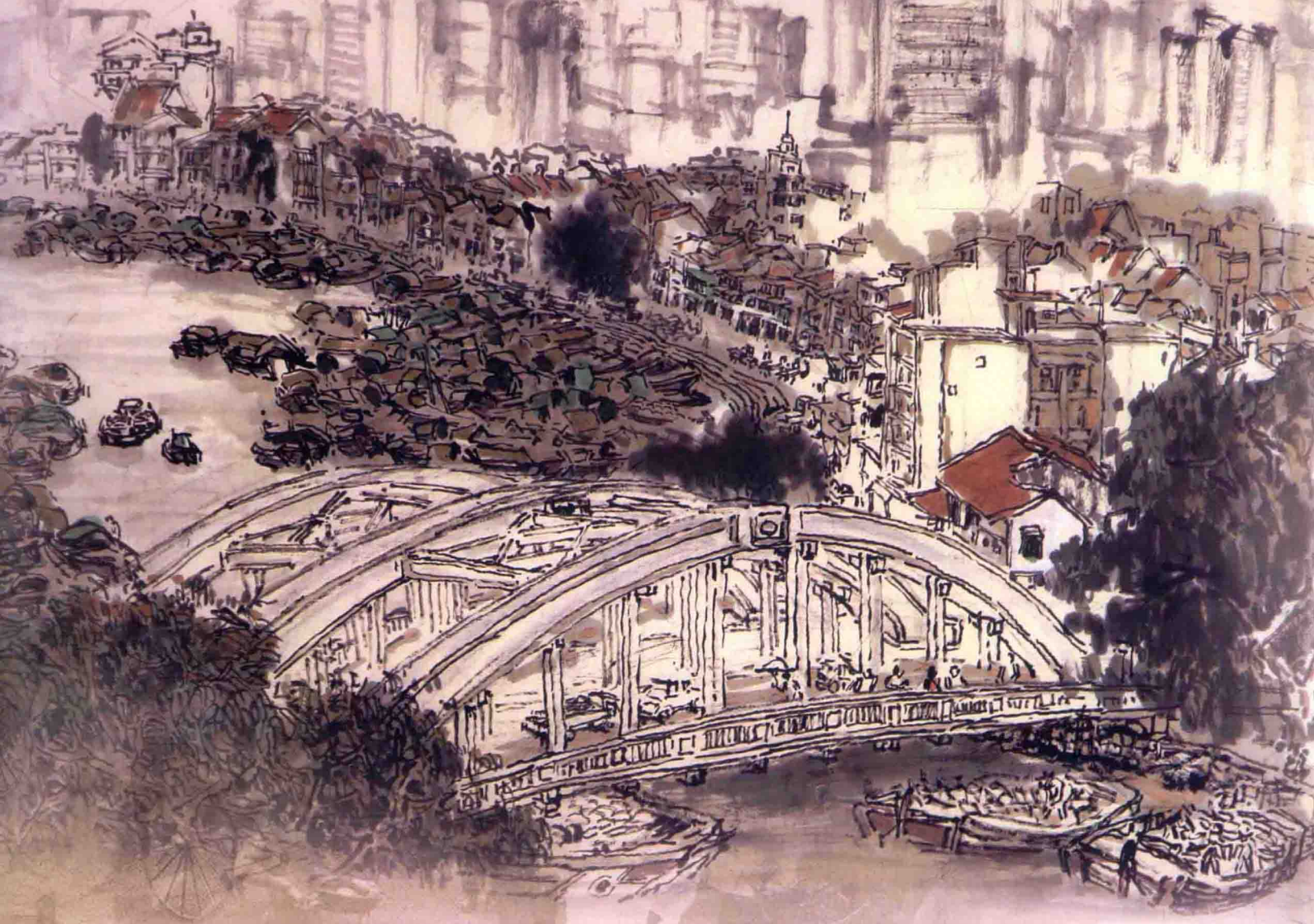
新加坡華人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新加坡華人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柯木林 主编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15年11月

《新加坡华人通史》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65) 6354 4078
Fax:(65) 6354 4095
www.sfcca.sg

编辑委员会
编辑顾问：蔡天宝　李国基
主　　编：柯木林
副　　编：林孝胜　张清江
审　　评：崔贵强
编辑委员：严孟达　黄坚立　容世诚　衣若芬　杨荘善
海外编委：梁元生　陈志明

设计：孔巍　杨华明
承印：深圳市新色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15年11月

ISBN: 978-981-07-9925-0

新加坡华人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目录

003 前言 蔡天宝

005 序 王赓武

007 导论 柯木林

023 第一章 海疆殊域 —古代新加坡 吴庆辉

045 第二章 移民与早期贸易

047 第一节 乘风破浪下南洋 — 早期华族移民浪潮 崔贵强

061 第二节 风帆时代的新加坡 — 开埠初期的中国帆船贸易 吕世聪 李业霖

075 第三章 新华社会

077 第一节 神权 · 绅权 · 帮权 — 帮权结构与帮权政治 林孝胜

093 第二节 闽帮精神 — 从恒山亭到福建会馆 林孝胜

113 第三节 广客帮总机构 — 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公所 曾 玲

129 第四章 清廷与华社

131 第一节 八方风雨会星洲 崔贵强
— 晚清官员访问新加坡

147 第二节 我视新洲成旧洲 林孝胜
— 中国驻新加坡领事

171 第三节 顶戴花翎 颜清湟
— 晚清“售卖官衔制度”与新加坡华人

189 第四节 晚晴园内外 陈丁辉
— 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华社会

199 第五章 迁民社会与峇峇社会

201 第一节 泽被功敷 杨进发
— 华族领导层与其政治变革

215 第二节 义结金兰 麦留芳
— 华人秘密结社的演变

231 第三节 一櫂冲开瘴海烟 梁元生
— 新华“士”阶层

245 第四节 海门奇葩 黄慧敏
— 峇峇文化

269 第五节 峇峇双杰 李元瑾
— 林文庆与宋旺相

281 第六章 报业文化

283 第一节 南渡衣冠 各领风骚 — 战前新加坡华文日报 崔贵强

301 第二节 从百花齐放到一枝独秀 — 战后新加坡华文日报 崔贵强 张 静

319 第七章 儒学与宗教

321 第一节 浮海居然道可行 — 新加坡的儒学运动 梁元生

331 第二节 三教合一 — 儒释道在新加坡的发展 徐李颖

357 第八章 出版物与文学

359 第一节 华风远被 — 开埠以来的华文出版业 李金生

373 第二节 与君话冷炎州月 — 新华古典文坛 柯木林

385 第三节 蕉风椰雨文学 — 新加坡华文文学 杨松年

399 第四节 东方红 — 左翼文学的文革潮 朱成发

413 第九章 风雨华教

415 第一节 开智启蒙 薪尽火传 梁秉赋
— 从华文教育到华文教学

425 第二节 华语还是方言 郭振羽
— 讲华语运动

439 第十章 文化与艺术

441 第一节 南洋画风 张夏帏
— 早期新华社会与南洋美术的形成

457 第二节 唱尽人间喜与忧 蔡曙鹏
— 新加坡的表演艺术

477 第三节 影视百年 叶舒瑜
— 华语电影与电视剧的发展

495 第十一章 家书抵万金

497 第一节 侨汇·侨批·民信业 柯木林
—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

507 第二节 华侨特有的专递服务 李志贤
— 各帮信局及其行业组织

533 第十二章 经济活动 林孝胜
— 华商与华资银行

555 第十三章 四海同心 义薄云天 林孝胜
— 抗日救亡运动

573 第十四章 昭南岛的沧桑 蔡史君
— 华侨“排斥论”与“利用论”交织下的军政

587 第十五章 政治运动

589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在新马 杨进发
— 其兴衰、贡献与影响（1912-1949）

603 第二节 默迪卡 陈 剑
— 独立斗争二十年

623 第十六章 建国之路

625 第一节 选贤任能 林金圣
— 历届大选与政治演进

639 第二节 因时制宜 陈 剑
— 独立后的国策与社会变迁

661 第三节 经济转型的新加坡 陈企业
— 回顾、反思与展望（1965-2020） 郭明忠 刘丹彤

675 第四节 现代新加坡之父 严孟达
— 耀眼的华人政治家李光耀 林孝胜

691 第十七章 缘聚岛国 欧雅丽
— 当代新移民

709 第十八章 两百年来谁著史 崔贵强
— 回望新加坡华人研究

729 附录一 新加坡历史大事记

735 附录二 新华先贤五十名

763 附录三 重点古迹与文物

790 附录四 参与撰写本书作者

793 附录五 主要参考资料

823 编后语

新加坡華人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柯木林 主编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15年11月

新加坡华人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前言

新加坡在开埠前曾是个荒凉的小渔村。经过岁月的洗礼，这美丽的岛国如今已跃升成赤道上闪闪发亮的小红点，是世界瞩目的国际枢纽。从简朴渔村到繁华都会，从开埠到建国，先辈们在历史上写下了一段段值得我们追溯、纪念与省思的故事。

今年我们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同时也喜逢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30年。为迎接这两个意义深远的里程碑，我们特别出版专著——《新加坡华人通史》，作为志庆献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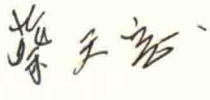
目前市面上没有一本从开埠至今，以新加坡华人为主线的全方位历史著作。宗乡总会开展此项目，不仅要记录本地华社的发展，更是本会对保存本土历史与文化不遗余力的决心。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一部跨世代的著作，内含18章，力邀海内外知名学者参与撰写及编辑工作。他们由老中青三代组成，来自各个专业领域，拥有深厚的学术研究背景。著作以1819年前的古新加坡为起始点，内容涵盖人文、社会、政治、经济、教育、艺术、宗教、出版等，当然也不忘记录珍贵的建国历程。我们将通过通史诉说先贤们披荆斩棘的艰辛与荣耀，不仅丰富了见识，也加深我们对他们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组家建国的魄力和毅力。

这本专著是新加坡华族历史的缩影，所有新加坡人、新移民甚至外国人都可以通过此书了解新加坡华人的历史，从而强化国人与新移民的归属感及身份认同。通史的出版，可以成为凝聚我国华社力量，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史册。

《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出版乃是一种回望，也是一项展望。相信借此机会能起到抚今追昔的作用，让国人进一步了解华族的奋斗历程与贡献，从而更加珍惜今日繁荣昌盛的硕果。冀盼各位读者都能从通史中，从先辈们的来时路上觅得前进的动力，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会长

2014年11月9日

新加坡华人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序

海外华人愿意遵守家人的乡土文化，知道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也欣赏古人的文艺成就，但是，很少人有机会认真学习。传统中国用经、史、子、集四类，来区分所有知识，把史夹在经与子之间，并不被大家注意。

新加坡建国经验很特殊。从马来国王的小港口，到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非常意外地成为独立国家，使须要她的多元民族社会统一，真是世界史籍里少见的。另外，还要在现代的国际秩序内，把这个共和国建立成一个“民族国家”，更是不容易。

这么独特的新兴国家，她的领袖们创国时，就排除任何既有的模式，也不接受各种炫目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国家的成败，要以实用主义来对付一切挑战。因此，建国过程中，面对多样的困难，都用这基本原理做建国的基础。但是，因为侧重实用，会有厚今薄古的倾向，连自己的历史，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在新加坡宗乡总会支持当地史学家写一部《新加坡华人通史》，实在是到时候了。

历史写作是多样性的，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历史观。《新加坡华人通史》著者的学术背景，当然是现代的、科学的。但是，仍旧值得我们斟酌，当地华人的史观，会跟中华传统史学有没有关系？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意识到先秦时期没有大家共认的“经”，到汉唐之间，经与史的分类才开始澄清，但是官场外则有各种佛教与道教的经册。到宋代，儒家理学哲人非常重视他们的经典，仍没能决定到底有多少种“经”。“史”的用途反而比较清楚，从华夏各民族开始有记录，就已经有整理史料的想法，之后，每个朝代的法政典章、食货、国防、地理形势等主要的条例，都成为治国制度和论政的框架。六经皆史的概念，就是说明，“经”并不是抽象的、玄妙的伦理道德，而是国家从历史教训集成的结晶。

海外华人仍有中国人的习气，或许会借鉴中国编史的经验。宋代之后的思想家，坚持用儒家的经书来主导思想，形成社会各阶层的共同价值观。他们编的启蒙读物《三字经》还教导儿童：“经子通，读诸史”，即先掌握“经”和“子”的学问，之后才得领会诸史的深层意义。可见他们已经感觉，要成熟的国家社会，才会知道“史”的重要。

实用主义是新加坡建国之本，能适用于多元民族的复杂环境，因为国内不同宗教各有不同的神圣经典，不能仅采用任何思想系统作为官方的“经”。至于“子”学，既然含有多样性的科学哲理和方法论，则很适合实用主义的原则。所以尽量鼓励官员和学生们，先把握各种科学技术和世俗思想，把这些当作他们教育的出发点，才符合新加坡的理想和需要。

“史”的性质不同。如果借鉴中华文明的惯例，则其范围不限于近现代的历史写作和研究，或各种史法或史观。那么，一个国家从开国到现在，所有关于建立政治经济体制，保卫边疆领土，治理社会安定的一切记录，都很宝贵，是建国必有的知识。如果用现今的术语，这就要包括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报告与资料。因此，要了解“史”的原意，才得明白它广泛的作用，才能把那些非常丰富的治国资料，充分地用来促进新兴国家的进展。

或许有人会觉得，新加坡共和国没有一个公认的《经》，非常可惜。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学者们能撷取前后数百年的宝贵经验，采取新颖的观点，用生动的文字，撰写一部华人通史，就可以像中华传统那样包罗万象，拥有综合性的治国“史”。这样来集成本国华人及其团体的各种经验，再融合国内的多元民族社会，一同建成一个又先进、又繁荣的国家，是个多方面的贡献，就不须另再寻“经”。这是“史”的基本中华性，能够藉它来建立一套以史为鉴的现代建国原则，是个伟大的工程。

让我恭祝同行的史学家们，成功的以史代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教授

2014年9月12日

新加坡华人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导 论

中华民族可说是世界上最富历史感的民族，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保有自己完整历史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不是凭空捏造的，这不仅有文字记载，也有出土实物为根据。在纸张未发明之前，中国的历史先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甲骨文），然后是铸于青铜器（钟鼎文），接着是用漆书写于竹简上（竹书）。从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至今，保存自己的历史，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国历史上的史官体制也是世界闻名的。从周代开始完善的政府主导的史馆，一直遵循严格的职业规范，忠实客观地记录一朝一代的君臣言行，并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连皇帝也不容易过问史官撰写的内容。史官有崇高的操守，为了维护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可以牺牲生命，这就是“董狐之笔”。以后各朝的史馆，不仅要修撰本朝皇帝的起居注，记录朝廷大事，保存与整理原始档案，还要编修前朝史。此外，民间私修的历史、野史、笔记、小说，也多少保存了某方面的历史面貌。

中华民族这种优良的传统，随着移民被带到海外移居地来。海外华人在重大庆典时都会出版纪念特刊，就是很好的例子。近年来，新加坡华族社团从单纯的特刊出版，又提升到整理整个华族社会的资料，并细分至族群的历史，如《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1986年）、《新华历史人物列传》（1995年）、《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2012年）、《江夏风云人物》（2014年），及2015年3月出版的《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与《走近新加坡柯氏宗族》（计划于2015年8月出版）等等，均系代表。

华族社群各自表述自己的历史文化与人物事迹固然重要，但毕竟是局部与片面的。作为新加坡华社最高领导机构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简称宗乡总会，英文简写SFCCA），因有鉴于目前世面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华人通史，乃认为有必要完成这项历史性的工程。

2013年9月18日，在第14届理事会暨执委会第七次会议上，一致通过编写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决定，以填补这个空白。会议决定后，便交由学术委员会负责执行。作为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我，乃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新加坡华人通史》全书的统筹与编撰工作。

记得在一次《联合早报》访谈中，我曾表示最大的愿望是“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撰写一部从1819年到今天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通史”[1]。但基于种种局限，这个计划一直无法实现。如今23年过去，弹指一挥间。2015年适逢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暨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庆典，际此双庆时节，编撰出版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华人通史，意义非凡。

然而《新加坡华人通史》工程浩大，最大的挑战就是制定全书纲目。由于这是一项全新工程，完全没有前例可循。唯一可资参考的是几部当年殖民地官员所撰写的英文典籍，还有就是一般的历史著述。我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数易其稿，最后才敲定全书各个章节的纲要。尽管如此，在整个编辑过程中，还是不断地修改。

通史是一种体例

通史是史学著述的一种体例。通过这种体例，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历史，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多种领域的文化等。在叙述中要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轨迹或贯穿其中的线索，让读者对历史有整体的认识。

因此，《新加坡华人通史》内容浩瀚，涵盖领域广，时间跨度大。全书从开埠前的〈海疆殊域〉到经济转型；从上层社会的领袖人物到基层人民的生活样相；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从华商、华侨、华裔到新加坡华人；从文化认同、政治觉醒到本土意识的萌芽、茁壮与成长；从本土的意识形态如文化、教育、文学（包括古典诗文）、乃至出版、戏剧、美术、影视活动及表演艺术等等，都有着墨。有些“争议性的历史课题”如秘密会社（俗称私会党）、中国国民党、马来亚共产党在本地的活动，亦不避

[1] 区如柏，〈沉醉在历史的海洋中：柯木林希望续写新华历史〉，载《联合早报》，1992年11月23日。

讳。这样做的目的是忠实于历史，让读史者更能全面地窥视新加坡华人史的全貌。

我们以全方位、多角度来撰写这部通史，希望在内容及体例上有所突破。在编写过程中，翻阅旧报刊，档案资料，倒有不少惊喜与发现。本书开章篇〈海疆殊域〉，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古代新加坡的图景。在莱佛士登陆前的500年，大约在公元1300年的时候，当时被称为淡马锡、单马锡（Temasek）或龙牙门的新加坡，是一个商港及海盗渊薮[2]，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近年来岛上各地发掘的出土文物如宋、元及明初的瓷器与钱币，以及1984年新加坡考古发掘出土的14世纪文化层遗物，显示这里是个商港。汪大渊（1311-1350）的《岛夷志略》（1349年）纪录了1330年与1337年的旅途，是个佐证。当时新加坡岛上已有华人居住，并与中国通商。汪大渊告诉我们，海盗专劫掠回航商船，和泉州通商的货物"皆瓢窃之物也"[3]。

然而，这段历史只维持了大约一百年。古代新加坡在17世纪开始没落。接下来两百年，新加坡陷入浑沌状态，直到莱佛士开埠为止。如果新加坡华人史从14世纪说起，或自1819年上推500年，亦不为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莱佛士开埠新加坡不是偶然的，肯定是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决定的。莱佛士开埠新加坡的意义，在于重启古代新加坡的繁荣。新加坡在开埠后短短的五年内就迅速发展为东南亚的区域贸易商港，是有其历史轨迹可寻。

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天然形势，加上历史及人文发展的因素，决定了新加坡必然成为本区域的贸易重镇，同时也产生了促进东西文化交汇的气候，与孕育多元文化的肥沃土壤。700年后，新加坡在整个区域以及全世界所处的形势，从殖民地时期直至今日，基本上并无太大的改变；新加坡曾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地位亦有增无减，多元种族与文化的社会特色，本质上仍旧和古时候的情况相同。

开埠初期，由于各种建设需要大批和建筑业有关的劳工、技工与木工，吸引了华人拓荒者先后从槟城、马六甲、廖内群岛及中国沿海的福建、广东两省，分四路到来新加坡。19世纪中叶，经过这波移民浪潮，新加坡华人社会基本形成（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1821年2月1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第一艘中国帆船从厦门直航新加坡。从1827年开始，《新加坡纪事报》（*Singapore Chronicle*）就不断报道华工随中国帆船到来新加坡的消息。中国帆船带来了早期新加坡的繁荣，对开埠时期新加坡的经济贡献殊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风帆时代的新加坡〉清楚地描绘了早年中国帆船的贡献。

自1836年以来，华人是新加坡的最大族群，华社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稳定。从殖民地到建国后的国际和外交关系，这个特殊的"华族"因素一直困扰不休。基于这个原因，殖民地政府对清廷（中国）在新加坡设置领事不只特别敏感，并感到不安，主观上认为清廷领事企图控制新加坡华社及传播"亲中国"的政治思想。历史上两国政府在"设领"的问题上一直纷争不断，说白了，亦即是两国政府对海外华社的"领导权之争"。

中国驻新加坡领事一章，阐述了历史上新中关系的来龙去脉。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首任专业外交官左秉隆领新期间（1881-1891），领事馆馆址时常搬迁，原因不详，学者可进一步探讨。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列表志明了从晚清、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的驻新领事名单及馆址，很有参考价值。

清朝驻新加坡领事的情况，目前已有专著，如温仲佶（Wen Chung Chi）的 *The Nineteenth-Century Imperial Chinese Consulat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1964年新加坡大学硕士论文）；及蔡佩蓉的《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2年出版）等。但民国时期的驻新领事这课题，向来涉及者少，该章节（第四章第二节）对其中最后几任民国领事，如唐榴、高凌百、伍伯胜作了简略的介绍，还有许多空间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至于当代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的研究，目前还是空白，这是学者可以开发的研究领域。清朝驻新加坡领事是在殖民地时期；独立后的新加坡共和国与中国建立的，是大使级的外交关系。2015年适逢新中建交25周年，回顾这段历史，颇有一番感受！

---

[2] 单马锡，见汪大渊，《岛夷志略》之"龙牙门"条；《郑和航海图》译作"淡马锡"；美籍考古学家约翰·米西克（John Miksic，1949－）曾率领学生于新加坡进行田野挖掘工作前后长达28年，然后将成果编写成书 *Singapore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于2013年出版。

[3] 《岛夷志略》之"龙牙门"条。

1900年，以康有为（1858-1927）为首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1866-1925）为首的革命派，不约而同地来到新加坡。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七次进出新加坡鼓吹维新和保皇思想；而孙中山也先后九次来新宣传革命，并在此策划了其中三场起义。他们两人在这里的活动，引发了本地华社对中国政治关注，“启蒙并扩大海外华人对祖国政治参与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两股政治力量相互竞争，彼此对立而致内部分裂的同时，也促使本地华人群体政治化的过程，“从而形塑了海外华人中华民族主义的认同”，对新马华人社会的政治思潮产生深刻的影响（第四章第四节）。

由于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政治动员，让地处南洋边陲的新加坡，一跃成为区域内推动和改变中国前途的政治中心。新加坡同时扮演保皇运动的总部，及革命运动的基地，致使本地华人，在对辛亥革命成功后接踵而来的共和、讨袁、北伐、抗战、国共斗争等中国政治动态，都有所回应。百年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播下的政治种子，持续在新加坡华社的土壤发酵成长。这种“内向之心”（亲中国）的现象，一直到二战结束、新加坡争取自治及独立后，本地华人社会的政治认同，方才逐渐由中国转向新加坡共和国。

新加坡早期的华族移民，主要是来自马六甲的漳泉商人，和中国沿海闽粤两省的移民。移民群中说不同方言所造成的隔阂而形成的“帮”，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的特征。在新马，“帮”的表现较东南亚其他地区突出。不同方言群体都设立自己的宗庙、崇拜不同的神祇、创建自己的义山，组织自己的地缘、血缘与业缘的会馆。此外，各帮还有各自的私会党。因此，“帮权政治”是新加坡华人史的重要课题。19世纪新华社会的“帮”与“帮权”的局面，殖民地政府并不干涉，反而使其合法化。帮权是绅权的基础，而绅权的取得，需要神授。在这样的背景下，庙宇的社会功能除宗教信仰外，更多地承担着政治的角色。庙宇的建设和管理者都是有名望的商人，这些商人同时又是华社的领袖和帮权政治的核心人物（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及第七章第二节）。

帮权特征也表现在移民时代的华商世界，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帮权和行业的关系。移民由于生活在陌生的多元种族环境，往往靠语言相同的同乡引介进入同乡从事的职业，造成某帮群多数从事某种行业的现象。如来自马六甲的华商控制转口贸易、潮商独霸胡椒甘蜜种植业、广客商分别垄断酱油与当铺业等。另一层面是各帮分享同个行业，但根据帮权结构占据各自地盘。例如汇兑或民信业就有闽、潮、广、客及海南帮群的汇庄。华资银行起初也是有鲜明的帮权色彩。行业的帮权结构是一双面刃。初期有助于企业建立商业网络，但当企业发展到成熟阶段就必须跨越帮界，甚至华社和国界，走向区域。否则，帮权结构便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除了经济大势外，建基于帮权结构的民信业的没落为一佳例（第十二章）。

由于新加坡一开埠就制定自由港与自由贸易政策，鼓励经济发展，这意味着商人的地位要比其他阶级重要，商人阶级是新加坡社会的中坚份子。自由港、商业至上和商人至上不但决定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的经济体系、商业社会的本质，也影响了华社领导层的模式。财富、威望和权势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那些来自马六甲的土生漳泉商人，通过建庙作为团结族人的中心而赢得绅权（帮领导权），并垄断了闽帮的领导层。巩固绅权也要得到当政者的认可，华社领袖向清朝政府捐官，或希望殖民地政府授予荣衔，此为重要原因之一。

新加坡华族领导层一开始就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华社领袖不仅要有钱，还要肯出钱，并能配合殖民地政府的政策，才能有效地为新华社会作出贡献。这种传统至今犹然，百年不变。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三节，和第五章第一节阐述了上述的史实。

1880年代，殖民地政府设立英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鼓励与教育土生子弟。1890年代以后，从英国学成归来海峡华人，壮大了亲英与亲英国文教领导层的行列。一个“皇家华人”（King's Chinese）的领导层模式终于出现。这与来自中国且具草根性的领导层，形成对照。

就是由于这种分化政策，使得早年的新加坡明显地分为迁民社会（Immigrant community）与峇峇社会（Baba community），两个社会都有各自的精英。这两个社会的分化一直到日本南侵之后，才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汇合成一股抗日洪流。陈嘉庚（1874-1961）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Nanyang Federation of China Relief Fund，简称“南侨总会”NFCRF）在这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

二战期间，日本给侵略区人民造成的痛苦是灾难性的，幸存者至今记忆犹新。在新马，反日浪潮源自1928年的济南惨案。但当时的“山东筹赈会”只有“反日情绪”而无“救亡概念”。嗣后〈田中密摺〉[4]曝光，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华野心已暴露无遗，整个舆论界才如梦初醒，开始铺天盖地传播田中奏折。单在上海出版的《日本田中侵略满蒙积极政策奏稿与注释》，不到一个月竟印了24版。新加坡三大华文报，《叻报》、《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也分别于1931年10月9日，10月13日及10月22日以大篇幅连载田中奏折，唤醒侨民的抗日救亡意识。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与新马及其他海外华人地区，才有亡国危机感，才萌发“救亡意识”。1937年的七七事变，一个以新加坡为基地，由陈嘉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个空前绝后的爱国爱乡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旗帜下，新马华人，不分男女老幼、政治意识、籍贯、富商、劳工、知识分子及学生，大家团结一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私忘我地到处奔波筹赈救国。除筹赈救国外，更大的意义在保护他们的“第二故乡”。“南侨总会”的抗日救亡决心坚持到最后，直至新加坡沦陷前夕，陈嘉庚等人才离开前往印尼避难。本书的第十三章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新加坡，结束了英国在新加坡长达123年的殖民统治，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三年八个月”的军政统治。“三年八个月”是新加坡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华侨大检证”、“南京大屠杀”与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并列为二战期间日本军政的三大污点。新加坡在“大检证”期间（1942年2月21日到23日）到底牺牲了多少人，至今仍有争议。本书第十四章指出，当年死难者“应在五万人以上”。该章亦对“华侨协会”（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在军政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贡献”作了历史的评价：“华侨协会”并不是“出于保护华侨、或为华侨社会谋福利而创立”。相反的，“华侨协会”是始终“为日本军政当局效犬马之劳，并出色地履行了‘大日本帝国’所赋予的、傀儡团体的职责”。

必须一提的是，“三年八个月”日治时期使新加坡华人认识到，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是摆脱外来势力控制的唯一道路。华人必须改变、并放弃战前不参与当地政治的移民思想，而应该落地生根，与其他民族并肩奋斗，自己当家做主，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才不会重蹈那黑暗的“三年八个月”的覆辙。从这角度看，“三年八个月”是警示人民必须反抗一切外来侵略，并立志当家做主的“反面教材”。2015年乃和平70周年，居安思危，重温这段历史，是否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二战后，东南亚掀起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运动，争取独立自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殖民地政府严厉管制华人到中国旅游、探亲及升学，也不准中国移民的到来。在这国际大势下，华侨正处于十字街头，有一种有家归不得的感觉，也有衣锦还乡美梦破灭的失落。一般华人普遍对中国新政权既不了解也没信心，回去是条不归路。既然不想也不能“落叶归根”回国，只好调整心态作“落地生根”的打算。这是二战后华社帮权政治转型，以及华人归属感由“华侨”到“在地华人”转向的基调，最终入籍成为新加坡公民。

曾经的文化重镇

峇峇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是南洋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其奇异缤纷的色彩。由于外人对峇峇不谙“汉语”的印象，峇峇常被讥笑为“OCBC”（Orang Cina Bukan Cina是华非华），甚至被批评为“数典忘祖”。其实，传统峇峇家庭更懂得“慎终追远”，神主牌曾是峇峇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婚嫁礼俗方面，峇峇沿袭明清时期的华南古礼，而且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其庆祝仪式甚至比一般华人更为传统。只是经过二战的洗礼及时局的变迁，峇峇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出现了断层而更显西化。本书第五章第四节对峇峇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有精彩的分析，值得一读。该节亦整理了一份“新加坡峇峇的华文作品列表”，很有史料价值。

侨汇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过去中国的入超（贸易逆差）就靠侨汇的弥补，当年新马侨汇占世界侨汇的七分之一。侨汇与侨信是“银信合一”的特殊家书，俗称侨批。新加坡曾是侨批的区域中转枢纽，周边国

[4]《田中密摺》或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家要寄侨批回中国，都集中到这里再转寄出去。经营侨批业务的民信业，在新加坡战后初期如雨后春笋，极一时之盛。我们特辟一章〈家书抵万金〉（第十一章），来阐述这一段历史。侨批的内容反映了低层人民的生活样相，填补了官方档案中对基层史料记录的某些空白片段，补正史之不足。今天，侨批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记忆遗产[5]。

自开埠至今一百多年来，华商在新加坡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新加坡虽然是个商业社会，但第一间银行，加尔各达联合分行（The Union Bank of Calcutta）却迟至1840年才设立。63年后（1903年）第一间华资银行——广益银行出现，那时距新加坡开埠已经84年了。1912年9月，华商银行在新加坡注册。20年后的1932年，华商银行、和丰银行（1917年成立），及华侨银行（1919年成立）合并为华侨银行有限公司。今天，华侨银行乃是新加坡三大银行之一。

1929年开始，全球经济大萧条。与此同时，日军侵华及日本企业南进东南亚，更使华人企业和华资银行面临空前经济危机。日本对新加坡华商的打击不纯粹是商业竞争，而是政治对抗。由于新加坡华商是援华筹赈会的骨干，击垮华商是日本侵略中国大计划的一部分，本书第十二章述之甚详。

从历史上看，新加坡也是一个中华文化重镇。20世纪初，以邱菽园（1874-1941）、林文庆（1869-1957）为首的新加坡华人，极力宣扬儒学、提倡孔教、推行建孔庙、兴学堂的计划，使孔教得以在海外继续发展，新加坡一度成了孔教复兴运动的中心（第七章第一节）。50年后，全东南亚唯一一所民办华文大学落户新加坡，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还有，新华古典诗文、蕉风椰雨文学及美术绘画、影视等等，在这里亦有其光辉灿烂的时刻。

早期新加坡这块被称为“化外之民”居住的海疆殊域，许多文人雅士都不愿到此。所谓“地气人俗殊中华，从来名士至者寡”，毫无文化可言。尽管如此，19世纪中叶仍有不少南来文人，基于种种原因，路过或在此作短暂停留，形成了独特的新华“士”阶层文化（第五章第三节）。他们写下许多经典的古诗文作品，对星岛及南洋风物，有所咏赏，成为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新华古典诗坛在新加坡曾经热闹过一段时期。

可惜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一切都变了！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语文也变了。许多土生的新加坡华人中文水平不高，甚至不谙中文，新华古典诗文终于淡出历史的舞台（第八章第二节）。

随着新华古典诗文的式微，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来的中国文人和土生土长的华人，在蕉风椰雨飘摇的道路上，共同负起推进新华文学的任务。1950年代，由舆论界、文化机关、学校、学生组织所发起的反黄运动，使新华文学活动获得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也使文学的社会活动有了可以发展的空间。在反对黄色文化，建立健康文艺的基础上，促成星华文化协会的成立。星华文化协会在往后政治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书第八章第三节对此有详细的分析。1966年，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新华文坛泛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红潮，第八章第四节亦触及了鲜为人知的新华左翼文学。

早期的东南亚，报章是推动当地文学的主要力量，新加坡的情况也是如此。《叻报》是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第一份以报纸形式出现的华文报，《叻报》之后的《天南新报》（1898年5月26日-1905年4月30日）、《星报》（1890年2月14日-1898年杪）、《南洋总汇报》（1905-1947）等等，为我们保留了早期新华社会的重要史料。更难能可贵的是，《叻报》创办人薛有礼（1851-1906）竟然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从1881年《叻报》创刊到1983年本地两大华文报章《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合并为今天的《联合早报》，华文报章从“百家争鸣”到“一枝独秀”，新加坡华文报业102年的历史，可从本书第六章窥视情况。

海外华人向来重视教育。新加坡的华族先辈当年积极办学，便是旨在让年轻的一代，能接受知识的启蒙，文明的教化。虽然英国殖民地政府治理新加坡一百多年，但一直没有把提供义务教育作为其施政职责。到了战后，这一情况才开始改变。所以，在此前百年以上的时期内，本地的华校都是由华社自资兴办。正是因为社会上有这样的需求，让我们看到了在政府没有提供义务教育的那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是华校为新加坡承担了绝大多数孩童教育的社会责任。自1849年崇文阁开创，至1955年南洋大学成

[5] 2013年6月19日，在韩国光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IAC）第11次会议上，由福建、广东两省联合推荐，中国国家档案局申报的“侨批档案”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侨批涉及的地域包括中国东南沿海的闽、粤、琼与东南亚各国。

立，新加坡华文教育经历有百年的风雨历程。1986年，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华文教育转型为华文教学（第九章第一节）。

本书第九章第二节还谈到“讲华语运动”（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讲华语运动”自1979年至今已臻36年。有趣的是：早在1898年，林文庆就在其寓所、安祥山（Ann Siang Hill）的威基利俱乐部（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和英华义学（Anglo-Chinese Free School）开办华语训练班（又称新加坡官话传习所，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积极推广华语。这是最早的“讲华语运动”，林文庆可说是新加坡“讲华语运动”的始祖。

说到林文庆，不期然地想到宋旺相（1871-1941）。林文庆与宋旺相两人不仅是“峇峇双杰”，也是新加坡华人史上的杰出人物。这两位都是英女皇奖学金得主的海峡华人，彼此惺惺相惜。但两人的思维，还是有差异。林文庆内心有“星洲”（新加坡）也有鹭岛（厦门），有英国也有中国；宋旺相只爱一乡一国，即新加坡和英国。通过对这两位海峡华人的探索，可以窥探百年前峇峇社会中，两种受英文教育群体的精神世界与生活状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本书第五章第五节对此二人亦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像林文庆这样学贯中西的双文化精英，成为各领域的领导人。

一般研究美术史的，都以1938年创办的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作为新加坡美术的嚆矢。我们在编写《新加坡华人通史》时，从史料中发掘了“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才是新加坡美术界的开山鼻祖。1922年，由潮帮殷商陈若愚（1866-1939）的三公子陈秉锽创办的“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较之1938年林学大（1893-1963）的南洋美专，还早16年。从《叻报》的记载上看，这间设于“皇家山脚吊桥头门牌第二十二号”（即现今克拉码头Clarke Quay一带）的“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已具相当规模。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把中国画与西洋画列为正科；木炭、水彩、粉彩、铅笔画列为选科。正科面授为期两年、函授三年；选科面授三个月、函授四个月。一开始报名就读的人数就有50多人。也许因为学院的存在短暂，成立两年后即停办，所以历来甚少有人注意到这新加坡美术史上的开路先锋。但它成立于闽帮人数最众多、最富有的方言群体的华社里，具有特别意义。那个年代，五四运动已经波澜壮阔地展开，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所倡导的思想意识，代表了当时海外华人，或更具体的说是潮籍侨民，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应。我们在本书恢复了“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的历史定位，同时肯定了新加坡画坛的潮人现象（第十章第一节）。

新加坡电影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02年第一场露天电影的放映。早期旅居新加坡的日本人也从事电影放映的行业。不过，早期在南洋一带最受欢迎的电影不是华语片而是粤语片。有关早期新加坡影视资料，可参考本书第十章第三节。

虽然新加坡建国至今只有50年，但选举却已有67年的历史。从1948年的第一次选举到2011年，新加坡共举行了16次选举，其中5次是在独立之前举行的。令人诧异的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选举，是一个以印度人为主的选举。本书第十六章第一节对新加坡16次的选举，有独到的解读。

海峡华人领袖争取宪制发展始于1920年代。陈祯禄是第一位海峡华人提出马来亚自治的理想。至于新加坡争取独立的斗争，可从战后的1945年8月15日起，直至1965年8月9日，历经20年始真正建国。其过程多变，既曲折又艰辛。从伦敦谈判开始，到中华总商会领导的争取公民权运动，乃至推动华人参政，推动选民登记，争取废除议院语言限制等等，华社有识之士及时作了对国家认同的转向。这反映在1947年底爆发的“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战。然而，此期间的国家认同，只是初步阶段。直至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人民的国家意识才逐渐浓烈（第十五章第二节）。

李光耀是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下培训出来的精英，他的出现，把海峡华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当地社会的贡献，推向一个高峰。他个人是新加坡的代名词，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他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他领导新加坡期间，对华族社会的贡献，不是三言二语所能概括。新加坡华人史绕不过其身影，他是建国总理，现代新加坡之父，无庸置疑。本书第十六章第四节重点评析了新加坡在李光耀掌舵下的建国艰辛之路，也凸显他的高瞻远瞩，如何通过精明的战略和策略来克服无自然资源的弹丸岛国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及人才发展的局限，而

在困境中发展出特殊但有效的建国之道（法治、清廉、威权、民主）。

独立后的半个世纪中，新加坡从一个转口贸易港，转化为迈向知识经济的后工业社会；人均收入从1959年的600多元，提升到2014年的6万多元；国势从第三世界跃升为第一世界。这种成就，确实令世界刮目相看。然而，新加坡的成功秘诀到底在哪里呢？本书第十六章第二节及第三节对独立后的国策、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有详实的分析。

新华历史的脉络

迄至建国以前，中国政局及其中央政府的侨务政策，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华族社会。从清廷驻新领事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19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本地华族社会都有深度参与。战后中国国民党对华族社会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因此，从晚清设领以后，殖民地政府对华族社会的效忠问题，始终耿耿于怀。华族社会亦因中国政局问题而分化：最初是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后则有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党派之分。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翔实记载了上述重大历史事件及华社的尴尬处境，并对此问题作了总结性的论证！

新加坡历史浅短，但在这绵延近二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从1819年至今，其间历程风雨沧桑，人物事件，纵横复杂，要理顺因果关系，并非易事。新加坡华人历史的脉络，在1965年建国前基本清楚；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华人史这条主线就逐渐模糊了。1965年以后，新加坡华社无论在社会、经济、国家认同及社团转型等层面上，都与以往不同，这也影响了华人历史的走向。

新加坡社会与市区景观，在建屋发展局（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简称HDB）与市区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简称URA，成立于1974年4月1日）成立后，有很大的改观。尤其是1960年2月1日建屋发展局成立后，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下，解决了市区住房拥挤的问题，使新加坡的市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殖民地政府所规划的同一方言族群聚居一处的现象，消弭于无形，有利创建一个多元民族的全民社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重组，独立后的新加坡华人企业，打破过去帮权和行业的关系，与传统家族企业模式，利用现代理念，聘请专业人士，提升企业的形象与管理，甚至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跨国公司一较高低。华人企业除了银行金融外，也出现了不少新兴行业，如科技公司、房地产发展商等等。2015年2月6日，陈庆炎总统在中华总商会举办的“新加坡建国50周年杰出华商奖”颁奖仪式上，亦肯定了华商在新加坡发展初期的贡献。

由于社会的变迁，以往照顾宗亲族人的宗乡会馆，已完成了时代的使命并且转型。本土意识提升为国家认同，也即是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华族帮群意识从此淡化，这一切都是建国之后新华历史发展的重点。

华人宗乡会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近百年的新加坡华族历史上，会馆曾经扮演重要的角色。从转化中得到新生的宗乡会馆，再度肩负起新的历史任务，成为强有力的民间华族文化机构。因此，建国以后的新华历史发展，可以宗乡会馆的活动为代表，侧重撰写宗乡会馆的活动，跟影响整个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重要政策。建国后宗乡会馆的活动，主要表现在发扬与保留母族文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配合既定的国策。1986 年1月27日成立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是新加坡华人史上的大事。宗乡总会成立的意义，在于抢救华人意识和维护中华文化的传承。本书第十七章总结了宗乡会馆在促进融合新移民所作的努力。

由于这是一部通史，各个篇章与篇章，章节与章节之间难免有重复之处。解决的方法是负责篇章的撰写者，对其研究领域的编写，顺其历史脉络，一气呵成。我们希望《新加坡华人通史》既是一部通史，也是新加坡国志的一部分。必须强调的是：本书第十八章阐述了过去二百年来，即从殖民地时代开始至今的新华历史研究概况及重要著述，使学者能更清楚地了解近当代新华史坛的基本轮廓。若干年后，这将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献。

《新加坡华人通史》全书分18章41节。书末除参考书目和参与撰写本书作者名录外，还有三个附录：〈新加坡历史大事记〉、〈新华先贤五十名〉、〈重点古迹与文物〉。这三个附录简单介绍了50件与华人有关的新加坡历史大事、50位华族历史名人及50处文物古迹。50这数字代表建国50年，附录的作用可让读者在短时间内了解新加坡华人历史。

这里要对其中的一个附录稍加说明。附录二〈新华

先贤五十名〉列举了50位新华先贤，我们对这批先贤作了详致考证。譬如陈笃生，根据《海澄峨山陈氏族谱》所载，他原名陈卓生，“生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三月十二日戌时，娶李贵郎官之女名淑娘”。一般史书都记载陈笃生生于1798年，实误。陈笃生英年早逝，辞世时年仅43岁。陈笃生祖籍福建省海澄县。直至2010年3月，其后人陈继廉从新加坡回乡寻亲时，发现《重修苍头社石路捐缘碑记》（光绪卅一年，1905年）中，陈武烈（陈笃生曾孙）捐龙银150大元，始确定其故乡具体地点即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仓头村后许社[6]；又譬如张永福，一般史书都记录其卒年为1957年。但在2011年1月，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研究小组，在香港砧石山的志莲淨院，找到张永福“莲位”，清楚志明张永福是“终於民国己亥年二月廿八日酉时”，民国己亥年为公元1959年[7]；还有胡文虎的永安堂是1926年在新加坡创立，而非传统说法的1923年[8]。至于其他先贤如薛佛记、刘金榜、林文庆、林秉祥等等，我们对他们的祖籍地都具体到乡镇的位置。这样做是要达到保存史料的目的。

本书各个章节均由研究该课题的学者负责撰写。选定合适的写作者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这项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有些原本已答应撰稿的学者，嗣后又因个人因素而退出编写团队，在物色人选方面确实颇费周章。

我们邀请的多是当前研究华人史的著名学者。所涉及的国家与地区，除本地外，还有来自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澳洲等地。在编写团队中，也有新加坡的新移民参加。新移民要融入新加坡的主流社会，首先必须要了解该社会的历史。参与史学著作，无疑是最好的入门。本地学者与新移民联合撰写新加坡华人历史，对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起了积极的模范作用。

从撰写者的年龄层看，可谓老中青三结合。这部通史也为年青学者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年青学者加入编写团队，选择其所熟悉的，或正在研究的课题撰写，这是刻意的安排。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必须要有传承才能持继永恒。不过，在让年青学人撰稿的同时，我们亦安排该课题的专门学者负责审阅稿件，以统一全书的质量。

为避免《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内容过于繁杂，每篇章节字数尽量控制在1万5000字左右。换言之，每个篇章的撰写者，以其丰富的学养，将研究精华浓缩在1万5000字的行文中。当然有些章节是超过规定的字数，这是不得已的事。每个篇章前均有150字的中英文说明，浓缩该章的内容概要，为日后有志深入研究者作了提纲式的启示。各个章节均署有撰写者名字，以示文责自负。

历史的长河是割不断的，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总是有其必然性。昨日种种原由导致今日之果，其理至明。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历史图景，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层面上，未免涉及至今日，这就是本书不设下限的原因。

为了确保《新加坡华人通史》可以在2015年11月顺利出版，我们在2013年初就开始工作，并且把截稿的时间订得很早。这样编委会才有足够时间审阅、修饰并统一全书文字。编辑委会成员除了历史学者、大学教授外，还包括了古建筑学家、文学研究者、人类学者、翻译工作者、报人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此全方位的编辑团队，能更全面地看待与解读历史问题。

编委会的主要职责，除了设计全书大纲，修饰各篇章外，就是重新审核存疑的史料。由于历史图片最能忠实地再现历史场景，每个篇章至少附有三张插图。我们在遴选历史图片方面，不仅要求与内容文字有关，同时要注意图片本身的原始性。除了一些基本图片外，尽量采用未经发表过的。

我们现在所做的是逆水行舟的工作。城市化、现代化、商业化的结果，已迷惑了我们的理智。缺乏人文思维，注重眼前利益之争的心态，充塞整个社会。如果我们这一代再不把自己的历史整理出来，可能就“后继无人”了！从这意义上说，《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出版，正合时宜。

新加坡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到国际大都会，从单元经济转型到多元经济，新加坡的华人与其他各族人民在这里胼

---

[6] 此碑于海澄镇仓头村后许社会庵宫发现，参阅2010年3月24日《厦门网》的报导。

[7] 根据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副馆长叶璞提供的资料，2010年12月27日至29日，在美国旧金山位于San Mateo的住家采访张永福的次女张健华（时年86岁）时，张女士就告以其父张永福的牌位安置于香港砧石山附近的一座庙宇。2011年1月，晚晴园研究小组终在志莲淨院找到张永福的“莲位”（列号“有0177”）。除叶璞本人外，时任馆长潘宣辉及研究部主任陈丁辉博士亦在场。

[8] 永安堂创立的年代，〈维基〉及〈百度百科志〉志明1923年但无资料来源。这里乃根据沈仪婷的《谱写虎标传奇：胡文虎及其创业文化史》（201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改为1926年。

手胝足，共同创造了今日的繁荣。新加坡从荒芜到进步，不是一蹴而成，至少已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本书也只是概述其间的几个重要环节而已。

这本《新加坡华人通史》封面题字出自本地书法大家曾广纬，封面设计则取自著名画家林子平于1980年所作之“新加坡河”水墨画，由孔巍小姐特效加工处理而成。本书出版得到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的赞助，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开放参考资料，特此致谢！还有蜚声国际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的序文，确使本书增色不少！

《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

2015年7月5日 · 新加坡

目录

003 前言 蔡天宝

005 序 王赓武

007 导论 柯木林

023 第一章 海疆殊域 —古代新加坡 吴庆辉

045 第二章 移民与早期贸易

047 第一节 乘风破浪下南洋 — 早期华族移民浪潮 崔贵强

061 第二节 风帆时代的新加坡 — 开埠初期的中国帆船贸易 吕世聪 李业霖

075 第三章 新华社会

077 第一节 神权 · 绅权 · 帮权 — 帮权结构与帮权政治 林孝胜

093 第二节 闽帮精神 — 从恒山亭到福建会馆 林孝胜

113 第三节 广客帮总机构 — 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公所 曾 玲

129 第四章 清廷与华社

131 第一节 八方风雨会星洲 崔贵强
— 晚清官员访问新加坡

147 第二节 我视新洲成旧洲 林孝胜
— 中国驻新加坡领事

171 第三节 顶戴花翎 颜清湟
— 晚清“售卖官衔制度”与新加坡华人

189 第四节 晚晴园内外 陈丁辉
— 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华社会

199 第五章 迁民社会与峇峇社会

201 第一节 泽被功敷 杨进发
— 华族领导层与其政治变革

215 第二节 义结金兰 麦留芳
— 华人秘密结社的演变

231 第三节 一櫂冲开瘴海烟 梁元生
— 新华“士”阶层

245 第四节 海门奇葩 黄慧敏
— 峇峇文化

269 第五节 峇峇双杰 李元瑾
— 林文庆与宋旺相

281 第六章 报业文化

283 第一节 南渡衣冠 各领风骚 — 战前新加坡华文日报 崔贵强

301 第二节 从百花齐放到一枝独秀 — 战后新加坡华文日报 崔贵强 张 静

319 第七章 儒学与宗教

321 第一节 浮海居然道可行 — 新加坡的儒学运动 梁元生

331 第二节 三教合一 — 儒释道在新加坡的发展 徐李颖

357 第八章 出版物与文学

359 第一节 华风远被 — 开埠以来的华文出版业 李金生

373 第二节 与君话冷炎州月 — 新华古典文坛 柯木林

385 第三节 蕉风椰雨文学 — 新加坡华文文学 杨松年

399 第四节 东方红 — 左翼文学的文革潮 朱成发

413 第九章 风雨华教

415 第一节 开智启蒙 薪尽火传 梁秉赋
— 从华文教育到华文教学

425 第二节 华语还是方言 郭振羽
— 讲华语运动

439 第十章 文化与艺术

441 第一节 南洋画风 张夏帏
— 早期新华社会与南洋美术的形成

457 第二节 唱尽人间喜与忧 蔡曙鹏
— 新加坡的表演艺术

477 第三节 影视百年 叶舒瑜
— 华语电影与电视剧的发展

495 第十一章 家书抵万金

497 第一节 侨汇·侨批·民信业 柯木林
—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

507 第二节 华侨特有的专递服务 李志贤
— 各帮信局及其行业组织

533 第十二章 经济活动 林孝胜
— 华商与华资银行

555 第十三章 四海同心 义薄云天 林孝胜
— 抗日救亡运动

573 第十四章 昭南岛的沧桑 蔡史君
— 华侨“排斥论”与“利用论”交织下的军政

587 第十五章 政治运动

589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在新马 杨进发
— 其兴衰、贡献与影响（1912-1949）

603 第二节 默迪卡 陈 剑
— 独立斗争二十年

623 第十六章 建国之路

625 第一节 选贤任能 林金圣
— 历届大选与政治演进

639 第二节 因时制宜 陈 剑
— 独立后的国策与社会变迁

661 第三节 经济转型的新加坡 陈企业
— 回顾、反思与展望（1965-2020） 郭明忠 刘丹彤

675 第四节 现代新加坡之父 严孟达
— 耀眼的华人政治家李光耀 林孝胜

691 第十七章 缘聚岛国 欧雅丽
— 当代新移民

709 第十八章 两百年来谁著史 崔贵强
— 回望新加坡华人研究

729 附录一 新加坡历史大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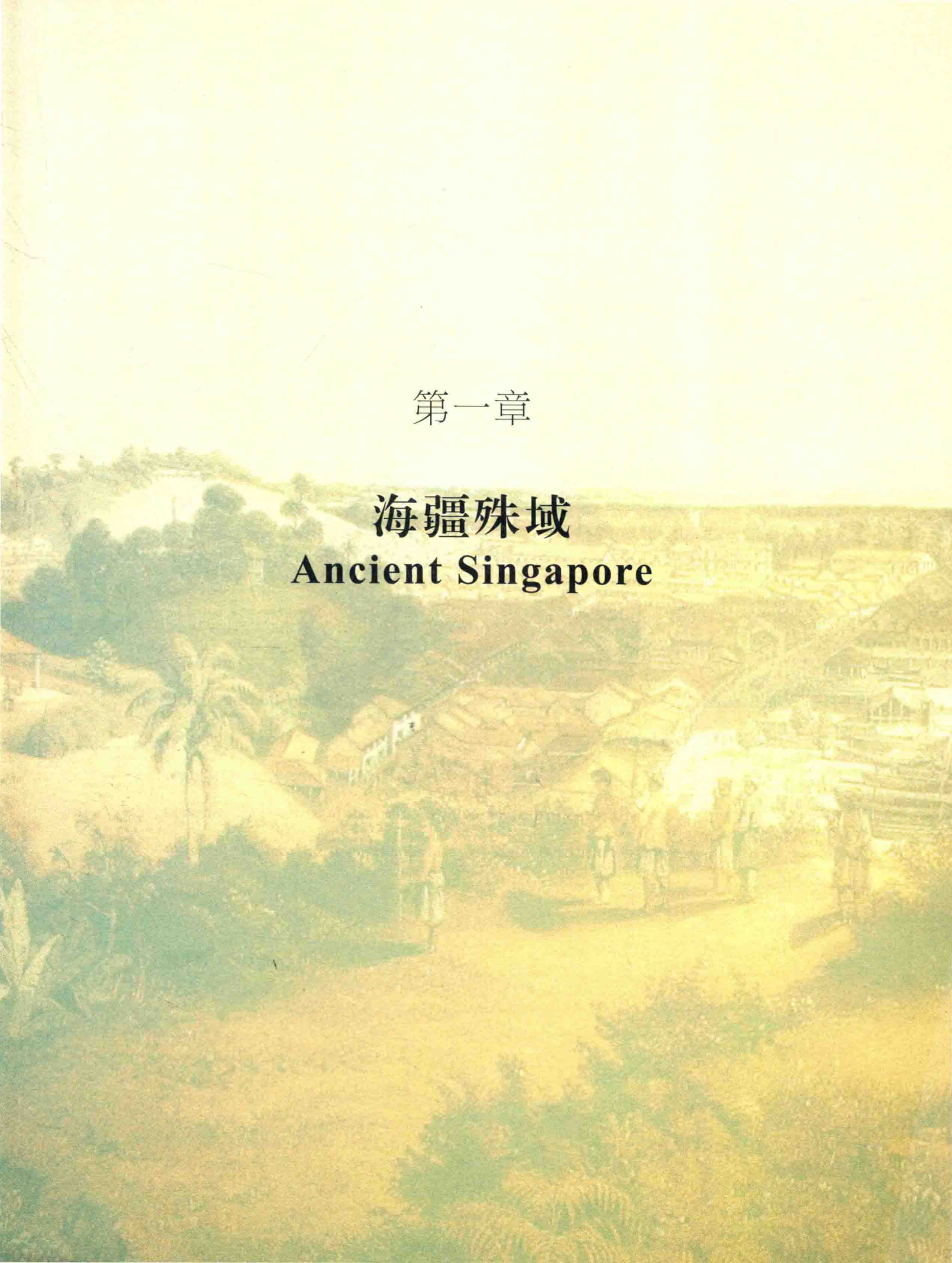
735 附录二 新华先贤五十名

763 附录三 重点古迹与文物

790 附录四 参与撰写本书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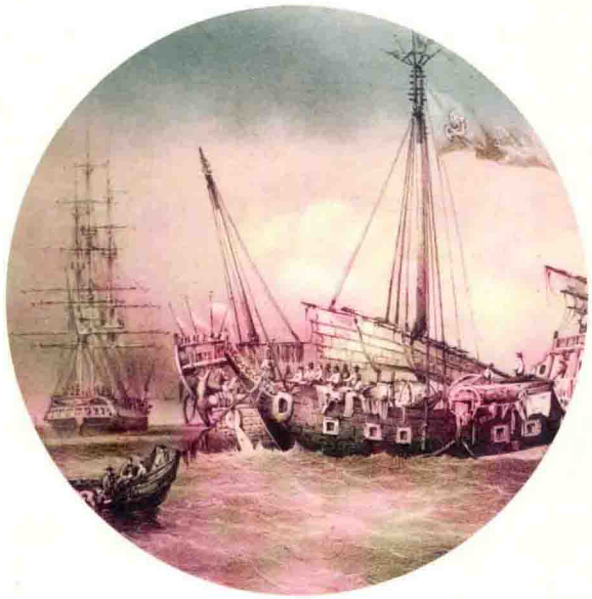
793 附录五 主要参考资料

823 编后语



第一章

海疆殊域
Ancient Singapore



海疆殊域
——古代新加坡

摘要

1980年代中叶，本地展开对古代新加坡的考古发掘工作。随着大量考古资源的出土、整理和分类统计，为文献资料相对匮乏的淡马锡时代，提供研究参考的依据。本章对古代新加坡聚落的分布范围、中国商贸内容和本地生活面向的梳理，揭开古代新加坡的神秘面纱。

Abstract

During the mid-1980s, there was much archaeological work carried out on ancient Singapore. The large number of artefacts being unearthed, sorted and classified as a result of these excavations provide much research data making up for the paucity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to shed more light on the pattern of early settlements, nature of Chinese trade, local life to unravel the many mysteries of ancient Singapore.

吴庆辉（**Ng Ching Huei**）

新加坡的历史可分为古代、殖民地时代以及当代三大时段。古代新加坡是指1819年新加坡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以前，介于13到18世纪之间这段历史时期，其中主要是14世纪的“淡马锡·新加坡拉”时代；第二段的殖民地时代是介于1819年至1959年之间，其中又分1819年至1942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时期，1942年到1945年的日据时期以及从1945年到1959年的战后英国殖民地时期；当代新加坡历史是从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1963年至1965年间加入马来西亚联合邦时期以及1965年以来的新加坡共和国时期。

古代新加坡的历史，是依据现存17世纪版的《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或*Malay Annals*）、中国元、明、清的古籍、16-18世纪葡萄牙、荷兰以及爪哇、越南等地方文献的零星记录。虽然文献记载有限，内容零散，但考古材料证明14世纪的“淡马锡”时期，曾经是一处繁荣的商港。19世纪20年代，留下关于新加坡开埠初年尚遗留的古代遗迹的文字记录。而从1984年至2015年间，研究人员在旧称“禁山”的福康宁公园与在新加坡河北岸等地方，先后发现多处14世纪的文化层遗址，出土数量可观的陶瓷片、钱币、玻璃珠子、金属残渣等文物，为古代新加坡历史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古代马来世界里的新加坡拉

东南亚在地理上可分为陆地与群岛两部分。陆地部分是介于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中印半岛，又称印度支那（Indochina）半岛，而群岛的部分范围则是今天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群岛以及马来半岛大片地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把这地区称为“南海”、“东西洋”、与“南洋”等；而西方称之为东印度、或者是远东（的一部分），到了二战时期因为盟军的东南亚军区的设立，“东南亚”[1]才开始成为近代对该地区的通用的名称。

东南亚地区在古爪哇文献称为“努珊达拉”（Nusantara），是“风下”或“群岛”之意，范围包括从马六甲海峡、泰南、马来半岛以及今天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周边，也包括菲律宾、越南和柬埔寨的南部等广大地区。这片群岛在东南亚也称为“马来世界”[2]。“马来世界”核心是马六甲海峡两岸，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廖内群岛等地方，其主要王朝包括[3]：

- 崛起于公元7世纪到13世纪之间位于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Srivijaya）
- 13世纪到15世纪期间以爪哇为权力中心的满者伯夷（Majapahit），以及把势力伸入马来半岛的暹罗阿育陀王朝（Ayutthaya，大城王朝）
- 15世纪初到1511年的马六甲苏丹王朝（Malacca Sultanate）
- 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的柔佛廖内苏丹王朝（Johore-Riau Sultanate）
- 西方殖民地，葡萄牙的马六甲（1511-1641），荷兰人的荷属东印度（1619-1945），英属马来亚包括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与马来属邦（1786-1957）以及东马地区

它们控制马六甲海峡和南洋群岛的海上交通要道，新加坡地处海上交通要冲，在不同时期分属不同王朝的势力范围。古代新加坡的历史是东南亚的群岛地区，也是“马来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

《马来纪年》是关于马来皇统从苏门答腊到淡马锡与马六甲的传承纪录，其中记载一段来自苏门答腊巨港的王子圣尼罗·乌达玛（Sang Nila Utama），从廖内来到海城“淡马锡”（Temasik）建立新加坡拉王国（Singapura）的故事，当时新加坡拉是兴都化城邦小国，梵文里新加坡拉是狮子城的意思，总共传五任国王，前后统治约一个世纪，他们是：

- 室利·兑里·穆纳（Sri Tri Buana），梵文的意思是三界之王，又名圣尼罗乌达玛，建国君主，在位48年
- 室利·毕克拉玛·威拉（Sri Pikrama Wira），室利·兑里·穆纳的儿子，在位18年。在位期间把新加坡拉

[1] 李金生〈一个南洋，各自界说：“南洋”概念的历史演变〉，载《亚洲文化》期30（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年），页113-123；柯木林〈古代新加坡的地名〉，载《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页3。

[2] 古爪哇文献Pararaton（帝皇录）与Negarakertagama（帝国史）记载满者伯夷王朝鼎盛时期的国务大臣Gajah Mada将军（约1290–约1364）在1336年曾誓言（Sumpah Palapa）将带领满者伯夷，把势力范围扩张到整个“努珊达拉”（Nusantara），在尚未如愿之前，他的食物不加一点香料。

[3] 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41-144；R. O Winstedt., "A History of Malaya," *JMBRAS* Vol. XIII Part I,1937, p.92.

发展成繁荣的海港，满者伯夷派人挑衅，在一位平民大力士巴丹的协助下才知难而退

• 里纳·威克玛（Rena Wikerma），室利·毕克拉玛·威拉的儿子，在位13年

• 巴杜卡·室利·马哈拉惹（Paduka Sri Maharaja），里纳·威克玛的儿子，在位12年。这期间新加坡海面出现成群剑鱼攻击渔民，一名聪明过人的孩子，提议用芭蕉树干建栏栅来解除威胁。后来国王因忌才，把小孩给杀害，血染遍地，据说这就是新加坡红山（Bukit Merah）地名的由来

• 伊斯干达·沙（Iskandar Shah），在位九年。因当众羞辱犯错的皇妃，皇妃的父亲是当朝的丞相，他怀恨在心，勾结来犯的爪哇，暗开城门，导致新加坡拉的灭亡。伊斯干达·沙流亡到马六甲，东山再起，揭开马六甲王朝的历史。但是在16世纪的葡萄牙和明代史籍的记录里对新加坡拉末代国王到马六甲建国史却有几个不同版本的故事[4]。马六甲建国首领是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因在苏门答腊政治斗争失败而逃到新加坡拉，没几年竟把接待他的当地酋长给杀了，自己代之为王。后因邻邦复仇派兵来犯，再度出走来到马六甲重振旗鼓，建立马六甲王国（约公元1405年）。伊斯干达·沙是拜里米苏拉的儿子，或者其实他俩是同一人（伊斯干达·沙是拜里米苏拉的伊斯兰教名）；葡萄牙记录里对侵犯新加坡拉的敌人的身份有爪哇、彭亨、北大年、暹罗等不同的记载[5]。《明史》永乐年纪录拜里米苏拉建国后，跟随郑和船队到明朝进贡，派使臣朝贡以及后来他在1413年去世的纪录。拜里米苏拉与明朝结盟，解除暹罗的威胁[6]

如果根据《马来纪年》五位国王在位年数，与《明史》关于拜里米苏拉的记录来推算，圣尼罗乌达玛到新加坡建国的年代是在1299年。当时新加坡拉经常受到来自北方暹罗和南方满者伯夷的威胁。14世纪元朝典籍《岛夷志略》（成书于1349年）证实新加坡曾经受敌的情况，“（暹罗）近年以70余艘来侵单马锡（新加坡古名），攻打城池，一月不下。本处闭关而守，不敢与争。遇爪哇使臣经过，暹人闻之乃遂掠昔里（新加坡海峡周边）而归。”

《马来纪年》最初在马六甲撰写，成书于约1436年，作者不详，原著已失传。那正是马六甲正从兴都教改信伊斯兰教成为马六甲苏丹国的年代，也是塑造今日“马来”认同的开端年代。16世纪以来流传的多达30种不同版本的文献，其中现存最早的是1612年，由莱佛士收藏编号S18的版本[7]，其神话故事与传奇性的内容明显地经过加工与渲染，但在不同版本之间，却留下为不同时期的政权服务的印记，提供认识马来王朝的宝贵历史线索。

《马来纪年》没有提供华人在新加坡定居生活的记录，但提及在第二任国王在位期间约14世纪中叶，新加坡拉已发展成繁荣的城市，多国商贾到来通商。虽然他们不时面对北方的暹罗以及南面满者伯夷提出称臣朝贡的要求，但是治理海岛近百年，提供适合对外通商的环境。

相关人物

汪大渊

历史事件

汪大渊（元朝）撰《岛夷志略》书中有单马锡与龙牙门的记载。学者认为单马锡是新加坡古地名，龙牙门即指新加坡南部与圣淘沙之间的海港

---

[4] 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隔年一名为王家服务的葡萄牙药剂师汤姆比利斯（Tome Pires）来到马六甲，为生病的总督服务三年，这期间他完成《东方志》（*Suma Oriental*）一书，记载印度与马六甲的见闻，此记录没有出版，在1944年才从档案堆里重见天日。此外还有，Joao Diogo do Couts 和Eredia 的记录。参考John N. Miksic, Cheryl-Ann Low Mei Gek, *Early Singapore 1300s-1819 Evidence in Maps, Text and Artefacts*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2004), p.97；John N. Miksic, *Singapore &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1300-1800* (Singapore: NUS Press, 2013), pp.162-183.

[5] 许云樵译，《马来纪年》（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年），页292-310。John N. Miksic, *op.cit.*, pp.162, 167.

[6] Cheryl-Ann Low, *Early Singapore 1300s-1819*; John N. Miksic, Cheryl-Ann Low Mei Gek, *op.cit.*, p.16.

[7] Kwa Chong Guan, Derek Heng, Tan Tai Yong, *Singapore A 700-year History from Early Emporium to World City*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09), pp.9-18.

中西视界里（9–15世纪）的南洋

亚洲大陆东南端的黄金半岛与萨巴纳（Seb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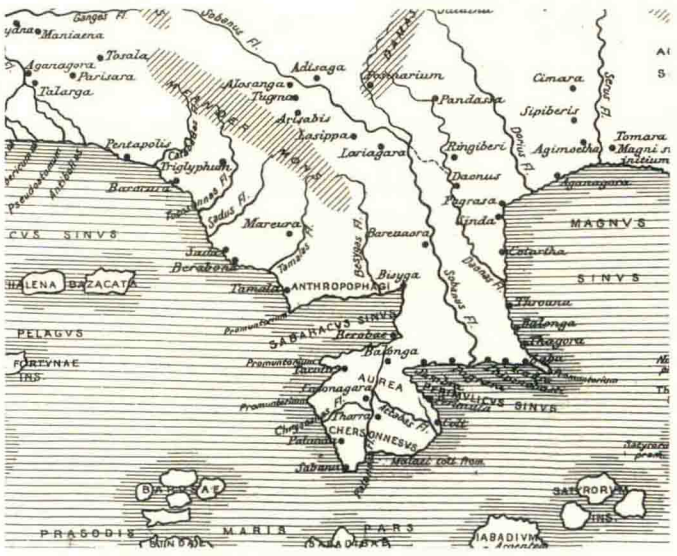
公元1世纪至3世纪，当时一位驻扎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名叫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100–160）的罗马官员绘制一幅亚洲地图，内容是根据曾到东方经商人士的描述，在亚洲陆地东南端有个半岛，名为“黄金半岛”（Golden Khersonese），相对位置就在今天的马来半岛；而在该半岛的南端有一处名为”萨巴纳”（Sabana）的地方，很可能就是西方对古代新加坡最早的认知。1000多年后，16世纪西方的世界地理大发现，欧洲最早向世界进行海上探索的葡萄牙人，就曾根据这些资料探索他们向往的神秘“东方”，马六甲海峡周边地方才再度出现在西方视界。

僧人与旅者游记里的南洋“唐人”

南洋地处亚洲两大文明古国以及东西方贸易往来的海上交通要冲，从汉朝到宋元时期跟东南亚有商贸往来、僧侣拜访、朝贡贸易与民间自由贸易的关系[8]。

唐代国势强盛，商通四海，中西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历史的一个空前高峰，世界各地称华族人士为“唐人”。宋、元政府鼓励海洋贸易，元以前是朝贡贸易与民间自由贸易。古代中国商人、僧侣或流亡人士因为商业、宗教或政治理由，需要留在国外，史称“住番”。

7世纪-15世纪，马六甲海峡周边是室利佛逝（Srivijaya，又称三佛齐，7-13世纪）和满者伯夷（Majapahit，13-15世纪）统治的势力范围。唐代僧人义净（7世纪）和他之前知名的僧人，东晋时代的法显（5世纪）路过巨港时，停留好一段日子；阿拉伯人马素提（Masudi）在942年途经苏门答腊，在他的《黄金牧地》一书中提及见到许多华人在此务农，特别是巴淋邦（Palembang，巨港）为多；旅行家和探险家意大利的马可波罗（13世纪），曾到访苏门答腊的旧港（巨港）路过南洋区域[9]；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1304-1368）也曾在1345年到苏门答腊和马六甲，后经越南到广州。可是在有关他们事迹记录里并没对新加坡留下明显的文字记录。



萨巴纳是约公元二世纪罗马地图里黄金半岛（马来半岛古称）南端的一个地名

区域军事与外交

11-15世纪，群岛地方开放的海洋和地理环境，先后受到区域以外的势力的武装威胁与文化外交的影响，例如：

- 在11世纪，南印度淡米尔人的注辇国（Chola）王朝派兵洗劫苏门答腊岛室利佛逝的城市
- 蒙古人统治的中国元朝在1292年与1293年间，曾派远征军攻打爪哇的满者伯夷。这项军事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元朝远征爪哇的军队失败后，有士兵流居当地，但在当地没留下明显的史迹，也没有关于新加坡的记录[10]
- 1365年的古爪哇《帝国史》（Negarakertagama）提到满者伯夷宣称淡马锡是她的属地
- 暹罗势力南下干预马来半岛的内政，北马四州（登

[8] 王赓武著，张奕善译，《南洋华人简史》（台北：水牛出版社，1969年），页14–15。

[9] 法显（337–422），东晋高僧，旅行家。399年离开长安（西安）到天竺（印度），410年到达狮子国（锡兰，今称斯里兰卡），412年从海路途经南洋耶婆提（据考证是爪哇地方）回国。著有《法显传》（又名《佛国记》），是今日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历史、地理、风俗和佛教等重要资料。义净（635—713），唐代高僧，佛经翻译家，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从海路到天竺取经。途经室利佛逝（今天东南苏门答腊）学习梵文6个月，到印度后游历两年，先后在那烂陀寺住了10年，室利佛逝住6年翻译佛经。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商人、旅行家，13世纪下半叶旅居元朝，后从海路回欧洲，在1292年途经巨港。著有《马可波罗游记》，学界怀疑作者没亲身到过中国而游记内容是根据当时波斯商人的口述撰写。

[10] 《明史·外国列传，勾栏由》：“其病卒百余，留养不归，后益蕃衍，故其地多华人。”

嘉楼、吉兰丹、吉打和玻璃市）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在暹罗的势力范围的影响之下。明朝初年实行“海禁”，但到了永乐和宣德年间，明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访问南洋14国，历时28年（1405-1433）。主要是为“通西南海道朝贡”、“宣德化而柔远人”，其中在1409年至1433年间的第二到第七次下西洋，总共五次访问马六甲苏丹王朝（Malacca Sultanate，15世纪 - 1511年），从此华人在马来世界留下明显的文史和生活的事迹

◆ 16世纪西方势力的介入后，新加坡与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进入被殖民地统治的新阶段。1511年，葡萄牙攻占并统治马六甲130年（1511-1641），荷兰接手184年（1641至1825英国接管）；西班牙控制菲律宾300多年（1571-1898）之后美国接管48年（1898-1946）

定居南洋的“唐人”

郑和出使西洋以后，带动华人寓居海外的风气。虽然明、清大部分时期实行海禁政策，但华人大量迁移国外、世代侨居南洋也是在明、清。封建朝廷把海外华民当着弃民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华侨”一词带有国家认同意识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

“唐人”在南洋定居，生息繁衍，例如：宋代《萍州可谈》：“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船过回偿，住蕃过十年不归，息也不增”。宋末元初，大批宋朝臣民流亡到南洋，又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曾提到唐人（华人）于1295-1296年在真腊（今柬埔寨）的生活情况。

1397年，爪哇满者伯夷国王灭三佛齐旧王朝，旅居苏门答腊巨港的广东南海人梁道明，受民众拥护为首领，在巨港北方疆土对抗满者伯夷。后来他接受永乐帝招安，回到明朝进贡并留下居住，梁道明副手施进卿继任巨港华社领袖。另一广东人是从事海盗活动的陈祖义，被郑和船队镇压，陈祖义被带回中国问斩。施进卿被明朝封为旧港的宣慰使。郑和在他第六次下西洋时，还到旧港安排施进卿去世后继承人的事宜。

明代马欢《瀛涯胜览》记载爪哇的杜板（Tuban）、新村（Gresik，又名锦石）、苏拉巴益（Surabaya，今泗水）是来自广东、漳州、泉州的华人聚居地。据统计菲律宾马尼拉华人在1571年西班牙未占据之前有150人，1588年增加到上万人，1603年达2-3万人。明代其他如马来半岛的吉兰丹暹罗的大城、北大年地方都有华人社群的纪录。

明代中末期到清初因为日本倭寇与反清郑成功海上活动势力等的因素，长期对民间实行“海禁”，“寸板不准下海”[11]。一方面限制人民的自由往来，另一方面流寓海外的华人开始繁衍生息，久居长住下来。

明代（15世纪以后）在苏门答腊巨港（旧港、古称三佛齐）、爪哇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Jakarta）、廖内、马六甲出现华人社群。当年中国在农业、手工制造、医药、建筑等方面拥有较高的知识和技术，又有庞大的商业和社会网络；加上勤奋刻苦，灵活变通的天性，深得当地人和殖民地统治者的欢迎。关于他们的经济社会文化面貌，也可以作为认识14-16世纪前后新加坡的参照点。

新加坡在中西古籍里的几个旧称

中国文献提供跟南洋贸易与地方志对华人在南洋的记载不多，对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之间的新加坡海峡一带的认识，宋、元、明都有地理上的记载，相关地理名称包括：“凌牙门”、“龙牙门”、“淡马锡门”以及在地理上对应的周边的地方，如，“罗越”（柔佛）、“吉利门”（吉利汶岛）、“白礁”（Pedra Branca）等地方。

[11] 1661年清初《迁界令》，从山东到广东沿海五省居民迁离海边30里。海禁于1684年解除。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又再禁。

表（一）新加坡在中西古籍里的几个旧称

新加坡古称	备注
沙巴纳 （Sebana）	罗马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y, 100–160 AD）
皮宗	《汉书》，东汉班固撰写，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皮宗指今新加坡一带，待考
蒲罗中	《太平御览·扶南土俗》，许云樵《马来亚史》的推论是Pulau Ujong，为“岛的南端”，即新加坡，学界看法存疑
单马锡、淡马锡、单马锡山、单马锡门（Temasik）	• 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1349年） • 爪哇《帝国史》（Nagarakratagama）是海城之意（1365年） • 明代《顺风相送》（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 • 明代张燮《东西洋考》（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 • 明代茅元仪的《武备志》“郑和航海图”（1628年） • 《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1612年） • 越南《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淡马锡派使臣到越南
凌牙门	• 宋代赵汝括《诸蕃志》（1225年） • 元代陈大震《南海志》（1304年）
龙牙门（包括水道）	• 《元史》记载延佑七年（1320年）元朝遣使到此索大象，泰定二年（1325年）龙牙门遣使向元朝贡奉献方物 • 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龙牙门条（1349年） • 明代费信《星槎胜览》（1436年） • 明代马欢《瀛涯胜览》（1451年） • 明代茅元仪《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1628年） • 《暹罗国路程集录》（1810年）“Long Nha Nat Mon”（龙牙海门）
班卒 （Pancur）	• 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班卒条”（1349年），泉水之意，学界认为其位置可能是在福康宁山后新加坡河畔
长腰屿 （Pulo Panjang）	• 明代张燮《东西洋考》（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 • 明代茅元仪《武备志－郑和航海图》（1628年）
狮子城、狮城、新忌利坡、尸牙波儿、星格波儿、星奇坡、星架坡、新甲埔、星加坡、新嘉坡、星嘉坡、新加坡	• 葡萄牙多幅地图（16世纪初）标识的“Bargungapara” 即“Xin–Gapara” 原意是通往中国的门户 （“Gateway to the coast of China”） • 《马来纪年》（1612年） • 葡萄牙人伊里迪亚（Godinho de Eredia）制作的一幅地图（1604年） • 清代的典籍《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史稿》、《清朝文献通考》、《南洋蠡测》、《国朝柔远记》
昔里、息辣、石叻、石叻门、石叻坡	马来语“Silat”音译，即海峡，指新加坡海峡，新加坡开埠后称为“石叻坡”，海港叫“石叻门” 清代的典籍
星洲	• 左秉隆（1887年）《勤勉堂诗抄》之〈游廖埠〉“乘兴不知行远近，又看渔火照星洲” • 邱菽园（1898年）主办《天南星报》惯用，后自称“星洲寓公”
海门	海门指从新加坡海峡至马六甲海峡一带，主要是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即三州府（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屿），民国政府派驻石叻的领事就兼管海门。实际上中国的领事，也负责照顾管理这一带水城的各个海港，包括属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吉里汶与廖内等地的华人事务

资料来源：

[1] 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2] 饶宗颐，《新加坡古事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

[3]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编撰《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 陈育崧，〈1819年以前的新加坡〉，载《椰阴馆文存》卷一（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页47-65

[5] 柯木林，〈古代新加坡的地名〉，《联合早报》，1988年1月3日

[6] 林我铃，《龙牙门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9年)

[7] 邱新民《东南亚古代史地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69年）；《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84年)；《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加坡》(新加坡：胜友书局，1991年)

[8] J. V. Mills, *Eredia's Description of Malacca, Meridional India, and Cathay* (Kuala Lumpur: MBRAS Reprint 14, 1997)

[9] J. V. Mills, "Malaya in the Wu-Pei-Chih Charts," *JMBRAS* Vol XV Part III, 1937, pp.1-48.

[10] Kwa Chong Guan, *From Temasek to Singapore: Locating a Global City-State in the Cycles of Melaka Straits History, Early Singapore 1300s-1819 Evidence in Maps,* Texts and Artefacts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2004), pp.124-139.

[11] John N. Miksic, *Singapore &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1300-1800* (Singapore: NUS Press, 2013), pp.172-173, 180-181

[12] Peter Borschberg, *Singapura in Early Modern Cartography: A Sea of Challenges, Visualising Space – Maps of Singapore and the Region*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2015), pp.6-83

关于龙牙门位置的探讨

• 南宋赵汝适（1225年）《诸番志》卷上“三佛齐国”条，提到巨港的商贸安排，“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在泉州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一始入其国”[12]。宋代从泉州出发的商船在冬季乘东北季候风先到“凌牙门”（新加坡），经商三分一，再到“三佛齐”（巨港）

• 《元史》延佑七年（1320年）九月记载遣使“到占城、真腊、龙牙门索驯象。”《元史》秦定二年（1325年）五月，龙牙门蛮遣使奉表贡方物

• 具体提到有华人居住于古代新加坡，只有元代汉族商人汪大渊（1349年）的《岛夷志略》

汪大渊，1330年和1337年，两度到南洋和西洋。1349年，他在泉州把经历见闻记载在《岛夷志略》[13]中，书中对“龙牙门”的描述如下：

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田瘠稻少，天气候热，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酋长掘地而得王冠。岁之始以见月为正初，酋长戴冠披服受贺，今亦递相传授。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产粗降真斗锡。贸易之货，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磁器、铁鼎之类，盖以山无美材，贡无异货，以通泉州之货易，皆剽窃之物也。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默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

自古中国以“门”命名的地方，指的是自然地形或交通道上的通道关口，在沿海地区则指水道或登陆口岸，例如金门、厦门、澳门等，南洋一代就有龙牙门和海门。它们在地理上的共同点是聚落离出海口有条海峡或水道，在经济发展上均达一定规模，交通上是周边地区的一个门户，以命名来推测“龙牙门”当时可能也是个商埠。

“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于是水道附近有龙牙状的地标成为后人考证该地名的主要依据。

《岛夷志略》里所描述的聚落，提到当心海盗的问题，文中用附近吉里汶岛为坐标，因此“龙牙门”是聚落也是水道的名称。

[12] 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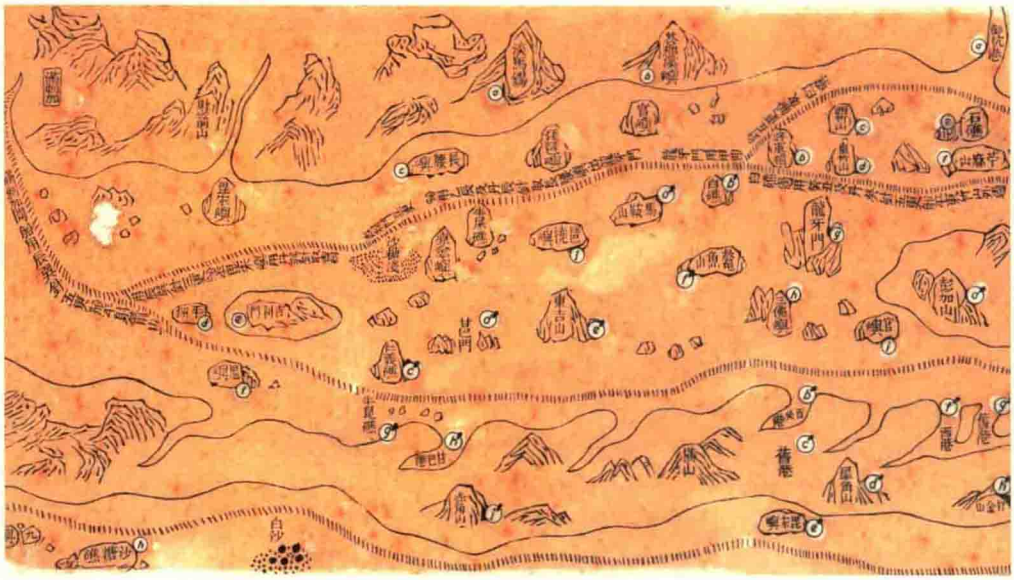
[13] 汪大渊著，苏继廎校，《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213-214。

相关人物

莱佛士

历史事件

莱佛士建立新加坡，是英国日后蚕食马来半岛各土邦的先兆



明代茅元仪《武备志》标示从马六甲返中国的航道指示图

明朝郑和在1405-1433年间七下西洋，茅元仪的《武备志·郑和航海图》提供了从马六甲经“龙牙门”到南中国海回航的方向航道指示[14]。其中从吉利门到白礁是以“长腰屿”为标记，出了水道（龙牙门），再向东航向白礁，这是判断龙牙门位置的主要依据。

《武备志》的“郑和航海图”标识“龙牙门”水道之外，另外也标识“龙牙门”为一座海岛，此海岛在航海图上跟苏门答腊东南岸的巨港、巨港岸外的林加岛（Pulau Lingga）的位置相对应：

学界主流说法认为新加坡海峡就是当时龙牙门所在地，主要根据《岛夷志略》、《武备志·郑和航海图》，19世纪英国人绘制的地图及水彩画，以及当代新加坡考古资料证明新加坡在14世纪时是一个繁忙商埠。

已故新加坡南洋学会文史研究者林我铃在其《龙牙门新考》著作中，按林加岛上两座尖形高山上大石推断，在当年中国水手眼里“状似龙牙”，听当地人叫“Lingga”，正与闽南人“龙牙”（凌 gay）对上了。传神的名字记录下来成了航海图中“龙牙大山”，“龙牙岛”。“Lingga”是闽南语“龙牙”的对音其实是讹传，在印度化的东南亚地方，这岛名因为大山状似兴都教信仰里象征生命源泉的圣物，是代表创造之神湿婆（Siva）的生殖器就叫作“Linga”。林我铃也提出明代马六甲海峡与南中国海之间，可以利用民丹岛和峇淡岛之间的廖内海峡为行线的说法，认为当时的龙牙门指廖内海峡[15]；只是这条航道不但比新加坡海峡长，其途经的廖内海峡更是“海人”的大本营，如Galang岛等[16]，不符中国航海员担心海盗的考量和选择。不过从南中国海到巨港，不用新加坡海峡，而取廖内海峡倒是情理之中。

19世纪英国人绘制的地图及水彩画，在新加坡今天拉柏多公园（Labrador Park）一角，曾经有块立于岸边，状似尖牙的礁石，洋人称之为Lot's Wife、“Rock Bluff”、“Sail Rock”，马来旧称是“Batu Berlayar”、“Batu Blair”；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则称“Varella”。主要是因为在那里的一块大尖石，古代航海者用它来指示方位和导航。1848年，为疏通航道而被炸掉。

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将新加坡海峡视为通往中国海

[14]《武备志·郑和航海图》提供了从马六甲经“龙牙门”到南中国海回航的方向航道指示。

（1）满剌加（Malacca）开船用辰巽针（东南向）五更船平射箭山。

（2）用辰巽针（东南向）三更船平昆宋屿（Pulau Pisang）用丹辰针取吉利门（Kerimun Island）。

（3）吉利门（Kerimun Island）五更船用乙辰(东南)及丹辰(东南)针取长腰屿出龙牙门。

（4）龙牙门用甲针(东向)五更船取白礁（Pedra Branca，俗称Batu Puteh）。

（5）白礁过用癸丑及丹癸(东北向)针五更船平东竹山（P. Aru）外过。

其中（3）“取长腰屿，出龙牙门”，不指示方向，航行时以“长腰屿”为标记，出了水道（龙牙门），再向东航向白礁，这是判断龙牙门位置的主要依据。

[15] 林我铃，《龙牙门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9年），页89-91。

[16] Sophen, *The Sea Nomads*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Singapore, 1977), p.44.

19世纪，英国画家笔下位于绝后岛（圣淘沙）与对岸拉柏多的尖石，是古代水手航行的标记

岸之门户“Xin - Gurapa”[17]，16-17世纪还将新加坡南面水道细分为新与旧两段新加坡海峡，以及总督海峡。旧海峡（Old Straits）是指绝后岛（今天圣淘沙岛）与本岛间的水道，新海峡（New Straits）是圣淘沙岛外水道，而以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命名的总督海峡（Governor's Straits），就是今天在莱佛士灯塔以南新印国界上的新加坡海峡 。17世纪，荷葡之间的竞争白热化，荷兰对马六甲和新加坡南面的航道进行封锁，葡萄牙船只另辟新航线，利用在新加坡与柔佛之间的柔佛海峡（Straits of Johor，又称地不佬海峡 Tebrau Straits）在18世纪-19世纪的“旧海峡”则指柔佛海峡。

古代海上航行者是沿亚洲大陆南下，在海上航行日子里，左边是茫茫无际的南中国海，而船的右方有连绵的陆地山峦。这山脉不就是条“大龙”，若要到龙身（马来亚半岛）的另一边（西岸），就要在白礁处右转弯驶入一条水道。这水道包括新加坡海峡与廖内群岛，错综如迷宫而水中暗礁满布，从海峡入口处望去，每一座海岛在水手眼里都是“牙”，当年中国水手看到的不只这一颗大牙，这条水道就叫“龙牙门”，包括今天圣淘沙岛内外航道以及新加坡海峡。

柔佛廖内苏丹王朝（Johore-Riau Sultanate）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到来（16-18世纪）

16世纪至18世纪，是西方殖民地势力介入马六甲海峡各政治集团间的纷争年代。葡萄牙人麦哲仑（Ferdinand Magellan）于1519年至1521年间带领的帆船队，完成航海环绕地球一周的壮举。148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1498年到达印度。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开启欧洲海上列强殖民东南亚的历史。西班牙

[17] Peter Borschberg发掘多幅16世纪初的葡萄牙地图，考证新加坡海峡所标识的“Bargungapara”的原意为“xin-Gapura”，“xin”指中国，而Gapura是门户之意，Peter Borschberg, *op.cit.*, pp.13-18。

相关人物

莱佛士　法夸尔

历史事件

6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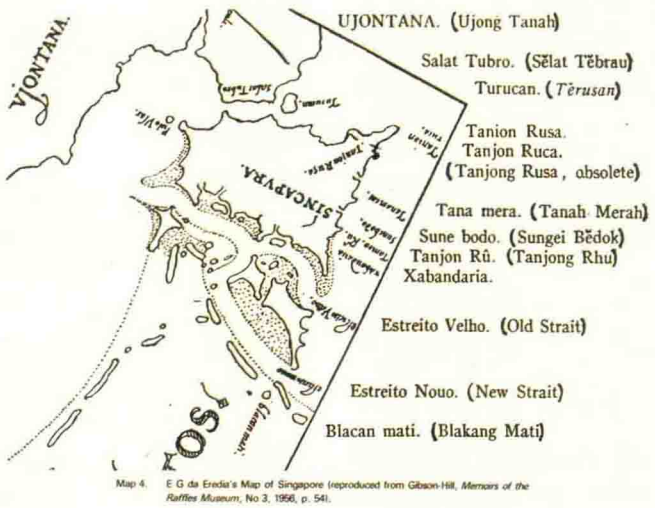
莱佛士及驻扎官法夸尔（W. Farquhar）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柔佛签订协定

人在1571年控制马尼拉，随之荷兰、英国和法国接踵而至。

马六甲被葡萄牙人占领后，马来王族流亡到柔佛河流域和廖内群岛一带建立新基地，史称柔佛廖内苏丹王朝。他们继续对抗葡萄牙，新加坡海峡成为葡萄牙、荷兰、亚齐、柔佛廖内与武吉士人等多方角力的舞台。

荷兰人在17世纪开始挑战葡萄牙人在马来世界的利益。1603年2月25日发生的圣达卡达丽娜号事件（Santa Catarina）[18]，葡萄牙因为商船被抢劫，跟荷兰海军在新加坡樟宜岸外打了一场海战，结果葡萄牙落败。几年后，1641年又失去马六甲，从此退出在马六甲海峡的政治舞台。

新加坡在那个时候属于柔佛廖内苏丹的势力范围，港务官驻扎在新加坡河口的地方。这位马来苏丹王室大臣的主要职责包括海事防务和向靠岸商船征收税务。1604年葡萄牙人伊里迪亚（Eredia）制作的一幅南马来半岛、柔佛与廖内的地图，其中包括新加坡部分，记录新加坡从南部外岛到东部沿岸的几处地方，计有绝后岛（Blakang Mati，今天的圣淘沙岛）、岛边的新旧海峡 、丹戎禺（Tanjong Rhu）、勿洛河（Sungei Bedok）以及丹那美拉（Tanah Merah）等地方，也在新加坡河口标记港务官（Xabandaria）的位置，说明在那时新加坡是位居新加坡海峡的口岸之一。



Map 4. E G da Eredia's Map of Singapore (reproduced from Gibson-Hill, *Memoirs of the Raffles Museum*, No 3, 1956, p. 54).

17世纪初葡萄牙人伊里迪亚绘制的新加坡与周边海峡图

1613年亚齐攻击柔佛在海峡以及柔佛河的根据地，位于新加坡河口的聚落被攻破并焚毁[19]。被焚毁后的新加坡在17-18世纪里就没有太多历史记载。

荷兰东印度公司1619年在爪哇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建立根据地，1641年荷兰攻占马六甲。在16世纪，葡萄牙、荷兰，17到18世纪的亚齐王朝（Aceh Sultanate）、来自苏拉威西（Sulawesi）的武吉士人（Bugis）以及苏禄群岛的摩罗海盗（Moro Pirate，或称苏禄海盗Sulu Pirate）的海上武装势力也干预柔佛廖内周边海域的权力平衡。

这时期在这个区域的华人主要是以商业贸易、经营手工业和务农为生计。葡萄牙统治马六甲从1511-1641年间，设立甲必丹制管理各社群。中国商人由于受葡萄牙排挤。于是华商改到马来亚东岸、暹罗湾的北大年、曼谷、越南、苏门答腊的其他口岸作买卖。1557年葡萄牙取得澳门控制权，继续明朝的海禁政策，牵制华人海外商业的发展[20]。

西班牙在1571年占领菲律宾，华人约150名与当地人杂处，进行自由贸易。1582年在马尼拉东北部巴色（Pasiz）河边设华人区巴利昂（Parian，“八联”、“八连”、“涧内”）。1588年，华人人口过万名，1603年有2.5到3万人，西班牙在1603年与1639年两度屠杀华人。从1582年到1860年间，“八联”多次被烧毁重建，维持了270-280年[21]。

1619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设甲必丹制。乾隆五年（1740年），巴达维亚发生《红溪惨案》，近万华侨被荷兰殖民地政府杀害[22]。福建总督向朝廷报告，但清廷全无反应。荷兰遣使到来道歉解释，当时乾隆以“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坟，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回应。

英国的航海世纪起步较迟[23]，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85年在苏门答腊西岸的明古连（Bencoolen，Bengkulu）设立根据地。

1703年，苏格兰商人亚历山大汉·密顿船长，曾路过柔佛，当时的柔佛苏丹有意把新加坡岛送给他当礼物。那个年代，不管是商人还是贸易公司，拥有土地并不是件好的投资，因此汉密顿婉拒了苏丹的美意。

---

[18] Peter Borschberg, *The Singapore and Melaka Straits – Violence, Security and Diplomacy in the 17th Centur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0), pp.71–75.

[19] *Ibid.*, pp.112–115.

[20] 王赓武著，张奕善译，《南洋华人简史》，页35–37。

[21] 同上注，页38。

[22] 同上注，页64。

[23] 英国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在1577至1580年间航海环绕地球，于1579年12月至1580年的3月间来到印尼西里伯斯岛（苏拉威西岛之旧称）和爪哇岛。

英国的法兰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船长在1783年抵达槟城。1786年设立根据地。1819年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史丹福·莱佛士在新加坡建立贸易站。

1811年，柔佛苏丹派大臣天猛公阿都拉曼（Temenggong Abdul Rahman）[24]，带领150名马来随从到新加坡河口定居[25]。18世纪末，在民丹岛从事甘蜜种植的华人人数估计近一万人[26]，在莱佛士（1819年）到来之前，华人已得到天猛公的同意在新加坡今天的实利基山、福康宁山和珍珠山一带种植甘蜜[27]。

从明代到清初（15-18世纪），海外华人散居南洋各埠，经年以血缘、地缘和传承文化为联系的纽带。华人已在东南亚诸埠，如巨港、巴达维亚、泗水、廖内、邦加、马六甲、槟城、吉兰丹、北大年、曼谷、越南会安、加里曼丹，渤泥（汶莱）、马尼拉等地方落脚繁衍。当英国海峡殖民地于19世纪初提供开放自由的商贸和相对稳定政治环境，再搭上由闽南漳泉、广东的广府潮客等人士在东南亚与华南家乡建立的民间商贸网络，配合马来、印度与西亚人士的管理条件，商埠的发展自然水到渠成。

14世纪新加坡考古遗址及重点文物

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六七百年前的新加坡是一个以商贸立国的城市。

由于现存关于古代新加坡的文献古籍资料零星不全，1980年代，考古工作者开始发掘地下材料，为研究古代新加坡的历史提供新的资料。虽然目前所发掘的材料不足以展现古代新加坡的全貌，但对判断其城市的规模、社会组织与经济活动性质却有极大帮助。

1984年，国家博物院发起的福康宁考古勘查项目，根据文献上的蛛丝马迹，在山丘靠近马来圣墓的山坡（今天在婚姻注册局建筑后方山坡上），发现古代14世纪的文化层。之后几次考古作业中均有所获，收集大量古陶瓷残片等文物。管理福康宁公园的国家公园局在2001年起把这些文物和当年考古发掘原址作公开展出，在1990年代到2010年间设考古工作室（现今新加坡国立大学与东南亚研究所均设有考古研究项目）。历年来的考古发现也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出。

领导14世纪考古研究工作的约翰·密锡博士（John Miksic），在福康宁山的考古作业是新加坡首次有系统地挖掘工作。密锡博士和他的学生林祯祥，在新加坡河北岸以及其他多个地点一共进行了10几处勘查挖掘，其中9处发现了14世纪文化层，另外约10个左右的勘查活动则只有19世纪但没有古代文化活动遗迹（见表二）。

14世纪时期的出土文物，包括来自中国闽南地区生产的元代陶瓷片如青花瓷、青瓷、青白瓷、枢府白瓷、体积较大的硬陶器以及东南亚一带自制的陶器，另外还有玻璃珠子、铁制用具以及钱币等等。其中元代青白瓷枕的人物瓷片，“罗盘”文饰的元青花瓷片，龙纹青白瓷片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出土文物经过分类、计算以及科学鉴定，再按其分布的范围、数量、密度，原料及破损情况，我们可以判断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是年人口统计，华人在总人口4727名中占1159名

[24] 古代马来皇室贵族集团，由四大臣主持，他们是（1）天猛公（Temenggong），国务大臣；(2) 港务官（Syabandar），负责海港事务与税收；（3）Laksamana，海军大将；（4）Penghulu Bendahari，财务主管。

[25] R. O. Winstedt, *A History of Johore (1365–1941)* (Kuala Lumpur: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MBRAS Reprint 6, 1992), p.92.

[26] Carl A. Trocki, *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e and Singapore 1784–188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0.

[27]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页4–5。

表（二）新加坡考古调查作业（1984–2014）

	考古遗址	考古日期	文化层年代
1	福康宁山 Fort Canning Hill	1984年1月/6月 1985年；1987年；1988年；1989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5年；1997年；2010年5月	14世纪； 19–20世纪
2	达士敦山店屋后巷 Duxton Hill	1989年3月	19–20世纪
3	皇后坊 Empress Place	1998年4–6月间	14–15世纪； 19–20世纪
4	新国会大厦 New Parliament Complex	1994年11月–1995年1月	14–15世纪； 19–20世纪
5	桥北路前哥伦坡阁 North Bridge Road, former site of Colombo Court	2000年11月–2001年1月	14–15世纪； 19–20世纪
6	前苏丹皇宫旧址 Former Istana Kampong Glam	2000年3月–2003年	19–20世纪
7	前勿拉士峇沙草地 （新加坡管理大学） Former Bras Basah Park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2001年8月；2002年3月	19–20世纪
8	旧国会大厦 Old Parliament House	1989年；2002年3月；2002年10月	14–15世纪； 19–20世纪
9	板球俱乐部草场 Singapore Cricket Club	2003年4月	14世纪； 19–20世纪
10	圣安德烈座堂草场 St. Andrew's Cathedral	2003年9月–2004年9月	14世纪； 19–20世纪
11	前丹戎加东炮台 Fort Tanjong Katong	2004年9月–2005年5月	19–20世纪
12	望海大伯公 Mount Palmer	2006年1月	19–20世纪
13	实拉榜炮台 Fort Serapong	2006年4–8月	19–20世纪
14	尼路店屋157号后院 No. 157 Neil Road House (Backyard)	2006年7–8月	19–20世纪
15	圣淘沙名胜世界 Sentosa Island Resort World	2006年10月–2007年2月	19–20世纪
16	前高等法院旁停车场 Former site of Supreme Court Car-park	2010年10–11月	14世纪； 19–20世纪

	考古遗址	考古日期	文化层年代
17	维多利亚纪念堂 Victoria Concert Hall (VCH)	2011年9月	14世纪; 19-20世纪
18	亚当花园 Adam Park	2010年5月-2011年4月；2013年1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	印度文化中心 Indian Heritage Centre	2012年12月	19-20世纪
20	善牧主教座堂 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2013年5月	19-20世纪
21	新加坡管理大学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Law School	2014年5月	14世纪; 19-20世纪
22	新加坡植物园 Jacob Ballas Children's Garden,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2014年7月	19-20世纪
23	武吉布朗坟场 Bukit Brown Cemetery	2014年8月	20世纪
24	皇后坊 Empress Place	2015年2-4月	14-15世纪

资料来源：

林祯祥与吴庆辉整理考古记录

John N. Miksic, *Singapore &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1300–1800* (Singapore : NUS Press and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2013)

其用途的性质，以及勾勒出当时的社会结构的轮廓（见附文一）。

我们依据出土文物的分布情况，配合文献记录，目前学界大都同意14世纪时的聚落是位于新加坡河口北岸，包括从当年的海岸线，即今天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沿新加坡河北岸到福康宁山，再沿今天的史丹福路（Stamford Road），史丹福淡水河到大草场这块地方，面积约0.5平方公里。

2011年，14世纪遗址考古作业（维多利亚纪念堂后巷）

比较禁山（福康宁山旧称）上出土的文物与山下和河边的不同，从品质的优劣、样式、数量、精细种类等的不同与出入，给了我们很大的提示，说明当时本地社会结构上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并不只是一处海盗巢穴那么简单；也印证文献记载，淡马锡或龙牙门地方，派使臣到元朝和越南的外交活动纪事，说明当时体制已具一定的规模。

禁山上出土好些具有特别意义的文物，包括指南针位彩青花碗瓷片，元代戏曲人物青白瓷枕瓷片、三爪龙纹青白瓷片，玻璃珠子制作坊、城墙护城河、宗教建筑以及果园的遗址等，说明禁山可能属于权贵阶级。结合早年克罗福关于宗教建筑地基，城墙遗址和护城河等的观察报告，禁山地段在14世纪时很可能是宫廷的所在地。

在前旧国会大厦一个10来平方米的小范围，出土单一式样。来自中国的硬陶器片（小口瓶）上百件，它们均没

使用过的痕迹，种种考古证据显示，这些用品是属于商品的性质，出土地点靠近新加坡河岸，其集中的密度，说明可能是由于运输起卸时的破损报废的。

元代文化层发掘的小口瓶（2002年在旧国会大厦考古遗址发掘，吴庆辉提供图片）

新国会大厦考古遗址发掘大量的溶冶铁器的残渣。根据研究结果，是小型铜铁器冶炼作坊，很可能是为航运船务提供维修服务的工作坊[28]。

而较远离河岸的考古遗址，如位于桥北路的前哥伦坡阁停车场、高等法院停车场、圣安德烈座堂草场等考古遗址出土的14世纪文物，也是以元代瓷片为主，但是分布相对零散，瓷片体积也较小而零碎，没有精致物件，研究判断是属于一般居民住处。

除了最新考古资料及中国的典籍记录以外，来自英国、葡萄牙、荷兰、越南、暹罗及爪哇等古代典籍堆中，也可找到不少关于古代新加坡是个商埠的蛛丝马迹。国家文物局在2004年出版的《古代新加坡面貌—根据地图、文献及考古资料的探索》（*Early Singapore 1300s-1819. Evidence in Maps, Text and Artefacts*），收集了许多最新研究文章。例如：葡萄牙人古地图，及当他们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后所记录下来的关于新加坡的口述历史等，都能开拓我们对古代东南亚经济面貌的多元视角。

考古资料证明，地处东南亚交通要道和季候风交汇点的古代新加坡，是马来群岛的一部分。在14世纪曾经是个繁荣的商埠，提供适合通商的条件。大量元代的商品，主要是陶瓷器皿、铁鼎、丝绸以及东南亚的香料与来自热带雨林的土产，当时流通的中国铜币，尤其是宋代铸造的仍十分通行。从商品数量和种类推测，当年这里可能是中国商品的转口贸易站。

当年岛上建立的城邦聚落，已是一个有相当组织和规模的社会，其权贵统治阶级与元朝有朝贡贸易关系。精致的青白三爪龙纹瓷器、元曲剧台装饰的白瓷枕，罗盘瓷碟等提示这方面的证明。

统治阶级是信奉印度南传的兴都佛教，山上皇宫范围内设有供奉神像的亭台，也有专门负责宗教职务的僧侣。皇宫有城墙、护墙河等防卫建设，在其范围内有果园、沐浴池与手工作坊。

平民阶级有工匠、农民、士兵，从事海上交通及商务等不同性质的人士，靠近新加坡河口的是商贾贸易区，近山脚的住着平民。

新加坡不是马来世界政治权力中心，但却又是政治上争取控制的要点。在19世纪以前几个世纪里，跟巨港、马六甲、巴达维亚、马尼拉、曼谷和亚齐等区域中心，曾经一度属于海洋经济与区域商贸网络的一环节，是印度与中国间，东西两个世界的商贸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角色。

目前文献与考古资料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说明新加坡当年已有华人社群的存在，但是资料同时也说明14世纪的新加坡，已拥有一个十分适合海洋贸易的生活环境。我们不排除住番的华商杂居于新加坡河口北岸平地，他们拥有较高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或掌握提供技术服务与产品供应的网络与语言知识；他们也可能是来自附近的巨港和爪哇等地，随着风的季节到此参加商贸的市集。闲暇时间里也下棋作乐，饮酒煮海鲜为食物。

15世纪-18世纪新加坡因为区域政治斗争，一度沦为小渔村，这期间华人开始在附近各城镇建立商贸和社会生活的基地，参与当地建设；也跟中国家乡保持联系，并相互交织为南洋网络，这个生态富有流动与互补性。关于新加坡华人历史的研究，有必要从跨地域视角探讨东南亚各地经济社会文化等共同发展的历史渊源。

19世纪初年，拥有跟西洋殖民地丰富生活经验的南洋网络里的各地华人，把握英国海峡殖民地提供发展机会到新加坡发展，掀开新加坡华人历史的新篇章。

[28] John N. Miksic, *op.cit.*, p.281.

附文一

新加坡考古遗址

福康宁山（Fort Canning）[1]

福康宁山（Fort Canning）在19世纪末建筑炮台以前叫“禁山”，俗称“皇家山”或“升旗山”。根据《马来纪年》记载，巨港（Palembang）王子圣尼罗乌达玛（Sang Nila Utama or Seri Teri Buana）从廖内民丹岛（Bentan）渡海到旧称淡马锡（海城）的地方建城，把新城命名为新加坡拉（狮子城）。

禁山是从马来名“Bukit Larangan”（Forbidden Hill）意译地名，此地之所以是禁地，根据《文西阿都拉自传》[2]，那是古代马来王权与王族墓地所在地，平民百姓对圣尼罗不得打扰。而当年王后和宫女在山腰的山泉洗澡的地方，更是闲人止步的禁地。据说山泉就在山背靠近在旧里峇峇利游泳池的附近，19世纪时船只靠在山下新加坡河岸添加淡水，水源可能来自同一山泉。

1822年，克罗福医生在前往暹罗途中路过新加坡时，曾把当时所见的古城遗迹记录下来[3]。

马来古墙（Malay Wall）、护城河与登城山沟（Moat）

克罗福医生见到沿着淡水溪（勿拉士水道，俗称流水渠）边，就在今天的史丹福路（Stamford Road）的位置，有一道土墙，从靠近海岸处直到禁山后，长约一英里。土墙墙基宽16尺（约5米），高8-9英尺（约2.75米），间中设有闸门，也设有炮眼炮墩。墙一旁有条平行的淡水河，显然是古早年代的防御建设，这也是古代的城界所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25年制作的早期新加坡地图就标志这古防线（Old line of Singapore）的位置[4]。

淡水河（后称为 Stamford Canal）也许就是700年前的古新加坡拉城的护城河。该淡水河源自东陵（Tanglin）在今天汉地路（Handy Road）旁，仍可见其踪迹。离以印度洗衣人命名的多美歌（Dhoby Ghaut）地铁站不远，印度人就是利用这淡水河水以洗衣为生，衣服还在当时草场上（今天新加坡管理大学靠国泰大厦那段）晒干。淡水河在今天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简称 SMU）校园流向海滨的那一段，今天已加了盖成为行人走道。在莱佛士城（Raffles City）不远的和平纪念碑旁，仍有一对桥墩，鲜为人们所留意，桥墩上清楚写着“Stamford Bridge”字样。

此外，据说还留下当年登山入城的一条山沟（Moat），位置就在皇家山脚（即禧街，Hill Street）的前禧街警察局后边半山腰，靠近前旗杆和前灯塔的地方。

古城建筑石台基和果园旧址

1822年2月4日，克罗福纪录他在禁山，靠近山顶的地方见到的古代建筑的石台基。据他描述是一处由方形沙石砖围成的方形地基。面积约40x40英尺（12mx12m），每边由14块沙石砖组成。石砖中有

[1] Kwa Chong Guan, "Records and Notices of Early Singapore"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Forbidden Hill" of Singapore: Excavations at Fort Canning, 1984*, John N. Miksic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Singapore, 1985), appendix pp.100–139.

[2] 杨贵谊译，《阿都拉传》（新加坡：热带出版社，1998年），页100；阿都拉（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yi, 1796年生于马六甲，1854年卒于麦加）是19世纪马来文学界的重要人物。1819年到新加坡，自传成书于1849年，是一部从平民角度记录19世纪上半叶马六甲和新加坡宝贵的社会资料。

[3] John Crawfu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Exhibiting a View of the Actual State of Those Kingdom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1828]); John N. Miksic, *op.cit.*, pp.209–212.

[4] 新加坡地图，英国国家图书馆，1825年6月18日。

洞孔，判断乃木柱子的基座，石台中央有圆形设计，可能是安置佛像的基座。根据克罗福判断，这应该是类似爪哇式宗教亭子的基座[5]。其位置就在今天电讯站的地方，可惜这些古迹在其后被英军康宁砲台与军营工程破坏，至今已荡然无存。

克罗福也在山上看到多种品种果树的园地，虽然在年代上已隔了500多年，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多种类果树集中一处是前人种植留下的。克罗福也找到中国宋代铜币与瓷片，还有本地区土人制造的陶器碎片[6]。

伊斯干达·沙圣墓（Keramat of Iskander Shah）

《马来纪年》的记载是圣尼罗乌达玛葬在禁山，但据葡萄牙人记录，伊斯干达·沙仍被葬于马六甲。莱佛士虽曾表示愿意在辞世后与马来古皇家墓群一起安眠于斯，但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或任何证明[7]。在民间说法不一，有伊斯干达沙·的衣冠冢之说，也有本是其他圣徒圣墓的讹传的推测。还是因为圣尼罗乌达玛是兴都教徒，于是被近代印籍回教徒改为圣墓，并依附伊斯干达·沙的名字的可能？在山腰那座圣墓是不是伊斯干达·沙的圣墓，是个不解之谜。

[5] John N. Miksic, *op.cit.*, pp.209–217.

[6] 中国铜币是东南亚地区传世的流通货币，唐宋的钱币仍在元明时代流通。

[7] John N. Miksic, *op.cit.*, pp.218–219.

历年出土具有代表性文物

新加坡石碑（Singapore Stone）

古代新加坡石碑曾竖立在新加坡河口（即今天浮尔顿酒店附近靠新加坡河口的前鱼尾狮公园一带），年代估计是在10-14世纪左右。克罗福在1822年的记录里描述石碑是在1820年发现的。石碑由一大块沙石劈成两片，打制成大小相仿，各高10英尺（约3米）、宽9-10英尺（约3米）。碑面的突出部分刻有约50行的古代碑文，那是本地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文字。碑文被置于一圈凸起的缘边之中，覆盖面积约长1.5米、宽2.1米。当年曾经跟莱佛士到现场的文西阿都拉，在其自传里说所有的人都去看就是没人读懂文字的内容[1]。学者对石碑的年代和文字看法不一，可能属于古苏门答腊文或古爪哇巴利文的一种。

新加坡石碑残片（新加坡博物馆提供）

该石碑在1843年的一项公共工程中被炸成数块，其中三片被当时工兵工程师收集送往加尔各答，这三块石碑残块上面的文字拓片给保留下来。但最后只有一块被称为“新加坡石碑”的残块于1921年送回给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馆[2]。传说这大石是当年大力士巴当在跟满者伯夷对手比较气力时，从禁山上抛掷到此的。而根据学界的推测，这可能是当年满者伯夷征服新加坡的一座纪功碑的残片。此石碑现藏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狮面金肩饰与金耳饰

此为南印度风格的金肩饰与金耳饰，1928年在福康宁山建蓄水池时由工人发现，上交当年莱佛士博物馆。其狮面纹饰是印度教守护门户的神兽，传说此神兽在偷喝长生不老的圣水时，被发现而立即被斩头。狮身死了但狮头却永生不灭。此守护神兽的狮面造型常用在爪哇兴都教古遗址的门户雕饰，金肩饰与金耳饰估计有700年历史，是狮城新加坡现存年代最早的狮子造型图象的文物，现藏新加坡国家博物馆[3]。

宫廷的琉璃珠子作坊

由于当年本地不具备高温制造琉璃技术，从遗址熔解古代玻璃碎片和其残留痕迹判断，1984年考古作业发现的14世纪的文化层，以及出土古代新加坡陶瓷碎片与数量可观的琉璃珠子，可能是一处把碎玻璃再循环来制造琉璃珠子的作坊。各种手工作坊符合传统马来宫廷的经济组织的模式。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将这块古代新加坡考古遗址保留下来，开辟展览走廊，成为今天福康宁公园14世纪历史走廊的教育参观点。

罗盘纹饰青花碗瓷片

1984年福康宁山考古发掘出土，显示海洋航行与中国科技先进的时代背景。

青白三爪龙纹瓷片

1984年福康宁山考古发掘出土，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元代对青白瓷三爪龙纹饰器皿在分配上的讲究规定，提示此精品可能与山上主人身份有关。

---

[1] 杨贵谊译，《阿都拉传》（新加坡：热带出版社，1998年），页115-116。

[2] John N. Miksic, *Singapore &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1300–1800* (Singapore : NUS Press and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2013), pp.13–15.

[3] John N. Miksic, *op.cit.*, pp.222.

5月5日

新加坡河出现第一座吊桥（埃尔金桥 Elgin Bridge），连接大小坡大马路

14世纪文化层出土的罗盘纹饰青花碗瓷片，元代青花高足杯以及梅瓶盖子（福康宁山发掘，现藏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元代戏曲人物青白瓷枕瓷片

1984年福康宁山考古发掘出土。元代瓷枕可能不是本地一般的生活用品，估计是属于赠予本地权贵人物的精美礼品的一部分。

满者伯夷风格的飞马骑士

1998年亚洲文明博物馆考古发掘出土，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文物局编号2002-00341）。这个双面对称的塑像立于一底座上，骑士端坐马鞍，腰间围着沙龙，裸露着上半身和小腿，这是一件爪哇式骑士造型文物，是同类文物中绝无仅有的一件。

“帅”

“帅”字象棋棋子及其他生活小用具如鱼钩、鱼骨、贝壳与陶瓷器皿残片，2011年维多利亚纪念堂考古14世纪文化层发掘出土。其中不少陶罐上还有商行商号的印记[4]。

14世纪文化层发掘的“帅”字象棋棋子（维多利亚纪念堂发掘，林桢祥提供图片）

加冷河明代青花盘瓷片

八片16世纪明代青花大盘瓷片是打捞加冷河时被发现，现藏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加冷河在16世纪葡萄牙记录中，曾是柔佛廖

[4] 林祯祥，2011年维多利亚纪念堂考古文物在东南亚研究中心工作室，文物在2014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700年展”的介绍考古作业部分展出。

14世纪满者伯夷飞马骑士（新加坡河畔发掘，现藏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内王朝设立港务官的所在地，但是不久被亚齐人毁灭，此后新加坡就沉寂一段日子，新加坡考古文物中没有明显的明代文化层或15-17世纪的出土文物，说明活动锐减与文献记载吻合[5]。

瓜形春宫盒

14世纪文化层一件瓜形盒子，盒盖雕瓜叶，盒内贴男女交欢硬陶塑，无釉，乃流落海外不多见的中国情趣文物，因为是孤件，可能是当年贸易站里的特殊礼品、交易品或私人收藏物，反映的文化交流史的轻松面。

马来王朝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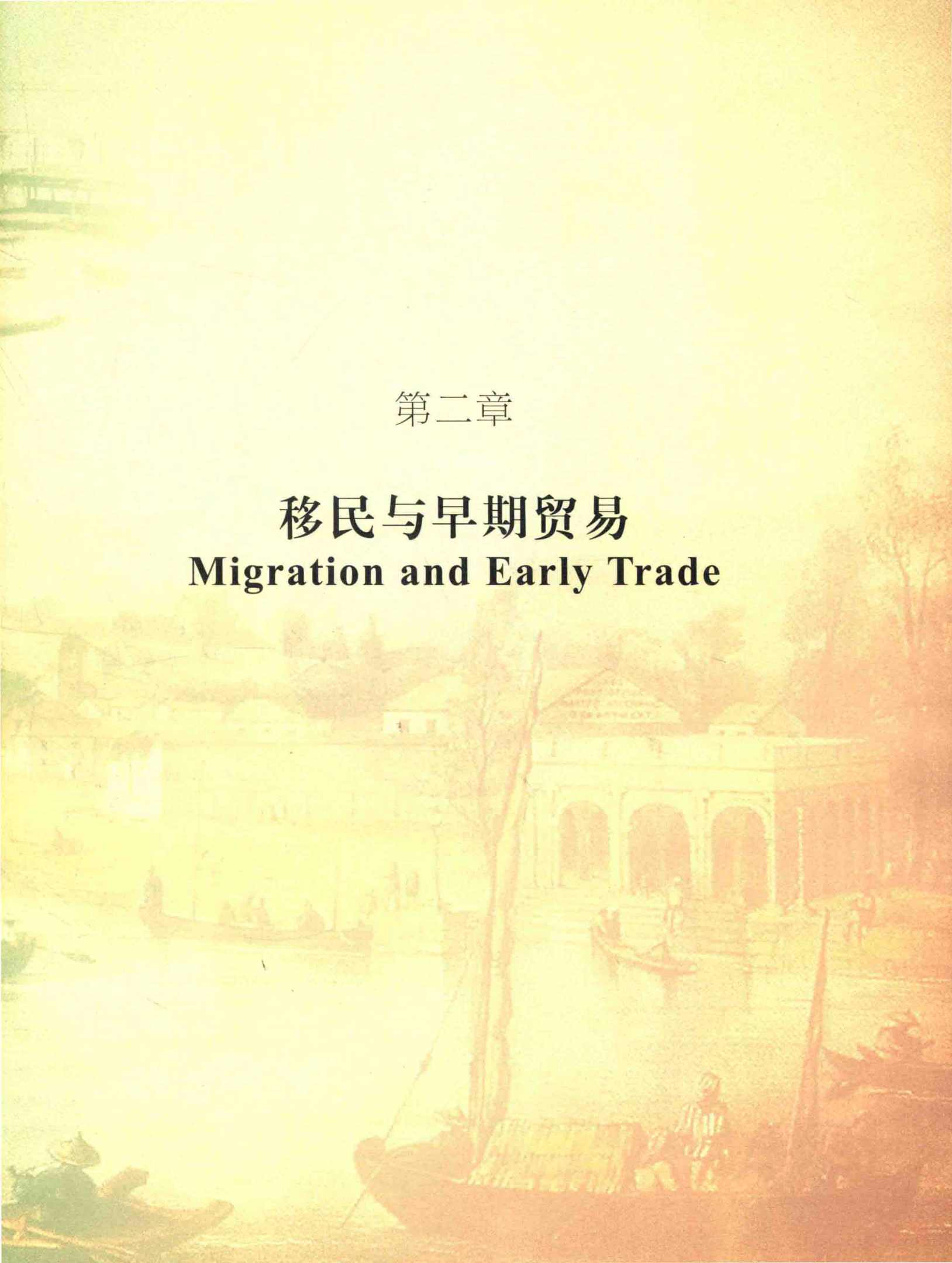
16世纪马来王朝铸造的金币，在本地出土跟16世纪柔佛王朝在新加坡河口马来聚落相关的文物，该聚落在1613-1615年被亚齐人烧毁。

[5] Kwa Chong Guan, *16th-Century Underglazed Blue Porcelain Sherds from the Kallang Estuary, in Early Singapore 1300-1819* (Singapore: SHM, 2003), pp.86-94.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新加坡划为十二区，每区设一区长



第二章

移民与早期贸易
Migration and Early Trade

第一节　乘风破浪下南洋
——早期华族移民浪潮

摘要

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以来，直至1942年日军南侵，华南移民（包括闽南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海南人及福州人等），都纷纷乘坐帆船而来，1860年后改乘轮船。有一部分是契约劳工，来到新加坡后，被迫遣送到东南亚邻近国家去，从事垦殖农园与开矿的劳苦工作。但大部分都是自由移民，他们凭着克勤克俭的精神，在海外开拓了一片天地。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in 1819 to the Japanese invasion in 1942, the immigrants from South China like Hokkiens, Teochews, Cantonese, Hakkas, Hainanese and Fuchows flocked to Singapore by junks and later by steamships in 1860. For the indentured labourers, they were sent to other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to work in plantations and mines. As for the largely free passengers, with their pioneering spirit, they eventually built their new lives abroad.

崔贵强 (Choi Kwai Keong)

新加坡开埠后不久，有两股主流移民浪潮注入，一股是来自马六甲的移民，另一股是来自华南的移民。

15世纪的马六甲王国，已有华人聚落，到19世纪初新加坡建埠时，马六甲华人经过几百年的经营，人数越来越多，聚落日益壮大，因经商致富的华人也逐渐多起来了。他们目睹新加坡开埠之初，提供了大开拳脚的机遇，便毅然移民过来。

华南移民包括福建（闽南）人、潮州人、广东（广府）人、客家人、海南（琼州）人及福州人等。

碇泊在新加坡岸外的中国帆船

为有源头活水来

闽南人属于泉州府与漳州府人士。泉州府的重要县市包括南安、同安、晋江、安溪、泉州市与厦门市等；漳州府则包括漳浦、海澄、南靖、长泰与漳州市等。

福建的海岸线绵长曲折，素有“闽海雄风”之称，沿岸多天然海港，水深港阔，有利于船舶停泊，发展对外贸易。宋（960-1279）元（1276-1368）之际，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日趋繁荣，泉州港已逐渐成为全国最大商港。明代时期，漳州海澄的月港已发展起来，促进对外贸易更加繁荣。到了清代（1644-1911），对外贸易中心逐渐转向厦门，与东南亚各商港都有贸易来往。不过，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后，厦门被规定为五口通商之一，由外人掌管厦门关税司署成立，大事发展海务与港务建设，才使厦门成为国际商港。厦门港一开埠，以英国船舶为主的各国船舶纷至沓来，使厦门岛一跃成为名闻遐迩的商业中心，厦门与许多口岸建立了密切的商业关系。同时国际性港口的重要地位，也使厦门成为移民海外的重要港口。据统计，仅1894-1913的20年间，从厦门出洋前往海峡殖民地的人数达102万7077人，平均每年5万1354人。

广府人属粤中广州府，其重要县市分布在珠江流域下游，以广州为中心，辐射到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港、澳门、鹤山、台山、恩平、开平、珠海市、江门市与中山市等县市。珠江三角洲人口稠密，村落连绵，城镇发达，为农业文化精华所在。广东南濒大海，沿海多优良港湾，广州、澳门与香港，都是先后崛起的良港。早在唐代（618-907），广州即已发展成为海上对外贸易的商港。到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以后，广州的对外贸易达到了极盛时期。清初施行海禁政策，限制外国人来华经商，1757年，清廷颁布上谕，封闭一切通商口岸，只留下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商埠。清政府在广州设立了海关与十三行，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独口通商给广州的经济带来繁荣，使广州成为中外货物集散地。自1553年葡萄牙人租占澳门后，澳门逐渐发展成为贸易商港。香港在鸦片战争后，割让为英国殖民地，在英国人的经营下，香港一日千里，迅速成为繁荣的国际商港。广州、澳门与香港，都成了日后近代移民海外的跳板，在这里扬帆启航，漂泊到海外各地。

潮州人属潮州府人士。统辖的县市有揭阳、潮阳、潮安、饶平、惠来、澄海、普宁、潮州市、汕头市及海丰、陆丰等，分布在潮汕平原，土地肥沃，人口密度占全国之冠，对环境压力很大。潮州位于韩江出海口，处于三角洲顶点。自唐宋时起，便成为粤东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也已发展成为对外贸易商港。明清之际，海上贸易更盛，潮州港逐渐为樟林港取代。迨至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

后，韩江三角洲不断南移，逐渐失去港口地位，为新崛起的汕头港所取代，成为粤东现代最重要的海港城市。在汕头港未崛起之前，潮州人与客家人多由樟林港出海，迨至汕头港发展起来之后，才成为移民出海的落脚点。

客家人的聚居地有三大区域，即闽西的汀江流域，粤东的梅江流域及粤中的北江与东江流域。中原汉族早在唐宋时期，便已迁至闽西，他们定居在汀江流域，汀江也是客家人的母亲河。汀州府所属的县市有上杭、永定、武平、长汀与连城等。自南宋、元、明以降，闽西的客家人逐渐向西推移，定居于梅江流域，以梅州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客家文化核心，大事发展农业文化。客家人在这区域兴教育，办学校，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这个区域包括了嘉应州五属的梅县、兴宁、五华、平远、镇平（蕉岭）以及大埔、丰顺一部分。到了清代中叶，梅州已出现地狭人稠现象，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迫使部分客家人不得不又向珠江流域迁徙。这个区域地处内陆，所以居民出海谋生，都要经过长途跋涉，到汕头港登船出海。

这一部分向外扩展的客家群体，终于在东江和北江流域定居下来，分布在惠州府的辖区，包括今惠阳、惠州、惠东、博罗、紫金、河源、龙川、和平及连平等县市。惠州是岭南重镇，扼东江流域水陆交通要冲，自客家人成为东江流域的居民主体后，这里也发展为客家文化荟萃地，形成一座以客家文化为主，兼具广府文化与潮州文化特点的多元文化中心。这个区域比较接近广州、澳门及香港，因此移民多以它们作为出海落脚地。

琼州人世代定居的海南岛，孤悬南海，隔着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遥遥相对，是中国第一大岛，其地势是西南属高原山岳地带，占全岛面积50%，其他地区属丘陵地带，占45.7%，只有在五大河流域有冲积平原，面积仅有5%左右。

海南岛四面环海，海岸线虽长但少曲折，天然良港不多，只有榆林（南部）、清澜（东部）、马袅（北部）、新英（西部）及海口（东北部）等数处港口。除榆林港与清澜港海水较深，可碇泊较大船只外，其他如海口港水面甚浅，无甚价值。海南移民出海，大多在清澜港下船，或到香港或澳门登船远行。

明代在海南岛建置琼州府，统辖县属十三，即：琼山、文昌、万宁、陵水、崖县、感恩、昌化、儋县、澄迈、临高、定安、乐会及琼东。海南岛都市规模不大，经济也不发达，人口不多。1933年统计，汉人约有210多万，黎人（土著）约40万人，比起闽粤的海外移民，海南移民出海较晚，人数也较少[1]。

福州府是福州人的故居，统辖十邑，包括

帆船上的中国移民

[1] 以上各节，参阅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朱维幹，《福建史稿》（下册）、林枫，《闽南文化述论》、郭伟川，《岭南古史及潮汕历史文化》、陈植，《海南岛新志》。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8月2日

英国东印度公司再与柔佛签约，正式割让新加坡

闽侯、闽清、连江、长乐、福清、罗源、永泰、平潭、古田与屏南。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端中部，是福建省省会，全省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中心。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重要港口，对外贸易中心。福州府县市的居民出洋，都是以福州港口为落脚点。

推力与拉力

所谓“推力”，即指华南生活环境恶劣，天灾人祸肆虐，民不聊生，人民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求存，形成了一股“推力”，把华南居民往海外推移出去。所谓“拉力”，即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在英殖民地政府的经营下，积极推动各项发展计划，经济日趋繁荣，急需劳动力，形成一股“拉力”，强力把华南移民拉拢过去。

造成“推力”的因素有下列数项：

山多平地少耕地不足

福建山地丘陵多，占全省总面积95%左右，平地仅占5%左右。山地丘陵地带，多不适宜耕作，只有其间分布着狭长的河谷、盆地及山间冲积平原，才可供开垦为农地。

平地多分布在江河冲积平原，其中以漳州平原与泉州平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适宜垦殖。此外，沿海平原也是一马平川，宜于发展为耕地。

整体而言，闽南土地较其他地区较好，也是人口稠密的地区。

广东省的地势北高南低，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三分之二，台地平原占三分之一。

粤北为南岭余脉，重峦叠嶂，但有山间谷地及河谷盆地，可供农垦。粤中为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平原上河网纵横，岗峦错落，是富饶的农业区。这里人口稠密，村落连绵，城镇发达，是广东第一大平原，也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所在。

粤东的潮汕平原，是韩江、榕江与练江下游的冲积平原，也是广东第二大平原，地势平坦，河网交错，农业聚落密布，土地肥沃，是全省最宜耕地之一。但地狭人稠，人口对环境压力很大。

至于粤东北客家人的集聚区域，山地面积最大，占47.5%，丘陵占39.2%，平原、阶地、台地仅占12.4%，河流和水库水面积占0.9%。这里只能发展为山地农业，生存环境恶劣。

人口压力与严重缺粮

自宋元以来，中原汉人就历经千山万水，长途跋涉，向福建广东移民。到了清代，福建人口迅速增长。1661年，福建人丁为145万5808人，1753年为471万339人，1829年为1908万1876人。168年间，人口增加了十倍多[2]。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与潮汕平原，到了清代，也显得地狭人稠，有人满之患。到鸦片战争前夕，广东人口已多达2463万4100人[3]。人口的大量增加，而农业增产却不足应付，因而发生了缺粮现象。有几个因素，更加剧了缺粮的现象，其一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使得粮食作物的面积萎缩，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经济的冲击下，尤为明显。

其二是土地兼并剧烈，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加剧了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地主对农民横征暴敛，使农民减低了生产的热忱。在闽粤两省，缺粮现象严重，须仰赖邻近江浙等省的米产、台米，甚至外国米粮（包括暹米）的接济。内地缺粮，人民饥不裹腹，难以维生，以致冒险移民外地。明末福建大饥荒，有福建人数万人移居台湾。清朝统一台湾后，闽南人民移居台湾省日众，自1683年起的近百年间，台湾人口新增70至80万，大部分由闽南渡海而来[4]。17世纪初，也有闽人移民马尼拉（Manila）、巴达维亚（Batavia，今称雅加达）、暹罗（Siam）与苏禄（Sulu）等地。与此同时，广东人也有移居越南、暹罗及海外各地。

天灾人祸

中国天灾频仍，经常发生苦旱与水患。据统计数字显示，在清朝267年的国祚中，就发生了92年苦旱及190次

[2] 转引自徐晓望，《福建通史》卷4：明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546。

[3] 蒋祖缘，《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13。

[4] 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页7-9。

水灾[5]，人民深受其害。闽粤两省，也难逃劫数。介于1068年至1911年的844年间，福建省即发生了饥馑888次，其中漳、泉、莆、仙等17县发生了321次，平均不到三年即有一次饥荒。1851-1908年间，广东台山县即发生了大水灾14次、台风7次、地震4次、大旱2次、瘟疫4次、大饥荒5次，共36次，平均一年半即有一次灾害[6]。天灾之年，赤地千里，人民死亡枕藉，只好铤而走险，成群结党，摇身一变成土匪，打家劫舍，社会岁无宁日。人民无处栖身，被迫离乡背井，远渡重洋谋生。

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在暴政的统治下，人们难以维生，官逼民反，只得揭竿起义，反抗腐败的统治者，造成内乱不息，社会动荡不安。明清之际，闽粤两省就发生了多次农民革命：如1448年，广州爆发了黄萧养领导的农民起义。明中叶以后，海南岛与粤省各地，相继发生了少数民族武力反抗政府与地主的叛变。1802年，广东天地会又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1853年，黄德美等领导的小刀会起义军攻克厦门，并建立政权。闽南各县群众起而响应，遭清军镇压，起义军溃败逃亡海外，如黄志信（黄仲涵之父）逃亡印尼避难。此外更有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如明末崇祯的李自成领导农民军，席卷半壁河山，直捣北京城，导致明朝灭亡。1850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军，金田起义，声势浩大，攻陷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此后又有捻党起义（1851-1868），其规模之庞大，实力之鼎盛，几乎动摇了清廷的根基。内乱迭起，在战火的摧残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远走高飞，亡命天涯。

另一方面，我们看看新加坡如何发挥“拉力”。

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是东西交通咽喉，有利于发展为国际商港。莱佛士占领新加坡后，立即宣布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新加坡成为自由港，外国商船进入新加坡港口，输入或输出货物，一概免抽税收。这一政策获得热烈的回响，从东南亚各地、中国沿海商港及西方国家的帆船，络绎不绝，到新加坡进行贸易。自由贸易政策，大大地推动了新加坡的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为了促进日趋繁荣的商业社会，政府必须发展商业市区，兴建商业与行政大厦，开辟公路，建架桥梁。又由于移民的大量移入，一切民生的衣食住行、民宅、医院、学校及娱乐设备，政府必须大兴土木，亟需劳动力。在风帆时代，新加坡河畔的驳船码头（Boat Quay）是中国帆船停泊与起落货物的所在。但进入了轮船时代，驳船码头已不敷应用。在19世纪下半叶，政府须动用大量劳动力，挖土填海，兴建吉宝海港（Keppel Harbour）。中国移民最能刻苦耐劳，工作效率高，甚受殖民地政府的欢迎。

此外，为了增加岁入，政府鼓励人民投资开辟农园，种植经济作物豆蔻、甘蜜与胡椒。园主绝大部分是华族资本家，农民清一色是华工。19世纪40、50年代，达至巅峰期，但到了1890年代，由于价格暴跌，市态不景，胡椒甘蜜种植物便一蹶不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华人资本家又大量种植黄梨与橡胶，也亟需华族移民。总之，从1819年开埠至1942年日军南侵的100多年间，除了短期间经济不景限制移民入境外，政府都是敞开大门，欢迎华族移民入境，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拉力”。

飘洋过海：从帆船到轮船

19世纪60年代之前是风帆时代，那时川行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远洋中国帆船，既载来中国产品如茶叶、丝绸及陶瓷器，也载来华南移

[5]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86–1953* (1959), p.229.

[6] 转引自吴凤斌，《契约华工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21。

相关人物

克罗福

历史事件

8月2日

英国驻扎官克罗福（John Crawfurd）乘船绕岛一圈，以宣示主权

南来移民的第一站——圣约翰岛（今）

民。60年代以后，轮船逐渐普遍使用，轮船容量大，安全而迅捷，逐渐取代了帆船，来自中国的帆船便越来越少了（参阅本章第二节“风帆时代的新加坡”）。

19世纪来自华南的“福”船和“广”船，具有若干特点，船首尾呈宽敞的方形，船的两侧装上一条横木，系上了锚钩。粗木的锚钩长达9或12英尺，并用石块加重重量。每艘帆船划分为几个防水船舱。帆船的尾部经常高过船首，这样的制作方式是合乎常理的，因为这样能减低惊涛骇浪对船尾的冲击，在强风中昂首前进。而且舵工伫立在高高的船尾，操作船柄，面向前方，一览无遗[7]。中国帆船通常重约三四百吨，不过也有些重达1200吨的。一般帆船长75至106英尺，宽17至34英尺，每艘船可运载数百人不等。

南来的帆船，一般都漆上红、青、黑及黄等不同颜色，不同的颜色标志着不同区域的船只，广州与汕头的俗称“红头船”，闽南的俗称“青头船”。有些船首画上一双眼，象征着可资辨别方向，乘风破浪前进。但也有人认为“船眼”代表了一钩新月，具有佛教的哲理[8]。有些帆船也绘上了动物，较常见的是展翅的苍鹰。

帆船利用季候风的吹送，扬帆远航。每当12月至4月间东北季候风吹送时，中国帆船便由广州、厦门、汕头、香港或澳门等港启航，扬帆南下，绕过海南岛，沿着越南东岸，航抵昆仑岛（Pulau Condore），然后横越海洋到达马来半岛东岸，南下新加坡。这较漫长的航程，费时二三十天，有时甚至长达40天。等到5月至11月间西南季候风吹送时，中国帆船便沿着来时的航线，踏上归途。

从中国乘帆船到新加坡的船费颇为稳定，船票需7元至8元[9]，比轮船的船票便宜。但对赤贫的移民来说，也是个沉重的负担。

但自鸦片战争后，中英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来华的英商船日多，中国帆船备受严重打击。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后，轮船的使用逐渐普遍。轮船的载重量大，安全快捷，从华南到新加坡，航程缩短至6至8天，又不受季候风的影响，终年可通航，因此逐渐取代了帆船。1880年，川行于华南与新加坡的轮船有178艘，帆船只有64艘[10]。1887年，轮船与帆船的比例是350岨54[11]。

1884年，华南移民抵达新加坡的人数高达11万多人，他们乘坐263艘轮船到来，这些轮船分别是英轮216，德轮26，澳轮12，荷轮8及美轮1，此外还有56艘中国帆船[12]。可见外国轮船以英轮最多，而中国帆船已经沦为配角了。外轮大小不一，大船载客多达千人，有的载六七百人，较小

[7] Downelly, I.A., *Chinese Junk and Other Native Craft* (1924), p.5; Purcell, V.,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1965), p.678.

[8] Cameron, J., *Our Tropical Processions in Malayan India* (1865), p.10.

[9] "Report of Committee upon the Condition of Chinese Laborers in the Colony," in *Straits Settlements Legislative Council Proceedings SSLCP* (1876), p.ccxlii.

[10] "Report of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Singapore, 1880," in *SSLCP* (1881), p.92.

[11] "Annu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Singapore, 1887," in *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 SSGG*, 1888.04.27.

[12] "Report of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Singapore,1884," in *SSLCP* (1885), p.C15.

的载客三四百人。

19世纪80与90年代，出洋者众，以致轮船来新者无不满额。轮船公司为获取更大盈利，尽量收客，船小客多，挤迫不堪。船上条件极度恶劣，舱中空气污浊，秽气扑鼻，食物肮脏，饮水医药奇缺，船客常患上疾病，乃至死亡。

外轮垄断了中南（洋）航线，获利至巨，华族资本家也分一杯羹，20世纪比较重要的船务公司有：

- 和丰轮船公司，业主为华族巨商林秉祥，属下有丰平、丰庆与丰祥等轮船，川行新加坡、香港、汕头与厦门等港口；
- 太古轮船公司，为英人经营，属下有安顺、安徽与美南等轮船，川行新加坡、香港、汕头、厦门与海口等港；
- 和兰轮船公司（KPM），为荷兰人经营，属下有万福士与金马等轮船，川行新加坡、香港、汕头与厦门等港；
- 渣甸轮船公司，为英人经营，属下有浩生与瑞生等轮船，川行新加坡、香港、厦门与上海等港；
- 渣华轮船公司，因其船号均以“鸭家”（Apear）为名，故亦称鸭家公司，川行新加坡、香港、厦门、上海及日本等港。

各船务公司竞争剧烈，在正常情况下，船票价格较稳定，但一旦有不寻常现象，船费则起落不定。

华南移民的大量涌入，给英殖民地政府带来诸多难题，其中一个是来自瘟疫地区的移民，常染上流行性疾病，一旦登陆新加坡后，便会损害当地居民的健康。英殖民地政府采取防范的措施包括：禁止瘟疫区的移民入境；倘若船上有人被疑染天花、麻风等疾病，那么整只船便须停泊于棋樟山（St John's Island）检疫站，接受医官等人的检查。

棋樟山检疫站设备简陋，岛上杂草丛生，羊肠小道，路灯幽暗。移民所乘轮船碇泊港外，由小船运送到岛上。这些小船安全设备欠佳，移民登岸，不幸掉入海中溺毙，时有所闻。收容所内，屋狭人多。热气熏天，水量不足，医药缺乏，易引起疾病。加上语言不通，饮食不合胃口，移民被困岛上，叫苦连天。抑有进者，有时医官更要男女移民赤身裸体，接受检验，移民引以为耻，以致怨声载道，导致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的垂询，乃至全侨社会的关注[13]。难怪有些华族团体与华人参事局局员大声疾呼，恳求政府改善棋樟山的设备，给予移民人道的处理。

南来移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移民，另一类是契约劳工（亦即苦力或猪仔）。

自由移民是指那些有足够旅费南来的移民，这些旅费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也可能是向亲朋戚友筹借的。他们在新加坡登陆后，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义务，他们可以行动自如，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

至于契约劳工，主要是指那些来自农村的贫民，他们身上不名一文，被人利诱拐骗南来。因为他们像猪只一样被贩卖出洋，所以契约劳工被视为“猪仔”，任人宰割。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行为了从中国取得更多廉价劳动力，便积极展开招募苦力的活动。它们与当地的买办、奸商、地痞与流氓相勾结，在厦门、广州、汕头与香港等地设立了猪仔馆。这些被称为“大客头”或“猪仔头”的洋人代理人，手下又豢养了一批“小客头”、“猪仔贩”，由他们深入农村去，不择手段地招募劳工。他们编造了到海外去发财致富的谎言，并准备为移民支付旅费。有时也引诱农民进城，介绍他们进赌场去，及至农民输得囊空如洗时，再威逼他们移民海外去工作，以便偿还赌债。

“大客头”为这些被拐骗来的苦力（或称“新客”）支付船费，也借给每名苦力服装

[13]《星洲日报》，1935年9月25日。

费、安家费及船上杂费。然后在“大客头”的押送下，一批批的苦力便登上船只，扬帆南来。

船只由人口贩运者所承包，为了多得利润，往往超载，致使船舱之内，“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人数既多，水供不足，饮食恶劣，“晕船吐呕，狼藉满舱”，加以“南洋酷热，上下蒸郁”，奇臭逼人。一旦有船客染上疾病，迅速蔓延，乃至一发不可收拾，死亡率很高。客家歌谣就唱道：“至嘱亲友莫过番，海浪抛起高过山，晕船如同天地转，舱底相似下阴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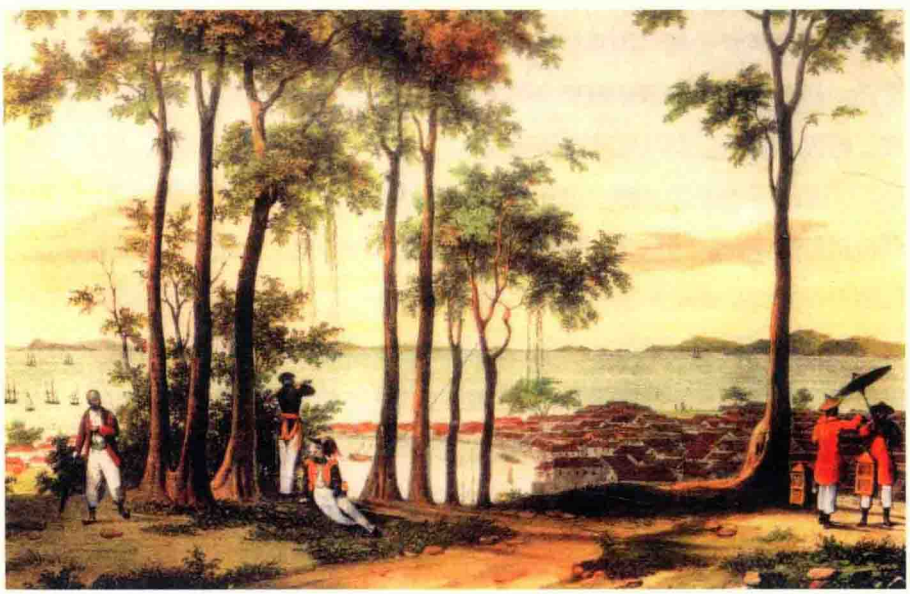
在船上（实际上是“浮动地狱”），苦力们过着非人的生活，长夜漫漫，好不容易才抵达新加坡。船泊岸后，苦力们在“大客头”等人的监视下聚集起来，他们身不由己，待价而沽。他们像活商品一样，任由雇主挑选购买。苦力被选中后，便得为雇主服劳役，为期六个月或一年不等。他们或被派往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群岛及毛里求斯等地区去，在农园种植甘蜜、胡椒与甘蔗等农作物；也有被派去采掘锡矿的。服役期间，雇主供给伙食，也发给若干零用钱。服役期满后，才能恢复自由身。不过也有些苦力掉入雇主的陷阱，沉溺于烟赌，背负一身债务而不能自拔。

至于那些一时不能脱手的苦力，被押往猪仔馆去。为防范苦力逃逸，“大客头”、当地经纪人与私会党人勾结起来，把苦力囚禁于密室中。这里窗户上都装上了铁条，门口有许多“三星”（Samseng，私会党打手）严密把守，这地方连猪只也无法呆下去[14]。有些苦力因不堪折磨，企图逃走，如被逮住，轻则痛打一顿，重则绑起来毒打至死，然后就在附近挖坑埋掉。此外也有些自由劳工，甫登岸后即被拐骗，监禁在猪仔馆里，受尽百般煎熬，直至答应被贩卖到他地充当苦役，方才罢休。

为掩人耳目，有些猪仔馆也挂名为客馆。1906年，代理新加坡总领事曾提到新加坡有新客馆六家，旧客馆七家。六家新客馆是：广泰和、广合源、琼海昌、广福泰、连兴和万泰昌。七家旧客馆是：源泉兴、振源昌、新成昌、广顺昌、锦和隆、新合顺和振南昌。这些只是公开挂牌者，实际上还有未按政府条例挂牌的有：源成、广顺、广福按、邱广源、广发和顺和泰等。以上这些客馆分布在武吉巴梭、牛车水、海山街（即克罗士街上段，Upper Cross Street）、妈祖宫、厦门街（Amoy Street）、豆腐街（即珍珠街上段，Upper Chin Chew Street）、戏园街（即史密斯街，Smith Street）一带[15]。

苦力贸易似乎在新加坡开埠不久后即存在了，不过这时的苦力贩运还是小规模的。直至鸦片战争后，苦力贸易才发展起来。1845年至1846年间，法国人斯巴卡柯曾到厦门直接招募苦力，然后用船载到布尔邦岛（Bourbon）去。嗣后，英、美、西班牙与葡萄牙的人口贩子也到中国，他们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区恣意掳掠中国人，然后贩运到海外。这种苦力贩运是大量的和全球性的，从南北美洲、大洋洲、东南亚、澳洲一直到印度洋，几乎遍及整个世界。至1874年3月为止，据说已运出了50万苦力[16]。

介于1845年与1875年间，是苦力贸易最鼎盛的时期，大批契约劳工涌入新加坡。新加坡竟成了契约劳工的集散地，他们再被遣送到马来半岛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去。



德雷（Deroy）画笔下的华人村，绘于1824年

[14] Campbell, P.L., *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 to Countries within British Empire* (1923), pp.6–7.

[15]《代办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呈件》，转引自《契约华工史》，页113–114。

[16] 可儿弘明，《猪花—被贩卖海外妇女》（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14。

但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苦力贸易之风在新加坡已逐渐收敛，英殖民地政府开始注意虐待苦力的事，从而加以保护。1880年，在新加坡登陆的华族移民中，自由移民有3万8113人，契约劳工只有8631，其比例是82:18[17]。此后，契约劳工的人数越来越少，而自由移民却相对地激增。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914年，英政府宣布废止契约劳工制，盛极一时的"猪仔"贸易，至此便销声匿迹了。

各帮移民浪潮

从1819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约140年间，华人移居新加坡经过不同的历程。鸦片战争（1840-1842）是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前，帆船每年载来的华南移民，人数不多，可谓涓涓细流。但鸦片战争后的五六十年间，轮船载来的移民，每艘都有数千名，掀起了第一次高潮。由于主客观的因素，到了1926年至1927年间，移民人数达到了巅峰，入境人数高达20多万人，可谓巨浪滔天。

新加坡开埠时，英殖民地政府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很快就吸引了中国帆船的到来。1821年2月18日，第一艘来自厦门的帆船航抵新加坡，载来了如丝绸、瓷器及茶叶等中国商品。至于船上是否有中国移民，则不得而知。1824年，两艘中国帆船装载了价值约13万5000元（西班牙银元）的货物前来新加坡。1825年，又有两艘中国帆船载来货物及移民。1830-1831年间，前来新加坡的中国帆船较前一年几乎增加了一倍，达18艘之多。其中来自广东省口岸的有11艘，来自厦门及蕉岭的各两艘，另有两艘来自上海及宁波，一艘来自饶平[18]。

帆船贸易的繁盛与华人人口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据统计，1824年新加坡华人有3317人，主要是闽粤人；1830年增至6555人；到了1836年，华人人口高达1万3749人，第一次超越过马来人（1万2487），高居榜首，此后华人一直保持着人口的优势。

据统计数字显示，1840年，华人人口有1万7179人，1849年有2万7988人，较10年前激增了1万多人。1860年有5万43人，较1849年的人口多了近一倍。这样的激增趋势一直保持下去，1871年达5万4572人，10年后（1881年），增至8万6762人；1891年，突破了10万大关（12万1908人）；到了1901年，更高达16万4041人。换言之，在30年间（1871-1901），新加坡华族人口激增了10多万人[19]。这期间华族人口的激增，并非来自自然出生率，主要是移民的涌入。

到了20世纪，华南移民浪潮继续向新加坡涌入，其层次之频密与冲击范围之广泛是空前的。介于1900年与1940年的40年间，除了受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余波的激荡，与30年代初期经济大恐慌的打击，短期间阻遏了移民浪潮的涌入外，在其他岁月里，移民都以飞跃式的姿态涌入，掀起了滔天巨浪。

在首十余年间，华南移民的入境，大体是呈现上升的趋势，介于10多万与20多万之间。这期间，马来半岛的锡矿业与橡胶业蓬勃发展，胶锡价格走俏，作为转口贸易站的新加坡，经济一片繁荣。接下来的10年（1914-1923），首先受到第一次大战的负面影响，胶锡价格骤降，土产滞销，商业不振，市景萧条。加上1922-1923年间，胶锡供过于求，价格暴跌，转口贸易受严重打击。影响所及，这10年间的移民骤降。1923年，新加坡终于摆脱困境，渐入佳境。为了充实劳动力，政府

[17] "Report of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Singapore, 1880," in *SSLCP*, p.92.

[18] 聂德宁，《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2-13。

[19] 1840-1871年间的统计数字，是根据E. Thio, "The Singapore Chinese Protectorate, Events and Conditions Leading to Its Establishment, 1823-1877," 载《南洋学报》卷16期1和2（1960年）页79。1881年，1891年及1901年的统计数字，是根据这三年的 *Singapore Population Census*。

相关人物

莱佛士

历史事件

7月5日

莱佛士在英国逝世，终年45岁

鼓励移民进口。到了1926年与1927年，移民浪潮迈向了顶峰。1926年移民人数高达34万8593人，1927年更创下了高记录，达35万9262人[20]。此后移民人数虽稍下降，但仍维持良好状态。然而1930-1934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大恐慌，新加坡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政府颁布了《移民限制法令》（Immigration Restriction Ordinance），限制男性移民入境。移民人数锐减，1933年只有2万7796人，大多数是妇孺。必须说明的是，入境的移民虽多，但同时离境的人亦不少。有些移民也辗转到马来半岛及其他地方落足，不过多数人羁留在新加坡。

漳泉帮群

福建人（实际上是泉州府与漳州府的闽南人）是最早移居新加坡的族群之一，也一直是最大的华人族群，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统治马六甲时代，漳泉人已移居马六甲，形成了华人村的聚落。1673年，闽南人创立了青云亭，作为祭祀观音及族群议事的中心。17至19世纪被委任的10名华人甲必丹，全部是闽南籍人。当新加坡开埠初期，一部分马六甲商人便移居新加坡创业，他们包括薛佛记及陈笃生等早期峇峇先驱。

薛佛记（1793-1847）在未移居新加坡之前，已确立他在呷华社会的地位。移居新加坡后，经商致富，他也是最大的地主。1828年恒山亭筹建时，他是首屈一指的大董事。1839年天福宫筹建时，他捐金仅次于陈笃生。他的家族也是赫赫有名，对新华社会贡献殊巨[21]。

陈笃生（1798-1850）由马六甲移居新加坡，经商致富，富甲一方，他是薛佛记的继承者，为福建帮的最高首领。1844年，陈笃生突破了帮派的藩篱，呼吁全体华人合力创建了陈笃生贫民医院，造福人群。其子陈金钟（1829-1892），也是显赫一时，被封为太平局绅，为暹罗、日本及俄国驻新领事。子承父荫，成为19世纪华社的领袖之一。

自明代以来，厦门已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港。清代于“厦门传设海关，为通贩南洋要区”，鸦片战争后，厦门被迫开放为五口通商之一，更加强其对外贸易的地位。长期以来，漳泉人出海谋生，绝大多数在厦门登船远航，厦门成了最主要的落脚港。

由厦门出洋的闽南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原因。早期出国的，不外乎贩洋经商，逃避灾荒兵祸，及经济破产出走等。新加坡开埠后不久，1821年2月18日便有第一艘中国帆船航抵新加坡商港。1827年在华人租地契约中，已出现“厦门街”一地名。《新加坡纪事报》（*Singapore Chronicle*）也报载介于道光九、十年间（1829-1830），从厦门起航的四艘商船，就载来了1570多人来新加坡。

早期华人出洋，经常有互相提携，彼此牵引的现象。移居新加坡也的闽南人也不例外，小自一个家族，大至同一条村或同一个乡。基于血缘与地缘的关系，由一个或少部分人先出洋。这些先行者一旦奠定了经济基础后，便把家人、同村或同乡的族人提携牵引进来，凝聚成一股力量。新加坡的泉州府县如同安、南安、安溪、晋江、永春与厦门人特多，与这种乡亲互相扶持牵引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自新加坡开埠以来，各方言群体的移民中，要以闽南人占多数。因此闽南人的人数，一路来都是高居榜首，排名第一。据新加坡人口普查，1881年，闽南人有2万4981人，占华族全人口（8万6766）的28.8%；1891年有4万5856人，占37.6%；1901年有5万9117人，占56%。

厦门海关有关由厦门出国的人数统计，也说明这点。介于1900-1913年间，由厦门港口出国的移民（绝大部分是闽南人），其人数最高的是9万7572人（1912年），最低的是4万6336人（1909年），其他年份多是七八万人。介于1914-1923年间，移民人数最多的是7万8656人（1921年），最少的是3万6123人（1918年），其他年份的人数是介于四五万人之间。海关报告说：“1925年和1926年可能是移民达到高峰的年份”。据统计，1925年是8万6154人，1926年是22万2922人[22]。由厦门出国的移民，很多是移向新加坡的。厦门海关的统计数字，与新加坡政府发表的统计数字，可说是不谋而合。

---

[20] Saw Swee-Hock, *Singapore Populations in Transition* (1970), p.43.

[21] 有关薛佛记及其家族的业绩，见柯木林，〈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页65-73。

[22] 转引自陈支平主编，《闽南海外移民与华侨华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34。

潮州人帮群

明清之际，潮州府县沿海各地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人民出洋风气日盛。在1860年汕头港口开埠之前，澄海东北的樟林港与汕头毗邻的南澳港，是潮州人出国的主要口岸，那时期的移民多迁往暹罗与马来半岛去。

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有文献记录可查的最早潮州移民可能是佘有进（1805-1883），广东省澄海县玉莆村人。1823年，18岁的佘有进南来新加坡。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说他是从汕头坐船来的，不过那时汕头尚未开埠，所以佘有进从樟林港登船的可能性较大。早期的潮州移民，多聚居在珠烈街（Chulia Street，俗称山仔顶）、吻基（Boat Quay，驳船码头）、沙球勝路（Circular Road）、谐街（High Street，水仙门）、里峇峇利路（River Valley Road）、菲立街（Philip Street）及马真路（Merchant Road）等地，开设胡椒、甘蜜等土产店，这一带成了潮人的商业中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潮人人口增加，聚落逐渐壮大。大约在1826年，潮人在菲立街筹建了粤海清庙（大老爷宫），祭拜天后圣母（妈祖），后来庙宇也成了潮人聚会议事，维系乡情，促进乡人福利的中心。

潮人的大批移居新加坡，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860年汕头发展为港口中心之后的事。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国订立了《南京条约》（1842年），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五口通商扩大了中外贸易，加强了外国的经济侵略，迫使中国小农经济的破产与传统手工业的没落，使更多农民与手工业者失业，不得不移居海外。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清廷再被迫订立了《天津条约》（1858年），除了赔款中法两国及确立领事裁判权之外，更另外开放牛庄、登州、潮州（后改汕头），汉口及南京等为通商口岸，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王国。接着订立的《北京条约》（1860年），准许华工自由出国，大大地刺激了契约劳工的风气。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德、美等国人及华侨资本家，组织轮船公司，川行中国沿海上海、香港、汕头与广州，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各地，厦门、汕头、广州及香港与新加坡之间也有定期的航线，轮船既快捷又安全，载来了大批的移民。

据估计，1869-1948年间经汕头港出国的华侨统计表显示，除了第一次大战（1914-1918）与30年代初期（1930-1934）出国人数陷于低潮外，出境到曼谷（Bangkok）、新加坡等地的人数，都达至八九万至10余万人不等。另一项统计显示，1869至1934年间，从汕头出口的旅客共有555万2900人，进口416万4700人，两相权衡，净出139万1200人，平均每年2万1403人[23]。

自开埠至1942年初日军南侵的100多年间，潮汕地区源头的活水，川流不息地注入新加坡，使潮人日益壮大。新加坡的人口普查，自1881年便将华人分成不同的方言群来统计，此后每隔10年便举行一次普查。据历次的人口普查统计，1880年潮人有2万2644人，占全体华人的26.1%；1891年有2万3737人，占19.5%；排行第二。1901年后位居第三，有2万7564人，占16.8%；1911年有3万7413人，占17.8%；1921年有5万3974人占17.0%；1931年有8万3099人，占19.7%。第二次大战后，英政府严禁华南移民入境，除了少数潮人在特殊情况下准予入境外，潮人人口的增加，全依仗自然出生率。

广府帮群

入境新加坡的广府人移民，主要来自两个地理区域，一个是在珠江三角洲西侧，西江与潭江流域的广大区域，包括台山（宁阳）、

[23] 冷东，《东南亚海外潮人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页90-96。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3月7日

新加坡、槟榔屿与马六甲三州府各设裁判所，新加坡高等法院落成

恩平、开平、新会（冈州）与鹤山五个县市，也就是俗称的“五邑”。另一个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以广州为中心，形成从广州到香港与澳门两个密集城镇带，包括佛山、番禺、顺德、南海等县市。

据研究，早在1786年（亦即英国人莱特占领槟榔屿同一年），就有台山端芬梅耀萱从马六甲到槟城谋生；同年新会大泽北洋乡民林道解在马六甲以建筑兴家，槟城与吉打许多楼宇都是林道解所建造。1819年，已在槟城当木匠多年的台山人曹亚志（曹亚枝、曹亚珠）为莱佛士率先智取新加坡[24]。

早期移居新加坡的台山人，很可能是追随曹亚珠的足迹迁徙过来的。1822年，曹亚珠与同乡邑人创立了“宁阳公司”（后改为宁阳会馆）。此后，随着中国帆船从广州的到来，乘客中相信有五邑人。但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新加坡的五邑人，人数不多。

早年华人聚集的街区

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50年代，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骤变，五邑人士的海外移民浪潮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西方列强主要是通过拐骗掳掠，强迫五邑人士的契约华工，经过了“浮动地狱”的艰苦旅程，到南北美洲、加勒比海及澳大利亚等地区，充当劳工，从事垦殖种植园，开采矿地及建设铁路的工作。契约华工制到1870年代达致高潮，延续到1880、1890年代才式微。这几十年内，五邑人士的移民主流，主要是导向南北美洲等地区。不过与此同时，移民浪潮继续冲击着东南亚地区。

随着新加坡五邑人士的递增，其经济活动与建树也愈益显著。如新会人的朱氏与罗氏家族，就曾在马吉街（Market Street，俗称中街）创设了“中街七家头”，即朱广兰、罗奇生、罗恒、朱有兰、同德、罗致生与朱富兰七大杂货行，并在中国大陆、香港、马来亚与印尼都有联系，经营粮油杂货生意，其辉煌业绩不仅称霸新加坡，而且垄断了东南亚各地的粮食杂货行业[25]。

又如台山人黄亚福，1854年来到新加坡，时年17岁。他原本是木匠，后来成为建筑师，曾承建新加坡多项大建筑工程。嗣后又结识柔佛苏丹及皇后，获得苏丹信赖，承建富丽堂皇的大皇宫，成了柔佛政府的最大建筑承包商，承建政府多项重要工程。现在柔佛新山还有一条命名黄亚福街（Jalan Wong Ah Fook）的街道，就是纪念他的[26]。

自新加坡开埠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几乎每年都有中国帆船的到来。这些帆船不仅载来了陶瓷器、生丝及茶叶等产品，也带来了大批的华南移民。既然中国的帆船以从广州下口岸的最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移民亦占多数。

大名鼎鼎的胡亚基，原籍广东番禺黄埔村，距广州仅36里。父辈兄弟五人，父亲胡宏根排行第二。新加坡开埠后，老五率先只身到新加坡来谋生。大约于1830年，其他兄弟四人也随后到来，携胡亚基同行，那时胡亚基年仅15

[24] 梅伟强，《五邑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8；关于曹亚珠智取新加坡一节，见陈育崧，《椰阴馆文存》卷1（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页66-73。

[25] 区如柏，〈百年前称霸中街的七家头〉，载《冈州会馆成立150周年纪念特刊》（1990年），页42-43。

[26] 黄佩萱著，张清江译，《黄亚福传》（新山：新山广肇会馆，2010年），页143。

岁，报名英校学习英文，后来居然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1840年，胡家开设的黄埔公司，经营牛肉、面包等物，供应东来英国军舰之一切必需品，并供应市上所需的牛肉、面包，业务蒸蒸日上，黄埔公司声名鹊起。

胡亚基发迹后，在离市二英里半之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购置南生花园，远近驰名。他又热心公共事业，资助医院与学校之创设。先后被委任为中国、日本及俄国驻新领事；又被政府委任为立法议会非官方议员、行政会议特别委员、太平局绅、名誉推事，并获英女皇颁予C. M. G三等宝星勋章，蜚声海内外，显赫一时[27]。

鸦片战争后的百年间，广府人不断涌进新加坡，其人数仅次于闽南人，排行第二或第三。据人口普查显示，1881年广府人有1万4853人，占全体华人人口17.1%；1891年2万3397人，占19.2%，位居第三；1901年后竟跃居第二，有3万729人，占18.7%；1911年有4万7500人，占23%；1921年有7万6198人，占24%；1931年有9万5144人，占22.5%。

“妈姐”与“三水婆”

19世纪的女性移民还很少，到20世纪首40年，女性移民才逐渐增多，其中有两群特别的女性移民，她们是广东的“妈姐”与“三水婆”。

据资料显示，介于1886年至1934年间赴新加坡的“自梳女”，仅顺德均安沙头村就有500多人。“自梳女”也有来自番禺、南海、肇庆、东莞等地的。所谓“自梳女”的习俗，始自清末广东未婚女子都梳有一根长辫子，结婚后才挽成髻。“自梳女”是指那些决心不嫁的女子，自行将头发盘起，当地人一般称她们为姑太或姑婆。在新加坡当住家佣工，“自梳女”也被称为“妈姐”。

清末民初，一般“自梳女”都是因家贫难以维生，便三女成群，结伴而行，带着养家的使命，漂洋过海，到新加坡等地谋生。她们大多受雇为家庭佣工，洗衣抹地煮饭，照顾主人及孩子的起居生活。勤奋工作，敬业乐业，颇得雇主赞赏。她们平日省吃俭用，一有积蓄即汇钱回家建屋买地。大多数“自梳女”选择终身不嫁。这是当时顺德的一种潮流，有些人担心一旦结了婚，就失去自由，不能回乡。

现在的“妈姐”，多数已是风烛残年，有的已过百岁，她们多选择落叶归根，回乡欢度晚年。

另一群妇女移民来自三水，在建筑工地干活，她们工作时头上多套上红头巾，所以被称为“红头巾”或“三水婆”。她们或因家境贫困，或因家庭失和，自主出洋。她们在建筑工地上工作，挑泥担水，搬运木条。工作酬劳低，平日省吃俭用，多人合租一间大房，房里摆着一排排床位，每人只占一个。房内空气污浊，环境恶劣。一有余钱，即汇款回乡接济家人。她们流血流汗，换来了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沧海桑田，事过境迁，昔日的红头巾，至今已年老力衰，有的选择回到佛山三水区安度晚年，只有区区数人仍留在新加坡。

客属、琼州与福州帮群

客家人是一个勇于闯荡、富有冒险精神的族群。早在18世纪，客家人已经在西加里曼丹的三发（Sambas）及坤甸（Pontianak）一带开采金矿，人数达两万余人，大多是梅县、大埔及海陆丰的客籍人，他们组织了许多公司，如“大港”、“三条沟”及“兰芳”公司等。18世纪末，客家矿工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镇压，溃散到砂劳越的石隆门（Bau）去。早期新加坡的客籍移民，可能一部分是来自西加里

[27]〈胡亚基传〉，关楚璞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年），页1003-1008。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6月

新加坡刑事法庭第一次开审

曼丹、砂劳越及槟岬等地。在风帆时代，处在内地的闽西汀州客、粤东北的梅州客及东江流域的惠州客，都要经过长途跋涉，到漳林港、广州或澳门港口出洋的。

1822年，新加坡嘉应州五属人士即筹建“应和会馆”，作为联络感情、互助互惠的中心。经过了几度重修，“应和馆”已美奂美轮，具有宫殿式的英姿。同一年，惠州府人士也成立了“惠州公司”（后改名“惠州会馆”），可见其时的新加坡，已有不少客籍人。

到19世纪60年代，已进入轮船时代，中国沿海除了原有的广州、澳门外，香港与汕头港口也相继出现，各地的客籍人已是改乘轮船，由上述港口登船远航，经过了七昼夜航程，抵达新加坡。随着时间的推移，抵新的客家人慢慢递增。然而，新加坡的客籍人，远远落在闽南人，广府人与潮州人之后，也不及迟来的海南人。据人口普查显示，1901年，客家人有8514人，占5.2%；1931年，有1万9716人，占4.7%。新加坡的客家人口不多，大概是由于新加坡是个国际贸易商港，而客家人多擅长开矿与垦殖，所以新加坡对客籍人的吸引力不大。反观马来半岛、砂劳越、沙巴及加里曼丹等地，矿产丰富，地大人少，足供客家人大展拳脚，所以这些地区都是客家人聚集的地区。

比起其他方言群，移民新加坡的海南人来得较晚，大概是在1850年以后的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于1858年缔结了《天津条约》，规定除了前次开放的五口通商外，增开琼州、汕头、南京、镇江等为通商口岸。两年后（1860年），中英、中法又订立了《北京条约》，规定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于是华工出国成为合法的举措，这大大刺激了琼州人的出国浪潮。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琼州人出国。他们多乘坐三桅帆船，从清澜、铺前及海口出洋。帆船离开沿岸港湾，沿着越南东岸扬帆南下，先抵达泰国境外小岛，再续程抵新加坡。

据有关资料统计，介于1887年与1900年间，从琼州口岸出境到新加坡的琼人，每年都有数千人不等，1895年与1899年，竟分别达1万154人与1万467人。又介于1902-1911年间，每年均达1万余人，1910年与1911年间，竟分别高达 2万7990人与3万2431人[28]。

但新加坡的琼人毕竟是少数族群，据人口普查，1901年有9451人，占5.8%；1931年有2万40人，占4.8%。

福州人移民新加坡，大概始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比其他方言群的移民要晚得多。据悉，较早来的福州人是闽清县文人徐季钧。徐季钧曾在福州英华书院任教，大约在1892年至1894年期间携眷南来新加坡。在《叻报》与《天南新报》任职。

黄乃裳（1849-1924）是稍迟来的福州人，他于1849年7月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于1899年9月携眷初抵新加坡。在女婿林文庆的推荐下，出任《日新报》主笔。黄乃裳曾于1900年与砂劳越的拉惹（Raja）订约，回乡招工开发诗巫（新福州）。1900年12月，第一批91名农工经新加坡等候轮船转赴诗巫时，有19人违约未登船去诗巫，料是留在新加坡谋生。清朝末年，有一些福州人前来新加坡当海员。到宣统晚年间（1909-1911），新加坡的福州人已有数百人。

民国初年，军阀割地称雄，引起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许多福州人便纷纷南来新加坡。据人口普查统计。1901年，新加坡的福州人有1万2888人，占7.8%；1931年有福州人6548人，占1.6%；福清人8842人，占2.1%。

早期来的福州人，大部分聚居在梧槽河（Rochor Canal）河畔及奎因街（Queen Street）一带，靠“三把刀”（即菜刀、剪刀、理发刀）走天涯，多从事厨业、理发业、裁缝业和咖啡业为生。

华人是新加坡最大的族群，过去多年来对新加坡的建国与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社会里，今后必然会继续发挥同舟共济、团结一致的精神，造福国家与人群。

[28] 转引自周伟民，〈清代海南移民的新趋势〉，载《海南移民论文集》（新加坡：海南文化研究中心，2013年），页29。

第二节　风帆时代的新加坡
——开埠初期的中国帆船贸易

摘要

古代中国的远洋帆船，在增进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曾作出很大的贡献。新加坡开埠初期，中国帆船除进行贸易外，并运载一批批华人到来从事开拓垦殖工作。

Abstract

In ancient days, the ocean-going Chinese junk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promoting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various countries of Southeast Asia by enhancing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early Singapore, these Chinese junks, besides trade, also transported Chinese immigrant coolies to Singapore for work in plantations.

吕世聪　李业霖（Loo Say Chong　Lee Yip Lim）

中国福建省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

新加坡与中国的帆船贸易可追溯到南宋末的13世纪。1974年8月，在福建省泉州市东南郊的后渚港古码头的海滩上，出土了一艘宋代古船（出土后被定名为泉州湾宋代海船），揭开了风帆时代新加坡和中国贸易的神秘面纱。

沉船船舱内曾出土贝类2000多个，其中有两个品种与新加坡海峡有密切的关系，称为龙骨节铠船蛆[1]及裂铠船蛆[2]。龙骨节铠船蛆盛产于苏门答腊、新加坡、菲律宾及马德拉斯。裂铠船蛆则是中国东南沿岸及新加坡特有的品种，分布于河口附近的红树林。泉州学者曾将出土海船上的裂铠船蛆，与新加坡吉宝海港（Keppel Harbour）的裂铠船蛆标本作比对。从上述出土于船舱内的贝类，与船体附着物的产地分布，学者还原了海船曾穿梭于包括新加坡海峡在内的东南亚各地航线上[3]。至于海船的沉没年代，学者提出是毁于宋末元初时的战火（约公元1277年的秋天）[4]。

从海船出土的贝类及附着物的分布地解析，印证了宋代泉州市舶司赵汝适《诸番志》，以及元朝旅行家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所提到的古代新加坡（“凌牙门”，“龙牙门”及“单马锡”），在宋末元初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贸易中心的史实[5]。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远洋帆船，在增进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曾作出很大的贡献。新加坡开埠初期，中国帆船对新加坡的贡献，也决不容忽视。

开埠初期与中国帆船

从18世纪初叶至19世纪的40、50年代，在一个多世纪的时代里，是中国帆船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6]。在这段时期，欧洲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的阶段，在对外贸易方面，葡萄牙和西班牙已趋衰微，但英国却以锐进的姿态猛然向前发展，而且与荷兰展开激烈的竞争。18世纪50年代，中国帆船除在中国本土制造的以外，中国船商又在暹罗投资

[1] 龙骨节铠船蛆学名为Bankia（Lyrodobankia）Carinata（Gray, 1827）。

[2] 裂铠船蛆学名为Dicyathifer Manni（Wright, 1866）。

[3] 李复雪，〈泉州湾宋代海船上贝类的研究〉，载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中国：海洋出版社，1987年），页140–146。

[4] 陈高华、吴泰，〈关于泉州湾出土海船的几个问题〉，载《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页75–76。

[5] 见本书第一章〈海疆殊域：古代新加坡〉。

[6] 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允高其倬奏请开放南洋贸易。当时除了闽粤两省旧有的贸易港如广州月港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贸易中心如厦门、樟林寨（澄海）、龙溪等。《厦门志》云：“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盛于乾隆初年”。“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航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

造船，暹罗成为中国海外造船业的中心。乾隆十二年（1747年），闽省巡抚陈大受奏言："闽商前往暹罗贩米，其国木料甚贱，应听造船回国，给照查验，报可"。"自是番地商船，益便往来"[7]。19世纪初期，中国船主在暹罗投资制造的帆船，估计达136艘，总计达3万9000余吨位，在陆上工作的华籍船员达八、九千人。这些船只有54艘川行于安南、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和暹罗之间，另有82艘经常来往于中国和暹罗之间[8]。在同一时期，中国帆船每年驶往安南各口岸贸易的至少有116艘，超过2万吨位。

根据哥罗福（J. Crawfurd，他曾广泛地与中国船商接触，从华籍船商口中获得丰富的航运资料）的调查报告：19世纪初叶，中国帆船在马来群岛的活动活跃，每年在东印度群岛出现的中国帆船约有23艘，共约1万4000吨位；在马来半岛东西海岸进行贸易的，至少三艘，计3000多吨位[9]。此外，由厦门驶往菲律宾群岛和苏禄群岛的中国帆船每年约有12艘，共约6000吨位[10]。粗略的估计，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期，中国帆船（包括在暹罗制造的）每年在东南亚各地贩运的有300多艘，总计达8万4000吨位。可见这段时期，中国帆船对东南亚的贸易发展，占有重要的地位。

19世纪在东南亚各地载运的中国帆船，是属于中国南方型式的远洋船只，它在构造上显著的特征是：平底、方头、高尾和四角帆。"这样的船只易于在强风中迎风前进，而且不致在茫茫的大海中有被海浪从后击打船尾的危险……舵工在高高的船上操纵那笨重的舵柄时，利用他所处的地位，可不受船首的阻碍而能看清前方"[11]。这种船只普通可载重300吨至400吨，最大的可载重达1200吨，每艘船都附带三只小划艇，以为装卸之用。因为具有这些良好设计和配备，中国帆船便成为东南亚水域中优良的航行工具。

新加坡开埠前，马尼拉（Manila）与巴达维亚（Batavia，今作雅加达）是中国帆船贸易的中心。开埠后不久，莱佛士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除了征收低微的入港税外，入口货物免税。1820年5月，对帆船征收5元入港税，超过400吨的船只则征收10元[12]。莱佛士的这个政策可说是划时代的，因为在东南亚，荷兰、西班牙等大部分殖民主义者皆实行保护主义，对外来商船征收重税。很快地，新加坡的自由港政策，吸引了马来群岛及中国的商船前来贸易。威廉·法夸尔上校（William Farquhar 1774-1839）在1820年3月31日写给莱佛士的信中曾夸耀新加坡的商业繁盛，并说当时停靠在码头的船只，有20艘是帆船，其中三艘来自中国，两艘来自中南半岛、另15艘来自暹罗。

莱佛士积极推行发展新加坡的计划。而利用中国帆船的活动力量来发展新加坡对外贸易，是莱佛士当时发展新加坡计划中的重要部分。1820年，中国帆船首先为新加坡开辟了新加坡和暹罗的贸易关系。法夸尔在1820年3月21日给莱佛士的信中就提到，中国帆船和暹罗船已抵达新加坡港口进行贸易。其次，莱佛士计划开辟新加坡对安南、中国本土和日本的贸易，莱佛士认为这段漫长的

[7]《清朝文献通考》，卷297"四裔传"（四）。

[8] 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33-34。

[9] J. Crawfurd, *History of Indian Archipelago, 1820*, vol. 3, pp.184-186.

[10] *Ibid.*

[11]《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页999。

[12] 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载《新加坡华商与华社》（新加坡：亚洲学会，1995年），页8。

相关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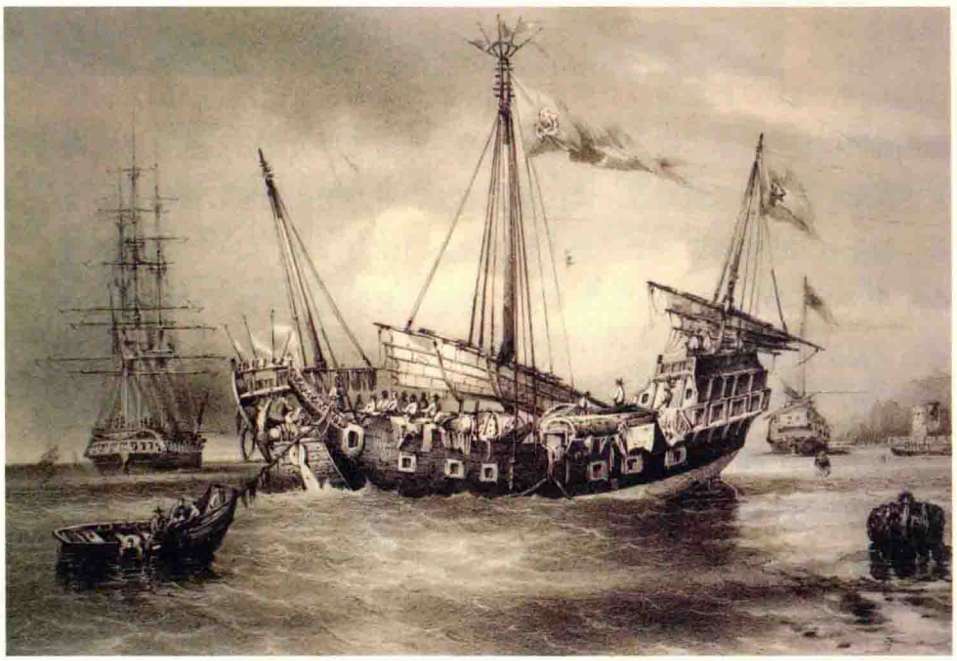
历史事件

这一年新加坡总人口1万8819名，华人占7575名

航线，唯有中国帆船可以有效地为新加坡服务[13]。当时的情形是：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土人误信谣言，排斥华船；在汶莱，汶莱苏丹专横、贪婪，多方刁难华船；而莱佛士却以开明措施鼓励华船。因此，中国帆船逐渐蝟集到新加坡来。中国帆船来新加坡贩运，既可获得更多的利润，又有更大的安全感[14]。

1821年2月18日，是新加坡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第一艘中国帆船从厦门直接抵达了新加坡。

芬礼逊（Finlayson）对这艘从厦门驶来新加坡的中国帆船，给予这样的描写："他们既没有航海图，也没有任何描述路上生活的书籍，更没有书写的文件指示他们所经的航线。他们甚至没有确定航行的方法，也似乎没有保存任何航海的记录。他们有一个粗糙的罗盘，装在木架上，上面分为24度，他们似乎并不太依据它。这也许是他们船上唯一的航海仪器"[15]。



新加坡岸外的中国帆船。法国铜板画，1839年。

芬礼逊指陈当时中国人航海没有航海图和有关航海的记录、书籍、文件等，是他对中国和航海文献完全无知。茅元仪的《武备志》（郑和航海图）、张燮的《东西洋考》、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以及《四海指南》、《海道经书》、《指南正法》和《顺风相送》等等（后二书经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加以整理以《两种海道针经》之名出版）都是中国舟子们历代相传的秘笈。他们还用通俗文字写下不少有关航海的记录，所谓"航海秘本"之类，相当于欧洲航员用的"Log Book"。凡是粗通中国文字的舟子，定必涉猎。而成书于16世纪的《顺风相送》就记录了今日新加坡的地名"长腰屿"（Pulau Panjang），是九条航线必经之地。而莱佛士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他研究了马来文献，他就对新加坡一无所知。甚至连当时的欧洲人也很少知道新加坡的存在。

1821年，中国帆船在新加坡进行贸易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事缘一艘由厦门航抵新加坡时，船长可能出于无知或是因为新加坡既然是宣布为自由港，没有向苏丹胡申（Sultan Hussein）及天猛公（Temenggong）赠送礼品，苏丹吩咐部下将中国船长绑起来，囚禁在甘榜格南。苏丹的这种行为引起本地欧籍商人不满，认为这将破坏新加坡作为自由港的良好声誉。七名欧籍富商联名致函驻扎官威廉·法夸尔，强烈抗议苏丹的行为。苏丹向法夸尔辩称，囚禁中国船长是因为他很无礼。法夸尔下令苏丹向船长道歉，并且要求其停止向来往船只收礼。另一方面，法夸尔也致函莱佛士，报告此事的原由及经过，并且在信中表示商人们对此事的介入与干涉是不当的。其实莱佛士在与苏丹与天猛公所签的条约中，曾列出日后英国如向各土著来往船只征税时，可得税款的半数。而欧籍商人早于此前曾向法夸尔抗议，只是驻扎官所成立的调查委员会认为，所有船只已经停止向苏丹进贡，因此抗议无效。

1823年，莱佛士与苏丹及天猛公再度签订另一条约，

[13] C. E. Wurtzburg, *Raffles of the Eastern Isle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54), p.589.

[14]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9.

[15] 转引巴素（Victor Purcell）《东南亚之华侨》（*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郭湘章译，1966年，页1000，笔者参照原文，略作文字改动。

规定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每月支付1500元予苏丹及800元予天猛公，而他们则放弃向船只征收财物之权力。自此，正式确定了新加坡自由港的地位。

与此同时，莱佛士与苏丹签约开埠新加坡，尚有一烦恼事，那就是荷兰的抗议。由于新加坡原属于柔佛王国领土的一部分，荷兰对英国占领新加坡的举动深感不满，不断提出交涉，强调荷兰之前已经和居住在龙牙的柔佛王朝苏丹订约，取得包括新加坡岛在内的柔佛王国领土。因为这个争执，英国当局担心会引发战争。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订条约（史称《英荷条约》Anglo-Dutch Treaty），划定两国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荷兰退出马来半岛，割让马六甲予英国，而英国则退出东印度群岛，放弃苏门答腊西南部的明古连（Bencoolen）。

《英荷条约》的签订使得新加坡走向繁荣的轨道。莱佛士一方面大事推行其市区发展计划，一方面鼓励马六甲的华人前来经商。莱佛士的市区发展蓝图是以新加坡河为中心，沿着河流的西南岸，供商人开设仓库及商铺，另外还特意分配地段给来自厦门的漳泉商人旅居。莱佛士的这个做法，完全基于积极与中国帆船商队建立良好的商贸关系，以及为来自马六甲的漳泉集团来新投资做铺垫。由于西方的商人需要借助马六甲的华商，搭起一座与中国帆船商队的沟通桥梁，才能建立一个健全的商业网络。因此莱佛士相信，侨居在马六甲已经三代的漳泉华商，因通晓华巫双语，正好是扮演这个中介的最佳选择[16]。此前，马六甲商人与来自厦门的帆船商队已经合作无间。在1795年的《建造祠坛功德碑记》（宝山亭）上，就可以看到唐船主蔡栋官的题捐。另外，1801年的《重兴青云亭碑记》上，也有厦门合成洋行、船主叶和观及板主林桂官的题捐[17]。

1831年4月28日的《新加坡自由西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有则关于中国帆船的报道，报道中阐述航抵新加坡的帆船，数量比上个季度多出一倍："今年（1831年）的帆船共有18艘，去年（1830年）同时期则只有10艘。其中来自广东的红头帆船共11艘，吨数介于100至400吨。这些船船头漆上红漆，称为红头船。两艘来自厦门的青头船，一艘250吨，另一艘为300吨，皆为绿头船。两艘来自樟林（Chong Lim），各200吨，船头漆上红色。上海与宁波附近有两艘，一艘500吨，另一艘为175吨，船头漆上绿色。一艘200吨的红头船则来自饶平（Jaoping）。这18艘船的总吨数为3713吨。总值达21万8927西班牙银元"[18]。

自从新加坡辟为自由港后，原来航行于爪哇的唯一港口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都纷纷集中到新加坡来。因为巴达维亚港要征收很重的船只入港税并课收土产出口税，英国游历家厄尔（G. W. Earl）于1832年抵达巴达维亚，目击实际情形，曾指出由于新加坡自由港的建立，中国和巴达维亚之间的帆船贸易几乎陷于停顿状态[19]。19世纪20年代，新加坡的国际贸易地位，发展得很快，并已超过了巴达维亚，成为欧亚货物集散的最大中心。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每当西北季候风向南吹时，是成群结队的中国帆船出现于新加坡海面的时候，也是新加坡港口商业生活最繁忙、最活跃的时候。新加坡港口海面

[16] 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载《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18-19。

[17] 傅吾康、陈铁凡，《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出版，1982年），页238、271。

[18]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CHINESE JUNKS," 1831.04.28.

[19] G. W. Earl, *The Eastern Seas* (London: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n 1832-1834, 1837), pp.23-24.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6月29日

三州府所设裁判所取消，商业受严重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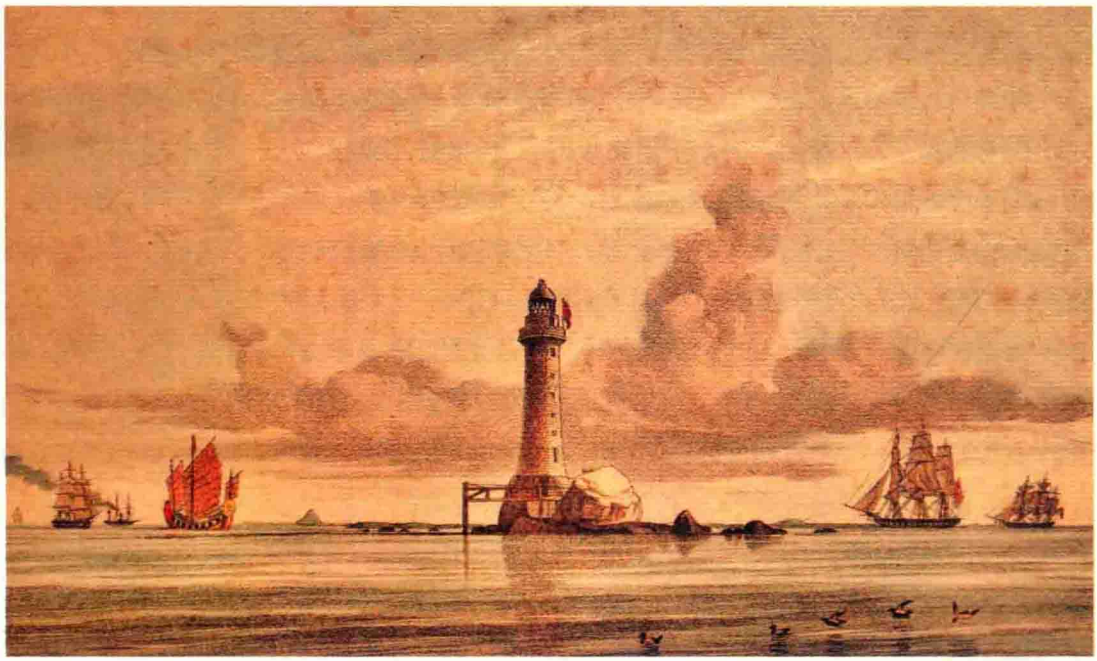
上可以用帆樯林立、商贾云集来形容。中国帆船通常在元月、二月和三月之间从东南沿海各个港口如广州、海南、汕头、樟林、诏安、厦门航抵新加坡港口时，本地商贾及马来群岛商船，迫不及待地涌靠中国帆船，展开海上贸易。厄尔对新加坡的帆船季节，曾作过很生动、真实的描写：

第一艘帆船的来临，通常在圣诞节稍前一点的时候，此时人们在焦急地期待着，马来舟子朝东方等待它的出现，华族社区里弥漫着一片喧噪杂沓的气氛；有些人沿街把这项重要消息告诉给朋友们知道，报讯的人冒冒失失地迎面而来；许多人赶着看帆船，以探听中国家乡方面的消息，凡是能在水面浮起的东西，从小舢舨到货船，都被征用。当帆船还在离岸好几里的海面时，第一只船就直驶到它那边去……帆船的甲板上挤满了新客，大多数来访的人，都不得不留在自己的船上，他们向帆船上的人们大声发问，期尽可能得到最多的消息……其他的帆船随后陆续而来，人们虽然没有对第一艘表现得那么高度的激动和兴趣，但是对每一艘船都表现着同一幕的场面。他们抵埠一两日以后，都不做生意，因为舟子们忙着在船上架起棚顶以护盖正要陈列在甲板上出售的货物。当这些安排妥当后，市集就开始了。这些帆船从早上到天黑都被岸上华商驾来的小舟团团围绕着[20]。

当西南季候风向西北吹起的时候，中国帆船就准备回国去。中国帆船的北归对新加坡的华人正如它们的南来一样视为一件要事。新加坡华人是通过北归的中国帆船汇钱回乡以为安家之月。汇款的方式，有用现银的，有用货物的，委托船上水客携带回唐。以1847年的情形为例，现汇取佣10%，若以汇款投资于货物，则免抽佣金。水客回到中国后，把货物变卖，然后把汇款交付汇人。中国帆船除了处理载货、汇款外，也运载旅客。那些赚了钱的人们，准备回乡省亲或扫墓祭祖，就搭中国帆船归国去。

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Ivan Goncharov，1812-1891），以舰队司令秘书的身份，于1852年乘坐“巴拉达”号三桅战舰途经新加坡，在海港停泊时，顺道参观海面上的一艘中国帆船时写道：

我们顺便参观了中国帆船。离着老远，它就激起了我们的好奇。船头和船尾高高翘起，显得极不相称，看上去很像摇摇欲坠的鸽笼。船身涂着蓝、红、黄三色，船头两侧各画着一只大鱼眼睛。中国人总愿把船弄成鱼的样子。我们向帆船划过去，小船纷纷给我们让路。中国人笑容可掬地接待我们。他们共有五个人，有的裸着上身，有的衣衫不整。上船后经过一座炉灶，旁边有一个烧饭的厨师。一股呛人的臭气从烟囱里扑鼻而来。帆船载满运往中国的各种原材，有红木、檀香木等，木质坚硬光滑，站在上面要小心滑倒才行。我们顺着窄梯上到船尾。正面设有佛龛，供着偶像，两侧是



新加坡岸海峡入口处的白礁灯塔水域是中国帆船的必经之道（19世纪铜版画）

[20] *Ibid.*, p.367.

肮脏的舱间。一个中国人正在给一个船主模样的人梳辫子。两人默默地瞧着我们，任凭我们走呀瞧的，不加干涉。中国帆船全是用木板、竹竿、苇席造成，连船帆也是席子的。船舵粗大笨重，奇形怪状。我们下了帆船，回到划艇以后，才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真是奇怪，人们竟敢乘着这种帆船漂洋过海。要知道从广州到这里，航程不短于1800海里啊！[21]

开埠初期，年末时航抵新加坡港口的中国帆船，船员或许兴奋于安全抵达目的地，而且有些船只航抵时正值临近春节，因此在船上击鼓鸣锣，并大事燃放鞭炮烟花。这对华人来说，本是极为平常的举止。然而在西方人的眼中，简直是干扰了港面及岸上的港务运作。因此，殖民地政府为了禁止这类活动，便刊印传单，分发给刚驶入新加坡海港的中国帆船[22]。文告中清楚表明政府对靠岸中国帆船的一系列限制。另外，文告中也透露了中国来的帆船，常运载病人上岸（详见后文）。

中国帆船的货运

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构成新加坡对外贸易的重要商业主干之一。新加坡主要向中国输出海峡土产（Straits produce）、印度鸦片、英国制造品和一定数量的军火，而向中国输入制造品，陶瓷、丝、茶等。新加坡与中国贸易是靠中国帆船和欧人的横帆船只（square rigged vessel）担任运输的。从中国前来贸易的帆船来自不同港口，其中有广州、潮州、海南、厦门、泉州等地。此外也有来自暹罗、安南等地的中国帆船[23]。以1824年为例，两艘抵达新加坡的中国帆船所运来的货物（共851吨），总值为13万元。除了货物，中国帆船还带来了中国移民，1825年，两艘帆船除了载来总值12万元的货物，还有1295名中国移民。中国帆船从新加坡载回的货物则有棉花、鸦片及火药。另外，中国舶商也在巴刹（Bazaar）里向华商采购的海峡土产[24]，例如：胡椒、甘密、锡、锑、金砂、樟脑、咖啡、燕窝、鱼翅、珍珠、玳瑁、乌木、檀香、藤条等等。

新加坡一直是中国外销瓷的转口中心。19世纪以来，临海的美芝路（Beach Road）即俗称为碗店前[25]或碗店口，街上数十家瓷器商，形成陶瓷买卖一条街。另外纽马吉路（New Market Road）、沙球勝路上段（Upper Circular Road，俗称潮州马车街）、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俗称漆木街）等处、亦聚集许多瓷商店号，陶瓷转口贸易极盛一时。

厦门出口的茶叶主要是武夷茶与安溪茶。厦门港在清朝嘉庆时，禁止茶叶从海路贩运，规定商人由内河过岭行走，从广州港出口。主要避免“洋面辽阔，漫无稽查”[26]。以新加坡开埠当年为例，英国从广州采购的茶叶，总值达750多万元（西班牙银元）[27]。五口通商后，闽南茶叶直接由厦门出口，浙江茶叶从宁波出口，逐渐削弱广州在海外贸易的地位。自开埠

---

[21] 伊·冈察洛夫著，叶予译《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77。关于《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一书对新加坡的描绘，详见柯木林〈十九世纪沙俄战舰在新加坡〉，载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页93-99。

[22]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835-1869)*, 1846.01.15, p.2.

[23] 以1830年至1831年为例，到新加坡来贸易的安南与暹罗帆船，共计35艘，总吨数为2225吨。详见*Singapore Chronicle and Commercial Register* (1824-1837), 1831.07.21,p3.

[24]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9-1869,"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33, Part 4, December 1960, No.192, p.108.

[25]《叻报》，1887年9月10日。

[26] 梁廷枏著、袁钟仁点校《粤海关志》卷18（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页358。

[27] 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3（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364。

以来，欧洲商人鼓励中国帆船多运茶叶前来贸易。1833年时，中国帆船入口的茶叶总值为5026元。隔年增至12万元。1840年1月30日，《新加坡自由西报》还报道，中国帆船已经运来约一万箱（chests）的茶叶，而且价钱比往年便宜。据统计，1839至1843年间，茶叶贸易是鼎盛时期。1843年时，英国商人从新加坡进口的茶叶总值达47万元[28]（不包括从中国直接出口）。

向中国贩运鸦片是被严禁的。然而鸦片却也是中国帆船贸易另一项重要的货品。莱佛士要中国帆船把鸦片运载到中国去。1838年，新加坡的英国官员就直认不讳地说，每年借助中国帆船的活动，大批鸦片从新加坡运往中国。西方列强输入中国的鸦片，单单是从1837至1838年间，总值竟达1300多万两以上[29]，约2万5000箱。英国著名的鸦片商詹姆斯·麦迪申（James Matheson）曾向加尔各答建议，在马尼拉或新加坡设一总栈，方便向中国倾销鸦片[30]。

到新加坡贩运鸦片的中国帆船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船身轻巧、速度快捷。这些鸦片商船来新时，多不载运货物，只携带白银。他们抵达新加坡比其他的帆船稍迟，约在每年的4月中旬，通常5月初就离开港口。由于无法沿合法管道入口，无论是西方列强或是中国帆船，运载鸦片到广州外洋，便由等候接驳的“蟹船”、“蜑艇”[31]走私入港。新加坡运往中国的鸦片，从1836年的418箱子，激增至1845年的2731箱（见表（一））。

到了1835年，新加坡对华贸易的总额是134万元，而由中国帆船运载的货物总值63万元，几乎占了半数的贸易价值[32]。可见中国帆船的活动，成为新加坡对华贸易的重要杠杆。中国帆船不但给新加坡带来货物，也带来了许多中国商人、手工业者和劳工，这些是开发新加坡社会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帆船的海员笃信海上女神妈祖，每艘帆船设有神龛，无论航行途中或靠岸登陆，皆有祭祀民俗。有意思的是，当时前来新加坡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曾不遗余力地对前来贸易的中国帆船船员，进行传教。传教士将在新加坡刊印的基督教教义小册子，不辞劳苦地带到中国帆船上去派发。其中著名的近代华人传教士梁发（1789-1855）在新加坡布道时，于1839年2月14日至3月19日之间曾和其他传教士登上许多停泊在新加坡海面的中国帆船，分发宣传基督教的册子。梁发还将到过的帆船船名、船主及帆船始发港详细记录下来[33]，成为研究新加坡开埠初期靠岸的中国帆船，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见表（二））。

表（一）1836–1866年从新加坡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1836–1866)

年代	数量（箱）
1835–36	418
1840–41	3796
1841–42	5327
1842–43	3436
1843–44	2454
1844–45	2731
1845–46	1730
1847–48	1355
1848–49	2680
1849–50	1144
1852–53	1774
1856–57	2007
1857–58	1911
1862–63	804
1863–64	1878
1864–65	1258
1865–66	902

资料来源：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9–69," "Imports of Opium into China, 1836–1866"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33, Part 4, December 1960, No.192, p.114

[28] Wong Lin Ken, *op.cit.*, p.119.

[29] 龚缨宴，《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中国：东方出版社，1999年），页290。

[30] 马士林著、区中华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香港：三联书店，1957年），页206–207。

[31] 梁廷枏著、袁钟仁点校，《粤海关志》卷9（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页368。

[32] Wong Lin Ken, *op.cit.*, p.106.

[33] 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207–208。

表（二）梁发向停泊在新加坡海港的中国帆船分发基督教传教书籍之船只记录（1839年）

船名	始发港	船主
2月14日		
金顺发	广东潮州	许鹏
福兴	广东江门	陈仁合
金昌利	广东江门	冯国柱
万发	广东潮州	林同合
广源	广东潮州	王口
万泰	广东潮州	蔡万
金合顺	天津/上海	张芳金
宝泰	广东/泉州	钓提
吴兴盛	福建泉州	王尾
王益盛	广东/泉州	王一
2月21日		
有财	暹罗	陈箭
金长兴	暹罗	高述
恒财	暹罗	颜德会
金合顺	暹罗	刘毅
邓万顺	暹罗	陈良
金英裕	暹罗	邱乌
顺盛	广东潮州	陈日
利财	暹罗	会岳
宝源	天津/上海	余述
苏德盛	暹罗	张发
万胜	福建厦门	林招记
2月28日		
聚利	暹罗	未知明
顺利	暹罗	陈靖
广源	广东潮州	杨大裕
盛发	广东潮州	林日昇
佳兴	福建厦门	吴文
鹏麟	天津/上海	区大降
金恒盛	天津/上海	蔡麟

船名	始发港	船主
3月5日		
梁就利	广东江门	甘双荣
薛广利	广东江门	薛世发
金如利	暹罗	金进达
恒万利	天津/上海	方有
金国兴	福建厦门	邱钮
和财	暹罗	李会
和发	广东潮州	陈大鹏
新胜隆	广东江门	陈荣光
广悦兴	广东江门	曹将轩
逢泰	广东省城	冯容
福庆	福建泉州	陈某
仕盛	诏安官口	沈永
3月12日		
金发盛	暹罗	李河水
金顺利	上海	蔡庆
泰盛	暹罗	沈玩
陈就	海南	陈留日
林兴盛	海南	林桂香
琼泰益	海南	许仙
得利	海南	林雄
梁万财	海南	林仁辅
3月19日		
泰顺	福建诏安	吴苟
万世利	福建诏安	陈健
顺安	福建诏安	林恩
永发	福建诏安	邓仁记
恬静	福建诏安	沈某
金顺泰	福建诏安	洪南
长发	福建诏安	未知
金建发	福建诏安	陈永
陈兴隆	福建诏安	陈嘉
金振发	福建诏安	蔡成

资料来源： 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208

中国帆船与早期新华社会

中国帆船积极参与庙宇与坟山的创建。本坡石叻路（Selat Road）恒山亭内保存一份非常重要的有关新加坡华人史和中国帆船的资料，这就是道光丙申年（1836年）《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的木碑。这篇碑文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恒山亭之香资，和尚于每月朔望日落坡捐化，而逐年唐船、暹船、安南船及外州郡舟合舨船、双层船等，平安抵叻者，公议唐船凡漳泉者，每只捐香资宋银四大员，其船中人客募化多寡随其发心。如暹船、安南船及外州郡之舟合舨船、双层船暨各号等船，不论船之大小，但属漳泉者，议定每只船捐香资宋银二大员。若属本坡之船，每年捐化香资一次。倘有船主不遵者，若遇其船中头目伙计或有身故者，公议不许附葬于本塚，着本亭和尚阻止；如漳泉等人有身故，要附葬于本塚者，务必对值年炉主处取单带交与本亭和尚为凭……[34]。

这段碑文透露当年恒山亭（创于1828年）和福建坟山（俗称柑仔园）的维持费，部分是依靠中国帆船捐化的。从这段碑文可以知道，漳泉舶商不但拥有“绿头船”（雍正五年（1727年），令各省船只分别用油漆涂色以资鉴别，福建用绿色，广东用红色，浙江用白色。这是人们俗称“绿头船”、“红头船”等名称的由来），而且拥有暹船、安南船和外州郡的舟合舨船等，足见漳泉舶商在航运业上的强大势力。碑文中的“宋银”就是“西班牙银”。

早年的新加坡海港，万帆云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位于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天福宫”创建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是新加坡华社闽帮的总机构，也是福建会馆的前身。庙内有三块石碑，其中两块是《建立天福宫碑记》刻于道光三十年，详细地记录了当年捐金建庙者的芳名，于中有65个“某某艚”[35]，“某某船”[36]和“某某双层”的名字，另外尚有“诏安众船户”、“澄源甲坂”与“协利双层”三个名字。“船”与“艚”是两种性能不同（远洋航行与近海驳运）的海上交通工具。19世纪以来，华人的驳船业，在本地的航运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而早年由闽南人所经营的大舶船，尚以如此古老的称呼，载入碑刻中。19世纪30年代，西人对于来往于新加坡河与外海的驳船有极深刻的印象：

有一种中国船型，叫做舢舨，我相信她是由帆船（junk）衍生而来的。可说是完美的迷你帆船，唯独此船没有甲板。船身漆上绿、白、红和黑色。这种船只上的船员，一般介于12至16人。这类船只通常由邑人摇橹操作。其实无论是大小中国舢舨，其操控模式相似。[37]

上述商号大多是19世纪初本地漳泉船主以及来自闽南与东南亚地区的闽籍舶商。有些船运业者的商号，以“金”字为首，例如“金恒盛艚”或“金发盛船”[38]。无疑这些都是舶主的大号，他们共捐了6588元，比当时首富陈笃生捐3074元7角7分和薛佛记捐2500元二项加起来还多。

中国舶主所以踊跃输将，是因为：第一，“天福宫”是闽人所建，有着地缘的关系；第二，“天福宫”是崇祀护航之神——天妃，与航海的人最有关系。中国船主和舟子回航返国前，必到“天福宫”拜祭。

除了碑刻上的记载，天福宫还保留了几件足以见证这段历史的匾额及楹联。当1840年天福宫落成时，保结厦门

[34]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辑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页225。

[35] “艚”字从六朝时便用作船名。《梁书》“王僧辩传”云：“侯子鉴等率步骑万余人于岸挑战。又以艚舟千艘并载战士，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轧袭，捷过风电”。又《正字通》曰：“船小而长者艚了（从舟）”，《说文》“鸟部”：“艚，鹘艚”。

[36] 《厦门志》卷5（福建：鹭江出版社，1996年），“船政略”渔船载：“……乾隆十二年，福建省舟古仔头船桅高篷大，利于走风，未便任其置造，以致偷漏；永行禁止，以重海防。”由此可见大舟古船的称呼，在闽台及本地闽南语圈中，是一脉相承的。自开埠以来，大舟古船一直在本地沿海与河流之间的货运，扮演重要的角色。

[37] Sherard Osborn, *1838 The Blockade of Kedah in 1838 in Malayan Waters* (Singapore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5.

[38] 关于金字的由来，据《厦门志》卷15载：“合数人开一店铺或制造一船则姓金，金犹合也，惟厦门台湾亦然”。

洋船出洋贸易总行—源丰行（金源丰）许礼敦敬奉一“光被四表”匾额（碑刻上的“金瑞安船”也是保结厦门洋船出洋贸易行之一）[39]说明已经走向末落了的厦门洋行与舶商，还是极为重视新加坡这个开埠不到20年的新港口。另外还有一对木烛形楹联[40]，题书：“圣德参天万民吉庆，母仪配后四海安澜”，这是由一位自称为玉沙坡尾弟子林妈贤所答谢的，玉沙坡是明清以来便是厦门的重要港湾。

除了厦门舶商，本地福建郊商户亦不落人后，天福宫所保留的一方题为“利济舟楫”的匾额[41]，以及一幅题曰：“圣德比天高，保护舟航，功屡施于远迩”，“母恩如地厚，眷怀商士，泽充洋乎新嘉”的楹联[42]，其敬奉者便特别注明是“福建郊户”，所谓“福建郊户”，乃经营福建商品的商家。

实际上，厦门与新加坡的商贸纽带从未断过。即使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本地华商仍然维持着与厦门的交通，例如由黄敏所创立的丰源号轮船公司（后由林和坂与林秉祥经营），此时交通工具已由帆船转变为轮船。

无论是恒山亭的《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或是《建立天福宫碑記》的记载，都说明东南亚的中国帆船贸易与开埠初期的新加坡历史息息相关。在《海峡殖民地档案》中有一张与中国帆船靠岸贸易条例的中文布告，布告的内容对研究本地早年的中国帆船贸易，有重要的帮助，原文如下：

奉国王上旨，示论于诸唐人船主及水手人等知悉。兹因新年将近，唐船处到之人，皆不知法律，每欲放铳、放炮、鸣金、以及高声喊喝，惊动左右船只及疑惑坡上之人。兹一概各不准再行故习。自今以后，如有何人再行故习者，立即遣马礁人拿获，依法处置，又将其船逐出港外，决不故宽。

保黎上人出令晓论于诸位唐船及廖船，并各色船之船主知悉，兹今日必不可载有病之人来新嘉埠，放其上山。若有不遵令者被保黎查出，即擒来定罪，日后要扬帆之时日，再令其落船，各船主则该带回本邦，决不宽情，特此示知。

救世主一千八百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七号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

这则由殖民地政府所颁布的文告，还特地翻译成带有地方特色的中文文稿。文告中清楚表明政府对靠岸中国帆船的一系列限制。另外文告中也透露了中国来的帆船，常运载病人上岸。笔者怀疑恒山亭在创建不到几年便已“叠叠佳城，垒垒丘墟”，与此不无关系。我们知道帆船贸易所仰赖的是季候风，航行于茫茫的汪洋，生死本毫无定数，一旦在航行途中生病，命运与希望之渺茫可想而知。拜祀天妃，祈求“海不扬波”，平安返国。

《重建琼州会馆船装捐题》碑刻上的船装捐题（1880年）

[39] 周凯，《厦门志》卷7“船政略”，页140。

[40] 此对木质烛形楹联现已转赠厦门华侨博物馆。详见厦门华侨博物馆编，《厦门华侨博物馆藏品精华》（中国：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250。

[41] 杜南发等，《南海明珠》（新加坡：福建会馆，2010年），页265。

[42]《南海明珠》，页277。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6月

印度马德拉斯第29营步兵，开始每周在大草坪演奏军乐一次

新加坡海南会馆（天后宫）初建于咸丰七年（1857年），原址在小坡马拉咨街（Malabar Street），至光绪六年（1880年）迁建于美芝路。在天后宫内，有许多石碑，记录了捐金重建会馆的芳名，其中许多用“某某装”的名号，“装”就是“船装”，相当于现在的船务公司。天后宫的《重建琼州会馆碑》上有条捐款记载曰：“各船装共题大银柒千柒百柒十五元”[43]。所谓“各船装”、“板主”就是琼州帆船船主，这些船主为琼州天后宫的重建，捐献了7000多元，足见财力雄厚。这些“船装”也如“天福宫”石碑上的船主一样，有本地的，有中国的。在18世纪末，琼州人的“捞绘船”，“米艇”已航抵安南甚至暹罗贸易；20世纪70年代以后，琼州人的海船和由琼州人驾驶的“暹船”已到新加坡来贸易。

海南帆船在新加坡开埠后，便与中国东南沿海其他口岸如广州、江门、潮州、汕头、樟林、诏安、厦门、泉州等地的帆船，同时来新加坡贸易。有意思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文博单位在海南岛征集航海文献时，曾征集到一批《航海水路簿》（亦称《针路簿》、《更路簿》）。《水路簿》内详细记载帆船从海南岛航行到新加坡的针路（航向），有些本子还提及航向新加坡海峡的地标“白石鹤灯”及“白石盍灯”[44]，即今天新加坡海峡入口处白礁（Pedra Branca）上的霍斯堡灯塔（Horsburgh Lighthouse）[45]。

中国帆船的没落

中国帆船贸易的没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1820年至1860年这40年间，新加坡的中国帆船贸易从兴盛到萎缩（见表（三）），与两次鸦片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息息相关。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是中国帆船贸易衰落的分水岭。《南京条约》签订，中国五口通商，新加坡的欧洲商船不再依赖中国帆船的转运，而中国市场对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土产需求，可从前往五口通商的欧洲商船取得供应，省却长途跋涉于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签订后，除了潮州及琼州等口岸续开，西方列强的势力还向华北进一步扩张，帆船贸易深受摧残。

此外，中国帆船在航海技术上也面对欧洲帆船的竞争。自19世纪40年代，西方曾以一种纵帆式的“飞剪船”（Clipper Ship）[46]，涌入中国沿海各口岸。苏伊士运河开凿后，欧洲各国的轮船在东南亚及中国口岸大行其道，英国的轮船从伦敦航行至香港只需60天的时间[47]，航程大大地缩短。显而易见，依靠季风的传统中国帆船，与西方列强轮船的优越性在海上竞争时，相形见绌。

由于列强的侵略，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国社会的混乱和贫困，不能提供中国帆船业一个正常发展的环境，中国帆船的制造技术和经营方法，没有改良，一直停滞在一个落后状态中，因此不能够与西方船业争一日之长短。再加上中国门户被打开以后，外国船只直接驰往中国港口及内河，已无需借助中国帆船之力了。中国沿海，海盗猖獗，打家劫舍，剽掠商旅，使得新加坡商人提心吊胆，深恐血本无归。所以新加坡华商渐多选择横帆运输，加上有保险业的保障，既便宜又安全。在汽轮还未普遍之前，横帆逐渐代替了中国帆船。

厦门帆船贸易早在嘉庆年间就已经开始萎缩。这主要是由于广州港的竞争及走私情况严重所造成[48]。到了道光初年，厦门洋行倒闭，以商船充作洋船尚有10余号[49]。清代时，广东的远洋帆船的数量以潮州最多，且载重量最大，介于500吨至100吨之间。咸丰八年（1858年）时，汕头的远洋帆船数量大约有400艘。从咸丰八年至同治八年（1869年）这11年间，远洋帆船减少至300艘。以后10年内又淘汰了235艘。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根据汕头海关的报告，载重一万担的大型远洋帆船，已经剩下两艘[50]。至于广州地区的远洋帆船，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时，因受外国商船的垄断而几乎完全消失。

---

[43]《新加坡华文碑铭辑录》，页207-210。

[44]广东省地名委员会，《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中国：广东地图出版社，1987年），页94。

[45]霍斯堡灯塔建于1851年。

[46]王志毅，〈轮船与飞剪船的竞争〉，载《船史研究》期6（中国：中国造船工程学会，1993年），页47。

[47]《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24。

[48]周凯，《厦门志》卷5“洋船（附洋行）”，页140。

[49]同上注，页141。

[50]蒋祖缘，《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中国：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页93。

表（三）1829–1866年中国帆船与新加坡的贸易（船只数量与吨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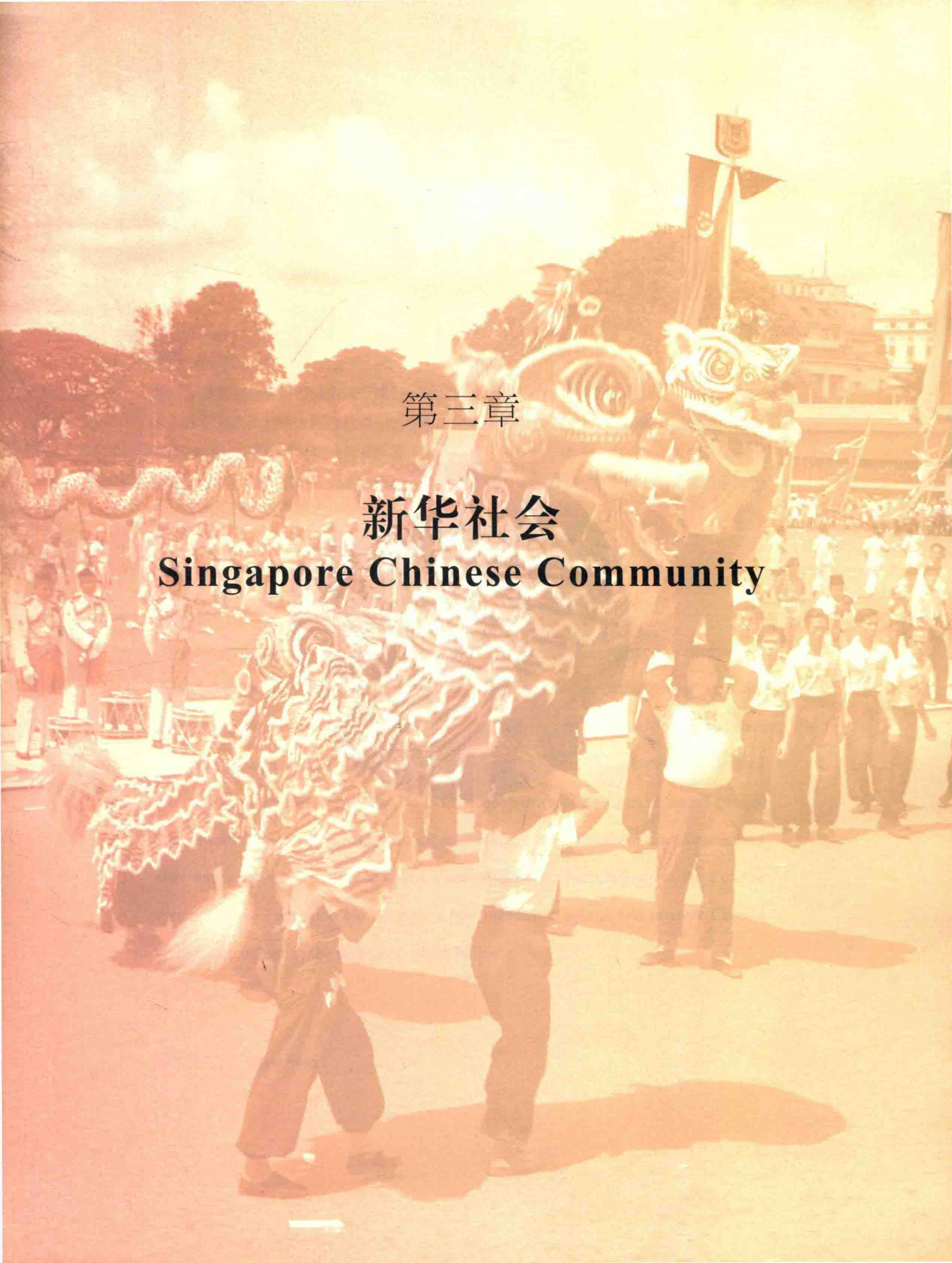
年代	入港数量（艘）	吨数	离港数量（艘）	吨数	总共（船数与吨数）
1829–30	11	2, 555	12	2, 300	（23艘）4, 835
1832–33	7	1, 247	13	2, 765	（20艘）3, 922
1835–36	17	2, 081	18	3, 243	（35艘）5, 315
1838–39	54	8, 613	30	5, 975	（84艘） 14, 588
1841–42	150	18, 400	97	12, 145	（247艘）30, 545
1844–45	76	13, 532	64	9, 925	（140艘）23, 457
1847–48	81	14, 608	55	10, 990	（136艘）25, 598
1850–51	44	9, 865	43	12, 443	（87艘）22, 308
1853–54	140	19, 705	78	11, 350	（218艘）31, 055
1856–57	143	14, 389	75	3, 184	（218艘）17, 537
1862–63	61	1, 1076	73	10, 419	（134艘）21, 495
1865–66	19	3, 280	11	1, 302	（30艘）4, 584

资料来源：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9–69"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33, Part 4, December 1960, No.192), Appendix C, Table Ib "Chinese Junks Arrived from and Departed for China 1829–30 to 1865–66", p.27

1844年至1845年，从中国来的移民共计1万人，其中1160人是乘横帆来的，占11%；1853年至1854年，中国移民计1万3000人，其中3424人是乘横帆来的，占26%。再以来往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中国帆船的数量和吨位和横帆的数量和吨位比较。1838年至1839年，中国帆船84艘，吨位1.4万，横帆87艘，吨位1.9万；1853年至1854年，中国帆船216艘，吨位是3万，横帆291艘，吨位15万；1864年至1863年，中国帆船134艘，吨位2万，横帆417艘，吨位是18万；1865年至1866年，中国帆船仅33艘，吨位4584，横帆732艘，吨位44011万。中国帆船在新加坡的活动，面对欧人横帆的剧烈竞争，每况愈下，颓势已无法再挽回了。

中国帆船贸易自开埠后的50年间，造就了早期新加坡的经济繁荣，也带来勤劳、坚韧的中国移民，将新加坡从一个被遗忘了的渔村，开辟为闻名世界的大港口。帆船贸易在新加坡开埠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日后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与海事科技的不断革新，风帆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然而新加坡作为东西海上交通枢纽的地位，始终因为其地理条件的优越性，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三章

新华社会
Singapore Chinese Community

第一节　神权·绅权·帮权
——帮权结构与帮权政治

摘要

本节探索新华社会帮权结构的形成、本质及其变迁的时空背景。19世纪闽、潮、广、客、琼的帮权结构及两极化的帮权政治，导致1854年闽帮跟诸小帮组合大冲突。二战前华社游离于亲中和亲英思潮之间进入帮权巩固期。新加坡独立后，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成立结束了华社帮群意识主导的帮权政治，取而代之的是在国家意识主导下肩负起传承文化和传统的使命。

Abstract

This section explores the origin, n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bang" structure and "bang"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The polarized "bang" structure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had led to a serious conflict in 1854 between the Fujianese dialect group and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lesser Chinese dialect groups. The prewar pro-China and pro-British political ideologies also led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Chinese dialect groups. Subsequently, the formation of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after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ended a period of ethnic parochialism in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Federation has taken on a new mandate to uphold and promote Chinese heritage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 building.

林孝胜（**Lim How Seng**）

19世纪的移民社会，由于大部分移民先辈所受教育不多，甚至目不识丁，说同样方言的同乡就自然而然地聚合在一起。因此，乡土籍贯成为早期华社结社最基本的纽带。世人普遍对故土都有眷念之情，中国人尤甚。何炳棣在其经典著作《中国会馆史论》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眷怀乡土本是人情之常，但直迄晚近，国人对乡土籍贯的观念，实较任何开化民族远为深厚。我（中）国幅员之广，相当欧洲全洲，虽自秦以降已作到‘书同文’的地步，但两千年来各地区间仍保有不同的风俗和方言。方言的不同是造成强烈乡土观念的主因之一”[1]。何炳棣也考证成立最早的会馆是明永乐年间（1403－1424）旅居京都北京的安徽芜湖邑人成立的，供同乡寄宿联谊之用的芜湖会馆[2]。明末清初之际，北京也已出现福州、同安及安溪会馆[3]。随着华人移民的过番，这种联络同乡、同宗及同业感情，团结互助的社会组织也在世界各地成立，成为海外华人移民社会的一大特色。

在殖民地时代，南来谋生的华人身在异乡，又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丝毫照顾，就业没有保障，也无任何社会福利。于是，下南洋的先辈便本着乡情和亲情的情怀，自发的结社以求自保，为同宗和同乡的乡亲提供基本的福利和安全保障，协助他们寻求工作及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乡土籍贯观念催生了帮或方言群认同，而移民社会内部结社自保的动力，促使同乡成立地缘及方言缘的同乡会如地缘的会馆、血缘的宗亲会、业缘的行会、秘密会社甚至义山，导致一个称为“帮”的方言社群网络的形成。

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结构与帮权政治

“帮”是一个方言社群，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如南洋各地的华人移民社群一样，新加坡华社最先也是从建立坟山和庙宇开始，然后才成立会馆，互助会及慈善医社。从接引新移民，安置住宿，工作，提供救济，照顾老移民的身体健康，甚至百年安葬，兴学办校教育移民的下一代，办集团结婚到保留传统发扬中华文化，宗乡会馆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华社的帮权结构主要由财雄势大的五大方言群，即福建、潮州、广府、海南和客家人组成。1881年，这五大帮或方言群人口分布如表（一）。

另一方面，莱佛士的市区发展计划将各方言群分区居住，如广帮聚居在牛车水（Kreta Ayer）、福建帮在直落亚逸（Telok Ayer Street）、潮州帮集中在沙球勝路（Circular Road）一带等，也是华社帮权结构形成的外因。

在各帮人口结构中，帮内帮外集团间的互动，就构成帮权政治[5]。地缘与方言缘的会馆是华社的主流，也是主导的帮权组织。籍贯加方言界定了各自会馆间的界限，这个界限也延伸到各帮群所设立的义山。莱佛士的重商政策、市区规划及拓荒广客技工被逼迁埋下以商人为主干的福建帮与其他小帮之间矛盾的伏线，导致19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出现两极性的格局：强大的福建帮面对广、客、潮、琼各小帮的联合阵线。在这样两极性的帮权架构下，我们先來了解福建帮内的帮权政治的情况。

表（一）1881年新华社会帮群结构

总人口	福建	潮州	广府	海南	客家	海峡华人[4]	其他
86, 766	24, 981	22, 644	14, 853	8, 319	6, 170	9, 527	272
(%)	(28. 8)	(26. 1)	(17. 1)	(9. 6)	(7. 1)	(11)	(0. 3)

资料来源： Report of Census of Singapore 1881

[1]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页1。何炳棣也列举形成乡土籍贯观念的三个特殊原因：儒家“孝”的礼俗和法律、官吏籍贯限制的行政法以及科举制度。

[2] 《中国会馆史论》，页15。

[3] 《中国会馆史论》，页16。

[4] 海峡华人大部分是由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漳泉人的后裔，可并入福建帮。

[5]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页30；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页117－148；Mak Lau Fo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5), pp. 124－134。

光绪御笔之宝——“波靖南溟”原件

“波靖南溟”匾额

福建帮的帮权结构与帮权政治

19世纪的福建帮是以操厦门语系的漳州府、泉州府、永春州的闽南人为代表。在业缘上属商人阶级，在人数和财务上也凌驾其他帮。因此，福建帮自新加坡开埠以来就领导华社。新加坡福建帮以马六甲移入的漳泉永春籍商人集团为主干。1827年，福建帮建立漳泉公冢恒山亭于石叻路（Silat Road）作为福建帮的总机构。1840年又建天福宫于华商汇集的直落亚逸街，会馆议事也附设在天福宫内。福建帮以漳泉派系为核心，他们构成恒山亭和天福宫创建时期的领导班子。来自马六甲的两位漳州人，薛佛记和陈笃生分别担任恒山亭和天福宫的大董事。19世纪天福宫的领导层皆由陈笃生及陈金钟父子把持。

与此同时，帮内小集团趋向结社以保障其利益。首先成立的是富有帮会色彩的金兰庙和庆德会。金兰庙为永春及泉州安溪74名帮会人士所立，1839年成立碑上所记载的捐款人多称号“哥”、“合”。其首领杨清海为一闽商，曾题捐天福宫建筑费80元[6]。庆德会为马六甲移入的36个漳泉商人家族于1830年组成的兄弟互济会[7]，他们积极参与福建帮总机构及永春系陈金声的兴学事业，可说是福建帮总机构的支系。

福建帮内另一分化运动是漳泉集团内部组织州或县级小团体。泉州府的南安与金门邑人陈泰，分别于1836年和1876年成立凤山寺（南安会馆前身）及孚济庙（金门会馆前身）[8]。漳州府长泰县人章三潮于1849年创立长泰会馆。永春邑人陈明水（陈金声子）于1867年创立永春会馆。木材船运商陈泰（金门）[9]、鸦片赌博饷码大户章三潮（长泰）及土产出入口商陈金声（永春）都富甲一方，却无法在福建帮总机构天福宫扮演领导角色，因而另起炉灶。可是他们和福建帮母体还是维持密切的联系[10]。闽帮以天福宫为中心每年举行迎神赛会时，皆请恒山亭福德正神（大伯公）、凤山寺广泽尊王（南安地方神）及金兰庙清水祖师（安溪地方神）三位神明齐集天福宫奉祀、观剧[11]。可见福建帮内的分化运动并没有削弱福建帮的实力，它只说明大集团的垄断加强了小集团的认同感。但是，在帮际活动和帮际关系中还是对福建帮认同，这是小集团在自保过程中和帮权政治中所表现的双重认同[12]。

19世纪新加坡和马六甲的福建帮享有共

[6] 林孝胜，《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新加坡：青年书局，2010年），页113—118。

[7] 有关庆德会组织及运作，见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100—128。

[8] 《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页125—129。

[9] 有关陈泰的企业，参阅林孝胜〈陈泰经营木材业方法初探〉，载《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129—147。

[10] 〈陈泰经营木材业方法初探〉，页39。

[11] 李勇，〈天福宫的领导层、组织与功能（1840—1915）〉，载《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卷2期2（2010年12月），页15。

[12] 陈育崧，〈绪言〉，载陈荆和、陈育崧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0年），页11。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2 月

三州府总部从槟榔屿移至新加坡

同的领导层。薛佛记晚年回马六甲成为呷华最高权力机构青云亭亭主。1847年由陈金声接任，之后亭主职位就由陈家世袭，其子陈明水、陈明岩及孙陈若淮相继担任，直到1915年亭主制被废除。薛佛记、陈金声，加上陈笃生和章三潮四大家族非但控制了领导层，并且有世袭现象。他们的第二代陈明水、陈金钟、章芳琳及较后的陈武烈（陈金钟孙）与薛中华（薛佛记后裔）也相继成为新加坡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福建帮首领。

福建帮假其人多与财富雄厚领军华社。可是，在帮际关系和活动中表现得非常保守和封闭性，鲜与外帮互动。笔者和友人于1973年作田野调查考察新加坡古迹时，常发现一个方言群赠送匾额或木刻对联给另一方言群的庙宇。这种跨帮活动实例发现于潮、客、广、琼帮庙宇，却没发现在福建帮的庙宇。别帮的庙中也没发现福建帮赠送的牌匾或木联[13]。可是另一方面，其领导人的社会行为却是超帮的，如陈笃生设立贫民医院，惠及各帮群。

其他方言群的帮权结构与跨帮组合

广、客、潮、琼帮的帮权结构

其他帮群的帮权结构也很复杂。潮帮代表广东潮州府操潮汕语系的八县邑人，即潮州八邑：潮安、澄海、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及南澳。19世纪，潮帮的主要职业为种植胡椒与甘蜜。这个行业包括商人、投资人、种植家、工头和种植工人。新加坡和柔佛的港主多为潮州人。19世纪潮帮也出了数位足以和福建帮抗衡的大实业家，如佘有进、陈旭年、陈成宝等。大部分潮籍人士多分布在种植园，过着群居的生活。他们个人的存在和工作维系在和同籍贯的工头及其背后的秘密帮会组织的关系上。他们无所谓结社，打从被雇佣为园坵工人的第一天开始，就依附在秘密会社的网络里。由于生活在市区的潮商人数相对的少，结社也相对的单一，这是业缘影响帮权结构最明显例证。1820年代，潮帮建粤海清庙作为潮帮最初的总机构和祭祀场所。1845年，佘有进倡建义安公司取代粤海清庙的总机构地位。潮州八邑会馆迟至1929年才成立。潮帮为第二大帮，可是不积极参与帮权活动。

广客两帮最具冒险精神，是华社移入刚开埠的新加坡的先头部队。他们也是莱佛士市区发展计划被逼迁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结社自保的帮权意识最强。两帮都比闽潮帮结社来得早。广客帮分别于1822年和1823年组织宁阳会馆及应和会馆。

广帮分四邑和五邑两派系。四邑指珠江上游的新会、新宁、开平与恩平。五邑则指珠江三角洲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顺德、东莞、番禺和香山。两者所操广府话稍有不同，职业也有偏差。

四邑人的职业多为建筑与木工，以及和这两个行业有密切关系的烧砖业与木材业，但也有例外。早期也有从商致富的如七家头朱有兰和罗致生两家族公司遍布东南亚。四邑人凝聚力强，小群意识浓厚。很早就创立地缘组织宁阳会馆（1822年）、冈州会馆（1840年）及肇庆会馆（1879年）；血缘宗亲会曹家馆（1820年代初）、四邑陈氏会馆（1848年）、台山黄家馆（1854年）；业缘组织北城行（1868年）为木工和建筑业人士的东西家组织。木工与建筑业重视在封闭式的行会制度下由师徒传授技艺。这种高度监督性的职业导致聚集倾向，也培养出一种非常纪律化的人际关系，这是别帮所没有的[14]。

曹家馆

[13] 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页28。

[14] 有关四邑人之行会组织，参阅今堀诚二，刘果因译，〈槟城华人手工业基尔特〉，载《南洋文摘》卷12期3，页187－198。

五邑人多从事商业、药行、客栈及茶楼。其地缘组织有香山公司（1831年，中山会馆前身）、南顺会馆（1839年，南海与顺德）和东安会馆（1876年，东莞）。

这种高度分裂局面使得广帮在19世纪缺乏一个总机构。广东会馆要到1936年才成立。然而在帮际关系和帮际活动中，双方合作无间。对外四邑人士以肇庆为代表，统称为“肇”，五邑人士则统称为“广”。19世纪，番禺邑人出了一个与福建帮领导层同级的富商胡亚基，故广帮及五邑系以番禺为代表。“广”与“肇”显示两派系邑人有强烈的认同感。广福古庙是两派系合建的，显示帮内还是合作团结的。在帮际活动中，则分别以“广”与“肇”之名参与，立场也多一致。

客帮人口虽少，帮内派系复杂。新加坡的客帮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约分三大派系：（一）丰永大集团为跨地缘的结合体。丰顺与大埔属广东潮州府，因操客语而不容于潮帮。来自福建汀州府的永定也因操客语而不容于福建帮。同时，也各自成立地缘组织：茶阳会馆（1857年，大埔）、丰顺会馆（1873年），以及永定会馆（1916年）；（二）广东嘉应州五属集团。这五属为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及平远。五属邑人成立应和会馆作为总机构，也建立五属义山；（三）广东惠州十县自成一系，于1870年代组织惠州会馆。客帮总机构南洋客属总会迟至1929年才成立。19世纪客帮的职业主要是技工、劳工、打铁业、当店、药行、布及裁缝业。在帮际活动和帮际关系中，丰永大与嘉应五属往往结合在一起，以便发挥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力。可是，同操客语的惠州集团却不容于丰永大和嘉应五属的联合阵线，只好突破方言界限而跟广帮的广肇集团合组成一个跨帮的广惠肇集团。

琼帮人数也较少，但很团结。在19世纪时只有一个总机构，即1857年建立的天后宫（海南会馆前身）。职业主要是餐饮业、咖啡店和家庭工作等。琼帮也不积极参与帮际关系。

其他移民新加坡比较后期的方言群如福州、福清、兴化及三江（浙江、江苏和江西）邑人在20世纪初才陆续成立会馆：福州会馆（1909年）、福清会馆（1910年）、兴安会馆（1920年）、三江会馆（1908年）。由于人数不多，鲜少参与帮际活动。

跨帮组合

新加坡开埠初期，华社本身就因强烈的帮群意识充满矛盾。因此，莱佛士命市区发展委员会必须将各帮聚居区域加以隔离以避免发生纠纷。广客两帮对经商致富的福建帮的不满早在1822年已露端倪了。当年他们被逼迁出吻基和甘榜格南以便开辟为商业区时，在陈情书上就抗议道：如果是为了筑路或建政府建筑物，他们很乐意接受被迫迁，“但是决不能为了让出（地段）给较富有的（商人）阶级而摧毁了（我们）穷人的家园”[15]。

面对人众财雄势大的福建帮，促使各小帮结合成一个超帮集团，企图在帮权政治及帮际互动中维持一个势力均衡格局[16]。这个跨帮大组合以广客两帮为主力。这是导致组织跨帮组合的重要动因。其核心组织由丰永大嘉应五属集团跟广惠肇集团组成，总部设在直落亚逸街的海唇福德祠。该祠起初约于1824年由广惠肇集团创立，客帮是于1854年重修时才成为重要伙伴[17]。其实，两集团的伙伴关系早在1830年代已经建立了。1838年两大集团合建新坟山绿野亭。

绿野亭倡办理事会以胡南生（即胡亚基，番禺，广帮）为大总理，另两位大总理为陈

[15]《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13—14。

[16]陈育崧，〈绪言〉，页17。

[17]《三州府文件修集》（新加坡：政府印务局，1894年），Pt 5, vol 1, pp.24–26.

相关人物

郭实猎

历史事件

德国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7–1838年迁至新加坡出版

19世纪末天福宫前车水马龙

嘉云（大埔，客帮）与何阿炎（南顺，广帮，义兴公司大哥），副总理四位：叶裕昌（嘉应，客帮）、黄阿周（香山，广帮）、李友清（嘉应，客帮）以及刘露清（嘉应，客帮）。这份领导层名单显示广帮五邑和嘉应五属组成此跨帮组合的权力中心。广帮五邑占三名，客帮大埔一名，嘉应五属三名。惠州、四邑、丰顺及永定皆无代表。

从各帮庙宇的匾额及题捐可寻找到超帮组合的痕迹。潮帮粤海清庙内可看到应和会馆、茶阳会馆、广惠肇以及琼州信士于1896年至1899年间赠送的匾额，唯独缺福建帮匾额，琼州天后宫内也出现潮帮义安郡信士赠送的匾额。超帮组织（潮、广、客、琼）以粤海清庙为中心每年联办迎神赛会[18]，印证了19世纪帮权政治的两极性。1869年和1870年，章芳琳在成为福建帮领袖前，以个人名义捐地扩建海唇福德祠，这是福建帮人士参与跨帮活动的唯一实例[19]，其意义不同于一帮群会馆赠送匾额或实物给另一帮群会馆所代表的帮际关系涵义。

两极化帮权政治酿成悲剧：1854年暴动

1854年5月5日，华社两极化的帮权政治，终于酿成巨大悲剧，爆发了新加坡开埠以来最严重暴动。对华社来说，更是一场浩劫。福建帮和潮帮，发生正面冲突，跨帮组合的广客帮也加入战围和潮帮同一战线[20]，一连12天，从市区到乡村胡椒甘蜜园丘，双方互斗、抢掠、杀劫、烧毁房屋[21]。

在暴乱发生前市面上已有紧张迹象。厦门小刀会（新加坡英籍华侨陈庆真创立的反清复明会党，队长多为新加坡华侨）于1853年5月在厦门起义[22]。11月失败后，1853年底及1854年初，2000多名属于天地会（义兴公司）的小刀会党羽（大部分为潮籍）乘五艘船陆续逃亡到新加坡，每船运载多则800人，少则400人[23]。警方在船上查获大批武器包括大炮、火药、矛等。当时的《海峡时报》及《新加坡自由西报》也大事加以报导，并敦促政府要严加监视这批骚乱分子[24]。后者也报导厦门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有些闽商因对厦门局势乱担忧而把厦门的家小接过来新加坡[25]。这批潮

[18] 李勇，〈天福宫的领导层、组织与功能（1840－1915）〉，页14－15。

[19]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43。

[20] Blythe, Wilfred, *The Impact of Chinese Societies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79.

[21] Blythe, *op.cit.*, pp.75－80; Buckley, C.B.,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9－1867*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584－594; *Singapore Free Press*, 1854.05, pp.12－14; *Straits Times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merce*, 1854.05, pp.9－16.

[22]《同安县志》卷3；陈育崧，〈厦门小刀会与新加坡〉，载《椰阴馆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4年），页96－99；庄钦永，〈英籍新加坡华侨陈庆真案－厦门小刀会史之一页〉，载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0年），页37－41。

[23] *Singapore Free Press*, 1854.12.30.

[24] *Singapore Free Press*,. 1854.12.17, 1864.12.30; Buckley, *op.cit.*, 1984, p.580.

[25] Buckley, *op.cit.*, p.580.

籍小刀会成员抵新后，获得蔡茂春领导的潮帮会党义福公司的接应。义福公司为了援助这批流亡兄弟，曾向义兴公司的福建帮党羽筹款，但被拒绝[26]，使两帮会关系出现裂痕。这批小刀会成员抵新也大大冲击帮会间的势力平衡，加强潮帮义福公司的势力。因此，当时市面上也盛传一些广东帮群正酝酿挑战福建帮在秘密会社的优势[27]。同时政府也相信帮群包括帮会之间的不和早已存在[28]。所以，数千名小刀会党员的涌入，引起新加坡各界包括政府尤其是华社与帮会极度恐慌。1854年初新加坡社会弥漫着风雨欲来的不安气氛。

自1853年9月，新加坡的米供应短缺导致米粮价高涨[29]，影响市民的生活。因此，因米而起的争执就成了1854年大暴动的导火线。1854年5月5日当天中午，一个福建人和潮州人在买卖一斤米的斤两问题上起口角，进而打了起来，并发展到两帮邑人在数个街道群斗。对方商店被抢，商店纷纷关门[30]。下午2时，警方承认局势已失控，潮闽两帮殴斗民众增至四、五千名[31]。第二天，驻扎官召见50位华人商界领袖，请他们利用其影响力协助平乱。潮帮会党义福公司首领蔡茂春也被请出来巡街，潮帮胡椒甘蜜业大王佘有进则陪警卫队到武吉知马（Bukit Timah）巡逻[32]，结果，无多大作用。

暴乱的头两天主要发生在市区的闽潮商店集中的街道，直落亚逸街 、马吉街（Market Street）、沙球勝路（Circular Road）、菲立街（Philip Street）以及吻基一带 。双方势均力敌，各有伤亡。可是当第三天动乱开始蔓延到郊区、乡村及胡椒甘蜜园坵，如曾厝港（Chan Chu Kang）、武吉知马、实乞纳（Siglap）、巴耶利峇（Paya Lebar）、汤申路（Thomson Road）、东陵（Tanglin），潮帮人数远超福建帮，并且潮帮会党几乎控制所有种植园。尤其在巴耶利峇和实乞纳，福建邑人的房舍被烧，伤亡惨重。

11日，总督巴特卫（W. J. Butterworth）发公告提醒华人这里不是他们的国家，各界必须守法，不能为私仇而互斗，政府绝不支持某帮群或某个阶层华人，任何人如破坏治安，将依法办，决不宽待[33]。这场暴乱在军警及欧籍商人志愿队的镇压，包括开枪射杀终于平息下来，12天恶斗结果造成400多人丧命、300多间房屋被烧毁、伤者不计其数。6月28日，总督向在印度的总部报告中提到同福建帮对峙的潮广客联合阵线已被瓦解[34]。

这场暴动规模之大，非同小可。连华商会馆侨领、帮会大哥都无法摆平。政府深感华社领袖、种植园主及帮会头人没有给予任何实质协助[35]。由于他们对新到来的小刀会成员有所戒心和警惕，也非他们所能控制，都不太愿意出门。他们是在特警严密保护下，才勉为其难出席驻扎官的官方会议[36]。其实，当整个帮群和帮会联成一气，这场暴乱已超越华社与帮会领袖的影响范围。暴动刚平息，《海峡时报》

---

[26] Blythe, *op.cit.*, pp.76–79; Buckley, *op.cit.*, p.585.

[27] *Singapore Free Press*, 1854.05.12, p. 2.

[28] Blythe, *op.cit.*, p.76.

[29] Buckley, *op.cit.*, p.579.

[30] 暴动的情况描述，见Buckley, *op.cit.*, pp.585–595 及卢耀华，〈论1854年的新加坡大暴动〉，载《亚洲文化》期6（1985年10月），页68—75。

[31] Blythe, *op.cit.*, p.4.

[32]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页74。*Straits Times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merce*, 1854.05.16, p.4。

[33] Buckley, *op.cit.*, p.592.

[34] Blythe, *op.cit.*, p.78.

[35] Blythe, *op.cit.*, p.77.

[36] Buckley, *op.cit.*, p 587.

记者5月16日（星期五）的目击报告说："星期五（5月12日）早上，市区的店铺没开，潮闽邑人之间的恶感已表露无遗"[37]。《新加坡自由西报》记者在5月12日的新闻报导也认为双方的"长时间的敌意现在爆发了"[38]。这场暴乱无疑是植根于19世纪新华移民社会的两极化帮权政治。这场暴乱最终导致1869年政府立法对帮会加以控制，以及1877年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的设立。

跨帮帮际关系与活动

到了1880年代，帮权结构开始松懈，更多超帮实例在不同的层面发生。福建帮创立的保赤宫陈氏宗祠在成立五年后，于1883年开放，让潮帮陈姓族人加入为会员。1885年同济医院的成立更是帮权政治的重要里程碑。同济医院的设立得到各帮各阶层的鼎力合作。1892年的"善与人同"匾额所列72名发起人涵盖各帮侨领：福建帮颜永成、李清渊与丰兴公司（陈金声家族企业）；潮帮椒蜜公局；琼帮琼源丰；广惠肇丰永大嘉应组合的汤广生、朱有兰、朱广兰、罗奇生、罗致生、胡南生等。这个名表突破了地缘、方言缘、血缘、业缘的界限。

英国殖民地政府也巧妙地利用华社的帮权结构来间接控制华社。政府通过帮会头目负责其势力范围内的治安。如区内发生事故，头目须交出涉案党徒给警方，否则头目有被驱逐出境之忧。政府也扶植各帮群领导层，加封太平局绅，利用帮领袖在帮内的权威，协助调解帮内及帮际纠纷，缓和帮权对抗的矛盾。帮领导层之间有些在业务上和公共服务方面也有密切联系。闽帮的陈金钟、陈金声，潮帮佘有进，广帮胡亚基都积极资助陈笃生贫民医院发展及参与管理。1889年，政府成立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作为政府与华社之间沟通的桥梁，也让各帮代表集议有关华人事务。参事局按各帮人口比例委任闽、潮、广、琼、客帮侨领为各帮代表。1895年闽潮各有五名代表，广、琼、客帮分别有四、二、一名代表。华人参事局的成立是官方对华社帮群结构的承认。1877年清廷和政府不约而同分别设立领事馆及华民护卫署，对帮权结构和帮权政治影响深远。清廷领事和华民护卫司竞争对新加坡华人的控制权[39]，在华社宣扬亲英和亲中的政治思想，把帮派思想提升到国家意识的层次。因此，19世纪末，两极化的帮权政治之势力均衡的理论基础已不适用，取而代之的新帮权政治指导原则，是在照顾帮利益之大前提下与外帮进行帮际交往和合作。

另一类帮权政治

坟山管理

儒家的慎终追远及孝道，是华人小传统民间信仰的中心思想之一。侨居在外，让先人去世后有个安息之处，因此各帮先贤都优先建立公冢称为义山，只开放让同帮过世先人入葬。和地缘会馆一样，界限分明，无形中，把人间的帮权结构和帮权政治也延伸到到天堂和地府，先人也就安息在同乡或跨帮组合友帮邑人为伴的灵界里。各帮会馆每年都到义山举行春秋二祭，后人于清明节也去扫墓。

闽帮、潮帮及琼帮分别建立了帮群义山恒山亭、泰山亭及玉山亭。广客两帮也建立跨帮公冢[40]：广惠肇、嘉应州、丰永大，七属先建立青山亭，封山后立绿野亭。当1937年绿野亭封山后，七属继分建广惠肇的碧山亭，嘉应州邑人另立双龙山、丰永大邑人建立公冢毓山亭。由青山亭、绿野亭到碧山亭皆取青山绿水碧波的意境，有一脉相承之含义。

迎神赛会

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华社，是绅权及帮权依附于神权的年代，传统的民间信仰和寺庙成为各帮群的活动中心。各帮定期举行的迎神赛会是大型的帮权活动。闽帮以天福宫为主，并由闽帮五股头主导，每三年举办的迎神赛会最为隆重。跨帮组合的潮、广、客、琼也以潮帮粤海清庙为中心，每年也有规模较小的迎神赛会[41]。在小坡，同一街道里的闽、粤、客籍商号，也逐年照例分帮定期于农历11月上旬，

[37] *Straits Times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merce*, 1854.05.16, p.5.

[38] *Singapore Free Press*, 1854.05.12, p.2.

[39] 林孝胜，〈华社控制权之争：清领事与英国官员的纠纷〉，《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63—85。

[40] 陶公铸，〈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载《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175周年纪念特刊》（1999年），页36—44；曾玲，〈新加坡华人宗乡社群认同形态的历史考察：以广惠肇碧山亭为例〉，载《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等，2002年），页77—100。

[41] 吕世聪，洪毅瀚，〈神权与帮权结合的体现：追溯天福宫的赛神绕境活动〉，载《南海明珠天福宫》（新加坡：福建会馆，2010年），页392—413；林源福，〈战前的天福宫与闽帮社会〉，载《南海明珠天福宫》，页379—382；李勇，〈天福宫的领导层、组织与功能（1840—1915）〉，页14—15。

传统的庙宇活动——迎神赛会

演戏酬神及举行迎神赛会[42]。绕街游行的神祇是各帮崇奉的神祇及地方守护神如妈祖、广泽尊王、清水祖师，绕境街道也集中在帮群聚居和从商的街道。绕境游行队伍所展现的帮群文化元素如南音、北管、大锣大鼓、旌旗等，使得迎神赛会有效地强化了帮群意识。这种大型宗教活动必须投入大批人力和金钱，在组织迎神赛会的过程中发挥了团结乡族的作用，大家为了把迎神赛会办得有声有色，都全力以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五股头之间在派出各自迎神的妆艺队伍方面也互相竞争，不惜出巨资企图出奇制胜。另一方面，迎神赛会也展现超帮的意义。当闽帮进行绕街游行，经过广帮的宁阳会馆、潮帮的粤海清庙、以及五股头当家炉主商号，都须停止奏乐，以示尊敬[43]。迎神赛会也提供一项全民，尤其是华工和异族同胞，共赏的娱乐活动。

秘密会社

下层工农阶级也存在同一模式的帮际组合，属于秘密会社性质。其业缘属于工农阶级，帮属则以闽潮、丰永大与广惠肇集团为核心。移民时代，华族会党的核心组织是义兴公司，自开埠以来义兴公司是秘密会社的总机构。19世纪他们垄断了劳工市场和行业，在新马的鸦片、酒和赌博的承包税制度的运作也扮演重要角色。大部分新客，尤其是契约劳工，都经过会党劳工招募与雇佣通道进入新加坡卖给雇主，基于语言沟通方便，同籍贯的雇主往往雇佣同乡劳工到甘蜜园当苦力，或在市区当人力车夫等[44]。那些自费劳工，也往往由同乡引介入行并住在乡亲的苦力间。他们都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保护，为了保住生计，新客也就加入同乡的帮会。1860年，义兴公司会员中福建人最多计1万5000人，潮州会员3500人，广府会员4000人，琼州会员2500人，以及客家会员1500人[45]。为了便于控制管理，义兴公司按方言群组广东义兴、福建义兴、潮郡义兴及海南义兴[46]。俨然成为工农阶级的帮权结构，不同的是它没有两极化，而是在义兴公司的旗帜下大统一。

[42]《叻报》，1900年12月7日。

[43]《叻报》，1901年11月15；吕世聪、洪毅瀚，〈神权与帮权结合的体现：追溯天福宫的赛神绕境活动〉，页395；林源福，〈战前的天福宫与闽帮社会〉，页372。

[44]《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页59—60。

[45] Blythe, *op.cit.*, p.538; 庄钦永，《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页73。

[46] Wang, T.P., *Chinese Towkay and Workers Strik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7–1900)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Nanyang Quarterly,1981), p.9.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月1日

新加坡第一次举行船赛

义兴公司的总部设在梧槽路（Rochor Road）[47]。1870年代义兴公司总部内设有过世会党要员的神主牌。义兴公司于1890年被殖民地政府全面查封后，这批神主牌被遗弃，辗转移放到在劳明达街（Lavender Street）社公庙内[48]。其中参与会馆庙宇活动的有：义兴公司的大哥何阿炎（广惠肇绿野亭倡办理事，广帮南顺代表）、曹符义与曹符成（曹家馆创办人）、张族昌与余增涌（1850年同为茶阳会馆副理）、许茂芝（绿野亭首事）、赵文炳（宁阳会馆首事，1840年）、李松泰（1860年广惠肇义兴领袖，1854年海唇福德祠大总理，1879年番禺会馆副总理）、萧贤舞（1850代茶阳会馆大董事）、义兴公司大总理阮锡禧（福建帮，题捐崇文阁，1861年）[49]。

帮权巩固的年代 (1900 – 1942)

表（二）各帮人口于1910年及1931年分别如下：

年	福建	广府	潮州	海南	客家
1911	59, 117	30, 729	27, 564	9, 451	8, 514
1931	180, 108	94, 742	82, 405	19, 896	19, 317

资料来源： C. F. Yong, *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p130 (Singapore: Oxford Umversity Press, 1897)

在世纪交替前夕，新加坡出现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华社。清廷驻新领事的护侨宣教，捐官买爵措施，拉拢了不少华商归附清廷。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闽商兼诗人邱菽园领导各帮华商发电报给清廷请愿[50]。不久维新保皇派首领康有为在邱菽园邀请下，于1900年到来新加坡寻求华人的支持[51]。随后而到的是革命派孙中山于1906年在晚晴园成立同盟会新加坡支部作为新马革命据点[52]。另一方面，清廷和殖民地政府继续在华社控制权方面角力。华人成为各方争宠的对象。二战前华社在这种新形势的冲击下，对抗性及两极化的帮权政治起了质变，宣告进入一个新的帮权政治时代。

基本上，20世纪最初10年，各方的争宠造成华社的分裂。而这种分裂不再依循帮群意识，而是亲中和亲英的政治思潮，使得帮权政治加入一种政治与文化元素。清领事、保皇维新运动、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以及随后的中国领事、国民党活动，把帮群意识提升到族群意识的“华人”认同。因此，华社虽然分裂，却开始有一个统一的族群共识。这个族群意识的发展随华人的政治意识和效忠对象的变迁而改变。在这个历史时期，此“华人”认同属于侨居性质的“海外华人”或“华侨”认同。

虽然如此，亲中的政治思潮或政治运动基本上还是依附在帮权结构来运作。历年来的赈灾活动，包括卢沟桥事件后，全南洋华人自发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筹款活动分帮进行（参阅第十三章“四海同心义薄云天：抗日救亡运动”）。甚至民国成立后进步的新生力量如国民党在海外活动也不能和帮权结构脱钩。根据杨进发对新加坡国民党的研究，他指出“同盟会在星洲的组织原则是依据分帮制的，这分帮制大体上是为国民党分部的组织原则。比如1929年正月星华国民党有九分部，其中第一与第六分部为海南籍党员，第四、五、七、八与九分部为广府帮会员”[53]。可见，帮权

[47] Vaughan, J. 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79) (Reprint 1971), p.115.

[48]《新加坡华人史论丛》，页134。

[49]《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页73—74。

[50]《星洲上书记》（上海：庚子年，1900年）。

[51] 李元瑾，〈1900年康有为在新加坡的处境〉，载《亚洲文化》期7（1986年4月），页3—18。

[52] 颜清煌，《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1982年），页110—111。

[53] 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页48。

结构在二战前的华社是如何根深蒂固的。

另一方面，1900年8月17日，一群来自马六甲和土生土长的新加坡拓荒先驱的后裔包括陈齐贤（陈笃生曾孙）、陈若锦（陈金声孙）、佘连城（佘有进子）等，在亲英思想的影响下组织海峡英属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他们自称海峡华人或侨生、土生土长，受英文教育，立场亲英，以成为皇家华人为荣。海峡华人积极主张本土政治、教育与社会改革，他们逐渐疏离华社主流。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创立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中华总商会前身）于1906年成立是帮权政治发展的一个指标性事件，它在社会的层面将帮权结构制度化。自创立以来，它取代福建会馆成为新加坡华社的领导机构。中华商务总会是在清廷南洋事务大臣张弼士的倡导下成立的。创办之初，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由21名闽帮及31名广帮代表组成，总理与副总理规定须由闽广两帮人选轮流担任。广帮由潮、广、客、琼联合组成，其组织架构维持了19世纪两极化帮权机构的基本特征。不同的是，它提供一个正式平台、机制和管道，让各帮通过协商和调停方式解决帮际冲突，以及展开帮内及帮际之间的互动联系[54]。其组织架构强化了华社的帮权结构。各帮分配到的董事会议席由各帮属商号与个人会员秘密投票选出。董事会议事的决策过程也很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如议题牵涉到“闽商与粤商交涉，须由正副总理邀集，闽粤两帮人员各半，方得评断”。帮代表就各项议题必须先咨询所属会馆的意见，寻求帮立场的指示，然后在商会董事会议上就有关议题发言或投票。如果帮代表不照办，帮属会员会弹劾他，以及在来届的董事会选举中让他落选[55]。商会的领导层大部分是中国移民及其后裔（通称为侨民），受华文教育、讲方言、认同中国政治、中华文化价值观，他们是华文教育与帮权政治的骨干。

中华商务总会和海峡英属华人公会分别将自己定位为侨民和侨生的合法发言人。两会所扮演的角色也被殖民地政府认可。在许多官方场合，两会的正副主席都分别以侨民及侨生代表身份受邀出席并发言。总体上，在群体的层面，侨民和侨生之间鲜少互动，可是，在个人层面不乏跨帮活动的例子。侨生领袖林文庆担任中华商务总会与福建会馆理事、陈武烈为中华商务总会理事及天福宫大总理、薛中华为中华商务总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等。

帮权组织的改革运动（1927 – 1937）

辛亥革命成功，使得中国国民党在海外华人社会里声誉日隆，新加坡国民党团体被视为社会和政治改革力量。这股改革潮流冲击着帮权政治及帮权结构的发展，导致1927年至1937年新华帮权组织掀起一连串巩固与调整活动。

1927年同盟会元老及国民党要员林义顺首先发动改组由佘有进家族把持的潮帮总机构义安公司。1929年1月26日，林义顺领导开潮侨大会，议决组织潮侨八邑（潮安、澄海、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及南澳）公产维持会。9月正式成立潮州八邑会馆，推举林义顺为主席，由他率领杨赞文、李伟南、林雨岩等潮帮少壮派领袖与佘家交涉。佘家同意将义安公司资产移交给改组后的义安公司新董事会。林义顺也荣任改组后的义安公司董事会总理。

客帮早在1923年就有成立总会的意愿，

[54] 林孝胜，〈二战前新加坡华社与帮权政治〉，页3—30。
[55]《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试办章程》（1906年），页5。

相关人物

佘有进

历史事件

佘有进获得大片土地种植甘蜜和胡椒。他是新加坡首位大规模种植胡椒甘蜜者，成为甘蜜大王。胡椒甘蜜输出是新加坡的经济命脉。同年4月23日，《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创刊

但缺乏一个强势的领导牵头。这个独当一面的首领终于在1923年出现。1923年万金油大王永定客富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将公司业务基地由仰光迁来新加坡。虎豹兄弟也有意扎根于新加坡的客家社群及华社，以竖立其企业和社会领导地位。1929年8月南洋客属总会在虎豹兄弟慷慨解囊下成立了，胡文虎一跃成为新加坡及东南亚客帮领袖。

潮客帮的巩固行动促使原为松散且虚拟的联合阵营的反思，导致1930年广东会馆的成立，宣示广东省各主要帮群（广府、潮州、客家及海南）的大团结，将原虚拟的联合阵线实质化。虽然该会采取个人会员制，各帮首领都出任历届董事，但却提供各小帮一个非正式议事和交换意见的平台。广东会馆的创会会长李伟南是当时潮帮和华社领袖，他是应届潮州八邑会馆主席及1927－1929年度中华总商会会长。广东会馆也让各小帮建立交叉领导层网络，在采取联合行动方面，可成为一个压力集团。可惜，其个人会员制的组织结构弱点使它无法积极扮演团结各小帮的角色，结果它始终是帮权政治的边缘团体。

同个时期福建帮亦出现一个华社公认的领袖陈嘉庚。陈嘉庚是个社会改革者，很赞赏国民政府高效率的责任委员会制度，每个委员都有特定职责。反观帮权组织沿袭下来僵化的董事会制度，董事推诿责任，阻碍会务发展。1929年，陈嘉庚发动改组中华总商会和福建会馆，实行委员会制度。

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引发南洋华人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基本上，这场运动是在帮权架构下展开的。1937年8月15日，陈嘉庚在中华总商会主持由118个侨团派出700名代表出席的侨民大会，即席成立星华筹赈会，负责向各界筹款，接济中国难民。该会依循帮权组织的架构组织执行委员会，由31名各帮领导组成，即闽十四、潮九、广四、客二、琼一及三江一。筹款组又按帮群分设六个帮委员会。各帮筹款委员会则利用帮内的同乡、宗亲和业缘网络策划筹款机制展开筹款活动。闽、潮、客、琼及三江帮都由帮总会馆统筹。惟广帮因广东会馆非广帮实质总机构，故由广帮领袖组织的海天俱乐部主导广帮的筹款活动。翌年南洋各地的筹赈会聚集新加坡召开南洋侨民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强化了帮群意识，另外一方面也提高了侨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及民族主义精神，出现史上第一次泛南洋侨民运动。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半个东南亚沦为日本殖民地，也结束了这场泛南洋华侨的民族主义运动。

基层的帮权政治

光绪御笔之宝——“曙海祥云”匾额

普通劳工也有其根据地缘、血缘和业缘而组成的社会与经济组合。新加坡河曾经是新加坡转口贸易的命脉。每天许多驳船将停泊在岸外的货船的进口货物，运载到新加坡河岸的货仓，再把货仓输出的土产如胡椒橡胶运载到货船。自19世纪开始，闽潮邑人就垄断新加坡河的驳船业。两帮驳船主与工人都划分渡头和活动地盘，井水不犯河水。为了保护地盘和饭碗，驳船主和工人往往与会党结盟。二战前，港内驳船数量潮帮占70%，闽帮驳船多在港外。但是，二战后，形势逆转，港内闽船反而占70%。操驳运的福建人多为同安、惠安及晋江人。二战前，闽潮或不同姓氏驳船主及驳运工人之间经常为了争码头或地盘发生严重格斗事件[56]。

丹戎巴葛是福建惠安与云霄的何、张及庄姓族人聚居地，基本沿袭了华南乡村一族一村的聚居模式。三姓族人南来后就住在各姓的估俚间，及在族人引介下从事同样的行业，形成一个地缘、血缘及业缘的社会与经济结合体。三姓族人虽然多为人力车夫，但各有地盘，而且和帮会联盟以保护族人利益而格斗。由于行业矛盾与竞争还是不免

[56] *Singapore Lifeline – The River and its People* (Singapore: Oral History Dept &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6), p.76.

发生各姓族人之间冲突，何姓与张姓，何姓与庄姓族人之间分别于1909年和1936年发生严重的族斗[57]。

二战后帮权政治转型

二战后，东南亚掀起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运动，争取独立自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殖民地政府严厉管制华人到中国旅游、探亲及升学，也不准中国移民的到来。在这国际大势下，华侨正处于十字街头，有一种有家归不得的感觉，也有衣锦还乡美梦破灭的失落感。一般华人普遍对中国新政权既不了解也没信心，回去是条不归路。既然不想也不能“落叶归根”，只好调整心态作“落地生根”的打算。这是二战后华社帮权政治转型，以及华人归属感由“华侨”到“在地华人”转向的基调，最终入籍成为新加坡公民。

1950年10月政府实施回马签证新条例，将回国省亲限定两年内回来缩短到三个月。11月中华总商会召开侨团大会，议决由商会、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南洋客属总会及三江会馆组成主席团向总督抗议[58]。

中华总商会在1950年11月29日例常会议热烈讨论华侨身份和地位问题，认为华人开发新马有功却无任何权利，因此有必要鼓励更多华人登记为选民，积极参政争取华人的利益。会上议决成立一个研究华人选举权小组委员会[59]。1951年5月，商会就落实积极展开推动华人选民登记的宣传工作。同时给英国殖民部大臣呈交放宽申请公民权条件备忘录，积极争取华人公民权。1954年，政府接受林德宪制委员会建议，新立法议会中废除华、巫、印商会的议席，商会的一些重要董事不满议席之丧失，遂发起组织政党（民主党）参加1955年立法议会大选。虽然大选出师不利，20名候选人中只有两人中选，华人在居留地归属意识已取代帮群意识成为华人认同感的主导思潮。1957年10月25日，中华总商会领导的争取公民权运动终于成功。华人纷纷申请公民权成为公民，并且积极参与国家建设。

中华总商会废除董事会帮权架构

中华总商会分帮选举董事制度及会长闽广两帮轮替制是华社帮权政治最后的堡垒。自1933年以来，有些董事及舆论认为商会分帮选举制度已落伍，应与时并进，因此建议改革商会组织。1941年2月，全南洋抗战救亡运动的领袖陈嘉庚就呼吁商会废除董事会帮派选举制度。他指出：“此种制例，始于数十年前，当时因风气未开，各省侨胞之畛域观念甚深，故不得不以此方式，适应该时华侨社会之特殊情形。今则华侨文化程度，日高一日，各籍侨胞，合组商店或联合举办社会福利事业者，不胜枚举，省界观念，已渐消除，实为同侨团结之良好现象。商会为全星商人集合机关，似可不必于会董中划出帮别，亦不宜于会长不能同籍连任，凡具有担任会长能力及资望，并为当地政府所信赖者，无论何帮均得选任”[60]。

李光前，一位具有世界视野的企业家和福帮商会会长（任期1947－1948年）于1949年卸任会长后发表很有代表性的表白：“本人二年前（1947年），对董事分帮制与会长省份轮流制，曾主张加以废除，惟未获全体董事支持，

[57] 陈鸣鸾，〈丹戎巴葛华族社会结构初探〉，*Tanjong Pagar: Singapore's Cradle of Development* (Singapore:Tanjong Pagar 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1986), 页150。

[58]《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50年11月11日。

[59]《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50年11月29日；1951年5月29日。

[60]《南洋商报》，1941年2月11日，转录自杨进发，《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新加坡：南洋学会，1980年），页82—83。

故成悬案。当时，因本人身为会长，恐外人怀疑有所企图，现在时机已过，董事重提，希望大家切实研究，将会章诸多不合加以改良，以容纳更多人材”[61]。1952年，庄惠泉、郑古悦、庄丕唐、刘牡丹等15名福帮董事及会员也联函商会提出废除帮派[62]，但都遭到和陈嘉庚、李光前呼吁的同样命运，提议遭否决。1965年3月，修改过时章程，废除董事帮

中华商务总会配章（正面）

中华商务总会配章（背面）

派选举之议再起，并慎重成立小组加以研究。经过16次会议，小组主席孙炳炎于1965年12月宣布小组“对商会新会员资格一事，一致同意应予以适当的规定。但是关于帮派应否废除问题，因各委员意见不同，未能达致协议”[63]。

1959年商会修改章程有所突破，董事会一致同意废除会长选举分帮限制，惟董事分帮选举却因董事之间有不同意见而作罢[64]。

1968年应届商会会长孙炳炎和商会董事兼财政主任康振福激烈公开争辩，尤其是康振福意指帮派操纵的一句“把持分肥”[65]意气话，更使董事分帮选举制度存废问题变得更加情绪化[66]。双方的主要论点归纳如下：

分帮选举的好处及反对废除分帮选举的理由[67]：

- 因某帮人才，同帮人士较了解，外帮人士时常不了解，如废除分帮选举，会埋没人才
- 分帮选举是团结的一种方法
- 保护小帮利益，确保小帮在董事会里有代表。如废除分帮，在大帮垄断下，小帮没有代表权
- 废除分帮选举后，董事会恐会变成党派之争，造成华人社会更大分裂
- 暂时保留帮派制度，待适当时机，再议废除

分帮选举的不合理及废除的好处[68]：

- 代表比例不均：现制分七帮（福、潮、广、琼、埔、梅、三江）。其中福建一省仅划为一帮，广东一省却划为五帮（潮、广、琼、埔、梅）。三江一帮则包括闽粤两省以外之所有省份。以此划分，有欠公平
- 帮派存在更容易造成某帮为某些人完全操控的现象，埋没人材
- 废除分帮选举能使董事会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 能选贤任人
- 分帮选举，畛域界限分明，封建观念浓厚，破坏团结，分散力量
- 狭隘的帮派主义落伍，妨碍社会进步

当商会于1965年及1968年争论帮派选举存废问题时，表态的部分各帮董事如下[69]：

主张暂时保留帮派选举

- 闽帮：黄祖耀、黄望青、庄卓岩、孙炳炎、庄为麟、吴浦云、蔡和安、庄奎章、何葆仁
- 广帮：梁庆经、林士超、郭佩弦
- 潮帮：连瀛洲、张良材、周镇豪、陈展翼、陈善良、陈立健、林继民、张衍德、刘木荣
- 客帮（大埔）：蓝天
- 琼帮：符致逢
- 三江帮：邵维铭、汤景贤

---

[61]《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新加坡：国际时报，1969年），页12。
[62]《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页12—13。
[63]《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页16。
[64]《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页13—14。
[65]《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页133—141。
[66]《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页50—52。
[67]《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页88—95。
[68]《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页54—55；74—75；77。
[69]《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页61—123。

主张废除帮派选举

- 闽帮：康振福、庄惠泉、徐雪阶、刘建华、周毅民
- 客帮（大埔）：黄祝秋

纵观上述表态的部分，各帮董事显示帮派选举存废立场在20世纪60年代已和个人帮属无关联，主张保留帮派选举及废除帮派选举制度者的帮属都有交叉现象。但主流意见是因时机未成熟，帮派选举制度暂于保留。

一直到1990年代废除之议再起。经历20余年时间，新加坡经济历经转口贸易、人工密集的工业化政策，今已转型到外销导向的高科技高资本的工业化政策。因此，呼吁商会打开门户吸引各重要领域如金融、资讯、工业、服务业及科技的专业人士、企业人才入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分帮选举制度成为他们入会的绊脚石。1990年代，移民一代的商会董事大半已荣休成为名誉会长或名誉董事或已去世，废除这过时的分帮选举制度时机既已成熟，且是当务之急。

1993年新任会长是丰隆集团执行董事的郭令裕，年仅39岁，受英文教育，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企业精英，无分帮选举制度的包袱。他于该年3月15日就职典礼上致词说，早期的分帮制度有其历史背景，但是这种帮派观念已时过境迁，独立后的新加坡提倡国民意识，目前各界努力向海外发展以维持经济增长，国人应不分种族携手合作，华族之间的真诚团结更为重要。商会会员如无法打破帮派隔阂，就会削弱实力，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形容分帮选举制度是历史包袱，使得许多年轻人才裹足不前[70]。他即席宣布新董事会计划在半年内修改章程，废除董事分帮选举制度。

1993年8月7日章程修改工作完成，包括废除分帮选举制度，由分四个阶段选举取代。8月21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380名会员出席大会，377票赞成修改章程，2票反对，大会以99.5%的绝大多数票通过[71]。自1906年至1993年长达近87年历史的中华总商会的帮权结构及帮权政治从此走入历史。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

1959年新加坡自治，1965年独立，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多元文化与多元种族的民主国家，大力培养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帮群及族群意识也自然而然相对地淡化了。政府设立各种部门负责国民的教育、社会福利、就业、医药及住屋问题。政府也设立了人民协会和民众联络所为民众提供休闲活动，以及作为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因此，这些措施大大地削弱了宗乡会馆的社会与教育功能。同时，会馆也面对会员老化和后继无人的危机。日渐成长的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多受英文教育，缺乏乡土观念，对会馆活动不感兴趣。到了1980年代初，各帮会馆领导都意识到危机的严峻，大家很快就取得共识，认为在迅速改变中的社会，会馆必须与时并进进行改革。

1984年12月2日，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南洋客属总会、广东会馆、琼州（今海南）会馆、福州会馆、三江会馆、晋江会馆及惠安会馆联办“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探讨会馆如何在新的时代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研讨会总结建议会馆必须开放门户、自我更新培养接班人，以及成立全国宗乡会馆联合总会[72]。宗乡总会终于在1985年底注册获准。1986年1月27日隆重举行成立大典。七大会馆（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南洋客属总会、广东会馆、海南会馆、三江会馆及福

[70]《放眼四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90周年纪念特刊》（1996年），页129。

[71] 同上注。

[72]《总会20年》（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05年），页19—20。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福建南安人创设凤山寺，初期建立在丹戎巴葛青山亭，1906年迁至摩哈末苏丹路

1984年12月2日，在“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上倡议成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州会馆）成为发起会员。成立之初，有104个会员。2015年，会员增加到220个。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创立取代了中华总商会在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的地位。宗乡总会的成立也结束了华社帮群意识主导的帮权政治，取而代之的是在国家意识主导下肩负起传承文化和传统的使命，积极协调宗乡会馆的关系。通过春到河畔、文娱活动、展览及出版物推广和发扬华族传统文化，成立文史资料中心，收集华社与宗乡会馆资料，以及办幼儿园教导学前儿童学母语和认识华族传统价值观[73]。最近更开放让新移民社团加入，扩大会馆的队伍，并且配合政府的政策在协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扮演积极的角色。

[73] 柯木林，〈而今迈步从头越：跨世纪的宗乡总会〉，载《总会十年》（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5年），页37—39。

第二节　闽帮精神
——从恒山亭到福建会馆

摘要

新加坡福建帮组织总机构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1915年以前为神权和帮权合一的年代，帮权依附在神庙的组织里，先是管理福建公冢的恒山亭与较后的天福宫妈祖庙。第二个阶段为帮权神权分立，由天福宫福建会馆于1915年为殖民地政府豁免注册开始，帮权和神权就逐步分离，导致天福宫反而成为福建会馆的附属宗教单位。第三阶段是二战后，在两位前任主席陈六使和黄祖耀及现任主席蔡天宝的领导下，福建会馆与时并进走向组织现代化。

Abstract

There were broadly three ph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kkien Huay Kuan in Singapore. Prior to 1915, the Hokkiens built the Heng San Teng Temple and later the Thian Hock Kheng Temple, which served as their ethnic power bases. It was a phase of unity of the religious and "bang" authority, whereby the latter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religious or temple entity. In the second phase, the "bang" authority was separated from the temple setup. This phase began with Thian Hock Kheng Hokkien Huay Kuan's exemption from official registration in 1915.The temple has since then become an affiliated religious unit or the clan association. During the third phase (in the post-war years), the Hokkien Huay Kuan has been modernised and corporatised.

林孝胜 (Lim How Seng)

福建社群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尤以闽南地区的邑人最早移民南洋，因此，新加坡的福建社群是以操厦门语系的漳州、泉州、永春及厦门邑人为主体，俗称闽南人。其他来自闽东、闽中与闽西的福建社群如福州、福清、莆田、龙岩、永定等邑人南来较迟。

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

早期南洋的闽南人与侨领

泉州是唐宋时繁盛的古商道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许多闽商代表的漳泉商人在南宋（1127-1279），乘搭商船从泉州出发，航向南洋群岛进行贸易活动。明初的海禁、官方外贸及朝贡贸易政策导致闽商纷纷向海外发展。明朝覆亡，一批不甘异族统治的闽南人逃亡南洋。这些历史大事促使闽商与闽南人滞留南洋。

明初郑和从1405年至1433年七下西洋，他在南洋群岛的爪哇、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发现数个广东、福建人聚落或社区。华人聚落主要分布在爪哇的满者伯夷（Majapahit）、杜板（Tuban）、新村（Gresik，革拉昔，又名锦石），苏鲁马益（Surabaya，泗水），苏门答腊的旧港（Palembang），以及加里曼丹的三发（Sambas）。而其中满者伯夷、杜板和旧港有闽南人居住，郑和的通译马欢记载了其目击报告如下：

满者伯夷：“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1]。

“杜板番名赌斑，地名也。此处约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2]。

旧港“国人多是广东漳泉人逃居此地”[3]。

1644年明朝被满洲人推翻，促使一批忠于明朝的义士逃往东南亚避难。不少避难义士如马六甲第二任甲必丹（Kapitan）李为经，就来到马六甲定居。李为经，厦门人，马六甲青云亭内立于1685年的《李为经颂德碑》，称他因明朝覆亡而“航海而南行，悬车此国”[4]。这些有志之士为马六甲华社注入新动力，为青云亭的创立埋下伏笔和铺设道路。17世纪初，在马六甲的葡萄牙籍宇宙志（Cosmography）学者易利迪亚（Emanuel Godinho de Eredia），在其著作中描述中国村的居民主要是来自福建的漳泉人。书中附有地图出现“漳州门”及“中国渠”的地标[5]。

配合种族隔离政策，葡荷殖民地政府以分而治之的方法，在各族群中选贤能者委为侨长，称为甲必丹，给予职权负责治理族群内的事物（包括诉讼）。这个甲必丹制度直到1825年才被英国殖民地政府废除。华人甲必丹的治所，就设在由第一和第二任华人甲必丹的郑芳扬与李为经于1673年所创建的青云亭内。

叶华芬、日本汉学家日比野丈夫及新加坡学者庄钦永，利用田野调查、碑铭和档案资料，初步整理出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谱系，各甲必丹的籍贯和生死年亦大致理清出来。令我们惊奇的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已知的11名马六甲的华人甲必丹，清一色由闽南人担任。其中确定为泉州同

[1] 马欢，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年），页11。

[2] 《瀛涯胜览校注》，页8。

[3] 《瀛涯胜览校注》，页16。

[4] 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中文学会学报》期10（新加坡：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1969年），页10。

[5] *Eredia's Description of Malacca, Meridional India, and Cathay, translated from Portuguese with notes by J.V. Mills*（Singapor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0）；张礼千，《马六甲史》（新加坡：郑成快先生纪念委员会，1941年），页329。

安厦门人的有四位，即李为经（第二任）、李正壕（第三任）、曾其禄（第四任）及陈承阳（第六任）。确定为漳州人的是郑芳扬（第一任，龙溪县）与蔡士章（第八任，海澄县）；另五位只知祖籍漳泉，乡县不详，他们是曾宪魁（第五任）、曾有亮（第九任）、曾世芳（第十任）以及曾乌霖（第十一任）[6]。

英殖民地政府于1825年废除甲必丹制度，马六甲华社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侨长地位。1915年亭主制度也被取消。历任亭主也都是闽南人：梁美吉（泉州南安，薛佛记妹夫）、薛佛记（漳州漳浦）、陈金声（永春）、陈明水（陈金声之子）、陈明岩（陈明水之弟）及陈若淮（陈明水之子）。

有些甲必丹的后裔如蔡士章的儿子蔡沧浪，及梁美吉之外的历任亭主都在1820年代初来新加坡发展，成为新加坡的华社的先驱人物与领导，把19世纪新呷两地的华社牢牢地拴在一起，两地华人关系密切。

福建帮权力中心结社演变三大阶段

新加坡福建帮组织总机构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1915年以前为神权和帮权合一的年代，帮权依附在神庙的组织里，先是管理福建公冢的恒山亭与较后的天福宫妈祖庙。第二个阶段为帮权神权分立，由天福宫福建会馆于1915年为殖民地政府豁免注册开始，帮权和神权就逐步分离，导致天福宫反而成为福建会馆的附属宗教单位。第三阶段是二战后，在两位前任主席陈六使和黄祖耀及现任主席蔡天宝的领导下，福建会馆与时并进走向组织现代化。

恒山亭：福建帮“神权与帮权”合一的起点

开埠初期，莱佛士将新加坡辟为自由港，及其重商政策的划时代之举，立即吸引了各国贸易商争先恐后地从重税区域如荷属东印度、马来土邦、廖内群岛及中南半岛，转移到新兴的新加坡市场。这批贸易商人包括来自马六甲和厦门的漳泉闽商。中国帆船早在开埠不久就到来进行贸易了，尤其是来自厦门的闽商商队备受重视。莱佛士在其市区发展蓝图里，特地在欧人区附近拨一地段供厦门商队旅新时居住。

马六甲的闽商约在1823年开始移入，到了1826年已是一个资力雄厚的集团。1826年4月的新加坡地政局的档案显示，马六甲闽商在商业区的马六甲街和直落亚逸街拥有22个地段，包括陈送五个地段、薛佛记四个、蔡沧浪、龚光传和杨金水各有一地段。

第二年，出现的漳泉新贵地主有陈笃生、杨佛应、杨清海及陈有郎等[7]。他们备受政府当局的欢迎和重视。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在1824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说，新加坡华人分马交（Macao，广东人）和福建人。后者最受人敬重与安居乐业，所有商人及大部分种植人都是福建人[8]。

其实，闽南人早在1822年就开始领导华社。新加坡开埠初期警备人员不足，莱佛士命令驻扎官委任各族甲必丹协助治理族群事务，当局曾委任仅有的两名华人甲必丹。第一位King An，籍贯和中文名都不详。

[6] Yeh Hua Fen, *The Chinese of Malacca* (Malacca: Malacca Historical Society, 1936)；日比野丈夫，〈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载《东南亚研究》卷6期4（1969年3月），页88-10；日比野丈夫，〈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补遗二则〉，载《东南亚研究》卷9期1（1971年6月），页58-60；庄钦永，《新甲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邦权政治〉，《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页28-62；C. 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Dewan Bahasa dan Kebudayaan Kebangsaan, 1963), pp.1-8, 27-38.

[7]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25-26；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22。

[8] C. B. Buckley,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 p.154.

相关人物

徐钦元　苏源泉

历史事件

2 月 20 日

新加坡商会（Singapore Chamber of Commerce）成立，首届理事会有两名华商，徐钦元和苏源泉。1860 年起不再接受华商，成为纯粹的西商会

第二位是漳州人陈浩盛（Tan How Sing，Changchow，the Chinese Kapitan）[9]。他早于莱佛士登陆前已居住在新加坡，可能是从廖内过来的。除了协助政府征收赌税外[10]，陈浩盛还是中介商与工程承包商，也拥有四块地段。身为华人甲必丹的陈浩盛是市区发展委员会的华人代表。1822年12月，又联名百余户吻基（Boat Quay，今作驳船码头）华人居民为逼迁事向当局呈递陈情书[11]。1823年6月30日，又联名其他闽商陈送、高福元、陈集成、蔡沧浪、李映及欧商巴米士（John Purvis）、李德（C. R. Read）等呈请愿书，抗议政府征用他们的地皮以便兴建码头，过后不久去世。

座落在甘榜峇鲁区（Kampong Baru）石叻路（Silat Road）的恒山亭是福建帮最早成立的帮权组织，专司管理福建帮公冢。新加坡福建帮的结社模式有别于广客两帮群。广客两帮由于遭到逼迁的教训分别在1822年和1823年成立宁阳会馆和应和会馆，以保护帮群的利益。福建帮是受政府青睐的帮群，没有危机感，因此较注重同乡百年后有个入土为安和让后人有个祭祀先人的场所的事务。恒山亭公冢应在1827年之前已存在。因为1827年5月20日福建帮以陈送为首呈函给驻扎官请政府制止注辇人（Cholas，印度）在福建公冢挖土，联名的还有颜栋、林全、张亚满、杨皂及蔡鸭[12]。恒山亭庙舍于1830年建成，并立碑纪念。

《恒山亭碑》[13]是华人移民史重要的篇章，它道出番客的梦和客死他乡的悲哀。碑文大意如下：新加坡山明水秀，商业发达，商贾齐集。但是过去先辈过番流寓异国既无奈又可悲，他们不知何日是归期。如活着终有衣锦还乡的一天，一旦不幸客死他乡则就地埋葬，入土为安。漳泉邑人眼见恒山到处是坟墓，由于家人都远在家乡，常年无人吊祭，荒凉孤坟。于是，同乡发起捐资建恒山亭，以备每年祭祀，聊表慎终追远心意。

开埠初期新华社会最高领导机构——恒山亭

恒山亭的正神座供奉主神福德正神，俗称大伯公或土地公，管理土地之神明，民间以其造福乡里，福泽万民，所以尊称为福德正神。左神座为城隍爷，是地方的守护神。右神座为注生娘娘，或称送子娘娘，专司妇女生育。华人的民间信仰相信佛家轮回转世说，人的去世只是劳碌今生的结束，却是投胎转世的开始。因此恒山亭设注生娘娘神座协助逝世祖先早日轮回转世。

恒山亭是以薛佛记为首的五位大董事（薛佛记、陈送、高福元、瑞茂号及振元号）及五位总理（高修词、王猜老、周正春、陈篆及张续）组成的理事会管理闽帮公冢。基于闽帮是华社的龙头大哥，这10人理事会实际上也就成为新华社会的领导。而薛佛记（1793-1847）又居大董事之首，成为闽帮和华社最高侨领。他又名薛文舟，为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祖籍福建省漳浦县东山上营。生死都在马六甲。从小随父学习经商，经营锡矿业。新加坡开埠不久，薛佛记到新加坡经商致富。他也是天福宫创建时的大董事之一。46岁时，薛佛记回到马六甲，荣任青云亭亭主，成为马六甲华人社会的最高首领[14]。

---

[9] 庄钦永，《新呷华人史新论》（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页39。

[10] 庄钦永，〈陈浩盛－新加坡第一位甲必丹〉，载《联合早报》，1985年7月6日。庄钦永后来考证陈浩盛是第二位甲必丹。

[11] 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15-18。

[12]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 (SSR)*, A68, pp.9-11.

[13] 碑文如下："夫叻州者包络山川，控引武垄，商贾于兹千仓万箱，是皆地之钟灵，水之毓秀者也，爰有人众之盛如此。然而托足异国昔人所悲，犹未旋返莫可以期，存则荣归。没则旅瘞，眼见恒山之左，叠叠佳城，垒垒丘墟，或家乡远阻，吊祭不至；或单形只影，精魄何依；饮露餐风，诚无已时，每值禁烟令节，一滴之到夫谁，与主令不胜感慨系之矣。是以会同人劾文正公之妙举，建亭于恒山之麓，以备逐年祭祀，少表寸诚，今将芳名共列于左，以垂不朽，为之序云尔"。「恒山亭碑」（1830），见陈育崧、陈荆和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页221-222。

[14] 柯木林对薛佛记家族研究有年，有关薛佛记及其家族事迹，见柯木林，〈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柯木林、林孝胜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页103-113；柯木林，〈薛氏家族·《叻报》·闽帮文化〉，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年），页318-327。

位居第二位的大董事陈送（1762-1835），祖籍福建省却在广州出生，19岁到廖内谋生，38岁移居槟城，10年后到马六甲。新加坡开埠不久来到新加坡谋发展，投资地产致富，富甲一方，在华社具有巨大影响力。但由于和会党有密切关系，故在福建帮社群里的地位只好屈居在薛佛记之下了[15]。

恒山亭的建筑费由99位漳泉善士仁翁（大部分是来新发展的马六甲漳泉商人）合捐5200西班牙元。其中三位大董事薛佛记捐764元，陈送500元及高福元300元，加上蔡沧浪400元，合计1964元，占了全部捐款的37%。捐款人中还包括10年后领导兴建闽帮第二指标帮权组织天福宫的陈卓生（又名陈笃生，捐80元）和龚光传（捐200元）[16]。

1836年，恒山亭订立规约，建立严格管理制度。恒山亭的常年运作由当任炉主主管。他要监督每年清明节和中秋节的祭祀活动，以及七月中元节举行普渡。炉主每年清明节在福德正神神座前掷筊选出新炉主，并进行新旧炉主移交手续。恒山亭有常驻和尚负责亭内外的日常运作，包括早晚巡视公冢坟墓，每月初一十五还得到市区化缘。规约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恒山亭内外赌博、卖鸦片。恒山亭公冢起初只让过世的漳泉人入葬，后来才开放给所有闽南人如永春邑人。恒山亭香资除和尚化缘外，还规定唐船漳泉人船主每只收香油钱宋银四元，暹罗船、安南船及各地船只的漳泉人船主无论大小每只收香资宋元二元。新加坡船每年捐资一次。如有船主不遵守规约，若遇船中头目、伙计身故，一概不准下葬在恒山亭公冢[17]。

10年后，恒山亭墓地已满，薛佛记及恒山亭董事议决于1846年11月30日开辟新冢，扩大管理范围。新冢山地名柑仔园，连同旧冢山，构成当年著名的福建坟山。《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1846年）说得很清楚，新冢山的管理制度，“务依旧冢规则”，也就是遵从10年前《恒山亭重议规约》中的决定，不过也有新的规定；“凡有葬新冢山，定限每穴贰丈贰尺四方为度，不得多占公司之地”，明确规定了墓穴的面积与形状[18]。1879年，薛佛记四子薛茂元重修恒山亭[19]。

天福宫创立与会馆关系

天福宫虽然于1840年落成，但却在10年后才立碑纪念其事[20]。《建立天福宫碑记》开宗明义点出天福宫兼具会馆功能：“复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21]。天福宫至今仍旧保留一方志明“会馆”的木匾[22]。这是神权和帮权结合的最佳案

[15] 陈育崧，〈绪言〉，陈荆和、陈育崧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0年），页7；*Singapore Free Press*, 1836.07.14.

[16]《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221-234。

[17] 见〈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1836年），《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224-225；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联合早报星期刊》，1992年5月31日与6月7日。

[18]〈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1846年），《新加文碑坡华铭集录》，页225-226；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联合早报星期刊》，1992年5月31日与6月7日。叶钟铃，〈恒山亭：新加坡福建帮最早的总机构〉，林纬毅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年），页8。

[19] 有关1846年后恒山亭公冢的发展，见叶钟铃，〈恒山亭：新加坡福建帮最早的总机构〉，林纬毅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页1-14。

[20]〈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57-58。

[21] 同上注。

[22] 吕世聪，〈天佑福地：从碑铭回顾天福宫的创建历程〉，《南海明珠天福宫》（新加坡：福建会馆，2010年），页220；林源福，〈战前的天福宫与闽帮社会〉，《南海明珠天福宫》，页370。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停刊

早期的福建会馆匾额

例[23]。有趣的是，学者们似乎没有深究“会馆议事之所”这句话的符号含义。

笔者于2004年撰写《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24]一书时也只是理所当然地一笔带过说：“殿之后为寝堂祀观音大士，也是当时会馆开会议事的地方”[25]。当时的宏观认知是既然天福宫继承恒山亭为闽帮总机构，董事们聚集在天福宫议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也就没微观地对“会馆”一词多着墨。吕世聪在其〈天佑福地：从碑铭回顾天福宫的创建历程〉一文中对“……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有新的诠释和认知，他说：“易言之，当天福宫于1840年落成之时，（福建）会馆亦同时在相辅相成地行使其义务、造福于社会”[26]。其意为福建会馆与天福宫同时建立。其实，早在1977年，杨进发也有此共识，他认为“福建会馆的历史可溯源于1839年前后是正确的”[27]。但他说“福建会馆一名是否出自1850年前后，这倒是值得讨论的问题”[28]。他认为福建会馆一名乃始于1915年，因为该年天福宫董事会以“天福宫福建会馆”之名向政府申请豁免注册，并获得批准[29]。换句话说，天福宫成立之时就具有会馆之实，但尚未正名为“福建会馆”。因此，冠以“天福宫—（福建）会馆时期”来概述天福宫由1840年至1915年的历史。

天福宫—（福建）会馆时期

1840年，闽南人在直落亚逸街建天福宫。天福宫的建立把福建帮群带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华社一起指标性事件。

恒山亭于1846年开辟新公冢，显示定居的闽南人口增加不少。从1821年初第一艘泉州帆船自厦门抵达新加坡后，漳泉邑人就源源不绝地来新加坡闯天下。另一方面，南来的漳泉邑人多为单身劳工，抵达后就投靠同乡同宗族人的估俚间，大宗小姓都有各自的估俚间[30]，单身劳工的工作及生活都以估俚间为中心。估俚间之间按行业及乡族关系划分界限，由于行业利益或乡族矛盾，估俚间之间常发生冲突。一旦发生争执甚至武斗就造成社会问题，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社会机制来作仲裁[31]。

基本上，上述漳泉人口增加及邑人之间的社会问题，对来自马六甲的福建帮侨领并不陌生，和甲必丹所处理的问题大同小异。但他们发现治理坟山的恒山亭，已不适合处理日渐复杂的社会事务与问题，包括民间信仰，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来处理活生生的帮群事务[32]。为因应这个时代需求，天福宫也就于1840年诞生了，并且很高调地以万人空巷的迎神赛会的方式，正式向新加坡各界宣布福建帮天福宫的诞生。

1839年天福宫开始兴建，1840年初大部分完成。在福建订做的主神妈祖金身于1840年4月20日由妈祖家乡兴化府湄洲湾运到，当时特别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迎接天妃娘娘入庙。1840年4月23日的《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报导了此空前盛况：

在过去几天，坡中锣鼓喧天，华人都涌到街上，举行喧闹的迎神赛会，热烈迎接从天朝运来的女神像。

---

[23] 徐李颖，〈在国家与社群之间：新加坡华人庙宇社会功能的转换—以天福宫为例〉，林纬毅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年），页18。

[24] 林孝胜，《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新加坡：福建会馆，2005年），页30。

[25] 同上注，页27。

[26] 吕世聪，〈天佑福地：从碑铭回顾天福宫的创建历程〉，《南海明珠天福宫》，页220。

[27] 杨进发，〈战前新加坡的福建会馆〉，《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页14。

[28] 同上注；页15。

[29] 同上注；林源福，〈战前的天福宫与闽帮社会〉，《南海明珠天福宫》，页370。

[30] 彭松涛辑，〈晋江人在新加坡〉，《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1918年-1978年》，页639。

[31] 《星洲惠安公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923年—1974年》，页65-66。

[32] 陈育崧，〈绪言〉，《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9。

但是，星期一（4月20日）的迎神赛会真的值得一看，这一回的迎神行列，长达三分之一里，可说锣鼓震天，彩旗蔽日，而最精彩的还是那些彩女，都是五到八岁的小姑娘，一队队出现于行列中扎彩的花车上，穿的是满汉衣服。这些小孩双足踏在铁杆上，铁杆被掩藏在衣服下面。她们服饰艳丽，又多笑脸迎人，有许多锦伞为她们遮盖炎阳。

天上圣母的神像安放在一顶极为华丽、杏黄绸纱的彩轿上，由一队穿着杏花短上衣的天神掩护着。我们虽然还没确定此女神的各种特性，但是人们对此神非常敬仰。在坡中建立了一座很华丽并且富有中国风味的庙宇来迎接她。

她被尊称为天上圣母（或妈祖婆），她是航海的保护神，被中国海员奉为海上女神，每艘出海的帆船都安置有天妃的神坛。

这一回的迎神赛会，被视为是向岛上华人正式宣布天上圣母已驾临新加坡。全部迎神费用，共达六千元之钜。[33]

天福宫很快就成为一个地标，取名天福宫意即“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因此天福宫也成为千千万万乘坐帆船南来的各籍贯人士，当他们乘风破浪，经过惊险的七洲洋，安抵新加坡后，甫上岸即刻到天福宫拜妈祖，感谢海神一路保佑之神恩。

天福宫是当时华社最宏伟的庙宇，具有传统中国宫殿建筑风格，所有建材来自中国。兴建之初，天福宫以中殿为主殿，祀妈祖，其在中国订做的金身就供奉在这里。两旁为辅助神千里眼和顺风耳。中殿之东堂祀关圣帝，西堂祀保生大帝，殿之后为寝堂祀观音大士。全部建筑费约三万七千余西班牙银元，费用全由新加坡和南洋闽籍殷商及漳泉船主乐捐。两位大董事陈笃生与薛佛记捐款最多，分别捐3074元和2400元。

天福宫创始董事会由三名大董事和九名大总理组成。陈笃生为大董事之首，另两名大董事是薛佛记和龚光传。九名大总理为：梁讚源、周柏梅、苏源泉、曾青山、蔡光禾、陈坤水、周陶、谢宝荣及陈楚。除了龚光传来自槟城外，其余都来自马六甲。他们都是富商。这批福建帮的新领导，在面对新客带来的新问题及新挑战的情况下，将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为同乡和华社服务。

《建立天福宫碑记》中都以“唐人”自居，如“我唐人食德思报”、“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显示福建帮领导层一贯的超帮视野，并成为福建帮领导层的行为准则。天福宫成为19世纪新加坡福建帮的权力中心，这和福建帮在19世纪华社帮际关系中鲜有互动，所表现的冷漠形象落差很大[34]。

陈笃生祖孙三代主政天福宫

陈笃生、陈金钟及陈武烈祖孙三代从1840年至1915年相继成为天福宫大董事，领导福建帮和华社75年，延续了薛佛记执掌恒山亭时立下的领导层世袭的传统。陈育崧在神权和帮权之外再加上一个绅权。他指出庙创办人可凭借神权建立绅权进而领导一帮，促使帮权合法化[35]。陈笃

早期的福建会馆附属在天福宫内

[33] *Singapore Free Press*, 1840.0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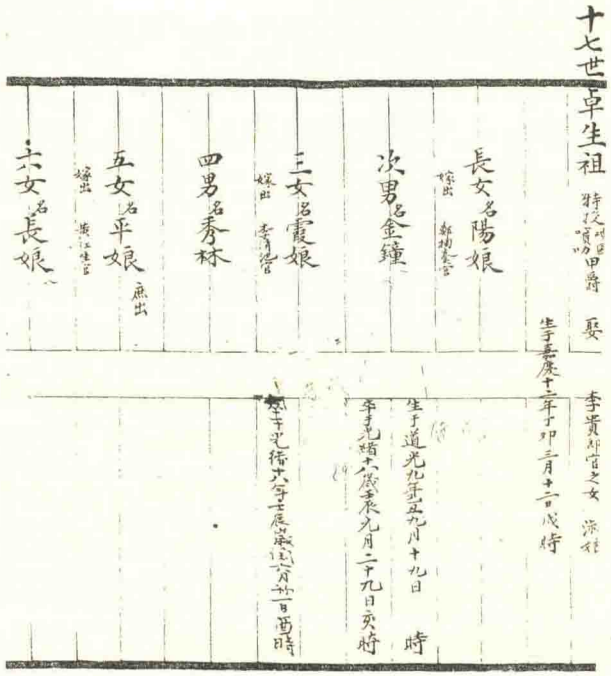
[34] 见上文林孝胜，〈帮权结构与帮权政治〉。

[35] 陈育崧，〈序〉，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页ii。

生祖孙主政天福宫时期正是神权、绅权、帮权紧密结合的写照。

陈笃生（1807－1850），原名陈卓生，祖籍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仓头村尤墩社），马六甲土生土长（长期以来，学者根据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说陈笃生出生于“1798年”[36]。今查《海澄峨山陈氏家谱》记载：“十七世卓生祖，特权英国实叻甲爵，生于嘉庆十二年丁卯三月十二日戌时”[37]。嘉庆十二年是公元“1807年”。因此，陈笃生是生于1807年，而非1798年，去世时是43岁）。新加坡开埠后不久来新，在驳运码头开商行，进而与一英商合作经营生意及投资房地产致富。他对华人传统民间信仰有很强烈的认同感。虽然他父亲陈月中对教会并不排斥，曾捐题一元给马六甲教会办的中华济困疾会，但陈笃生对教会非但保持保留态度，还施压阻止别人信教。有一次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找他传教，谈了两小时，但陈笃生还是坚决反对基督教信仰[38]。因此，由于对传统民间信仰的强烈信念，促使他于1839年捐地建全新最宏伟的华人庙宇天福宫，作为福建帮和华社总机构。大董事和大总理起初在后殿议事，后移至较宽阔的画一轩。1844年，鉴于许多贫穷华工生病求医无门，他毅然创建陈笃生贫民医院。英殖民地政府非常器重他的仁风善举，奉他为华社首领，并封他为太平局绅，陈笃生是华社受封的第一人。

同样来自马六甲经营出入口生意致富的陈金声（1805－1864），原被殖民地政府公认为继承陈笃生在华社领导的地位，却因祖籍永春的关系，而无法进入漳泉集团控制的福建帮总机构天福宫的核心权力中心，转而热心兴学在天福宫右翼创办崇文阁及位于厦门街的萃英书院。陈金声也热心公共事业，捐巨资协助政府改善新加坡自来水的供应。他积极支持陈笃生贫民医院的管理，并担任董事，也捐资建筑天福宫。



根据《海澄峨山陈氏家谱》的记载，天福宫大董事陈笃生原名陈卓生

陈笃生去世后，其子陈金钟（1829－1892）继承父业以及福建帮与华社的侨领地位，包括天福宫大董事职位。陈金钟在马六甲出生，幼受英文教育。他所创设的振成公司在暹罗和安南设立碾米厂，是新加坡最大米商。陈金钟在暹罗米业务庞大，深受暹罗皇室和政府重视，被委任为暹罗驻新加坡总领事。当曼谷在1982年庆祝开埠200周年时，出版一套丛书表扬对曼谷开埠有功人士，其中一本专号人物就是陈金钟[39]。日本封他三等勋章，他也向清廷购买道台衔。陈金钟是华社公认的侨长，被尊称为“甲政”（即甲必丹），1892年2月去世，墓碑上也冠上“甲必丹”头衔。

陈金钟居天福宫三大董事之首，由另两名大董事邱正忠和蔡绵溪辅佐处理天福宫与会馆事务。三人合作无间，为福建帮与华社谋福利。天福宫虽然是崇奉道教神祇为主的庙宇，但早期，天福宫也有住持僧人管理香火等庙务。1850年，陈金钟独捐1700余元，在天福宫面海低地筑堤

[36]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p. 66；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页55。

[37]《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陈氏族谱》，页27。该族谱记载陈笃生的家世渊源如下：“始祖惠公传世（自泉州府）迁移漳州府建南院分支海澄县……我本原正过田御史世祖后裔，迁移许坑，又移苍头23保后许社传十三世国华祖立业……十六世月中传十七世长名孟郎、次名有郎、三名卓生……”。该族谱为十八世水源于同治十年（1871年）依原谱修刊。后续修至二十世武烈。

[38] 庄钦永，《新呷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页75。

[39] 1990年代中，一名任教于朱拉隆功大学的陈金钟后裔（陈金钟之暹罗夫人谱系）来新寻根，笔者带他到陈金钟墓凭吊，临别获其赠《陈金钟专号》一册。

岸，以防涨潮时危及庙产。任内，他也在庙前空地盖戏台，修补庙的建筑物。1860年后，他以天福宫作为治理福建帮及华社事务的场所。福建人结婚都到天福宫注册，由陈金钟在结婚证书上盖章[40]。1881年，在清廷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的鼓励和支持下，陈金钟创设一个天福宫属下的民间宣教团体乐善社，“宣讲圣谕为宗旨的慈善团体，宣扬儒家纲常名理，移风易俗，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41]。殖民地政府封他为太平局绅及委任他为多个委员会委员，他也曾协助政府调停多起闽粤两帮械斗事件。1854年陈金钟扩建陈笃生医院的两翼病室及改进院务。

由于陈金钟的长子早逝，二子陈纯道也不幸于1891年病逝，当陈金钟1892年去世时，其长孙陈武烈（纯道长子）才18岁，天福宫及会馆的事务暂由另外两名大董事邱正忠和蔡绵溪治理[42]。邱正忠，福建省漳州海澄人，开设恒春号。热心公益，在家乡置义田、兴宗祠、办教育，在新加坡积极参与恒山亭、天福宫、乐善社、同济医院事务。蔡绵溪，祖籍福建省漳州海澄，马六甲出生，在厦门街开设芳吉号。两人辅佐陈金钟治理天福宫30余年。他们执掌天福宫期间（1892-1897），已年迈（邱正忠72岁，蔡绵溪60岁），所以其主要任务是维持天福宫的正常操作[43]。

邱正忠于1896年6月过世，因此寻求新领导成为燃眉之急。天福宫董事遂于1897年3月15日在《叻报》登报宣布天福宫订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1897年3月17日）11点钟举行公议，“系俾众检阅恒春交来公项，并再申举新填董事”[44]。会议如期在天福宫画一轩举行，由董事蔡绵溪与代理董事吴新科主持。吴新科推举陈金钟孙陈武烈（时年23岁）为新董事，颜永成附议，会议通过。会议也议决选李清渊为新董事，蔡绵溪留任董事。可是4月1日复选正董事（即董事或称大董事之首）时，不料蔡绵溪婉拒留任，于是另订4月10日举行高规格的闽商选举大会。

出席的闽商非常踊跃，有百余人，由著名侨领颜永成主持，以投筒之法先选出替补董事和后选正董事。主席拿出一个铁盒，内分三格，各开一孔，孔旁贴候选董事名：邱新再、林和坂与吴寿珍。主席分发红豆给出席者，每人一粒，以便投入给心仪的候选人。有48人参与投筒，投选结果，邱新再得19粒最多被选为新董事。接着依法在陈武烈、李清渊及邱新再三人中选正副董事。有63人投筒，陈武烈得47粒中选为天福宫正大董事，另二人为副大董事[45]。天福宫遂进入陈武烈主政时代。陈武烈是陈笃生曾孙，毕业于莱佛士书院，新加坡女校创始人之一，曾任陈笃生医院管委会委员多年。

天福宫的宗教活动

陈笃生祖孙三代主政时期，天福宫重大的活动以宗教活动著称，包括：

妇女烧夜香习俗

每年农历元月十六、十七两晚，天福宫只准妇女进庙烧夜香膜拜。宫外有巡差把守。“妇女烧香毕，多命马车往抛球场等处，一则藉以玩月而览其景色，一则可联闺友而叙，

[40] Vaughan, J. D.,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79), p.26 (Reprinted by OUP, 1971).

[41] 李勇，〈天福宫的领导层、组织与功能（1840—1915）〉，载《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卷2期2（2010年12月），页16-18。

[42] 同上注，页6-7。

[43] 同上注。

[44] 《叻报》，1897年3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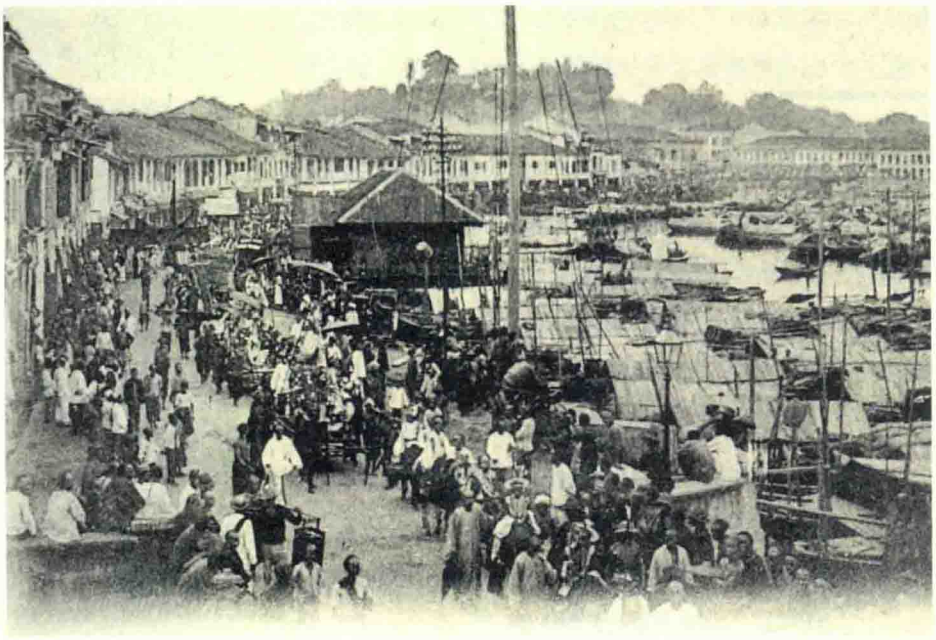
[45] 《叻报》，1897年4月13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5 月

第一艘新加坡建造的轮船举行下水礼



天福宫的迎神赛会

乃闲情也。是以历年于此两夜，抛球场等处均无男子之踪”[46]。

中元普渡与抢祭风俗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俗称“鬼节”。佛教强调孝道；道教则着重于为那些从阴间放出来的无主孤魂做“普渡”。天福宫设立福泽公司专门负责中元普渡[47]。天福宫普渡，在祭祀之外，还有抢祭的风俗。“每年中元，天福宫设置一高棚，将祭品置棚台上，不设梯子，祭祀后，锣声响起，所有的人便蜂拥而上，青壮年人纷纷竞相沿架攀爬是棚台，抢夺祭品，以最先抢得‘头彩’者为胜”[48]。

三年一度的迎神赛会

最为老一辈华人津津乐道的是天福宫三年一度的神、绅商及众人同乐的迎神赛会。1840年迎接妈祖金身的迎神仪式，成为日后天福宫每逢农历丑、辰、未、戌年，即三年一度的迎神赛会立下了先例和规格。迎神赛会相当隆重，需要周详策划和长时间筹备。有固定的迎神及送神路线，迎神和送神日期也要向神明请示。

以1901年为例，该年中秋节源顺街（即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顺丰街（乔治街，George Street）、中街（马吉街，Market Street）、兴隆街（罗敏申路，Robinson Road）及三美街（英文街名待考）五股头值年头家炉主到“天福宫神前杯卜，已定十月初八迎请恒山亭福德正神（大伯公）及凤山寺广泽尊王，并金兰庙清水祖师三神像到天福宫内观剧，至于送神回庙，则在十二月初四”[49]。初八（1901年11月18日）当天早上各股头齐集天福宫，“各股商装点台阁扎作龙狮，挑选美女妙童，以备临期出色。是日风和日丽，观者塞途。各队分次起行，颇称整齐。计第一队为兴隆街：有龙两条，台阁两座；第二队源顺街：龙两条，台阁五座，马队随行；第三队中街：台阁三座；第四队三美街：龙一条，台阁六座，马队随行；第五队顺丰街：龙两条，台阁六座，马队狮子随行。队中复以鼓乐杂以旌旗，尤为兴高采烈”[50]。

迎神队伍从天福宫出发，按照设定的路线，经过五股头、牛车水等闹市街道，锣鼓喧天地到石叻路的恒山亭、当时在柏城街（Peck Seah Street）的凤山寺与纳喜士街（Narcis Street）的金兰庙去恭请福德正神、广泽尊王及清水祖师到天福宫和天后娘娘一起看戏。

---

[46]《叻报》，1889年2月19日。

[47] 李勇，〈天福宫的领导层、组织与功能（1840—1915）〉，页14。

[48]《南海明珠天福宫》，页43；《叻报》，1891年8月22日。此习俗常引发争端，后便被禁。

[49]《叻报》，1901年9月30日。

[50]《叻报》，1901年11月19日；《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页41；林源福，〈战前的天福宫与闽帮社会〉，《南海明珠天福宫》，页372—373。

三神在天福宫“作客”近两个月后，于十二月初四日（1902年1月13日）送神回銮。五股头各备台阁鼓乐马队及各仪仗为缀景，还有舞狮。各马队还要装扮民间故事如八仙过海、水淹金山寺、王昭君出塞等，一路上浩浩荡荡送神回庙[51]。

会馆活动

赈灾

19世纪及20世纪初，每当中国尤其福建侨乡发生天灾人祸，新加坡闽帮和新马华人即积极响应赈灾号召。1889年，黄河泛滥，时任天福宫大董事的陈金钟捐4000元赈灾。1898年，华南地区发生灾荒，厦门米价高涨，厦门绅商设立平粜总局，并致电新加坡闽商呼吁助赈。闽商集议于天福宫，议决在新加坡成立由颜永成带头的厦门平粜局驻叻筹捐董事，“广集缘资，筹办米石，源源济厦”[52]。闽帮大小商号包括振成号（陈武烈）、丰兴号（陈若锦）等踊跃捐款，广帮和潮帮商人也自发募集6000余元。到6月中旬，共募捐到近两万元。南洋各地闽侨募款汇交新加坡平粜局董事统办，购大米，配送厦门赈济[53]。

1905年，由于新加坡闽商热心赈济侨乡漳泉水灾，光绪皇帝于1907年赐“波靖南溟”御书与匾额一方给天福宫以示表扬[54]，同时也藉以笼络华民，以抗衡在海外华社中日益壮大的保皇党与革命党势力[55]。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成立，福建省政府请求新加坡闽侨援助建设新福建。同年11月13日，千多名闽侨齐集天福宫开闽侨大会，陈武烈当临时主席，大会议决成立福建保安会，推举陈嘉庚为总理，陈武烈为议员协助筹款。

兴学

闽帮在新加坡兴学源自祖籍永春的陈金声。他分别在1849年与1854年创办两所私塾，崇文阁和萃英书院。19世纪晚清政府鼓吹南洋华人开办新式学校，新加坡各帮自1905年纷纷响应兴学。

闽帮于1906年12月16日在天福宫开第一次兴学会议，议决“兴办（启）蒙小（学）两等学堂”。80个闽商在议决案上签字[56]。接着募捐工作由天福宫董事与协理负责[57]。1907年2月，清廷学部一等咨议官福建学务议长陈宝琛南来视察侨教，鼓励闽帮兴学，并撰写兴办道南学堂序。翌年4月，正式发布倡办道南学堂启事，附陈宝琛的道南学堂序，以及110个发起人和首次捐款人名录，共募捐到3万6000余元，其中包括天福宫三大董事陈武烈捐1000元，李清渊捐2000元及吴寿珍捐1200元[58]。12月道南学堂开始招7岁至15岁福帮子弟入学，课程包括国语（华文）、算术、图画、唱歌、体操等科；初级班的国文（华文），概用漳泉方言教学，每名每月学费一元，又午膳费一元五角，按月送交学堂。如贫寒子弟，可申请免费[59]。

1907年11月8日开学，近百名学生入学，聘请教员四名。校舍初设于陈金钟店屋“振成

[51]《叻报》，1902年月14日。《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页41–42。

[52]《叻报》，1898年5月20日。

[53]李勇，〈天福宫的领导层、组织与功能（1840—1915）〉，页18–19。

[54]《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71。福建会馆将光绪御笔“波靖南溟”捐献给国家文物局，列为国宝级文物。光绪御匾高挂在天福宫正殿中央。

[55]林孝胜，《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页42–43；《南海明珠天福宫》，页52。

[56]《叻报》，1906年12月17日；李勇，〈天福宫的领导层、组织与功能（1840—1915）〉，页21。

[57]《叻报》，1906年12月26日。

[58]《叻报》，1907年4月16日。

[59]《叻报》，1907年2月30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2 月 1 日

印度加尔各答友联银行（Union Bank of Calcutta）在新开设分行，为新加坡有银行之始

号”，1912年迁入亚米尼亚街（Armenian Street）新校舍（今土生华人博物馆）。

另一所闽帮学校爱同学校则于1912年为卫理公会汪嘉谟牧师所创办。1915年由于经费短缺，几乎要停办，幸得邱国瓦和林推迁等闽帮富商的支援，才得以维持。

陈武烈主政时期（1897–1916）

由于迎神赛会及其他宗教活动过于铺张，花费太多，陈武烈加以简化，董事会议决只准灯彩鼓乐，禁装台阁点景，每次可省四、五万元。祈安迎神恢复旧制，装扮台阁及顶马各杂剧一概禁止，改用旗伞香亭；中元节普渡，各商家可在店中祭拜，不须在街中摆祭品或搭棚演戏，也不必互赠祭品[60]。

众所周知，1929年陈嘉庚领导的福建会馆大改组，革了时任天福宫福建会馆主席薛中华的命，原因是他没有好好遵照1915年章程处理会务（详后）。但是，是谁订立1915年章程呢？是陈武烈。所以，福建会馆一连串改革的源头源自陈武烈。陈武烈可说是福建会馆改革运动的先行者。

我们回来探讨为什么陈武烈非要立章？按传统，天福宫大董事是终身职。其曾祖父陈笃生、祖父陈金钟都是做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大可以不立章，继续做大董事直到去世。当时也没有迹象如薛中华的情况一样有人“逼宫”。

陈武烈在那个时代是个先进人物，出身富豪之家，受教于新加坡最高学府莱佛士书院，属于殖民地政府培育出来的土生华人（峇峇）知识分子精英。林文庆和宋旺相是他的同辈好友。1899年新加坡华人女校创办人之一，也积极参与海峡侨生公会的活动。他非但喜好洋人的赛马，本身还是马主。

陈武烈是个西化和现代化人物，可是他也有很传统、很华人的另一面。他是华人传统大本营天福宫的大董事，热心服务帮群和华社。他曾经一度是美以美寄宿学校（Methodist School）的信托人，但于1896年愤怒辞去信托人职务[61]，因为校方积极向华籍学生传教，违背其推行世俗教育的诺言。陈武烈也是个社会改革者。天福宫的董事会里也有不少热衷于社会改革者如邱正忠、吴寿珍等。吴寿珍是1906年中华商务总会的创会总理，陈武烈是创会个人会员[62]。陈武烈眼看商会有章程，有严密的组织，董事会按章程运作。1915年商会以民国商会法取代清制商会法，并改名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取代旧名“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63]。陈武烈还是孙中山的拥护者，辛亥革命前已参加了新加坡同盟会支部，革命成功后，他于1913年5月当选为新加坡国民党支部副部长[64]。深受这股欣欣向荣的改革潮流感染的陈武烈，反观天福宫沿袭华人庙宇传统的组织结构，没有章程，也没有明文规定董事协理的职权，更没有会员登记制度。每届选举主要是五股头闽帮商家及富商参加。相比之下，使他感触良多，遂触动他改革华社传统落伍的组织结构的动机。

虽然陈武烈认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和清廷断绝关系。1906年6月，他和林文庆积极协助清廷总领事孙士鼎筹款设立戒（鸦片）烟善社，孙总领事还特地向外务部报告此事[65]。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陈武烈这种敌我不分的矛盾行为是不可理喻的，然而，陈武烈和林文庆都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社会改革者，思想开明。因此，他俩往往将社会改革置于政治理念之上，从不拒绝对不幸的人伸出援手。

到了1915年，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海外华人托“华侨为革命之母”的美誉，华社一时万象更新，充满改革风气，天福宫于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也动了起来。1915年，福建会馆创办第一所学校崇福女校，设立于天福宫戏台后街。很凑巧的，也是在1915年，陈武烈和会馆领导觉得画一轩地方小，不适合作开闽帮大会之用。故在陈武烈任内最后

[60] 林源福，〈战前的天福宫与闽帮社会〉，《南海明珠天福宫》，页374。

[61] 宋旺相，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页242。

[62]《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丙午丁未（1906/1907）两年征信录》，页5。

[63]《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庆祝钻禧纪念特刊》，1964年，页175–177。

[64]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年），页332–335。

[6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为职商陈武烈等集款设振武戒烟善社事致外务部咨呈〉，《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史料汇编地一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页324。

一年将崇文阁右廊及另一住屋，改建为会馆馆舍，建筑费由天福宫支付。会馆落成，硬件有了，还缺软件（章程）。于是由律师起草章程，向政府注册，定名为天福宫福建会馆。第二年被政府批准为豁免注册的社团，进入福建会馆时代，天福宫成为会馆附属的庙宇。随后根据新立章程选举，选出薛中华担任新主席，结束了长达75年由陈笃生、陈金钟及陈武烈祖孙三代主政闽帮总机构的时代。

薛中华主政时期（1915－1929）

薛中华为改组立章后的首任正董事。薛中华是闽帮拓荒首领薛佛记的曾孙。他是英资汇丰银行的买办。1886年生于新加坡，就读于圣若瑟书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出生在买办之家，伯父薛有礼（《叻报》创办人）和父亲薛有文都是汇丰银行买办。1909年接过父亲的棒子成为汇丰银行买办。1919年至1920年，他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薛中华领导福建会馆长达15年之久。1923年，他以福建会馆主席的身份成功调停福清和兴化籍人力车夫打斗事件。双方因竞相拉客酿成集体格斗，死伤不少，数十人被逮捕，造成停业。福清会馆与兴化会馆主席邀请福建会馆主席薛中华出面调停，以息争端。同年9月24日，双方签订和约，两方人力车夫各派代表备彩烛一对，送交福建会馆，表示愿意接受调停，以修旧好，和平解决。惹祸之人，交警方处理，福建会馆对无辜受害者给予恤款。这起事件和平落幕强化了福建会馆作为闽帮总机构的地位[66]。

1924年，为了筹赈救济饱受战乱的同安农民，闽帮特组织新加坡福建同安救济捐董事会，负责筹款，陈延谦为临时主席，共筹得两万余元救济金。

1927年是福建会馆史上一个重要年头，它是陈嘉庚1929年改革福建会馆的起点。事缘1927年闽帮办的道南学校和爱同学校董事会改选，闽商反应冷淡。陈嘉庚对闽商缺乏兴学精神很不满，他于是发动在福建会馆开闽侨大会，讨论解决道南和爱同两校董事连任，以及两校资金来源及管理问题[67]。

闽侨大会一共开了两次。第一次于6月25日召开，陈嘉庚呼吁闽侨学校交福建会馆统筹统办。但由于出席者只有10多人，他另订7月16日召开第二次闽侨大会。大会议决闽侨学校由福建会馆董事部管辖，并获得会馆每年辅助经费。大会也即席成立一个以陈嘉庚为首的12人改组福建会馆董事兼教育委员会，负责福建会馆的改组，统计闽侨学校及其经费问题。时任福建会馆主席的薛中华因不认同改组而没有出席7月16日的第二次闽侨大会。改委会以陈嘉庚当主席的怡和轩俱乐部为基地，和薛中华为首的福建会馆董事会交涉改组事，进展迟缓。1927年11月底，才见福建会馆登报征集会员，凡福建人，有正常职业和认捐基金者，即可成为福建会馆永久会员，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后来，陈嘉庚忙于山东筹赈会事务无暇顾及福建会馆改组事。待1929年1月山东筹赈会结束后，陈嘉庚决定参加1929年福建会馆董事会选举，挑战薛中华的领导权。他顺利中选成为福建会馆新主席，福建会馆进入一个新纪元。

陈嘉庚主政时期（1929－1950）

陈嘉庚入主福建会馆象征马六甲侨生集团领导会馆时代的结束。一个由中国南来的移民集团主导会馆的时代由陈嘉庚掀开序幕。

陈嘉庚（1874－1961），福建省同安县

[66]《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页46－47。

[67]《南洋商报》，1927年6月18日；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页17。

集美村人，生死都在中国。早年在集美受教育。17岁来新加坡随父陈杞柏学做生意。1904年，父亲事业失败告老回乡。是年，陈嘉庚从零开始创业，由米和罐头黄梨制造业起家，后来也投资树胶及树胶产品制造业，号称树胶大王。建立了一个多元化的家族跨国企业集团——陈嘉庚公司，分行遍布东南亚和中国，欧美有办事处，成为新马发展工业的先驱。陈嘉庚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信念，将一生赚来的钱用在福建和新加坡的慈善及教育上。他在集美办小学、中学、师范学校、职训学校、厦门大学。并参与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和崇福女校的创办。1919年倡办南洋第一所华文中学——南洋华侨中学。

陈嘉庚很赞赏国民党的委员会制度，因为各委员都有特定任务和工作目标。于是1929年2月2日，福建会馆新董事会举行首次会议时，他即宣布将董事会改总理制为委员会制，由35名执行委员会和5名监察委员会组成。35名执委中，5名为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会是最高领导，陈嘉庚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其下设立五科，分别管理总务、经济、教育、建设及慈善事务。每科各设主任一名，各委员会各司其职，每年必须向会员大会作工作报告。各科主任为：周瑞献（总务）、何葆仁（教育）、叶玉堆（经济）、陈永远（建设）及胡载坤（慈善）。另设监察委员会（主任为李振殿）监督执委会的工作[68]。

随着董事会改为委员会制，旧章程已不适用。于是成立以陈嘉庚、何葆仁、李光前、林戊己、陈万安、周宗鳞及庄丕唐的七人小组负责起草新章程。1930年8月4日会员大会通过新章程。1937年11月15日，福建会馆在公司条例下注册为非营利社团，接管天福宫福建会馆的产业及维持管理所属庙宇和义山。天福宫福建会馆之注册会员为创始会员，凡侨居新加坡年过21岁有正当职业的福建人可加入为会员。新章程将会馆正名为新加坡福建会馆，取代天福宫福建会馆之旧名称，从此进入新加坡福建会馆的时代。

改组后的福建会馆首要任务是落实闽侨教育的改革计划，接办道南、爱同及崇福三校，及辅助津贴八所闽侨学校（光洋、中华、丹诏、崇德、彰德、益励、钟声及惠群）。改组后福建会馆三校老师改以华语教学，一改过去落伍的方言教学。经费方面，三校除征收学费充经常费外，每年会馆津贴每名学生10元，夜校5元，免费生及半费生由会馆负责。训育方针是把学生培养成一个有教养、合群、守纪律，有科学头脑与爱国心的好公民。会馆还聘请教育指导员负责改组三校的工作，以达致教育行政统一的目的。但面对严峻的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其企业和会馆都面临资金短缺的危机，福建会馆于1932年1月26日举行的执监联席会议决定除直属三校外，停止津贴八所辅助学校[69]。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影响华校师资来源，福建会馆毅然于1941年开办南侨师范学校，培养师资。

陈嘉庚也是社会改革者，致力于移风易俗，排除迷信，消减神权色彩。改组后不久，委员会在征得五股头的同意下，废除天福宫的迎神赛会。后来允许有限制的迎神出游，但不设置台阁排场，限定福德正神出游，仅置一香亭。1935年议决改良华人丧仪，减少铺张浪费、彩阁、舞狮舞龙、光怪陆离。福建会馆连同南安、永春、安溪、晋江、诏安等14间闽帮会馆组成的闽帮丧仪改良委员会，于1936年7月公布改良丧仪规约12条。丧仪以简单庄严为指导原则。12条规约包括停柩一至七日，居丧期间勿设宴饮赌博、出殡哀乐一队（能免更佳）、勿抬迎联轴或旗帜、勿装彩阁、不可烧灵屋及金银山、亲朋戚友吊丧可送赙金花圈或送殡等。1938年3月14日福建会馆在报端发表改良丧仪委员会宣言。为了扩大宣传工作，福建会馆还函请各校友会演话剧、在各电影院放幻灯片、在大小坡分六区派人演讲宣传[70]。

改组后的福建会馆也热心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1934年8月8日河水山大火，灾情严重，福建会馆即刻组织救济灾区委员会，展开募捐，安排临时住宿及其他善后工作，也在大世界举行游艺会筹款救济灾民。福建会馆也和中华总商会协调向政府商议灾民的善后问题，为灾民请愿请政府建平民屋分配给灾民。当1936年12月，印度籍清洁劳工罢工，市区垃圾堆积如山，福建会馆为了市民健康，雇工分区大扫除。

---

[68]《福建会馆改组后第一届议案及帐目报告》，1931年，页1-2；林孝胜，〈二战前新加坡华社与帮权政治〉，《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新加坡：青年书局，2010年），页1-22。

[69]《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页19；林孝胜，《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页54-60。

[70]《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页62；《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页20。

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殖民地政府特别指定福建会馆主席陈嘉庚领导新加坡及全南洋华人的抗战救亡运动。陈嘉庚先后成为星华筹赈会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闽帮筹款活动由福建会馆统筹，闽帮富商、胶业巨子、银行家、文教界人士、受薪人士及工友热烈响应陈嘉庚的号召，踊跃捐款，筹得近128万元。

二战后福建会馆组织现代化

二战后陈嘉庚决定落叶归根回中国建设新中国。1949年初，中共派特使庄希泉从香港专程来新力邀陈嘉庚回国参加政协[71]。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于1月20日正式发邀请电报给陈嘉庚："先生为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72]。陈嘉庚在庄希泉协助下发了回电："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敢不如命。惟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千祈原谅"[73]。

1950年5月21日他乘飞机回中国，结束了他在南洋多姿多彩的前半生，也象征一个华侨时代的结束。

陈嘉庚离去后把福建会馆领导的棒子交给陈六使，掀开一个落地生根的华人时代的序幕。二战后，福建会馆在前主席陈六使、黄祖耀及现任主席蔡天宝的主政下，与时俱进，走向现代化。

陈六使主政时期（1950－1972）

陈六使（1897－1972），祖籍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是陈嘉庚的同乡。出身贫寒大家庭。19岁南来在陈嘉庚树胶厂当工人。1920年代中叶和兄长创设益和公司，经营树胶出入口生意致富，和李光前齐名成为世界级树胶巨子。1950年被选为福建会馆主席，及当选为中华总商会会长，成为闽帮与华社的领袖。

陈六使接棒后，正逢新马政治酝酿大变动。二战后，民族主义运动席卷整个东南亚，人民争取独立，要求参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殖民地政府严格限制华人到中国省亲或升学。新加坡华人只好正视身份属性与华教问题。因此，华人居留权和华教发展，理所当然成为陈六使最迫切和最重要的工作事项。

选民登记与公民权是全体华人面对的问题，因此由商会领头，福建会馆积极支持商会发动的推动选民登记与争取公民权运动。陈六使呼吁新加坡华人要关心政治，争取公民权与选举权，号召华人踊跃登记成为选民及参政。他强调在争取公民权问题上不可畏事，这是大众切身之事，必须力争到底。

1955年9月福建会馆大厦落成，由首席部长马绍尔主持开幕典礼，陈六使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致词，呼吁政府发公民权给热心教育者，因为他们为本邦造就人才。

创办南洋大学

1953年领导全南洋华人创办南洋大学是福建会馆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也是陈六使担任福建会馆主席任内最为人乐道的事。

华文教育向来靠华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发展起来的。师资来源和学生升学出路都靠中国。1949年后，这条通道被切断了。因此，1950年代初，整个东南亚华社急需设立一间华文大学，以解决上述两大问题，南洋大学就应时代需求而诞生了。

陈六使于1953年1月16日在福建会馆执监委

[71] 肖伟俐，〈中共特使庄希泉力邀陈嘉庚回国〉，《名人传记》期12（中国：河南郑州，2012年），页82-86。
[72]〈中共特使庄希泉力邀陈嘉庚回国〉，页86。
[73] 同上注。

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倡议集合华社力量来创办一所华文大学，作为全南洋华教的最高学府。他表示愿尽个人全部力量与同侨合作，完成这千秋大业。他即席宣布将捐献500万元充作南大建校基金。他也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宣布福建会馆献出位于裕廊路14英里处，广达523英亩地段作为兴建大学校址。

陈六使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同年2月12日，中华总商会董事及214个华团代表召开大会，共商创办大学计划，陈六使被推选为主席，即席推举陈六使和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南洋客属总会、三江会馆、潮州八邑会馆、漳州总会、琼州会馆、福州会馆、广惠肇公会、马华公会新加坡分会及树胶公会12侨团组成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

由于创办南大是全南洋华人的共同心愿，即刻获得全南洋华社的支持，从千万富翁到小贩、舞女、三轮车夫都热烈响应，这是继南侨总会的另一次泛南洋华社运动。马来亚各州纷纷成立南大筹委会，协助募款，掀开筹款热潮，义演、义唱、义赛、义展、义卖、义踏、义舞，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以说，南大的一砖一瓦，都有全南洋华社每一分子的血汗，新马殷商如陈六使、李光前、胡文虎、陆运涛、连瀛洲、林连登、刘玉水、邵仁枚等都捐献巨款。

1956年3月15日，南大举行隆重开学仪式，陈六使致词高呼“今天是海外华侨最光荣的日子！”

南大创办后，福建会馆继续捐助南大，1959年至1971年，福建会馆再献捐70万元建礼堂。1971年4月执监委员会议决捐建三座学生宿舍或捐30万元扩建学生宿舍。1980年，南大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从1956年至1980年，南大为新马及东南亚培育了近两万名高等知识分子。他们在新马的政经、工商、文教各界作出重大贡献。

直属五校

陈六使任内福建会馆直属学校增加到五校：道南、爱同、崇福、南侨女中（1947年创办）及光华学校（1953年创办）。1955年9月耗资70万元的福建会馆大厦落成，崇福和爱同就迁入大厦的新校舍。1957年，五校接受政府全部津贴。1947年福建会馆停办南侨师范学校，在原校址创办南侨女中并附设小学，1950年增办高中，1965年重建。

陈六使吸取陈嘉庚时代，会馆的教育和公益事业往往受到经济短缺的影响。因此，会馆在他任内购置不少产业，如云南园、万礼园及三巴旺园等，这些产业成为维持五校扩建或迁建的经费以及慈善基金的来源。

陈六使时代的福建会馆鼓励集团结婚，提倡节约。从1956年至1960年期间，会馆主办了17届集团结婚，每三个月举行一次。每对新人花费不超过两百元，包括杂费、租车、照相。福建会馆的集团结婚的特色是新人来自各行各业，也来自不同方言群。

陈六使于1972年8月20日辞去福建会馆主席职务，不到一个月就于9月11日病逝于新加坡中央医院。

黄祖耀主政时期（1972 – 2010）

祖籍金门的黄祖耀是在1972年9月，从陈六使手中接过福建会馆领导棒子，至2010年7月退任，前后38年，是任期最长的一位福建会馆主席。黄祖耀是银行家，大华银行集团总裁，时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要职。他主政时期，新加坡已是个新兴独立国家。

由于陈六使在1963年大选时，呼吁各界以拥护南大的精神，支持各政党的南大毕业生候选人，被视为暗示支持社会主义阵线的南大毕业生候选人，导致政府和福建会馆的关系很僵。因此，黄祖耀上任不久就致力于加强会馆和政府的关系。他和政府领导层关系良好，也获得政府的信任，担任国家科学局主席及新加坡货币局理事。于是黄祖耀调整了福建会馆各项会务和活动的基调，以配合政府的政策，协助国家建设。

黄祖耀在就职典礼致词时，呼吁会馆活动应随着时代的进展而加以改变，不要局限于同乡，而应该扩展到全国人民。会馆也应该一视同仁资助贫穷青年，为国家造就更多人才。1973年5月，福建会馆率先决定把属下五校的学生奖学金也颁发给成绩优良的各族学生。

黄祖耀也致力于现代化会馆组织，他的会务三大方针是改革会馆组织、会馆产业须有全盘发展计划，以及用人得当。1984年，黄祖耀修改订立于1937年的旧章程及革新会馆组织。根据新章程，会馆废除执监委员会改以理事会制度。理事会由37名理事组成，有主席一名，四名副主席，分总务、财政、教育、建设及慈善五组。黄祖耀任内还设

黄祖耀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典礼上讲话（1986年1月27日）

立福建会馆基金，注册为非营利有限公司。

黄祖耀任内的其他重大工作及发展计划包括：

属下学校迁建

道南、爱同及崇福学校受到城市规划影响，必须迁建，因此学校发展计划被列为第一期发展项目。1981年道南学校迁入马林百列现址建新校舍。1990年成为首批10所特选小学之一。爱同学校于1979年迁入宏茂桥新校舍。1992年再迁至光明山通道现址。爱同学校也是1990年教育部宣布的首批10所特选小学之一。崇福学校也在1985年迁到义顺新镇现址。南侨女中于1984年开始招收男生，改名为南侨中学。2001年，小学迁往盛港，正式成为南侨中学和南侨小学两所学校。南侨中学为特选中学之一。

发展产业

1980年代开始，会馆积极推行云南园建屋发展计划，将收益作教育、文化与慈善用途。1993年3月已完成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发展计划。

修葺天福宫与重建会馆大厦

有百余年历史的天福宫的木质建材遭严重虫蛀，急须全面修复。1990年代中按照中国古建筑专家的方案展开复修工作。1994年3月落实重建楼高八层的福建会馆新大厦，并于2004年落成启用。

成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1980年代，新加坡的宗乡会馆普遍面临会员老化，会员减少，以及年轻人对会馆不认同等问题的困扰。会馆危机促使全国宗乡会馆发起自强运动。福建会馆挺身出来领导这个宗乡会馆复兴运动。1986年1月27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福建会馆主席黄祖耀成为宗乡总会理事会创会主席。

成立文化艺术团

为了提倡及发扬中华文化，1986年福建会馆成立文化艺术团，开办以少儿培训为主的各类课程，培育了数以万计能掌握华文华语、热爱华族传统文化的人才。

竖立闽帮三贤铜像

1980年代中，福建会馆特约广州著名雕塑家孔立伟为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塑造半身铜像，分别置于福建会馆，南侨中学及光华学校，以表扬三人毕生对会馆、闽帮及新加坡的教育、文化和慈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蔡天宝主政时期（2010年迄今）

2010年7月，继黄祖耀之后，蔡天宝成为华社两个最重要的宗乡会馆，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及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第二任会长。2012年迄今，蝉联二大会馆领导人。

祖籍福建省晋江县的蔡天宝是和美集团的创办人，自1987年8月起担任和美置地有限公司的主席兼总裁。时任通商中国主席、华社自助理事会信托局委员会主席、仁慈医院主席以及碧山东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他也在2005至2010年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2007年，获颁新加坡杰出商人奖。2014年8月，又获颁“殊功勋章”（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以表扬他对社区的长期贡献。蔡天宝是这个勋章的唯一获奖人[74]。

2010年8月7日，蔡天宝从前任主席黄祖耀手中接过福建会馆馆印后强调说：“社团应该与时并进，寻求突破。虽然担任会馆领导人是属于义务性质，但理事们必须不断自我鞭策，也得为更换新血做好准备。”

在蔡天宝任内迄今，有几项活动值得一书：

飞跃教师奖

2011年8月，福建会馆设立“飞跃教师奖”，以表扬那些有爱心而且在培育学生品德和学业方面有特出表现的好教师。“飞跃教师奖”颁发对象是全国中小学和初级学院的教师。蔡天宝解释说，今天学校教师面临艰巨挑战，培育学生不单要传授知识，还要对教育有献身精神，而且还要有热忱。教师日常所需要处理的事务，很多时候是和教务无关的。而要使一般的学生在品性、课业和活动方面变好，教师更是需要耗费不少心力。福建会馆向来不遗余力推动教育，设立这个奖就是要肯定这些热心、默默努力付出的好老师。

直属学校发展规划

兴学和推广中华文化是福建会馆传统的核心使命之一。蔡天宝认为：“兴学为善、弘扬文化是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创会使命和目标。经历了173年的风风雨雨，福建会馆许下为教育精益求精[75]。”福建会馆属下有五所小学：道南、爱同、崇福、南侨小学、光华学校和南侨中学。因此，身为福建会馆主席，他也意味着身兼这六所学校的董事长职务，必须肩负起发扬福建会馆百年办学的重任。

2013年，蔡天宝接受《新学》（新加坡教育双语双月刊）专访，透露其福建会馆直属学校发展蓝图。他希望能在教育部的协助下，为福建会馆属下小学在邻区增设两所新中学，提供12年中小学完整教育的大计。他也表示这是会馆持续为传承先贤办学使命所作的努力[76]。在他的发展蓝图里，计划多办两所中学。“福建会馆属下虽有五所小学，却只有一所中学。对此，福建会馆有意在中学教育方面投入更多心力。现有的南侨中学，坐落于新加坡东北部，会馆希望能够在东部光华学校和道南学校附近，以及中部崇福学校和爱同学校附近设立两所新中学。这是为了让想到福建会馆属校就读的学子有更多的选择与机会，造

1.8.2010　早报星期天

蔡天宝：与企业一样

会馆工作须设表现指标

@谢燕燕

新加坡福建会馆新任会长，也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刚推举出来的新主席蔡天宝，是以企业家的严谨态度对待会馆工作。他认为会馆理事不能只是“挂个名”，必须和企业一样，设定表现指标（KPI）。

这位将在本月7日第40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上，接替银行家黄祖耀（81岁）出任福建会馆会长一职的发展商，也将接替黄祖耀出任宗乡总会主席，正式成为华社顶尖人物。

蔡天宝（62岁）是中华总商会上届会长，目前是仁慈医院管理委员会主席，也是通商中国主席，因此对华社来说，并不陌生。他在就职前接受本报专访，畅谈他对华社的期许。

对于会馆的工作，他显然有严格的要求。首先，他认为每一届理事，都应该为会馆未来五或十年的发展，制定一套具体计划。这位福建会馆新主帅强调，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凡事不进则退，会馆也一样。虽然说担任会馆领导人是属于义务性质，但理事们必须不断自我鞭策，也得为更换新血做好准备。

蔡天宝说：“社团应该与时并进，寻求突破。就拿福建会馆的五所小学来说，成绩都相当好，但不能停留于此，必须不断自我检讨，快速寻求突破和发展，还要能预见五年、十年后的发展，否则很快就被其他学校超越。”

在整个访谈中，他不只一次强调好的团队。做起事来才能事半功倍，而有了好

福建会馆新主帅蔡天宝对团队要求很严格，认为会馆理事不能只是“挂个名”。（邬福梁摄）

团队，组织就成功一半。

所以现代会馆首先必须要有好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效率高的秘书处，其次是要能引进好的人才，会务才能往前发展。

本地许多历史悠久的宗乡会馆，经常因缺少能一呼百应、让人信服的领导人，使会馆不时陷入派系斗争，不是公开争吵，便是暗流汹涌，在明争暗斗中内耗，会务无法得到发展。

福建会馆如何避免陷入这样的困境？

蔡天宝认为会馆必须机制化，领导人要抱着服务和回馈社会的心态，公平对待每个人，做事也必须有透明度。另外也要能凝聚团队，让大家有共同目标和归属感。

他每次领导一个新组织，都喜欢办静修营（retreat），让大家坐下来讨论会馆未来发展，找出新方向。

一旦有了认同，便朝同一目标努力。这类活动虽然只是两三天时间，却也能培养理事之间的感情，加深彼此的认识。

吸引人才是最大挑战

蔡天宝说，会长不可能全面管所有大小事，因此需要好的团队来分工合作，这样才能全方位看到团队发展。

他坦言，吸引人才是最大挑战，但他平时会仔细观察、留意和发掘好的人才，慢慢把他们引进理事会。看来，他在基层组织服务多年的丰富经验，都被用到会馆的组织工作上。

询及华社在现今社会的作用，蔡天宝认为最重要是保持传统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同时也要为促进社会凝聚力尽力。

他解释说，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种族和谐非常重要。在这之后是推动社会公益，负起社会责任。

他也认为会馆可以借助独特的地缘联系，对中国和海外商业关系发挥实用性功能。

谈到黄祖耀对会馆的贡献，蔡天宝说：“黄祖耀带领福建会馆走过38个岁月，对于一位日理万机的企业家来说，如果没有对祖籍乡亲的热忱，对国家社会的热爱，是不会对一个社团做出如此长时间的奉献的。”

利用会馆平台
创造学母语环境

蔡天宝认为福建会馆下来可以利用会馆和属校的平台，创造一个学习和使用华语的大环境。

他表示，理事会将和属校家长团探讨这一问题，会馆属下青年团下来也会成立“促进华语小组”，而教育组也会探讨这一课题，看看如何创造使用华语的大环境。

蔡天宝强调，讲华语不应只由政府推动，民间也应响应。他想从属校的学生和家长开始，营造这样的大环境。

他指出，福建会馆属校有1万2000名学生，另外还有学生家长，而会馆的会员超过4000人，加上会员家属，人数就更可观。

除此之外，还有演艺班的近2000名学生。如果把他们全部加起来，将是个很大的平台，可一起创造讲华语的大环境。

他进一步解释，福建会馆每年吸引大约500名新会员，很多家长是因为希望让孩子进属校受教育而加入会馆。会馆属校都是以华文为优势。

既然如此，就希望这些家长和学生能帮忙创造一个促进华文学习与应用的大环境。

蔡天宝认为，母语可以团结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推广母语不能用商业利益来衡量。母语的政策也必须与世界大环境并进，而家长应以身作则，不要排斥母语。

2010年7月蔡天宝接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后接受《联合早报》记者专访（2010年8月1日）

[74] “联合早报网”，2014年11月23日。

[75]《新学》，期5（2013年9月）。

[76] 同上注。

福东部与中部的学生[77]。”蔡天宝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到福建会馆百年的办校经验与热忱，给予福建会馆设立新中学的机会，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举行第七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暨第四届新加坡福建文化节

2012年11月下旬，福建会馆在新加坡隆重举行“第七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暨第四届新加坡福建文化节”，这是蔡天宝上任以来的最大盛事。他非常重视这次大会。会前数个月，他不辞劳苦，风尘仆仆亲率代表团前往世界各地，如南非、印尼、中国的福州、厦门、泉州等地拜访福建乡亲，召开恳亲大会说明会，诚邀世界各地福建乡亲踊跃前来参加，共襄盛举。

2012年11月23日至25日，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如期在狮城最新地标——金沙湾综合娱乐胜地举行。大会吸引4000多名来自19个国家，50个地区的福建人参加，其他主要活动有《蓝海福建文物大展》、《神笔马良》大型音乐剧、美食节和经济论坛等，并出版《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78]。

11月24日上午，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为恳亲大会主持开幕仪式时说，本地福建人多年来为国家贡献良多，陈嘉庚是其中一位先贤。在新马经商发达，积极回馈社会，在本地兴办华侨中学，在中国办厦门大学。陈笃生是另一位福建先贤，为创办陈笃生医院出了很多力，也协助兴建“天福宫”。张志贤也提醒说，在目前这个可以自由迁移的时代，大家要牢牢地保留自己的文化和家乡的根，在新地方安家后也要为当地做出贡献[79]。

来自世界各地的13个福建商团组织，在第七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上签署友好合作协议书。张志贤说，这将能加强全球福建网络的联系，提供更多商机。

福建会馆主席蔡天宝也说，这是本届大会一项重要收获，是大会走向实质性合作行动的重要一步。“大家今后将加强信息沟通，定期往来和互访，开展经贸交流与合作”。他建议大会探讨成立“世界福建同乡联合秘书处”的可行性，秘书处将可作为联系彼此的中心，让各地福建同乡会能保持联络，推广合作[80]。

福建会馆与时并进的历程，充分体现新旧传统的并存之道。“随着时代的变迁，类似宗乡会馆能够凝聚族群并充分发挥社会功能的团体已不多见，因此我们必须珍惜现有组织，以更积极和进取决心，让会馆精神持之以恒，发扬光大”[81]。

作为现任福建会馆主席，蔡天宝在恳亲大会期间有重要政策性谈话，透露福建会馆未来发展的方向：

> 福建会馆向来不遗余力推广教育和弘扬传统文化，除了继续资助六所属校在基础设施、教学和科技方面的发展，也将进一步配合教育部提出的“以价值为导向”的教育方针，向学生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他们良好的品格，希望年轻一代从小树立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精神。会馆今后也将更深入地和家长、社区合作，营造有利于华语学习的大环境。
>
> 会馆目前正在筹备文化艺术学院，加大力度推广华族文化与华文教育、展现本地多元文

[77] 同上注。

[78]《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于2012年11月出版，主编柯木林，该书共收录新加坡已故闽帮人物155人上迄1819年，下迄2012年6月。如再加上附录〈增列闽籍人物资料表〉中的429名，该书实际上收录了584名闽籍人物。

[79]《联合早报》，2012年11月25日。

[80] 同上注。

[81] 同上注。

这张《搬迁通知》结束了新加坡福建会馆在直落亚逸街174年的历史

化特色。学院将开设不同类别的课程以适应幼儿、成人和乐龄人士的需求，普及与推广华族文化，为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和谐社会继续作出贡献。

今年新一届理事会特设会员事务组，旨在加强会员对会馆的归属感。我们也成立了各类兴趣圈，举办每月会员聚会和各种与时俱进的活动，为会员提供更多的交流渠道，深化会员间的联络。

会馆希望吸引更多闽籍人士，尤其是年轻的福建同胞，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服务会馆，承传会务[82]！

随着大会的落幕，蔡天宝清楚绘出福建会馆未来的发展愿景，规划福建会馆直属学校与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学院，以及加强建立全球闽商闽人网络，将成为蔡天宝任内的工作目标，也是福建会馆今后的发展方针。

2014年7月18日，福建会馆离开了根植175年的直落亚逸街，迁移至座落在东海岸上段的福建会馆文化学院。此后，福建会馆的发展，又进入了历史的另一篇章[83]！

[82]《联合早报》，2012年11月24日。

[83] 柯木林，〈谈新加坡福建会馆的“迁都”〉，载《联合早报》，2014年8月16日。

第三节　广客帮总机构
——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公所

摘要

在殖民地时代，福德祠绿野亭既是广府和客家移民的庙宇、坟山组织，亦是广、客宗乡社团的总机构，在华人社会占有举足轻重地位。自新加坡建国以来，在社会变迁的时空脉络下，它努力跟上时代步伐，除继续团结广、客宗乡社群，也配合国家发展办理公益慈善文化事业，促进社会进步。

Abstract

Under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the Hok Tek Chi Loke Yah Teng Association was a temple, a burial ground administrator as well as the umbrella organization for the Cantonese and Hakka communities. Since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in 1965, it has kept pace with changes in society and has promoted charity and culture in conjunction with national development.

曾玲（Zeng Ling）

福德祠绿野亭是一所基本与新加坡开埠以来历史发展同步、且仍活跃在今天新加坡社会的华人宗乡社团。

福德祠绿野亭（以下简称绿野亭）[1]的出现，是开埠初期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呈现帮群形态的产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客属的惠州与广属的广府、肇庆移民联合形成“广惠肇”社群，并与客属另外的“嘉应五属”[2]、“丰（顺）永（定）大（埔）”[3]两移民社群组成联合阵线，而联合阵线的总机构就是绿野亭。绿野亭的演化历史与内部成员组成，可以表（一）展示。

在绿野亭近两个世纪的演化中，留下许多与其发展历

表（一）：

[1] 本文所研究社团的名称及用法，有以下说明：在1927年章程里，该社团全称为“海唇福德祠绿野亭”。1993年新颁布的章程改为“福德祠绿野亭公会”。为了兼顾历史原貌和行文方便，笔者在文章中做这样的处理：1993年以前，在文章的标题部分，用“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全称。在内容中若仅涉及庙宇，就用“福德祠”。如涉及该社团，就用“绿野亭”。1993年以后，在文章的标题部分，用“福德祠绿野亭公会”，在内容部分则简化为“绿野亭”作为该社团的名称。

[2] “嘉应五属”指祖籍为广东梅县、兴宁、五华、平远、焦岭五县移民组成的社群。该社群以1823年成立的新加坡应和会馆为总机构。

[3] “丰永大”指由祖籍为广东的丰顺、福建的永定和广东的大埔三属华人移民组成的社群。有关这三属移民何时形成一个社群，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史相关的金石碑铭、账本、董事部会议记录、章程、纪念特刊等各类文献[4]。这些历史文献真实与具体地记载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运作方式与认同形态，是考察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移民社群整合、华人社会建构与演化的珍贵文本记录。本节主要运用这些资料，重构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进程中作为庙宇、坟山组织和广、客宗乡社团总机构的绿野亭发展史。

建立及特点

根据匾额、碑文等各类文献，绿野亭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的海唇福德祠古庙和青山亭。

从无主孤坟到广客社群庙宇

关于海唇福德祠（以下简称福德祠）的由来，见之于一则传说："据前人所述，当日神座为一长者之坟地，初不过陋小而仅具规模，后以声灵显濯，远近蒙庥，遂至祈祝者日众，及道光甲申，乃集众而扩建之……"[5]。而有关该庙的最早记录，则是至今仍悬挂在庙内的一幅1854年的匾额[6]。

庙里还立有两块与匾额同一年代的石碑。一是"广惠肇"的《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大伯公庙序碑》。该碑文记录此次修建的过程，强调广惠肇社群与福德祠的关系：

立于咸丰四年（1854年）的"赖及遐陬"匾额

"兹我广惠肇府人等羁旅于此，环居一埠，敬立福德神，建庙以壮神威，设祀以崇祀典，由来尚矣"[7]。另一块则是客家社群所立的《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该碑文所列的捐款名单中，有"应和公司"和"大丰永公司"为此次重修各捐赠了75元的记录。还有潮郡万世盛公司也捐了93元[8]。

以上有关福德祠的传说与金石资料显示：（一）福德祠所在地原本是一处无主坟地，后来因有华人的祭拜而变成一间小庙；（二）该庙最初并无社群所属，它是在1824年经由"广惠肇"移民修建并接手管理才开始具有社群属性。正是根据1824年的牌匾，绿野亭将其创办的年代定立为1824年；（三）在1854年"广惠肇"重修福德祠工程中，因客属的"嘉应五属"和"丰永大"加入而扩大了福德祠的社群边界。

福德祠从无主孤坟到社群庙宇的转变、显示伴随闽粤移民南来拓荒而传承到东南亚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华人移民社群整合与社团建构中的重要意义。福德正神即土地神崇

[4] 有关绿野亭的文献，碑文部分见《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70–93、231–261。文字部分见曾玲主编《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一：1920–1927年会议记录》、《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二：1953年–1959年会议记录、1957年–1959年绿野亭坟山迁葬委员会会议记录》、《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三：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新加坡华裔丛书福德祠绿野亭系列，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出版；1927年福德祠绿野亭章程；《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纪念特刊》，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1960年出版（非卖品）。下文所提绿野亭文献，均见上述内容。

[5] 陶公铸，《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纪念特刊·沿革史》，页1。

[6] 海唇福德祠在1985年3月被政府征用。政府将包括海唇福德祠在内的一片土地出售给新加坡地产商远东机构。1998年11月，远东机构将其改建为新加坡华人移民博物馆。

[7] 《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页70–79。

[8] 《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页79–84。

拜，是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加坡移民时代华人帮群社会结构的脉络下，经由孤魂崇拜转化而来的福德祠，已不仅仅是一座供奉大伯公的华人民间宗教庙宇，它同时也承担整合移民社群与作为“广、客”总机构的功能。

青山亭

在殖民地时代的东南亚，坟山组织是华人移民社团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世纪的新加坡，几乎每个华人移民社群都建有自己的坟山，这些坟山大多以“亭”称之。华人坟山组织的基本功能是处理本社群先人的茔葬和祭祀，同时也具有界定社群成员身份、承担团结、凝聚与整合本社群的重要功能[9]。

在广、客移民社群整合的历史进程中，坟山亦起着重要的作用。绿野亭最早的坟山，大致设立于新加坡开埠之初的青山亭。“戊戌之先，属人原有青山亭之设，位于安祥山之东，即今柏城街（Peck Seah Street）之西一带滨海地段”[10]。有关青山亭的零星记载，根据保留下来的账本记录，光绪乙巳年（1905年），青山亭收地租15元和交屋契金15元[11]。青山亭的最后一次修建，是在光绪丙午年（1906年）和丁未年（1907年）[12]。另外，账本中有“光绪丁未五月青山亭起葬状师费50元”[13]的记录，说明青山亭因殖民地政府征用在这一年开始进行迁葬事宜。

上述的碑铭与账本记录，显示绿野亭由来自中国广东的广府、肇庆、惠州、嘉应、丰顺、大埔和福建的永定移民所创立。该社团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绿野亭是在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移民帮群分立与帮群间互动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社团组织。在这个社团内部，即有“广府”与“客家”祖籍地缘的不同，又有方言之差异。因此，内部复杂社群关系与多元认同形态的存在，是该社团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绿野亭建立的基本任务，是为新加坡广、客移民提供宗教活动场所和安葬先人的坟山，以及进行处理移民身后的茔葬、祭祀等事宜，这也是移民时代华人社团的基本功能之一。绿野亭与一般会馆和宗亲会的相异之处，在于它仅承担一般华人社团的部分功能，即处理移民的信仰与身后的丧葬祭祀，并将这部分功能独立出来。换言之，在开埠初期的新加坡社会脉络下，广、客移民以中华文化中的神明信仰和祖先崇拜为纽带，建立了跨方言与地缘的新社群组织。

总括以上所述，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出现于华人社会舞台的绿野亭，既是庙宇与坟山组织，亦是广、客两移民社群的总机构。双重功能是绿野亭的基本特点。

内部社群关系与认同形态

在建构绿野亭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内部复杂社群关系与认同形态，是其中的关键与重要的问题。

根据碑文与账本等文献，在开埠以来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与演化的形势下，绿野亭内部的社群关系经历了以下的几个阶段。

从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末，是广、客移民社群整合的最初阶段。在这一时期，广、客移民透过共同经营与管理福德祠和青山亭坟山，不仅在开埠初期新加坡帮群林立的华人社会建立联合阵线，也在总机构内部奠定了两社群关系的最初框架。

从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绿野亭内部的社群整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广、客移民继续通过共同管理庙宇与坟山来巩固与发展联合阵线，其内部则在不断整合过程中逐渐形成“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社群形态。

由于南来移民的不断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世纪30年代末，青山亭坟山基本已无可安葬先人的空间。

---

[9] 曾玲，《坟山组织、社群共祖与帮群整合：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亚洲文化》总第24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0年），页122-135；曾玲，《坟山组织与华人移民之整合：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建构帮群社会的历史考察》，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页934-949；曾玲、庄英章，《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年），页85-151。

[10] 同注5。

[11]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29-30。

[12]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45、59。

[13]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60。

1838年广、客侨领向殖民地政府申请土地并合作修建了新坟山绿野亭。1840年修建工程结束后，广、客合立《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记载此次修建新坟山的缘起和过程[14]。该碑文内容中第一次出现“我广、惠、肇、嘉应州、大埔、丰顺、永定等庶……”字样，显示从青山亭到绿野亭，透过对广、客移民身后事的丧葬与祭祀以及坟山的修建与管理，两社群的整合已经基本完成，开始以一个联合体的社群形态运作。1840年以后，广、客移民继续通过共同修建庙宇与坟山来整合与建构其内部的社群架构。有关这一时期绿野亭运作状况，保留在以下的碑文中[15]：

咸丰四年（1854年）“广惠肇”立《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

咸丰四年（1854年）“客帮”立《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

同治元年（1862年）“广惠肇嘉应大埔丰顺永定”合立《重修新山利济桥碑记》

同治八年（1869年）“嘉应州五属”、“丰永大三邑公司”立《福德祠大伯公碑记》

同治九年（1870年）“广惠肇”立《砌祝地基捐缘勒石碑记》、《建筑福德祠前地台围墙序》

光绪十年（1884年）“广惠肇”立《广惠肇重修新利济桥道碑》

光绪十年（1884年）“嘉应州五属”立《重修绿野亭利济桥芳名碑》

从上述广、客修庙建桥的碑记，可以看出从1840年以后到80年代中叶绿野亭内部的社群关系特征：

第一、这一时期的广、客社群虽然合作进行了七次重修庙宇和坟山等项工程，但除了同治元年是由“广惠肇嘉应大埔丰顺永定”共同重修利济桥外，其他的六次工程均是由“广惠肇”、“客帮”、“嘉应五属”、“丰永大”等分别进行，这说明这一时期的绿野亭内部呈现“合中有分”的社群形态。

第二、在广、客呈现“合中有分”的同时，也表现出在总机构内部“分中有合”的另一面。例如，在同治八年客属修建福德祠大伯公碑中的副首事汤广生，其名字也出现在同治九年“广惠肇”修建福德祠捐款名单中。他为“广惠肇”的修建工程捐了六元，位居数百位捐款名单中的第10。另外，在光绪十年《广惠肇重修新利济桥道碑》中，客属的茶阳会馆、丰顺会馆亦合捐了250元，应和会馆则独捐了250元。这三个客属社团为捐款名单中数额最高者。

海唇福德祠原由广帮和客帮共同管理，当时分属广、客帮的两个司祝因事争吵，导致两帮构隙，后由总巡抚（警察总监）与华民护卫司出面调停，风波才告平息。这块遗留下来的诉讼碑是最好的证明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虎患猖獗，几乎每一期的周报都有若干人死于虎口的报道

[14]《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231-232。

[15]《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70-92、页231-247。

绿野亭内部的社群关系架构，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福德祠二司祝讼公碑》中被确认[16]。根据该碑文的内容，在绿野亭内部包括广、客三社群，即广帮的“广惠肇”、客帮的“嘉应五属”和“丰永大”。广、客权力与利益均等。碑文规定的广、客三社群在绿野亭内部的划分办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权利与义务等划分，为未来绿野亭内部各社群的权利、责任与经济利益的分配等问题奠下了重要的基础。

作为一个跨方言与祖籍地缘的新社群组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绿野亭内部建立在广、客三社群“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关系架构上的社群认同形态也基本确定下来。

根据账本、会议记录等文献，广、客三社群共有的“绿野亭认同”体现在绿野亭管理运作等的许多方面。在绿野亭的账本中，有一份光绪戊子年（1888年）八月至光绪庚寅年（1890年）七月修筑青山亭、绿野亭围墙等各项费用的支出账目记录。根据这份记录，当时修筑青山亭、绿野亭围墙等的各项费用共需银6434.15元。这些费用由福德祠的香油银、“广惠肇”、“丰永大”、“嘉应五属”四个部分的支付。在扣除了福德祠的香油钱后，尚需银4812.89元，“按四股”即2 1 1的比例，“广惠肇贰股”、“丰永大壹股”、“嘉应壹股”的方式支付[17]。这份记录表明，透过为庙宇与坟山的各项修建工程承担镭银经费，广、客三社群显示出其对共有的总机构的认同。另一方面，总机构在其运作中亦注重与强调其与属下社群之间的认同关系。以坟山管理与“春秋二祭”为例。在广、客三社群分别建立的冢山之后，为了凝聚属下社群，根据董事会议记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和十七年（1928年）春祭期间，绿野亭两次祭扫广惠肇碧山亭，两年支割草费工银30元[18]。绿野亭祭扫碧山亭坟山，显然有助于加强“广惠肇”的“绿野亭认同”。

在总机构内部，广、客三社群除共有的“绿野亭认同”外，还存在着对各自所属社群的认同。以下是笔者根据账本中有关1906年至1929年绿野亭分派属下款项及其使用情况的记录制作的表格（见附表（一））。

附表（一）的内容显示，一方面透过款项的分派与接受，显示作为总机构的绿野亭与属下的“广惠肇”、“丰永大”与“嘉应五属”之间互为认同之关系。另一方面，绿野亭内部社群认同的差异亦可从广、客三社群对款项不同的用途显示出来。“广惠肇”所分得的款项主要用于该社群所属的“养正学校”、“碧山亭”坟山和“广惠肇方便留医院”。而客帮的“丰永大”和“嘉应五属”总机构应和馆，亦透过款项的使用显示出与“广惠肇”不同的社群认同。

绿野亭社群整合与认同形态之建构为该社团管理系统的建立与制度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运作系统之建立与制度化

根据会议记录、账本等，绿野亭组织机构的建立，历经了一个发展演化之过程。附表（二）是笔者根据相关记录制作的表格。

根据附表（二）的内容，从1898年到1933年，绿野亭管理形态的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898年持续到1914年3月。在这阶段，广、客移民以福德祠为总部，以广、客两帮的商号如“协利当”或个人如“陈天送”，三或四年一任轮流管理总机构。

第二阶段从1914年到1922年。在这阶段，虽然福德祠仍是总机构的总部，但在民国三年三月（1914年3月）“香山会馆接管进支总结”，显示会馆开始取代个人或商号进入绿野亭管理系统，绿野亭组织机构开始趋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第三阶段开始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这一年绿野亭以广、客三社群为原则成立“董事部”，由属下的“广惠肇”九所会馆、“应和会馆”和“丰永大公会”等十一所社团派出20名代表，组成董事部来管理福德祠[19]。

上述三个阶段的演化不仅涉及绿野亭管理者和管理机构的制度化，亦有助于促进其内部的社群整合。

虽然福德祠在广、客社群内部的整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数十年中并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管理机

[16]《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92-93。

[17]《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378-380。

[18]《1837-1933年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256、270。

[19]有关1923年成立董事部与建立制度化组织机构与管理系统问题，下节还将具体讨论。

制。在《福德祠二司祝讼公碑》，首次确定“司祝”的社群所属和广、客分帮聘请的办法，“众请司祝四人，广帮二名、嘉应丰永大帮二名，其人归执年炉主酌请”。

随着绿野亭进入制度化的发展阶段，自开埠以来一直扮演总机构的福德祠，逐渐作为绿野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独立出来。民国三年后，“司祝”已不受社群所属的限制而回归庙宇管理者的身份。

坟山管理处理的是先人的茔葬事宜，所面对却是广、客三社群的生者，因而是绿野亭运作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绿野亭建构制度化管理系统的过程中，有关坟山的管理主要涉及坟山的埋葬形态、“春秋二祭”及“巡山制度”等内容。

根据文献纪录，到20世纪20年代，绿野亭坟山内已经确立“个人坟地”和“社团总坟”两类基本的葬地形态。有关个人坟地，所能见到的较完整的记录是1957年绿野亭坟山的迁葬记录，“有县籍姓氏者4341穴，无县籍姓氏者7177穴”，总计共有“1万1518穴”[20]。另一类埋葬形态是“社团总坟”。所谓“社团总坟”，是东南亚移民时代华人社团所创造的一种埋葬方式。“社团总坟”由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等不同类型华人社团设立于华人坟山内。绿野亭坟场内的“社团总坟”依其性质又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绿野亭属下各类社团建立的总坟，另一类是由绿野亭设立的“绿野亭总坟”。根据文献记载，在总机构创建初期，广、客社团就在青山亭设立总坟。例如，1849年刘关张赵四姓移民在青山亭建立“四姓先人坟墓”[21]。1840年以后，广、客社团继续在新开发的绿野亭坟山设立总坟。如1885年三水移民在绿野亭建立“三水义冢”等[22]。绿野亭坟场内的“绿野亭总坟”和“属下各类社团总坟”的分类，是绿野亭内部社群结构与认同形态在埋葬形态上的反映。

“春秋二祭”与“巡山制度”，是绿野亭运作与坟山管理中的重要内容。有关19世纪青山亭和绿野亭的祭祀先人记录，主要保留在碑文中。到了20世纪，与祭总坟相关的记载频繁地出现在绿野亭保留下来的账本与议案簿中。根据这些记录，绿野亭祭总坟开始于1920年，该年因“春祭”支出160元[23]。而“秋祭”则是在1928年才开始。另外，在民国九年至十六年的《福德祠绿野亭议案簿》中，亦有大量绿野亭董事部“祭总坟”的记载。例如1923年绿野亭成立董事部，此时正值清明节前后，董事部随即议决进行“祭总坟”工作，并成立了一个包括番禺、香山、南顺、东安、三水、冈州、惠州、肇庆、宁阳、永定、丰顺、嘉应、大埔、应和等会馆的代表共计15人所组成的“春祭”委员会，准备了“金猪”、酒、茶、鞭炮等“春祭之应用品”[24]。

“巡山制度”，即定期巡视坟场，以免坟场遭到破坏，这是绿野亭坟山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保留下来的账本中，有许多涉及巡山的费用支出。例如，1923年董事部成立，这一年的3月26日、4月14日、4月20日、4月29日、5月1日“董事往绿野亭看山车费”共花费60元[25]。从这一年开始直到账本记录结束的1933年，有关董事巡山车费的支出大量出现在账册中。这说明在1923年董事成立后，“董事巡山”已经成为绿野亭坟山管理的重要制度之一。

此外，绿野亭的坟山管理还包括修整道

[20] 陶公铸，《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纪念特刊·蔡厝港先人坟墓表》，页1-56。

[21]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2册）》（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页20。

[22]《广惠肇碧山亭118周年纪念特刊：三水会馆发展史略》（新加坡：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1988年）。

[23]《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三：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196。

[24]《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一：1920年-1927年会议记录》，页53-56。

[25]《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三：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214-216。

海唇福德祠是广客帮的重要庙宇之一

路、凉亭、割平坟场内过高的茅草等项常年工作。

1927年8月21日，绿野亭章程经同人大会通过，正式刊印施行[26]。这是绿野亭颁布的第一部章程。该章程的颁布，显示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演化，绿野亭已基本完成内部的社群整合与管理运作制度化的历史任务。

章程首次确定庙宇和坟山为绿野亭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将社团定名为“新加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这显示原本作为庙宇与坟山名称的“海唇福德祠”和“绿野亭”，透过章程的条规同时也被赋予社团组织的形态，进而确认绿野亭在百年发展中所承载的庙宇坟山管理机构与整合广、客移民社群组织的双重功能。在章程的“宗旨”条中，确认由广、客的“广惠肇”、“嘉应五属”、“丰永大”构成绿野亭的整体，规定“绝对保护维持福德祠绿野亭产业广客两帮七属广惠肇嘉丰永大义冢坟场为宗旨”，这既是对一百年来广、客移民在新加坡社会脉络下所历经的整合进程的总结，亦是以章程的形式，确认这个跨方言与跨地缘华人社团的社群边界。

在绿野亭一百年的历史演化中，其内部广、客三社群关系架构的确立，不仅直接制约这个社群组织在“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基础上“整合大群，凝聚小群”的认同形态，亦是该社团建构组织管理系统的基本与重要基础。1927年颁布的章程总结与确认绿野亭在百年社群整合基础上以广、客三社群为原则建构的组织管理系统，并将其条规化：

其一、以广、客三社群的会馆为社团成员设立董事部：

根据议案簿的纪录，有关绿野亭设立“董事部”的讨论，开始于民国九年四月的会议[27]。民国十二年，绿野亭正式成立董事部，由广、客各派10名、总计20名董事所组成。这一年3月25日的会议记录中有一份“癸亥年职员表”。这是在绿野亭保留下来的文献中，第一份完整的绿野亭董事部成员名单。根据这份名单，绿野亭确定由属下当年已经成立的广、客11所会馆为绿野亭的基本成员，即广属的番禺会馆、香山（后改为中山）会馆、宁阳会馆、冈州会馆、三水会馆、惠州会馆、东安会馆、肇庆会馆、南顺会馆；客属的应和会馆、丰（顺）永（定）大（埔）公会[28]。并规定在1926年以后成立的广、客之会馆不再具有会员的资格。这是绿野亭在创立一个世纪后，首次以章程条规的形式确定其管理机构和成员组成。

其二、以广、客三社群为基干的董事部组织法：

关于董事部的组织方式，章程规定“本亭祠设20人，计广惠肇10名，应和馆5名，丰永大公司5名组织之”。“由本董事部20名内推正总理、副总理、财政、司理各一人、查数两人。其余概为董事分任各项职责”。

章程也确定广、客两帮三社群“轮值”的管理制度。由广、客两社群轮流管理总机构，是自以福德祠为总部以来所形成的一项重要传统。章程以条规的方式规范董事部核心成员由广、客轮流担任的“轮值制”及具体办法：“本亭祠正总理、副总理、司理、财政为广客两帮双方轮值担任，两年为期。例如本届广帮担任正总理、司理，客帮则担任副总理、财政，下届互相更换。每届以两年为期，期满改选。惟财政员倘有挟款潜逃及负欠公款等情形，须有该帮负责偿还以维公款”。

章程还对正、副总理、财政、司理、查数、各部董事的职权、职责等，以及绿野亭召开董事会和同人大会等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

确认并规范绿野亭在20世纪初所建立的庙宇与坟山管理制度，是1927年章程的另一重要内容。这包括对庙宇“司祝”社群身份的解除、“春秋二祭”社团总坟、“董事巡山”等内容。

[26]《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附录一。

[27]《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一：1920–1927年会议记录》，页16–18。

[28]《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一：1920–1927年会议记录》，页50–52。

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发展，绿野亭在社群整合的基础上于1920年代建立制度化的组织架构和规范化的管理系统。1927年颁布的首部章程，总结与确认了绿野亭在新加坡社会脉络下所历经的一个世纪的社群整合与制度化建构的成果，亦为该社团在20世纪的发展提供了纲领性文件。

转型与发展

从1957年到1990年的30多年里，新加坡从殖民地时代进入独立建国的本土社会。在这一时代变迁中，绿野亭各项产业相继被殖民地当局和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所征用，绿野亭因而面临艰巨的重建任务。作为庙宇、坟山组织与广客宗乡社团的总机构，绿野亭的重建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新坟场等的建设，亦涉及内部社群认同感与凝聚力的促进与强化，从而推动该社团在新时代的转型。

从1824年“广惠肇”首次修建海唇福德祠，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绿野亭已拥有坟山、会所、福德祠庙宇、福德大厦等产业。这些产业不仅有效解决移民时代广、客移民的宗教信仰、身后的丧葬、祭祀等问题，亦为整合与凝聚两社群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1957年的新加坡仍处于英殖民地政府统治之下。这一年，殖民地当局实施大新加坡计划，征用了设立于1840年的绿野亭坟山。为此，绿野亭董事部召开同人大会，成立绿野亭坟山迁葬委员会，制定具体的应对之策[29]。根据《绿野亭碑记》[30]和各类记载，绿野亭派出代表与殖民地政府土地局交涉土地征用赔偿款项与筹建新坟场土地的划拨等各项相关事宜。经多次谈判，当局最终决定在蔡厝港拨出五英亩作为绿野亭新坟场用地。同时，在扣除了蔡厝港五英亩地价后，赔偿绿野亭“30万零757元4角5占”款项[31]。

在与殖民当局展开各项谈判之时，绿野亭着手进行坟山内先人遗骸的迁葬工作。基于绿野亭内部多元复杂的社群形态，董事部及迁葬委员会非常慎重地处理与迁葬相关的各项工作。除了将迁坟手续刊登在当时新加坡各大中西报刊上、印发传单通告属下各同人、聘请监工专职迁葬与登记死者等项外，特别注重对坟山内社团总坟与个人坟地的处理。迁葬之前，迁葬委员会勘察并记录了坟山内的广、客各类总坟之情况，同时妥善处理社团总坟的迁葬费问题。在个人坟地方面，迁葬委员会亦十分认真、仔细地做好死者的起骸和相关资料的登记

已被拆除的绿野亭公所

[29] 有关1957年绿野亭坟山征用与迁葬的记录，见〈绿野亭坟山迁葬委员会立议案簿：1957–1959〉，载《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二》，页320–401。

[30] 该碑目前仍在蔡厝港绿野亭坟场内。

[31]《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纪念特刊》，页6。

相关人物

卡奇克·摩西

历史事件

7月15日

英商卡奇克·摩西（Catchick Moses）创办英文《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

工作。从1957年11月21日起至1958年2月11日，起骸工作持续了近三个月始完成。

绿野亭其它产业的被征用，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此时新加坡已摆脱殖民地统治进入本土社会。为了解决二战后严重的屋荒等民生问题，新加坡政府自建国后即开始大规模的市区重建工程。在这项计划下，许多位于政府规划重建地段内的华人帮群坟山、会馆等均先后被征用或部分被征用。1985年3月28日新加坡政府在宪报公布，将征用绿野亭公所在的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海唇福德祠和福德大厦。1986年7月29日，市区重建局来信通知，征用福德祠的赔偿金是4万1000元，福德大厦的赔偿金为62万2680元[32]。

基于福德祠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宗教、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接到征用通知后，绿野亭董事部强烈要求政府能够保留这座历经新加坡开埠以来的社会变迁、蕴涵华人社会发展历史记忆的庙宇。另外，董事部认为政府支付的庙宇赔偿款与实际应赔数差别实在太大，根本无法进行庙宇重建。

鉴于在征用诸问题上与政府存在重大分歧，绿野亭在1986年8月通过派出代表与政府官员对话、属下社团联名上书等形式向政府表达诉求。然而，与政府的谈判与交涉持续了数年无果。无奈之下，绿野亭根据章程召开特别同人大会，决定将此案提交法庭。后经多方协调，绿野亭同意接受庭外和解，并接受政府所增加的赔偿额：福德祠的赔款额从4万1000元增至13万2124元。福德大厦的赔款额，从62万6280元再增加64万9319元，总共是127万1999元。由于缺乏重建福德祠资金，当政府征用福德祠和福德大厦与赔偿问题告一段落后，绿野亭董事部决议将被征用的福德祠内的神座与神明经火化送上天庭。1994年7月23日上午10时，在众多善男信女、属下11所会馆、各报记者、历史博物馆代表等百余人的见证下，经道士念经后的神像等物品被火化，只保留大伯公和城隍爷神像，请回芽笼（Geylang）新会所安放[33]。至于福德祠内的许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如雕刻对联、牌匾、石碑、香炉、古钟、大鼓等，则捐给新加坡历史博物馆永久保存[34]。

当各项产业相继被征用，绿野亭的重建也随之展开。

自殖民地政府同意划拨蔡厝港五英亩土地作为重建新坟场用地后，董事部即开始筹建工作。新坟场建设工程开始于1957年，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在这期间，绿野亭董事部领导下的迁葬委员会主持对政府土地局所拨地段的勘察与测量工作，确定以碑柱而非墓碑的方式，重新安置迁移自原绿野亭坟山的一万多具遗骸。与此同时，新坟场还进行了一系列建设工程。这包括填筑土敏土坪和水泥、建“绿野亭坟场”牌楼，牌楼内安置大伯公和大伯婆神龛、建绿野亭七属先人之总坟等[35]。

蔡厝港新坟场的各项工程在1959年初顺利完成。该年的3月20日绿野亭立《绿野亭碑记》记载新坟场建设的全过程和主持与参与的全体人员。1959年3月22日，绿野亭举行隆重的圆（峻）坟开光典礼，聘请法师为绿野亭牌楼内的主神土地公、绿野亭先人大总坟和新坟场的先人碑柱主持开光祭礼。绿野亭属下社团代表和董事部全体成员数十人参加了典礼，并在绿野亭坟场牌楼前合影，为绿野亭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见证[36]。

绿野亭重建的另一项内容是在1994年购买新会所。对华人社团来说，有了“会所”，就意味着社团成员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有一个社群认同的物质边界。当因资金问题无法重建福德祠时，董事部决定购买新会所。经多方奔波，1992年董事部标得克力路（Craig Road）三层楼店屋。1994年董事部再购买芽笼11巷17号两层楼店屋作为产业。该产业的一楼作为公会会所，大伯公和城隍爷神龛也安置在此，二楼则出租。至此，经历过殖民地时代到建国以来的数次搬迁，芽笼11巷17号一楼终成为了绿野亭公会的永久会所[37]。

伴随新坟场与新会所的出现，重建后的绿野亭不仅在

---

[32] 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叶福德祠征用的问题，见福德祠绿野亭资料室撰写的〈福德祠绿野亭大事记〉，载《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175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1999年），页114。

[33] 关于芽笼新会所，将在下节谈到。

[34] 绿野亭董事部，《福德祠大伯公庙搬迁小组第一次会议记录》（1994年6月18日）。

[35] 关于绿野亭大总坟等，下节还将讨论。

[36] 《绿野亭公所董事会议记录》（1959年2月28日）。

[37] 〈福德祠绿野亭大事记〉、〈福德祠绿野亭公会之演化历程〉，载《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175周年纪念特刊》，页114。

产业形态上发生重大变化，亦直接导致其内部的管理制度与社群关系发生改变。绿野亭在面对这些变迁与挑战中所做出的调整，也促使这个百年社团进入转型期。

当殖民地当局在1957年征用绿野亭坟山之后，随着以土葬为主的旧坟山被以在五英亩范围内由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碑柱组成、碑柱之下是先人骨灰瓮的蔡厝港新坟场所取代，绿野亭丧失原本处理移民身后丧葬的功能，实施了一个多世纪、并经1927年章程确认的坟山管理系统亦随之走入历史。

在社团功能与管理制度发生改变的同时，绿野亭内部的社群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在绿野亭坟山的迁葬过程中，作为社群认同象征的广、客各类社团总坟，绝大部分并不是迁移到蔡厝港新坟场，而是迁葬到各自所属的广惠肇碧山亭、丰永大坟山、嘉应五属义山。这样，1957年以后的绿野亭，其新建的蔡厝港新坟场中不再有广、客社团的各类总坟。

为了应对内部社群凝聚力的问题，绿野亭在蔡厝港坟场修建一座“绿野亭七属先人大总坟”，并在新坟场竣工典礼中举行隆重的祭总坟仪式。该总坟内并无先人骨灰或骨骸，仅具“绿野亭认同”的象征意义。与此同时，董事部在1958年6月6日的议案中，决定修整和祭祀在广惠肇碧山亭、丰永大坟山和嘉应五属义山内的“绿野亭先贤总坟”。不仅如此，根据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和相关的账册数据，绿野亭还通过分款的方式来处理与属下社群的关系。1957年殖民地当局征用坟山后，在其所赔付的款项中扣除新建坟场及各项相关费用，还余下30多万元。经董事会决定，绿野亭将该款项分成四份：12万元分给“广惠肇”、6万元分给应和会馆、6万元则分给“丰永大”，其余6万元则作为广、客三社群共有的福德大厦的建筑费用。这样的分款方式无疑有助于加强绿野亭内部的社群凝聚力和对总机构的认同感。

绿野亭的另一次转型是在新加坡政府征用海唇福德祠庙宇与福德大厦之后。此次征用，绿野亭失去了作为自移民时代以来一直扮演广、客社群信仰与凝聚中心的福德祠。更为艰难的是，此时绿野亭所面对的不再是殖民地当局，而是一个属于包括华人在内的全体新加坡人的国家与政府。在社会变迁的新时空环境下，绿野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

今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华人社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38]。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绿野亭再一次进行自我调整。在社团内部，绿野亭强调历经移民时代历史演化而形成的社群认同，继续承担总机构的功能。与此同时，绿野亭也将关爱扩大到全社会，关注和贡献新加坡社会的公益、教育与文化事业，并走出国门到祖籍地寻根和参与全球华人社团的跨国活动。

如前所述，受制于新加坡社会从殖民地时代到建国初期的发展变迁，绿野亭内部的社群认同与凝聚力曾面临诸多挑战。到了当代，面对年轻一代中华文化认同淡漠、传统华人社团逐渐老年化与被边缘化的困境，绿野亭透过重修章程、坚持与延续传统的“春秋二祭”等方式，继续坚持与强调与凝聚其内部的“绿野亭认同”。

绿野亭1927年颁发了首部章程。70年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绿野亭于1993年8月3日再次颁布经政府注册局批准的新章程。也就是在这部章程中，绿野亭的全称从“新加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改为“福德祠绿野亭公会”。

[38]《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页13-29。

1993年章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申与强调绿野亭内部的社群结构与组织形态。就社群结构而言，新章程第四条重申，“本公会成员为广惠肇九间会馆、客属嘉应州应和会馆、丰永大公会（丰顺永定大埔）”。在组织与董事会的组成方式上，新章程亦延续1927年章程的内容，“本公会由广惠肇九间会馆各派代表一人及轮值担任司理或财政之会馆多派一人共派10人，客属嘉应州应和会馆派代表5人，丰永大公会派代表5人，合共20人组成董事会”。

为了强调广、客三社群对总机构的认同，新章程还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如在第二章“宗旨”条第二款中，规定公会要“维护安置在广惠肇碧山亭、应和会馆双龙山坟场、及丰永大公会三邑祠内之福德祠绿野亭总坟和神主牌”。第四款规定“赞助广惠肇、嘉应州、丰永大之公益慈善教育事业”。

坚持与延续传统的“春秋二祭”，也是当代绿野亭强调与凝聚社群认同的另一重要运作内容。相关的记录显示，从1937年“秋祭”开始，董事部“春秋二祭”即涉及广、客所属的青山亭、绿野亭、碧山亭、毓山亭、嘉应五属义山等的所有社团总坟。该项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当代绿野亭常年定期举行的一项重要活动。在每年的三月和十月，福德祠绿野亭董事部都择日（通常安排在星期日），到嘉应五属义山、丰永大坟场、广惠肇碧山亭、蔡厝港坟场进行祭拜社团总坟的仪式与活动。

当代绿野亭的“春秋二祭”，在维系属下社群对总机构的认同、以及促进社团内部凝聚力等诸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关怀与奉献社会，热心公益事业，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传统。绿野亭也不例外。早在1958年，绿野亭董事部公议捐助南洋大学开幕贺礼200元。新加坡建国后，绿野亭继续以有限的财力支持与赞助社会公益事业。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野亭捐助广惠肇留医院、中华医院、同济医院、佛教施诊所、肾脏基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民众联络所、中国水灾等单位的款项达到数万元。

在绿野亭对新加坡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在李振玉会长任内所推动的出版《福德祠绿野亭丛书》与筹募“华社资料研究与出版基金”两件大事。

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从殖民地时代以来，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资料一直缺乏系统的记载、收集与整理，更遑论出版。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新加坡建国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和快速的市区重建情况下，各类华人历史记录，如帮群坟山、庙宇的金石碑铭、华人社团的会议记录、账本、名册等文献档案大量流失。这不仅使新加坡华人社会丧失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年轻一代的新加坡华人也因缺乏对历史的了解而无法传承前辈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与传统。因此，收集、整理与出版华人社团文献资料，保存和记载华人社会的发展历史，对于今天的新加坡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福德祠绿野亭丛书》与筹募“华社资料研究与出版基金”两项工作的推动开始于2004年1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振玉会长与笔者提及福德祠绿野亭所保留的一批珍贵历史资料。这批资料包括了民国九年（1920年）开始的会议记录、光绪年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2年）的账本等等。2004年1月19日，时任华裔馆馆长的吴振强与笔者等一行人来到福德祠绿野亭公会拜访董事部并就文献资料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会上，大家提议将这些文献交给华裔馆收藏、整理与出版。2004年3月25日，董事部会议正式通过了与华裔馆的合作计划。2004年4月16日，福德祠绿野亭与华裔馆在公会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移交仪式，正式将这批资料移交华裔馆。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当天以“福德祠绿野亭公会和华裔馆合作，华社资料共同保存”为题在“团缘”版做了大幅报道。华裔馆馆长吴振强在仪式上强调，“这是一个抢救历史文献的行动”。李振玉会长也在交接仪式上号召“有经济能力的会馆，带钱来参加这个历史文献的出版计划。经济有困难的会馆，欢迎他们利用基金保存历史档案”。

出版基金设立的消息见报后，得到广、客两属宗乡社团董事们及热心人士的支持与捐助，首批捐款已超过3万元。2004年6月20日公会举办绿野亭创立180周年庆典。庆典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在教育部与社会发展部及体育部政务部长曾士生的见证下，李振玉会长和吴振强馆长签署了合作协议书。庆典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则是为“华社资料研究与出版基金”筹募款项。李振玉会长在致辞中呼吁与会者为“华社资料出版基金”踊跃捐款，现场气氛热烈，包括曾士生政务部长、广、客各宗乡会馆、商界翘楚等纷纷慷慨解囊，至当晚庆典结束，共筹得出版基金7000多元。庆典大会后，“华社资料与出版基金”继续展

开筹款工作，到2004年12月31日，共筹得款项4万1457元。

绿野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工作在2005年完成。新加坡华裔馆以“新加坡华裔馆丛书：福德祠绿野亭系列”出版这批历史文献。该丛书由吴振强主编，“福德祠绿野亭系列”包括曾玲著、郭根维译的《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和曾玲编著的“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一、之二、之三”等四部专书。

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纷纷跨出国门，或组织回乡访问团到祖籍地探亲访友，祭拜祖先和神明，重建与祖籍地的经贸文化联系；或主办或参与全球性的联谊恳亲大会，广泛地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以及中国祖籍地建立联系网络。总之，跨国活动已经成为当代华人宗乡社团运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福德祠绿野亭属下的广、客社团也紧跟时代潮流。例如，客属总会与属下的客属社群于1996年在新加坡成功举办了第十三届世界客家联谊大会。2000年，广东会馆在新加坡筹办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第一届世界广东联谊大会。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许多广、客社团响应政府号召，纷纷组团回祖籍地寻根祭祖，同时运用与祖籍地传统的血脉与文化联系，为华人到中国从事经贸活动牵线搭桥。

面对时代发展的新潮流，绿野亭也在其会务中加入跨国活动新内容。1996年，董事部首次发起组织访问祖籍地旅游团，前往绿野亭属下11所会馆在中国的祖籍地进行14天的寻根访问活动。访问团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党政与侨办、侨联等部门领导的欢迎与款待。在会面中，除了与祖籍地的官员见面与谈叙，访问团也注重了解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同时领略祖籍地的人文地理和自然景观。

绿野亭的跨国活动，也包括了对区域华人宗乡社团的访问。2003年2月11日至14日，福德祠绿野亭董事部组团前往泰国合艾，访问合艾广肇会馆和合艾客家会馆。在合艾，福德祠绿野亭访问团与广肇会馆和客家会馆相互交流和联谊，双方互赠纪念品并拍照留念。

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福德祠绿野亭既是广府和客家移民的庙宇、坟山组织，亦是广、客宗乡社团的总机构，在华人社会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独立建国后，在社会变迁的时空脉络下，绿野亭努力跟上时代步伐，除继续团结广、客宗乡社群，也配合国家发展办理公益慈善文化事业，促进社会进步。绿野亭在近两个世纪的演化历程，是包括华人社会在内的新加坡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与新加坡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的社团组织，福德祠绿野亭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运作状况，显示当代新加坡华人传统宗乡社团在认同形态与社会功能等方面的一些特点。一方面，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具有多元、多层认同形态。绿野亭对社会公益、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关注，是从华侨社团转变为华人社团的绿野亭认同新加坡国家与社会的体现；而绿野亭透过“春秋二祭”等活动，显示其对“绿野亭认同”的坚持与强调，表明当代传统宗乡社团在国家认同之外，仍坚持和延续在移民时代发展起来的社群认同意识。绿野亭多元认同形态的存在，正是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传统华人宗乡社团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是跨国化和全球化。其主要的途径是广泛地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以及中国祖籍地建立经贸文化联系，以促进华人社团所在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从绿野亭的祖籍地寻根和出访东南亚华人社团，显示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此一新社会功能。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漳泉邑人于马里士他路创建梧槽大伯公庙

附表（一） 福德祠绿野亭分派属下社群款项及使用情况（1906–1929）

年代	分派属下社群的款项	使用情况
光绪丙午年 1906年	广帮 4128元	广惠肇学堂
	客帮 4128元	
民国丁巳年 1917年	广惠肇 1250元	养正学校
	丰永大 625元	
	应和馆 625元	
民国戊午年 1918年	广惠肇 1500元	养正学校
	丰永大 750元	
	应和馆 750元	
民国己未年 1919年	广惠肇 2500元	
	客帮 2500元	
民国庚申年 1920年	广惠肇 2900元	养正学校
	丰永大 1450元	
	应和馆 1450元	
民国癸亥年 1923年	广惠肇 4000元	养正学校
	应和馆 2000元	
	丰永大 2000元	
民国乙丑年 1925年	广惠肇 2200元	养正学校
	应和馆 1100元	
	丰永大 1100元	
民国丁卯年 1927年	广惠肇 4000元	养正学校
	应和馆 2000元	
	丰永大 2000元	转交客属总会捐款
民国己巳年 1929年	应和馆 5000元	
	丰永大 5000元	
	广惠肇 1万元	碧山亭 3000元 碧山亭修纪念亭 1000元 养正学校 3000元 方便留医院 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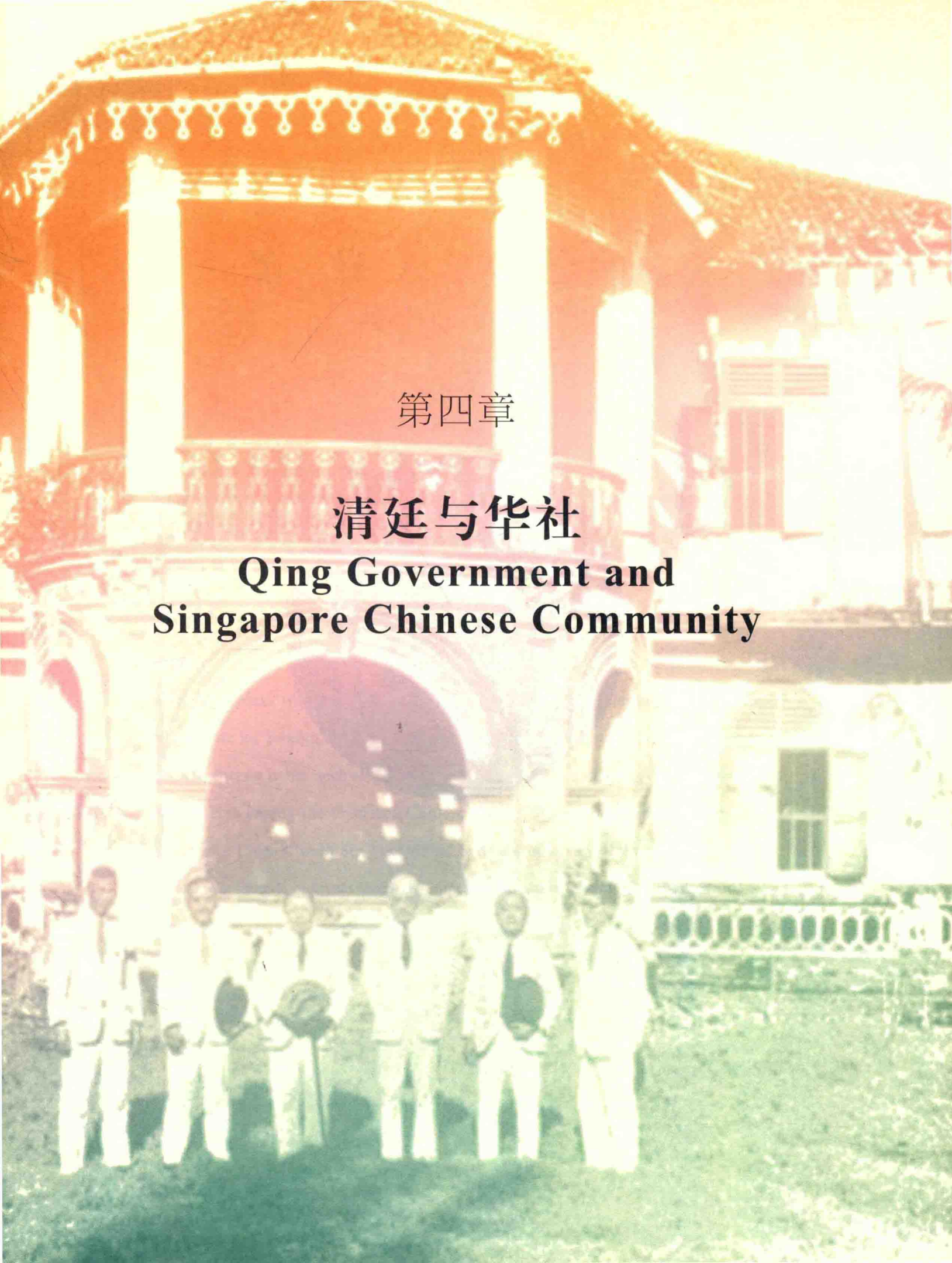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1837–1933年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附表（二） 光绪壬寅年至民国二十二年（1898–1933）

年代	管理者	社群所属
光绪戊戌至辛丑（1898年–1901年）	经理 陈泗隆	广帮
光绪壬寅至乙巳（1902年–1905年）	经理 协利当	客帮
光绪乙巳七月初十至戊申九月 （1905年9月–1908年9月）	经理 裕和号赵沛棠	广帮
光绪戊申九月初二至辛亥九月初二 （1908年9月–1911年9月）	经理 大和当郭吉川	客帮
辛亥九月初五至民国甲寅三月十六 （1911年9月–1914年3月）	经理 陈天送	?
民国甲寅三月十七至丁巳三月十三 （1914年3月–1917年3月）	香山（中山）会馆 信昌隆黄史卿代黄云辉收	广帮 应和
民国丁巳四月初十至庚申二月二十一 （1917年4月–1920年2月）	正总理 冈州会馆（广帮）广泰号朱述筱 副总理 大埔帮 朱锐宸 谭清源	
民国庚申三月十三日至癸亥二月初九 （1920年3月12日–1923年2月9日）	正总理 大埔帮 刘登鼎 副总理 肇庆会馆 牛车水何锐昌号何思观	
民国癸亥二月初九至乙丑二月二十八 （1923年2月9日–1925年2月28日）	正总理 番禺会馆 陈籍卿 副总理 应和馆 梁谷欣	
民国乙丑二月二十八至丁卯二月 （1925年2月28日–1927年）	正总理 应和馆 陈翼扶 副总理 东安会馆 陈子番	
民国丁卯三月十八至己巳三月初三 （1927年3月18日–1929年3月）	正总理 东安会馆 刘灿辉 副总理 应和馆 陈翼扶	
民国己巳三月初三至辛未年三月初二 （1927年3月–1931年3月）	正总理 丰永大 蓝禹甸 副总理 香山会馆 林煜	
民国辛未三月起至癸酉二月三十日 （1931年3月–1933年2月）	正总理 香山会馆 林煜 副总理 丰永大 蓝竞余	

资料来源：陶公铸，《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纪念特刊·历届职员表》，页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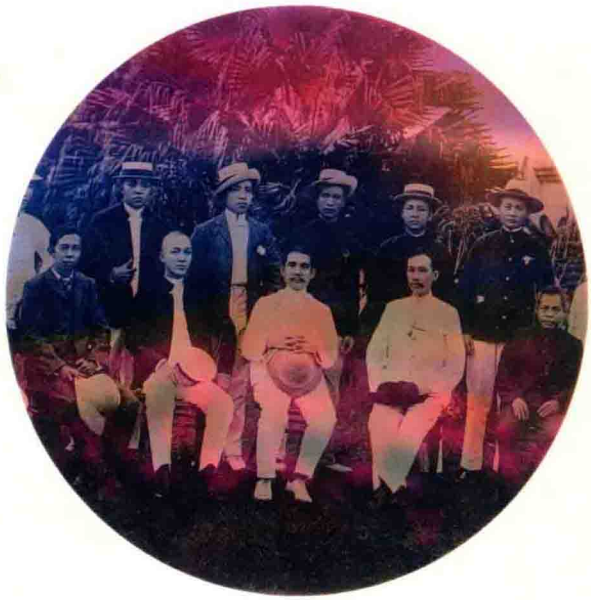
Chinese Theatre



第四章

清廷与华社

Qing Government and Singapore Chinese Community



第一节　八方风雨会星洲
——晚清官员访问新加坡

摘要

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设立总理衙门，处理外交事务，并派遣官吏出国访问，与西方国家政府谈判有关政治、外交、贸易与文化等课题，以及吸引侨民回国投资，推动国内企业现代化。他们在西方各国游历与参观，体察异国国情与先进技术，以便作为日后中国富国强兵的参考。同时，北洋舰队也多次访问海外，展示国威，吸取海外华侨的向心力。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Qing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n External Affairs Office responsible for foreign affairs. It sent delegations to the west to deal with Western governments on issues such as politics, diplomacy, trade and culture. They also sought investments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help modernise China's enterprises. Meanwhile, China's North Sea Fleet visited Southeast Asia several times to demonstrate its power in order to motivate Overseas Chinese's patriotism towards their motherland.

崔贵强 (Choi Kwai Keong)

鸦片战争（1840-1842）标志了满清王朝的解体，敲响了清廷走向衰亡的丧钟。此后的数十年间，日俄美及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雷霆万钧之势，掀起了侵略狂潮，摧毁了清廷的防御力量，导致了一连串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中国封建保守的锁国体制从此解体，使中国不得不与世界各国发生联系，建立起相互外交、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关系的网络。

总理衙门的设置

为了处理与外国的事务（夷务），清王朝遂于1861年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它是一个专管中外一切交涉的机构，实际上它也办理一切洋务新政，涉及外交、军事、吏治、工商、交通、财政、教育等。总理衙门由满清皇族奕䜣（1833-1898）集团掌管20余年，均无多大建树。但自太平天国起义被平定后，大批汉族官僚相继冒起，担任总督和巡抚者逐渐增多，他们甚至渗透到中央政府的机构，与总理衙门掌握实权的奕䜣相通气，构成了新兴的官僚集团。他们包括李鸿章、曾国藩、丁日昌及沈葆桢等人，形成了实力壮大的洋务派。

在洋务官僚之下，有一群支持洋务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洋务官僚的幕僚和助手，地位不高，但具有经世的思想，讲求“师夷长技”，主张在经济和文化上效法西人。这些人包括郭嵩焘、薛福成与丁日昌等人，为清廷派遣外国的重要官吏。

随着清廷与外国来往逐渐频密，总理衙门的职责之一，便是派遣官员到各国去。这始于1866年初斌椿等人的出使欧洲，考察当地的国情风俗。此后30余年间，直至清朝的覆灭，总理衙门之遣使外出，络绎不绝。

派遣使节团与代表团的人选、组织、行程、经费与活动，主要由总理衙门策划与决定，而地方总督如张之洞、盛宣怀等高官，以及农工商部等经济机构亦参与其事。

出国官吏大抵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官方使节团代表，负有向西方列强“致歉”及“谢罪”的使命；以及与西方国家政府就有关政治、外交、贸易与文化等课题展开谈判。代表团成员大多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分子，崇尚西方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及管理制度，因此在游历各国期间，他们参观了学校、工厂与政府机构，体察异国的国情，以便将心得带回中国，转为国家的施政经验，促进中国走向“自强”“富国”之道。他们也观察体会海外华人的社会风貌、风俗民情，注意到侨民的雄厚财力，以及对居留国所作的贡献，并向侨民灌输爱国的意识。

第二类访问代表团是由各类的高低官吏组成。主要任务是赢取海外侨民的财力支援，以推动国内现代化企业的发展。原来，自1875年光绪帝即位，随着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清廷割地及付出巨额赔款，国库空虚，财政枯竭。为求救国图存，清廷便推行经济近代化的庞大计划，其中一个途径，便是吸取侨民资本家的财富，以资挹注。因此派遣代表团到海外各地，向侨民巨商卖官鬻爵，劝请他们购买铁路、银行及矿物等股票。为了做好护侨工作，了解侨民实情，代表团的另一任务，是调查侨民的实业状况。除文官外，代表团还包括武将，北洋舰队曾多次访问海外，龙旗飘扬，威风凛凛，引起了海外侨情鼎沸，激荡了侨民的爱国意识。

19世纪下半叶的新加坡，已经发展为繁荣的商港，是东西往还的必经之地。因此到东南亚及西方国家访问的中国官员，在漫长的旅途上，往往都会以新加坡为落脚站，游览观光，劝请侨民支援祖国。

负荆请罪的访客

第一个到访新加坡的考察团，是在斌椿的率领下，前往欧洲考察民情风俗。随行者有张德彝、凤仪充当翻译官，他们都是同文馆的高材生，并有海关总税务司美国人赫德（Robert Hart）作陪。考察团于同治五年（1866年）2月14日离大沽入海，沿岸南下，经香港、西贡，于18日晨航抵新加坡。翌日北上穿越马六甲海峡，出印度洋，前往欧洲。考察团在欧洲游历九国后，然后循原路经新加坡北返国门。

考察团来去匆匆，只在新加坡先后逗留各一日，曾参观英国炮台，并游览酷地阔花园。眼见市郊处散布着许多洋楼与商肆，店主多闽粤人，中国人贸易者数以万计。华人仍流行送葬及吸食鸦片的习俗。华人中要算黄埔人胡璇泽（即胡亚基）最负盛名[1]。

[1] 张德彝，《航海述奇》，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帙11，页8679-8680。

晚清官员斌椿曾于同治五年（1866年）访问新加坡

斌椿所著《乘槎笔记》

1875年，云南省发生了玛加理（A. R. Margary）遭杀害的事件。玛加理原是英公使馆书记。是年被派往云南，参加英国探测队，企图开拓缅甸通达云南之商路，竟遭当地土民杀害。英政府故意渲染其事，硬指云南总督巡抚岑毓英为主谋，严加究诘，并命舰队进逼直隶湾，清廷只得俯首签字，遂有1876年《芝罘条约》之订立。条款之一是清廷必须派遣大使赴英国谢罪[2]。1876年，郭嵩焘被委任驻英法大使，于次年被派往伦敦负荆请罪，遂有西行之举。

赴英使节团以郭嵩焘（1818-1891）为首，刘锡鸿为副使，随行者有参赞官黎庶昌，翻译员张德彝、户部员外郎凤仪、苏格兰人马格理（S. H. Macartney）及随员多人，于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3日）离开上海，翌年1月21日抵达伦敦[3]。

1876年12月13日，使节团抵达新加坡，15日离新北上，只作两日勾留。轮船泊岸时，适值福建船政厂之扬武兵船亦巡洋至此，获提督蔡国祥、蔡国喜兄弟及胡璇泽前往接应。海峡殖民地总督泽维士（William Jervois）亦遣代表来迎，至总督府谒见总督及其家人。过后他们到福康宁山炮台参观，俾了解其装备及砲兵之组织。接着使节团到胡氏南生花园观光，对园中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及所陈设器物，叹为观止。随后在华民护卫司必麒麟（W. A. Pickering）的陪同下，前往洪家花园游览。洪家花园是闽广人公地，这里“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极清幽之致”。园中并豢养了鹿豹熊猿等动物，尤多而奇。他们也到法庭旁听诉讼案件之审讯，对法庭“规模整齐严肃，不闻喧嚣”，印象尤为深刻。据说，当时“新加坡约20万人，西洋人2000，番人及印度人盈万，余皆闽广人也，而粤人较多。据胡璇泽云，广属人已至7万之多”[4]。

1884年，晚清官吏蔡钧到访新加坡。在这之前，他先奉调出洋随使美、日、秘三国。乘轮先抵日本横滨，横渡太平洋至旧金山，再乘车至美国东岸的华盛顿与纽约，勾留了三个月，以视察驻美领馆业务。之后登轮渡海，横渡大西洋抵英国利物浦与伦敦，转程

[2] 刘彦，《中国外交史》（台北：三民书局，1962年），页80-81。

[3] 郭嵩焘，《使西纪程》，载《小方壶舆地丛钞》，帙14，页8843，8869；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1971年），页565、575。

[4] 《使西纪程》，页8846-8848；《郭嵩焘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卷3，页70-72。据统计，1891年，新加坡的总人口达18万1602人，华族人口有12万1908人。又自开埠以来以迄于今，闽南人人数均居榜首，约占40%以上，其次是潮人，粤人屈居第三。

相关人物

天猛公

历史事件

柔佛天猛公垄断了马来亚树胶买卖，新加坡西商会提出抗议

到巴黎、马赛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除了视察业务外，便是到处游览观光及观剧。之后转轮进入地中海，访问拿波里，出红海，抵埃及，横渡印度洋，抵锡兰，穿过马六甲海峡北端的槟榔屿，再南下直抵新加坡码头泊岸，然后驱车前往领事馆拜谒左领事秉隆，获得左领事的热情款待，赴市中观赏粤剧，游览市容。蔡钧的《出洋琐记》，留下了对当时新加坡的印象："华人约十万，闽人居七，粤人居三，殷实富盛之家，如潮人陈姓（陈旭年）、黄姓（黄亚佛），闽人（应为潮人）佘姓（佘有进后裔），皆拥赀三四百万，席丰厚履，他处所未有也"。"游览各处，所见贸易于市廛，负贩于道路者，皆中土人；……乡间耕植者，亦皆中土人也"。"途中所见，夏屋渠渠，书大夫第朝议第者，则陈黄两家之居宅也。虽远隔数万里之外，旅居百十年之远，而仍复奉正朔，遵服制，不忘官阀之荣，皇灵之震叠不既远关哉"！蔡钧只在新逗留一天，次日即解缆北行，经丁加奴前往越南西贡回国[5]。

早在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曾纪泽就在出使英法旅途中，稍事逗留数日。这期间，他获中国驻新领事胡璇泽款待，并游览市肆，对华人与市容印象深刻。曾纪泽出使欧洲八年后，于1886年5月交卸使英职务，10月10日，携带眷属自法国马赛乘搭轮船返国。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于光绪四年（1878年）奉旨出使英法，开始其外交生涯，处理中俄伊犁与中法越南交涉，显示了他是个出色的外交官。在返国途中，他们一行人于是年11月5日航抵新加坡。船泊岸时，中国驻新领事左秉隆率亲属登船迎迓，继后众人驱车到领事署休憩。

实际上，曾纪泽与左秉隆渊源甚深，当中国第一任驻新加坡领事胡璇泽因病故出缺时，曾纪泽即上奏极力荐举左秉隆接替领事职。在奏疏中力陈"（左秉隆）年力正富，学识俱优，通达和平，有为有守，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以之充补新加坡领事官，事属人地相宜"。左秉隆任期三年期满后，曾纪泽再度上疏，恳求留任左秉隆为领事。左秉隆驻新领事任期长达10年之久。

曾纪泽此次来访，与左秉隆晤谈甚欢。他们也一起去英总督府，拜谒总督夫妇，获得主人热情款待。嗣后，复在船上接见闽粤华商邱松龄等35人呈递颂词，显示海外侨民对清廷的忠诚。

曾纪泽一行人在新逗留三天后，乘轮北上经西贡、香港返国[6]。

1890年2月11日，法轮伊拉瓦底号（Irrawady）碇泊新加坡港口，载来了清廷出使英法义比大臣薛福成（1838-1894）以及随员共20余人。薛福成为江苏无锡之秀才。1865年助曾国藩平定捻军之乱，为曾国藩赏识，延揽为幕僚。李鸿章对他也畀倚甚重。薛氏主张效法西方，为崇洋派的积极分子。1884年被委为浙江宁绍道台，旋擢升为湖南按察使司，翌年出使英法义比四国。

薛福成一行人登岸后，候迎者有领事左秉隆及其侄儿左树南等人。他们在新加坡只逗留一天。在紧密的行程中，曾拜会了殖民地总督施密司（Cecil Clementi Smith），也到南生花园作短暂憩息。旋驱车到市内观光，只见市内商店林立，酒楼戏台无不具备。据悉新加坡约有华人十万余人，闽人居其七、粤人居其三[7]。

薛福成是个具有通商富国思想的维新人士，认为贸易会给地方带来财富，他十分关注当地土产的输出，认识到政府从抽洋药税与酒烟等税，每月可得85万元。贸易之盛，岁值至千余万元。

薛福成也提及萃英书院及陈金钟来谒见。陈氏原籍福建海澄，世居新加坡，经商致富数百万余，被授以暹罗领事职。他仗义疏财，对中国天灾与海防的捐助，一掷万金。他崇尚中国衣冠，惟言语不通，须用人传话。自称不忘中国，日后有事极愿效力[8]。

此次薛福成赴欧，是接任刘芝田（瑞芬）中丞出使四国大使。刘氏交卸后，回粤履新。返国途中，于1890年5月28日航抵新加坡。刘氏之来新，纯属私人访问，可免与当地英政府迎送酬酢之劳。是日清晨六时，左秉隆与左树南登船奉谒。接着，当地华绅吴夔甫偕劝捐委员汪竹斋亦登船拜谒。约八时左右，刘氏率随员上岸观光。先至领事府署用早餐，然后往南生花园游览。迨至下午三时余遄返领

[5]《出洋琐记》，载饶宗颐，《新加坡古事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页119。

[6]〈使西日记〉，载《小方壶舆地丛钞》，帙11，日记10；《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卷1（新加坡卷），页13-15。

[7] 薛福成，〈出使英法日记〉，载《小方壶舆地丛钞》，帙11，页9306；李雪涛主编，《出使四国日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页24-27。

[8] 薛福成，〈出使英法日记〉，页22-24。

事府署，时当地著名华绅包括陈金钟、吴进卿、邱忠坡、吴夔甫与李清渊等人已恭候刘氏之驾临，并奉上恭贺颂词。刘氏亦以诸商之恪遵中国文化，不忘父母之恩，深感欣慰。

1896年4月7日，老迈的李鸿章（74岁）及其随员50余人（包括儿子李经述及李经方）乘轮船抵新加坡。李鸿章是清廷重要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权倾一时，他也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曾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及北洋通商大臣。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曾代表清廷与日本缔结《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等地，俄国逼迫日本交还辽东半岛给中国，自居有功，并伺机扩展其对东方侵略的野心。恰逢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订于1896年5月28日举行加冕典礼，坚持要求李鸿章作为专使赴俄致贺，遂有李鸿章之西行。

李鸿章一行数十人，于1896年3月28日离开上海，经香港、西贡，4月7日抵新加坡。勾留一日继续西行。4月30日抵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之后遍游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美国与加拿大，10月3日返抵天津，为时半年有余。

在此之前，海峡殖民地总督米切尔（C. B. H. Mitchell）曾获得英驻北京代理公使的指示，李鸿章是以大使身份出国，当抵达新加坡时，政府应鸣炮19响致敬，亦获得伦敦殖民部大臣之同意[9]。同时，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弼士）通函当地各华商，届时各铺户门前应张灯结彩，以壮观瞻[10]。

4月7日晨轮船碇泊后，张振勋、代表坡督的华民护卫司、日本领事及多名华族绅商登船谒见，连同李鸿章等人登岸。是日然申码头（约翰斯顿码头Johnston's Pier）面貌焕然一新，屋顶上龙旗与米字旗迎风飘扬，间有盆花古树花篮点缀。码头上挤满人群，争睹李鸿章的丰采。访客好不容易才穿过人海，登上总督的马车，直驱总督府去。

在总督府内，总督邀约了当地著名绅商四五十人作陪，许多海峡侨生如林文庆、李清渊、佘连城及陈若锦等人都躬逢盛会，席间免除叩头跪拜之礼，代之以鞠躬屈膝。

下午三时许，李鸿章一行人遄返总领事署，接见另数十名华商，免不了彼此慰问。五时左右，再乘总督马车。往明丽园（前南生花园）游览，受到主人佘连城热情招待，之后直驱婆罗洲码头（Borneo Wharf）与欢送者告别[11]。李鸿章者番访新，适值《马关条约》订立后不久，新加坡华人多不齿其卖国行为，怨恨悲愤。政府为防患于未然，一路上严加保护，免生枝节[12]。

1901年7月31日，德国邮船拜仁号（Bayern）碇泊新加坡港口，船上有醇亲王（载沣）及其随员50余人。醇亲王是醇郡王（奕譞1840-1891）之第五子，1891年承袭父位，受封为醇亲王。1900年义和团起义，德国驻北京大使遭杀害。翌年，醇亲王代表清廷向德皇致歉。1908年光绪帝驾崩，宣统（醇亲王之子）嗣位，醇亲王做了监国摄政王，成为清廷实际的统治者。

7月31日下午二时许，拜仁号泊港，福康宁山上炮声隆隆，以示英政府之敬意。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罗忠尧，海峡殖民地副总督及本坡华商多人登船拜谒。码头上人山人海，争睹醇亲王的丰采。登船的华商有二三十人，多身披清朝官服，拜谒醇亲王时，均匍伏跪拜，行三跪九拜之礼。至于海峡侨生，以阮添筹及陈齐贤等人为代表，他们身穿便服，拜谒醇亲王时，并未行三跪九拜之礼。鞠躬之后，肃立一

[9] CO273/213, 05 & 06.05.1896.

[10]《叻报》，1896年3月30日。

[11]《叻报》，1896年4月9-11日；*The Straits Times*, 1896.04.07 & 08

[12] *The Straits Times*, 1896.04.08; Song Ong-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1967), p.289.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新加坡第一个有籍可查的学塾崇文阁创设于直落亚逸街天福宫左殿

旁。醇亲王一行人登岸后，乘总督府所备之马车，首往总督府拜候。接着往同济医院。医院前张灯结彩，中英国旗并排飘扬，陈设一新。在那里醇亲王再次接见众绅商，席中吴夔甫向醇亲王恭献颂词。颂词系以大红京缎书写尼金字，以檀香雕花匣盛之，多用黄袱包裹，极为精致。颂词中极力颂扬醇亲王之出洋游历，吸取欧西政制之长，为他日振兴中国之借镜，并祝皇太后与皇上福寿无疆。此外，海峡侨生亦以阮添筹与林文庆等人为代表，奉献颂词。颂词中声明他们是代表所有新加坡海峡侨生，表露了渴望中国日益富强之情，强调他们虽身在海外，但认定中国仍是他们的祖宗父母之邦，不敢忘怀，亦祈望朝廷不忘海外华民。他们虽在海外谋生，却遵循中朝制度、教化、风俗与正朔，热望王爷欧游后返国，辅助皇上维新，俾与天下诸强国并驾齐驱。阮添筹等人的颂词，曾掀起一场小风波，有署名Orang Puteh（白人）的海峡侨生，投函《海峡时报》的编者，否认阮添筹等人的代表性，并认为颂词中的措词，将会引起英政府对海峡侨生效忠英廷的怀疑，至为不当[13]。

嗣后，醇亲王一行人往李清渊的振裕园游览，在那里受到主人热情款待。离开别墅，返同济医院稍憩后，即登船。翌晨，德轮西航欧洲。

1902年5月1日晨，大清专使英国大臣载振贝勒乘英国邮船孟俄号抵新加坡，他是奉命参加英皇加冕庆典，前赴欧洲途经新加坡的。当轮船泊港后，中国驻新代理总领事吴寿珍、新派驻新尚未接篆之总领事凤仪、坡督代表及本坡绅商吴夔甫等人登轮谒见。迨至载振等人登岸丹戎巴葛码头时，福康宁山上鸣炮21响致敬。那时码头上，早已有各籍绅商代表鹄候，英兵排队奏乐欢迎。一行人先至东陵振裕园行邸憩息，并接受粤省保商委员吴桐林及李清渊等贡献颂词。载振亦鼓励众绅商矢志报国。

旋乘坡督马车往总督府拜谒坡督瑞天咸（F. Swettenham）。辞行时已是下午四时，复应佘连城之邀约，往明丽园（亦名蔚园）游览。“蔚园琪花瑶草，万紫千红，陂塘逶迤，竹树縈拂，时甫暮春，池荷着花，虫声唧唧”。载振游兴盎然，诗兴勃发，“咏诗曰：白华補入皇华咏，总是庭闱眷念时”。离开蔚园，一行人旋观光市容，由土库街（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直落中街（马吉街，Market Street），出老巴刹口，过丝丝街，上吉宁街（克罗士街，Cross Street），由应和会馆折入源顺街（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斜上天福宫，过粤海清庙，出十八溪墟（驳船码头，Boat Quay），绕入马车街（福建街，Hokkien Street），越二马路（新桥路，New Bridge Road）回振裕园行邸。“周历数里，观者如堵，欣欣有喜色，门前悬龙旗，结彩绸，栉比鳞次，旖旎生风”。载振见诸商恭敬之忱，不胜欣慰。入晚八时，贝勒即乘马车返邮船。翌晨，坡督、吴寿珍、凤仪及华商佘连城等人亲临码头辞行[14]。

自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出走西安后，为了遮羞门面，西太后便下诏罪己，下诏求直言，下诏变法，下诏立宪，此后五年内所行的新政，不过是“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于是在1905年6、7月间，便有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举。不过正当考察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束装待发之际，却发生了吴樾炸弹事件。徐世昌与绍英遇炸后，不果行，改派尚其亨及李盛铎出洋。

出洋考察代表团于1905年12月19日离开上海，由日本迳赴美国。翌年1月23日航抵华盛顿，访问白宫。2月15日从纽约赴欧洲，访问了德国、俄国、意大利、英国与法国，在欧洲前后勾留了约四个月之久。然后取道新加坡返国。首先是载泽、尚其亨及其随员约25人，于1906年7月2日乘法国邮船在然申码头泊港。中国驻新总领事孙士鼎及随员登轮晋谒，那时在码头鹄候的有坡督代表，英军仪仗队伍及华商40余人，绅商中包括李浚源、林维芳与吴寿珍等人，他们有的身披清廷官服，列队迎迓。此外，码头上到处人山人海。当载泽等人登岸时，福康宁山上鸣炮示敬，载泽及尚其亨乘坐了坡督特备的马车，迳往督府拜谒，而头等参赞左秉隆则代表两大臣到总商会去，向恭候的诸绅商致谢盛意。轮船碇泊新加坡仅数小时，到下午三时许，即启轮北上返国[15]。

7月12日，五大臣中的端方及戴鸿慈续抵达新加坡。除

---

[13] *The Straits Times*, 1901.08.03.

[14]《叻报》，1902年5月2、3日；载振，《英韶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页8-10。

[15]《叻报》，1906年7月3日；*The Straits Times*, 1906.07.02；Song Ong-Siang, *op.cit.*, p.398。

循例到总督府拜候外，并往振裕园行辕稍憩，复于下午六时至中华总商会，参加本坡诸绅商之筵宴，接受颂词，至九时许回轮安歇，翌晨北返。

任重道远的访客

19世纪80年代，已有部分清廷高官了解到海外侨民的雄厚财力，并注意到其处境的困厄。两广总督张之洞（1884-1889）在其奏议中（1886年10月11日），阐述了许多海外侨民受到殖民地政府与人民的虐待，渴望清廷的保护，遂建议清廷派舰队出洋巡视，以资保护侨民。他深信海外侨民对清廷舰队之建置，必将踊跃输将。据张之洞的估计，海外侨民每年的侨汇，高达两千万元[16]，建议为了激励侨民对祖国的捐助，对那些慷慨输将的海外团体与个人，应授予匾额与官衔[17]。薛福成亦在其奏议中（1890年2月3日）指出：中国的对外贸易，逆差甚巨，但海外华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苴。以新加坡而论，设领已13年，支销经费未满十万元，然各省赈捐，海防捐所获之款，实已倍之。而商傭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中国的，当亦不下一二千万元，这就是他认为领事一官不能不设之由[18]。

张之洞向海外侨民捐船的梦想虽未实现，但却成功地奏请总理衙门派遣代表团出洋巡视，俾了解海外侨民之困境，进而采取护侨之对策。

1886年8月26日，由王荣和与余璜率领之代表团离广州南下，前后历经东南亚与澳洲20余埠，至翌年秋方启程归国。他们首赴马尼拉，听取侨民的申诉。在西班牙政权的统治下，这里的侨民受害最烈。其被害各案，“或挟嫌故杀，或围墙故烧，甚至官长循私，巡查讹诈，暴敛横征，显违条约”。代表团接着到新加坡访问，与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官，礼意尚洽。据代表团的印象，英设华民护卫司专理华民事务，尚称公允，惟不向中国领事衙门报名情意，既不联络，而目击招工客馆作奸欺瞒，无从禁止，亦失保护之旨。代表团亦到过马六甲、槟榔屿、仰光、日里（Deli）、加拉巴（Calapan）、三宝垄（Semarang）。代表团发现到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华人横遭虐待，荷官横征暴虐，捐税繁多。最后代表团游历了澳洲的墨尔本及雪梨（悉尼）等地。回国之后，王荣和等向清廷献议，马尼拉与加拉巴的侨民受害最深，所到之处，商民睹汉官之威仪，尧天之覆，莫不欢呼迎谒，盛颂皇恩，迫切恳求清廷的保护[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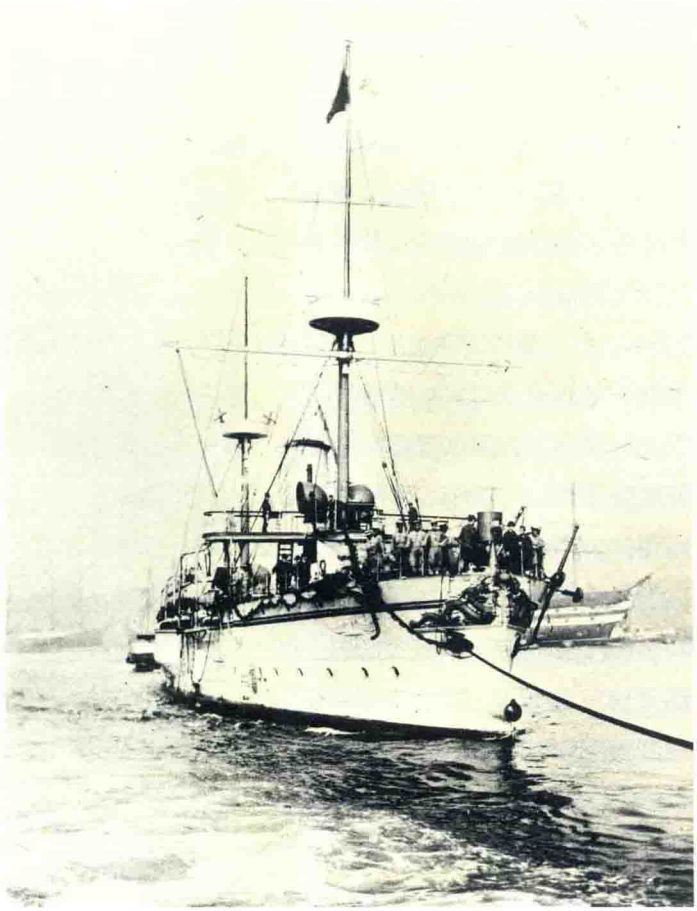
清廷的海军建置，大抵滥觞于福州马尾船政局之创立。当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便有意创设马尾船政局，并设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但左宗棠北调后，自1867年起，便由沈葆桢主持其事。在沈葆桢的推动下，马尾船政厂已粗具规模，船坞、兵工厂、学校与战船都先后建置起来。到了1887年，清廷更从德国购置了战船四艘，即致远、靖远、经远与来远等舰，是为后来北洋舰队的骨干。

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以华民“侨居异土，每受洋人欺凌，群情愤郁，延颈喁喁，仰冀国威，远加覆庇。故建议各埠侨商捐赀购造护商兵船，分赴各埠周巡护商，以便皇威远播，海外商民咸蒙义安之福”[20]。薛福成亦以“留寓外洋华民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国人所轻侮”为理由，奏请清廷酌派军舰周巡外洋，以张声势。他认为如侨商捐赀购护商兵船之议能

[16] 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卷15，奏议15，页6270。
[17]《张文襄公全集》，卷13，奏议13，页12-13；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卷74，页27。
[18] 薛福成，《庸庵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卷1（海外文编），页1117。
[19]《清季外交史料》，卷74，页22-25。
[20]《张文襄公全集》，卷13，奏议13，页1150-51。

付诸实现，则“海军省养船费而有历练之资，兵船无坐食之名而著保海之绩，商贾傭工捐费不多颇霑利益，使臣领事虽弱，亦倚声援，一举而数善备焉”[21]。于是派舰周巡外洋，扬威异域，宣慰侨民，笼络民心，成了晚清的既定国策。

北洋舰队曾经先后三次访问新加坡。第一次是在1887年11月10日泊港，勾留约一周，至17日才启航北归。原来清廷向德国购买了四艘战舰，自9月中旬驶离欧洲水域。道经直布罗陀、塞德港（Port Said）、亚丁（Aden）、科伦坡（Colombo）、新加坡与香港，然后北上大沽口归队。这次是因购粮煤，遂在新加坡勾留。舰队司令官是英国人龙君（Lang），曾受中国提督衔，在北洋水师充当教席。管驾（舰长）有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与邱宝仁。他们一行曾赴总督府拜谒，参加坡督金文泰（Clementi C. Smith）盛宴[22]，并蒙本坡绅商设筵款待，出席盛宴的包括陈金钟、李清渊、陈恭锡、陈若锦及颜永成等海峡侨生领袖。舰队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吸引了许多好奇与爱国的公众人士参观。参观人士不分贫富贵贱，包括了一些海峡侨生[23]。



致远舰（中国海军史专家陈悦供图）

1890年4月3日，北洋舰队第二次访问新加坡，勾留了约11日，始解缆赴马尼拉去。舰队由定远、镇远、致远、济远、经远与来远六艘铁甲组成，由丁汝昌与琅威理二公统带，各舰舰长分别为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方伯谦、林永升与邱宝仁。众将官登岸时，福康宁山上鸣炮17响致敬。欢迎的人群中，除领事左秉隆等人外，尚有坡督代表率领的枪兵一队。一行人曾拜谒坡督，走访领事府署，并乘坐坡督特备之马车，游览闹市。在新期间，丁汝昌以振裕园为停骖之所[24]。

北洋舰队的此次造访，与第一次访问之性质迥然不同。第一次是路过，驾驭者为洋人。而这次却是奉天子之命出巡，战舰共达六艘之多，器械之精，旌旗之盛，令人眉飞色舞[25]。舰队的南来，显然是要争取海外侨民的归向祖国，掀起了内向运动的热潮。

4月7日晚，左秉隆在领事馆设宴，邀约丁汝昌等将官出席，并有本坡绅商多人作陪。当宾客抵步时，有中国军乐奏乐，所奏者为西乐，间以华调。席间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海峡侨生代表恭奉颂词，强调他们虽生长海外，而寸心不忘君父，目睹战船来访，不胜欣慰。

丁汝昌等人在新加坡，酬酢甚忙，既有闽商陈明远与章芳琳邀约赴宴，本坡粤、潮、闽商亦分别设宴款待。他们曾簇拥至墨经梳律师楼（Burkinshaw），拜见老师曾锦文，行三跪九叩之礼，并呈上联合赠送老师之颂文，把老师恭维一番，充分表现了尊师重道的精神。原来曾锦文是槟榔屿侨生，却仰慕中国文化，曾应左宗棠之聘，任福州船政局教席之职，因此北洋水师初期学生，大都是曾锦文的高足[26]。

1894年3月3日，北洋舰队第三度抵新加坡访问，这次的舰队计有定远、靖远、来远与经远诸舰，亦由丁汝昌率

[21]《清季外交史料》，卷87，页1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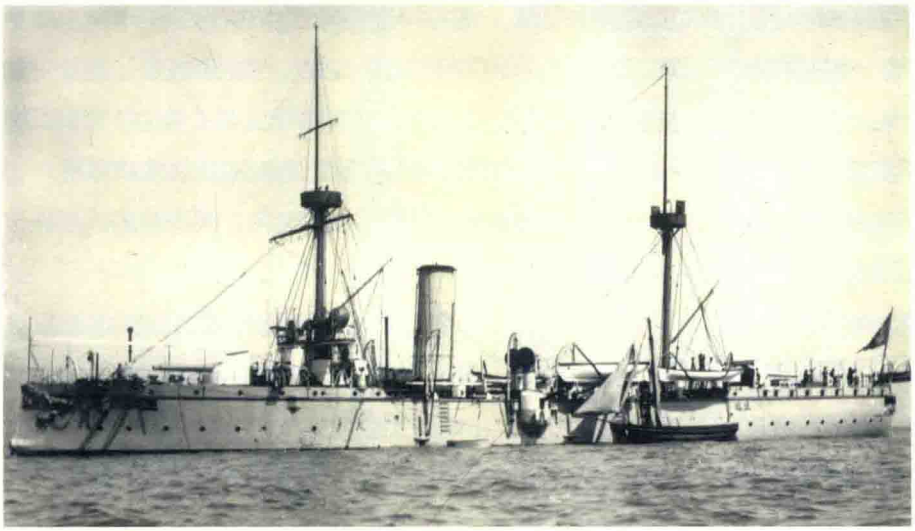
[22]《叻报》，1887年11月18日。

[23] *The Straits Times*, 1887.11.14.

[24] *Singapore Free Press*, 1890.04.03；《叻报》1890年4月10日。

[25]〈观中国巡叻战船有说〉，载《叻报》，1890年4月8日。

[26] 陈育崧，〈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载《南洋文摘》卷7 期12，页827。



北洋舰队于1887年至1894年间先后三次访问新加坡(中国海军史专家陈悦供图)

领。泊港时，福康宁山上鸣炮示敬。总领事黄遵宪等人到然申码头迎迓。与上次的情形一样，丁汝昌等人以振裕园为行辕，酬酢频仍。先是有粤商在万春园设宴，继后有闽粤各绅商在同济医院中陈设公宴，曾锦文亦在平安阁宴客。他们先后到资政第与蔚园拜候陈宜敏（陈旭年）与佘连城。这次的访问，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似引起更大的激动。“新加坡商民，衢歌巷舞，欢声雷动，各忻忻然有喜色”[27]。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廷已意识到海外侨民已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助于发展中国近代化的企业。自中法战争（1884-1885）与甲午战争（1894-1895）后，割地赔款，国库空虚，民穷财尽，清政府感觉到要救国图存，更非积极推动企业现代化不可，因此吸取海外移民资本，以支持国家企业的发展，便成为主要的途径之一。为了达致竭力吸取侨资的目的，清廷更频频派遣外交专员及使节代表团到海外各地游说劝捐。在芸芸众生的外交专员中，一个扮演桥梁角色的关键性人物，便是大名鼎鼎的张弼士。

张弼士又名振勋，1841年生于广东大埔县，家境贫寒，幼时只接受三年私塾教育。1858年，17岁，因家乡生活困苦，便离乡背井，远渡荷属巴达维亚城（即今印尼雅加达）谋生。他勤奋机智，经过多年的努力，便奠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后来又把投资实业，扩展到苏门答腊、马来半岛槟城及彭亨等地。他是卓著的种植家、金融业主、矿主、航运业主，积财钜万，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1893年，张弼士被委任为中国驻槟城的副领事，翌年复被调往新加坡，升任为总领事。他勤政爱民，促进了清廷与当地华人社会的联系。

1896年，张弼士奉召回国，协助盛宣怀策划兴建铁路，同时他也被委任为中国通商执行总裁。此后他本人也在中国各地设立公司，投资发展工商农矿业。另一方面，他也忙于穿梭来往中国与新马之间，向侨界推销铁路、银行与矿务等股票。

1898年9月初，张弼士以清廷高官的身份，到新马推销粤汉铁路的股票。为了推动销售数达200万两的铁路股票，乃在新加坡设立了一分公司，除了在报上刊登广告宣传外，他也联络当地富商，解释购股的潜在利益，吁请他们购买股票[28]。

张弼士雄于财，精明干练。1900年被召回国后，对处理与解决粤汉等铁路的难题居功厥伟，又协助发展中国的商务贸易。他疏财仗

[27]《叻报》，1894年3月6、7、10、13日。又参阅柯木林，〈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的历史反思〉，载《南洋学报》卷65（2011年8月），页17-61，很有参考价值。

[28]《叻报》，1898年9月30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5 月 24 日

霍斯堡灯塔举行奠基礼

义，慷慨输将，如1903年捐出20万两作为创立路矿学堂的经费，因此获得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召见。除了慰勉有加外，并授予三品京堂候补及侍郎官衔。1904年，清廷又委任他为对外考察商务大臣及农工商部总监。张弼士在国内仕途亨通，在南洋又素负盛名，获得当地侨民的敬重，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清廷再次派他到东南亚来筹款。

1905年杪，张弼士偕同商部部员时楚卿南来。他们于12月13日抵达新加坡码头，受到当地以吴寿珍为首的华族绅商热烈欢迎。是日沿街诸铺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途塞，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他们以同济医院为行辕，多日来积极展开活动。张弼士等人曾拜候总督、辅政使司及华民护卫司等殖民地官员，又与华商密切联系，华商频频设宴款待，酬酢甚忙。

此行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向侨界推销粤汉铁路股票，除了在报章刊登宣传外，还在新加坡委任罗奇生为代理商，罗奇生是当地广东帮的领袖之一，认股额多少不得而知。在槟城，负责推销股票的是南华医院，截至1906年3月，销售了七万多股[29]。

张弼士此行也促成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诞生。在一次聚会中，当地众绅商假同济医院设宴款待访客，并邀凤仪总领事作陪。席间张弼士吁请诸商扬弃畛域观念，各籍人士应一视同仁，有事则通融互相照应。当前的急务是创设商会，这一来不但使商情联洽，声气相通，且商权由此而兴，诸事易于筹办[30]。张氏首捐银3000元，以为首倡。经过一番筹备后，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终于1906年4月8日成立[31]。

不过，粤汉铁路的兴建，波折重重。首先是财政拮据，其次是董事间的意见对立，行政效率差，人人假公济私。股东大会与遴选董事常导致会场大乱，须电召军警来维持秩序。1911年，清廷宣布铁道国有化政策，粤汉铁路遂收归国营。

1900年，新加坡迎来了爱国诗人邱逢甲。邱逢甲原籍广东省蕉岭县，1864年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父亲是设馆授业的私塾老师。邱逢甲天资聪颖，幼承庭训，饱读经书，富有诗作天赋。1889年赴京考试中进士，任清廷工部主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邱逢甲返台，创建义军抗日。甲午战败后，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但邱逢甲领导的义军仍负隅顽抗，却寡不敌众，全台失陷，邱逢甲只得黯然挥泪离台，回返祖籍地蕉岭，长期从事书院教学工作。

1900年，广东省当局委派邱逢甲等人到东南亚察访侨情。联络海外侨商，以推进海外华商与中国商业贸易发展；另一方面，也向侨民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及华文教育的价值。3月初，邱逢甲一行人乘海轮从潮州出发，经香港、西贡于3月下旬抵达新加坡，获得邱菽园及华侨领袖的热烈欢迎。这期间，邱逢甲忙于演讲与应酬等活动，为推广商业贸易，宣扬儒学运动与建立孔庙而奔跑。他也在《日新报》发表了〈劝星洲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暨大学堂启〉，把孔教与基督教相比拟，认为宗教是具有生气与凝聚力的力量，企图把孔教定为国教，使它在中国社会中起着与基督教相同的作用。

这期间，邱逢甲也到坤甸、吉隆坡、马六甲、槟榔屿与芙蓉等地发表演说，传播中华文化。他曾赋诗一首〈自题南洋行教图〉记述了当时的情形，诗曰“莽莽群山海气青，华风远被到南溟。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

邱逢甲此行，历时三个多月，6月中旬，启程北返。

1905年，福建张亨嘉华商人向商部申请兴建漳厦铁路，并认为一旦陈宝琛被委任为经理，经费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申请终获批准。

陈宝琛（1848-1935）原籍福建闽侯，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1906年11月，他航抵新加坡，受到当地华人领袖热烈欢迎。闽籍商人设宴款待，场面异常热闹。陈宝琛打铁趁热，乘机在报上发表了长篇声明，阐明福建境内筑路的重要性。他强调铁路不仅有利于商务的发展，亦有巩固国防的功用。一旦漳厦铁路完成后，其他邻近各省如江西、浙江与广东皆蒙其利[32]。在另一粤籍人士所设的公宴中，陈宝琛再度呼吁华人消除畛域观念，捐弃

[29]《叻报》，1906年3月19、20日。

[30]《叻报》，1905年12月16日。

[31]《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厦落成纪念刊》，页150。

[32]《叻报》，1906年11月27、28日。

帮派成见，在福建省投资兴建铁路[33]。陈宝琛很快设立了销售股票代理商，多数代理商是闽籍商人与中华总商会理事[34]。

据说，闽籍巨商刘金榜购买了一万股；东兴号与金福和号可能购买了1万至1万5000股[35]。在槟城，卖出了3万8000优先股与2万至3万普通股。吉隆坡也有销售两万股的记录。最大的认股者，或许是怡保的胡子春，他买了20万股[36]。

漳厦铁路的修建开始于1906年。此后数年间迭经挫折。首先是资金不足，原订资本是600万元，每股5元，缴足资本只及半数，使建筑工程陷于半停顿状态。至1909年，只完成了约35里左右的路线。面临着财政的危机，陈宝琛辞职不干，由广东交通银行董事经理陈炳煌瓜代，这样的安排引起了股东普遍不满。随着1911年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漳厦铁路遂收归国有。

中国企业的近代化，还包括矿业的开采与银行保险业的创设与经营等等，清廷曾派遣代表团南来推销股票，也托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为推销。

远赴马来亚去的代表团，成功地说服了当地的华族资本家回国投资开采矿业。1906年，吉隆坡华商陈绍康、林焕章携巨款回惠州筹设矿务公司[37]。翌年，胡子春等人到琼州与广东永安探测矿源。胡子春有意计划在琼崖发展农牧矿业，终获农工商部批准，成立侨兴公司。1908年，胡子春又筹集了百万元资金，准备回国推动发展计划。1909年，再筹集了资金15万元，如获政府豁免征税，预计同年秋即投入生产[38]。

1907年3月，徐经明率领代表团访问新马，呼吁侨胞支持银行、轮船与保险公司的设立。徐经明抵达新加坡后，即在《叻报》发表一连串声明，说明此行目的，促请公众人士踊跃认股。他强调筹集众人资金创设公司，是赚取利润最好的办法。银行、轮船与保险业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影响侨民既深且巨。依照其章程，总行设在上海，分行将设在海外各大埠[39]。该联合企业将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经营。

徐经明在新加坡勾留三周，各籍华商都答应帮忙设立代理处，以方便公众人士认股。他亦先后访问了槟城、吡叻、雪兰莪、森美兰与马六甲。

新马华族人士认购热烈。截至1907年10月，新马的认股额达致230万元[40]，其中新加坡约占100万元[41]。

总的来说，清廷有意吸取侨民资金来推动中国企业近代化，并没有达致预期的效果，基本上是失败的。据颜清湟的研究，失败的原因有二：第一，海外华资的附庸性与从属性。海外华人经营的事业，大多是传统保守的家庭式的，特征是小资本与小经费，无法取代外资，从事现代化企业的投资。第二，中国经济的保守与官僚性质。许多官员表现的消极态度，地方官员对海外投资者恶劣的行径，欺诈与剥削，缺少立法保护，使海外华族资本家裹足不前[42]。

[33]《叻报》，1906年12月4日。
[34]《叻报》，1907年1月2日。
[35]《叻报》，1906年12月20日。
[36]《叻报》，1906年3月20日。
[37]《叻报》，1906年10月6日。
[38]《叻报》，1909年6月19日。
[39]《叻报》，1907年3月11日。
[40]《叻报》，1907年10月1日。
[41]《叻报》，1907年10月12年。
[42] 参阅颜清湟，〈海外华人与中国经济现代化，1875-1912〉，载《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页330-331。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9月1日

三州府由印度政府直接管辖

还有一些来访的官吏，是奉命到海外来考察侨民的业务，调查侨民实况，宣慰侨情的。

1907年，杨士琦奉命出使东南亚各地，执行考察侨民商业，调查侨民实况的任务。杨士琦安徽举人出身，负着农工商部侍郎官衔。在海圻、海容两艘带甲巡舰护航下，于1907年10月26日由上海启程，经香港抵马尼拉，获得当地华人盛大欢迎。续航抵西贡、曼谷与巴达维亚（雅加达）等地，转赴新加坡，于12月5日晨碇泊码头。左秉隆总领事及中华总商会正副总理登轮拜谒。然申码头挤满人群，其中包括商会协理议员及各籍绅商，坡督亦派有枪兵一队及军乐前往迎迓。杨士琦一行人登岸后，即到总督府拜候，旋转赴总领事馆与商会，以商会为行辕。是日市内许多华人商店，都高悬龙旗，张灯结彩，欢迎杨侍郎的访问。是晚，商会设宴款待，左总领事及各籍绅商均躬逢盛会[43]。在新期间，杨侍郎除忙于酬酢外，更接见了道南、崇正与端蒙学堂之监督及师生，并予以诸多勉励。他也为道南学堂题额："斯文在兹"[44]。9日，海圻、海容公开展览，吸引了许多华籍观众。翌日即离新开往巴达维亚。

以下是杨士琦对新加坡的印象："新加坡幅员甚少，农产亦稀，自英人开埠后，免税以广招徕，由是商舶云集，百货汇输，遂为南海第一巨埠。华侨二十余万人，工商而外，擅陂沿园林之利。商会成立最早，势力甚雄，英官颇假以事权，而海外各商会亦以此为枢纽。学堂四所，课程规则悉遵学部，定章宗旨纯正"[45]。

这类官员的到访，还有农工商正郎王大贞，1909年4月9日抵达，13日离新；钱洵、董鸿祎，官衔分别是太守与孝廉，到访日期是1906年12月3日；以及农工商部郎中赵从蕃，于1911年访新等官员。

访新的历史意义

19世纪70年代，清廷洋务派的核心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及李鸿章等人，意识到对外遣使的重要性，并在舆论上占了压倒性的优势，促成了总理衙门派遣驻外使节的决心。

自1877年初郭嵩焘等人赴伦敦建立了驻英使馆后，清廷便陆陆续续派遣驻外使节，至1912年清廷覆灭，派出的使节达57人，主要派驻的外国计有欧洲的英、法、德、俄、意大利及比利时等国；美洲的美国、秘鲁、巴西及墨西哥等国，以及东方的日本。

这些使节团在赴任或返国途中，往往在漫长的旅途中，短暂驻足新加坡，他们对新加坡的严密行政制度，自由贸易政策带来的经济繁荣，社会的井然有序，以及华人侨民的雄厚经济实力及其对清廷的忠诚，具有深刻的印象。

中国驻外使节负有双重使命，一是办理外交，另一个是考察外国政情，作为国内变革的借镜。因此在职期间，他们除了致力于保护海外的华工华侨，免受外人的虐杀与剥削外，还到处参观学校、博物馆、炮台、兵工厂、造船厂、现代化机械工厂、法庭、行政机关等，也深切关注西方的社会状况、风土民情。经过了留心的观察与深切的体验后，他们扩大了视野，对西方的民主政制、先进的国防与军工业、最新的科学技术、注重实用的西方教育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认为这一切是西方国家国富民强的部分基因。

总理衙门要求驻外使节对总署须提呈详细的报告，并有行程日记、使事日记缮交总署。光绪年间，驻外使节及其随员的日记、旅行记已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以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崔国因等人的出使日记最有价值。加上他们提呈的奏疏，及他们与曾国藩、李鸿章及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过从甚密，他们向清廷提出种种改革，包括推进国防军事现代化、引进先进机器设备、发展近代军工企业、改革国内经济建设、铺设铁路和开采矿业、发展工商业，以及教育与宪政的改革等。他们的建议与议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晚清官吏的访问新加坡，以及当地华民的反应，表现了当年新加坡华民浓烈的热爱中国意识，尤以华族资本家与上层阶级分子为甚。高官武将所到之处，群众多张灯

[43]《叻报》，1907年12月5日；*The Straits Times*, 1907.12.06。

[44]《叻报》，1907年12月10日。

[45]《清季外交史料》，卷2万10，页435。

李清渊的振裕园曾多次充当来访中国官吏的行辕

结彩，刷新市容，列队欢迎。而华族社会领袖，包括华南移民社会领袖胡璇泽、邱忠坡及吴寿珍，以及海峡侨生社会领袖陈金钟、李清渊、林文庆等人，几乎倾巢而出，联合起来，前往码头迎送，设宴款待，奉献颂词。李清渊的振裕园，甚至被充当为中国官吏的行辕。在谒见醇亲王或其他高官时，移民社会领袖多身披清朝官服，行三叩九拜之礼。而海峡侨生社会领袖则身穿便服，弯身鞠躬以代。颂词中表达了他们认定中国仍是其祖宗父之邦，表达效忠中国之情。

移民社会领袖在满清官吏面前，表现效忠中国，愿为中国富强效犬马之劳，是意料中事。但海峡侨生却是土生土长，自小受西方教育与文化的熏陶，并身为英国籍民，受到英殖民地政府的宠幸，竟作出了以中国为祖国，愿意为祖国效忠的表现，却有些意料之外。实际上，有些海峡侨生的热爱中国，不仅仅止于言词，更是身体力行，投奔中国服务，如精通多国语文的辜鸿铭（1857-1928），福建同安人，游走于中西文化间，得心应手，他曾为张之洞做幕僚，长达25年。曾锦文（1851-1920），精通中、英、巫三种语文，曾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及《西游记》等中国名著译成马来文。在槟城大英义学毕业后，就到福州海军学校学习，后来受聘于左宗棠，任福州船政局副教席之职。北洋水师的学生，很多都是他的门生子弟。伍连德医生（1872-1959），广东台山人，曾获女皇奖学金赴英国学医，后来到中国服务。1910年，哈尔滨发生了“黑死病”，死人无数，终为伍医生扑灭，成为名符其实的“瘟疫战斗者”。阮添筹生于新加坡，先在莱佛士书院受教育，后赴英学习法律，旋返新执律师业。1904年赴中国，做了王子澍的幕僚。

19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两大主流——移民与海峡华人，基本上是处于和谐与互助的状态。他们的领袖私谊弥笃，彼此仰慕敬佩，同心协力，合作无间，出钱出力，共同为华社创设庙宇、会馆、医院、学校与慈善机构，造福广大的华人社群，促进华社的进步与繁荣。海峡华人也仰慕中华文化，恪守中国的传统习俗，他们一方面受惠于殖民地政府的恩宠，另一方面也对积弱的清廷忧心忡忡，耿耿于怀，效忠祖国。

可是到了20世纪，由于时间的推移，与囿于形势的变化，殖民地政府对海峡华人的宠幸与偏爱，极力提倡英文教育；而对华人移民的冷漠与华文教育的压制，致使海峡华人改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维多利亚街的圣婴女校开始兴建

变了对华人移民的态度，由合作而鄙视，两者关系渐行渐远。至于由专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新加坡，设立行辕与代理处推销企业股票，虽有反应，却碍于主管的官员消极态度，与客观的华侨资金的局限性，并未达致预期效果。

英殖民地官员对来访的客人，表面上是遵守外交礼仪，尽了地主之谊的责任。当中国高官航抵码头时，总督派代表去迎接，并备马车把访客带往总督府去拜谒总督，总督亦设宴款待。有好几次华民护卫司还陪伴访客参观炮台、名胜，以及观览市容，最后欢送访客离去。对于来新推销实业股票、劝买官衔、以及调查侨民实况的官员，殖民地政府也不便加以干扰。实际上，殖民地官员对中国驻新领事连同远方访客的活动，提高侨民的爱国意识是有所不满的。如华民护卫司毕麒麟就曾给英国殖民部大臣致备忘录，指出来访客的活动，会给当地侨民带来恶劣的影响。驻新领事也经常越俎代庖，擅自颁发船主牌照与护照，目的是抽取税收。殖民地官员还埋怨中国官员向侨民施压，以达致劝捐及鬻官的目的。清廷的鬻官卖爵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引起了一些海峡殖民地官员的惶恐，向伦敦殖民部大臣建议，对那些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有功于社会的华人领袖，赐予更多的英殖民地官衔，来抗拒清廷笼络新加坡侨民的政策。

附表
访问新加坡的晚清官吏一览表

姓名（舰队）	抵新日期	离新日期	官衔	访问性质	资料来源
斌椿	1866.3.4	1866.3.5	山西襄陵县知县，副护军参领，衔三品顶戴	路过	《航海述奇》 《乘槎笔记》
郭嵩焘	1876.12.13	1876.12.15	署理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侯补侍郎，驻英法大使	路过（赴英就公使职）	*Eminent Chinese of Ching Period*; 《随使日记》；《使西纪程》； 《郭嵩焘先生年谱》
蔡钧	1884.3.?	–	四品京候，出使日本大臣	路过（由欧洲归国）	《出洋琐记》
曾纪泽	1886.11.5	1886.11.8	驻英法公使；钦差兵部左侍郎	卸职返国路过	《使西日记》
王荣和 余璠	1886.8.26	?	王荣和（副将） 余璠（候选知府）	访查南洋华民商务	《清季外交史料》 《李文忠公全集》
北洋舰队	1887.11.10	1887.11.17	邓世昌（提督衔，纪名总兵，北洋海军中军中营副将） 叶祖珪（北洋海军中军右营副将） 林永升（北洋海军左翼左营副将） 邱宝仁（北洋海军右翼左营副将）	购粮煤	《叻报》；〈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
许竹箕	1888.1.13	?	驻德、法、奥、荷等国公使侍郎	路过（由欧返国）	《叻报》
张樵野	1889.11.27	?	出使美日秘大臣	路过（由欧返国）	《叻报》
梁逢云	1890.2.?	1890.2.6	驻旧金山总领事	路过（由欧返国）	《叻报》
薛福成	1890.2.11	1890.2.11	湖南按察使司；驻英法义比四国公使	路过（出使英法等国）	《叻报》；《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北洋舰队	1890.4.3	1890.4.13	丁汝昌（海军提督） 琅威理（提督衔纪名总兵）	扬威异域，宣慰侨民	《叻报》；〈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記〉；*Singapore Free Press*
刘芝田（瑞芬）	1890.5.28	1890.5.28	广东中丞（巡抚）；驻英、法、义、比四国公使	路过（卸公使职，由薛福成接替，由欧返国）	《叻报》 《西征纪程》
陶渠林 王芷帆	1891.3.13	?	陶渠林（观察轰甲；驻德京公使） 王芷帆（太守大庆；驻俄京公使）	路过（由欧返国）	《叻报》
北洋舰队	1894.3.3	?	丁汝昌：同上 琅威理：同上	扬威异域 宣慰侨民	《叻报》
李鸿章	1896.4.7	1896.4.7	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路过（赴俄参加庆典）	《叻报》；*The Straits Times*；*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吕镜宗	1897.12.11	1897.12.12	驻德国大臣	路过（赴德就职）	《叻报》
丘逢甲	1900.3	1900.6	工部主事	抚慰民情宣扬文教	徐博东《丘逢甲传》
载沣（醇亲王）	1901.7.31	1901.8.1	监国摄政王	路过（赴德请罪）	《叻报》；*The Straits Times*
张在初	1902.4.8	1902.4.9	英义比国公使	路过（赴欧履新）	《叻报》

姓名（舰队）	抵新日期	离新日期	官衔	访问性质	资料来源
载振	1902.5.1	1902.5.2	二等镇国将军贝子衔	路过（赴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庆典）	《叻报》；《英韶日记》；《清史稿》
罗稷臣	1902.7.5	1902.7.6	驻英京钦差大臣	路过（由欧返国）	《叻报》
杨诚之	1902.11.18	1902.11.18	驻比国公使	路过（赴欧履新）	《叻报》
载伦	1904.8.3	1904.8.4	贝勒	路过（由欧返国）	《叻报》
张振勋（弼士）	1905.12.13	?	太仆寺正卿，侍郎，头品顶戴	查察商务 宣慰侨民	《叻报》；《槟城散记》
载泽 尚其亨	1906.7.2	1906.7.2	载泽（驻法公使；辅国公；贝子衔） 尚其亨（会臣）	路过（由欧返国）	《叻报》；《清史稿》
戴鸿慈 端方	1906.7.12	1906.7.13	戴鸿慈（刑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 端方（湖广署理总督，两江署理总督）	路过（由欧返国）	《叻报》；《清代七百名人传》；*Eminent Chinese of Ching Period*
陈宝琛	1906.11.27	1907.1.23	侍郎侯补，内阁学士	推销漳厦铁路股票	《叻报》
钱恂 董鸿祎	1906.12.3	?	钱恂（太守） 董鸿祎（孝廉）	稽查华侨工商业务	《叻报》
徐经明	1907.3.10	1907.3.31	道台观察	推销银行与轮船股票	《叻报》
杨士琦	1907.12.5	1907.12.10	农工商部侍郎	考察华侨商业 调查海外侨民实况	《叻报》；《清季外交史料》；*The Straits Times*
王大贞	1909.4.9	1909.4.13	农工商部正郎	宣慰侨民	《叻报》
赵从蓉	1911	?	农工商部郎中	考察侨民商务	《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第二节　我视新洲成旧洲
——中国驻新加坡领事

摘要

本节探讨晚清政府改变从弃民到护侨的侨务政策的原因，中国在新加坡设立海外第一间领事馆的历程及几位杰出的驻新领事（左秉隆、黄遵宪及孙士鼎）的事迹；维新与辛亥革命运动对驻新领事工作与形象的影响。本节也描述1912年至1950年国民政府领事与国民党团的双轨侨务管理运作，以及中新建交与1990年以来驻新大使一览。

Abstract

This section traces the circumstances that led to Qing government's change of its policy from one of abandoning to one of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1870s,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first overseas consulate in Singapore; highlights of significant consular work by prominent diplomats such as Tso Ping Lung, Huang Tsun Hsien and Sun Sze Ting;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Chinese reform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n Qing consuls' work and reputation. This section also explores the dual-track manag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by Kuomintang's (KMT) Republican government through local consulate and KMT party organization from 1912 to 1950. Lastly, a brief introduction is appended as an epilogu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gapore's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in 1990 with a lis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mbassadors to Singapore since 1990.

林孝胜（**Lim How Seng**）

设驻外领事和护侨护商是近代国际关系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是驻外外交官的重点工作。但对清廷来说，这些都是很遥远的事，也不屑一顾。当西方历经工业革命，到处扩张领土，争夺海外殖民地，掠夺其资源以养国内民族工业的时候，中国还处在闭关锁国，惟我独尊的境地。清朝自1644年入主中原后，奉行天朝体系，自认泱泱大国和自给自足，为万邦之主，没有和外国通商的必要。外国则是蛮夷之邦，是中国的藩属。在天朝体系下无所谓国际关系，只有宗主国和藩属关系，也无所谓外交，只有朝贡来往。清廷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是漫长的路，国家和人民为此都付出惨痛的代价。

面对郑成功抗清，满清入主中原后施行海禁，不准国人出海贸易或居留。凡官员兵士人民，私自出海者，当私通贼论，斩[1]。1740年，印尼雅加达发生“红溪惨案”，近万名华人被屠杀。清廷的经典反应是指他们为弃民，被屠杀活该[2]。

1685年，清廷开始苏醒，开海禁，允许外国洋行通过中国公行进行交易及和官府交涉。外商必须住在公行的商馆里，不得随意出门，等同软禁。外商除了经商期间也不准到广东[3]。英人试图将中国贸易之门敲开大一点，遂有1793年派特使到中国之举。

清廷领事馆设置与华社（1877–1911）

天朝的余晖：1793年英国使节访华

18世纪，西方历经工业革命，都殷切把产品销到中国，却遇到重重困难。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大使马戛尔尼（Earl of Macartney）来华请求改善广东通商待遇。当时正逢乾隆八旬万寿，大臣就一厢情愿地把马戛尔尼使节团当着是来祝寿，恩准他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大清帝国皇帝乾隆。当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违背礼仪，没有行叩跪之礼，只单膝下跪献上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及礼品。乾隆却当着是一般贡品而已，还责难英使在礼品单上自称“钦差”一词，而降旨要其改为公差，以符天朝体例。乾隆赏赐他一席筵宴，且下了两道敕谕给英王，拒绝所请[4]。这是清朝帝国的余晖，保持了天朝的威严。西方各国意识到文斗不行，只好试图武攻闯关了。中国禁烟提供了西方动武最及时的机会。两次鸦片战争改写了清朝和西方列强及和海外华人的历史。

天朝的衰落：两次鸦片战争

1838年（道光十八年），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大大影响到英国的利益。1840年6月，中英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的清政府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割让香港给英国，赔款2100万元、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

1856年，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捕捉中国船“亚罗”号上的海盗，派兵进攻广州。法国借口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在广西西林被杀，亦出兵入侵。1857年，英法组成联军，攻陷广州。打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一炮。最后导致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迫使清政府先后和中英、中法、中俄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赔偿巨额赔款，丧失大片领土主权，还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给英国；准许外国人在中国贩卖人口。

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凭着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如梦初醒，发现政体内竟没有处理国际交涉事务的部门，于是匆匆忙忙于1861年设立总理衙门（后改为外务部），专门处理外交事务。清廷从此不再谈万邦之主，也不再说朝贡，毫无选择地被逼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按照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和各国往来。第二次鸦片战争把贩卖人口合法化，加剧华工被贩卖到南洋、中南美洲、北美洲，甚至南非当廉价劳工。

---

[1] 《大清律例》，卷20。

[2] 蔡新，《缉斋文集》，卷4。

[3] 吕思勉，《中国通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页349。

[4] 同上注。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市民抗议印度卢比作为海峡殖民地的通用货币

设领护侨：华工血泪的代价

鸦片战争加上太平天国起义，导致华南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大量农民被葡、西、英、美、荷等国设在厦门、广州、汕头、香港及澳门的劳工中介公司，被骗、被拐、或自愿成为契约劳工过番当廉价劳工，俗称为苦力或猪仔。1865年运往古巴者5000余人，运往秘鲁者8000余人[5]。运载苦力的船（人称浮动地狱）往往超载，船上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很多苦力就在漫长旅途中病死，如1850年往秘鲁的两艘苦力船运载740人，途中死亡者247人[6]。他们在工场、矿场、种植园常被虐待。

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虽然允许外国公使驻北京，但无意愿在国外设领。1858年订立《天津条约》时，美国全权代表告诉直隶总督谭廷襄，在美国的华工有10多万人，建议清廷派领事赴美。总督回答“敝国习惯，向不遣使国外”[7]，清廷更没有所谓护侨的意识。

有关在海外设领的建议，到同治年间才出现[8]。闽粤地方官，如广东巡抚蒋益澧、福建巡抚王凯泰，都建议在华人流寓众多的南洋地区或新旧金山设领护商护侨[9]。但促成设领的临门一脚却是发生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事件[10]。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并派官员到伦敦致歉意。1875年清廷派郭嵩焘为首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兼出使法国钦差大臣前往英国道歉。翌年，该使节团改为常驻英国使团，郭嵩焘官衔改称为驻英法公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使节，从而成为中国外交史上派出驻外长期代表的开始[11]。

在新加坡设领事馆就是郭嵩焘倡议的。当他出使赴英途中，看到许多华人在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居住。同一年，华工在秘鲁、古巴、吕宋与苏门答腊遭虐待的消息传到北京，总理衙门随即派官员到秘鲁和古巴视察属实，清廷开始意识到有在华工众多的国家设置领事馆的迫切需要。因此，当郭嵩焘于1876年向清廷建议在新加坡设置领事馆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阻力，很快就被接纳。清廷就在新加坡设立海外第一间领事馆，“兼辖海门等处交涉事务”[12]。（“海门”是指英属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与槟城）[13]。

清廷驻新加坡领事

1877年清廷在新加坡设领事馆，1891年升格为总领事馆。从1877年至1911年，共有11名清廷驻新加坡领事及总领事[14]（见表（一））。

---

[5]《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1951年），页癸30。

[6] 同上注，页癸31。

[7] 同上注，页癸23。袁丁，《晚清侨务与中外交涉》（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36。

[8] 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等，2002年），页9。

[9]《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页29—30。

[10]《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页33。

[11]《晚清侨务与中外交涉》，页40。

[1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73。

[13]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书麓书社，1985年），卷2，页421—424。

[14] 此表的领事名录根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页73。领事馆馆址为笔者根据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SSD），1877–1912整理而成。

表（一）清廷驻新加坡领事及总领事

名	职称	任期	馆址	附注
胡璇泽	领事	1877.10－1880.3 （光绪三年九月－六年二月）	黄埔公司 驳船码头（Boat Quay）和蒙咸街（Bonham Street）交界处	原道员。广东人，新加坡华商
苏泩清	署理领事	1880.3－1881.9 （光绪六年－七年八月）	同上	原盐提举衔布政司
左秉隆	领事	1881.9－1891.5 （光绪七年八月－十七年三月）	禧街（Hill Street）55号	原五品衔都察院学习都事
黄遵宪	总领事	1891.5－1894.7 （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年六月）	1891.2：马六甲街（Malacca Road）28号 1893.4：禧街55号	原二品衔分省补用道
张振勋	署理总领事	1894.7－1897）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年）	禧街58号	原三品衔候选知府。由于他是南洋富商，又曾当驻槟城副领事，总督视他为正总领事。
刘玉麟	署理总领事	1897－1899.5 （光绪二十三年－二十五年四月	同上	原分省补用道。
罗忠尧	总领事	1899.5－1902.1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七年十二月）	1899－1901：禧街58号 1902：莱佛士码头（Raffles Quay）14号	原驻英三等参赞，布政使衔候选道。清档案记载在黄遵宪和凤仪之间领事都是代总领事。
吴世奇	署理总领事	1902.1－1902.5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年四月）	同上	又名吴寿珍。1906年为中华商务总会创会总理。
凤仪	总领事	1902.5－1906.1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三十一年十二月）	罗敏申路（Robinson Road）32号	原候选知府
孙士鼎	总领事	1906.1－1907.10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三年九月）	同上	原广东候补知县
左秉隆	总领事	1907.10－1910.10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宣统二年九月）	勿拉士峇沙路 （Bras Basah Road）76号	
苏锐钊 宋谦	总领事 秘书兼通译	1910.10-1911 （宣统二年九月－三年）	同上	原候选道

资料来源：《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SSD)*, 1877-1912

清廷设领经过

新加坡设领之路并不平坦。由于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在新加坡设领被视为中英外交的延伸。因此，有关设领的交涉是在伦敦进行，伦敦殖民部大臣也得征询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意见和立场。

原则上，英政府不反对清廷在新设立临时领事馆，由当地华人侨领兼任领事，但对设立永久性领事馆和来自北京的外交官有所顾虑。所以英方提出两个先决条件：设领属临时性安排，首任领事必须是“具有高尚品格和良好社会地位的新加坡华族居民，而不是来自北京的官员”[15]。清廷起初也不同意设临时性领事馆的安排，但最终为了减少设领阻力才勉为其难地同意[16]，先“登陆”再说，静观其变。同时，委任当地侨领为领事也可解决设领的经费问题。总理衙门仅负责开办的经费，至于领事馆的维持费如职员薪金，领事需设法筹划报销[17]。

郭嵩焘力荐新加坡广帮侨领胡亚基为首任领事：“其官衔则首充俄国驻新加坡领事，继由新加坡公举充巡理府事务，继由英国派充新加坡提察刑狱事务，又授新加坡议政局员，由奥国赏给头等宝星，又由英国赏给宝星。前闻其加道衔，盖在英国得视中国道员也”[18]。1816年出生于家乡广东省广州黄埔村，胡亚基，字南生，号琼轩，官名璇泽。15岁南来新加坡，在其父创立的黄埔公司学习做生意，人称黄埔先生。不久父殁，继承父业。1840年公司成为英国舰船的食用品供应商。1864年被委任为法院陪审员，1869年任立法会议第一位华人非官方议员，兼行政会议特别议员。翌年受封为太平局绅。1876年获英国维多利亚女皇赐封圣迈各及乔治三等勋章。1872年任名誉推事，俄国与日本驻新加坡名誉领事。

附设在黄埔公司的清廷领事馆

当时，除中国外，在新加坡已有下列15个国家设领：奥地利（Austria）、比利时（Belgium）、巴西（Brazil）、丹麦（Denmark）、法国（France）、意大利（Italy）、荷兰（The Netherlands）、德国（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葡萄牙（Portugal）、俄国（Russia）、暹罗（Siam）、西班牙（Spain）、美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瑞典（Sweden）及挪威（Norway）[19]。

设立之初，中国领事馆附设在位于驳船码头（Boat Quay）和蒙咸街（Bonham Street）交界处（即今大华银行总部）的黄埔公司内。俄罗斯及日本领事馆也附设在这里[20]。胡亚基谙英语，故免设翻译员，只设秘书和书记各一人。1878年4月25日，苏淮清由北京到任当领事随员职称为副领事[21]，也在黄埔公司办公。苏淮清不是职业外交官，原为管理盐务的地方官。身为富商的胡璇泽也非职业外交家，他是个大忙人，业务大，官务繁忙，其郊区住宅南生花园是当年新加坡的重要景点，途经新加坡的中外达官要员，都以作客南生花园为荣。因

[15] "Minutes of the Colonial Office", C.O. 91/142, 1877.04.27.

[16]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页88—89。

[17] 〈使英郭嵩焘奏新加坡设立领事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页5。

[18]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二（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页552。

[19]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80);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年），页6。

[20]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Singapore :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80), p.42.

[21]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页58—59。

相关人物

陈金声

历史事件

福建帮领袖陈金声创办萃英书院，为新加坡华人设立的第二所学塾，院址在厦门街131号

此，草创时期的领事馆在人事和设备方面都严重不足。

1878年，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欧途经新加坡，“新设领事胡璇泽号琼轩、副领事苏淮清号玉川者来谒……饭后，偕子兴（左秉隆，驻伦敦英文三等翻译官）……乘马车至领事署小坐。至胡琼轩家，观其花园。雨甚不能游，但观其室厅中陈设，兼于窗间窥视鸟笼、兽圈、龟池而已”[22]。曾纪泽告诉胡璇泽他对不发领事薪俸颇不以为然，答应将向总理衙门争取照章发给薪水。有趣的是两人竟然须以英语交谈，方可沟通。曾纪泽说：“琼轩操粤中土语，余不能解，因与英语相回答焉”[23]。

自1836年，华人是新加坡的最大族群，华社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稳定。从殖民地到建国后的国际和外交关系，这个特殊的“华族”因素一直困扰不休。基于这个原因，殖民地政府对清廷在新设领特别敏感，感到不安，主观上认为清廷领事企图控制新加坡华社及传播亲中的政治思想[24]。因此，殖民地政府抢先于1877年6月1日设置华民护卫司署。四个月后，清廷领事馆在新设立。两者都被赋予治理华人事务的任务，令双方在执行工作时时常发生矛盾与冲突。

华民护卫司的主要职权除了掌控私会党和娼妓外，还是华工入境的监督官，他部署和授权合法华工招募者。当华工抵达新加坡时，须向华民护卫司署报到，雇主和契约华工必须在华民护卫司署签署一纸劳务合约。另一方面，清廷领事的主要职权包括护侨护商及查办华人的事务[25]。清廷认为凡具有中国血统者皆为中国侨民。因此，无论是华族移民，或在海峡殖民地土生土长的海峡华人，都是清廷子民，属于领事服务的对象。另一方面，殖民地政府则坚持两者既然居住在英国殖民地，则必须接受殖民地政府管辖，清廷领事无疑是实行治外法权。殖民地政府官员不断强调领事应该着重护商，增进和照顾侨胞的商业利益，不应过问当地的政治事务，包括华人事务。

由于清廷只负责创馆经费，为了筹措维持费及职员薪金，胡亚基获总理衙门授权，向来往于新加坡和南洋群岛间经商的中国商船征收船只注册费，并颁发船牌给船主[26]。他还向新加坡华人船主征收出港证两元，以及货运每吨四分半的费用[27]。此船牌费收入有限，不足于应付领事馆的开销。光绪五年（1879年）领事及随员薪俸才由总理衙门出使经费支付[28]。英政府指控驻新领事此举超越领事职权[29]。鉴于胡亚基身兼殖民地政府数个重要官职的身份，英殖民地政府于1879年9月只是“客气”地请求胡亚基停发船牌给华人船只[30]。1880年3月胡亚基身故后，殖民地政府态度转硬，于1882年3月16日，总督颁布通告下令在海峡殖民地建造的中国帆船船主，即日起不得向清领事申请船牌[31]。清廷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也即刻命左秉隆停发船牌[32]。

1880年3月27日胡璇泽去世，由随员苏桂清暂代领事，使馆仍旧附设在黄埔公司内事馆[33]。驻新领事馆的地位问题又成为清廷和英当局争执的焦点。可是，殖民地政府总督史密斯（Cecil C. Smith）拒绝承认其任命，理由是苏桂清声望不高，况且当局也没同意设立永久性领事馆[34]。在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交涉下，伦敦于6月让苏桂清暂代领事。曾纪泽乘胜追击，和英国外交部就设永久领事一事谈判，英方终于同意中国可于1881年在新加坡设立永久性领事馆，同时也不再反对清廷由北京派专业外交家来新当领事。

---

[22]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页139－140。

[23]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页352－353。

[24] 林孝胜，〈华社控制权之争：清领事与英国官员的纠纷〉，《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页63-85。

[25]〈使英郭嵩焘奏新加坡设立领事片〉，载《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4。

[26]〈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为新加坡设立领事给薪俸等事折〉，载《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9－10。

[27] "Letter of Weld to C.O，1882.03.14", C.O. 113-106.

[28]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页6。

[29] C.O.106/F.O.，1880.12.13.

[30] "Letter of Marquis Tseng to Earl Granville,1882.05.31", C.O.118/F.O.,1882.06.14.

[31] "Translation of Proclamation,1882.03.16", C.O. 118/F.O., 1882.06.14.

[32] "Marquis Tseng's Letter", C.O. 118/F.O.,1882.06.14.

[33]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881, p.49.

[34] "Letter from Weld to C.O. 21.06.1880", C.O. 103/66.

在文化沙漠播种的外交官：左秉隆与黄遵宪

由于新加坡是南洋商贸和海外华人中心，当新加坡设常驻领事定案后，清廷非常重视，首两位驻新领事都是资深的职业外交官，即左秉隆与黄遵宪。他们除了是职业外交官外，还是能诗能文及有抱负的士子与文人。

清朝派驻新加坡首任专业外交官左秉隆领事（时年32岁）

左秉隆为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忠山佐领下人，在同文馆学习英文，曾派驻伦敦公使馆当翻译官七年，曾纪泽保荐出任新加坡领事："该员年历正富，学识俱优，通达和平，有为有守，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以之充补新加坡领事官，实属人地相宜"[35]。他于1881年9月走马上任，领事馆从黄埔公司迁到禧街（Hill Street）55号自设的领事馆，主要使馆人员包括秘书、助理秘书及书记等[36]。不知什么原因左秉隆任内（1881－1891）曾频频迁馆舍，但都在禧街。1885年由55号迁到59号，下一年又搬进48号，1887年至1891年迁到34号[37]。

为了促使寄居海外的华侨心向清廷，宣扬亲中的政治思想，左秉隆及历任驻新领事及总领事于每年皇帝与太后的寿辰时，必连同当地华侨大事庆祝。左秉隆全权负责庆典的规划，并广邀华商与侨领到领事府参与庆典。事先会在报章登通告，届时，被清廷授官衔的绅商列队，向象征皇权的龙牌行叩跪大礼及朗读颂文。

六年后，左秉隆的好友李钟珏在1887年到访新加坡，见证左领事处处遭到其对手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 A. Pickering）的牵制，他说"护卫司专营华人一切事，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38]，又说"而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事，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39]。左秉隆利用其高超的外交手腕，在这复杂敏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执行其领事任务。赢得华社及对手（英殖民地政府）的尊敬和赞赏。

作为职业外交官，左秉隆到任后即意识到华工贩卖和娼妓问题是华社严重问题。19世纪40年代，英荷公司通过驻扎在厦门、福州、汕头、广州、香港和澳门的商行在中国招募掠卖华工。华工主要分卖身的契约工和赊单工，即出国船费由招工者先垫付，在国外须受雇主控制，直至还清债款及利息。新加坡地处东西交通要道，是华工集散总汇，他们先到新加坡，然后再分发到东南亚各地工作。1887年5月左领事好友李钟珏游新加坡，目睹当时新加坡牛车水一带有许多"猪仔"馆，华工抵达新加坡后被安置于馆内，

[35]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页53—54。

[36]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883.

[37] *Ibid.*, 1885—1891。

[38]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页5。

[39] 同上注，页6。

丧失自由，备受虐待[40]。李钟珏在牛车水也看到妓馆如林[41]，向华民护卫司署注册的妓女三千余人，“皆广州府人或自幼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42]。

按常理，华工贩卖和娼妓问题属护侨的核心任务，可是，都归华民护卫司所管辖。左秉隆不和华民护卫司对抗，他知道这两个领域只能配合不能插手。因此他以反映实情，试探向殖民地政府建议禁止华工买卖。基于英商和华商业者的经济利益，不获接受。李钟珏记述“在叻华官绅屡欲清其源，而为英官所持，卒不得行”[43]。左秉隆于是转而促闽粤官员在源头严厉取缔华工贩卖与妇女被拐，有些个别被拐落难华工，则“由（左）领事就地访确超拔遣回者近岁较多”[44]。

左秉隆任内，从香港“贩幼女来坡，卖入妓馆者”越来越多[45]。华民护卫司署成立后不久，原设有妇孺收容所收容这些被拐沦为娼妓妇孺。1886年，“（左）领事悯之，率同华绅言于英总督，允下护卫司议章设保良局，以时查察，于是此风乃息”[46]。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史密斯非常赞同左秉隆的建议，特另设半官方机构保良局（Po Leung Kuk）接管华民护卫司署的妇孺收容所，成立官商管委会。华民护卫司毕麒麟为保良局主席，左秉隆及陈金钟等侨领为委员。这种安排完全是为了左秉隆，因为左领事绝对不可能接受担任政府部门的职务[47]。

虽然如此，左秉隆在执行其他两项例常领事职务方面，遭到华民护卫司和英殖民地官员的刁难[48]。其一是前面所提到的发船牌给新加坡华人船只。胡璇泽及苏桂清都收到照会停发船牌，但直到左秉隆任内的1882年3月，才正式下令禁止海峡殖民地华人船主向清廷领事馆申请船牌。

其二，每当中国发生天灾，领事往往向在地华社发动募捐。1885年及1889年，左秉隆向华社募捐赈灾基金，获得新马华侨热烈响应，清廷还封虚衔给捐输多者，以资奖励，引致新加坡殖民地官员抗议领事向当地华人施压捐输，以及向侨民传播效忠清廷的思想[49]。

19世纪末，新加坡虽非一片文化沙漠，但文风不盛，华人子弟多学习实用的谋生的技艺。据李钟珏的观察，“闽广士子在叻授徒者颇不乏人，叻中子弟读书，图回籍考试者亦不少。然叻地无书又无明师友切磋琢磨，大都专务制艺。而所习亦非上中乘文字。近年领事官倡立文社制艺外兼课策论，稍稍有文风矣”[50]。左秉隆于是积极在华社展开宣教及其他活动，“劝兴义学，讲圣谕开为会以行教化”[51]：

- **倡设义学**

左秉隆上任不久就展开兴学运动，倡设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室等[52]。

- **办会贤社**

1882年设立会贤社，目的是培养文风和笼络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每月由左秉隆出题，让知识分子按题作文，由他或其他学者审评，佳作有赏[53]。左秉隆积极推动绅商组织民间宣教团体，闽帮领袖陈金钟在天福宫设立乐善社，粤帮也组织同善社。两社定期办演讲会，以宣圣谕，维持风化为宗旨[54]。

- **主催英语雄辩会**

雄辩会专为受英文教育的海峡侨生而设。每两个星期

---

[40]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页16—17。

[41]《新加坡风土记》，页11。

[42] 同上注。

[43]《新加坡风土记》，页17。

[44] 同上注。

[45]《新加坡风土记》，页13。

[46]《新加坡风土记》，页12—13。

[47] Edwin Lee, *The British as Rulers Governing Multi- Racial Singapore 1867-1914*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90-91, 181.

[48] 1887年，李钟珏访问新加坡，见证了左秉隆办事处处受制于华民护卫司，见《新加坡风土记》，页5。

[49] 林孝胜，〈华社控制权之争：清领事与英国官员的纠纷〉，《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73—77。

[50]《新加坡风土记》，页10。

[51]《新加坡风土记》，页6。

[52]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载《椰阴馆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4年），页121—127。

[53] 有关会贤社的详细活动，见本书第5章第3节梁元生，〈新华“士”阶层〉；

[54] 载梁元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5年），页9—10。

在领事馆集会，由左秉隆亲任主席，公开辩论政治、社会或文化等问题[55]。雄辩会很受侨生欢迎，踊跃参加，这项活动加强了侨生对中华文化和中国政治的认同。

1891年，当左秉隆任期满三年，华社及殖民地政府对他的领事业绩给予高度好评[56]。薛福成称赞“精明干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浃恰，办事颇称稳惬，盖领事中之出色者”[57]。曾纪泽以左秉隆在新卓越的表现，奏请总理衙门、慈禧太后及光绪帝给予留任。他说：“该处（指新加坡）领事有联络邦交、保护民商之责，非谙练洋务，深悉地方情形之员，不足以资镇抚。左秉隆在坡三年，竭力整顿，于前任领事胡璇泽之积弊，补救多端。清理华洋讼案，劝谕富商捐资，设立义塾，奖掖绅民，因应得宜，操持不苟。不惟华民爱戴，即各国驻彼官绅皆敬佩之……臣再四思维，求如左秉隆者熟悉该洲情形，能自树立者，一时实难其选……于新洲流寓闽粤人民言语性情，易于通晓，以之留任领事，实属人地相宜”[58]。可是，清廷最终还是把左秉隆调赴香港担任首任驻港领事。左秉隆被调往香港根据柯木林的分析，是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他的积极支持者曾纪泽于1890年4月辞世，从此左秉隆失去了有力的靠山，他日后的官运亦不顺畅，任香港领事一职亦未成行。

提升为总领事馆

1890年，丁汝昌率舰队巡视东南亚港口，目睹槟城、马六甲及下列英属马来半岛土邦：芙蓉（Sungei Ujong，今Negeri Sembilan，首府Seremban也名芙蓉）、雪兰莪（Selangor）、吡叻（Perak）、柔佛（Johor）华侨颇多，常有被虐待之事。为了护侨，丁汝昌建议将新加坡领事馆提升为总领事馆，另在其余各地设副领事统辖于新总领事[59]。左秉隆也同意丁汝昌的方案，并进一步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列槟（Penang，设正领事）、呷（Malacca，设副领事）为一组、盛产锡矿的吡、雪与芙归另一组，柔佛则独立处理，可派领事或副领事。他还特别提议将委任各地原有的甲必丹兼任领事[60]。总理衙门的最后方案是提升驻新领事为总领事，槟城设副领事，其余各地暂缓设领。新总领事统辖槟城、马六甲及英属马来亚交涉事务。经过驻英公使薛福成和英国外交部商议定案，清廷于1891年5月，将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驻英法公使薛福成推荐前美国三藩市总领事黄遵宪为首任总领事[61]。

黄遵宪初上任时总领事馆馆址设在马六甲街（Malacca Road）28号，1893年迁回禧街55号。编制为总领事黄遵宪，随员何晋梯等五名、翻译官那三、那华祝、刘玉麟、海军衙门游历章京二员、刑部员外郎彦恺以及兵部即补主事凤凌[62]。

黄遵宪继左秉隆之后担任保良局委员。黄遵宪的诗与文造诣很深，继续积极提倡发展华文教育，改会贤社为图南社，致力促使南洋华民的学术文化昌盛起来。他亲任社长，拟定学规，仿效传统中国学院惯例，每月设定课题，由社长黄遵宪捐银10元给赏。

相关人物

阿里

历史事件

已故苏丹胡申之子阿里（Ali）在新加坡官署册立为柔佛苏丹

[55] 李勇，〈天福宫领导层、组织与功能（1840—1915）〉，《华人研究国际学部》卷2期2，页16。
[56]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椰荫馆文存》卷一，页124。
[57] 柯木林，〈左秉隆与新中关系〉，《南洋学报》卷63（2009年12月），页 109-130。
[58]《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1，页79—81。
[59]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页88—89。
[60]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4，页213—214。
[61]《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页239—240。
[62]《清季中外使领年表》，页73。

身着清朝官服的驻新加坡首任总领事黄遵宪（左二）

根据叶钟铃的研究，图南社课题内容主要分下列两大类：中国问题及南洋问题。他统计黄遵宪任内该社24期的课题，中国问题占17题，其中有关侨务者占7题，南洋问题占22题，其中礼俗占8题。可见，黄总领事除致力于向侨民灌输忠君爱国意识之外，特别鼓励诸生重视研究当地问题、南洋时务及地方礼俗，关心当地时事民情[63]。

左秉隆和黄遵宪相继在新加坡撒播文化种子，两人离职后，“文风赓续不断，邱菽园先后设立丽泽社（1896年）和南洋崇儒学社（1934年），这可以看出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的轨迹”[64]。黄遵宪任内重要政绩包括：

• 促使清廷开海禁及严禁虐待归国华侨

黄遵宪于1891年呈一个报告给驻英法公使薛福成，申诉华侨回乡惨遭乡人与地方官敲诈。薛福成遂根据黄遵宪的报告于1893年向总理衙门奏请开海禁，清廷批准所请，于1893年底颁发新条例使华侨回国成为合法化。

• 槟城设领事馆

总理衙门在槟城设副领事的原议，迟至1893年3月才落实，槟城富商张振勋受委为槟城首任副领事，置于新加坡总领事管辖之下。

• 颁发护照

此新规章授权领事颁发护照给回乡的华侨。总领事黄遵宪遂按照规章发护照给华侨，收费由一至四元不等[65]。他也发出“字单”或委任状，委任新加坡某些闽商担任代理人，把总领事馆的新条例公告坡中的福建乡人[66]。

海峡殖民地政府对黄遵宪发护照非常不满。华民护卫司毕麒麟即刻发出中文公告，指控清廷总领事在一英人治理的国家，向英人统治下的华人发出护照是超越领事权力，并且等于把清廷领事地位置于和大英政府官员平等的地位[67]。

1893年6月，为防止私运鸦片烟从新加坡到海南岛，清廷颁布一新条例。按照新条例，华人船主必须向总领事申请鸦片烟出口准证，称为洋药凭单。总领事须在申请书及凭单上签名方为有效。由于新条例也规定船主以外人士才可以缴交凭单费，因而造成许多麻烦和不便。因此船主联合向总领事情愿。结果，黄遵宪颁布临时变通办法，向船主征收每箱鸦片烟40元抵押费。黄遵宪还委任一名琼籍商人蔡文宝（Chua Bun Bo）代向船主收抵押费。蔡文保共收得8000多元，并替总领事收存此笔款项。殖民地政府总督麦士威（William Maxwell）据此指控黄遵宪受贿赂，要求将黄遵宪调职。清廷派特派员英籍海关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到新调查后认为黄遵宪清白，始终没经手抵押之款[68]。不过，对黄遵宪的外交官生涯却造成抹不去的阴影。1894年底，黄遵宪黯然结束驻新总领事职务。第二年，原欲出使德国当大使，但因受贿赂案的困扰，遭德方拒绝[69]。

洋药凭单事件再次触动英殖民地政府官员，对驻新领事在华社影响力日益膨胀的敏感神经，要求英外交部重新考虑清廷设置总领事问题，外交部认为事情没那么严重，

---

[63]〈派驻英法两国及新加坡人员清单〉，载《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102。

[64] 详见叶钟铃，〈黄遵宪与图南社〉，载《亚洲文化》期15（1991年6月），页123－124。

[65]〈黄遵宪与图南社〉，页126。

[66] 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页235。

[67] 同上注。

[68] 同上注。

[69]〈电复查明黄遵宪前在新领事任内批复华商抵押款项情形〉，《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198；叶钟铃，〈中国驻叻总领事黄遵宪办理洋药凭单事件始末〉，载《亚洲文化》期25（2001年6月），页168－176；林孝胜，〈华社控制权之争：清领事与英国官员的纠纷〉，《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79－80。

总领事只触犯清廷和殖民地政府之间的“半官方条例”而已[70]。

除了上述二事外，基本上黄遵宪和总督史密斯维持良好关系。黄遵宪被委为保良局委员。任内重提在吡叻（Perak）、雪兰莪（Selangor）和首府吉隆坡（Kuala Lumpur）设副领事过程[71]，也可看出两人互动密切。两土邦为英属邦，移民全是华民，多在锡矿场当矿工。总督也认为两土邦皆华民，不必尽用英法律，因此嘱黄遵宪将《大清律例》有关财产部分抄出备参考。“已为抄《户律、户役门》凡八条。施督（史密斯总督）即译英文，札交各处承审官一体遵办，为英人绝无仅有之事。施督于华民保护甚周，其行政时有将就华民之处”[72]。因此，黄遵宪力促驻英法公使薛福成及总理衙门“趁其在位，赶设领事，此亦事机之不可失者也”[73]。可惜，此建议无下文，不了了之。

1895年至1911年间驻新总领事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为日本所败，导致一系列的政治改良事件。康有为“公车上书”发动维新运动，要求清廷实行政治改革，成立君主立宪制度，接着是戊戌政变和保皇运动。1900年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大旗抵抗外国侵略，导致八国联军（英法德美日俄意奥）攻占天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避难，随后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

在中国国内如此纷纷攘攘的大环境下，一时也无暇顾及海外使领。这反映在驻新领事的频频调动。随着黄遵宪仓促被调走，刚于1893年3月上任仅一年余的槟城副领事张振勋，被调来新加坡担任署理总领事，并于1894年7月走马上任。到任不到两年，突然于1896年初，奉北洋通商大臣王文韶及两广总督张之洞电调回华，商办铁路招商事宜，遗缺于光绪廿二年正月初一（1896年2月13日）由三等翻译官刘玉麟暂代总领事[74]，七月初二（8月10日）被委为署理总领事[75]。刘玉麟署理近三年一任到期，清廷于1899年5月调原驻英三等参赞罗忠尧上任，依然是署理总领事[76]，约于1901年底扶正为总领事。不久却因事告假，由新加坡富商吴世奇（吴寿珍）暂代总领事五个月（1902年1月21日-1902年5月）。这期间领事馆馆址大部分时间都在禧街58号。1902年初才迁至莱佛士码头（Raffles Quay）14号。

驻新总领事馆的不稳定情况及一连串的署理职务，清廷也觉得不妥，有碍于领事馆的有效操作，于是决定派遣资深外交官凤仪担任正总领事。时任驻英公使张德彝对英外交部大臣表示自黄遵宪总领事离去后，“所派（补缺）各员均系代理。此于领事职分权利大有防碍，是以中国政府现拟派补缺后，以道员用候选知府凤仪充当新加坡总领事。该员前曾来英随使多年，此间士大夫与之往来者颇不乏。中国如果派该员前往，贵政府肯以总领事相接待否？”[77]英外交部和新加坡总督欣然同意凤仪的任命。凤仪总领事于1902年5月走马上任，

[70] 陈育崧，〈黄遵宪使德遭拒始末〉，《椰阴馆文存第一卷》，页131—136。

[71] Wen Chung-chi, *The Nineteenth-Century Imperial Chinese Consulat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64, unpublished), p.222; 叶钟铃，〈中国驻叻总领事黄遵宪办理洋药凭单事件始末〉，页175。

[72]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八，页797—798。

[73] 同上注。

[74] 同上注。

[75]《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236。

[76] 同上注。《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志明刘玉麟由1897年开始署理总领事不确。

[77]〈代理新加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罗忠尧造呈办陕西赈捐款数目清册，1901年8月〉，载《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246。

相关人物

加尔各答大主教

历史事件

3月4日

加尔各答大主教为圣安德烈座堂举行奠基礼

驻新领事馆重新进入正轨，凤仪上任后将领事馆搬迁至罗敏申路（Robinson Road）32号。继凤仪之后是清朝最后的三位总领事：孙士鼎（1906年1月－1907年10月）、左秉隆（1907年10月－1910年10月）以及苏锐钊（1910年10月-1911年）。

左秉隆（前期）和黄遵宪时期是清朝驻新领事的黄金时代，之后的诸领事所面对的是动荡的中国时局和分裂的华社。清廷内忧外患不断，政局非常动乱，国库空虚，清廷积极向海外华侨筹款赈灾鬻官和招商。因此，支援络绎不绝的赈灾鬻官团和招商团成为领事重要的工作。

19世纪末，清廷频频发动华侨募捐赈灾、防务经费、建海军军费和国家基金，为了回报献捐的华侨，清廷赐予虚衔，逐渐形成一个鬻官卖爵制度[78]。颜清湟指出，1899年之后，“捐款封官成为公开化，于是，官衔的价格表被普遍刊载，以吸引可能捐官的华侨，而清朝的省政府却成为积极的推销者。它们除了通过总领事和当地代理人，以维持其鬻官的旧途径以外，还派出本身的代表团，到海外进行鬻官事宜。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估计有大约40名官员，被清朝省政府派遣到新马两地，执行这种任务”[79]。1901年陕西干旱成灾，新加坡署理总领事罗忠尧及槟城署理副领事谢荣光率先各捐500元和1500元给陕西义赈基金，罗忠尧还劝同济医院各商董捐银1万2000余元。陕西巡抚奏请赏罗忠尧和谢荣光戴花翎，赏赐同济医院御匾[80]。颜清湟总结鬻官的目的除了帮助救济中国灾民，旨在促使华侨在政治上效忠中国。各省政府通过在地领事、侨领或派遣代表团进行鬻官。华侨热烈购买官衔也有助于光宗耀祖及确认个人的社会地位[81]。

晚清成立工商部积极招揽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热烈认购中国企业的股票。清廷频频派专使或招商团到海外向华侨招商。张振勋被委为商务考察大臣，1905年清廷派他往南洋考察商务，鼓励华侨回国投资[82]。此行还促成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中华总商会前身）的成立，商会也是华社亲清廷的堡垒。1906年底，清廷农工商部派遣商务候选道徐锐到南洋招商，先后到吕宋、新加坡、吉隆坡和槟城等地游说华商对拟议中兴办的银行、航运及保险三项公司投资认股，在当地领事积极协助下各地华商认股超过百万元。1907年1月抵达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协调办招商会，获得华商，尤其是中华商务总会董事，热烈响应，认股近70万元[83]。对拟办的中国振兴商务大公司，即席认股8万3000元。认股名单有如当时华商名人录包括：黄甫田（黄亚福）、廖正兴、林文庆、蔡子庸、林维芳、王绍经、杨瓒文、吴寿珍等[84]。

自从设领后，新加坡领事接待来访的清廷官吏成为例常重要工作。这些清廷访客可以归纳为两类。其一为清廷出使欧洲，往返途经新加坡，总会在新加坡稍停数日，领事得接待，陪同拜会总督，也安排接见当地华商。例如驻英公使曾纪泽于1886年11月15日到访三天，时任领事的左秉隆登船迎接，领公使到领事馆巡视。翌日陪公使接见潮商陈从煦等13人，午后陪公使拜会坡督卫尔德（Frederick Weld）。第三天下午，35名闽粤华商登船呈递颂词，左秉隆在旁陪侍。“客去后，与子兴久谈”[85]。另一类是舰队出洋护侨与宣扬国威（如北洋舰队三访新加坡）、朝廷或各省遣派的赈灾鬻官团、招商团、巡视商业与华民考察团的到访，领事都得出动款待[86]。

---

[78]《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汇料编第一册》，页265、276。

[79] 颜清湟，〈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载《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页3－43。

[80]〈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页5。

[81]《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汇料编第一册》，页256、258。

[82]《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汇料编第一册》，页14。

[83] 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页118－128；〈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济现代化1875－1912〉，载《海外华人史研究》，页46－49。

[84]〈新加坡中华商会正总理蔡名英（子庸）副理吴世奇（寿珍）查明徐锐在坡招集华股拟办公司情形禀文〉，载《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汇料编第一册》，页571－574。

[85]〈新加坡商务总理为会禀查复徐锐在破招股情形开具认股名单呈请察核事的禀文〉，《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汇料编第一册》，页579－580。

[86] 薛福成，《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页960－961。

孙士鼎总领事的护侨活动

孙士鼎总领事仍以罗敏申路32号为其治所，任内的重大护侨活动包括：

◆ 改善棋樟山侨民检疫待遇

凡侨民乘搭轮船到新必须先到棋樟山岛检疫后才可上岸。1906年初发生侨民在检疫时被令脱衣裤等侮辱事件，孙士鼎总领事即刻照会新加坡总督，请改善侨民受检待遇。他同时收集商会的意见，以便跟政府磋商[87]。经交涉后，总督也即刻下令“凡由有疫之埠来船，大舱搭客均不用赤身验体等”[88]。

◆ 设立戒烟善社

19世纪末，10个人力车夫中就有8个是鸦片烟民[89]。孙士鼎自上任后，“见嗜鸦片者尤倍于内地，于工商两界大有阻碍，无怪商务日替而流为丐为盗，日益多”[90]，故筹设戒烟所，寻求华商协助。但华商多怕戒烟会损害殖民地政府和英商的经济利益，多取观望态度。1906年6月，他得到陈武烈、林文庆医生及殷雪村的积极协助，终于设立振武戒烟善社。孙总领事除特地向外务部报告此事外也知照总督[91]。

◆ 兴学

孙士鼎任内热心劝华社办学，将应新学堂章程规则呈给学部。学部派董鸿纬赴新加坡、槟城及爪哇等处考查办学情况[92]。

◆ 揭发华工受虐待惨况

1906年9月孙士鼎向外务部报告华工贩卖出洋及华工在荷属文岛与柔佛遭虐待情况，呼吁清廷禁华工贩卖，他指出“招工之例不禁则猪仔之弊不绝”[93]。华工贩卖牵涉很广，尤其是英荷殖民地政府及洋行的经济利益。英荷洋行在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密布爪牙于中国内地不择手段地招募华工，而新加坡是华工的集散中心，华工运来新加坡暂住在猪仔客馆，然后转送到荷属及柔佛或马来土邦的种植园、矿场做苦工。

孙士鼎要求坡督和华民护卫司介入调查，他们都以权限不及推辞。其实，华工贩卖也是新加坡经济的命脉之一，因此，可以理解总督的不合作态度。孙士鼎的报告为华工陈情导致两个结果：其一，是清廷外务部促驻荷兰公使跟荷兰外交部交涉，订立工约及设领事，以便护侨。同时，外务部也对荷兰驻北京公使施压，要求赶快订工约，直接向中国通商口岸招工，设立荷属副领事[94]，稽查保护；如由新加坡转运，则新加坡总领事随时调查[95]。其二，由于拟办的中荷协议将大大影响新加坡华工转运站的垄断地位及经济利益，因此，伦敦殖民部寻求外交部之助，向清廷驻伦敦公使及外务部施压，导致孙士鼎任期不到两年就被清廷调离新加坡。1906年，清廷对孙士鼎的政绩也有好评，说他任内“为华侨兴学戒烟商除苛例”有功[96]。

孙士鼎的离去有点扑朔迷离和耐人寻味。1906年8月，孙士鼎上任只有七个月就被调的消息，已在民间传开。侨民对孙士鼎护侨“尤多称颂，迭接南洋各岛数百家商店联

---

[87] 参阅本书第4章第1节，〈八方风雨会星洲〉；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页94。

[88]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页56。

[89] 《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汇料编第一册》，页320。

[90]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页13。

[91] 《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324。

[92] 同上注。

[93] 《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370。

[94] 《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336。

[95] 在荷属设领事宜，中荷双方迟至宣统三年（1911年）才达协议，1911年9月清廷同时在爪哇、巴东及泗水设领事馆。

[96] 《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351。

名禀请留办”[97]。驻英公使原已内定调广东候补知县汪大钧接任。可是，他还有要事没办完，不克成行，于是驻英公使向外务部推荐顺从民意，让孙士鼎续任[98]，因此孙士鼎得以留任。同年9月14日，孙士鼎促殖民地政府改善棋樟山华民入口检疫待遇，从9月19日至1907年1月，他向清廷报告华工贩卖及文岛和柔佛华工被虐待，建议中国禁止华工贩卖。事件越滚越大，中荷英外交交涉频繁。1906年11月22日，英殖民部档案提起孙士鼎攻击华工贩卖之事[99]。1906年12月30日就传出总领事孙士鼎“在任闻讣丁亲母忧当经禀报”回乡[100]。在外务部尚未物色到替代人选前，孙士鼎留新视事。1907年4月至8月，英国殖民部和外交部之间频频交换意见，检讨向清廷施压调走孙士鼎的策略和行动[101]，不到一个月，1907年9月清廷外务部决定派左秉隆接任，1907年9月22日交接完毕，孙士鼎回国[102]。

历史巨变前夕的左秉隆总领事

左秉隆临危授命，于1907年10月再度回新当总领事。他将总领事馆由罗敏申路搬迁到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76号。这也是清朝驻新领事馆最后的馆址。

这次回来，左秉隆发现很不一样的新加坡华社。1881年当他从北京来新加坡担任首位职业外交官时，受到华社热烈欢迎。1891年离去时也感受到华民依依不舍之情。那是亲中的华社，团结的华社。1907年等着他的华社虽然依然是亲中，但却是个分裂的华社。戊戌政变时，光绪被软禁，新加坡群情哗然，邱菽园发动签名运动，致陈情书给清廷求解除光绪帝的软禁。各界知名人士如陈齐贤、陆寅杰、林文庆、张永福等都签名[103]。不久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继续在海外保皇。接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海外如火如荼地展开。1906年，同盟会在新加坡成立分会，康有为、孙中山先后到访新加坡鼓吹保皇和革命。左秉隆再度回新时正身逢中国历史面临巨变前夕的十字路口，中国政局导致新加坡华社分裂为亲清廷的当权派（以中华商务总会为基地）、亲康有为的保皇派（以邱菽园为首）和亲孙中山的革命派（以晚晴园为基地）。左秉隆是在这三种势力狭小的夹缝中执行领事任务，左右为难。

清廷非常关注保皇党和同盟会在新马的反清活动，下令清领事要严密监控，随时向清廷报告。

1900年2月2日，康有为抵新，邱菽园招待他住在驳船码头（Boat Quay）的家中。坊间盛传清廷派四名刺客来新，殖民地政府严加保护。康有为抵新前一天，时任驻新署理总领事罗忠尧面呈驻英公使罗丰禄的电报给坡督瑞天咸（J. A. Sweetenham），传达两广总督李鸿章命令，要求坡督驱逐康有为出境。英殖民部非但拒绝，还警告清廷如康有为出事，英方将不会等闲视之[104]。罗忠尧于是退而

左秉隆出任驻新加坡总领事文凭（杜南发提供）

[97]《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330。

[98]〈新加坡华商请将领事留任事电，1906.08.18〉，载《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汇料编第一册》，页329。

[99] 同上注。

[100] CO273/319 Confidential of 22 Nov. 1906 Anderson to the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 引自Edwin Lee, *The British as Rulers Governing Multiracial Singapore 1867–1914*, p.184 and endnote 28.

[101] Lee, *op.cit.*, p430。

[102] CO273/333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25 April 1907, 13 May 1907,9 July 1907 and 15 Aug 1907. 引自Edwin Lee, *The British as Rulers governing multiracial Singapore 1867–1914*, p.184 and endnote 29.

[103] *Ibid.*

[104]《星洲上书记》（上海，1900年）。

求其次，雇洋密捕，严密监控，设法阻止其保皇活动[105]。

戊戌政变后，清廷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也开始作象征性的政治改革，推行保皇党主张的开国会，制造清廷走向君主立宪的假象。此时，保皇党的威胁已大不如前了，改良运动失败后，大势是朝向革命运动。因此，清廷更担忧的是企图推翻满清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同盟会在新马的活动。

孙士鼎总领事任内数次向清廷报告孙中山的反清活动。他分别于1906年和1907年6月电告两广总督和驻英公使，孙中山有回华作乱之谣言。1907年9月26日，孙士鼎致电报给驻英及驻荷公使，报告孙文（孙中山）在南洋各岛售卖军务票数百万张，收银一元，功成还本息10元。以荷属各埠及英属吡叻、吉隆坡为多，并建议请英荷外交部禁止革命党的活动[106]。

1908年1月4日，左秉隆报告孙中山已由暹回新加坡，“党务渐衰”[107]。

1908年1月31日，军机处为设法从新加坡驱逐孙中山事，给两广总督广西巡抚电法巴使节电称，孙文已于西历本月24日乘法公司船萨拉西开往新加坡，“电驻坡孙（左）领查明电部外，希随特密查至该逆何日由坡出境”[108]。军机处竟然不知左秉隆已取代孙士鼎为驻新总领事。

1908年2月6日，左秉隆向外务部报告：“腊月念四日，孙文到坡住潮人张永福（家），坡督知而不拒，派人窥其动静，愚民附之，巨商则否。除随时探报外，请速设法驱逐是幸。秉隆叩”[109]。军机处即电促驻英公使李经方函英外交部速电坡督立即设法驱逐。坡督回复称已向孙文儆戒，警察随时考查，如有违犯本督所发禁令之处，定即拿办[110]。

新加坡的革命党报章《中兴日报》与《星洲晨报》，痛恨左秉隆举报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两报几乎每隔数日就有攻击左秉隆的言论和报导。以下是一些重要摘录：

刊于《中兴日报》者：

左秉隆又欲升官耶。左秉隆接坤甸匿名信，密告革命党王亚炳等拟到内地谋乱，已陆续运大量军火由厦门铜山约定起事。函中附革命党姓名。左秉隆报闽粤两省查办。（1909年12月23日）。

清领事又禀报革命党起事。厦门人陈格由厦门、汕头铜山混入。（1910年1月7日）。

斥左捕风捉影。诬告坤甸二商王亚炳、廖清霞，当地华商开大会为他们辩白。（1910年1月10日）。

后来经查实，王亚炳和廖清霞都是坤甸华商，无参与革命党活动，是被人诬告。左秉隆一时不察，密报清廷。于是1910年1月26日的《中兴日报》向左秉隆发难，质问“左秉隆知否禀报不实之罪”。

左秉隆父子同席喝花酒。（1910年1月22日）。

左秉隆又报外人暗助革命党私运军火入华。（1910年1月27日）。

刊于《星洲晨报》者：

左秉隆又欲以匿名信罗织党狱耶。左秉隆之何人，固清廷倚之以为查探南洋之革党者也。（1910年1月26日）。

清廷又欲借名抚慰华侨以图运动。彼异族

[105] 李元瑾，〈康有为在新加坡的处境〉，载《亚洲文化》期7（1986年4月），页6。
[106] 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页135。
[107]《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汇料编第一册》，页172。
[108]《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汇料编第一册》，页173。
[109] 同上注。
[110] 同上注。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琼州会馆与琼州天后宫创立于马拉峇街，1880年迁至美芝路现址

之清政府，历来之对于我华侨也，不独毫无爱惜之心……华侨与清政府之感情，既经断绝，两不相干。（1910年3月17日）。

左秉隆自复任驻坡清领事以来，专为满清者侦探，日以革命党诬华侨为事。（1910年4月11日）。

1910年8月4日的《星洲晨报》，有篇标题“哀哉我华侨何不幸而遇左领事”的文章，对左秉隆作无情的人身攻击：“左领事升官发财之念即渴，而诬报华侨为革党，亦不过仅能开二千余元之侦探费，犹未足以达升官发财之目的。况该领事日与埠上之所谓富商钜贾，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

革命派报章对左秉隆最具恶意及揶揄的经典之作莫过于刊在《星洲晨报》（1910年1月4日）的头版广告：“谨告我国四万万同胞：大清钦命驻新加坡总领事左公秉隆表扬韦廉士大医生红色补丸之奇功”。

当左秉隆三年任满卸职时，《星洲晨报》（1910年10月22日）以“清国驻坡领事左公秉隆去思记”为他送行，数落他举报革命党人行踪、父子喝花酒等的罪状。

清领事馆的最后岁月

原驻旧金山总领事苏锐钊调来新加坡继任总领事，密探革命党在南洋的活动依旧是其领事工作的重点。1911年6月6日，他呈给外务部的一份报告，指出经他细心调查发现，由新加坡赴广东起事者不多，参与者大半皆是荷属爪哇一带。该处华民多支持革命党。富商多输款接济，尤其在泗水为最。而新加坡华侨众多，有些被煽惑者，“领事无究辨之权，英政府于有碍其地方治安之外，概不闻问。故领事惟有随时随事，婉言劝谕……如确有输运军火等事，则当雇佣侦探，细密查访，苟能查有实在消息，自当飞报”[111]。

清末，驻新使馆开始出现行政不当、管理松弛的末世乱象。1910年，陈嘉庚向商会报告“领事馆对于侨民诉案办理不公，有违保护宗旨，请即呈农工商部及外务部训令遇事公断”[112]。同年9月8日，爆发中华商务总会总理林维芳向外务部禀控使馆秘书兼通译曹谦“无恶不作”事件。

左秉隆总领事手书《聪明正直》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被革命军攻陷后，大清王朝的气数已接近尾声了。驻新领事也无事可办，惟专传达清廷公告给华侨。10月23日，总领事馆接两江总督来电，代发给报馆，电文报导清军在河南一带击溃“匪军”（革命军），匪兵伤亡六百余人[113]。

10月31日，总领事馆将外务部专电发给报章，宣布凡戊戌政变逃亡人士、保皇党及革命党人，如自动归顺将获大赦。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被定为民国元年，孙中山宣誓就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推翻了两百多年的清王朝统治及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统治。

中华民国驻新总领事（1912–1950）

中华民国刚建立，政局混乱。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不久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帝制。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内外交困，被迫宣布撤消帝制，恢复共和。1916年6月6日，病逝于北京。中国进入军阀混战和割据时期。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权据点在广东。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二次北伐，攻克北京，统一中国，迁都南京。

[111]《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汇料编第一册》，页174。

[112]《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汇料编》，页515。

[113]《新加坡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页59。

表（二）中华民国驻新加坡领事

名	职称	任期	馆址	附注
曹谦	署理总领事	1912	勿拉士峇沙路76号	曹谦为原清廷驻新领事馆秘书兼通译。馆址亦为原清廷领事馆原址
胡惟贤	总领事	1912.09.21－1918.10.19		调任厦门交涉员
罗昌	总领事	1918.10.19－1919.01.25		1918年11月10日任正总领事
伍璜	总领事	1919.01.25－1921.09.21	苏菲雅路(Sophia Road) 5号	调署伦敦领事
罗昌	署理总领事	1921.09.21－1923.11.13	同上	1922年4月5日任正总领事。调署加拿大领事
周国贤	署理总领事	1923.11.13－1924.11.22		未到任前派贾文燕代。调部办事
马廷亮	署理总领事	1924.11.22－1925.01.19		
贾文燕	署理总领事	1925.01.19－1926.02.04	罗敏申路(Robinson Road)44号	贾文燕于1926年7月8日在任身故，总商会下半旗三天致哀
冯祥光	署理总领事	1926.02.04－1926		1926年6月22日留署汉堡，贾文燕署
欧阳祺	署理总领事	1926.07.19－1927.05.26	同上	
李骏	署理总领事	1927.05.26－1929	同上	
唐榴	总领事	1929.01.24－1930	罗敏申路64号	
陈长乐	总领事	1930.10.22－1932		
唐榴	总领事	1932－1933		
刁作谦	总领事	1933－1936	经禧圈(Cairnhill Circle)2号	
高凌百	总领事	1936.12.11－1941.12	同上	在中华总商会设办事处
伍伯胜	总领事	1946－1950.01.06	同上	因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闭馆

资料来源：

《北京政府驻外使领人员年表（1912—1928）》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912—1950

许苏吾，〈中国驻新马领事始末记1877—1950〉，《中国学会30周年纪念特刊》，1979年

北洋政府时期驻新领事活动（1912－1927）

北洋政府时期驻外领事及总领事的主要职权包括[114]：

- 在所管辖区域内以发展本国商业、抚绥侨商为职务
- 调查侨商状况、当地通商经济情报
- 发护照、生死婚娶证明书给华侨
- 考查及指导在地侨校、宣达教育法令、调停侨校学务纠纷、保送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等

可是，国内处于军阀割据局面，影响在外领事的工作，反映在驻新领事有如跑马灯似的频繁调动，从1921年到1927年，几乎每年都换一个新脸孔，而且都是署理总领事。领事也就无法有效的推动例常的领事任务，更谈不上策划长期的工作计划了。下列为民初领馆的情况和主要活动：

[114]《叻报》，1911年10月23日。

• 晚清民初过渡时期的代总领事曹谦

内乱时期，一时民国政府无暇派领事来接管新加坡领事馆，暂由前清廷驻新领事馆的秘书兼二等通译官曹谦，亦名曹让之，担任署理总领事，由他接管勿拉士峇沙路76号的总领事馆。曹谦是个大有来头的争议人物，安徽人，生于1867年，肄业于上海中西书院。毕业后曾游历新金山，历任热河五金等矿翻译。1907年9月，孙士鼎总领事任内，由驻英公使李经方保荐派来新加坡担任二等通译官。官方给他很好的评语："素娴英文，留心时事"[115]。但是，1910年9月8日，中华商务总会总理林维芳等向外务部禀控曹谦，列出其十大罪状，包括英文不通、嫖赌、贪污、巴结富豪、欺压良民等等[116]，把他形容成如流氓一般。

以贵为侨领如此高调控诉，很不寻常。这和官方给他的好评真有天渊之别。晚清外交档案也无对曹谦采取纪律调查的记录。也许有些指控有夸大渲染之嫌，如指他英文不通，那他在孙士鼎、左秉隆及苏锐钊三朝总领事任内，是如何混过去的？领事馆写给英文报的澄清文告也由他代答[117]。曹谦任内曾积极协助成立南洋英属学务部，发起人是中华总商会1913年度粤帮议员蓝镜清，筹办处就设在领事馆。但随着曹谦调部候用，北京派胡惟贤来接任总领事职务而无疾而终。1912年12月27日的《叻报》社论借题赞扬曹谦办事负责。

虽然指控用了强烈人身攻击的词语，可是，从指控事件的细节看来，却又不像是空穴来风或诬告。晚清驻外公使独揽大权，自行决定公使随员及属下使馆工作人员。当时驻英公使就是保荐曹谦的李经方，所以，指控无损于曹谦的外交生涯，他还是安稳地做他的秘书兼二等通译官，直到改朝换代，脱下清朝官服，摇身一变成为民国政府的代总领事。曹谦是晚清民初乱世的一个传奇人物。

• 新旧商会之争[118]

中华商务总会是清廷催生的，而且在其工商部有备案，一直以来就是亲清廷的堡垒。1912年1月1日，商会以清政府尚未被推翻为理由，拒绝同盟会要求开会讨论筹办庆祝孙中山荣任中国临时大总统之事，引起革命党人和同情者的不满。于是由潮商沈子琴领导另起炉灶，组华侨总商会，俗称新商会，拥护南京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原商务总会为旧商会，拥护北京的袁世凯总统的北洋政府，互相抗衡。新商会电上海华侨联合会请向孙中山的临时政府申请注册。华侨联合会即刻电告孙大总统的实业部："孙大总统事业部总次长鉴：接新加坡电称该埠华侨重新组织华侨总商会，已禀准英政府，求转请我政府给钤记等因。盖商会为振兴商务理应代呈，俟章程寄到，再请立案，以资保护而促进行"[119]。虽然过后不久，孙中山的总统大位让给袁世凯，新商会注册。北洋政府的工商部决议规定一埠之中不得设两商会，命新加坡总领事协调及广东省都督代表力劝两商会合并[120]。另一方面，孙中山也托革命元老陈楚楠、林义顺及林文庆出面调停[121]。两商会曾举行数度谈判，新商会依然强硬不妥协。拖了整年无结果，工商部非常恼怒，觉得不成体统，命令新商会附入旧商会，理由是旧商会获殖民地政府豁免注册，而新商会是注册团体，可是双方合并谈判还是无进展。1913年8月，新加坡总领事胡惟贤献议工商部不承认新商会，工商部同意并通知总领事转告各界："华侨总商会此后如有关于商会上一切问题发生，一概不承认"[122]。10月，工商部重申此立场。至此，新商会已名存实亡，一年后自动解散。

---

[115] 李盈慧编，《官方公报的华侨史料1911年－1916年》（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2012年），页192－194、241－242。

[116] 《官方公报的华侨史料1911年－1916年》，页265。

[117] 《官方公报的华侨史料1911年－1916年》，页494－495。

[118] *The Straits Times*, 1909.01.19.

[119] 杨进发，〈新旧中华总商会的对立1912－1914年新加坡华人社会领导层的斗争〉，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页288－289。

[120] 《临时政府公报》，民国元年（1912年），号48，引自李盈慧编，《官方公报的华侨史料1911年－1916年》，页48。

[121] 《工商部部令二则》，民国元年九月初七日（1912年10月16日），号130，引自李盈慧编，《官方公报的华侨史料1911年－1916年》，页72－73。

[122]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庆祝钻禧纪念特刊》（1964年），页175。

• 护照、商照

民国成立不久，外交部公布“华侨回华护照向由各埠商会发给，应改归各埠总领事及领事发给，以归划一”[123]。工商部将此新条例通知海外华侨商会，一时引起混乱。由于晚清授权各商会发证件方便华侨回国，名称有称护照（Passport）或商照者（Merchant's certificate）。有些上书中文商照，下书英文Passport，非常不一致。当时因为是用于侨商回华，因此，农工商部均各照准立案[124]。新加坡总商会在接到工商部的通告后开会讨论，议决：“工商部来令是指发给护照改由领馆，并无阻止发给商照之明文，故决暂仍旧办理发给商照，俟新指令到后再行讨论”[125]。

• 牛车水事件

1927年3月27日发生牛车水事件，侨民为了追悼孙中山忌辰，游行到牛车水时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伤亡。中华总商会正副会长前往领事馆查问实情。商会原要召开大会，由于这事属国际关系，中国外交部电告商会无须介入，由总领事全权处理，和新殖民地政府交涉。商会和总领事联合呼吁社团及民众保持冷静，以维持社会秩序。

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与驻新总领事

中华民国从推翻了满清后，整10余年依然是割据的状态，1914年至1918年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没有一个鲜明的侨务政策[126]。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才建立侨务机构和侨务政策。其侨务政策涵盖三方面：（1）加强侨务行政及保护华侨，如整理使领馆、调查侨民生活及各种事业状况、增进侨民地位、整理侨务机构；（2）鼓励及保护侨外工商界，如鼓励侨外工商界回国投资兴业等；（3）发展华侨教育。

国民党政府的侨务机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国民党内建立的国民党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其工作范围相当广泛，包括海外党务、国际经济贸易、文教，以及侨务等涉外性质的活动。该委员会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直接指导侨务工作，制定侨委会、侨联总会的侨务工作的方针及政策，代表国民党慰问海外侨胞，宣传党纲等[127]。

另一个是政府行政院内建立的侨务行政系统，即行政院侨务委员会，直属于南京政府行政院。其主要职务包括：调查华侨状况、处理华侨纠纷、辅导华侨团体、指导监督华侨教育、推广华侨社会教育、推行华侨职业教育、辅导华侨文化传播事业、鼓励及协助华侨回国投资、侨生回国升学辅导等有关侨务方面的事宜[128]。

国民党政权是以党领导政府。因此，党和行政的侨务系统的工作都和使领有关。国民党的中央海外部为促进各地党部和驻外使领的联系，1929年订定海外党部使馆联席会谈要旨，按月举行党馆会谈，加强党政关系。

总之，在党政合一的架构下，领事官的职务越来越繁杂，集商务、学务及侨务于一身。

1933年在吉隆坡设立领事馆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新马的侨务行政组织结构如下：（1）

[123] 李盈慧编，《官方公报的华侨史料1911年－1916年》，页178－179。
[124] 《官方公报的华侨史料1911年－1916年》，页62－63。
[125] 《官方公报的华侨史料1911年－1916年》，页77。
[126]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页60。
[127] 王赓武著，张奔善译，《南洋华人简史》（台北：水牛图书，2002年），页180。
[128] 毛起雄、林晓东编著，《中国侨务政策概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页58。

新加坡总领事馆，有总领事、领事及副领事各一人；随习领事两人，其余为主事、随员和通译官等。管辖区除新加坡外包括马六甲、柔佛、丁加奴及吉兰丹。（2）吉隆坡领事馆管辖雪兰莪、森美兰、吡叻及彭亨。（3）槟城领事馆管辖区除槟城外包括吉打、玻璃市及天定（Dinding）。

国民政府派驻新加坡的总领事是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唐绍仪之子唐榴，广东中山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留学美国。历任中国驻美国使馆随员，驻英国使馆秘书，北京政府司法部秘书，外交部秘书、驻荷属巴东、泗水、日本长崎领事。1929年1月任新加坡总领事，但任期不长，第二年10月，回国民政府外交部，任驻沪办事处处长。

继任的是陈长乐博士，祖籍广东台山，生于新加坡。1903年毕业于新加坡英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芝加哥大学攻读，获哲学博士及法学博士学位返回中国，执教北京大学。后由胡汉民推荐给孙中山，外交部美洲司司长。1930年10月至1932年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时逢世界经济大萧条，新马经济大受影响，商店及工厂倒闭，许多失业华工流落新加坡街头，陈长乐总领事，一方面，和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交涉，由政府安排临时住所，供伙食，暂收留无家可归的华工，一方面促林秉祥的和丰轮船减低船费，由胡文虎赞助船票，把华工送回国，免得流落海外。1932年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1932年唐榴短暂再回新接任总领事，一年后调驻印度加尔各答代理领事。

刁作谦原籍是广东兴宁县人，在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市渡过他的童年。中学毕业后回国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得法学博士。历任中国驻古巴及巴拿马公使。1933年来新以公使衔继接任总领事。任内提高了驻新总领事职权，监督与指挥槟城和吉隆坡领事馆。刁作谦迁馆至经禧圈（Cairnhill Circle）2号，这也是中华民国领事馆最后的馆址。刁总领事平易近人，在领事馆内办事不修边幅[129]。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护侨工作，1935年底外交部督促驻外领事馆负责办理华侨登记。刁作谦总领事即函请中华总商会，商会也即发动各会馆义务向会员宣传，并协助领馆办理华侨登记。1936年卸任回国，转任外交部驻两广外交特派员。

未完成的侨民捐建领馆运动

继任者为高凌百，江苏江阴人，1922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国民政府简任秘书。1936年12月11日，派驻新加坡总领事。为方便侨胞领取护照及华侨登记，始在中华总商会设办事处。任内适逢新马侨民发动捐建使馆。由于驻新、槟、隆的领事馆都是租用的，侨务增加后，馆舍已不敷应用，新马华社遂有自发筹建领事馆的运动，主要由新马国民党领袖发动。1936年底，胡文虎在南天酒楼召集新马侨领李光前、陈延谦、梁燊南、林庆年、李振殿等商议筹建新加坡、吉隆坡和槟城领事馆。翌年三月在中华总商会开发起人会议，成立马来亚华侨筹建领事馆委员会，主席胡文虎，新马各州代表为副主席。建馆运动也获得新马华民政务司的同意。可惜正当新马筹款运动开始启动时，1937年7月7日中国爆发七七卢沟桥事件，全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因此，捐建领馆事暂停[130]。

驻新领事与华社的抗日救亡运动

高凌百任内也参与了全南洋侨民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国府在新马最高领事代表，他负责协调党国政府跟南洋筹赈会沟通的重要渠道。1937年8月15日，侨务委员会发布告华侨书：“在现在国家有史以来最大危机的抗日战争中，祖国需要华侨各人在精神上以及物资上的爱国支援”[131]。国民党于1938年4月设立海外部，以加强海外党务，策进华侨抗日救国运动。1939年，为了加强工作配合，发挥及集中力量，扩展战时工作，海外各地

[129]《中国侨务政策概述》，页59。

[130] 姚楠，《星云椰雨集》（新加坡：新加坡新闻与出版公司，1984年），页168。

[131]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年），页194—197。

党部和领事馆每月举行联系会议[132]。因此，党府、各地党部及侨务行政机关（包括领事馆）是南侨总会及各地筹赈会强力的支援力量。

七七事变宣示日本全面对华侵略，引起南洋华侨自发性强烈反应，也加速了自1928年济南惨案而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15日，中华总商会董事会决定发电报给蒋介石，告知海外华侨对日本入侵华北之义愤，以及呼吁国民政府抗敌到底[133]。8月15日，商会主催侨民大会，即席成立星华筹赈会，陈嘉庚被选为主席。

同一期间，筹赈会组织在南洋各地遍地开花。为了更好地展开南洋各地的筹款活动，各地侨领遂有在新加坡筹组全南洋筹赈会的建议。于是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与荷印吧城华侨捐助祖国慈善委员会主席庄西言函请陈嘉庚主催。陈嘉庚谦让，没答应。庄西言上书蒋介石，请政府出面，行政院长孔祥熙于是电洽陈嘉庚，同时嘱驻新总领事高凌百（1936年底继任）拜会陈嘉庚，除了转达国府请他主持大局的意愿外，两人也对筹款方法、通信联络及提倡国货等问题交换意见。陈嘉庚毅然接受此重任。1938年10月10日，180名来自南洋各地及香港的代表齐集新加坡召开全南洋侨民大会，五天后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担任主席，高凌百也在侨民大会致词及出席大会结束后的晚宴。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回国慰劳视察团，目睹机工生活条件恶劣，也没受到官员善待，非常不满。陈嘉庚即刻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力争改善机工的待遇，但未获满意答复。随后他率慰劳团到西北考察。6月初到延安。延安之行改变了陈嘉庚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看法。国民党府对他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两者关系顿成紧张，导致南侨总会第二届大会内讧。

南侨总会第二届大会订于1941年3月29日在新加坡举行。召开前一个月陈嘉庚宣布不愿连任。高凌百亲往慰留，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也致电慰勉。大会开幕当天，高凌百致词提及南洋有挂羊头卖狗肉的份子，呼吁大家要提高爱国的警觉性等语，陈嘉庚认为是影射他。第二天，陈嘉庚授意请总领事离开会场。陈嘉庚致词历数高凌百贪污、拥汪精卫、亲德三罪，同时又揭发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南来宣慰，到处鼓励树立党权，破坏华侨团结[134]。31日，陈嘉庚在各地代表的慰留下蝉联南侨总会主席。

高凌百任期至新加坡沦陷前夕（1941年12月）。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治期间领事馆暂关闭。

最后一任总领事伍伯胜

二战结束不久，国民政府即派伍伯胜博士来新担任总领事。伍伯胜，原籍广东台山人。随着国共内战，新加坡的华社也分裂成拥蒋拥毛两大阵营。自1946年8月，新加坡总领事馆也管辖砂劳越华人事务。他于1946年12月5日飞砂劳越宣慰侨胞一个月，受到热烈欢迎。视察后，英政府同意中国于1948年初在古晋设领。不久，中国大陆变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132] 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5》（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页9。

[133]《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5》，页187—203。

[134] *Monthly Review of China Affairs*, No. 83 (July 1937), pp.15–19.

立。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新中国政权。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关闭。总领事发闭馆通告："为通告事，本馆于本日10时，接本坡代理辅政司来函通知，英政府已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兹遵照外交部电令，于本日下午四时下旗闭馆，特此通告"[135]。伍伯胜也发致谢侨胞书，感谢侨胞任内给他的支持和爱护。他也致函给辅政司、法国总领事、各国总领事和领事[136]。当时伍伯胜担任驻新领事团领袖，他将该领事团领袖职务移交给法国驻新总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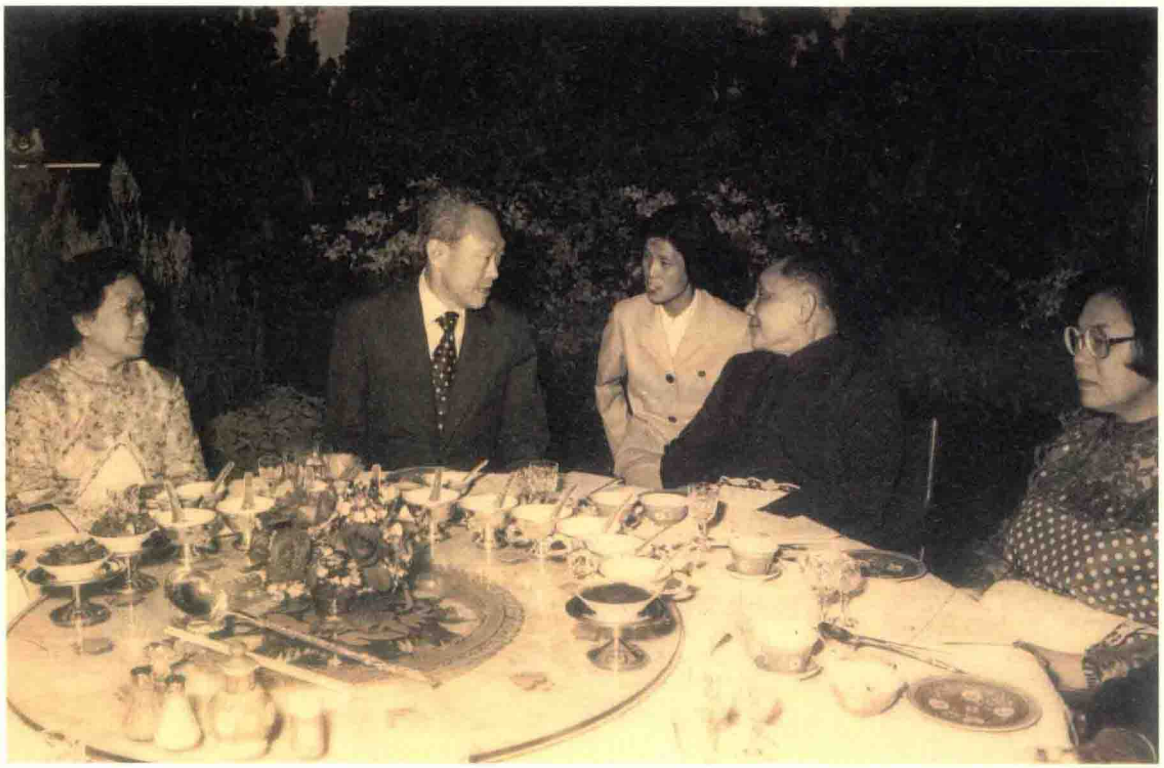
领事馆闭馆前半小时，《南洋商报》记者现场报道："向领事馆领取护照的侨胞，没有一个。门前的车马稀疏，没有过去的热闹，但全体馆员照常办公，神态自若，没有一点结束前凌乱表现"[137]。

闭馆时国民政府驻新总领事馆主要人员除了总领事伍伯胜外，有领事廖颂扬、副领事程心益、李祝怀、随习领事唐承庆、刘寿山、卢佳、主事于建阁、戚耀华及余寿浩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大使（1990–2015）

新中建交前后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新加坡的战略性地理位置和华人占多数的人口结构，又成为东南亚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围绕着新加坡的是邻近的回教国家：马来西亚、印尼、汶莱及菲律宾（南部回教区域），新加坡可说是处于东南亚马来世界的中心。建国之初，新加坡的华人因素引起国内非华人族群及邻近回教国家的疑虑，甚至深感威胁，惟恐新加坡会成为第三中国。另一方面，新加坡地处回教国中心的地理因素，也使当时防卫力量薄弱的新加坡，惶恐不已。因此，华族与马来世界中心两大因素主导了第一代新加坡政治领袖的外交思维与外交政策。为了证明新加坡不是第三中国，新加坡公开宣布它将是最后一个东盟国家和中国建交。



李光耀与邓小平在总统府国宴上亲切交谈（1978年）

[135]《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册）》（台北：华侨协会总会，1999年），页212—216；陈嘉庚演讲词，见杨进发编著，《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新加坡：南洋学会，1980年），页154—160。

[136]《南洋商报》，1950年1月7日。

[137] 同上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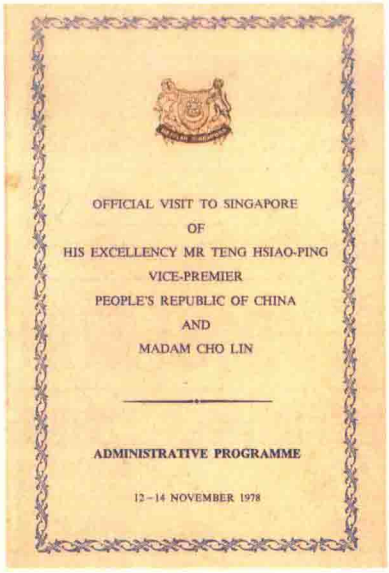
建交前破冰之旅的一些花絮

1975年3月，外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访华，同时部署总理李光耀翌年正式访华。他没想到在一天深夜里，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里接见他。

1976年5月10日，李总理首次访华见到了怀病在身的毛泽东主席，还特地要求访问延安。让中方大吃一惊，这是外国首脑破天荒之举。中方欣然答应，并安排两架苏制螺旋桨飞机给新加坡代表团飞赴延安参观[138]。

随后中国邓小平副总理于1978年11月12日至14日正式访新[139]。邓小平一下机就在巴耶利峇国际机场（Paya Lebar International Airport）发表书面讲话，说他是对李光耀访华的回访，“双方将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40]。一行人下榻在总统府里的一座别墅。

当晚八时李光耀总理在总统府设国宴招待[141]。邓小平访新期间，双方进行了两次会谈，李光耀详细介绍了新加坡经济发展过程、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吸引外资等各项措施。会谈后，吴庆瑞副总理专程陪同邓小平去考察裕廊工业区。邓小平表示希望吴庆瑞


OFFICIAL VISIT TO SINGAPORE
OF
HIS EXCELLENCY MR TENG HSIAO-PING
VICE-PREMIE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MADAM CHO LIN

ADMINISTRATIVE PROGRAMME

12–14 NOVEMBER 1978

1978年邓小平访新行程手册

先生到中国访问，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建议。1985年中国国务院正式聘请他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142]。

新中建交

新加坡遵守诺言终于在1990年10月3日在印尼之后跟中国建交。两国建交后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一直维持紧密关系[143]。中国与新加坡建交后，开始派遣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表（三）列出建交后至2014年中国派驻新加坡大使一览。

[138] 同上注。

[139] 张青，《出使新加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页32。

[140] 有关邓小平访新详情见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页63—684；张青，《出使新加坡》，页33—37。

[141] 邓小平副总理在新加坡机场的书面讲话，1978年11月12日。

[142] 国宴前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国宴前循例会互换首长讲稿。当时笔者任职文化部新闻组，受总理新闻秘书之命将李总理的讲稿送到总统府别墅给中方外交部新闻司工作人员。约半小时后，该官员从楼上下来，说邓副总理要对其讲话稍作修改。邓小平改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开头客气话，原句是：“应李光耀阁下的邀请，我们十分高兴地前来贵国进行友好访问。总理阁下刚才的友好讲话以及你们给予我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修改过的句子为：“……总理阁下给了我们热烈的欢迎和盛情接待我们”。第二句在讲稿的第二段，原句是：“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修改过的句子是：“……，但是，中国人民的愚公移山的精神……”。

[143] 有关邓小平访新破冰之旅，详见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页664—672；张青，《出使新加坡》，页33—37。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1 月 24 日

新加坡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之间开始有电讯交通

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名	职称	任期	馆址
张青	大使	1990.12 – 1993.02	大威路(Dalvey Road) 70－76号
杨文昌	大使	1993.03 – 1995.06	同上
傅学章	大使	1995.07 – 1997.07	同上
陈宝鋆	大使	1997.08 – 2000.08	同上
张九桓	大使	2000.08 – 2004.04	同上
张云	大使	2004.05 – 2007.02	东陵路(Tanglin Road)150号
张小康	大使	2007.03 – 2010.04	同上
魏苇	大使	2010.05 – 2012.12	同上
段洁龙	大使	2013.04 – 2015.05	同上
陈晓东	大使	2015.06 – 迄今	同上

第三节　顶戴花翎
——晚清“售卖官衔制度”与新加坡华人

摘要

晚清由于常面临天灾，国库空虚，遂由清官员向新马华侨售卖下列四种官衔：捐虚衔，捐出身，捐加级和捐封典。购买官衔者大部分是华籍富商，他们有能力和有强烈的意愿来购买官衔。本节以多层面来分析售卖者（清政府）的动机，售卖过程和潜在的政治利益，以及购买者（华籍富商）的心理需求，身份的提升和领袖地位的加强。

Abstract

In late Qing, as China was facing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without adequate means to tackle the problems, while the Overseas Chinese were enthusiastic in acquiring fame and social status, the Qing honours flooded the market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his chapter analyses the motives, the process of selling and the hidden political interests of the sellers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the raising of social status and strengthening of leadership claims of the purchasers (the wealthy Chinese merchants).

颜清湟（**Ching-hwang Yen**）

经过30多年的成长，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已日趋成熟[1]。当时，以地缘为主的会馆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亲会纷纷建立。同时，华社也出现了一批腰缠万贯的富裕商人，他们长袖善舞，入息丰厚，过着令人羡煞的优裕生活[2]。也就是这些富裕的商人，除了物质上的享受之外，他们有能力追求那些看不见和摸不到，但是可以感受到的声望和地位。

虽然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还是讲几种不同的华族方言，同时也保留许多华人传统的习俗。但是，他们与中国并没有任何的官方接触。1877年当清朝的第一个领事馆在新加坡设立时才结束这种局面。清朝领事馆的设立对新加坡华人来说，如同天降甘霖。但这甘霖并非化外之“弃民”的极力恳求，也非清朝本身经济利益的考量，但却是因为一位高瞻远瞩的外交家——郭嵩焘的创举。当他出使英国路经新加坡时，作出在当地设立领事的重要决定[3]。清朝领事馆的设立给新加坡的华人带来极大的心理震撼。从那时起，他们在清政府的眼中不再是“化外之民”或“天朝弃民”，而是受政府保护的“臣民”[4]。由于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坚持，清朝同意就地取材，委派当地颇孚众望以及和英殖民地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华籍绅商胡璇泽（又名胡亚基，外号黄埔）为第一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5]。胡璇泽因年迈力衰，加上他的领事职位只是兼任性质，领事馆经费短缺，在他任内的三年期间（1877-1880，胡亚基于1880年逝世），建树不多。但新加坡清领事馆的设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把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拉近。

晚清时期中国与新加坡华人

新加坡华人与中国关系的重要发展却要等待两位专业外交官的莅临才打开新的局面。他们是新加坡华人历史上著名的清朝外交官左秉隆（左子兴）和黄遵宪。1880年，首任清驻新加坡领事胡璇泽去世后，留下了不易填补的空缺，当时清领事馆有可能被英方取消。由于清政府的坚持，成功派遣一名专业的外交官左秉隆前来填补。从这个角度来看，左秉隆的接任是清政府外交的一次胜利，因为它争取到派遣领事的专有权。

左秉隆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外交官，曾经在伦敦中国使馆服务多年，精通英语，对西方的礼仪也非常娴熟。他的外交手腕和语言技巧使他能与新加坡的英殖民地政府官员建立友善的关系，从而在新加坡华社顺利推行文化与教育的活动。在他第一次任内的10年间（1881-1891），除了履行保护当地华人的权益外，他花了很多时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和华文教育。1882年，也就是他接任新加坡领事的第二年，创办了“会贤社”。顾名思义，“会贤社”就是汇集有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子参加提倡文化的活动。左领事亲身参与，每月初他出题给那些参加竞赛的文人学者写文章或作诗，并以本身的部分薪酬为奖金，亲自颁发给获奖者以资鼓励[6]。比如1889年正月当光绪皇帝大婚的时候，左秉隆在“会贤社”主办正月课榜，以光绪皇帝大婚为题，而参加竞赛的士子达21人。他们的文章由领事亲自批阅并选出最好的三名，即第一名祝万年，第二名李梦花

---

[1] 有关1850年以前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成长，参阅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载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页11-38。

[2]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76-304，就记载着许多早期新华社会中的富商和他们的生活。

[3] 有关导致设立新加坡第一个清朝领事馆的分析，参阅Wen Chung-chi, "The Nineteenth-Century Imperial Chinese Consulat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64)；Yen Ching-hwang,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1851-191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40-144；也参阅中文译本，颜清湟著，栗明鲜、贺跃夫译，姚楠校订，《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0年12月），页151-153。

[4] 有关历朝中国对海外华人歧视的讨论，参阅颜清湟，〈清朝时期海外华人传统形象的变更〉，载颜清湟著，《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造室，2010年11月），页9-10。

[5] 〈使英郭嵩焘奏新加坡设立领事片〉，载《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重印版册1，页211（即原版卷11，页13）；林孝胜，〈清朝驻星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1877-1894〉，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页17-18。

[6] 《叻报》，1889年7月27日。

和第三名刘云楼。他们都受到奖励[7]。左领事也关心当地华人的教育，他认为如果华人子弟不接受华人的传统教育，将丧失中华文化的根。他鼓励富裕的华商捐资开办华文学堂。在左秉隆的影响下，华文学堂纷纷成立，如保赤宫陈氏宗祠所建的“毓兰书室”，广肇商人所建的“广肇义学”，由颜永成独资创办的“培兰书室”，以及其他的“乐英书室”和“养正书室”等[8]。

清朝领事的提倡传统文化和教育传承了中国的语言与文化。它们不仅使大部分新加坡华人感到作为“天朝子民”为荣，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激发他们对清政府效忠的热诚。左秉隆在这方面的努力继续由他的继承者黄遵宪总领事完成。黄遵宪是晚清时期著名的诗人和改革运动的支持者。他继续提倡文化活动，把“会贤社”改名为“图南社”。从“图南社”的名称和它每月诗文竞赛的题目来看，黄遵宪不仅注重中国的事务，同时也注意新加坡的课题[9]。黄遵宪也极力提倡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如孝道和贞节，以及扩充对马来半岛华人的保护[10]。此外，他极力向清政府条陈，必须废除传统的移民政策。该政策老旧而不合时宜，它束缚了中国人向海外的拓殖。因此，1893年，清朝政府正式废除该政策[11]。

清朝国力的日益衰败，可能影响到左秉隆和黄遵宪在新加坡的护侨效果。但是，左、黄两领事在提倡文化与教育的工作却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从新加坡的观点来看，这时期（1877-1911）正是中华文化的启蒙时期，而它的缔造者就是左秉隆领事。他的努力使到远离故土而定居在天南一隅的华族移民能够再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他作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当之无愧[12]。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朝的售卖官衔可以在新加坡华社顺利进行。

清政府为何与如何售卖官衔

虽然鬻官卖爵的事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年间，但是，售卖官爵的制度却是形成于清朝。1635年，即满洲人建立清王朝的前九年，满洲地区遭受严重的饥荒，满洲皇帝皇太极（后尊为清太宗）开始售卖官爵来填补国库的空虚。但此举只是一次过，并没有把售卖官爵变成一种制度。但是，到了18世纪乾隆皇帝时，鬻官卖爵已成为补贴国库空虚的一种办法。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在位时东征西讨，耗费巨额军费。加之，贪官污吏横行，国库更形短缺。于是，售卖官爵就成为政府筹集经费的一个有效途径。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和孙子道光皇帝在位时，因为内忧外患加剧，国库更形空虚，售卖官爵作为一种制度当然更显得需要。1842年和1860年，满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于是，售卖官爵更为迫切。1843年当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受到巨款赔款的沉重打击，政府大量售卖官衔，但当时的对象却

[7] “星洲会贤社主办正月课榜，以光绪帝大婚为题”，《叻报》，1889年3月2日，页5。

[8] 陈育崧著，《椰阴馆文存》卷1（新加坡：南洋学会，1984年），页123；柯木林，〈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载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页118。

[9]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115-116.

[10] 郑海麟著，《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6月），页369-376。

[11] 有关黄遵宪在清政府废除传统移民政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参阅Yen Ching-hwang, *op.cit.*, pp.253-266；也参阅中译本《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年》，页272-280。

[12] 柯木林，〈新加坡领事官左秉隆：事迹与历史评价〉，载刘泽彭主编，张应龙，徐云副主编，《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页18。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这一年的人口调查结果，华人在8万1734总人口中占5万零43人

不包括海外华人。因为他们的形象已经从以前的所谓“化外之民”或“天朝弃民”变成更为恶劣的“汉奸”[13]。在1887年之前，海外华人还是被拒于清朝政府售卖官衔的门外。但是也有些例外的事件。如1869年，新加坡的一位闽帮领袖章芳琳就曾经以捐赠福建海防的形式，购买到清朝的“道员”官衔[14]。另外一位新加坡的华人领袖胡璇泽（胡亚基），当他还没有被清政府委任为驻新加坡临时领事时，就已经拥有同样的“道员”官衔[15]。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廷以虚衔、封典和花翎（翎枝）的奖励方式劝华侨捐资以充当新加坡和吕宋领事馆的经费[16]。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清廷变通章程售卖虚衔，封典和花翎的规章在《叻报》刊登[17]。两年后（1889年），当一张清朝虚衔的价格表刊登在《叻报》的时候，这意味着清政府已经正式打开售卖官衔的闸门，让海外侨民按价购买。这张价格表中共有47项官衔供选择，从最便宜的虚衔“把总”要价38.40两，到最高的“道员”衔，要价1679两不等[18]。从这时候起到1912年2月满清政府正式覆亡为止，清朝的官衔泛滥了整个海外市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年28岁的邱菽园捐银六千六百两购买道员衔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朝在新马售卖虚衔发展的两个阶段。1889年之前，售卖官衔是在伪饰中进行。华族富商以救济中国的灾荒为名，捐出可观的款项。之后，由各受灾省份的巡抚或总督奏请奖赏。当时北京的中央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每当中国发生水灾或旱灾时，有关灾区的省政府便通过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或委派当地的侨领为代理人筹款。1887年，河南郑州地区遭受严重的水灾，河南省政府就委任新加坡侨领李秋坪为代理人，负责筹募救灾善款。李秋坪在当地的唯一华文报章《叻报》刊登一则通告，敦促华侨慷慨捐输[19]。1888年12月，上海道台龚照瑗曾致函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敦请他协助筹款，以救济安徽地区遭受严重旱灾的灾民[20]。这种筹款方式并不能保证成功，全赖新加坡领事官或代理人的热忱和努力。在这两个案例中，省政府或许已经向代理人和领事暗示，赈捐绅商愿意出多少银两，而他们可能获得的某种官衔。当捐助者把款项缴清，省大员将按情奏请清廷授予适当的官

[13] 有关这问题的讨论，详见颜清湟，〈清朝时期海外华人传统形象的变更〉，载《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页15-23。

[14]《星报》，1893年4月20日。

[15] 使英大臣郭嵩焘奏请在新加坡设立领事的奏文中，提到“新加坡见广东人道员胡璇泽为其地人民所推服……”。显然，胡璇泽在还没出任新加坡首任领事之前，已经拥有“道员”官衔。参阅〈使英郭嵩焘奏新加坡设立领事片〉，载《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1964年，重印版），册1，页211；《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原版，卷11，页13。

[16] 张之洞，〈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保护，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载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册1，页474；原件，卷23，奏议23，页14。

[17] 李鸿章的奏请清廷变通章程以济要需的摺文经户部商议后批准三条例，其中包括“翎枝酌减”和“道员准捐二品顶戴”。在“翎枝酌减”一项中规定，以后凡三品以上捐花翎者，需银2000两，四、五品花翎需银1000两，蓝翎500两，均以实银清收，不再折减。在“道员准捐二品顶戴”一项中规定，以后由原有三品衔道员捐加二品顶戴者，应捐银5400两。如果原来没有三品衔者，则按此数加倍报捐。仍照海防例减二成上缴。见〈清政府所颁之捐务新章〉，载《叻报》，1887年10月24日。

[18]《叻报》，1889年10月17日。

[19]《叻报》，1888年1月4日。

[20]《叻报》，1889年1月2日。

新加坡殷商陈泰之牌位（朝议大夫）

衔。1888年，吉隆坡华人甲必丹叶致英（又名叶伯雄）曾献捐5000元（墨西哥银元）作为广东惠州水灾的救济金。广东巡抚便奏请朝廷授给一面褒奖匾额[21]。

从1889到1911年间的第二个阶段中，售卖官衔变成公开化，也就是所谓市场导向制度。在这制度下，售卖官衔已经不需要伪饰进行。由于清朝的经济危机日益加重，国家所需的银两也更为迫切，公开售卖可能带来更好的效果。于是，官衔的价格表公开在当地的华文报章刊登藉此吸引更多的购买者[22]，而清朝的省政府则成为积极的推销机构。它们除了照样通过清领事或当地的代理人，以维持原有的售卖官衔的途径外，还派出本身的代表团，以进行更直接的销售活动。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根据新加坡华民护卫司的一位官员的估计，大约有40名清朝官员，被省政府派遣到新马地区执行这任务[23]。

一支售卖官衔代表团的人数，由一人到三人不等，这要看灾情的严重性而定。代表团的人员普通下榻在代理人的店铺，并把它当作行辕来处理售卖事宜。在代理人和清领事的协助下，他们的莅临受到广泛的宣传，刊登在当地的华文报章上。当他们抵新后，首先必须声明身份和官阶以及所代表的机构，并解释南来的目的。他们也通过报章呼吁侨胞慷慨捐输以济灾民。同时，也在报章上刊登官衔的价格表以及购买官衔的条款[24]，这些价格表把买卖双方的关系拉紧。任何人想要购买官衔可以直接和售卖官员或他们的代理人联络。因为售卖的官衔种类繁多，可供购买者自由选择。他可以购买最便宜的“贡生”或“监生”的头衔，这都不超过100银两。也可以购买昂贵的“道员”和“知府”头衔，要价都超过1000银两。当然，也可以购买多个官衔，或购买官衔给他的儿子或祖先，那要看他的经济能力和意愿而定。虽然刊登报章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吸引购买者，但是，如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售卖者还须通过私下的讨价还价，并加上一些有效的保

[21]《叻报》，1888年9月1日。

[22]《叻报》，1889年10月17日；《星报》，1894年3月5日；《天南新报》，1900年12月3日；及《中兴日报》，1907年9月25、26日。

[23] 这位英籍官员是当时新加坡副华民护卫司（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哈尔氏(Mr. G. T. Hare)。哈尔氏精通中文，是当时英籍官员中对中国和华人事务问题专家中的佼佼者，他曾编三册《三州府文件修集》(G. T. Hare,(ed.), *A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Sele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Special Use of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rotected Native States, 3 Volumes,* (Singapore: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4))。其中保存许多早期有关新加坡华人的珍贵史料。第一册，“禀帖卷”（Petitions）中保存了118件当地华人向华民护卫司提呈的禀帖，页1–99。除禀帖外，第一册的另一部分则包括70件“告示”（Proclamations），页100–164。其中大部分是新加坡华民护卫司的有关华人的告示，但也参杂一些广东和福建政府有关华族移民或当地社会的一些告示。由于哈尔氏对中国和当地华人的了解，他的估计是相当可靠的。见 “Report by Mr. G.T. Hare, 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 Singapore dated 30th September 1896”, in Colonial Office Records (CO), 273/218, pp.56–58.

[24]《叻报》，1889年10月17日、1890年1月5日；《星报》，1894年3月5日；《天南新报》，1900年12月3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渣打银行正式在新加坡设立分行

证。因为那些有能力购买的绅商，当他们要进行这种交易时，免不了有多少疑虑。有些怀疑售卖官员和代理人的诚信，有些人要等到官衔的价格有所降落时才积极进行[25]。

当交易成功后，购买者的大名将公布在当地的华文报章上，藉此招徕更多的购买者。同时，售卖官员将他的名字呈上给各该省衙门，并奏请朝廷授予适当的嘉奖。由于售卖官衔的动力来自不同的省级和道级的衙门，这制度免不了有些缺陷。当时北京的朝廷需要批准那些官衔的售卖，但又不协调这项工作。这造成各省衙门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得官衔的价格逐步下降。同时在购买者心中造成混乱。中央没有统一的售卖机构和一定的价格也导致不良的后果。有一些购买者被强迫诱买他们不想要的官衔，有些买贵了，还有一些甚至受骗。这些不当的行为使清政府的形象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受损[26]。

谁购买清朝的官衔为何要购买

晚清时期新加坡华人拥有官衔者，大部分是通过购买方式而极少部分是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这时期新马两地的拥有官衔的295名中，只有五人，即少过2%的比例，是通过科举或立下军功而获取。这少数人是福建武进士林国瑞，福建举人邱菽园，拥有五品军功的另一位福建人郑鸿梁，以及拥有举人资格的客家人张克诚，和拥有五品军功的广东人韩旭[27]。

在清朝售卖官衔制度的五种捐献中，有四种稍微修改过的类别供海外华人选购。它们包括捐虚衔，捐出身，捐加级和捐封典。在新马291位购买虚衔者当中[28]，有220名捐虚衔，63位捐出身，4位捐加级，和47位捐封典[29]。在购买清官衔的富商当中，只有少数购买较高官阶的虚衔。在291名的样本当中，只有50名拥有，那就是等于17.2%。这些虚衔包括道员、道台（观察）、知府（太守）、员外郎、盐运使（都转）、中翰、部郎和朗中[30]。大部分高级的官衔要价超过1000银两，而这数目是超过普通商人可以支付的。

因此，我们可以下定论，在这期间，新马最少有50名极为富有的华族商人。其实，在这50名富商中，有17名更是富甲一方和名噪一时的超级富商。而区区1000或2000银两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著名的超级富商如新加坡的章芳琳、陈金钟、吴寿珍、邱菽园、吴进卿、李清渊、和刘金榜，以及马来亚的张弼士（张振勋）、胡子春（胡国廉）、余东璇和谢荣光等就属于这一类。他们花了成千上万的银两，购买多个虚衔和官位，藉此提高他们的威望和地位。

章芳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69年，他捐献福建海防基金获“道员”衔；1881年，他捐款救济直隶（现在的河北省）旱灾灾民，替他的祖宗三代（包括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获取三级加二品的“封典”；1888年，又捐助河南郑州水灾而获赏戴花翎；1889年，为表示他的孝心，花了超过1万银两替他的祖宗三代获取“盐运使”衔兼三级加一品[31]。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新加坡富商吴进卿（又名吴新科或吴冀鼎），八年内（1889-1896）购买了五个不同的官衔。吴进卿不断购买越高级的官衔来提升其地位。从“资政”到“方伯”，最后于1896年买了“花翎盐运使”的高衔[32]。

在我们的样本当中，有82.8%购买较低的清官衔，似乎是较不富裕的商人。但是像新加坡的颜永成和李俊源，槟城的梁碧如，以及柔佛和新加坡的黄亚福（又名黄耀庭，黄福基和黄莆田）则是例外。这些人也非常富有，他们是

---

[25]〈新加坡副华民护卫司哈尔氏的报告〉，1896年9月30日，同上注23；《叻报》，1890年12月4日。

[26] C. H. Yen(Yen Ching Hwang), "Ching's Sale of Honours an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877-1912),"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 No.2, p.24；也见中译文，颜清湟著，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载《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58。

[27]《星报》，1896年4月8日、1897年4月13日；《天南新报》，1901年9月28日；《叻报》，1906年7月5日。

[28] 本来在295位拥有官衔中，减去5位，应得290位。但是邱菽园除了通过科举获得举人外，也向清政府购买官衔，所以得到291的数目。

[29] 这三个数字加起来是334名，这似乎有错误。不然，是因为其中有许多捐虚衔，捐加级和捐封典加在一起。这些数字是根据《天南新报》（1898至1903年）；《星报》（1892至1897年）；《叻报》（1887至1896年）；《日新报》（1900年）；《中兴日报》（1907年）；《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朝东华录》；和保存在台北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而未出版的“总理衙门档案”的资料编辑而成。

[30]“道台”即是道的监督官；“员外郎”即是中央六部某部的二等秘书；“盐运使”即是盐务的统筹官；“中翰”即是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的秘书；“部郎”即是中央六部某部属下的署长；“郎中”即是某署的秘书。

[31]《星报》，1893年4月20日。

[32]《叻报》，1889年3月26日、1890年8月13日；《星报》，1892年2月10日、1893年3月16日、1893年4月4日、1894年3月3日、1895年2月18日、1896年4月8日。

身着清朝官服的本地富商刘金榜

新马著名的商贾。这一点说明了并非所有的富商都要购买较高的官衔，以符合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并非出不起这笔款项，他们可能觉得那些高级官衔要价太高，货非所值。在这些较低的官衔当中，从最低的“监生”衔要价38银两到最高的“同知”（或称司马）衔要价690银两。以上的两种官衔加上“州同”（或称州司马）是最受欢迎的，占较低官衔的61.3%。在230个低级官衔中，计有54名“同知”、37名“州同”和52名“监生”[33]。

新加坡的华族社会是由广东和福建的移民及其后裔所组成，保存着华南所流传的有关家庭、氏族和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这包括孝道、贞节、尊老敬贤、褒扬官职和教育，并注重名誉和社会地位等。因此，“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等传统观念在许多移民的脑海中根深蒂固[34]。这些传统观念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模式相契合，那就是谋求官职而获取财富和威望。然而，海外华人社会的阶梯并非一样。由于移民远离故土，加上清朝对华侨的传统偏见，大多数的华侨和他们的后裔少有机会通过科举制度来获取官职。于是，社会阶梯的程序被倒转过来：先取得财富，然后才利用财富来获取威望和权势。

与中国传统的社会不同，当时新马的华人社会组织没有很严格的划分，它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它没有王公贵族和官僚，那些成功而乐施好善的富商很快就攀升到社会上层，成为华社的侨领；而那些丧失财富者则滑落阶梯。因此财富、威望和权势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这时期来自中国的移民，大都出身低微。而这时期的许多侨领，都是白手成家的人，他们在心理上对官衔有强烈的需求。当他们在华南农村度过童年时，大多怀有升官发财的梦想。他们在农村观看传统戏剧时，免不了看到大官出巡的场景，那就是“骑在高头大马背上，两旁跟着大批的护卫和随从，呼喝开道，备受旁观者称赞”[35]。当他们在农村或市镇的富有亲戚出资购买虚衔以穿戴官帽服饰，也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36]。在残酷的现实下，华南农村青少年的孩童梦想难以成真。或许，有一条向上爬的途径，那就是泛海出洋，挣得更多的钱财，然后购买所要的官衔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实际的层面，清朝官衔带来令人羡煞的荣誉和特权，而这些都能够在生活、传媒和社交活动中显示。官衔使拥有者穿戴与众不同的官帽和服饰，而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些象征的详细区分则代表不同的荣誉与地位。在清朝的官场中，从中央的一品大员如六部的尚书和以上的官员，到九品的县吏都穿戴不同的官

[33] 颜清湟著，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载《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附表四”，页76-82，。

[34] 〈论旅叻华商近日渐知名贵之为荣〉和〈做官论〉，载《星报》，1892年8月9日、1893年4月18日。

[35] 这是《星报》编辑对中国官员出巡的生动描写，原文为“策骐马，出则驺从鸣道……见者侧目”，参阅〈论旅叻华商近日渐知名贵之为荣〉，载《星报》，1892年8月9日。

[36] 晚清时期，中国乡村地区的富有者购买“典吏”(县衙门掌管公文的书记）虚衔之风甚盛。参阅 T'ung-tsu Ch'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39.

陈金钟的墓碑上刻有清朝官位头衔

帽、服饰和腰带[37]。任何违规者将受到严厉的处分。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分析，官衔和拥有的荣誉使许多平民感到羡慕。新加坡的华文报章对官衔也非常重视。当某些富商购得官衔时，他们的芳名将依官衔高低等次刊登在报上，广加宣传。比如1888年，《叻报》的主编曾撰文报道他出席富商吴翼鼎（吴进卿或吴新科）在他的别墅德源园所设宴会的盛况。受邀的贵宾包括左子兴（左秉隆）都转、邱忠波观察、吴淡如太守、吴夔甫太守、黄吉亭司马、左树南通尹、莫翰卿上舍和陈必达守戎等。左秉隆被列第一，因为他是清朝驻新加坡领事，而其他贵宾的名次则按他们官衔的高低列出[38]。毫无例外的，报章的东主、主编和记者都认同官衔的社会价值，这反映在他们的报道上。所有购得官衔者的芳名都会被刊登在报章上。那些获得清政府的特别荣誉或匾额者将受到更多的表扬。1887年，新加坡的闽籍富商吴新科（吴翼鼎或吴进卿）曾捐献福建海防基金，受闽督杨昌潜奏请嘉奖。清廷赐吴匾额一块。《叻报》大加赞许，称他“居家有则，爱国能忠”[39]。

以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情况来说，唯一的大众传媒是华文报纸，曝光的机会很少。如果名字和新获得的官衔刊登在报端，那将会使到宗亲和乡亲们引以为荣和倍感骄傲。俗语云：“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对早期新加坡的华族移民来说，他们有机会在宗亲和乡亲面前炫耀他们的财富与官衔，将是何等荣耀的事，这也大大满足他们的虚荣心。

还有，清朝官衔可以帮助确认领导权。它能够加强富商已获得的领导地位。在当时的新加坡华人社会，许多富商虽然热衷于获得侨领的地位，但这种地位需要英殖民地政府或清政府的确认。那些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当然英殖民地政府的官位和官衔最受重视，但那些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富商，他们的选择是清朝官衔。它不仅加强富商所取得的侨领地位，同时也确认那些已经是华社的拥有实权的领袖如华人甲必丹之流。这种作用很显然地反映在清朝领事所主办的官方聚会如光绪皇帝诞辰或大婚、慈禧太后的华诞、华人新年，以及满清王公显贵到访的重要庆典等。在这些场合，那些拥有清官衔的富商和侨领很有机会被邀到领事馆赴会，向皇上和太后表示效忠。在这些庄严的庆典中，领事馆的正厅摆设象征皇权的龙牌。受邀的华社领袖按官衔高低列队向皇上和太后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以示归顺。礼毕，一位官衔较高的代表被推举朗读一篇颂词以表忠诚[40]。

---

[37] 如一位四品官员的官袍上绣上一只塘鹅，他的官帽上镶上一粒深紫色但不透明的石纽扣，他的腰带上有四个金色的方格以及一粒银色的纽扣。而拥有三品的官员的官袍上则绣有一只孔雀，帽上有一粒蓝宝石纽扣，他的腰带有四个金色方格和数粒蓝宝石。参阅 H.C. Sirr, *China and the Chinese*, Vol.2, pp.378–379.

[38]《叻报》，1888年6月5日。

[39]〈星洲华侨吴新科受封〉，载《叻报》，1887年8月26日。

[40]〈星洲诸华绅在领事署庆贺光绪皇大婚及亲政〉，载《叻报》，1889年3月7日（二月初六日）。

举一个例子来说，1888年2月适逢农历新年佳节，驻新加坡清朝领事左秉隆在领事馆举行一次重大庆典。领事馆正厅摆设光绪皇帝和慈禧皇太后的龙牌。19名拥有清官衔的绅商被邀出席。他们都身着清朝官服顶戴，按官衔的高低顺序排列，向皇上和太后行最隆重的三跪九叩的大礼。首先跪拜者是左秉隆，因为他是朝廷命官。排行第二的是陈旭年资政，因为他的官衔和年齿皆尊。再下来按官衔高低的是吴进卿观察、陈国泰资政、吴淡如观察、吴夔甫观察、黄文德太守、柯明辉司马、黄吉亭司马、李永志司马、颜永成司马、陈明远司马和黄耀开司马。再下来的是更次等官衔的拥有者如陈赓都戎、陈上林都戎、李俊源守戎、陈大耳州司马、黄兆光上舍、黄祝三上舍和蔡锦溪车功等[41]。在新加坡传统的华人社会，人们对尊卑和地位的高低非常重视和守护。那些付出重金购买清朝较高的官衔者当然对其地位的公开确认而倍感欢愉。

在这个时期，新马的一些掌握实权的华人甲必丹也热衷官衔。如新加坡实际的华人甲必丹和闽帮的领袖陈金钟就拥有“道台”衔，而马来亚吡叻华人甲必丹郑景贵则持有二品官衔，同时他也为祖宗三代购买二品官衔的封典[42]。吉隆坡著名甲必丹叶亚来（又名叶德来），吉打甲必丹戴春桃，吡叻甲必丹陈亚炎以及另一位吡叻甲必丹许武安都拥有官衔，所以他们可以穿戴清朝官服顶戴，并请人画像以传后代[43]。

对于上述的华族富商，侨领和甲必丹，获取清朝的官衔使他们有权穿戴清朝官服和顶戴，同时享受崇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耀。对他们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回故里向亲戚朋友和同乡炫耀，以光门楣。既然在新马成功的华族移民，大部分出身低微，他们有强烈的意愿要回乡炫耀自己的成就和财富。同时，也间接提升了亲戚和宗亲在乡里的地位。

售卖的官衔有四种：捐虚衔，捐出身，捐加级和捐封典。售卖的渠道是通过省政府或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或者通过新加坡清领事或当地的侨领。大部分的官衔购买者是新加坡的华族富商，他们有着强烈的心理需求，以金钱来改善身份和社会地位。清官衔使他们有权穿戴官服和顶戴，藉以显示自己的成功和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同时，清官衔也确认了他们在华侨社会已经获得的领导权。也有助于他们在中国故里炫耀成功和财富以及提升亲戚和宗亲在当地社会的地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清政府通过这批官衔拥有者来扩大它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影响力。在晚清的后期，当新马华人社会日益受到康梁的保皇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影响的时刻，清政府也通过他们和其他亲清朝的领袖来遏止上述两股势力的扩展。

[41]〈论人生第一事〉，载《叻报》，1888年2月22日。

[42] 颜清湟著，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载《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附表一”，页72；《叻报》，1889年8月12日、1890年5月31日。

[43] 王植原著，《叶德来传》（吉隆坡，新加坡，香港：艺华出版印刷有限公司，1958年3月），书前的照片；李业霖主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出版，1997年3月）封面和页279的照片。C.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1963), pp.2–12.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月25日

圣安德烈座堂举行献堂礼

附表（一）1877年至1912年间新马华侨向满清政府捐购较高官衔者名单

姓名	官衔	获官衔年份
张煜南	二品顶戴	不确定
章壬全（章芳琳三男）	员外郎衔	1889
章壬宪（章芳琳次子）	郎中衔花翎、二品顶戴	1889，1896
张弼士（张振勳）	知府衔、二品、道员衔	1893，1901
章芳琳（章明云）	道员、盐运使衔	1869，1889
陈积锦	知府衔、花翎	1908
陈秩园	通奉大夫	1890
陈进福	部郎衔	1889
陈晋国	道台衔?	1896
陈清泰（陈泰）	中宪大夫、通奉大夫	1898?
陈翼云	知府衔	1894
陈俪琴	知府衔	1892
陈逊志	资政大夫	1890
邱忠波	道台衔	1888
邱和穆	道员衔、花翎四品	1903
邱喜星	道台衔	1900
邱曾琪	道员、花翎四品	1903
胡子春（国廉）	同知衔、盐运使衔三品卿	1900，1908
吴寿珍（世奇）	知府衔、道台衔	1902，1909?
许仕超	道员衔	1903
谢荣光（春生、梦池）	同知衔、二品顶戴、盐运使衔	1897，1898
胡梦青	盐运使衔	1906
黄继祥	道员衔	1903
黄晓东	知府衔	1894
黄文生	知府衔	1890
邱正忠	花翎盐运使、荣禄大夫	不确定
邱菽园（炜瑗）	主事四品衔、道台衔	1901，1902
李清渊	同知衔、花翎二品顶戴	1890，1906
李星曹	道台衔	1900
廖世芳	花翎道衔	1908
林花钻（汝舟）?	同知衔、道员衔、五品	1892，1908
林鹏举	花翎三品	1896
林秉祥	花翎候选道	1906
林搏云	知府衔	1892
林士志	道员衔、花翎四品	1903

姓名	官衔	获官衔年份
林云龙（林志义）	福建花翎道	1900
刘明经	中翰衔	1890
刘金榜（元勳）	同知衔、道员衔	1890，1903
戴培元	四品衔法部员外郎衔	不确定
陈金钟	道台衔	1890?
蔡名英	花翎道衔?	1908
曾兆南	同知衔、中翰衔	1890，1892
戴喜云（春荣、欣然）	知府衔、道台衔、盐运使衔、道员及二品衔	1890，1895，1903，1908
吴进卿（新科、翼鼎）	资政、方伯衔、道台衔、廉访衔、花翎盐运使衔	1889，1892，1893，1894，1896
吴夔甫（丕球）	知府衔、道台衔、花翎二品	1888，1889，1902
吴淡如	知府衔、道台衔、盐运使衔	1888，1889，1890
吴梓材	候选道员、四品卿衔	1908
姚峻修	道台衔	1900
叶欲方	道台衔	1892
余东璇	道员、花翎四品	1903

附表（二）1877年至1912年间新马华侨捐封典者名单

姓名	替祖宗三代所捐之封典	捐购年份
张兆光	四品封典	1903
张裕	七品封典	1903
章芳琳（明云）	二品及一品封典	1881，1889
陈际远	五品封典	1903
陈鸿章	五品封典	1903
陈毓馨	六品封典	1903
陈国达	五品封典	1903
陈炳辉	五品封典	1903
陈树昭	六品封典	1903
陈陶来	五品封典	1903
陈庭魁	四品封典	1903
陈冬发	五品封典	1903
郑安邦	二品封典	1903
郑诗成	五品封典	1903
邱曾琪	四品封典	1903
邱曾三	五品封典	1903

姓名	替祖宗三代所捐之封典	捐购年份
李廷辉	九品封典	1903
梁国器	六品封典	1903
梁德成	五品封典	1903
梁维贤	四品封典	1903
林振麟	五品封典	1903
林祥昭	四品封典	1903
林明哲	五品封典	1903
林士志	二品封典	1903
林文英	五品封典	1903
林耀坤	六品封典	1903
刘景云	五品封典	1903
刘恭平	六品封典	1903
刘金榜（元勳）	三品封典	1903
王成德	七品封典	1903
魏开第	五品封典	1903
魏玉书	五品封典	1903

姓名	替祖宗三代所捐之封典	捐购年份
谢富谦	五品封典	1903
谢国元	九品封典	1903
黄继祥	四品封典	1903
黄瑞云	六品封典	1903
邱正忠	一品封典	不确定
郭永祥	七品封典	1903
李步腾	六品封典	1903
李腾辉	六品封典	1903

姓名	替祖宗三代所捐之封典	捐购年份
杨升来	五品封典	1903
叶世绵	五品封典	1903
颜我标	七品封典	1903
颜韫玉	五品封典	1903
余廷勳	九品封典	1903
余东璇	二品封典	1903
余荣芳	九品封典	1903

附表（三）1877年至1912年间新马华侨捐出身者名单

姓名	官衔	姓名	官衔	姓名	官衔
张洪廷	监生	范仲清	监生	刘进文	监生
张时举	监生	黄开成	贡生	邵绍璋	监生
张廷光	贡生	黄开咸	贡生	余宝箴	监生
张维藩	监生	黄开烈	贡生	沈祥云	监生
张郁昌	监生	黄开祐	贡生	蔡国章	贡生
张郁荣	监生	黄可学	监生	王鹏程	贡生
陈祯	监生	黄贝德	监生	王绍瀛	监生
陈正言	监生	洪为杰	监生	吴友杰	贡生
陈晋元	监生	古清	监生	杨金鉴	贡生
陈汉光	监生	蓝兆芬	监生	杨宗华	监生
陈倚	贡生	蓝益光	监生	杨友兰	监生
陈山言	监生	蓝鹏光	监生	叶贞正	监生
陈昇	监生	蓝文光	监生	叶懋斌	监生
陈惟勤	监生	李章润	监生	叶世坤	监生
陈永利	监生	廖赴源	监生	叶蔚文	监生
庄赞廷	监生	林承恩	监生	严我璋	监生
符朝选	监生	林浩川	监生	余霁明	监生
韩玉书	监生	林焕春	监生	余桂秦	监生
何达英	监生	林人信	监生	余宝华	监生
许澄灿	贡生	林瑞生	监生	余宝贵	监生
许大龄	监生	林腾云	监生	袁必福	监生

（注：贡生与监生皆为虚衔，捐购此二官衔者不能列入清朝的官僚集团。）

附表（四）1877年至1912年间新马华侨向满清政府捐购较低官衔者名单

姓名	官衔	获官衔年份
张兆光	同知衔	1903
张际远	守备衔	1903
张景华	守备衔	1903
张祥麟	州同衔	1903
张显宗	蓝翎	1903
章壬乾	布政司都事衔	1889
章壬庆	都察院都事衔	1889
章壬和	大理寺评事衔	1889
章壬焕	中书科中书衔	1889
章壬光	翰林院孔目衔	1889
章壬坤	按察司知事衔	1889
章壬寿	光禄寺署正衔	1889
章壬松	太常寺博士衔	1889
章壬荣	銮仪卫经历衔	1889
张时衡	同知衔	1890
张兹文	花翎同知衔	1906
张文澜	光禄寺署正衔	1903
张裕	詹事府主簿衔	1903
张云祥	同知衔	1896
陈捷春	花翎同知衔随带加三级	1906
陈镜澄	同知衔	1890
陈鸿章	同知衔	1903
陈宜进	同知衔	1896
陈毓馨	州同衔	1903
陈奕云	同知衔	1893
陈国桢	同知衔	1903
陈国达	同知衔	1903
陈麟祥	从九品	1903
陈鹏南	四品顶戴州同衔	1896
陈必达	守戎衔、同知衔	1888，1890
陈炳辉	蓝翎同知衔	1903
陈仕鹏	同知衔	1893

姓名	官衔	获官衔年份
黄吉亭	同知衔	1888
黄江永	花翎同知衔	1896
黄光玉	县丞衔、州同衔	1903
黄贵顺	盐提举衔布政司经历	1896
黄应昌	从九品	1903
饶灿	上舍衔	1890
郭濬	州同衔	
郭永祥	大理寺评事衔	1903
赖鸿文	州同衔	1903
蓝镇平	花翎同知衔	1908
蓝炳荣	州同衔	1896
李江泗	州同衔	1906
李俊源	蓝翎都司衔	1896
李心帆	贡士衔	1890
李鸿星	州同衔	1906
李冠常	待诏衔	1890
黎广熙	同知衔	1909
李步腾	州同衔	1903
李腾辉	州同衔	1903
黎廷辉	从九品	1903
李桐生	同知衔	1900
梁焕章	布政司经历衔	1903
梁国器	营千总	1903
梁碧如	同知衔	1900?
梁宾荣	从九品职	1896
梁德成	州同衔	1903
梁天禄	布政司理问衔	1903
梁维贤	同知衔	1903
廖荣相	从九品	1903
林振勉	蓝翎	1903
林志义	同知衔、花翎四品	1897
林祥昭	同知衔、花翎五品	1903

姓名	官衔	获官衔年份
陈少庚	都戎衔	1890
陈树昭	州同衔	1903
陈纯道（陈金钟次子）	同知衔	1890?
陈大耳（德信）	州同衔	1888?
陈陶来	州同衔	1903
陈赓园	都尉衔	1889
陈天香	守御所千总	1903
陈廷才	州同衔	1903
陈冬发	同知衔	1903
陈维清	同知衔	1890
陈荣章	同知衔	1903
陈荣光	同知衔	1903
陈永源	州同衔	1903
郑安邦	游击衔、花翎四品	1903
郑成东	州同衔	1906
郑清和	同知衔	不确定
郑青云	同知衔	1906
郑瑞龙	州同衔	1906
郑懋龙	把总衔	1903
郑诗成	同知衔、花翎	1903
郑寿山	蓝翎同知衔	1906
郑位	布政司经历衔	1896
邱昭忠	中政衔	1909
邱和仁	都司衔	1903
邱曾南	布政司理问衔	1903
邱曾三	州同衔	1903
邱银力	同知衔	1892
邱银曹	同知衔	1892
锺铭新	五品诘职	1896
符腾芳	从九品	1903

姓名	官衔	获官衔年份
林国材	州同衔	1896
林明哲	州同衔	1903
林步元	州同衔	1890
林从善	同知衔	1892
林文英	同知衔	1903
林耀坤	州同衔	1903
刘朝光	州同衔	1903
刘集辰	从九品	1903
刘进业	花翎	1903
刘景云	花翎五品	1903
刘湘文	从九品	1903
刘恭平	州同衔	1903
刘步梯	从九品	1903
刘少沂	花翎尽先都司游击	1906
刘作栋	从九品	1903
罗子珍（乃馨）	同知衔	1890
梅炜贤	都戎衔	1890
莫翰卿	上舍衔	1888
欧阳钧	上舍衔	1890
潘述之	上舍衔	1890
彭耀光	中书科中书衔	1903
佘宜谦	蓝翎同知衔	1896
佘宜慎	蓝翎同知衔	1896
沈潜光	州同衔	1890
苏敬庄	州同衔	1903
孙逢源	都司衔	1906
宋文光	从九品	1906
汤汝亨	上舍衔	1890
蔡绵溪	守戎衔	1889
曹国馨	州同衔	1903

姓名	官衔	获官衔年份
颜永成（锡坤）	福建同知衔	1889?
韩任准	州同衔	1903
韩兰馨	州同衔	1896
何鉴宾	从九品	1903
何晋孚	县丞衔	1896
何晋梯	贡生、县丞衔	1892，1894
何敬轩	从九品	1903
何燮猷	从九品	1903
何惠荃	明府衔	1902
何乐如	上舍衔	1890
何世荣	营千总衔	1903
谢庆璋	通判衔	1903
谢俊奎	从九品	1903
谢富谦	蓝翎同知衔	1903
谢国元	从九品	1903
许则儒	州同衔	1903
许万命	光禄寺署正衔	1896
许文清	四品衔	1903
薛声光	同知衔	1896
胡玑（琼轩）	太仆寺卿衔	1893
胡心存（蔭荣）	州判衔	1890
胡国光	同知衔	1906
黄兆光	中书衔、盐提举衔、布政司理问	1890，1896
黄诏平（黄亚福之子）	大令衔	1902

姓名	官衔	获官衔年份
左树南	通尹衔	1888
王成德	中书科中书衔	1903
王值槐	光禄寺署正衔	1903
王雨村	都戎衔	1890
魏开第	同知衔	1903
魏申叔	同知衔	1902?
魏玉书	同知衔	1903
翁凌汉	同知衔	1903
黄亚福（莆田、福基、彦廷）	俊秀衔、同知衔花翎	不确定，1908
吴质钦	同知衔	1902
吴研秋（吴质钦之子）	明府衔	1902
杨昌丰	蓝翎同知	1896
杨铭汤	蓝生、县丞	1892，1899
杨升来	州同衔	1903
姚莲辉	同知衔	1906
叶世绵	州同衔	1903
叶达南	州同衔	1903
颜晋春	蓝翎同知衔	1903
颜熙载	州同衔	1903
严我标	中书科中书	1903
颜韫玉	同知衔	1903
余廷勳	从九品	1903
余荣芳	从九品	1903

附表（五）1877年至1912年间新马华侨向满清政府捐虚衔一个以上者名单

姓名	虚衔	品级
章壬宪	郎中衔	二品顶戴花翎
张弼士	知府衔、道员衔	二品
章芳琳	道员衔、花翎盐运使	花翎
陈翼云	同知衔、知府衔	
陈必达	守戎衔、同知衔	
郑安邦	游击衔	花翎四品
郑诗成	同知衔	花翎
邱和穆	道员衔	花翎四品
邱曾南	布政司理问衔	七品
胡子春	同知衔、盐运使衔	花翎三品
吴寿珍	知府衔、道台衔	
黄兆光	盐提举衔、中书衔	
谢富谦	同知衔	蓝翎
黄晓东	同知衔、知府衔	
黄光玉	州知衔、县丞衔	
李清渊	同知衔	花翎二品

姓名	虚衔	品级
林祥昭	同知衔	花翎五品
林花钻	同知衔、道员衔	
林士志	道员衔	花翎四品
林云龙	道台衔、道员衔	花翎
刘金榜	同知衔、道员衔	
邱菽园	主事衔、道台衔	四品
曾兆南	同知衔、中翰衔	
戴喜云	道员衔、盐运使衔	二品
黄亚福	俊秀、同知衔	花翎
吴进卿	资政衔、方伯衔、廉访衔、道台衔、盐运使衔	花翎二品、一品
吴夔甫	同知衔、知府衔	花翎四品、二品
吴淡如	知府衔、道台衔、盐运使衔	
吴梓材	道员衔	四品卿衔
颜晋春	同知衔	花翎、蓝翎
余东璇	道员衔	花翎四品

附表（六）1889年满清政府公布供新马华侨捐购之官衔价格表

捐官者	银额（两）	官衔
贡生与监生	1679.36	道员
贡生与监生	1391.92	知府
贡生与监生	1228.80	盐运司运同
贡生与监生	1228.80	郎中
贡生与监生	1024.00	员外郎
贡生与监生	640.00	同知
贡生与监生	531.20	主事、都察院都事、都察院经历、大理寺署正
贡生与监生	512.00	通判
贡生与监生	288.00	光禄寺署正
贡生与监生	240.00	通政司知事
贡生与监生	208.00	典簿

捐官者	银额（两）	官衔
贡生与监生	192.00	部寺司务
贡生与监生	160.00	国子监典簿
贡生与监生	115.20	国子监典籍、翰林院待诏
贡生与监生	102.40	翰林院孔目
贡生与监生	96.00	州同、布政司经历、布政司理问
贡生与监生	80.00	按察司经历、布政司都事、盐运司经历与州判
贡生与监生	64.00	盐库大使、按察司知事、府经历、县丞、盐运司知事及布政司照磨
贡生与监生	38.40	按察司照磨、府知事、县主簿、州吏目与茶马大使
知府	1564.80	四级随带加二品
知府	454.40	一级随带加四品
州同	448.00	二级随带加五品
武生与监生	583.68	游击
武生与监生	288.00	都司
武生与监生	51.84	贡生
俊秀	72.00	乡试监生
俊秀	38.88	监生
俊秀	25.60	九品顶戴与低于九品
庶民	152.00	营卫守备
庶民	128.00	守御守千总
庶民	80.00	卫千总
庶民	67.20	营千总
庶民	38.40	把总

资料来源：《叻报》，1889年10月17日。

附表（七）1894年满清政府公布供新马华侨捐购之官衔价格表

捐官者	银额（两）	官衔
庶民	690.00	同知
庶民	100.00	州同
庶民	38.00	监生
庶民	28.00	九品

资料来源：《星报》，1894年3月5日。

附表（八）1900年满清政府公布供新马华侨捐购之官衔价格表

捐官者	银额（两）	官衔
庶民	600.00	花翎三品
庶民	300.00	花翎四品
庶民	150.00	蓝翎

资料来源：《天南新报》，1900年12月3日。

附表（九）1907年满清政府在中国筹资与投资之华侨所赐封之官衔爵位

捐官者	银额	虚衔（X）或实位（S）
庶民	20,000,000.00以上	一等子爵（S）
庶民	18,000,000.00以上	二等子爵（S）
庶民	16,000,000.00以上	三等子爵（S）
庶民	14,000,000.00以上	一等男爵（S）
庶民	12,000,000.00以上	二等男爵（S）
庶民	10,000,000.00以上	三等男爵（S）
庶民	8,000,000.00以上	花翎三品（S）
庶民	7,000,000.00以上	三品（S）
庶民	6,000,000.00以上	花翎四品（S）
庶民	5,000,000.00以上	四品（S）
庶民	4,000,000.00以上	五品（S）与二品（X）
庶民	3,000,000.00以上	五品（S）
庶民	2,000,000.00以上	四品（X）与二品顶戴
庶民	1,000,000.00以上	四品（X）
庶民	800,000.00以上	二品（X）
庶民	500,000.00以上	三品（X）
庶民	300,000.00以上	四品（X）
庶民	100,000.00以上	五品（X）

资料来源：《中兴日报》，1907年9月25日-26日。

第四节　晚晴园内外
——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华社会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先后来到新加坡，因而引发本地华社对中国政治的关注，启蒙，并扩大海外华人对祖国政治参与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两股政治力量相互竞争，彼此对立而致内部分裂的同时，其实也是促使本地华人群体政治化的过程，从而塑造了海外华人中华民族主义认同。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he arrival of the Chinese reformist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Singapore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re was a political awakening among the local Chinese towards China. The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in fact a politic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local Chinese, which had shaped their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t identity.

陈丁辉（Tan Teng Ph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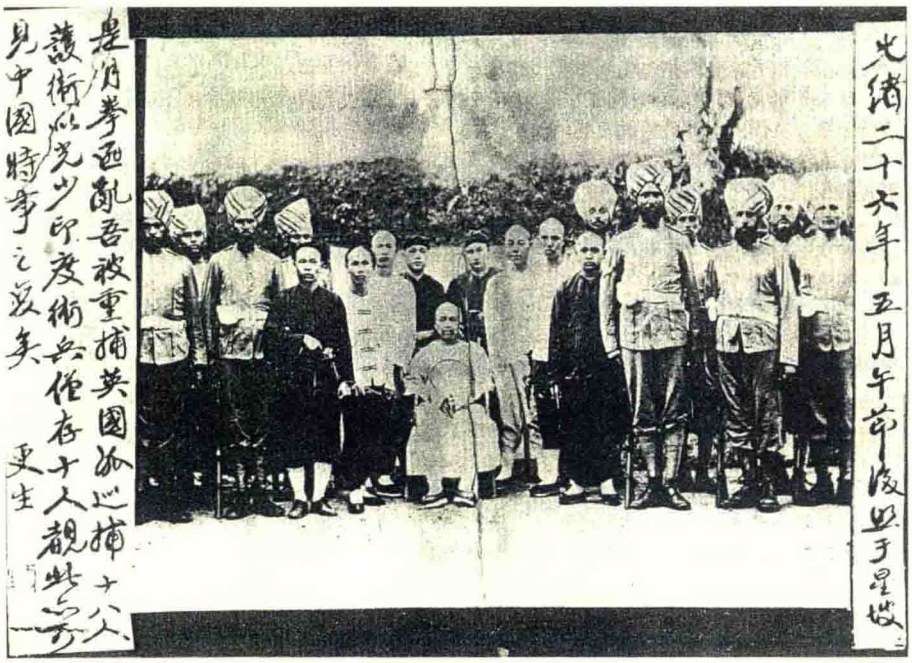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先后来到新加坡，因而引发本地华社对中国政治关注，启蒙并扩大海外华人对祖国政治参与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两股政治力量相互竞争，彼此对立而致内部分裂的同时，其实也是促使本地华人群体政治化的过程，从而形塑了海外华人中华民族主义的认同。当时维新派以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首，康有为甚至在戊戌政变后七次进出新加坡鼓吹维新和保皇思想。而革命派则以孙中山（1866-1925）为代表，先后九次来新宣传革命，并在此策划了其中三场起义。1900年，康有为和孙中山不约而同先后来到新加坡，他们分别代表了维新和革命两股势力，在本地华人社会圈活动，对新马华人社会的政治思潮产生深刻的影响。

保皇维新在新加坡：康有为、邱菽园

1900年的新加坡大约有15万华人人口[1]。随着人口的增长，由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所组成的会馆和社团应运而生，寺庙、学校和报馆也相继成立。本地最早的报纸《叻报》（1881年）和《星报》（1890年）都倾向支持满清政府，因此，当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后，两报也基于民族存亡的危机感主张变法图强，支持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即使戊戌变法失败，两报仍对康有为在海外的保皇勤王运动表达同情。1898年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也力挺康有为的政治主张。

邱菽园（1871 - 1941），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出生，自小受传统私塾教育。其父邱笃信在20岁时独自来到新加坡，经营米业致富。邱菽园8岁时来到新加坡，15岁重返家乡读书参加科举，先后考中秀才和举人，惟进士落第，从此绝意仕途。不过，正是这段回国读书和赴考功名期间（1888-1896），他接触到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所开启的改良及变法思潮。因此当他在1897年回到新加坡之后，仍然关注中国的政治变革。邱菽园个人非常推崇康有为，他本身也是维新派的信仰者[2]。

康有为（1858 - 1927），广东南海人，光绪廿一年（1895年）考取进士。甲午战争清廷大败后，康有为屡次



康有为（中坐者）与护卫
摄于新加坡（1900年6月）
（晚晴园提供）

[1] 新加坡的人口从1824年10,683人（华人占31%）增加到1840年35,389人（华人占50%），再从1860年81,734人（华人占61%）激增到1901年226,842人（华人占72%）。

[2] 这可以从邱菽园的著作《菽园赘谈》感受到维新改良的思想。有关邱菽园维新思想的研究，参阅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响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香港：香港大学，1997年），第四章，页82-84；张克宏，《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吉隆坡：华研出版，2006年）。

上书，终于1898年6月获光绪皇帝召见，开始启动新政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光绪皇帝遭软禁在瀛台，康有为于1898年10月24日流亡到日本，1899年4月前往加拿大、英国等地宣传维新，成立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以“忠君爱国”为号召，鼓吹君主立宪，明确反对革命。同年10月，康有为获悉母亲在香港病重，便从加拿大搭船返港，在港期间两次被清廷派出的刺客行刺不果，让他深感生命受到威胁。正当此时，邱菽园汇赠千金力邀他到新加坡避难。1900年1月27日，康有为乘船南下，2月2日抵达新加坡，展开他在南洋的流亡岁月。

史载，康有为在1900年至1911年12年间前后七次来到新加坡。这期间朝廷悬赏10万两要捉拿他。为了避开清廷的耳目和记者的追踪，康有为经常更换居处，一度住在邱菽园的店铺恒春号三楼“客云庐”和他的寓所“南华楼”内，也曾短暂居住在林文庆的家中，再入宿章芳琳的别墅“茂林园”。康有为也进出马来亚的槟城、太平、怡保、吉隆坡等地宣传保皇思想。

李元瑾总结邱菽园对康有为及其维新运动的贡献包括以下几方向：首先邱菽园出资创办了《天南新报》，以实际行动在新加坡支持中国的维新运动；其次他也在本地积极筹办新式学堂，负起章程起草和筹款等工作；再者他在1899年和林文庆等人创办新加坡华人女校，提倡女子受教的权利；其四他呼应康有为的兴儒之举，在本地倡导儒教复兴运动，透过报章宣传儒教的重要性；第五他在1899年10月发动南洋各地500名商众，电祝德宗皇帝“圣躬万安，早行新政”；第六他在1900年2月以从香港迎来康有为，让对方有安身之所进行维新活动；第七他协助康有为在新加坡统筹各地的保皇维新运动；最后邱菽园资助康有为策划1900年8月自立军在武昌的起义，虽然失败，但却是保皇运动中唯一一场起义[3]。概括而论，康有为得以在海外推行维新和保皇，全赖邱菽园鼎力相助，同时也使得新加坡成为保皇运动在海外的宣传中心。

革命之声在新加坡：孙中山、张永福与陈楚楠

孙中山（1866-1925），广东翠亨村出生，幼时受私塾教育。1878年偕母到夏威夷追随兄长孙眉，在当地入读教会学校，至1883年回乡，不久转到香港念医学院，学成后在澳门和广州行医。1894年，孙中山有感于中国积弱，朝廷面对列强侵略全无招架之力，欲上书李鸿章不果，遂决定放弃温和的政治改革路线，改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是年年底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1905年在日本创立同盟会，长年在海外宣传与推动革命理念，前后策划了10次起义。

根据王赓武的记录，孙中山前后来新共八次。不过最新发现的资料显示，孙中山总共来新九次，他在1905年底也曾到过新加坡[4]。1900年，孙中山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宫崎滔

[3]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后，湖南唐才常预定1900年8月22日发动自立军起义勤王，但因事泄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所镇压，唐才常等30位策谋者被杀害。起义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康有为不肯将海外筹募得来的款项汇给唐才常（其中包括邱菽园个人捐助的25万叻元），使其难以准备武器和粮食等补给。见李元瑾，〈邱菽园与辛亥革命〉（广州：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8月22日），页275。

[4] 有关孙中山来新八次的研究，参阅Wa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in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81), pp.130–139. 又：杜南发根据史料指出，乙巳秋/冬（1905年10月11日）孙中山由日本经新赴欧，逗留近两星期未被记录，因此孙中山来新应该是九次。参阅杜南发，〈孙中山到底来新几次？〉载周兆呈主编，《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新加坡：八方出版，2011年），页10–17。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9 月 10 日

丹戎巴葛船坞公司成立，资本 12 万 5000 元

晚晴园的前身“明珍庐”

天）的建议下，第一次前来新加坡欲与康有为见面，共商合作的可能性。当时宫崎寅藏与另一名日人清藤幸七郎先抵新，他们在等待孙中山到来之际被康有为怀疑是清廷派来的刺客，英殖民地官员遂以涉嫌谋刺康有为的罪名逮捕他们。孙中山抵新后透过医生友人吴杰模、黄康衢两人引介，请时任立法局议员的林文庆帮忙，结果宫崎与清藤虽获释出狱，当局却裁定两人永远不得再入境，孙中山亦遭驱逐，五年内不得入境。这是历史的转折点，革命派试图在海外联系维新派，双方第一次在新加坡接触就以误会收场，徒劳无功。这两股势力从此分道扬镳，各自走在救国的并行线上。

孙中山再次来到新加坡是五年后的事了。当时他在美国看到《图南日报》的月份牌，印象极为深刻，于是专函革命挚友尤烈询问该报详情，获知张永福、陈楚楠等人跟他有共同的政治理念。1905年当他从欧洲前往日本途中路经新加坡时，特地拍电报请尤烈安排会面。这是孙中山首次与本地的革命同志接洽，为日后同盟会在新加坡建立分会奠定了基础。张永福和陈楚楠也成为孙中山在新加坡最忠实的支持者[5]。

张永福（1872-1959），祖籍广东饶平，其祖父大约在莱佛士宣布新加坡开港后，就自汕头搭乘轮船“长美号”前往南洋从商，因此他在美芝路（Beach Road）开设“新长美”商号，经营布匹和香料贸易[6]。其父张理于1833年在新加坡出生，长大继承家业，与来自印度尼西亚邦加文岛（Muntok，Bangka）的土生女子陈宝娘结婚，生养七名子女。张永福也在新加坡出生，自幼在密驼路（Middle Road）家中上私塾，及长跟随父亲学做生意，后继承布庄生意，成为本地的年轻富商。1905年张永福在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购置了一栋名为“明珍庐”的别墅，改名为“晚晴园”后供老母晚年居住。1905年，当孙中山来新加坡宣传革命，张永福便让出“晚晴园”供他住宿，于是“晚晴园”成为推翻满清的革命基地，遂使新加坡与近代中国革命历史接轨。

陈楚楠（1884-1971），祖籍福建厦门禾山，本名陈连才，别号“思明州之少年”[7]。其父陈泰自中国南来，也在美芝路经商，创立“合春号”，从事木材贸易。陈楚楠在新加坡出生，自幼在家读私塾，同时也学习英语和马来语。1898年陈泰过世后，陈楚楠兄弟共同继承父业，并于1905年创设“合春园”，扩大投资橡胶种植事业。及后他自己在克兰芝（Kranji）开设占地600英亩的“岐山橡胶园”，又在裕廊（Jurong ）17英里处拥有1400英亩的“成都园”，使他在20世纪初的新加坡华人富商圈中占一席之地。不过他年轻时经常以“思明州之少年”的笔名，在新加坡维新派主持的《天南新报》和香港《中国日报》发表抨击满清政府的文章。

新加坡华人社会在20世纪交接之际，整体上倾向支持保皇势力。1899年，张永福和陈楚楠参与了78名新加坡人上书清廷，反对慈禧太后废黜光绪皇帝的行动。两人也参加过邱菽园和林文庆所领导的“华人好学会”。该会以促进社会福利为宗旨，并支持改革运动。但随着唐才常“自

[5] 有关两人的革命事迹，参阅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陈楚楠，《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40年）。

[6]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中译本见：宋旺相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有关张永福的介绍，见潘醒农编，〈张永福传〉，载《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年），页158；，毕观华，〈张永福〉，载《怡和轩90周年纪念特刊（1895-1985）》（新加坡：大水牛出版，1985年），页101-104。

[7] 冯自由，〈南洋革命党第一人—陈楚楠〉，载《革命逸史》第三册，（台北：商务，1965年），页183-189。

立军”起义失败后，许多人对维新派感到失望，开始转向支持革命。张永福和陈楚楠受黄乃裳及南来革命党人尤烈的影响，也逐渐成为革命思想的拥护者。他们经常在“小桃源俱乐部”议论政治和时事，批判清朝的腐败无能。1902年，两人加入教会所创办的“星洲书报社”，以演讲的方式宣传革命思想。此后，书报社便成为宣传革命和教育群众的重要场所。

1903年“上海苏报案”爆发后，清廷要求上海租界引渡邹容和章太炎，押往南京处斩[8]。张永福和陈楚楠闻讯，立即联合其他支持者以“小桃源俱乐部”名义发电报，敦请英国驻上海领事援引保护国事犯条例，拒绝交出两人。在各方奔走声援之下，邹、章二人结果仅被判监，逃过一死。经此一事，本地华人开始明白清廷打压异己无心改革。这同时也鼓舞了革命派的士气，让他们体验参与及改变国内政治的可能性。“上海苏报案”也让张永福和陈楚楠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宣传报刊的重要性。

1904年，张永福和陈楚楠出资创办本地第一份革命报刊《图南日报》，宣传反清及革命思想，无奈维持了一年多后，因经费短绌被迫停刊。许多人认为他们大逆不道，亲朋戚友多不谅解，英殖民地政府在清廷的压力下亦严厉警告两人。

尽管如此，正是在这几年间，新加坡“维新—革命”的政治版图稍稍产生了变化。比起1900年孙中山初到新加坡“营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而后被驱逐出境，这几年来经过张永福和陈楚楠等少数革命志士的努力，当他在1905年再度来到新加坡时，就已经在本地拥有一批支持革命的同志。因此，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不久，便指示张永福和陈楚楠在新加坡筹组分会。1905年底，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假晚晴园正式成立，由陈楚楠出任第一任会长，张永福担任副会长，翌年改选时两人互换职位，此后由张永福蝉联会长职多年。1907年，两人创办《中兴日报》用以对抗主张保皇的《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很快地成为南洋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革命报刊之一。

孙中山在新加坡期间，其中四次入住晚晴园，并在这里策划过三次起义：1907年5月

1905年元旦的《图南日报》（晚晴园供图）

[8] 《苏报》创刊于1896年的上海，内容刊载多市井琐事，直到聘请章士钊为主笔后，立场始转向批评朝廷。1903年，清廷指邹容和章太炎所发表的文章〈大逆不道〉，乃照会上海租界逮捕邹、章等六人，并查封报馆。详见王敏，《苏报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见《中国同盟会革命史料》（一）（革命文献 第六十五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4年），页432–437；454–459。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5 月 24 日

街道开始装置煤气灯

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7月广西镇南关起义，以及1908年4月云南河口之役。张永福和陈楚楠两人担任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领袖多年，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支持不遗余力。除了踊跃捐助几次起义外，也积极筹措诉讼费营救起义失败的革命领袖、接济数百名革命军撤退到新加坡，并安顿他们在本地落脚。同盟会成立后，他们透过办报、书报社、戏剧表演和公开演讲来宣传革命思想。

换言之，新加坡已成为推翻清朝的革命策源地、指挥和筹款中心以及革命志士的庇护和避难所。此地汇聚了一批近代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如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黄兴、张继和居正等人，他们与南洋的革命志士在此议事，共同努力推翻满清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1908年，孙中山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提升为南洋支部的总机关，希望能藉此提振本地革命支持者的士气，可惜效果不彰，因为接二连三起义失败让出钱出力的华侨产生信心危机，也开始感到心灰意冷。1910年，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支部总机关由新加坡迁至槟榔屿，革命活动中心就此北移。

维新与革命的竞争：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回应与影响

当我们把维新派和革命派放在一个比较的脉络来检视，许多面向值得进一步思考。颜清煌的研究指出，维新和革命的诞生都是响应中国当时所面对的困境，其目的均在于救国，以免国家被列强瓜分，然而彼此的方法和手段大不相同。维新派认为可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制度改革，采君主立宪，以和平的方式改变中国；革命派则推崇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且深信只有武力推翻满清和帝制，中国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考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力量主要来自传统士绅阶级，支持者多是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读书人。他们一方面不想推翻满清，否则以科考入仕的途径将受到破坏，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受影响。因此，他们看不起没有经由科举考取功名的革命派人士。而革命派的支持者大多来自中下阶层，他们或多或少接触过新式教育或西方文化，具有较开明或激进的思想[9]。

这样的阶层身份正好反应在康有为和孙中山身上。康有为代表传统忧国思民精神的读书人，考中进士，且是少数看到结构性问题必须从制度面改革的知识分子，主张变法。因此当康有为流亡到新加坡，他的支持者多是有类似背景之人，包括科举出身的邱菽园和南来避难的黄乃裳[10]，以及其他曾向朝廷买或捐官的上层富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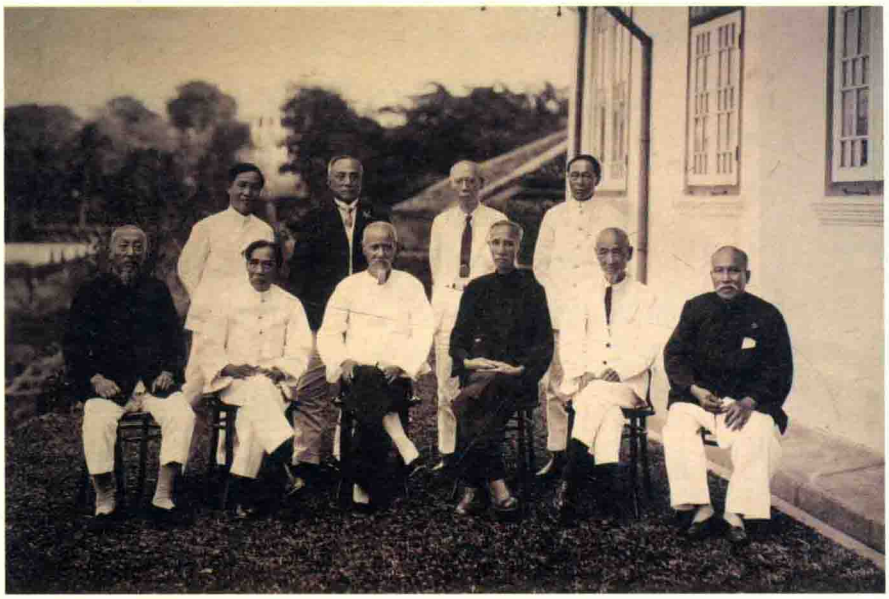
黄乃裳（1842-1924），福建闽清出生，和邱菽园同中举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来到新加坡。他原本支持维新变法，他的文章也启发张永福和陈楚楠等人，但自“自立军”起义失败，对康有为感到失望而转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康有为以光绪皇帝为号召，对海外华人社会自然有深刻的影响力。因此在1908年以前，维新派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力量远大于革命派，及至光绪皇帝崩逝，革命党的影响力才逐步扩大。

孙中山则代表另一种理想精神。他出生农家，早年在夏威夷和香港的生活经验，让他有机会认识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西方教育背景也让他免于背负传统士大夫的

张永福所著《南洋与创立民国》（2013年12月再版）

[9] 颜清煌，《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1982年），第七章。

[10] 黄乃裳和邱菽园同中举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四处捉人，因此来到新加坡。他原来支持维新变法，他的文章启发张永福和陈楚楠等人。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对康有为失望，因此转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黄乃裳曾帮忙革命派从新加坡运回反清书籍《图存篇》（邹容的《革命军》翻印），密赠各界，亦积极参与黄冈起义回到中国发动革命。



孙中山的支持者——新加坡潮籍殷商林义顺（后排左二）

包袱。因此，他认为惟有推翻帝制建立新的共和体制，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他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思想对海外留学生和华侨华人社会有一定的吸引力。孙中山也争取海内外秘密会社 / 党的支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发动起义。这些作为都是维新派无法苟同的。

1877年，满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这说明朝廷开始重视各地华人在海外的经济势力，希望借助他们的财力实践改革，其中一个做法是卖官鬻爵。海外富商也乐于透过捐官取得虚衔，作为荣耀家门和提升社会地位的交换。根据统计，1877年至1912年的35年间，新马社会共有295人拥有清廷的官衔，其中不到2%是真正透过科举或军功取得功名，其余都是捐官而来。这奠定了商绅阶层认同朝廷的基础。戊戌变法以来，新加坡华人社会在报章的宣传下对维新派的改革主张多有同情，1900年康有为到来时，维新派的力量更加茁壮。康有为在新期间，受到地方士绅和富商的礼遇，经常受邀到各学校演讲，还协助创办了中华女子学堂。他的追随者主要在新式学堂和报馆任职，均主张温和的政治改革，支持保皇，乃至于其后和平请愿召开国会的运动。

相较于维新派，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要晚至1905年年底才把触角伸到新加坡。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后，年底来到新加坡，在张永福、陈楚楠等人的支持下，假晚晴园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其创始会员除张、陈两人，尚有李竹痴、林义顺、许子麟、林镜秋等人。这批青壮年商绅认同孙中山的革命理念，透过各种方式展开革命宣传：报纸方面，除了利用既有的《图南日报》[2]，也另外在1907年至1909年之间先后创办《中兴日报》、《阳明报》和《晨报》等三份报纸来宣传革命。其中《中兴日报》乃由孙中山倡议，经本地同盟会成员集资，在1907年8月20日正式发行。该报撰稿阵容强大，计有田桐、王斧、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等人，其销售网络遍布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社会，与支持维新派的报章相抗衡；而在书刊方面，新加坡同盟会分会的核心成员分别从上海、香港、东京引进反清的书刊，以各自的店屋作为经销点，对外推广。他们也重印了《革命军》一书，改篇名为《图南篇》，私运回国秘密分发。

此外，同盟会成员也透过书报社的形式，让不识字的民众有机会学习和接触革命的思

孙中山曾于小桃源俱乐部用餐（晚晴园供图）

想。书报社定期邀请革命同志到来演讲，藉以唤起民众的反清意识，又以戏剧表演的方式来传播反满思想和民族主义，达到宣传革命的目的。〈徐锡麟枪击恩铭〉、〈秋瑾女士之死〉都是当时广受欢迎的戏曲。书报社是同盟会对外公开的注册单位，相较于报纸书刊只能针对识字人士，以视／听觉刺激人们产生革命热忱的书报社，对中下阶层人士有一定的吸引力。当时在新加坡成立的书报社计有：星洲书报社、公益书报社、同德书报社和同文书报社等。

综观康有为和孙中山在新加坡活动的10年间，他们分别所代表的维新及革命的两股势力互有消长，受到本地华人社会不同阶层的对象支持。维新派能影响上层的富商阶级，特别是那些向朝廷捐官的保守派人士，坚决以温和的手段来支持中国的改革。而革命派一开始吸引较为年轻的商绅和有志之士，进而扩大到一般民众。不过，无论是维新派或革命派，无不透过报章、教育、公开演讲和戏剧等形式来鼓吹各自的思想和立场，争取社会支持。然而有意思的是，当维新和革命两派积极争取本地华社的同时，事实上他们开启了本地华人参与国内政治的契机，提供了海外华人接受政治启蒙进而投入政治活动的机会，也促使他们超越过去仅关心家乡发展的格局，扩大关注国事。因此可以这么说，清末维新与革命运动在海外的动员，无论在行动或论述上的，对南洋华人社会而言是一个政治化的过程。及后辛亥革命的成功，前此的政治参与更进一步转化为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意识的滥觞。这或是康有为和孙中山所始料未及的。

南洋角力的意义

维新和革命运动在南洋的角力，对新加坡华人社会有何意义？我们可以从政治和文化两个不同层面来总结。就政治意义上，我们首先回到中国近代史的脉络来谈。清末中国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国际局势中，被迫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来回应国家积弱、政治受困以及国际生存的问题。朝廷被迫进行改革，先后推动洋务、推行变法，试图从体制内找出发展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途径，惟不成功。维新变法一派失败后流亡海外持续宣传保皇思想，不过当时另有激进派崛起，决以革命的手段从体制外推翻帝制，试图建立西方模式的现代民族国家。他们在起义失败后亦逃离中国，与维新派同时在海外寻求支持的力量。

凑巧的是，这两股力量不约而同在1900年来到新加坡，使这个英属殖民地在往后10年间，意外成为保皇与革命两派的海外基地。从海外华人史的角度而言，过去被视为天朝弃民的华南移民，因为康有为和孙中山两人的政治运动而登上历史舞台。海外华人社会的人口素以商人、劳工为主，大多数下南洋谋生的苦力不关心政治，他们所期待者是有朝一日落叶归根，衣锦还乡，因此跟中国政治保持距离，甚至远离政治。但随着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先后聚集在新加坡鼓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救国理念，局面有所改变了。海外／本地华人第一次参与到祖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出钱出力，甚至有少数人亲自投身革命。这在过去很长时期的华人移民史所未见的现象。

此一现象为本地华人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维新和革命两派的政治动员与号召，重新连接并且强化了海外华人跟中国的关系。两派人士均在此组织政治团体，维新派创立保皇会，革命派则成立同盟会分会，各自透过办报和演讲的形式来宣传政治思想，让不同阶层人士得以藉此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亲身参与其事，有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可能性。因此，作为南洋一隅的新加坡，因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政治动员，让原处于边陲的新加坡，一跃成为区域内推动和改变中国前途的政治中心，同时扮演保皇运动的中心及革命运动的基地。

就文化的意义而言，南洋在中国眼中是南方海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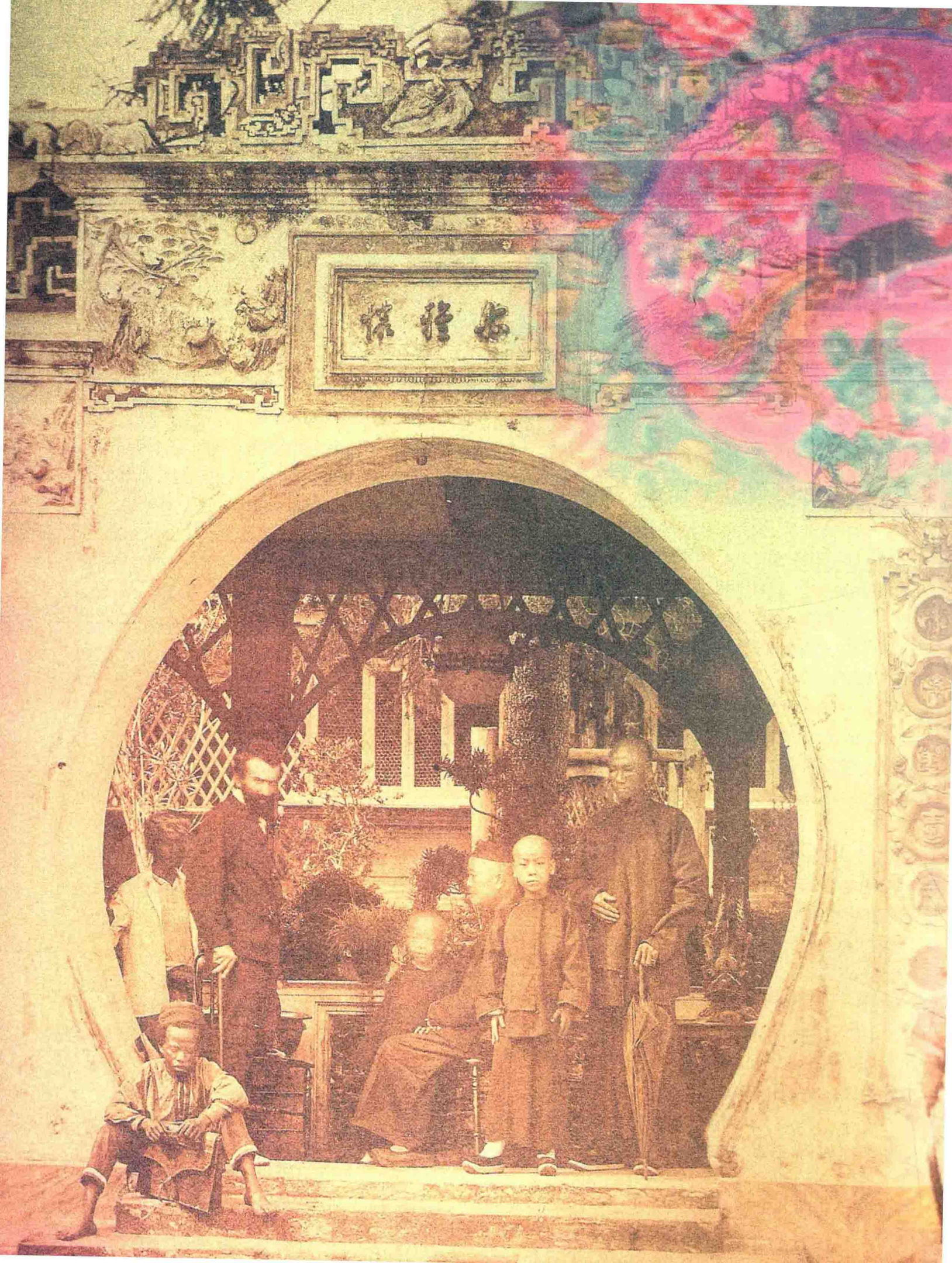
处文化边陲的蕃邦。然而随着维新变法的口号，当地开始创建新式学堂、女子学校，也发起孔教复兴运动，凡此种种都冲击着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当时两派人士在报章上掀起笔战，维新派除了主将康有为和梁启超，还有其他文人如徐勤、欧榘甲、伍宪子等人助阵；革命派人士则有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田桐、陶成章以及居正等人执笔，双方都在支持他门的报章发表文章，使新加坡顿时成为两大阵营的论述中心。是次文笔和内容都很精彩的思想论战，大大提升了新加坡华人社会讨论和认识中国政治改革的深度。换言之，这批南来避难的流亡文人，不论在南洋鼓吹维新或革命的同时，无意间促进了本地教育和文化水平发展，特别是透过新式学堂和报章，对强化海外华人身份文化认同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结果来看，这两个层面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冲击了新加坡的华社，促使本地华人经历政治化的过程，同时也牵动了海外华人再中国化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如同地心吸引力般的作用持续在新加坡华社发酵，导致他们对辛亥革命成功后接踵而来的共和、讨袁、北伐、抗战、国共斗争等国内的事态都有所回应。因此，百年前维新和革命播下的政治种子，持续在新加坡华社的土壤成长。这种心向中国的现象一直到二战结束、新加坡争取自治及独立后，本地华人社会的政治认同方才逐渐由中国转向新加坡共和国。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哥里门桥落成



第五章

迁民社会与峇峇社会
Chinese Immigrant and Peranakan Communities

第一节　泽被功敷
——华族领导层与其政治变革

摘要

本节探索19世纪帮、会党与海峡华人领导层走进历史的舞台。它分析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影响华社政治领导层分裂成国民党、马共与陈嘉庚的势力。陈嘉庚以无党派的姿态领导1930年代赈灾救难的运动。最后，本节研究战后新加坡政治认同的大转移，导致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最终的胜利。英国接受李光耀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

Abstract

This section identifies the bang, secret society and Straits Chinese leadership which played their respective roles in 19th-century Singapore. It discusses how 20th-century China's political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affected the 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into 3 contending political leadership the Kuomintang, the Malayan communist movement and the Tan Kah Kee forces. With a non-partisan posture, Tan Kah Kee led a China salvation movement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from 1937. Finally, it analyses the post-war Singapore's political changes which brought Lee Kuan Yewled People's Action Party（PAP）to self-government in 1959 and independence in 1965. The British gave blessings to the PAP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mocratic, non-communist independent Singapore.

杨进发（C. F. Yong）

新加坡早年的经济政策，不但鼓励19世纪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影响华社领导层的模式。新加坡的自由港与自由贸易政策意味着商业至上、商人至上、商人的地位要比其他阶级重要。尤有进者，此两政策吸引了大批从马六甲移植到新加坡的土生漳泉商人与“中介商”（Middlemen），使漳泉商人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与垄断了闽帮的领导层。潮帮领导层的崛起则在1840年代。

再者，莱佛士的自由移民政策，不仅带来了无数南中国的移民，也引进不少私会党徒。因为海峡殖民地政府缺乏人力与物力来取缔私会党，政府不得不承认其组织的合法化与领导层运作的权力。新加坡私会党的领袖因此成了强有力的华族领导层的模式之一。

1870年代，华社的第三种领导层的模式，来自受英文教育土生华人精英，他们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880年代，英官方设立英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鼓励与教育土生子弟。1890年代，林文庆与宋旺相从英国学成归来，壮大此亲英与亲英国文教领导层的行列。一个“皇家华人”（King's Chinese）领导层的形象塑造了第三类领导层的模式。

19世纪华族领导层功能与贡献

新加坡开埠初期，新加坡驻扎官曾采纳葡萄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惯用的“华人甲必丹制”（Kapitan China），帮助政府征收赌税或维持地方治安。新加坡驻扎官曾委任两名华人甲必丹，其一为京安（King An），广府人，经营鸦片，且与其他英人有交易。第二人为陈浩盛（Tan How Seng），潮州人，是一名中介商与建筑承包商，且拥有四块地皮，卒于1823年[1]。1826年，殖民地政府废除“甲必丹制”，但有名望与地位的漳泉人领袖，如陈笃生、陈金声与陈金钟，都曾经是非官方的华人“甲必丹”，为土生华人所拥戴[2]。

新加坡开埠，华族移民来自不同地域与口操不同方言接踵而至，“帮”的社会俨然成立。在不同方言群体的帮社会中，各帮设立自己的宗宙、崇拜不同的神祇、创建自己的义山，组织自己的地缘、血缘与业缘的会馆。此外，各帮还创设自己的私会党。19世纪华社的“帮”与“帮权”与分裂的局面，反而任其发展并合法化。1822年，莱佛士的城市发展计划，便建议华人区域分帮而居，以免杂居可能带来帮派的冲突。又如1890年，当新加坡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成立以取代私会党的领导层时，该组织还是以帮的原则来委任参事局员。

19世纪新华人口，闽人属于第一大帮，帮内财富雄厚，学识水平高，且人才鼎盛，英官方往往刮目相看。薛佛记（1793-1847）是闽人在新加坡的开山祖师，一个典型的“峇峇”（Baba），祖籍漳州漳浦县人。他在马六甲经营锡矿业发迹后，1824年移民新加坡，购置七块土地，成为新加坡最大地主之一。1828年，薛佛记以“缘首”身份，捐巨资与闽人共创恒山亭，为闽人最高机构，中选为其正董凡12年。此恒山亭内，建筑庙宇，为闽人丧葬祭奠，且管理福建义山，为闽帮移民提供烧香拜祭、死有所葬的善后事，是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其第二大贡献是捐巨资（2400元）为建天福宫之用。1840年天福宫取代恒山亭为闽帮最高总机构，薛佛记礼让陈笃生为闽帮新领袖，当时华社传为佳话。

陈笃生（1807-1850），祖籍漳州海澄人，马六甲出生，年青时移民到新加坡，勤俭起家。后首创陈笃生公司，与英商华尔希（J. H. Whitehead）做投资生意而致富。在陈笃生任天福宫正董期内，最为人乐道的贡献是1844年以7000元独资，建立陈笃生医院（Tan Tock Seng Hospital），为全体新加坡人提供医药服务。

当1850年陈笃生在新加坡逝世时，其哲嗣陈金钟（1829-1892）尚年幼，故天福宫正董由名噪一时的陈金声（1805-1864）担任。他也是马六甲出生，祖籍福建永春。陈金声经商新岛，长袖善舞，富甲一方。1850年代，陈金声的商号“丰兴陈”妇孺皆知。他为人慈善，除建金声桥与蓄水池以外，也于1849年建崇文阁，1854年创萃英书院，开新加坡埠华文教育先河。1850年，英官方认为他是承继陈笃生的闽帮领袖，为政府封为太平局绅（Justice of Peace，简称JP）。凡有会党械斗事件，如1854年闽潮两帮会党械斗，政府照例请陈金声与其他帮领出来排难解纷，

[1] David K. Y. Chng,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cca: Some Notes,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0), pp.40–1.

[2]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174.

息事宁人。其子孙后辈，如陈明水（1828-1884）与陈若锦（1859-1917），除了发扬陈金声的热心公益与提倡文教的传统外，已开始走向“皇家华人”的道路，维护海峡土生华人的政治利益。

陈金声晚年退隐马六甲，天福宫正董非陈金钟莫属。陈金钟与邱正忠（1820-1896）、蔡绵溪（1836-1903）三人合作无间，为宫事与福建会馆事共事凡30余年，为闽帮利益鞠躬尽瘁。从1860年代开始，新马社会趋向国际化与政治化。陈金钟往往介入政治纷争而不能解脱，他的领导层的模式已超出帮的界限，属于亲英的政治认同与巩固土生华社的政治力量。闽帮领导层的政治变革，应该得到更深入的分析。

19世纪的新加坡潮帮属于第二大帮，人口也仅次于闽帮。就举1881年新加坡人口为例，闽帮有2万4981人，潮帮有2万2644人。但自1901年开始，广府帮人口却超过潮帮，成为新华社会的第二大帮，潮人在星柔两地垄断甘蜜与胡椒种植业。19世纪60年代，新加坡出现了好几位有钱有势的潮帮领袖，故有“陈天蔡地佘皇帝”的美言。“陈天”是指潮人姓陈的成功人物遍天下，诸如柔佛的最大港主陈旭年（Tan Hiok Nee, 1827-1902）、新山开埠功臣陈开顺（Tan Kai Soon）与售卖鸦片专利权致富的陈成宝（Tan Seng Poh, 1830-1879）等等。“蔡地”是指潮人义兴首领蔡茂春（1819-1879），他在下层社会中势力很大，活动地盘很广。“佘皇帝”是指佘有进（1805-1883）领导潮人有方、兴办教育、为政府维持地方秩序，1864年为政府委任为首席高级陪审官。因拥有地位与权势，故有“佘皇帝”之荣誉[3]。佘有进为潮帮领袖典型，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与文教进步都作出贡献。其子佘连城（1850-1925），是新加坡土生受英文教育的精英，突破帮的局限性，三度由政府委任为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非官方议员，为新加坡社会服务。他与其他同

潮帮领袖佘有进

时代的海峡华人，在19世纪后半叶，为新加坡塑造了一个亲英的政治领导层。

如果说19世纪华人“甲必丹”、帮领导层的模式与海峡华人政治领导层是英殖民地政权的杰作，那么华人私会党（Chinese secret society），俗称三合会、天地会、义兴、义福与海山等等便是中华帝国内华人政治传统的产物，根植于乡土中国。

中国的会党先传入槟城、马六甲与柔佛，然后再从以上三地移到新岛。槟城广东台山人曹亚志（1782-1830），职业木匠，原是该埠广东义兴首领。他应莱佛士招募，也随军而来。曹亚志除了建立宁阳会馆（1823年）以外，还组织曹家馆与广东义兴，开新加坡会党组织之先河。因宁阳人多务泥水木匠业，故广东义兴是工人阶级组成的会党。接踵而至的是广东嘉应州人，他们以种植园艺为生，是早期的农民集团。他们于1823年刱建应和会馆，崇拜关帝，富有浓厚的会党色彩。1830年，闽帮杨清海与陈送（1763-1836）等74人组织会党曰金兰庙，为闽籍会员服务。1840年代，潮帮也建立潮州义兴与其支部义福，为潮侨实力地盘。换言之，从1840年开始，新加坡各帮都拥有会党组织，影响力也已超过帮组织，诸如会馆等等。

新华社会党发展快速是有其历史因素

[3] 潘醒龙编著，《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年），页46。

相关人物

麦士威

历史事件

大法官麦士威爵士（Sir P. B. Maxwell）撰《海峡殖民地推事之任务》一书出版

的。其一是早年政府无资源与政治决心来控制或取缔会党，华社会党是合法与公开的团体。其次，政府因部门无人懂得中国语文与方言[4]，故政府的情报来源有困难。加文纳（Orfeur Cavanagh，1858-1868）任新加坡总督期间，每逢会党骚乱，政府便邀请会党首领出面维持治安[5]。第三，会党组织大都能满足会员需求，如为移民提供一系列的网络，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社会与精神的支持[6]。第四，新加坡会党颇有经济来源，他们控制19世纪中国劳工移民的供应而从中取利。19世纪华资能够垄断马来亚的锡矿业，就是因为私会党能提供劳动力[7]。第五，19世纪是帮权社会，小帮结社为自保，大帮设党为巩固帮权以支配华社。英官方常指责会党是华社的统治者，即所谓“主权内之主权”（Imperium in Imperio），或译为“政府中之政府”，也不是全无根据的。

20世纪的新马历史工作者，几乎一致同意19世纪会党组织之庞大，会员之众多。巴素（Victor Purcell）指出1841年的天地会与义福，两党共有1万名党员[8]，当时新华总人口只有2万人。特恩布（Mary Turnbull）引用1858年新加坡警察总监德明（Thomas Dunman）的估计，认为新加坡会党人数占新华总人口的75%[9]。费德曼（Maurice Freedman）证实1879年新华有10个私会党，注册理事共924人，注册会员达2万3858人。1881年，会党人数增加到3万3000人，占新华人口的45%[10]。可见会党势力之大，影响华社之深。

从1840到1880的40年间，新加坡会党内争层出不穷，演成仇杀、械斗、骚乱与暴动，这是会党最为猖獗嚣张的时代。1854年新加坡大暴动，是闽粤两帮会党（义兴与义福）最为惨痛的流血斗争。这次械斗，为时10日，双方杀人放火，焚毁房产，房屋被烧劫者300余间，死者约400余人，伤者无数。事后，法庭审讯16日，处死刑者2人，驱逐出境者14人，坐牢狱者64人。此乃新华史上破坏社会秩序最为严重的一个例子[11]。

尽管19世纪的会党是公开与合法的组织，其首领与政府也在治安方面颇有来往，但由于缺乏文字记载，故领导人物的面貌模糊不清，领导人的个性与魅力难辨，有英雄本色的传奇人物难寻。但这个世纪也有一位敢闯天下的蔡茂春，值得素描简介。

蔡茂春生于广东省潮州府，19岁移民新加坡，在新加坡加入了三合会。1850年代，蔡茂春成为义兴的首领，卷入了1854年闽粤两帮大暴动，但他却也渡过了这场会党残杀的浩劫。1861年，蔡茂春领导武装社员攻打陈氏社员，导致逮捕与囚禁。1864年，英官方准他归化为英籍民。此后，他专心向各行业发展，包括娼寮的经营以及中国移民劳工进出口贸易。蔡茂春一生能累积财富，主要原因是英政府需要他帮助维持地方治安。毕礼德（W. Blythe）对他传奇性而又具阴谋性的生涯作一个概括：

> 对新加坡华人而言，蔡茂春是权力的化身。他说的话就是法律，因为他有办法变成法律。他不但是市内最大与最自大的会党首领，而且获得政府的信心。因此，如有人违反了其命令，其名字就会被抹黑[12]。

1879年蔡茂春逝世，其百年古墓于1987年7月在义顺区被发现。墓碑刻有“明”字，表示他是一位有民族思想的反清复明的义士，对明朝忠贞不渝。该碑亦指明蔡氏有五位妻妾[13]。

1867年，英国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海峡殖民地，对新马殖民地发展采取有建设性与有干预性的政策。英官方加强会党控制，两次（1869年与1877年）注册会党与其理事。1889年，政府决定立法取缔会党，授权总督解散已注册的会党。1890年，殖民地政府最终结束了长期以来会党

---

[4]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64.

[5] *The Chinese in Malaya*, p.163.

[6] David K. Y. Chng, *Heroic Images of Ming Loyalists, A Study of the Spirit Tablets of the Ghee Hin Kongsi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9), p.59.

[7]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pp. 237–238.

[8] Purcell, *op.cit.*, p.160.

[9] C. M. Turnbull,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1867*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19.

[10] Maurice Freedman,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on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 no.1, October 1960), p.32.

[11] Turnbull, *op.cit.*, pp.114–116.

[12]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Secret Society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11.

[13]《联合早报·星期刊》，1987年7月5日。

威胁地方法律与秩序。

在殖民部（Colonial Office）统辖下，新加坡大胆地推行了三大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加速了海峡华人政治领导层的崛起。

第一个政策是1869年英官方在新加坡改革宪制，设立两院制的立法议院。行政议院（Executive Council）提出议案由立法议院（Legislative Council）辩论，然后由前者执行其法令。立法议员大多数为官方所指定，只有少数非官方议员是从海峡殖民地各民族社群中甄选出来的，受惠者为各社群中受英文教育源流的精英，让他们有机会体验国会操作的程序。换言之，此两院制为受英文教育的海峡华人开辟了一条政治领导层的蹊径，政府承认他们为全新华人的代言人。19世纪，海峡华人为立法议院议员有陈若锦（1889-1894），佘连城（1883-1890）与林文庆（1895-1903）等三人。

担任暹罗驻新加坡领事时期的陈金钟

第二个政策是走马上任的新总督克拉克（Sir Andrew Clarke）于1873-1874年干预吡叻州的内政。干预的原因之一是吡叻为争夺锡矿开采权而引起连年内战，影响海峡殖民地的经济与贸易发展。为此，克拉克总督邀请吡叻内战有关人士进行和谈。克拉克总督邀请陈金钟出面调解。历史学家黄存燊证实陈金钟为英国贡献犬马之劳。他说："吡叻发生私会党的械斗事件时，金钟曾出面排解，说服了槟城私会党领袖，接受政府的调停，同时也影响了马来酋长的态度。1874年，邦咯条约（Pangkor Treaty）订立时，金钟实际上曾协助英国政府自罗阁阿都拉（Raja Abullah）手中取得天定（Dinding）……"[14]

陈金钟何许人也？

陈金钟为慈善家陈笃生之子，出生于马六甲，幼年受英文教育，及长通晓巫语与暹语。他继承父业而发扬光大，为新华、暹华社会知名的大地主与大财主。生前曾自置一艘1500余吨轮船，川行东南亚与华南各港口，更在暹罗与安南两处开分行，经营米业，做米较兼营白米生意。这是一代闽帮巨人在新加坡与东南亚的财富记录。

陈金钟在雪兰莪的经济发展始于1866年。该年，陈金钟与一位英商里德（W. H. Read）获得巴生（Klang）的征税权[15]。斯后，又取得吡叻州酋长的鸦片专卖权[16]，为保护与发展马来亚的经济利益，陈金钟被卷入这两州多年的流血战争，在吡叻，陈金钟拥护酋长阿都拉的政权斗争；在雪兰莪，他参与东姑库汀（Teng Ku Kudin）的阵营，排斥反对库汀的巫族酋长马迪（Raja Mahdi）。陈金钟在这区域的纠纷中，不但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

[14]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新加坡：新加坡国家语文局，1965年），页38。

[15] Khoo Kay Kim, *The Western Malay States, 1850–1873, The Effects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n Malay Politic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87.

[16] Purcell, *op.cit.*, p.113.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椒蜜公局成立以保障投资者、种植者的利益，以及保障柔佛与新加坡之间贸易的相互利益。海峡殖民地的管辖权由印度总督转移到英殖民部大臣手中，此后新加坡日趋繁荣

9月1日

新加坡正式成立邮政，发行邮票

物，也是一位能够影响军事大局的人物[17]。

英国人赏识他的才华，感激这位谙英、巫语言的海峡华人，对英国扩展马来亚的疆土，作出重要的贡献。从此，英国政府对海峡华人与其领袖，更加刮目相待。

英殖民政府的第三项政策是1884年英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的设立。政府每年颁给两位最优秀的英校中学生到英国大学深造。宋旺相与林文庆先后获得此奖学金，前者念法律，后者读医科。两人学成归来后，为成功的专业人士，并对新加坡社会，尤其是华社，作出巨大的贡献。历史学者特恩布尔（C. M. Turnbull）曾精简地总结他们的贡献：

这一批受英文教育的亚洲专业人士精英呈现了一种新式的领导层，并开始塑造一个精妙的西方化与现代化的新加坡社会，包括对西方教育与专业成功的尊崇，开拓了一条新途径，让亚洲社会吸收及接受西方的医药，英国的司法制度与欧洲的教育方法[18]。

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海峡华人领导层，是19世纪新加坡华社领导层的第三个模式。它是最现代化、最开明与最能为英国接受的领导层。

20世纪前40年华社政治领导层

19世纪末年的新加坡，有忧国的哀鸣、虔诚的期望，也有爱国（英国）使命的宣布、为民请命的誓言。20世纪初风云际会的历史巧合，有1900年2月康有为的抵新加坡，7月孙中山的访问与8月海峡英籍华人公会（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成立大典。这历史巧合将带来华社的政治变革，华社政治思想的分裂，与华社政治领导层角逐于历史舞台。由于语言源流与政治倾向的不同，华社本身先分裂成移民社会华文源流的领导层与海峡英籍华人公会的领导层。而移民社会的领导层，本身却分裂成三个相互竞争的领导层，即国民党（Kuomintang，成立于1912年），马来亚左翼政党（如1930年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与陈嘉庚无党无派的领导层（The Non-partisan Leadership of Tan Kah Kee）。

海峡英籍华人公会（简称公会）的创立，其原因包括英籍华人人口的激增，从1881年的9500人到1900年估计的2万人。其次，在林文庆与宋旺相等的领导下，信心高昂，英国在南非军事的告捷，公会也就应运而生，公会的章程鼓励海峡华人对英国的绝对效忠、推动高等与科技教育与维护英籍华人的利益与特权。第一届理事有陈若锦（会长）、佘连城（副会长）、宋旺相（秘书）、佘柏城（Seah Pek Seah，财政）与理事林文庆、陈武烈（闽帮帮主）与阮添筹（律师）等等。当时，公会有800名成员，无疑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政治压力集团。

从公会开始到1941年，其主要的领导人除第一届理事已略陈列之外，其他首领包括李浚源（公司董事）、许山兴（公司董事）、黄瑞朝（律师）、陈祀仁（律师）、黄兆珪（律师）、林汉河（医生）、郑连德（公司董事）与王长辉（律师）等等，他们为政府重用，大都被委任为立法议院的非官方议员。

在这一批英文源流的领导层的指挥下，公会是否有完成章程中的使命？

从效忠英国的问题上看，公会于1901年鼓励英籍华人参加华人义勇军（Chinese Volunteer Company）以防卫新加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公会呼吁华人，尤其是英籍华人，参加义勇军、民兵与后备队，协助英国战争。此外，公会领导人更捐巨款，购置战机以抵抗德国。战时的马来亚华人，包括英籍华人，捐款购置53架飞机赠送给英国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会多次组织与登记会

此匾为陈笃生所赠

[17] Khoo Kay Kim, *The Western Malay States, 1850–1873*, pp.222–225.

[18] 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nd edition), pp.116–117.

员参加义勇军，协助地方防务，抵抗日本侵略。如此，他们实现对大英帝国效忠的心愿。

公会对发展高等教育不遗余力，1905年，陈若锦等领导华人筹建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King Edward VII Medical College），除本人捐资1万2000元以外，新加坡华人共捐出4万1700元[19]。1912年，陈若锦与佘连城从华社集资约12万元，作为扩充医学院之经费[20]。1919年，林文庆与李浚源，为庆祝新加坡开埠100周年，也捐巨款为筹建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之用。前者捐1万元，后者答应捐12万元使该学院于1929年成立[21]。

1930年至1934年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为总督期间，政府为建立一个统一的马来亚，主张巫文为通用话（lingua franca），巫文小学教育免费。这亲巫语与教育的新政策，贬低了英语与英文教育，引起了华族议员的一致反对。金文泰一意孤行，不赏识他们对英国语言、教育与文化的激情，让他们刻骨铭心地感觉到爱国无门。这场辩论延续了四年之久，海峡华人代表公然与政府抗辩，结果导致了槟城议员林清渊“走出议会”（Walk Out），抛弃“乌纱帽”（resign），以表白冲冠之怒的反抗性和挫折感[22]。

新加坡海峡华人领袖争取宪制发展始于1920年代。1922年，陈祀仁向政府建议海峡华人有权选择其代言人进入立法议院。1924年，宋旺相立法议员也建议英文教育源流的各族群应有权直接选举代表议员。此外，他还建议亚洲人应参加行政议院以执行重要政治决策。1926年，陈祯禄在立法议院慷慨陈词，声称有必要扩大立法议院的组织，并建议政府增加非官方议员的人数以为有效的反对党。他是第一位海峡华人提出马来亚自治的理想：

> 我们最终的政治目的应该是统一与自治的马来亚。这自治的马来亚由联邦政府与国会组成整体，在一个便利的中心（如吉隆坡）发挥功能，并尽量予以自主本地事务的权力，为各选区利益服务[23]。

1931年，海峡殖民地的三个公会联名要求总督修订宪法，其中最主要的要求是扩大立法议院，使非官方议员占多数。金文泰不准备给海峡华人更多的政治权利，故拒绝所请[24]。

20世纪的前40年，公会多次敦促政府容纳有资格的亚洲人成为政府部门的职员。这些努力最终在1930年代为政府采纳，政府允许亚洲人加入海峡殖民地的司法、医药与文官服务机构，让亚洲人能有机会作出更多的贡献。不过，殖民地的英籍官员，还继续垄断马来亚公共服务（Malayan Civil Service），不让英籍海峡华人染指。

海峡英籍华人公会是20世纪前40年最现代化与西方化的领导层。在经济领域里，他们是树胶种植、银行保险船务等企业先驱，热心追求资本主义所能带来的物质文明，他们维护英文教育的重要性，一致反对金文泰的亲巫语言与教育的政策。在政治的范围内，他们争取宪制改革，让亚洲人享有更多的参政权力。他们期望建立一个多元民族与统一的马来亚，是马来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作为一个政治领导层，他们属于改良主义者，他们与政府合作，但很有勇气为维护亚洲人的利益而向政府挑战，这个领导层虽然宣誓效忠大英帝国，但他们之中也有一部分领导人参与中国政治运动、支持华文教育、鼓励海峡华人学习与欣赏中国古典文化。这种情操、思想与行动，实在难能可贵。

---

[19] Song Ong Siang, *op.cit.*, p.367.

[20]《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1949年），页1020。

[21] 杨进发，《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页44。

[22]《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页362。

[23] Proceeding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Straits Settlements* (1 November 1926,) p.B161.

[24]《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页361-362。

如果说海峡华人领导层是团结的象征，那么华文源流移民社会的领导层却是分裂的恶兆。辛亥革命（Double-tenth Revolution）以前的新华移民社会，为清朝的存亡、分裂成三股政治力量。华社上层，如果不是拥清的，便是拥康的维新思想。拥清的泰半是曾经捐官鬻爵的华商，而拥康的却大都来自广东各帮的人物，因为康有为是著名的广东人。这两股力量的大本营是1906年成立的中华商务总会（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第三股力量来自华社的中下层，他们支持孙中山同盟会共和革命的主张。1906年在新加坡成立的同盟会是股方兴未艾的政治力量，其成立时只有13位成员。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入盟者已有400余人，其中也包括了海峡华人的佼佼者，诸如林文庆、陈武烈、张永福、林义顺与陈楚楠等等。同盟会领导层有不少能干、敢牺牲的人物，会员中也有不少组织能手。此外，其外围组织有多间书报社（Reading Rooms），诸如星洲与同德书报社等。它也有同情革命的俱乐部，如怡和轩（Ee Hoe Hean Club），也有《中兴日报》（*Chong Shing Yit Pao*）的革命宣传。从1900年到1911年，孙中山八次抵新加坡[25]，一方面策划革命，另一方面郑重地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辛亥革命催生了国民党运动（Kuomintang Movement）。这运动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它为当地政府三次严禁（1925年、1930年与1949年）。1912年12月，新加坡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得到当地政府注册与北京政府承认。这是新马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政党，是新华史上的一件盛事。新加坡国民党有两大目标，在外是支持孙中山建国，在内是指望夺取华社领导权，以控制与整顿华社。为达到控制华社，同盟会同人于1912年5月创立南洋华侨总商会（Chinese Merchants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以对抗1906年成立的中华商务总会。两商会的存在分裂华社，故有多次的合并谈判，其结果是中华商务总会占尽优势而拒绝合并。其优势包括它是非注册团体，且获得当地政府支持，故能稳操胜券。1912年8月，同盟会同人也组织了南洋华侨教育总会（Nanyang Chinese Gener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目的是推动华文教育，如出版教科书与提倡国语应用，1913年7月，新加坡国民党的2000名会员选出第一届理事共123名，在这庞大的组织中，16名来自海峡华人，其中林文庆为会长，陈武烈与林义顺为副会长，陈楚楠与殷雪村为正副评议长等等。这批海峡华人领袖的中选，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挚友，林文庆是当时新加坡社会的风云人物，备受政府爱戴。但好景不常，1913年10月袁世凯总统严禁国民党，1914年英官方施压力与该年8月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以取代国民党，新加坡国民党自动解散，其运动遂走向低潮。

1919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基地，开始重组中国国民党。1923年广州国民党总部进行改组海外国民党运动。他们在新加坡建立一南洋总支部（Nanyang Head Branch），以推动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党务发展。1925年，南洋总支部在此两地设有14支部，71分部与80区分部，共有党员4317人[26]。该年2月，英国殖民部（Colonial Office）召开一个扩大会议，讨论禁止马来亚国民党的问题，出席者来自殖民部、外交部（Foreign Office）、陆军部（War Office）、北京英国大使馆与吉隆坡和新加坡的华民政务司署（Chinese Affairs Department）等等。新马的两位华民政务司却一致强调国共合作对马来亚有害无益，盖中国共产党会通过合作来控制海峡殖民地20万名中国劳工[27]，这次大会虽然没有马上决定严禁国民党，但是，该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影响英国在华南的经济利益，殖民部与外交部决定取缔新马的国民党。该年7月1日，英内阁批准所请，10月新马两地政府证实国民党已全盘解散。这是马来亚国民党运动第一次受严禁。

1926年，新马国民党的复苏始于中国国民党的北伐。1927年，国民党东山再起，主要是与来自华南的共产党员竞争地盘。1928年，南京国民党派来姚定尘主持改组国民党，清除共产党与建立英属马来亚总支部。1929年1月，第一届全马代表大会在新加坡选出总支部理事共13人，后补七人，新加坡政府并未干涉。1930年1月4日至7日，第二届

---

[25] Wa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XV, Pt 2 (Singapore: The South Seas Society, Dec. 1959), pp. 55-68。又根据最新的研究所得，孙中山前后来新加坡九次，参阅杜南发，〈孙中山到底来新几次？〉，载周兆呈主编，《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新加坡：八方出版，2011年），页10-17。

[26]《中国国民党在海外》第1册（台北，1961年），页161。

[27] C. F. Yong,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5.

全马代表大会在新加坡选出新理事，适值金文泰总督（Sir Cecil Clementi）走马上任。金文泰有意教训国民党人，故有2月20日总督府的会议，出席者除总督与华民政务司外，尚有17名第二届英属马来亚总支部的理事。金文泰指责国民党人犯法，讽刺英籍民张永福对中国的效忠是“两头蛇”（leung au sha，double-headed snake）[28]。最后，金文泰命令国民党领袖们解散其组织。这是新马国民党运动第二次被取缔的历史经验。金文泰的决策引起南京政府的不满，遂有英驻华大使蓝逊（Sir Miles Lampson）与中国外长王正廷的谈判，1931年两方达成协定。此王、蓝逊协定指明马来亚的国民党不准组织、宣传与募捐。但是，新马华人可加入中国国民党为会员。这个协定是英国外交的胜利，但它也给华人一条生路——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中国政治或救亡运动。他们倾全力支持陈嘉庚无党无派领导层的筹赈工作。

新加坡的移民社会，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它培植了不少亲中国与爱中国的精英，追随孙中山倒满，效忠蒋介石抗日与反共，是新华社会一个重要的领导层。

战前的国民党，其出类拔萃者，比比皆是，诸如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李振殿 、周献瑞、侯西反、林庆年、林文庆等等。国民党的领导层属于华社的中上层，其中包括殷商、企业家、专业人士、教师与报人等。他们泰半来自华文教育源流，故醉心发展中华文化与教育。战前新华中正中学与华侨中学的创建，都有国民党人财力与师资的贡献。他们几乎都是社会活动家，一身兼任多职，如商会董事、校董、会馆领导人、俱乐部委员、赈灾救难团体的理事。

新马国民党不是一个兼容并包、搞统一战线的政党，常与敌对党派相互竞争或对抗，故有同盟会与商会的冲突、国民党与商会外围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1913年）和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1914年）的纠纷、国民党与左翼工会及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在1920与1930年代的明争暗斗等等，其结果导致了华社政治与政治思想上的分裂。寄人篱下的国民党，往往吃殖民地政府的亏。

新马华社左翼运动是中国五四运动的产物。它以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cho-Communism）的思想出现在中马的吉隆坡，其最得力的推动者为吴钝民，一位日本留学的福建移民，吉隆坡《益群报》（*Yik Khuan Poh*）的主笔。他主张反对强权、发扬绝对自由与绝对平等的思想。此外，也大力宣传平民主义，包括平民政治与教育。他歌颂劳工神圣，建议中国采用苏联的政治制度，以工、农、兵为主的领导层来统治国家。这些建议，便是他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内涵。吴钝民因日本占领青岛而组织排日货运动为政府所逐[29]，虽有承继人，但其影响不大。

继吴钝民之后，乃有1922年与1923年从中国南来的一批中国共产党员。他们在吉隆坡主持校政、推动夜学运动、组织劳工与青年学子，并出版新马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本左翼运动的月刊——《南洋评论》（*The Nanyang Critique*）。他们之中，有两位中共党员为此运动之先驱。其一为董方城，湖北人，上海工运领袖，吉隆坡中华学校校长。其次为鲍惠生，湖北人，原名包惠僧，北京大学毕业生，是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成立时的13位创始之一。鲍惠生是吉隆坡《益群报》的编辑[30]，因为他们是历史“过客”，故影响有限。

1924-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广东省的党组织派遣特使到新马两地从事组织

[28]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p.251.

[29] 杨进发编著，《吴钝民政论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页1–2。

[30] 《吴钝民政论集》，页12。

相关人物

麦士威

历史事件

大法官麦士威因英政府颁布的《保安法令》苛待华人而上书伦敦当局据理直言

与宣传工作。他们成功地在1926年建立南洋各业总工会（Nanyang General Labour Union）、南洋共产青年团（Nanyang Communist Youth）以及夜学运动等，奠下了左翼共产党运动的基础。1927-1930年国共分裂时期，新马左翼运动有所发展，首先是中共派遣五位密使到新加坡组织南洋共产党临时委员会（Nanyang Provision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这是1930年4月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的前身，此组织成立于1928年1月。其次，从中国逃来的政治难民中，有多位成为马共的领导人物。如吴清，琼山县人，黄浦军校出身；傅大庆，江西人，中共干部，曾到莫斯科受训，曾任苏联在华特使鲍罗庭（Borodin）的翻译；魏宗周，琼州万宁县人，中学教育，1928年抵新加坡等等。他们与其他17位代表于1930年4月中旬在柔佛巫罗加什（Buloh Kasap）召开大会，成立马来亚共产党第一届领导层，黎光远、琼州乐会县人，工运领袖，中选为马共秘书长；吴清为组织部长（Organisation Head）；傅大庆为宣传部长（Propaganda Head）；魏宗周为党常务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秘书等等。

由于英官方监视甚严厉，且自1934年开始有内奸莱特（Lai Teck）作内应，1930年代的马共领导层更换频仍，欠稳定性。尽管如此，马共自1936年开始，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工潮，打击殖民地经济。此外，马共尚利用1937年中日战争所产生的高涨情绪，组织许多地缘、业缘与学界的抗敌后援会（Anti-Enemy Backing-Up Society），争取民众支持与加深马共影响。1941年，马共的势力激增，党员估计有5000名，其外围组织的抗敌后援会会员有4万名，马来亚各业总工会（Malayan General Labour Union）有会员5万人[31]。在日本南进前，马共显然是英殖民地政府的最大劲敌。

新马1920年代的左翼运动，其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中国。但是，1930年成立的马共却是共产国际（Comintern）上海远东局（Far Eastern Bureau）的杰作。它派阮爱国（Nguyen Ai Quoc，又名胡志明）出席马共在柔佛的成立大会。阮爱国鼓励华人代表“学习巫族语文，招募巫人为共产党员而非为民族主义者”[32]。

马共的领导层是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相结合的组织，华族上层多避而远之。它跟中共与苏联国际共产党有联系，但大体上还是以马来亚为本位。自成立以来，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马来亚“苏维埃共和国”（Soviet Republic），一面反殖反帝，另一方面为工人福利奋斗。1936年以前，其领导层泰半为海南人所控制。1936年，蔡白云与莱特中选为正副秘书长，才结束了琼人的垄断。蔡白云为福建金门人，而莱特为越南人。1939年，在13位马共中委的名单中，最少有5人为新马出生者。这意味着土生土长的新马华人已打开了左翼领导层的殿堂。

战前马共曾取得局部的成就，在其灵活地运用马克斯的阶级路线（发动工潮）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动员群众联合阵线的战术）。马共大力推行群众路线，使其外围组织抗敌后援会得到民间广泛的支持。

作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马共有严重的局限性。第一，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共未能突破种族与语言的障碍，大大地削减了其政治潜能与影响力。马共上层未能解决“莱特”问题，使其领导层损失惨重。这是英官方与日本统治者运用《孙子兵法》所带来一网打尽的成果。

第四股政治力量，是陈嘉庚（1874-1961）无党无派（non-partisan）的领导层。在分析陈氏领导层的内涵与崛起的历史因素以前，先简单地介绍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创业经历与社会地位的建立。陈嘉庚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1890年移民到新加坡，从米业、黄梨罐头制造和树胶种植起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营船务致富。1920年代初，发展树胶制造业而成为早年新华的工业家、企业家。1934年世界经济不景自动收盘。陈嘉庚是一位典型的儒商，从勤俭创业，诚毅为人处事，公忠体国。其一生大业，前半生兴学，后半身纾难，为新中两地鞠躬尽瘁。

在殖民地时代，财富是社会向上攀升的阶梯。陈嘉庚灵活地运用财富办教育（诸如领导1919年华侨中学的创办、1921年厦门大学的建立）、搞慈善，为社会、国家尽义务，名闻遐迩。此外，他在1920年代获得两个实力地盘，即1923年怡和轩俱乐部的总理与1929年福建会馆（Hokkien Huay Kuan）的主席职位。前者是新加坡百万富翁的俱乐部，其成员都是各帮的领袖。后者是新加坡闽帮的最高机关，闽帮人口最多，经济力量最强，人才鼎盛。在怡

[31] C. F. Ya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pp.234; 274–275.

[32]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p.130.

和轩近百名的会员中，陈嘉庚有不少助手，其中一位孙崇瑜（1897-1990）为新加坡华民政务司署翻译员，1930年代为华民政务司帮办（Chinese Secretary for the Secretary of Chinese Affairs）。孙崇瑜的贡献是助陈嘉庚与华民政务司建立良好关系，并支持陈氏的政治事业[33]。

辛亥革命以后，陈嘉庚不参加任何政党，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说“余自忖不能领导他人，亦不宜受他人之领导”[34]。这不是藉口。他不参加国民党领导层，因为国民党的确有不少资格与声望比他高的领导人物，诸如林文庆、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与陈武烈等等。但是，比较重要的因素是当时新加坡华人政治上闹分裂，有新旧商会之争，也有国民党与中华商务总会的外围组织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的冲突。他两党都有亲朋戚友，故不愿介入。1913年，他在家乡集美筹办集美小学（Chi Mei Primary School）。待他于该年底返新，国民党势力开始走下坡，故入党机会已失。陈嘉庚未参加任何政党，认为自己是超党派人物，故他常强调“南侨爱国无党派”。他的所谓“无党无派”，实际上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高境界。

1928年，陈嘉庚以“无党无派”的姿态，以怡和轩俱乐部为大本营，领导“山东筹赈”（Shantung Relief Fund）运动。这是陈嘉庚反应日本军队为阻止中国北伐军在山东济南的流血冲突。陈嘉庚获得新加坡100余社团单位参加成立大会，出席代表来自各帮各界共1000余人，选出一个32位董事领导的山东筹赈会，会长为陈嘉庚。这100余单位的社团，有学校、俱乐部、校友会、书报社，以及血缘、地缘与业缘团体等等。在陈嘉庚领导下，此运动为时九个月，每日有各华报宣传，敌忾同仇的民族主义思想高涨，筹款共得136万元新币。1930年代陈嘉庚所领导的政治或慈善运动，诸如1936年的购机寿蒋与西安事变（Xi'an Incident），1937年的星华筹赈会（Singapore China Relief Fund）与1938年的南侨筹赈总会（Southseas China Relief Fund Union），基本上还是采用民间社团为主的组织与募捐政策。在政治化的时代里，陈嘉庚的无党无派的领导层普遍地得到民间支持，马共与其外围组织抗敌后援会也广泛地获得工人与学生的助力。

陈嘉庚无党无派领导层的政治号召力与奋斗精神，使他登上新华、马华以至于东南亚华人领袖的宝座，享有政治权力、地位、社会影响力，以及千百亿的国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央国库。

在日本南进前，新加坡总督汤姆斯（Sir Shenton Thomas）多次恳请陈嘉庚出任新加坡华侨动员总会（Singapore Chinese Mobilisation Council）的主席，替英政府进行民防工作，为保卫新加坡尽犬马之力。陈嘉庚享受崇高的荣誉，是英政府所承认，华社所赞赏的。

以上四种模式的政治领导层，各有其实力地盘、政治影响力与历史遗产。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对新加坡政治与宪制发展作出贡献，他们是新加坡国会民主制度的前身，有条件提升到全新人民的代言人。国民党与陈嘉庚势力分享新加坡华社的政治与教育的领导层，两者也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国民党运动屡受英官方阻扰，使陈嘉庚的领导层能放胆动员民间社团组织来完成救亡纾难的历史任务。新马的左翼力量靠工人起家，它组织工人阶级，提高工人经济条件与政治地位，是英殖民地政府的劲敌。

[33] 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页186-90。

[34]《南侨日报》，1947年9月30日。

相关人物

胡亚基

历史事件

12 月 21 日

胡亚基就任立法议员

战后华族领导人与其政治认同

如果说新加坡华人政治领导层第一次突破性的变革发生在20世纪的首10年，那华人政治领导层第二次的历史性变革产生则在20世纪的40年代。在这个多事之秋的10年里，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1950年代的新加坡政治发展与华社领导层的变革，如日本统治马来亚（1942-1945）、新加坡宪制发展、马来亚紧急状态（1948-1960）、东西集团的冷战（1946-1989）、中国的国共内战（1946-1949）与马来亚大学的成立（1949年）。它们不但决定战前领导层的命运，而且也对新崛起争取自治独立的政党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日本统治昭南岛（Syonan），是新加坡历史最为恐怖与黑暗的时代，华社牺牲最为惨重，各个领导层元气大伤。马共1936年与1941年中选的中央委员，几乎全部为日军斩尽杀绝[35]。迨1943年4月底，大西觉（Onishi）的宪兵部已逮捕了新马两地的马共党员与嫌疑犯，人数共达6665人。这些人的被捕，大都是马共秘书长莱特出卖的[36]。不过，日治期间，马共趁机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加强其军事力量、名誉与影响，导致1948年6月马共的武装斗争。

日本统治新加坡是英国军事上的“滑铁卢”（Waterloo），13万英国联军为战俘，其帝国尊严受损，其至高无上的形象失其魅力，新加坡的沦陷为新马两地有识之士带来当家作主的信心。

最后，日本统治新加坡的暴虐性与野蛮性，为一代身历其境的年轻人，诸如李光耀、杨玉麟、林金山与韩瑞生等等，决心在战后从政，争取新马的自治与独立。1961年，李光耀在新加坡广播电台演讲中强调历史赐予他的任务：

> 我的同侪与我的那一代人，曾经历过日本统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坚决地认定，没有人——不论是日本人或英国人——，有权利唤使或虐待我们。我们能够自治，并在此值得骄傲的国土上，哺育我们的子孙，使他们成为有自尊心的人民[37]。

国共的内战，主要影响华文教育领导层的政治斗争。这其中有国民党与陈嘉庚拥载毛泽东的政治角逐，也有国民党与1946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Chinese Democratic League）的政治论战。这场中国内战的左右之争，在1949年结束。1949年5月，新马两地政府严禁国民党与中国民主同盟。该年10月，中共内战胜利，1950年5月陈嘉庚决定回国参加中共建国行列，这场内战余波也最终退出新华政治舞台。

马来亚紧急状态（The Malayan Emergency），是马共武装斗争时期，1953年走向低潮，1960年为马来亚政府镇压。1948年，新加坡政府也通过紧急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严禁其党，取缔其领导层。1950-1953年，马共在新加坡市委与区部单位领导层，遭到摧残而崩溃，党组织有“群龙无首”之势[38]。留下来的只有三位党干部，即搞《自由报》（*Freedom*）宣传的方壮璧、工运党委员詹忠谦与学运委员黄明强。方壮璧被李光耀称为马共“全权代表”（The Plenipotentiary），与李光耀密谈多次有关两党反殖合作等问题。马共在新加坡最重要的领导人余柱业于1953年移居印尼避难而与新加坡党组织失去联络。

在地下组织受破坏与士气低沉的情况下，马共学委黄明强与《自由报》编辑方壮璧于1954年2月至1955年4月推行公开与合法的学生、工人与农民的群众性运动[39]，即所谓“公开统一战线”的策略（The Open United Front）。

1954年，新加坡的国民服务法令，是“上帝赐于马共的礼物”（The National Service issue was a god send for the MCP）[40]。马共鼓动华文中学生游行抗议而与警察发生冲突，26名学生受伤，48名被扣留。这便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5·13事件”（5.13 Incident）。此事件加强学生政治觉悟，导致1955年成立的中学联（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s Union），矛头针对反殖。其次，此事件促

---

[35] Yoji Akashi, Lai Teck,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39–1947"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49, 1994), pp.73; 76.

[36]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39–1947, p.74.

[37] Lee Kuan Yew, *The Battle For Merger*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Series, 1961), p.11.

[38] 方壮璧，《方壮璧回忆录》（雪兰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年），页135；陈剑主编，《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雪兰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年），页176, 209。

[39] Lee Ting Hui, *The Open United Front,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Singapore, 1954–1966*（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6）, pp.47–48. 陈剑主编，《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页207。

[40] Richard Clutterbuck,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945–1983* (Singapore, Graham Brash (Pte) Ltd, 1985), p.83.

使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开始关心与同情华校学生的遭遇。因为帮助被捕学生辩护，李光耀有缘踏进了华文教育人士的世界，使他亲身体会华校生的生命力、政治理想、牺牲精神与反殖毅力，为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李光耀决定猎取（poach）此源流之精英，以助他争取该源流人士之支持。他自信能说服或感化华文源流的活动分子，支援他完成自治与独立的目标[41]。为此，他邀请来自华文源流的两位左翼工运领袖，林清祥与方水双到他府上做客。林方两人为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成立时的发起人。他们为党务、工运与反殖斗争献出犬马之劳，为达到其理想坐牢而不悔。

"5·13事件"为李光耀突破华文源流的新天地，1954年5月28日的马大"《华惹》事件"（Fajar Incident）让李光耀打进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Malaya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的大本营。根据政治部（Special Branch）的一位高级职员柯立敦（R. B. Corridon）的口述历史资料，他说英当局最担心马大社会主义的喉舌——《华惹》，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华惹》的编者有学术水平与理论基础，其分析力强，说服力高。为搜集《华惹》幕后人物资料，他本人潜伏在大学校园三天三夜，访问教职员，确实编者姓名与寻获《华惹》为物证[42]，其中有《华惹》第7期，1954年5月10日出版，封面文章为"侵略在亚洲"（Aggression in Asia），颇有反殖与反帝的论调，诸如法国镇压越南民族主义者的解放斗争、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保护台湾政府与英国统治马来亚，人民的利益被牺牲等等[43]。新加坡的律政司于5月23日审查《华惹》第7期以后，主张以"煽动"（Sedition）的罪名控告八位《华惹》编辑部人员，诸如傅书楷等。5月28日，警察的逮捕震动了新马社会[44]，李光耀为辩护律师之一，上诉得直，法官宣判全体无罪释放。"《华惹》事件"不但增加了李光耀的名誉与魅力，而且也深入了他对英文教育知识分子的影响。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领导人物，如詹姆士·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兀哈尔（Sydney Woodhull），傅书楷与林福寿等都曾经参与人民行动党的行列。

1954年10月，李光耀与其核心人物，招收或"猎取"不少来自新加坡三大教育源流（中、英、巫）的精英。其次，他们也得到三大教育源流的工人与受薪阶级的支持。第三，他们也打进工运，建立群众基础。第四，李光耀也获得华人的宗乡会馆与职业团体的援助，如客属总会等等。有了以上的良好条件，人民行动党遂于1954年11月21日正式成立，选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12名委员。其委员会是民主非共领导人与左翼人士的统一战线，左翼势力的三位代表为方水双、曾超卓（Chan Chiaw Thor）与蒂凡那（C. V. Devan Nair）。这早期的统一战线导致了多次的政治斗争与1961年的大分裂：一个是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另一个是林清祥（Lim Chin Siong）组织的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cialis）。1963年2月2日，新加坡政府执行所谓"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逮捕百余位社阵、工运、文化、教育界等左翼人士，导致左翼势力在新加坡走向衰落与低潮。

人民行动党成立后，高举反殖反紧急法令与独立民主的新马统一的马来亚大旗[45]，接受林

[41]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Pte Ltd, 1998), pp.173–174; 176.

[42] 柯立敦于1978年12月在英国苏利（Surrey）提供作者有关《华惹》与他扮演的角色的有关口述资料。笔者访问柯氏是孙崇瑜介绍的。

[43] CO1030/361, "Arrests under sedition legislation in Singapore," See *Fajar*, No.7, 1954.05.10.

[44] *Ibid.*, see attached typed document under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an extract from Legislative Assembly Proceedings, no date given.

[45]《建党十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编辑委员会，1964年），页281–282。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0 月

私会党发生大械斗

德宪制报告书（Rendel Constitutional Committee Report），参与1955年4月大选，林德报告书于1954年2月发表，建议民选议员（25名）、组织部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在六名部长选出一位首席部长（Chief-Minister）等等。此次选举，劳工阵线（Labour Front）得10席，人民行动党3席（李光耀、林清祥与吴秋泉），劳工阵线中选人数最多，推出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为首席部长。1956年，马绍尔率领代表团到英伦谈判宪制改革失败辞职，由林有福取代为首席部长，林有福于1957领导一个新的宪制代表团，再度与英殖民部谈判与1958年双方的修改，终得一个自治的宪制方案。此宪制方案允许英国继续负责新加坡的国防与外交事务。此外，在内部治安方面，该宪制中规定成立一个新加坡“内部治安理事会”（Singapor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其成员共七位，三位来自新加坡政府，三位代表英国利益，马来亚政府也占一席。这个理事会的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保证新加坡自治政府清除或控制左翼政治势力的威胁。最后，这个新宪制赋予英驻新加坡最高专员解散民选政府，由英国取而代之。这个特权，再度强调内部治安的重要性。

新加坡的新宪制带来了1959年5月30日立法议院的选举，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在51位立法议员中，共占了43名。人民行动党获总选票的54%，选民共28万1891人。

1963年新加坡和大马合并，期望甚高。1965年，新加坡退出大马，取得独立，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同床异梦，焉知非福?

1950年代，新加坡的劳工阵线与人民行动党比较有贡献。前者领导人如马绍尔与林有福，对争取新加坡自治作出努力。但是，人民行动党，最有原动力、影响力与群众基础，他们在的社会建设（如建屋等）与经济发展（开始工业化）是有效的建国方针。

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有几个特点：（一）它是多元民族，但华人占大多数。这也反映新加坡人口中华族占70%以上的人口；（二）主要领导人物来自英文源流。其中五人可说是核心人物，他们包括李光耀（党秘书长）、杜进才（党主席）、吴庆瑞（党副主席）、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左倾英文报编辑贝恩（K. M. Byrne）。除了拉惹勒南以外，其含四人在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念书时期认识的，后在英国升学时期组织马来亚论坛（Malaya Forum）的战友。这五个领导人物都有才华，尤其是李光耀，胆识过人。如1950年8月从英国毕业归来，受警察总监盘问。他自称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非共产党员。他认为马来亚的动乱只是英政府与马共之间的私人战争，如果前者获胜，他将即刻争取自治政府的成立与加速马来亚化……[46]。李光耀招收林清祥与方水双参加建党大业的危险性，与李光耀六次秘密接见“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的冒险性，再次证明他判断性强，有处之泰然的领袖作风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无畏的精神。李光耀的其他可靠的同僚包括杨玉麟、韩瑞生、林金山、王邦文与黄麟根等等；（三）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教育水准高。试举该党1959年的51位候选人，有中学教育水平的共28人，占候选人的55%，有学院水准的候选人共3人，占全体的6%，有大学教育的候选人共10人，占总数的20%[47]；（四）有关语言的应用方面，1959年的51位候选人中，谙英语者有19人，占总数的37%。能讲华语者13人，占总数的26%，能用英巫双语者6人，占总数的12%。能说英中双语者7人，占总数的14%。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最为现代化的政党，其双语领导人还是极为少数，只占51位候选人中的25%[48]；（五）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制服，全身素装（Men in White），不打领带。这个朴素、端庄、有活力、具纪律性与使命感的领袖形象，给新加坡人民一种亲切感。新加坡人民，对政府官员或政治人物一向有敬而远之的传统。

战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主要领导人物来自英文教育源流的大专学生。他们属于民主、非共的社会主义者，主张以宪制合法手段取得自治与独立。此政党于1959年取得自治，1965年成为一独立国，其领导层的贡献巨大。首先是李光耀与其核心人物的才干、胆识与奋斗精神，团结各民族的精英，共同为其政治大业鞠躬尽瘁。英殖民部最终接受人民行动党为其继承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

---

[46] CO1030/403, Briefs for Secretary of State's visit to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55, p.8, contains biographical notes on Lee Kuan Yew.

[47] Pang Cheng Lian, *Singapore's People's Action Party. Its History,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40.

[48] *Singapore's People's Action Party. Its History,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p.41.

第二节 义结金兰
——华人秘密结社的演变

摘要

在早期马来亚活动的华人秘密结社，从1794年到1965年，实际上包含好几个种类。它们因外在环境的转变而异其质。由最早期的落难义士借用公冢公司的壳，蜕变成1850年虚有洪门之表而以牟利为实的公司，后又因1930年经济大萧条摧毁了行业/方言/帮会的三合一结丛，使得敛财的会党、私会党等应运而生。本节将逐类叙述之。

Abstract

In early Malaya during the 1794-1965 period,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comprised various types. These iconic societies frequently shifted their orientation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the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virtual Triad societies, "gongsi or kongsi"and gangs. In those days, one's occupation was invariably tied up to the origin of his dialect. After the great influx of Chinese labourers around 1850, this tie-up was further reinforced through the gongsi's connection with the protection societies, thereby generating secret societies with a complex mixture of occupation, dialect and gang elements. However, with the onslaught of the 1930 Great Economic Depression, this complex of relationship was finally destroyed, leading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gangs.

麦留芳（Mak Lau Fong）

金兰庙碑刻

撰写一部新马殖民地时代的华人秘密帮会史，究竟该从什么年代开始？又应从何种角度切入？真令人觉得千头万绪。那源头是一个忽隐忽现、是非互渗的概念：帮会。造成这种概念上不稳定的状态，主要是资料的来源或可靠性。帮会也是秘密结社，本节拟建构数个秘密会社类型，以厘清官方和民俗资料衍生出来的定义。

对严格的历史学家来说，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但是，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对华人结社的认知，就不免会渗入许多臆测、穿凿附会、绘声绘影的描述。在过去，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殖民地政府的档案。那是一种定义的来源。西方学者的书写，多依赖这种资料。

另一种资料算是田野资料，所指的是会党文献如腰凭和收据、碑刻文字、钱币信物、会馆会议记录、和通俗街名等。碑刻文字多来自墓志铭、神主牌或禄位、颂赞和纪事的匾额等。

不论资料的种类，也不论使用它的人有多谨慎，无意中亦会选用不同的“秘密结社”的定义：时而官府的定义、时而民俗资料的穿凿，时而报章的臆造或想当然尔的推论。学者选用资料，各有所好，但至今的共同点是：除却管理公家的公司外，其他以公司命名的组织，由始至终，一概被视为秘密结社、帮会、会党。这是大有商榷余地的。笔者虽有意走出这淌浑水，却也处于知易行难、无可奈何的境界。

首要的工作是在既定的历史脉络中，尝试建构华人秘密结社的类型。分类的准则是它们的活动模式，而不是一贯性的天地会的组织纲领。换言之，采用洪门纲领的不一定就是洪门的堂口，或它们必定支援反清复明的活动。

笔者在新马从事会党田野工作在1974年已正式结束，距第一个在1794年在槟城被发现的帮会，约近180年。在这期间，会党已从“洪门天地会”演变至街头党。要简略的了解这个变迁的轮廓，得先具有某些社会历史的共识：

第一，清代从1721年开始便实施海禁（见《大清律例》），把移出中国本土的子民，视作不安本分的人，不准其归来。尤其是久居不归者，更可问斩。因此，对潜逃海外者而言，那是一条不归路。落地后他们必须自立门户、自力更生，故走上不归路是一种胆识。碑刻文字和义士神主牌皆证明了洪门人物确曾南渡逃难。到殖民地时仍坚持反清复明的，舍落难义士，料无他人。

第二，虽然几乎所有的闽粤华人帮会都采用天地会的组织纲领，但在行动方面，很多并无遵循洪门36誓的主要行为规范，如金兰兄弟情、反清、复明、革命。因此，这些只能算是披洪衣的另类结合体；也有不披洪衣，或顺清或保皇的帮会。

第三，英属殖民地的华人“公司”原是管理同籍贯义山的组织，后被借用而成为牟利的结合体和秘密结社。另外，冠用“馆”的组织在那时代应是指武术馆。入馆学艺的本就得通过师兄弟的结盟仪式，除个人健身外，也多提供保全服务。视馆为帮会，似乎更接近事实。在枪炮不易获得的

年代，没有武馆，几乎不可能有大规模和持久的械斗。

第四，义士在原乡的洪门身份应是在其逝世后，由家人、别人还原或追封的。易言之，走上不归路的可能一直在隐瞒着某个身份，直到逝世时才揭露。如曹家馆的曹符成、曹符义和麦安，甚至具有两种相互排斥的政治身份。哪先哪后，这就大有文章了。

上述各点，尚属笔者个人见解，并非史实。

秘密会社的历史脉络

秘密会社是一个泛称名词。在民间、学者、执法部门，秘密会社又被称为“帮会”、“会党”、“汉留会”、“哥老会”、“团伙”、“黑道”、“黑帮”、“私会党”、“匪党”、“犯罪集团”等。这类结合体都满足最基本的保密条件，那就是该社的主要活动或行动，外界在事前不会得知。旧金山的《大同日报》在1911年刊登了一则致公堂和同盟会结盟的公告，无人不知；但其突击性行动如起义，却是保密的。

天地会在发源地的本质

中国历史几千年，对中国朝代的时序稍作了解，可以确立天地会的活动时代及其意义。天地会是在满洲人统治中原后120年才创立的，而落难义士南来是在又30年后。有关的帝皇朝代的更替约为：秦（公元前221-207）、汉（公元前206-公元220）、三国（220-265）、两晋（265-420）、南北朝（420-589）、隋（581-618）、唐（618-907）、五代（907-960）、宋（960-1276）、元（1271-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1）、民国年代（1912-1949）。

洪门在组织和结盟意识方面，无疑是深受汉末三国刘、关、张桃园结义（见《三国演义》）和宋朝梁山泊四海兄弟的侠义作风（见《水浒传》）的影响。洪门创立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覆明的清朝，却在清帝治国120年之后。

这会社的成员自称洪门；外人则称之为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三河会、小刀会、双刀会等等。洪门最大的支部或山堂在海外的，如北美、欧洲、大洋洲、南洋、致公堂、洪顺堂。在南洋，尤其在荷属印尼及英属马来亚，和洪门或致公堂是有实质政治联系的，或亦是其海外堂口的，是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中和会和同盟会。

在中国的传统家族制度下，如“父母在不远游”，洪门理应不会壮大。但它却在中国国内和海外，活动了两百多年，全是男性。际此，我们不妨在洪门的动员与内控方面稍多着墨。

洪门的歃血为盟的入会仪式，主要目的是以拟制亲属替代封建的家族思想。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和梁山泊的108位兄弟拜把，便是拟制亲属的一种；它对男性的贩夫走卒比对士大夫更具吸引力。舍亲情、离家走入梁山的多是权势的受害者。洪门的仪式，就隐藏着许多家仇的神话，如恩将仇报的火烧少林寺的故事等。洪门既要推翻满洲人，所招入会的当然是汉人，泰半是底下层阶级。

一个革命组织，冲锋的成员最可能是来自底层阶级，理性的国殇分析是挑不起他们的情怀的。创建洪门的，掌握着当时汉人的特性：“不讲民族而讲家族的、不讲国家而讲君上的、不讲后世而讲祖宗的、不讲先民而讲宗派的”[1]。因之，对基层不能晓以国家公仇、民族大义，但却可假借神话来激起江湖义气，英明的领导人遂可将之提升至国家民族的层次。

孙中山也洞察到这一点，故其与洪门致公堂的关系，若离若合；当然是取其理性者而合：仅反清制，却主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1]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35年原版，1969年翻印），页18。

相关人物

胡亚基

历史事件

2月11日

新加坡铁路有限公司成立，资本10万元，胡亚基出任临时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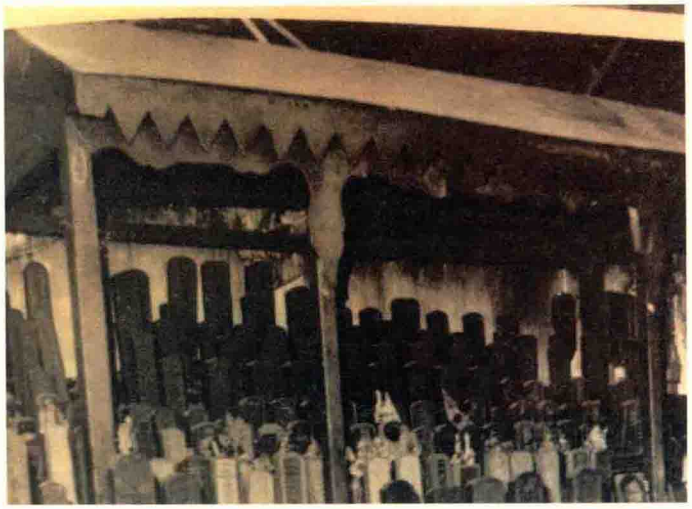
天地会的南来

任何结社，都必须有领导人和随员。谈到领导人，或权力来源，原则上有三大类型：基于辈分或经验正统性的传统型；由法定机构赋予权力的理性或法治型；和天生的魅力型。领导才能多表现在会员的凝聚方面。以早期南来避难的洪门义士来说，他们对于凝聚会员或内控的方法，不必他求；原乡的洪门本已有完善的歃血为盟的仪式、誓言、条规等。但在中国境外，图谋重整旗鼓，却缺乏正统性，也不适应殖民地的人脉：参与本地的民间社团应是上策。这是义士们的借壳上市的策略。

不过，在19世纪中叶，殖民地政府需输入大量开矿和种植的人力，遂吸引了大量的劳工或苦力涌入海峡殖民地。其时要到中国去招募“契约劳工”，往往都得假手于代理公司。本地的生意人，顿觉得贩卖劳工或“卖猪仔”有利可图，英、荷、华各籍的代理公司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

劳工上岸后，先被关锁在廖内民丹岛或新加坡。过后又得被运送到马来亚内地不见人烟的蛮荒地带去启土生聚，主要是开矿和种植，如锡矿、胡椒、甘蜜、棕油、树胶等。为了有效地控制这大批劳工的移动，洪门的凝聚和内控机制用来应是得心应手，具有义士背景的更是驾轻就熟。武馆便因此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为行业公司提供监控劳工移动的服务。也有公司本身自立的武馆，如义兴公司之“义兴馆”。天地会的五虎将，或虎将，是武职。行业公司间械斗之规模及持久性，以及武力支援马来王室平乱的，端赖武术馆所能提供的人力资源。单靠赤手空拳的暴民去徒博是不济事的。

从1764-1912年因中国本土的政治形势改变，促使洪门产生了反清复明、反清不复明、和不反清不复明的各类结盟团体。在南洋采用天地会入会仪式的会社，似乎对反清复明意识，并不在意。它们不但没遵守洪门36誓中禁止兄弟或堂口间公开互相恶斗的条规，如第20，24，28条，甚至还有背道而驰、同室操戈的。槟城在1867年义兴和大伯公的械斗、暴动，和后来义兴和海山在太平拉律近十载的火拼，也好像和反清没什么相干。



五虎祠内的反清复明义士神主牌

此外，义兴公司在柔佛新山的开发活动，如港脚、饷码等商业性活动。从1844年到1916年，都受到柔佛王国的天猛公和苏丹的支持：独尊义兴。在目前所获得的田野资料来看，这一公司也被视为天地会的一环；但该公司70年来的言行，百分百是营利性质的。

在新加坡方面，除了宗乡会馆、义山管理会、庙宇之外，其他的华人组织如公司、武馆，在1890年全部被查禁。在新山的柔佛-廖内王国则迟至1916年才和义兴公司解约，过后亦遭解散。原因之一是本是行政独立的柔佛，那年被英国拼入英国殖民地的版图。英殖民官在这之前已曾数度敦促柔佛苏丹查禁义兴。

披洪衣的不一定就是洪门子弟。但殖民地政府所害怕是让它们坐大后，可能会掉头来反殖民。把它们连根拔起，才算上策。英、荷殖民地政府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类中国文化产品，如洪门歃血为盟的入会仪式及信物等，曾选派御用学者，如荷人施利高（G. Schlegel）及英人毕麒麟（W. Pickering）到中国学习当地语文，志在研究洪门的来龙去脉，以逐步控制造反的会社。也正是这个原因，英殖民地政府在1869-1890年间，把这类会社，尤其是文献中鲜有提及的武术馆，列为危险社团，而必须注册，到最后被封禁。由于行业公司和武馆保持着紧密的共生关系，它也被视作危险社团、帮会。为了要和先驱学者维系对话，本节也暂时循规采用“公司即帮会”的传统定义。

拟制洪门组织的类别

一般人以为在19世纪时，华人秘密结社只有一种，那就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除了会内会外对洪门的称谓不一样外，而常更改堂号主要还是为掩人耳目，但其反清宗旨可说到处杨梅一样花。这与早期南洋的各地挂祖籍名号的公司不一样，那些都是丧葬公冢互助会。这些公司本质上并不是天地会，却被落难义士借来掩护其政治意图。

几乎所有公开的资料，都证明了本地公司一致采用洪门组织纲领。尤其是当时在1877年担任新加坡华人护卫司的英官毕麒麟，便曾因为加入“福建义兴”（公司）而见证了天地会的入会仪式[2]。许云樵也在1971年重复且肯定其可靠性[3]。

另一点是，虽然它们都披洪衣，却分复明（朝）和不复明两类。由郑成功创立的天地会，是地道的又反清又复明的会党。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中和会、同盟会，甚至黄三德和司徒美堂在北美所领导的（洪门）致公堂，至少在孙中山加盟之后，仅反清却不复明。较后司徒又投靠共产党去了[4]。

基于以上的了解，笔者认为南洋华人移民帮会的成立与发展，至少有好几种模式。最早的一种是，南渡逃难的反清复明的义士，落地后曾过着老骥伏枥的生活，暂寓志于当地庙堂，如青云亭和恒山亭。另有仅反清而不复明的同盟会支部，在槟城、霹雳、新加坡都有。也有都不站边的顺清的子民和受爵人士、甲必丹和庙亭亭主等，他们仅为移民同胞排纷解难，因之而成立了中华公会、会馆、义冢、庙宇等。在该两亭内的领导人所陈列的颂赞匾额中，便有沿用大清皇帝和改用“清”字无“主”来纪年的。新加坡曹家馆的曹符成，在1830年逝世后，既是义士，又用“皇清”纪年。这不像是孤立事件，因曹符义和麦安亦具此两种相互排斥的身份[5]。如有兼甲必丹和义士身份者，其中义士的身份应是在他西归后家人给他还原的。

不站边的也有仅牟利的股份公司（如港脚、猪仔馆、烟馆）或商会等。这类组织却也容纳各路人马、各方言群。至于天地会的背景，只反映在个人身后的神主牌上，以及公司内允许摆设天地会所崇拜的神祇，如洪门的五祖。至于他们生前是否也积极主持公司/公会内的业务，则有待查考。不过，在新加坡社公庙的73义士中，有些确曾是会馆的董事。简言之，从1794到1916的122年里，公司有两种：公冢的管理单位和被视为帮会的牟利组织。

以天地会的组织纲领把海峡殖民地100多个会党分类，习惯上仅区分成两大类型：天地会和街头党或私会党。那似乎和事实有点距离。不是所有“披洪衣”的公司都是反清的，槟城的海山就是一例；在它尚未和类洪门的大伯公撮合前，可能根本就和天地会没有实质的关连。从所得的各类资料里，义兴公司绝对是“披洪衣”的公司。但它是不是一个洪门的海外堂口，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综合以上所述，以反清行动作为分类的框架，则本地的秘密结社可分成以下三大类：反清复明、反清不复明、不反清不复明。后一类又包括了披洪衣的会社如义兴公司、外衣不明的海山、一般私会党或匪党。要是把秘密会社的发展或演变的时序也带进来，分类就稍为复杂一点，如下表所示。但分类却可以简化为：落难义士借壳（1800-1840）、公司与武馆（1840-1890/1916）、帮会与会党（1890/1916-1942/45）、战后私会党（1945-1963）。

---

[2] Pickering, W.A.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 in *JSBRAS*, 1 (1828): 63-84 & 3 (1879): pp.1-18.

[3] 许云樵，〈星马私会党与洪门天地会的渊源〉，载《东南亚研究》卷七（1971年），页1-28。

[4] 香港凤凰电视台“我的中国心”节目，2014年3月16日。

[5] 庄钦永，《“石叻梧槽”五虎祠义士新义》（新加坡：南洋学会，1996年），页16-17。

表（一）江湖结构与演变

帮会演变的阶段	社会结构与特征	主要结社与活动	备注
1. 天地会南来 （反清复明） 1800 年之前	华人人口稀少 华侨反清、保皇	起义失败逃至海外拟设堂口	致公堂/洪顺堂原本在北美洲活动
2. 借壳过渡 1800-1840/1850	工商各业结构简单； 语/业结丛萌芽	落难义士与顺民借庙宇公司的壳：义兴等	义士多采用洪门纲领 顺民沿用皇清纪年
3a. 公司与武馆 [多语群]（虚拟洪门） 1840-1881/1890	劳工激增、武馆兴起 强化了语/业/帮结丛 帮会=公司+武馆	义冢公司转营利公司； 总商会结构渐萌； 义兴公司自设武馆	活动于三州府 太平拉律（Larut）
3b. 公司与武馆 [单语群]（虚拟洪门） 1844-1916	皇族/苏丹特许的 方言群：潮洲人为主	义兴公司自设武馆； 中华公所结构	活动于柔佛各港脚； 武馆协助皇室平乱
4. 帮会与会党 （混合共存） 1890/1916-1942	社团禁令实施： 境内帮会变会党 境外革命帮会进驻	新义兴等公司崛起： 新瓶旧酒， 反垄断的械斗仍持续	同盟会等与本地会党共存
5a. 爱国帮会：民国帮会 （反清不复明） 1894-1942	国民政府筹饷、北伐	兴中会/中和堂/同盟会 1895/1901/1906	活动于： 檀香山/日本/香港/新加坡/槟城/怡保/芙蓉
5b. 爱国帮会：抗日帮会 （不反清不复明） 1942-1945	日治时代社会大恐慌 拟制洪门帮会再现	洪民（门）会、华记保护马六甲海峡同胞	霹雳太平、槟城、马六甲沿海
6. 战后的私会党、匪党 1945-1957/1965	百事待兴、星马分家 国共内战、帮会分化	各族自立的匪党窜起	保护划定地盘内之特种及非法行业

第一类型

有关天地会的起源，众说纷纭，能免则免[6]。其中一说是郑成功于1764年因反清而逃难至台湾后才创立的。继后林爽文起义失败，天地会随着逃难义士传入了南洋。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义士，是曾经在原乡参加过起义的天地会会员。他们拳脚灵活当然不在话下，说他们都曾在武馆学过武艺，一点也不稀奇。

在起义失败后还能逃到海外的，在身、心方面，应该都是重量级人物，其卷土重来之意必也坚强。在策略的运用上，在地借壳上市也好，借尸还魂也好（详见第二、三类型），他们的确曾在英、荷殖民地活动过两三代（1764-1881）的时间。

荷籍学者施利高、英殖民官毕麒麟、沃恩（Vaughan）、华德和史德龄所收集到有关当地秘密会社各类资料中，如前述，得知在19世纪时，在荷属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英属马来亚和香港，帮会所采用的入会仪式、会规、暗语等，皆源自洪门天地会。较后出版的萧一山等[7]的著作，也证实了天地会会员潜逃到南洋一事。

在马六甲青云亭和新加坡恒山亭里，颂扬甲必丹的匾额上所用的“天运”纪年，被认定仅为干支纪年[8]，而非暗喻反清。有份拍卖新加坡义兴公司梧槽地段的1849年的中译政府公告，是用“天运”干支纪年的。庄钦永认为是政

[6] Yen Ching Hwa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10.

[7] 同注1；亦请参阅许云樵、陈育崧、庄钦永的著作。

[8] 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载《中文系学刊》卷10（1969年），页1-51。

府在不知情之下，给了一名反清会党人士抄写所致：不用道光年号[9]。在73名义士中，虽大部分采用“天运”，却有好些沿用清帝年号的，仅用“干支”或公元的亦有。以皇清纪年记录生卒年代的有：活跃于1840年代，一名；1850年代，两名；1860年代，一名；1870年代，一名。

不过，出具生卒年代的应不是义士本人。以此看来，应用“天运”来纪年与“清无主”的关联不大。采用“皇清”纪年的，很明显不主张反清。但用“清无主（汎）”纪年的，肯定是反清复明。不过，青云亭附属义山的明墓群，安葬的应是明朝移民或天地会义士。又如柔佛新山绵裕亭所埋藏着不明数目的神主牌的公墓（建于1921年），曰“汎”墓，和附近的百多座个别的“汎”坟墓[10]，便是义士安息之所。

再证之于受封清官、甲必丹、亭主等，他们采用皇清纪年的也不少；虽颂赞匾牌和碑铭有假手于他人者，当事人都应看过认可。综合所述，除了采用皇明纪年和“清无主”记号（如汎墓）可接受为扶反清意识明显外，其他的符号则值得再三思考。

新加坡泰山亭的明墓群，以及社公庙（五虎祠）的73个义士神主牌，也是最不具争议的证据，证明了反清又复明的天地会会员，曾在本地落脚，并在华侨社区领袖群伦、创立各类公司；这可是借壳上市的策略。

此外，1853年洪门小刀会在厦门起义失败后，亦有数目不详的义士逃到新加坡避难。庄钦永证明他们的名字并没出现在五虎祠的禄位群中，或泰山亭里[11]。他亦质疑田仲一成提及1854年在潮州海阳县彩塘的另一次起义，田仲说失败的义士的禄位应也在五虎祠内。庄钦永查核了海峡殖民地档案和清代反政府的帮会招供的会员名单，并没发现此两批义士名字俱在五虎祠里。也许他们是葬在新山的绵裕亭而至今尚未开封的公墓里。这类田野资料，是确认会党党员身份的一个方法。

另又有一个辨认方法，那是取决于该人哀荣时的人气。此处提供两个例子：陈送（叔送）和林推迁。据当时报章报道，陈送的送殡人潮非比寻常，夹道致哀。当时，恒山亭的1830年纪事碑，记录他为第二大捐款的董事[12]。陈育崧据此而论定他曾是黑道人物[13]，却没给予证实。

在所有公司皆被查封后五年，中国南来的林推迁另起炉灶，创立了冠盖云集的怡和轩。他生逢农历新年，每年元旦聘来戏团在怡和轩前上演街戏至元宵，街上车水马龙。他因此被认定是义兴的人物，还道出阶序是“洪棍”。若他真的是义兴的人，那他应是活跃于1890年之前；之后已无义兴。

这是义士借壳或借尸还魂的策略，也好以之掩盖警方的耳目。在这批早期的落难义士方面，借壳上市似乎还相当成功。更令人侧目的是，他们把洪门的组织纲领引进了海峡殖民地。但在借壳还魂上，即排清复明，却又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主要还是虎落平阳，虽没被犬欺，曲高却和寡。若义士林亚泰于1881年去世后还有尚存的其他义士的话，纵尚怀还魂的意志，其与日俱减应是意料中之事。

---

[9] 同注5。

[10] 吴华，安焕然，舒庆祥编，《柔佛义兴史料集 1844–1916》（柔佛新山：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2013年）。

[11] 同注5。

[12] 〈星马华文碑刻系年〉，页19。

[13] 陈育崧，〈引言〉，载陈育崧、陈荆和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页6–7。

第二类型 借壳过渡：从公司到公司

在英国殖民地时代，如前所述，许多的华人秘密结社皆采用“公司”名号。但更早时，“公司”乃是各籍华人的葬丧组织。在旧日的闽粤地区，已流行有“公司”的组合。集数人出资合创事业，盈亏以出资多寡来分摊 。18世纪的西婆罗洲，尤其是在开矿地区如东万律，便出现不少的类似公司，“兰芳公司”[14]便是其中之一。至于在体制上是否和当时的英属或荷属的东印度公司一样，则有待进一步查考。

殖民地时代本地以公司为名的华人组织有两大类：分担经费的殡仪组织，和损益摊分的牟利组织。在早期大规模开矿、开垦工业尚未上轨道时，移民皆设立有不同方言组合的公司，以处理同籍贯乡亲入土为安的善后。在槟城，客属嘉应便成立过仁和公司（1801年）；同时期尚有潮州公司、海南公司等。马六甲的潮州义冢公司、潮州公司（1822年）；新加坡的茶阳公司（1860年）、丰永大三邑公司（1869年）、嘉应五属公司（1887年）、琼崖公司（1878年）、丰顺公司（1887年）等。换言之，管理公冢的原始组织称为“公司”。

饶宗颐早就观察到殖民地的会馆皆源自义冢组织，即地缘互助式的公司。其实，这种公司的原始运作方法，类似民间的“银会”，如1898年槟城五福书院的千益银会所提及的运作方式。这也类似一般民间的互助会。各会员择一数额存钱入会，若有会员因急需用钱，可以献议愿付的利息来借贷。若超过一名献议，放利最高者为成功标得者。其他各会员的存款便从该利率中得利。

此类公司，殖民地政府从不干涉是很自然的。它可能是因此被落难义士看上了，而动起借壳的念头。和胜公司、海山公司、松信公司、义兴公司、存心公司等，不像是和地缘或血缘有什么关系的。只挂“公司”名，殖民地政府便以为也属丧葬一类。直到它们演出大规模暴力事件时，才改变原有的看法。此类事件的发生，十九有武馆的介入。若是，那公司和帮会就相互代名了。

武馆的大量设立，主要是应当时之需。当1850年代劳工大量涌入殖民地后，卖猪仔、开矿、种植、包烟包酒包娼等行业兴起后，带动了垄断与反垄断的活动。武馆便提供了这种服务。这正是公司和武馆相连接，合二为一的时候。那种光景，殖民地政府只见公司，不见武馆：公司就变成帮会了。这可是一个由丧葬组织的公司，演变成行业垄断的公司的过程。

不过，在劳工涌入之前，本地的社会和行业分化却很简单。较早期南来的移民，绝大多数来自低下阶层，也几乎终生仅会说所谓的乡下话。一到南洋后因谋生才发现很多移民不说自家话，那无形中他们只得找同乡帮忙。另在选择学徒制拜师学手艺的，如木匠、水喉、电器、草药、理发、典当、甚至学校等等，因交流频密，雇员所操的方言，很自然的变成雇用的重要条件[15]。这种徒弟职工制度，也自然的催化了方言群认同的萌生。

方言群认同的内涵，不仅局限于所操的方言而已，它包含了一种围绕着一语群的生老病死的次文化。甲群尽管能通晓乙群的方言，如惠州客和增城客，他们日常所认知和实践的风俗，却可会和惠州、增城的广府人相差百里。潮州语群和茶阳语群之差异，该以千里计。学徒还得和师傅一起居住，也得打理好些家庭事务。方言与次文化便构成了方言群认同的概念的元素，也暗喻着行业与方言的密切接连关系。

不过，这时段，即1850年之前，也仅出现这二合一的结丛，武馆或帮会的介入层次尚浅不足道，尚未蔚成气候。

不论义士主导还是一般侨民主导的公司，方言群认同却比虚拟的兄弟情要来得强烈。他们都很自然地、积极地参与。尤其是在华侨人口急速增加的冲击下，社会组织、行业结构也得随着应变。从1840年的1万7000人激增至1849年的2万8000人，再增至1860年的5万人。到1901年时，华侨人口已增至16万人。方言群、行业、公司/武馆这三合一的结丛，更是牢不可破。

移民到南洋的，其所操方言繁多。但许多的冲突，却不是因为彼此所操的方言不同，而是不同方言的群体，蓄意利用他们公司的势力来捍卫把持着既有的行业。那些公司的领导人，多是当地闻人，如甲必丹、会馆要员。

又因移出或被拐卖的苦力都是男性，便促使青楼事业

---

[14] 罗香林，《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页23-32。

[15] 黄枝连，《星马社会史导论》（新加坡：万里文化，1971年），页31-36。黄枝连亦曾做过“星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研究”（见同书页17），对徒弟制度有详尽的分析。另可参阅今崛诚二，《马来亚华人社会》（槟城：嘉应会馆，1972年）；李永球《星洲日报》（吉隆坡，2012年1月30日）。

蓬勃的发展。根据统计，新加坡在1833年至1881年的华人性别比例（差距）最低是1（女）岨7（男），最高时是1岨14.4。青楼事业既营业24小时，很自然的，便得受到24 小时的保护。他们中，多来自说广府话的香港和澳门。方言跟经济利益又绑在一起，故意要“捞过界”的，硬要把两者拆散的，当然得诉诸武力。成败得失，就得看垄断的公司的武馆实力了。政府执法人员，是无法有效地提供此类服务的。有的领导人则选择到公会去评理。

在三州府维护这个结丛的机构，起先多设在庙堂，如恒山亭和青云亭。继后把世俗事务从宗教祭祀分开后，另建会馆和武馆来处理行业垄断的事务；三合一的结丛便开始浮现。这类保卫行业和其工人生计的组织，仿佛是现代工商社会中的“职工会”。不同的是，它们斗争的对象不是顾主（往往是同乡），而是拟瓜分利益的另一方言群。

当连接武馆的公司一旦也参与其事，行业/方言/帮会的三合一结丛便应运而生。本质上，公司主使垄断，武馆则落实公司所托。

接下来，我们将以两个例子来进一步阐释好几个关键词如义士、公司、武馆、行业、方言群认同等。两个例子分别是新加坡和新山的义兴公司。在语群方面，前者的会员来自好几个方言群，后者则几乎是由单一语群所组成。最相似的地方是它们都披洪衣，却都不干洪事。

第三类型　公司与武馆：虚拟洪门

（a）多语群的义兴公司

落脚于海峡殖民地的华侨，他们所创立的秘密会社，到底是反清的洪门帮会，或一般性的自保会社？洪门山堂大佬冯自由曾这么说：“同盟会历年运动，向以南洋为大本营，独不

秘密会社入会仪式

能得义兴会之助，故谓南洋洪门团体与革命无关，亦无不可”[16]。

借壳的义士

冯自由语中有三点值得说明一下，以抖出两会社关系的一些端倪。其一为，洪门把本地的义兴视为同盟会或洪门的堂口。一如其他本地的公司一样，义兴亦采用洪门歃血为盟等的仪式，“披洪衣”。

其二为，他所提及不友善的义兴，是否是被查禁后的义兴？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等南来所接触的华侨侨领，皆是当时各类华人会馆的要员。而这些要员，在经过碑文和社公庙的反

[16]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41。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1 月 18 日

东方与澳洲之间的邮船线启动

清义士名单作交叉比对后[17]，发现不少的义士也正是当时的会馆要员，如董事和理事。乍看之下，义兴和其他本地公司的领导人似是旧日落难的天地会义士。其实，据义兴社公庙神主牌所载，最后一位义士（林亚泰）去世的年代是1881年；且九年后也被查禁了，非本地出生的会员则会被遣送回原乡。孙中山到访，说是由义兴安排是不太可能的。比较可能的是透过香港兴中会和新加坡的中和堂的连线关系，直至1906年同盟会在新加坡晚晴园成立为止。

其三为，1850年之前的义兴，尚处于落难义士借公司外壳的过渡时段。但之后其在本质上则已转型为牟利的组织，一个仅照顾其方言帮群经济利益的总会或公会。

新加坡的义兴公司，提供了一个迁民或义士借壳的例子。新加坡义兴成立于1850年代或更早，1857年购地建立了公司大楼。该公司活跃到1890年《结社法规》（Societies Ordinance）实行时才解散。在这时段，公司内设有置放会员神主牌的灵位堂。依据一般会馆的互助会习俗，那是仅供会员使用的。换言之，非会员的灵位不会被接受。

根据庄钦永的研究，在1857年义兴公司搬进新址时，公司内曾置放过一百多个神主牌，其中有 73位被冠以各类洪门文献中没出现过的“义士”头衔，如“明赠义士”、“候明义士”、“复明义士”等24种[18]。一般的惯例是，会馆或公司本身是不涉及封衔的，那该是家人追封或个人生前的嘱咐。会馆的义务是照单全收，即写什么就收什么。因此，灵牌置放仅说明那73名义士和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有关联，但却不能以此证明该会馆/公司是一个天地会的堂口。

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臆测是，那好几百名因起义失败而逃难到本地的义士，落地后很可能想过在地浴火重生。借壳上市无疑是比较有效的方式，这个壳就是本地的各类华侨宗乡会馆和行业公司，义兴公司便是其一。借壳的手法最成功的一例是，义兴曾被一位义士使得它扶摇直上：他是柔佛开港始祖陈开顺（1803-1857）。生前曾被柔佛王国封为甲必丹（即华人族群总长），逝世后被拜把兄弟追封为“候明义士”。

可惜的是，自从最后一位义士（明赠义士）林亚泰于1881年逝世后，就没有落难义士活动的资料了。

但如前述，致公堂大佬冯自由对义兴却非常失望。冯自由的失望是因为他误把本地义兴公司当着革命的天地会的一环。殊不知各公司经落难义士操舵后到1850年，已经变质：仅“披洪衣”，不干洪事。

总商会的结构

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史德龄秘密结社资料[19]，包含有腰凭、通告、收据、铜板信物、或印章等。有几张通告抬头铭记着“义兴公司”，下接有“义福馆”、“广福馆”、或“广惠肇记”等，看来它们都是义兴的一个组成单位。一张收据志着“义兴馆”，它应是义兴公司的直属武馆。如前述，义兴入会仪式场地的描绘中，正门上所悬挂的匾额题有“义兴馆”三个字。这个馆于1887年还发出一张红色的底银（即会员费）收据给一名清远属（清字无“主”）的会员刘阿福。

另外，在一颗印章上，更刻有“义兴大公司广福馆”。这在组织结构上，显示了义兴公司是一个总商会，或公会，公所，附属其下的乃是各方言群的公司和武馆，

秘密会社印信

[17]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台北：中央研究院，1985年），页125-148。

[18]《“石叻梧槽”五虎祠义士新义》，页5-6。

[19] Irene Lim,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Featuring the William Stirling Collection*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1999). 另可参阅Trocki, Carl., "The Rise and Fall of Ghee Heng Kongsi in Singapore," in D. Ownby and M. Heidhues, *eds. Secret Societies Reconsidered*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刘嘉斌，〈义兴公司信物钱〉《星洲日报》（大柔佛版），2006 年11 月11日。

如广东义兴，潮郡义兴、福建义兴、海南义兴等。

不幸的是，在1885年政府援引了1865年和1885年的《危险社团法令》（Dangerous Societies Act），把潮郡义兴封禁；同样的在1888年封禁海南义兴；复在1890年查封了福建义兴、义福（馆）、广惠肇义兴、海山、福兴（馆）、松柏馆、粤堂馆、广福义记、洪文堂、利城行等社团。这些社团应附属于“义兴大公司”内，它也是最后一间被封禁的华人（危险）社团。枝叶落光后，主干也应声而倒。

把新加坡义兴公司视为天地会组织，除了它采用洪门组织纲领外，也是因为当义兴公司新大厦于1857年落成时，殖民地高官沃恩[20]到那儿参观过。他说大厅里摆着“五祖”或“五虎（将）”的神位；又听说那象征着五大方言群。至于那大厅是专给天地会拜祭开山五祖用的，或也是用来举办喜庆事的，或是武术教练场，云汉心里自有数。

那73名义士的神主牌也置放在“公司内”，可以是一种关联，也可说是巧合，真是百口莫辩。但在学者发现此类神主牌时，从1890 年到1960 年被发现的70年里，它已几经搬迁，流散的资料应该不少。

除了天地会的拟制兄弟情外，当时的方言群认同也很强烈，它把义兴公司都分化成广东义兴，海南义兴，福建义兴和潮郡义兴等。且每群都与某些基本和厚利行业捆绑在一起，反垄断的冲突就屡见不鲜了。比如说，鸦片的营运，本是一种东印度公司所垄断的行业，每两年公开拍卖一次的包销执照，大部分给华人的行业公司获得。义兴公司便是常标得的大公司之一。拥有执照的公司乃广设烟馆，在1820年的牛车水区便见烟馆林立，比米铺还多，约有好几百间。绝大部分烟客是苦力。很显然的，此类行业，包括赌馆、娼馆，必得雇佣会党来作全天候的保护。也因此，行业公司与会党就被视为一体。

在结构上，各类职工会又会结合起来而成为一个“职工总会”，其主要目的是在调协各方言群体在行业上的争议。这和后来的中华总商会里所流行的“帮”的概念很相近，说同一方言的组成一帮，如潮州帮。在更广的文化层次上，则称为“方言群”。新加坡的义兴公司在尚未被解散（1890年）前，似乎就扮演着这么一个协调各帮利益的角色。

有一行业是鲜有被学者提出的，那就是武馆，它应是秘密结社的骨干组织。这种组织其实就是为秘密会社提供武力支援的单位。有张“义兴公司”（横跨顶部）的收据或腰凭上，就在正中间铭刻着“义福馆”，也有铭刻着“义福会馆”的。不过，后者可能是“义福馆”之误，因其县属不明。前者，十九是为授徒而设的武馆，一成是指猪仔馆或摊馆，又称赌馆。而能有效控制猪仔馆和赌馆的，舍孔武有力者其谁？罗香林也发觉，在原乡，摊馆，也挂“公司”之号[21]。

另在所查阅的档案中找到四张收据/通告，铭记有“存心”、“存心社”、“存心公司”和“存心会馆”，好像是四种不同性质的组织。除了公司和会馆因正处演变过程中，而可视为暂时的重叠外，其余两种，不像是那些移民的乡镇名，更不是血缘指标。其中之一，应是武馆之名。另外的有可能是扣留苦力的猪仔馆。所列的内容却都与殡仪丧葬有关。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新加坡义兴公司是一个公会、总商会。有待拟定的是那些所组成的会社的背景。

[20] Vaughan, J. D.,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Mission Press, 1879).

[21] 同注14。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 月 20 日

签订《邦咯条约》（Pangkor Treaty），英殖民地政府在马来半岛各土邦设置参政司，标志了英政权开始由海峡殖民地伸展到马来半岛

第三类型 公司与武馆：虚拟洪门

（b）单语群的义兴公司

在上述田野资料中所了解到的是，天地会义士的确在早期的海峡殖民地活动过约80年：卓立义士陈声实（1789-1864）是元老，明赠义士林亚泰（1823-1881）是有活动记录的最后一位[22]。但促使当地殖民地政府所关注的，是华人社团间彼此的持械殴斗。若这些华人团体都是天地会的堂口，他们的枪口应该是一致对准清政府的，怎会有那么多内讧的帮派呢？

细阅他们殴斗的原因，多是争夺地盘或生意，以及反对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移民不公平的政策；槟城的华人大暴动、新加坡邮局所引起的反政府示威等，便是其中一些例子。本土的华人组织如义兴公司，被卷入天地会事故是有的。有一次，因公司之间在捐助天地会堂口事件上谈不妥而动武；捐助对象是1853年从厦门潜逃到新加坡的洪门小刀会会员。前述冯自由对义兴的不满，以及孙中山派特使到澳洲要求新加坡的（新）义兴资助北伐，也算是天地会事故。

不过，本地的公司是否捐助天地会并不等于它们也是天地会的堂口。换言之，在移民社会中，除了反清的天地会外，应还有其他不以反清为己任，或仅为自保求生的会社。在青云亭和恒山亭内的碑刻文字，包括甲必丹所立的，1830年代及往后，都有采用大清纪年的。此类皇朝纪年的会馆、庙宇公告等，从道光，到咸丰，到同治，到光绪等，都在三州府出现过[23]。此外，槟城海山是反清或保皇，仍有待研究。

有如上述，行业垄断是多类械斗的真正原因。不过，在三合一的结丛环境下，在操同种方言的情况内工作，冲突应会减少。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是18世纪时，创建于西婆罗洲加里曼丹的兰芳公司，和活跃于1844年至1916年柔佛新山的义兴公司。前者是客家人在主持，而后者的绝大部分的成员是潮州人，同是单一语言的会社。

罗芳伯在婆罗洲建立的“兰芳公司”或“兰芳大总制”，是一个开垦和商业公司，是一个客家氏族股份公司，罗香林有专著探讨它的来龙去脉，这里略去不谈。

由于1914年之前，柔佛-廖内王国尚未被并入英殖民地，是个独立王国。其天猛公（国务大臣）依布拉欣（Ibrahim）为积极发展王国内的经济，特别邀请了华人公司开垦王国内的许多河港地带。时在廖内的义兴公司首先响应。新加坡两位义兴公司的领袖陈开顺（后也被封为甲必丹）和陈德海也分别在1844年和1846年获得发展港脚的准证[24]。著名的港主还有陈旭年、佘令财、林亚相和末代领袖林进和。该公司的主要活动除了开垦种植外，也成立了各类事务仲裁及保安机构，以治理华人的业务。该公司也发行流通法币，主要是铜板，俨然是个华人自治区：这便是著名的“港主（港脚）制度”。港主也多标得柔佛苏丹所设的饷码专利权。

在柔佛王国时代的义兴公司，是唯一的合法华人公司。这无形中就为义兴公司塑造了一个特色：唯一的公司。它虽也愿意容纳各方言背景的成员，却还是以潮州人居多。

大臣的儿子阿武峇卡（Abu Bakar 1862-1895）继任大臣，又于1885年受英女王维多利亚封为苏丹。之后，仍没实施一水之隔的英殖民地政府的《结社法规》。继任苏丹的公子依布拉欣（1895-1959；承袭祖父名）反而更坚决的推行“独尊义兴”的政策：其他的公司不论籍贯，若要经营港脚，必须先加入义兴。

不过，在苏丹王朝于1914年被并入英殖民地版图后两年，义兴公司便被通知解散。继后华人便成立了公所。在柔佛王国时代的义兴公司，它岂止是一家庞大的开发公司，俨然亦是一个中华公会。今日的中华公会，可追溯到中华公所，和义兴公司。

前述的港主制度，仅是好几种劳务密集，且在语言上雇员间须能彼此沟通的一种行业。其他同类的行业尚有开矿、种植等。在马来亚内地，应还有其他单语（方言）的公司，如海南义兴、福建义兴及广东义兴等。只可惜有关的资料，却远不如新山潮郡义兴的来得完整。

---

[22]《“石叻梧槽”五虎祠义士新义》，页9-15。

[23]〈星马华文碑刻系年〉，页8-51。

[24]安焕然，〈柔佛政府与独尊义兴〉，载《柔佛义兴史料集1844-1916》，页22-32。

第四类型　帮会与会党

义兴公司已早于1794年在槟城创立，1890年连同三州府的其他各公司被查禁；硕果仅存的柔佛新山义兴公司则迟至1916年被查封。之后，新一轮的接班人却接踵而来。

本地帮会（公司+武馆）被查禁后，由于业/语/帮结丛尚继续运作中，对保全服务的要求也仍殷切，大型的帮应会用新瓶装旧酒，如新义兴。

另外，从1890年到1911年的20年间，尤其是1894年清政府割让台湾等地给日本的《马关条约》签署后，反清的浪潮又被推上新高，兴中会、中和会、同盟会应运而生。其实，孙中山在夏威夷时就参加了洪门致公堂，为“大陆山”堂的堂主。从1894年到1907年孙中山、汪精卫和尤列曾多次造访南洋，并在英属马来亚成立反清会社。孙中山的亲信尤列于1901年在新加坡创立了中和会。无可质疑的，那些结社，都是革命帮会，也当然是秘密结社。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如1923年，孙中山亦曾透过海外帮会，间接地要求（新）义兴公司援助订于1926年展开的北伐活动。

华人帮会在义士林亚泰逝世后仍然活跃着，这可算是一个境内的非法公司和境外的帮会平行共存的局面。本地的公司是因为披着洪衣，虚有其表，却一直以来都常被视为洪门的外围组织。在这时段，到底正统的洪门堂口和拟制洪门的公司有没有擦出火花？值得进一步研究。这些既是爱国（反清）活动，接下来的“爱国帮会”一节，会多加叙述。

全球经济大萧条发生在1929年底，1935年初稍露复苏端倪，但一直到1940年初才完全复苏。在这10年中，马来亚仰赖出口的锡矿及树胶种植业首当其冲，许多同类行业的劳工因此失业。游手好闲的人剧增，维持治安的警力却递减，社会治安每况愈下自不在话下。很自然的经济犯罪便应运而生。这也许是个促成会党林立的主要原因；其中也应有不少是非法帮会变质而沦落的会党。

在1890年之前，包含武馆在内的秘密结社，也不过10来个。而且，多是捍卫一己方言群既得经济利益的帮会。社团查禁三部曲的第一部是1865年推出的《社团注册法令》。其在三州府实施时，相信有不少新加坡的帮会会员已转移活动阵地到新山。较严厉的第二和第三部法令付诸实施时，有更多的会员转移新山是意料中之事。

如上述，新山当时还是受独立的柔佛-廖内王国统治，故未跟进英殖民地政府的查禁行动。由于当时的苏丹独尊义兴公司，虽然义兴是由众数的潮州人主导，却也依法容纳其他方言群。这个语群的局限性被破解后，过去方言群/行业/帮会的结丛便逐渐趋向解体。但在中、北马的情况，这个语群转换过程就可能不太一样。

直到1916年柔佛实施华人社团禁令后，华人才设立了华人公所以处理华人事务。有的帮会则转入地下活动。许多帮会中，有留下迹象的是“新义兴”。这种转换，应视为从帮会到会党的过程。在这个长达10年的转换的过程中，相信有些帮会就重温三合一的共生旧梦，步三州府的后尘，重作法外冯妇。

这个三合一的结丛，最终还是给1930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彻底地粉碎了。1930年代，本地的矿产和开垦业应声倒地，大部分的工人都失业，旧日的方言群垄断行业的现象自然就解体了。过去的帮会也好，会党也好，为了生计，有的死灰复燃，有的另起炉灶。就在这个时段，在殖民地内便出现100多个非法会党。帮会年代结束，犯罪团伙兴起，活跃到1942年日军入侵。新义兴因滋事而出现于1922年至1934年的新加坡警局档案中[25]（包括其公司印章），它的存在才被发现。

[25] Mak Lau Fong, *The Sociology of Secret Societ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34.

第五类型 爱国帮会：民国帮会

爱国帮会乃指海外华侨社会对其国内援助，或保护本地侨胞安危的会社。因时代及因应对象的不同，本质上分成辛亥革命和日军入侵马来亚两个时期。前者是有关孙中山等南来鼓吹建立共和国的事迹，后者则指日侵时期本地帮会/会党抗日保民的活动，有称之为“爱国抗日共同体”[26]。

共和革命帮会

在历史的脉络里，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中和会、同盟会等乃秘密结社，属于反清却不复明的一类。为了招募更多人参加反清的革命运动，社会基层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寻找个体献身则远不如群体参与来得更事半功倍。

洪门天地会这个包罗基层大众的组织，最适合不过了。它不但能提供人力资源，也可筹募资金。最实际的是它到处提供耳目，可随时及快速地安排保护落难的会员。为此，孙中山在夏威夷时就参加了洪门致公堂。19世纪初，档案记录有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和汪精卫曾多次到南洋的造访活动，如1906年，1907年在香港、新加坡、槟城和怡保成立同盟会分会[27]。较早前，孙中山的亲信尤列于1901年在新加坡创立中和会，目的在向新加坡的公司/帮会及工农阶级鼓吹革命。他伪装在新加坡行医时，也是林推迁所主持的怡和轩的座上客。

本地的拟制洪门帮会虽被查禁除名，但国破山河在，旧日的人物资源尚有，只是朱颜改。林推迁的怡和轩，便是一例。

我们会相信同盟会既不复明了，宣誓入会的仪式和涉及明朝的诗歌等，应不会被采用。当要被推翻的清政府被推翻后，孙中山领导的类似天地会的同盟会、兴中会、致公堂，便不可能仍以“反清”作为活动的号召。其他海外的类似组织，如北美的致公堂，是不可能仍揭橥反清大旗来招揽会员及筹款了。其实。当北美致公堂黄三德于1912年上函给孙中山（时为临时大总统）要求回到中国成立政党曰“致公党”时，孙中山的回复却很冷淡，甚至认为致公堂和同盟会的历史应分开来撰述。

原则上，孙中山革命非常倚重洪门。至少，在孙中山逝世（1925年）后至1931年日本伪装经营中国东北时，北美致公堂依然支持他生前所创立的国民政府进行北伐、抗日。之后又支持红军抗日至新中国成立。若南洋华侨的地下组织真是洪门堂口，肯定的必也随时势而改弦易辙。

到底以“义兴”、“义福”、“海山”等鲜见于中国文献的本土会党，是否亦是反清及支持共和的秘密结社？资深的洪门老大冯自由的印象是肯定的，尤其是义兴。亦有谓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之前，有好几百位海峡殖民地的会党分子响应，要从新加坡到香港支援起义[28]。这些秘密结社的成员到底是来自中和会、同盟会，还是英属殖民地的本土华人公司？以年代来看，那些本地的公司、帮会已在1890年全被查禁了。从那时起，它们虽都走入地下，但仍运作如常，仍是和武馆结盟的行业公司。也算是真正的秘密会社，但它们算不算是洪门的外围组织呢？

抗日帮会

就在经济大萧条时，惊天动地的1937年日军侵华“七七事变”发生了。日军继续南下进军南洋。因此，具有天地会知识的便乘机以家喻户晓的洪门名声自立门户。它们披的是洪衣，但表述却不同。爱国帮会便有“华记”、“洪民会”，和其他专以勒索保护费为主的私会党。据说洪民会[29]和华记乃是国民党在1908年或1912年成立之外围组织，沉寂一段时间后，又在日侵马来亚时恢复爱国活动。

日本于1942年侵占马来亚至1945年。兵荒马乱与民不聊生的社会情况，既是经济犯罪的温床，也是报国的契机。当时最具威慑力的会党是“洪民会”（有曰洪门会），会员号称数万人。其创会人及要员为前拟制三合会（如“公司”）会员陈得辉、杨亚咨、蔡应春、梁水冬。在十八丁（Sepetang）活动的类洪门帮会曾多次发挥保护同胞的功能，该会曾歼灭大批入侵该区的日军。其活动范围涵盖了槟城至马六甲海峡沿途的居民和渔民。1946年时，据说仅在槟城及威省，会员人数便达至十万人，大部分都听命于当时的国民党。

---

[26] 邱格屏，《世外无桃园：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北京：三联书局，2003年），页50及多处。

[27] Chan Sue Meng, *Road to Revolution* (Singapore: Sun Yat-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2013), pp.8–59.

[28] Yen Ching Hwang, *op. cit.*, pp. 110–140.

[29] W.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87.

这个“爱国”的概念，在多元种族或移民社会中，当亦可涵盖族群亲和感。如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星、槟）和20世纪50-60年代（星、隆）的种族大暴动，便曾激发了平日相互倾扎的会党的联合抗衡行动，也是一种盗亦有道的表述方式。连同反清革命党于1900年至1929年在南洋所建立的各类帮会，如中和会、同盟会，该些组织可被视为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

日军于1945年撤离后，马共所组成的抗日军获悉洪门帮会曾向一位王姓的商贾购买大批军火，那是日军投降后留下来的，便献议收编该区的帮会，但并不成功[30]。

其实，英殖民地政府班师回马后，却说服了帮会与政府合作，以消灭由抗日掉枪反殖民的马共。岂料政府控制了马共后，却回头来大事逮捕帮会成员。这讯息来自李永球在霹雳州太平的访谈[31]。受访者乃旧日曾在十八丁游弋于马共和帮会的要员，如李瑞容、林龙通和林亚吉等。

大战后到马来亚独立的时段（1945-1957），在1950年代活跃于怡保华林市（Falim）一带的“华记”，很可能就是当年活跃于太平的类洪门帮会。又在霹雳州活动的小八洪、零八等，政治背景则有待查考。该时反蒋拥共的帮会也很活跃，如吉隆坡的“致公党”便是一例。

第六类型　战后的私会党与匪党

第六类的华人会党组织，有不少是在日本投降后延续下来的。战后因物资缺乏，治安败坏，违禁品泛滥，新成立的是一种扰民、牟利、勒索的会党。它们并不采用洪门仪式，但却选择性的应用基本的职位如大哥、老揸、打骰（色）等，以及把洪门的密码108拆散成08、24等来命名。其实，该时会党所采用的名字也五花八门，如四方八面党、303、老永兴、同盟阁等等。其中老永兴的腰凭还印上两面国民党的旗帜，会员姓名以及新加坡住址[32]。

它们的主要活动已不是旧日的方言群工会形式，又无政治意图，而是划分地盘，专向活动于其地盘内的富人、小贩、学生，索取保护费。根据一张新加坡的铁和堂的保护费收据，志明该月（年）捐是二十元。这数额不低，一般高中毕业生的薪金是一百元左右。而不少党员喜欢纹身，送出有党铭记的贺年卡。

在1950年代私会党最盛行，党员经常到中、小学校园鸠收所谓保护费。他们也常在娱乐场所流荡，白吃白喝。那些常受顾客骚扰、且又无法获得警方协助的行业如酒吧、夜总会、按摩院以及娼妓业等，都是鸠收保护费的对象。较后，黑帮多转向厚利的地下市场，如走私和贩卖违禁品。

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两地的会党却还连体。其实，在那个时候，在新加坡干案后的党员，多逃到马来西亚去。地下社会在这时代，尤其是在马来半岛，其一个特色就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会党；华人的到2012年仍有穿洪衣的黑帮。那已是一个犯罪学的课题了。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活跃于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帮会/会党，有持久活动可辨认的有四大类。其中的后三类，由于它们都借用源于洪门的组织框架，遂被一般人误认为洪门天地会的堂口。其实，它们仅披洪衣，不干洪事。可惜的是，由于资料缺乏，目前尚未能确定槟城海山公司的底细：反清或保皇。若是保皇，

[30] 麦留芳，〈洪门秘记初稿〉，载《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卷17（台北：中央研究院，2002年），页1-66。

[31] 李永球，〈星洲广场〉，载《星洲日报》（吉隆坡：2009年11月15日）。

[32] 麦留芳编，〈早期马来亚华人会党之田野资料〉，载《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卷20（台北：中央研究院，2007年），页1-37。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2 月 24 日

大英邮船公司“戈登堡号”撞毁，103 人遇难

新、马华人帮会史就得重写。

此外，帮会应是行业公司和武馆的结合体。由于资料中有“义兴公司”与“义兴馆”两类收据或腰凭，而在公司收据上亦印有和洪门有关的文字，无形中提示了公司时而帮会，时而行业组织。在两者都没志上发出日期的情况下，能确立这个二为一，一为二的时机，将是一个研究上的重要突破。由于本节仍须和传统连接，即所有的行业公司都视为帮会；殖民地政府在1890年所查禁的也都是帮会。

如陈育崧所说[33]，帮会的研究资料还很缺乏，他觉得碑刻文字虽很重要，仍然不能解决帮会的定义问题。他很了解方言帮群和帮会、私会党的差异，故他行文谨慎。但当他提到“陈送”时，却像乱了阵脚，附和报章的报道，说陈送是黑帮。那显然不是官方的定义。撰写华人社会史的颜清湟[34]，在这方面也很谨慎，但在华人公司的黑、白方面，时也有语焉不详之处。

基于仅有的稀薄田野资料，我们认为该时的公司其实是一般的牟利行业组织。它们被视为帮会，主要是因为它们与武馆的共生关系。若往后证明属实，则殖民地的帮会史便得以1850年为始点，而1930年为终点：之前的是避难义士和武馆史；之后为会党史。若主题是秘密会社史，那正是本节所锁定的：1794-1965。从1957年开始，就更接近犯罪学的领域了。

[33] 陈育崧、陈荆和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3-29。

[34] Yen Ching Hwa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p.110.

第三节　一櫂冲开瘴海烟
——新华“士”阶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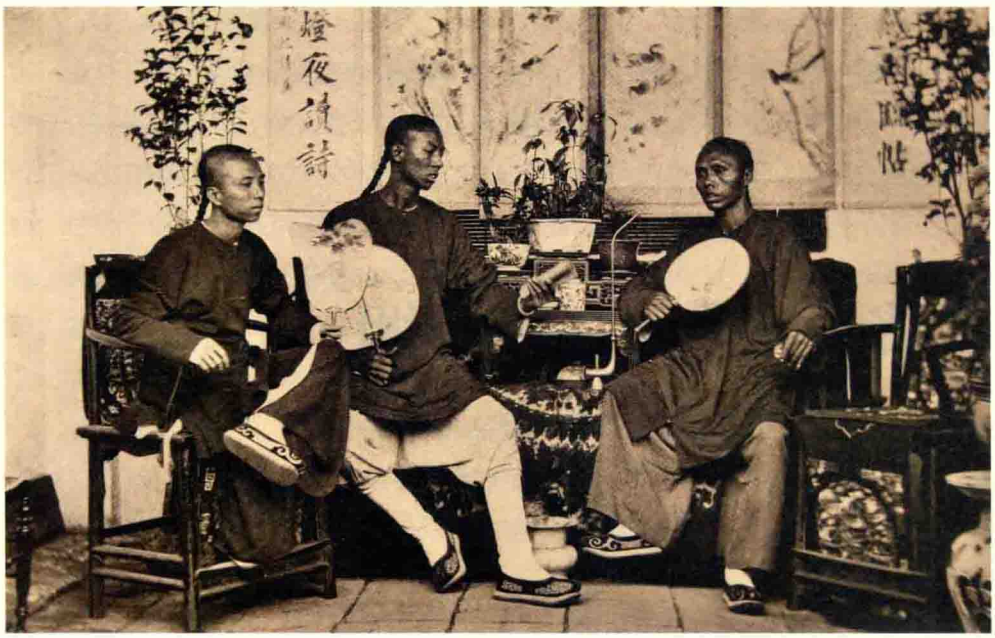
摘要

一般探讨早期新加坡华人历史的著作，皆以商人和劳工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本节以原始文献为基础，发掘出一群深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的文人、教师、医师等，他们组织会贤社及会吟社，每年举办多次酬唱及征文活动，俨然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士阶层”。本节透过对两个会社及其活动的考察，以重现早期新华社会士人的历史面貌及其社会角色。

Abstract

This section examines a group of Chinese scholars, teachers and medical doctors - members of the literati class, and their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social role in 19th century Singapore. Historical scholarship on the Chinese in early Singapore has always been focusing on merchants and coolies rather than other groups. This study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class, based on primary sources such as epigraphic materials and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aims at re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traditional scholars and helping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work and role in early Singapore.

梁元生（**Leong Yuen Sang**）



新加坡的“士”阶层

研究19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最基本的华文史料是碑铭和报刊。前者对于研究早期华社不可或缺，而翻阅1887年至1900年的《叻报》，发觉除了论述和消息之外，尚有许多有趣而琐碎的零星资料，如诗词联语、物价报导、广告启事等，若加以整理，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早期新华社会的面貌。本节所要讨论的，就是从这观点出发，希望透过对零星资料的重新整理，和运用微观的分析方法，为研究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摸索出一条新路。

会贤社课榜名录

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所藏《叻报》缩微胶卷第一卷第1724期开始看（1887年8月19日星期五），很快地在第1725期（1887年8月20日）中就可以见到以下这份名单：

会贤社六月课卷共37名：梁立新、何鸣盛、吴士达、胡□年、颜步青（各赏银一大元）；胡桂臣、李一川、李炳贤、霍超、彭小梁、黄图、蒋鸣谦、萧宝森、吴应谐、龚显祖（各赏银五角）。

这是一份会贤社榜名录。会贤社是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创立的一个文社，目的是培养文风和笼络士人。每月由左秉隆定出题目，称为月课。本地文人学者按题发挥，作文交卷，由领事本人或其他指定学者评定等次，分别给赏[1]。在1887年6月之前的课榜名录，由于《叻报》的散佚而不存，但以后的课题和得奖名单几乎每月见报，中间虽偶有缺漏，经过收集与整理后，得到如上面所述的名单共则之多，兹特将每月课题及得奖名录制表如文后附表（一）。

名录背后的几个关键人物

这份名录中的人数，除去重复者外，大约有300人之多。在未进一步分析此份名录意义之前，先介绍这份名录背后的几个关键人物。虽然这几个人的名字并没有列在这份会贤社课榜名单之内，但却与这份名录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连。

---

[1] 会贤社的规制因无1882年的《叻报》，故不得详。但根据继左秉隆出任领事的黄遵宪所订立的“图南社”学规，应可推见会贤社之月课程序。因为“图南社”是继承“会贤社”的一个相同性质的文会。图南社学规如下：

每月于初一由领事署出题，初十截卷，二十发榜。

社中取列一二等者，照以前旧章由总领事捐廉十元以为奖赏，如佳卷增多，当另行筹加奖赏。

此社无论何人均能报考，各于卷面填写姓名；其列一二等者，于发榜后领卷之时，并须报名（明）住址。

诸生投卷之时，即领回收条一纸，以后领卷及领赏报，均以此收条为据。

社中课卷，现托黄墨林印刷，诸生应课者悉用此卷，以归划一。每卷定价收银二占，以为墨林堂印刷之赀。

以上各条，见《叻报》8279号（1892年10月21日）。

相关人物

章芳琳

历史事件

章芳琳捐献三千元，辟一草坪，即芳琳公园

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会贤社的领导人左秉隆。“会贤社”这个文人组织是他所创办的，“月课”的规则也是由他订立，每月的课题也由他所拟定的，而且他亲自负起大部分的评选甄别的责任。此外，连每月证文的奖金也是他自己掏腰包拿出来的[2]。

先介绍左秉隆其人：左秉隆，字子兴。在1881年至1891年期间，左氏是清朝驻新加坡领事。他在1850年生于广州，15岁入广州同文馆学习英语及各种西学课程，18岁进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译官。先后在广州同文馆及北京同文馆深造及教学。29岁时由总理衙门奏保为都察院都事，加五品衔[3]。曾纪泽1878年奉旨出使英国，请调左氏为驻英使署翻译官。曾纪泽对左秉隆的英文造诣相当赞赏，时常请教，并称“子兴考论其例甚精，非余所及”[4]。其后，也是由于曾纪泽的推荐，他才被派充为清朝驻新加坡领事，授四品衔[5]。

从以上左秉隆的教育背景及早年经历看，左秉隆并非一个传统式的文人：他摒弃科举入仕的正途，入同文馆学习西文西学，而以洋务外交为职志。在当时风气闭塞的中国，可算是一位不类同群的先驱先觉者。然而，我们并不能因左氏的措意西学及投身外交，便认为他忽视传统或旧学不深。反之，左秉隆对传统文化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与负担。他不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且对吟诗作对有所偏好。12岁时就跟从名士樊封学习古文诗赋，以后一生宦海浮沉、星槎万里，皆时有吟翫之作。后人为之结集出版，名为《勤勉堂诗钞》[6]。由此可见左秉隆实在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开明之士。

左秉隆于1881年秋抵达新加坡。他出发上任前，曾纪泽有《送左子兴之官新嘉坡领事》诗两首，其一如下：

花萼初春日未中，左郎天矫气成虹；
藏身人海鸡群鹤，展足天衢凤勒骢。
涵养生机宜守朴，指挥能事莫矜功；
旅亭无物装行箧，赠汝箴言备药笼[7]。

左秉隆也和诗一首《次韵留别曾劼刚通侯》：

萧萧风雨卧庐中，只有精诚贯白虹；
讵意南山藏雾豹，却来西域逐云骢。
酬佑不易姑言志，寡过犹难况论功，
一字千金仁者赠，书绅仍合碧纱笼[8]。

左秉隆在新加坡担任领事10年，颇受当地华侨爱戴，《叻报》有云：“左子兴太守理事新洲，政绩循声，莫能枚举”[9]。陈育崧曾列举其政绩之大者如下：（一）贩卖猪仔的取缔；（二）妇女的保护；（三）海盗的破获，以及（四）振奋文教[10]。而后者更为左秉隆用力最深而贡献最大之所在。

为了振兴文教，左秉隆一方面鼓励办学，使得华侨子弟有接受传统文化的机会。在左秉隆莅新之前，新加坡只有一所传统学塾——萃英

---

[2] 左秉隆捐俸作为月课赏金之事，除图南社学规可资旁证外，还有直接说明左氏捐金之举者，见左氏友人卫锦生诗：“使君海外宣威德，令我钦迟已十年；爱客共倾浮白盏，怜才不惜选青钱”。在此卫锦生有注云：书院月课，凡列前茅者公以鹤俸奖于花红。见《叻报》2363号（1889年10月5日）。

[3] 关于左秉隆生平事略，见〈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载左秉隆，《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页1-8。

[4] 李恩涵，《曾纪泽外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页25。

[5] 陈育崧，〈新加坡中国领事设置史〉，载《椰阴馆文存》卷一（新加坡：南洋学会，1964年），页116-117。

[6] 关于《勤勉堂诗钞》之于1959年得在新加坡出版，陈育崧实奔走有功，并得商衍鎏及曾希颖赐序，其经过大略见黄荫普之“记事”，收录于《勤勉堂诗钞》之后。

[7] 朱杰勤，《〈新加坡风土记〉的作者李钟珏》，载《亚洲文化》期5（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84年4月），页5。

[8] 同上注，又见《勤勉堂诗钞》，页99。

[9]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载《椰阴馆文存》卷一，页123，又见《勤勉堂诗钞》，页7。

[10] 〈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页123-125；《勤勉堂诗钞》，页4-7。

书院，但在左秉隆鼓励下，兴学运动展开得如火如荼，培川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屋等纷纷成立，弦诵之声，相闻于道，如1890年《叻报》所记："叻中书塾，除自请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11]。

另一方面，左秉隆致力于设立文社。文社的作用在于呼朋啸侣，舞文弄墨，以道德学问互相砥砺，以诗词歌赋抒怀述志。这种以文会友集会结社之风，在传统中国的士人社会里甚为流行，但在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商人势力最盛，士人文士不但人数不多，而且社会地位不高。直到左秉隆大力提倡传统文化，振兴学术风气后，士人才得以逐渐抬头，得到社会上其他阶层的尊敬。

左秉隆创立的文社有好几个。除了"雄辩会"（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是以英语为媒介、以海峡侨生（即峇峇Baba）为对象外，其余皆以振兴华人传统文化及拉拢传统士人为目标。成立最先而活动最多的就是会贤社。它在1882年成立，除了例常卧会，每月皆有"月课"，由左秉隆出题课士，这也是传统中国书院的习例，如现代的征文比赛。在中国社会中，课卷多由书院教习或地方学官评阅，但身为领事的左秉隆，为了推动教育及振兴文风，往往自己批阅文稿、评定甲乙，而且常常至深夜不寐。有诗为证：

欲授诸生换骨丹，夜深常对一灯寒；
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12]。

左秉隆性好吟诗作对所以又有会吟社的创立，使嗜好此道者有一共同酬唱、相互切磋之所。会吟社的创立年份不详，估计约在1889年4、5月间。该年4月，毓兰书室成立，并且以"毓兰"二字公开征求对联，结果得楹联共186对。左秉隆受邀为此次征联的裁判，并且做了六副联语送给书室。这六副联语是：

毓德养才书为至室
兰滋蕙树室有余香

毓德克勤乃能成德
兰香虽远不及书香

毓秀钟灵地接鹅湖成鹿洞
兰芳桂蕊香飘谢石切燕山

毓粹风襟含清词韵
兰亭书法杜甫诗名

毓粹含和人师特表
兰台石室典籍攸藏

毓寅幸作男儿须立圣贤功业
兰甲深培异域回殊桃李风姿[13]

由于这次征联的反应热烈，左秉隆乃与毓兰书室负责人王道宗等进而组织会吟社，并且仿效会贤社之例，每月以二字为题征联，得奖者除了获得赏金外，名单也在报上刊登。左氏除了出题和评阅外，也常有示范之作。例如：

（1）联题：朋友

兽二共为山中友
鸟三同作树中朋

又：

不如己者真无友
自远方来定有朋[14]

（2）联题：深思

深锁蛾眉愁不语
慵梳蝉鬓苦相思

又：

深心洞达劳深想
细目条分费细思

又：

深由浅入方为学
智与愚殊只在思[15]

（3）联题：乞巧

乞巧何曾真得巧
卖痴却似反成痴[16]

[11]〈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页123。
[12]同上注，又见《勤勉堂诗钞》，页243。
[13]《叻报》（2215号1889年4月15日）。
[14]《叻报》（2354号1889年9月17日）。
[15]《叻报》（2354号1889年9月26日）。
[16]《叻报》（2319号1889年8月15日）。

会贤及会吟社之外，又有乐善社，在1880年初成立，是否由左秉隆创办，不得而知，但由于它的主要任务是“宣讲圣谕”[17]，那是左秉隆职责所在，自然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而言之，左秉隆是与会贤社最有关系的人，随着他的离任，会贤社也于1891年解散，下任领事黄遵宪另外组织图南社，虽然性质相近，却是名字不同的一个新团体了。

会贤社名录后面的另一关键人物是叶季允。叶氏原名懋斌，号字行，当时是《叻报》的主笔。叶季允本籍安徽，自少流寓广东，在来新加坡当《叻报》主笔前，曾经在香港《中外新报》任职。1881年薛有礼创办《叻报》，乃招叶季允来新，一直担任主笔前后40年，故陈育崧称之为“南洋第一报人”[18]。

叶季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热心。他是养正学堂的发起人，是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中诗文界的祭酒。《叻报》中常有诗作发表，偶尔也替会吟社评阅对联。19世纪末诗人丘逢甲访问新加坡时，对叶氏极为赏识，并赠诗数首，其中三首如下：

平生风义柳堂门，
雄直依然粤派存；
谁料南荒柔佛国，
听松庐尚有诗孙！

万里飞腾志未乖，
海山苍莽遣吟怀；
他年岛国传流寓，
诗屋人寻豆腐街！

廿载风尘粤客装，
皓公山色郁苍苍；
自来海外称诗老，
更望垞城作故乡[19]！

叶季允是否会贤社的中坚分子，因史料不详，毋从得知。但毫无疑问地他对会贤社的活动是极力支持的。除了前数年的《叻报》因散佚而不能作为根据外，其余1887年至1891年叶季允主编的《叻报》都对会贤社的活动有着详细的报导，几乎每月的月课课题和得奖人名单皆刊登其上。不但如此，《叻报》也选登了一些优秀的会贤社月课课卷，如1887年7月份

成立于1880年的乐善社是“宣讲圣谕”的地点

[17]《叻报》（2316号1889年8月12日）。
[18]《椰阴馆文存》（卷二），页397。
[19]《叻报》（5485号1900年3月27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4月1日

海峡殖民地加入万国邮政联盟

第一名卢满的文章〈政贵与民同好恶论〉及1888年3月份第一名黎镇铎的作品〈子以四教文〉[20]。《叻报》的报导和宣传，在在地提高了会贤社的声誉和引起了更多人对传统文化发生兴趣。

除了左秉隆和叶季允，还有一些人和会贤社及上列的会社名录有着重要的关系，他们便是月课课卷的评判。上面说过左秉隆领事是每次月课的出题者，也时常担任阅卷评审的工作，但间中因公务繁忙，或是其他原因，左秉隆也有请其他鸿儒名士，来帮他作评判的工作。根据资料显示，做过会贤社课卷评审人的至少有力轩举、刘长卿二人。力轩举为福州孝廉，左秉隆甚赏识之，“有相见恨迟暮”及“使我心倾慕”之诗句，并聘力氏为其子的家庭教师[21]。

也有一些从中国来新的访客或为左秉隆的故旧良朋，或是著名的骚人墨客，在新逗留期间，皆多有参与会贤、会吟二社之活动，如刘少希、卫铸生、田嵩岳、慧堂及宋剑峰等人[22]。他们与左秉隆及叶季允互有诗句唱和，然而是否有参与阅课卷的工作，则无从得知了。

会贤社名录的分析及其启示

上文述及与会贤社有关的几个关键人物，现在让我们讨论这份会贤社名录并分析其意义。

上列会贤社月课名录并不完整，因为会贤社的月课早于1882年就开始了，但因《叻报》散佚，故名单也随之而失。这份名录乃是从丁亥年（即光绪十三年）六月份（1887年8月）始，迄辛酉年（光绪十七年）五月（1891年6月）。除了中间有数月缺漏外，共得月课得奖名单35份，另一份（1888年3月）只记录首名得奖者。

换言之，这份名录是36次会贤社月课的得奖名单。每次参加月课提呈文章的人数大概有30余人，最少的一次只有22份课卷（1888年1月），最多的一次有47份课卷（1890年6月），每次得奖人数例为15名，分甲乙丙等，甲等通常取5名，赏金1元；乙等10名，赏金5角；间中也有例外只赏10名的。

这份名录并不包括所有呈交课卷的人，而只是得奖人名单，故可以估计参加月课的总人数可能在千人之上。这份得奖名单则共达514人。但因为名单中有许多人名是重复出现的，所以实际上名录中只有219人。换言之，有很多的人重复地参加月课，并且多次得奖。其中得奖最多次数者是吴士达，在36次月课中，有24次名列榜上。其他多次获奖者有：

吴达文	15次	蒋鸣谦	5 次
黄　图	10次	区铁泉	4 次
章瀚斋	7 次	夏之时	4 次
许朝凤	6 次	区锡增	4 次
颜步青	6 次	陈墨农	4 次
谢庆元	6 次	赵舒翘	4 次
李一川	6 次	黄书香	4 次
吴成金	5 次	刘鸿斌	4 次
潘百录	5 次	颜参峨	4 次
刘云楼	5 次	许佳培	4 次
傅日新	5 次	颜宫耀	4 次
金重羽	5 次	许金声	4 次

其余得奖两次及三次的，更多得不可胜数。由此可见，会贤社的活动有一批非常热心的支持者，而其他人数也不少。如果把会吟社征联的得奖人名单计算在内[23]，或者1887年以前的会贤社月课名录仍然保留下来的话，这群人的数目估计至少有数百人或上千人之多，至于参加人数则会更多了。这些文人能写八股制艺，又能吟诗作对，显然属于传统的“士”的阶级。在19世纪80年代的新华社会中，大部分的人是商人及劳工，识字不多，却出现了这样一个人数相当多的士人集团，这是一个相当重要而又为前人忽略的社会现象。

---

[20] 卢满，〈政贵与民同好恶论〉，载《叻报》（1774号1887年10月17日）；黎镇铎，〈子以四教文〉，载《叻报》（1939号1888年5月12日）。

[21] 左秉隆，〈赠力轩举孝廉“诗“〉，载《勤勉堂诗钞》，页9。至于力氏充当评卷之责，则载《叻报》（2835号1891年5月8日）。

[22] 关于刘少希、卫铸生、田嵩岳、慧堂及宋剑峰诸人在新加坡与左秉隆、叶季允等人唱和之诗句，载《叻报》（2377号1889年10月22日）、（2352号1889年9月24日）、（2356号1889年9月28日）、（2344号1889年9月14日）、（2366号1889年10月9日）、（2371号1889年10月15日）、（2400号1889年11月18日）、（2452及2453号1890年1月31日及2月1日）、（2457号1890年2月6日）、（2497号1890年3月25日）、（2198号1889年3月26日）及（2333号1889年8月31日）等。

[23] 会吟社每月征联得奖人名单，见本文附录。

这个士人集团的出现，是两个条件混合起来而造成的：一是中国文人的南来，二是本地知识分子的兴起。

中国文人在早期甚少到外国游历，更少作永久移民的打算，这是儒家安土重迁思想影响使然。但在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移民潮的兴起，也有少数的知识分子因不满清朝的社会政治而流寓海外者。到了19世纪后期，尤其是新加坡设领之后，我们就可以见到更多的文人学者南来，有的是为了访友，例如李钟珏[24]，有的是为了游历，如田嵩岳[25]，也有的是为了筹赈，例如卫铸生[26]。当然也有的是到本地来谋生的。尤其是左秉隆大事兴学之后，学塾书室纷纷开办，对教书先生的需求也就大为增加了。《会贤社月课名录》中人的传记资料甚少，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些人是当时书塾的教师，例如萃英书院的王攀桂、王云桂[27]，和毓兰书室的王道宗[28]。

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和宗乡组织的建立，本地华人对传统文化也较为关注。但文风和教育的丕振，则主要是左秉隆等热心人士努力推动的结果。由于得到最高官员的鼓励，华商纷纷捐资兴学，使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更有不少华商出资遣送子弟回国接受教育，希望循传统科举路线争取功名，如恒春号邱正忠送其子邱菽园回籍受教应考[29]，谦源公司黄福（甫田）送其子黄景棠（黄兆楠）返国读书中举[30]，都是明显的例子。1890年新加坡才子吴锡卿（可能是《名录》中的吴达文[31]）归国应考，文人多以诗歌送别，成为士林佳话[32]。由此可见，在19世纪最后的两个10年中，已有不少本地文人崭露头角，可与中国南来的文人媲美。

除了中国南来及本地培养的士人外，也有一些是从商人转化为士人，或是既商亦士的人物。像“丰裕”号东主及“振裕”号股东之一的李清辉，在19世纪60年代是个非常活跃的中

---

[24] 李钟珏，字平书，上海人，为左秉隆挚友，1887年到新加坡访问，著有《新加坡风土记》一书，为研究十九世纪后期新华社会的重要文献。

[25] 田嵩岳，名均，又号晚霞生。四川成都人。他在1889年以南游，在新加坡与左秉隆、叶季允等人有诗唱和，并自著〈晚霞生述游〉一文，刊于《叻报》（2443号至2445号1890年1月10日至1月13日）。

[26] 卫铸生，江苏常熟人，号破山冷丐，1889年以办浙江赈捐事到新加坡，其酬唱诗作散见于《叻报》（2352号1889年9月24日）、（2356号1889年9月28日）、（2344号1889年9月14日）、（2366号1889年10月9日）、（2371号1889年10月15日）、（2369号1889年11月13日）及（2400号1889年11月18日）等。

[27] 王攀桂，又作王板桂，约于19世纪70年代加入萃英书院的教师行列，19世纪末年升任为萃英书院的负责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他的名义发表萃英书院开办祝校启事一则，见《天南新报》1900年4月19日。他的名字除了出现在“会贤榜”，也常出现在会吟社联榜之中，例如1889年9月17日《叻报》（2346号、1889年12月19日第2427号、1889年9月26日第2354号）等所发表之会吟社联榜上，王攀桂都得第一名，其各联云：1（朋友）“友能规过方称友，朋比为奸不是朋”。2（深思）“深纯学问由勤读，绝妙文章在巧思”。3（左右）“右戚比干怀象魏，左贤胶鬲举鱼盐”。此三联为夺魁之作。王氏联语尚有多种，不一一尽录。

[28] 王道宗，珩山人，毓兰书室开办时由他出名公布联榜，由此推测其为该书室之负责人。见《叻报》（2215号1889年4月15日）。

[29] 邱菽园，名炜萱，以字行。1874年生于福建省海澄县，其父邱正忠早年来新经商，经营米业。邱菽园在中国出生，七岁南来，因性好诗文，其父乃遣送回乡接受传统教育，并参加科举考试，中了举人。其事参见1985年3月3日《联合晚报》之《大特写》。

[30] 黄景棠（原名黄兆楠），是新加坡“谦源公司黄福封之少君，生长星洲，丁酉科（1897）拔贡，朝考以知县分发河南，留粤与邓孝廉家让、陈茂才芝昌力办时敏学堂，固最留意学堂之人也”。见《天南新报》1901年12月14日。

[31] 吴锡卿，又作吴席卿，回中国应考前左秉隆也有诗相赠，见《勤勉堂诗钞》，页126。笔者推测其为《会贤社月课名录》中的吴达文，因为1890年前吴达文曾多次在会贤社月课课榜上出现，但1890年之后则不再看到他的名字了。而另外一位吴必达，则在1890年之后仍在《名录》中时常出现，故推测吴席卿即吴达文。

[32] 例如《叻报》（2219号1889年4月19日）有梁耀流《送君席茂才旋闽赴七律》：“才如江海气如虹，旷览山川眼界空；少伯生涯余伟略，班侯事业属英雄。南游已历三千里，北上还搏九万风；把酒临岐何惜别，早期归去步蟾宫”。从诗可见吴席卿亦为中国南来之士子。另送别吴席卿诗又见《叻报》（2591号1890年7月14日）。

介商人。但自从参与萃英书院的工作后，就热心推动传统教育，自己也“有志于中原之学”[33]。到了晚年，除了屡次捐助经费给萃英书院，还有多次亲任考试官，到院考核生徒，试以诗联、书札或诘以章句，评定等差[34]。当中国名士卫铸生访新时，李清辉殷勤款待，并作诗以记之：

快哉宗国到耆英，何幸披云见客星；
天老奇材成晚节，人逾花甲等年青。
驰观异域曾沧海，涉尽山河若户庭，
他日条陈中外事，群公推许法先型[35]。

李清辉及邱菽园之外，章芳琳家族也有不少子弟挤身士林，例如会吟社联榜中就有章芳源（元）和章壬宪，就是章芳琳的弟弟和儿子[36]。至于会贤社名录中的“宪壬”及其他章姓人物如章瀚斋、章庆墉、及章廷让等，是否有着关连，则甚难确定。另外一位新加坡华族巨商胡璇泽（胡亚基，又名黄埔）的儿子胡心存，亦是一位既商亦士的典型人物，他常常在家中招待往来的中国官吏和狂士骚客。1889年卫铸生有诗一首〈胡心存别驾招饮漫赋一律〉：

折简招邀绮席开，一时吟展印苍苔；
升堂佳客及狂客，入座仙才杂鬼才。
赌酒直呼明月下，催诗不觉玉山颓；
天涯万里逢高会，乘兴何妨扶醉回[37]。

胡心存自己也喜欢舞文弄墨，在会贤社名录中，他的名字作胡荫荣，只出现过一次，但得到1888年5月课榜的第一名。该月的课题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38]。

至此，我们可以归纳以上有关会贤社名录的讨论为以下数点：

- 从会贤社名录显示，19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已经出现一个人数颇众的“士人集团”。
- 这群新华人士的基本形态与传统中国的文人儒生没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熟读儒家经典（从课题多取自儒家思想一点可以看出来），而且善诗能文，更有部分以回中国应科举、求功名为人生的目标。
- 这个“士人集团”由于和官府（以左秉隆的领事署为中心）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得到官吏的支持和报章的鼓励，因此在社会上建立了一定的誉望。正因如此，才会有商人转化为士人，以及商人子弟加入这个集团的现象。

会贤社课榜与其他名录之比较观察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由会贤社课榜，看到一个为数颇众的士人集团在19世纪后期的新华社会中出现。但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对这个士人集团的个别成员所知不多，只知道有些是中国南来者，也有些是本地出生者，有些是教书先生，也有些是商人子弟。虽然他们在社会上算得上是荣誉阶级，但在整个新华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社团和乡团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们能否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或“士绅”一样，起着领导性的作用？

在缺乏传纪资料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是不容易解答的。由于这些问题与19世纪末新华社会的权力结构与领导层有关，我们在这里尝试用比较及反证的方法去探讨上面的问题，即是拿这份会贤社名录和当时及稍后新华社会的领袖层去作比较观察，希望藉此可以了解这个士人集团在新华社会中的地位。

第一份值得我们注意的19世纪新华社会领袖名单是杨进发所提供的，他在〈十九世纪的新加坡华人领袖〉[39]一文

---

[33] 李清辉，祖籍福建省永春县，生于马六甲，19世纪中叶到新加坡从事商业活动，其弟李清渊，为商界闻人。李清辉虽为侨生，但对传统中国教育非常热心。“有志于中原之学”，为《叻报》主笔叶季允对李清辉之评语，其生平见梁元生，〈李清辉与《东游纪略》〉，载《南洋学报》（新加坡：南洋学会）卷39，第一、二期合刊（1984年），页34。

[34]《叻报》（2151号1889年1月17日），又见梁元生上引文。

[35] 梁元生，上引文，页38注12，又《叻报》（2378号1889年10月23日）尚有李清辉赠卫铸生的另一首诗如后：“瀛寰欲遍戒微尘，阅历蒐奇回迈伦；笔气纵横青媲勇，风流跌宕玠前身。山川图画罗妥胸低，人物诗意大雅轮，漫以珠玑持赠我，阳春岂易和频频”。

[36]《叻报》（2417号1899年12月7日）及《叻报》（2427号1889年12月19日）的会吟社联榜。有关章芳琳之生平以及其家族之事迹，见林孝胜〈无帮派色彩的慈善家章芳琳〉，载玉成等编《芳林今昔》（新加坡：芳林区公民咨询委员会，1977年），页22-25。

[37]《叻报》（2427号1889年12月19日）。

[38]《叻报》（1988号1888年7月10日）。至于会贤社榜上的胡秩荣、胡浚荣、胡崇荣诸人，是否胡氏亲属，待考。

[39] Yong Ching Fatt, "Chinese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in Hsin-she hsieh-pao," *Journal of the Island Society*, Vol. 1 (December, 1967), pp.1-18

中，列出了19世纪新华社会的15位领袖，他们是：陈志生、蔡沧浪、陈笃生、佘有进、陈金声、胡亚基、章芳琳、陈明水、陈金钟、陈成宝、颜永成、佘连城、陈若锦、林文庆、和宋旺相。而由陈金钟起以后诸人，则为19世纪后期新华社会之领袖人物。

在杨进发另外一篇研究20世纪早期新华社会领导层的文章中[40]，他又列举了以下各人为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新华社会的领袖：陈若锦、佘连城、林文庆、李浚源、宋旺相、黄瑞朝、许山兴、陈祀仁、黄兆珪（以上来自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张永福、吴寿珍、蔡子庸、林维芳、张善庆、廖正兴、林秉祥、陈嘉庚、陈仙钟（以上来自中华总商会）。

在这两份名单中，完全没有一个来自会贤社名录，也没有一个名字曾经在与会贤社名录性质相近之会吟社榜名录，及图南社月课名录中出现过[41]。由此可见，以会贤社为代表的士人集团不但在19世纪末未能挤身新华社会领导层中，而且在20世纪初年还是不能打进领袖圈中。

不过，话说回来，会贤社名录中人未能进入上述两份新华领袖名单之中，并不为怪，因为杨进发文中所举诸人，都是19世纪及20世纪新华社会的“巨头”，是影响力甚大的“超级”领袖，连一些名气颇大的早期人物如薛佛记、李清辉、邱菽园等都未列名在内。

因此，我们便得进一步发掘这些“巨头”之下的领导人物。在19世纪后期的新华社会，这些人物来自各帮派、乡团和社团的负责阶层，即是会馆和公所的董事和值理。

势力最大的福建会馆，早于1860年由天福宫逐渐改组而成，初时由陈金钟领导，直至1892年陈金钟去世时为止。可惜其他董事名单不存，无从比较。在福建会馆之下，最有影响力的闽人集团则是永春会馆，在1876年创立，1890年注册。在1905年会馆扩建后立有碑记，我们从其中可得19世纪末期及20世纪初期会馆之领袖人物。碑记共录“前董事”及“新董事”名单两份。“前董事”是：颜奇标、颜甘平、颜尊益、陈英佐、陈日安、陈维新、吕基□、李耀立、章孝渺。“新董事”是：颜煌年、张文焕、李家堵、李家廉、颜文□、郑世高、陈文砖、姚士偶、郑文搏、林采达、郑成东、黄文玉[42]。其中只有李家廉和林采达两人与文人时有来往，其余诸人和会贤社、会吟社都扯不上关系。

至于其他帮派在19世纪时创立的会馆有冈州会馆、义安公司、琼州会馆、宁阳会馆、丰顺会馆、惠州会馆、南顺会馆等等。现在留存下来的会馆董事名单并不多，只有下列几份是属于19世纪后期或20世纪初期的：

琼州会馆（1857年创立），19世纪后期领袖名单[43]：

王永祥、周道炽、郑志禄、吴志裕、郑中纶、杨家润、龙士章、韩誉準、黄可辉、吴学龙、韩清甫、文进炯、林鸿儒、林之釗、郑志明、周缵隆、邢祖谟、吴时裕、冯辉昌、韩惠封、王业楼、郑光聪、庐毓章、陈昌禄。

南顺会馆（1889年成立），发起人名单[44]：

梁敏修、杨星堂、陈进福、李星南、邱雁宾、陆寅杰、邓仲航、陈伯川、陈竹朋、陈赞明、刘以甲、简英甫、马勤甫、钟泽泉。

在1911年至1912年，南顺会馆发起重建募

[40] Yong Ching Fatt,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1900–1941,"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History* (November 1968), pp.258–285.

[41] 会吟社联榜及图南社月课名录，见文后附表（二）。

[42] 陈荊和、陈育崧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页211–212。

[43]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页65。

[44]《新加坡华族会馆志》，页53。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 月 21 日

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成立，会员 131 名

捐运动，其时的理事为[45]：

梁敏修、杨星堂、陈进福、谭拱之、陈竹朋、刘铭、李星南、邱雁宾、陆寅杰、陈赞明、李爵廷、刘以甲、谢树春、邓瑞泉、冯恩、高丽生、黄鸣臬、简英甫、陈伯川、冯芹圃。

中山会馆（1838年成立），光绪初年理事及协理名单（1875-1880）[46]：

总理：张春田

财政：何竹轩

协理：黄有成、邝造、郑之、何显、蓝成、吴华根、阮华可、李锦川、郑经泉、冼开富、冼坤达、陆带、冯会、张贵芳、黄业良。

又，中山会馆于1899年重修，其时总理为黄有成，协理是何竹轩、邝造及郑之。

1910年总理为张振南[47]。

应和会馆（1822年创立），1875年董事名单[48]：

总理：罗翰诚

副理：梁振丰、刘兆香、梁德、陈源裕、谢元、朱训、刘恒兴、汤广生、邓裘轩、彭永昌、夏杰儒、黄锡吾、谢福昌、王祥、刘寿、谢荣年、温其兰、谢谦元。

番禺会馆（1879年创立），初期董事名单[49]：

大总理：胡南生（胡亚基）

副总理：谭合兴、正三福、胡金好、李松森、黄纪亭、福隆号。

值理：福昌号、梁亚记、周桂华、陈祥、曾卓湘、周洪、凌始谦、马根、曾戊寅、陈永义、周旺、区荣、黎翁、冯子凌、梁亚、杜保、颐泰号、苏盛、曾社林、梁水、曾顺意、郭洪、李炽坤、梁福、黄晓东、李润秋、黄祥、邓暄、曾驹、卢不亭、陈桢、茂兴号、简培培、刘景恒、曾大、梁带、李应辉。

丰永大公司（1888年创立），领袖名单[50]：

公司创立时之信托人如下：

张有始、杨克诵、胡祠达、谭东合。

1906年重建后：

总理：陈龙祥、张光韶

副理：何云卿、陈龙昌、邓朝宗、张荣森、胡耀昌、谭增振、吴寿山、蓝贲臣、刘晋廷、杨笃臣。

尚有其他会馆董事名单，不一一尽录。

单从以上几份会馆领袖名单，再参考比较其他宗亲会、寺庙、义冢、善堂等总理和董事名单[51]，可以清楚看到会贤社所代表的士人集团和代表地方势力的帮派领袖，几乎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群体。名字同时出现于两种名录之中的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如章芳源及陈宪章（如果会吟社联榜中的宪章真的是陈明水的话）。

由此推论，19世纪末期的新华社会，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因经过左秉隆、黄遵宪等人大力提倡之后而得到勃蓬的发展，文风大盛、学塾增加，以及士人阶级逐渐受到社会的尊崇，但商人并没有把社会上的领导权交出来，把新华社会变回传统中国的士绅统治的社会。士人阶级受到尊重，和传统的功名受到尊重一样，因为会带给家族更高的体面和荣誉。所以商人不但有鼓励子弟转化为士人的倾向，也有争购功名顶戴的风气[52]，但士人只是一个“荣誉阶级”，只是商人领袖所要的锦上添花，归根究底，经济势力仍是控制新华社会权力的主要因素，至今犹然。

---

[45]《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215-218。

[46]《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页55。

[47]《新加坡华族会馆志》，页56。

[48]《新加坡华族会馆志》，页51。

[49]《新加坡华族会馆志》，页84。

[50]《新加坡华族会馆志》，页90。又参见《新加坡华文碑铭记录》，页151-152。

[51] 可参阅吴华及陈荊和、陈育崧二书，此外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页154-190内〈新加坡华文铭刻集录初编〉一文中亦提供一些新华领袖名单如同济医院总理、保赤宫总理、福德庙总理等名录，皆可比较。

[52] 颜清湟著、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51-87。

附表（一）《会贤社课榜名录》

年	月	课题	卷数	得奖人数	得奖人名单（由第一名起顺序排列）
光绪十三年（1887）	六月	〈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论〉	37	15	梁立新、何鸣盛、吴士达、胡□年、颜步青（以上各赏银1大元） 胡桂臣、李一川、李炳贤、霍超、彭小梁、黄图、蒋鸣谦、萧宝森、吴应谐、龚显祖（以上各赏银5角）
	七月	〈人皆可以为尧舜说〉	33	15	蒋鸣谦、李一川、李天鸣、黄图、罗泉英（各赏银1大元） 颜步青、何鸣盛、吴士达、梅之华、陆云峰、张乘时、霍超、何敬文、彭小梁、李凌云（各赏银5角） 卢满（赏2元）
	八月	〈政贵与民同好恶论〉	30	14	李一川、蒋鸣谦、吴成全（各赏1元） 颜步青、吴士达、林思斋、卢钟灵、甘棠、曾瑞元、张图、黄图、黄捷元、邱增荣（各赏5角）
	九月	〈臣事君以忠〉	31	15	彭晖南、黄图、吴士珍、吴士达、蒋鸣谦（各赏1元） 章浩如、李一川、颜步青、刘尚文、杨丹书、章廷让、林绍昌、王敬承、吴子为、苏良（各赏5角）
	十月	〈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缺）
光绪十四年（1888）	正月	（缺）	22	15	陆道亨、林福山、洪南英、陈畴、蒋鸣谦（各赏1元） 蔡蔚农、黄植、刘楚楠、吴士达、廖莹、策再馨、黄图、潘祖荫、叶荫、余香谷（各赏5角）
	二月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39	15	王沛霖、吴士达、李梅、陈道亨、洪南英（各赏1元） 黄江汉、黄钟俊、黄植、陈畴、颜步青、章庆墉、陈南金、朱受采、谢恩维、吴焱（各赏5角）
	三月	〈子以四教文〉			黎镇铎（第一名） [余缺]
光绪十四年（1888）	四月	（缺）	34	15	胡秩荣、黎镇铎、胡友梅、吴达文、黄辉阁（各赏1元） 胡荫珏、胡乃来、胡松年、潘宗岳、章庆墉、吴士达、黄焕文、黄图、金国宝、谢恩维（各赏5角）
	五月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39	15	胡荫荣、胡乃来、黄瑞元、胡绮波、吴士达（各赏1元） 胡夏渊、陈南金、王道平、方志学、胡振元、许佳培、谢赓臣、黎镇铎、黄图、刘崧云（各赏5角）
	六月	〈言忠信行笃敬〉	36	10	许佳培、张涵、郑志辰、胡春霖、钟赞元（各赏1元） 傅日新、谢荣恩、颉志诚、吴达文、周达（各赏5角）
	七月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	31	15	吴达文、颜步青、古腾骧、刘楚楠、胡长荣（各赏1元） 郑志辰、黄图、许佳培、谢一元、郑雨如、黄辉阁、谢恩维、颜志诚、吴鸿波、刘云楼（各赏5角）
	八月	〈惠迪吉从逆凶论〉	34	15	刘鸿斌、刘云楼、谢庆元、谢大鹏、胡锡荣（各赏1元） 吴士达、李一川、吴世培、陈道亨、文祖、古道明、林秉章、古腾顺、陈若钟、吴达文（各赏5角）
	九月	〈满招损谦受益论〉	34	15	萧灿生、林秉章、吴士培、张志南、吴宝琛（各赏1元） 史凤生、古道明 、文祖、许登临、吴达文、何后昆、古腾骧、陈以庄、刘鸿斌、胡崇荣（各赏5角）

年	月	课题	卷数	得奖人数	得奖人名单（由第一名起顺序排列）
光绪十四年（1888）	十月	〈致知在格物论〉			（缺）
	十一月	〈人之行莫大于孝论〉	33	15	胡浚荣、萧灿生、吴士达、王道隆、傅日新（各赏1元） 胡普隆、萧宫漏、胡锡荣、童梅生、史凤生、刘云楼、李士基、 刘鸿斌、谢庆元、罗必达（各赏5角）
	十二月	〈学而不思则罔〉	36	15	王道宗、谢炳光、刘云楼、李子兰、王道隆（各赏1元） 萧宫漏、童梅生、谢恩孝、胡浚荣、傅日新、张志南、郑志辰、 何自珍、萧灿生、叶秀荣（各赏5角）
光绪十五年（1889）	正月	（缺）	21	15	祝万年、李梦花、刘云楼、谢祝轩、吴士达（各赏1元） 傅日新、王道宗、许登临、谢天恩、许卓南、王云桂、林琼宴、 谢圣恩、洪恩湛、郑席珍（各赏5角）
	二月	〈贫以无求为德，富以能施为德论〉	33	15	吴士达、谢祝轩、刘鸿斌、谢鸿慈、张德荫（各赏1元） 朱启明、王道宗、黄书香、李梦花、谢圣恩、曾国荣、周仁藪、 黄辉阁、傅日新、梁士龙（各赏5角）
	三月	〈故理义之悦我心犹？豢之悦我口〉			（缺）
	四月	（缺）	40	15	郭伯涛、苏宝璇、颜宫耀、谢廷恩、吴士达（各赏1元） 范世杰、陈金阶、赵舒翘、林培袁、黄书香、朱启明、万年青、 杨作孚、陈化龙、莫如德（各赏5角）
	五月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44	15	胡金埙、颜宫耀、邵荫棠、胡（吴□）士达、许辉煌（各赏1元） 胡福昌、蔡承恩、谢庆元、许森松、黄书香、黄图、黄金波、 林康衢、赵翼云、张宗敏（各赏5角）
	六月	〈兴于诗〉	38	15	胡铿、梁昆山、颜宫耀、吴达文、赵舒翘（各赏1元） 洪恩湛、许朝凤、黄图、蔡承恩、谢鸿恩、谢庆元、吴士达、 林康衢、许森松、谢炎（各赏5角）
	七月	〈立于礼〉	42	15	许其庄、李坤林、胡铿、胡士达、陈学诗（各赏1元） 赵舒翘、梁香文、许朝凤、林康衢、许辉煌、林森木、蓝梅翔、 谢鸿恩、黄书香、赵翼云（各赏5角）
光绪十五年（1889）	八月	〈成于乐〉	31	15	许其庄、周宗濂、许敬存、文汝器、胡鉴（各赏1元） 何湘、罗震南、胡玨、严澄晖、陶唐世、吴达文、祝三多、吴士达、 洪陶范、张宗敏（各赏5角）
	九月	〈志于道〉	41	15	罗震南、许其庄、胡鉴、周宗濂、赵舒翘（各赏1元） 许卓南、王懋德、洪昌涵、林英华、谢庆元、郑成德、郑尚志、 王云桂、许朝凤、宋廷椿（各赏5角）
	十月	〈五福以攸好德为根本〉	28	14	胡子名、史凤生、周崇源、吴达文（各赏1元） 麦珠吉、潘渭鱼、雍朝凤、吴印槐、夏变彝、王攀桂、吴士达、 王光甲、许其森、何必然（各赏5角）

年	月	课题	卷数	得奖人数	得奖人名单（由第一名起顺序排列）
光绪十六年（1890）	二月	〈疾止復故论〉			（缺）
	闰二月	〈则以学文〉	32	15	王观澜、许金声、孙平、吴士达、谢祝轩（各赏1元） 吴达文、童昌文、陈墨农、黄凤图、吴荣仁、李森宝、季春庭、 杨书升、郑炳旦、李晋贤（各赏5角）
	三月	〈有文事必有武备论〉	37	15	吴士达、林建初、许金声、章瀚斋、吴达文（各赏1元） 潘渭鱼、夏之时、吴成金、许鑫、王文光、陈墨麓、杨书升、 潘百禄、林澍培、郑文光（各赏5角）
	四月	〈武侯论〉	27	15	潘百禄、吴士达、李鼎铨、张振岳、章瀚斋（各赏1元） 刘长卿、周仁薮、谢庆元、宪壬、夏之时、罗炳南、黄月池、 郑秉旦、许金声、吴成金（各赏5角）
	五月	〈贸侯论〉	31	15	林赞襄、李家伦、章瀚斋、吴士达、夏之时（各赏1元） 颜宫耀、吴成金、叶佩兰、许朝凤、潘渭鱼、吴焱、郑瑞金、 刘长卿、宪壬、余存（各赏5角）
光绪十六年（1890）	六月	〈禁烟论〉	47	15	颜参峨、夏之时、王文光、何晋孚、刘馨（各赏1元） 金重羽、林飞龙、章瀚斋、叶佩兰、石中玉、邱景棠、林东升、 吴士达、潘百禄、吴达文（各赏5角）
	七月	〈多钱善贾论〉	40	15	金重羽、章瀚斋、老佩廷、邱庆顺、吴成金（各赏1元） 潘百禄、刘馨、罗千钟、颜参峨、许朝凤、林□龙、李一川、 金声香、黄月池、吴达士（文□）（各赏5角）
	八月	〈君子周急不继当〉	36	15只列14人	金重羽、冼维新、黄玉峰、颜参峨、黄文质（各赏1元） 李鼎铨、吴成光、郑文光、吴达文、黄月池、黄文辉、金千里、 陈墨农、杨允赞（各赏5角）
	九月	〈不远游〉	39	15	李家伦、金重羽、许佳培、王观澜、章瀚斋（各赏1元） 周梦溪、马庭耀、冼衡士、许金声、丁贝彦、同于周、吴士达、 黄文辉、吉元、陈墨农（各赏5角）
	十月	〈无以妾为妻〉	27	12	金重羽（赏2元5角） 王观澜、章瀚斋、区铁泉、金生水（各赏1元） 李鼎铨、颜参峨、老佩廷、潘百禄、黄文辉、区锡增、许朝凤 （各赏5角）
	冬月	〈问圣门之学修己而不恤人，务实而不务名者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避世不见佑而不悔，乃又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其异同之故安在，自修之士宜何如立志用功欤?〉			（缺）

年	月	课题	卷数	得奖人数	得奖人名单（由第一名起顺序排列）
光绪十七年（1891）	二月	（缺）	40	15	梁昆山、胡浚文、区锡曾、颜廷贞、周仁薮（各赏1元） 王廷达、区铁泉、杨焕堂、黄继清、蔡兆容、陈毓兰、黄扬清、 涤源、冼胪卿、林孙秀（各赏5角）
	三月	〈财散则民聚〉	36	15	区锡曾、胡志良、陈冠英、吴士达、蔡兆荃（各赏1元） 区铁泉、陈冠贤、胡浚文、黄扬清、甘日华、黄锡麒、林昌年、 陈毓兰、陈云钺、梁昆山（各赏5角）
	四月	〈君子居之〉			（缺）
	五月	（缺）	36	15	金钟声、区铁泉、赖焕尧、吴士达、林焕文（各赏1元） 邱会枚、颜清高、黄振鎰、吕荣杰、区锡增、杨冠南、梁惠南、 黄在中、林文清、林昌年（各赏5角）
	六月	[停课]			

附表（二）会吟社联榜

1. 联题：鸟鱼

《叻报》刊登日期：2255号（1899年5月31日）

得奖人：王道南　徂山氏　张德芳　张耒春
郭瑞春　张德萌　清溪别墅　星云氏
张克为　许登临

2. 联题：乞巧

《叻报》刊登日期：2319号（1899年8月15日）

得奖人：林瑞春　王道南　张志南　张德明
张祯祥　郭瑞春　陈玉玺　蔡发明
木桂芳　张文婆　许朝凤

3. 联题：龙虎

《叻报》刊登日期：2303号（1889年9月17日）

得奖人：张祯祥　张澄清　王道南　张克为
张德芳　蔡赞文　白文龙　张志南
蔡秉文　林瑞春　林文耀　欧阳珍
黄图　张德明　张宗文　林绿波
郭瑞春　蔡发祥　朱如松

4. 联题：朋友

《叻报》刊登日期：2340号（1889年9月17日）

得奖人：王攀桂　张德明　张克为　邱衡琯
张德芳　星云氏　澄清氏　张文婆
周宗濂　许发临　张宗文　林瑞春
蔡秉文　李道潜

5. 联题：深思

《叻报》刊登日期：2354号（1889年9月26日）

得奖人：王攀桂　张克为　张志南　邱衡琯
张祯祥　周宗濂　郭承祖　许登临
张文婆　蔡秉文　林春泽　林瑞春
蓬莱书室　张宗文

6. 联题：重九

《叻报》刊登日期：2366号（1889年10月9日）

得奖人：周宗濂　王攀桂　赵自琴　张祯祥
张克为　邱衡琯　张德芳　张文婆
许登临　邱衡琯　蔡秉文　林春泽
陈日涯　蔡赞文　陈祐清　张兹题

7. 联题：始终

《叻报》刊登日期：2417号（1889年12月7日）

得奖人：泰　庄　章浩如　王攀桂　张德明
章芳源　张景恒　林沧海　张祯祥
陈文锦　陈宪章　邱衡琯　王碧香
张德芳　林瑞春　张文婆　郭仰高
章瀚斋　秋轩居士

8. 联题：左右

《叻报》刊登日期：2427号（1889年12月19日）

得奖人：王攀桂　陈文锦　王道宗　张德明
张克为　林静庵　林瑞春　林静庵
张祯祥　张德芳　简孟常　林静庵
泰　庄　苏敬堂　章芳源　许献璋
张志南　林　腾　苏　俊　邱衡琯
蒋丽妙　陈荣华　张景恒　章瀚斋

第四节　海门奇葩
——峇峇文化

摘要

峇峇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乃多元纷呈的南洋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不仅包含了华人的传统文化特性，同时兼容马来文化特征。后受西方殖民者的文化影响，使得峇峇在政治甚至文化认同上曾一度亲英（国）。这种奇异的文化结合，便成了所谓的“峇峇文化”。

Abstrac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Peranakan Chinese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olourful and diverse Southeast Asian cultural heritage. The Peranakan culture not only encapsulates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s, but also assimilates distinct traits of the local Malay culture. Later, the cultural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colonial powers has shaped the Peranakan Chinese'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ffiliation. This acculturative combination of factors gave birth to the unique Baba culture.

黄慧敏（Ng Fooi Beng）

峇峇（Baba）是马来群岛历史上早期华人移民与当地马来妇女通婚后所繁衍的后代[1]，其后这些“混血儿”之间也相互嫁娶，甚至在19世纪与大量从中国涌入的新移民通婚，生儿育女，凭着其混杂了中华、马来及西洋的文化型态，逐渐在华人中形成一个特殊的民族集团。新马峇峇发源于马六甲，后部分人随着槟榔屿（1786年）与新加坡（1819年）的开埠而向北、南移居。广义的峇峇，包括了峇峇（男性）以及娘惹（女性）。而狭义的峇峇，则专指男性成员而言，女性峇峇一般称作“娘惹”（Nyonya），年长女性则尊称为“Bibik”。

关于baba一词的来源，众说纷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说法：

- baba本为印度孟加拉国（Bengal）土话，用以称呼欧洲人的儿童，后可能经印度人引进槟城，把当地华人儿女也称baba，演变到后来，大小通称[2]。
- baba是马来语bapa（父亲）谐音，最初是爪哇当地对混血华人（Peranakan Cina）的“尊称”，后来转音成了马来人对华人的“通称”[3]。而今日的峇峇及马六甲的马来人也以baba或简称ba来称呼父亲或年轻的华人（男性）[4]。另外，也有以baba作为先生代称的，如Baba Kim Teck即金德先生。总言之，baba本是尊称他人的名词，后被借指“峇峇华人”[5]。
- baba意即先生、父亲或孩子。有学者从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中表示先生的“Babu”一词考察。也有学者如登尼斯（N. B. Dennys）提出该词源自土耳其语而从印度传入海峡殖民地的说法[6]。
- 在福建话中，“ba”有“麻木”之意，因此现今峇峇或一些福建人认为，峇峇不懂华语，在非峇峇人眼中，峇峇对华人的语言或文化已经麻木了，故称之“峇”[7]。

透过语言资料的分析研究，人类学家陈志明认为：“baba一词源自于中东，并经过印度引介到马来群岛”[8]。

由于所处环境文化的多元以及社会政治背景的变迁，峇峇又有“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和“海峡出生华人”（Straits-born Chinese）等不同称谓。根据中外史料分析，这群人最早被他称为“峇峇”，也自称“峇峇”，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新客”（Sinkeh）从中国华南大量南移，他们开始察觉自身的异质性而自称“Peranakan”（即混血的土生仔），以区别于其他“纯种”华人或马来民族等。

随着英国殖民地政府于1826年将其主要聚居地新加坡、马六甲及槟榔屿划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9]，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许多在西方教育下成长的“峇峇”，更倾向效忠英国统治者，开始将英人的他称“Straits Chinese”、“Straits-born Chinese”转为自

---

[1] 这是指广义的“马来人”而言，包括东南亚所有讲南岛语系马来语的民族，如：马来人、爪哇人、巽他人、马都拉人及峇厘人等。

[2] 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79, Singapore and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epr.), p.2; Png Poh Seng,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Case of Local Identity and Socio-Cultural Accomodation",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1), 1969, p. 96;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Penerbit Fajar Bakti, 1993), p. 2.

[3] Png,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1969, p.96。

[4] 据调查，新马等地的福建峇峇及非峇峇福建人，常以“阿峇”昵称小男孩，或干脆将孩子的名字或小名取做“大峇”（大儿子之意）或“细峇”（即小儿子）。如笔者之远房表哥本名便叫“陈细峇”。

[5] 陈志明，〈第七章：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峇峇华人的社会与文化〉，载《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页168。

[6] Frank A. Swettenham, ,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and Malay Languages with Notes: rev. edn 1896* (London: W. B. Wittingham & Co., 1881); Hugh Clifford and Frank A. Swettenham, *A Dictionary of the Malay Language: Malay-English, Part 2: The Letter 'B'* (Taiping (Malaysia):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5), p.102; N. B. Dennys,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British Malaya* (London: London & China Telegraph Office, 1894), p. 2.

[7] 陈志明认为，这个解释只是取现在峇峇文化的特征，或者对峇峇华人有所偏见，不足以解释峇峇这个名词的来源。（参阅陈志明，同注5；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 1988), pp. 10-11; John R.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5.

[8] Tan Chee Beng, *op.cit.*, p.13.

[9] 1826年，英国殖民地政府将新加坡（1819年正式取得统治权）、马六甲（1824年取得）与槟榔屿（1786年取得）合并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俗称“三州府”。必须说明的是，新加坡峇峇社会与马六甲、槟榔屿等地的峇峇，虽因客观环境的因素而发展出同中有异的文化形态，三者间却渊源颇深，三地的许多家庭甚至仍有亲属关系，而三地的峇峇公会至今还会轮流举行年会，互动频繁。然而为配合本节主题，笔者将专注撰述新加坡的峇峇社会与文化，至于马六甲及槟城的峇峇，则不赘述。

位于亚美尼亚街的土生华人博物馆集中展现了峇峇文化

称，当时的峇峇大都自认是本土之子（Sons of the Soil）或大英子民（或英华人，King's Chinese）。这时的称谓，不仅具有“居住区域”的界线，也隐含了当时这群人在社会阶级上的“优质”观念。然而随着主权的转移，该行政区域的瓦解，“峇峇”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扮演的中间人角色逐渐失势，“海峡华人”一词已成了历史名词。

现今，这群混有华巫血统、以峇峇马来语为母语、历史上主要以马六甲、新加坡及槟城为聚居地，且文化上华巫西兼容的土生华人，一般自称“峇峇”或“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

新加坡峇峇社会的形成

华人旅居南洋，与当地民族通婚融合由来已久。明朝《星槎胜览》及《东西洋考》皆有记载，马六甲男女，肌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而《明史》也提及，马六甲男女，发上均打簪，其中有些肤色比较淡薄者，是华人的后裔，显示出华侨与马来女子所生的混血儿，其肤色有明显不同[10]。可见，早在三宝太监郑和在公元 1405 年至 1436 年间到访东南亚以前，已有华人，尤其闽粤地区的男性，随季候风南渡经商或定居。

晚清以前中国女子出国不易，因此早期南洋的华族女子数量极少，华族男子唯有选择与本地马来或原住民女子，包括峇达（Batak）和峇厘（Balinese）女奴通婚，开枝散叶[11]。婚后，由于这些原住民妇女不识汉语，华人被迫以当时马来群岛的共同语——马来语沟通，孩子在耳濡目染下，也学会马来语。日复一日，随着这些讲马来语，却秉持华人文化与马来生活习惯的通婚家庭日渐增多，一群以独特腔调马来话为母语的华人便顺势产生。进入 19 世纪，随着华南移民的大量涌入，这群在马来群岛土生土长的“华人”，在语言及生活习惯上马来化的特性，明显与后到只讲汉语的“新客”华人形成反差，而自成另一支不同的华人群体[12]。

[10] 费信，《星槎胜览》，〈满剌加国〉篇；张燮《东西洋考》，卷4；《明史》，卷325。

[11]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30; Munshi Abdullah Bin Sheikh Abdul Kadir, *Hikayat Abdullah (Jilid Dua)*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Pustaka Antara, 1966), pp. 222–225.

[12] “汉语”，指包括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等方言在内的汉族语言，而不是源自中国北方，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华语”（官话）。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4 月 20 日

新港船坞附近大火，百余亚答屋遭焚

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开辟新加坡，积极开发新加坡为自由贸易港口，辅以农业开垦，带来无限商机，促使马六甲峇峇纷纷移居新加坡。与此同时，也有少数来自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土生华人，前来本地发展。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因有机会和英国人接触，加上殖民化英语教育的结果，峇峇凭着掌握巫、英双语的能力，以及了解马来半岛社会文化的优势，成了欧洲商人与内陆原住民之间通商的中介。至19世纪末，勤勉且擅长理财的峇峇，几乎掌控了整个海峡殖民地的地方贸易，其经济势力甚至延展至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地区[13]。

19世纪新加坡的峇峇除从事商业贸易外，也受雇于欧洲人或从事香料种植，当时的新加坡巨贾，包括陈笃生、陈金声、蔡沧浪、章芳琳、陈金钟、陈明水、颜永成等人，都是峇峇。这时期的峇峇西化不深，仍有浓厚的方言群认同及乡土情结，在白手起家致富后，亦不忘回馈社会。他们建医院、办学堂、设会馆、热心捐助公益事业，成为新加坡华社最初的领袖阶层。陈笃生于1844年捐资创设了至今闻名的“平民医院”（后改名陈笃生医院），陈金声于1857年捐助新加坡自来水工程，协助改善民居的水供问题，其他如天福宫的崇文阁、萃英书院等学塾，两人皆为主要捐助者兼创办人；而颜永成也于1883年设立英华义校（颜永成学校之前身），同时是同济医院的倡建总理之一。他们的子孙，如陈金钟、陈明水等人亦继承衣钵，继承华人乐善好施的美德，贡献社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经商，峇峇也开始种植树胶和黄梨、投资矿产、房产及金融业，林文庆、佘连城、李浚源及马六甲的陈齐贤等峇峇，皆为马来亚橡胶业先驱。而从事黄梨种植及加工业的林义顺，也赢得“黄梨大王”美名。英语的掌握不仅使峇峇商人左右逢源，也造就了许多专业人才以及在外商公司就业的机会，如林文庆、宋旺相（宋鸿祥，Song Ong Siang）这两位曾负笈英国深造的“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得奖者，便是当时华社的白领精英。此外，鉴于这群人的双语能力，殖民地政府承认峇峇殷商及领袖们在本地华社中的代表地位，甚至委任他们为立法议员、市政委员或其他与华民事务相关行政单位的职员。

这时期的峇峇，大多接受英语教育，加上面对华南移民在政治及经济上的竞争，为了自身的利益，峇峇更倾向认同英国统治者，且自认是英华人。凭着所累积的财富与教育背景，更积极在本地政经和文教等领域主导华社，比如第一位受殖民地政府委任为新加坡华人永久立法议员的佘连城、行医从商且身兼立法议员的林文庆、曾任新加坡市政委员及立法议员的商人陈若锦等，皆是当时华社的领袖人物。1900年，林文庆、陈若锦、佘连城和宋旺相等人，成立了“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以求保障海峡华人在英帝国的权益，并对英女皇表示效忠。

19世纪末的峇峇社会，其最典型的文化模式已近完形；在英国殖民者的维护下，作为大英子民，他们享有许多非峇峇华人所没有的政治、经济与教育权利，俨然是新马社会中最为优越的特殊阶层[14]。他们生活在海峡殖民地都会区，并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培养出阅读的兴趣。尤有进者，经济条件的宽裕也使峇峇有钱有闲的去享受市井生活里不同的娱乐消遣活动。经济基础的稳定，使生活日趋西化的峇峇更有余裕参加时事辩

早期的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

[13] 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于1896年成立，统辖地区包括了霹雳（Perak）、雪兰莪（Selangor）、森美兰（Negeri Sembilan）及彭亨（Pahang）四州。有关峇峇在经济上的强势，参阅崔贵强，〈战前新加坡华族史的特征〉及〈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巨商〉，载《新马史论丛》（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

[14] Maurice Freedman：“十九世纪的峇峇华人成为华人社会的优越阶级（Superior Stratum），在经济与政治上都支配了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社会。”（参阅 Maurice Freedma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 Longer View*（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1965）, p.11.

论、学习西洋音乐及体育项目等等各类峇峇俱乐部活动，其中包括英语雄辩会（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1882 年）[15]、海峡华人体育会（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1885 年）、海峡哲学研究会（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1893 年）、海峡华人康乐俱乐部（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1885 年）、海峡华人足球协会（Straits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威基利俱乐部（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1891 年）、海峡华人文学协会（Straits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1911 年）、海峡华人读书会（Straits Chinese Reading Club，1909 年）、海峡华人业余音乐协会（Straits Chinese Amateur Musical Society，1906 年）、华人骑马会（Chinese Riding Party）等。而娘惹们尤其年长者，闲暇时则酷爱玩“十二支”、“四色牌”或观看戏曲[16]。或许继承了南岛马来母亲乐天知命的基因及音乐天赋，直至现代，峇峇社会依然非常注重休闲生活，尤其碰上喜庆场合如婚宴，除了打纸牌消遣，峇峇娘惹们会即兴唱作 Pantun 诗或高歌 Dondang Sayang，并大跳马来 Joget 舞助兴。

值得一提的是，1890 年代开始，林文庆、陈若锦、宋旺相、佘连城及陈武烈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了海峡华人社会文化改革运动，具体活动包括了：成立华人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1896 年）、创办《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1897 年）、提倡女学，创立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1899 年）、组织华语学习班并展开儒教复兴运动（1899 年始）、发动反鸦片运动（随 1906 年戒烟所的创设而推行）、提倡孝道及剪辫运动（1898 年为该议题争辩最活跃时期）并宣传破除旧习陋俗等等[17]。20 世纪初，小部分识中文的峇峇如张永福、林义顺、林文庆及陈武烈等人，基于民族情感，以及对西方文化体制的体悟，先后受南来宣传维新运动的中国保皇党和由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思潮所感召，捐钱并参与创办《日新报》（1899 年）、《图南日报》（1904 年）及《中兴日报》（1907 年）等报刊，甚至协同新客华人于 1906 年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支持中国改革。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凭着对多重文化及语言的掌握，峇峇社会在新加坡的政经文教各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 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华南移民在人口、社会与经济力量上的超越、日治时期的摧毁、战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战后的峇峇社会，虽有如建国总理李光耀这些杰出人物，然而在国家政经和社会文化上的发声，已随“辉煌年代”的过去而逐渐消音[18]。尽管至今仍有新加坡土生华人公会（Peranakan Association Singapore）及爱之山协会（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等峇峇组织极力维持峇峇社会的凝聚力及宣扬峇峇文化[19]，然而由于人口的减少、政策的改变，加上涵化后文化特征的日渐稀释、几乎并入华族社会，现实中的峇峇社会，已只能靠文化和主观认同来维系。

[15] 由中国首任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倡设，旨在替清政府拉拢受英语教育的峇峇。

[16] 英国殖民官Jonas Daniel Vaughan曾提及1850年代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传统戏剧的风靡，几乎每晚都到戏台前报到。详见 Gretchen Liu, Angeline Philips, *Wayang: A History of Chinese Opera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88), pp. 21–32; J. D. Vaughan, *op.cit.*, pp.85–87。

[17]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1897 Vol. 1–1907 Vol.11；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响应》（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2001年），页43–52。

[18] 此指整体峇峇而言，就个人而言，至今我们仍无法漠视诸如李光耀及林文庆等人在新马（甚至世界）尤其华人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力。一般上，不管是内部或外部观点，皆视1830年代至1930年代期间为峇峇文化发展的黄金岁月（Golden Age），1940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日本占领马来亚的破坏，峇峇文化才急速走向没落。

[19] 新加坡土生华人公会（Peranakan Association Singapore）的前身即“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1965年改名“Singapore Chinese Peranakan Association”，1966年再改名“Peranak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2 月 15 日

当局创设华人邮务分局于马吉街（Market Street），专门让华人寄送银信回乡

峇峇社会与家族体制

峇峇的祖先大多来自华南闽粤一带，因此峇峇社会当中有福建峇峇、潮州峇峇、广府峇峇、客家峇峇等区分。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峇峇社会流行的“族内婚制”，非同姓间的联姻，增强了峇峇内部的凝聚力，形成一个紧密的社会结构。在移民潮涌的年代，峇峇也时兴新客入赘娘惹家的婚姻，大批下南洋的中国男子，在本地华人女性奇缺的情况下，纷纷“进赘”（Chin Choay）到峇峇家庭，从此过峇峇生活、生儿育女，峇峇马来语的使用人口也相应增加。换言之，峇峇社会主要是通过婚姻控制，维持他们小社会的完整与繁衍；到了1911年，新加坡的峇峇人口已达4万3562人[20]。

峇峇社会延续汉文化的家族观念，讲究孝道，相对于华南移民，对待儿女重男轻女的观念较轻，但用餐时仍有男先女后的顺序，且“入赘”婚姻上，子女仍须从父姓。家族体制方面，峇峇延续了华人的宗族制，主要体现在亲属称谓上，除父（Pak或Bapak）、母（Mak）、弟弟妹妹（Adek）等以马来语称呼，大部分称谓皆借用福建话亲属词汇，如兄长（Nkoh）、姐（Chi），父系的爷爷奶奶（Lai Kong、Lai Ma）、伯（Pek Pek或Npek）、伯母（Um）、叔（Chek Chek或Nchek）、婶婶（Nchim）、姑姑（Koh）、姑丈（Koh Teoh），母系的外公外婆（Gua Kong、Gua Ma）、舅（Nku）、舅母（Nkim）等[21]。

峇峇家庭生活也承袭了汉文化“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女子自12岁成年后直到出嫁，不得外出抛头露面，只能呆在家中接受生活教育，向女性长辈学习女红和烹饪，以待出嫁后能操持家务。这情形直到1899年林文庆与宋旺相等人创办了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才有所改变，娘惹们于此首开本地女子教育的先河，外出接受英式教育，读书认字。

然而在继嗣上，峇峇社会虽倾向父系继承，却没有中华传统“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即家族中若一家之主的“父亲”离世，则由寡母当家做主，而非传给长子。而早期新客男子与娘惹通婚，也多是入赘女家。

在二战前，峇峇家庭祖孙三代甚至四代同堂是普遍的现象，有长辈言传身教，许多传统的峇峇文化包括语言，因此得以代代相传。

峇峇社会的语言与文学

峇峇社会最大的特征，是讲一种闽南方言与马来语相混杂的“峇峇马来语”。在早期，它更是用来区别土生“峇峇”华人与新近移入的“新客”华人的重要依据[22]。峇峇马来语所借用的汉语词汇多为表达亲属关系和宗教信仰的名词，同时也吸纳了许多借自英语、葡萄牙语、荷兰语和淡米尔语的词汇。若仔细凝听，峇峇马来语的语感特性，其实更趋向汉语，而非完全遵从马来语的规律[23]。

峇峇马来语在长期自由放任的汉巫接触下，至少于18世纪诞生。最初衍生自17世纪已在马来群岛各大港口中通行、且夹杂了各种语言的“通俗马来话”。之后受华人丈夫的汉语词汇、语感及口音所影响，而独具特色，并透过“家庭”这个关键性的社会因素，使口音得以代代相传，直到19世纪随着峇峇经济地位的提高与扩展而发扬光大。1889年至1942年之间，峇峇社会广泛流传以峇峇马来语书写的中国通俗翻译小说及报章杂志，更证明了峇峇马来语不仅是口语，透过“罗马字母”的书写，它也曾经成为峇峇人生活里重要的“书面语言”。

19世纪中叶英国人为发展经济，不断从中国及印度引进大量外劳，造成了海峡殖民地的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华

---

[20]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56.

[21] Felix Chia, *The Babas* (Singapore: Times Book International, 1980), pp.41–45.

[22] Anne Pakir, The Linguistic Heritage of the Peranakans, in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p.xv.); 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the Baba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1988), pp.139–141；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 334–335；云惟利〈第十一章：峇峇话〉，载《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996年），页193。

[23] 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65(1913), p. 51.（附录于：John R.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53–165.）

南移民的涌现与壮大带来冲击，加上为配合殖民者利益而推行的教育政策，尤其英语教育的推展，渐进而深入的改变了峇峇的语言习惯。1830年代至1930年代之间，在峇峇社会文化发展的“黄金年代”，所谓正统（true-blue）峇峇，其母语或内部交流用语是峇峇马来语，在社交场合及对外则多改用英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峇峇社会日趋西化，峇峇马来语的母语地位虽受到撼动，但英语仍只是峇峇的第二语言。直到二战来临，日治时期的仇华政策，乃至战后政治局势的几度变换，都使峇峇社会严重受挫，连带也影响了峇峇马来语在此之前旺盛的生命力，而语言的趋利性更推动峇峇社会全面走向英语。

20世纪以降，峇峇常被非峇峇华人取笑为“OCBC”（Orang Cina Bukan Cina），原因就在于外人对峇峇不谙“汉语”的刻板印象。然而20世纪以前的峇峇，尤其是第一二代，尽管以峇峇马来语为母语，部分人却不曾真正与父系的汉语（方言）隔绝，或多或少能从父辈或以“汉字方言”传授中国文化知识的私塾学堂习得汉语[24]，而早期峇峇家庭把孩子送返中国念书，或请“先生”教导孩子汉语的情形亦时有所闻[25]。另外，自19世纪中期开始，受到源源不绝的华南移民所带来的冲击，为便于沟通、巩固通商网络，一些峇峇曾“重拾”汉语方言，以便能参与本地华人社团（如会馆、宗亲会），甚至领导群伦。但对于“华语”这个对华南民族而言是外来语的北方官话，绝大多数峇峇确实是陌生的。有趣的是，早在新加坡第一间新式华语学校——应新学堂成立（1905年）之前，林文庆自1898年起先后在家里、威基利俱乐部和英华义学（Anglo-Chinese Free School）为海峡土生华人开办了华语学习班，并且积极推广华语，乃至印尼爪哇等地也开始成立华校或增设华语教学。尽管如此，华语在峇峇社会仍只是昙花一现。从整体来看，峇峇社会中懂汉语的仍算少数，尤其随着第三、四代对“祖籍地”的疏离，加上英语教育的发达及功利性，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中期，峇峇社会中会讲“汉语”或看得懂汉字的已寥寥无几，却不能说完全没有。

回顾峇峇社会所处的时空背景，峇峇的语言发展史，是多元纠缠而富变化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说是峇峇语言使用上各语言相互较劲的时代，在本民族的峇峇马来语之外，部分峇峇因私塾教育启蒙，延续了峇峇人汉语方言的能力，与此同时又面对外来英语的强力介入。这样的多语环境无形中为峇峇社会培养出不少双语甚至如曾锦文（Chan Kim Boon）这类的三语人才，而这正是峇峇文学得以产生的契机。英殖民时期的新加坡，是海峡殖民地的政商及文化中心，人才汇聚，出版业亦较兴旺，峇峇借此得以把包括口传文学及书面文学在内的峇峇文学推向全盛期。

峇峇的语言使用情形复杂，由语言衍生而来的文学，也与之相互映照。虽说从民族文学的角度看，峇峇文学必须以民族语言创作的峇峇马来语文学为主，然而我们也不应忽略该族属作者以其他语言创作的作品。

---

[24] 参阅《叻报》，1890年3月13日报导：“叻中书塾，自请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如萃英书院、培兰书室、毓兰书室、养正书屋、乐英书室等，多至不可胜言”。

[25] 例如，林文庆便曾提及峇峇男孩被送回（中）国受教育之事。而陈达也有报告说，当初中国南部的外移村有华侨所办的学校，其中有很多有马来血统的男孩在那儿求学。详见Lim Boon Keng,"The Chinese in Malaya", *in Present Day Impression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China, Hong Kong, Indo-China, Malaya and Netherlands India*, ed., W. Feldwick (London: Globe Encyclopedia Co., 1917), p. 876; Chen Ta,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AMS Press, 1978 (1939)), p.143.

峇峇马来语文学

峇峇马来语文学最早展现在马来诗歌（班顿 Pantun、莎雅尔 Syair）的口头创作上，殖民地时期峇峇娘惹们更盛行以诗入歌的传统歌谣朗诵（咚当撒央，Dondang Sayang），新加坡出版业的兴盛，也使峇峇得以把作品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或出版诗集。

19 世纪末，峇峇社会开始以罗马字拼音的方式出版峇峇马来语和英文报纸、杂志或书籍，尤其峇峇马来语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更是流传广泛。峇峇曾以峇峇马来文创办了七份报纸和四份杂志，其中包括三份峇峇马来文暨英文、一份峇峇马来文暨汉文的刊物，而峇峇马来语翻译文学作品最早便是发表在这些刊物上。可以说，新马地区马来语的罗马化书写文体最早呈现在峇峇创办的报刊上，比马来人以罗马化马来文创刊的时间提早了超过 20 年。

在峇峇马来文报刊方面，《土生华人报》（Surat Khabar Peranakan，亦称 Straits Chinese Herald）是峇峇办的一份刊物，1894 年 1 月于新加坡创刊。该日报主要以峇峇马来文及英文双语出版，内容以本地新闻及广告为主，偶尔穿插一些特别报导和故事。这份刊物寿命不长，创刊同年 5 月，被并入英文报 *Daily Advertiser*。惟 *Daily Advertiser* 也于不久后夭折（1894 年停刊）。接着是 1894 年 7 月由宋旺相及陈文进（Tan Boon Chin）合办的《东方之星》（*Bintang Timor*），这份报纸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新马第一份完全以罗马化马来文创办的报纸，内容主要以国内外新闻和社论为主，透过社论我们可以阅读到海峡华人对于当时国内外时事的看法，诸如中日战争、马来语教育等问题，都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该报也收入了不少文艺作品，包括诗歌、故事、笑话及谜语（teka teki）等。但由于办报经费短绌，加上订阅成绩不理想等问题，这份报纸一年后也宣告寿终正寝[26]。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报纸最热心的赞助人及投稿人之一，是当时柔佛的内务大臣拿都敏达拉鲁阿（Dato Bintara Luar of Johore）[27]。

1910 年经营船务公司的吴清林（Goh Cheng Lim）创办了《马来西亚提倡者》（*Malaysia Advocate*），旨在提供一些世界新闻，还特别报导外国及其人民的进步情况，以增进海峡华人的见闻。这份报纸停刊时间不详，但是根据宋旺相记载，这份报纸和 15 年前的《东方之星》一样短命[28]。1924 年 1 月，吴清林又与袁文成（Wan Boon Seng）合办了《日常报》（*Kabar Slalu*），除了刊登新闻、广告和社论，也刊登了不少文艺作品。最特别的是首次连载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作品，其中包括了《白蛇与黑蛇》（*Cherita Ular Putay Sama Ular Itam*，由萧海炎（Siow Hay Yam）翻译）、《梅良玉的故事（二度梅）》（*Chrita Mwee Liang Geok*（Jee Toh Moey），由萧海炎翻译）及《薛仁贵征西》（*Seeh Jin Quee Cheng Say*，由萧钦山（Seow Chin San）翻译）；这份报纸于同年 5 月停刊。1926 年，峇峇马来语及英语双语周报《新新闻》（*Kabar Uchapan Baru*）创刊，1927 年后则改为双周刊，直到 1931 年停刊；1928 年袁文成与林君良合办了巫汉双语的《商业报》（*Perdagangan*）。最后根据 William R Roff. 的记录，1931 年 Siow Hay Yam 及 O. S. Key 出版了一份名为《东方之星报》（*Kabar Bintang Timor News*）的报纸[29]，这份报纸至今下落不明，但根据报纸名称和出版人推断，应是在新加坡出版的峇峇马来文、英文双语报。

在峇峇马来文杂志方面，现存最早用峇峇马来语出版的杂志应是 1906 年创办的峇峇马来语、英语双语月刊——《峇峇之友》（*The Friend of Babas*）。该杂志由周崇扬（Chew Cheng Yong）主编，吴佛庆（Goh Hood Keng）及吴灵印（Goh Leng Inn）助编，内容主要刊载广告、社论、小说和基督教故事；该刊于 1908 年停刊。22 年后，新马第一份全部罗马化马来文杂志才于 1930 年由袁文成创刊，这份逢星期日出刊的杂志——《土生华人之星》（*Bintang Peranakan*），内容除了连载中国翻译小说《后列国志》（Ow Liat Kok Chee，译者为 Seng & San 即袁文成和萧钦山）

[26] Bintang Timor,1895年7月2日（vol. 2, no. 112），p.2，编者感言。

[27] 柔佛内务大臣（Dato Bintara Luarof Johore），有说为马来文学家文西·阿都拉之子。参见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页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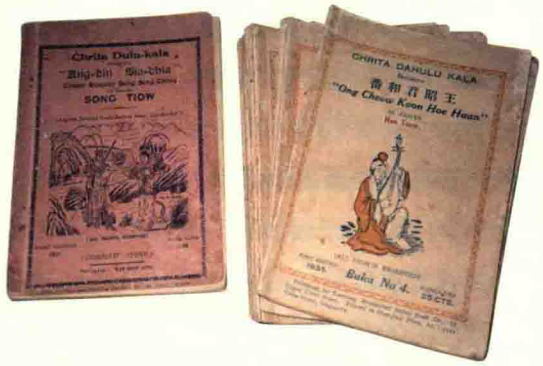
[28]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8.

[29] William R Roff., *Bibliography of Malayand Arabic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Peninsula Malay States1876–194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6.

外，也刊载广告、社论、国内外新闻、体育活动、读者投书、幽默小品及诗歌等。这本刊物的销路颇广，扩及马来亚各大城市、砂劳越、廖内、爪哇及曼谷等地；只可惜同样办不久。根据 Roff 的记录，该刊在出版了 34 期后于 1931 年 6 月停刊。袁文成于 1932 年又创办了另一份峇峇马来文杂志，名为《土生者之光》（*Sri Peranakan*），该刊内容与 *Bintang Peranakan* 大同小异，也同样分销南洋各地，只是这次用了更多篇幅连载由 "Seng and San" 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杨文广征南闽》（*Yeo Boon Kong Cheng Lam Ban*）。

另外 1934 年出版的《讲故事者》（*Story Teller*），则是专门用以连载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孟丽君》（*Beng Leh Koon*）的刊物，译者为邱平炎（Khoo Peng Yam）；该刊于 1935 年停刊，也宣告了峇峇马来语刊物出版业的结束。

几乎与峇峇马来语报刊的出版同时，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期，峇峇文人曾出版过将近 80 部翻译自中国文学作品的峇峇马来语文学书册，且曾广泛流传于海峡峇峇社会。最早的翻译作品于 1889 年出版，其中包括由陈明德（Tan Beng Teck）所翻译的《杏元小姐与梅良玉》、《雷峰塔》、《杂说传—今古奇观与聊斋》、《凤娇与李旦》，石瑞隆（Chek Swee Liong）和平瑞公司（Peng Swee & Co.）合译的《忠节义、卖油郎》和《三国故事荟萃》，以及 Lye Kam Lim 所译的民间故事《憨子婿》[30]。而峇峇翻译家中，最出色的当属曾锦文，他于 1891 年开始在朋友谢子佑（Cheah Choo Yew）及陈谦福（Tan Kheam Hock）的协助下，以峇抵彦东（Batu Gantong）为笔名，自陈明德手上接下《反唐演义》卷四以后的翻译工作，并于 1892 年重译前三卷，同时开始翻译《三国》（1892-1896）。之后他独自翻译了《水浒》（1899-1902）及《西游记》（1911-1913），由于翻译质量高，且皆为中国名著，在峇峇社会中颇受欢迎。其子曾衍派（Chan Yen Pai）还分别于 1932 年、1933 年及 1934 年再版了《三国》、《西游》、《水浒》三部翻译作品。



峇峇马来语译书册《红面小姐》（左）及《王昭君和番》（右）（黄慧敏提供）

1930 年以后，峇峇翻译文学发展蓬勃，一些峇峇开始有意识的发展新闻及文学事业，也常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翻译工作，这样的分工无形中加剧了整个翻译工作的步伐。例如 1931 年，袁文成（Wan Boon Seng）和萧钦山（Seow Chin San）便曾合作翻译过《后列国志》、《西汉》、《东齐列国》、《瓦岗》等作品。袁文成可说是后期高产量的翻译家，包括他独自翻译的《红面小姐》（1931 年）、《三下南唐》（1931-1932 年）、《李哪咤》（1933 年）、《杨文广征南闽》（1933-1934 年）、《一枝梅》（1936 年）等作品，他翻译过的作品共有 23 部之多。1940 年代受到二战的摧残，令峇峇马来文翻译事业发展惨淡，直到 1950 年，才有一部由袁文成翻译的《牡丹公主》出版。1950 年之后，中国通俗小说的峇峇马来语翻译工作便告停止；此后虽有黄庆福及 Felix Chia 分别于 1963 年及 1985 年尝试以峇峇马来文翻译过《三伯英台诗》（Sha' er San Pek Eng Tai）及《三伯英台》

[30] 憨子婿，即"憨女婿"之意，峇峇译者以福建音将之直译为 Gong Kiah Sie（《憨子婿》）。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3 月 2 日

新加坡救火局成立，6 月 1 日电话开始启用，初期只有 50 条电话线

（Sam Pek Eng Tai）剧本，然而，迄今数十载，峇峇马来语翻译文学明显已在西化的峇峇社会中一蹶不振。无论如何，从民族文化译介及交流的角度看，这些峇峇马来语翻译作品确实具有其历史意义及文学价值，而峇峇在中国通俗小说翻译上的成就，更是现今马来学界望尘莫及的。

1920年代马来亚与印尼等地非常流行马来戏剧——孟沙湾歌剧（Bangsawan），峇峇必不可免的也卷入这股热潮中，一些峇峇俱乐部开始自编自演峇峇马来语戏剧——“峇峇孟沙湾”（Baba Bangsawan）。1910至1950年代，新加坡陆续出现了一些峇峇马来语演出的戏剧，如Mustapha（《慕斯打法》，1913年）、Tidak Berdosa（《无罪》，1957年）、Hanyut Diri（《流放自我》，1958年）、Naga Berapi（《火龙》，1959年）、Kaseh Ibu Tiri（《继母的爱》，1959年）等。可惜敌不过时局的急速转变，步入1960年代，峇峇戏剧开始式微，直到1970年代，峇峇孟沙湾歌剧界就已曲终人散了。

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峇峇独特的文化受到了学者专家及媒体的注意，许多相关的报导及专题研究在此后数十年纷纷出炉。1980年代开始，受这股风潮影响，曾经在公共场合上销声匿迹的峇峇马来语，出现了复苏迹象。年轻一代的峇峇，开始对峇峇马来语产生兴趣，除了和父辈或祖辈们对话，同辈间也尝试以峇峇马来语对谈。而在这股“复兴运动”中，新加坡土生华人公会和爱之山协会扮演了积极的推动角色，以爱之山协会为例，从1980年代至今连续推出了多部峇峇（马来语）舞台剧（Wayang Baba，英文称为Peranakan Plays），社团内也经常举办Dondang Sayang诗歌吟颂活动。此外，一些峇峇教徒众多的教会，以峇峇马来语进行宗教活动的情形也增加了。除了甘榜嘎保卫理公会（Kampong Kapor Methodist Church）等仍以峇峇马来语唱圣歌及讲道，有些教会除了还保留峇峇马来文书写外，例如加东的圣家堂（The Holy Family Church），也跟进以峇峇马来语进行农历新年的天主教弥撒[31]。

书写方面，有Felix Chia等人重拾峇峇马来文，写出如Pileh Menantu（《选媳妇》，1984年）、Laki Tua Bini Muda（《老夫少妻》，1985年）等剧本，并在以英文撰写介绍峇峇文化的书中，对峇峇马来语有非常生活化的介绍[32]。而1993年由峇峇魏天福（William Gwee Thian Hock）撰写的*Mas Sepolu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足金：峇峇话精粹》）一书的面世，则可说是峇峇社会的一个创举，无疑的，在峇峇马来语研究及学习上，它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这股复兴潮显示现代峇峇对峇峇马来语的认同和积极态度，却无法保证语言的生存。和二战前相比，峇峇马来语的使用人口已大量锐减，此外，现实客观因素诸如城市化、现代化、族外婚、宗教信仰的改变等，都在不断地侵蚀着峇峇的社会与语言；尤其1940年代以后，日常用语改用英语的现象，在峇峇社会中已相当普遍。20世纪末期，许多峇峇家庭已经沦为“单语家庭”，目前除了少数能同时操汉语外，英语已成了生活上唯一的沟通语。1986年，根据学者Anne Pakir估计，新加坡地区能讲流利及半流利峇峇马来语的人口加起来只有5000人左右[33]。

峇峇英语文学

谈及峇峇的英语文学，首先就不得不提及早期峇峇英语创作发表的温床：《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 A Quarterly Journal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简称SCM）。《海峡华人杂志》于1897年在新加坡创刊，直到1907年停刊，为峇峇办过的刊物中，寿命最长的杂志。这份杂志主要由林文庆和宋旺相编写，是两人抒

[31] Felix Chia, *Ala Saya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pp.52–53;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1993), p.52.

[32] 这些书包括：Felix Chia, *The Babas*（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0）; Felix Chia, *Ala Sayang*（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3）等。另外，关于新马峇峇马来语（翻译）文学，学者杨贵谊、陈志明、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张丽珍及黄慧敏等人，都曾有研究。另有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马来语）文学，在苏尔梦、廖建裕（Leo Suryadinata）、John B. Kwee（郭约翰）及一些荷兰、印度尼西亚学者的长期深耕下，已有非常丰硕的成果；与之比较，新马峇峇（马来语）文学的研究仍非常不足。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根据原文本及语言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马来语）文学”并不等同于“新马峇峇（马来语）文学”，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马来语的原型为“巴达维亚马来语”，而新马峇峇马来语的原型是“马六甲马来语”，从整个历史背景及文化相似度看，两者（包括文学）虽无法一刀切断，却“形似而神异”，不能以偏概全，混为一谈。

[33] 根据Anne Pakir, "The Linguistic Heritage of the Peranakans", in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p.xi.

发已见的主要据点。由于两人皆是当年峇峇社会改革主要的倡导者，因此它被视为研究早期峇峇社会的重要刊物，即是峇峇改革运动的喉舌，也是早期英语文学作品主要发表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勤于笔耕的是林文庆及宋旺相两人。林文庆的生平著作以论说文和翻译为主，作品散见于《海峡华人杂志》、《海峡华人年刊》、《海峡哲学学会年报》、《天南新报》、《日新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及厦门大学的重要刊物。其专书多抒发对时事发展的观点，或倡导儒家文化思想。此外，他也投入翻译中国经典如《左传》、《离骚》等书，积极地向已经不认得汉语的族人介绍中国文化与思想。而宋旺相不仅编著过英语刊物，如《海峡殖民地法律报告书》（1894-1899 年）、《七弦琴报》（Lyre，1902 年）、《海峡华人杂志》、《海峡华人年刊》（1909 年）等，也以峇峇马来文在《磐石堂信息》（*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上发表文章，并且创办《东方之星》报刊。他也曾经在《海峡华人杂志》中（S.C.M，Vol. 8，No. 4，S.C.M，Vol. 9，No. 3）以马英双语撰写 “An Hour with Hikayat Abdullah” 及 “Abdullah Munshi and the Earl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Malacca” 两篇文章，向海峡华人介绍马来文学家文西阿都拉及其作品。此外宋旺相也出版过单行本或专书，如《大战期间对英帝国的责任——海峡华人的基本指南》（1915 年与林文庆合著）、《海峡华人与当地爱国同盟》（1915 年）及《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923 年）等。《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可说是新加坡华人第一部史书，内容充满维多利亚时代英式风格，虽更多反映了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历史，惟其史学价值仍值得肯定。

另外几篇值得注意的战前作品，包括陈合隆（Tan Hup Leong）1895 年发表于《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的《环球旅行游记》——“A globe-trotting Voyage”、新加坡首位女医生李珠娘（Lee Choo Neo）于 1913 年发表于英国 *Queen* 杂志上的传记——“The Life of the Chinese Girl in Singapore”；而艺术家刘溪士（Low Kway Soo），1913 年也在维多利亚剧院（Victoria Theatre）发表了自己编导的戏剧——*After the Battle*，他也与李珠娘等人一起创作马来语喜剧——*Mustapha*，这些戏剧的演出皆是为协助海峡华人康乐俱乐部募集上海华人红十字会（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基金[34]。

二战后峇峇英语文学虽趋没落，却仍有少数出色的创作者，尤其是杨清河（Robert Yeo）及官林星波（Stella Kon）。杨清河的创作几乎涵盖文学的三大文类，即诗歌、小说及戏剧，并且是本地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他的创作生涯从诗开始，1960 年代末却以充满批判性与社会关怀的戏剧作品成名。其诗作尤其出色，经常散发出一种乡愁与缅怀交织的游离情绪，而这也正是他字里行间不经意流露的峇峇气质。杨清河的创作颇为丰富，正式出版过的作品包括有：三本诗集（即 *And Napalm Does Not Help*，1977；*A Part of Three: Poems*，1989；*Leaving Home, Mother: Selected Poems*，1999）、三部戏剧作品（即 *One Year Back Home: A Play in 5 Scenes 1966-1988*，1990；*Second Chance: A Cross Cultural Theatre Casebook*，1996；*The Singapore Trilogy: Are You There, Singapore? One Year Back Home; Changi*，2001）以及一部小说（*The Adventures of Holden Heng*，1986）。而官林星波为林文庆及陈笃生的后裔[35]，她的创作体裁也扩及戏剧、小说及诗歌三大类，其中又以剧本创作上的成就最受人瞩目，尤以独幕剧 *Emily of Emerald*

[34]《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页392-393。

[35] 官林星波是林文庆的曾孙女，父亲为林国安（Lim Kok Ann）；母亲 Rosie Seow Guat Kheng 则为陈武烈（陈笃生曾孙）的外孙女。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危险社团取缔法令》实施

Hill（《翡翠岭上的爱美丽》，1983年）最为著名，且多次在国内外各地公演，更在1983年荣获新加坡国家戏剧奖（Singapore National Playwriting Competition）首奖。

1970年代末峇峇社会兴起文化复兴风，开始在战后长期被忽略的境况中寻求自我定位，影响所及，许多以英语撰写的峇峇娘惹回忆录或传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Felix Chia的*Reminiscences*、Josephine Chia的*Frog Under a Coconut Shell*；Gwee Thian Hock的*A Nonya Mosaic: My Mother's Childhood*；Lee Kip Lin的Amber Sands: *A Boyhood Memoir*；Betty Lim Koon Teck的*A Rose on My Pillow*；Peter Wee H. L.的*From Farm and Kampong*；Yap Pheng Geck的*Scholar, Banker, Gentleman, Soldier*；Rosalind San Neo的*My Life, My Memories, My Story*等。另外，新加坡土生华人公会也以英语出版会刊——*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Newsletter*（《土生华人公会通讯》，1995-1996年）、*The Peranakan: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土生华人公会季刊》，1996-），除了报道该公会的活动，介绍峇峇文化外，也收录一些文学作品。

峇峇汉语文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于本地的汉语文坛的作家，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南下宦游或作短期寄寓的文人墨客，真正土生土长的屈指可数，而峇峇李清辉及陈省堂就占了两个名额。李清辉的古体诗及中日游记〈东游记略〉曾刊登于《叻报》；而陈省堂的〈敬访良医〉、〈天人交眷〉、〈称名宜正〉、〈割辫通议〉及〈越南游记〉等文章，则散见于《叻报》和《星报》。《叻报》创刊于1881年12月10日，报名乃取自"石叻"（新加坡俗称，译自马来文Selat）一词。该报是东南亚、也是世界上在中国以外首办的华文报章。其创办者薛有礼，出身峇峇世家，报章编写工作则主要由总编兼主笔叶季允主导，叶氏为中国南来文人，因此报章难免具有中国意识。但基本上，《叻报》仍是早期以汉文书写的峇峇的主要发表园地，而李清辉及陈省堂的作品，正好为早期弥漫中国"遗民"、"侨民"风味的华文文坛，注入了一股南洋本土风情。可惜随着老一辈峇峇的离世、峇峇社会西化日深，汉语传承几近断层，战后只有历史学家陈育崧仍有古体诗和散文等创作，但基本上，新华文坛的峇峇创作者已后无来者。

峇峇文化及风俗习惯

峇峇的祖辈多原籍中国闽、粤地区，即使久居南洋，但内心里仍有继承自宗族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而峇峇后裔在涵化的过程中，虽把南岛马来传统细节纳入日常生活，或受西方思潮濡染，却也固守着华南民族的文化特性与风俗。峇峇社会的文化，可说是多元纷呈的南洋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不仅包含了华人的传统文化特性，同时兼容马来文化特征。后因西方殖民者的文化入侵，在政治甚至文化认同上曾一度亲英，这种奇异的文化结合便成了所谓的"峇峇文化"。

宗教信仰及节庆礼俗

早期的华人与本地土著女子通婚并没有宗教的束缚，因此其后裔依然保留华人多元的传统信仰，即主要由民间信仰、祖先崇拜、儒、释、道混合而成的宗教信仰。

峇峇重视祖先崇拜，虽因涵化而被他人批评为"数典忘祖"，但传统峇峇家庭事实上更懂得"慎终追远"。神主牌曾是峇峇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住家大小，均设祖先灵位，以示孝道。此外，早期峇峇人家中多设有天官及灶君香炉，虔诚者厅堂也设神龛，或喜到庙中求神问卜；峇峇祭拜的神祇主要是观音、妈祖、关公、大圣爷（孙悟空）或大伯公等，小祀时奉以香火、节庆大祀则配以三牲、糕果。坐落在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天福宫，便是新加坡峇峇娘惹敬神拜佛的重要庙宇之一，该庙于1840年由峇峇陈笃生等人捐建，宫庙右侧的阁楼，则是早期峇峇华人组织"庆德会"之所在[36]。

峇峇华人秉承汉文化传统之余，亦入乡随俗，吸纳部分马来民间信仰，祭拜"番邦土地"公及拿督公，并相信

[36]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有限公司，1995年），页220；《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页23。

巫师作法之术。此外，峇峇祭仪及供品也因地制宜，他们会用酸柑拜神，也常用沙爹祭亡魂。直至近代以前，峇峇多是从长辈或寺庙僧侣处接受宗教浸濡，而祭仪的执行与承袭，正是凝聚峇峇社会的有效媒介之一。20 世纪初随着峇峇娘惹们的思想日趋洋化，许多人开始转为基督、天主教徒或无神论者。20 世纪中期以后，除了少数人依然保持拜祖先的习俗，峇峇社会的传统信仰已逐渐没落。

峇峇的日常生活沿袭了许多华人的传统风俗及礼节。华人节日如：农历新年、农历初九拜天公、清明、端午节、七巧节、中秋节及冬至等，峇峇的庆祝仪式甚至比一般华人更为传统。一年中最重要的节庆为农历新年，礼俗自旧历十二月二十四送神明上天庭述职拉开序幕，到年十五元宵节方止，而其中的团圆饭、守岁、拜神祭祖、上庙祈福及派红包等都是不可豁免的习俗。在许多峇峇家庭里，逢年过节，子孙辈依旧得遵照礼俗，跪着向长辈叩头和敬茶祝安。

峇峇娘惹的婚嫁礼俗繁杂，遵行沿袭自明清时期的华南古礼，却处处可见马来元素。峇峇娘惹婚礼习俗皆由长辈言传身教，家境不富裕者，婚礼仪式则较为简单，但对寄托着传宗接代愿望和家族姓氏昌荣的联姻，仍寄予高度重视；婚前说媒、合八字、选择良辰吉日、纳彩、邀请宾客、梳头、安床等仪式皆不可少。早期峇峇的纳彩仪式非常隆重，新郎家亲属与负责送礼者在唢呐与锣鼓伴奏下，前往新娘家送礼；新娘家收取某些礼物，并附上回礼，才让送礼团带回新郎家。纳彩仪式的礼物须包含猪腿、成双的红蜡烛、内装聘金及结婚费用（Belanja Kahwin）的红包、宋吉缎（Kain Songket）、金色槟榔（Pinang Mas）及珠宝等寓吉祥美满之物[37]。

传统峇峇婚礼一般延续 12 天，联姻双方都严格遵循各种礼节。从迎亲、吃（汤）圆、向“三界”（Sam-kai）神坛及祖先灵牌敬礼、向长辈敬茶、合房、三朝回门礼等，皆与华南婚俗大同小异，而婚庆中专伺新郎的 Pak Chindek（一般由马来男子或身穿马来服饰的男子担任）、桄叶槟榔、椰浆饭或婚宴时娱宾的咚当撒央（Dondang Sayang）等，都可见马来文化痕迹。二战后，随着生活的日渐西化与时局的改变，峇峇社会已不再举行长达 12 天的婚礼，一些家庭仍保留纳彩、迎亲及敬茶等婚俗，但仪式已去繁从简，新郎新娘也不再穿上传统婚庆礼服，改披婚纱西服行礼，似从前大富人家般铺张讲究的婚庆仪式，如今已鲜少见。

此外，峇峇社会的生育习俗也保留了许多华巫交融的观念。为避免影响出生婴儿，娘惹们从怀孕到婴儿满月，皆需遵守许多禁忌，如不杀生、不得修葺住房或移动家具等等。产后

娘惹装束

[37] Rosie Tan Kim Neo,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tudy of the Straits Chinese Way of Life," Un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1958), pp. 16–18; Peter Wee, *A Peranakan Legacy: the Heritage of the Straits Chinese* (Singapo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0), pp.20–21.

遵循传统坐月子进补，也采用马来疗法来调理身体，例如使用Param（手足涂擦剂）、Temu（姜科植物）及Jamu（混合草药）。相较于生日，峇峇更重视满月礼，一般会有剃发和净身仪式，尤其嫡长男婴满月，更会分送红鸡蛋及黄姜饭等，以示庆祝[38]。

峇峇社会也严格遵守继承自汉人祖先的丧葬习俗，以示孝道。根据逝者在家中的地位或辈分高低，丧葬仪式也有所不同，一家之长的葬礼尤其复杂，从逝者入殓、陪葬品选择、守夜、祭祀、吊祭、亲友的慰问及家属答礼、到出殡等，都有严谨的礼仪。战后峇峇社会虽仍延续拜祖先的传统，但丧葬仪式已简化许多，信奉其他宗教的峇峇甚至不再举行这些仪式，但不管任何信仰，多数人仍保留给予慰问金（白金）的礼俗。

生活习俗及物质文化

◆ 服饰

李钟珏在《新加坡风土记》中曾记载他1887年游历所见，清晰点出了峇峇典型男汉女巫的服饰文化：

> 久居叻之华人，多娶土人女为室，其装饰与安南女子略同，窄袖宽衣，其长没足，因而所生之女，亦从土装。闻闽人潮人家中，竟无一汉装妇女者，不若男子尚有一辨，存其本真也[39]。

峇峇早期多穿偏中式的衣裤或长袍，居家偶有汗衫纱笼的南洋风穿着。到了19世纪末，年轻一代的峇峇则逐渐放弃旧款服装，改穿西服。

手工精细，色彩华丽的娘惹珠鞋（黄慧敏提供）

峇峇社会服饰的马来化，主要展现在娘惹的穿着打扮上。娘惹的传统服饰主要是由彩色纱笼（Sarong，下裸围裙）配上长衫（Baju Panjang）或可峇雅短罩衫（Kebaya）组合而成。新加坡娘惹所穿的纱笼大多用来自爪哇岛的峇迪布（Batik）制成，以手绘峇迪为上品，布匹图案以花草为主。之后日渐多元化，而有鸟类、蝴蝶等图案。

Baju Panjang是最原始的娘惹服饰，一般为年长娘惹的穿着。20世纪初，年轻娘惹逐渐改穿由荷属印尼引入、质地轻薄且绣上美丽花边的Kebaya。娘惹的上衣通常不用纽扣，而是以一套三件的扣式胸针哥罗桑（Kerosang）或扣链（Kerosang rantai）搭襻，配以雕工精细的锡质腰带。另外，早期娘惹喜头盘螺形发髻插上金钗，1930年代以后，年轻一代的娘惹，则放弃发髻，仅以发夹装饰。娘惹们平时上街，布腰带上常挂有一个编织或珠子荷包，肩披手绢，脚踩精致的珠鞋或金线鞋出门；年节喜庆时则会穿金戴玉，尽显珠光宝气。后期受非峇峇华人社会影响，娘惹们偶尔也会穿上旗袍出席重要场合。

娘惹们的缝纫手工细腻精湛，服饰穿着的制作继承华巫文化的手艺，也融合了西方手艺风，自成另一股独特的南洋风味，尤其娘惹的制作珠鞋手艺，从鞋面的图案设计，到珠子的缝纫手法，都能看出曾受中国传统手工艺和西方华丽的洛可可风影响。可惜随着时代及潮流的更迭，现今精于制绣珠鞋的工匠，已不多见。

◆ 饮食

峇峇在饮食习惯方面，深受南岛文化影响。峇峇人好吃酸甜辣口味，进餐时多用手抓饭，后期多改用汤匙与叉子，筷子则只在祭拜祖先的供桌和婚礼的“进房”（Chim Pang）仪式中出现。早期许多娘惹们喜欢嚼槟榔栝叶，富贵者甚至专有一套调配槟榔的精致器具；而南洋著名的菜系之一——“娘惹菜”，则融合了华人与南岛住民的烹饪精髓，是华人文化本土化最独特的体现。除了中式烹调中常用的葱、姜、蒜、酱油、豆酱等佐料，娘惹也善用本土食材和香料，如酸角果肉（Asam jawa）、黑果（Buah keluak）、辣椒、马拉盏（Belachan）、石栗（Buah keras）、香茅（Serai）、麻风柑叶（Daun limau perut）

[38] Rosie Tan Kim Neo, *op.cit.*, pp. 56–72.

[39]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年），页10。

等调味。此外，娘惹擅长以糯米、椰子、香兰叶（Daun pandan）及椰糖等材料，制作色彩斑斓，精致香浓的娘惹糕点。

娘惹的烹饪及女红手艺，承载了中华传统观念，旧时的娘惹多为出身中上层官户或商贾人家的闺秀，成年出嫁前，多足不出户，每天在家向女性长辈学习烧菜和刺绣，以提升自身的价值，以期婚后能凭手艺赢得夫家尊重，也因此娘惹菜用料繁多、制作时间长而工序复杂，且代代相传。

峇峇社会对厨艺的重视，也衍生出另一让人称道的文化遗产——娘惹器具。19 世纪中期 20 世纪初，峇峇大户人家一般会收藏至少两套瓷器。白底蓝花系的青花瓷一般供日常和祭祖时使用，俗称“厨房瓷”，这些瓷器多进口自中国或日本。另一种是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专门自中国江西景德镇订制或自上海进口、以牡丹凤凰图案为主饰，被称为“娘惹瓷”（Nyonya Ware）的粉彩瓷器，这类彩瓷通常用于节日或喜庆场合，后期也用于日常生活。此外，少数富裕峇峇也会购买欧洲进口的器具，惟数量不多。在峇峇社会发展的巅峰期，拥有瓷器的数量和品质象征着峇峇家族的财富与社会地位，而瓷器的使用，某种程度上也彰显了峇峇文化在颜色及设计上的喜好，以及与中华饮食文化的联系。

• 建筑

新加坡的峇峇早期主要聚居于尼路（Neil Road）及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之后延伸至如切（Joo Chiat）、加东（Katong）、翡翠岭（Emerald Hill）一带。

新加坡典型的峇峇宅邸，主要以街屋（或称店屋，shophouse）为主，一般为连栋式排屋，屋前一楼通常保留具遮阳避雨功能的行走空间，俗称“五脚基”[40]。峇峇房屋设计融合了中国南方、马来、荷兰以及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特色。殖民地时期的峇峇社会，住宅上华丽精美的雕饰往往反映了屋主的财富与社会地位，因此富裕的峇峇住宅，屋前墙面皆装饰华美，常有寓意福、禄、寿、喜的花草、鸟兽浮雕，或镶嵌进口自法国、英国及比利时等地的雕花或几何设计的瓷砖。

峇峇住宅一般狭窄却深长，设有大厅、中厅、内厅、天井、后院、侧院等，并有气孔或檐板镂空、天井或前庭等通风照明设计。屋内摆设古色古香，雕栋匾额，不乏古朴典雅的木制家具、陶瓷古董等摆设。而峇峇即使不谙中文，也喜在前门挂上“字号”匾额，以显门楣，通常一户人家的字号就用作屋名；此外大门或窗户上也张贴或嵌刻对联，寓意吉祥之余，也突显大户人家的书香之气。

峇峇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 19 世纪以前的交流孕育期、英殖民地时期的融合兴盛期、到 20 世纪战后的疏离没落期，在在都反映着其所处年代及环境对该社会的影响。最典型的“峇峇社会”，应是指那些与本地原住民有着混合血统和文化身份、在殖民地时期具浓厚西方文化政治思想背景的土生族群，并不包括其他单一血统及文化的土生华人在内。

峇峇的文化经常是从“家”这概念衍生出发的。早期南来的汉人因娶了马来妇女而在当地成家立业，进而有了一群混血后代，再从家出发到“家族”不断的扩大，因联姻而形成一个自别于他族的社会。峇峇文化上最精髓之处都展现在“宗族”生活和风俗习惯上，而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以及文学也正是为迎合峇峇的家庭教育及居家需求而出现的。峇峇社会在融入马来语言、衣着饮食，以及西方思潮的同时，华族家传的风俗及道统意识却始终与之相连。

20 世纪中期以后，二战的洗礼及时局的

[40] 五脚基，意为五英尺宽走道，原为海峡殖民地时期制定的建规之一，即“Five Foot Way”，马来语译为“Kaki Lima”（五尺），后被海峡华人（福建人）音译为“Goh-kaki”。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6 月 1 日

新加坡与柔佛之间的电话接通

加东如切路上，至今仍能看见早期典型的峇峇家居（黄慧敏提供）

变迁，使峇峇的经济势力遭受重挫，许多富裕峇峇家道式微。早期祖孙同堂、家族聚居的居住形式在战后也逐渐瓦解；少了宗族的联系，年轻一辈的峇峇也因传统文化继承上的断层而更见西化。可以说，华巫西文化的兼容曾使峇峇在英殖民地时期面面俱到，自成精英阶层，带领华社推动新加坡社会发展；战后却也令他们在华族与马来族之间，陷入不伦不类的尴尬局面，而抹杀了他们此前曾作出的贡献。换言之，峇峇本身长期处于从涵化回到涵化的流变中，其文化特性的转淡、民族认同的徘徊、人口数目的减少和家族“富不过三代”的宿命等等，已使该族团迄今几已步入黄昏。

然而，随着地球村的来临，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涵化已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今如何在现代化的洪流中保留东方“以家为本”的价值观？确立自身的本土特色？形塑国家文化意识？已成了必须思考的问题。而孕育自南洋，融合中、巫、西文化精髓的峇峇社会文化，或许正可作为未来本土多元文化与意识和谐交流的典范。

附表
新加坡峇峇的华文作品列表

作者	署名	作品	发表刊物	发表日期	体裁	备注
陈省堂	闽漳陈恭三省堂	越南游记自序		1888	序文	
陈省堂		越南游记	叻报	1888/05/08-05/18	游记	
陈省堂		敬访良医	叻报	1888/08/10	启事	
李清辉		赠日本友人仓辜作诗	叻报	1889/02/12	诗（古体）	摘自：〈东游记略〉
李清辉		东游记略	叻报	1889/02/12-03/05	游记	
李清辉		奉和铸生词兄见赠原韵	叻报	1889/10/23	诗（古体）	
陈省堂	敏求斋主人及诸仝人	天人交眷	星报	1892/04/22	论说	
陈省堂	省堂陈希曾	论婚姻注册	叻报	1892/11/29	论说	
陈省堂	实叻敏求斋主人省堂陈希曾	恭贺新禧	星报	1893/02/23	启事	
陈省堂	星江居士	重游越南记	叻报	1893/08/25-09/06	游记	
陈省堂	敏求斋主人	观蛇者说	叻报	1893/09/21	论说	
陈省堂	敏求斋主人	称名宜正	星报	1893/10/17	论说	
陈省堂	省堂陈希曾	游凤山寺	星报	1893/12/16	游记	
陈省堂	敏求斋主人	本坡华人饮食失宜失所亟宜整顿说	星报	1894/01/20-01/22	论说	
陈省堂		敏求斋集自序（原题：文集择艳）	星报	1894/02/21	序文	
陈省堂	敏求斋	幻剧述奇	星报	1894/02/24	游记	
陈省堂		清娱轩记	星报	1894/03/06	游记	
陈省堂	敏求斋	携眷游槟	星报	1894/03/09	游记	
陈省堂	敏求斋	日落洞记	星报	1894/03/22	游记	
陈省堂	敏求斋	祀非其鬼	星报	1894/03/30	论说	
陈省堂	敏求斋主人	游苏门达腊记	星报	1894/05/17-05/21	游记	
陈省堂	敏求斋主人	重游槟城记	叻报	1894/06/05	游记	
陈省堂	敏求斋主人	浮罗访友	星报	1894/06/08	游记	
陈省堂	敏求斋主人	游董里记	叻报	1894/06/12	游记	

作者	署名	作品	发表刊物	发表日期	体裁	备注
陈省堂	敏求斋主人	端阳浴海记	星报	1894/06/12	游记	
陈省堂	敏求斋	寥海丛岛记	叻报	1894/06/26	游记	
陈省堂	敏求斋	隆游记略	叻报	1895/11/30	游记	
曾锦文	槟榔屿半老叟介田曾锦文	他骑骏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上虽不足下有余。	《三国》	1896	诗（古体）	
陈省堂		辞行晋越	叻报	1896/12/22	启事	
林文庆		防疫说	天南新报	1898/06/07	论说	
林文庆		募创本坡女子学堂缘起	天南新报	1899/04/18	杂文	
陈省堂	敏求斋主人	割辫通议	叻报	1899/05/22	论说	
陈省堂	敏求斋	西贡花园记	叻报	1899/07/17	游记	
陈省堂		哭洪君兆元哀词	叻报	1899/10/23	论说	
林文庆		“格物杂说”之〈论流星〉	日新报	1899/11/15-16	论说	
林文庆		防疫说	日新报	1899/11/17	论说	
林文庆		译西报载马也实论日本人治台事	日新报	1899/11/18	论说	
林文庆		译西报载班迈利论英直战事	日新报	1899/11/21	论说	
林文庆		译西报载班君论英直战事感而书此	日新报	1899/11/22	论说	
林文庆		译西报论中英商务	日新报	1899/11/23	论说	
林文庆		译西报记罗钦使在英京游览事	日新报	1899/11/28	论说	
林文庆		论儒教	日新报	1899/12/13-15	论说	
林文庆		“格物杂说”之〈释名〉	日新报	1899/12/19	论说	
陈省堂	闽漳陈省堂	越南地舆记	叻报	1902/03/27-04/07	游记	
陈省堂		越南风俗论	叻报	1902/08/18	游记	
陈省堂		莫分畛域	叻报	1910/09/26	论说	
陈省堂		外甥娶妗咏	叻报	1911/09/19	论说	
陈省堂	省堂	义仆能干？	叻报	1911/10/10	论说	
林文庆		普通卫生讲义		1911	论说	

作者	署名	作品	发表刊物	发表日期	体裁	备注
林文庆		民国必要：孔教大纲		1914/03	论说	
林义顺		林义顺传		1921	传记	
林文庆		李鸿章杂记（译本）		不详	杂文	
林文庆		人类种族问题	厦门大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	1926	论说	
林文庆		林文庆先生在中华俱乐部的演说词	南洋商报	1926/02/02，02/04	论说	
林文庆		本校五周年纪念会林校长之演说辞	厦大周刊，第145期	1926/04/10	论说	
林文庆		大学毕业生之责任	厦大周刊，第155期	1926/06/19	论说	
林文庆		恭祝圣诞之盛况—林校长言说纪略	厦大周刊，第158期	1926/10/09	杂文	
林文庆		林校长讲演进化论之科学及哲学观	厦大周刊，第177期	1927/11/26	论说	
林文庆		大学责任观	厦大周刊，第192期	1928/01/05	论说	
林文庆		林校长撰赠奉安挽辞	厦大周刊，第207期	1929/06/08	悼文	
林文庆		陈嘉庚先生与本校	厦门大学九周年纪念刊	1930/04	论说	
林文庆		三民主义救国真诠	厦大周刊，第10卷，第1期（总第237期）	1930	论说	
林文庆		三民主义之心里的基础	厦大周刊，第10卷，第14期（总第250期）	1930-31	论说	
林文庆		厦大十周年纪念的意义	厦大十周年纪念刊（1921-1931）	1931	论说	
林文庆		厦门大学十年报告书		1931	杂文	
林文庆		个人修养论	厦大周刊，第11卷，第16期（总第279期）	1931-32	论说	
林文庆		大学生应有之态度	厦大周刊，第12卷，第1期	1932/09/26	论说	

作者	署名	作品	发表刊物	发表日期	体裁	备注
林文庆		敬告全国同胞固有民族精神应付国难	厦门大学十二周年纪念专号	1933/04	论说	
林文庆		大学生活的理想	厦大周刊，第13卷，第1期	1933/09/30	论说	
张永福		南洋与创立民国		1933/10	杂文	
林文庆		科学在现代文化上的地位	厦大周刊，第13卷，第9期	1933/11	论说	
林文庆		中国如何救亡图存	厦大周刊，第13卷，第15期	1934/03/17	论说	
林文庆		厦门大学最近一年来之回顾及其感想	厦大周刊，第13卷，第19期	1934/04/06	杂文	
林文庆		此次募捐经过情形	厦大周刊，第14卷，第23期	1935/04/15	杂文	
林文庆		本校第十届毕业典礼盛况	厦大周刊，第14卷，第30期	1935/06/24	杂文	
林文庆		林校长演讲救国问题	厦大周刊，第15卷，第16期	1936	论说	
林文庆		牺牲自己建设国家	厦大校刊，第一卷，第10期	1937/03/01	论说	
林文庆		中国文明的伦理根据	南洋商报	1938/05/14	论说	
林文庆		中国的进化	南洋商报	1938/08/19	论说	
林文庆		人生的哲学	南洋商报	1939/07/13	论说	
林文庆		马来亚之华人	南洋商报	1940/11/06	论说	
林文庆		混乱之世界	南洋商报	1940/12/01	论说	
林文庆		人格修养	南洋商报	1941/02/23	论说	
林文庆		广播七七纪念	南洋商报	1941/07/07	杂文	
林文庆		孔子学说真谛	星洲日报	1941/08/16	论说	
林文庆		日人在中国的暴行	南洋商报	1941/09/17	论说	
林文庆		中国民主之复兴	星洲日报	1941/09/19	论说	
陈育崧		花朝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戊戌寒食清明花盛开槟城小住怀南海康先生清明花即安山那先生极爱之名曰一日黄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和陈振贤先生感怀一律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过七洲洋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作者	署名	作品	发表刊物	发表日期	体裁	备注
陈育崧		戊戌重周槟城怀康南海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此诗集据《椰阴馆文存·第二卷》426页印刷为“柳影潮声”，经柯木林先生指正，实乃“椰影潮声”。根据《椰阴馆文存补编》中柯木林先生在〈“万点花飞雨外村”——悼陈育崧先生〉一文叙述，其收藏之《椰影潮声》为1976年陈氏本人“手抄其旧作”赠予。又陈氏曾于《东南亚古代史论丛》序文最后署“陈育崧1968年开斋节写于东海岸椰影潮声楼”，笔者猜测该诗集便是在该时期旅居东海岸创作，再根据陈育崧在《二十年代的槟城青年运动》叙述其赋〈戊戌重周槟城怀康南海〉诗文的经过，推测本集之诗作当作于19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非一时一地之作。
陈育崧		厦大同学倡办中正中学举林惠祥教授为校长有谋以挤之者林君闻之拂袖而去诗以慰之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镇北关吊鲁迅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莲花河访张观察故宅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夜泊龙牙门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从巴力至木歪渡霹雳河道中即景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泳[雅女]（俗称少妇曰[雅女]音雅汤平）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题翁占秋画孙陵子丈珠帘图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寄槟城故人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赠愚趣园老人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金山怀古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访唐人街遗址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欧游心影梵蒂冈谒教宗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罗马斗兽圈巡礼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汉堡不夜城惊艳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夜出巴黎凯旋门有感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作者	署名	作品	发表刊物	发表日期	体裁	备注
陈育崧		伦敦玫瑰园听乐队演奏花丛假寐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康桥访德坤夫妇下榻木扉书屋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飞渡阿尔卑斯山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游日光慰鬼怒川酒家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自江之岛至湖尻下车箱根信宿乃去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乙巳初秋有北国之行八月十日抵鹭门闻新洲独立喜而赋比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广州看东方红演出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题中华儿女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乙巳除夕访嘉定边和忽传陈桥之变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士林河吊白思华迁政信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槟城花岬春潮馆看落日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赠红头军代表潘惠珍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访船业重镇挪威豪义山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挪京奥斯陆街头偶见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访东柏林忽传艾森豪威尔将军噩耗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东京新宿御苑看落樱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京都二条城怀古德川归政明治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台北听歌仔调忆陈少苏夫子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访安哥窟响者指点遗迹辄引周达观风土记相左证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重游箱根景物全非感慨系之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读诗隐梅花三弄爱其“天上有星皆北拱人间无水不东流”句感赋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作者	署名	作品	发表刊物	发表日期	体裁	备注
陈育崧		豆腐街访叶季允故宅	椰影潮声	1950-70s	诗（古体）	
陈育崧		《马来亚潮侨印象记》序	《马来亚潮侨印象记》	1951	序文	
陈育崧		“圣经与中华”评介	星洲周刊（第83期）	1952/11/13	杂文	
鲁白野		狮城散记		1953	杂文（集）	
鲁白野		马来散记		1954	杂文（集）	
陈育崧		椰阴馆读书记	南洋学报（第十卷第一辑）	1954	杂文	
鲁白野	威北华	流星		1955	小说（集）	
陈育崧		“开吧历代史记注本目次”序	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	1955	序文	
鲁白野	威北华	春耕		1955.	散文（集）	
张永福		觚园诗集		1955	诗集（古近体）	
陈育崧		《社会科学研究集刊》代序	南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集刊》	1957	序文	
鲁白野		马来亚		1958	杂文（集）	
陈育崧		叶季允先生——第一报人、海国诗宗	南洋第一报人	1958	论说	
鲁白野		印度印象		1959	游记（集）	
鲁白野	威北华	黎明前的行脚		1959	诗（集）	
陈育崧		记林文庆以狗肉起黄遵宪沉疴事	南洋学报（第17卷第2辑）	1961	杂文	
陈育崧		林文庆论	南洋学报（第19卷第1、2辑）	1964	论说	
陈育崧		以史报故国——悼叶华芬先生	南洋学报（第19卷1、2辑）	1964	悼文	
陈育崧		南渡衣冠此一人——纪念赵泰先生	中国学会年刊	1964-1967	悼文	
陈育崧		陈嘉庚研究计划序	陈嘉庚（陈着）	1965	杂文	
陈育崧		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展览会启	星洲日报（文艺副刊）	1965	序跋	
陈育崧		陈嘉庚先生传		1965	传记	

作者	署名	作品	发表刊物	发表日期	体裁	备注
陈育崧		林文庆博士传		1965	传记	见文存补编：与李业霖合着
陈育崧		《东南亚古代史论丛》序	南洋学会丛书第8种	1969	序文	
陈育崧		谈谈“翻译的困难问题”	新社文艺（第12期）	1970	杂文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南洋学报（第20卷第2辑）/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1971	序文	
陈育崧		《行隐集》序	南洋学会丛书第14种	1972	序文	
陈育崧		《石叻古迹》序	南洋学会丛书第13种	1973	序文	
陈育崧		《新加坡会馆志》序	南洋学会丛书第16种	1973	序文	
陈育崧		“新加坡沦陷三年半”读后	南洋商报（商余）	1973/07/30-31	杂文	
陈育崧		怀念百扇斋老人	黄曼士纪念文集	1976	悼文	

参考资料：

马仑，《新马文坛人物扫瞄，1825-1990》，士姑来（Skudai）：书辉出版社，1991年

马仑，《新马华文作者风采，1875-2000》，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柯木林，《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有限公司，1995年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卷一至三），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

陈育崧，魏维贤、许苏我编，《椰阴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年

叶钟铃，《陈省堂文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4年

庄钦永，《新呷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叻报》：http://www.lib.nus.edu.sg/lebao/index.htm（2003/02/05-15浏览）

《星报》：1890-1898年

第五节　峇峇双杰
——林文庆与宋旺相

摘要

本节先从林文庆与宋旺相之生平事迹归纳峇峇知识分子群体中两种类型的形塑与特征，再以他俩合编的杂志和个人的历史著述为主要案例，论证两人的共识 / 同轨与分歧 / 分道，以及他们的跨越与局限。评价走入历史的人物和他们笔下的历史呈现，最后以古喻今，乃本文一大特色。

Abstract

This section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wo distinctive types of Baba intellectual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Lim Boon Keng's and Song Ong Siang's lives. Using the magazine both men jointly edited and their key publications, the author analyses their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their thought, their collaborative and separate paths as well as their transcendence and limitations. The section first assesses the historical personages and the history as depicted by them before draw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sent.

李元瑾（**Lee Guan Kin**）

在英国统治新马时期，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三地曾于1826年被整合成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有着土著血缘的土生华人（男俗称“峇峇”，女俗称“娘惹”）因此多了一个称谓——“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这个社群在19与20世纪交替间出现了三位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那就是新加坡的林文庆（Lim Boon Keng，1869-1957）和宋旺相（Song Ong Siang，1871-1941），以及槟榔屿的伍连德（Wu Lien-teh，1879-1960）。他们都毕业于新加坡著名的莱佛士书院，并先后获得女皇奖学金到英国攻读医学或法律。三人学成返乡后除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发挥所长外，还联合主编《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共同推动海峡华人/峇峇（本节将交替使用此二词）的社会、文化和教育之改革，被誉为“海峡三杰”。

本节从新加坡的视角出发，聚焦于林文庆与宋旺相这两位当地最杰出的峇峇知识分子。他们是一对好友，互相欣赏、珍惜和尊重，并在许多重要事项上并肩合作，包括移风易俗、教育群众、提倡女学、照顾华人利益以及向英国政权输诚等。但另一方面，两人在社群、阶级、文化、宗教、乡土和国家等的归属意识，有着明显的差距。虽说“君子和而不同”，但分歧难免影响共事。笔者将通过比照的方式，呈现他们的背景与特征、共识与分歧、同轨与分道，以及跨越与局限。这样的探索，也可窥探百年前峇峇社会中两种受英文教育群体的精神世界与生活状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当代意义。

本节先从人物的生平和活动等归纳两种类型的形塑、特征和异同，再以一份林文庆与宋旺相合编的杂志——《海峡华人杂志》、一篇林文庆执笔的长篇历史文章——〈马来亚的华人〉（"The Chinese in Malaya"）[1]和一部宋旺相编写的历史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2]，作为主要案例，论证两人之间的共识 / 同轨与分歧 / 分道，以及他们的跨越与局限。这里要强调的是，林文庆与宋旺相两人都非常重视历史，也从事新马华人历史的撰写。宋旺相在林文庆的推荐下，完成了《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并于1923年出版。而林文庆在此前已发表过〈英属马来亚的华人〉、〈马来亚华人的革命运动〉[3]以及前面提到的〈马来亚的华人〉等文章。两人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写作，加强笔者选题与论述的意义；而以历史著作评论其执笔者——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不仅充实本节的内容，也构成本节的一大特色。

如何比较 / 评价已走入历史的人物以及他们笔下的历史呈现，这确实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充满趣味性的尝试。

两种类型

本节将通过横向对比，从出生背景、语言使用、求学经验、婚姻状况、社交活动、社群服务、文教事业、政治兴趣等层面，描绘林文庆与宋旺相，突显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中两种类型的特征及其异同[4]。

林文庆与宋旺相是同时代的人物，年龄相差仅两岁（林文庆比宋旺相大两岁）。林文庆祖籍福建海澄，祖父林玛彭在1939年从中国移居槟榔屿，与当地娘惹结婚。父亲林天尧在槟榔屿出世，后来全家迁至新加坡。林文庆生于新加坡，是第二代土生华人，母亲是马六甲娘惹。宋旺相祖籍福建南靖，曾祖父于18世纪末南来，祖父宋英宗和父亲宋佛俭都在马六甲出生，1843年父亲移居新加坡，宋旺相在新加坡诞生，是第三代土生华人，母亲是槟城娘惹（父亲丧妻再娶）。个人的“血缘”（第二代或第三代土生）与祖、父的“地缘”（在中国、槟榔屿或马六甲出生），对探究林、宋二人的乡土意识和华化程度，具有参照意义。林文庆内心有“星洲”（新加坡）也有鹭岛（厦门），有英国也有中国；宋旺相只爱一乡一国——新加坡和英国。

---

[1] 此文刊登于 *Present Day Impressions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London, 1917)。

[2]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 Murray, 1923). 这里引用的是1967年马来亚大学出版的版本，特此注明。

[3] "The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Proceeding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Feb,10，1910;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Malaya," Proceeding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Jul.12.1913.“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新马在独立之前是一家；“英属马来亚”属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包含了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及五个马来属邦。

[4] 有关林文庆与宋旺相的出生、教育、婚姻、社交、成就、活动、贡献等详细的论述与资料，参阅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以下简写为《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第二章和第三章，必要之处再另注。

两人都深受父辈影响。林文庆12岁丧父，由祖父母带大。林玛彭是个读书人，在华商章芳琳公司任职，为孙子取名“文庆”是希望他熟谙中华文化，还一度将孙子送入义塾念书，虽然为时短暂。祖父的文化修养、方言使用和中国乡土意识，在孙子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宋旺相的祖父宋英宗重视中文，将儿子安置在新加坡兄长开设的私塾中。但宋佛俭却瞒过伯父偷偷到香港，再赴英国，在那里读书和入教，还意外荣获维多利亚女皇在白金汉宫接见。他回到新加坡后创立磐石堂（Prinsep Street Presbyterian Church），组织海峡华人第一个基督教家庭，职业上则终生受雇于英国公司。宋旺相婴儿时就在磐石堂受洗，14岁入会。家庭长辈本身的教养，影响日后二人对中华文化和基督教的取舍迎拒。

林文庆、宋旺相都在峇峇家庭中长大。因为女性长辈的关系，峇峇马来语（Baba Malay）（新加坡和马六甲峇峇人所操的马来语）是家中不可或缺的用语。在学习马来文方面，宋旺相家境更为优越。林文庆的母亲早逝，宋旺相的母亲冯芳莲能读能写马来文，成为儿子的第一位马来文老师，为宋旺相日后在莱佛士书院学习马来文打下坚实的基础。至于方言和中文，林文庆从祖父身上获益，自幼会说福建话，在英国读书期间因为不懂中文而深感羞愧，19岁开始发奋勤学。宋旺相则很少说福建话，更没触碰中文，留学英国时即便在人面前表示不谙中华语文，也不会像林文庆那样敏感和在意。林、宋二人语言倾向，从写作更可以看出。林文庆的作品大部分用英文书写，少数以中文发表，还出版了华文报《日新报》。宋旺相则精通英巫双语，作品以英文为主，其次是马来文，还创办马来文报《东方之星》（*Bintang Timor*）。

林、宋二人都是先立业后成家。林文庆前后迎娶福州黄端琼——黄乃裳举人的女儿和厦门殷碧霞——殷雪村医生的妹妹。两位太太都通晓中英双语，对林文庆探索中华语言文化和追求中国兴味不无帮助。有趣的是，她们俩出嫁前已是基督教徒，而林文庆一直是排斥基督教的。宋旺相的妻子杨喜娘也不是娘惹，父母来自中国，父亲杨本盛从商。杨喜娘懂得福建话和广东话，在私人老师的指导下又掌握马来语和英语，出嫁前才接受基督教，婚后在磐石堂司琴，是位“夫唱妇随”的贤内助。林文庆与黄端琼生四子，即可胜、可明、可能和可聊；林文庆与殷碧霞育一女一儿，即月卿和炳汉。月卿和炳汉受笔者访问时，能用华语和英语交谈。宋旺相与杨喜娘有两个养女，即Lily 和Mabel。Mabel告诉笔者，她们姐妹的中文名是母亲取的，她只记得自己叫美娘。两姐妹都不会讲华语。林、宋二人的语言习惯也影响后代。

林宋二人的社交活动受到个人出身、语言、职业、信仰等因素的制约。林文庆活跃于医、商、报、政等各界，深交者包括律师宋旺相、报人邱菽园、医生殷雪村、商人陈嘉庚、政治人物孙中山等。林文庆与宋旺相25年来携手领导海峡华人社群，或改进现状或争取权益。林文庆与邱菽园是康有为的拥护者，协助他遥控各地的保皇运动和中国的汉口起事。林文庆与殷雪村是反鸦片和兴女学的好搭档。林文庆与陈嘉庚为厦门大学并肩奋斗16年。林文庆曾协助孙中山的日本朋友摆脱新加坡的牢狱之灾，后来加入革命党和同盟会的活动。宋旺相的社交对象主要是教会中人、律师、军官和政要等。他结交许多英国朋友，那张收进《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36岁结婚照，新人两侧坐着12位男士，10位是白人。他跟牧师慕雷（William Murray）共同主持磐石堂和华人基督教协会前后34年，与律师詹姆斯·爱谨（James Aitken）合营律师馆长达36年。这些朋友和共事伙伴，大多数是他家中常客。

林、宋二人爱护海峡华人社群。他们的海峡华人改革党（Straits Chinese Reform Party）推动峇峇社会的改革，其喉舌即《海峡华人杂志》（1897年创办）。他们的海峡英籍华人公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3月1日

政府设立孤寡救济基金。12月15日第一次发行本地明信片

林文庆与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1926年）合影（陈仲熙提供）

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1900年设立）带领峇峇向英国输诚示忠和维护作为英国公民的权益。他们的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1899年开办）以小娘惹为栽培对象。林文庆与宋旺相的分别在于，林文庆同时也活跃在中国移民社群之中。林文庆与中国移民的关系密切，他的一些作品突出新客的优良素质，赞扬他们头家的创业精神，肯定劳工的贡献。他受邀加入邱菽园的《天南新报》，自己也为中文读者出版《日新报》。他是中华总商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努力争取的领袖人物。宋旺相则不然，他生活在峇峇的圈子内，业余大部分时间是在教堂内和教会组织里活动。

林、宋二人深受维多利亚时代学术风气的熏陶，对西方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和哲学等都深感兴趣，对自由主义、民主理念、女权思想和现代化精神都非常向往。相较之下，宋旺相比林文庆更喜欢西洋的音乐和西式的体育活动，他听古典音乐、拉小提琴、射击、踢足球、打网球和桌球。从中西方文化的角度切入，林文庆泅泳于两者之间，推崇西方科学和进化论，但更积极提倡儒学 / 孔教，甚至以儒学 / 孔教跟基督教抗衡，并赞同西学源于中学、中学胜于西学之类的论说。宋旺相则可谓彻底西化，是个绝对虔诚的基督徒，终其一生为教会服务，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只限于一点小传统。不过他包容儒学，默许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尊儒学而远西教。

林、宋二人热爱新加坡，这是他们的家乡。林文庆一生除了留学英国六年和掌管厦门大学16 年，其余65年都在新加坡度过。他的黄金岁月（23岁—51岁）都贡献给出生地，并在经济、医学、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有所建树。1921年，林文庆携带家眷到厦门。厦门鼓浪屿是殷碧霞的出生地，他们于1908年结婚后便开始在那里长期购置地产，厦门成为林文庆的第二故乡。1937年，厦大改为公立，林文庆离开厦门。那时，他在新加坡的财富因所托非人而早已荡然无存，但他还是选择终老于此。相对来说，宋旺相的本土意识更浓，他除了留英五年和欧游三次，始终没迁离新加坡。对他来说，个人的乡在新加坡，宋家的根在马六甲，而中国原乡已无意义。宋旺相以自己的信仰，专长和方式，为出生地服务，其中一大贡献便是完成《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从某一些角度为新加坡系统性地构筑了整百年的记忆，从而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

林、宋二人都认同海峡华人是英籍子民，为表忠心先后成立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和华人义勇军（Chinese Company of the Volunteer Force）。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公会出版了《对英帝国的责任：大战期间海峡华人的基本指南》手册，发动峇峇支持英国，林、宋二人是主要的执笔者[5]。不过，林文庆远不如宋旺相的专一。林文庆到厦大掌校之前，已涉足康有为的维新和保皇运动、满清政权的招揽活动，以及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从1898年至1921年，他周旋在中国和英国两大政权之间，其归属感显得摇摆，而越往后亲中的行迹越明显。宋旺相则不然，他对英国忠贞不二，也很在乎海峡华人的忠诚是否受到重视。当海峡殖民地政府拒绝颁发护照给一位海峡华人时，他立即发表抗辩文章〈海峡华人是英籍子民吗？〉[6]宋旺相的赤胆忠心最终获得英皇的赏识，并于1936年荣获乔治五世的封爵。从此，他称自己和他的社群为“英皇的华人”（King's Chinese）[7]。

---

[5] 手册即*Duty to the British Empire. Being an Elementary Guide for Straits Chinese during Great War* (Singapore: SCBA, 1915). 共21篇文章，由5人执笔，10篇出自林文庆，6篇出自宋旺相。见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 532–533.

[6] Song Ong Siang, "Are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Subjects?"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以下简写为S.C.M.）, vol. 3, no.10, Jun, 1899.

[7] 乔治五世逝世前数日册封宋旺相为爵士，1936年1月1日生效，宋美娘珍藏封爵证书；1936年2月20日，宋旺相回信感谢剑桥唐宁学院友人的贺函时就自称 "one of the King's Chinese" ,见Letter of Song Ong Siang to H.C. Whalley Tooker Esq.,M. A., L. L. M. 同年宋旺相在《海峡时报年刊》发表关于海峡华人文化发展的文章，题目便冠以“英皇的华人”，原文题目和出处："The King's Chinese — Their Cultural Evolution from Immigrants to Citizens of a Crown Colony, *The Straits Times Annual*, 1936.

综上所述，海峡华人社群并非铁板一块。大致上，峇峇知识分子都通晓峇峇马来语和马来文，受英文教育，参与西式团体，从事西式文教、体育、音乐、娱乐等活动。他们对自己的社群有强烈的归属感，以马来亚，尤其是出生地新加坡为家乡，认同海峡华人为英国子民，并乐意为社群、家乡和国家（英国及其殖民地）做事。然而，在中国政治和中华文化的冲击下，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自动学习中华语文、吸纳中华文化、走入新客社群中，甚至参与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有关的组织和活动。林文庆及他的许多志同道合者，如陈德顺、王纯智、陈武烈、黄献文、龚振荣、李浚源、林秉祥、殷雪村、孔天增、黄兆珪等，便是属于这一类型[8]。相形之下，宋旺相及周围伙伴，如宋旺裕、陈文源、林观泰、林观扬、陈文进、陈德娘、黄瑞朝、许山兴、林汉河、李珠娘等则比较西化，他们与新客社群保持距离，对中国事物淡然以对，属于另一类型[9]。两群比照，前者显得复杂、跨越性强；后者比较单纯、局限性明显。两群既然有共识，必能同轨共事，但彼此的分歧无法避免，当差距越来越大时，分道扬镳的时刻也就降临。

共识与分歧

以下阐论林文庆与宋旺相的共识与分歧，以及两人因共识而共事因分歧而分道，主要以他们年青时掀起的海峡华人社会改革[10]为例证，并围绕在这场改革的喉舌《海峡华人杂志》。

林、宋二人是莱佛士书院同学。共同的时代背景、殖民地环境、英文教育出身、海峡华人和英籍子民身份，使两个年青人自然地走在一块，为一些共同目标努力。从1890年代末至1920年代结束这20多年，他俩最紧密、最持久的合作要算是推动海峡华人社会的改革和实践对殖民地政权的忠悃。

1893年，林、宋二人从英国归来。两人经过西方文明的洗礼，对眼前海峡华人的现状深感焦虑。1894年，他们已开始活跃，林文庆在公共场合发表反鸦片的精彩演说，宋旺相则出版《东方之星》启发读者的思想。不久后他们就携手共事，努力通过新式的组织和宣传方式，帮助峇峇摆脱愚昧无知、迷信保守和好逸恶劳等劣质，引导他们追求知识、科学、道德和文明，走向现代化。1896年，二人合组华人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分任正副主席。学会经常主办演讲、学术课程和时事辩论会之类的活动，促进峇峇对政治、学术、时事等的兴趣，引发他们对社会人群的责任心。1897年，他们又合编《海峡华人杂志》，作为改革的喉舌。杂志宗旨在促进知识分子的知识性活动，提供他们探讨各种人文课题的园地。1899年，两人再合办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女校通过智育、体育和群育变换海峡华人女孩的素质，从而改进女性的地位、子女的家教和社群的前途。

林、宋二人合作密切，关系和谐，但这不等于说两人之间的看法没有分歧。事实是，他们各有各坚守的革新哲学和宗教信仰。林文庆的改革言行，不只受西方科学、自由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也从儒学/孔教和中国清末改良主义运动得到启示，因而添加了中华文化和中国这两种元素。这些元素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而越来越强烈，与宋旺相的基督教信仰和忠英思想越来越格格不入。翻阅《海峡华人杂志》，有助于了解此一分化。

《海峡华人杂志》（1897—1907）是当时

[8]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页174-176、页364-367。

[9]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页176-177、页367-369。

[10] 有关林宋领导的海峡华人改革，尤其是《海峡华人杂志》和华人好学会的论述与资料，参阅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第五章和第六章，必要之处再另注。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0 月 1 日

海峡殖民地与英国的邮包、邮件开始传递

一份非常重要的英文刊物，内容与体裁多样化，每年一卷四期，从未间断。杂志的创办与基督教徒有关。1896年，宋旺相在华人基督教协会的年终会议上，向大家推荐了一份由协会会员撰写的“手稿杂志”，有人认为其中一些文章非常出色，应该印给海峡华人精读。宋旺相于会后邀请林文庆共同编辑，《海峡华人杂志》就这样诞生了。这份杂志所宣传的改革运动，一开始也获得不少基督教徒的支持，给人一种基督教化运动的印象。然而，在林文庆的主导下，杂志的儒家色彩越来越明显。杂志的封面在刊物名称下写着“A Quarterly Journal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东西文化季刊》），在编辑姓名下有五个中文字，即孔子的“过则勿惮改”，字体加黑字型加大，从右到左排列，还译成英文“If you have faults, do not fear to abandon them”。林文庆个人为杂志撰写了不少于50篇的文章，其中好多篇在不同程度上赞扬儒家思想质疑基督教教义。1899年和1900年，林文庆发表了六篇冠上“海峡华人改革”的文章，其中宗教、孝悌和葬礼三篇都出现不少褒扬儒学批判基督教的文字[11]。1904年至1907年之间，他那10篇题目冠上“儒家”一词的文章，也具有同样的特色[12]。面对林文庆及其同道的挑战，一些牧师和教徒陆续撰文反驳。双方于是掀起一场世纪之交的辩论，时间持续至少15年（1895—1910），《海峡华人杂志》成了的辩论重地[13]。没有资料显示，宋旺相对林文庆不断批评基督教有何不满或驳斥，或者林、宋二人在这辩论时期有何交锋。即便如此，两人的分歧已十分明显，而这分歧还是出自各自所坚守的信仰上。

除了中华文化外，中国元素的介入也影响了林、宋二人的共识，《海峡华人杂志》同样提供了这方面的讯息。在杂志创刊的前面几年，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发展至高峰，紧跟着便发生1900年的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这一年，《海峡华人杂志》第4卷的25篇文章中，就有七篇专论中国，而且围绕在戊戌政变的事件和人物，其中四篇出自林文庆之手[14]。从1898年到1901年，林文庆在该杂志发表了六篇跟中国维新有关的文章，即〈中国的维新〉、〈光绪皇帝〉、〈广东的哀号〉、〈维新者遭迫害〉、〈1898年北京政变〉和〈辜鸿铭对慈禧的崇拜〉[15]。换句话说，在林文庆的引导下，《海峡华人杂志》也十分关注中国的维新，并作出回应。林文庆个人的作品，在描述中国维新的人物和事件时，或赞美、同情，或愤怒、唾弃，都非常之投入。再看宋旺相，他对中国的维新与政变漠不关心，未曾在杂志上写下片言只句。实际上，他向来不甚留意中国的政治，1901 年刊登在《海峡华人杂志》第5卷的〈醇亲王与叩头礼〉是他唯一一篇书写中国政治人物的文章[16]。但该文内容侧重于醇亲王出使德国，写来中立，完全是一个旁观者的笔调。简言之，林文庆对中英两国的双重认同与宋旺相对英国的绝对效忠，是两人共识中的另一分歧。

除了中华文化和中国政治两元素，加深林、宋二人分歧的还有新客元素。这点，华人好学会可以为我们补充说明。根据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此会是宋旺相在1896年3月协助林文庆组成的，为会员提供定期学习英国文学、西方音乐和中华语言的机会[17]。林、宋二人为学会所做的一些演讲也刊登在《海峡华人杂志》上。1899年8月，学会成立分会，开放给受华文教育人士。新客邱菽园受邀共同主持，增设分支于邱菽园的恒春公司和《天南新报》

[11] 三篇即："Straits Chinese Reform 4 – Religion," (1899); "Straits Chinese Reform 5 – Filial Piety," (1900); "Straits Chinese Reform 6 – Funeral Rites," (1900)。

[12] 十篇即："Confucian Cosmogony and Theism," (1904); "Confucian View of Human Nature," (1904); "The Basic of Confucian Ethics," (1904); "The Confucian Code of Filial Piety," (1905); "The Confucian Cult," (1905); "The Confucian Ideal," (1905);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1905); "The Status of Women under a Confucian Regime," (1906); "The Confucian Code of Conjugal Harmony," (1907); "The Confucian Ethics of Friendship," (1907). 举例：上述第一篇论宇宙和人类起源时，林文庆评：“近代的发现和先进的知识已证实创造天地故事的传奇性，而基督教教义却完全建立于此。创世纪中亚当被创造及其堕落，是基督教整个神学理论的一大缺点……反观儒家对宇宙和创世的看法，我们可以察觉孔子对这些话题不发表言论。中国确实有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但这些神话与儒家哲学毫无关系。”（页78–79）。

[13] 有关辩论详阅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页268–275。笔者讨论的问题包括：这场辩论如何产生？始于何时？维持多久？双方卷入者何人？争辩的重点是什么？有什么重要意义？

[14] 七篇即："The Death of the Reform Martyrs," "The Future of China," "List of Works Relating to China in the Raffles Library, Singapore," "His Imperial Majesty Kwang-su," "A Voice Heard in Canton," "The Persecution of the Reformers," "The Peking Coup D'etat of 1898," 全发表于1900年，最后四篇的作者是林文庆。

[15] 六篇文章即："The Renovation of China," (1898); "His Imperial Majesty Kwang-su," (1900); "A Voice Heard in Canton," (1900); "The Persecution of the Refomers," (1900); "The Pekin Coup D'etat of 1898," (1900); "Mr. Ku Hung Ming's Apotheosis of Tsu-Hsi," (1901).

[16] Song Ong Siang, "Prince Chun and the Kowtow Ceremony," S.C.M., vol. 5, no. 19, Sep, 1901.

[17]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p. 236.

报馆。《天南新报》刊登了广告、章程、预告和报道等。它一连三周刊登招收会员的广告，反应良好，会员原本只有50名受英文教育者，开放后短期内人数剧增至数百名。演说是主要的活动方式，地点多数在华商阁，内容“首政治，次学术，次时务，次格物”，合群演说时以英、华、巫三种语言进行。每期演说的预告由林文庆、邱菽园两人联名刊登在《天南新报》首版[18]。华人好学会的性质从此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纯峇峇的团体，而是更接近中国维新运动高涨时期的学会组织。它甚至卷入中国的政治，那是1899年10月的事。那时，邱菽园听说光绪皇帝久病未愈而太后有意废立，赶紧在《天南新报》呼吁新加坡华商联名恭请德宗圣安，旋即获得500多人的响应，林文庆的姓名出现在第三位，而好学会则有30多位会员率先题名[19]。

新客社群应该不是宋旺相及其友人刻意排斥的，虽然他们跟这一社群少有接触。但是新客元素显然加深海峡华人的分裂，带来社群、文化和国家等认同意识的分歧。《海峡华人杂志》的尊奉儒学遗弃基督教和好学会的卷入中国政治，相信都不是宋旺相所乐见的。

从华人好学会成立直到《海峡华人杂志》停刊，这12年是林、宋二人为改进峇峇社会合作关系最密切的时期。然而两人在共同的轨道上并行时，必已觉察到对方的偏离和彼此的差距。于是，两方同时亦专注于另外的一些组织和活动。例如，林文庆于1899年出版《日新报》，向受中文教育的华人传播西方知识、激活改良主义和儒家思想；于1899年开始在家里设立华语班，教授峇峇学习华语，后来扩展到威基利俱乐部、中国领事馆和海峡华人体育会。例如宋旺相于1908年至1916年负责编辑《磐石堂信息》（*Prinsep Street Presbyterian Church Messenger*），一份以马来文和英文出版的宗教月刊，内容亦批判社会弊端和引导读者过高素质生活[20]；于1908年成立读书俱乐部（Reading Club），附属于基督教协会，按照基督教路线塑造年青人高贵的品格，鼓励会员阅读文学、语言和艺术作品，参加戏剧组、辩论会和道德哲学班的活动[21]。上举各项，人们不会在《日新报》、华语班和儒学运动找到宋旺相的踪迹，也很难在《磐石堂信息》和读书俱乐部发现林文庆的身影。1907年，《海峡华人杂志》停刊，象征着林、宋二人在革新事业上合作的蜜月期已结束。1909年宋旺相再办《海峡华人年刊》，林文庆已不是主编了。

不过，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前，林、宋二人在效忠英国的组织——海峡英籍华人公会里还是合作无间。他们在公会的旗帜下，编著手册《对英帝国的责任：大战期间海峡华人的基本指南》，引导海峡华人为英皇效力。这是林、宋二人一生最后的合作了。他俩的忠诚获得英国政权的肯定。但是对比宋旺相一路来对英国的忠贞不二，林文庆从1890年代末至1910年代

[18] 有关广告，从1899年8月29日刊登至1899年9月21日，见《天南新报》报首“好学会广告；广告也提及增设分支一事。有关设立支会缘起、活动主要方式、演说内容和语言等，见《天南新报》1899年9月22日首版“好学会简明章程”，连登五日。有关演说预告，见《天南新报》1899年10月4日“好学会第二期演说布启”，连登两天；或1899年10月12日“好学会第四期演说预告”，连登六天。至于人数的剧增则见《日新报》，1899年11月25日，天寥子的“拟新洲好学会序”。

[19] 曾昭琴在其作〈星洲上书记〉（作者注明“大清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十月，闽海逋客谨识缘起于古柔佛国之读天演斋”），特地提起好学会会友的题名。

[20]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p.248. 该刊物的议论文章主要由宋旺相的合作伙伴慕雷执笔，内容探讨道德、社会、人类等问题如"The Drink Habit," 7.8 (May, 1915), pp.1–2; "The Gambling Habit," 7.9 (June, 1915), pp. 1–2; "A Noble Life," 5.1 (Oct., 1912), pp.1–2; "A Noble Deed," 8.3 (Dec., 1915), p.1; "War and Peace," 11.9 (June, 1919), pp. 1–2. 这些作品反映基督教知识分子结合宗教和世俗的忧患情怀，以及追求高尚生活的理想。

[21] Song Ong Siang, "The King's Chinese–Their Cultural Evolution from Immigrants to Citizens of a Crown Colony, "pp. 42 & 44; 宋旺相的侄女婿，也是读书会的学生Mr Tan Kek Tiam告诉笔者：“宋旺相一生最大的兴趣集中在海峡华人读书俱乐部，为它无私地服务了31年，扮演顾问和导师的角色，影响的学生数以百计”。

结束时，始终周旋在中英两国之间。林文庆在1919年获颁英帝国四等勋章，1921年就到厦门出任厦大校长。1919年和1921年，宋旺相两度代替林文庆在立法议会的职务；1924年至1927年，正式奉委，从此更积极地为英殖民地政府服务，并于1927年和1936年分别获颁大英帝国三等和二等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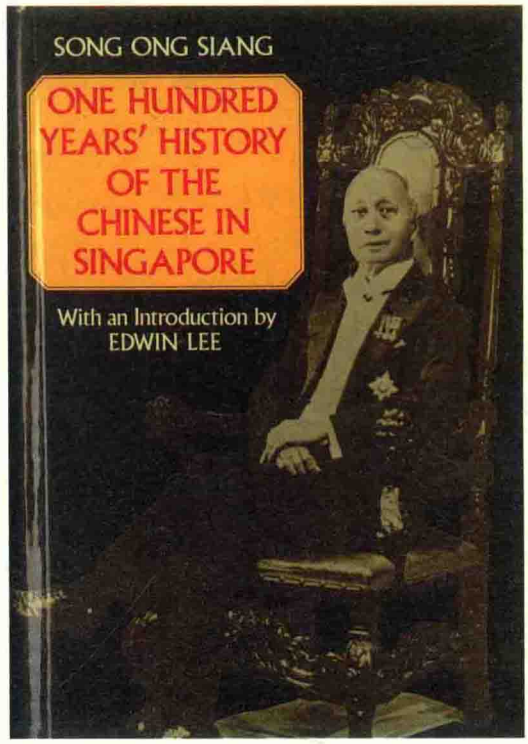
1921年以后，林文庆与宋旺相走上不同的路，也无缘再共事了。林文庆在中国称中国为“我国”；宋旺相在新加坡称海峡华人为“King's Chinese”。

跨越与局限

林文庆与宋旺相是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峇峇知识分子，既有共识又有分歧，青壮年时同舟共济，中老年时分道扬镳。前面的论述已可觉察：林文庆在两条主线上交叉前进，性质比较复杂，空间比较宽广；宋旺相在一条主线上行走，性质比较单纯，空间比较狭小。笔者将通过进一步的比较，更深入地阐论林文庆的超越性和宋旺相的局限性，并以两人撰写的新马华人历史著作——林文庆的长篇历史单篇文章——〈马来亚的华人〉和宋旺相的厚重历史专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为个案。

林、宋二人都喜欢历史，他们在英国读书那些年，阅读大量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品，特别是英国文史学家的佳作。林文庆欣赏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对历史和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特色的掌握，也爱阅读卡莱尔（Thomas Caryle，1795—1881）的作品[22]。前者是一位史学家、评论家和政治家，后者是散文作家、历史学家、杂文作家、政治家。宋旺相则常以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诗〈从事高尚之事〉（Do noble things）勉励教友[23]，金斯利（1819—1875），是一位牧师、小说家、诗人、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

林文庆的历史写作经验比宋旺相更丰富，除了用真名发表〈英属马来亚的华人〉、〈马来亚华人的革命运动〉和〈马来亚的华人〉等文外，也曾以“Historicus”和“Wen Ching”的笔名发表如〈1898年北京宫廷政变〉之类的文章和《中国内部的危机》[24]专著。宋旺相确实没有写过什么历史文章，却凭一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成为新加坡的历史学者，甚至有人称他为新加坡的太史公。宋旺相应该感谢好友林文庆，他有机会撰写《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林文庆有推举之功，而《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部分构思也参照了林文庆的〈马来亚的华人〉。这两个作品的出版时间相差六年（林文1917年，宋著1923年），出版社都在英国。原来，为了纪念莱佛士在新加坡建立殖民地一百周年，《新加坡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主编瓦尔特·梅克皮斯（Walter Makepeace）邀请林文庆另外编著一本新加坡华人百年历史。当时林文庆分身乏术，于是推荐了宋旺相，还把自己手上的一些草稿和照片交给这位朋友，让他自由使用，林文庆的〈马来亚的华人〉也成为宋旺相的重要参考资料[25]。宋旺相心怀感激，除了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编者的话”表达对



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首版1923年，此为1984年的版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22] Lim Boon Keng, "On Simplicity of Language," S.C.M., vol. 4, no. 16, Dec, 1900, p.157; Lin Meng Ching (Lim Boon Keng), "The Doctrine of Feng-Shui," S.C.M., vol. 2, no. 6, Jun, 1898, p.69.

[23] Song Ong Siang, "Our Aims as a Society," S.C.M., vol. 4, no. 13, Mar, 1900, p. 9.

[24] Wen Ching (Lim Boon Keng), *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 (London: Grant Richards, 1901).

[25]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ee "Foreword", p.vii.

林文庆的谢意，也在该书第一章“导言”里大段摘录林文庆的〈马来亚的华人〉。由此可知两个作品之间的关联与可比性。

以下将通过两作品的比照，突出林文庆的跨越性和宋旺相的局限性。先考察林文庆的长文〈马来亚的华人〉，所谓“马来亚”，在新马分家之前是包括新加坡，林文庆所描述的马来亚华人是以新加坡华人为主体。这里先摘录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为这篇〈马来亚的华人〉所作的简介：

林文庆的〈马来亚的华人〉发表于1917年，属于较长篇的历史论文。它简述中国人南来的历史、土生华人的形成、华人的贸易方式；略谈中国秘密会社的南移、政治逃犯的抵达、新客的出现；写到文明的先锋时，赞扬中介商、技术工人、劳工、农民和渔民；写到社会觉醒时，不只介绍知识分子伍连德、宋旺相、林文庆的社会改造运动和儒学复兴，也提到商人李浚源、林秉祥、陈嘉庚、林义顺等的成功表现；写到华人拓荒时，表扬垦荒者、劳工和商人，也称赞英国的治理方式；写到华人社会时，列述其特点，如家庭的家长制、社会阶级意识的淡薄、婚丧礼俗的铺张、儒学的复兴；最后专写海峡华人，除了他们的忠英行为，还突出辜鸿铭和伍廷芳之前往中国服务，勉励海峡华人参与中国的开发，并强调中国、英国和新加坡华人三者的利益一致[26]。

为了方便比照，这里选择社会（社群与阶级）、文化、政治三个层面来考察两人的作品。上段摘录，可以看出林文庆完全是站在本地华人的立场和角度书写自己族群的历史与现状，内容相当全面，也很有概括性。从社会层面来看，在分群上，他既描绘华人移民社会，也反映海峡华人群体；在分层上，他一再表扬华商，也多次称赞华工。从文化层面来看，他突出英国先进观念的移入，也强调本地儒学的复兴。从政治层面来看，他着墨英国的善治与海峡华人的忠悃，也涉猎中国的发展及其对本地华人的影响。

这样的一篇文章，不只展现林文庆个人的史观与史识，也论证了他生命的种种跨越性。在社会上，林文庆跨越峇峇与新客两群，既是峇峇的重要领导人，也是移民社会公认的领袖；他跨越社会阶级，既是商人尊敬和跟随的社会领袖，也是劳苦大众仰望和求援的大人物。在文化上，他跨越东西文化，努力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女学等先进观念，也积极复兴中华语言和儒家伦理。在政治上，他感激英国人的培育和提拔，处处为英国政权效力；另一方面，他也不断追求对中国的兴趣，欧战之前，在新加坡，举凡清朝官员造访、保皇运动、革命运动、国民党组织等，他都有份参与。

再考察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这是第一部采用编年体方式完成的新加坡华人通史，在时间上，它纵跨一百年，从1819年到1919年；在编写上，全书按年记事，每十年一章，太长则分两章，共十三章。笔者已发表评析专文〈从认同角度评析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偏狭性〉，此处即根据此一研究成果，从社会（社群与阶级）、文化、政治几方面，简要说明宋旺相作品的种种问题，从而展示人物本身的局限性[27]。

从社会分群的角度考察，《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偏重于海峡华人社群，疏离众多的移民群体。所谓“新加坡华人”应当包括峇峇与新客，但《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描绘的人物，绝大多数来自海峡华人社群；描述的社会组织和活动，侧重于西式团体及其活动。它对各方言群创建的会馆、公会、庙宇、坟冢、学校等，

[26] 李元瑾，〈从认同角度评析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偏狭性〉，载《亚洲文化》期22（1998年6月），页107-108。

[27] 李元瑾，〈从认同角度评析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偏狭性〉，页96-113。

或忽略或轻描淡写。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考察，《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偏重社会中商阶层，疏离广大的劳动群众。书中介绍的人物，以商人占绝大多数，其次是受雇于西人公司者和专业人士；对于广大的劳动阶级，虽不乏关怀之情，但着墨不多。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西化色彩笼罩史册，忽略华人的主体文化。新加坡华人文化的组成部分离不开学校——华校与英校、报纸——中报与西报、宗教——寺庙与教堂。《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没有忽略，但重点放在英校、英文报刊、西教的记载；至于华校、华文报刊和华人寺庙的描述，则非常简略。《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也记录不少文化、艺术和体育的团体及其活动，但大部分属于西式的组织。一些传统知识分子成立的文社学会和商人主导的宗乡会馆及其活动，还有普罗大众的民俗民风，或只字未提或三言两语。

从政治的角度考察，《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忠英意识充溢全书，漠视华人的中国情结。它反复描述华人的亲英行为，这几乎是每章的特色。它摘录不少华人赞颂殖民地官员的文字，多次记录华人对英王重大日子和英王室成员来访的热烈响应，花费不少笔墨叙述海峡华人的忠英组织以及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英国的表现。至于与中国有关的政治事件和人物，《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也有点滴记载，主要放在华人的响应，但所占的比例很小，写法不过蜻蜓点水，其中还出现一些谬误。

综合言之，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更像是一部新加坡海峡华人中上层的历史，而且充满了西化和亲英的色彩。

同样的，这样一部巨作，不只展现宋旺相个人的史观与史识，也论证了他生命的种种局限性。在社会上，他只是海峡华人的领导人，不太关心中国移民社群；他养尊处优，很少接近劳苦大众。在文化上，他热切拥抱西方宗教与文化，对中华文化不甚了解。在政治上，他全心全意效忠大英帝国，对中国事务不感兴趣。

人如其文，文如其人。林文庆与宋旺相生命形态之区别，其文可证。

追昔抚今

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分化，殖民地时代早已存在，主要表现在不同方言群之间的隔阂和峇峇与新客之间的矛盾。即便是峇峇本身，也出现两种清晰易辨的类型，林文庆类型和宋旺相类型是也。时至今日，随着国家独立后语文政策的演变，尤其是两种语文教育和华语运动的实施，导致方言地位迅速下降，新加坡方言群分化的现象随之消弭。但是，峇峇与新客的矛盾，经历二战后中英两国撤退、新加坡建国、华校没落和教育政策调整等事件的冲击，历史“基因”虽产生变裂，语群分化实质却仍然延续。这种语群对立，在不同时段呈现不同状貌。

峇峇与新客的分裂因素包括出生地、教育、语言、社群、文化和国家等认同上的差异，当然还有利益上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英两国的影响力弱化，土生华人人数剧增，但这些转变最终没有消除新华社会的分化，因为教育因素（英文教育或华文教育）成为主导因素，取代了出生地认同（新加坡或中国）和国家认同（英国或中国），而英校生与华校生的纷争取代了峇峇与新客的矛盾。英校生与华校生因为语言与文化的差距，以及现实利益分配的不均，长期处于不融洽的状态。1980年代，华校分崩离析，分裂华社的教育因素逐渐消减，但国家务实的语文教学政策和家长不同语文源流的教育背景，继续培养不同语文（英文或中文）程度的下一代。今日，新加坡华人社会还是存在着讲英语和讲华语的两个群体。

回望百年，能为峇峇与新客两群之间搭桥者，惟有林文庆这一类型。其人数虽少，但却是最有能力促进社会的团结。在林文庆的拉拢下，新客邱菽园和西化峇峇宋旺相有机会在共同的组织里和活动中共事。华人好学会和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都是佳例。1899年8月，林、宋二人领导的华人好学会在创设三年半后便成立支会，吸引受华文教育人士数百人加入，邱菽园受邀与林文庆共同主持演说会。1899年4月，林文庆召集12位代表在中国领事馆开会，会议通过了章程，决定了校名、地点、开课日期等，选出了第一届执委[28]。林、宋二人担任执委，邱菽园捐献3000元，被推为副主席。邱菽园

[28] "Chinese Girls' School," *The Straits Times*, 24.4.1899.

在女儿婚礼上的林文庆（左一坐者）

的《天南新报》热衷报道相关消息[29]。宋旺相则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两处提起邱菽园对女校的贡献[30]。而这女校是为娘惹创办的。

还看今朝。新加坡独立后，政府积极推行双语教育。1980年所有华族英校生必修必考华文，这也是应付华校式微和西化加速的措施之一。由于华文教育的没落和双语教育的偏差，在文化上属于宋旺相类型的新一代人数迅速增加，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忡忡。1990年代末，政府提出培养“华文精英”计划，目标是培养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精通双语的华文精英，确保有足够人才应付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机会。2005年教育部推展双文化课程，培养中西双文化精英。从双语教育到华文精英再到中西文化精英，新加坡政府在培育林文庆类型的新一代，作了一些努力。2004年6月23日，时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在一次“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学术会议开幕演讲辞中，特别突出林文庆，以他为国家所需要的双语和双文化人才的历史典范。第二天，《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分别以“林文庆——学贯中西的历史典范”和“Lim Boon Keng: Bicultural Broker”为题，详加报道[31]。

从个人、群体、国家、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林文庆类型自然远胜于宋旺相类型，不只是个人的生命比较丰富，能做的事比较多，所做的贡献也比较大。新加坡需要这样的国民，需要这样的各领域领导人，更需要这样的国家领袖。

本节结束前，让我们回到新加坡华人历史的撰写。翻阅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其导言（第一章）的内容约四分之三摘自林文庆的〈马来亚的华人〉。然而，该章除了提到中国法显和郑和的南来，所摘录的尽是海峡华人的部分，即峇峇的历史、婚姻、语言、习俗、特性和素质等。换言之，林文庆的〈马来亚的华人〉设计了一个相当全面的历史框架，宋旺相却只切割“峇峇”一角，并“以此为必要的历史导言”，紧跟着“进入本书的正题”，编写他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倘若当年林文庆接下此重任，必能为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著作出更大的贡献，为后人立下历史书写的“历史典范”。

[29] 例如：《天南新报》，1899年4月24日，标题：“倡兴女教”；1899年4月25日，标题：“办理女学堂芳名录”。1899年6月15日，标题：“星加坡中国女学堂准期开学告白”。

[30]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pp.101, 305.

[31] 会议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为庆祝成立10周年而举办的，会议名称是“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学术会议，李光耀受邀为会议主持开幕礼，并发表演讲。见《联合早报》2004年6月24日和*The Straits Times*, 24. 6.2004.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7月8日

海峡贸易公司创立，为世界最大炼锡机构

联合早报
zaobao.com
南洋 · 晨钟
2007年4月4日 Wednesday 星期三 农历丁亥年二月十七
MICA (P) 257/07/2006
今天48大版 / 售价75仙

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

●张劲东（新加坡）

五千人同绘世界出现了一股公转热潮：恢复中人的传统纪年——农历”。

华文化绵延数千年，构筑了无数璀璨，但其中一个渐已蒙尘的角度，引人们的关注，那就是纪年。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存有，历史这个国家或有民族的文明是否有标准之一。而“纪年”则是其中，也是表现中华民族今年是什么，那么很大多数人都

人认为西历和西元只是港台地区的用法，“过时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既然耶稣纪元有幸充当了“公元”，成了“世界正统”，那么人们必须纠正“公元就是耶稣纪元”的错误观念，要知道，公元之位也像皇帝的位置一样，比如秦始皇是皇帝，可是皇帝不止他一个；同理，公元不等于耶稣纪元，只是耶稣纪元现在占据着公元的位

命杂志采用了黄帝纪元，当时为正值同盟会发动最后决战的革命志士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即使在民国成立后，学者中仍有不同声音。1912年1月5日和8日，章太炎连发两个宣言，反对采用西元，主张采用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为开端的共和纪年，与此同时，康有为建议改宣统年号与清朝国号，但称中华或中国，用孔子纪年或黄帝纪年。此后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时，仍使用孔子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世界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公元制，实则西元制，这是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决定的。

台湾的“西元”比较准确

SIN CHEW JIT POH
收編逃越蔣軍
越盟發表在邊境戰役中
奪獲法蔣兩軍合作文件
台灣同胞堅願說
再不放許其人歸國了
廣東人民政府
未遵往曲江
怎樣改造
新疆和平解
放的成功
越文發號施令
越外部發言人一百名
越共發行
越南解放
越南解放
越南解放

第六章

报业文化
Media Culture

第一节　南渡衣冠　各领风骚
——战前新加坡华文日报

摘要

新加坡华文日报，从1881年创办的《叻报》，至1942年，约有20家。各报的总编辑多为中国南来的文人，富有办报经验，也是写作的多面手，因此报纸各有特色。各报多关心中国的政治发展，且政治立场鲜明，有的拥护康有为的维新保皇，有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虽非党报，却支持国民政府，热衷于抗日救亡运动。

Abstract

From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local Chinese newspaper, Lat Pau in 1881 to 1942, there were about 20 Chinese dailies in Singapore. They recruited veteran journalists-cum-writers from China as chief editors who helped shape the distinct features of respective newspapers. The highly politicized pre-war local Chinese newspapers were preoccupied with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y were either pro-Kang Youwei's reform movement or pro-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Despite the Nanyang Siang Pau and Sin Chew Jit Poh being non-partisan, they ardently supported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崔贵强（Choi Kwai Keong）

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是薛有礼于1881年创办的《叻报》，直至1942年日军南侵的50余年间，华文日报相继问世，此起彼伏，前后约有20家，包括《叻报》、《天南新报》、《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国民日报》、《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等。

战前的华文日报，多关心中国的政治发展，甚于卷入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如《天南新报》与《南洋总汇报》是康有为保皇党的宣传舆论；《中兴日报》是孙中山革命党的喉舌报。《国民日报》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报，拥护共和。《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虽非党报，却是拥护三民主义，支持国民政府，热烈为抗日救亡运动而奋斗。

华文日报之启蒙

华文日报之启蒙，始于《叻报》之创刊。《叻报》于1881年12月10日问世，是新加坡最早出版的华文日报。《叻报》的创办人是薛有礼（1851-1906），原籍福建省漳浦县人，出身于“峇峇”世家。祖父薛佛记（1793-1847）是初期马六甲与新加坡闽帮集团的社会领袖。父亲薛荣樾（1826-1884）是薛佛记次子，自幼受中英文教育。及长从商，经常川行于新马及厦门间。薛有礼为荣樾长子，兼通中英双语，曾随父到厦门经商，父子俩与中国文化甚有渊源。

之所以取名《叻报》，实因“叻”是“石叻”的简称，“石叻”原是马来语“Selat”之音译，意为“海峡”，后转为“新加坡”的称谓。《叻报》之取名“叻”，实是从“石叻”衍生而来。

关于薛有礼办报的动机，有说他是为名利而办报，实际上以当年环境之恶劣，《叻报》的销数也只有区区数百份，广告也不易招徕，实无利可图，也无从带来名誉地位。真正的意图可能是借办报开拓民智，提高人们的爱国意识。

薛有礼是幸运的，打从《叻报》创办开始，即从香港礼聘叶季允（1859-1921）南来当主笔。叶氏祖籍安徽歙县，后移居广东番禺。他文才横溢，满腹经纶，精通金石诗画，兼通歧黄术，可谓多才多艺，被誉为“南洋第一报人”、“海国诗宗”[1]。叶氏自任职主笔后，勤于笔耕，经常以“惺疆生”为笔名，撰写论说（社论）、政论与时评，偶尔也发表诗作，和朋友酬酢、唱和。除了短期辞去编务，在豆腐街自设医务所外，从1881年至1921年逝世，长达40年，他尽心尽力，为《叻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叻报》（1881–1932）

《叻报》从1881年创刊，至1932年关闭，除了1916年后半年一度停刊外，实际报龄长达50年又4个月。在这悠悠的岁月里，《叻报》几经挫折；至于编务人员方面，自叶季允1921年逝世后，也变动频频。创办人薛有礼，1906年逝世，共计在职25年，在《叻报》史上，为任职最长的发行人。此后发行人一职由长子薛兆熊继任约10年。1917年《叻报》复刊，由薛中华接办，正式注册为有限公司。1928年，经理一职由薛中华之子薛梦龙接任，直至1932年收盘。

叶氏逝世后，主笔（总编辑）一职由周君南取代，至1927年卸职，由李焕燊接任，此后主笔频频易将，七度易人，平均每任不及一年。他们包括张辟方、李铁民及陈鍊青等人。

据何舒敏的〈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日报—叻报〉（1881-1932）一文，将《叻报》分为三期，即：第一期（1881-1907）为创刊与奠

《叻报》首任主笔叶季允

[1] 陈育崧，《叶季允先生》，载《椰阴馆文存》卷二（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页397-410。

基期；第二期（1907-1921）为成长与改革期；第三期（1921-1932）为发展与没落期。

第一期的《叻报》，每日约出八版。新闻可分为论说、电音及普通新闻。论说（社论）除由主笔、编辑撰写外，大部分来自剪报。新闻的第一项为“谕旨恭录”，次为电音（电讯）、普通新闻，最后为“京报选录”。新闻报导多用四字作标题。内容包罗万象，无奇不有。这一期的新闻编辑与来源，尚处于幼稚阶段，新闻未加分类，主要来源靠翻译与转载，新闻报导的速度慢，范围小，数量不大，正确性不高。

第二期《叻报》的革新，主要的是1907年1月16日加编“叻报附张”（副刊），内容包括游戏文章、黄州谈鬼、漆园寓言，又有诗词歌赋，风谣俚曲，增添了报纸的趣味性与娱乐性。“叻报附张”为新加坡华文报副刊的滥觞。

第二期的新闻报导的处理有显著进步，开始出现了新闻分类，类目有：本馆论说、谕旨恭录、本馆译电、选电、京报、京事、行省、祖国、港澳、闽粤、南洋、本坡、告白等。

在第三期里，有些学者指出：这期间的《叻报》已经走向式微，最终导致关门大吉[2]。实际上，这期间的《叻报》，还有副刊、新闻来源方面，还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可是到了1932年3月31日，《叻报》受到两方面的胁迫，不得不停刊。一是经济方面，自1930年来，经济大萧条便席卷全球，薛中华被迫辞去董事与市议员职位，导致报纸的广告费收入锐减，不足以应付庞大开销，终致停刊。

另一方面，自1931年梁显凡接管编务后，为了节省开销，终止副刊印行，而新闻报导亦减少，在其他各华文报的热烈竞争下，《叻报》处于下风，终致收盘。

《叻报》对中国的政治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它反对康梁的维新运动，把革命党人视为乱党，主张效忠清廷，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地位。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辛亥革命，对这惊天动地的事件，《叻报》缄默不语，直至10月17日，革命爆发一星期后，才陆续予以报导。在清廷覆灭后，《叻报》才拥护国民政府。在对待英殖民地政府的态度上，陈蒙鹤认为《叻报》是亲英的[3]，柯木林则认为《叻报》的立场是拥护有利于当地华族社会的一切措施，反对一切不利于华侨的政策[4]。

《星报》（1890–1898）与《日新报》（1899–1903）

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10余年间，新加坡出现了两家华文日报：《星报》与《日新报》。

《星报》于1890年2月14日创刊，1898年杪停刊，报龄约达九年之久。《星报》的创办人是林衡南，亦名林光铨，他是古友轩印务馆东主。古友轩大约于1860年代开始营业，承印中英巫等书籍，由于印刷精美，信誉卓著，生意兴隆。古友轩既有现成的印务器材，主人因利乘便，于1890年创设了《星报》。馆址坐落于直落亚逸街101号。林衡南中文造诣颇深，亦通晓巫文，曾编纂《华夷通语》，这是一本华巫字典。相信他曾参与《星报》的编务与撰述工作。《星报》创刊后一段时间，林衡南逝世，由其子嗣继承父业。

由于《星报》没有报导其主笔、编辑等人，其论说也不署名，因此除了林衡南，其他编辑人员，我们全不知情。

---

[2]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p.52；柯木林，〈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载《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页132。

[3] Chen Mong Hock, *op.cit.*, p.45.

[4] 〈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页132。

大清光緒廿癸年

星報

丁酉五月初一日

目錄

《星报》（1897年5月31日）

《星报》每日出版一纸共八版（星期天及假日除外），作综合性排版。通常第一版有论说（社论），占2/3版位，新闻报导与广告，分散在其他各版。新闻报导不分地域与性质，揉杂在一起。以四字为标题，如“吕宋近闻”、“破镜重圆”、“升旗志哀”及“私秤被罚”等等。囿于讯息来源偏狭与采访人员短缺，新闻内容多简略。

《星报》虽以商业谋利为主，政治色彩淡薄，但其政治意识无疑是偏向中国的。这表现在其关注中国命运，怒斥外来侵略者，同情苦难的中国人民。如对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国军事失利，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星报》就发表了一系列社论，痛斥日本侵略者，并希望中国能改革吏治，发奋图强[5]。

不过《星报》也关注华社面临的严重问题，诸如娼妓、鸦片、赌博与私会党等，针对这些弊病，《星报》曾撰文评述，促请有关人士及政府的注意，从而加以改革[6]。

《星报》的销数呆滞，管理不善，亏蚀过巨，到了1898年杪，不得不收盘，前后维持了九年。数月后经过改组，《星报》另起炉灶，改名《日新报》。由于《日新报》的前身是《星报》，报刊号数接《星报》而为2876号，该号于1898年10月5日问世。

《日新报》的业主是林文庆，他必然也参与了《日新报》的改组工作，并拟订该报的决策与方针。林文庆习医，1892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嗣后返回新加坡悬壶行医。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与改革家。林氏醉心西学，也推崇儒家思想；他致力于改革新加坡华人（包括海峡华人与移民）的思想与习俗，也同情中国的维新运动。因此《日新报》就成了林文庆及其同僚散播思想、推动改革与教育读者的工具。该报常译载西报有关时事论析的专论；发表推崇儒家思想的专文；华人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是提高华人政治与文化的组织，《日新报》没有忘却这方面的宣传。该报当然更关注中国的变局，当1900年后期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导致中国日益危亡之际，《日新报》推出了一系列的论说，论析了中国之困境及其补救之道[7]。

黄乃裳曾经是《日新报》的主笔。他原籍福建闽清县人，家境贫寒，曾入私塾受教，后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及布道师。黄乃裳40岁考中举人，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时值甲午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举国震惊。嗣后康梁主张变法，推行新政失败，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六君子被杀，康梁逃亡海外。黄乃裳因受株连，仓促间逃回福建。1899年秋，他携眷南来新加坡，经女婿林文庆推荐，担任《日新报》主笔。前后只大约做了九个月，于1900年8月3日离开报馆。这期间，他以“梅湖半农者”为笔名，发表了八篇论文，呼吁华侨捐弃畛域成见，团结一致，组织商会，共谋福利[8]。

---

[5] 社论如〈论日人终不能据有台湾〉，《星报》，1895年7月26日；〈论中国强邻逼处当图变计〉，《星报》，1895年10月14日）；〈论中国吏治之坏〉，《星报》，1895年10月19日；〈论日本虽得台湾未必能守〉，《星报》，1895年11月22日等。

[6] 社论如〈论私娼宜亟为查禁〉，《星报》，1890年3月15日；〈叻地吃烟最苦说〉，《星报》，1890年2月27日；〈嫖赌之害孰为轻重说〉，《星报》，1890年3月27日等。

[7] 如〈论中国变局〉，《日新报》，1900年7月29日；〈论战〉，《日新报》，1900年8月23日；〈论中国今日议和之难〉，《日新报》，1900年8月27日；〈论中国和局即无形之瓜分〉，《日新报》，1900月11月19日。

[8] 叶钟铃，《黄乃裳与南洋华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页11-16。

这期间，有三家华文日报同时存在，它们是《叻报》、《天南新报》与《日新报》，三者的编排方式与内容大同小异。华文报读者不多，招揽商家广告不易，在剧烈的竞争下，《日新报》处于不利之境，苦苦支撑，至1901年宣告倒闭，报龄不及三年。

总之，《星报》与《日新报》都是两家平凡而政治色彩淡薄的早期华文报。

保皇与革命之论争

《天南新报》（1898–1905）

《天南新报》创刊于1898年5月26日[9]，创办人是诗人邱菽园。

邱菽园名炜萲，菽园是他的字。生于1874年，原籍福建漳州海澄县人。八岁南来新加坡受教育，十五岁随父母返海澄，参加童生岁考。1895年进北京，时值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邱菽园激于义愤，奔走上书，不果，从此绝意仕途，旋南来新加坡。父亲邱正忠在新加坡经营米业，成为巨富。父殁，菽园继承了遗产逾百万。他具有浓烈的爱国意识，目击满清政府颟顸无能，外患侵凌，因为赞成变法图强，遂于1898年创办了《天南新报》，鼓吹维新思想。

至于《天南新报》之命名，“天南”是泛指中国海洋之南，亦称南洋，殆指今日的东南亚。“天南”地域辽阔，新加坡是“天南”一埠，犹如南洋的一颗明珠，因而在这“天南”一隅新生的报纸，就称为《天南新报》，也是很恰当的命名。

《天南新报》的编辑阵容强大，邱菽园既是报业东主，也兼任华文总主笔，常以星洲寓公、菽园（淑元、宿圆或旭沅）名号撰述专文，阐发议论。在他之下，主笔尚有徐季钧，号古梅钝根生，曾在《叻报》任事，擅写社论，专题发挥。另一主笔林箸筹，号热血人，亦以撰述社论见长，其文正如其名，行文磅礴，充满爱国激情，写作甚勤；还有一个主笔是容濂丞；英文总主笔是林文庆，陈德逊副之。此外，操笔政的还有王会仪，他曾在《星报》做过事。

跟过去的华文日报一样，除星期天与节日假期外，《天南新报》每日出版一纸八大版，不同的是，《天南新报》有更多的新闻报导，用该报的话说：在“所有中国商口，皆设访事电传要务，与本坡西报声气相通，消息较为灵捷”。其排版也比《叻报》与《星报》有所改善，比较整齐美观，不同地域的新闻放在一起，各得其所。如以1898年6月2日的报纸为例，其排版如下：第一版有邱菽园的社论、报馆的告白与声明；第二版有上接社论、英美电音、翻译新闻（译自香港《华字英报》与上海《西字报》）；第三版有本坡新闻，各报论说；第四版有各报新闻（选自《广州报》、《求是报》、《天津报》与《农学报》）；第五版有国外新闻与京报选登；第六、七与八版都是广告。但自从1900年底邱菽园脱离《天南新报》后，报纸的内容与排版都有改变。改版后的报纸，内容反而不如过去的充实。

《天南新报》具有爱国的激情主义思想，它对中国政治发展比本地的更表关注。这也难怪，在其八年的报龄中，中国正是风云激荡，处于极端内忧外患之境地。先是有康梁的维新运动，继有义和团之动乱所引起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些事件及其掀起的激荡余波，严重威胁中国的亡国灭种，自然就成了《天南新报》评论的课题。

维新运动发轫于戊戌年（1898年）6月中旬，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推行变法。到是年9月，维新运动受到了慈禧太后

[9] 王慷鼎，〈天南新报史实探源〉，载《王慷鼎论文集》（新加坡：南洋学会，2014年），页335。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6月29日

官立储蓄银行移交邮政局

及保守派的反击扑灭，光绪帝被囚禁，康梁出走，六君子被害。《天南新报》对维新运动的立场是鲜明的，即反对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篡夺政权；主张还政于皇；也反对追捕康梁，捕杀新党。因此，它认为太后垂帘听政，一意孤行，不足为喜，反引为忧[10]；它主张在当前的局势下，只有光绪帝才能保中国，使中国变法图强[11]；对于“西后忍心而权奸施毒，竟使我皇重受冷月凄号之苦”，《天南新报》深表哀痛，呈请海外华商一而再，再而三“电请圣安，并请皇太后归政”[12]。它强调“维新之说，实吾四万兆人所共有之心，亦即吾四百兆人所难缓之公事也”[13]；政变之后，保守派追捕康梁余党，雷厉风行，《天南新报》警告说：“若必严行捕戮，绝其故国之望，恐此等热血多而涵养少之人激而思变。”[14]

《天南新报》虽未发展到今天报纸的水平，但它对新加坡华文报业作了两大贡献。首先是扬弃了过去报纸“有闻必录”的态度，而选择有价值的新闻报导。其次是藉报纸作为发抒爱国情怀与改革运动的工具。此外，《天南新报》一开始就设了“杂著附刊”栏，刊载邱菽园的著作《五百石洞天挥麈》，开启了后来华文报增设副刊的先河。

据王慷鼎研究，迄至1901年终，邱菽园为了逃避清廷的追捕，辞却《天南新报》总理及总主笔的职务，还把股权让给阮添筹律师，与《天南新报》断绝一切关系。1903年3月，《天南新报》再度易手，由侨商许山河接办，直至1905年停刊为止。

邱菽园在《天南新报》的三年多期间，一共发表了61篇各类文字，其中政论占多数，共44篇，多发表在1898年；其余属文史论文之类，多发表于1901年。这是他一生政论文字的精华，内容清新，立场明确，纵论维新救国之道，文字气魄宏大，洋洋洒洒，引人入胜[15]。

《天南日报》的销售数额不错，但报费难收及广告难招，使其财政陷于困境，终于在1905年4月30日停刊。

《南洋总汇报》（1905–1947）与《中兴日报》（1907–1910）之论战

自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梁逃亡海外，继续推行其保皇运动，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1899年7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分会。1900年在邱菽园的支助与安排下，康有为抵达新加坡，陆续展开保皇运动。保皇分会在新加坡跟着成立，由邱菽园出任会长。接着康有为又到东南亚各地展开保皇维新宣传。

与此同时，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也到海外四处活动。为了拯救其日籍友人宫崎寅藏，孙中山于1900年7月9日第一次抵达新加坡，随后遭英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在活跃的革命党人中，最重要的两位是陈楚楠与张永福。他们是当地富商，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大大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保皇党人与革命党人都深切意识到，报纸是宣扬本党政治思想与打击敌方威信的有力利器，所以都积极经营报纸。正如上述，早在1898年，邱菽园已创办了《天南新报》，作为保皇分子的舆论机关。1905年《天南新报》收盘后，接着同年又有另一保皇党喉舌报的出现，这就是《南洋总汇报》。说来有点滑稽，《总汇报》原是革命党张永福等人创办的。嗣后邀约了商人朱子佩等人参股，商人思想保守，不满《总汇报》藉此宣扬革命思想，与革命党人摊牌，结果是张永福等人退出，《总汇报》遂沦为保皇党的舆论阵地[16]。

嗣后，《总汇报》获得了康梁门徒的加盟，他们是徐勤、欧榘甲、伍宪子。徐勤仅次于康梁，是保皇会第三号人物。其他两人也是康梁的热烈追随者。来新加坡前，他们曾在日本、加利福尼亚及香港主持报业，富有办报经验，也是写作能手。自从他们加盟后，大大加强了保皇派的宣传阵营。

《总汇报》的版面配置活泼，标题不再只限于单调的

---

[10]〈太后垂帘不足为喜电辨〉，载《天南新报》，1898年9月27日。

[11]〈论保中国非赖皇上不可〉，载《天南新报》，1899年4月12日。

[12]〈海外华商宜再举行电请圣安并请皇太后归政说〉，载《天南新报》，1890年12月28日。

[13]〈论维新为国民公事〉，载《天南新报》，1899年12月7日。

[14]〈论严治新党非中国之福〉，载《天南新报》，1898年11月15日。

[15]王慷鼎，〈邱菽园的报业活动〉，前引书，页316–317。

[16]陈蒙鹤著，胡兴荣译，《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广东：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年），页77–78。

四个字，长短不一，视“新闻的内容而定”。社论与专题都使用句号标点，使读者更易阅读。新闻报导和社论的版位扩增，粤闽新闻占据一整版或更多，副刊也显得更重要。很快地，《总汇报》便执新加坡华文报业的牛耳。

另一方面，陈楚楠与张永福也于1904年出版《图南日报》，聘请陈诗仲与黄伯耀负责编务。该报公开鼓吹革命，推翻清廷，痛斥清廷官员贪赃枉法；同时也抨击保皇思想，被思想保守的商人认为大逆不道，群起抗拒，不买《图南日报》，也不刊登广告，使《图南日报》经济陷于困境。被迫于1905年底歇业，报龄不足两年。

1906年，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成立，革命党人不甘寂寞，以陈（楚楠）张（永福）为首的革命党人重整旗鼓，再次筹款，出版《中兴日报》，于1907年8月20日创刊。

《中兴日报》早期的编辑是何虞颂与王斧。他们到《中兴日报》服务前，曾在香港主持报业事务。他们同样是出色的报人，擅写各种文体，可谓是报坛多面手[17]。

何虞颂与王斧离职后，《中兴日报》另一主要编辑是田桐。田桐留学日本，曾在彼邦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亦为《民报》撰稿，署名恨海。编辑《中兴日报》期间，曾与《总汇报》大打笔战，并获得胡汉民与汪精卫等人助阵，孙中山也加入战围。

1908年6月10日，恨海发表了一篇论说〈与总汇报书〉，这是驳斥《总汇报》的〈立宪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手段〉一文，行文鄙薄，并列举若干立宪之根本问题，要对方回答。《总汇报》以牙还牙，于是掀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论战，足足延续了一年有余，而以6月至8月达致高潮。

在大论战的首半年，双方可谓战将如云，倾巢而出。《中兴日报》的主将有胡汉民、汪精卫、田桐等。9月，孙中山寄居新加坡，也加入战围，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撰写了几篇短文，驳斥对方的论点。

胡汉民于1908年7月由香港抵新加坡，协助孙中山安置镇南关与河口两役撤退至新加坡600余党人之生活问题，并辅助孙中山扩大党务宣传工作。他除了有一段时间北上马来半岛及暹罗从事宣传，与各地同志联络外，大部分时间都羁留在新加坡，直到翌年5月，才奉命返回香港，筹备广州起义及扩充南方党务。这期间，适值《中兴日报》与《总汇新报》展开大笔战。胡汉民学识渊博，以其丰富的法律、政治与历史等理论知识，撰成谠言正论的鸿文，驳斥保皇党的思想理论，巩固了革命堡垒，立下汗马功劳。他发表的专论最多，除用原名外，常用的笔名有“去非”、“辨奸”、“诘奸”等。

这期间，汪精卫也在新加坡，给《中兴日报》写的长文，不下14篇之多，畅述革命可杜绝列强瓜分的理论。他虽在1908年9月底离新，但仍不断寄稿发表。汪精卫文采朴质，笔触流畅。结构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先提出立论之纲领，然后引证事例实据，详加阐述，使人一目了然。孙中山谓“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论，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18]。汪精卫也有演说天才，胡汉民说他“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19]。

田桐身为主笔，在论战中自然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他也自然成为《总汇报》激烈抨击的目标。单单在7月份内，《总汇报》直斥恨海的长文短评，就有16篇之多。

此外，也有署名“广博”、“神骥”、

[17] 有关何虞颂及王斧创作的各种文体，刊〈中兴日报：新加坡同盟会的喉舌〉，载崔贵强，《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新加坡：海天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页54-55。

[18] 南洋小学生（孙中山），〈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也〉，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五册（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页294。

[19]《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页33。

“观战”与“龙腾”等人，与《总汇报》诸子针锋相对，叫阵对骂，一来一往，很是热闹。

两报的论争，环绕着下列两大主题：

（一）革命是否可行

《总汇报》的保皇分子强调革命党是乱党，根本没有实力推翻满清政府，而革命党的叛乱，会导致内部分裂，国无宁日，这只能提供列强瓜分中国的机会。可是《中兴日报》的革命党人认为，满清政府祸国殃民，欺压汉人，要救中国，非揭竿起义，实行武力的种族革命不可。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还未被列强整个儿瓜分豆剖，主要是因为列强各国维持其均势，尚未能解决利益之均分。汉人应乘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才能杜绝外国瓜分中国的野心[20]。

（二）宪法与国会之设制

保皇分子既认为革命不可行，那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便是改良政府，制定宪法。“有了宪法，便可设立国会，国会是富强之基础，治安之本原”。而革命党人却认为，立宪与国会绝不是乞求得来的，既然专制君主不肯拱手献出，唯有实行种族革命，以武力推翻政府。到那时，民权得以伸张，才能实现立宪与立国会的要求。他们强调：“征之各国历史，有由民权而构成国会宪法，无有由国会宪法而发生民权”[21]。

上述论战的文字，多出现在论说之栏，谠言正论，鸿文巨著，双方短兵相接，行文不免鄙夷谩骂。一般而言，《中兴日报》的文字多基于法理、政治与史实之理论，逐层剖析驳斥，说服力较强，似乎占了上风。

然而，更尖锐的激战，却表现在副刊的文字上。《总汇报》的论战策略，双管齐下，“第一版之言论，必义正词严。而第二版之谐谈，不妨谑而且虐”[22]。于是在副刊上出现了短评、谐文、谐丛、粤讴与班本等精悍的短文，嘻笑怒骂，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如伍宪子曾将《中兴日报》诸记者姓名笔名凑以下一联：“药石（居正）无灵，精卫含冤填恨海（田桐），汉民遭劫，杜鹃啼血怨西林（张绍轩）”，连革命党人都认为“谑而虐矣”[23]。又如署名“警”的作者，曾出下联曰：“田桐秋老死，叹药石无灵，终衰（中兴）有报。长此茫茫恨海，精卫难填”。并声称如能出上联对之者，将予奖赏。这样的游戏文字，也使对方不好受。此外如短文《问药石病》、《恨海记》与《龙腾记》都是引用敌对者的笔名，冷嘲热讽，嘻笑怒骂一番。相形之下，《中兴日报》副刊的文字，就不那么多样化，那么引人入胜了。

至于论战所使用的文字，也到了书不择言的地步。“无耻”、“卑劣”已属小儿科，甚至“臭贼”、“匪徒”、“妖孽”、“癞狗”与“妖言”等恶毒字眼，都派上用场了。

不过，那时候的新马侨民，以保守分子居多，尤其是资产阶级分子，更畏革命如蛇蝎，所以《中兴日报》销途呆滞，日销千份左右。创刊以来，入不敷出，经济拮据。到1908年，甚至“负债累累，困难殊甚”，幸赖陈楚楠与张永福竭力支撑，报业得以持续。然而最终还是无法支持，于1910年夏停版歇业。

《总汇报》与《中兴日报》的笔墨论战，展开政治思想的斗争，对当地侨民民智的开发，爱国意识的灌输，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言，资产阶级分子比较倾向保皇派；而中产的小商人与知识分子，以及低层的劳动分子，却较同情革命分子。

---

[20] 关于这方面的论说，《中兴日报》主要的有汪精卫，〈申论革命决不致瓜分之祸〉（《中兴日报》自1908年6月25日至7月27日缺，7月28日是该文的第11期连载，至8月7日连载18期才刊完）；〈革命可以杜绝瓜分之实据〉（1908年8月27日、28日、29、9月2日、25日、26日、28日及30日）；〈革命之决心〉（1908年9月4日）；胡汉民，〈驳总汇报惧革命召瓜分说〉（1908年8月19日、20日及22日）。而《总汇新报》主要的有亦市（即徐勤），〈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1908年6月29日，7月1日、2日、4日、6日、7日、9日、11日、13日、16日、18日及20日）；锄，〈排革命实以救中国〉（1908年10月16日、19日、23日及24日）；平实，〈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1908年9月9日及11日）。

[21]《中兴日报》的主要文章有：汪精卫，〈要求开国会者宜有最后之武力〉（1908年10月10日）；去非（胡汉民），〈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1908年8月10日、12日、13日、14日、15日、17日、18日、19日、20日及21日）；辨奸（胡汉民），〈驳总汇报论国会与君主之关系〉（1908年10月22日）；宅人，〈正总汇报定期开设国会为为中国自强之基础〉（1908年9月15日、19日及24日）。而《总汇新报》主要的有：锄，〈论国会之趋势〉（1908年8月1日、3日、5日）；勇，〈论定期开设国会为中国自强之基础〉（1908年8月29日及9月2日）；平实，〈论今日时局只可立宪救国万无革命之理〉（1908年9月5日）。

[22]〈斥中兴之记者〉，载《中兴日报》，1908年7月7日。

[23]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3年），页85。

拥护共和，反对专制（1913–1923）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清廷覆灭，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但革命的果实很快便被袁世凯攫取，袁世凯更于1915年僭号称帝，引发起各地的讨袁运动。可是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梦，便郁郁而终。接着中国出现了军阀割地称雄，互相争战，群魔乱舞的政局。

1917年，更上演了张勋复辟的丑剧，扶持清帝溥仪复位，引起全国军民的反抗，复辟运动只维持了11天，便被扑灭。

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地盘日益壮大，他们野心勃勃，专制独裁。而主张民主共和的中国国民党，势力仅局限于南方广州地区。直至1926年组成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统一中国。

这期间，新加坡的华文日报，除了延续下来的《叻报》、《总汇报》以外，新创办的有《振南日报》（1913-1920）、《国民日报》（1914-1919）及《新国民日报》（1919-1940）。

《振南日报》（《振南报》）于1913年1月1日在新加坡创办，1920年9月30日停刊，报龄长达7年9个月。它是中国进步党新加坡支党的党报。其宗旨是“主持公理、指导政府、增进国民知识、维持国际和平”。早期的主要股东有刘照青、张弼士与方璧池。

邱菽园在《天南新报》停刊后，蛰伏了一段时期，于1913年底东山再起，参与了《振南日报》的业务。他具有多重身份：股东、监印、发行人、司理、主笔及编辑主任等。此后，他与《振南日报》的关系时断时续，直至报馆关闭[24]。

《国民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报，于1914年5月18日创刊。那时正是袁世凯萌生帝制之际，为了抑制袁氏的野心与广植国民党之信念，槟城国民党人乃分头向英荷美法暹等地华人劝募办报股本，得4万余元。股本既足，公举陈新政为总理，丘天绍为经理，聘雷铁崖为总编辑，《国民日报》于焉诞生。草创初期，该报之反袁议论，不获当地侨民见谅；加以袁氏爪牙的破坏，与当地政府严加管制，以致销售数额锐减，经费枯竭，不得不于1915年8月31日停刊。停刊后曾一度改出《国民杂志》，但为时甚暂，又告停版。

嗣后，该报董事部于槟城集议，商议报纸复刊，议决重整旗鼓，派遣薛木本来新加坡进行筹划，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1916年3月1日复刊。

《国民日报》之主笔，先有雷铁崖。1917年3月，聘北京梁瘦佛南来主持笔政。梁氏南来前，曾任北京《顺天时报》主笔。他擅写论说，也写旧体诗。但任职数月后，梁瘦佛因不适当地的饮食习惯，脑疾腹疾时起，物质精神备受折磨，不得已辞职返国。主笔一职由成运可接任。嗣后复得姚鹓雏加入阵营，于1918年1月杪由沪启程南来。姚鹓雏过去曾在上海的《太平洋报》与《民国日报》任职，也办过杂志。他擅写政论文字、诗歌、小说与杂文等，是一个多面手，该报后来与《振南日报》展开笔战，姚鹓雏是主将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国民日报》同人激于义愤，屡屡刊载抵制日货的文字，不见容于当局，总协理遭政府拘拿，该报被令停刊一个月，于是年8月6日停止出版。旋由董事部议定与人承办，派谢文进为经理。同年10月1日复刊，改名《新国民日报》。

复刊第一天的《新国民日报》，重申其宗旨是：促进共和国民的程途，发挥平民政治的意义。要改良社会，鼓吹教育与提倡实业，但它的言论将不会超越居留地政府的法律范围。而复刊的报纸也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内容共有八大项，有国内外要闻与评

[24] 王慷鼎，〈邱菽园与《振南报》〉，前引书，页347–361。

相关人物

林衡南（林光铨）

历史事件

2 月 14 日

古友轩出版的《星报》创刊

论，有本坡与南洋要闻与时评，此外还有闽粤时评及副刊“新国民杂志”[25]。

一般而言，华文报大都赞成中国采用民主共和的政体，反对少数人的独裁专制，所以它们对袁世凯的处世用人，自私自利，包藏祸心，都不具好感，或善言相劝，或尖锐评骘。如《叻报》就批评袁士凯录用陈璧、曹汝霖与段芝贵为用人不当[26]；1913年4月，袁世凯不顾众人的反对，违法与五国银行团订立善后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总汇新报》即向政府提出忠告，要求政府确定财政之计划，如整理币制、创办银行、偿还外债等等，以植国家根本大计，起国家于沉疴，并宣布借款之明确用途，以释众疑，平息反对之声浪[27]。

1915年12月，袁世凯更一意孤行，僭号称帝，改号洪宪。这种倒行逆施，家天下的自私行为，引起公愤。《叻报》与《总汇新报》虽未作正面抨击，却也在显著版位，刊载了“日英俄法四公使合词劝告之详电”。电文指出，中国改变国体，实行帝制，引起人民强烈反对，易生动乱，造成危险，这种改变是不必要的，宜暂缓推行[28]。连保守的《振南日报》也认为“中华国之民最适用于共和制也”，“共和立国以来，敢言其是日逐进步，而非退步矣”。对于袁世凯的改体帝制，编者寓公“不禁为之掷笔三叹”[29]。至于拥护共和，反袁最力的《国民日报》，更对袁氏痛加挞伐，猛烈抨击。

《振南日报》创刊于1913年元旦，主要编辑有邱菽园，《振南日报》常有署名“寓公”作品，即邱菽园“星洲寓公”的别号。邱菽园饱读经书，过去主持过《天南新报》，富有办报经验。袁世凯死后，《振南日报》支持北京政府的段祺瑞，认为段祺瑞充任国务总理，政局将会翻新，中国统一前途充满乐观气象[30]。另一方面，《振南日报》鄙夷孙中山及国民党，认为孙中山与军阀陆荣廷之合作，假护法之名，反对北京政府，不过是“争权竞利”，两系最终必会发生冲突[31]。《振南日报》的政治立场，与《国民日报》是尖锐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振南日报》与《国民日报》立场迥异，各事其主。那边厢对段祺瑞及北京政府交相赞誉，痛骂孙中山及追随者；这边厢却歌颂孙中山等人的爱国精神，严厉谴责段祺瑞等人的出卖国家与民族，这种各走极端的尖锐矛盾，终导致了一场主题“中国会不会亡”的笔战。

《新国民日报》复刊后一年半，又因与敌对者政见不同打了一场笔战，这回的对手是华报先驱的《叻报》。

这次笔战前后延续了四个多月，直到1921年9月9日叶季允逝世方才罢休。笔战期间，两报几乎每天都有文章刊出，有时三几篇同时出笼，有长篇义正词严的言论，也有嘻笑怒骂的短文。至于阵前的主将，那边厢有惺噩生（叶季允）与李焕燊；这边厢有痴鸠（疑是《新国民日报》总编辑张叔耐）与李铁民。惺噩生毕竟是报坛高手，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略通道理的，是尚存人格的，他的文字也蕴籍，也很有读书人气味，从来没有鄙俚蛮横底话”[32]。

这时期的华文报设有“论说”（社论），刊载于第一或第二版之显著版位，“论说”大都是鸿文巨论，有时连载数天。“论说”主要由总编辑执笔，也有转载国内的评论文字。“论说”以评论中国问题为主，偶尔出现评论国际与当地问题的文字，不过数量不多。

报道国内外新闻的有“选电”、“专电”、“特约电”及“译电”，大都是来自电报的材料，也有简译当地英文报章的。一则新闻只有三几行，寥寥一百数十个字，语焉不详。另有“祖国要闻”及“世界要闻”，是比较详尽报道的文字或专论，有的是特约通讯员所写，有的是转载国内报章的文字。

大概是因为新加坡的华族多半是华南的移民，对乡情特别关注，为适应读者的需求，各报都辟设“福建新闻”与“广东新闻”的专版，报告两省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

[25]〈例言〉，载《新国民日报》，1919年10月1-6日。

[26]〈忠告袁大总统〉，载《叻报》，1912年5月18日。

[27]论说〈为大借款事忠告政府〉，载《总汇新报》，1913年6月7日。

[28]〈日英俄法四公使合词劝告之详电〉，载《叻报》和《总汇新报》，1915年12月16日。

[29]论说〈共和冤辞〉，载《振南日报》，1915年12月16日。

[30]〈统一前途之乐观〉，载《振南报》，1918年5月3日。

[31]〈陆孙两系冲突之必至〉，载《振南报》，1918年5月15日。

[32]〈唉呀叻报的笔战跟着它老记者一起死了〉，载《新国民日报》，1921年9月12日。

等动态。这类报道经常占了半版或2/3版，几乎每天都有。

各报也设有“时评”的专栏，篇幅小，通常只有区区一千数百个字，评论的课题还是以中国的为主，如〈累卵痛言〉[33]、〈总统果不可让人耶〉[34]；也有评论当地问题的，如〈刘君已判决出境了〉[35]。

“本坡新闻”与“南洋新闻”的内容最贫乏，大概是经费枯竭，没有聘用专人实地采访，只凭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报馆只是一味“有闻必录”，并不深究新闻的真实性。虽然报纸也逐译宪报或政府广告，但严肃的新闻不多，倒是杀伤、偷骗、抢劫、烟赌、嫖妓与打架等等罪恶新闻，却无日无之。每则新闻寥寥数百个字，乏善可陈，编排凌乱，是最乏味的部分。

大概也是为了满足商人的需求吧，各报每天都拨出一版，报道汇票行情、土产行情、物价一览，以及轮船出入口，但却很少有经济专文的刊载。

各报亦有副刊之设。《振南日报》称“文苑”，早期在新闻余幅，附载诗词，或围墨轶事，用以补白，及聊助读书兴趣。1907年1月16日，《叻报》加编“叻报附张”，内容包括游戏文章，滑稽词令，黄州谈鬼，漆园寓言，又有词赋诗歌。

新加坡华报的总编辑（主笔）是从北京、上海、广州与香港等地聘请的。如南洋第一报人叶季允，先在香港的《中外新报》服务，1881年《叻报》创刊时，被礼聘南来主持笔政，前后达40年。其他有《国民日报》的主笔梁瘦佛（来自北京）与姚鹓雏（来自上海）以及《新国民日报》总编辑张叔耐等人。他们南来之前，都曾在京沪港等地报馆任职，富有编辑与写作经验，也因袭了那些地方报纸的风格与方式。上述诸人都是多面手，写论说（社论）时评，写小说，赋诗填词，他们的作品几乎天天见报，有时更是几篇作品同日出现，他们同时也得兼理编务的工作。不过他们毕竟也没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而其他编辑与写作人员甚感缺乏，加上报馆经费枯竭，以及当地政府对舆论的箝制，因此这时期的华报都不够完善；如国际新闻、本坡与南洋新闻过于简略，国际问题评论欠缺，新闻处理凌乱，版面不美观，标题呆滞，缺少变化，都是明显的缺陷。

在商言商，抗敌救国（1923–1941）

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局动荡，军阀群雄割据，战争频繁。直至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才铲除了旧军阀势力，但实际上中国并未统一，国民党内部分裂，派系林立。除了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府外，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等军人都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地盘，公然与南京政府对峙。1929-1930年间，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及中原大战，战后蒋介石才巩固了中央政权。

另一方面，自1927年蒋介石下令“清党”，肃清党内共产党人的势力，国共便公开决裂。此后，共产党红军以井岗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并把势力扩张到江西、福建、湖南与湖北等地。从1930年后，蒋介石对红军多次围剿。至1934年10月，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向西撤退，经过了约一年千山万水的跋涉，最终到达了延安，建立了新根据地。

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扩大对华侵略。先是发生“济南惨案”，接着又爆发“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淞沪之战”，最终更发动“七七

[33] 载《国民日报》，1918年5月15日。

[34] 载《叻报》，1921年4月22日。

[35] 载《新国民日报》，1919年10月8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在林文庆创导下，成立“威基利俱乐部”，为海峡华人精英分子的社交场所

事变”的全面侵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

这期间，新加坡华文报除了原有的《叻报》（1932年停刊）、《总汇报》与《新国民日报》外，新崛起的报章依序为《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民国日报》与《星中日报》。

《南洋商报》于1923年9月6日创刊，由商业巨子陈嘉庚独资创办。20世纪初，陈嘉庚投资黄梨业与橡胶业种植，发了大财。后来又建立树胶成品制造厂，生产轮胎、胶鞋、医疗器材及各类玩具等，分行散布在上海、香港、厦门、广州、吧城及马来半岛各地，与其每年花费庞大的广告费在别人报上推销产品，不如由自己办报来推销。因此他萌生了办报的念头，筹办《南洋商报》。

《南洋商报》办报的目的是多方面的，除了“在商言商”谋利外，报纸之所以取名《商报》，就意味着创办人企图通过更多商务与经济的报导与评述，教育读者，从而协助华商拓展当地的经济事业，华商实业之发展，实有助于充实教育之发展经费[36]。

《南洋商报》出版了一个多月后，便遭挫折，殖民地政府以该报“涉及党派政治”为由，着令《南洋商报》于10月28日停刊，直至1924年2月1日才复刊，前后停刊了三个多月。

复刊后的几年间，《南洋商报》业务一帆风顺，年有盈利。1928年改用卷纸复印机，每小时可印5000份，是新马用卷纸复印机的第一家。但自1929年经济不景气发生后的数年间，新马百业萧条，民生艰苦，影响所及，报纸零售价不得不减低，每份由一角减至三四分。广告也锐减，收费低廉，过去每版广告全年取费4000余元，这时竟低至2000余元，幸赖该报基础稳固，得以渡过难关。

1932年1月3日，《南洋商报》增刊出版星期刊。那时候，日本加剧侵略中国，继“九一八事变”后，复有“一二八淞沪之战”，祖国风云激荡，当地侨民急欲了解事态发展，对于国内消息均想先睹为快。为满足读者的需求，该报遂从1932年3月14日起，改午报为早报，清晨6时以前出版。较早时，该报出版了彩色画报，每逢星期三出版。

1933年8月，《南洋商报》改组，脱离陈嘉庚有限公司，由李光前、林庆年、李玉荣等人承办，注册为有限公司。那时广告日多，篇幅扩充，由四大张而五大张而六大张；星期刊则由一大张而二大张而四大张。1937年10月份的《南洋商报》，其内容包括国内外新闻、中国新闻特写、评论、本坡新闻、马来亚新闻、市况报道，副刊“狮声”及其他。星期刊则除了概括上述主要内容外，还有“电影”版与“经济”版，前者评述影人影事，后者有经济专题论文及报道。

自创刊至日军进占新加坡（1942年初）的18年间，编辑主任计有11人，他们是方怀南、杨治襄（智湘）、林独步、沈职民、张相时、汪颂鲁、曾圣提、蓝碧空、邱国材、傅无闷与胡愈之。他们先后来自中国，有些在进入报馆服务之前，先在教育界服务。在报馆任编辑主任一职，长短不一，短的只有两个月，如方怀南、沈职民与杨治襄；有的任期长达三四年，如林独步、邱国材与傅无闷。

其中林独步在任期间，对《南洋商报》的新闻及评论的处理有不少创新。汪鲁颂主政只有一年半（1928年11月-1930年5月），但也在印刷形式，副刊及评论等方面作了改革与创新。邱国材任期长达四年八个月（1932年11月-1937年6月），任职期间，对新闻内容的安排，评论的撰述，副刊的增版，也都作了贡献。傅无闷任期三年多（1937年7月-1941年1月），他是编辑主任兼经理。傅无闷加盟《南洋商报》之前，曾在厦门、菲律宾、仰光、槟城、泗水等地主持报务。1929年《星洲日报》创刊后不久受聘为编辑主任，至1937年跳槽到《南洋商报》为止，可说是资深的报人。傅无闷文笔犀利，才思敏捷，下笔成章，任职期间，对《南洋商报》贡献很大。那时适值抗日救亡运动在新马如火如荼地展开，《南洋商报》成了抗日舆论的强大阵地。胡愈之主持报务只有一年一个月（1941年1月-1942年2月），他是有名的语言学家与政论家。奉中共高层指令，南来加盟《南洋商报》，加强反日言论。他给《南洋商报》带来许多新颖的改革，他的多姿多彩的论著，很受读者欢迎，使《南洋商报》脱颖而出，独树一帜[37]。

《星洲日报》是由胡文虎、胡文豹创办。胡文虎原籍福建永定，缅甸仰光侨生。自小研习中医，制成了虎标良药多种，包括虎标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与止痛散等。《星洲日报》于1929年元月15日正式出版。

《星洲日报》的筹办具有多方面的目的。首先胡文虎

[36] 见《南洋商报》创刊号上发表的题为〈实业与教育之关系〉，1923年9月6日。

[37] 有关《南洋商报》诸编辑主任之业绩，参阅王慷鼎，〈南洋商报战前历任编辑主任〉，载《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新加坡：新社，1987年），页49-88。

乌节路上的《星洲日报》广告

必定从陈嘉庚的办报作广告宣传得到启示，他的办报目的之一，也是借报纸来推销其虎标良药；其次是“在商言商”，借报纸谋取商业利润；第三是“提高国人知识，补助学校教育之不足”，从而提高华侨之地位。

《星洲日报》创刊伊始，聘得朱宝筠为总主笔。朱氏留学法国，专工纸料，归国后由蒋介石荐举南来《星洲日报》服务。报馆并聘用周逸农与胡浪漫为编辑。1929年3月，由于朱宝筠水土不服，复无心恋栈报业生涯，辞职归国，总主笔一职由周逸农暂代，旋周君卸职，1929年10月1日改聘傅无闷为总主笔。

自傅无闷掌舵《星洲日报》后，便包揽了编务与撰述工作，前后达八年之久，作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报纸面目一新，日趋完善，成了执华文报业之牛耳[38]。

傅无闷跳槽到《南洋商报》后，报馆聘请关楚璞主持笔政。1938年，郁达夫应聘南来，担任该报文艺副刊编辑。郁达夫勤于笔耕，乐于扶掖后进，使该报副刊散发出浓厚的文艺气息。关楚璞（笔名楚公）于1940年离职后，俞颂华接任。南来之前，他曾在《东方杂志》和《申报月刊》当主编，熟悉国际问题。但俞颂华任期不长，大约在日军南侵前半年便回国，总编辑一职由潘公弼接任，但不久即发生了日军占领新加坡事件，报馆结束营业。

《星洲日报》初期每日出版四大张（16版），后来因广告与内容增加，扩充到五大张而六大张。就1933年的报纸来看，其内容有社论、中外新闻、广东与福建新闻、新闻评论、本坡新闻、马来亚新闻、南洋新闻及副刊“晨星”等。星期刊除中外新闻外，有“每周评论”、“经济周刊”、“妇女界”、“国际问题”、“体育周刊”、“文艺周刊”、及“游艺场”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多姿多彩。

在战前13年的报业史中，《星洲日报》树立了几项创举。出版的第一年，发行画报，图文并列，取名“星光”，每周一期，随报附送。1932年，《星洲日报》增出星期刊。过去的华报，星期日休刊，《星洲日报》打破了传统惯例，此后各报竞相效尤。同年8月，更因时局紧张，每日分早晚两次出版，早版6时发刊，晚版午后6时见报，全日共出八大张。1937年七七事变后局势愈益危急，为满足读者要求，该报更增出午报一张。由是早午晚日出三次，有时还出版“号外”。此外该报并于一周年纪念、二周年纪念、四周年纪念及六周年纪念均发行巨帙纪念刊。1940年更出版了《星洲十年》，厚达1300余页，都百万言，内容丰富翔实，是研究新马重要参考资料，弥足珍贵。

《民国日报》于1930年1月1日问世。此前一年，一批国民党的忠贞之士为了组织一纯粹

[38] 详情见〈傅无闷与星洲日报〉，载崔贵强，《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页134–154。

党报，云集新加坡，成立筹备委员会，委员包括张永福、何思观、郑古悦、郑螺生、谢文进及胡文钊等人，向政府申请注册获准。预订资本20万元，招足6万元即可开办。但其时正值经济不景，招股极为困难，几经努力，只收得4万余元。旋由郑螺生补足，即定购机件字粒，赁屋聘人，着手准备出版工作。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党报，报头“民国日报”四个大字即为党国要人于右任所题，之下印上了总理遗嘱。创刊号上有中央党部如胡汉民、王正廷与陈果夫等党要贺文及题词，以壮声势。

该报初时每日出版4张16版，内容有中外新闻，多选择刊登有利于国民党的电讯，尤其是中央来电；有短评、本坡与南洋新闻、市况一览表、公共园地（让公众尽量发表言论）、副刊“新航路”、以及“党务”一栏。“党务”一栏之设，目的是“把本党主义的理论，本党政策的价值，本党一切消息，择要在这一栏发表，俾一般民众对本党有相当认识，进而为本党奋斗，彼此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一新中国”。

《民国日报》可谓生不逢辰，诞生之时，正值世界经济恐慌的阴影笼罩新马之际。市况萧条，失业浪潮澎湃，人民购买力低弱，商家少登广告，报纸滞销。零售报费从一角降至三四分，不及半年，《民国日报》即陷入经济困境，只得向中央党部要求资助，获得每月资助国币1000元。该报也命途多舛，1930年5月2日的社论〈济南血〉一文，利用济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鼓动抵制日货，言词激烈，被当局认为煽风点火，惹事生非，吊销执照，停刊两个月，至7月10日才复刊。这使该报的全盘营业，受到严重打击。

嗣后，该报同人惨淡经营，维持了五年，到1935年1月，因亏蚀过巨，不得不收盘。计五年来亏折了11万余元，包括股本8万余元，中央津贴2万余元，李振殿代出1万余元，拖欠华侨银行1万5000余元。

《星中日报》也是胡文虎创办的，于1935年9月11日问世。初期是午报，日出两张，内容有社论、时评、专电、外电、本坡及中外各地新闻、商业经济体育教育等各种特讯，还有副刊及各种专刊。但11月初以后，改为早报。编辑主任是胡守愚。胡守愚，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出身，留学日本，是东京大学研究生。1938年被调往香港，主编一职由钟介民取代。翌年钟介民被调职，而以《星槟日报》主编胡迈取代，改为小型报。

这期间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具有前所未有的优点：

（一）人才鼎盛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互斗，民不聊生。1927年蒋介石“清党”，对左翼文人残酷迫害。到19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加深对华侵略，致使一批批中国知识分子，南来避乱谋生，其中不乏具有良好学历与专业，及丰富的新闻从业工作经验者。他们大多受聘于当地报馆，这大大加强了报馆的编务与写作阵容，其中包括傅无闷、曾圣提、张相时、汪鲁颂、冯列山、王仲广、郁达夫、王任叔（巴人）、关楚璞、叶浅予、郎静山及胡愈之等等。在他们主持笔政期间，都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报纸焕然一新，丰富了报纸的内容，扩大了报纸的版位[39]。

这期间，华文报也有许多专刊出现，如“南洋周刊”、“电影月刊”及“戏剧周刊”等。《星洲日报》也设有“经济周刊”、“国际问题”、“妇女界”、“体育周刊”、“南洋研究”、“电影周刊”及“教育周刊”等等。这些专刊大都由专人负责撰文评述，是研究这时期华人的经济活动，社会动态与华文教育的好材料。至于文艺副刊则更多，几乎每种报纸都附设文艺副刊，如《南洋商报》的“晓风”与“狮声”，《星洲日报》的“晨星”与“繁星”；《新国民日报》的“新路”与“新光”，《总汇报》的“世纪风”与“舞台面”，《星中日报》的“星火”与“星云”等等，名目纷繁，争相辉映。

（二）资金雄厚

《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既是大资本家创办的报纸，又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因此有雄厚的资金。由于竞争剧烈，两报都极力延揽人才，改善内容。一种做法是多买专电。过去的报纸只买中国专电，上述两报却兼买外国的如路透社与美联社等专电。这一来，便扩大了新闻来源，充实了新闻内容。两报也在新马各地增聘采访人员，有了专人采访，新闻较确实详尽，新闻范围也扩大了。此外两报也在中国各大城市如南京、北平、上海、广州、厦门等地以及香港增聘特约通讯员，把各地的动态，以新闻特写

[39] 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页113-121。

的方式，快捷而详尽地反映出来。随着时日的推移，新闻性质日趋复杂，分门别类，因此编者与记者都须分工合作，使报纸益趋完善。由于两报的改善，争得更多的广告与读者。其他各报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奋起直追，力加改善。这期间的《叻报》、《总汇报》、《新国民日报》与《民国日报》，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改进。

此时的华文报依然具有浓烈的中国政治色彩，就政治立场而言，大多是亲国民党，拥护南京政府。《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它宣扬国民党党义，服膺三民主义，自不待言。《星洲日报》也开宗明义，一而再强调这一立场，它说其使命之一是“以党（国民党）为立场，发扬三民主义”[40]。又说：“本报立言态度，自出版至今，始终以三民主义及民众为立场……凡对于三民主义及民众利益有冲突者，不论其为何人，均据理批评”[41]。至于《南洋商报》，党性色彩不太浓烈。创办人陈嘉庚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前期支持国民党，所以该报也是“对祖国以拥护南京政府为宗旨”，告诫“凡服务本报诸君务须深切体会本报之宗旨”[42]。

如果说华文各报对国民党的看法仍存歧见，那么在国共摩擦的问题上却一致指责共产党，把中共称为“共匪”。《民国日报》是党报，自然是激烈反共的。《星洲日报》把中共喻为流寇，干的尽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勾当。主笔傅无闷也以匪共蔓延，地方紊乱，对蒋介石之剿匪，寄以重望，希望他能克奏肤功，拯民众于水火。不过，他以为匪共势力之坐大，群众之归附，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之失策，不能辞其咎[43]。1934年10月，红军突破包围，撤离江西，向西挺进。傅无闷写了一篇〈共匪突围南窜〉的社论，分析中共的动向，认为“共匪突围南窜，侵粤非其目的……为假道湘黔，为贯澈其理想中之川陕路线计，不能不侵粤”。“吾人虽不信匪有蹯踞广东，依以为生之可能，而地方治安之扰乱，社会基础之破坏，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与乎中央追随匪踪之入粤，而引起对西南军事之纠纷，则祸患之钜，皆吾人所不忍预测者也”。《南洋商报》的反共立场，虽不像上述两报昭然若揭，但从其新闻报道的处理，标题的遣词用字，以“共匪”称“中共”，其反共立场显而易见。当1934年10月底中央撤离江西时，《南洋商报》就唱“闽赣共匪之没落”的高调了。其他如《总汇新报》和《新国民日报》也都采取反共立场。

“七七卢沟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侵华，当国难当头，民族存亡面临严重威胁之际，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御外侮，枪口一致对外。《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创办人也捐弃前嫌，各自领导华族族群，共同抗敌救国。报纸是最有力的宣传工具，对教育群众，提高侨民的爱国意识与鼓动同仇敌忾的民气能发挥极大作用。随着抗战的爆发，两报即配合领导层的决策，积极地亦步亦趋，展开与推动抗敌活动。

华侨的抗敌救国活动，首先有新马各地华侨筹赈会的成立，负责展开捐款及筹款行动。为了促进全东南亚华侨的精诚团结，群策群力，加强后援救亡运动。东南亚各地华侨代表，于1938年10月10日召开各地华侨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为东南亚各地筹赈会的领导机构。总办事处设在怡和轩，众推陈嘉庚为主席。在南侨总会的领导，各地展开了捐款、演剧筹款、售花助赈、抵制日货、推销自由公债、征募机工回国服务、组织回国慰劳团。两报对上述各项活动，无不以长篇累牍，

[40]《星洲日报》发刊词，1929年1月15日。

[41] 蠲民，〈本报一年来的回顾〉，载《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刊》1930年，页T123。

[42] 子心，〈本报十二年来史之回顾〉，载《南洋商报》，1935年9月8日。

[43] 无闷，〈蒋介石之剿匪谈〉，《星洲日报》社论，1932年7月1日。

相关人物

柔佛苏丹

历史事件

3 月 26 日

甘榜武吉士发生大火

12 月 3 日

柔佛苏丹在新加坡的新王府落成

详尽的报导。报人并以奔放的热情，激越昂扬的文字，打动读者之心，参与各项活动。

随着日军的扩大军事侵略，战况日趋激烈，战场上的瞬息万变，激起海外华人的极大关注。两报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无不拨出巨大的篇幅详尽报道与分析战况。《星洲日报》就例常出版早版六大张（24版）、午版一大张（四版）、晚版一大张（四版），遇到发生重大紧急的突变，还加出号外。内容一般有社论（如〈经济制裁日本〉、〈敌将大举犯华南之警耗〉、〈厦门失陷的影响〉）；电讯四版，报导国际动态与国内战况进展；本坡要闻四版；马来亚要闻三版；祖国要闻两版；闽粤地方新闻、经济要闻、副刊“晨星”各一版。

华文报章一致拥戴蒋介石领导中国军民抗敌，称赞他英明果断，不屈不挠。两军对峙，在蒋介石领导下，中国可单独作无限期抗战，经济及军事上均无须外力援助，前途乐观，事实证明中国必胜，敌国必败。

华报也赞誉在国民党将领及民众支持下，国军英勇抗敌，屡屡挫败敌军的攻势。可是对毛泽东的抗战“持久论”的战略，共军游击战的战绩，却只是偶尔提及，如《星洲日报》述及“敌在晋北，被八路军击败后，现拟全力犯晋，贺龙亲在前线，指挥战事”[44]。又说“第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抵重庆谒蒋。允将八路军归中央直辖，中共彻底服从中央之重要表示”，“朱德率精锐部队攻热河，已在蓟县北马兰谷与寇激战”[45]。

众所周知，汪精卫在平津失陷时即欲与日本内阁谈判和平，停止抗战，以满足日本吞噬中国的条件，等同屈膝投降。陈嘉庚风闻其事，数度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发电汪精卫与蒋委员长，询问其真相，一旦确实真有其事，陈嘉庚怒不可遏，向参政会提案，会议通过“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决议案。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率领其党羽逃离重庆，飞往河内，公开表态“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消息传来，全国沸腾，一致同声谴责。新加坡侨民

《星洲日报》十周年纪念特刊

也群情汹涌，各团体纷纷通电蒋政府“请缉汪归案明正典刑”。华文报也拨出巨大篇幅，连篇累牍，转载党国中央及国内舆论一致痛斥汪精卫的“丧心病狂，荒谬绝伦”、“甘作民族罪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议决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蒋委员长声称“中央决战到底”[46]。

《南洋商报》是抗日舆论的坚强堡垒。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一直由名报人傅无闷坐镇，1940年12月初，更由周恩来举荐胡愈之南来进入《南洋商报》服务，充当编辑主任，《南洋商报》如虎添翼。胡愈之是中共党员，国际问题权威。胡愈之走马上任后即着手一连串的改革。胡愈之文思敏捷，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论，方修认为“胡愈之是个优秀的政论散文作家”[47]。社论的内容广泛，概括了欧洲、苏联、美国、中国、日本、东南亚及非洲等范围。军事的冲突发展，政治的波谲云诡，外交的纵横捭阖，经济的微妙关系，无一不是社论论述的课题。

胡愈之也写了许多长文与短评，大都是围绕着保卫中国、保卫南洋、促进国际合作，抵御军国主义的伸张。在胡愈之主持下的《南洋商报》，其立场是主张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提出的口号是：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在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大前提下，各党派都应泯除成见，团结抗日救国。华侨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帮派主义的复活。团结起来，给敌人汉奸迎头痛击[48]。

---

[44]《星洲日报》，1937年10月18日。

[45]《星洲日报》，1939年1月28日。

[46]《星洲日报》，1939年1月5-6日。

[47]方修，《胡愈之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年），页2。

[48]崔贵强，〈赤道线上的呼号：胡愈之与南洋商报〉，载《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页75-104。

附表
战前新加坡华文日报一览表（1881–1942）

报纸名称	社长/经理/创办人	总编辑/主笔	创业日期	停刊日期	销数	立场	备注
《叻报》	薛有礼	叶季允 何应源	1881.12.10	1932.3.31	550（1900年）；650（1920年）	拥护当权派，保守	
《星报》	林衡南	林衡南 萧庆祺	1890.2.14	1898秒	970（1896年）	保守	
《天南新报》	邱菽园	邱菽园 徐季钧	1898.5.26	1905.04.30		支持保皇党	
《日新报》	林文庆	黄乃裳	1898.10.5	1901			
《图南日报》	陈楚楠 张永福	陈诗仲 黄伯耀 何德如等	1904年初	1905末	不详，印刷1,000份	革命党人报纸，激进	为南洋创刊革命机关报之嚆矢
《南洋总汇报》	朱子佩	徐勤 王仲广 梁显凡 邱宗尼	1905	1947	1,430（1911年）；1,600（1921年）；4,200（1929年）；8,000（1938年）	保皇党机关报；前期保守，后期稍激进	辛亥革命后改称《总汇新报》；1939年为胡文虎接办，战后初期与《星洲日报》联合出版，1946年6月1日两报又独立出版。
《中兴日报》	陈楚楠 张永福	田桐	1907.8.20	1910	1,000	革命党人喉舌报，激进	
《星洲晨报》		谢心准 周之祯	1908	1910		革命党人宣传报	
《南侨日报》	黄吉宸 卢耀堂		1911	1911	900	革命党人宣传报	
《振南日报》	邱菽园 刘照清 张弼士	邱菽园	1913.1.1	1920.9.30		中国进步党党报 反孙中山，支持段祺瑞	
《国民日报》	陈新政 丘文绍等	雷铁崖 姚鸿雏 梁瘦佛	1914.5.20	1919.8.6	2,000（1918年）	国民党党报，反军阀，拥护共和	言论过激，被政府命令停刊
《新国民日报》	谢文进	张叔耐 宋韵铮	1919.10.1	1940.12秒	3,200（1921年）；5,424（1930年）；8,000（1938年）	国民党党报，反军阀，拥护共和	其前身是《国民日报》，《国民日报》复刊后改今名，1941年元旦迁往吉隆坡

报纸名称	社长/经理/创办人	总编辑/主笔	创业日期	停刊日期	销数	立场	备注
《南铎日报》	蔡炽三 陈仁甫		1923.5.4	1925.4.15			
《南洋商报》	陈嘉庚 林青山	邱国材 傅无闷	1923.9.6	1983.3.15	2,700（1921年） 7,000（1931年） 30,000（1938年）	拥护南京政府	1983.3.15《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
《星洲日报》	胡文虎	傅无闷 关楚璞	1929.1.15	1983.3.15	12,000（1933年） 60,000（1937年）	拥护三民主义，支持国民党	1983.3.15《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合并为《联合早报》
《民国日报》	郑螺生 张永福	黄凤翔	1930.1.1	1935.1.5	2,200（1933年）	国民党党报	
《星中日报》	胡文虎	胡守愚 钟介民	1935.9.11	1941年			

第二节 从百花齐放到一枝独秀
——战后新加坡华文日报

摘要

战后初期，有10余家华文日报复刊与创刊，一时朝气蓬勃，但仍具有中国色彩。1965年建国后，华文报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报刊与报馆法令》结束家族垄断报业的时代，报馆改组为公共公司。1983年，《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1984年成立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全面管理中英各报。

Abstract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there were as many as 10 Chinese newspapers, all of which were still preoccupied with news on China. They have since undergone drastic changes after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in 1965. The 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 requires newspaper companies to go public, thus ended an era of family-controlled newspapers. In 1983, Nanyang Siang Pau and Sin Chew Jit Poh were merged into Lianhe Zaobao, followed by the setting up of th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Pte Ltd in 1984 which owns and manages all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崔贵强 张静（**Choi Kwai Keong Zhang Jing**）

战后近70年华文日报的历史，以1983年《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成《联合早报》为分水岭，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45-1983）与第二阶段（1983迄今）。

第一阶段的华文报业（1945-1983）

初期的蓬勃报业

战后初年，华文日报的复刊与创刊，可谓朝气蓬勃，百花齐放。据统计，华文日报多达12家，计分1945年9月至12月六家；1946年四家，1947年一家，1952年一家。可见1945至1946年间出版的日报，最为畅旺[1]。这12家日报是：《中国日报》、《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南洋商报》、《华侨日报》、《新民主报》、《地方日报》（以上六家在1945年复刊或创刊）、《民报》、《公报》、《中南日报》、《南侨日报》（以上四家在1946年创刊）、《中兴日报》（1947年创刊）及《益世报》（1952年创刊）。

然而，这些日报大多是短命的。超过10年的寥寥无几，能延续三、五年的，为数不多，大半是出了三几期或一年半载之后，便销声匿迹。关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销量呆滞，缺少广告支持，财政陷于困境。有的却是由于报纸政治立场左倾，言论过于激烈，被殖民地政府勒令停刊。

战后初期华文日报的涌现，大抵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这期间的中国与新马正处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在中国，国共多年来的积怨，终导致兵戎相见，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在新马，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要求自治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热衷政治人士，不计成败得失，创办报纸，以作为宣传某种政治思想的工具。这期间的华文报，有的左倾，有的反共，也有中间偏左或偏右的。

其次是英殖民地政府对言论采取较宽容的政策。自英政府卷土重来以后，豁免社团注册，允许包括马共与国民党等团体活动。除非是言论过激，影响到社会治安，否则人们有办报的自由，可以放言高论。当然随着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后，政府才加紧箝制舆论。

从政治立场与性质而言，华文日报可类别为三类，第一类是表面上标榜不偏不倚，实际上仍具有中国政治色彩，其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右或偏左，这在1940年代后期尤为明显。但随着1950年代中国与新马政治局势的嬗变，其立场也随之转移。属于这一类的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华侨日报》与《公报》。第二类是具有浓烈的中国与当地的政治意识，它们或是拥共反蒋介石，或是拥蒋介石反共，或是反殖民主义，这一类可以《新民主报》、《南侨日报》与《中兴日报》为代表。第三类则以经营报业为谋取盈利为目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民报》与《新生日报》都属于这一类。以下是分类论述各报的境况。

昙花一现的日报：《华侨日报》、《公报》与《益世报》

《华侨日报》创刊于1945年9月18日，较《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晚了约10天，同样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诞生的。因此出版初期只有一小张两小版，刊载的消息简短而量小。1946年元月1日后，报纸便扩充到四版，内容也较充实，除国际、中国与新马的新闻报道外，社论出现的频率也高，此外还有副刊“星海”与“每周电影”等。《华侨日报》的报龄延续了一年多，至1947年7月停刊。

《华侨日报》的编辑主任先由胡戍女担任。胡氏在新闻界服务多年，初任《国民日报》编辑，后转到《星洲日报》任电讯编辑。《华侨日报》创刊后，胡氏受聘为主笔。任职三个月后，不幸飞来横祸，被军车辗死，遗下孤儿寡妇，身后萧条。继任者戴始仲，戴氏曾在怡保报界服务，思想右倾。

从《华侨日报》的社论来观察，早期对中国的政治是颇中立的，后期却稍有右倾。不过，其对当地的政治、社会与各族问题倒是相当关注的。

《公报》于1946年3月1日创刊，开始时只有两版。出版两个多月后，才改为四版。《公报》印行了约一年半，于1947年11月7日停刊。编辑主任有张匡人及洪淑谦。张氏战前曾任《星洲日报》与《星中日报》编辑。战后当《公报》编辑主任两年。1948年转入《南洋商报》主编本坡版。《公报》发刊时，以“和平、民主、自由、团结”为

[1]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系年（1945-1959）〉，载《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报刊》（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5种，1982年）。

报纸之努力意向。但其内容空洞贫乏，少有社论，而所谓的“公论”，也多是转载重庆《大公报》的社评，乏善可陈。

《益世报》原是中国四大报章之一。1948年，大主教于斌嘱李国汉与刘益之等人来新加坡筹办《益世报》。刘益之还从国内运来一部号称时值25万元的巨型高度轮转印刷机。经过数年奔走，筹得20万元。于斌也从美国寄款来，并派牛若望副主教协助出版事宜。万事俱备，乃于1952年6月7日发刊。孰知出版四月后，因销路呆滞，广告短缺，经济陷入困境，不得不于同年10月12日宣告收盘，贻人以“筹备三年，出版四月”之讥。

其实，《益世报》有强大的编辑阵容。总编辑李星可、副总编辑刘问渠、社论撰写员张冰学、牛若望，编辑主任钟文苓、副刊主任刘以鬯，及采访主任赵世洵，都是来自香港的名报人与作家，名重一时。他们准备来新大展拳脚，在报界独树一帜，令人一新耳目。想不到使人大跌眼镜，惨淡收场。

《益世报》虽不叫座，但其内容却令人叫好。它平日出版两大张共八版，星期刊增刊至12版。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几乎每日都有一篇社论，星期刊有“星期专论”，社论涉及国际与新马问题，似乎论列后者的问题居多。《益世报》的社论，撇开其观点不谈，内容充实，词句凝练，行文顺畅，言之有物，出诸行家之手。它的“天下”版，由驻外各地特派员，撰述论析各地的时事，常有佳作。《益世报》的经济新闻，不限于金融与土产报道，经常有论析经济的专文出现，如〈远东经济情势报导〉（1952年6月8日）、〈对北京与日本贸易协议的透视〉（1952年6月12日）与〈仍然在挣扎中的香港工业〉（1952年6月18日）等经济专文，使读者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益世报》的副刊“别墅”与“语林”，前者刊载综合性的文字，后者是发表小说、诗歌与杂文等文体的地盘。香港名作家如李辉英、徐讦、刘以鬯、易文与曹聚仁等人的作品，常出现在“语林”副刊版。此外，《益世报》的体育版也别具特色，尤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导，甚为详尽。

党性极强的日报

•《南侨日报》

《南侨日报》的创办是形势使然。为了加强左翼政治思想的宣传及抗衡亲国民党舆论的攻击，左翼人士在短短的两个月内筹足了办报的资金。在诸大股东里，陈嘉庚是最大股东，其他主要股东有张楚琨、高云览、王源兴、陈玉水与李光前等人。1946年11月21日，《南侨日报》正式诞生。

《南侨日报》编辑部阵容强大，计有胡愈之、洪丝丝、夏衍、吴柳斯、蔡高岗等人。胡愈之无疑是灵魂人物，他有丰富的办报经验，擅写政论性的文章，早期的社论，大多出于其手笔。胡愈之于1948年4月离开新加坡后，洪丝丝接着撰写社论，主编《南侨晚报》。名作家夏衍也曾担任过短期主笔，撰写社论及短评。

1949年10月10月的《南侨日报》

《南侨日报》是中国民主同盟新马支部的喉舌报。其政治立场是反蒋反美，拥护中共，积极推动解放中国的事业，树立民主自由的中国。

《南侨日报》专注于中国事务的发展，分析评论国共内战的形势，歌颂中共的民主与自由，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专制与独裁。据统计，在其三年多的报龄中，社论共计有870篇，其中450篇（63.8%）是评述中国问题的，不过也注意当地的事务，社论中论及新马问题的有149篇（21.1%）[2]。

《南侨日报》的亲中国立场，大事渲染共产主义的伟大，与英殖民地政府有意培养与灌输效忠本地意识是背道而驰的，当然不见容于政府。1950年9月21日凌晨，当局采取行动，派出大批警探围搜《南侨日报》社，检走若干文件，扣留洪丝丝与胡伟夫等人，并下令禁止《南侨日报》的出版、销售与流通，印行了三年十个月的《南侨日报》至此宣告结束。

•《中兴日报》

《中兴日报》的前身是《中南日报》，后者于1946年10月1日创刊，由傅无闷筹办，原是一家无党无派的报纸，立场中立。但出版后不及三个月，由于财政出现危机，便转卖给国民党人，成为国民党党报。最初仍以《中南日报》的名义印行。直至1947年5月16日才正式改名《中兴日报》。

初期的编辑阵容不弱，连士升、陈振亚、陈伯萍、彭松涛、陈允洛与招宋双等名报人都曾在《中兴日报》服务过。但由于财政困境及人事的倾扎，都先后离开报社。到了后期，报社就显得人才凋零，报纸的素质也跟着降低。

《中兴日报》的宗旨是“拥护中华民国政府，反共抗俄，支持当地政府剿匪戡乱”。认为苏俄是一种“国际极权政治阴谋”，最终目的是要“赤化全球”，而共产中国是苏俄的附庸，朱德、毛泽东则是“苏俄的鹰犬”[3]。

《中兴日报》坚决拥护国民政府，宣扬三民主义，极力揭发共产主义的阴谋。因此对支持中共的中国民主同盟与陈嘉庚，抨击不遗余力。它责骂民主同盟是中共的“尾巴”与“帮凶”，斥责陈嘉庚是“叛徒”。

另一方面，《中兴日报》也誓言拥护当地政府，协助政府剿灭马共。报社的亲英立场与反马共的言论，遭致了马共的报复。报人屡屡接获马共的恐吓信。1950年3月7日，马共向报社投掷手榴弹，幸而没有引发爆炸。

《中兴日报》出版后，打不开销路，以致财政上一筹莫展。嗣后《中兴日报》的处境，变本加厉，虽然中央党部偶而在经济上予以接济，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端赖陈国础社长苦苦支撑，苟延残喘，直至1957年8月31日，由于亏蚀过巨才停刊，前后延续了十年又三个多月。

报坛常青树

•《南洋商报》

1945年9月日本投降，英殖民地政府卷土重来，新马光复后，《南洋商报》于9月8日复刊。

复刊初期，一切因陋就简，只出版一小张共两版，内容单薄，消息简短。但复刊三周后，即增至一大张共四版，除了报道新闻外，也有社论与副刊。随着时日的推移，版位愈益扩大，内容日益充实。到了1950年3月，每日出版两大张共八版，计第一、二版是电讯，刊载国际新闻及社论；第三版是中外版，登载各地派驻记者撰写的专论；第四版是经济版，包括提供胶锡、各种土产行情与金融消息；第五、六版报导新加坡新闻；第七版提供南洋新闻；第八版是副刊，有“商余”及“和平”等。每逢星期天更出版两大张半共12版，内容除上述各项外，更增设画页与副刊多版，计有“星期园地”、“妇女与家庭”、“星期文艺”及“电影与艺术”等。

战后初期，编辑部人少事多。王仲广任编辑主任，曾心影当主笔，加上邱衡近（凤人）、洪锦堂与毛以信等人，既要翻译编写，又得采访，工作繁重可想而知。随着工作的日益繁重，编辑部需增添人手，嗣后谢松山、陈振夏、连士升、曾铁忱与彭松涛等人也加入服务。他们大多是中国南来的文人，有良好学历，中英兼通，有办报经验，著述丰富，可谓阵容鼎盛。1954年王仲广辞却编辑主任职，由曾心影代行职务。1956年，《南洋商报》从香港聘请李微尘南来就编辑主任职。李微尘中英俱佳，经验丰

[2]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95年），页162。

[3] 郑古悦，〈国际矛盾造成中国之悲剧〉，载《中兴日报》，1949年2月14日。

富，任职期间，给《南洋商报》带来一番新气象。李微尘至1960年才离职，由施祖贤取代，至1960年代，前后达10年之久。1970年代，担任编辑主任的先后有连士升、仝道章、冯列山、陈振夏与钟文苓。其中以陈振夏的任期较久，长达五年，其他的任期两三年不等。为了充实内容，编辑部的组织也益趋完善，计分：电讯组、本坡组、南洋组、中外组、经济组、副刊组、美术组、通讯组、采访组与资料组等。还设了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的有曾心影、王仲广、谢松山、陈振夏、彭松涛与连士升等人。

战前的《南洋商报》基本上是以中国为本位，中国意识浓烈，关注中国的动态，评论也以中国为主要对象。战后初期国共内战期间（1945-1949），《南洋商报》依然延续了中国本位的特色，以巨大的篇幅，报导与评论国共内战的发展。《南洋商报》对内战的立场，基本上是拥蒋反共，说得平和一点，是中间偏右。尤其是在1947年前国军在战场上占上风的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南洋商报》推崇蒋介石为旷世英雄，民族救星。另一方面，《南洋商报》又痛批毛泽东，并认为内战是由中共挑起的，不赞成中共的作风，“尤其是武装叛乱，破坏交通，残杀人民，我们更坚决反对”。

可是到了内战后期，国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南洋商报》的立场开始动摇，对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颇有微词了。批评国民政府是个腐化集团，不知民间疾苦，不能改善社会生活，只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蒋介石该为军事失败负责，是该引退的时候了[4]。

另一方面，对共军的“忍苦耐战”，奇兵突出击垮强敌，《南洋商报》则赞叹与敬佩不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代以后，《南洋商报》对中国的种种国策，仍诸多关注。开始时褒多于贬，但后来许多过激的手段与政策，诸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搞到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激起坡人的义愤，言词上不免贬多于褒了。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中国与新马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中国爆发国共内战，神州大地烽烟四起，结果是共军击溃了国军，国民政府退守台湾。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立了共产政权。建国初期实施的政策，触动了海外华人的神经，尤其是1956年周恩来宣布的双重国籍政策，政府鼓励海外华人选择入籍居留国，更大大刺激了新马华人逐渐扬弃了过去的侨民意识、落叶归根的观念，而加强居留地的意识、落地生根的观念。

另一方面，英殖民地政府也改弦易辙，改变新马的政治版图及政制。首先在1946年9月，推行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计划。在该计划下，政府有意广泛授予非马来人公民权。在马来人的强烈抗议下，政府决定于1948年2月1日正式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收紧非马来人申请公民权的条件，引起了华人的反新宪制运动。1950年代，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下，华人展开了争取公民权与参政权运动，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与此同时，殖民地政府也作出若干让步，让新加坡逐渐迈上自治独立的道路。在林德宪制下，新加坡分别于1955年与1959年举行大选。1957年，林有福政府率代表团飞赴伦敦谈判新加坡自治，取得了英殖民地政府的同意。1959年新加坡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李光耀组阁，1959年6月3日成立自治政府。

在新马大变动的过程中，报人的政治嗅觉最灵敏。早在1940年代的后期，报人即提出：

[4]〈蒋介石应该引退了〉，载《南洋商报》，1949年1月14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2 月 20 日

中国北洋舰队到访

10 月 31 日

汇丰银行新址开幕

华侨已把马来亚视为永久故乡，他们是最大多数的纳税人，凡有纳税之义务，即享有公民之权利，华人应享有自由平等参政权[5]。

争取华人公民权的议论，成为《南洋商报》的呼声，占据了报纸巨大的篇幅。报人政治意识的转变，也使报纸变质，扬弃了中国本位的立场，而代之以报导与评论当地事务为主。据统计，社论论及中国问题的，1946年占69.7%，显示了报人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但从1950年代的开始，有关中国的社论篇数便不断下降，1950年仅有22.5%，1953年减至22.4%；相反地，有关新马社论的篇数，1946年只有19%，但到1959年，竟高达84.3%，显示了报人心目中，居留地的地位已经超越故国了。

新马的政治发展，瞬息万变，令人眼花缭乱。1963年9月16日新马合并，组成马来西亚。两年后，由于种族间的敏感问题，新马分家，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新马的分合，自然成为《南洋商报》议论的主轴。

自治政府成立后，为促进各种族的交流与和谐，以及提高与扩大新加坡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政府大力提倡英文教育。政府也加紧箝制舆论，通过诸如《报刊与印馆法案》，禁止报社接受外来的资助，以免报社落入外人手中，以防报导与评论新闻有偏见，破坏国家与社会利益。又规定报社不能由某个家族操纵，必须改组为公共公司，公开发售股票，改组管理层。

这一来，便引起报人的不满，提出批评与抗议，触发了所谓“五月风暴”的事件。

1971年5月2日凌晨，政府引用公安法令，逮捕扣押了《南洋商报》的李茂成（总经理）、仝道章（总编辑）、李星可（主笔）及郭隆生（公关经理）。政府发表文告指出：自1970年初以来，在他们主持下的《南洋商报》，“方针就逐渐改变，一方面炫耀着共产主义，同时又借着语文和文化问题鼓起种族和沙文主义情绪”。“它（《南洋商报》）把政府描绘成为一个压制华文教育的政府之后，甚至进而变本加厉，把政府说成是“数典忘宗的二毛子”。而这都是由“国外组织，通过内在工作人员，在当地制造破坏和麻烦事件”，因此“新加坡政府必须也将一定采取行动，来对付那些愿意为国外势力所利用而加害于新加坡的人们”[6]。

针对“五月风暴”的事件，《南洋商报》提出抗议，并要求政府立即放人。它也对政府的指责提出辩护，说“本报一路来既没有发表过专门介绍共产主义制度的文稿，形容共产主义制度毫无瑕疵，也从未支持过它的政策”，“我们坚决反对任何种族主义，为的是我们认识种族主义正是本邦多元社会的敌人”[7]。

“五月风暴”的余波荡漾。1971年6月11日在北欧芬兰首都赫尔辛基（Helsinki）召开的国际报业协会年会，议程中谴责新加坡未经审讯扣押报人的举措，议案通过要求政府释放他们，未获成功。

“五月风暴”过后，《南洋商报》继任的总编辑有冯列山、陈振夏与钟文苓。此后报纸稳健发展。1975年后，《南洋商报》注册为一家公共公司，公开售股，市场反应热烈。它的销数也蒸蒸日上，1979年，平日的销数达9万份，星期天更增至11万1000多份，盈利丰厚。自1970年1月5日起，逐步改用简体字。到了1979年9月3日，全面改采横排，版面显得更为美观，也方便读者阅读。1991年6月后，报章更进入电脑化时代。

◆《星洲日报》

新马光复后，《星洲日报》于1945年9月8日复刊。复刊初期，由于人手缺乏、纸张短缺，印刷机简陋，故与《总汇报》出版《联合版》，至翌年6月1日，才恢复分别印行。

复刊伊始，《联合版》只出一张共两版，多刊载新马光复与日德投降消息。三周后，即印行一大张共四版。到了1950年，每日印行两大张共八版。第一、二版是电讯；第三版是经济交通版，报导新加坡土产、胶锡与金融行情，以及轮船的往返；第四版是体育、教育与赛马新闻；第五版是本坡新闻；第七、八版是南洋新闻及副刊“星云”。星期刊又增设影剧、游艺场与综合版。到了1954年，每日出版三大张共12版，内容更充实，副刊更多。

战后的报业发达，社务纷繁，编辑部采取分工制度，总编辑统摄行政工作及新闻言论方针，而社论则由专人撰

[5]〈新加坡自治政府〉，载《南洋商报》（社论），1946年10月3日；〈今日的马来亚华侨〉，载《南洋商报》（社论），1948年7月8日。

[6]《南洋商报》，1971年5月3日。

[7]〈报人的天职〉，载《南洋商报》（社论），1971年5月4日。

写。早期的总编辑为胡伟夫，后跳槽到《南侨日报》。继任者为胡浪漫，胡氏为福建永定人（跟胡文虎同乡），曾先后在《星槟日报》与《总汇报》服务，擅写经济与政论文章，亦长于赋诗填词，1950年投笔从商，由江锦帆接任，但不久即离去，遗缺由黄思递补。黄氏至此连任27载，直至1977年9月才退休。继任者有黄溢华、吴锡与黎德源。

至于写社论的主笔，有廖颂扬、李星可、赵泰、仝道章、郭史翼、黄彬华与卓南生等人。廖颂扬通晓中英文，曾在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任职，1951年加入《星洲日报》当主笔，撰写社论，其社论以四平八稳见称。李星可出身北京大学，留学法国，对戏剧甚有研究，其社论以泼辣见长，言人所不敢言。

战前的《星洲日报》是以中国为本位，具有浓烈的中国政治色彩，它要发扬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在战后内战期间，它延续了中国本位的风格，表面上宣称无党无派，不偏不倚，实际上它是颂扬国民政府，斥责中共的失信。在初期国共和谈之际，始终未能达致协议，冲突依然持续不绝，《星洲日报》认为国民政府是忍辱负重，中共却言而无信，缺乏诚意，中共应负谈判失败的责任[8]。

1947年，当国军在军事上稍占上风之际，华文报都抱着乐观的态度，为国军喝彩。同年3月19日，国军胡宗南部队攻陷延安，《星洲日报》的社论评论道：政府收复延安，说明共军军事力量之脆弱，因为再继续打下去，共党的"胜利"将终归幻灭，所以应谋求政治解决[9]。

《星洲日报》贬共的立场，虽然在1949年天下大势已定的情况下略有改变，接受了既成的事实，言论上对中共保持友善的态度。但迨至中共建立政权，尤其是1950年3月24日广州的永安堂分行被封闭后，《星洲日报》又改变态度，严厉批评新政府的种种背叛人民的政策。然而到1951年后，《星洲日报》对新政府的批评，已日渐减少了。

1950年代以后，《星洲日报》已扬弃了中国本位的立场，中国政治意识转淡了，相反地较关注居留地的地位与前途。华人在今后的出路，报导与评论居留地问题逐渐成了报纸的主轴。据统计，讨论新马问题的社论，1949年只占10.2%，1957年，却高达93%。至于以中国为主题的社论却相应的递减，1949年71.4%，但到1959年却只有0.3%，不再那么重视了。这显示了报人的政治意识，已逐渐从故国转移到居留地了。

1960与1970年代，《星洲日报》一直稳健地发展，组织上也有重大的改变。1975年改组为公共公司，销路也逐年递增。1970年代初改用简体字，1979年全面改为横排。正当报纸稳健发展之际，政府与管理层却要将《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合并，成为《联合早报》，于1983年3月15日问世。

第二阶段的华文报业（1983–迄今）

两大报合并

1983年3月中旬，《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的合并，为华文报业树立了一个里程碑，震动了新加坡的华社。

对两报的合并，政府所持的理由是：由于华文教育的低迷，华文报读者有下降的趋势，这威胁到华文报的长期生存能力以及可能导致华文新闻从业员产生冗员的现象，有关方面必须对华、英文报加以重组。把《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两报的人力和财力资源集合起来，以节省成本和开销，这也可以提高新闻报业的水准[10]。

---

[8]〈和平能否重开〉，载《星洲日报》，1947年1月17日；〈和平解决将成绝响〉，载《星洲日报》，1947年2月11日。

[9]〈延安收复以后的时局〉，载《星洲日报》（社论），1947年3月24日。

[10]《星洲日报》，1982年4月21日。

南洋商報
NANYANG SIANG PAU SINGAPORE
一番大革新 • 一片新气象
南洋·星洲
联合早报
明日与广大读者见面
让我们说一声谢谢
政府已批准广播局计划
波道

最后一版的《南洋商报》刊载有关《联合早报》的出版新闻（1983年3月15日）

建国后传媒法规的沿革

当局对于报业的直接干涉可以追溯到1959年6月8日。刚刚上台的人民行动党立即开展文化整顿活动，吊销了涉嫌刊登情色新闻的八种华文及英文小报的出版许可证[11]。独立后的新加坡在1967年颁布了《不良出版物法令》（Undesirable Publications Act），取代了1938年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制订并在1955年修订过的统一法令。该法令禁止进口、发行和再版境内外出版的影响公共安全和利益的出版物，主要针对不利于新加坡的政治、道德、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发展，并对当地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出版物。这一法令同时授权政府禁止那些干涉新加坡内政的外国刊物在本土销售发行。

1972年，新加坡当局将《不良出版物法令》修改后更名为《新印刷出版法令》（Printing Presses Ordinance）。此后，该法令在1974年被修订的《报纸与印刷出版法令》（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取代。《报纸与印刷出版法令》在1977、1986、1988和1990年先后四次修改。法令的主要内容包括：发行报纸必须每年向政府申请许可证；报纸不得挑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挑动民族情绪或鼓动使用暴力解决政治问题；报纸企业必须公开挂牌出售股份，股份分为管理股和普通股；管理股只能出售给政府批准的个人。在决定报业执行人员的任免等重大问题时，管理股持有人的一票相当于普通股持有人的200票。为了防止外来势力的影响，法令还规定，报业公司的总裁只能由新加坡人担任，公司接收外国资金必须经过政府批准，记者接收外来稿费必须向报纸发行人报告等。为了防止个人控制报业公司，《报纸与印刷出版法令》规定，任何个人拥有股份的数额不得超过普通股总额的3%[12]。

该法令实质上将新加坡的报章出版管理权收归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报业公司的管理者只能是政府信赖的个人或企业，并且杜绝了外籍人士控制报社机构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对于华文报业而言，这部法令的颁布最终促成了华文报从单一种族的报纸变为新加坡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一种语言报纸，它不再为华族所独占独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法令的颁布，对于新加坡华文报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1986年，新加坡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管制，尤其针对在新加坡出版发行的境外刊物。修订后的《报纸与印刷出版法令》规定："政府有权限制那些被政府认为参与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在新加坡的销售发行，同时政府有权在图书馆陈列删剪过的被禁外国报刊或将这些报刊送到指定地点销售"[13]。1990年当局再次通过的修正案进一步规定，在新加坡每期出售300份以上的外国报刊，如果每周或更经常地报导或评述东南亚事务，必须向新加坡政府申请发行许可证[14]。这一系列修订案的颁布，使得新加坡的新闻出版业进一步排除了外界的干扰，坚持自己的传媒政策，从而有利于国内的传媒健康以及社会稳定。

立法后华文报业的改革

在法规相继出台的情况下，新加坡当局在1960和1970年代，对新闻界的自由化倾向也做了一系列的肃整。

如前所述，1971年5月，新加坡内部安全委员会以"倾向共产党"、"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了《南洋商报》的四名高级职员。其原因是该家报纸针对政府推广英文的举措有过激的言论，被政府认定为借由语文和文化问

[11] 林任君，《我们的七十年》(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1993年)，页29。
[12]《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页404-405。
[13] 赫晓鸣：〈从强制到疏导：新加坡政府对新闻业的管理〉，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期2，页85。
[14] 同上。

题，煽动种族沙文主义。

这一事件立即引起《南洋商报》抗议，并很快引起国际报业人士的批评，但是当局依然坚持他们的判定。当时李光耀这样评说："任何人要借着假造的理由，虚构华族语文和文化将面对被消灭的危险，以期鼓起种族情绪，都要受到严厉的处分。为此，政府对《南洋商报》四名高级职员及编辑采取了行动"[15]。李光耀的这段话清晰地阐明了这一时期新加坡当局对于新闻传媒的管理的核心思想，即要维持各种族之间的平衡，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李光耀在对于新加坡的传媒体系设计中有鲜明的新加坡特色。他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尽管个人主义有利于促进个人的奋斗精神，但一味强调个人自由，忽略集体的力量，轻视政府法令，是会对国家造成危害的。西方所推崇的绝对新闻自由不适合新加坡。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国家，要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困难重重，因此必须强调在媒体中的国家观念[16]。

除了维护本国内的种族平衡，对于涉嫌有外国敌对势力影响国内传媒的情况，新加坡政府表现同样强硬。如1971年，当局谴责《东方日报》（Eastern Sun）接受共产党若干低息贷款，责令该报的七名外籍高级雇员辞职，报纸被迫停刊。同年，当局指责《新加坡先驱报》（Singapore Herald）记者收受"不友善的外国资金"而撤销该报的印刷许可证。当局对传媒的整肃也包括杂志等出版刊物，例如1977年初，逮捕了《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的一名记者，指控他非法公布机密情报，同时，该杂志的另一名记者也遭逮捕。这名记者随后在电视上公开承认在报导中有意将当局抹黑为不民主的专制政府[17]。1976及1977年间，几十名经常著文批评政府的新闻工作者以参与"共党阴谋"等罪名被捕[18]。

经过1960至1970年代的肃整后，新加坡政府已基本上消除了历史因素所带来的过度新闻自由，从而使独立之后的新加坡尽快建立一个服从于国家利益的传媒体系成为可能。并且这个传媒体系将为这个多元民族聚居的国家逐步创立国家意识，促进民族团结，乃至发展经济。

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华文报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规范和整改后，新加坡政府进一步确定了对报业，尤其是对华文报业的管理思路。新加坡新闻媒体管理思路和模式可以用时任总理吴作栋于1995年7月15日在庆祝《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创刊150周年会上发表的题为《新加坡报章：好政府和好社会良性循环的一部分》的演讲内容来总结。吴作栋指出"新加坡的报章不能因为其他国家的新闻机构采取了对抗性的角色而这样做。这不等于说我们要新加坡报章成为政府的喉舌"。"你们（传媒）对新加坡人的最佳服务就是准确地报道，清楚地分析，以及从新加坡人的角度，为新加坡人明智地诠释事件与事态的发展；澄清问题，清楚地说明各项选择"。因此，"报章的任务是促进共识，而不是挑起对抗；是促进建国，而不是损害社会组织"[19]。这段话精确地阐明了新加坡政府对于新闻事业的态度和立场。

相关人物

林和坂　林推迁

历史事件

林和坂、林推迁等创设"怡和轩俱乐部"，1925年迁至武吉巴梳路现址，会员主要为各帮名流

[15] 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现代出版社，1994年），页525。

[16]〈从强制到疏导：新加坡政府对新闻业的管理〉，页85-86。

[17] Kuo Chen-Yu & Peter S. J. Chen, *Communication Policy and Planning in Singapore*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3), p. 47-48.

[18] Kuo Chen-Yu & Peter S. J. Chen, *op.cit.*, p. 295.

[19] 林任君，〈95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载《新加坡对西方媒体的反击与新加坡的媒体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中国华中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合出版，2005年），页5。

1980年代，伴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国家的发展要在利用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技知识的同时，也要杜绝西方社会和政治的弊病。就传媒的管理而言，这时的新加坡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民族结构，要求它的新闻媒体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从而成为政府在发展国民经济、促进民族团结的助力。因此，新加坡政府开创出一种以传媒与政府合作互利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的推行，对于新加坡华文报业来讲，是一次历史性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华文报业经历了空前的巨大变革。1982年4月20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公告宣布两家华文报纸《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并且在这一年的5月27日组成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Singapore News and Publications Ltd），负责新加坡华文报纸的出版和运营，其中包括了《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以及海峡时报有限公司负责出版发行英文报纸《海峡时报》及《新明日报》等报纸。1984年7月11日，新加坡三大报业集团：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海峡时报有限公司和海峡时报出版公司宣布合并，组织成立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1988年9月当局再次修改《报章与出版法令》，修改后的法令实际上将报业的管理权交给政府所信任并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投资者，从而使得新加坡各种语言报章全面纳入报业控股。报业控股的创立一方面有利于官方对于各种语言的报纸的统一协同管理，同时促成新加坡的各语言报纸从“种族”报刊转变为国家民族语文出版物，是新加坡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此同时，也开启了政府与传媒共赢互利的局面。

报业控股有限公司自诞生至今，始终是新加坡最大的出版机构，旗下有《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三份华文报纸，另有《我报》、《逗号》（星期五周刊），以及《大拇指》等有定向读者的日报或周报。

1983年3月，《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这两份新加坡最具影响力的华文报纸走入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早报》（以下简称《早报》），以及相继创立的《联合晚报》、《新明日报》。《早报》是新加坡华文报业巨变之后，最为重要的华文报纸。创立之初，《早报》即针对早前两大报纸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巨资购买大量的柯式印刷机，进行版面调整，增加了本地新闻的版面，同时关注民生，设立读者交流版块，进行良好的互动。与此同时，报社也向世界各地派驻记者，收集国际新闻，设立言论版，邀请知名时事评论家撰写文章。它的机构较之前私人报业时代更趋完善合理，办报理念更具时代性。

1983年3月16日，《早报》在创刊号“我们的话”中开宗明义地表明报纸的任务，“将各地新闻忠实报导，不夸张，不渲染，不武断，不歪曲，我们将设法使用浅白易懂的文字和生动有效的照片与图解，方便读者了解和领会所发生的一切重大新闻的演变、意义和影响”。同时该文也立场鲜明地表态该报的职责和立场，“我们有责任协助向读者传达与阐析我们的民选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我们同样有责任反映读者对当局施政的意见与批评。作为一份独立和民营的报纸……我们绝对不徇私，不偏袒任何人和集团，我们鼓励公正的公众舆论与批评，但绝不为任何个人或团体利用，因而损及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20]。”可见《早报》自创立之初已脱离了私人报业和华族报业的传统思维，将读者群体定位为新加坡全体国民，以维护国家利益，促进执政党与民众的沟通为己任。

自创立之初，《早报》就展现出对于本土新闻的关注，仅新加坡新闻就占据了10余版的版面。由于新马两地的渊源，马来西亚新闻也是该报关注的焦点，占据了一个版面，国际新闻占两个版面。此外，报道港台和亚细安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动态的新闻也占据了两个版面。除了新闻外，还有言论版，除社论外，还有反映民意的短评和读者来论，从而使得报纸起到了上情下达的沟通作用。《早报》亦设有种类繁多的副刊，内容涉及大众文艺，例如流行小说、电视、电影、漫画等。除了文艺类副刊以外，还涉及民生、教育、妇女、艺术等等[21]。

由此可见，《早报》的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又兼具趣味性和知识性，因此，很快被新加坡民众所接受。从1983年创刊至今，《早报》在30多年的岁月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读者的需求不断改良，

[20] 崔贵强，《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新加坡：华裔馆、南洋学会，2002年），页18-19。

[21]《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页10-39。

迄今已发展成为新加坡最具代表性和国际知名度的一份华文报纸。

《早报》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代历史悠久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成为蜚声国际的知名报纸，与它拥有雄厚的经济支撑，完善的机构设置，合理的办报理念和优秀的采编团队息息相关。其中，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早报》的自身定位。它始终秉承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办报精神，在采编本土新闻，处理国内摩擦的时候做到不偏不倚；在面对国际争端的时候，它义正辞严，维护国家的主权。

例如，新加坡独立后，新马两国关系十分敏感，摩擦时有发生。在两国诸多的争执中，新加坡通往马来西亚的火车站主权行使权的争议在媒体表现的尤其激烈。由于在英国殖民地时期，规定马来亚铁道公司拥有丹戎巴葛火车站及铁道两旁的土地拥有权，新加坡独立之后，马来西亚将关卡、移民厅及边防检疫站等都设在火车站内，从而形成了国境关卡设在新加坡腹地的奇特现象。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1992年，新加坡政府决心对这种现象进行调整，因此新加坡内政部通知马来西亚当局，计划将关卡等搬迁到兀兰检查站大厦。然而，这个提案没有得到大马当局的配合。相反，马哈迪首相甚至在新马边境的新山发表公开演讲，质疑新加坡此举动的目的，反对搬迁关卡，从而在两地的报业掀起一场论战。就此，《早报》也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专文，驳斥大马的责难。

此外，《早报》在反映民情民生方面，也切实做到了下情上达，它专设“交流站”版，刊载民众来信，据实反映大众生活中存在的诸如教育、交通、服务质量等问题。

从1993年开始《早报》被允许在中国公开发行，并且是当前唯一获得此项许可的海外华文报纸。

1983年3月16日，与《联合早报》同时创刊的还有《联合晚报》（以下简称《晚报》）。与《早报》偏重政论的严肃基调相比，《晚报》则定位于成为一份娱乐性和趣味性的报纸。《晚报》在创刊号中这样写道：“传播现代知识，发扬传统文化，是《晚报》所负的重大使命！我们《晚报》同人，决心把这一份真正属于大家的晚报办好！我们用轻松活泼的文字处理精彩的副刊，工余一读，解闷尽忘忧，我们用浅白生动的文字报道国内外新闻，翔实快捷，翻阅晚报，立知天下事！报纸必须与民众声息相通。基于这个信念，我们竭力反映民情”[22]。

因此，《晚报》在内容方面十分重视趣味性，除了报道国内外新闻之外，另有一版“趣闻”，网罗世界各地奇风异俗，千奇百怪的异象，以供读者消遣。此外，《晚报》有半版“广场”，内容以专栏、言论、投诉及专访为

南洋·星洲
联合早报
LIAN HE ZAO BAO
我们的话
双喜双庆
本报及晚报今日创刊文化部长主持典礼
丹那巴南献词
〈快报〉新面貌
派报公会启事
本报启事
房屋贷款 90%
湘園

《南洋·星洲联合早报》首版（1983年3月16日）

[22]《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页40。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月1日

苏丹浅滩灯塔启用

7月1日

马来联邦（四州府）成立

主，议论的多为时下流行的话题，涌现出不少笔锋犀利的本土专栏作者，很受读者欢迎。《晚报》的另一大特色是“大特写”。大特写的内容丰富多样，包括历史文物，民俗民生，旅游地理，奇人奇事等，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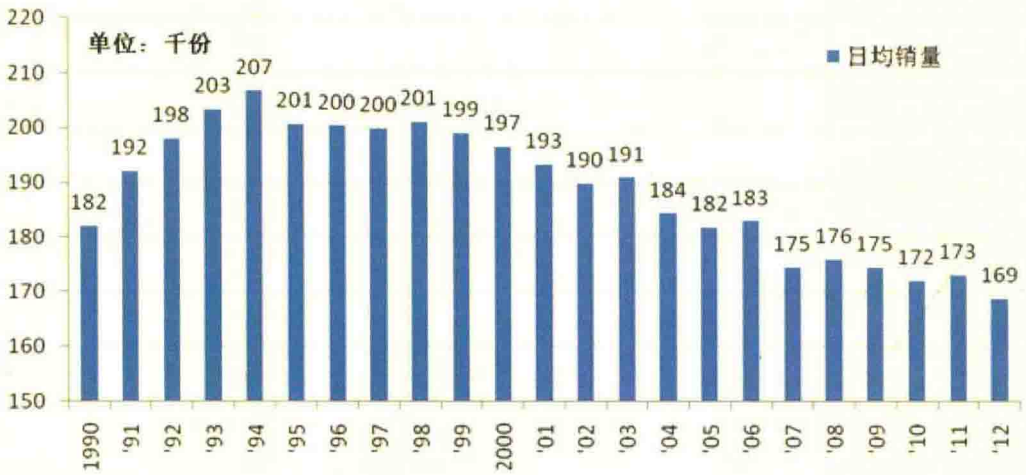
应该说，《晚报》在创立初期是一份健康益智的报纸，它一方面给广大读者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一方面向大众传播浅显易懂的知识。然而，1990年代之后，为了打开销路，《晚报》转变了风格。《晚报》愈发重视电影、电视和副刊小说，在报道明星花边新闻和社会各色新闻时，经常借助追踪内幕，捕风捉影，利用明星绯闻或黑帮新闻来吸引读者。

报业控股旗下的另一份华文报纸是《新明日报》。《新明日报》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与新加坡斧标驱风油大亨梁润之在1964年联合投资创立。海峡时报集团在1982年及1983年先后重资购买了该报45%及14%的股份，使《新明日报》成为海峡时报有限公司的子公司。1987年，海峡时报集团进一步购买剩余的40%左右股份，最终成为时报集团独资拥有的公司。1990年3月19日，新加坡报业控股进行结构改组，将旗下的《联合早报》、《联合晚报》以及《新明日报》都纳入华文报集团管理[23]。报业控股接管《新明日报》后，申明该报将拥有独立的言论立场，“不鼓吹任何思想体系或理论，也不做任何集团的传声筒”，而“以国家利益以及新加坡各民族和谐共处为最高原则”。

创立之初，金庸就将《新明日报》定位于有别于《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娱乐性报业。通过增加该报的娱乐和社会新闻，加上连载自己创作的武侠小说来吸引读者。这种风格延续到1980年代中期，《新明日报》依然拥有“新加坡新闻”、“国际新闻”两个版块，转载香港《明报》、《中报》及《快报》等报的社评，并刊登大量的电视剧情以及流行武侠小说，当然也涉及娱乐消息、财经、体育、赛马等讯息。到了1988年，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新明日报》又增设“言论”版，副刊“咖啡座”、“万花筒”、“新特写”、“专题报道”、“消闲坊”以及“摩登坊”等等，这些新增内容讯息包罗万象，报纸再加以些许点评，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报纸的趣味性和博览性[24]。

2002年初，《新明日报》每日出版在20至24版之间，报道本国新闻、综合新闻及国际新闻。此外，该报还设有娱乐、体坛、“美的天地”、“饮食市场”、“周末特区”、“遨游四海”及“保健生活”等版面，以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新明日报》还有一个特色专栏为“非常话题”，其所刊载的内容与本地民生息息相关，如“消费社会的隐忧”，

图表：1990–2012年度《联合早报》日均销售量（统计到千份）



资料来源：彭伟步，《新马华文报：文化、族群和国家认同比较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23]《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页45–46。

[24]同上注，页46。

“传统宗乡会馆须向新移民招手”等。这个专栏同时也刊载读者的观点，向大众及政府反映民间所面临的若干问题，其中一些论题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获得当局的反馈，因此它也成为官方和民间互动交流的平台[25]。

国家认同与文化传承

独立后的新加坡所面临的是一个孤立无援，大国环绕的局面，在经济和政治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而文化方面，在摆脱了殖民地统治，脱离了马来西亚之后，则面临更加严峻局面。独立后，新加坡当局对于报业出版，尤其是华文报业出版的一系列改革总体来说是成功的。近50年间，华文报业的转变对于新加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命运”的文化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鉴于严峻的建国形势和复杂的种族关系，独立后人民行动党实行了民族多元化，各民族平等的政策。华族虽然始终占新加坡人口的大多数，但当局没对主体族群有任何偏袒政策。开国元勋拉惹勒南（S. Rajaratnam）曾说：“政府要消除新加坡华族所强调的中华特质，以避免他族与邻国视新加坡为中国海外势力的延伸，才能使新加坡生存下来”[26]。此外，从马来西亚脱离后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强调国家认同。自1965年以来，华文报业的变革则是建国后，新加坡族群认同淡化，国家认同锐化的缩影。

自报业控股成立后，在三大华文报纸上灌输国家思想，自此，新加坡的华文报成功从华族报纸转型为国民报纸。除了中英文报业之外，杂志、书籍等出版物，连同相继成立的其他传媒机构一起，对于培养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构建新加坡文化，不遗余力的进行了数十年的努力，成果斐然。1999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张汉音博士进行了一项调查，“假设华人对国家最有感情的指数为10，而最没有的则为0。调查的结果显示，新加坡人对国家感情的平均指数超过9，相当于80%的华人均认同国家。”[27]

新加坡华文报纸的另外一个重要功用则在于它对华族文化的传承。建国后，英文的推广为新加坡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却也造成新加坡的年轻一代与传统东方文化之间的隔阂，从而丧失了文化之根。有学者指出，新一代人由于只接受英文教育，不习华语，而丧失了接受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熏陶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大量接受西方思想，包括西方社会所诟病的个人主义和功利思想，对西方盲目崇拜。新加坡的领导者很快认识了这种传统文化流逝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开始重新审视政府的文化策略。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在1992年9月华文报“三庆”开幕式上说：“推广和保留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报章和书籍的主要任务。如果华文报能保持一定数量的读者，我们将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化的联系，把传统的价值观保留下来，充满干劲和活力的华文报，能帮助我们保留与推广华文和传统价值观”。他希望通过华文报纸的大力弘扬，“保存新加坡各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并维护代表新加坡精神的某些共同价值观，这样才不会迷失我们的方向”[28]。

1979年，当局发起讲华语运动，三大报纸肩负起推广华语使命，全力以赴向新加坡民众介绍华族文化，并与政府机构以及民间华族社

[25] 彭伟步：《海外华文传媒概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59–160。

[26] Vasil, Raj. *Asianising Singapore: The PAP's Management of Ethnicity*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95).

[27]〈新加坡人的族群认同感〉，载《联合早报》，1999年12月12日。

[28] 转引自彭伟步，《新马华文报：文化、族群和国家认同比较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06。

团合办弘扬华语和华族文化的各项活动。例如，《联合早报》自1998年起，每年都偕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重要机构发起“新加坡大专文学奖”，以此在本土青年中推广华文的应用。这项比赛受到本土青年的重视和喜爱，每年都有大量优秀作品涌现，切实在中学以及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掀起了华文写作的风气。1991年6月，当局举办了长达一个月的“华族文化节”，由《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三家华文报联合主办，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了世界华文书展，国际华文文艺营、书画展、龙舟赛、语文讲座等38个项目。这一声势浩大的活动在新加坡本土引起了很大反响。

总之，华文报纸对于推广华语，维系华族文化传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华文报面临的困境

2000年12月初发表的《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报告显示，5岁至14岁的华族孩童在家里使用英语的比例，从10年前的23.3%提高到2000年的35.8%，激增了12.5%。根据官方人口普查数字，在家中讲英语的小一学生人数在1980年仅为9.3%，而1999年升到42.4%，增幅十分惊人[29]。

语言习惯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华文报读者数量的大幅下降。从1960年代开始新加坡的绝大多数中小学都采用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而在重视英文语言能力的社会大环境下，大多数的家长也基于孩子未来就业竞争优劣的考虑，把孩子送入英文学校就读，而少数华文学校则日渐面临着生源减少的窘境。最终，就连本土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也被迫于1980年8月与使用英文教学的新加坡大学合并。

1980年代以后，英文教育已经在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新加坡当局意识到，华文能力丧失以及华族文化消失会对以华族为主体的新加坡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1979年发起了多讲华语少讲方言的运动，试图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各界推广华语。然而，对于新加坡的青年一代而言，语言学习的重要途径——学校教育，依然坚持使用英文，而华文成为华族学生的母语必修科目。在校的华文学习以听说为主，而不重视阅读及写作能力。对于当代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崔贵强这样评述：“新加坡学生的华文水平普遍低下”。由于学生们只是在小学、初中念过华文，华文是单科，上课的时数也少，而且历史、地理、数理等都以英文教学；即使在初级学院，华文也非必修；到了大学，除非念中文系的，根本不必接触中文。崔贵强还表示，新加坡的大学生除非就读中文专业，大多数人的中文水平连写一张字条都错字连篇，更遑论阅读中文报刊了[30]。

华语水平的大幅下降，使得年轻读者放弃华文报，而选择阅读英文报章。据统计，1989年《联合早报》小于30岁的读者是35%，1999年则只有20%[31]。年轻人或许愿意收看第8频道（华语频道），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不愿意费力阅读《联合早报》。1999年，有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受英语教育年龄在25岁以下的华族年轻人，有11%至17%阅读华文报，而有80%的学生没有阅读华文报”[32]。在新加坡所发行的网络报纸中，《联合早报》网虽然是统计浏览量最大的报纸网站，但2006年1至10月的统计显示：“（《早报网》的浏览总量中）87%来自中国，新加坡本土的读者仅占5.74%”[33]。

在日渐失去年轻读者群的同时，新加坡华文报的社会影响力也在日趋弱化，例如读者阶层的变化。新加坡的精英阶层，其中除了医生、律师、大学教授、科学家、高级工程师以外，也包括了大量的政府公务员和国会议员，他们是支撑国家发展的社会中坚。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接受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调查显示，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阅读华文，有的因为长年在海外接受教育，甚至不能说华语。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仅阅读英文报章而忽略华文报[34]。尤其作为政府公务

[29]《联合早报》，2000年3月17日。

[30]《联合早报》，2003年4月19日。

[31]《联合早报》，2003年4月19日。

[32]《新马华文报：文化、族群和国家认同比较研究》，页78。

[33]《联合早报网年度报告（2006年）》（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2006年11月）。

[34]《新马华文报：文化、族群和国家认同比较研究》，页81。

联合早报网（2015年6月24日）

员，如果没能阅读华文报而无法了解受华文教育的相当数量民众的心声，又如何制定出能够被全社会所接纳的政策？对此，李光耀也指出他发现多数部长只阅读英文报纸，而不读《联合早报》。因此，他告诉议员："如果一名受英文教育的（华族）议员想担任部长，他必须阅读华文报纸。否则他将无法知道老百姓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那将会有很大的麻烦"[35]。

1995年，《早报》推出电子版——《联合早报网》，从而开始借助网络科技来扩大其影响力。另一方面，报纸信息网络化也能够帮助《早报》克服本土华文读者日渐减少的趋势，将其市场扩大到全球华文读者群体。据《早报网》在2004年的网上调查显示，在2004年9月11日至24日间，《早报网》的日平均页浏览量达到800-1000万次。根据这一数据，估计每天的平均读者人数超过400万人，而来自海外的读者人次预计每日超过百万名。这次网调还显示，《早报网》的读者遍布全球，其中中国的读者（包括台湾和香港）占了读者总数的75%，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及东南亚的读者分别占读者总数的12%、8%和5%。《早报网》的读者绝大多数拥有较高学历，其中大学本科学历占70%、硕士研究生占15%。此外，就读者专业背景而言，其中86%为工作人士，其中专业人士占33%、管理层占23%、执行层占6%、商人占4%、蓝领占4%[36]。由此可见，《早报》通过网络平台，已经成功成为海内外华人了解新加坡的重要媒介，并且也赢得了知识分子阶层读者的认可，这对于新加坡国际形象的塑造无疑是有利的。

然而，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全球化，在给予新加坡华文报业新的生机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严峻的挑战。声讯科技和互联网络使得报业不得不面对来自全球新闻媒介的竞争。2000年前后，当局也曾试图让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和新传媒集团分别在报纸和电视两个传媒领域进行政府主导下的竞争，可是，由于本土市场过于狭小，开放竞争后的两大集团不仅没有获得当局期待中的发展，反而因为内耗而出现了巨额亏损。两大集团最终决定整合业务，分别发展原先的核心企业，使两大集团再次分别垄断报业和电视传媒，这种情形延续至今。

[35] 吴元华，《华语在新加坡的现状和前景》（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04年），页36-37。

[36] 据早报网2004年9月11日到24日的读者调查数据得出。

相关人物

林文庆　宋旺相

历史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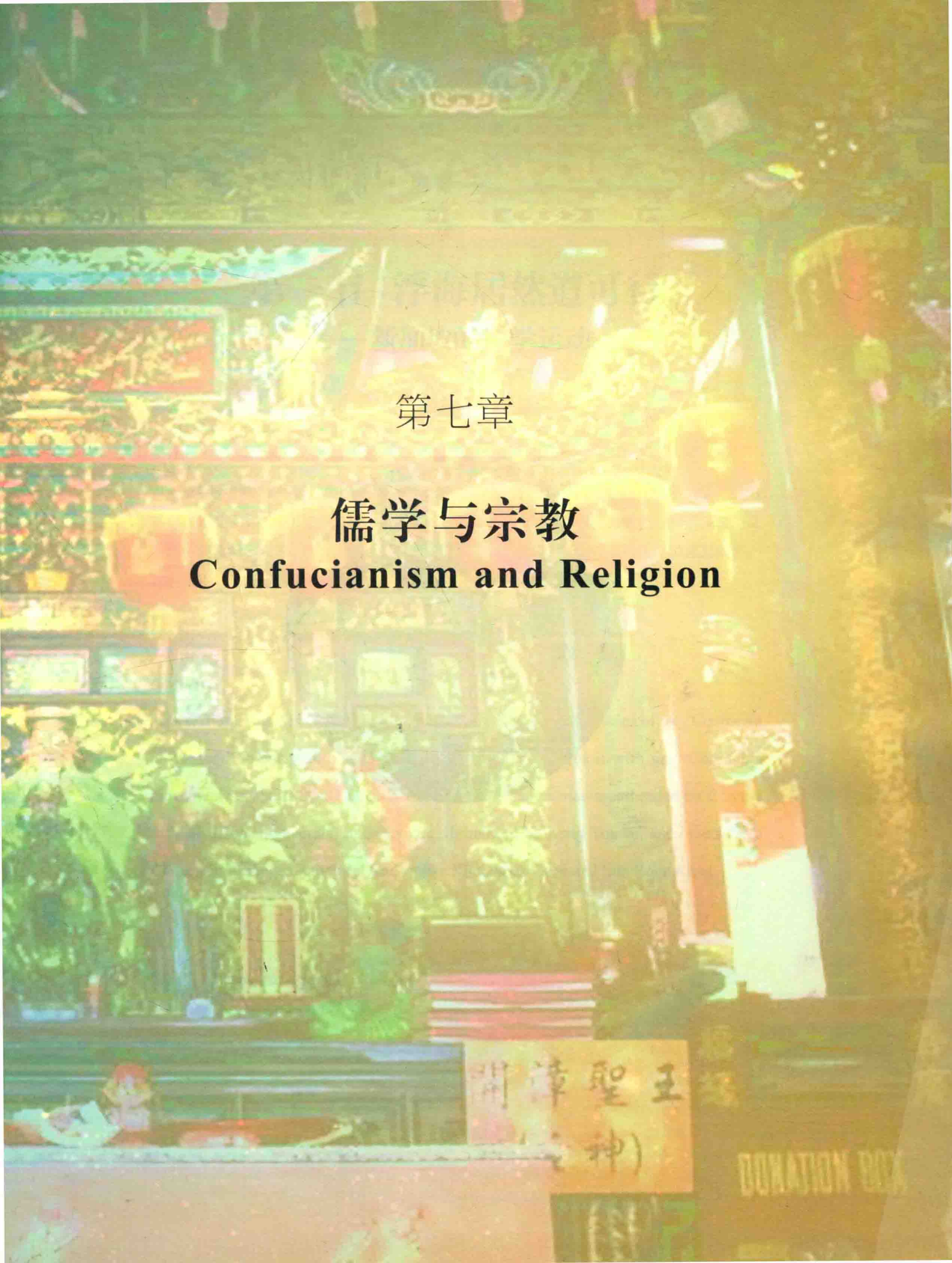
3月1日

林文庆与宋旺相所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出版

附表
战后新加坡华文日报一览表（1945–2014）

报纸名称	社长/经理/创办人	总编辑/主笔	创业/复刊日期	收盘日期	销数	立场	备注
中国日报	邵仁枚 邵逸夫	张匡人 蔡文玄	1945.8月下旬	?			只出版7天或10天
南洋商报	李玉荣	王仲广 曾心影	1945.9.8复刊	1983.3.15	44,000 (1946)		与《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
星洲日报/总汇报	胡蛟	胡浪漫 黄思	1945.9.8复刊	1983.3.15	35,000 (1946)		与《南洋商报》合并为《联合早报》
华侨日报	何鸣吾	胡戍女 戴始仲	1945.9.18	1947.7	9,000 (1946)		
新民主报	柯朝阳	陈如旧	1945.9.22	1946	11,000 (1945)	左倾，可能是马共喉舌报	
地方日报			1945				
民报			1946	1946			出版数个月后关门
公报	胡昌耀	张匡人 洪淑谦	1946.3.1	1947.11.7	10,000 (1946)	略亲国民党	
中南日报	傅无闷	傅无闷	1946.10.1	1947.5.2		前期中立，后期右倾国民党	出版不及3个月，为国民党人接收，成《中兴日报》前身
南侨日报	陈嘉庚	胡愈之 洪丝丝	1946.11.21	1950.9.21	20,000 (1946)	左倾中共，中国民主同盟喉舌报	
星洲晚报			1947.4.11	1947.7.31			
南侨晚报	胡愈之	林芳声	1947				《南侨日报》姐妹报
中兴日报	陈国础	陈振亚 陈建基	1947.5.16	1957.8.31		右倾，国民党党报	
南方晚报		曾铁忱	1950.10.16	1963.5.3		中立	
益世报	刘益之	李星可	1952.6.7	1952.10.12		右倾，反共	
新时代报			1955.2	1955			出了几个月，改为小报，旋亦停刊
星马日报		王仲广	1957.11.23	?			报龄短
新生日报	梁润之		1961	1966			初创设于新山，1962年迁至新加坡
南洋晚报			1963.6.1	1963.12.25			前身为《南方晚报》

报纸名称	社长/经理/创办人	总编辑/主笔	创业/复刊日期	收盘日期	销数	立场	备注
新明日报	梁润之 金庸	钟文苓 吴元华 成汉通 杜南发	1967.3.18	迄今继续出版			
快报			1980.9.1	1984			自1983年3月16日起改为每周出三次
联合早报		黎德源 林任君	1983.3.16	迄今继续出版			
联合晚报		陈正 李慧玲	1983.3.16	迄今继续出版			



第七章

儒学与宗教
Confucianism and Religion

第一节　浮海居然道可行
——新加坡的儒学运动

摘要

本节从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儒学运动谈起，追溯到上一世纪末另一次的儒学运动。当时倡导者邱菽园和林文庆在1897至1907年间，召集同志集会结社、捐资献地、同游演说，又透过中英报章、杂志，积极地宣扬儒学，影响及于邻近各埠，使崇儒尊孔之风遍及南洲。其思想和活动皆与后来的儒学运动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Abstract

This section examines th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fucian movement" in early 20th century Singapore,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Confucian movement" in the 1980s. The early Confucian movement was spearheaded by Chinese officials (Consul-generals) in Singapore, influenced by Kang Youwei and others from China, and actively led by local leaders like Khoo Seok Guan and Lim Boon Keng.

梁元生（**Leong Yuen Sang**）

1982年春，以教育部道德教育课程变制为起点，一个波澜壮阔、举世瞩目的“儒学运动”在新加坡展开了！

若单从教学的角度去看，儒学不过是中三、中四学生所能修习的宗教及道德课程中的一种，自不应占着这样显著而重要的位置。但由于社会各方面的热烈响应，以及政府在教学之外也鼓励其他与儒学相关的文化及社会活动，而且从国外请来不少声名显赫的“儒家学者”，所以造成了声势，掀起了热潮，也吸引了国际的注意！

归纳来说，从1982年到世纪末的“儒学运动”有下列令人注目的四点特色：

- 编写课程：教育部成立了儒家伦理课程编写小组，以符合本地学生程度的语言，实际而生动的例证、新颖而有效的教具和方法，把古旧的学说翻新，以切时情，以救时弊。这是传统的延续，但其中也有大胆的创新。
- 研究机构：新加坡之推行儒学，除了表现在教学上的普及化及现代化的一面外，还有学术探讨、深入研究的一面。1983年成立的东亚哲学研究所，几年来就积极地进行研究及推广儒学的工作。成立图书馆，广购有关儒学的书籍；又邀请国外知名学者，到本地作演讲和研究。此外民间还有儒学研究会等团体，也在普及儒学与研究儒学两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海外学人：1982年夏秋之际，政府邀请了八位外国的“儒家学者”访问新加坡，为编写教材提供意见，也和本地各阶层人士讨论儒学[1]。8月儒会星洲，可说是当时的一件盛事！其后余英时、杜维明两位教授，应东南亚哲学研究所及儒家课程编写小组之聘，多次莅临新加坡讲学。此外，多位东西名儒都曾陆续驾临，或作研究、或作演讲，尤是弦歌吟诵之声，不绝于耳。
- 中英双轨：新加坡教育部儒学教材的编写，以及社会上举办有关儒学的活动，有着分途并进、中英双轨的特色。不但用华语华文去宣扬儒学，也用英语英文去讨论儒学；其对象主要是本地的华人，但也希望儒家伦理可以变成整个新加坡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所邀请的外国儒学专家，包括洋人；所举办的演讲与讨论，兼用英语。

由于上述特色，致使许多人说：新加坡近年所推行的儒学运动，诚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也是儒学发展史上的新页。

然而，翻开历史，追踪前人，我们却可以见到：先辈们走过一条颇为相同的道路！

百年前19世纪末期的新华社会，也掀起过一阵“儒学热”，展开过一个波澜壮阔、令人侧目的“儒学运动”。在这个运动之前，无论在推广、普及、研究各方面，也和现在的儒学运动有颇多相似之处，有着许多可供比较和参考的价值。虽然，相信大多数现阶段儒学运动的倡导者，都对这段早期的儒学热潮未加注意，但正因如此，其雷同之处才使人惊异。难道这就是所谓文化的因子、历史的遗传？

让笔者从上述四项特色——改编课本、教研机构、海外学者、中英并用——去考察新加坡历史中的“儒学运动”，以供现在进行中的“儒学运动”参考和借鉴。

19世纪末儒学运动的背景

新加坡历史上的一次儒学运动，发轫于19世纪末年，持续推行约有10余年之久。运动之展开，可以1897年为起点，至1909及1910年左右，才逐渐“淡出”。但这个运动的酝酿，则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左秉隆领事的大力兴学及1890年代初期黄遵宪总领事的鼓吹文教。经过这两位清朝领事的大事经营，19世纪90年代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产生回归和仰慕之心。文风的丕振、学校的增多、儒生的南来，都为1897—1910年的“儒学运动”（或作“孔教运动”或“儒教复兴运动”[2]）铺好了道路。当然，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兴，以尊孔崇儒为号召，风靡一时，影响所及，遍及于海内外。保种保教的思想，建孔庙、设学堂的呼吁，在华人社会中相当流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新加坡的孔教运动或儒学运动，也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当时新加坡著名的诗人邱菽园和社会领袖林文庆，就是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在1897至1907年间，他们召集同志、集会结社、捐资献地、同游演说，又透过中英报章、杂志，积极地宣扬儒学，影响及于邻近各埠，使崇儒尊孔

[1] 在1982年受邀请来新加坡访问的八位“儒家学者”中，其中七位来自美国，他们是熊玠、唐德刚、吴元黎、许倬云、陈荣爱、余英时和杜维明。另外一位来自台湾的学者是师范大学的伍振鹭。余、杜两位后来受聘为教育部儒家伦理编写小组的海外顾问。

[2] 19世纪末新加坡的“儒学运动”，一般称作“儒教复兴运动”，英文名为“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这里用“儒学运动”为题，解释见末段结束语。有关此一运动之著述不多，值得参考的只有Yen Ching-hwang,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99-1911,"（颜清湟：〈新马的儒教復兴运动(1899-1911)〉）*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arch, 1976), pp.33-57。

之风，遍及南洋。下文就前述四点去论析此时的儒学运动。

课程与读本的改编

儒学思想记载在五经典藏之中，宋代朱熹把《四书》整理出来，详加解释，是儒学读本编订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而后，中国的书院学塾，皆以《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课本，《四书》熟读之后，再读《朱子集注》及其他的注释和经典。至于幼学童蒙，则诵读以儒家精神为基础而编成的《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幼学琼林》之类的启蒙书籍。几百年来，相沿成习，而这套儒家课本也被奉为宝典，作为读书人入仕的阶梯。

19世纪初期到中叶的新加坡，已有私塾和义学之设。最早之纪录有德籍传教士汤臣（Rev. G. H. Thomson）之笔记。据他所见，1829年的新加坡，有粤人所办学塾二所，一位于甘榜格南（Kampong Glam），有学生12人；一位于北京街（Pekin Street），有学生8人；另外北京街还有闽人办的学塾一所，有学生22人[3]。在这些学校中，华人子弟所读的课本与传统中国的书塾无异。课本的文字古奥，而学生亦不求甚解，纯用记诵方式。及至后来崇文阁及萃英书院的成立，华文学校也稍具规模，但在课程和读本方面，却没有任何改变。至1880年代左秉隆的倡导之下展开了兴学运动，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屋等才纷纷设立，但教材和课本仍沿前代。

在19世纪末年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并没有丢弃以前的儒家课本，即《三字经》、《千字文》、《四书》及《集注》、《孝经》等。但部分儒家学者却迫切地了解到课程变革的需要。时代变了，一个讲格致（科学）文明的时代已经来临！环境变了，是一个属于英国人统治下的华人社会而非传统的中国！语文也变了，许多土生的新加坡华人不晓中文，甚至华侨子弟的中国语文水平也不高！为了挽救时弊，邱菽园等一方面乃刻意推崇儒学，讲究传统诗文。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适应时势、顺应环境，把旧教材和旧课本重新编订，用较为浅白的语言和熟悉的事例，去介绍儒家历久不变的真理。在这方面，邱菽园和张克诚用力最多，也最有成绩。

邱菽园（1874—1941）是早期儒家运动的大将，他所着眼的是启蒙课本（即初级小学）的改编。他是儒家的信徒，绝不怀疑《四书》的精义[4]，但他察觉到旧书塾里的《千字文》、《三字经》等童蒙读本，在内容和字汇上都不能够切合本地的需要，所以毅然进行重新编写的工作。

1899年，为配合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成立的需要，他写了《谈字文》一套两册，作为女学的读本。书成后在《天南新报》中也刊登了广告："传统邱菽园先生著幼学入门书第一种。此书上、中、下，编订两本，最便南洋华人子弟幼学之用，家塾课诵，得此善本，不患不认字识解矣！…… 每套两本，取实价银二角正"[5]。后来于1920年又编成《新出千字文》一册，以适学童的需要[6]。在其一篇题为《论千字文》的文章中，邱菽园明显地表示了他对旧课本——周兴嗣的《千字文》——的看法，他以为其书的内容精辟，"所言皆《四书》精义"[7]。但原书字句艰深，平时罕用，所以不

[3] Francis H.K Wong and Gwee Yee Hean, *Official on Education: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870–1939* (Singapore: Pan Pacific Books, 1980), p.3；又见许甦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1950年），页7。

[4] 见下引邱菽园，《论新出千字文》之评语，又参阅姚梦桐，〈邱菽园编《新出千字文》—现有新加坡最早的启蒙读本〉，载《亚洲文化》期8（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86年10月），页57。

[5] 《天南新报》，1900年11月21日。

[6] 有关《论新出千字文》的词汇讨论，见《邱菽园编〈新出千字文〉—现有新加坡最早的启蒙读本》，页57–58。

[7] 《邱菽园编〈新出千字文〉—现有新加坡最早的启蒙读本》，页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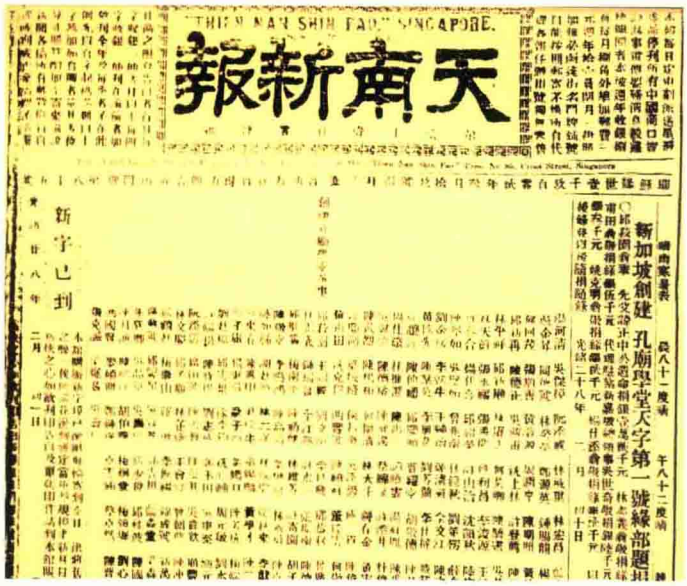
相关人物

邱菽园

历史事件

5 月 26 日

《天南新报》出版，由邱菽园主编


天南新報
新字已刊
新加坡創建孔廟興堂天字第一號緣部題捐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天南新报》刊登有关新加坡创建孔庙学堂的告示

能有效地传达儒家的信息，甚至因为教材不合，可能会贻误学童。所以邱菽园用较为浅白的文字，又以一些本地社会常见的事物为题材，而沿用旧的《千字文》的体例，写成《新出千字文》，作为蒙学课本。虽然《新出千字文》并不是一味宣述儒家的圣德，但所讲的修身待人的道理，还是以儒家为根本的。

另外一位对儒学课程及读本之改订出力极大的，是居住在吉隆坡的张克诚。张氏为大埔客家人，中国乙亥科（1875年）举人，曾经做过广东和山县的训导（学官），大概在1890年代中期南来，寄寓于吉隆坡，但常在新加坡《天南新报》发表尊孔崇儒的言论[8]。他极力支持“儒学运动”，鼓励在新加坡及其他南洋埠头建孔庙、开学堂。他也认识到旧的课本和经典，既繁多又艰深，不容易在学识不高的海外华人社会中广为流传。他说：“孔子之教，简编浩瀚，虽老师宿儒皓首研求，尚苦于不得要领，况农工商贾乎？”[9]因此，他致力于改编儒家课本，采择群经，分门别类，把重要的道理编纂成书，名为《孔教撮要篇》。这本书分作五个部分：首先说明孔教源流，其次论五教（即五伦），然后述《大学》篇所说的八条目。后面两部分是：周官六典和“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图说”。每部分有总叙，名为纲领，有分析，名为条目[10]。此书大约在1900年间完稿。

嗣后，张克诚更进一步把《孔教撮要篇》用白话改写，务使识字的人均可由此而明白儒家要义。《天南新报》主编说：“张广文（克诚）所著《孔教撮要篇》皆取经义，恐未易人人通晓，故复将《撮要篇》逐条逐节，演为白话，欲使识字之人，一见便知。转相传述，妇孺皆能通晓。其苦心孤诣，诚可嘉矣”[11]！

张克诚的《孔教撮要篇》，大约亦在1900年或1901年左右完成，曾经在《天南新报》连载[12]，可以说是第一部白话文的儒家读本，现摘录书中首章2节为例，以见一斑[13]：

卷一：父子有亲章

圣人之数，有五件事是人人共有的，人人要行的。其第一件事，曰父子有亲。如何叫做父？生我身者就是；如何叫做子？我生的就是；如何叫做亲？亲字讲做爱。父爱其子，子爱其父，就是父子有亲。于今就是父爱子一件说与大众知道：

大学传为人父节

大学传说：为人父，止于慈。慈即是爱。为人父要爱子之事，人人都知道，这不烦说。子曰：爱之能勿劳乎？

只是父母爱子，要为一生打算，不可只顾目前。若只顾目前，子放荡任他放荡，什么事都顺从他，就是骄生养惯了，将来就不能做成一个人了。所以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爱之深，所以虑之至，所以不得不勤劳其子呢！这勤劳其子的，实在是父母一片养子之心呢！

远在中国文学运动之前，在1900年时，张克诚就以白话文来编写儒家读本了，我们应该从中体会先辈先贤宣扬儒学的苦心，以及普及文化所作的努力。

教研机构的设立

早于19世纪80年代时，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已有几个文社和学会，时常举办传统式的文化活动，如宣讲圣谕和诗

[8] 张克诚在《天南新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孔教撮要白话〉外，还有〈上两广总督陶制军稟〉、〈孔教多界限实无界限说〉等篇，载《天南新报》1901年9月28日，1902年6月12日，1902年6月13日。从上述文章中亦可略见其生平。

[9] 张克诚，〈募印孔教撮要篇小引〉，载《天南新报》，1900年8月7日。

[10] 同上注。

[11] 《天南新报》，1901年11月23日。

[12] 从上引1901年11月23日之《天南新报》开始，一直连载至1902年4月7日止。

[13] 《天南新报》，1901年11月23日。

文酬唱等。其中有会贤社（1882年由左秉隆创立），在推行儒家思想方面，更是相当卖力。从1882年到1891年期间，会贤社几乎每月皆有举行月课（如今日的出题征文），而月课的题目多与儒家思想有关。例如[14]：

- 光绪十三年（1887年）7月课题：〈人皆可以为尧舜论〉
- 光绪十三年（1887年）8月课题：〈政贵与民同好恶论〉
- 光绪十三年（1887年）9月课题：〈臣事君以忠〉
- 光绪十三年（1887年）10月课题：〈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 光绪十四年（1888年）2月课题：〈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 光绪十四年（1888年）3月课题：〈子以四教文〉
- 光绪十四年（1888年）5月课题：〈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 光绪十四年（1888年）6月课题：〈言忠信行笃敬〉
- 光绪十四年（1888年）9月课题：〈满招损谦受益论〉
- 光绪十四年（1888年）10月课题：〈致知在格物论〉
- 光绪十四年（1888年）11月课题：〈人之行莫大于孝论〉
- 光绪十四年（1888年）12月课题：〈学而不思则罔〉
- 光绪十五年（1889年）5月课题：〈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 光绪十五年（1889年）6月课题：〈兴于诗〉
- 光绪十五年（1889年）7月课题：〈立于礼〉
- 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课题：〈成于乐〉
- 光绪十五年（1889年）9月课题：〈志于道〉

其后黄遵宪把会贤社改为图南社，仍然继续举行月课，虽然间中也有出题论及儒家思想，如壬辰年（1892年）12月课题：〈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乃出于《四书》；以及癸巳年（1893年）8月课题：〈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亦出于《四书》。不过，在黄遵宪的领导下，图南社的讨论和研究兴趣，渐向维新和西学。其后黄遵宪甚至明言："图南社不出《四书》题，以南岛地方，习此无用也"[15]。

到了1892年儒学运动展开之后，学术讨论和研究的兴趣又回到儒家思想的各个课题上来了。由林文庆、邱菽园为首的一个团体——华人好学会，就时常举办儒学的演讲会和座谈会。例如1899年10月好学会第五期演说就有下列两个与儒学有关的题目：一是〈实行孔教说〉，另一是〈训蒙改革私议〉，演讲的地点在华商阁三楼[16]。

不过，在儒学运动期间，新加坡华人并不涉足于一些演讲和诗文活动，有不少人认为：要宣扬儒学，就要有一个更具体和有力的组织来推动，同时也负起学术研究、训练教师和培养人才的责任。他们的构想是成立一座孔庙学堂。孔庙及学堂是二而一，是一个计划中的两大工程。建立孔庙，是为了把儒学变成孔教，以取代其他华人信仰，成为华人的宗教，以文化团结华人成为一体，与西方天主教及基督教抗衡。附于孔教的学堂则兼有研究及培才两项目的。计划中的孔庙学堂还设有藏书楼，广购图书及各地报章，供人阅览，又邀请儒学者出任传道之职，按时宣讲儒家学说。

这个计划可能最早是在1896年或1897年间

[14] 关于会贤社月课详情，参阅梁元生，〈从一份名录看19世纪后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士人集团—会贤社〉（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论文，1983年），该文节稿参阅《联合早报》〈根〉版，1988年1月1日。

[15]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卷二（新加坡：南洋学会，1984年），页297。

[16] 《天南新报》，1899年10月24日。

相关人物

林文庆

历史事件

10 月 5 日

继承《星报》的《日新报》创刊，业主为林文庆

由邱逢甲向邱菽园提出的，但计划并未付诸实行[17]。在1898及1899年，实际建庙兴学的工作却在日本横滨、马来亚霹雳州的巴罗（今怡保）、缅甸的仰光（Rangoon，今作Yangon），以及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雅加达Jakarta）及望加锡（Makassar）的华人社会中先后开始，而后者反倒迟迟未有进展[18]。据邱菽园自己的解释，他是“因病惮劳”，所以“留以有待”[19]。到了1900年，由于邱逢甲及王晓沧的鼓吹，建庙兴学之说乃再次复兴[20]。以邱菽园、林文庆等为首的一批绅董，成立了一个创建孔庙学堂的组织，规划章程，筹募款项，积极地进行这个搁置了数年的计划。现将当时草拟的两份章程列后，可见其计划之一斑[21]：

（甲）孔教章程：

一、专设孔庙一座，务极冠冕堂皇

二、设师范学堂一所，专习宣传孔教

三、专习宣传孔教之士，必须考其品行学问，中选者方为合格，给照宣传

（乙）中西学堂章程：

一、本学堂兼习中西学问

南洋圣教总会职员合影（具体年份不详）

二、大小坡设蒙堂若干所，兼习中西文字。三年考试，合选者送入本学堂

三、本学堂初学华文之生童，宜聘通达英文、兼通官音者为教习

四、本学堂华文，专学官音，以便联络一气

五、本学堂英文，与本坡大学堂平等

六、本学堂华人教习，宜请高等师范先生

七、本学堂宜聘高等师范为监院

八、本学堂须建学舍一所，以为各外埠来学子弟食宿之所；而监即住其中，为之阅照一切

九、本学堂将来稟请中国驻叻总领事转详驻英钦差大臣，代奏朝廷，作为中等学堂，诸生毕业后，考试入选者作为秀才，送回中国与试

如果按照一部分人的构想，这个孔庙学堂的计划不单是研究及宣扬孔子教义，而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其他还包括设图书馆、建格致书院、成立研求会、开医局、办报章等各项计划。不过由于保皇与革命两党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发生斗争，原拟以儒家文化作为团结力量的运动，也受到分化阻缓，终于不能成功。邱菽园、林文庆等成立教研组织的设想，除了筹建孔庙外，其余计划始终在新加坡不能如期实现，但他们总算还曾经付出过一番心力。

海外学人的访问

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新加坡及邻近地区的儒学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有些中国的“儒家学者”被邀到南洋来协助推行儒教，也有些学者在访问本地时被邀请演讲和发表他们对儒家的意见。这些访问学者之中，与本地的儒学运动最有关系的，至少有四人：吴桐林、邱逢甲、王晓沧、康有为。

---

[17] 邱逢甲，〈劝星洲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及大学堂启〉中有言：“三年前与菽园孝书，曾以此事发议”。该文成于1900年春，故推算为1896–1897之间。邱文参阅《天南新报》，1900年3月27日。

[18] 关于其他地区建庙兴学的报导甚多，参阅《天南新报》1900年3月17日，1900年1月4日，1900年10月11日，1900年11月15日，1900年2月22日，1900年5月9日，1900年5月7日，1900年5月8日，1899年10月31日，1899年11月13日，1899年12月4日等有关望加锡、巴城、巴罗及马六甲等地之报导。

[19]《天南新报》，载〈致叻报主笔〉，1900年12月21日。

[20] 王恩翔，〈星洲宜建孔庙及开大学堂说〉，载《天南新报》，1900年3月26日；邱逢甲，〈劝星洲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及大学堂啟〉，载《天南新报》535号，1900年3月27日。

[21] 此两项章程见《天南新报》，1901年3月10日，下署〈孔教同人公启〉，显然非一人所拟，可以代表一群人的构想。

吴桐林可能是最早在新加坡积极提倡孔庙的中国访客。吴桐林，字质钦，在丙申（1896年）夏天到南洋游历。据他自己说，此期间曾“在星嘉坡对众演说，劝建孔子教堂及学堂诸义举”，但其时儒学运动还在酝酿阶段，反应并不热烈，所以“言之谆谆，听者藐藐”[22]。邱菽园大概也在同时期有建庙兴学的构想，谁先谁后，甚难断定。不过吴桐林第一次在本地提倡建“孔子教堂”之说，肯定没有受到本地侨领缙绅的重视。吴桐林第二次来新加坡，是1901年，那时他是奉两广总督陶模之命，到南洋传谕保商的事。其时南洋尊孔保教之运动，已如澎湃波涛一般汹涌地展开了，惟独新加坡对建孔庙学堂的事则迟迟不举。所以他一方面极力鼓励本地士商从速兴办，说：“星嘉坡议建孔子教堂，乃华裔为子孙之事，非内地之事也！”而另一方面则传达两广总督陶模之支持及赞助儒教的心意，说：“所有我孔子三纲五常之至道，陶帅又不惮其烦，反覆讲论，言之精详。且闻陶帅行文之日，正政躬有恙之时，以有恙之政躬，而不忘我民于海外，所谓民胞万物与，公尔忘私，陶帅有焉！”[23]

邱逢甲和王晓沧，也同样为传谕保商之事南来，他们结伴同行，在1900年3月从潮州出发，下旨抵达新加坡。邱逢甲（1864—1912），台湾诗人，己丑（1889年）科进士，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日本侵占台湾时期，曾积极鼓吹抗日保台，倡立“台湾民主国”，为义军首领。1895年保台失败，乃内渡返粤东，主讲潮阳东山书院及海澄景韩书院[24]。王晓沧，字恩翔，嘉应州人，亦为粤东著名诗人，1886年邱逢甲由台赴闽应乡试时即与他结识，内渡后更多往还。戊戌政变后，两人伤怀时局，在潮州互相作诗抒怀对勉，名为《金城唱和集》[25]。二人俱与邱菽园有书信来往，对彼此诗才互相倾慕，王晓沧且把《金城唱和集》所收诗歌寄交邱菽园选印出版。二人对新加坡华人社会，想必然从与邱氏的书信往来中得到一些了解。同时邱、王两人的另一挚友，他是著名的诗人黄遵宪，也在新加坡担任过总领事数年[26]。有了这些关系，邱、王两人都想到新加坡游历和访友。趁着粤省正拟派人到南洋传谕保商，邱逢甲得到惠潮嘉道沉絜斋的保荐，被委出任专员，于是和王晓沧一同南来，以副夙愿。

邱逢甲、王晓沧皆为维新党人，倡导儒学，实着意于维新。他们盼望着尊孔而使海外华人团结合群，企图通过建庙兴学使华人“维国体、开民智、正人心”，而使得中国能够自强。1900年3月26日的《天南新报》的版首，王晓沧发表了〈星洲宜建孔庙及开大学堂说〉一文。翌日邱逢甲发表了〈劝星洲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及大学堂启〉，造成了颇大的震撼[27]。邱逢甲除了鼓励闽粤缙绅团结合群，大力捐输之外，更呼吁清朝廷驻叻总领事罗叔蕙出面挑起重任。他说：“总领事罗君，官也。而实是吾闽之郡人，而又夙负重望，倘能主其事，起而倡之，则可事半功倍。”[28]

其后邱、王两人又到槟城、巴罗各埠，到处演说，宣扬孔教，鼓励建庙兴学。在下文所引一封由巴罗名士王桂珊致《天南新报》编辑王会仪的信中，我们可以得见邱、王两位对新、马早期儒学运动影响之一斑。这封信原文

[22] 吴桐林，〈星嘉坡创议建孔子教堂缘起〉，载《叻报》，1901年12月9日。

[23] 同上。

[24] 关于邱逢甲生平，参阅徐博东、王志萍合著，《邱逢甲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年）。

[25]《邱逢甲传》，页116-117。

[26]《邱逢甲传》，页121-123，另外关于黄遵宪在新加坡之事迹，参阅柯木林，〈黄遵宪总领事笔下的新加坡〉，载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页155-164，及叶树景，《黄遵宪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班论文，1988年）。

[27] 南洋各地对邱、王二氏建孔庙立学堂之呼吁，最热烈者为霹雳巴罗（今怡保）一地，有年轻之绅商王维泉甚至捐地建庙，又拨出自己房屋作为藏书楼之用，名为“道南楼”，事见《天南新报》1900年5月8日，1900年1月26日等各期。又参阅《邱逢甲传》，页139。

[28]《天南新报》，1900年3月27日，邱文之末段。

不长，全部引录如下[29]：

会仪仁兄大人阁下：不晤教言，已数月矣。弟值此时事日非，逃名海外，借医而隐者，数年无事。偶阅报章，知各埠皆有志昌明圣学，心窃喜之。近来华人最众者，莫如大白腊，而竟寂寂无闻，居是邦者，又未免怅然耳。幸而邱工部、家广文两先生来游斯土，都人士倒屣而迎，每以倡建孔庙学堂为劝。临行饯别，席间诸公唱和诗多，中有闽友同宗维泉，毅然以兴学自任，先行捐送圣庙基地，购买书籍。越夕复延工部演说，众志翕然。于是知人心向善，有感遂通。从此白腊一隅，不虑无学无权，以开通民智也。兹将小引诗章，先行附报，质之菽园有道及诸同志，当亦许可。耑此布达。即请文安并叩贵报大主笔尤列先生均安

宗愚弟以鉴（王桂珊）顿首

在许多的诗章中，邱逢甲有一首名为〈自题南溟行教图〉的，对其在南洋讲述儒学的情形描写得最生动传神。诗曰[30]：

莽莽群山海气青，华风远被到南溟；

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

南洋各地对邱逢甲、王晓沧建孔庙办学堂的呼吁，反应甚为热烈。文人骚客也有许多应和的诗篇，散见于1900及1901年各期的《天南新报》中。

在儒学运动期间访问新加坡的中国学者之中，以康有为的声名最为显赫。康氏以今文经学崛起南方，立论雄奇，引起颇多的争论，但自成一家言，为19世纪后期儒家人物中最有影响力者之一。甲午战争后，以公车上书获知于光绪帝，引为己用，措意维新。19世纪末年中国的尊孔保教运动，康氏实是核心人物。可惜戊戌维新，百日而废，六君子被杀，而康梁则流亡国外。但在海外维新人士心中，康有为仍然是声誉极高，备受尊敬的人物。

康有为在政变后离国，到过日本及加拿大，后再回到香港。1900年2月2日，在新加坡邱菽园的资助下，从香港乘船到新加坡。康氏在新逗留的时间比其他海外访客如邱逢甲、王晓沧等都来得长，直到8月9日才离开星岛，迁往槟城。在新逗留时间约有半年之久。

康有为虽然是儒学大师和尊孔保教运动的领袖，但是在旅居新加坡期间，并没有出面宣扬儒学；反之，在本地的一段日子里，他谢绝应酬，很少在社会露面。李元瑾在〈从中西报章的报导窥探康有为在新加坡的处境〉一文中，把康有为在新加坡的事迹作了详细的报导和考证[31]。她说康氏在新期间，生活于三种压力之下：一是清廷的缉捕和追杀，一是殖民地政府的监视（或保护），一是反对者或不同情者的舆论[32]。在这些压力之下，康有为大部分的日子都在风声鹤唳、提心吊胆中渡过，更遑论出面替儒学或孔教作宣扬了。在此只录康氏在新期间所写而李文未引的一首诗，作为他旅居新加坡时生活的写照，诗题为〈星洲闭关赠星洲寓公〉，诗曰[33]：

我与君居星嘉坡，日饱邮厨腹其皤；

缅邈经月不相见，有似牛女隔天河。

重垣闭关绝宾客，竟日枯坐如禅和；

奉花洗叶作功课，午鸡一鸣清睡过；

翻思京华人事沓，忽得收身坐维摩。

话虽如此，康有为在新加坡并不是完全是个蛰居的隐者，他曾经会晤维新志士容闳，讨论汉口起义，甚至在新加坡作幕后指挥，协助保皇会的筹款及唐才常的勤王计划。他也和邱逢甲、王晓沧见过面，因此极有可能彼此讨论过南洋的尊孔保教运动，而且他和邱菽园、林文庆等本地儒学运动健将时有过从，定然在这些人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上述几位访问学者对本地的尊孔运动都有一定的刺激及推动作用，但他们来新加坡原来的目的，并非为了宣传孔教及建庙兴学。到了孔庙落成及学堂开办后，南洋地区便有专程礼聘中国的儒家学者南来专司传教兴学的职责的。最明显的例子是荷属望加锡的孔庙学堂，它在1900年便成立了，同时托人到中国厦门去聘请儒士苏易（苏师孟，字子长）夫妇南渡担任男女教习之职[34]。后来因学堂扩

[29] 王桂珊（以鉴）致王会仪书，见《天南新报》，1900年5月7日。

[30] 徐博东、王志萍，《邱逢甲传》，页140。

[31] 李元瑾，〈从中西报章的报导窥探康有为在新加坡的处境〉，载《亚洲文化》期7（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所学会，1986年4月），页3-18。

[32] 同上，页17。

[33]《天南新报》，1900年10月6日，作者署名“更生”。

[34]《天南新报》，1900年10月12日。

南洋圣教总会内厅

充又再从厦门增聘连珍如及李开三两分任讲席[35]。其他各埠也有相关情形。可惜新加坡孔庙学堂的资料不全，不能把情况说得更清楚。

中英双语的并用

19世纪末新加坡的儒学运动，另有一点与现在的儒学运动相似的，便是应用华英两种语言为媒介，向两种不同教育背景的新加坡华人灌输儒家思想。开始时运动之主流当然是以华语及方言向移民社会或受传统教育的华人进行儒家教育，以冀达到保国合群与文化回归的目的。这方面主要的领导人是邱菽园。他通过《天南新报》鼓吹，也从事实际的改编课程工作，更捐巨款筹建孔庙学堂，可以说是全面性的投入。其他重要人物如清朝驻叻总领事罗叔羹、代领事吴世奇等，皆有出力；儒士张克诚在报章上多次发表言论，而且撰写普及的儒学读本，绅商如林志义、黄甫田（即黄亚福）、杨仕添等捐资赞助，都算是这个运动的领袖人物[36]。

然而，我们绝不能忽略这运动中另外一位重要的领导人——林文庆医生。他也和邱菽园一样全面的投入：用笔为文，用口演说；既出钱，又出力。虽然他也有用华文写作（如发表在1899年12月《日新报》中〈论儒教〉一文）[37]，但他主要的贡献是在于用英文英语传播儒学，使一些英文教育出身的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或“峇峇”，也对儒家学说产生兴趣，甚至投身于这个运动，而其文化认同也由“英化”（Anglicization）及“马来亚化”（Malayanization）转向传统中国文化（Re-Sinicization）。虽然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但他们都是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如陈德顺（Tan Tek Soon）及孔又曾等便是由于孔教运动的影响而变成热心中国文化的[38]。而林文庆本人也是由早期的倾向西方文化而于19世纪末年逐渐转变成儒家信徒的。林文庆是第三代的海峡侨生，1869年生于新加坡，年轻时受英文教育，是新加坡著名英校莱佛士书院的毕业生。他在1887年获得女皇奖学金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习医，是新加坡华人学生获得这项奖学金的第一人。林文庆毕业后，即于1892年回到新加坡行医，同时积极地提倡社会改革。他对儒家学说之发生兴趣，据李元瑾的研究，约始于1894年[39]。其后因岳父黄乃裳的影响，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更加关注，而研究儒学也更为热心。

在1895年至1920年间，林文庆用英文写了许多篇有关儒家文化的文章，像〈宗教在中国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in China"）、〈儒家对人性的看法〉（"Confucian View of Human Nature"）、〈儒家的宇宙与上帝观〉（"Confucian Cosmogony and Theism"）、〈儒家伦理的基础〉（"The Basic of Confucian

[35]《天南新报》，1900年11月15日。

[36]《天南新报》，1902年3月17日。

[37]《日新报》，1899年12月13日、14日、15日。

[38] 关于陈德顺及孔又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参阅拙文〈宗教与革命：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徒对革命运动之反应〉，载《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係研究中心，1986年），页192-213。

[39] 李元瑾，〈林文庆的儒家思想〉，见《亚洲文化》期10 (1987年10月)，页95。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8 月 17 日

海峡英籍华人公会（俗称侨生公会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成立

Ethics"）、〈儒家论友悌之道〉（"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儒家孝顺的规矩〉（"The Confucian Code of Filial Piety"）、〈儒家在远东〉（"Confucianism in the Far East"）及〈儒家的国家观念〉（"The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State"）等，分别发表在《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及新加坡海峡哲学会（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Singapore）的两份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及*Transaction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Singapore* 之中[40]。与此同时，林文庆也用英文作过多次演说，鼓吹儒学，也亲自到南洋各埠去宣传孔教[41]。林氏这股崇儒的热情，延续至20世纪20年代，还是丝毫不减。和他一样用英语向海峡侨生和外籍人士讨论儒家的，在新加坡有陈德顺，在荷属巴达维亚有李登辉[42]。

历史重演

以上从课本编写、教研机构、海外学者及两种语文为各个方面，说明19世纪末新加坡的推行儒学运动与当代新加坡的儒学运动，有着许多类似之处。当然，历史不可能照搬重演，因为许多环境上、政治上、社会上及文化上的因素也改变了，故此早期的儒学运动与今日的儒学运动仍然有许多根本上的差异。最重要的分别，是其目标与精神上的不同。今时今日新加坡推行儒学，主要是藉此加强国民的道德观念，以抗拒西方的颓废风气及功利主义，但在早期的儒学运动中，则有强烈的文化认同与爱国（中国）意识。在精神上早期的儒学运动注重儒家宗教化企图把孔子变成教主，把儒学变成教义，配合孔庙、祀礼等宗教仪式，使儒家变成儒教，而足以与西方的基督教、非洲及中亚的回教等抗衡，并且取代佛道二教及其他民间信仰，而成为华人的宗教。正因如此，早期的儒学运动又称为孔教运动或儒教复兴运动。本文以儒学运动为题的原因，是因为所探讨的四个范围并没有强调其宗教性。今日的儒学运动，虽然也稍有涉及儒家天命的解释，而部分海外儒家学者如杜维明、刘述先等更为强调儒家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一面，不过在学校的课本以及在社会的讨论中，重点还是放在儒家的世俗性（secular）方面的教导，即是儒家重视人伦、融协社会的各项义理。反之，建孔庙、立教主、定祀典，以及种种与宗教相关的口号，一直没有人提过，更不遑响应和讨论了。

位于新加坡里峇峇里路251-255号南洋圣教总会外观

早期新加坡的儒学运动早已声沉影寂，邱菽园、林文庆、康有为、张克诚等大师也已作古。现代新加坡的儒学运动，从1982年发展至今，前景如何，现在尚难定论。不过儒学从孔子时代至现代，经过2000多年的考验，不但脉膊没有停息，生命还在延续发展，而且不断吸收与创新，则是不争的事实！

[40]〈林文庆的儒家思想〉。

[41] Yen Ching-Hwang,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99-1911*, p.39.

[42] 梁元生，〈宗教与革命〉，页207，201-211；又关于李登辉之生平及其对儒家的兴趣，参见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页44-56。

第二节　三教合一
——儒释道在新加坡的发展

摘要

19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也带来了祖籍地的信仰。这种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宗教习俗，在早期移民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社会的变迁，到了20世纪，三教的发展更加有组织性，对各自宗教的认同意识更加强烈，教团也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宣教，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文化。

Abstract

In the 19th century, immigrants who came to Singapore from China's southeastern coast brought along with them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These beliefs, which are a synthesi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ir spiritual well-being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here. In line with social change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evolution of the three religions became more institutionalised and possessed a stronger sense of religious identity respectively. Also, in keeping with the rapidly changing world, these religious groups have begun to strengthen their efforts in preaching their religious doctrine and thoughts.

徐李颖（Xu Liying）

新加坡开埠后，大量的中国移民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祖籍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还有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念。这种融合了儒释道三教观念的民间信仰，成为新加坡华人的主流宗教。

把儒、释、道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分析，是学术史上的一大难题。作为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支柱，儒家长期占据主流的政治地位，佛与道则在精神与修身层面与儒家形成有益的补充，三者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等各个领域。尤其在民间文化中，三教已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情形，在新加坡华人信仰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在新加坡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华人庙宇中，供奉着各种地方性神祇、仙佛真人、孔子门徒。这些神明虽然带给广大信徒深深的精神寄托，并承担一定的道德宣化的功能，但是大部分的庙宇、管理人和信徒并不关心背后的佛、道教理、儒家学说等。注重“有求必应”的现实功能性，是这些民间信仰的共通性。

殖民地时期英政府的人口调查，都把“儒、释、道”归为同一类，这也反映了当时华人信仰的实际情况。如表（一）所示。

新加坡建国后，人口调查中的宗教分类略有调整。如表（二）所示。

从1980年开始，儒家已经从宗教条目中消失，表明政府明确地将儒家归于学术思想，而非宗教。随着佛教和道教的各自发展壮大，它们被分列开来，成为两种不同的宗教。而儒教的消失，使得不少供奉儒家圣贤的庙宇被列于道教信仰。

新加坡政府试图从更加贴近现实和符合学术规范的角度，详细调查国人的宗教信仰，这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数据。但另一方面，政府的调查报告却使得儒、释、道的研究易于陷入更大的困境。例如：儒家学术和民间孔子信仰被割裂开来；佛道二教在实际的信仰活动中有着很大的重叠领域，这一部分被有意地忽略；道教成为了大杂烩，凡是不能归于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庙宇、神明都被纳入到道教。

尽管儒、释、道的研究是一个充满难度和挑战的课题，但是作为新加坡华人精神和宗教生活的重要部分，我们仍然应当尽力对儒、释、道的发展历程、相互关系作出深入而广泛的探讨。为了论述的方便，本节仍然从儒、释、道三教出发作分别的探讨，三教的论述范围以如下标准来区分：

儒教：信奉孔子思想的庙宇或组织；供奉孔子及其他儒家圣贤的寺庙祠堂。

佛教：信奉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佛，以及尊崇佛教经典内记载的一切诸佛和菩萨罗汉的寺庙庵堂；以华人信仰的汉传佛教为主的佛教组织。

道教：信仰道教天尊真人；各类神仙的庙宇或组织；供奉所有地方性神祇的庙宇。

以上只是粗略地对三教的范围作出区分。笔者认为，在为庙宇和组织定性时，首先应该尊重庙宇和组织者的宗教意愿及宗教认同；其次，再从其宣扬的主要教义和学说作为划分的依据。

儒学与儒教

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一开始就是与民间宗教相胶着的。19世纪初，来南洋谋生的中国人大多是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他们大多没有很深的儒学理论修养，更不可能有意识地去推广儒学运动。他们所继承的简单朴素的儒家伦理道德，更多的表现在生活习惯和民间宗教的层面。比如对孝道的崇奉、对祖先的祭拜、对家庭伦理的维护、对义气的执著。那时的儒学更多的是“生活上的儒学”、“宗教上的儒家”，而非学理层面的儒学。19世纪末，跟随中国的孔教运动，新加坡也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复孔运动，成立了孔教会。这场运动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而落入低潮。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掀起了第二次儒学运动，这次运动主要是从学术和教育的层面提倡儒家思想并试图将之制度化。但最后因为种种困难，无疾而终。有关新加坡的两次儒学运动，可参阅本书第七章第一节〈浮海居然道可行：新加坡的儒学运动〉。

虽然儒家和孔教在新加坡社会几经沉浮，但民间的儒学社团仍在顽强地发展，南洋孔教会、新加坡儒学会、喜耀文化协会等团体就在努力地推动儒家文化，成为当代民间儒学的中坚力量。但在以英文为主流的新加坡社会中，这些民间团体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表（一）新加坡宗教与人口比例调查表（1849—1931）

宗教/年份	1849	1911	1921	1931
儒/道/释	27, 526（52. 0%）	216, 501（69. 4%）	310, 163（72. 8%）	411, 665（72. 5%）
回教	22, 007（41. 6%）	53, 595（17. 3%）	69, 604（16. 3%）	86, 827（15. 3%）
基督教	1, 861（3. 5%）	16, 349（5. 2%）	21, 386（5. 0%）	30, 068（5. 3%）
印度教	1, 452（2. 8%）	15, 580（5. 0%）	19, 772（4. 6%）	31, 128（5. 5%）
锡克教	——	146（0. 05%）	1, 022（0. 2%）	2, 988（0. 5%）
犹太教	22（0. 04%）	707（0. 2%）	623（0. 14%）	777（0. 14%）
其他	23（0. 04%）	14（0. 004%）	38（0. 009%）	306（0. 05%）
无宗教	——	——	——	——
未说明	——	62（0. 02%）	3, 269（0. 8%）	3, 694（0. 7%）
总计	52, 891人（100%）	311, 987人（100%）	425, 877人（100%）	567, 453人（100%）

资料来源： Tong Chee Kiong, *Religious Trends and Issues in Singapore* in Religious Diversity in Singapore, edited by Lai Ah Eng,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32（原表格中计算错误之处，本文进行了修改，不再额外指出）

表（二）新加坡宗教与人口比例调查表（1980–2010）

宗教/年份	1980	1990	2000	2010
天主/基督教	10. 1%	12. 7%	14. 6%	18. 3%
佛教	27%	31. 2%	42. 5%	33. 3%
道教	30%	22. 4%	8. 5%	10. 9%
回教	15. 7%	15. 3%	14. 9%	14. 7%
印度教	3. 6%	3. 7%	4. 0%	5. 1%
其他	0. 5%	0. 6%	0. 6%	0. 7%
无宗教	13%	14%	14. 8%	17%
总计%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 Singapore Census of Population 2000, 2010.

民间儒学团体

南洋孔教会

“南洋孔教会”的前身是“实得力孔教会”，虽然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因为社会背景的改变，二者之间并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差异，从领导人、会务宗旨到社会影响力，都有巨大的差异。

随着政治和国际形势的改变，南洋孔教会的宗旨与实得力孔教会完全不同，后者提倡关心社会政治、以“万国和洽太平”为己任。南洋孔教会则侧重孔子的道德和教育学说，而远离政治话题。例如1949年，孔教会复兴后的首次大型活动是“中国文物展览会”，以宣扬文化和艺术为目的。1951年组织“星华图书馆筹募委员会”，希望能够筹建会所

和图书馆。从1967年到1990年，几乎每年都举办征文比赛[1]，征文的题目也都是围绕着孔子的道德和教育观。新加坡独立后，南洋孔教会更加疏离政治和社会问题。1974年的章程就明确地提出了不参与政治的宗旨："本会以宣扬孔子遗教促进儒家固有道德学术而不参与政治为宗旨"[2]。这与实得力孔教会章程中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其次，从领导人来看，实得力孔教会的倡导者与中华总商会的领导是同一批人，他们不但是商界精英、华社领袖，而且对儒家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地了解。他们既给予孔教会强大的经济支持，也通过给报章写稿在学理上宣传儒教。林文庆曾经在《天南新报》上撰写多篇文章来比较儒教与基督教，并一再强调"西学源出儒学"的观点[3]，培养当地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虽然孔教会受到了当时革命派的激烈反对，但是在西方列强侵华的背景下，以中国传统儒教为反侵略的思想武器的主张还是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另外，实得力孔教会也一直借用中华总商会的会址作为办事处。可见在实得力孔教会时代，由于得到了中华总商会在财力、人力、物力上的全力支持，尊孔运动得以在新加坡迅速地发展。

而南洋孔教会在1949年复会之后，领导人虽然仍以成功商人为主，但随着孔教运动的低落，南洋孔教会的社会影响力也日趋减弱。在1951年复会之后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中，第一任会长林庆年便把筹建会所当作急需解决的问题[4]。可见复会后南洋孔教会已失去了中华总商会的全力支持。前三位会长任期不长，第四位会长蔡多华（1888-1981）在任21年（1960—1981），任期最久。蔡多华也曾任南洋圣教总会会长、新加坡南安会馆、同济医院总理、副主席及代主席等职[5]。因为他的关系，南洋孔教会得以借用南洋圣教总会会址办公。

蔡多华之后，黄奕欢（1908-1985）于1981年继任会长直到往生。黄奕欢是一位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热心于慈善和教育事业，曾担任多间华校董事，为南洋大学的创办出钱出力[6]。他在任期内慷慨资助孔教会的活动，不但资助孔诞费用和征文比赛奖金，而且捐资在裕华园安置由台湾孔孟学会赠送的孔子像[7]。

原新加坡中华女中校长盛碧珠，1986年到2001年担任会长。之后由其子胡克济接任至2007年。胡克济是会计师，母子两人都非商人，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大不如前几任会长。尤其自1987年之后，南洋孔教会不得不从南洋圣教会迁出，居无定所，会议都在会员私寓中举行，这也限制了会议的正常举行和开展常规性的活动的能力。尽管盛碧珠将建立孔圣堂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但是因为新加坡地皮逐年上涨，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购买会所的愿望遥遥无期。至此南洋孔教会的发展跌落低谷。在缺少强大经济来源的困境下，当时的孔教会不得不改变策略，开放门户吸收更多人入会。他们甚至考虑通过孔子崇拜的宗教形式，来扩大影响力、增加收入[8]，反映了孔教会和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所遭受的冷遇和窘况。

2007年，郭文龙接替胡克济担任会长。郭文龙以自己多年来经商和参与社团工作的丰富经验，积极地为南洋孔教会策划活动、拉拢人才、吸引资金，不但使南洋孔教会的媒体曝光率激增，其主办的儒学课程、文化讲座、孝道征文比赛、孝道音乐会等，都引起了不错的社会反响。郭文龙也在2008年实现了南洋孔教会拥有会所的多年宏愿，但是因为该会所太小不能满足会员活动需求，已于2014年售出，南洋孔教会仍在寻觅合适的新会所[9]。郭文龙带领下的南洋孔教会，努力推广普世化的儒家道德伦理，近年来更把推广"孝道伦理"作为主要的目标。

作为20世纪初孔教运动的产物，实得力孔教会能够延续到南洋孔教会，跨越一百年的动荡岁月，已属不易。南洋孔教会的曲折道路，也反映了孔教和儒家思想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命运。此外，新加坡孔教和儒家思想的发展间

[1] 根据孔教会特刊记载，从1967到1990年间，只有1976年、1985年、1986年、1987年、1988年未举行任何比赛，1980年改为书法比赛。

[2] 盛碧朱主编，《孔圣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纪念 南洋孔教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双庆特刊》（新加坡：南洋孔教会，1995年），页45。

[3] 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0年），页100。

[4] 《孔圣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纪念 南洋孔教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双庆特刊》，页38。

[5] 柯木林，《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页205。

[6] 《黄奕欢对南洋大学的贡献》（新加坡文献馆，2009年）。

[7] 《孔圣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纪念 南洋孔教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双庆特刊》，页40。

[8] 在2004年4月和9月的理事会议上，理事们一致同意开放门户，广邀本地儒学同人参加。再以孔教会名义，成立一筹款小组，以筹建孔圣堂。在孔圣堂设立孔子像，让信徒祭拜。

[9] 〈会所风波刚平息，百年南洋孔教会再觅新会所〉，载《联合早报》，2014年6月2日。

接受到中国的影响，南洋孔教会能够重现复兴之势，与中国国力的增强、儒家文化重新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和推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其推动的普世化儒家道德伦理，容易被一般阶层所接受，也符合新加坡政府努力强化家庭凝聚力的政策。

新加坡儒学联合会

为了响应中国北京成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2000年成立了新加坡儒学联合会。

1994年，中国北京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新加坡派员参加。与会人员回国后，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儒学研究及推广儒家思想，决定成立新加坡儒学联合会。2000年11月2日，新加坡儒学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长、新加坡知名华商唐裕为理事会主席，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荣照为第一副会长，苏新鋈教授为第二副会长，聘请王赓武、庄右铭、盛碧珠、刘蕙霞、林徐典为顾问。该会成立后，以集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国际儒学联合会。

2001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新加坡儒学联合会首次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主题为“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以及新加坡本地的10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就儒学与新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展开讨论。之后，新加坡儒学联合会每年主办或者与其他社团联办各类儒学讲座，并派代表出席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学术活动。

2013年11月23日，新加坡儒学联合会再次主办以“儒家与宗教：互动和对话”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儒学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本地约200名学者参会，共同探讨儒家精神如何为促进社会和谐作贡献。

新加坡儒学联合会虽然是民间的学术团体，但参与者大都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有着浓厚的学院派色彩，着重于儒家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推广。儒学联合会的出现与第一次儒学和孔教运动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是在中国的主导和影响下出现的。但其学院派的特点，决定了在民间的影响力受到局限。

民间宗教里的儒家

除了儒学层面，儒家思想和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还以依附于民间宗教的形式存在着。有两种形式，其一是融入多教合一的宗教组织，如德教会、南洋圣教总会、立德传心堂、一贯道等。其二，是进入民间庙宇，以孔子崇拜的形式得到崇奉和祭祀。

多教合一中的儒家

在多教合一的宗教组织中，儒家通常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因为各会的宗旨和教义不尽相同，所以儒家在其中所占份量亦有所差别。

德教会是五教合一的宗教，包括儒、释、道、回、耶。它于1939年起源于中国潮汕地区，后在东南亚一带广为流传。新加坡第一间德教组织约创立于1952年，名为紫新阁[10]。现在，德教联合总会设于新加坡，在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地有90多处分会，会友数十万人。

德教会在初创时，崇奉的是道士杨筠松、柳春芳及宋大峰，道教色彩非常浓厚。后来慢慢地吸收了中国的历史人物、佛教的释迦牟尼以及儒家的孔子等等。德教南播后，又将耶稣和穆罕默德也吸纳进他们的“师尊群”里。

传至东南亚后，德教的教义向儒家的伦理道德倾斜，宣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智”以及“不贪、不伪、不欺、不骄、不妄、不怠”等戒律为其信条[11]。在2004年出版的《中外普渡皇经附吕圣注解》

[10] 郑良树，〈德教的草创与南播〉，载《华人文化史论丛》（卷一）（新加坡：南洋学会，1982年），页32。

[11]〈德教的草创与南播〉，页45。

相关人物

林文庆

历史事件

在林文庆及海峡英籍华人公会要求下，成立华人义勇军，通称华人连队

中[12]，既有中国传统的神鬼观念："神令乎鬼，鬼听乎神，神鬼宰御，阴阳攸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又有儒家的"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尤以慎独为先"的观点，甚至明确地指出"治世以儒为首"。整本"普渡皇经"渗透着浓郁的儒家道德信条。

德教会的会友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夜聚会，聚会中主要的仪式是请"扶乩手"在沙盘上写字，宣誓神意。德教的教义基本上都来自于乩文。德教的实质是把民间的巫术仪式与儒家的种种道德规范相结合。虽然德教没有特意地标榜儒教，但其经文中贯穿的儒家精深，无疑是对儒教的一种最好的宣传。

南洋圣教总会是三教合一的宗教，供奉孔子、太上老君和释迦牟尼。约成立于20世纪初期，总会设在新加坡里峇峇利路（River Valley Road），是马来西亚、泰国、香港、台湾五地圣教会的总组织[13]；在马来西亚更有众多属会[14]。

每年农历8月27日孔诞，南洋圣教总会循例举行祭孔大典。参与者全部身着传统的蓝色马褂、黑帽，有古乐伴奏。仪式上诵读圣经：《大学》和《中庸》。南洋圣教会不像德教会一样将五种宗教融合为一，而是不同的节日诵念不同的经文，基本上沿用了儒释道各自的祭祀方式。

立德传心堂是以儒教为主的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组织，供奉释迦牟尼，孔圣夫子，太上老君。由林济南创办于1971年，殿堂建成于1972年，位于樟宜路（Changi Road）。

立德传心堂创立之时，新加坡已经过20多年的发展建设，政治稳定，在经济和工业等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国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都得到满足。但社会的快速变动亦引起了不少社会问题，如少年犯罪、滥用毒品、离婚率升高等等。经济带来的社会问题不但引起政府的注意，更使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向传统思想寻求解决之道。林济南创办立德传心堂也是基于此种原因，他在十周年特刊的《缘起略历》中说："十年前同人等鉴于世道浇漓，人心险恶，物质胜于精神，时髦重于道德，俭朴不崇，奢华是尚……非昌明儒释道三教，宣扬伦理道德，不能挽回于万一"[15]。便是试图以儒家的传统道德来挽回世道人心。

基于这样的创建缘由，尽管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但立德传心堂的主导教义仍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每年孔子诞辰，立德传心堂会举行祭孔仪式。仪式上除了向孔子鞠躬敬礼、献供香花，还要举行儒家思想的演讲，希望人人感受道德古风。

从以上多教合一的三种民间宗教组织来看，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儒教在其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客观上来说，儒家附属于多教合一的宗教组织有利于儒家道德思想的传播，儒家的伦理道德被包裹在民间宗教的仪式中，也更容易被普罗大众所接受。但是因为新加坡和中国不承认儒家是宗教，儒家在宗教化的道路上充满阻碍，民间宗教中的儒家也难以彻底地与宗教融合。

民间庙宇与孔子信仰

如果说在多教合一的宗教组织中，儒家的核心思想、伦理道德、经典文集等还能够得到部分的继承和发扬，那么在民间庙宇的祭孔活动中，儒家的修身养德、忠孝仁义等完全被忽略。孔子成了与土地、财神、妈祖等一样的保护神，保佑学生考得高分、升学顺利成了最主要的职能。

新加坡民间庙宇祭奉孔子历史非常悠久，可追溯到开埠之初。根据林孝胜的实地考察，地藏王庙的正殿供奉地藏王菩萨，左边较小的神坛却供奉着孙悟空，另一边神坛则供奉儒家圣人孔夫子[16]。殖民地时代知名的帮权庙宇如天福宫、粤海清庙也都供奉着孔子，其他庙宇中供奉孔子者更是随处可见。

信徒们在考试前或者开学前，会带子女到庙里拜孔子，以祈求儿女学业优异、考试顺利。而孔子像旁大都摆放笔记本、铅笔等学生用品，这些是经道士或法师做法后的福物，需要的学生可以随意拿取。

2003年，三清宫首次以道教仪式祭孔，吸引了1500个

[12]《中外普渡皇经附吕圣注解》开篇即说"新颁中外普渡皇经即是德教之真经"，因此可以把"中外普渡皇经"及其注解看作是德教的基本教义。

[13] 南洋圣教总会的文献资料非常少，也没有出版过会刊。因此这一部分的撰写只能依靠笔者的田野调查和口头访问的资料完成，遗漏的历史部分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考查。

[14] 南洋圣教总会属下的分会有：槟榔屿圣教会明善堂、安顺圣教会、沙白圣教会、霹雳圣教会、吧生圣教会、大山脚圣教会、吉隆坡圣教会、太平圣教会、新山圣教会、北海普善堂、槟榔山修真院、马六甲圣教会、吉礁圣教会、吉兰丹圣教会、爱大华圣教会等。

[15]《立德传心堂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立德传心堂，1982年），页12。

[16] 林孝胜，〈金兰庙的沧桑〉，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页70。

学生参与[17]。之后，其他庙宇也纷纷效仿，孔诞祭孔成为一股热潮。例如三巴旺财神庙、崇义庙、裕廊大伯公庙等等。祭孔仪式上诵念的是道教的庆贺科仪，与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毫无联系。

总而言之，孔子和儒家文化主要以两种方式在新加坡发展，一是儒学，一是孔子崇拜。儒学运动经历了两次高潮，但都因为时代政局和社会文化的改变导致无疾而终。虽然一些热心儒学的民间文化机构仍在努力宣扬孔子思想，可是缺少了政治的依靠，其社会影响力十分有限。反倒是民间信仰中的孔子崇拜，对普通民众更有吸引力，只是这样的孔子崇拜已经丢失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与一般神明信仰无异。

新加坡佛教的发展

佛教在新加坡有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两大系统，在华人社会中以北传大乘系的汉传佛教为主流。因此本小节主要论述汉传佛教在新加坡的发展历史。

僧侣和佛寺何时出现在新加坡，史学界没有明确的答案。1970年，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隆根法师指出，金兰庙和妈祖庙分别供奉地藏菩萨和观音大士，表明佛教信仰已经出现[18]。传发法师在《新加坡佛教发展史》中也认为，福建会馆所属的金兰庙内奉有地藏菩萨，是新加坡北传佛教信仰的正式出现[19]。许原泰则指出，从匾额和碑记上看，地藏王庙的出现迟于金兰庙约70年，因此以地藏王庙作为北传佛教的出现未必完全正确。即使勉强认为地藏王庙是显现狮城佛教信仰之始，那也已是20世纪初、中叶之事了，未必是在创建金兰庙时的19世纪30年代[20]。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来说明佛教的传入，但随着开埠后华人庙宇的出现，根据碑铭记载，这些庙宇都有聘请和尚担任住持的传统。

庙宇里的僧人

通过庙宇的碑文记录可以发现，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新加坡的华人庙宇无论供奉何种神明，庙宇的住持一般都是僧人。无论是供奉大伯公的顺天宫、供奉天后妈祖的天福宫、供奉广泽尊王的凤山寺、供奉城隍爷的都城隍庙，甚至供奉九皇大帝的后港斗母宫，都可从各种碑文、记录、新闻中，看到僧人担任住持的踪影[21]。

建立于新加坡开埠前后的顺天宫，历届住持都是佛教僧人，共有六位。最后一位明义法师担任名誉住持一直到2008年。从2009年开始，不再聘请僧人担任名誉住持[22]。

坐落在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地区的都城隍庙，1905年由僧人瑞于修建。瑞于初到新加坡时，曾任南安人社群总机构凤山寺住持。之后，在社会名流邱菽园的资助下，建设了都城隍庙。瑞于1953年圆寂后，此庙一直由俗家弟子管理至今。

新加坡最著名的庙宇，福建帮总机构“天福宫”，一直由佛教僧人担任住持。天福宫的僧人属于受雇佣者，管理层通过公开招标，对外承包香火一事。因天福宫在新加坡地位

[17]〈庆祝孔子圣诞，祈求金榜题名〉，载《联合早报》，2003年9月22日。

[18] 隆根，〈新加坡佛教漫谈〉，载《南洋佛教》期412（2003年），页3。

[19] 传发，〈新加坡佛教发展史〉（新加坡：佛教居士林，1997年），页55。

[20] 许原泰，《中华传统宗教信仰在东南亚的蜕变：新加坡的道教和佛教研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页161。

[21] 这些庙宇在1951年出版的《新加坡庙宇概览》中都被归于佛教总会属下，参阅《新加坡庙宇概览》（新加坡：南风商业出版社，1951年）。

[22]《路班让顺天宫福德正神——新加坡路班让顺天宫二百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顺天宫（大公司）有限公司，2012年）。

相关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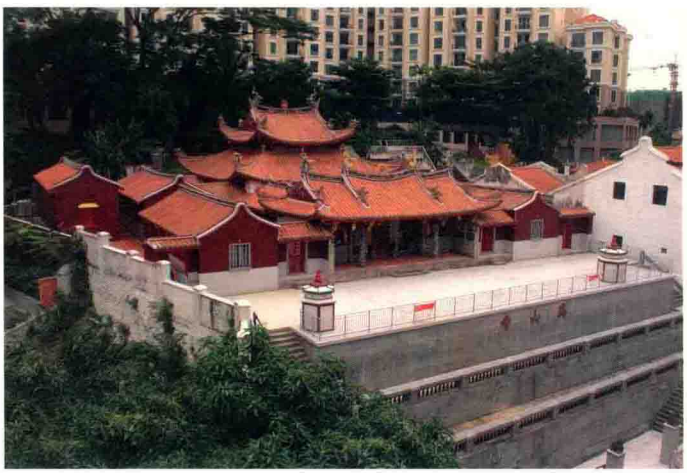
巴克利

历史事件

英人巴克利（C. B. Buckley）所撰《新加坡旧时轶史》（*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9-1867*）出版，内容记述新加坡1819年至1867年的史实

重要，香资数目巨大，因此深受瞩目，对外招标一事在报纸上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应。如1897年3月27日《叻报》〈天福宫事近闻〉载："顷据坡中闽商付函本报，嘱为登录。函内所云乃本坡天福宫招人承充香火之事，详视所论，夺珠合理。惟愿该宫董事人于此一事尚其细心酌核，方可举行。庶见大公不至，外闽人言，藉藉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窃愿董其事者，有以善国之斯可矣"[23]。当年4月3日《叻报》再登〈天福宫招人承充香火事〉："本坡天福宫近因尼招僧人承充香火之事，……窃按该宫为本坡闽籍全省公众香火，所关颇巨，其料理之人臧否，实为闽省商民面目所关，祈愿诸君踊跃赴庙，秉公熟议，以定承办之人"[24]。1898年4月30日天福宫在《叻报》上正式刊登〈天福宫告白〉："兹因本坡天福宫住持僧人擅自回唐本宫香炉另招僧人，投充一年为期……"。

到了20世纪初期，天福宫仍由僧人负责一切宗教事宜。如1915年在报纸上刊登的启示〈中元节更新之办法〉："本宫每届中元先由值理人募捐布置扎纸设坛，名曰普渡。由来旧矣。自乎民国肇兴侨胞进化咸有更新之议，遂于本月十二号在本会馆共同决议，自本届起由宫积项年拨五十元交住持僧办理，不得仍而之挨户劝捐，强人所为。如有自愿到宫捐送香烛茶果者，听之，按盂兰会之设，始于唐僧目连欲救其亡母生前之罪兼以饷同狱无依之魂。事虽虚渺，心实慈悲。同仁等为转移社会风俗计，故将此项改归僧人主持，而撂贴以办费，是亦护法者所宜然者也。谨此通布。中华民国四年八月廿一日，新加坡天福宫公启"[25]。文中提及中元普渡的费用将由天福宫拨出50元，交由住持僧办理，而不再挨户募捐。



凤山寺鸟瞰

福建人最大的义山，建有庙宇恒山亭。根据道光岁次丙申年（1836年）所书写之木牌〈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其中多处提及亭内和尚的职责和约束他们的行为规范，如："第三条：中秋佳节，头家炉主捐缘金备办牲礼物件祀神，……所捐缘金，开费之外有存银员，概交本亭和尚收为备办红烟老叶茶等件，以供炉主全年祭祀及代客不时之需"；"第四条：凡清明节、七月普渡、中秋佳节……又不许亭内和尚设卖鸦片烟，并不许在亭边左右设卖鸦片烟馆。如有妄行不遵者被众查知，将和尚革出，将烟馆拆毁决不容恕"；"第五条：恒山亭之香资，和尚于每月朔望日落坡捐化，……如漳泉人等有身故要附葬于本冢山者，务必对值年炉主处取单，带交与本亭和尚为凭，如无取单为凭亦着和尚阻止"[26]。而恒山亭一年一度的万缘盛会，则是兼请僧道尼，共同主持法会。如民国十二年（1923年）所立〈第一届万缘胜会碧山亭倡建万人缘会纪念〉中说"……僧道尼三坛诵经礼忏，通宵七昼，结彩张灯，更设素酌以迎宾……"[27]。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所立〈广惠肇碧山亭建醮超度幽魂万缘胜会会序〉中载："……建三昼四夜之道场，赶九日登山祭扫，俾向皈依，就斯亭建设洁净梵坛，择阴历九月初五晚起醮至初夜八圆满，集僧道尼三坛，诵经忏咒各种梵文，夜演瑜伽幽普遍，……"[28]。

福建人的另一座义山庙宇麟山亭，也是由名为碧玉的僧人负责募捐重修桥路的。在1915年4月10日的《叻报》中，有一则〈重修麟山亭桥路广告——募捐广告〉："启者：癸丑年，重修麟记山亭桥路事业，经董事议决，由僧碧玉仝张君植出为劝捐，目下桥路尚未完竣，需项尚欠

[23]〈天福宫事近闻〉，载《叻报》，1897年3月27日。

[24]〈天福宫招人承充香火事〉，载《叻报》，1897年4月3日。

[25]〈中元节更新之办法〉，载《叻报》，1915年8月23日。

[26]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2年），页224—225。

[27]《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261—263。

[28]《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262—263。

二千余金之谱，伏望众铺户诸善翁赞成善果添捐一次相与有成功德无量，此布”[29]。僧碧玉当时也是东岳庙的住持。1908年1月2日《叻报》上有一则启事〈创建新鉴公东岳庙进火小启〉，叙述了东岳庙兴建的缘由，并告知东岳庙将于该月廿九日进火（晋宫），落款为“东岳庙住持僧碧玉”[30]。两则启事时间仅相差七年，僧碧玉应为同一人。僧人碧玉原系中国福建省漳州开元寺僧人，到南洋后看到新加坡缺少东岳庙，便自筹资金买下武吉宝美（Bukit Purmei）的一块地建成了“东岳庙”，中祀“东岳仁圣大帝”、旁祀“观音佛祖”“阎罗天子”“都府城隍”和“注生娘娘”[31]。东岳庙至今仍然坐落在原地，而且香火鼎盛。

同属于福建帮的金兰庙，1907年11月20日在《叻报》刊登了一则〈题缘宜慎〉，提醒信众当心不肖奸僧骗人钱财。从落款“金兰庙住持贫衲瑞兴禅师”，可知金兰庙也是由僧人担任住持的。

早期的僧人都是受雇于庙宇，自身并没有拥有权和管理权。主要原因是19世纪的华人庙宇大都与帮权机构相结合，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为进入华族社会领导层，商人们积极地参与庙宇活动，早期的华族首领在建庙和重修庙宇的工作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庙宇的主导权一般在大商人的手中。此外，华人庙宇中供奉的神明都是移民们从中国带来的乡土神明或者民间俗神，正统佛寺并不多见。僧人来到新加坡后受雇于帮权庙宇或者民间小庙中，首先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弘扬佛法则是之后的目标。正如〈新加坡佛教总会〉的介绍中说：“新加坡开埠之初，已有华侨之神庙，嗣后庙宇随人口而增，然真正祀奉佛者甚少，多属大伯公、城隍、天后之类，三宝佛及观音菩萨、地藏王，却少之又少”[32]，反映了当时佛教的状况。

第一间佛教丛林——莲山双林寺

新加坡第一间真正的佛教丛林当属莲山双林禅寺。双林禅寺于1898年开始建立，1909年正式落成，如许原泰所说，该庙“对北传佛教在新加坡之正式传播起着酝酿作用”[33]。

双林禅寺位于大巴窑（Toa Payoh）住宅区金吉路（Kim Keat Road），由刘金榜献地所建。刘金榜（1838-1909）祖籍福建省南靖县，1858年南来新加坡。初当苦力工，作过小贩，靠勤俭积蓄创办“万山号”药铺，经营中药材。后集资开设“福南银号”而致富，开创新加坡华资银行的先河，跻身金融界。他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发起人之一，历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新加坡福建会馆董事、华人参事局委员、保良局委员、皇家艺术会会员[34]。

贤慧禅师是双林寺开山住持禅师，祖籍中国福建泉州。1898年从缅甸弘法而归，途经新加坡，巧遇刘金榜，受其挽留。刘金榜献出于1885年购买的一片土地，约38英亩，筹募兴建双林寺。并礼请贤慧禅师为开山住持[35]。1900年，刘金榜再献土地12英亩续建双林寺。至此，刘金榜已把自己购置的50英亩土地全部捐给双林寺。次年贤慧禅师圆寂，双林寺工程尚在进行中，遂由其弟性慧禅师接任住持[36]。

---

[29]〈重修麟山亭桥路广告-募捐广告〉，载《叻报》，1915年4月10日。

[30]〈创建新鉴公东岳庙进火小启〉，载《叻报》，1908年1月2日。

[31]〈创建新鉴公东岳庙进火小启〉，载《叻报》，1908年1月2日。

[32]《新加坡庙宇概览》，页1。

[33]《中华传统宗教信仰在东南亚的蜕变：新加坡的道教和佛教研究》，页172。

[34]《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24。

[35]释证亮、梵辉，《西禅小记》（福州：福州怡山西禅寺刊本，1942年）。

[36]《莲山双林寺》（新加坡：莲山双林寺，2001年），页11—13。比丘尼妙慈，〈莲山双林禅寺缘起〉，载陈荆和、陈育崧合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155—156。

刘金榜捐巨资聘请中国名师巧匠南来，仿闽南古刹兴建该寺，使之成为马来半岛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中国式建筑。双林禅寺是中国传统的合院布局，也是汉族寺院的建造形制，主体建筑沿南北中轴线布置，配殿及附属建筑配置于东西两厢或后侧。中轴共有三进落，每一进落之间由殿堂组成的院落重叠，院内有院，以庭院与建筑虚实搭配组合，是中国大丛林的典型实例[37]。

莲山双林寺与当时新加坡其他的华人庙宇完全迥异，严格遵守佛教丛林的规范，摈弃了华人庙宇儒释道混杂的传统，在新加坡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莲山双林寺的出现，宣告了佛教信仰场所在新加坡的正式落成，这不仅仅在形式上树立了佛教的形象，更为佛教有组织地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转道法师与佛教组织的初创

1913年，转道法师抵达新加坡，他的到来为佛教有组织地传教开辟了道路。他不但积极地创建佛教寺院，还与其他僧人、居士一起发起了各种佛教组织，并邀请高僧前来弘法宣教，提倡正信佛学，为佛教在新加坡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转道法师（1872-1943），祖籍福建省南安县。13岁时，因闻人诵《六祖坛经》及《般若心经》，心生欢喜，遂离家到南安仙迹岩寺。18岁时前往漳州南山寺，依善修法师出家，法名转道。19岁于南山崇福寺受具足戒。1909年38岁时，至厦门主持南普陀寺。1913年，厦门南普陀寺设立僧伽学院，因缺乏经费，转道法师受托至新加坡募化。转道法师抵新后，因出面帮一刘姓富商解决地皮争执，刘某便发愿将此地献给转道法师以建伽蓝之用。转道法师和转岸法师、瑞等法师一起在这位于寅杰路（Yan Kit Road）的土地上兴建了“普陀寺”[38]。普陀寺依中国古典佛寺建造，大殿、厅堂、禅室、香积厨等一应俱全，是华僧的另一驻锡之处。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复修，1967年举行落成典礼，时任总理李光耀主持开幕仪式[39]。

由于转道法师精通医术，尤擅小儿科，人们尊称他为“儿童活佛”。遇贫者施医赠药，为人敬重。随着声名远播，转道法师也应同乡福建帮领袖之邀，到天福宫出任住持。1919年双林禅寺重修期间，又被推举为首座[40]。

20世纪初，新加坡的佛寺不多，南来的僧侣无处安身。当时有虔诚信徒郑雨生献地，胡文虎出资，请转道法师在光明山创建佛寺。1921年，普觉禅寺在光明山初创，最初只有一间大殿、一间僧舍，四周蔓草重生、坟冢垒垒、行人罕至。普觉禅寺广纳十方僧众，是新加坡十方丛林之始。数十年后，普觉禅寺已成为东南亚最大的佛教道场。普觉禅寺也是新加坡最早提供佛教荼毗火化与骨灰安置服务的佛寺[41]。

佛寺建成，来往的僧侣有了挂单和落脚之地，于是多位大陆高僧陆续南下，为新加坡带来了一股学佛风气。1922年，受转道法师的邀请，圆瑛法师（1878-1953）南下星洲普觉寺宣讲《大乘起信论》，正式开创了北传佛教高僧向新加坡华人移民宣扬正信佛法的先河[42]。请国内法师前往讲经，这在当时的新加坡，甚为罕见[43]。

1926年8月，转道法师进一步与中国商人蒋剑一、黄天行、苏鹤松等人倡组“星洲讲经会”，力邀中国一代佛教领袖

新加坡双林寺旧貌

[37] 莲山双林寺网站：http://www.shuanglin.org/。

[38]《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138；《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页156。

[39] 释能度主编，《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新加坡：药师行愿会，2010年），页155。

[40]《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157。

[41]《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页171。

[42] 广义，〈转道老和尚传〉，载《南洋佛教》期4（1969年），页20。

[43] 于凌波，〈早年弘化南洋的释转道〉，载《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页47。

太虚大师（1889 - 1947）南来新加坡弘扬佛法，为新加坡的北传佛教掀起了一阵高潮[44]。太虚在讲经会上发起组织“中华佛教会”，得到转道、如安、瑞于、普亮、其真等法师的支持，以及邱菽园、黄典娴等华社侨领的积极响应，于1927年正式成立，以太虚、圆瑛、转道等法师为导师。中华佛教会在后来的发展中，为佛教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凡的贡献，是出版佛教书刊的先驱[45]。

1933年，转道法师与道阶、瑞等、瑞于、普亮、如安诸法师，以及邱菽园、庄笃明等居士50余人，于寅杰路普陀寺发起筹组“新加坡佛经流通处”，推举李俊承、庄笃明等十余位居士为董事。1934年，佛经流通处召开第二次董事会议，决定成立“新加坡佛教居士林”[46]。佛教居士林后来几经搬迁，现在位于金炎路（Kim Yam Road），为五层楼建筑。居士林开设有佛学班、图书馆、功德堂、中医义诊，而且常年免费提供素食，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1938年，转道法师念及不少新加坡华人受英文教育，不能读中文经典，于是鼓励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侨陈景禄居士以英文教导土生华人研读佛经，并与一群受英文教育的佛教徒联合创立了“英文佛教会”[47]。

总之，转道法师在来到新加坡后，不但积极兴修寺院，同时大力提倡佛学教育，广邀中国高僧讲学。在同辈僧人和热心居士的大力支持下，转道为新加坡佛教开创出了一个新局面。他推动建立的普陀寺、光明山普觉禅寺、佛教居士林、中华佛教会和英文佛教会，都成为弘扬佛法的重要基地。

慈航法师与李俊承居士

同一时期，从中国南来新加坡为汉传佛教带来巨大影响的，还有：圆瑛法师、太虚法师、道阶法师（1870-1934）、演本法师（1872-1957）、慈航法师（1895-1954）、法航法师（1904-1951）[48]。其中，圆瑛、太虚、道阶、演本、法航都只在新加坡做短暂停留，唯有慈航法师旅居新马约10年，“掀起了知识分子学佛的热潮”[49]。

慈航法师，原籍福建省建宁县。自幼父母先后辞世，18岁剃度出家，法名慈航。慈航法师33岁进入了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学习，后来应邀出任安庆迎江寺住持。有感于自幼失学，知识基础薄弱，慈航法师曾发愤苦学《唯识讲义》，多年之后终以精通唯识而著名[50]。

1939年9月太虚大师担任“中国佛教访问团”团长，出访缅甸、锡兰、印度、暹罗、马来亚等地宣传救国运动。慈航法师作为团员协助太虚大师访问东南亚，使该项活动获得极大的成功。太虚大师等人完成外交任务后，于1940年4月25日率团返国，慈航法师则继续留在新马弘扬佛法[51]。

慈航法师在南洋长达10余年，期间往返新马各地讲经说法，先后倡办了星洲菩提学院、

[44]《太虚自传》（新加坡：南洋书局，1971年），页136。
[45]《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页315-317。
[46]《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页318-319。
[47]《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页327。
[48]《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页37-47。
[49]《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页45。又根据张从兴，〈汉传佛教在新加坡〉，载《联合早报》，2010年10月24日：从中国南下弘道的还有虚云老和尚，他曾经为了募款重建云南鸡足山道场而远下南洋，曾在新加坡做短暂停留，事见《虚云和尚年谱》。
[50]于凌波，《肉身菩萨释慈航》，载《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页193。
[51]印顺，《妙云集13太虚大师年谱》（台湾：正闻出版社，1990年），页448-472。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月1日

新加坡市区通往克兰芝的铁路开始通车

槟城菩提学院，以及马来亚各地的佛学会。他经常在这些学院或佛学会作通俗佛学演讲。由于慈航法师说理圆融，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吸引不少人士皈依三宝。

在新加坡开创菩提学校的毕俊辉女士（1900-1981），法名慈辉，就是慈航法师的皈依弟子。慈航法师在新马广宣佛法，毕俊辉担任翻译工作，积极参与慈航法师在新马所推动的佛教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慈航法师一方面认为佛教文化之传播，必先从教育着手，另一方面则觉得既然槟城已有一间佛教学校，新加坡作为一个大城市，也应该建立一间佛教学校，以提倡佛化教育，于是鼓励毕俊辉居士留在新加坡筹办菩提学校[52]。

慈航法师在新期间，跟随他的女居士们还设立了女众道场菩提兰若，并为慈航法师购置“法师寮”，方便他来往新马弘法。慈航法师后设灵峰菩提学院，作为本身修行及度众的道场。1946年，灵峰菩提学院成立中国佛学会，慈航法师出任导师。同时创办《中国佛学》月刊，积极宣扬佛法。后来又续办《人间佛教》、《佛教人间》等佛教月刊，尽量通过文字弘宣佛法[53]。

1948年秋，慈航法师应台湾中坜圆光寺妙果和尚之请，离开新马到台湾创办“台湾佛学院”。1954年圆寂于台湾，成为台湾第一尊肉身菩萨。慈航法师被视为太虚大师门下弟子，他在新加坡佛教界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被视为“太虚大师一生革新中国佛教运动的外在延伸”[54]。在新马传教的十余年，他积极宣扬佛法、倡建佛教学校，所建立的教育传播模式对新加坡佛教影响深远。

早期华人庙宇里的僧侣

在当时的居士群体中，弘扬佛教的代表是李俊承。李俊承（1888－1966），原籍福建省永春县，17岁南来，创立永兴公司。后又在新加坡开设太兴公司，并倡议开办森美兰州中华学校（今中华中学）。1925年返回中国，皈依佛门，法号慧觉居士，潜心钻研大乘佛教。回新后继续经商，先后购置太丰饼干厂，出任和丰银行总理。后倡议和丰、华商、华侨三家银行合并，为今天华侨银行有限公司的前身。1935年，李俊承与转道老和尚及庄笃明居士创办佛教居士林，为当时社会名流、墨客骚人聚会之处[55]。

日治时期，日本军队对于佛寺僧众的态度比较友善，各寺庙庵堂获准继续进行宗教活动。新加坡佛教就界组成救济队伍“中华佛教救恤会”和“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前者由李俊承出任主席，龙山寺广洽长老为总务主任，庄笃明为副总务主任，策动救济工作[56]。李俊承还将全岛十余所寺庙改作临时救济所，动员全新加坡佛教徒加入救死扶伤的工作，并且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征集物资米粮，以利施医赠药、赠送棺龛，施衣施粥等各项救济工作。中华佛教救恤会也起到了掩护青年免受征兵之役的作用[57]。

由于日军善待佛教徒，使北传佛教的信仰者急剧增加，成为新加坡光复后佛教寺院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

新加坡佛教总会

新加坡光复后第三年，李俊承“奉前华民政务司（郑

[52] 毕俊辉，〈我的一生〉，*Maha Bodhi School 40th Anniversary* (Singapore: Maha Bodhi School, 1989), p15；转引自许原泰《中华传统宗教信仰在东南亚的蜕变：新加坡的道教和佛教研究》，页181。

[53]《中华传统宗教信仰在东南亚的蜕变：新加坡的道教和佛教研究》，页181。

[54]《中华传统宗教信仰在东南亚的蜕变：新加坡的道教和佛教研究》，页182。

[55]《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47。

[56]〈林史〉，载《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简介》（新加坡：新加坡佛教居士林，1995年），页1—3；〈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简史〉，载《走过狮城七十年1934-2004——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七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佛教居士林，2004年），页205-214。

[57]《新加坡华侨志》（台湾：华侨文化出版社，1960年），页198。

惠明）之命，筹创佛教总会”[58]。他与转岸法师、达明法师、瑞于法师、广洽法师及庄丕唐居士等人，于1949年7月31日邀请全新加坡华人佛寺庵堂代表，假佛教居士林召开筹备佛教总会会议。是年10月30日佛教总会获得政府批准[59]。

1950年1月8日佛教总会依章程选出执监委员、正副主席、常务委员及各部正副主任等职员。李俊承当选为第一届常务委员会主席。入会者有团体会员90余名，个人僧俗会员700余名。

新加坡佛教总会成立之初，会所设于佛教居士林，后迁入菩提学校。1969年购入蒙巴登路（Mountbatten Road）一栋别墅充作会所。1970年代，为筹建文殊中学，佛教总会变卖了这项产业，一直寄居于菩提学校。1996年8月购得芽笼24A巷（Lorong 24A，Geylang Road）地皮，因经费问题直到2006年始着手兴建，2008年落成，2009年11月，由李显龙总理主持会所开幕及佛教总会60周年双庆大典[60]。

早在1947年，英文佛教会的人士就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将佛教最大的节日“卫塞节”申请成为公共节日。后来在陈景禄、宏船法师、李俊承等人的不懈努力下，1955年该申请得到英殖民地政府的批准。此后每年卫塞节，佛教总会以及各个佛教机构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成为新加坡多元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总会虽然长期没有自己的会所，但这并没有阻碍佛教总会推广慈善、服务社会的决心和行动[61]。在慈善方面设有“佛教总会基金会”，1988年宣布成立，1994年注册为慈善机构。基金主要用于资助佛教医学与科学的研究、提供奖学金资助佛教徒深造、资助教育文化和慈善机构以及佛教寺院庵堂的建筑和发展、援助遭受天灾人祸及贫病苦难的人士。资金不做任何政治用途。

在社会教育方面，首先于1990年设立青年团，在年轻人中弘扬佛教、培养人才。1993年筹办悉达多托儿中心，1995年正式开放服务大众。1998年筹办菩提托管中心，1999年投入服务。佛教总会每个月也会举办各种佛学课程和讲座，广邀海内外的高僧大德前来弘法布教。

此外，佛教总会还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设立“肃毒辅导组”和“监狱辅导组”，帮助失足者改过自新。1977年，受新加坡肃毒协会之邀，佛教总会设立肃毒辅导组，聘请专职辅导员和志愿佛教徒参与肃毒辅导工作。1987年，在三巴旺戒毒所设立了佛教辅导礼堂，在精神上给予戒毒者支持和鼓励。为了让服刑者有机会听闻佛法，觉悟前非，佛教总会在监狱、军人扣留所提供辅导服务。2002年设立“觉岸之家”，帮助过去曾在监狱及戒毒所受过佛教辅导的人，得到延续的辅导和帮助[62]。

活跃的佛教团体

二战后，不但新加坡的佛教寺庙如雨后春笋般迅速遍布全岛，各种团体和联谊组织也不断出现和壮大。除了中华佛教会（1927年）、佛教居士林（1934年）、英文佛教会（The Buddhist Union）（1938年）和佛教总会（1949年）等至今仍保持活跃的社会活动外，1950年代之后成立的佛教团体还有：宽济堂念佛社（1952年）、般若念佛堂（1954年）、

相关人物

陈楚楠　张永福

历史事件

年初

陈楚楠与张永福所创办的《图南日报》出版

应和会馆增设应新学校

[58] 宏传，〈新加坡佛教总会名誉主席李俊承居士归西七七之期〉，载《新加坡佛教总会会务报告-196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新加坡：新加坡佛教总会，1966年），页23。

[59]《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页59。

[60]《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页59-67。

[61] 详细内容可参阅释能度主编《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页68-138。

[62]《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页106-109。

净名佛学社（1962年）、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图（1964年）、法轮社（1969年）、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1981年）、大众学佛研究会（1982年）、大悲基金会（1985年）、慧严佛学会（1985年）、海印丛林（1985年）、慈光福利协会（1992年）、药师行愿会（1995年）、觉海学佛研究中心（2008年）。

新加坡的佛教深受台湾佛教界的影响，早在1950年代开始，两地的僧侣往来密切，不少新加坡的僧侣在台湾的佛寺出家或担任过住持。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佛教开始在新加坡设立弘法机构，包括新加坡净宗学会（1992年）、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新加坡分会）（1993年）、新加坡佛光山（1996年）、法鼓山新加坡护法会（1996年）。

新加坡净宗学会是由净空法师创立。20世纪90年代净空法师由台湾来到新加坡，弘扬净土法门。新加坡净宗学会坐落在芽笼35巷（Lorong 35，Geylang Road），学会设念佛堂、图书馆，长期主办弘法人才培训班，学员有僧俗二众，学成后派往世界各地弘法。

佛教慈济功德会新加坡分会成立于1993年，原名“佛教慈济功德会新加坡分会”，是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的海外分会之一，由证严法师创立。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的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人文和环境保护四个方面。在医疗方面，推广骨髓捐赠，设立慈济人医会、慈济义诊中心以及洗肾援助计划；在教育方面，设立慈济大战青年联谊会、慈济教师联谊会、慈济大学新加坡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人文方面，设立“慈济文化中心”和“静思书轩”；在环境保护方面，设立环保站，在静思堂从事资源回收与分类出售的工作，并搭建“惜福屋”进行资源回收与再出售。总之，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新加坡分会自成立以来，为新加坡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加坡佛光山成立于1996年，秉持星云法师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鼓励信徒自我充实、提升素养。新加坡佛光山设立三个组织：新加坡佛光山、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新加坡佛光青年分团。2000年，“新加坡佛光山”注册成立，2004年标得榜鹅坊（Punggol Place）的地段筹建庙宇，2008年新加坡佛光山寺院正式落成开光。新加坡佛光山推行四大理念：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在文化方面，通过音乐、话剧、研讨会、文物展等等丰富的活动项目来推广佛法；在教育方面，网罗人才、培养讲师、摄化青年，不断扩大弘法平台，开办多元课程；在慈善方面，通过捐血、义诊、拜访老人院、国际赈灾等活动，激发人们超越苦难、尊重生命的意识；在共修方面，每周进行，主张传统与现代融合，顺应时代开创佛教新局面。

此外，新加坡的佛教界也参与世界性的佛教组织，如世界佛教友谊会和新加坡佛教僧伽联合会。

世界佛教友谊会（Th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由斯里兰卡佛教会于1950年发起，广洽法师与毕俊辉居士代表新加坡佛教总会出席会议。会议上吁请与会代表回国各自成立分会。1952年在达明法师的支持下，世界佛教友谊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毕俊辉长期担任领导人，致力于推动跨种族、跨宗教的慈善事业。从成立到1969年，每年卫塞节庆典，该会都向各界劝募善款，捐赠给慈善团体。1969年起，卫塞节庆典由佛教总会接办。

新加坡佛教僧伽联合会由宏传法师和法乐法师联合发起，注册成立于1966年。该会成立的目的是促进南北传佛教徒的团结，会员中以泰籍僧侣居多。多年来，该会在联系南北传各组僧伽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总之，佛教是新加坡目前最大的宗教，也是华人信仰者人数最多的宗教。从上文“表二：新加坡宗教与人口比例调查表（1980-2010）”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15岁及以上的新加坡人佛教徒占总人口的27%，略低于道教徒的30%。到了1990年代末，上升至31.2%，道教徒则迅速下降至22.4%。至2000年，佛教徒人数激增至42.5%，而道教徒则惨跌至8.5%。这一时期，也是前文所述及的新加坡佛教组织和寺院大肆增长的时期，同时由于1990年代台湾佛教在新加坡扎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新加坡佛教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进入21世纪，佛教徒人数滑落了9%，这9%基本上是被天主/基督教（3.7%）、道教（2.4%）和无宗教（2.2%）所瓜分。佛道二教关系紧密，虽然道教人数略有上升，但从整体的华人信仰来看，进入新的世纪，华人传统信仰遭遇西方宗教和无神论的强力冲击。从1980年到2010年，西方天主/基督教徒和无神论者的数量呈现加速度的增长趋势。显示在当代新加坡社会，由于英文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全球化的影响，西方文化正在快速地改变新加坡华人的思想和生活。

道教在新加坡

上节已略微提及了新加坡道教的情况。根据实际的情形，新加坡华人对于佛、道二教的区分并不十分清楚，也不十分在意，儒释道三教兼容的局面即使在今日的华人庙宇中仍然非常普遍。新加坡道教和佛教的总人口数一直都在50%上下徘徊，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程度的消长，这种消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华人在选择佛、道信仰时的摇摆。反映了佛、道二教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关系。

道教初传

早期的华人庙宇没有佛、道的区分，奉祀的都是民间俗神。因此，对早期道教的论述，笔者采取比较宽泛的概念，即包括了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主要原因首先是这些俗神基本都被纳入了道教庞大杂糅的信仰体系，其次，是在现当代的发展中，道教组织发挥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将佛教不愿意承认的俗神信仰，都吸纳入到了自己的组织当中。

学者们普遍推测，在英国人到来新加坡之前，中国的商人和种植者就已经在新加坡来往停留了[63]，但当时的新加坡只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小渔村，人口稀少[64]，中国的商人并未在此长久居留。有学者推测早在郑和下西洋之时，中国人就已经把海神妈祖的神像带到了新加坡。许原泰在〈论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一文中，通过新加坡最早的两间庙宇“福德祠”和“顺天宫”的史料分析，认为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很可能早于开埠的日期，而且是从安葬移民海上浮尸的“阴鬼”信仰开始的[65]。尽管这一观点是从旁推测，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开埠前新加坡就已经有了明确的道教信仰，不过从“顺天宫”和“海唇福德祠”的信仰的内容与方式来看，这两间新加坡最早的华人庙宇，的确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顺天宫最早坐落在小坡马拉峇街（Malabar Street），是一座大伯公庙。根据陈荆和与陈育崧编著的《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内收录的〈重建顺天宫碑记〉的记载，该庙

望海大伯公庙

[63]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196。

[64] 根据莱佛士与当时的纽波德上尉（Captain Newbold）的记录，那时的新加坡只是个渔村，居民大约150人，其中有马来人及海人，他们多半是渔夫与海盗，亦有约30名华人。上述记录引起了学者的质疑，有人认为当时的新加坡并非荒岛，而是一个商港；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新加坡居民远远超过150人。莱佛士登陆之前的华人已有从事甘密的种植。参阅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年），页5。

[65] 许原泰，〈论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载《宗教学研究》期1（2011年）。

"建于嘉道之际"[66]，即公元1796—1850年之间。1981年《南洋商报》记者报道顺天宫信徒在庙后墙壁上重新发现两块尘封已久的石碑，根据"建于嘉道之际"推算顺天宫应是建于1808年。此报道引起了不少人的讨论，也有人将"嘉道之际"解读为1820年和1821年[67]。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顺天宫在新加坡开埠前已经存在了。

"海唇福德祠"出现的年代与顺天宫相去不远。据说，在清仁宗嘉庆年间（1820年左右）有一陈姓长者浮尸到直落亚逸（Telok Ayer）海边，居民捞起葬于案旁。后来因前往祭祀者日众，广客七属人遂敛资于道光甲申年（1824年）建祠，榜约"福德祠"。庙内悬挂的最早的一块匾额立于"道光岁次甲申年"，即1824年，说明在1824年之前，便已经有了大伯公香火[68]。

"顺天宫"和"海唇福德祠"这两间最早的庙宇，供奉的主神都是"大伯公"。"大伯公"是新加坡人最普遍、供奉数量最多的神明。"大伯公"究竟是什么神，曾经在新、马地区引发过激烈的学术争论。学者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名称、来源和大伯公认同三个方面。有人认为大伯公是移民先驱死后被供奉为神；有人认为大伯公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土地神，大伯公的发音与福建和广东地区农村人对土地神的称呼一致。在新加坡大伯公也被称为"福德正神"，这与中国人对土地神的尊称是一致的。而且他们的塑像也都是一手持杖、一手拿着元宝的白须老人。所以，大部分学者认为，"大伯公"的原型就是中国的"土地神"，只是被增加了一些当地的文化特色，并与移民初期的鬼魂崇拜相结合。早在唐末五代杜光庭编撰的道书《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中，土地神就被列为地祇而奉之。因此，大伯公庙的出现就标志着道教的传入。

帮权庙宇与道教

与帮权机构相结合，是19世纪位于新加坡商业区的华人庙宇的一大特色。"海唇福德祠"就有着浓厚的帮权色彩。它初为广惠肇集团创立，在19世纪前期，为了对抗人多财众的福建帮，联合丰永大、嘉应五属与广客两帮组成的广惠肇集团。"海唇福德祠"成为广、客两帮联合阵线的总部。

新加坡开埠后最早的华人移民是来自马六甲的漳泉商人和中国东南沿海闽粤两省移民，因为所操方言的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太一样，形成了以各自方言为认同的"帮"。加上不同方言族群到新加坡的先后而造成利益资源的分配问题，"帮"的划分更加显著，成为19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大特色。根据人数的多寡，五大主要帮群为：闽、潮、广、琼、客[69]。据1881年海峡殖民地人口的统计显示，在总数8万6766名华族中，以福建人最多，计3万3508人；潮州人居次，计2万2644名；广东人1万4853名；海峡侨生9527名；海南人8319名；客家人170名，其他272名[70]。

在移民初期，为了捍卫各帮的权力、争取族群利益，这些帮群团体聚集在各自的庙宇中议事。庙宇承担着会馆和学校的功能。这些庙宇大都位于沿海的商业地带，即使后来会馆从庙宇中独立了出来，这些庙宇仍然是帮群的重要象征。比如，闽帮建立的天福宫（1839-1842年），主神妈祖；潮帮建立的粤海清庙（1826年），主神玄天上帝和妈祖；广客七属人创立的海唇福德祠（1824年），主神大伯公；海南人的天后宫（1857年），主神妈祖；嘉应客人创建的丹戎巴葛福德祠（1844年），主神大伯公。

其他与帮派有关的著名庙宇还有：福建帮的恒山亭（1828年）和金兰庙（1830年），主神分别为大伯公和清水祖师；南安人的凤山寺（1836年），主神广泽尊王；广肇邑人创建的广福古庙（1835年），主神齐天大圣；金门人创建的浯江孚济庙（1876年），主神圣侯恩主；福帮血缘性组织陈氏宗祠保赤宫（1878年），主神开漳圣王。

正如林孝胜所说，19世纪的新加坡社会，积极参与庙宇活动是侨领进入华族社会领导层必备条件之一。所以，早期的华族首领在建庙和重修庙宇的工作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19世纪各帮领袖中，最热心从事庙宇活动的首推福建帮首领章芳琳。他于1863年建巴西班让福德庙，1887

[66]《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页152。

[67]〈针对邱新民的看法国大两讲师提出质疑〉，《南洋商报》，1981年10月1日。

[68] 李奕志，〈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载《石叻古迹》，页199-200。

[69]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页29。

[70] Maurice Freeman,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 no. 1, 1960, p.26.

大伯公是新马华人崇祀的神祇，类似中国的土地公

年建清元真君庙与玉皇殿，1869年捐地重修海唇福德祠，1881年独资重修金兰庙[71]。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市区的庙宇在宗教信仰的功能之外，更多地承担着政治的角色。庙宇的建设和管理者都是有名望的商人，这些商人同时也是华社的领袖和帮群政治的核心人物。受聘的住持一般都是僧人，看不到任何道士的记载。

在五大帮派中，人数居众的福建帮管辖下的所有庙宇、坟山，都是聘请僧人担任住持，并负责宗教法事的。但是，有学者提到，1893年的《叻报》及《星报》记载天福宫在迎神赛会期间，曾举行过一场盛大的醮事“罗天大醮”。因罗天大醮费时七昼夜，花费巨大，当届董事会甚至大幅削减绕境活动的规模[72]。“罗天大醮”是道教中上三等醮事之一。宋代张君房所编道书《云笈七签》中云“结坛之法有九”，分为上三坛、中三坛和下三坛。上三坛为国家设之，分别为：顺天兴国坛，为普天大醮；延祚保生坛，为周天大醮；祈谷福时坛，为罗天大醮[73]。由此可知，罗天大醮在古时是属于国家参与的道教祭典，规模宏大。天福宫既然主办过“罗天大醮”，很有可能延请道士住持醮仪。但是因为资料阙如，当时的情形不得而知。

当时的道士们没有统一的组织，大都以个人道坛的名义在民间活动，为普通百姓做一些超度功德，或者庙宇庆典诵经祈福等。一个道场若需人数较多，主导的道士则会叫上其他道坛的来帮忙，组成临时的团队。正因为道士自立道坛，以道士为职业，不在庙宇中作住持，关于道士及其活动的记载非常缺乏。

最早提及道坛的资料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所立的〈广惠肇重修利济桥道碑〉中：“吴道院送醮一坛，玄门弟子吴升南、李杰生”；“陈道院送醮一坛，玄门弟子陈心泉、陈谦堂”[74]。广惠肇三属人士为方便香客前往绿野亭扫墓，重修通往绿野亭的利济桥。此则碑文就是记录当时出资建桥者的名单。这段文字至少告诉我们，早在1884年，新加坡就已经有了道坛，而且不止一家。广、惠、肇三属属于广帮，根据当时壁垒分明的帮派划分，文中提到的吴道院和陈道院很可能属于广帮的道士。

1902年1月23日的《叻报》中有一则〈玉皇宫建醮酧恩启〉：“公启者，我玉皇宫秉昊天大至尊之灵，为阇坡香烟之首，近年经诸绅商肃诚祀事克荷，天庥叠降祯祥为民造福，是以本宫谨定历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三昼夜延僧仗道建醮酧，恩兹将届醮务之期倘诸善信有欲题捐缘者务须有本宫缘簿及玉皇墨印为凭，若无此物，即系冒名题

[71] 林孝胜，〈典型华族庙宇玉皇殿〉，载《石叻古迹》，页117。

[72] 杜南发主编，《南海明珠天福宫》（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2010年），页397–398。

[73]（宋）张君房，《云笈七签》（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2221。

[74]《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238—239。

相关人物

张永福　朱子佩

历史事件

1 月

张永福创办《南洋总汇新报》，后由亲保皇派的朱子佩接手

3 月 31 日

电车初次试行

1840年4月20日从中国运来的妈祖神像，至今仍然保留在天福宫内

捐，祈勿提交，俟届醮期，尚乞诸君赴庙拈香以迓休祥而昭诚敬，特此预告。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新加坡玉皇宫住持黄庭光等拜启。”

提及该宫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三昼夜的道场是“延僧仗道”，既有僧人亦有道士。该宫主神“昊天大至尊”即是道教中玉皇大帝的称号“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的简称。玉皇殿无疑属于道教庙宇，但其法会僧道同时在场，从住持黄庭光的落款上也看不出是僧还是道。

以上资料可以推断，从新加坡开埠到20世纪初期，道士已经随着移民进入新加坡。早在1884年，新加坡就已经有了道坛的记载，而且不止一家。但是市区里那些知名的庙宇，几乎都是由僧人担任住持的。道士们在自己的家里立坛，为庙宇或信众做一些功德法事，在社会政治上几乎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因此关于他们的记录也乏善可陈。

乡村庙宇与道教

在帮权庙宇之外，新加坡还有另外一种庙宇，广布在乡村、丛林和甘榜地区。新加坡开埠后，中国的南部沿海居民大批来到新加坡成为底层劳工。他们有的在工厂和港口劳作，有的进入新加坡山芭、甘榜垦殖。这些村民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的需求。他们一般先是设一个小小的神龛，供奉家乡的神明。

如万山港福德祠，主祀土地公。万山港为地名，指的是加冷河流域两岸，尤其是下游地段。当年该地区工厂林立，工厂周围有许多以亚答及木板建成的工人宿舍[75]。根据该庙现存最早的碑刻、立于1901年的〈重迁福德庙碑记〉中说“新加坡万山港有福德祠，不知始之何时也。闻之同治初年，卜迁瓦缸窑，续迁椰水塘，而后至沙冈万山，而易名沙冈万山福德祠……”可知，该庙出现的年代约为清同治初年（1861-1874），至1901年已经历过三次搬迁。1900年，富商刘金榜将万山港地区名为“沙冈”的一块地皮以500元卖给万山港福德祠的两位信托人。次年，庙宇建成，万山港福德祠再次搬迁到“沙冈”，即现今庙址所在地[76]。根据新加坡乡村庙宇一般的发展轨迹，可以推测万山港福德祠在立庙之前，或许只是一个供奉“土地爷爷”的临时神龛，受到附近工人、苦力和村民们的虔诚信仰。因神明显灵，而有人出资建庙。

再如整合了12间小庙的淡滨尼联合宫。这12间庙宇原本都位于淡滨尼地区，最早一间出现于1851年。19世纪的淡滨尼到处是山芭和丛林，不但虎患肆虐，还有流行病，出现过“麻风芭”[77]。这些天灾人祸使得当时的人们对神明的依赖心更重。于是，出现了可驱逐虎患的洪仙大帝庙，驱赶时疫、麻风的福安殿，还有数间可保佑信徒避免车祸、出入平安的大伯公庙等等[78]。

凤山宫，前身为葱茅园九皇宫。“葱茅园”在巴耶利峇路（Paya Lebar Road）和机场路（Airport Road）的交界处，在殖民地时代，那里人烟稀少，村民以种植葱茅为生，因此得名。1906年，三位漳州籍人士从马来亚迁移到葱茅园，随身携带吉隆坡安邦九皇大帝的香火。他们在

[75]《投桃之报——万山港福德祠历史溯源》（新加坡：石叻学会，2008年），页10。

[76]《投桃之报——万山港福德祠历史溯源》，页18-21。

[77]〈淡滨尼古庙晋驻大庙〉，载《庙宇文化》第1本（新加坡：焦点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页38。

[78]《淡滨尼联合公晋宫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淡滨尼联合宫，2003年）。

典型的华人庙宇——玉皇殿

葱茅园搭建简陋茅屋栖身后，把九皇大帝的神像安在前厅，供村民膜拜。随着信徒的增加，1928年始建首座庙宇[79]。

这些庙宇散落在新加坡各个地方，每个年代都有新的庙宇出现。庙中所供奉的神明也非常多样化。数量最多的是大伯公，除了把大伯公当作主神来供奉，大部分的庙宇也会把大伯公和注生娘娘当作配祀供奉在主神两边。说明移民初到此地时，最渴望的就是能够在新的土地上平安生活，同时繁衍子嗣。另外，关帝、观音和妈祖也非常的普遍。此外，就是闽、粤移民从他们的家乡带来的各种地方性的神明信仰了，例如清水祖师、广泽尊王、保生大帝、玄天上帝、哪吒三太子、法主公、包公、三王府大人、九天玄女等等，还有一些甚至不知其来历、名称罕见的神明。一间庙里少则供奉三、四尊神，多则数百尊，令人眼花缭乱。这种现象是移民继承了闽粤两省的民间信仰习惯，如陈支平在《福建宗教史》中所说："福建民间社会的诸神崇拜是十分繁杂的，不仅奉祀之神为数众多，而且各地崇奉之神差别很大，一铺一境，一乡一村，奉祀之神都各不相同"[80]。

相对于商业区的帮权庙宇，这些乡村庙宇的功能比较单一，就是驱邪纳福、守护家园，同时慰藉思乡之情。这些乡村庙宇对于宗教的认同更加模糊，他们与神沟通的主要方式是"跳神"。"跳神"是指灵媒自称神灵附体，做出种种与常人不同的怪异行为，而替人驱邪、治病、问亡、判断吉凶、寻人、寻物等，又称降神，灵媒被称之为"乩童"。乩童有男有女，男称"跳童"，女称"仙姑"。明清以来中国福建省各地都有跳童活动，新加坡的大部分庙宇里至今仍保留着跳童的传统[81]。

另一种与神沟通的方式是"扶乩"，又称扶鸾、降卜等。即用桃木三叉，由左右扶乩者各执其一，待神降临后，用三叉的另一角在沙盘上写下文字，然后由一旁的执事读出沙盘上的字，记录下来，以为神示。"扶乩"活动需要有能读书识文的人参与，新加坡早期移民多为苦力，识字不多，他们所建立的庙宇比较少有"扶乩"活动。倒是一些组织较为严密的民间教团，如德教会、三一教等，"扶乩"活动仍然很频繁。

在新加坡建国之前，乡村庙宇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庙宇碑刻也非常有限。庙宇的历史大都是以口传的方式流传下来。当年，这些庙宇是否有道教活动已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当时普通百姓儒、释、道不分，但求"神明显

[79]〈葱茅园百年九皇爷庙〉，载《庙宇文化》第1本，页38。

[80]陈支平主编，《福建宗教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487。

[81]《福建宗教史》，页65。

相关人物

吴寿珍　陈云秋

历史事件

3月15日

中华商务总会成立，吴寿珍、陈云秋当选正副会长

灵、有求必应”来看，如果19世纪已经有道坛开始为市区的帮权庙宇主持斋醮法会，那么这些乡村庙宇也有可能邀请道士来主持庆典。

总之，新加坡开埠后，华人庙宇逐渐遍布全岛。其中最有社会影响力的是处于新加坡河两岸的繁荣商业区的帮权庙宇，这些庙宇大都延请僧人担任住持，但也有道士参与法会。其他数目众多的乡村小庙，供奉的都是与移民的生活最为密切，或者从家乡而来的最为亲切的神明。虽然他们不在乎释、道之别，只祈求灵验，但这些以多神信仰为特色的、具有浓烈地方性色彩的神庙，在新加坡建国后都逐渐归入了道教组织。

新加坡的道士与道坛

根据现有的资料，道士姓名和道坛名号有明确记录的，始于20世纪初。在这之前，根据上文所分析，新加坡肯定有道士，但是或许道坛没有延续，或许道士返回中国，又或者流动到其他地方，致使道坛名号没有流传下来。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新加坡在1920年代才开始有专业道士南来执法[82]。另外，笔者在1920年代的《南洋商报》上发现了几个类似道坛的坛号，如：如真坛[83]、天南坛[84]、显南坛[85]，但其实这些地方都是提供戒烟服务的，是否为道坛，尚不清楚。

20世纪的道教，充满着方言帮派的划分。但这种划分更多地是受到方言和风俗习惯的局限，而非政治意味的帮权较量。

新加坡的道士群体与方言群像对应，分为五大帮：闽、粤、潮、琼、客。潮州人的宗教活动由善堂的经师主理法事，因而没有道士[86]。新加坡本地也没有客家帮道士和道坛，如客家人需要做道场，则从马来亚柔佛州古来，延请客家道士。此外，客家人也会聘请斋姑诵经。所以，新加坡本土的道士群体有三大派：福建帮（闽）、广东帮（粤）、海南帮（琼）。而福建省因为各个地方的方言差异较大，因此福建帮属下根据祖籍地的不同又可以细分为：闽南帮、福州帮、兴化帮。

根据这三大帮派道士的口述，广东帮出现得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建帮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海南帮因为移民较晚，人数较少，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道坛。

福建帮道士划分为：闽南帮、福州帮和兴化帮。闽南帮，指的是用闽南方言诵经的泉州、漳州及永春的道士。这一派人数最多，目前也最为活跃。依据所诵经文，细分为“灵宝派”和“三元派”。灵宝派以泉州道士陈辉荣（高迨）（1900—1973）设立的“混元道坛”（1930年左右）和惠安籍张启珍“西龙道坛”（1930年左右）为代表；三元派以南安籍的林嘉禧和林本佬二位堂兄弟设立的“南山普济道坛”（约1930年代）为代表；此外还有安溪道士施玉泽的“广应道坛”（约1930年代）、安溪道士姚池南的“高济道坛”（年代不详）、金门人黄森树的“复灵道坛”、晋江籍张文埔创立的“兴玄道坛”等等。

福州帮，指福州十邑籍、以福州语诵经的道士，以陈明梅道士的“召元道坛”（1951年）为代表，目前约有10多位传人。

华人庙宇的迎神赛会活动

[82] 李焯然等编，《道教简述》（新加坡：道教总会，1994年）页61中说：“新加坡是在1920年代才开始有专业道士南来执法，主持超度亡魂、追荐功德之‘斋醮’及庆祝神诞的祈福‘清醮’等科礼仪斗事宜”。

[83]〈如真坛特刊启事〉，载《南洋商报》，1928年4月4日。

[84]〈星洲公立天南坛戒烟社建设募捐鸣谢暨第三届委员表〉，载《南洋商报》，1929年9月23日。

[85]〈显南坛在新世界举行十七周年纪念〉，载《南洋商报》，1932年8月26日。

[86] 彭松涛，〈道教传入新加坡概况〉，载《道讯》期4（1992年10月），页2。

兴化帮，包括莆田、仙游及福清三县，以兴化语诵经之道士。兴化帮是各帮道士中人数最少的道士群，据说仅有一位，名为余梦维。日治时期移居新加坡，设立“显济道坛”。

人数仅次于福建帮的是广东帮道士，指的是用广东方言诵经的道士，包括广州、惠州、肇州等三州府。但是有线索可循的道士记录，推迟到20世纪30年代。

早期代表人物为曹耀辉，冯梓成、冯衍德兄弟，何一鸣、何有祺兄弟。他们几乎是同一时期来到新加坡。曹耀辉道士在1930年代来到新加坡，设“太来曹道院”，并传授徒弟。道院后改称“太上老君庙”。他传子曹森华、曹灿华和其他徒弟[87]。

冯梓成和冯衍德兄弟。冯衍德传徒弟冯九、冯安及陈荣基。冯安传徒弟黎童贤。

何一鸣和何有祺兄弟，祖籍广东番禺大岗。他们初到新加坡时，由于法事不多，因此经营粤剧大戏演出。后来才执行道教法事。何一鸣传子何瑞华，设“玄明道院”。何有祺传子何育祥，设“法昌何道院”。何育祥设立的“法昌何道院”影响较大。

海南帮，也称琼州帮，指的是用海南方言诵经的道士。海南帮道士因两地移民南来的时间相对晚许多，人口也较少，因此迟至1950年代才出现。

原籍海南岛嘉积县（今琼海市）的王经初、王经师两兄弟是海南道坛的奠基人。他们于1941年来到新加坡谋生。1950年代，王氏兄弟开设“灵宝皇坛”。此后新加坡的海南帮道士都以“灵宝皇坛”为坛号，一直延续至今。

道教活动与道教组织

新加坡最早的道教组织是1979年成立的“三清道教会”。在“三清道教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成立了“新加坡道教总会”、“新加坡道教协会”。这些组织机构的成立，使得新加坡的道教活动有了正式的记录。在这过程中，道教也成为受国家承认的十大宗教之一，在国家级的宗教活动上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

三清道教会

新加坡的道士，因为方言的隔阂，一直以来都是各自为政、互不往来。即使同一方言群的道士，因为生意上的冲突，也往往不太和睦。混元道坛的陈国显在接手父亲陈辉荣的道业后，感到道教前途堪忧，遂产生联合其他道士和道坛的念头。于是他与大师兄林忠铭商量，希望能够利用父亲陈辉荣已经奠定下的威望，将道士们团结起来。陈国显与林忠铭首先开始联络闽南帮的道长们。闽南帮道士们一拍即合，于1974年10月6日非正式地成立了一个“庆祝道祖圣诞同盟”，参与的道士主要有林忠铭、黄森树、张清湖、张再金等。

该同盟定于每年农历二月十五，由参与的道坛轮流举办一场庆祝道祖太上老君的庆典。庆典日，白天间举行祝寿法事，并聘请傀儡戏班酬神；夜间宴请各界人士，同时邀请布袋木偶戏班、杂技醒狮团以及南音团表演助兴。1975年，第一届“庆祝道祖圣诞”的活动首先就在陈国显的“混元道坛”举行了。

之后，陈国显又进一步游说广东帮与海南帮的道士参与。1978年，广东帮道士加入该同盟；翌年，海南帮道士也加入。三帮道士汇合之后，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正式的社团组织。1979年12月7日，经由新加坡社团注册官批准，新加坡第一个道士团体，而且是首个由闽、粤、琼三帮道士联合组成的道教团体——三清道教会，正式注册成立。这成为新加坡道教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

三清道教会正式成立后，除了延续每年农历二月十五庆祝道祖圣诞的活动外，还积极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道教界联系。1985

[87]《道教传入新加坡概况》，页2。

陈氏宗祠保赤宫旧影

年，三清道教会在劳动公园举行盛大的“全国水陆空超度大法会”，吸引近万人前往参拜。此外，该会还在陈国显等带领下成立诵经班，招收了三十多位学员，以闽南语教授学员诵经。后来，政府发起讲华语运动，以闽南语诵经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陈国显就与中国道教协会联络，邀请北京白云观监院黄信阳道长前来教授华语普通话诵经。之后，北京白云观陆续有多位道长受邀莅新弘道。

1994年，三清道教会为庆祝成立15周年出版了纪念特刊。1995年，该会假黄金广场主办“新加坡道教——现在与未来”研讨会，反应热烈。

1999年7月3日至5日，三清道教会在新加坡虎豹别墅万仙台，举办了为期三天的“99道教宣弘大会暨新加坡三清道教会成立二十周年庆典”，香港蓬瀛仙馆受邀协办。中国道协副会长张继禹、任法融，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李养正、福建省道协会长林舟和来自香港、台湾地区及海外的道教人士应邀参加了此次庆典。庆典活动包括“祈祷二十一世纪世界和平大法会”、“道教文化展”、“道教家庭日园游会”，道教论坛、《道德经》书法赛等活动。

2004年新加坡三清道教会举办了“25周年庆典”并出版了纪念特刊。

新加坡道教总会（创立初期）

1988年，新加坡政府开展了一次宗教调查并公布了宗教调查报告。该次调查显示，新加坡道教徒所占比例从1980年的29.3%下降到了1988年的13.4%[88]。这次调查报告的出炉，给新加坡的道士们敲响了警钟。

在道教信仰认同式微的情况下，陈国显等人意识到，道士的人数非常有限，要想扩大道教徒的数量，必须把众多的华人民间庙宇联合起来。而且这些民间庙宇本身就与多神信仰的道教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只有利用庙宇和信徒的共同力量，道教才能够在日渐西化的新加坡保存香火。

1988年，三清道教会的陈国显、忠义庙的李金池、通淮庙苏建成联合发起会议，广邀各道教宫庙团体的负责人，在大巴窑幸福酒楼召开座谈会议，商讨如何应对道教徒流失的问题。席间大家一致同意筹组道教总机构，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

总机构定名为“新加坡道教总会”。1989年6月筹委会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1990年2月申请得到批准。同年3月11日，“新加坡道教总会”在裕廊东通淮庙的临时会所宣布正式成立。当时共有27个庙宇和道教组织加入团体会员。

道教总会的宗旨是：（一）促进、加强及鼓励新加坡各道教团体和道教信仰者，彼此间建立更好与更密切的关系，协调、合作及了解；（二）促进、主办或资助教育文化，社会及其他活动，以提高公众人士对道教的认识；（三）提倡、资助或从事有关道教文化及传统的研究；（四）在公共与民间方面促进本会与其他组织间的关系、了解及合作；（五）主办、参与或协助社区与福利服务；（六）从事一切其他符合或利于促进上述宗旨，或其中一项宗旨的活动[89]。

首任主席由三清道教会的陈国显担任，忠义庙代表李金池担任秘书长，通淮庙代表苏建成担任财政。此后，道教总会开始了一系列宣传道教文化、弘扬道教传统、增强道教组织凝聚力的活动。

道教总会成立后，积极建立与中国的联系。1990年8月便组团参加福建泉州“老子研讨会”，还参观访问了北京白云观、山西太原关圣帝君古庙、湖北武当山金顶紫霄宫。10月，陈国显又率团参加了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的开光大典。

为了进一步吸收会员、扩大影响力、提升道教形象等，道教总会决定邀请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参与，积极举办

[88] Eddie C.Y.Kuo, John S.T.Quah, *Religion in Singapore: Report of a National Survey,*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1988), p5.

[89]《新加坡道教总会章程》，页1-2。

讲座、展览、法会等一系列活动。从1989年11月开始，道教总会每月举办一次巡回礼斗及科范法会，在各间庙宇轮流举行。1990年，在福建会馆大厦举办画展。1991年6月，在百乐大酒店主办“道教与传统文化研讨会”。1992年，道教总会首次举办“传度大典”，吸引96位道教徒参与。

道教总会延续了三清道教会开办“诵经班”的传统。1992年7月，在女皇镇忠义庙及裕廊总宫的琼瑶教邸相继成立道教诵经班，聘请北京白云观监院黄信阳道长及陈信一道长授课。

1993年5月3日至7日，道教总会在西部的庙宇大士伯公宫草场举办连续五昼夜的“护国祈安大清醮暨超度法会”[90]。法会得到了中国道教协会、北京白云观和台湾中华道教总会的支持。

1994年和1995年，道教总会联系海内外道教机构和学术团体举办道教文化月，广邀海外知名的道教界人士主持讲座、研讨会，道教文物展，以及大法会等等。

道教总会成立后的这五年时间（1990-1995），通过一系列活动推广道教，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道教在民间庙宇中的影响力得到扩大，不少原本佛道不分的庙宇开始有了明确的道教认同。

新加坡道教协会

“新加坡道教协会”注册成立于1996年2月16日，会长由李至旺担任至今。其创会宗旨为：（一）弘扬道教教义与道教精神；（二）研究与发展道教文化与传统；（三）联络新加坡道教徒的感情关系；（四）促进公益事业与社会福利工作[91]。

新加坡道教协会成立后，立即联合香港、台湾的道教组织，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日共同举办“新加坡道教节”。1996年3月15日，《新加坡道教节宣言》出炉，表明他们推广道教的志向：“我们有必要秉承先人的大志，致力发扬中华精粹，使优良的传统不致于流逝，并推广至各个角落，让更广泛的群众了解道教，认识道教，同时在道祖的圣诞日，连同海外各地如台湾，香港等，共同宣布农历二月十五日为道教节。祈使中华文化永远光芒四射，光辉灿烂，更祝愿道气长存。”

“新加坡道教节”连续举办13年后，李至旺开始联合台湾、印尼、马来西亚和意大利的道教团体与道士，举办跨国的世界道教庆典。2009年，第一届“道教节世界庆典”由新加坡道教协会和印尼三宝垄泽海庙共同举行。

2010年，“道教节世界庆典”由新加坡道教协会、印尼三宝垄泽海庙、马来西亚沙巴州道教联合总会，三地的道教团体共同举办。2011年，除了以上三个团体，还有意大利道教协会也加入了“道教节世界庆典”。2012年的道教节在台湾开幕，代表们也去了中国安徽省涡阳县（老子故里）朝圣，闭幕式在意大利举行。2013年，道教节开幕式由马来西亚沙巴州道教联合总会承办，朝圣大典在中国河南涡阳天静宫和河南鹿邑太清宫举行，闭幕式则由台湾高雄道德院举办。

新加坡道教协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地争取在新加坡设立“道教节”为合法公共假期。就像他们在“道教节世界庆典”的“宗旨”里的内容：（一）团结全世界道教徒认同“道教节”，于二月十五“道教节”大日子共同欢庆道祖太上老君（老子）圣诞；（二）鼓励全世界道教徒定期于每年二月十五齐聚道教圣地或老子故里“朝圣”；（三）把道祖老子《道德经》教诲传播至全世界，教化众生，德化万物；（四）弘扬道教至全世界，争取“道教节”有朝一日被公认成为法定假日。

但是，新加坡的道教徒人数持续下降，华

[90]《护国祈安大清醮暨超度法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道教总会，1993年），页23。

[91] 新加坡道教协会网站http://www.taoism.org.sg。

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道教徒人数不足十分之一。这样的现实情况使得争取“道教节”为法定公共假期的努力倍显艰难。

新加坡道教总会（新的发展）

1996年至2002年，与道教协会的活跃度相比，道教总会活动相对沉寂。2002年，在道教总会的第七届理事会选举中，韭菜芭城隍庙总务暨三清宫董事主席陈添来获选为新一任会长。他和新的理事团队开始了重振道教总会的努力[92]。

新一届理事会从教内与教外两个方面，推动道教的复兴。教内，积极争取更多庙宇加入会员，增强会员之间的凝聚力，并在政府与宫庙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将政府政策和宫庙意见上传下达；同时也努力推动道教文化，宣传健康向上的宗教信仰。教外，与其他宗教建立良好关系，加入宗教联谊会，响应国家的宗教和谐政策，为世界和平和宗教和谐广作宣传。

◆ 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2002年又发生印尼峇厘岛爆炸事件，一系列的世界性恐怖事件让新加坡社会对世界和平充满期待。从2002年开始，新加坡道教总会每年举办“世界和平祈祷大会”，广邀其他宗教团体共同协办，期望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唤回世界的和平与安定。

2010年第七届“世界和平祈祷大会”于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上举行。同年12月3日新加坡道教总会在博览中心举办了“新加坡道教总会20周年庆典暨多元宗教及多元种族联欢晚会”。会上的特别嘉宾包括多名部长及国会议员，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则以大会贵宾的身份莅临现场并发表演说。大约2500位海内外人士人出席了这场盛事。这次活动详情收录在2011年出版的《勤而行道二十载——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中。

◆ 出版《狮城道教》季刊

至2005年3月，新加坡道教总会属下的庙宇会员也增加到了54个。为了加强对道教正信的宣传，使会员和信徒对道教有深入的认识，从2005年开始，新加坡道教总会开始出版会刊《狮城道教》。每三月一期，及时报告道教总会及其属下会员的动态，并刊登道教历史、哲学、科仪之类的文章。《狮城道教》是新加坡至今为止唯一一本道教刊物，在弘扬道教文化方面发挥了持续的影响力。

◆ 成立道教青年团

2006年道教总会青年团宣告成立，宗旨为“弘扬道教文化，定期组织活动，培养人才及领袖，推广宗教和谐，为社会作出贡献”。青年团成立后，积极参与各项宗教活动，如由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和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主办的“2007新加坡宗教和谐青年论坛”；“2008新加坡青年论坛”；由东南社区发展理事会于2009年2月8日在锡克教中心主办“多元宗教青年对话会”；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与四美工艺教育学院于2009年5月23日举办“和谐社会游戏运动会2009”等。在一系列活动的号召下，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人数不断增加，到2012年已超过百人。

◆ 主办传度大典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新加坡的道士都去台湾参加授箓和传度，或者邀请台湾的天师到新加坡主持授箓仪式。1991年，自中国江西省龙虎山嗣汉天师府恢复对海外弟子授箓以来，新加坡道教总会多次组团前往龙虎山参加传度及授箓大典。有感于参加传度和授箓的本地道教徒与日俱增，而一些年长道教徒无法做长途旅行，自2010年开始，新加坡道教总会邀请龙虎山道教协会，在新加坡举办传度大典。2010年4月，新加坡首届“传度大典”吸引了153名传度生参加。

成立新加坡道教学院

新加坡道教总会在1990年成立之初，便有了开设道教学院的想法；新加坡道教协会也一直把开办道教学院当做自己的目标之一。直到2007年年底，新加坡道教总会在财力和人力条件都足够成熟之后，方才注册了“新加坡道教学院”。

新加坡道教学院附设于三清宫，经费也主要由三清宫赞助。学院内设有道教图书馆。2008年12月，“新加坡道教学院”与“三清道教图书馆”同步开幕。新加坡道教学院成立后，开设有短期课程、一年制道教课程、专题课程

[92] 新加坡道教总会最近10年的资料，由道教总会会议记录（2002–2013）、《狮城道教》（2005–2013）、《联合早报》和《新明日报》相关报道，以及道教总会理事和秘书的口述历史，综合而成。

和文化讲座。课程目标受众是对道教感兴趣的社会人士，不分年龄和学历背景都可以报名上课。从2009年到2012年，道教学院大量邀请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的知名学者前来授课，在新加坡乃至海外道教界都受到广泛的瞩目。但是，新加坡道教学院缺乏系统的人才培养计划，仍停留在兴趣班的层面，能否肩负起培养道教人才的使命，仍是未知数。

道教总会的成就与困境

从2002到2012年的10年间，道教总会的会员人数成倍增加，目前共有500百多个宫庙会员。根据2000年的人口调查报告，道教徒的总人数也略有回升，这对于道教界人士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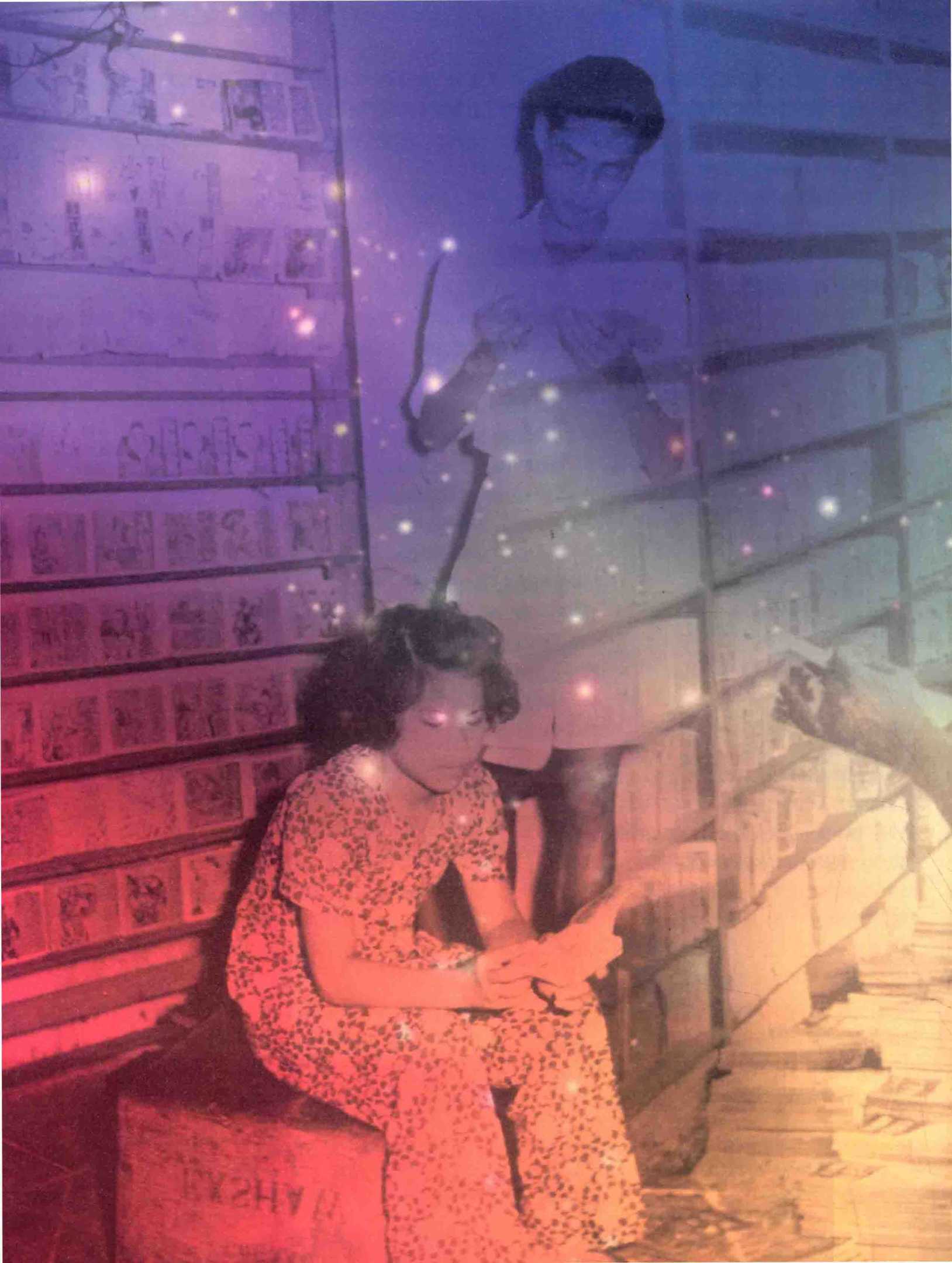
虽然道教总会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在这10年的发展历程中，道教总会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难题。例如，该如何处理道教与民间信仰和乩童的关系问题，道教传承方式与现代生活接轨的问题，人才培养的问题，领导人的接班和选拔问题，增加凝聚力和认同感的问题等等。

回顾新加坡开埠以来的宗教史，道教是衰落最快的宗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道教从华人的主流信仰退化为边缘性宗教。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宗教”本身有了不同的认识：儒家退出了宗教的舞台，佛教和道教努力从“民间信仰”的混沌中跳脱出来，恢复制度化宗教的本来面目。而在建立自我认同的道路上，佛教显示出了强健的竞争力，而道教的自我觉醒远远落后于佛教，导致了信众的迅速流失。

另一方面，新加坡以英文为主流语言，使得华人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道教所遭遇的冲击也最为强烈。而佛教因为早已是世界性宗教，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得以迅速应变，避免了巨大的损失。

此外，佛道二教面对教育的态度，也是造成今日繁荣与困顿之别的另一主导因素。佛教历来重视人才的培养，僧人中高学历者比比皆是；反观新加坡道教，道士们仍在延续家族、师徒相传的传统，普遍学历不高，道士们把开坛做法当作一种职业而非信仰，缺乏使命感和人文关怀。即使道教总会开办了道教学院，但缺乏培养人才的长期规划，能否承担起宗教教育的使命，尚有待观察。

儒、释、道三教伴随华人移民的到来而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主流信仰。这三者从最初的交织混杂，发展到今日的各自独立、界限明确，但其彼此依存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实质并未改变。如果说新加坡的儒家文化和孔教的兴衰沉浮，与政治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无法跳出时代的宿命，那么，在宗教自由的新加坡，佛教和道教的命运则更多的与华人文化的兴衰、宗教觉醒度，以及宗教人员本身的素养息息相关。



第八章

出版物与文学
Prints and Literature

第一节 华风远被
——开埠以来的华文出版业

摘要

新加坡华文出版业的发展与演变，与华文在新加坡的地位和应用、教育和语文政策、政治环境、人口改变、阅读风气等外在的因素息息相关。本节将分期阐述新加坡从1819年开埠至今的华文出版业的兴衰转折。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Singapore is closely linked to Chinese language's position, application, education, government's language policies, political environment, population change as well as the reading habits in Singapore. This Section will trac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Singapore since 1819,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publishers and publications at each stage.

李金生（Lee Ching Seng）

本节内容主要回顾华文印刷出版事业在过去146年来的迂回发展，以及各个发展阶段的成果和特色，俾使读者了解新加坡华文出版业的衍变过程。首先简单叙述战前华文书刊出版业的演进情况，可分为两个时段，即19世纪上下半叶。

19世纪华文书刊出版业的演进（1825–1900）

19世纪上半叶：宣教书刊时代（1825–1842）

新加坡印刷出版事业，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英国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这个新殖民地设立的印务局。1822年，即新加坡开埠的第三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为了向这个殖民地的各族居民宣教，乃设立印务局，就地出版各种语文（如中、英、巫、暹、日、爪哇文）等宣教刊物。最早的出版物是一本英文辞典，《英巫文词汇》（*A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and Malayan Languages*），出版于1827年。现存的最早华文出版物，则是一本题名为《训女三字经》的宣教小册子，出版于1832年，目前收藏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1]。

在中国境内出版第一份现代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美国基督教会（美部会），也在1834年从中国转移到新加坡并设立坚夏书院，就地印刷中文《圣经》和宗教性书刊，以及关于世界史地、西方科学与文明的知识性书刊，向中国和新加坡的华人宣教，直到1842年[2]。

从1832年至1842年这10年间，外籍传教士在新加坡通过坚夏书院和新加坡书院的名义总共出版了114种中文宣教及一些知识性书刊，数量约达百万册，实在惊人。这些书刊大多数运往中国分发，一部分在新加坡分发给当地华人。可以说，这10年是19世纪新加坡中文出版业的最蓬勃时代，也是新加坡作为华文出版书刊重镇的第一个黄金10年。

19世纪下半叶：华文报章的滥觞（1860–1899）

由华籍商人创办和经营的印务局则迟至1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1877年，由林衡南撰写、古友轩出版的《华夷新语》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新加坡华文辞典[3]。四年后，由海峡华人薛有礼创办的《叻报》（1881-1932）也创刊了[4]。其后，《星报》（1890-1899）、《天南新报》（1898-1905）、《日新报》（1899-1901）相继出版，形成一种新的出版风气，新加坡华文出版界跨入从宣教刊物转型到出版报章（日报）的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报章的流通面较书刊广、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较大，特别是《叻报》这份由华人创办的新加坡第一份日报，刊期从1881年到1932年，长达52年之久；它的流通面不但遍及马来亚的主要城市，并且还延伸到南洋其他地区的主要城市[5]。它对新加坡华文出版业的影响不可忽视。1930年代兴起的华文小报和书刊出版以及它所呈现的繁荣景象，与这时期华文日报的兴盛，也有直接的关系。

古友轩是当时新加坡赫赫有名的印务馆，除了印刷出版华文报章和书刊外，也承印英文书刊[6]；叻报馆也承接其他印刷业务，由此可见早年印务馆与书刊出版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认为，19世纪下半叶是印务馆出版书刊的时代。这种趋势开创了20世纪新加坡华文出版业的一种特点，许多机构、民间团体、书局或个人的出版活动，是交给印务馆负责印刷或者甚至交给印务馆发行的。

20世纪初至建国前夕（1900–1965）

20世纪初至战前：政治报章、小报杂志、南洋教科书相继登场（1900–1941）

跨入20世纪，华文报章继续领先其他类型的出版物。几份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报章，先后推出。率先创办的是与新加坡保皇派报业先驱《天南新报》与革命派先锋《图南日报》（1904-1905）；继而又有《南洋总汇报》（1906

[1] 庄钦永，〈《训女三字经》—现存最早的一本新加坡华文刊物〉，载庄钦永著，《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页78。

[2] 庄钦永，《神州域外西潮暗流：十九世纪上半叶马六甲、新加坡中文出版初探》（新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6年），页24。

[3] 庄钦永，〈古友轩二三事〉，载《新加坡华人史论丛》，页105。

[4] 陈蒙鹤著，胡兴荣译，《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年），页25。

[5] 《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页30。

[6] 《神州域外西潮暗流：十九世纪上半叶马六甲、新加坡中文出版初探》，页105–106。

《新加坡画报》（1929年）

《新加坡画报》（奉安专号）（1929年）

创刊）、《中兴日报》（1907年创刊）。创办这些报章的人及其支持者，不是保皇会的成员如邱菽园、黄乃裳、林文庆等，就是革命党人或具有前卫思想者，如张永福、陈楚楠等。他们出版报章，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扬政治主张和争取支持者。新加坡的《天南新报》、《南洋总汇报》和槟城的《槟城新报》等报章，大力支持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改良主义，主张君主立宪制度，以维护满清政府的统治，以为中国带来民族复兴；而聚集在《图南日报》旗帜下的革命派人士则具有反清立场，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期盼推翻满清的统治，建立共和国[7]。

从商业利益出发的华文报是较后创办的《南洋商报》（1923年创办）和《星洲日报》（1929年创办），这两份日报后来发展成新加坡最具影响力的华文日报，两报在1983年合并，组成今天的《联合早报》。两大报也分别于1948年与1952年开始出版一系列《南洋商报丛书》及《星洲日报丛书》。

华文小报与杂志的出版，则是从1925年开始。当年问世的《消闲钟》被誉为开启新加坡小报的先河。嗣后五年间，小报与杂志的出版，如雨后春笋，蔚为大观。据崔贵强的估计，介于1925年与1929年间，小报与杂志的出版数达50余种；而在1930年后至1941年，除了开始时的短暂时期萎缩外，后来更有上升的趋势，呈现一片蓬勃繁荣的景像[8]。

这期间小报和杂志的繁荣，与其时代背景关系密切。首先，因为受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海外华人对新文化书刊杂志的阅读，有殷切的需求，带来了商机。1925年后的数年间，锡价与橡胶的价格高居不下，新马经济繁荣，民生富裕，商人便出钱办起报刊来；1930年至1934年办报者和读报者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小报和杂志的出版暂时萎缩了几年；1934年后新马经济复苏，再次有利于报刊的出版。其次，自1937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政局成为新马华人的聚焦点，纷纷创办小报发表抗日言论，支持中国的抗战、

[7] 《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页74。

[8] 崔贵强，〈新加坡的华文小报与杂志〉，载《源远流长：上海书局70周年纪念刊》（新加坡：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1995年），页63。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2月5日

维多利亚剧院落成

9月30日

教育局成立

痛贬时政、激励日渐散涣的民心[9]。

在新式学堂出现以前，新加坡的私塾或学堂采用的教科书主要是《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启蒙读本。如前所述，1832年新加坡女子学堂负责人马典娘娘（Sophia Martin，约1819-?）撰写的《训女三字经》，是目前已知在新加坡出版的最早的华文教科书；而邱菽园的《新出千字文》则是出自新加坡华人编著的第一本教科书。其他的启蒙读本，大都是从上海或香港输入。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出现后至1931年的东南亚各地的华校所采用的教科书，也几乎全是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这个由中国教科书垄断的局面直至1930年代，由本地华商创办的世界书局、南洋书局，出版了一系列本土化教科书之后，才能得以突破。

1931年，世界书局开始发行其兄弟公司众兴出版社所出版的“南洋教科书”，即“众兴版”教科书。1938年12月，世界书局又通过子公司众兴出版社出版一套《最新修订课程标准南洋教科书》。南洋书局则在1941年出版《南洋常识教科书》。这些本土化教科书不仅由本地学校采用，它们也在东南亚其他城市的学校广受欢迎。

战后至建国前夕：教科书的马来亚化及小型出版社的涌现（1945–196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华文出版业从日治时期的冬眠状态迅速复苏，并从1950年开始稳健地快速发展，至建国前夕已成功跃升为东南亚的华文出版重镇[10]。

二战后的20年间（1946-1965），正是新加坡政治与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大时代。新加坡华人的政治意识产生很大的变化，华人正从“侨民意识”逐渐转化为“马来亚意识”，或者说是从“中国”认同逐渐转向“本地化”或“马来亚化”认同。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自然会在华文出版业有所反应，最大的特点就是教科书的马来亚化，以及小型出版社的涌现[11]。

教科书的马来亚化

所谓“教科书马来亚化”，是指英殖民地与过渡的自治政府为了控制新马方言学校（主要是华校）的发展、推广英文教育而建立的一个新教育制度。其手段是通过改编华校教科书，削弱或删除战前教科书的中国意识教材，引进偏重本土文化色彩的内容，培养学生效忠居留地的情操。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实质，就是政府主导教科书的内容，由政府设立的教科书委员会制定各科课程标准，监控教科书的编纂、审定、出版和采用。1956年12月，新马各自改组华校之教科书委员会，于是新加坡委员会继续负责修订华校小学各科之课程标准，并把课程的修订由小学提升到中学，至于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与发行则让民间出版公司自由竞争，由各间学校自由选用[12]。

新加坡在战前颇有规模的中文书店约有22家，但有能力发展出版业的也只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上海书局与南洋书局5家，称为“新加坡五大书局”。1957年12月由中华和商务联合作为一个单位，世界书局和联营出版社作为一个单位，南洋书局和上海书局各自作为一个单位，四方合作成立“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收购四家教科书的版权，集中华校小学教科书在新马婆地区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教科书的马来亚化大致完成。

小型出版社的涌现

二战前的新加坡华文图书市场主要是由价廉物美的中国图书所垄断。二战后，由于中国政治情势变化，图书的出口受到影响，加上英国殖民地政府在1958年宣布禁止中国53家（包括香港3家）出版社的图书进口，造成新加坡华文图书市场出现“真空”状态，这给新加坡的华文出版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为了解决图书供应这个问题，上海书局和世界书局在香港设立出版社，一方面安排与大陆签署版权转让协议，以便在香港翻印各种在新马销售的中国版图书，另一方面也在香港组织作者和编者，编写和出版各种新书，供新马和南洋各地销售[13]。

---

[9]《源远流长：上海书局70周年纪念刊》，页64。

[10] 林恩河，〈新加坡华文出版的峥嵘岁月：1945–1965新加坡华文出版的观察〉，载《亚洲文化》期38（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14年），页108。

[11]〈新加坡华文出版的峥嵘岁月：1945–1965新加坡华文出版的观察〉，页111。

[12] 崔贵强，〈从中国化走向马来亚化—新加坡华文教科书的嬗变（1946–1965）〉，载叶钟铃、黄佟保合编，《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页70。

[13] 陈蒙志，〈上海书局历史中的时代印记〉，载《学文2：上海书局历史中的时代印记》（吉隆坡，2012年），页68–69。

世界书局出版的“华侨人物志丛书”之《南洋第一报人》（柯木林藏）

除上述的世界书局、上海书局和南洋书局着力于华文书刊出版外，以出版日报为主要业务的南洋商报社、星洲日报社、南方晚报社，以及新创立的青年书局也先后加入出版图书的行列，形成这个时期华文图书出版界的主力。除此之外，也涌现许多以出版文艺书刊为主的小型出版社。根据统计，独立前出版单行本的出版机构，共有四海书局、星洲书屋、狮岛书报社、文艺出版社、南国出版社、马来亚理想文化社、巨轮文化社、马来亚文化服务社等117个单位。众多小型出版社的涌现，进一步繁荣了这个时期的华文出版业[14]。

建国50年：华文书刊出版业的危机与转机（1965–2015）

新加坡华文出版业在建国后的发展与演变，与华文在新加坡的地位和应用、教育和语文政策、政治环境、人口改变、阅读风气等外在的因素关系密切。

建国初期、华文出版业多彩缤纷（1965–1979）

1965年共和国成立时，华校学生已经锐减至17万人；所幸的是，华文在新加坡的发展经过19世纪第一代移民创办的私塾教育时期，和20世纪现代学校教育时期后，接受华文教育的第二代华人数量非常庞大，基础深厚。华文在建国初期在社会层面的应用广泛，具有一定的经济和政治价值，因而在这时期华文书刊出版的数量尚能保持稳定，一些非盈利性质的官方机构、民间团体、学术和商业机构的出版活动频仍，也为华文书刊出版业增添多姿多彩的元素。

此外，在华校中，除了英文（第二语文）之外，其他科目主要还多采用华文课本（只有数学、科学及工艺科，有些学校采用英文课本），华文课本的市场还是相当大的。因此，教科书出版商如新加坡教育供应社、世界书局、上海书局、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教育出版社等，大都能聘请专家增修原版课本，减少课文中的中国色彩，加强对独立国的认同。1969年5月15日，教育出版社的《展望》杂志创刊，积极推广青年阅读和推动青年学生创作，贡献不小。此后，政府实施强制学习第二语文的政策、推行华文简体字以及社会环境的急速改变，促使政府修订或重新颁布学校课程，这种种因素促成1970年代华文教科书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15]。

经济转型期、华文书刊出版业开始萎缩（1980年代）

到了1980年代，新加坡社会进入转型的时代，各方面都在蜕变：在教育上，传统的华文源流学校走进了历史，只保留了九间特选学校；在经济上，1970年代精心策划出来的重工业和加工业，已经不合时宜，成本的递增，密集的劳动力，必须寻求新的出路；整个社会

[14] 同注10。

[15] 陈田启，〈课本〉，载魏维贤编，《新加坡华文书刊，1965–1990》（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1990年），页27–28。

相关人物

王绍经

历史事件

4 月 24 日

琼侨领袖王绍经等创办的育英学校成立

在朝向城市化、商业化、科技化的道路转型。华文书刊的出版，开始承受巨大压力，作为华文出版业主流的文艺书刊，出版量比之前显著减少许多[16]。

政府在解决了国家的政经建设等重大建国任务之后，开始集中精力于教育建设。在课程方面，随着新教育体系的实施，课程纲要全部重新制定，课本也重新编纂。在这项重大改革中，负起重任的是教育部所成立的“新加坡课程发展署”。这是因为从1980年开始实施的新教育体系，不仅需要革新教学内容，也采用新教学方法，要求课本编纂者必需掌握种种新的教学技术，设计教材与教学法，并且在学校进行新教材教学试验，收集教师与学生的意见，经过分析、研究，再修订试用教材、定稿；不仅如此，在推行新教材及教学法时，还必须负责教师的培训工作。这许多专业任务，并不是一般商业性出版商所能胜任的。因此，一般出版商不得不从主动转为被动，放弃编纂教科书的任务，转而争取和教育部课程发展署合作，通过投标方式以取得该署所编纂的课本的出版和发行权[17]。

经济巩固期、华文和华文出版业出现新机遇（1990年代）

1990年代，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已从转型期进入巩固期，开始向外扩张，强调环球化经营网络。政联公司表现优越，在新加坡境内和境外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国人的收入增加了，开始注重生活素质，注意力也从精神的追求转移到物质方面，文艺创作进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接班人出现断层断代的现象。华文书籍的销路每况愈下，出版业陷入重重的危机之中。很多小型的文艺团体纷纷解散，如海洋文艺社、春雷文艺研究社、生活剧社等，文艺书刊的出版进一步萎缩[18]。

与此同时，作为华文输出国的中国，在经过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外交开放后，经济不断发展，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也不断加强加深，对亚洲和东南亚格局无不产生巨大的影响，华文再度受到东南亚各国重视。除了一向保留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马来西亚外，其他如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寮国、泰国这些原本是新加坡华文出版发行腹地的国家，也纷纷恢复华文的教学。曾经是海外华文的重要基地和出版重镇的新加坡，在出身华文教育源流国民的积极推动以及中国新移民的推波助澜之下，华文出版业最终冲出阴霾，重见曙光，表现出在危机中见到转机的新契机。

21世纪初期：华文与华文出版业双双走出谷底（2000–2015）

进入21世纪，新加坡的经济建设开始向知识经济模式转型。亚洲金融风暴平息后，政府表明要搭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顺风车，并宣布要将新加坡建设成文艺复兴城市。在教育体制及其他领域的改革中渐渐强调“创意”的重要性，在本地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华文和华文文学艺术，开始出现回升的现实需要。

在大环境变化的带动下，向来处于自生自灭处境的本地华文文学开始进入了公共领域“扶弱助贫”的名单上。新加坡艺术发展理事会继续主办新加坡金笔奖文学创作比赛和作家节活动等工作，同时也赞助华文文艺团体的活动和本地书刊的出版。国家图书馆设立了专门单位，举办新加坡阅读月、文化讲座、协调读书会活动、从事书刊与文学资料的整理保存出版等。全国书籍发展理事会亦从艺理会得到拨款，以“新加坡文学奖”的名义，恢复了一度停止的“全国书籍奖”评奖[19]。

在民间，本地华文文学书籍的出版，似乎也呈现相应的活跃气氛。一些本地文学作者将自己的作品结集自费出版。若干小型的出版社如草根书室、玲子传媒、创意圈工作室、新华文化事业、风云出版社、华艺出版社等，继续投入华文书刊的出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度曾在华文书刊出版业引领风骚的青年书局，在沉寂了30年后重新出发，动用大笔基金，一方面重印旧书，一方面推出几个新系列丛书的出版，一时传为佳话。由前著名作家兼出版人潘醒农的哲嗣潘国驹博士主持的八方文化企业，也较频繁地介入华文书刊出版，交出亮丽的成绩。

建国前后出现的民间团体，如南洋学会、新加坡亚洲

[16] 怀鹰，〈80、90年代的新加坡华文文学风貌〉，载《新加坡华文文学编年书目（1965–2009）》（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1年），页54。

[17] 《新加坡华文书刊，1965–1990》，页29。

[18] 《新加坡华文文学编年书目（1965–2009）》，页61。

[19] 林康，〈新加坡华文文学新世纪十年印象〉，载《新加坡华文文学编年书目（1965–2009）》，页67。

研究学会、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五月诗社、锡山文艺中心、宗乡会馆、联络所等在2000年后继续热衷于华文书刊的出版活动；不但如此，在新旧世纪交接前后，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艺术团体，例如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世华文学研创会、新加坡书写文学协会等，容纳了部分在原属社团解散后长时间不结社、或者从来不曾参加过什么文学团体的长期处于“边缘”的写作人和新移民作者；如异质诗社，容纳了新生代写作人；又如随笔南洋网，主要集中了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也容纳了在网上写作的本地写作人[20]。这些新旧团体在21世纪前15年间，出版数量不少的华文书刊，成为新加坡华文书刊出版的中流砥柱之一环。

更令人振奋的是，由新加坡20个主要华文出版社组成的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终于在2005年2月2日成立。这是新加坡华文专业出版界的里程碑。在此之前，本地的华文出版社不是在做个别努力，就是在印刷业者及书店文具业者组成的书业文具商公会的旗帜下运作，无法突显出出版机构的专业性。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的成立，标帜了新加坡华文出版机构专业性质的开端。

2006年，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的成员增至24个出版社。这24个出版社，除了商务印书馆（新）有限公司、中图（新加坡）上海书局有限公司、大众书局、友联书局私人有限公司、青年书局是独立前创立的书局兼出版机构外，其余的19个出版社都是在建国之后成立的，它们包括新加坡艺术出版社、亚太图书有限公司、创意圈出版社、儿童教材私人有限公司、创意出版私人有限公司、爱的伯乐语言教育推广私人有限公司、赤道风出版社、八方文化创作室、智力出版社、怡学出版有限公司、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友谊企业有限公司、泛亚出版社、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新亚出版（新加坡）有限公司、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泛太平洋教育出版社、成功出版私人有限公司、雪妮语文中心等机构。这些建国后兴起的出版社，大都拥有专业的编辑、设计、打字、排版人才，可为本社或客户提供一站式的出版服务，它们的行销也不仅局限在新加坡本岛，而是走入区域[21]。

建国50年华文书刊出版业的成果与特色

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独立后，语言生态发生剧烈的变化，华语或其他华人方言逐渐不再是华人的家庭主要用语，也不再是华人之间的共同流通语，华文在教育体系里沦为第二语文，少数学生甚至以华文作为第三语文来学习。新生代华人的华文语文程度一再降低，华文阅读能力不断在衰退；尤有进者，华文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因为政治因素而遭到被削弱或被封禁的厄运；这种种客观事实自然影响及华文出版业的表现。

庆幸的是，建国后50年里华文在民间的应用，仍然有其坚韧的生命力。主要由接受过华文教育的建国一代华人组成的华社（宗乡会馆、商会、同业公会等）及个人（知识分子、社会贤达、学术人员、教师、报人、写作者），对华文、华族文化、华文教学的执着与坚持，在民间各个领域里继续广泛应用华文，也积极参与或支持华文书刊的出版事业。因此在建国以来，华文书刊出版业并没有因为华文在社会上层地位的削弱和新一代学生华文水平的降低而有太大的萎缩。这50年来，华文出版业在劣势中求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成果虽然说不上丰盛，却也算交出令人满意的成绩单，总出版量超过2万余种[22]。

[20]《新加坡华文文学新世纪十年印象》，页67。

[21]《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成立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2005年）。

[22] 新加坡全国总书目（Singapore National Bibliography），2011年序言。

建国以来的新加坡华文出版业，具体表现出以下几个特色：

文学团体和新华写作者的出版热忱推动华文出版业

如前所述，推动新加坡战前华文文学的主要力量，是文学杂志与报章的文艺副刊，单行本屈指可数。到了战后，文学单行本的出版渐渐多了起来，而在新加坡共和国建立后25年间，数量更是有所增加。战后出现的一批文艺青年在建国初期已然成熟，他们的写作热忱高昂，坚持不懈，在“建国文学”理念号召下，逆境求存，除个别作者与出版商合作出版文艺书籍外，也联同志同道合的作者组织文学团体，自搞出版书刊活动，或者联合或委托专业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还有一些作者自费出版自己的作品，成为个人出版人。这种出版社-文学团体-个人竞相出版文学书刊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而在1990年代之后尤为兴盛。根据不完整统计[23]，建国后49年以来总共出版的文学书刊约有2657种，其中由文学或其他团体出版或由它们主催出版的书刊约有741种，以个人名义为出版者有90种，而由商业出版社负责出版的书刊则有1826种，居各类型出版单位之冠。这个时期出版的华文文学书刊有期刊、诗刊、丛刊等形式，而单行本书籍的体裁种类繁多，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杂文、戏剧、相声、文集、文学评论与研究、史料、书目、索引等，不一而足。

建国以来出版的文学作品被称为“新华文学”，用以和建国前新马一体的所谓“马华文学”，以及新马分家后在马来西亚出版的“马华文学”作品区分开来。这时期新华文学的作者群，约有300多人，人数较多的是报人、教师、文员或店员，几乎清一色为业余性质。这时期成立的文学团体，比较活跃的有1966年创立的新社、1970年创立的新加坡作家协会、1971年创立的岛屿文化社、1978年创立的五月诗社、1981年创立的新加坡文艺协会、1982年创立的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1991年创立的锡山文艺中心、1997年创立的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以及近年才创立的世华文学研创会、新加坡书写文学协会等。它们也是积极参与新华文学书刊的出版机构，出版量都超过五种以上。此外，一些教师团体如新加坡华文教师会、宗乡会馆如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等也在文学书刊的出版方面颇有贡献。

早年的书报摊

这个时期华文文学出版业的兴盛，大小出版机构的不计盈亏，前仆后继，竞相替文艺团体与个别作者出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统计，在这时期出版华文文学书籍的商业或非盈利出版社的数目超过285家，包括独立前已经存在的五大书局中的3家（即世界、上海、商务）。独立后比较活跃、出版文艺书刊50本以上的出版机构，计有青年书局（171种）、玲子大众传播中心（134种）、教育出版社（115种）、东升出版社/热带出版社（108种）、胜友书局（82种）、万里文化企业/万里书局（72种）、风云出版社（71种）、创意圈工作室（64种）、八方文化企业（58种）、新华文化事业（54种）10家；出版20本以上、50本以下的有赤道风出版社（46种）、世界书局（36种）、华文中学教师会（32种）、草根书局（31种）、中外翻译书业社（30种）、新加坡新闻与出版（28种）、春艺图书公司（28种）、洪炉文化企业（28种）、文学书屋（26种）、华中初级学院（22种）、上海书局（21种）11个单位。其中玲子传媒、创意圈、八方文化三家是1995年后才开始出版文学书籍的商业出版机构，不到15年的时间就有如此成绩，其表现颇为亮眼。

官方机构和民间团体出版活动频仍

新加坡独立以来，官方机构和民间社团的活动频仍，历年出版的刊物很多，这些刊物多数是非卖品，出版后分发给公众、来往的机构及会员，鲜少为人得知。根据笔者

[23] 据《新加坡华文文学编年书目（1965-2009）》（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11年）及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线上书目（2010-2014）的统计。

的调查，独立后49年（1965年-2014年12月），官方机构和民间团体的出版物，累计共有约3496种，约由1080个机构出版，数量可以说是相当可观[24]。

依照社会进展的阶段，这些参与出版华文书刊活动的官方机构和民间团体，可分为三组，即：（一）华人社会的传统组织如血缘、地缘、业缘、学缘社团（即会馆、同乡会、同业公会、校友会）；（二）宗教、医药、福利、学校与体育文娱团体；（三）官方机构、政党、基层组织与职工会[25]。它们出版的书刊林林总总，有章程、馆史、通讯录、会讯、月刊、纪念刊、族谱等，而纪念特刊是其中最有历史价值的一种刊物。纪念特刊，或简称特刊，是指一个组织为了庆祝重大事件如成立典礼、机构开幕、大厦落成或成立周年、十周年、银禧、金禧、钻禧或百周年纪念而出版的纪念刊物。对内，特刊是机构首长或社团领袖与职员或会员建立共识的重要媒介；对外，机构和社团通过特刊向外界展示其机构宗旨或会务活动及成就，以便会员或公众人士（包括学者与政府），对该机构和社团在国家建设与社会服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有更好的了解[26]。这种以资讯为主要内容的出版品，近年来已逐渐被电子化的网站所取代，出版的数量已大幅度减少了。

这些团体大都不设专门的出版单位，而是由一个团体内部成员组成的编辑组或委员会负责组稿、编辑和出版，并交给专业的印务馆负责印刷。近年来，有越来越多民间团体延聘专人编辑特刊，或外包给专业的出版社处理撰稿、编辑、设计及出版事宜，因此刊物的质量均达一般专业水平，例如新加坡澄海会馆的《乘风破浪：新加坡澄海会馆40周年纪念，1965-2005》（2005年）、新加坡福清会馆的《走番：新加坡福清会馆一百周年、培青学校九十周年纪念特刊》（2010年）、醉花林俱乐部的《流金岁月：新加坡醉花林俱乐部166周年暨新会所开幕双庆纪念特刊》（2012年）、新加坡福建会馆的《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2005年）、《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2012年）及新加坡金门会馆的《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2015年）等，不仅内容丰富，包装和设计也是一流水准的出版品。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会刊《源》（1986年创刊）以及怡和轩俱乐部的会刊《怡和世纪》（2002年创刊）则是聚合本地学术界、媒体和民间研究者的华文平台，流通很广，设计和印刷精美。

学术机构出版活动成绩不俗

建国以来新加坡的学术机构如南洋大学、义安学院、义安工艺学院、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学术团体如南洋学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新社等的出版活动也很频仍，出版的书刊琳琅满目。它们在期间出版的书刊，据不完整统计，共有713种，计有单行本、特刊、特辑563种；学报、期刊、专刊62种；其他出版物88种[27]。

[24] 根据《新加坡宗乡会馆出版书刊目录》（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07年）、《馆藏南洋研究中文资料目录/中文图书馆编》（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1990年）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线上目录（2008-2014）统计。

[25] 林孝胜，〈纪念特刊〉，载《新加坡华文书刊，1965-1990》，页15。

[26] 〈纪念特刊〉，页15。

[27] 学术机构出版统计，参考以下资料得出：《馆藏南洋研究中文资料目录》（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1990年）、《新加坡国家出版总书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1965-2011）、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线上目录（1988-2014）、《南洋大学师生著作、出版刊物目录》（新加坡：第十一届南大学生会出版委员会，1975年）、《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书刊总汇》（新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4年）、《南洋学会出版书刊总目（1940-2010）》（新加坡：南洋学会，2010年）、《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这项统计未包括非正式出版物如学位论文、英文本等。

相关人物

总督　孙中山

历史事件

1月16日

总督为基督教青年会大厦主持开幕礼

9月15日

孙中山在星洲书报社演讲

南洋大学（1953-1980），是民间创办的大学，1953年创校，1955年正式开学，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组成新加坡国立大学。在1965年到1980年间，它属下的出版单位包括行政单位、各院系、学会、研究所、出版社等34个单位，总共出版了221种书刊，绝大部分是建国后出版的，出版的书刊种类有行政单位报告、学报、期刊、年刊、纪念刊、文学作品等。其中《南洋大学学报》、《亚洲研究所研究报告系列》、历史系的《华族行业调查系列》、《乡村调查系列》等，对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南洋大学也栽培了为数众多、以华文为主要媒体的工作者，包括大学教职员、中学校长及教师、华文媒体工作者、作家、研究学人及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的华文著述、文学创作、编译书刊，经由本地和国外出版机构出版者，数以千计。可以说，南大的创办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华文书刊出版业黄金时代的动力；南大毕业生持续不断的耕耘，也是1970年代至1990年代华文书刊出版业低潮时期的中流砥柱。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立于1994年，旨在推动中华语言与文化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中心既注重研究中国的语言、哲学、文学、文化等，也特别关注与区域华人社会有关的课题，范围涉及传统与文化、华语与方言、历史与民俗、移民与网络，以及教育、社团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中心重视学术出版，10年来已出版学术丛书《南洋人文丛书》18种和《南洋语言文化丛书》23种、国际学术期刊《南大语言文化学报》和《华人研究国际学报》（联合出版），学术演讲集《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公开演讲系列》6种以及国际会议论文集等。

南洋学会原名“中国南洋学会”，创立于1940年，战后改称南洋学会，是东南亚华人最早研究南洋课题的民间学术团体。该会的出版物以《南洋学报》为主，并不时出版“南洋学会丛书”，至2014年共出版了46种（建国前6种，建国后40种）。早期学报的内容，主要是南洋各地的史地考证、人种探讨、民俗搜奇、语文专论、生物研究、史料整理和校注的文章，战后重点倾向新马华人史的研究。新加坡建国后，该学会的会员和作者群注入了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职员和毕业生，加速南洋学报和丛书内容的本土化。

另一个多产的民间学术团体是1982年成立的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当时，已经建国16年的新加坡共和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教育的发展初具规模，但精神文明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却严重滞后。一群从事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华校毕业生遂聚首创立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积极推动文化的研究和活动。他们出版了一份以研究亚洲文化学术为主要内容的学报《亚洲文化》（年刊），并从主办演讲会、座谈会和研讨会，进而出版中文学术丛书、东南亚史料丛刊、英文学术丛刊和研讨会论文集，32年来共出版了39种书刊，成绩不俗。

教育部主导教科书出版活动

建国前，华文教科书的出版几乎是由中华、商务、世界、上海和南洋五大大书局主导的。建国初期，华校学生数目虽然锐减许多，但华语与华文教学仍受到政府与社会重视，教科书出版的市场保持稳定，当时除传统华文教科书出版商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上海书局外，还吸引了新的业者如新加坡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教育出版社、教育供应社、胜利书局、泛太平洋书业、联邦出版社、友谊企业等进场。这时期共有多达52家民间出版社[28]参与出版教科书的竞争，教科书种类也多，有中小学华文第一语文、华文第二语文、文学科、历史科、地理科、公民科、科学、道德教育、社会、健康教育、音乐、数学等，几乎包括了所有学校科目。

然而，到了1980年代，语文和教育政策进一步调整，学校教科书的出版趋向专业要求，开始了由教育部主导教科书出版业的时代；一般出版商则倾向于出版教学参考书与辅助读物，教科书的出版量逐年锐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期间，主要的华文课本大多是根据教育部制定的课程标准，或由新加坡课程发展署的教育官员或调动学校的专业教师负责编写，而由教育部和私人出版商联合创办的教育出版社负责出版和销售；少数由其他民间出版社出版。原有的民间的教科书出版机构则从前期的52家锐减至世界书局、新加坡文化事业、胜利书局、教育供应社

[28] 曹蓉主编，《开卷有益、润物无声：东南亚早期华文课本图示目录》（新加坡：周星衢基金会、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大众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出版，2014年），页9。

等13家。

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主要的教育出版商如泛太平洋教育出版社、成功出版私人有限公司、新亚出版（新加坡）有限公司、大众书局集团、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等具有国际视野的民间出版机构，采取立足新加坡放眼国际的策略，转而积极拓展中国、台湾、香港、韩国、日本、东南亚等海外的教育用书市场，开启了另一片天地。它们出版适用于不同地区的各语文课本、课文辅导练习、应考手册、作文指导、学生作品、图画字典、学前教科书、地图及一般参考用书，数量约有一万余种之多。

学生文艺的出版由盛而衰

新加坡早期的华文学校，为了鼓励学生阅读和创作，多在校内的公共走廊或课室里设置壁报拦，张贴学生的优秀作文或文艺作品，有些学校甚至将壁报上的文章结集出版，这是学生文艺刊物的起源。最早的华文学生刊物，可能是1923年3月创刊的《养正学生月刊》，现存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

华中初级学院设有“新加坡学生华文文艺资料中心”，这是本地唯一收集学生刊物最齐备的中心。根据它的收藏显示，战后至建国前夕新加坡华校的学生刊物，只有华夏公学的《华夏学生》、中正中学的《学文》、《汇流》、南洋大学的《艺文》、《大学论坛》、《大学青年》、《戏剧研究》等七种而已，寥寥无几。建国以来，由民办的南洋大学学生团体主导下，学生文艺书刊的出版活动才逐渐形成一种风气，建国50年来，由全国各级学府出版的刊物，可谓种类繁多，成为新加坡华文书刊出版活动的另一特色，也为文艺界培育了不少写作人才。据统计，从1965年到2014年，新加坡各级学府的173个单位（大专院校7所、初级学院及高级中学20所、中学102所、小学44所），总共出版了期刊196种、文艺单行本81种、文艺理论5种、学生文丛6种、比赛专辑12种[29]，虽然这些期刊大多数刊期不长、印量也不多，而且多数已经停刊，但这类型的出版物对学生文艺界的影响则是深远的。许多学生作者，后来成为作家、艺术家、广告人、华文老师、新闻工作者等，为新华社会的华文文化及华文相关行业培养了一批新的接班人。

儿童文学书刊和动画图书的出版具有潜能

华文儿童文学书刊的出版，起步和进展都比其他类型出版物迟缓。在建国前，除了南洋书局出版的《马来亚少年》（1952-1954）几种外，几乎所有其他在新加坡书店销售的儿童书刊不是来自中国大陆，就是从港台进口的，战后出生一代儿童，可以说没有不读过《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儿童画报》、《好儿童画报》、《儿童乐园》、《南洋儿童》等这几种香港出版的儿童刊物的。其中，《世界儿童》（1950-1978）的推手，是新加坡世界书局的东主周星衢，编辑部早期也设在新加坡，后来才移到印尼的雅加达。这本由香港世界书局出版、风行整个东南亚的儿童刊物，内容包括童话寓言、名人故事，以及历史、地理、生物与生活知识等。文字浅显、图文并茂，很受儿童欢迎，问世初期读者人数已超过16万[30]。

建国初期，新加坡儿童书刊的出版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直到1970年代，教育部在学校推行简体字，并且用简体字刊印新课本，市面上那些以繁体字印行的儿童读物，顿时成为不合时宜。在政府和教育部的鼓励之下，本地业者才开始涉足儿童书刊的出版，他们邀请本地的一些兼职作家，编写适合学生阅读的课外读物。当时教育出版社首先推出一套民间故事丛书和《少年月刊》、《新加坡儿童》两本定期

[29] 吕振端，〈新加坡学生华文文艺刊物综述〉，载《新世纪学刊》期12（新加坡：斯雅舍，2012年），页126-135。

[30] 黄涓，〈周星衢基金会出版两刊物，为本地出版业留下印记〉，载《联合早报·阅读世纪》，2015年2月17日，页3。

刊物及一种画刊，名为《欢乐儿童》；联邦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两套华英对照的民间故事；《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两大报馆也拨出版位，刊登儿童文学作品。进入1980年代后，传统华校走入历史，《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儿童文学的版位被取消了，教育出版社的两份华文儿童刊物也无以为继，仅存的一份《新加坡儿童》，则改名为《新一代》，变成双语刊物。这时候，仍然坚持出版华文儿童文学读物的出版社，仅有联邦出版社、胜友书局、达利捷以及较后出现的维新出版社、百汇和泛亚等数间。这期间（1970-1990）出版的儿童文学书刊，仅得儿童诗17种、儿童小说38种、童话寓言11种、期刊11种，成绩差强人意[31]。

然而21世纪，华文和华文出版业双双走出谷底后，儿童书刊（包括动画书、小学辅助读物）却一跃而成为最具国际市场潜能的华文书刊类型，它比新华文学书刊、教科书具有更佳的国外销售市场。这是因为中国的复兴，导致东南亚几个国家的小学恢复了华文教学，而华文断层已久的东南亚国家的小学生，人数极为可观。新加坡几家具有现代化设备和专业团队的出版社，如新加坡艺术出版社、亚太图书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新）有限公司、创意出版私人有限公司、智力出版社、怡学出版有限公司、泛亚出版社、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大众书局、中图（新加坡）上海书局有限公司、新亚出版（新加坡）有限公司、SNP泛太平洋出版社、成功出版私人有限公司、友联书局私人有限公司等，纷纷投入华文儿童书刊、动画书、教学辅助读物、语文学习参考书的出版，蔚为一时风气，这十多年来的出版总和已大大超越前期。

主要出版社与出版人

新加坡出版华文书刊的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很多，但绝大多数是非商业性或非专业性的团体或独立出版人，许多商业性出版社的规模也不大。具有一定影响的华文出版公司只有时信出版集团、大众书局、新加坡联邦出版公司、胜利出版私人公司等几家，它们同时也出版大量英文或其他语种书籍。

2005年由新加坡20个主要华文出版社组成的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其会员中的商务印书馆（新）有限公司、上海书局、大众书局、友联书局私人有限公司、青年书局五家是独立前创立的书局兼出版机构，拥有超过50年的历史，它们对新加坡的华文出版业的贡献，不容忽视。简介如下：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最悠久的文化出版机构，也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现代化书店。它的新加坡分馆，在建国前主要业务是批发中国版图书和教科书，业务遍布东南亚；新加坡建国后，它也兼而出版本地辞书、文艺书籍和系列儿童读物。

上海书局，创办于1925年，成立以来是致力于销售图

世界书局出版的儿童刊物（周星衢基金提供）

[31] 陈彦，〈儿童文学〉，载魏维贤编，《新加坡华文书刊：1965-1990》，页37-46。

书来推广中华文化，并推动华文文化教育出版事业。战后，世界书局开始涉足于出版业务，并协助胡愈之和沈兹九夫妇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该社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综合性期刊《风下》和《新妇女》月刊。2001年，上海书局接受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中图）参股，成立中图（新加坡）上海书局有限公司，经销中国书刊、音像制品及出版为主要业务。但数年之后因双方经营文化的差异而拆伙，上海书局在新加坡走入历史。直到2012年结束营业为止，上海书局总共出版了上百种华文书刊，包括一套对东南亚华文教育意义重大的现代版华校小学教科书、一种再版多次、累积印量超过10万册的《现代华语词典》、《马华文学60年集》丛书10种，以及少数本地有特别需求的华文、马来文和英文图书。

大众书局由周星衢于1936年在新加坡创办。它与分别创立于1924年和1934年的正兴公司和世界书局属大众集团的一部分。第一间以经营世界书局出版的数千种刊物为主的大众书局设立在小坡桥北路（North Bridge Road），其旗舰店百胜楼分行在1980年正式营业，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双语书局。如今，它拥有92间分店，是新马最大的连锁书店。为了推动新加坡的华文阅读，大众书局除引进海外好书，改版成为简体字，以“大众印品”的品牌推出本地市场外，同时也自行出版适合本地学子的丛书。近年来，大众集团通过策略性联盟拓展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图书市场，将新加坡华文书刊开拓更大市场；面对电子书时代，大众控股主席周曾锷早在2001年即创立大众电子学习控股，把香港小学的华英数课本转化成电子版的“活教材”（Living Textbooks），成为新加坡出版社的先行者[32]。

友联书局创立于1952年，业务遍及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主要经营各类高素质的中文图书零售及批发业务，并兼出版成人及儿童书刊。

青年书局于1955年创业，以销售华文书籍为主。1958年开始出版华文图书，先后约有一百余种，其内容包括文学、史地、教育等，建国后一度由于阅读华文的人口逐年减少而停止出版业务。沉寂了30年后的青年书局，在21世纪重新出发，并动用大笔基金，一方面重印旧书，一方面推出几个新系列丛书，轰动一时。可惜的是，青年书局的东主因年纪关系，又没有继承者，最终也步上上海书局的后尘，走入历史。

此外，在建国后创立的一些出版社，如教育出版社（后来纳入SNP泛太平洋出版社）、艺术出版社、创意圈出版社、赤道风出版社、玲子传媒、八方文化创作室等，在建国50年期间，也曾在推动华文出版业方面作出一定的成绩。和建国前创办的老字号不同的是，它们大多以出版为主要业务，拥有专业的编辑、设计、打字、排版队伍，可为本社和客户提供一站式的出版服务。它们中有好些亦具有国际销售网络，有能力将新加坡的华文出版品分销到国际市场。

出版人方面，建国前创业一代有几位传奇性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例如，上海书局的创办人之一的陈岳书、世界书局的创办人周星衢、南岛出版社的创办人潘醒农等出版人是建国前新加坡华文出版业的开路先锋，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创建了华文出版业的基础，同时还培育了另一代出版界的接班人。南洋书局的陈育崧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身兼教育家、商人、出版人、学者于一身，南洋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亦曾风行东南亚，可惜没有继承人。

陈岳书的子女陈蒙星、陈蒙志、陈蒙鹤等继承了他们父亲的衣钵，将上海书局从新加坡扩展至吉隆坡，并从华文书刊的出版扩大到

[32] 高极登，〈资信世代，电子出版 e 路走来〉，载《联合早报》，2002年7月18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1 月 23 日

中国教育部颁布领事管理学校规程，委驻新加坡总领事管理侨校

多语文书刊的出版；陈岳书的另一名儿子陈孟哲则另起炉灶，设立了青年书局。

周星衢的后人周曾锬、周曾钧、周曾锷三兄弟不仅将世界书局、正兴书局和大众书局等集团化，并且开创了中港台的出版和销售网络，为新加坡的华文出版业迈向国际化打下坚实基础。2013年，大众集团总裁周曾锷以其先父周星衢的名义创立了非营利文化机构“周星衢基金会”，推动华文语言、教育和文化，先后和国家图书馆合作出版了《岁月书香》、《开卷有益 润物无声》及《世界儿童 童心永远》几种记录本地书店和出版业的历史印记。

另一个克绍箕裘的例子是潘醒农的公子潘国驹博士，他原来是搞科学研究的，后来却又回过头来经营出版事业。他所创办的世界科技出版社和八方文化创作室，拥有世界水准的出版设备和队伍，广纳世界一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作者群，制造了另一个新加坡神话。

展望将来：作为国际华文出版基地之一

研究中国华文书业的学者辛广伟曾把世界华文出版业的整体概况，归纳为“三大基地，四个地区”。三大基地指的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列为上述三个基地之外的第四个地区。根据他的观察，新马两国出版的华文书，从数量和质量上，远不如中港台三地，却比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高出许多[33]。

辛广伟的观察基本上是正确的。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曾经是东南亚华文出版业的重镇，早期的华文宣教刊物是以新加坡为出版基地，然后运往中国各地分发；新加坡出版的华文报章和教科书，也都曾在东南亚各国广泛流通。据上海书局温平的回忆，他当年曾把“现代版”华文教科书推销到印尼去，并以雅加达上海书局为基地，联合当地的书商组织了“印华联合出版社”，将现代版教科书改编为适合印尼华校采用的《印华小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在印尼一直发行到1965年为止，发行量几乎占全印尼总数的95%[34]。又如，南洋书局在1941年所出版的《南洋常识教科书》初级第一册显示，该教科书是由南洋编译所主编与发行，交由香港永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南洋常识教科书》的发行地包括仰光、吧城、槟城、吉隆坡、吉打、马六甲各地的南洋书局，售价为叻币2角5分[35]。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华文教科书曾在东南亚各地据有过一定的市场。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华文书刊出版业虽曾一度因社会环境的变异、华文学校的锐减、华文地位的衰微和读者群的萎缩而受到挫折，东南亚华文出版重镇的地位也一度北移至吉隆坡；但随着上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复兴，华文在东南亚和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得以提升，新加坡华文书刊出版业也随着大环境的新机遇，迅速从低迷的境地走了出来。最先走出“黍离伤痛”的是文学团体如世华文学研创会、新加坡文艺协会、新加坡作家协会等，他们通过与亚细安各国文学团体的交流活动，将新加坡华文文学书刊重新散播到东南亚各国，有人比喻这种书刊的流传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继而教科书、教学辅助读物和儿童书刊等类型出版业，也随着东南亚各国学校恢复华文教学的机遇而重获商机。从21世纪初开始，这类书刊的出版商和出版量逐年增加。在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出版机构如创意出版私人有限公司、八方文化创作室、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大众集团、新亚出版（新加坡）有限公司、泛太平洋教育出版社、成功出版私人有限公司等的努力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重新成为东南亚华文出版业重镇，甚至跃升为世界华文出版业的第四大基地，也是指日可待的。

---

[33] 辛广伟，《世界华文出版业》（台北：远流，2010年），页238。

[34] 温平，〈难忘的培育和鼓励：纪念新加坡上海书局创建65周年〉，载《源远流长：上海书局65周年纪念刊》（新加坡：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1991年），页48。

[35] 叶伟征，〈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华校教科书出版概况〉，载叶钟铃、黄佟保合编，《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页53-65。

第二节　与君话冷炎州月
——新华古典文坛

摘要

新华古典诗文中所隐藏的史料，很少为学者重视。以古典诗文作为切入点，通过古典诗文，考察与了解19世纪新加坡历史、人文社会风貌及其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为学者们研究新华历史，研究华人社会文献，提供一个新的尝试。

Abstract

Very few historians have really scrutinised and appreciated the classical poetry compos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Singapore. The poems have embedded in them valuable local historical content concerning Singapore in the early days. This chapter cites many examples of such poems which describe, among other things, the social customs as well as the social fabric of the early Chinese in Singapore in relation to the political events of China in those days.

柯木林（**Kua Bak Lim**）

新加坡地处赤道边缘，气候炎热，19世纪时，这块被称为化外之民居住的海疆殊域，许多文人雅士都不愿到此。所谓“南洋乃化外之邦，榛莽之疾地”，毫无文化可言，“地气人俗殊中华，从来名士至者寡”[1]！

尽管如此，19世纪80年代仍有不少南来文人，基于种种原因，路过或在此作短暂停留，并写下不少经典的古诗文作品，对星岛及南洋风物，有所咏赏，实不失为研究新华社会的史料。

南渡衣冠

南来的文人雅士，都有深厚的旧学修养。南来的目的，或为访友，或为游历，或为筹赈，当然也有的是来此谋生的，形式不一而足。然而，不论何种原由，这些饱读诗书的中原知识分子来到南洋，眼前的一切新鲜事物，自然都是诗作的最佳题材，因此尽入诗中：

一榷冲开瘴海烟，晚霞光照木樨筵
高人作客凭谁热，诗吏如仙只自怜
骨傲不知酬世语，情多何惜买花钱
与君话冷炎州月，是否前生有剩缘

此诗为《叻报》主笔叶季允（1859-1921）所作，这是他迎逆到访的中国士人田崧岳的诗[2]。田嵩岳，本名均，别号晚霞生，四川成都人。1889年秋南来，主要目的是为江浙筹饷赈灾，撰有〈晚霞生述游〉一文，刊载于1890年1月10日至12日的《叻报》，报导其南洋游历之梗概[3]。此诗中的“瘴海烟”、“炎州月”形象地突显了新加坡炎热的天气。“与君话冷炎州月”一句，颇具意境。左秉隆在新加坡领事任内曾自嘲为“炎州冷宦”，可见南来的文人士子，对新加坡炎热的气侯，实在是耿耿于怀！

〈晚霞生述游〉一文，学者甚少注意。这篇游记有不少关于南洋风物的描绘，弥足珍贵。当述及新加坡时，晚霞生写道：“五日（即光绪十五年十月五日）抵新加坡。居然巨埠也。其地平衍沃野数百里，物产厚腴，无崇山峻岭之蔽。阛阓罗列，洋夏分处……游公家花园，园基广阔五十余里，亭台延缦，池沼斜面……寖以繁水气之精，敷润卉草异葩，奇葑吐洩，天地之菁蕴，纷纶并现……”[4]。

1889年晚霞生抵新时，正值新加坡开埠后70年，从文字的描述，可知此时的新加坡已相当繁华（“居然巨埠也”），休闲公园设施亦具雏型（“游公家花园，园基广阔五十余里”）。〈晚霞生述游〉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值得重视。

“中华风景记桃符”

其实早在23年前，即同治五年（1866年）初，清朝政府出于“了解外国时政民意”，抱着考察西方社会的政治目的，派出时任山西省襄陵县知县，63岁的满人斌椿为首席代表，率四名同文馆学生、两名英国人及一名法国人出使欧洲，开启了中国官方旅游团赴欧洲的先河[5]。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66年3月7日），斌椿一行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在欧洲参观了当时一些领先世界的产业和技术，令他们大为惊讶[6]。

回国后，斌椿将其所见著书，即为《乘槎笔记》，现存有京都琉璃厂二酉堂的善本，书中对欧洲各国做了精彩的记述：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

---

[1]〈送卫铸生先生远游息岛即题其南游话别图邮呈〉，《叻报》，1889年10月25日。

[2]〈赠晚霞生即次其留驻申江诸友元韵录呈〉，《叻报》，1889年10月25日。诗末注“惺噩生未定稿。”〈晚霞生述游〉一文中写道：“叶季允所谓惺噩生者也”（见〈再续晚霞生述游〉，《叻报》，1890年1月13日），故惺噩生乃叶季允的笔名，此为佐证。

[3]〈晚霞生田崧岳稿〉曰：“己丑秋买舟游历南洋诸岛，由暹罗至新加坡，勾留十日与卫君铸生相遇，承以诗扇见诒。匆匆不暇答和。甫抵申江，依韵晋二律，寄盼并祈炎州冷宦、惺噩生两吟长同政”（见《叻报》，1890年2月6日）。

[4]〈再续晚霞生述游〉，《叻报》，1890年1月13日。

[5]〈斌椿：走出去才能看到“西洋景”〉，《凤凰资讯》，2008年7月31日，网上资料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bupingdengtiaoyue/news/200807/0731_4259_686409.shtml。

[6] 同上注。

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7]。

在前往欧洲途经新加坡时，斌椿见到英国炮台，形势雄壮，“洋楼颇宏整”[8]。几个月后（1866年8月11日）由欧洲返航，再度抵新，斌椿兴奋地写道：“新加坡多闽粤人，市廛门贴桃符，书汉字中原景。余历十五国回至此，喜而有作”（《海国胜游草》之〈至新加坡〉）[9]：

片帆天际认归途，入峡旋收十幅蒲
异域也如回故里，中华风景记桃符

新加坡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使斌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斌椿的随员张德彝（1847-1919）出使时，留意到西方当时使用标点符号。在1868年至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这本书现在称作《欧美环游记》），书中向中国文人做了介绍，这是标点符号在中国被使用的开始[10]。

“又看渔火照星洲”

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公元1881年9月25日（星期日），左秉隆出任驻新加坡领事[11]。左秉隆对新加坡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这块蛮荒之地的化外移民“再华化”（Re-Sinification）。他上任不久，全东南亚最早的一份华文日报《叻报》也在新加坡出版（1881年12月10日）[12]。

从此，新华社会在左领事与《叻报》倡导下，掀起了振兴文教的热潮。一时学校林立，文风丕振，坡中士子，无不以道德相砥励。这一时代的启蒙运动，奠定了日后新华社会的基础[13]。

左秉隆一生的事业，以在新加坡的为最大。作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左秉隆可谓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8月4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5月20日

《国民日报》创刊

---

[7]〈斌椿：“中土西来第一人”〉，网上资料 http://www.picturechina.com.cn/bbs/thread-13412-1-1.html。

[8] 柯木林，〈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载柯木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页 12。

[9] 饶宗颐编，《新加坡古事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276。

[10]《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标点的，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资料引自瓜田，〈标点符号是怎样诞生的〉，载《求是理论网》，2010年5月13日，网上资料 http://www.qstheory.cn/ts/zxyd/xszlhj/201005/t20100513_29593.htm。

[11] 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前后两次。第一次自光绪七年八月至光绪十七年三月（1881年9月－1891年5月），连续三任共九年有余，始调任香港。光绪三十三年九月至宣统二年九月（1907 年10月－1910年10月），他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三年任满后辞职。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左秉隆辞官，仍留寓新加坡。1916年迁居香港，同年9月回广州，1924年卒于广州，终年75岁，葬广州北郊狮带岗之原。参阅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南洋杂志》卷1期 7（新加坡，1947年），页 75-76；及左秉隆《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附录〈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与〈徙居九龙〉，《勤勉堂诗钞》卷三，页89。

[12] 柯木林，〈“我视新洲成旧洲”—左秉隆与新中关系〉，载《南洋学报》卷63（新加坡：南洋学会，2009年），页 109-130。又：根据王慷鼎的考证，《叻报》创办日期系光绪七年十月二十日，公元1881年12月10日。1932年3月31日最后一期《叻报》（列号14781）的版首右上角有这样一则告白：“本报创办于前清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编辑及发行所在新加坡哥劳实得力十一号及十三号，电话七一六四号。总理薛梦熊，督印人兼编辑主任梁显凡……”，查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即公元1881年12月3日。此日期与王慷鼎考证所得的1881年12月10日相差7天（参阅王慷鼎〈叻报创刊日期正式确定〉，《星洲日报》，1982年5月24日）。笔者再根据《叻报》于1911年12月11日刊载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一文来看，《叻报》的创办日期应是1881年12月10日（星期六）。

[13]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载《勤勉堂诗钞》，页1-9。

左秉隆墨宝

左秉隆墨宝（细部）

当之无愧，他对新华古典文坛的贡献，不可抹煞。南洋史学者陈育崧的〈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一文，将其领新惠政拟之为“韩（愈）之于潮，苏（轼）之于琼，朱（熹）之于漳”，是十分恰当的[14]。

左秉隆的诗著《勤勉堂诗钞》中，有不少富有新加坡地方色彩的诗篇。描写本地风光，情韵锵铿，读了令人飘然神往：

息力新开岛，帆樯笑四方
左复中国海，西接九州乡
野竹冬仍翠，幽花夜更香
谁怜云水里，孤鹤一身藏[15]

作为繁盛的通商口岸，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左复中国海，西接九州乡”）。这首诗描绘了新加坡海面上万帆云集的壮观景象（“帆樯笑四方”）。还有一首五言绝句，这样写道：

清晓倚高楼，云烟四望收
山雾环阙秀，海色映帘幽
此地通华夏，何人务远谋
大旗遥对处，指点是新洲[16]

左秉隆领新期间，曾游历马六甲、吉隆坡、槟城、廖内等地。他有一首〈游廖埠〉的七言律诗，写的就是从廖内回新加坡时，上午登船，一路帆开逐流，归来已是入夜时分，他看到新加坡海面上，渔火点点，于是赋诗纪游：

朝辞廖屿上轮舟，一片帆开逐顺流
绿树青山逢处处，和风丽日送悠悠
谩歌雅调惊云鹤，乱拨鹍絃狎海鸥
乘兴不知行远近，又看渔火照星洲[17]

这首诗的气魄，虽不如李白的〈下江陵〉，但神韵却相似。一幅赤道地区的海上风光，在他的笔下，一览无遗。“又看渔火照星洲”一句，点出了昔日新加坡海岸线的夜景，美极了！

根据新马历史学者李业霖的考证，左秉隆是“星洲”一词的创始者。因1887年左秉隆赋此诗时，比邱菽园于1898年5月31日在《天南新报》发表的小品，还早11年（见后文）。

1907年9月，左秉隆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兼辖海门等处。此时他年事已高，旧经验已不能适应新潮流。而且局势的发展，对他十分不利，他忧心忡忡，一筹莫展[18]。我们

[14] 同上注。
[15] 〈息力〉，载《勤勉堂诗钞》卷三，页86。
[16] 〈柔佛王宫早眺〉，载《勤勉堂诗钞》卷三，页66。
[17] 〈游廖埠〉，载《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10。
[18] 柯木林，〈“我视新洲成旧洲”—左秉隆与新中关系〉，载《南洋学报》，页 109–130。

读他这首诗，就可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十七年前乞退休，岂知今日又回头
人呼旧吏作新吏，我视新洲成旧洲
四海有缘真此地，万般如梦是兹游
漫云老马途应识，任重能无颠蹶忧[19]

此诗颇有人事沧桑之感，读之令人心酸。“万般如梦是兹游”，此行任重道远，国际风云瞬息万变，怎不叫人忧心如焚？往日那种敢作敢为的豪气，不知消磨何所了？！

《新加坡风土记》

左秉隆领新期间，其谱友（结拜兄弟）李钟珏（1853-1927）曾于1887年5月来新拜访他。李钟珏乃上海名士，出身小康，擅于医学。李钟珏在新加坡住了两个月，著成《新加坡风土记》一书，翔实地记录了百年前新加坡的风土人情，为研究新加坡历史的珍贵资料[20]。

《新加坡风土记》有一段文字是描述当年的街道市容：

坡中道途宽坦，修治之工，终年不辍。桥梁多以精铁为之，较之上海租界各桥，更形坚固。马车路四通八达，无往不利。每于申酉之交，驰车骋游，讼海滨以入。山内浓阴深树，细草疏花，不绝于目。时或一豁一桥，两三茅屋，或层楼杰阁，隐约林间。昔人所谓入山阴道，应接不暇，殆亦似之。夕阳将下，闻狺狺喔喔声，恍惚峰泖景象，几忘其置身万里外也[21]。

这段记载，似曾相识。久居本地人士或曾作郊游者，对文中所描述的景色，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吧。

卫铸生与左秉隆的唱酬

李钟珏离开新加坡两年后，1889年10月，沪滨名士卫铸生以苏浙江事到新加坡。卫铸生号破山冷丐，祖籍江苏省常熟县，他是书法大师。南来时，已年近古稀（时年62岁）[22]。此前卫铸生与左秉隆并未谋面，但他对左秉隆的诗才，慕名已久[23]。到新加坡后，一见如故，甚为投缘。卫铸生在赠予左秉隆的诗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使君海外宣威德，令我钦迟已十年
爱客共倾浮白盏，怜才不惜选青钱
有时诗思凌云上，无恨天机到酒边
岛屿镜清秋气肃，纷纷鱼鸟得陶然[24]

此诗中“怜才不惜选青钱”说的就是

[19]〈别新加坡〉，载《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29-130。

[20]柯木林，〈新华古典诗文选释〉，载《石叻史记》，页24。

[21]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书局有限公司，1947年），页15。

[22]卫铸生于1889年乘轮船离开上海，经过香港、西贡，同年九月初抵达新加坡。抵步后即写了三首律诗，刊于1889年9月14日《叻报》（〈甫抵息岛漫赋俚言三律录请〉），其中有“六十二龄聊鼓浪，万三千里逐奔轮”之句（诗末注“古吴卫铸生初稿”）；又左秉隆于1889年9月28日，在《叻报》发表〈奉酬卫铸生先生〉的律诗，其中有：“壮哉此老真难及，六十二龄如少年，力尚能行万里路，字犹堪换一囊钱”之句，由此可知卫铸生时年62岁。卫铸生因年事已高，健康不佳，但于旅新期间，身体情况似有好转。他自己说：“予素患痰喘，遇寒即剧。酣地炎蒸故，到此两月其疾渐减”，见〈奉酬子兴大词宗三叠原韵录请〉，载《叻报》1889年11月13日。

[23]左秉隆的诗才在艺林中是颇负盛名的，《勤勉堂诗钞》（共七卷）即为其诗著。蔡钧的《出洋琐记》载：“左司马（左秉隆）出感怀诗见示，缠绵跌宕，情韵斐然。司马既精英文，而汉文又如此超卓，殊令人钦羡无已”。田崧岳的〈晚霞生述游〉也说：“中朝领事官为左子兴（秉隆）都转，倜傥有大才……多学工诗，曾一识其风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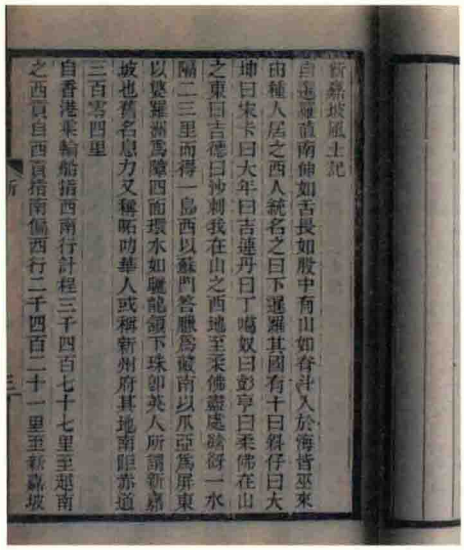
[24]〈子兴都转见惠和章依韵报之录呈诸大吟坛正刊〉，载《叻报》，1889年10月4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华人组织英属马来亚华侨学务总会，反对学校注册条例

上海名士李钟珏曾于1887年闰四月到访新加坡



李钟珏所著《新加坡风土记》原版

左秉隆领新期间设立会贤社，每月课题，并由自己出资勖士子的史实[25]。在此，卫铸生有注云："书院月课，凡列前茅者，公以鹤俸奖于花红"。由此可见，新华古典诗文亦可为学者提供研究的素材与依据。[26]

在另一首赞扬左秉隆的诗作中，卫铸生又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左秉隆的为人与学识的信讯：

才大勋高志不骄，左公卓识自超超
平情能使群心服，妙手兼医众腹枵
领导标新恢远略，移风易俗仗星轺
经纶巨细包涵尽，永固邦交答圣朝[27]

参照史料，再配合前引诗一起解读，则左秉隆之性格、才学及其政治智慧，跃然纸上。这位杰出的晚清专业外交官，"爱客共倾浮白盏"，"才大勋高志不骄"，爱酒好客，平易近人。薛福成赞他："盖领事中之出色者"[28]，故能连续三任驻新加坡领事，"永固邦交答圣朝"。左秉隆亦谙岐黄之术，可惜有关他的医学造诣，资料不多，此诗只是提供一个旁证而已！

左秉隆对卫铸生的赞许是有回应的。1889年9月28日的《叻报》发表了左秉隆〈奉酬卫铸生先生〉的律诗，虽说是"子兴氏未定草"[29]，却是回应得恰到好处。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左秉隆的诗才，也看到了他为人谦虚的品德：

赠我新诗归我勋，令人惭愧复欢欣
医非神禹难治水，官是老兵颇好文
遍野哀鸿劳远梦，遐陬威凤喜同群
敢将燕石酬和玉，拜向班门乞运斤

对这位来自远方的诗友，左秉隆的评价亦高，他说："先生向以书法著名海上，曾游日本，极见重于彼都人士。兹辱临星嘉坡，想爱书家必以先观为快矣"[30]！两人彼此尊重，相互酬唱，完全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殊为难得[31]。

---

[25] 据《叻报》新闻（冠裳盛会）1887年11月17日的报导："予（指驻英使馆随员余思诒）在案头所见会贤社课卷数十本，实不意叻地文风有如此之盛也"！可见当年新华社会在"会贤社"倡导下，文风颇盛。

[26]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载《勤勉堂诗钞》，页1–9。

[27] 〈呈左子兴都转四律录请〉，载《叻报》，1889年9月24日。

[28]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国驻英法义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赴欧上任时，途经新加坡，左秉隆仍在任。后来薛福成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一书，在书中薛福成记载云："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浃洽，办事颇称稳健，盖领事中之出色者"。左秉隆自1881年（光绪七年）莅任，至是已连续三任矣，可见他之为当局所倚重。

[29] 子兴是左秉隆的别字。

[30] 〈奉酬卫铸生先生二律录请〉，载《叻报》，1889年9月28日。

[31] 1889年11月18日《叻报》刊载左秉隆的两首诗，此为其中的一首："与君数日不相见，怀想深如弥岁年。黄菊已倾无数盏，绿苔空散满阶钱。闲看萝月悬窓外，静听松风到忱边。惟有高人殊未至，一回思念一悠然。"足见两人交谊甚佳（〈五叠前韵奉和铸生我师录请同政〉）。

卫铸生的访新，通过《叻报》的报导，掀起了一场诗歌对答的热潮，确实使当年的诗坛活跃起来[32]。于是本地人作诗的兴趣愈浓，诗社文社也陆续出现[33]。

“诗屋人寻豆腐街”

酒与美人，向来都是才子骚客诗作的题材。在新华古典诗作中，当然不乏这类作品。卫铸生的〈寿荣华酒楼即句〉八绝，香艳旖旎，当年新加坡上层人物的生活情况，可见一斑。这里是其中的一首：

五花骢马七香车，辘辘声中月正华
灯火层楼明似昼，一竿挑出酒帘斜[34]

《叻报》主笔叶季允戏成四绝调之，此其一：

艳说新洲卖酒家，无端春色逗仙槎
他时归去人相问，幸道天南尚有花[35]

叶季允名懋斌，号永翁，安徽人，任职《叻报》达40年之久。叶氏工于诗，既是报人，亦是诗人。他雅擅篆刻，精岐黄术[36]，可谓多才多艺。叶季允虽主《叻报》笔政40年（1881-1921）[37]，然而他的诗作，刊登《叻报》的不多。陈育崧辑有叶季允的《永翁诗存》，可供参考[38]。当时，叶季允的声名，驰骋遐迩。中国近代著名诗人邱逢甲（1864-1912）对他极为赞赏。19世纪末，邱逢甲以保商局事奉命来新加坡宣慰华侨时，特地登门拜会，并赠诗数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万里飞腾志未乖 海山苍莽遣吟怀
他年岛国传流寓 诗屋人寻豆腐街[39]

诗中的“豆腐街”是横贯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及新桥路（New Bridge Road）之间的古径，在早期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今天已不复存在。当年著名的酒楼、餐馆、戏园、妓院都集中于此。这里不仅是文人骚客常到之处，也是王孙哥儿闲荡的好场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番客篇〉与〈新加坡杂诗〉

继左秉隆之后任新加坡总领事的是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祖籍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晚清著名的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黄遵宪任总领事期间，将会贤社易名图南社，依然每月课题，继

---

[32] 卫铸生与左秉隆及其他文人（李清辉、晚霞生等）酬唱诗作，散见于《叻报》，1889年9月14日（〈甫抵息岛漫赋俚言三律录请〉）、1889年9月24日（〈呈左子兴都转四律录请〉）、1889年9月28日（〈奉酬卫铸生先生二律录请〉）、1889年10月9日（〈叠韵奉和铸生先生录请〉）、1889年10月15日（〈子兴都转又赐和章窃欣引玉复叠以酬录呈〉，〈寿荣华酒楼即句录塵〉）、1889年10月23日（〈送卫铸生明府游新嘉坡即题其南游话别图录〉）、1889年11月13日（〈奉酬子兴大词宗三叠原韵录请〉）、1889年11月18日（〈五叠前韵奉和铸生我师录请同政〉）及1890年2月6日（〈己丑秋买舟游历南洋诸岛，由暹罗至新加坡，勾留十日与卫君铸生相遇〉）等。

[33] 梁元生，〈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之士人雅集〉，载梁元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5年），页45。

[34] 录自陈育崧，〈石叻古迹序〉，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页iv。

[35] 陈育崧，《南洋第一报人》（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1958年），附《永翁诗存》，页29。

[36] 叶季允精医术，曾于1901年7月2日出版《医学报》，这是一份昌明医学，宣传卫生的星期刊。《医学报》总共出版了多少期，至今尚无资料可考。但根据王慷鼎的研究，《医学报》停刊于1902年5月13日。以此推算，该报前后应出版了46期（周）。

[37] 柯木林，〈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载《石叻史记》，页81-90。

[38] 陈育崧辑《永翁诗存》共收录叶季允诗作135首。

[39] 南武山人邱逢甲稿，〈赠叶永翁布衣〉，载《叻报》，1900年3月27日。诗中注云：“君所寓曰豆腐街”，当時叶季允的住所在豆腐街，又参见《南洋第一报人》，页4。

承了左秉隆任期内的文化政策[40]。黄遵宪有一首著名的诗是写给梁启超（1873-1929）的，题为《赠梁任公同年》：

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41]

2003年6月29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香港期间两次提到这首诗。中国三位总理先后提及黄遵宪的，除温家宝外，周恩来曾称赞他对教育改革的贡献，朱镕基亦曾评价他为维新改革先行者[42]。

令人自豪的是，这首诗与新加坡历史有关。这是黄遵宪于1891年赴新加坡任职时，途经香港，有感于国家积弱，列强瓜分而写的[43]。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事三年期间（1891-1894），也写了不少吟咏新加坡风物的诗篇。

1891年秋，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事，至1894年11月卸职回国，旅居新加坡三年多。这期间，黄遵宪的诗作，也有不少反映当地环境和侨民生活情况，为研究新华史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44]。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卷七中收录有〈新加坡杂诗〉（十二首），其中第一首是这样的：

天到珠崖尽，波涛势欲奔

地犹中国海，人唤九边门

南北天难限，东西帝并尊

万山排戟险，嗟尔故雄藩

这首诗是写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新加坡附近各岛，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定其总名曰海门，英国以新加坡为南洋之门户。新加坡战略地位的重要，我们的先辈诗人早已知道了。“人唤九边门”，道出了新加坡位置之所在，犹如中原地区的九边重镇。

〈番客篇〉是一首五言古诗，收录于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卷七。全诗408句，2040字，内容分两大部分。前半部描述华侨富豪举办婚礼的情况，并穿插反映了新加坡华族的发迹史、饮食、服饰、容态、交游和嗜好。后半部以较长篇幅，借与婚礼席间一老人的谈话，抒发了作者的感慨和议论[45]。

〈番客篇〉中有一段文字是描述当年华人家庭的布置。“插门桃柳枝，叶叶何相当。垂红结彩球，绯绯数尺长。上书大夫第，照耀门楣光”。大门扎青结彩，“大夫第”的匾额高悬门楣，反映了早年华侨殷商捐资鬻官购虚衔的史实。从描绘中，可以看到早年华侨，虽然远隔重洋，过着富裕的生活，却仍保留家乡的某些习俗[46]。

除了〈番客篇〉较全面地反映侨民生活外，〈新加坡杂诗〉描述了新加坡的历史，文物及风俗，对华族生活的某些侧面也作了反映。如第八首写的是当时土著妇女的装束：

不着红蕖袜，先夸白足霜

平头拖宝钿，约指眩金钢

一扣能千万，单衫但裲裆

未须医带下，药在女儿箱

不著袜而趿拖鞋，一袭纱笼，是马来妇女和娘惹的打扮。至于戴镶了金钢石的约指，配上珠光宝气的扣子，今日的富家女仍然如此。

榴梿是万果之王，黄遵宪也写入了诗中：

绝好留连地，留连味细尝

侧生饶荔子，偕老祝槟榔

红熟桃花饭，黄封椰酒浆

都缦都典尽，三日口留香

---

[40]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七月，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中国驻新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领事升为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马六甲、海门等处，黄遵宪为第一任驻新总领事。黄遵宪曾作〈图南社序〉一文曰：“夫新加坡一地，附近赤道，自中国视之，正当南离。吾意必有蓄道德能文章者应运而出，而寂寂犹未之闻者，则以董率之乏人，而渐被之日尚浅也。前领事左子兴观察，究心文事，创立社课，社中文辞，多斐然可观。遵宪不才，承乏此间，尤愿与诸君子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窃冀几年之后，人材蔚起，有以应天文之象，储国家之用，此则区区之心，朝夕引领而企者矣。抑庄生有云：鹏之徙于南溟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而后乃今将图南。今故取以名吾社，二三君子其共勉之。光绪辛卯十一月，黄遵宪叙”，参阅郑海麟、张伟雄编校，《黄遵宪文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页129-130。

[41]《黄遵宪 —〈赠梁任公同年〉》，网上资料 http://tieba.baidu.com/f?kz=100387319。

[42] 吴春燕，陈亮谦，〈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感动今人〉，载《光明日报》，2005年3月30日，参阅网上资料http://www.gmw.cn/01gmrb/2005-03/30/content_206047.htm。

[43]〈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感动今人〉。

[44] 柯木林，〈黄遵宪总领事笔下的新加坡〉，载《石叻史记》，页91-101。

[45] 同上注。

[46] 同上注。

“都缦”即是沙笼。本地有“当了沙笼吃榴梿”的谚语，正如诗中所说的“都缦都典尽，三日口留香”。黄遵宪说榴梿香甜胜于荔枝，飨客有似槟榔，美艳似桃花饭，醇厚若椰酒浆，可见他一定很喜欢吃榴梿。

舍影摇红豆，墙阴覆绿蕉
问山名漆树，计解蓄胡椒
黄熟寻香木，青曾探锡苗
豪农衣短后，褊野筑团焦

这是〈新加坡杂诗〉第10首，写的是本地物产。红豆即相思子、沈香木、胡椒皆南洋特产；“青曾”，青石也；漆树指的是橡胶树。胶园、锡矿的工人，大都住在茅舍之中，即所谓“团蕉”也。这首诗写景叙物，南岛风光，呼之欲出。

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事三年期满回国（上海），1895年参加强学会，结识康有为，与汪康年创办《时务报》。1897年以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襄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办新政，并任《湘学报》督办，参与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创办工作，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回乡，从此不再复出。1905年辞世，终年57岁[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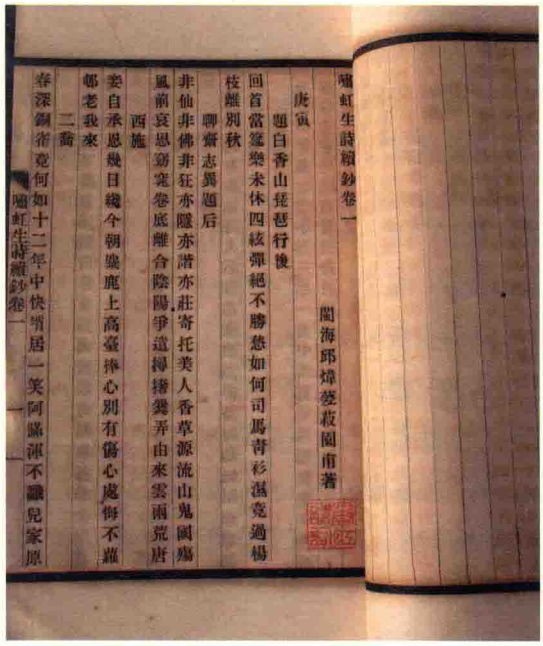
星洲才子邱菽园

久居新加坡的才子邱菽园（1874-1941）是殷商，又是名士[48]。他和中国许多著名学者文人及社会活动家都有联系。他的〈诗中八友歌〉就提到康更生（有为）、黄公度（遵宪）、林氅云（鹤年）、唐薇卿（景崧）、潘兰史（飞声）、邱仙根（逢甲）、王晓沧（思翔）、梁任公（启超）的名字[49]。

此外，还有著名外交家高闳（钝甫）、革命家章炳麟（太炎）、翻译家林琴南（纾）、文学家陈宝琛、江建霞、易实甫（顺鼎）、丁叔雅、张菊生、杨蛰仙；教育家蔡元培（孑民）、画家徐悲鸿、梁杭雪、高剑父、刘海粟等，都与他经常通讯，交换作品。在当年整个东南亚华族社会中，邱菽园声誉之隆，无人能与比肩[50]。

由于长期居住在新加坡，邱菽园的诗文，自然带有极浓厚的地方色彩。最令人神往的，莫过于下引这篇刊载于1898年5月31日《天南新报》的小品，题为〈五百洞天挥麈二则〉，其一云：

余尝登高阜而望，每当夕阳西匿，明月未升，隔岸帆樯，满山楼阁。忽而繁镫偏缀，芒射于波光树影间者，缭曲迴环，蜿蜒绵互，



邱菽园诗集《萧虹生诗钞》（附藏书印）

[47] 同上注。

[48] 有关邱菽园资料甚多，其生平简介可参阅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第1版），页102-103。1941年11月30日上午10时邱菽园于其寓所（42，Amber Road）辞世，时年69岁。

[49] 八友顺序出自邱炜菱，《菽园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368》，《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续编·37》（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

[50] 柯木林，〈新华古典诗文选释〉，载《石叻史记》，页26。

殆不可以数计。……岛人尝称新嘉坡为星嘉坡，向以为译著之偶异耳。今而后知星字之为美，其在斯乎！况是坡也，一岛濛洄，下临无地，混然中处，气象万千，既以星嘉是坡为表异，何不以洲名明坡为纪实耶？乃号之曰“星洲”，而以“星洲寓公”自号。门下士以“星洲”为记实也，遂沿其称曰“星洲”；都人士以“星洲”为表异也，亦群而曰“星洲”。载述于此，为新嘉坡得号所自。

这篇短文，其辞藻之优美，足以媲美〈滕王阁序〉与〈岳阳楼记〉。他自称为“星洲寓公”，把新加坡译为星洲，既合对音，而又雅俗共赏，所以能够沿用至今。学者误以为新加坡别号星洲，系邱菽园所创，盖源自此文。今日，每当落日余晖，晚霞漫天之际，伫立花柏山（Mount Faber）头，眼下一景一物，不也正与邱菽园所描绘的景致相吻合？

邱菽园在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后，便屡用“星洲”一词作为新加坡的别称。如果说左秉隆是“星洲”一词的创始者，邱菽园却是将“星洲”推广应用，可说是发扬光大者[51]。

古典诗文的时代感

南来文人中，有一类比较特别的，那就是政治避难者，最著名的当然是康有为（1858-1927）。戊戌维新失败后，1900年2月2日，康有为从香港来新加坡投靠邱菽园，寓客云庐[52]。客云庐位于恒春号店铺三楼，故址在吻基（Boat Quay，今作驳船码头）17号，这是邱菽园父亲的米店所在地。在这里，康有为赋诗一首，题为《寓星嘉坡邱菽园客云庐三层楼上，凭窗览眺，环水千家，有如吾故乡澹如楼风景，感甚》，诗曰：

小桥通海枕波流，两岸千家数百舟
廿载银塘旧山梦，忘情忽倚澹如楼[53]

此诗描绘了当年新加坡河两岸的景致，也道出了康有为思乡的愁绪。他魂萦旧梦，眼前两岸船只穿梭的情景，使他彷彿又回到阔别多时的家园，游子心情，跃然纸上！

旅新期间，为远离政治是非之纷扰，康有为深居简出，行踪诡秘，外界难以得知。这首题为《星洲闭关赠星洲寓公》正是他在新加坡的生活写照：

我与君居星嘉坡，日饱邻厨腹其皤
顷邈经月不相见，有似年女隔天河
重垣闭关绝宾客，竟日枯坐如禅和
奉花洗叶作功课，午鸡一鸣清睡过
翻思京华人事沓，忽得收身坐维摩

诗题中的星洲寓公指的就是邱菽园。康有为在新加坡时，正值“儒学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际。19世纪末中国的尊孔保教运动，康有为是核心人物。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梁元生博士认为，“康有为在新加坡并不完全是个蛰居的隐者”，他和邱菽园、林文庆等本地儒学运动健将时有过从，也极有可能讨论过南洋的尊孔保教运动，并对这些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新加坡逗留约半年之久，直到1900年8月9日才离开新加坡，迁往槟城[54]。

1900年及1901年的《天南新报》，有许多关于儒学运动的诗文，其中邱逢甲（1864-1912）的〈自题南洋行教图〉一诗，对其在南洋讲述儒学的情形，写得最为生动传神：

莽莽群山海气青，华风远被到南溟
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55]

诗注曰“四月朔日在闲真别墅衍说，闻者以为得未曾有”。这首诗使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波澜壮阔、举世瞩目的“儒学运动”时代。在“南溟”（即南洋）的椰林之中，万人围坐，聆听“圣经”（即中国儒家典籍），这场面不可谓不壮观。

此诗在南洋文化人中广为传颂，而诗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也同样让人震撼。1840年鸦片战争以

[51] 柯木林，〈武吉布朗还有哪些秘密？〉，载《联合早报》，2012年6月16日。
[52] 柯木林，〈新中两国交往大事记（三世纪-1950年）〉，载《石叻史记》，页340。
[53] 张克宏，《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6年），页12。
[54] 梁元生，〈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的儒教复兴运动〉，载《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页75。
[55] 邱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 173。〈自题南洋行教图〉共有二首，还有一首是：“二千五百余年后，浮海居然道可行。独倚斗南楼上望，春风回处紫澜生”（诗注：斗南楼，门人王生所居，予为署额）。

后，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唯有文化，是几千年的积累，仍然是中国人精神的寄托。因此这一时期的南来文人，仍有古国、大国心态，这首诗是最好的说明[56]。

这些新华古典诗文所散发的时代感与生活气息，正是其魅力所在，历久弥新！

碑文资料也是古典诗文

当我们谈及新华古典诗文时，往往会忽略碑文资料。新加坡许多庙宇祠堂中的碑文，都以优美的古文体写成，其中不乏对建筑物周遭风物的描述，至今读之，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立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玉皇殿碑记〉就是一例。〈玉皇殿碑记〉对当年玉皇殿所处的地势，有精彩的描述："（庙）于永全街中，背山环港，渊涵岳峙，绕绿送青，胜地也。且与前所自建之真君庙相去仅数十武耳。而后先辉映，具有形胜"。文中提到的永全街，即今合乐路（Havelock Road）；山指的是当年的公塚绿野亭；所谓港就是前面流经的新加坡河。

玉皇殿至今犹存，但其地势已与碑文中描述的大不相同。今天我们看到的玉皇殿，周边高楼林立，已不见"背山环港，绕绿送青"的情景；而近在咫尺的绿野亭公所，早已在城市重建规划下，烟消云散了！

雄据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天福宫，介于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新加坡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庙，建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这座雄伟的古庙，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列为国家级的古迹。

〈建立天福宫碑记〉对新加坡从开埠到成为大都会的过程，有简单扼要的叙述，十分有趣："自嘉庆廿三年，英吏斯临，新辟是地，相其山川，度其形势，谓可为商贾聚集之区。剪荆除棘，开通道途，疏达港汊，于是舟樯云集，梯航毕臻，贸迁化居，日新月盛，数年之间，遂成一大都会"。碑记确定天福宫的地理位置在"新加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至于何以取名天福宫，"盖谓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碑文文字不仅优美，亦可视为新华社会珍贵史料。

天福宫创建前的新华社会最高领导机构系恒山亭。此亭于1992年5月11日傍晚毁于大火[57]，所幸其碑文文字已被收录在《新加坡华文碑文集录》一书中，因此得以传世。其中〈恒山亭碑〉描写当年"恒山之左"尽是："叠叠佳城，疊疊坵墟"[58]。所谓恒山，指的就是今天的甘榜峇鲁（Kampong Bahru）一带，当年这里是一片坟山，与今日所见的景致大不相同。

早年的庙宇除部分作为国家古迹被保留下来外，其他多数在市区重建计划下被拆除了。建筑物一旦被拆，再加上没有保存历史的认识，碑文资料亦随之破坏，这是进步的代价，文化的损失，有得有失！

新华研究的切入点

19世纪新华古典文坛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组合的结果。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阅这些旧档文献，在汽笛喧嚣的闹市中欣赏这些古典诗文，百年前的风物旧貌，呈现眼前。在令人荡气迴肠的同时，亦不免对岛国百年的沧桑事变，有所感触！

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南来的文人雅士，没

[56] 南治国，〈"凝视"下的图像—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载《暨南学报》期3（2005年），页62-28。

[57]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载《联合早报》，1992年5月17日。该文收录在《石叻史记》，页38-39。

[58] 陈育崧、陈荊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1972年），页221。

相关人物

林秉祥

历史事件

1月15日

和丰银行成立，林秉祥出任董事长

8月10日

南华女校创立

有中国驻新加坡领事的推动，即左秉隆的会贤社与黄遵宪的图南社的努力；没有《叻报》、《天南新报》等早期报章的宣传重视，刊载这些古典诗文，作为史料保存至今，我们是不可能知道当年的文坛，竟是如此热闹，唱酬如此频繁的！

可惜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物换星移，一切都变了！“时代变了，一个讲格致（科学）文明的时代已经来临！环境变了，是一个属于英国人统治下的华人社会而非传统的中国（社会）！语文也变了，许多土生的新加坡华人不谙中文，甚至华侨子弟的中国语文水平也不高”[59]，新华古典诗文终于淡出历史的舞台！

“与君话冷炎州月，是否前生有剩缘”，新华古典诗文中所隐藏的史料，很少为学者重视。学者们不妨以古典诗文作为切入点研究新华历史，或许可以有新的突破！

[59] 梁元生，〈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的儒教复兴运动〉，载《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页66。

第三节　蕉风椰雨文学
——新加坡华文文学

摘要

本节论述自19世纪末以来新加坡华文文学，在中国和台湾文学交织影响下，以及在本地作者和文艺团体负责人的努力下，所走过的蕉风椰雨的不平道路。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Singapore's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Taiwan. However, with the efforts of local writers and leaders of literary associations, it has since developed into a distinctive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杨松年 (Yeo Song N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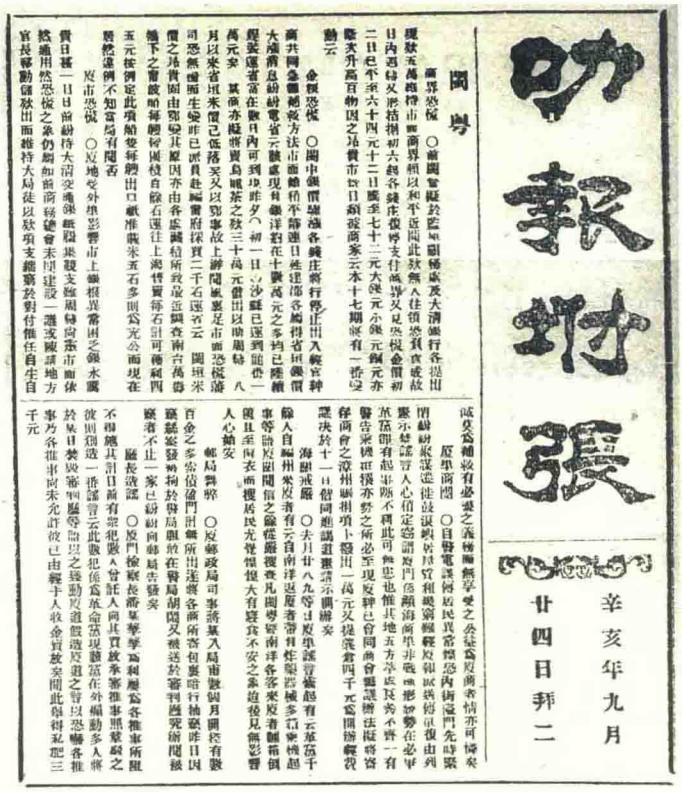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华人大量南下，中国文人也跟着南来东南亚，包括新加坡。就是这些早期南来的中国文人和后来土生土长的华人，在蕉风椰雨飘摇的道路上，共同负起推进新华文学的任务。

19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又有不少中国作者南来新加坡，也和本地作者一样，共同凑出文坛的另一番热闹。

本节将分三个部分论述新华文学的发展。一为二战以前的新华文学；二为二战以后至新加坡独立前的新华文学；三为新加坡独立以后的新华文学。

二战以前的新华文学

在早期的东南亚，报章是推动当地文学的主要力量，新加坡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中国报纸出于消费的考虑，推出形形色色的栏位来刊载文学作品。早期新加坡华文报


叻報張

辛亥年九月廿四日拜二

《叻报》副刊（1911年9月24日）

章创设各种栏位，容纳文学篇章，嗣后中国报章在栏位的基础上，辟设副刊。新加坡报章也随着仿效，接受中国影响的新加坡报章，在栏位的名目上，更是缤纷多样，甚至连传播主体也比不上。如《叻报》副刊〈叻报附张〉小说栏，就有“哀情小说”、“滑稽小说”、“实事小说”、“社会小说”、“报应小说”、“寓言小说”、“道德小说”、“侦探小说”、“骗术小说”、“述异小说”、“言情小说”、“规讽小说”、“记事小说”、“怪异小说”、“果报小说”、“侠义小说”、“义侠小说”、“惩谨小说”、“瘟疫小说”、“家庭小说”、“哀遇小说”、“哀艳小说”、“惊言小说”、“黑幕小说”、“警世小说”、“冤情小说”、“侠情小说”、“苦情小说”、“幻情小说”、“华侨小说”、“抒情小说”、“讽世小说”等[1]。虽然名目多样杂乱，但也能看出当时编者对这类作品的重视。

早期的文学作品，都是旧文体，除了旧文体小说、古文、诗词，还有粤讴、龙舟歌等等。甚至在五四白话运动发生前，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包括提倡白话文的文章，也是用旧文体写成的。如1919年9月，林克谐发表于《叻报》的文章中支持与提倡白话文，文章〈欲言语统一非改编小学国文课本为白话文不为功〉表示：十数年来，学校在推广国语的工作上失败的原因在于方法上的失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须置于白话国文教授的推广。他说：“盖白话国文，文义浅近，其文字即言语。言语即文字，以此而施之小学员，由国民而高小，先后七年，读之，默之，讲之，作之，卒不能将所学者而说话，吾不信也，即世人亦必不信之”[2]。

侨民意识浓厚时期的新华文学

1919年10月1日，新加坡另一主要报章《新国民日报》发刊的那天，主笔张叔耐用白话文写发刊词，其中说：“报纸是开通风气的东西，自要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若满口之乎者也，说着经书上的话头，孔孟的道理，只讨好了旧派的人，新派的人便不赞成，并且也不太合时宜”[3]，不但解释该报之所以提倡白话文的原因，也显

[1] 杨松年，〈1900年至1920年台湾新马旧体问题文学之比较研究〉，载龚鹏程、杨松年等编，《21世纪台湾、东南亚的文化与文学》（台北：南洋学社，2002年11月），页85–96。

[2] 《叻报》，1919年9月3日。

[3] 《新国民日报》，1919年10月1日。

示他是从大众传播普遍性的角度来提倡白话文的。张叔耐也是一位杰出的旧文体写作者，当时报纸用文言文写成的社论，多是出自他的手笔。不仅如此，他也写作许多旧体诗，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新国民日报》报纸题名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新加坡白话文学就在新旧文人的合作下，展开它的发展道路。

经济压力是当时华人南下的主因。根据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中国太平洋学会对闽粤10个县的905户有亲人出国的家庭的调查发现，由于经济因素出国的有633户，占69.95%；其他原因包括南洋有关系、天灾、企业发展、行为不检被逼出国等等[4]，显示当时多数华人是由于不得已的因素而南下的。南下后，只有少数能够衣锦荣归，多数人或者因为挣得财富之后，不想放弃已经经营多年的事业，或者已经满意所从事的工作，不想回去；而更多的人，因为没有积蓄，仍然等待好运的到来，继续留在异地；或者看到、听到中国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安，经济依然穷困，不要回去再度受苦。

留下来的华人，故乡的感情非常浓厚，在1925年以前的新加坡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个词语是“爱国”。作者们论述爱国的定义，如超顽的〈爱国释义〉、鸠的〈怎样才算得爱国〉，互助的〈爱国浅说〉；强调爱国的重要性，如白华的〈为什么要爱国〉、王琼心的〈爱国与爱家孰重〉；要求以实际行动实现爱国，如怨汉的〈爱国宜实践论〉、傅箕的〈爱国当从爱用国货起〉等等。如果再就一些作品进一步阅读，作者的爱国情绪更加清晰了，所指的国当然是中国，而编者们基于爱国感情，大量发布这类作品，把它提高到无上的地位。

《新国民日报》编者张叔耐在1919年10月1日的《社论》中说：“我们虽则侨居在南洋地方，但是我们的根本，毕竟还在中国，因为我们到底还是汉族，到底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现在虽则在英荷两国的属地上做事情，到底是个客居的客人”。又说：“古人说得好，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正体现这种爱国观。

这种情绪也表露在对国庆日的庆祝事上。中华民国国庆日到，报章充满呼吁参加国庆节、支持国庆节、认识国庆节的文章。1919年10月1日《新国民日报》刚创设，对国庆日庆祝的言论不多。但是看到那一年国庆的气氛薄弱时，第二年编者也好，作者也好，就有多篇嵌有“国庆日”、“双十节”的词语文题的作品出现。如刘两峰的〈星侨对国庆日当如何乎〉、鸠的〈侨胞乎迎接第九度双十节〉、愚的〈侨胞乎当知双十节行将近矣〉、那森州的〈劝告侨胞庆祝双十节〉、佚名的〈望侨胞对于国庆日之庆祝〉、李子石的〈对于双十节的感想以告国人〉等等。

此外，报章文章也常常吁请侨胞注意中国的问题。如佚名的〈南洋畅销国货之妙音〉、思明的〈南侨宜注意祖国实业，忘本的〈吾侨胞宜举行黄花岗纪念〉、张剑雄的〈请华侨注意共和与帝制〉、意予的〈中国式教育应改革之点〉、佚名的〈中国农用肥料问题〉、意予的〈中国式生活应改革说〉等等。

可以说中国意识非常之浓厚，在二战以前马华文学的分期上，笔者称1925年以前的新加坡文学为“侨民意识浓厚时期的新华文学”。

南洋色彩萌芽至蓬勃期的新华文学

在1925年以前的新加坡华文报章，虽然有以“南洋”为名的，但并不普遍。到了20年代下半段，“南风”、“南洋”、“南国”、“南岛”成为许多杂志以及报章副刊的名称，作品以这些词语为题的更大量出现。

新加坡《新国民日报》率先于1925年推

[4]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页48。

出一份副刊《南风》。作品如张金燕的〈说说南洋的文艺热〉、撕狮的〈南洋的文人现在的愿望〉、依夫的〈充实南洋文坛问题〉、黄僧的〈给一般志在南洋文艺的朋友〉、如焚的〈南洋文艺特征的商榷〉、陈炼青的〈文艺批评在南洋社会上的需要〉、火星的〈对于南洋的文艺说些不重要的话〉等等。篇名都嵌有“南洋”一词。

更引人注意的是这些刊物编者发出的宣言式的呼声。如《南洋商报》副刊《文艺周刊》编者曾圣提言及发刊宗旨在于：“这个刊物并无特别使命，她只想在万里炎阳的热国，找寻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召募她的同情者，同时（在）高椰胶树之下，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叻报》副刊《椰林》编者陈炼青表示：“我们观之北美，其殖民历史与我华人相埒，可是他们到了现在，已经创造一种美洲特殊的文化了，我想希望南洋文化能够萌芽的，总要努力来促成它赶快萌芽，更要努力来促成它赶快发芽，以至开花”。

文学作者的声音更响亮了。张金燕在《南洋与文艺》中表示：“我的皮肤遗传着祖宗旧衣裳，而黄姜、咖喱把我的肠胃腌实了，因此我对于南洋色彩浓厚过祖宗的五经，饮椰浆多过大禹治下的水了”。黄征夫则从另一方面强调创造南洋学术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南洋学术文化落后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总以为我们侨居南洋是客属，不明了事实和环境上，华侨地位已确定其固定性，一般人终是痴望祖国境况更佳时就回到父母之邦，不知华侨是绝对离不开南洋的”。

由于提倡南洋色彩，编者除了鼓励描写南洋社会生活题材外，马来人的历史、生活、文学、艺术也成了作者关注并加以介绍的对象，作品有因明、承微合译的〈马来半岛之历史述概〉、李金煌的〈马来族之生活状况〉、EE译的〈马来歌〉、革尘的〈马来民歌二首〉、桂昌的〈马来漫画之二〉、LK的〈马来故事：乌鸦与仙女〉、毓才译的〈马来情歌〉、虚的〈马来传说〉、穗仙译的〈马来恋歌〉、曼四的〈马来民歌〉、及韩朝的〈马来民歌选〉。

可以说这时期文学中的南洋情感由萌芽而趋于强烈，在二战以前新华文学的分期上，笔者称这时期1925年至1933年的文学为“南洋色彩萌芽至蓬勃期的新华文学”。

马来亚文学特殊性的文学

1934年后，新华文学作者对用“南洋”一词来称呼当时的新华文学，开始不满意了，原因在于这一词语欠准确性。作者一礁表示：“目前在我们的文坛上与马来亚文学并行着的，有南洋文学的一个名称。我认为事实正要求着我们把后者放弃。因为南洋不仅在区域上是广阔散漫的，就是政治关系的隶属上，也有着它们不同的宗主国（暹罗，它的政治形态及其文化与其他各地还存在着更大的差异）。何况，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工作范围，也只在马来亚。”

所以在1933年后，我们看到异于上一个阶段文学词语的出现：马来亚文学或马来亚地方文学。马来亚文学的提出，是南洋文学理念更进一步鲜明化的结果。这种迹象始于1934年3月1日废名于《南洋商报》副刊发表的〈地方作家谈〉的文章，文章中确定马来亚自有它的地方文艺，废名除了给马来亚地方文艺以及地方作家下定义外，更批评当时作者忽视马来亚地方文艺的态度，并举出14位可称为马来亚的地方作家。这篇文章引来热烈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废名对本地作者到上海发表文稿的批评，及他推荐14名堪称马来亚地方作家的方法。且不论争论的详细情况，在这场争论中，我们看到众多含有“地方作家”关键词的文题出现，如C君〈地方作家介绍的商榷〉、则余〈地方作家谈的检讨〉、废名〈总算我抛了一块地方作家谈的砖〉、长江〈杂感而已：关于地方作家〉、C君〈再和姜生先生讨论介绍地方作家〉、苔莉〈地方作家论题的检讨〉、柳何依〈介绍地方作家的清算〉、姜生〈讨论地方作家〉、与〈地方作家讨论的余音〉。地方作家已是当时作者心目中重要的观念。

在上一个阶段，我们看到许多作者重视南洋色彩，强调南洋地方色彩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对中国影响的挑战。但在这阶段，废名在强调马来亚地方文学的同时，也对中国影响作出如是揶揄的挑战：“大狗可以叫，难道小狗就叫不得。何况大狗未必有小狗叫得那样好听。更何况目前上海的中国作家们，除了一般上层豢养的大狗和一些疯狗癞狗等以外，有几个作家值得我们重视的呢”。

这就是我常提及的文学传播的不接受的问题。1936年发生的另一场论争也可以了解到马来亚文学在新马作者心

目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本土文学的态度，和对外来影响的抗拒。事缘1936年9月一位作者曾艾狄在《星洲日报》副刊发表一篇文章〈马来亚文艺界漫画〉。文章讽刺当时作者喜欢搬取中国文坛文学口号的现象，讽刺这是一种搬尸的行为。文章更强调：马来亚应该有马来亚文艺的生命，马来亚文艺界应该不是只搬尸的公式主义的理论。

文章发表后所引发的争论，多数文章文题有“马来亚文学”、“马来亚文坛”的字眼。如一礁〈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羊羽〈当前马来亚文化之路〉、李润湖〈马来亚文艺的特质〉、陈玉兰〈马来亚文坛零话〉、杨如〈漫话马来亚文坛〉、木鱼〈关于马来亚文学的商榷〉等等。

另一个令人注意的现象就是在这阶段，各报章大力推动年终总结马来亚各方面文章的发表，而这些文章提及这地区的文学、文坛，文题都用上“马来亚”的字眼。如马达〈1936年马来亚文坛〉、黄石〈1936年马来亚文艺界动态概述〉、人生〈1936年马来亚文化界动态〉、李润湖〈1936年的马来亚文坛〉等等。

这是一个提倡马来亚地方文学、强调马来亚文学特殊性的文学时期。

本土意识蒙受挫折时段的新华文学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华民族面对存亡的关头，处在东南亚包括马来亚的华人，虽然外移已久，但毕竟是中国人。面对如此危难局势，多数人热血沸腾，积极参与救亡队伍。在报章上，1920年代中期以后少见的关心中国、爱护中国、挽救中国的作品又大量出现。单是七七事变发生后几个月间，文学作品文题也经常出现中国两个字，或者高呼中国伟大，如苍人的〈伟大的中国〉，或者呼吁保卫中国，如广田的〈保卫我们的祖国〉；或者自豪地宣称他是中国国民，如广广的〈我是中国的国民〉。而一切都指向一个目标：爱国。

即使到了本阶段中晚期，中国多个地区沦陷了，地区沦陷一方面引发南洋华人的战斗火焰，另一方面引起他们无尽的乡愁和乡思呼吁战斗的，如洪英〈战斗的祝福：给在祖国的朋友〉、伟夫〈祖国的春〉、涔岑〈祖国〉、杨越〈投向祖国的怀抱〉、西风〈保卫我们的家乡〉、西风〈送君上征尘〉。乡思乡愁缕缕的，如倩丽〈乡思〉、青苔〈乡思〉、宋凌云〈思乡〉、烽丁〈家乡〉、凌沙风〈乡愁〉。而由于乡思、乡愁的大量出现，还引起文艺界的批评，并引起一场争论。

前一阶段一礁所说的：“我们生活着的社会是马来亚的社会，却不是远在他方的祖国”的理念已经不再藏存在作者的心中。作者呼请人们爱国，关心祖国，更激励人们回去中国参战，以最实际行动体现爱国的精神。作品如陈焕的〈关于回国〉、佚名的〈一个可爱的马来亚侨生：抛弃家庭回国服务〉、在干的〈知识分子需是无需回国参战吗〉、吴惊唤的〈回乡杀敌去〉、林翰水的〈回国吧华侨救伤队〉、玉萍的〈写于槟华救伤队回国之后〉，都围绕着回国的种种课题提出意见。

“抗战”、“救亡”、“抗战文学”等字眼充斥在作品的题目中，如林蒂的〈戏剧与救亡〉、火树的〈救亡声中的华侨儿童〉、初航的〈救亡线上的岑株〉、渔光的〈马华文艺界如何克尽救亡的任务〉、南鳌的〈知识分子的救亡工作〉、萌声的〈一点意见：关于南洋知识分子的救亡问题〉、黄石的〈我的意见：关于南洋知识分子的救亡问题〉、高原的〈南洋文化界的救亡工作问题〉、？飞的〈建立马华漫画作者抗战统一阵线〉、尤致明的〈抗战与通俗化运动〉、林铭的〈抗战时期的马华出版界〉等。例子之多，不胜枚举。

这是一个侨民意识再次高度腾涨，本土意识蒙受挫折时段的新华文学。

相关人物

林文庆　林义顺

历史事件

6 月 28 日

华侨银行成立，创办人为林文庆、林义顺等

二战以后至独立前的新华文学

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是新马人民的悲惨岁月。战后，萦绕马来亚文学作者的另一个课题是战争的回忆与沦陷时期所受痛苦的追思。

战前马来亚人民抗战救亡活动，以及日军侵入马来亚前人民的抗日行动，都深深地激怒了日本军方。日军占领马来亚时，实行大检证与屠杀反日分子。知识分子是日军最密切注意的对象。因此在这方面所受的迫害也较大。所以在日军铁腕的管制下，不少文人逃亡，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失去生命。战后的马来亚文学作品有对牺牲的文化人的哀思，也有充满逃亡经历的回忆。《南洋总汇报》推出的"记者节特刊：并追悼被难同志"特辑，所刊出的作品有胡愈之〈追悼几位殉难的旧同事：悼前《南洋商报》记者庄朝松、陈重庆、叶时候、许贻瑶先生〉、胡佗〈怀念纪放眼先生〉、石蕴真〈记郑卓群〉、曼的〈忆沈良牧〉、菲的〈悼林潮平〉、哲的〈念彭佐良君〉等等[5]。

回忆逃亡作品中以关于胡愈之、沈兹九、郁达夫、巴人、李铁民、王纪元、汪金丁、张楚琨、流浪、高云览等人之逃亡苏门答腊的居多，而郁达夫的牺牲尤其令这些逃亡的文友更为怀念。这方面的作品包括胡愈之有关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6]、林非心的〈纪念郁达夫先生〉[7]、罗方的〈郁达夫先生轶事〉[8]、丁英的〈郁达夫的悲哀〉[9]、殷甫的〈忆郁达夫先生〉[10]、大白的〈忆念郁达夫〉[11]、郑亚平的〈忆郁达夫先生〉[12]等等。

侨民文艺和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时期

对战争带给人间的灾难与浩劫，文学作品也有具体的描绘。丘天的〈复仇〉写出日军轰炸后的荒凉情景[13]。为对付反日分子，日军展开大检证、大屠杀行动，不少人因此而遭殃，佚名〈双溪大年与居林之屠杀〉[14]、春生〈峇株巴辖蒙难经过〉[15]、佚名〈哥打丁宜屠杀纪实〉[16]、廖良贻的〈暴日在霹雳之残杀〉等文章就写出马来亚各地人民在大检证、大屠杀行动中蒙难的情况。而被日军拘捕的，也在牢狱中蒙受种种的酷刑。方念祖的〈槟城大检举及日寇毒刑〉[17]、扑志的〈检证在吉隆坡〉[18]、寒枝的〈被检证那天〉[19]、谛克的〈检证在王家山脚〉[20]与〈从被捕到出狱〉[21]、蓝孔影的〈我的被捕〉[22]、黄伟强的〈兴楼狱中〉[23]等等，写出被捕人士所受的各种毒刑的惨状。对敢于挺身与日军作战，或者在沦陷期间敢于从事秘密活动反对日本的英雄人物，文学作品也没有忘记为他们添上色彩。胡建人〈新加坡保卫战的回忆〉[24]、谭显炎的〈潜渡印度洋〉[25]、吴在新

---

[5]《星洲日报》，1946年8月31日。
[6]〈记者节特刊〉，《星洲日报》，1946年8月2日。
[7]《华侨日报》副刊《星海》，1946年3月11日。
[8]《华侨日报》副刊《星海》，1946年3月2日。
[9]《公报》，1946年7月9日。
[10]《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46年7月9日。
[11]《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46年5月28日及29日。
[12]《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46年11月1日及2日。
[13]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2）》（小说一集），页23。
[14]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新加坡：新加坡文史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页840。
[15]《星洲日报》的《柔佛华侨近年殉难侨胞特刊》，1947年3月17日。
[16]《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533-534。
[17]《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509-512。
[18]《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45年10月20日及23日。
[19]《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46年5月23日、25日、27日至31日。
[20]《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45年10月9日。
[21]《总汇新报》副刊《文会》，1948年6月10日至15日、17日、18日。
[22]《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45年9月24日至26日。
[23]《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45年12月19日。
[24]《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45年10月23日、26日、29日。
[25]《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646-648。

的〈从重庆到马来亚〉[26]，都是描写抗敌人员的经历。而对抗敌牺牲的人士，文学作品也加以歌颂与哀思。作品悼念林谋盛烈士的有：云仙的〈悼林谋盛烈士〉[27]、无邑的〈星华义勇军追悼阵亡烈士大会记〉[28]、龙光标的〈王宝兰等被害记〉[29]、陈宗狱的〈沈慕周烈士素描〉[30]等。

日军投降与新马的光复，也带来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豪气。他们向往美丽的生活，歌颂不愿再度遭受欺压、凌辱的意志。如铁戈的诗〈在旗下〉、逸人的诗〈黎明之唱〉等。

日本投降后，英军于1945年9月再度踏上马来亚的土地，继续其宗主国管治。马共游击队走出森林，左倾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也在这个时候成立。职工会活动的蓬勃，也增强左翼的势力。英国殖民地政府与马共的摩擦终于促使英国政府利用1948年6月16日马共在和丰的一次武装攻击，宣布紧急状态，实施紧急法令，加强对新马的围剿。这对马来亚的政治、社会、文化都有重大的影响。

许多逃难的知识分子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光复后纷纷回归，在新马奋斗的文人也在战后拿起了笔继续创作。具有强烈中国意识的作者仍然创作中国的主题，但是撰写本土的各种题材的作品较前有显著的增加。具有中国色彩的“侨民意识”文学与本土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是本时期文坛的一大事件。

1947年底，星华文艺协会举办第一次马华文艺独特性座谈会，会议肯定马华文艺是世界文学的一环，有其特殊的内涵；新马华人社会虽然具有中国的传统方式，但在时空的影响下，也有它的特性；中国南来作者，虽然可以写中国事物，但也必须关心与写作马来亚的题材。会议虽然接触到了新马华文文学应当有其特殊性，但所提出的意见并没有引起不同的反应。1948年吉隆坡《战友报》新年特刊刊登周容的〈谈马华文艺〉，指出一切文艺都有它的特殊性，马华文艺也不例外。有特殊性的文艺一定写此时此地的事物。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截然不同的关键，就在于马华文艺必须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而侨民文艺作者就不如此。因此他直接提出写此时此地的具有独特性的文艺才是马华文艺，没有独特性的是“侨民文艺”。身在新马却写中国的事物，犹如“手执报纸而眼望天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之所为。“身处马来亚而等待中国人民大翻身”，也只能做个逃难作家。

周容的这篇文章引起侨民作者的反驳。李玄〈论侨民文艺〉、沙平〈朋友你钻进牛角尖里去了〉等批评周容的见解。之后周容再撰文〈也论侨民文艺〉回辩。周容这篇文章发表后，引来多个作者的回应，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其中一些文章为：知角的〈是朋友，不是敌人〉[31]、〈争问题，不争意气〉[32]、海郎的〈是侨民文艺呢？还是马华文艺〉[33]、光明的〈我对马华文艺论争的意见〉[34]、马达的〈我对文艺论争的管见〉[35]、铁戈的〈文艺独特性、任务、及其他〉等[36]。其他参与的还有：

[26]《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649-651。
[27]《华侨日报》副刊《星海》，1945年1月14日。
[28]《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829。
[29]《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845-846。
[30]《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46年12月15日、18日。
[31]《民声日报》副刊《新风》，1948年1月26日。
[32]《民声日报》副刊《新风》，1948年1月29日。
[33]《民声日报》副刊《新风》，1948年2月4日。
[34]《民声日报》副刊《新风》，1948年2月6日。
[35]《民声日报》副刊《新风》，1948年2月15日。
[36]《民声日报》副刊《新风》，1948年2月16日。

引流、冠雄、符人、金丁、西樵、丝丝、小郎、闻人俊、克刚等人，甚至在香港的中国作者夏衍[37]、郭沫若[38]也卷入这场论争中[39]。文章数十篇，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论争。

这是一个侨民文艺和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时期的新华文学。

反对黄色文化，本土意识继续拓展时期

1948年英国殖民地政府为对付马来亚左翼分子，实行紧急法令，管制民间的结社与出版活动，禁止左翼政治运动。战后蓬勃发展的新华文学在这种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下，消沉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较为软性的文化。这些作品有些强调色情，有些反映个人消沉的情绪。当时有些文学评论者就把这一类的文化称为黄色文化。

编者将当时的文学环境形容为黑暗的处境，或者直接指出当时的文学是处于低沉的状态，或者两者兼具。有些编者就以激励的语调来勖勉当时的人们，也勖勉自己。《南洋商报》副刊《文风》的编者杏影〈谈黑暗〉说："没有黑暗，我们那里会晓得光明的可爱，那里能理解光明的意义和价值！世间没有凶恶存在，怎能见出善良？没有怯懦，怎能见出勇毅？没有奸诈，又怎能见出忠诚？"[40]

1953年10月12日在新加坡珍珠山下发生的女学生庄玉珍被奸杀的事件，原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文化界将它扩大为文化问题，并以此作为扭转紧急法令实行后文化界陷入消沉状态的文化行动。舆论界、文化机关、学校、学生组织纷纷举办反黄运动。反黄运动可以说使文学活动获得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也使文学的社会活动有了可以发展的空间。它促成星华文化协会的成立。星华文化协会在下一个阶段的政治运动中就扮演重要的角色。

就是在1953年末以后，文艺才出现振兴现象。新加坡荒地社在1953年9月推出纯文艺期刊《荒地》，前后共出版18期。之后有多种文艺刊物相继出现。野草社于1954年1月出版《野草》，姚紫于1954年2月创设《文艺报》，人闻月刊社于同年3月出版《人闻》月刊，耕耘出版社于4月推出《耕耘》，中正中学也在9月出版《学文》，人间出版社于11月创刊《人间》，这些都是纯文艺刊物。此外在新加坡出版的期刊尚有：《南洋月报》、《文艺行列》、《新生》、《新苗》、《南洋青年》等等。

20世纪40年代末紧急法令的实施，殖民地政府展开肃清反对的力量，使到有些激进的文学作者被拘捕入狱，不少侨民文学作者或者被遣送出境，或者选择回返中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留在马来亚的侨民作者，也改变过去的看法，渐渐树立本地的感情，树立马来亚的认同意识。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见解遂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随着东南亚日益蓬勃的民族自主运动而发展，随着土生土长的马来亚作者的逐渐成长。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作品，虽然还是以侨民的意识来创作，如杨嘉的小说《归侨》[41]，但是这种意识已渐渐地衰微了。

受到文艺界呼吁描写此时此地的影响，以及人们的心态倾向于关注本土的命运，大多数作者转向反映马来亚社会，特别是都市、乡村里的小人物的生活。萧村虽然是南来的作者，作品的写作方向却转向本土，他的小说《山芭》，写本地乡村妇女孤苦无靠，最后不得不牺牲肉体的故事[42]。《国术师》[43]、《半天娘娘》[44]，就着笔于描写本土乡村人民的愚昧无知，容易遭受蒙骗。其他作者也把笔端朝向社会的不同方面。貂问湄的小说如《小鬼春秋》[45]、《出路》[46]等，"意在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丘絮絮的作品

---

[37] 夏衍的文章为〈马华文艺试论〉，载香港《文艺生活》海外版期2（1948年3月）。

[38] 郭沫若的文章为〈关于马华化问题〉，载香港《文艺生活》海外版期1（1948年2月中）。另一篇文章为〈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载香港《文艺生活》海外版期2（1948年3月）。

[39] 有关此论争的更详细情况，参阅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吉隆坡：董总出版），1987年4月。

[40] 文章写于1951年1月，见杏影《愚人的世纪》（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

[41]《风下周刊》期121，1948年4月10日。

[42] 参阅萧村，《国术师》（香港：学问疏导，1951年）。

[43] 同上注。

[44] 同上注。

[45] 作品写于1954年2月。见《小鬼春秋》（新加坡：文汇出版社，1957年）。

[46] 作品写于1954年4月。同上注。

多关心当地的学校教育与女性生活，写学校教育的有《学府风光》，写女性问题的有《牺牲者》、《变》、《被幸福摈弃的一群》等等。

这是一个反对黄色文化、本土意识继续拓展时期的新华文学。

本地意识腾涨、爱国主义文学提倡时期

1955年以后，新马人民在要求结束殖民地统治上，态度越来越鲜明。1955年英殖民地政府答应新加坡成立民选政府，1959年执政的民选政府在和英国政府的谈判后，争取到实行内部自治的协议。1959年6月，新加坡自治邦成立。马来亚更在社会各阶层的努力争取下，比新加坡更早在1957年结束殖民地统治，获得独立国的地位。

文化上，随着马来亚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意愿的进一步发展，马华文化界在前期反对黄色文化建立健康文艺的基础上，进一步酝酿更紧密的团结，朝向争取独立的目标前进。1956年3月星华文化协会为响应默迪卡大会，召开全星文化界大会，会上提出了爱国主义文化的口号，并以之为当时文化工作者的工作重心，对这时段的文学也有重大的影响。马来亚文艺界在响应星华文化协会的宣言上，除了提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之外，也倡立爱国主义文学的口号。

歌颂马来亚独立、歌颂人民解放自由、强调斗争是这时期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的主题。马来亚还没有成为独立国，文学作者已经将它视为祖国，并且为它的走向独立与自由而期望，甚至欢呼[47]。

有如杜丝工在爱国主义文学口号中所要求的，这时期有不少文学作品，意在暴露下层人民所受的痛苦社会，直接或间接地暗示造成人民贫困的主要因素是殖民地政府的施政， 或殖民地政府与资方勾结，剥削人民的结果，所以劳方联合团结以抗拒资方不合理行为的行动，就得到写作者的赞颂。也有含蓄地提醒人们在情感极为波动的时刻，应稳着脚步的话语，如周灿的《青春》。

有系统地进行马华文学的史料整理与撰写工作也在这时段开始酝酿。方修是这项工作的先导者。在1957年春天，一位作者漂青借给方修一批战前出版的《南洋周刊》等杂志，引起他“希望能为早期马华文艺界的劳绩留下一点纪录，同时也给将来编写马来亚文学史的人略作参考”的构想。这构想使他在开始的阶段完成一些论析马华文坛往事的篇章，并将1957年8月至1958年3月间所写成的这一类作品，集为《马华文坛往事》一书[48]。然而这些作品还是属于单篇之作，大规模的撰写工作仍有待发展 。

这是一个本地意识腾涨、爱国主义文学提倡时期的新华文学。

本土意识继续腾涨、后新加坡自治时期

1957年马来亚独立，1959年新加坡自治，1963年马来亚又和新加坡组成马来西亚。新形势的发展带来接二连三的喜讯。在上一阶段对这些喜讯的欢呼，到这一阶段，仍然持续不断。

许多作者认识到，马来亚独立了，新加坡自治了，马来西亚组成了，这些胜利的成果是属于全民的，也就是属于各民族的。因此，新的文学形势要求“艺术工作者必须努力从事于创造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促进各民族兄弟团结一致的优秀艺术”。

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当时的知识分子显然将重点置于对马来亚的关心与爱护上。关心马来亚，就应对马来亚有更具体的认识。所以在这时期，我们看到不少介绍马来亚的作品出现。

他们通过多种样式致力于介绍其他民族的

[47] 吴岸诗作〈朋友〉。见《盾上的诗篇》（新加坡：新月出版社，1962年）。

[48] 方修，《马华文坛往事》（新加坡：星云出版社，1958年）。

相关人物

陈嘉庚　林文庆

历史事件

陈嘉庚斥资1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聘请林文庆为首任校长

生活、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促进民族间的了解，以达到种族和谐的目的。韩玉珍所写的诗剧是当时轰动文坛的杰作。他在1962年以一篇《丹那苏布尔》参加新加坡南洋大学举办的创作比赛，内容写马来民族英雄汉都亚领导军队与山魔、水怪、风妖决战的故事。这是马来神话故事，而韩玉珍以诗作的形式把它演绎开来。1965年韩玉珍在出版他的另一首长诗〈茉莉公主〉，内容写布沙加国女王为女儿娶亲的故事。“写得更是情节迂回，高潮跌宕，把读者引进如幻疑真的艺术境界”。

在这阶段中，我们更看到许多关于马来民间故事、马来文学作品翻译的作品出现。

所谓爱国主义思想，有些作者更直接表示是“爱国观念及马来亚意识”。他们甚至提出要“建立一个马来亚共同的道德观念”。在探讨如何建立马来亚共同意识上，文学论者表示，建立这种共同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对当时不少写作者来说，写实主义的道路是他们极力坚持的原则。国家的独立固然引起他们的兴奋，然而他们仍然关心社会的问题。因此社会的矛盾，下层人们痛苦的生活，是他们关心的重要课题。他们同情穷困的人们，不少作者将他们的笔触指向劳苦的人民，写他们的失业，写他们被雇主的剥削，写他们的穷困让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陷入恐慌的境地，是当时非常普遍的题材，特别是小说创作。

不过在这时期，我们同时看到另一类文学创作崛起。环绕在1960年代初期马来亚文学杂志《蕉风》周围的一些写作者，在黄崖的促进下，从另一些方面思考文学创作的问题。他们举行了不少文学会议，致力于建立现实主义文学以外的文学道路。他们强调追求的文学目标在于现实主义者所否定的真、善、美；强调自由心灵表现的重要性。

现代主义文学的提倡确实给新马文坛带来另一番景象。一些作者致力于这类作品的创作，也取得可观的成绩。

1960年代钟祺与林方等人的论战，是当时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紧张关系白热化的冰山一角，两种文艺路线的其他作者在行文间互相攻击的情况，也常有所见。文艺界几乎分为两个水火不相容的门派。直至70年代中期，由于有一些文坛人士极力呼吁门户开放，在所编辑的文学刊物中，极力容纳不同门派的作品，文艺界才开始有了新的气象，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作者开始互相容纳，在同一文学刊物中发表作品，最后演变成能够在同一文学团体中共同推动文艺。

这是一个本土意识继续腾涨、后新加坡自治时期的新华文学。

独立以后的新华文学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此前，新马华文文学的关系密切，新加坡有任何文艺纷争，往往会引起马来亚文坛的反应。相反的，马来亚文坛有什么变动，也会引起新加坡华文文坛的关注。

1965年以后，新马华文文学各有各自发展的道路，各自具备的风格，也各有各自的成就。1965年以前，我们可以合新马华文文学在一块研究，称它们为马华文学或新马华文文学；1965年以后，则非分开两者研究不可。在新加坡，人们称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为新华文学，在马来西亚，人们称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为马华文学。马华文学的名称常和一些统称战前与战后的新马华文文学为马华文学的相混。

独立后的新华文学，在出版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可说是取得丰收。在单行本出版方面，新加坡自1945年至1965年20年共出版477种文学书籍：其中诗集44种，小说集197种，散文集112种，剧本36种，史料评论13种，丛刊75种。而自1965年至1980年的15年共出版554种，远较上一阶段多得多了。其中诗集112种，小说集136种，散文集183种，剧本25种，史料评论40种，丛刊58种。

文学杂志的出版也由沉寂逐渐走向繁盛，1965年7月后至1967年，在新加坡出版的文学杂志有：《南风》、《文艺生活》、《文学月刊》、《新诗月报》等。一般刊期都很短，《文艺生活》、《文学月刊》只推出1期，就停刊了。只有《新诗月报》、《南风》坚持的时间较长。1967年后，情况有所改善，所出版的杂志有《新社文艺》、《岛屿季刊》、《旭阳》、《驼铃报》、《里程碑》、《乡城文艺》、《前卫》、《山花》、《星光》、《文峰》、《新野》、《狮岛青年》、《茶座》、《青年文艺》、《猎户》、《岛屿月刊》、《前卫》、《南涛》等。综合性的杂志如《新加坡月刊》、《南洋教育》、《建设月刊》、《电视与广播》等，也容纳一些文艺作

《蕉风》创刊号（1955年11月10日）

品。1970年以后至1976年，文学杂志的出版更是繁盛。

1976年教育出版社《新加坡文艺》大型文艺刊物的出炉，给文坛带来更大的冲力。该期刊于1976年1月创刊，季刊，每期出版百页以上，办刊宗旨中容纳不同门派的作者的作品，对当时文坛分门分派的现象影响不小，其后的文学团体与出版物业都以此为号召。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出版的《文学半年刊》，是一份拥有许多写作人支持的刊物。南洋大学诗社也出版《红树林》诗刊，以新颖的风格给当时的诗坛带来新的气息。《度荒文艺》年刊，在设计与选稿上，予人深刻的印象。楼出版社推出丛刊《楼》，致力于推进现代精神的文艺。山图书公司的《拾穗》，是新马第一部纯文艺评论杂志，自有其的特色。综合性杂志《乡土》于1979年发刊，也容纳文艺作品。职工总会《奋斗报》，自1977年起改为杂志型，并设有文艺版《狮城文艺》。《新加坡月刊》辟设《新苑》，《新加坡青年》、《民众报》都拥有文艺的版位。

学校刊物大量涌现是这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色。中学的刊物如公教中学的《学文》、中正中学的《湖声》、立化中学的《立风》、《立化学苑》、德新中学的《德新园地》、华侨中学的《艺澜》、《华岗》、德明政府华文中学的《野草》、德新中学的《德新园地》、德能中学的《星座》、育英中学的《文海》、黄埔中学的《绿野》、大智中学的《大智文艺》、笃德中学的《文晖》、华义中学的《文艺列车》、《华义文丛》、圣公会中学的《文苑》、圣尼格拉中学的《基石》、瑞士村中学的《村籽》等。初级学院有国家初级学院的《晨曦》、圣公会初级学院的《文苑》、圣安德烈初级学院的《晓风》、华中初级学院的《华韵》、公教初级学院的《长风文艺》、南洋初级学院的《棕榈》、淡马锡初级学院的《绿涛》、《淡马锡文艺》等。大专学院也出版文艺刊物。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出版《文艺季风》、《激流》、《绿洲》，新加坡工艺学院有《新时代》、南洋大学中文学会有《北斗》，《北斗》停刊后另推出《新生》，义安工艺学院的《文艺生活》、《焦点》，国家初级学院的《晨曦》等。

文学花朵灿烂绽放时期

新加坡独立后最初阶段，政治环境的突然改变反而让文艺一下子没有办法调整起来，所以当时出现一阵子的沉闷，这种气氛一直到1970年代后才有转变。当时的文坛，不同文艺道路的文人的坚持，使到文艺界有着不同的门派，而且成见极深。一些编者和团体负责人就致力于这种文艺环境的改变。《新加坡文艺季刊》的编者，很明确的表示：该刊园地公开，欢迎不同门派的文学作品。1976年成立的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也表示要联络所有的新加坡共和国的写作人，联合促进新加坡文学的发展。

对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作者们心态经过一番调整后，文坛上出现众多讴歌独立的声音，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吾土吾民创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各华校代表举行会议，一致反对学校注册法令，但政府拒绝收回成命

《赤道风》

作选》就收集不少讴歌独立的作品，如苗芒的〈花柏山〉等这类篇章。

在年轻一代的文艺工作者的经营下，新加坡文学也出现不同的面貌。当时一批年轻作者，认为文学不应当只是纸本的产物。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是他们理想的目标。因此他们举办诗乐活动，让诗的创作与音乐的听觉艺术结合起来。南洋大学诗社的会务方针之一就在于促进这样的活动。诗社创始时，就以诗乐活动和演出为号召。

史料整理和文学发展探究在这时段取得高度的成就，著作丰盛，不但有好几部文学史作品出炉，学术界也重视新马文学的整理和介绍的工作。各大学都开设新马华文文学的课程。除了设立不同的组织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外，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的文学史展，更以艺术的多元结合呈现了新马文学发展的足迹，获得各界的赞扬。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方修在整理战前马华文学工作上又有新的开展。先是编辑了一系列马华文学选集，其中有诗集、小说一集、二集、戏剧集，等等，于1968年至1970年间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这些选集的编定，主要在为出版马华文学大系作准备。一两年后，一套10本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出版了。其中包括：理论一集、二集、小说一集、二集、散文集、诗集、戏剧集、剧运特辑一集、二集，及出版史料集。这是继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后，华文新文学界出版的一套大系。收集了自1919年至1941年间马华各文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史料，使得一些战前的马华文学作品得以现形在读者眼下，使得读者能够从作品的层面了解马华各文体文学在各个阶段的演变情况。意义之重大，自不在话下。同时，这套大系也刺激了李廷辉等人在新加坡教育部的支持下，编辑自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前的另一套新马华文文学大系[49]。

1970年代末期，一些年青的学者在方修等人所建立的基础上，从事比较全面的资料搜集与比较细致与深入地探讨战前马华文学的工作。这类研究在1980年代之后，更达致高峰。

必须强调，这种文学研究的热闹，并不是新马学者的专利，实际上自1980年代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外地学者纷纷投入战前马华文学研究的阵营。上海的王振科对战前的文学思潮有浓厚的兴趣[50]，并为此撰写了多篇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广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海外文学中心特设资料室来收集新马海外文学作品。该所赖伯疆的《东南亚海外戏剧概观》，就包括战前马华戏剧的论述。广州市中国归侨作家联

[49] 李廷辉等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共有八集，计理论、小说一、小说二、散文一、散文二、诗歌、剧本、史料。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录自1945年至1965年即新加坡独立前的新马 华文文学作品。

[50] 作品有〈1936年两个文学口号的论争在新马文坛的余波〉、〈新兴文学理论在新马的传播〉、〈中国话剧艺术对新马华语戏剧运动的影响〉、〈中国现代作家在新马的文学活动〉等，载《同根的文学》（海口：南海传播公司，1996 年）。

合会的刊物《回音壁》所刊登的多篇早期作家的回忆文章，提供早期作者的重要资料。汕头大学陈贤茂也撰写了马华各体文学发展的文章，其中当然包括战前马华文学发展的论述。港、台、海外文学学术会议的多次举行，也推动马华文学的研讨。厦门大学1988年举办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会议，也有助于马华文学研究的推进。日本今富正巳教授，对马华文学研究非常热心，曾写作多篇关于马华文学的篇章，也在日本培养研究马华文学的研究生，舛谷锐就是相当突出的一位。今富教授对马华文学的分期更为注意，并曾为此撰写了长篇的分析文章[51]。另一位学者铃木正夫教授为探求郁达夫在新加坡的文学活动，在新加坡居留一段时间，回日本后根据在新加坡取得的资料写成的论文，使他成为郁达夫研究的权威。

这是一个文学花朵灿烂绽放时期的新华文学。

新华文学继续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刚开始时，文学还是蓬勃的发展。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的成立，给文艺界带来另一股推动的力量。该会和当时的写作人协会一道，推动文学的出版，文学研讨会的举办，构成当时文坛的另一番热闹。要特别提起的是国际文艺研讨会的举办。在这之前，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止于国内文学作者参加。在一些热心人士提出“我们要走向世界，也要世界走向我们”的呼声后，新加坡文艺研究会首先举办国际文艺研讨会，之后报馆举办的各届文艺营，邀请中国及外国著名作者与会，规模更大，是这时段必须提及的大事。

1980年8月，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华人社会热烘烘创设的这间大学，由此走入历史。之后，华文学校更陆续停办，华文教育面对空前的危机，文学发展的蓬勃景象突然改观，报章副刊剧减了，主要华文日报只存《联合早报》一份，《新明日报》虽名为日报，其实是晚报，和另一份《联合晚报》在下午出售。两份晚报性质的报章都没有文学副刊，而《早报》只有《文艺城》一种副刊而已，和过去繁盛的副刊出版形成鲜明对照。曾经附设文学版页的杂志如《新加坡月刊》、《民众报》、《奋斗报》先后停办，文学刊物的出版只剩下几种：《新加坡文艺》、《新华文学》、《热带文艺》、《赤道风》、《锡山文艺》等。南洋大学毕业的文学作者纷纷为这样的转变深感忧虑和哀伤，杜红、莫邪、秦林、寒川、潘正镭等都有这方面的作品，其他作者如原甸等也有这题材的篇章。张挥则为华文教育的式微以致于濒临消失而写下好几篇散文、小说。人们极其担心传统的根的流失，长风葛因此有诗《把根留住》，而梁钺更创作《鱼尾狮》为文化之不鱼不狮倍感痛心。学者欧清池更称这一时期的华文文学为黍离之伤时期的文学。

然而，在这时段，我们也看到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小了，文学已经不止是一个地区的事。这至少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新加坡文学团体和中国推出的出版工作，让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出版得以蓬勃的开展。例如新加坡文艺协会和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合作推出的《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作家自选集》，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以“赤道线上”为名的全国作者选集，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种文体作品选集等。新加坡作家协会也和厦门鹭江出版社推出《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卷》、锡山文艺中心和湖

[51] 今富正巳撰写多篇战前新马文学研究的论文，如〈马来亚华文文学的高潮和低潮〉、〈马华文学在抗战初期的一些问题〉等。论文用日文书写。由今富正巳教授古希纪念文集刊行会编，1992 年，东京三冬社出版。

相关人物

宋旺相

历史事件

宋旺相撰《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脱稿，次年在伦敦出版

南文艺出版社推出散文选集等。特别是几部规模较大的大系，没有外力的扶助，是很难出版的；其二是作者发表的园地扩大了，所出版的作品的阅读范围也开阔了。很明显的例子是尤今的作品在中国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中国读者心目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一些作者如张曦娜、希尼尔、梁文福、孙爱玲等也在中国和新加坡以外地区深获好评。

困难的环境没有难倒有心推动文学的团体和个人。除了上面所提的新加坡文艺协会、作家协会、锡山文艺中心外，刚成立不久，主要以开放大学新马华文文学课程师生为班底的新加坡世华文学研创会，积极推出《新世纪学刊》、《新世纪文艺》、《世华文学作品丛书》外，还决定出版大型的新加坡文学大系，共14册，每册绪论约5万至10万字，详述有关文体发展的历史，深受文艺界的重视。

社区组织在推动文学上也扮演一份角色。1980年代阿裕尼联络所的阿裕尼翻译与创作学会、加东文友俱乐部、金声联络所的文艺组织曾经给文学界带来一场热闹。目前武吉知马俱乐部锡山文艺中心，也是重要的文艺推手。而令人惊喜的是寺庙也加入文学的行列，大士大伯公庙出版的大士文艺，也给新加坡文坛奏出特别的一章。新加坡宫庙不少，希望有更多的寺庙加入华文文学的推动。

蕉风椰雨飘摇下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确实是走了一大段不平路。它从最初主要由中国南来作家经营开始，充满浓浓的中国情，逐渐向本土意识靠拢，由南洋色彩提倡，发展为马来亚地方的感情，又因中国对日抗战转向中国感情。战后由于认识到唯有依赖自身的力量，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生命与财产，于是而有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发展至1950年代，本土意识的发展和反殖力量结合，文艺界乃有爱国主义文学的口号。新加坡独立后，爱国精神进一步挺进，文艺局面，一片繁荣，1980年代华文面对的困境，让这片繁荣起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在有心推动文学作者的努力下，我们仍然看到文学的发展继续向前推进。

第四节　东方红
——左翼文学的文革潮

摘要

新华左翼文学最鼎盛的时期，也正是当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的滚滚红潮，“克隆”了一股“新加坡左翼文学狂潮”。本节尝试解读中国文革时期新华文坛向左急转的时代心声，探讨范围包括文革文艺理论对本地左翼文学与文艺活动的冲击，以及马共与其卫星组织所扮演的角色。

Abstract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of the leftist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coincided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billowing red tid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ave birth to a wave of "Singapore frenzy." This section provides an interpretation of how the local literary scene swerved to the lef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朱成发（Choo Cheng Fatt）

新华作家一开始就受中国作家的影响，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作家的影响，包括鲁迅、巴金、艾青、曹禺等。新加坡建国之初，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左倾之风剧烈南袭，新华文坛在滚滚红潮冲击下，出现了一股前所未见的极左潮流。这里所要描述的新华左翼文学，正是这股文革潮大张旗鼓，叱咤风云的时期。

文革对新加坡左翼文学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开宗明义地点出文艺服从于政治。在这个基本理论指导下，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发展方针。文革期间，“四人帮”进一步夸大了这个文艺方针，提出了“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及“主题先行论”等极左文艺理论。这些文艺理论颠倒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否定了作家的主体性，其政治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新加坡左翼文学当年就是追随这样的文艺标准，创作了大量左倾作品，让新华文坛霎时间红旗飘飘、枪声卜卜。

马共与文革潮

新加坡左翼文学的蓬勃发展，马共的推波助澜起了很大作用。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马共及其左翼外围组织，也展开了一连串的反右斗争。这场斗争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了新华左翼文学文革潮的诞生。

根据资料，文革潮是从左翼政党社会主义阵线的机关报《阵线报》举办一系列《文艺笔谈》开始[1]。笔谈探讨了“文艺应该为谁服务”、“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以及“文艺运动的任务和方向”等问题，其真正目的显然在于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并以这一思想作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演出的指导方向。

笔谈结束后，新华左翼文坛开始向“左”急转，文团、杂志、剧团等纷纷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小说、诗歌、戏剧、文论等纷纷“变色”。1967年中，社阵文艺杂志《新青年》第七期发表了确立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总结性文章〈当前我国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2]。这篇署名“一群文艺工作者”的长文，大量引用文革文艺理论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结合当时左翼政治运动进行议会外斗争的局势，对左翼作家的任务和使命，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以下“指导性”的意见：

- 关于左翼文艺工作者的立场与服务对象

文章认为，“文艺必须服务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革命战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必须站立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绝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 关于左翼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

文章指出，“要改造好思想，要真正实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深入工农群众，在思想感情上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

- 关于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手法

文章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同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在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上有严格的分野”。文章也批判了“积极的现实主义”，认为是“反动御用文人及蜕化变节分子的伎俩”。

文章发表不久，左翼团体在社阵总部举行了“文艺座谈”，对文章所提的理论和观点表示同意，并正式确立了左翼文艺所遵循的“文革式文艺路线”。

1968年6月1日，马来亚共产党发表《高举武装斗争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政策声明，制订了“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政策，并在北马高乌等地发动游击战争。1969年11月15日，马共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开始对新马两地播音。马共的“乡村包围城市”政策及其宣传，对于左翼文坛产生了进一步的催化作用，一股更左倾更冒进的潮流开始在左翼文坛出现，各文团纷纷转入地下，组织“文艺轻骑兵”，在乡村郊区搭舞台搞小规模演出，或在社阵和人民党的幼儿班结业礼和恳亲会上搞“文革式表演”。这些演出的内容，显然已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春雷文艺大汇演》在演出前被马国政府下令封禁，并逮捕了主要负责人。在新加坡，当局也逮捕了一些左翼团体的负责人，并封禁一些团体，包括康乐音乐研究会和醒华校友会等。

---

[1] 〈举办文艺笔谈启事〉，载《阵线报》期282（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1966年9月17日。

[2] 一群文艺工作者，〈当前我国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载《新青年》期7（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中宣会，1967年6月），页15。

公开出版的左翼刊物

政府的逮捕行动使左翼团体的激进演出沉寂下来，但“革命斗争”并未因此熄灭。马来亚文艺历史经验评论小组的文章就这样说：“1970年，大规模的群众性演出和旗帜鲜明的团体活动的条件被堵塞了，革命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打击前面，并没有停下来抚摸伤口……而是摸索着改变了斗争的方式，从公开的出版工作方面找到了缺口，继续坚持战斗”[3]。

“公开的出版工作”，指的是在197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具有强烈左倾色彩的文艺与综合性杂志。网雷在〈七十年代新加坡华文文艺杂志〉一文中指出：“在七十年代，文艺杂志占主导地位，造成很大声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与思想倾向，敢于直面人生，敢于干预生活，反映社会现实，描写民众的苦难与抗争，表达民众的愿望，暴露黑暗，歌颂光明”[4]。

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刊物，与五、六十年代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大不相同，内容更为激进，并歌颂工人阶级，抨击现有的社会制度。与此同时，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也出现不少同情工人阶级的作品，包括《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文化”、“青年知识”；《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以及《民报》的“朝花”等。大专学府的出版刊物也有明显的左倾色彩，包括南洋大学中文学会出版的《新生》；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的《激风》、《劲草》与《绿洲》；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协会的《新时代》与《光芒》等。

以下简略介绍当年公开出版的一些左翼文艺刊物：

- 《旗》：社阵机关报《阵线报》的文艺副刊，随主报于1961年11月创刊。文革期间，转载了大量中国报章（包括《人民日报》、《红旗》及《解放军报》）的社论及批斗文章。
- 《新青年》：社阵中央宣教出版委员会出版的文艺杂志，1966年7月创刊，至1971年4月停刊，共出14期。《新青年》与《旗》的诗歌一样激进。
- 《建设》：综合性文艺月刊，1968年底创刊，内容包括时事分析、生活问题和社会现象的讨论，也常发表较尖锐的文艺评论。
- 《文艺生活》：综合性文艺双月刊，1969年创刊，定期发表“重量级”的文艺评论，对当时的文坛展开猛烈的批判。
- 《奔流》：文艺月刊，1970年创刊。内容主要反映青年学生和工人的“斗争”。
- 《青年文艺》：综合性文艺双月刊，1970年创刊，主编是怀鹰，刊登不少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生活与奋斗的文章。
- 《笔端》：文艺双月刊，1971年创刊，风格与《奔流》雷同。
- 《赤道诗刊》：1971年创刊，槐华主编，刊载及介绍本地及中国的革命诗歌。
- 《乡城文艺》：1974年6月创刊，主编也是槐华，内容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等。
- 《南涛》：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1972年创刊，小说创作占有较大份量，并多数反映和突出工人阶级斗争。
- 《星光》：文艺月刊，1973年6月创刊，刊载不少评论文章，也刊登描写工人生活或与资本家斗争的短篇小说。
- 《大地》：1971年5月创刊，以工人为主要对象的通俗文艺月刊。

[3] 马来亚文艺历史经验评论小组，〈高举党的战斗旗帜，为发展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文艺奋勇前进〉（油印本刊物）。

[4] 网雷，〈七十年代新加坡华文文艺杂志〉，载《艺术天地》期10（新加坡：艺术天地出版社，1997年6月），页94。

相关人物

陈嘉庚

历史事件

9月6日

陈嘉庚独资创办《南洋商报》，至1983年与《星洲日报》合并

工人小说大量涌现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后，立刻展开工业化计划，在西部开辟裕廊工业区，兴建基础设施，累积国家资本。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给予投资者税务优待，并通过颁布《职工会修正法令》及《雇佣法令》管制工会，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

建国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说："发展经济学者当时普遍地把跨国公司看成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我们的责任是为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他们争取过来……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5]。

在政府的努力下，外来投资急速增长，1965年独立时仅6亿4770万元，至1976年的10年间就剧增到58亿4300万元。欧美日跨国公司纷纷前来设厂，纺织、化工、木材加工、食品、金属工业等工厂的烟囱在裕廊镇工业区一个接一个冒起。大批劳动力，包括来自马来西亚的劳工涌入裕廊镇就业，无论晨昏，工厂的机器都在不停运作，形成一片忙碌的景象。

对于这种急剧的变化，左翼人士却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始终认为，支配科技和消费选择的跨国公司，一直在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制工人。齐扬在《阵线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把裕廊工业区形容为"一座即将爆发的活火山"。文章说，除了以法令"束缚工人的手脚"，政府还设立"管理局"，派遣警察、特务和工贼"严密监视工人"，并以黄色工会"瓦解和出卖"工人的斗争[6]。

为了反映工人阶级的"反迫害斗争"，左翼作家采用了文革的创作手法，突出阶级斗争、塑造工人英雄形象，创作了大量工人小说。左翼杂志几乎每期都刊载这类小说，出版单行本的工人小说也不少，作者包括崇汉、岳典、萧汀（即怀鹰）、吴宜、冬琴、林华及红茄等。这个时期不少工人小说的作者，本身也是工人，例如崇汉和岳典等。

尽管技巧不够成熟、小说的篇幅也普遍较短，但在整个时代激昂氛围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工人小说仍大受欢迎。当时，有电台甚至从报刊上选了某篇作品，当作文艺或故事节目来播讲，例如志工所写的《新苗》。不少单行本印刷单薄简陋，却始终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例如崇汉的《金光道上》。方修指出，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由于很多作品所写的，正是大部分读者所熟悉的生活，或所关注的问题，因而容易引起他们共鸣的缘故"[7]。

在工人小说作者群中，写得最勤、产量最丰、结构模式最受文革文学影响的，首推崇汉。崇汉原名邹崇汉，祖籍广东大埔县，1945年在新加坡出生。中学毕业后先后当过工厂工人、农场工人、店员及船厂记时员等。1960年开始写作，已出版的作品有散文集《不屈的英灵》、诗集《赤道鼓声》、短篇小说集《怒火渔乡》、中篇小说《金光道上》、《在风雨中》、《白云下》及《崎岖路》等。

中篇小说《金光道上》和《在风雨中》先后出版于1974年与1975年，是崇汉的代表作，也是文革味最浓的作品。《金光道上》与中国文革时期著名小说家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书名接近。《金光道上》写一个名叫狄源的中四毕业生到三夹板厂体验劳动生活，在形象高大

工人小说

[5]《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9月），页68。

[6] 齐扬，〈裕廊工业区——一座即将爆发的活火山〉，载《阵线报》期328（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1969年4月20日），页5。

[7] 方修，《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新加坡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页14。

的工人清坚和女工雅娟的关怀与帮助下“觉醒”，并在小说的结尾经历一场尖锐的劳资斗争后，坚决表示“愿为人民的崇高事业献出一分力量”。

崇汉自称对工人阶级的感情是真挚的。在当时鼓励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年代里，崇汉中四毕业就投身工人行列，深入生活，并写出一本又一本的工人小说；时至今日，许多与他同时代的同学已经飞黄腾达，而他仍默默地在电子厂里当个清洁工人。

另一位工人小说作家岳典原名叶岳典，又名怡田，祖籍福建厦门，1937年5月生于新加坡。中学毕业后就在工厂工作，1960年开始写作，笔名有岳典、叶子青、叶哨、巴望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俯拾篇》、短篇小说集《黎明前夕》及《楼上和楼下》等。短篇小说集《黎明前夕》的主题篇《黎明前夕》，突出了工伤事件的严重与工友的团结。岳典也在《星光》杂志等左翼刊物发表了不少篇幅较短的小说，例如《工厂日记》、《日出前》、《往事》等。由于内容都是反映工人生活、工友团结以及与资方的斗争等，作者曾自称自己的作品为“工人小说”。

怀鹰原名李承璋，祖籍福建南安，1950年7月出生于新加坡。少年时代就读于东林工艺中学，1968年未毕业停学。离校后，怀鹰曾从事多种行业，包括德士司机，生活经历非常丰富。1970年代开始积极写作，喜用不同笔名发表作品，常见的有奔浪、怀鹰、萧汀、严阵、曲波等。除创作小说，怀鹰也写诗、散文及评论，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海上风波》、《出路》及《火碳河》；中篇小说《姐妹情深》、《再嫁》及《乡土情》；散文集《铜像的故事》及《无名的英雄们》；诗集《花魂》等。

《海上风波》是怀鹰在1975年以萧汀为笔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共有五篇，小说的题材较广，包括了描写猪农悲惨生活的《养猪》、渔民在风浪中讨生活的《海上风波》、抗日小说《毛广岛沦陷前夕》、以及工人小说《刘师傅的话》等。《刘师傅的话》全篇以对话方式，通过刘师傅的口，讲述一个工人从参与抗日、抗英到劳资斗争的经过。

另一位工人小说作者冬琴原名彭杜生，祖籍广东丰顺，1947年3月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边佳兰渔村。冬琴在1959年到新加坡凤山小学就读，后升上中正中学，因家境贫寒，修完中三就辍学。1967年加入马来亚劳工党，任该党新山行政区委助理秘书。冬琴一度在新加坡中国银行任职。由于参加左翼政治活动，冬琴两度被马来西亚当局扣留；1978年被遣送回新加坡。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在宿舍里》及评论集《演出与创作的若干问题》。

克隆文革“光明大道”

工人小说受文革文学理论框框的约制，而工人出身的作者，或是“弃笔从工”的知识分子，所创作出来的小说也文笔粗糙，艺术成就不高。方修在《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里就指出，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这一时期的某些作品，技巧不够成熟，艺术形式显得粗糙”[8]。

章翰在1973年新大中文学会文艺创作比赛特辑《成长》的“评判的话”里，也不客气地指出：“这次参加比赛的作品，大多数有一个不错的主题，思想倾向很好，但是，语言很贫乏，叙述欠条理，交代不清楚，描写不生动不具体，很难感动人”[9]。新大中文系教授陈荣照当年也在比赛评语中说：“就小说而言，较为严重的偏差，就是有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倾向。有几位作者，借小说中人物的嘴，大篇幅

[8]《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页14。

[9]〈成长〉，载《新大中文学会1973年文艺创作比赛特辑》（新加坡：新大中文学会，1973年12月版），页14。

相关人物

基里玛

历史事件

6 月 28 日

刚落成的新柔长堤由总督基里玛主持通车仪式

地宣传自己主观的思想……”[10]

当时的工人小说结构千篇一律，基本上可以归纳出以下结构：

- 青年到工厂或工地体验生活
- 资方剥削工友，工友间则存在摩擦与分裂
- 正派工友出现，其中一位形象最高大
- 正面人物搞文化班、野餐等活动团结工友
- 劳资冲突，罢工行动展开，主要英雄被捕或逃走
- 结尾：憧憬光明的未来

工人小说作者感受到中国“积极乐观”的革命气氛，创作时几乎都拖了一条“光明的尾巴”，认为工人阶级最终必定胜利。至于怎么样才能胜利，所建立的是什么模式的社会，工人小说作者或是不愿说明清楚，或是自己也概念模糊。崇汉的两部长篇工人小说中，这“光明大道”隐隐约约出现了马共的影子，《在风雨中》的英雄人物卫井行要向他的哥哥学习，而从描述中，他的哥哥显然就是一个马共游击队员。

马共的武装斗争，是一条“光明大道”吗？随着马共的瓦解，历史已经提供了答案。但在那个经济刚刚起步，华校生出路不明朗，工人阶级备受压制的年代，马共的斗争就成为了左派分子的一线希望；更何况正如冬琴《在宿舍里》所说的：“在那阳光普照的东方，人们正在干着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东方”当然是指中国，所干的伟大事业自然就是“文化大革命”。远方的强大靠山，让左派分子更是兴奋不已。

红色诗歌：高歌猛进的年代

文革时期，是风起云涌的岁月，是高歌猛进的年代。新加坡的左翼诗歌，在那年代里也首首充满了战斗的字句。左翼诗人更不避忌讳地直接歌颂武装革命和马共，对建立“光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诗人彼岸在《响雷》的后记里就指出了当代诗人的“使命”：“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文艺所迫切需要表现的不是个人的哀伤，不是身边琐事，不是风花雪月，而是火！是把大众燃烧起来的火”[11]！彼岸所说的这把“火”，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之火”。如火如荼的各种文革运动，像火红的枫林，让站在大洋彼岸观望的新加坡诗人振奋不已。

1971年《赤道诗刊》创刊，由席宣（即槐华）撰写的发刊诗《文艺卫兵歌》，就是对文革的最明显的向往：

从赤道了望东方
是不落的太阳把世界照亮
我们捧起心爱的宝书
欢呼歌唱

地球永远向东转
赤色的道路在伸长
我们畅游在无边的旗海
乘风破浪

黎明的号角已吹响
胜利的烽火燃遍四方
我们是马来亚的文艺卫兵
心向太阳[12]

旗飘《赤道》、枪响《乡城》

1960和1970年代的左翼杂志，当年被称为“文艺轻骑兵”。它们来如电，去如风，寿命都很短，多数只能出四至七期，但却前仆后继，为那个动荡的岁月，留下了一篇篇时代的见证。

在众多的左翼杂志中，刊载最多红色诗歌的，要数《赤道诗刊》和《乡城文艺》。

《赤道诗刊》创刊于1971年3月，前后共四期，1971年12月停刊，三年半后，《乡城文艺》薪火重燃，1974年6月创刊，同年12月出版3、4期合刊后停刊。

[10]《成长》，页11。
[11] 彼岸，《响雷》（新加坡：高峰出版社，1970年）。
[12] 槐华，《文艺卫兵歌》（新加坡：赤道诗刊社，1971年3月）。

《赤道》属纯诗刊，《乡城》也以诗类为主，但也刊载其他文体的作品。把这两份刊物放在一起介绍，是因为它们有着好些共同点：

- 它们的主编都是槐华
- 两份刊物都以最激昂的歌声，歌颂“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并对本土的“黑暗”作出最强烈的抨击
- 两份刊物的版位也几乎一模一样，都辟有《亚非拉诗歌选》；都把创作的诗歌分为两类：《赤道之歌》与《乡城之歌》刊登有一定水平的作品，《朝阳》与《曙光初照》则发表习作

《赤道》的主要作者包括槐华（也是席宣、旌望、旅征及北弦）、殷戈、佟暖、辛愚、伦欣、关睢、朱旭、汉英、杜中、施平、集成、梅岩、立年、立思及丹卡等。

槐华是《赤道》的主要作者，原名鄞国琦，1960年毕业于南洋大学物理系，当年以诗集《水塔放歌》广受好评，以后陆续出版了诗集《心上有你的声音》、《缪斯喜悦的回音》以及《红太阳 / 一朵玫瑰》。槐华1977年4月曾遭新加坡内部安全局拘留。

左翼杂志

有人说《乡城文艺》取名“乡城”，含有“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意思。槐华指出，在《乡城》最后一期《编后话》的最后一段有特别含意：“如果说，创刊以来算是突破一点，取得经验，那么这经验又是什么呢？只有四个字：内持外游。”何谓“内持外游”？槐华解释说，“‘内持’就是指‘内线的持久战’，‘外游’就是指‘外线的游击战’”。

除了槐华，《乡城》的其他诗歌作者还有铁雄、梅秀（即伏浪，也就是沙石、霜育、马浪）、井桑、歌雷、贺闯、谢斌、殷戈及齐干等。

《阵线报：“旗”》与《新青年》

《阵线报》是在1961年11月，配合社阵的成立而创刊的，每周一期，1972年12月停刊，前后共出版了603期。《阵线报》的副刊取名“旗”，内容主要配合政治运动的需要，较常见的作者有星群、马群、梁艾文、朱兵、秋江、红焰、李凡、席宣、凡工、立思、丹卡、辛愚、云峰、红桦、林康及严思等。所发表的诗歌一般采用民歌体或快板，以跳跃的节奏及押韵的方式创作，目的在于方便朗诵和演出。例如以下秋江的诗歌：

这是个幸福的夜晚
电台传来了
东方红的乐曲
我一次又一次
激情地倾听着
那期待已久的
振奋人心的大喜讯
我的心要飞向北京

——秋江《祝贺您，胜利的“九大”》[13]

社阵出版的另一份文艺刊物是《新青年》，由社阵中央宣教出版委员会出版，1966

[13] 秋江，〈祝贺您，胜利的“九大”〉，载《阵线报》期331（1969年5月11日），页9。

年7月创刊，至1971年4月停刊，共出14期。《新青年》的诗歌与“旗”一样激烈，如叶民的〈全世界人民胜利前进〉（1967年第9期）及岩的〈奔赴农村战场〉（1969年第12期）等。主要作者包括小林、叶民、岩、梁兴昌、崇汉及向红等。

《新青年》的一个特色是设有“音乐栏”，刊载红色歌曲，如群音作曲的《马来亚人民团结起来》、庸言词曲的《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斗争》等。这些歌曲的特点是：节奏明快、曲调激昂、充满战斗气息，唱起来令人热血沸腾，极富煽动性。

揭露阴暗面的红色诗歌

史英在《新华诗歌简史》中，论及新加坡1970年代的诗人时，把左翼诗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思想上有明显的左倾立场，殷切改变社会制度，包括上述的槐华、梅岩、施平、殷戈、彼岸等人。另一类则是只表露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描绘社会阴暗面，这一类诗人包括丘克难、陈伦新、马田、庸夫、李贩鱼、高澈及李摛白等[14]。

丘克难当过汽车修理技工，著有诗集《生活之歌》（1972年）及《这一条幽静的路》（1976年）。高澈原名高水明，曾当散工，著有诗集《生命的艰途》。丘高两人声称，虽然同受文革影响，他们和槐华等“红色诗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后者对共产主义和革命有“深刻的认识”，有明确的方向，而他们对革命的概念则是模糊的，在感情上向往，但没有具体的联系，因此创作时倾向于写实，主要揭露生活的“阴暗面”。

由于出身工人阶级，这一类“红色诗人”写诗的技巧显得稚嫩，表情达意时稍嫌单刀直入，但他们对下层人民的生活，却能作较全面的描绘，比起第一类红色诗人，其作品具有更浓厚的生活气息。

左翼诗人对文革的向往，除了外在的因素外，华校生的地位问题也是原因之一，针对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第二类诗人的作品有更深刻的反映。例如陈伦新这首《走在裕廊的道路上》，就反映出当时华校生的处境：

……

工业区的路条条直
今天，从十多里外的都市
跑来了三个刚离校的小伙子
……
他们战战兢兢地走上楼
在一间冷气室
会见了厂主
“我们刚念完中四
想在您的工厂
打打杂，做点事。”
“可惜你们迟来几日，
你们不妨先回去，
以后多留意留意英文报纸。”
……
在一间小小的咖啡店里
三瓶冷冰冰的汽水
也浇不退他们各自心头的愤怒
哭，哭不是最好的控诉
他们忽然捏紧拳头发狂地挥舞
“我们要把这一切全记住！[15]”

在重商重英文的社会，华校生如果不是痛下苦功补习英文，多半就只好加入收入较低的蓝领行列。陈伦新说“要把这一切全记住”，但“出路”何在？他在《恨与爱》里说：“我面临的是——/一个需要火的时代/我熬夜地赶着挖掘/为了要将它们/及时献出来”，而这火来自哪里？“我们不怕承认/我们的光/来自那遥远的太阳”（《星星》）。来自东方的红太阳，显然在那个时代成为了苦闷的华校生心灵深处的“大救星”。

红色诗歌的艺术特色

很多人说红色诗歌艺术性不高，谈起1970年代的左翼诗歌就不屑一顾。史英在《新华诗歌简史》中评说：“整体来说，他们不太讲究艺术技巧的运用。”原甸在批评左

[14] 史英，《新华诗歌简史》（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4月）。
[15] 陈伦新，《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新加坡：人民生活出版社，1976年5月）。

翼诗人李贩鱼的诗时也认为，“最大的缺点是缺乏剪裁，语言拖沓”[16]。即使是红色诗人槐华本人，在九十年代回顾当年的诗歌时，也不免含蓄地批评说：“如今看来，（在《赤道诗刊》）发表的诗作，不少是色彩强烈或甚至标语口号化……”[17]

对于红色诗歌的技巧问题，笔者认为必须结合时代的客观因素来讨论。在那个文革思潮狂热冲击的年代，有以下几个因素影响着诗歌的创作：

- 浅白直露的文字，比含蓄尔雅的文字，更能表达对“崇高理想”的向往
- 标语化口号化的中国文革诗歌，被一些理论文章推崇，成为了模仿的对象
- 工人写作者受到鼓励，大量出现，技巧水平因而受到限制
- 因为要为“工农兵服务”，诗歌的水平必须接近读者的欣赏水平，换言之，含蓄精巧的作品就较难达到目的

总而言之，红色诗歌是历史的产物，红色诗歌在艺术上的浅显粗糙、激昂直露，也同样是时代的产物。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环境，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红色戏剧：从康乐“赤化”说起

1966年4月，左翼艺术团体康乐音乐研究会在维多利亚剧院公演四幕剧《生活的旋律》。该剧描写一个破产的商人，企图利用子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但子女们却选择自己应走的正道。《生活的旋律》是康乐在维多利亚剧院最后一次公演的话剧。

1966年8月，康乐为庆祝成立12周年公演《音乐晚会》。晚会的节目包括大合唱《和平友谊之歌》、《山林之歌》及《满江红》、三弦独奏《十八板》、男声独唱《我的太阳》、女声独唱《妈妈不要生我的气》等。

康乐在1966年及之前所走的是现实主义的、温和的创作路线。《音乐晚会》筹委会主席在献词中说：“推广正派音乐艺术，上演具有现实意义与富有健康感情的节目……是我会一路来所坚持的演出任务……”[18]

然而，到了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红潮就改变了新加坡左翼戏剧团体的方向。

1969年10月，康乐在日本园（即当年社阵汤申支部）内部演出《革命文艺晚会》，节目竟是：大合唱《国际歌》、《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长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灿烂辉煌》；舞蹈《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民乐大合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及诗剧《送军粮》等。

相对于之前在维多利亚剧院上演的《我的太阳》、《妈妈不要生我的气》等等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创作”，这些高喊革命口号，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文革式作品，在康乐内部恰似一阵阵红色狂潮，把旧的节目一下子淹没了。

雨石在《康乐与剧运》一文中，追述康乐在1966年及以前的演出后，于文末一段，交待了康乐“赤化”这一件大事：“1967年以后，碍于复杂的客观环境，康乐内部出现纷乱，最后被迫停止活动。这不仅是剧坛一大损失，也是现实主义艺术的一大挫折”[19]。

雨石所谓的“复杂的客观环境”，指的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外在影响，而所谓的“内部出现纷乱”，就是指康乐的造反派革了当权派的命，在那个闹翻天的年代，“革命无罪，

[16] 原甸，《马华新诗史初稿》（香港：三联书店及新加坡：文学屋，1987年5月）。
[17] 槐华，《半世纪的回眸》（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18]《音乐晚会特辑》（新加坡：康乐音乐研究会，1966年8月）。
[19] 雨石，〈康乐与剧运〉，载《热带学报》，2001年1月。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3月21日

英国计划在新加坡建立军港

造反有理”，“内部纷乱”是很平常的事。

会务方针从1966年8月的“推广正派音乐艺术，上演具有现实意义与富有健康感情的节目”，到1968年急剧向左转，这种180度的变化，其中所隐藏的派系斗争，实非简单的一句“内部纷乱”所能形容。

左转分水岭：《抗美援越游艺晚会》

1966年10月20日，社阵联合人民党、左翼工团及文艺团体等，在繁华世界体育馆举行四天《抗美援越游艺晚会》，以筹募援助越南人民基金。晚会只举行了三晚，第四天就被当局封禁。这个晚会的举行，含有双重意义：

（一）这是左翼政党、工会及文化艺术团体首次联合举办的文艺晚会，是左翼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在这次演出前，左翼阵线发动了数以千计的干部和群众，挨家逐户展开宣传，以突破执政党政府的消息封锁。

（二）这也是左翼运动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极左派采取冒进行动，九名社阵议员宣布集体退出国会，展开街头斗争之后，与温和派的一次大分裂。

左翼运动的分裂，也直接导致文艺活动的分道扬镳。当权的极左分子在《抗美援越游艺晚会》后，不再甘于搞过去较低调的文娱演出，而纷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大唱革命歌，大跳语录舞。许多左翼文团工团，如康乐音乐研究会，就是在这个晚会后展开内部斗争，排练起文革式的文娱节目。

晚会第三晚发生了流血事件。根据《星洲日报》报道，1966年10月22日晚，一队九名警察人员在体育馆执行任务时，与晚会招待员及纠察员发生纠纷，警员受到逾百名群众攻击[20]。流血事件发生后，警方逮捕了九人，并撤回游艺晚会第四晚的演出准证。10月23日晚，社阵组织秘书王清杉被捕，隔日，多处发生示威游行及警民冲突事件，多名左翼分子遭拘留。

《抗美援越游艺晚会》可说是新加坡左翼团体向更左的方向急转弯的分水岭，自此以后，激进的左翼团体步社阵议员走出国会的后尘，也把维多利亚剧院让给了其他较温和的文艺团体，转而在工会、工厂等群众场所演出，而节目内容也更毫无顾忌地歌颂文革、马共与武装斗争。

《红灯记》从京剧变话剧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等把《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八个剧目合称“革命样板戏”。

1969年1月，新加坡左翼工会金银业职工联合会，在庆祝成立23周年时，将革命样板戏之一的《红灯记》改编成话剧，并在会庆上公演。金银业工联的这项“创举”，可以说是新加坡左翼运动在文革狂潮的冲击下最大胆最极端的表现。

金银业工联把京剧改写成话剧，显然是因为缺乏能够演唱京剧的演员。但改写成话剧后，《红灯记》原有的艺术特色就荡然无存了，而剩下的仅仅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斗争经历。

在金银业工联内部演出话剧《红灯记》后，醒华校友会也于同年12月在日本园上演这出话剧。也许是由于公演《红灯记》，以及其他原因，醒华校友会于隔年1月遭政府解散。

三大土产“样板戏”

文革有八大革命样板戏，新加坡左翼团体当年也创作了三个较为大型的演出项目，即音乐舞蹈史诗《歌唱马来亚》、诗歌造型《抗日之歌》以及诗剧《送军粮》。这三大演出项目，当时有人认为可以成为本土的革命“样板戏”。

在评论第二届新春革命文艺晚会时，作者席延就提出了要“搞出好的样板作品”[21]。席延认为，马共的武装斗争，以及议会外群众斗争的“蓬勃发展”，是创作革命样板的有利条件，“这就像文革期间工农兵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创作了革命样板戏一样”。席延认为，音乐舞蹈史诗《歌唱马来亚》及诗歌造型《抗日之歌》，可以“修改及加工，使尽可能完美，成为好的样版作品”。除了《歌唱马来亚》和《抗日之歌》，康乐音乐研究会于1969

[20]《星洲日报》，1966年10月24日。

[21] 席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演唱马来亚革命壮丽史诗〉（评第二届新春革命文艺晚会），载《阵线报》期329（1969年4月27日），页7。

本地样板戏

年10月举办的《革命文艺晚会》中的压轴节目诗剧《送军粮》，也被认为是可以发展为样版戏的作品。

以下简单介绍这三个土产“样板戏”：

- 音乐舞蹈史诗《歌唱马来亚》

《歌唱马来亚》以音乐、舞蹈、戏剧、诗歌及美术等的综合形式，歌颂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马共所领导的二十多年武装革命。该剧演出时动员了近百名演员，序幕以战鼓和欢呼，展现气势磅礴的场面，天幕上映出马来亚地图，红旗招展。尾声用大型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

- 诗歌造型《抗日之歌》

《抗日之歌》反映马来亚人民抵抗日军侵略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斗争，突出马共的领导，以及宣传毛泽东“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革命胜利”的理念。《抗日之歌》也是一个综合剧，运用的形式包括了音乐、舞蹈及戏剧等艺术手法。

- 诗剧《送军粮》

《送军粮》的发生时间在“马来亚抗英解放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地点在彭亨河畔文德甲的某个新村。第一场表现胶工和农民“突破火线送军粮”；第二场写区委和战士“冲破层层封锁线”接军粮；第三场写军民“手握钢枪心向党，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高举大棒的批判文论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批斗。在中国有“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在新加坡则有左翼工团“炮打分裂主义集团司令部”。所谓的“分裂主义集团司令部”，指的是以李绍祖和徐振弓为首的社阵领导层。

金银业工联在1968年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特刊里，发表了长达14页的不署名评论文章〈掌握毛泽东思想，推进我国的革命〉[22]，给李徐集团扣上“形左实右的分裂主义集团司令部”高帽，指他们所表现的是“非无产阶级和反无产阶级的坏透了的思想和作风”。文章也指这个“帽子工厂”司令部“把有共同语言的人，都看成是‘革命派’，把没有共同语言的人，都打成是‘帝国主义代理人’、‘特务’、‘黑帮’、‘牛鬼蛇神’、‘右倾分子’等等……”

紧随着金银业工联之后，鱼业职工联合会、茶餐酒吧职工联合会、驳业工友联合会以及劳工党等左翼团体，也都大张旗鼓地向李徐集团猛轰。

无论是这个“分裂主义集团司令部”，还是炮打这个司令部的人，所搞的其实都是分裂活动。从他们极端冒进的行动与黑帽乱扣的文章，可以明显的看到文革极左思潮和批斗文字的恶劣影响。

“遍地毒草”的文艺界

1967年6月，发表在《新青年》第7期的评论文章〈当前我国文艺工作者的若干问题〉[23]，是左翼分子全面批判新加坡文艺界的重头文章。文章署名“一群文艺工作者”，长14页，近两万字。在谈到“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问题时，文章点名批判“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搞文

[22] 佚名，《掌握毛泽东思想，推进我国的革命》，载《金银业职工联合会庆祝1968年国际劳动节特刊》（1968年版）。
[23] 同注2。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9 月

马来亚橡胶研究院正式成立

艺的”新马作家，包括杜红、钟祺、苗芒、谢明、麦青、宋雅、苗秀、征雁、田流等，指他们表现的是“个人主义、温情主义、自由主义等坏思想、坏作风”，而另一名诗人周粲则是“公开打着形式主义反动文艺的黑旗，公开鼓吹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意识”。

除了以上这篇长文，当年发表在《阵线报》等左翼刊物的一些评论文章，行文大都杀气腾腾，批判性的文字已恶性膨胀到完全无视人的尊严。

对于左翼阵营好勇斗狠的批斗，新加坡的文艺工作者大多不愿与之论争。诗人周天当年以林子为笔名，在左翼刊物《笔端》发表了一首诗〈今夜想起〉，曾受到极左分子的攻击，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我的一首诗〈今夜想起〉，被认为含蓄的写法不能让工农大众接受……林康的诗〈挽歌〉，也不合工农大众的口味，而彼岸也难逃红卫兵式的鞭鞑，我真为当时的政治标准感到悲哀”[24]。

“遍地毒草”的年代已经过去，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也早已远去，但历史所留下的疤痕，仍深深地烙印在老一辈的华校生脑海。无论是对还是错，无论是顺流还是逆流，历史都是真实的。而历史所造成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伤感的、荒谬的还是错误的，都是构成现在历史的根基。

文革潮文学之反思

文革潮文学从兴盛到走向衰亡，国内外左翼政治运动的式微无疑是重要的客观因素，但文学本身在艺术、语言、审美与理念等方面所受到的各种框框的制约，显然也是和这股文学思潮没落不无关系。

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新加坡，对这种完全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文学进行模仿，其结果必然是在内容与形式上都陷于僵化与形式化。除了描写工农兵（“兵”是指马共游击队）的生活和斗争目标，文革潮文学几乎已放弃了其他的写作对象，内容与形式千篇一律，对读者已无新鲜感可言。这种以政治为服务对象的文学，在整个政治体系瓦解，政治的奋斗目标消失之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文革潮文学崇尚以工农兵的话语进行创作，追求浅显易懂，说出劳苦大众的家常话。左翼评论家们鼓吹作家到劳动人民中学习，最终甚至直接地要求工农群众自己拿起笔来创作。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被削弱，甚至被剥夺。知识份子选择到劳动人民中生活，尝试“转变身分”后再以工农兵的话语进行创作。这样的作品，文字与情感都经过了某种程度的模仿与扭曲，尝试说出劳动阶级“内心话”的知识分子，却隐藏着自己的“真心话”，经过时间的考验，剩下的只是空洞的口号与形式。

文革潮文学给人的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崇高、无限、高昂、激越。但这种革命理念，是和现实生活疏离的、矛盾的、冲突的。文革狂潮平息之后，受冲击最大的是左翼阵营的作家群，无论是口号喊得最响的红色诗人、平实无华的工人小说作者，还是挥舞着批判大棒的评论家们，在后文革时期都出现了失落与迷惘的心态。

诗人原甸就是一个例子。1961年以《青春的哭泣》响誉诗坛之后，原甸就以满腔的热情乘船到中国，奔向梦想中的文革。但作为“归国华侨”，原甸在中国受到了“冷遇”，幻想破灭，之后辗转到了香港，并在1980年代回到新加坡，写下〈疲倦的鸟回巢了〉：

疲倦的鸟回巢了
共和国　我回来了
……
我的土地
有一个窟窿
盛着我的泪水[25]

原甸的泪水，最终都交给了上帝：

应该相信——
教徒的眼泪
最真
它不流自眼睛
它淌自心灵……[26]

[24] 周天，〈我的视角：七十年代的文坛〉，载《热带学报》，2001年1月版。
[25] 原甸，〈疲倦的鸟回巢了〉，载《原甸三十年集》（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1990年12月）。
[26] 原甸，〈我进教堂〉，载《原甸三十年集》。

同样把失落的灵魂交给宗教的是崇汉，1999年出版的小说集《奔走在闪耀的路上》，宣扬的不再是《金光道上》的阶级斗争，而是一贯道的“真理之道”。他在〈序〉里说，写这本小说的目的，是要“阐扬至尊至贵的真理大道及因果报应，帮助读者把污浊的心灵洗涤得干干净净”[27]。在崇汉的影响下，一些左翼作家，包括丘克难等，也加入了“求道”的行列。

有人“求道”，有人走入教堂，也有人改弦易辙，向西方的现代主义汲取养料。槐华在诗集《缪斯喜悦的回音》里就说，他在1990年代所写的诗“尤其朦胧”，因为多了“郁金香似的心曲、映入梦中的双桅船”，而少了“曾泛于时代多彩画面的诗筏、飘舞于黎明之声的火花”[28]。

当然，更多的左翼作家在狂潮之后就封笔了，在新华文坛上销声匿迹，仿佛已经从人间蒸发。

文革思潮是这场历史悲剧中的一个重生的假象。历史已经证明，文革不可能带给中国新的希望，也同样不可能带给新加坡华校生新的希望。反思新加坡左翼文学的文革潮，若还有一些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恐怕就是某些作家那种无私与净化的“崇高理想”，在日益强调经济发展与物质享受的新加坡，也许这正是我们今日所欠缺的！

[27] 崇汉，《走在闪耀的路上》（新加坡：热带出版社，1999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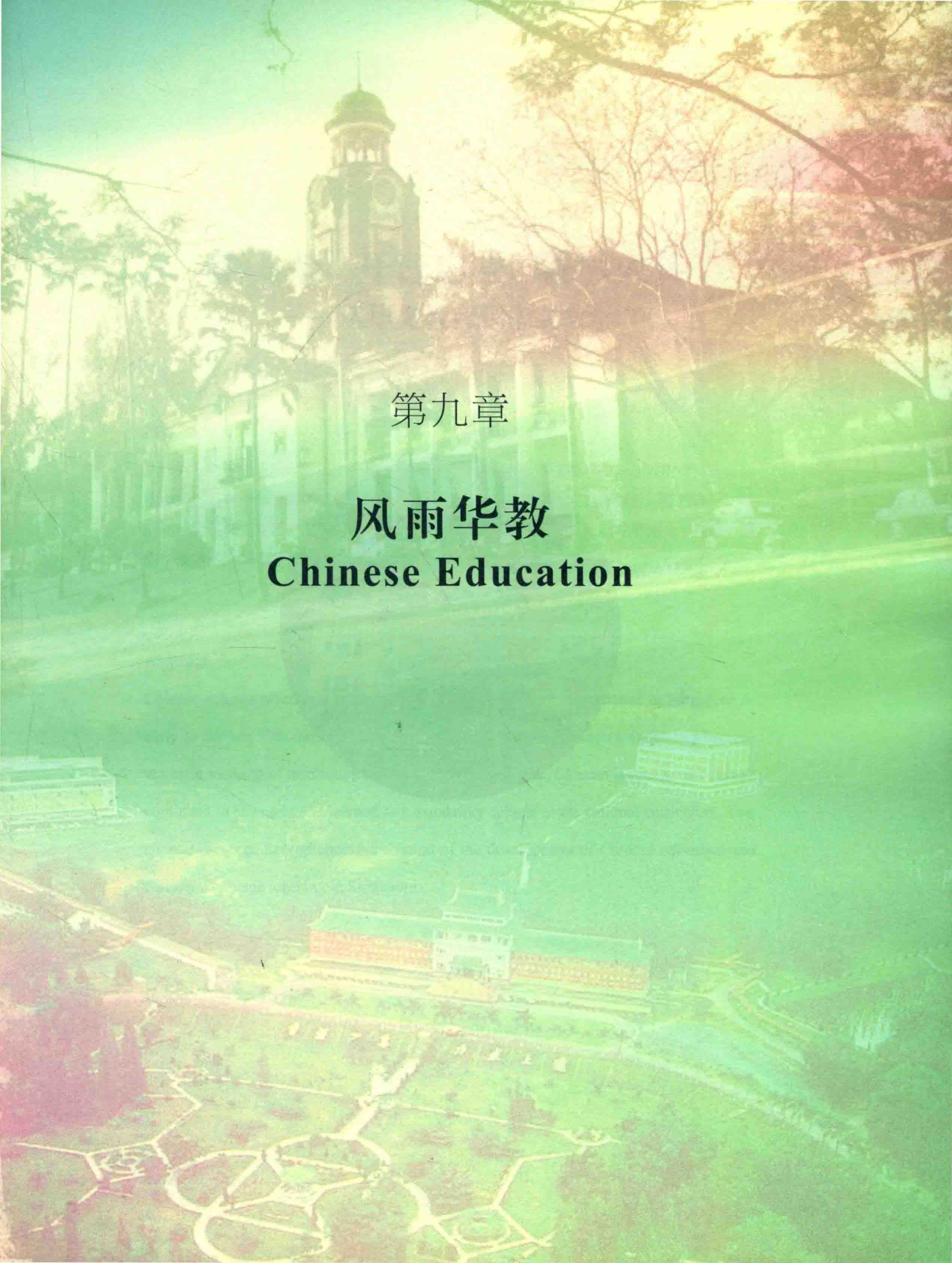
[28] 槐华，《缪斯喜悦的回音》（新加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12月）。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柔佛蒲莱山大蓄水塘落成，开始供应新加坡人民饮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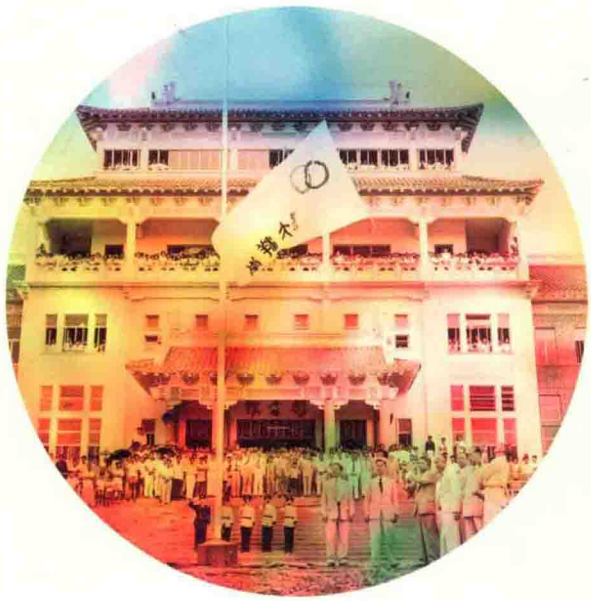
我会讲华语
I Can Speak Mandarin
1955



第九章

风雨华教

Chinese Education



第一节　开智启蒙　薪尽火传
——从华文教育到华文教学

摘要

从作为一个英国殖民地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华文教育及华文教学在新加坡的整体教育结构中始终占有一个显著的地位。然而在内容、体制和目标上，它也不断地因应着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时代大局的变化而作出调适或改变，从而发展出一个自成一格的华教体系。本节的主旨，即为此发展历程作一综述。

Abstract

Chinese schools offering a modern form of education were in existence in Singapore as early as the late 19th through early 20th century. By 1987, although English had become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all schools in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inued to be taught and learned as a mandatory subject of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This chapt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Singapore.

梁秉赋 (Neo Peng Fu)

创立于1849年的崇文阁是否是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校，目前学界仍存争议

崇文阁碑刻

自20世纪伊始，华文教育在新加坡迅速发展，令教育平民化成为可能，并因此改变了整体华人社会的素质，使其脱胎换骨。但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后，因为社会历经重大变迁，华文教育在完成其历史任务之后，功成身退。延续华族语言与文化的重任，则转由学校里的华文教学来肩负。

而要能深切著明的了解什么是华文教育，莫过于从认识其载体“华校”入手。所谓华校，指的是：

以中文（最早是闽、潮、粤、客、琼等方言，后来则为国语或普通话）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并且在教导现代学科知识的同时，也侧重于对学生进行有关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知识的教授，以及华族的思想和价值观之灌输的学校。

此中“现代学科知识”的教授为其关键，因为它使华校和过去的私塾、蒙馆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在科举考试尚未废除的19世纪，新加坡华社已有民办的公立教育机构，其数目至少在50间以上，其中较为知名者即为崇文阁与萃英书院。但这些教育机构，是以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珠算，以及四书五经等内容为主的，因此在性质上实属以举业或道学为宗的所谓旧学的教习场所。严格来说，它们并不是后来在新加坡（以及其他东南亚地区）普遍所见的，以现代学科知识与技能之传授为鹄的华校之前身。

华校的由来

新加坡和马来半岛（英属马来亚）到处可见的华校，最早出现于1904至1908年之间，其名称或为“学堂”或为“学校”。比如新加坡的应新学堂（客籍社团办）创立于1905年；广肇学堂（粤籍社团办）和端蒙学校（潮籍社团办）皆创立于1906年；而道南学堂（闽籍社团办）则创立于1907年。槟城（Penang）的中华学校创立于1904年；吉隆坡的尊孔学堂开办于1906年；怡保（Ipoh）的育才学堂则创办于1908年。这些最早的华校之所以集中首见于这几年之间，实与科举考试废除于1905年有直接的关系。

学堂原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产物，早于1860年代既已出现，本是以教授实业和专门技术为其目标的，比如机器、电报、船政、陆师和水师学堂等等。但这些教授新学的学府40年间发展滞慢，至1902年为止，在当时四亿余中国全

国人口当中，学堂的生员尚不足7千名。其原因就是人们仍以科举为正途，不肯进入学堂就读。晚清新政的当权人物以大刀阔斧之力，一方面废除科举，另一方面劝勉社会上的宗亲和乡亲组织协助创办学堂。新马两地华裔社会对此呼吁积极响应，这就是为什么此地最早的华校都是由社团组织所创办的原因。而其时的学堂、学校，实为提供新式教育的小学之谓，也就是后来的华校之肇端。

华人向来重视教育，因此新加坡的华族先辈当年积极办学设立华校，便是旨在让年轻的一代，能接受知识的启蒙，文明的教化。我们可以从他们当初创建学校时给予学校的命名，感受到他们的期望和苦心。本地许多华校的名字，都反映出它们所被赋予的，是一个为孩童开启智慧、培养道德的崇高使命。所以我们看到，因寓有发蒙启迪之冀望，而以“启”、“蒙”两字为名的学校，便有启发、启秀、启智、启蒙，和端蒙、化蒙、陶蒙等校。此外，因为希望学校能发挥作育、培养人才之功用，而以“育”、“培”、“陶”、“养”等字义为校名的，便有育才、育贤、育英、育人、育文、育德、育新、育正、培道、培德、培本、培文、培英、培才、培新、陶英、陶才及养正等校。我们也看到，因为祈望学校能注重学生在志向、道德和文明方面的教诲，而以“志”、“德”、“文”等字义为校名者，便有励志、尚志、通志、励德、彰德、树德、广德、振德、崇德、博文、广文、崇文、宏文和敬文等校。而亦有学校以明伦、植哲、弘毅、维新、更生、崇正、励正、励明为名，可以推想其创办人具有把涵养学生之心志和节操的理想托付于学校的愿望。我们也可看到，注重团体精神的培养也是当年一些华校创办的初衷，所以有以合群、植群、励群、益群、振群、裕群和爱群为名的学校。更有不少学校以“华”字为名，彰显其以培养学生具有族群自强观念

创办于1854年的萃英书院

的用心，比如育华、爱华、建华、醒华、聚华、新华、启华、培华、励华、旺华、益华、曙华、裕华、辅华、强华、崇华、爱华、陶华等校便是。另有一些学校，由于创校人有感应时代精神的用心，于是以同民、育民、新民、公民、平民、培民、国民、全民、大众、民众和民主为校名。这些华校的校名，深刻入微地体现了先贤当初创办学校的良苦用心及殷切期盼。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不论是位于乡村或市区中的华校，绝大多数于其创始之初即是男童与女童兼收的。此应与当年兴学办校的社会贤达原来本就是教育乡里，普遍施教的用心有关。可能当时社会上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盛，所以有机会入学读书的孩子尚以男童居多，但家长若是愿意让自己家的女孩念书，学校一般也并不拒收。也就是说，除了少数在创办伊始就很清楚的将本校定位为只收男生或女生的学校以外（此尤以教会所立之学校为然），自其初始至蓬勃发展以来，绝大多数的华校施行的就是男女合校制，让男女孩童同窗共读。此亦足为华校的开明与进步之征。

华校的兴盛

20世纪的首40年之间，华校在新加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至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以前，本地大大小小的华校已有300多所。这些华校，大约三分之一位于市区，或置身会馆建筑之内，或藏身市井店屋之中；但它们一般都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6月

华人社团筹款救济山东惨祸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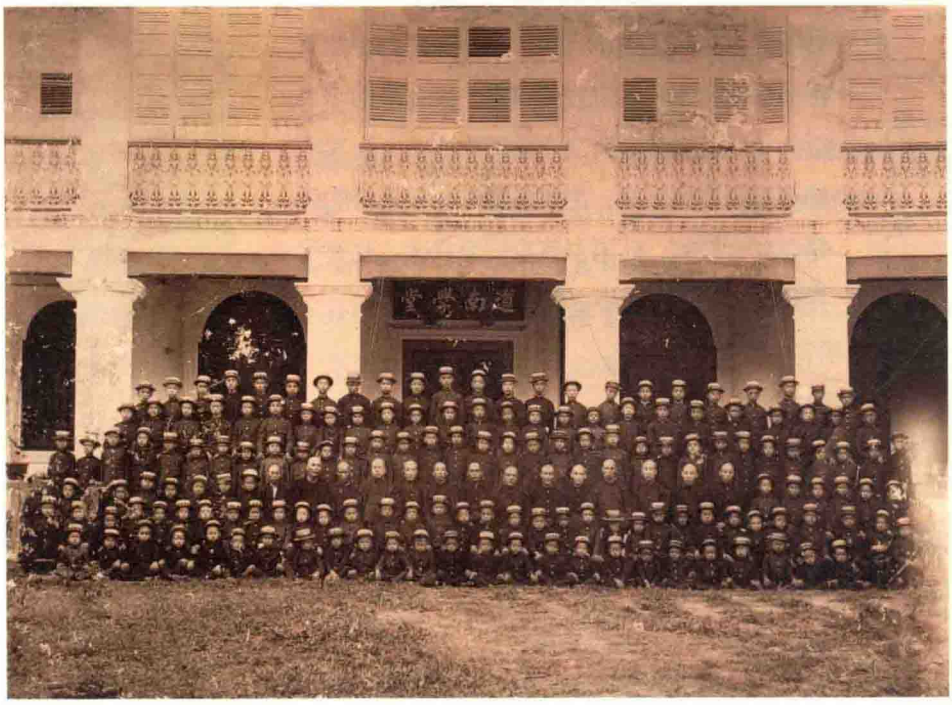
7月3日

莱佛士学院成立，为当年新马最高学府

规模较大，设备较佳，能让数十甚至数百学童容身就读。而其余大多数的华校，则零星散布于新加坡的各个乡村里面。这些乡区华校虽不乏亦颇有规模者，但一般因陋就简，往往以村庙的空间或戏台，权充课室，就此教导孩子读书识字。这些华校虽然在三年的日治沦陷期间（1942-1945）遭遇很大的破坏，但战后很快就恢复旧观。当时有名可考的308间华校，除了遍布在新加坡本岛的市区和各乡村地带之外，也伫立在四个离岛之中[1]。因其分布面广，且学费低廉，因此为广大民众的小孩，提供了可以就近入学的机会。劳工阶层的子弟及贫苦农民的孩子，不管他们是居住在闹市的陋巷中，抑或穷乡僻壤的山芭里，都可以找到一所他们负担得起的华校接受正规的教育，从而改变其命运。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虽始于提供启蒙教育的学堂与学校，但却发展迅速，继之再有提供中等教育的中学，以及高等教育的大学之创建。在提供新式教育的小学于本地扎根不到10年光景，新加坡在1919年就有了第一所提供中等教育的华校——南洋华侨中学，它象征着华文教育的发展自此迈入另一个里程碑。从此时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另有三所华文中学相继成立。这一发展，改变了华校学生以往在本地完成小学教育以后，如果还要念书就必须回到中国继续升学的情况。而从战后到1950年的短短几年之间，又有另五所华文中学接踵成立。1956年3月，南洋大学正式开课，这意味着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完成了具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

为什么前四所华文中学需历时30年才能建立，而后来的另外五间则仅在战后几年之间就相继出现呢？这应当和时局的发展有关。一方面是因为战争期间为避乱而南来的中国文化与知识界人士，因当时的国内局势而选择在此地居留的人数颇众，这使到创校所需的师资不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战后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经济的复苏也使华校学生的升学问题，日显迫切。也就是说，对中学学额的强劲需求，亦成为在本地创办华文中学的一大推动力。1949年以后，情况更有重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新加坡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文中学毕业生，已经难以再回到中国继续深造，接受高等教育。这一历史契机，使得在本区域建立一所华文大学的吁求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道。新马两地的华社，遂汇聚东南亚各地华裔的力量，在新加坡创建了南洋大学。而南洋大学这所中国以外唯一的华文高等学府，当时其实是为来自新加坡、马来亚、沙巴、砂劳越、文莱、北婆罗洲和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华校学生敞开大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加坡的华校扮演着的，其实是一个区域华文教育中心的角色。



道南学堂（1906年创办）

[1] 施楷，〈1945-1967年新加坡华校名单〉，载潘星华主编，《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新加坡：华校校友会联合会，2014年），页252-254。

华校的性质

1956年以前，本地的华校都是由华社自资兴办。除了少部分是由私人开办的以外，大多数是由宗亲及地缘组织（如会馆与公会）所设立，或社会贤达与地方人士所集资创建，也有一些是由教会等宗教团体所开办的。所以，华校在性质上实属民办的教育机构，一般由一个董事会负责维持与监督学校的运作。华校在新马地区虽令无数的几代孩童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但在当地政府的认知中，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凡有华人儿童之地方均有华校之设。学校由同乡会，或宗教团体，或商业社团所维持。从来彼等对于任何形式之政府管制均加以强烈之反对，一般言之，只有在学校经费骤增，校舍不堪修理，或教员薪金过于低薄以至影响学术程度之时，政府津贴始获接受[2]。

华校为什么到处可见？维持华校的人士又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政府的资助与管制？这都与华校的性质息息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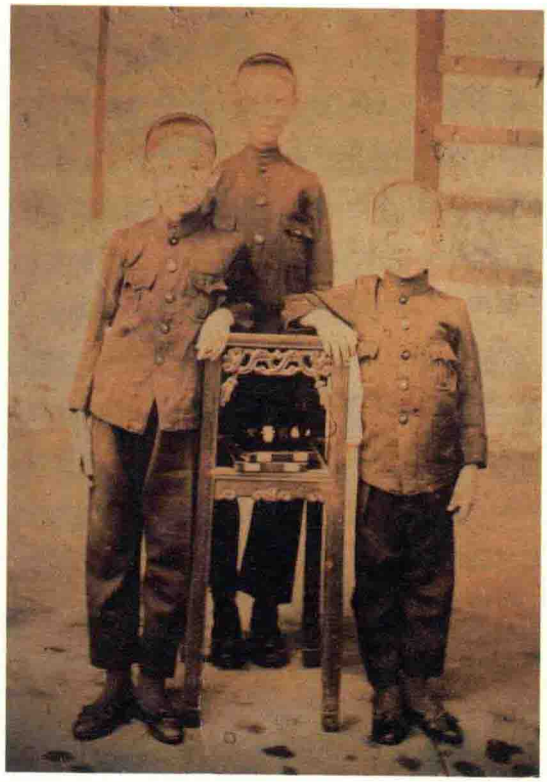
新马华校的师资，主要来自闽、粤、江、浙等地；而其教科书则大体与当时中国国内学校所使用者无异，其中尤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所编印者为主。自1920年代至1950年以前，情况大致如此。此外，华校的学制亦为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及高中三年的所谓“六三三”之体制；而全年也以春、秋二季为两学期。从这些特点来看，华校实为当时中华民国国家教育体制的海外延伸。也就是说，华校其实就是侨校。迟至1948年，华校的《国语》课本中，仍可见到这样的课文：

我是中华国民，我爱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我们的祖国。

你要爱中国、我要爱中国、他要爱中国，我们都要爱中国。

由此可知，华校不仅让孩子们学习知识，修养道德，提高文化水平，它也有维系当地华社之侨民认同意识的作用。所以，太平洋战争一结束，中华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随即在重庆召集东南亚各地与华校有关的人士回国开会，“共商复兴侨教”的工作。由李光前担任主席，负责新马两地华校之复建的“马来亚区华校复校辅导委员会”，于1946年6月在新加坡成立时，当时民国政府派驻吉隆坡和新加坡的总领事，及其教育部的专员与督学，都出席了会议。这显示，华校甚至在战后的重建工作，都是由中国官方策动、英国政府认可、新马民间人士出面执行的。所以，殖民地政府不认为它有义务设立华校。但它愿意给予华校津贴，并寄望通过这样的资助能使它得以影响甚或管制华校。这样的意图，自然为担心华校会因此而变质的人士对“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和管制，都满怀戒心。

不过，英国殖民地政府不愿意设立官办的华文学校，其实也是促成华校遍地林立的原



端蒙学堂学生

[2]《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新加坡：政府出版局，1956年），页3。

相关人物

胡文虎

历史事件

1 月 15 日

胡文虎独资创办《星洲日报》，至 1983 年与《南洋商报》合并

因。因为当局虽然很早就开办英校，但一直没有为当地孩童大规模提供学额的举措。因此就算迟至1949年，除马来文学校外，新加坡纯粹官办的学校尚只有区区的16间政府英校而已，而虽非官办但获得政府辅助的英校另外也不过19间。以1949年为例，这35所学校总共为3万2000余名幸运的孩童提供了受教的机会。然而当年需要为所有新加坡的适龄孩童提供的学额，其总数实高达10万以上。这也就是说，其他进不了这35所学校的孩子，若要上学就必须另寻出路。这就是为什么同一年中，有7万1000名华族小孩，必须进入民办的319间华校之中，才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原因[3]。华校的存在与蓬勃，正是因为社会上有这样的需求之缘故。这一历史事实也让我们看到，在政府没有为孩童提供义务教育的那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之中，是华校为新加坡承担了为绝大多数的孩子提供教育的这个社会责任。

华校的式微

战后10年，可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的鼎盛期。它不但拥有由数量庞大的中小学所奠定的基盘，还发展出了顶端的大学。同时，它所教育的学生总数，也超过英文、马来文和印度文等各类别语文源流的学校。然而，在这一繁荣景象的背后，其实已有一严重的隐患浮现。1950年以后，华校的生源开始逐年递减，华文教育的版图遂逐渐萎缩。在战争刚结束的1946年，全国7万6000余名各级学生当中，有4万6000多名就读于华校；在英校中求学的，只有2万3000多名。1951年，全国近15万名学生当中，在华校就读的虽仍有约7万6000名，但英校的学生人数，已攀升至5万5000多名。到了1956年，全国24万余名学生当中，已有约11万名就读于英校，另外的10万8000余名则就读于华校[4]。可见进入英校求学的学生日多，而选择入读华校的学生日减。英校学生之增，是建立在华校学生的流失之上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倾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而且，就算家长有选择把孩子送入英校的意愿，突然之间又如何创造出这么多英校的学额来满足这样的需求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与英国当局战后实行的一项教育政策有关。

英国殖民地政府虽然治理新加坡一百多年，但一直没有把为全体孩童提供义务教育作为其施政职责。到了战后，这一情况才开始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在此之前百年以上的时期内，当局虽然开办英校，但其所提供的学额，却是极为有限的。然而在1947与1948年间，殖民地政府的立场却有了重大的改变。当时殖民地政府宣布将实施一个“十年教育计划”，矢志为新加坡的全体适龄孩童提供六年的免费小学教育。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施政，因为它意味着，政府当时必须为高达14万5000名孩子们，提供一个得以享有义务教育的学额。以当时的现实而言，这似乎是一项不可能达成的目标。但当局却以无比坚定的决心，表示会为此而兴建一百所以上的学校来完成这个目标。仅至1954年末，已有54所政府出资盖建的新校舍在此计划中完工落成。其中的47所被用来开设为小学，其余的7所则为中学[5]。而这些每间皆可容纳数百名孩童就学的学校，是极有规划地分布在有大量适龄孩童居住的社区范围内的。其用心，就是争取让附近的居民愿意让孩子们就近入读这些政府学校。

为什么英国殖民地政府会为此而投注这么大笔的资源？原因就在于这个宏伟的教育政策，其实是英国为新加坡日后得以实现自治（“extending the capacity for self-government”）这一政治进程所规划的手段[6]。具体而言，英国当局希望进入这些新建的学校之中就读的孩子，能在一个同质的学习环境中塑造共有的认同观念，养成一种统一的公民意识，以有利于在未来携手并肩建立一个有在地认同观念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其关键所在，便是这些新学校将被规划为什么性质的学校？依照当局的决策，它们必须属于能跨越族群藩篱，把各族孩童都容纳在一起学习的英文学校，而不是旨于维护民族教育的华文、马来文和印度文学校。这一庞大的盖校舍、建新校的工程，因此彻底地改变了新加坡原有的学校景观和教育生态。其

[3] 此处数据悉依 Colony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en-Year Programme: Data and Interim Proposal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49), p.2 中所陈述者。

[4] 此处的统计数字引自 T. R. Doraisamy, *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TC Publication Board,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1969), p.147.

[5] *Colony of Singapore Annual Report 1954*, "Chapter IX Education"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p.97.

[6] Colony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Ten Years' Programme*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47), p.1.

直接影响，便是造成全岛各地在短时间之内涌现出许多英校。这些由丰沛的官方资源所支持的学校，以更佳的教学设备，更为低廉的费用（免缴学费，只需付杂费），与原有的华校争夺生源。它对华校，以及其他民族语文源流学校的杀伤力，可以想见。由此可知，英国当局这一为新加坡孩童提供全面受教机会的“十年教育计划”，其实是为其深远的一个政治目标服务的谋略。它便是造成日后英校一枝独秀，华校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肇始之因。

华校的复兴

华校由于主要依靠自力经营维持，且不以盈利为目的，又不太愿意接受殖民地政府的资助，因此经费并不宽裕。其一般性开支，如教员薪酬与学校诸种杂项开销，主要依靠学费收入来抵消。因此，当学生来源日益锐减，导致学费收入急剧下降时，自然要面对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窘境。一些境况稍差的学校，甚至面对关闭的厄运。因此1950年代初期，华教人士有发起组织“火炬运动”力谋自救之举。这一社会运动乃是希望通过广泛的呼吁，让家长仍然选择把孩子送入华校就读。惟其效果并不理想。然而，时局的变易却为华校的生存带来了一线曙光。那便是在1955年4月的普选之后产生的民选政府，不得不在新形势的压力下重新检讨过去对待民族教育的官方立场和政策[7]。

1956年2月8日，劳工阵线政府公布了《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旋即又于同年3月29日公布《教育政策白皮书》（*White Paper on Education*），宣布自此以后，政府将“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教育”，对所有语文源流的学校都给予一视同仁的财政资助。当局复于1957年1月11日在《宪报》公布，给予各学校的“全部津贴条例”。两个月后的3月31日，新加坡几乎所有的华校都表态接受了政府的“全部津贴制度”[8]。华校从前之抗拒英殖民地政府的官方资助，源于不愿意让当局可借此过度干涉校政，从而改变其“侨校”之性质。但自1950年代中期以后，新加坡已迈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其各族居民在身份认同上，都面对着需要塑造一个本土认同的时代呼唤。专以教育领域而论，这意味着本地的所有学校都有服膺于这个崇高目标的义务或责任。对民族语文学校而言，其教学宗旨就不能再仅专注于个别族裔的民族意识之培养，而须以塑造具有全民意识的公民自觉为目标了。换句话说，华校自此须由侨校改变为属于新加坡华人的华文学校。

接受了政府的全面资助的民办华校，遂成为“政府辅助学校”（government aided

---

[7] 新加坡具有法理意义的普选（universal suffrage）始自1948年，且于此至1953年之间，共举行过8次选举。即分别于1948与1951年举行的立法议会议席的选举（legislative election），加上另外6次的市议会议席的选举（municipal election）。然而，这几次的选举却仅是群众参与度非常低的政治活动，其中华族选民的参与比率，更是微不足道。比如1948年的立法议会选举，在20万可注册为合格选民的群众当中，只有2万2千余名登记为选民。但这一情况在1950年代中期彻底改变，在语文、教育、公民权等问题激发起来的反殖情绪的带动下，受华文教育及口操方言且不谙英语的华裔选民踊跃投入1955年4月2日举行的立法议会的选举当中。史家即曾指出，以民众参与的广度及深度而言，本地具有真正普选意义的政治运动，始自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选举。这一方面的论述，可参阅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5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3) 之第七章 “The Electoral Experiment,” pp.251–277。

[8] 此一说法据载于《新加坡华校联合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华校联合会，1967年），页59之文献。另据唐菁编著，《新加坡华文教育》（台北：华侨出版社，1964年），页74中所载，至1958年，全新287所各类华文中小学之中，只有42所没有接受津贴。

南洋大学校景

schools）。另一方面，在1956年的《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之倡议下，政府也开始兴办政府华文小学和中学。至1961年为止，新加坡共有228所华文小学和28所华文中学[9]。同时，华校的教科书也积极开启其本土化的历程。这256所由辅助学校和政府学校共同组成的华文教育体系，当年为占全新加坡学生总数之40%的15万名华文源流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中小学教育体系[10]。自1959年即开始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秉承了“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教育”的理念，也依循前任政府实行全面资助各民族语文学校的政策。此外，其教育部长杨玉麟并于1960年2月，宣布承认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的学位；而在1968年5月，时任教育部长王邦文则宣布正式承认南大的学位[11]。这些正面的因素，无疑给之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华文教育打了一剂强心针。因此，华文源流的学生人数在全国学生总数上所占的比例，虽然在新加坡取得独立的1965年前后已降至30%左右，但我们看到的是，从1957至1967的10年之间，一直有30%至40%的华族家长，仍然选择把子女送入华校就读[12]。华校在1950年代初期因英殖民地政府的“十年教育计划”而受到的冲击，在1956年以后因接续执政的两个民选政府皆施行“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教育”之政策而获得缓解，并由此缔造一个复兴之局。可惜这一中兴的荣景，却是短暂的。

华校的凋零

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华校又开始面对生源紧缩的难题。在1967年，华校所招收到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尚占全国小一学生总数的33%；但到了1977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13.75%[13]；而至1983年，竟再骤降到不足1%[14]。自1950年代中后期以来，其发展得以持续稳定了10余年之久的华文教育，为什么又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其原因颇为复杂，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三个较为显明的方向，来理解这一变化。

其一，从位居华文教育体系之顶端的大专教育的层面之变化来作观察。父母为孩子选择要接受何种体系的教育，首先考虑到的应该是其持续晋升的前景，尤其是中小学基本教育完成以后的专业或高等教育的深造机会。自

[9] 根据唐菁编著，《新加坡华文教育》，页80-107中所列之“1961年新加坡中小学华校一览表”整理。

[10] T. R. Doraisarmy, *op.cit.*, p.147.

[11] 见纪宝坤、崔贵强编著，《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之“南大大事年表”（新加坡：华裔馆，2000年），页13-14。

[12] 根据时任总理李光耀于1977年2月23日的国会演讲记录。

[13] 同上注。

[14] 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检讨与建议》（新加坡：新加坡教育部，1992年），页7。

1960年代以来，新加坡步入朝急速工业化发展的阶段，高端的工艺与商管技术教育因此成为获取优职的保障。然而，成立于1958年的新加坡工艺学院（新加坡理工学院的前身），自其创建以来即以英语为授课语言。此外，成立于1963年的义安学院（1968年改名义安工艺学院，即义安理工学院的前身），原本与南洋大学一样，是一所属于华文院校的高等学府。但它在1971年也全面改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1962年，马来亚大学于吉隆坡另立校园，而马大原本位于武吉知马（Bukit Timah）的旧址则自立为新加坡大学，并延续马大原来即以英语授课的传统。更令人瞩目的是，原本作为本地及本区域华文教育之最高学府的南洋大学，也于1975年开始招收各语文源流学校的毕业生，并将中文系以外的其他学科之教学媒介语，一律改为英语。时至1978年，南洋大学更与新加坡大学在新大位于武吉知马的校址共组联合校园，为的是要让南大学生能在一个具有浓郁的英语氛围的环境中上课。两年之后的1980年，政府便将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为一所纯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所有的大专学府皆采用英语教学的事实，不啻表明华文源流中小学毕业生如果英语能力不强的话，其深造机会其实是极为有限的。而早在1966与1967年间，教育部甚至已开始要求华文小学的数学和科学这两门学科，改用英语来教学[15]。这一冷酷的现实，对家长考虑要不要把孩子送入华校，可能是很有负面的影响的。

其二，从新加坡的整体城乡重建之历程来作观察。1960年，新加坡开启其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随后的20年间，本地的市区和郊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密集居住于市区的人口，逐渐被转移到郊区新开发出来的组屋新镇。而要建设这些卫星镇，首先当然需要把原居于这些郊区地带的居民作重新安置。比如原居大巴窑与勿洛这两地之乡村内的民众，便是在1962、1963年之间开始分批迁离，以便腾出空间来发展新镇的。裕廊地区的民众迁移与土地重建，也始于1960年代。这些发展与变化，其实对华校的存续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无论原来是位于市区或乡村地带的华校，其校舍无可避免的，都在重建计划下被拆毁。由于经费问题，除了少数有强大会馆之财力支持的学校外，绝大多数校舍已不复存在的华校其实很难再觅地另盖一所新校舍，或是有足够的能力接受政府出资所盖的校舍，来再把学校维持下去。在过去土地与社会成本皆相对低廉的时代，村民大众或有心人士只要稍有积累，就可以设立一所学校。但在大规模、大范围的城市重建启动以后，这样的历史条件已不可再加复制。许多华校，因此在1960和1970年代，也在全岛的土地风景线被重新形塑下，走入历史。华校减少，华校学生的人数自然相应萎缩。

其三，从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尤其是与学校里的语言教学有直接关系的政策之演变来作观察。自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取得独立以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遂不再强调学习三语（即作为国语的马来语、族群各自的母语，以及英语），而是专注于让学童掌握双语（即作为共同语的英语，及族群各自的母语），并认真执行这一决策。1965年，教育部将各语文源流学校的第二语言，规定为小学会考的其中一门科目。这一批小六毕业生升上中学以后，于是成为了第一批在学校里必修第二语言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四年后的1969年，他们参加初中会考时，第二语言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会考中的一门必考科目。第二语文成为学校中必修、必考的一门学科的政策，对华校学生而言，影响不大。因为华校对作为第二语言的英文之教习，向来都极为重视。然而，许多英校从来就没有实行第二语言的教学。有的英校

相关人物

胡文虎

历史事件

华民护卫司署接受胡文虎建议，合资遣送失业老华侨回国

[15] *Many Pathways . One Mission: Fifty Years of Singapore Education*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7), p.194.

虽然有以学生的母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科目之设，但往往因循苟且，未给予认真教导。因此，当学生的族裔语言（母语）成为学校里必修、必考的学科以后，在一些家长的认知中，英校与华校之间的界线，也许已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尤其是政府所新办的英文源流中小学，它们因为没有传统英校的形象，更容易让家长觉得它们应该是与华校差别不大，也一样同时教导学生中、英两种语文的学校，遂将孩子送往其中就读。这些误解，可能也是间接造成华校生源减少的一个原因。

1979年2月，《一九七八年教育部报告书》（*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俗称《吴庆瑞报告书》）发表，它从华校近年来的收生境况，预估其将难以为继。然而，政府也担忧在终将成为教育全国学生之主流体系的英校中，如果不能有效地让孩童学好其母语，及传承其母族文化，新加坡的前景堪虑。报告书于是为新加坡规划出一个“新教育体系”：全国各族孩童未来都将在一个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学校中学习，并同时竭力掌握好母语。1986年，华文源流体系的最后一批学生毕业以后，华文教育在新加坡自此走入历史。然而，“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校虽然不再存在，但“对学生进行有关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知识的教授，以及华族的思想和价值观之灌输”的工作却没有中断，这一历史任务继由学校里的华文教学肩负起来。

华文教育在新加坡教育史上的贡献，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肯定。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它所培养出来的无数华校毕业生的这一视角来审察其历史意义，则也许更能掂估它的重量。在中小学教育尚未成为每一个公民与生俱有的权益的时代，普遍可见、到处林立且学费低廉的华校为所有想接受教育的孩子提供了一个求学的机会。其影响所及，不但使新加坡整体社会之涵养因此得以提高，更在数十年之间为我国铺垫了一个具有基本教育之素质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基本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不仅是普及知识而已，更为重要的是道德与纪律的培养。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为新加坡储备了一个具有高度可塑性的劳动力的来源；为我国应对工业化时代之来临而需要组建一支高效率的整体劳动队伍提供了必备的条件。而作为新加坡及本区域华校学生之精英的南洋大学毕业生，更为社会之中坚，在各行各业的高端领域发光发热。华校虽已不存，然其贡献仍在、影响不绝，是为薪尽火传。

第二节 华语还是方言
——讲华语运动

摘要

于1979年揭幕的讲华语运动，历时30余年，至今仍继续中。本节分析讲华语运动的历史背景，探讨多年来运动本身在对象、目标、策略等各方面的演变，分析华语相对于英语和方言地位的消长，以及此项运动对新加坡社会语言状况的影响。

Abstract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launched in 1979, has become an annual event for decades till today. Over the years, the Campaign itself has gone through evolutionary changes in its target population, objectives, and campaign strategies. As a long-term language planning movement, the Campaign has made lasting impact on the changing sociolinguistic profile of Singapore, as well as the status of Mandarin vis-à-vis that of English and Chinese dialects.

郭振羽（Kuo Chen Yu Eddie）

在殖民地统治时期，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出现了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四种语言源流。各个源流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师等等彼此相差甚大。以华校为例，早年（1949年以前）所采用的多是源自于中国的课本教材，校长和老师也大多来自“祖国”，学生效忠认同的不是英国，也不是殖民地政府统治下的新加坡，而是遥远的“祖国”。

为了融合多元民族建立新的共和国，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决定采用多元语言政策，早在1959年的自治邦法令中就明令采用四种官方语言。在1965年独立之后列入宪法：以马来语作为象征性的国语，以英语为跨种族通用语及行政用语，华语和淡米尔语为“母语”（民族语言）。

在教育方面，独立之后，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将教育制度“国家化”（nationalization），逐步将四大源流融入一个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国家源流”。在教学语方面，自1966开始推行双语教育，规定所有学生都须学习英文，作为各族共同语言，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学习其“母族语言”，以保留文化的根。

当年华族各方言群乃是以各自方言为家庭及本族群用语。各方言群之间则是以福建话为通用语。早年开国总理李光耀每年国庆日演讲，除马来语、英语、华语之外，也以福建话发言，以便和华族大众沟通。此外，到了大选期间，不少候选人大量使用方言（不同选区使用不同方言），以争取选票，至今仍然。不过，福建话以及各种方言虽各有其重要功能，在官方语言政策中没有正式被认可的地位，被视为不足以进入庙堂之上的“次等语言”。

新加坡独立之初，为了求生存，全力谋求发展经济，建立基本设施，10多年中取得重要成就。1970年代后期，新加坡的建国历程趋于稳定，开始有余力关照到经济以外的人文发展。在那段时间，在政府的带领下，先后策动几项社会运动，包括礼貌运动、敬老运动、儒家伦理运动，以及推广华语运动。

推广华语运动揭幕

1979年9月正式揭幕的推广华语运动，由总理李光耀亲临新加坡大会堂主持开幕典礼。他在大会中发表题为《华语还是方言》的演说，先后以华语、英语和福建话发表谈话，说明推广华语的必要，以及政府当局推广华语的决心。他在英语演说中，开宗明义指出：新加坡华人面对着一个困境（dilemma）。接着他解释，由于方言的普及，华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使得学生的华语学习，遭遇困难。由于英语的地位已为众所接受，新加坡华人将来所能有的选择有二：不是英语和华语的并用，便是英语和方言并用；而为了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应该推广华语以取代方言。他总结称：“由逻辑上看来，应有的决定是很显然的；但是在感情上，如此的选择却是痛苦的”[1]。

于是，新加坡最“长寿”的社会运动揭开了序幕。

讲华语运动揭幕后的两个月，李光耀在题为《语言的掌握和多种语言社会》的电视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阐明讲华语运动的目标[2]：

“我们应设法在这五年内使所有……（华族）年轻人都放弃方言，除了与祖父母讲话外，只讲华语。”

“在10年内，我们应可以使华语成为咖啡店、小贩中心和商店中的通用语言。当然，也同时使用英语”。

为了达到推广华语的目标，语言策划当局（当年的“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于1979年9月开始，运用多种媒介，采取多项措施，并举办多种活动，进行全面全国性的宣传和推广。为了达致远期的语言目标，策划当局在1979年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活动之后，厘定了长期性的推广活动，决定每年举办“华语运动月”活动，各有其中心主题，配合举办许多活动，推广华语的学习与使用。如此持续不断，至今36年。2014年6月，现任总理李显龙为第35周年的讲华语运动开幕，继续强调华语和华文的重要。

讲华语运动虽然是在1979年9月才正式展开，但是有关语言政策的检讨以及华语运动的策划，早在1977年已有迹可循。由1977年底到1979年华语运动开始短短不到两年之间，李光耀总理曾经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六次和语言有关的重要政策性谈话：

- 1977年12月，应新加坡大学政治学会之邀，到新大演讲，谈《高等教育和新加坡的前途》（*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Singapore*）
- 1978年1月，应新大和南大联合校园学生会之

[1] *The Straits Times*, 1979.9.8.

[2] *The Straits Times*, 1979.11.24.

邀，到联合校园演讲，谈《双语政策的重要性及其限度》（*The Importance and Limits of Bilingualism*）

- 1978年2月，应南洋大学历史学会之邀，到南大演讲，谈《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和高等教育》（*Bilingualism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Singapore*）
- 1978年4月，参加《双种语文教育》（英语）座谈会，由电视台播出
- 1978年4月，参加《双种语文教育》（华语）座谈会，由电视台播出
- 1979年2月，于总统府元宵节招待会发表谈话，谈《语言习惯与重大决定》（*Of Language Habits and Momentous Decisions*）

从李光耀当年的多次政策宣示，以及他在32年之后发表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2011年）[3]，可知他本人是新加坡长年以来语言政策最重要的诠释者和设计者，更是华语运动最热切的推动者。

在1978年4月一次英语电视座谈会中，李光耀明白指出："除非我们重新来研究，来讨论我们教育的基本原则和目标，除非我们很详细的考虑，然后做一个判断，不然的话，50年后，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英语的社会"。"如果政府要新加坡成为一个讲英语的社会，我就不必提出方言和华语的问题，我会让人民自由的继续用方言。结果英语会成为方便的共同语言，而华语将失去了它在社会上的角色"[4]。

在同年4月另一次《两种语文教育》的华语电视座谈会上，他明白指出以实际行动推广华语的可能性。他说："我所能做到的是创造鼓励讲华语的环境，使电视和电台，在观众最多的广播时间用华语。我希望以社会压力，慢慢会促使年轻一代，在商店、在巴士、在戏院和小贩中心都讲华语"[5]。

到了华语运动开始前半年，李光耀在总统府元宵节招待会中谈话，提到以宣传运动方式推广华语计划。相信在这期间，华语运动的政策原则，已经确定。他说："我们必须改变和改善我们的语言环境……大家一同努力，通过教育、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播与电视，鼓励人们只用我国的四种官方语言"[6]。

到了1979年8月初，《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海峡时报》以及"报林俱乐部"联合举办了一次推广华语座谈会，强调推广华语的迫切需要。几天之内，各报并一致以社论支持此论点，很明显的在为9月初的华语运动做最后的铺垫工作。

由于语言问题多年来在新加坡是极具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关华语运动的政策是经过内阁和执政党最高层慎重考虑之后而确定的。由于这一语言运动在新加坡国内以及东南亚国际政治方面，都可能造成深远影响，只有李光耀本人才能负得起如此重大决策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也惟有他的全面支持，以及他亲自一再以明确立场肯定此一运动，才可以使推广华语达致最大的效果。

综合李光耀多次有关语言政策的谈话，我们可以认识到讲华语运动乃是以现行的双语政策为既定的政策基础，以此为出发点，李光耀更肯定（一）英语做为共同语的地位

[3]《联合早报》出版；李光耀在新书发表会上说："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4]《星洲日报》，1978年4月22日。
[5]《星洲日报》，1978年4月8日。
[6]《星洲日报》，1979年2月19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世界发生经济大萧条，胶价跌至每担4元

当局开始限制华人入境

和功能；（二）英语地位已为众所接受的现状；（三）华语（而非方言）做为华族共同语的正当性，以及（四）经由华语（而非方言）以保留华族文化的必要。

由于在大前提上肯定了双语政策和双语教育的必要，李光耀也多次强调必须推广华语方可减轻学生在学校的语言负担，以确保双语教育的成功。在推广华语运动期间，教育当局也一再以统计资料强调以方言为家庭用语会影响到子女的学业成绩，有相当比例的华族学童，没有能力兼修两种语言，必须经由华语而学习并保存华文识字能力，不致沦为文盲。

初期推广华语的策略

自独立以来，执政党政府一贯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动各种社会发展的目标。重要的例子如“敬老运动”、“礼貌运动”，以至于“节省用水运动”、“公路安全运动”等等，社会学者称之为“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1979年开始的华语运动，基本上也是采用“社会工程”的方式，促使华人改变对华语和方言的态度和行为。

早期讲华语运动的策划和协调是由文化部政务部长主持下的一个委员会总其成。在这个委员会之下，有两个工作委员会负实际推行工作，分别协调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的华语运动活动。前者由文化部政务部长主持，而由各部门派代表参加组成。后者则由中华总商会会长亲自主持，由华报以及华文教育团体之代表组成。这两个工作委员会都向文化部的华语运动委员会负责。和华语运动有关的决策，便是经由这两个工作委员会，而推行于政府和民间部门。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可及于大众传播机构、学校、部队及交通界以及民众联络所等；而民间部门在中华总商会的主持之下，则可遍及各职工会、行业团体、宗亲会、同乡会等等。这公私两大部门的配合，足以涵盖几乎所有的华人和华社。

在工作委员会的层次之下，各个政府部门以及华人社团也都组成“华语推行小组”，以切实策划或执行和华语运动有关的措施（譬如举办讨论会、华语课程等等）。然而，由于各机关社团的性质不同，各个华语推行小组所采措施，以及对华语运动本身的积极程度，也不尽相同。

讲华语运动的初期目标，是要改变华人的语言行为和语言习惯，以华语取代方言。要达到这目标，负责当局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认知方面，促进华人的华语能力；（二）态度方面，说服华人接受华语的重要性；（三）行为方面，促使华人在不同场合中，使用华语，不讲方言。华语运动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大致可以由这三方面分析。

在华族人口中，有相当人数不懂华语，或不能讲华语。语言策划当局为了推广华语，在说服人们接受华语的同时，必须提供充分机会，让不懂华语的人有学习华语的机会。在这方面，策划当局所采措施，包括：

- 文化部与教育部合办华语课程，供公务人员进修；同时合作编印《华语会语》读本，并录制录音带作教学与自修之用，除供上述课程使用之外，还公开发售
- 人民协会协助民众联络所举办华语课程，供一般民众选读；若干公私机关也自行办理华语课程，供员工进修
- 广播与电视台每周定时播出“华语会话”节目，以英语及方言教华语。课程内容刊载于英文报和华文报

从有关资料看来，在早期华语运动期间，各种不同华语课程都得到相当热烈的反应。华语课程的录音带供不应求，电视台的“华语会话”节目也大受欢迎。由于华语环境的存在以及方言和华语间相当程度的相似，新加坡华人即使从未上过华文学校与华语课程，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华语能力。正式的华语课程以及非正式的华语环境（譬如电视华语节目），对于华语能力的提高，有相当的成效。

“态度”方面的改变，可以说是华语运动的重点所在。由李光耀的电视谈话，以至于街头巷尾〈让我们讲华语〉的标语和招贴，目的都在于向不讲华语的华人，灌输华语的重要性，希望由态度上的肯定，而达致行为上的改变。在华语运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说服性传播”（persuasive communication）方式，都全力施用。最重要的包括以下几项：

- 政府和舆论领袖的谈话演说，如电视座谈会、公开座谈会、报纸专栏等
- 学校和公私机构举办辩论会、作文比赛、演讲比赛以及讲故事比赛等
- 大众传媒刊出并播放华语运动标语以及宣传短片、

讲华语运动期间所用的宣传贴纸（I Can Speak Mandarin）

幻灯片，播送讲华语运动宣传歌曲[7]，赠送华语运动的T恤衫、宣传徽章等，也在公共场所以及公司行号张贴标语，造成一个全面鼓励讲华语的社会环境

在各种方式的“说服性传播”之中，无疑的，以李光耀几次的电视座谈会带来最广面且最深入的影响。自1979年11月起一年之内，李光耀分别以英语、华语和福建话，和新闻界代表举行三次座谈，经由电视网播出：（一）1979年11月（英语）〈语言的掌握和多种语言社会〉电视座谈会；（二）1980年1月（华语）〈语言的掌握和多种语言社会〉电视座谈会，以及（三）1980年11月（福建话）〈家庭用语和语言学习〉电视座谈会。

这些座谈会的重要内容，由华文报和英文报详尽刊载，同时并以社论和专栏再加引申诠释。李光耀谈话的影响，不止在于他个人魅力（charismatic）的说服力，同时也在于他亲自肯定此一语言运动，赋予正当（legitimate）的地位，同时消减反对的声音。

华语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要求达到语言习惯的改变。在这方面，策划当局只能间接地经由社会压力的加强，而配合以适当语言环境，以达到目标。至于直接和语言行为有关的行政措施，大略也有下列几项：

- 调派通晓华语的服务人员，参与和民众诸多接触的工作，并主动使用华语
- 要求公私机构的服务人员，凡是会讲华语者，佩戴“我会讲华语”的佩章
- 鼓励公司商店以及熟食中心的摊位，贴

[7] 1980年推出华语运动宣传歌曲“大家说华语”，由流行歌手黄莺莺主唱。歌词是：“国家要进步，语言要沟通，就从今天起大家说华语，不分男和女不分老和少，不再用方言，大家说华语，听一听，记一记，开口说几句，多亲切多便利，简单又容易。”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月3日

《星洲日报星期刊》创刊。英政府特派威尔逊爵士（Sir Samuel Wilson）视察全马政务

上“我们讲华语”的招贴，造成鼓励人们使用华语的环境

李光耀在1979年讲华语运动揭幕式谈话中，曾经表示，如果家长们清楚表明他们希望子女讲华语，政府会考虑采取行政措施，以支持家长们的决定。“我们可以训示政府公务人员，政府医院和诊所人员，以及柜台服务人员，除了对60岁以上的老人之外，不得讲方言”[8]。在1980年初的一次座谈会中，他再度表示需要采取一些辅助性的行政措施，以推广华语。不过政府需要给人民一两年的心理准备。“过了两年左右，我们就可以要求小贩、德士司机和巴士司机在申请执照时，必须通过华语口试”[9]。

讲华语运动激起的反响

长久以来，语言问题在新加坡是极具争论性的政治问题。1950年代的左派抗争以及1960年代的种族冲突，常是以语言和教育问题为导火线。政府为了避免由此造成政治不安，一方面采取多语政策以谋求和谐，另一方面也时时以压制性的措施消弥过激言论的出现。由此背景看来，政府当局在1970年开始鼓吹华语，似乎难以思议。由当年华语运动的推行，我们可以判断：（一）政府当局对于维持新加坡的政治稳定，有绝对的信心；（二）华语问题如今已经减少了情绪性的色彩，而容许理性的讨论；（三）鼓吹华语华文，不会影响到华族人口对新加坡的效忠，不会造成华族沙文主义的危机。

虽然如此，华语运动对于现存的社会语言状况，是一重大刺激，必然要影响到各语言相对地位和功能的再调整。而由于各种语言都有其支持者，社会中不同人等对华语运动自然产生不同反响，或为正面或为反面，是我们探讨社会语言状况时所不可忽略的。

先就华族人口本身而言，对于华语运动的态度，大致可分为支持者、存疑者和反对者三类。

以人数和声势来说，支持华语的华人无疑占优势。特别是受过华文教育的华人，藉此机会全力鼓吹华语的推行。如前所述，鼓吹华语和华文教育，在早期曾经是敏感课题，为政府当局所不容，如今却在政治领导阶层的支持下，可全力施为。以华校、华报以及华人社团为代表的支持者，正是推行华语运动的中坚分子。值得注意的是，有若干支持者，在热衷推行之际，有时不免忘却华语运动的“官定目标”，呈现了“沙文主义”的过激心态。为了消除这方面“过激”的反应，在1981年“华语月”期间，乃出现了对华语运动的文化意义的不同诠释。一方面有位部长呼吁：“为了保有华族优良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也为了打破各方言族群之间的隔膜，并促成新加坡华人有一共同的语文表征，我们有必要使华语成为日常生活中应用的语言”[10]。而几乎在同时，一位高级政务部长却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如果我们把整个讲华语运动当成是要保留华族文化，那么，这是大错特错的”[11]。这位高级政务部长原是华校出身，在政治领导阶层中一向以支持华文华教为目的。他的这段话，应是有意且有计划的用以消减“过度热衷”推广华语的趋向。领导阶层努力维系微妙平衡的苦心，昭然若揭。

有些华族人士在原则上支持讲华语运动，在心理上却对当局推广华语的诚意抱着“存疑”的态度。这类人士在“存疑”的心理下，甚至于认为政府当局之提倡华语，乃是别有用心。在1980年底的国会议员补选期间，便有反对党的候选人抨击执政党推广华语，乃是为了适时争取华文教育人士的选票。也有人指出，当局一方面将南洋大学改为英语教学，并进而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另方面却推广华语，乃是要冲淡南大改制所造成的冲击。更有人讥之为“推广华语、消灭华文”。这一类的看法，可归之为“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的观点。

“反阴谋论”者的看法，却相信李光耀总理推广华语的诚意和苦心；而观察李光耀数十年论政的言论，特别是他2011年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可以感受到李光耀不但意在推广华语，而且确实有经由华语而追寻文化根源和建立自信自尊的用意。

早在1978年4月一次英语电视座谈会中，李光耀讲过：

[8] *The Straits Times*, 1979.9.8.

[9]《南洋商报》，1980年1月10日。

[10]《南洋商报》，1981年6月1日

[11]《南洋商报》，1981年6月8日

“没有一个民族有这样长久的历史。有四千多年延续不断的历史。这是惟一的一个文明，几千年都是同样的语言、文化。从那些古迹、雕刻的人像，从古坟里挖出来的人的样子、以及他们所画的，你可以辨认得出那些古人和现在的人是有关系的。现在的华人或者中国人，或者华人的后裔，跟两千年或者三千年前的那些人，那些创造文明的人，是一样的。我想不管我们是在新加坡建设一个国家，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也好，或者在别个地方也好，我们都要知道根源”[12]。

从以上的谈话，可以了解李光耀推广华语的苦心，以及这番苦心所代表的政治上的圆熟以及对传统的认同。

对华语运动持反对意见的华人，依判断人数不会很多。在大众传播一面倒的声势之下，即使有反对意见，也无从表达。在华语运动期间所常听到的“保留意见”，多是在接受“推广华语”的大原则之下，对于推广的策略和方式，表示不同意见。这一类的意见，常见诸于《海峡时报》的报道和读者投书，大致是代表部分受英文教育者的看法。

华语运动虽然以华族人口为对象，但是在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社会形态下，为数超过全人口四分之三的华人全面展开语言运动，对其它两大民族的人口，自然也是种冲击。

马来族和印度族人对华语运动的反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反应是抱着疑虑不安的态度，深恐华语运动带来华族沙文主义的浪潮，将新加坡变成以华语为主的社会，威胁到他们的安宁与平等参与的机会。事实上，在1980年底的国会议员补选活动中，带有偏激马来民族主义色彩的反对党候选人，便曾借此抨击执政当局推广华语的目的，是要让华人支配新加坡的文化生活。为了消除马来人和印度人的不安，自华语运动展开初期开始，李光耀本人以及内阁中马来族和印度族的政界领袖，都一再强调华语运动纯粹是以华族人口为对象，尽量冲淡华语运动在文化价值和认同上的色彩，而偏向于以功利性的理由（如教育功能、经济效用和共同语的传播功能），来说明华语运动的必要性。

由以上讨论，可以再次发现语言问题的敏感性。语言和文化及民族认同密切相关。政府对华语的鼓励，自然引起其它语言的使用者和支持者的关切，常常带来情绪上的反应。由于各等人士立场不同，各方反响有相互矛盾之处。同样一项措施，有人认为过度，有人认为不足；有人怀疑政府当局的目的在消灭华族文化，有些人却认为最终“阴谋”是以华族文化压倒其他文化。在如此歧异的反应之中，当政者显然无法面面周到，只能在不同反应之中做适时的说明或修正，以“修补”（patching）的做法，维持一个不甚稳定的平衡。由华语运动的分析，不难了解新加坡政府处理语言问题和拟定语言政策时面对的困境。

卅五年华语运动的演变（1979–2014）

讲华语运动自1979年揭幕开始，定位为长期社会运动，每年10月为华语运动月，由副总理或资深部长主持揭幕仪式，发表政策演说，阐述运动的重点和方向。由于这是个长年长期的语言策划运动，各个阶段目标不同，对象有异，所采取的策略也应调整。

根据讲华语运动掌舵人李光耀的分析[13]，

[12]《星洲日报》，1978年4月21日。

[13] 本节内容主要参照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11年），159–170页。

1979年以来的讲华语运动，可以10年为期，分三个阶段：第一个10年的目标是华语取代方言；第二个是认识华语的文化价值；第三个是认识中华文化的同时使讲华语成为一种时尚。

第一阶段（1979-1988）主要目标是要在公共场合，以华语替代方言成为华族之间的通用语。这段时期历年提出的主要宣传对象和场合如下：一般讲方言的华人（1979年）；工作场所，在柜台与公众接触的公务员（1982年）；市场和熟食中心（1983年）；公共交通员工（1985年）；购物中心（1987年）。可知这段时期运动重点在于提高并普及华语在公众场合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以取代相当根深蒂固的方言。在这阶段，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方面提供学习华语的机会，譬如开办华语会话班，在电台和报纸教导华语华文通用词汇，要求在柜台服务的公务人员学习华语，并以华语与公众交流，少用方言。要求巴士售票员、德士司机、餐厅和熟食中心的小贩，努力学习华语，并且尽量使用华语。

另一方面，当局也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譬如停止在广播和电视台播放方言广告，从1981年1月起全面停播方言节目，引起相当大的争议。另外，也规定学校学生姓名以汉语拼音替代原来（身份证上）的方言拼音，许多地名和街道也开始以标准汉语拼音替代原有的方言路名。

到了1980年代后期，经过将近10年的推动，在公众场合中，华语大致已经取代了方言成为常用的通用语，可以说第一阶段的运动已获初步成功。但是，以华语替代方言，其结果之一是将华语从原有华校知识分子使用的“高层语言”（high language）贬低为“低层语言”（low language）。而在同一时期，英语地位和普及日益“侵蚀”华语的社会功能和地位。为了维护并推广华语，自1988年开始，推广华语理事会首次将宣传对象由中下层大众“提升”到白领阶级，进入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1989-1998），推广的对象从蓝领阶级转移到白领阶级，宣导重点也从“少说方言”，转移至“认识文化”。作为宣传对象的白领人士，大多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即使是双语，也常以英语为强势语言，这批人的华语水平可能逐渐削弱。这段时期华语运动宣传的主要对象是白领人士（1988年）、高级主管（1990年）英文教育的华人（1991年）。宣传标语也调整为“学习华语，认识文化”（1991年）、“用华语，表心意”（1992年）、“讲华语，开创新天地”（1996年）。

1989年推广华语运动由当时新闻艺术部长杨荣文主持开幕，点明讲华语运动的新方向。他说，接下去的目标不再只是推广华语，减少方言；更重要的是把华语提升为华族同胞的高层语言，与英语并驾齐驱。他也强调其他母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也该如此，双语并用。

这个阶段的讲华语运动还有两项重要的政策调整，兼具象征与实质意义：第一，自1994年起，推广华语委员会的主席改由英校生担任，并转以英语作为主要宣传媒介。第二，1998年“推广华语委员会”改组为“推广华语理事会”，成为当年新闻艺术部属下的常设机构，宣示政府长期推广华语的决心。

这段时期为了协助受英文教育的华人掌握基本华语会话，运动的推广形式也有所调整。宣传重点强调东西方文化和谐，“掌握华语将如虎添翼，在丰富的东西文化中无往不利”[14]，同时采取轻松幽默的方式，使受英文教育者消除心理障碍。配合每年举办的华族文化节，印发英文《华族文化节节目指南》，鼓励受英文教育人士参与华族文化节的活动。由此看来，这类活动的对象已经不只是华族同胞，而是广大对华族文化有兴趣的人士。为了改变大众观感，理事会还邀请名人、影视歌坛红星充当讲华语运动大使，包括名歌手蔡健雅和林俊杰等。这些都成为推广讲华语运动第二个10年的特色。

讲华语运动的第三个10年（1999-2009），承继上个10年认识中华文化的工作，继续以轻松活泼方式，使讲华语成为跟进时尚的象征。这个10年，推广的对象锁定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出生、受英文教育而且不太会讲华语的新加坡华人，强调讲华语是自然、时髦、时尚的。新的标语是“华人，华语，华文”（2001年），到了2004更大胆采用了双语并用的“华语Cool”，明显是要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同。推广华语理事会也开始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合作，在全国各地的区域和社区图书馆举办各种华文书展、华语课程、朗诵交流会等。同时也开始大量采用新媒体、互联

[14]《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页166-167。

网、博客，投年轻一代之所好。

2009年以后的华语运动大致延续此方向，大量利用年轻一代所熟悉的新媒体作为推广华语的工具。譬如2012年推出iPhone免费应用程式“iHuayu”，收录了5万个商业及本地常用的专有名词，供使用者查找中文翻译，同时还提供词汇的发音以及例句，方便华语华文的学习和使用。

以上分析可知，讲华语运动虽历时超过35年，其主要运动对象，目标和策略却是与时并进的。运动早期的对象明显是惯用方言的中老年华族人口，随后开始转向英语背景的白领专业人士，到了2000年之后开始针对独立后出生惯用英语的年轻一代。推广策略也由早期传统的强制性的行政措施，转变到利用大众流行文化，并充分运用新科技媒体的“软性”行销。

至于华语运动的宗旨，如李显龙总理在《推广华语运动35周年纪念特刊》的专访中所说的：“我们今天的目标不再是‘多讲华语，少用方言’，现在的宗旨是‘在英语环境中，请尽量运用华语’，使华语能继续成为一个活的语言、一个有生气的语言、一个能够表达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欲望的语言”[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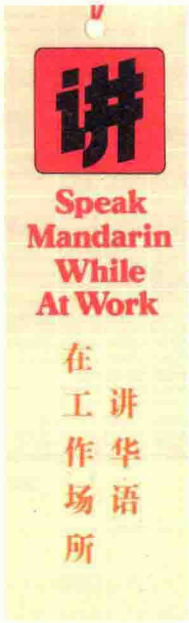
讲华语运动和语言转型

华语运动历时35年，至今还在持续进行中，究竟效果如何？有些批评者认为，如果运动成功的话，还需要年年继续下去吗？而经过35年的努力，如果还不成功的话，再继续下去又有什么意义？

在推广华语运动最初几年，有关部门和单位经常进行调查，以测知语言习惯和态度的改变，从而衡量华语运动诸种政策和策略的成果。1989年华语运动10周年，推广华语委员会出版特刊《十年华语》，详细介绍十年的活动和成效，列举了多项统计资料，包括历年（与公众接触的）政府部门方言和华语使用情况，以及巴刹和食物中心华语使用情况的调查。整体而言，华语虽然还不能取代方言，但是由方言转向华语的趋势相当明显。

长期而论，自华语运动开始以来，这几十年间，新加坡社会历经了内外在环境的多种变化：在人口结构、教育政策、就业形态方面都发生巨变。随着中国崛起，华语地位全面提升，已经成为一优势国际语言，兼有实用功能和象征地位。因为如此，这几十年的社会语言变化不能简单归因于华语运动。至多只能说华语运动在这三十多年宏观社会变化中，努力借力使力推广华语，既有成就，也有挫折。

有关1979年华语运动开始以来的新加坡社会语言地位变迁，最为完整的统计资料是1980年以来的四次人口普查，提供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间华族主要家庭用语的变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加坡家庭一般都是多种语言混合使用。以一个典型的华族家庭为例，家庭成员之间可能会用到方言、华语和英语。最常见的应该是第一代（如祖父母）讲方言，第二代讲华语，第三代儿童就可能多讲英语了。统计中



[15]《华语·新时代》（新加坡：《推广华语运动35周年纪念特刊》，推广华语理事会出版，2014年），页17。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实施《外侨条例》，每艘船每月不得运载超过 25 名同国籍移民入境

所谓“主要家庭语言”是指家庭成员之间最常用的语言。

表（一）和图（一）列出华族家庭“主要家庭用语”的统计。由表中的统计趋势看来，以方言为主的华族家庭，由1980年的76.2%，降低到2010年的19.2%。如此下降趋势看来还会继续下去，方言被边缘化的命运怕是很难逆转。而在此30年间，讲华语和英语的华族家庭比例大增；以英语为主要用语的家庭从10.2%升高到32.6%；讲华语的家庭从13.1%增加到47.7%。比较起来，华语的普及相当成功，讲华语运动显然有其成效。不过，细看2000年到2010年的统计，在这10年间，华语家庭仅仅从45.1%略增到47.7%；而同时期以英语为主要用语的华族家庭却由23.8%遽升到32.6%，势头之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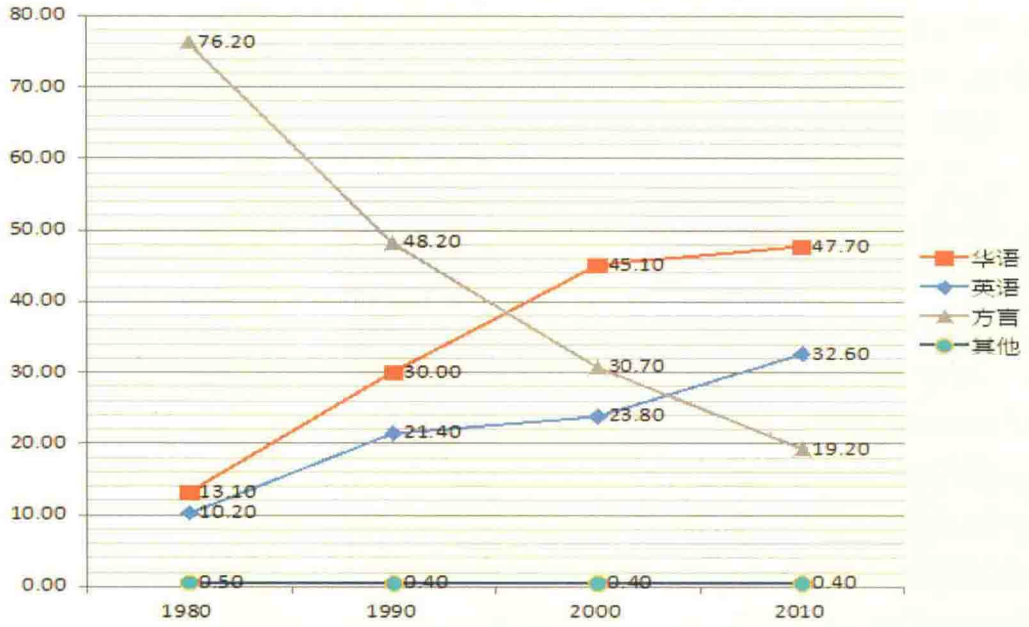
展望未来，英语和华语互为消长的大趋势，值得关注。虽然有讲华语运动助阵，新加坡的大环境却是趋向英文英语独大。长期以往，华语能不能在英语挂帅的情势下，保留其生命力和竞争力，尚不可知。理想的状况是华族家庭能够华语英语双语并用，而不是英语取代方言和华语，成为单语家庭。至于方言，恐怕难避免在家庭消失的命运。

表（一）华族主要家庭用语（1980–2010）

华族主要家庭用语（家户单位 %）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英语	10.2%	21.4%	23.8%	32.6%
华语	13.1%	30.0%	45.1%	47.7%
方言	76.2%	48.2%	30.7%	19.2%
其他	0.5%	0.4%	0.4%	0.4%
总计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新加坡人口普查报告》，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

图（一）1980年至2010年华族主要家庭用语（家户单位%）



资料来源：《新加坡人口普查报告》，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

方言与讲华语运动

1979年开始的华语运动以推广华语取代方言为主要目的，可以说华语运动是针对方言而起的。如李光耀所说的："……方言除了干扰双语教育，还起着分裂华人社会的负面作用。华人因为不同方言就出现了不同帮派，讲同一种方言的华人组成一个帮派，同声同气，往来密切，和其他不同方言不同帮派的人，就有了隔膜。以华语来取代方言，重组华人社会，使它由分裂变为团结，也是我推广讲华语运动的目标。当华语成为华人的共同语，成为各籍贯华人的交流媒介语以后，过去的各种帮派、小集团就会逐渐分化、消失"[16]。

因之，从一开始，多项语言政策和策略，多是以"消减"方言的使用空间为目标。

就以宗乡会馆为例，以地缘为基础的会馆，其目的原是要加强同乡的情谊，为乡亲提供必要的服务。使用方言乡音，原是凝聚乡情的基础，说是天经地义也不为过。然而，由推广华语的立场而言，这些地缘同乡会馆，正是抵制华语普及的源头，也是华语运动必须"攻破"的堡垒。因为如此，有关当局以各种方式，鼓励同乡会馆在开会时，转而使用华语。其间实施何种压力或鼓励，暂无深入分析，只是要求同乡不用方言，改用华语，只能说是情何以堪。不论如何，如此政策经过长期推行，到底也有了成效。根据1988年交通及新闻部调查，和1979年以前的情况比较，宗乡会馆的语言习惯已有改变。宗乡会馆之中，在会员大会中使用方言比例，已经由1979年以前的79%，减到1988年的24%；而理事会会议使用方言的会馆比例也由1979以前的79%，减到1988年的18%。可以说是10年有成[17]。时至今日，宗乡会馆采用华语当然是更为普遍了。

在所有有关"消减"方言的政策之中，最有效也最有争议的是在广播电视中对方言使用的限制。一直到今日，可说是讲华语运动35年历史中最有争议的课题。

为了推广华语以取代方言，有关当局很早就看到广播电视的影响力。在1979年华语运动开始一年前，于1978年已停播广播电视上的方言广告。华语运动开始后，在1979年11月就将极受欢迎的广东话连续剧《倚天屠龙记》配成华语。到1981年元旦起，全面停播方言广播与电视节目，包括有线广播的"丽的呼声"。每一次的决策都引发民间巨大反对的声浪。但是当局坚持执行在有线广播电视禁播方言的政策，数十年不变[18]。

时至今日，媒体发展局制定的《免付费电视节目守则》[19]，还细列电视节目中有关方言使用的限制和准则，包括：

13.4除了戏曲或其他获得有关部门批准的节目，所有中文节目一概需以华语播出。方言对话或方言歌曲依情况所需可酌情使用，此外，方言可在下列情况下使用：

(a) 受访者为只会讲方言的老年人或外国人的新闻、时事、教育资讯访问节目，需备字幕或附加配音

(b) 一些食物的方言名称，如肉骨茶、炒粿条、红龟粿等可在本土电视剧里使用

(c) 进口的华语戏剧节目的方言主题曲可在节目开始及结尾时播放

多年来各方呼吁放松媒体方言禁令的诉求不断，比较重要的包括：1996年，华语电视咨

[16]《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页145。

[17]《华人·华语·华文》（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出版，2000年），页87。

[18] 唯一的例外是电台958城市频道每日三次播出方言直播新闻，每次约10分钟，播放两种方言新闻，大约各5分钟，每次大约可报道6-8则新闻。虽然每天都有六种方言的新闻报道，其象征意义远超过实质功能。参阅《华人·华语·华文》，页87。

[19]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Free-to-Air Television Programme Code," n.d. (2013年6月起生效)。

相关人物

瑞于上人　李俊承　邱菽园

历史事件

6月17日

佛教居士林成立，筹备人为瑞于上人、李俊承、邱菽园等

询委员会（ACCESS）年度报告；2003年，电视广播节目咨询委员会（PAC）年度报告；2010年，媒体审查检讨委员会（CRC）报告书。基本论点都是认为讲华语运动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吁请政府在不影响讲华语运动的前提下，适度放宽公共电视台播映方言节目的限制。到2010年以后，在互联网上讨论放松媒体方言禁令的请愿，更层出不穷。对此多项呼吁，政府仍然坚持华语运动尚未成功，不可功亏一篑，对开放方言的建议，一本初衷，坚决不予接纳。

对于这方面的坚持，我们可以在李光耀的一本自传式的著作中[20]，清楚看到他个人对这个课题的执着。在一次访问中，他指出在2011年退出内阁后，基本上不干预政事，但是：

“偶尔我对某些事情有不同意见，我会让总理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政府曾考虑恢复无线电视的方言节目……。我表示反对，指出……”[21]

还有一次，在访问中，有以下对话：

问：所以您已经没有什么未完成的工作要……

答：没有。我已经完成我要做的。我将总理的责任交给吴作栋……他又将责任交给了李显龙。这是个不同的世代，我的贡献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是当他们说要恢复方言……（我就不能不干预了）[22]。

李总理主持全国推广华语运动开幕指出

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
英语势必成为华裔共同语言

只要家长们都要子女学习并使用华语不讲方言
政府将采取各种行政措施来支持家长们的决定

多讲华语
少说方言
全国推广华语运动开始

李总理为全国推广华语运动主持开幕发表演说

全国推广华语运动开幕（1979年9月8日）

对于华语和方言的关系，政府（和李光耀）基本上认定是“零和”（zero-sum）关系。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之，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经过35年华语运动，在教育和语言政策压制之下，方言逐渐被边缘化。

然而，究竟方言在新加坡，对某些人群和某些场合，还是有其功能，有其需要。就在2003年，爆发沙斯（SARS）病毒传染事件，为了告知不懂华语的老年人如何防范病毒，当局邀请了几位演艺人员当亲善大使，以闽南话、广东话、潮州话和海南话四种方言，上电视讲解如何预防沙斯。这是自1981年以来，电视上首次出现方言节目。沙斯危机过后，电视屏幕上，方言灭迹，一切如旧。这段插曲充分显示了新加坡政府的实用性（pragmatism）本质。还有一例，就是一到大选期间，在群众大会上，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也常以方言为竞选语言，只因为有不少人还是觉得方言比较亲切，容易赢取人心。由此可见，方言在民间还是有其草根般的生命力，虽然经常受到官方政策的压抑，但是在大众流行文化的领域，还占有一片天地。比较明显的是本地电影中，方言尺度较宽，譬如《钱不够用》（2002年）、《881》（2007年）、《新兵正传》（2013年）等，都大受欢迎。此外，方言流行歌曲包括粤语流行歌曲和福建（闽南）歌曲，也流行于“七月歌台”和卡拉OK的场合。

关于华语和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作为“次文化”）和高一层次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近年来，有不少以地缘和语缘为基础的会馆，还是在努力保留方言，并推广方言文化。在民间，也还有公民自觉和民间自发的“保留方言运动”。在华语运动的大环境下，这些努力究竟能有何作为，会有何成效，还有待观察。

[20]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2013).

[21] Lee KuanYew, *op. cit.*, pp.296–297.

[22] Lee Kuan Yew, *op. cit.*, p.306.

展望未来

新加坡长期坚持推广华语运动，是国家语言策划的独一案例。在一世代之间，新加坡华族社群经历语言转型，由方言而华语而英语；转型之速，前所未见，对社会影响，既深且远。时至今日，在巴刹、熟食中心、地铁巴士等等公共场合，华语早已替代方言，成为大众用语。就是在传统的“方言重镇”如宗乡会馆等场所，华语也是通用语。在如此转型过程中，华语的地位，由原来的“精英语言”转变为“大众语言”。推广华语运动初期以华语替代方言的目标，可说已经达成。

然而在此期间，新加坡社会以英语为尊的大趋势，势不可挡。英语虽无国语之名，却有国语之实（de facto national language），是政治和法律用语，高等教育用语，也是主要国际经贸用语，代表身份、地位和权力。英语的影响力，由政治经济教育层面，扩及于大众传播、社区活动，以至于社交、家庭层面。由高阶层的精英人口，扩展到中等阶层以至于中下层人口。终究，“精英”压过“精华”，是无可逆转的大趋势。

但是新加坡的华语也不是处于毫无招架之力的地位。长期由政府主导的讲华语运动，赋华语以官方的认可（endorsement）和正当（legitimacy）地位，配合这些年来外在和内在因素，维护华语和华文的发展。

这30年来，最重要的外在因素，当然是中国崛起，新加坡和中国互动密切频繁。如今，华文的地位和功能为世所公认，华文华语的学习正方兴未艾。在新加坡，有更多的家长注意到华语的重要性，将幼龄子女送到双语幼儿园，学习双语。在社会上、职场上双语人才愈来愈受重视。近年来，媒体、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经常举办以华语进行的文化活动和讲座，其密度之高，力度之强，前所未见。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这30年间，新加坡人口由1980年的240万，增加到1990年300万，2000年400万，2010年500万，到今日的540万。这30年间，增加了300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新移民或是短期居留的外来人口。这其中，又以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占多数。这个重要的新族群，对华文华语的维护和推动，以及华族文化资源的提升，都将发挥积极的贡献。在这一两世代内，华语将继续是这批新移民家庭的母语。

除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之外，还有数十万新移民来自世界各地，各有各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未必都是英语挂帅。新加坡仍然会是个多元多语的社会，不会成为一个纯讲英语的单语社会。

与此同时，更直接而且会“潜移默化”的是大中华文化圈结合两岸三地的流行文化，以整合之势呈现文化中华的软实力。新加坡身处大中华文化圈的边缘，是文化圈的一分子。华语电影、电视剧、电视综艺节目、流行歌曲、卡拉OK，在新加坡广为流行，深具渗透力，为华语学习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养分。

展望将来，在推广华语运动的旗帜下，配合外在和内在诸种有利因素，华语在新加坡仍然可以维持一定的地位和功能。

本节内容部分采自于作者早年著作：（1）郭振羽〈第八章“华语运动”分析〉，载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页121-135；（2）郭振羽，〈讲华语运动进入20年：旧瓶装新酒〉，载《华人·华语·华文》（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2000年），页125-133。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教育局开始举办受津贴华文学校学生会考

第十章

文化与艺术
Culture and Art

第一节　南洋画风
——早期新华社会与南洋美术的形成

摘要

华人美术发展乃新加坡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自20世纪二、三十代至二战时期，许多艺术家纷纷南来，于1938年成立南洋美术专科学院，以南洋文化为本位的美学观念，因而产生“南洋画风”，成为富于糅合中国、欧洲与东南亚艺术的独特风貌，并融入中华水墨与书法的养分。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Singapore's cultural history. The influx of artists from China from the period of 1920s-1930s t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had l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here in 1938, its aesthetic positioning being based on the uniqueness of the Nanyang culture in this region of Southeast Asi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nyang style thus emerged as a unique blend rich in Chinese, European and Southeast Asian elements, and often enhanced by the art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张夏韦（**Teo Han Wue**）

本节所述的“南洋美术”、“南洋风格”或“南洋风”局限于新马华族美术群体在地发展的现代美术运动，而非广义的涵盖整个东南亚区域所产生的艺术。

在前几个章节中，我们说到开埠初期，新加坡从中国与印度引进大批廉价劳工。当时有识之士对华族侨民文化水平低落的问题非常关注。中国驻新的第一位领事左秉隆（任期1881-1891）于1882年设“会贤社”，并展开兴学运动，在华人社会里起非常积极的影响。黄遵宪（任期1891-1894）接任后改“会贤社”为“图南社”，继而有诗人邱菽园（1874-1941）创立“丽泽社”，目的都是为了增进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艺风气。

其实，在这些学社、团体未成立前，华社已有启蒙馆与义塾的倡设。根据德国传教士汤生牧师（Rev. G. H. Thomsen）1829年的记录，他相继开办了三间华文私塾性质的学校：两间粤语班于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和北京街（Pekin Street），另一间闽语班在北京街[1]。随着新加坡社会的进展，这些早年栽培的幼苗，在19世纪的50年代逐渐茁壮成长。由福建帮领导创办最早的学校：崇文阁与萃英书院，先后于1849年与1854年成立，其他方言群体也纷纷相继创办学校。

作为一个移民社会，从一开始直至1965年新马分家，新加坡的文化生态与马来亚本来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向来互动频繁，尤其是两地与中华文化的母体源头的关系是那么紧密。因此，很多基本人文体制的产生，很自然是通过移植和嫁接来建构的。由于华族为多元种族当中的大多数，文化与艺术领域里缺少不了华族文艺界的中坚分子作出的贡献。

现代美术之开端

早期的启蒙馆和义塾的课程沿袭中国旧传统，除四书五经外还加上书法与珠算。可列入美术或视觉艺术范畴的科目，应该是书法，而担任教学的老师都有一些书法基础。此外，1906年新加坡已有知名艺术家兼摄影家苏彬庭设立的商业性质的美术学校“画相传习所”，专门传授“水相、油相、炭相”等。

宋旺相（1871-1941）在他1923年出版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提及厦门街有一个拥有50名主要是侨生华族会员的“业余绘画协会”（Amateur Drawing Association），活动相当频繁，曾于1912年举办展览，例常活动如展览、比赛等。当时英文报《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与《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都给予报道[2]。

1922年潮籍商人陈若愚的三公子陈秉犧创立的“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成为新加坡最早具有现代学制规模的美术专科学校，由一批年轻潮籍文化人担任主要领导层兼师资，如《叻报》总编辑周君南、南洋华侨中学首任校长涂开舆、端蒙学校校长沈凤俦以及教师孙裴谷、蔡梦香与杨抱冰。孙裴谷早年曾得潘天寿指点，成为岭东画派开创者，1915年任端蒙学校美术教师，1922年任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教授兼主任。1924年返回潮汕地区从事美术教育工

叻報
有限公司
Lat Pau Press, Ltd.
Chinese Daily Newspaper.

1922年9月26、27日，《叻报》连续刊登的“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绘画科招生广告”

[1] 庄钦永，《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页165、172—173;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26。

[2] *Singapore Free Press*, 10 September 1912, p.7; *The Straits Times*, 23 March 1914, p.10.

作；蔡梦香擅长书画，曾为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的启蒙老师，1908年执教于端蒙学校。其他还有林伯嵩、陈远志、曾沧海、曾其隆，他们都成为学院主要的师资人才[3]。

学院的创办人有宏图大志，并且满怀信心。1922年10月16日孙裴谷在开学典礼上致词中说："这个学院的性质，是和平常的学校不同，是一个专门研究美术的学院，是一个很特别的机关，是南洋华侨所从来没有的……这个学院可以跟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所设国画研究所，和刘海粟在上海所办的美术学院先后比美，以后南洋美术的发达，可不让国内的同胞独步了"[4]。

对当时社会普遍重西洋画而轻中国画的风气，尤其看到学生报名时全都选修西洋画，孙裴谷感慨地说："美术既为一国文化之所系，便不可任其退化，尤其是积极地建设新中国的艺术，凭着中国固有的根基，以收欧美所有的特点，互相研究、互相资助，以助完成大中华的新艺术而促进我大中华的新文化，不要学了西画就忘了中画，不要学了中西画即以为满足，而忘了创设我大中华未来之新绘画，这便是本学院创办的宗旨……"[5]

学院创办人表现出的，不仅是蔡元培与刘海粟那股以美术教育建设新社会的精神，还抱着侨民在海外为保存与承传母族文化的强烈意愿。如此浓厚的"侨民意识"是那个时代历史发展阶段正常而必然的状态。

这所设于"皇家山脚吊桥头门牌第二十二号"（即现今克拉码头（Clarke Quay）一带）的美术学院，把中国画与西洋画列为正科，木炭、水彩、粉彩、铅笔画列为选科。正科面授为期两年、函授三年，选科面授三个月、函授四个月。一开始报名就读的人数就有50多人[6]。从课程的设计看，学院教学内容全根据当时盛行的现代美术新思潮。不幸的是，学院成立两年后即停办。

至今新加坡所发表过的美术史论著，对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这段重要事迹，大多没有提及[7]。那个年代，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已经波澜壮阔地展开，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当时所倡导的思想意识，代表海外华人，或更具体的说是在漳泉人数为最众多人口当中的潮籍侨民，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应。

根据当时一般说法，1920年代新加坡美术界一片沉寂，这也许是因为从事艺术的群

相关人物

黄伯权

历史事件

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开幕，首任经理黄伯权

[3] 叶钟铃，〈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创办史〉，载《中教学报》期22（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1996年），页96—101；另见钟瑜，《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1900—1965）》（吉隆坡：正山国际设计艺术集团与马来西亚艺术学院东方艺术研究中心，1999年），页6—8；"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绘画科招生广告"，《叻报》，1922年9月26日、27日。

[4]《叻报》，1922年10月25日。

[5] 同上注。

[6]《叻报》，1922年12月4日。

[7] 对于这一点，叶钟铃在前引文〈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创办史〉列举各重要论著以说明：许甦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1950年）："新加坡美术学校之创设，还是七七事变后的事"，页81；玛戈（许钟祜），《马来亚艺术简史》（新加坡：南洋出版社，1963年）："马来亚之有艺术学校，当以新加坡的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为嚆矢"，页170；刘抗，〈五十年来的星马绘画〉，载《这半个世纪（1910—1960），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年）未提及"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姚梦桐，《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1927年以前新加坡画坛一片寂静"，页2；姚梦桐〈新加坡第一代书画家定位初探〉载《新加坡第一代书画家翰墨集珍》（画册）（2001年）用上叶钟铃文章的资料；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前馆长郭建超在其著作中亦无论及：Kwok Kian Chow, *Channels and Confluences: A History of Singapore Art* (Singapor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ingapore Art Museum, 1996)；叶钟铃的文章发表后，马来西亚钟瑜1999年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1900—1965）》，页6—8；及帅民风，《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皆先后引述叶钟铃文，并感叹这所学院只办了两年，虽然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尤其在书法方面，页182—183。

体只不过是一小撮人。其实，1920年代中期前，许多南来中国画家为谋生而开设私人画室，制作商业广告或剧场布景。由于待遇低微，很少有在学校任教的，所以如今可以查考的，只有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1922年创立）与端蒙学校（1906年创立）的蔡梦香、孙裴谷、杨抱冰等人[8]。先驱画家陈宗瑞认为："孕育新加坡艺术的是商业美术是洋学堂（华人开办的新制学校），哺养新加坡艺术的是商业美术"[9]。

此外，几位南来活动而至居留的艺术家如杨之爱、徐悲鸿等，都因为本身有扎实的阅历和学养，而视当地艺术风气相对的薄弱，深感其乏善可陈。1927年杨之爱在新加坡举办"留法学生南洋美术展览会"，所展出20多位曾到法国学习美术的学生的作品。虽然引起热烈的反响，但有位署名泰白的作者在《星洲日报》发表评论，感叹本地华人的艺术活动过于沉寂，美术气氛仍然十分浅薄，即便物质生活相当优越，地理位置又处于欧亚交通必经之地，但许多人生活却孤寂苦闷，于是呼吁侨民应为文化努力[10]。过后，杨之爱曾任教于麻坡中华中学，1929年移居新加坡，并创设"探美画会"，但正当收集上海名家作品，筹办留法学生画展之际就不幸逝世。徐悲鸿（1859—1953）于1937年回忆十多年前，曾两度（1925年与1927年）居留于新加坡时所见到的状况："那时的新加坡虽然不像沙漠，也可以说是炎荒，哪里有什么艺术"[11]？虽然，这话正好呼应上述《星洲日报》评论者的论点，但事实上，新加坡画坛正处于萌芽阶段，以一个开埠仅有百年历史的移民社会，艺术活动的能力和程度必有一定的局限，将它形容为"炎荒"、"沉寂"或许是由于艺术家主观要求过高，而以中国的经验与尺度来衡量南洋文化发展的缘故。

虽然早期移民社会文化水平不高，但陆续来自中国的文人多为饱读诗书、富有学识才情的知识分子。除了当教师外，也有肩负起社会教育与舆论重任的报人，如《叻报》主笔叶季允（1859—1921）精于篆刻；报业先驱诗人才子邱菽园（1874—1941）诗、书、画兼通，《新国民日报》主笔张叔耐（1891—1939）工于金石。由于这些报界领导层本身的学识与艺术修养，他们对美术教育的推广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1920年代起，新加坡华族美术界的发展虽算不上蓬勃，但也可说已经逐渐展开和前进。1922年创办的华侨美术学院，有潮籍文化人在端蒙学校的基础上开了一个头，可惜办不过两年就中止；杨之爱1927年带来的《留法学生南洋美术展览会》成为新加坡有史以来首个规模最大的展出，获得社会热烈关注。杨之爱原来毕业于上海大学艺术科，1926年留学巴黎，展览成功后，于1929年移居新加坡，本该有一番作为，奈何壮志未酬、英年早逝。接着，有文艺界人士徐君濂、林霭民、陆康贤主持的文化团体"青年励志社"于1929年，在罗敏申路（Robinson Road）的青年励志社会所主办一项规模庞大的"新加坡美术展览会"，宗旨为提倡美的价值，也为南洋苦闷乏味的生活增添生气[12]。参展的画家有徐悲鸿、张汝器、李家耀、罗卓君、刘开赏、张伯河、谢松安、廖伯玉、黄清泉、蔡竹贞、叶维烈、郑照吾等，展出的作品约500余幅，当时《星洲日报》誉为"马来半岛空前的美术展览，要算是南洋美术界携手第一声"[13]。

从1929年至1939年的10年间，是新加坡美术关键的发展阶段。1929年除了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新加坡美术展览会"之外，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展览，这是由国民党革命领导廖仲恺（1878—1925）遗孀何香凝（1878—1972）假中华总商会举行的"新加坡华侨筹助仲凯农工学校经费书画展"。这展出的意义在于何香凝曾是当时中国政界重要人物，担任过民国妇女部长，1928年因政见分歧而离开政坛转向绘画。因为这种关系，加上何女士声称此行两大目的，"盖欲环游世界各地，一以筹募仲凯农工学校基金，一以宣扬祖国文

[8] 钟瑜，《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1900—1965》，页9。

[9] 陈宗瑞，〈四十年来新加坡艺坛回顾〉，载《艺术协会双庆画刊》（1969年），收录于陈其新2010出版的《陈宗瑞文集》。

[10] 泰白，〈到象牙之塔去－介绍南洋大酒店留法学生美术展览会〉，载《星洲日报》，1927年9月3日；姚梦桐，《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页8—9。

[11]《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页2。

[12]《星洲日报》，1929年7月3日。

[13]《星洲日报》，1929年8月25日。

化”[14]，所以展览筹备工作由罗承德、林霭民、邝维周、李维熊、胡桂庚、林建邦、符和谦、李容卿、郑照吾、唐领事夫人、黄兆奎夫人、林文庆夫人、黄素云、吴允文、刘韵仙、彭梦民、陈如葆等所组成的委员会负责。随即又成立了一个由多位重量级的华人社会领导如胡文虎、陈嘉庚、林金殿、林义顺、张永福等组成的展览委员会。虽然如此，也许因为何氏政治立场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相左，她访问时所受礼待相对的低调，募捐情况也不见踊跃。陈嘉庚只捐5元、林义顺、张永福等人都没有捐款，而身为委员长的胡文虎虽捐出了2000元却不出席开幕礼[15]。

中国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1879—1951）于1930年12月赴印度出席会议途中，在新加坡、吉隆坡与槟城停留并举行画展，展示自己的作品64幅以外，还有珍藏的古画如巨然（生卒年不明，属南唐937—975时代人）、李公麟（1049—1106）、蓝瑛（1585—1666）、陈洪绶（1598—1652）的作品。因此引起广泛注意，文化界的反应尤其热烈[16]。

南洋美术从萌芽至成长

从社会对高剑父展出的反应看来，新加坡文化上并未必如一般所说那样是个“枯寂的炎荒”。古画展出的部分得到众多书画爱好者踊跃观赏，针对画家本身的作品，《叻报》于1930年12月12日还发表了一篇署名“郁如”分析入微的读艺评论〈观高剑父美术展览会后〉。

其实，自20世纪初年，新加坡社会对美术的关注已经开始，一方面有1906年成立的“画相传习所”的商业美术学校；另一方面，有1922年创办具有正规学制的“华侨美术学院”。其他有助于美术的发展即是戊戌政变（1898年）后，新加坡华人积极参与兴学，纷纷创立的新式学校。1905年的“养正学堂”（后改名为崇正学校），属于私塾性质，陈楚楠便是发起人之一，租位于美芝路的合春号公司为校舍，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校；其次是广肇学堂（后改名为养正学校），成立于1905年，是广东人赵沛堂等所倡设。其后1905年嘉应人创办应新、1906年茶阳会馆创办启发、同年潮州人创办的端蒙学堂、福建会馆1907年创办道南学堂、海南人1910年创办的育英学校。这些学校师资当中也有一些美术人才，他们同时活跃于美术教育与艺术创作，因此新加坡从一开始教育发展与美术发展浑然一体，成为社会不可分割的文化领域。

进入1930年代，新加坡的美术活动已渐萌蓬勃气象。更重要的是，美术界本来浓厚的“侨民意识”也开始有转变，显著地倾向在地化，逐渐表现出更多的本土意识以及对南洋题材与风格的向往。其实，本土意识更早在马华文学圈内已酝酿了一阵，通过表达对社会现状不满而诉诸文艺创作来暴露与改造。段南奎于1926年在阐明其所主持的《叻报》副刊《星光》的编辑的思想导向时，用极强烈的文字来形容南洋社会，“是陈腐的、堕落的、静止的、停滞的、臃肿的、麻木不仁的、半身不

[14]《星洲日报》，1929年11月5日。

[15]《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页13—21；虎标万金油创办人胡文虎（1882—1954）与其弟胡文豹（1888—1944）于1929年创办《星洲日报》时，版头由蒋介石题签，主笔人选亦由蒋氏推荐，可见胡氏与蒋介石的良好关系。有关何香凝访新为廖仲凯农工学校筹款情况也见于林孝胜〈怡和轩俱乐部研究〉，载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页84；杨进发著，李发沉译，《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年），页120。

[16]《星洲日报》，1931年1月19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3月1日

英属马来亚广播有限公司电台启播

遂的病社会”。他呼吁年轻人与知识分子“本着批判的态度，来重新估定南洋的一切的价值”。另一位编者许杰于1928年的《枯岛》第10期编后话中说：“南洋有南洋的历史、风俗、人情、风景，作者不要何如穷搜远处，是俯拾即是的东西，都是绝好的文学题材……文学是要有地方色彩，譬如我们一说到南洋，便觉有椰林、高树、旷野、草屋、牛车舟，徊现在我们的脑际，如果能把这种地方色彩捉住，表现在文艺里，那便是绝好的文艺了”[17]。

自1920年代中期后，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掀起的文艺创作“地方的特殊性”、肯定在地文艺的生命而坚拒沦为“中国文化的支流”的思潮，日益壮大，直接影响整个华人社会。当时的传媒报章如1925年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与1929年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创办的《星洲日报》等，对南洋文艺的理念都很积极地议论、肯定而加以传播与推广，产生很大的作用。

根据《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1931年的记录，那一年新加坡画坛有几个展览值得一提。是年一开始刚由郑鼎新、张伯河以及王士龙等人所成立的“南星美术研究社”在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展出会员作品与古今名画。当时，有署名“外汉”作者发表评论寄望画家“以伟大的精神，抵抗社会恶浊的厄运”[18]。社员当中张伯河为潮籍人，上海艺术大学毕业，当时任教于端蒙学校，是活跃于新加坡画坛的画家；另一社员郑鼎新于展览后联合同好发起组织艺术专科学校，并附小学及国语夜学，于3月开课[19]。漳州十属会馆于4月间举行了一个邱静山珍藏“宋元明清书画展览”，展出有苏东坡、米芾、唐寅、文征明、董其昌、郑燮、尹秉绶、何绍基等名家作品；星洲才子邱菽园也有作品参展[20]。

1931年10月基督教女子青年会举行了新加坡有史以来首次女子美术展。参展者来自本地女子保良局拘留女子、各校学生以及各妇女社团，展出作品除绘画、摄影外还有手工艺品如刺绣、烹饪等[21]。

1931年10月23日，从中国辗转来到新加坡的美术家陈升平创立了“南洋新闻漫画社”。原来这位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的画家，1930年3月于青年励志社编的《青年》旬刊发表了一幅漫画插图〈现社会经济轮下的牺牲者〉之后，漫画作品便开始陆续见于《星洲日报》。陈升平于1930年继胡斌担任该报副刊《星光》编辑之职，直到6月离开。接着，他为了招生，在《星洲日报》刊登“南洋新闻漫画社简章”，宣称因“南岛漫画人材缺乏，特设漫画教授班分面授、函授两部。来学者可于短期内学成漫画技能……。我们要仗一支秃笔把人间口谈仁义而行同盗贼的假面具和一切恶透丑透的形象描写出来”[22]。同年12月漫画社出版了《社会漫画》，不仅为漫画提供发表的园地，也刊登等量的文艺作品，成为新加坡早期极罕见漫画文艺并重的刊物[23]。

这个时期画坛的活动情况迎来新加坡美术界1930年下半期更热烈蓬勃的气象。1930年代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南来的文化人也日渐增加，其中不乏愿意参与本地美术活动、而至组织书画研究社者。1935、1936年间，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华人文艺工作者在作品中力求大众化、反映现实生活，也积极集合团结、互相勉励，因此出现了推动美术事业的社团。

一群中国来的艺术工作者蔡竹贞、李运扬、林道庵、徐君濂、张伯河、林天、陈升平、刘恭熙、黄清泉和李魁士等，于1935年4月15日集会，发起成立“沙龙艺术研究会”，召集新华艺术大学与上海美专校友为会员。由于入会人数太少，是年11月发起人再度开会，出席者有张汝器、庄有钊、张伯河、卢衡、赖文基、高振声、陈宗瑞、林天、徐君濂等，议决扩大组织以接受各方包括马来亚以及荷属各地的艺术同道参加，将“沙龙艺术研究会”改称为

[17] 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页35-40。

[18]《星洲日报》，1931年1月7日。

[19] 姚梦桐，《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页30，引述《南洋商报》1931年2月20日。

[20]《星洲日报》，1931年4月7日。

[21]《星洲日报》，1931年10月20日。

[22]《星洲日报》，1931年10月29日。

[23] 姚梦桐，《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页31—32，引述杨松年，《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新加坡：同安会馆，1988年），页282。

“华人美术研究会”，于1936年正式成立[24]。

华人美术研究会成为新加坡第一个组织健全的美术团体，由主席而至中英文秘书、出版、交际等皆有专人负责。1936年第一届的理事为：正主席张汝器、副主席杨曼生、正总务徐君濂、副总务李魁士、财政赖文基、中文秘书卢衡、英文秘书庄有钊、出版主任林道庵、副主任蔡竹贞。研究会计划举办年届美展、参加会外展出、接待来自国外的访问艺术家、邀请他们作专题演讲。华人美术研究会自成立后第二年起，适逢中国抗战之始，文化人纷纷南下，一时会员阵容增强许多，本地艺术水平也大大提升，并且不少作品都具有本地色彩，美术界以往浓厚的“侨民意识”相对减少。

1936年华人美术研究会的成立对新加坡美术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它成为1938年创立的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先声。这发展并不偶然，研究会会员当中来自教育界者颇众，比如端蒙学校的张汝器、张伯河、陈宗瑞，中正中学的叶之威，工商学校的黄青泉，育英学校的陈达琚，道南学校的吴在炎、颜再声，养正学校的刘先德，南洋女中的陈俊文，启发学校的杨永奎；而南洋美术专科学校自校长林学大到教师如高泽沛、钟鸣世、黄葆芳、陈溥之、钟白木、卢衡、张汝器和李魁士等都是华人美术研究会的会员[25]。

除了美术团体与教育机构的推动，媒体的有关报导与评论对美术发展也起相当的作用。自战前起，《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都以美术副刊的形式对美术活动给予报导与评论。编辑戴隐郎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另外，美术评论家玛戈（原名许钟祜）早在1930年代就频频在报章上发表美术评论。1950年出版的《南洋之美》，他收集了多篇1933年至1936年发表于《南洋商报》的文章，内容很明确肯定本土人文风物的美学价值，对“文化沙漠”或“文化荒原”之说可说是雄辩的反驳。玛戈曾出版十多种有关东西方尤其是东南亚艺术的著作，推介区域文化的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1963年出版的《马来亚艺术简史》。这本书于1999年由建筑学学者赖启建翻译成英文，成为所有新加坡美术史学生必读的重要参考书[26]。

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成立：新加坡美术史上的里程碑

1930年初，中国厦门美术专科学校的留日画家黄燧弼赴法国考察，返国途中经过新加坡，因认为此地适合设立美术专科学校，故与钟白木、钟鸣世磋商办美术学校事宜。回厦门后便找厦门美专创办人之一的林学大商议，希望他南来办美专[27]。1937年，侨居新加坡的厦门集美校友在陈厥祥（陈嘉庚之子）的带动下，组成校友会，为推动侨教兼主张创办美术学校。同年，厦门美专因“九一八事件”爆发停

[24]《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页40—41，引《星洲日报》，1937年8月5日。

[25]《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页51。

[26]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于2013年为纪念玛戈《马来亚艺术简史》出版50周年，策划了一个展览《从此岸到南洋：玛戈的马来亚艺术简史》，展出书中提及重要艺术家的作品。有关展览的资料有一段这样的文字“玛戈以一个简单却饶有意义的问题作为他文章的开篇：‘马来亚常被称为文化沙漠，事实上是不是这么糟？’在玛戈撰写文章的同时，各项文化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马来亚大学艺廊的开幕、南洋大学（南大，1956年）正式投入运作、马来亚政府推动‘马来西亚化’运动（1957年起）及新加坡艺术节的启动（1959年）。对受中文教育的群体来说，艺术是蔡元培提倡新教育的一环。当玛戈试图从史前到当代对艺术界进行自我省思的同时，读者对他文章中没有提及的部分投入同等的关注。社会与族群的动乱纷扰不息，玛戈在评价本土艺术的同时，究竟透露了什么重要的线索，可供我们窥探当代社会思潮？”

[27] 钟瑜引新加坡画家林木化（1938—2008）口述，见《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1900—1965》，页34。

办，林学大与多位师生南下新加坡。陈厥祥觉得林学大为办美术学校最合适人选，便挽留他以协助完成办学计划。初抵达新加坡的林学大对这片新的土地也寄予相当的期许：

星洲地当南洋要枢，为东西贸易之总汇，物产丰富，经济充裕，文物风光，别具热带色彩之特质。惜尚无美术学校之设立，苟能加以发动提倡，关系华侨教育文化，必非浅鲜。……况处此全面抗战之大时代中，吾人安居后方，尤宜各尽所能，以增强国力，聊尽国民之天职，故慨然应诺[28]。

另一方面，新加坡华人美术研究会本来于1937年底提出筹办美术专科学校的建议，还成立了由李魁士、杨曼生、刘抗、张汝器、徐君濂五人组成的“开办美专起草委员会”[29]。1938年1月13日华人美术研究会召开例常理事会时，主席报告“筹组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目下正在计划中”，此为“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名称首次出现。同个会议里也通过林学大加入华人美术研究会。

后来，华人美术研究会考虑了种种因素，原先创办美术学校的计划暂告停顿，转向与林学大携手合作，共同建立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创校初四年间（1938—1941），华人美术研究会的张汝器、徐君濂、李魁士、卢衡、黄葆芳、吴在炎、施香沱等人都义务教学。杨曼生因与林学大相知，虽远在槟城也常到美专演讲和提供作品挂于校内供学生参考[30]。

其实，南洋美专与华人美术研究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美专教师多是研究会会员，两者还曾共用同一栋坐落于芽笼路第3巷167号的楼房。林学大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研究作画、观摩砥砺，影响本校学生甚深，因此养成一种自动研究之校风。自是以后，对于社会各种美术运动，美术会几与本校打成一片……”[31]。

华侨美术学院之后，新加坡陆续出现好几个略具雏形的小型美术学院，如玫瑰艺院、南星艺术专科学校、西南美术学院、西湖美术学院等，但规模都小，学生流动性大，维持时间亦极短暂，只有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从1938年成立以来，就继续不断地培育造就新加坡而至区域的美术人才。

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成立与发展多得当时一批集美校友的资助，加上中日战争爆发后，厦门美专停办，林学大与其同事抵达新加坡，形成一支生力军。美专初设时由林学大担任校长，教职员邱应葵、郭应麟、钟鸣世、谢投八、高沛泽、林俊德、钟白木、李魁士、陈溥之、黄葆芳、施育艺、吴德先、郑农、施香沱、司徒槐、张汝器、吴在炎、李大白、徐君濂，全为中国或法国美院毕业的专才；课程直接参照厦门美专，有西洋画系、雕塑系、艺术教育系及实用美术系。全日制的三年课程包括绘画概论、教育理论、木炭素描、水彩画、中国水墨画、图案设计、英文、华文诗词、音乐等。

在新马的美术史上，南洋美专的创立是重要的里程碑。在当初草创阶段艰难情况下，如果不是林学大的远见与魄力、厦门集美校友的鼎力赞助、华人美术研究会的艺术家的奉献，这所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抗日运动与新加坡华人美术发展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新马华侨各阶层掀起全面“抗日救亡”运动。各媒体、文艺刊物都投入抗战救亡的行列。戴隐郎在他编的《南洋商报星期刊·今日艺术》里呼吁美术界团结，通过美术尤其是漫画积极参与救亡宣传运动[32]。本来马华文艺界刚兴起的“南洋意识文学”，已被激昂的“南洋抗战文艺”所掩盖。虽然，此时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成立让“南洋美术”获得新生机，但其步伐在救亡运动中，“抗战美术”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当儿，不得不缓慢下来。

[28] 林学大，《本校创办经过的回忆》，载南洋美术专科学校1946年复办的纪念刊，转载于南洋美专出版委员会《学大》（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1986年），页7。

[29]《星洲日报》，1937年12月23日。

[30] 钟瑜，〈钟正山访谈录〉，载钟瑜编，《南洋美术之父林学大》（马来西亚：艺术学院东方艺术研究中心，1991年）。

[31] 林学大，〈本校创办经过的回忆〉，载南洋美术专科学校1946年复办的纪念刊，转载于南洋美专出版委员会《学大》，页7。

[32] 杨松年，〈戴隐郎与新马华文文学〉，《亚洲文化》期14（1990年4月），页117。

中日战争时期在新马刚萌芽的木刻、漫画活动也深受中国方面的影响，积极投入抗战行列。1937年华人美术研究会以“救亡漫画展”参加新华筹赈会。当时，文艺工作者通过媒体大力推动漫画，强调其社会作用，认为它是组织和教育文盲大众最有力的武器。新加坡在战前五年间举行过多次漫画展，目的除了宣传和教育外还为祖国筹赈救济难民。1940年南洋美专也设有“木漫研究会”，其会员卢衡、陈宗瑞、张汝器、戴隐郎、徐君濂、陈溥之、庄有钊、梁作侃、杨曼生等都有木刻、漫画作品参展。那时期活跃的木、漫创作者有40多名，可惜这热烈的情况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就沉寂下来。原因是殖民地政府后来发现新马华社中抗日分子的马来亚共产党势力日益强大，便开始严厉取缔抗日活动，木刻漫画为宣传生力军自然首当其冲[33]。

华人美术研究会除支援中国抗战赈灾活动，于1941年与西人画会（The Singapore Art Club）联合举办“为自由而战”（Fight for Freedom）美展，赈济英国难民。这是中西画家首次超越自己族群而为人类争取自由的行动。

1937年至1941年间，不少中国著名画家为抗战筹赈南来举行画展，包括王济远、胡呈祥、张丹农、沈彬仪、徐悲鸿、翁占秋、昆明文协分会的喻世海与宁涵章、王霭多、李飞鸿、刘海粟等。画展先在新加坡举行，然后北上吉隆坡、怡保、槟城三个华族人口众多的城市。在新加坡展出地点主要是在中华总商会和维多利亚纪念堂。这时期，新加坡充分发挥其为区域文化交流之要冲的地理位置；来自中国名家以及本地各美术团体所举行的展览，也对本地美术发展形成一股动力，产生相当的影响。

南来的画家当中，徐悲鸿、刘海粟、

画家张汝器绘制的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林学大（1930年代末，收藏情况不详）

司徒乔夫妇与新加坡美术界的接触比较持久与深入。徐悲鸿1939年之前曾六次访问新加坡。重要的有两次：1925年由黄孟圭介绍前来见其弟黄曼士。当时徐悲鸿于巴黎因留学官费中断，正设法筹回国路费，偶遇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黄孟圭，正在巴黎考察，两人一见如故。黄曼士时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交友广阔、爱好收藏字画古董。黄曼士邀徐悲鸿来新，热情地款待他住入芽笼35巷的江夏堂（即百扇斋），宅内还为他特设一画室，并介绍他为南洋侨领画像。此后徐悲鸿每次到新加坡都住在那里，许多重要作品如《六朝人诗意》、《放下你的鞭子》、《泰戈尔像》也都那里完成[34]。第二次是1939年1月，徐悲鸿来新马举办筹赈画展，前后逗留了三年，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进新加坡前夕才返回中国。离去前匆匆将逾千幅自己历年的代表作和其他个人艺术收藏，装

[33]《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1900—1965》，页117—118。

[34]欧阳兴义，《悲鸿在星洲》（新加坡：艺术工作室，1999年），页46—53。

相关人物

陈嘉庚　庄西言

历史事件

陈嘉庚、庄西言等联合南洋各地华侨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

进几十个箱子，一批运到罗弄泉（Lorong Chuan）埋藏在一口枯井里，另一批埋在韩槐准位于汤申路8.5英里的愚趣园的红毛丹林中[35]。这批珍贵藏品有一部分于1949年由陈晓楠带回中国，但是数量多少，其余留下没带走的有多少，都没有明确的记录[36]。

除了举行展览以外，到访画家都兼作艺术演讲。徐悲鸿在新积极参与华人美术研究会与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活动，号召艺术家应以反映现实为手段，参与改革社会；居留新马期间，徐悲鸿共作了12次演讲，其中8次是在新加坡；刘海粟在新加坡共作了7次[37]。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与言谈在本地文化界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

徐悲鸿1939年南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由几十位新马富豪为他筹办的《徐悲鸿画展》，轰动全新加坡，上至总督，下至学生、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每20个新加坡人当中就有一人参观过画展。规模之盛、筹款数目之多、艺术影响之深远，在新马史无前例，至今仍然是个光辉的纪录[38]。

1941年日军南进前夕，新加坡全民奋起进入抗战状态，美术界包括华人美术研究会、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纷纷成立抗敌协会。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马之后，马上开始大肆搜捕抗日分子，进行血腥残暴的“大检证”屠杀，许多华人文艺界人士有的逃离、有的牺牲、还有一些转入地下成为抗日军。

林学大将美专关闭，自己全力投入抗战工作。他因长子参与抗日地下工作被捕而下落不明，便退隐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美专教师施香沱起初加入郁达夫领导的文工团，负责抗日宣传画的工作。沦陷后跟郁达夫等人逃往苏门答腊避难，埋名隐居于渔村，潜心苦读作画，深入思考中国绘画传统里的各种主张，更感悟“山芭”与乡间大自然的生活体验如何开阔画家的艺术心灵[39]。

华人美术研究会的会长张汝器、副会长何光耀、会员庄有钊、林道庵等在大检证中被日军杀害。张汝器战前曾作很多抗日漫画、油画，还曾举办画展作抗日宣传。日军南进前，他作了一幅日军在中国强奸妇女的图画为抗日筹赈。当然，大检证受杀害的美术界人士当不止这些。也有一些被捕后死里逃生。刘抗因曾于1937年从中国回到马来亚麻坡时，常作抗日漫画刊登于报上，1942年日军宪兵逼他呈交一份抗日地下组织的报告，他却施计为军官作了一幅肖像然后送去宪兵部，结果伺机脱身逃往新加坡[40]。

林学大与南洋美专：南洋绘画风格的形成

林学大认为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人文条件，有利于创造和发扬富有南洋特色的美术，并沟通东西文化，因此定下四个办学宗旨：传达祖国文化、辅助华侨教育、沟通东西艺术与建立马来亚新艺术[41]。他坚信南洋的热带风貌以及多元民族的本质为此提供优越的条件，所以决意朝向理想努力不懈。由于林学大为南洋美专制定了明确的宗旨，在日军南侵前短短的四年内打下扎实的基础，而获得相当蓬勃的发展。

根据现有的文献、图像资料（包括原作与印刷品），我们能见到新加坡华人最早的画作是刘开赏（1889—1982）的油画《山猫》（1921年）[42]。刘开赏与两位兄弟都是侨生

---

[35] “愚趣园”是新加坡早期文化人韩槐准1936年在汤申路开辟的果园。当所植红毛丹成熟时，主人便广邀文人雅士来品尝，并欣赏他所藏陶瓷器。1940年他与姚楠、关楚璞、张礼千、许云樵、郁达夫发起成立南洋学会。1950年代起，韩槐准潜心研究陶瓷器，颇有所成。1962年，携妻带女返回中国北京出任故宫博物院顾问职。韩氏于197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36] 这段资料见于欧阳兴义《悲鸿在星洲》，页22—30，华天雪对此提出质疑，发表于〈一段清晰又朦胧的历史：徐悲鸿在星马〉，刊登于新加坡美术馆《徐悲鸿在南洋》展览图录（2008年），页87—88。

[37] 《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1900—1965》，页54；徐悲鸿在新加坡演讲文本部分收录于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中国：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页101—107。

[38] 欧阳兴义，〈徐悲鸿历史研究的时代机缘〉，见新加坡美术馆出版《徐悲鸿在南洋》展览图录（2008年），页66—77。

[39] 施香沱，〈三年多的流亡所得到绘画上认识〉，载《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复办纪念刊》，（1946年），无页数。

[40] 钟瑜1996年8月10日于新加坡与刘抗访谈，引自《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1900—1965》，页59。

[41] 〈钟正山访谈录〉。

[42] 刘开赏所作《山猫》属Richard Low收藏，引自Kwok Kian Chow, *Channels & Confluences: A History of Singapore Art*, (Singapore Art Museum, 1996), pp. 12–13.

华人，在当时峇峇社会里很活跃。他还在乌节路开了一间称为Empire Studio的“帝国画室”，曾为印尼富商黄仲涵（1866—1924）作肖像。当黄仲涵1924年于新加坡逝世时，《马来亚星期六邮报》（*Malayan Saturday Post*）将那幅肖像刊登在报上，并注明是“著名帝国画室刘开赏的佳作”，完成年代不详[43]。

南洋题材最早却见于南来画家张汝器（1904—1942）的作品里。1927年他到新加坡后就投入本地教育和美术活动，从参展作品的题目以及出版物里的图像看，张汝器意识地将南洋风注入作品中，例如1939年华人美术研究会展出的油画《咪啦与妊娜》和《满载而归》，这类南洋题材的画是画家1934年旅欧归来苏门答腊峇达山之行所作[44]。

张汝器从1936年至1941年曾多次连任华人美术研究会主席职位和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科教授，他自己创作的方向很符合林学大办学为“沟通东西艺术与建立马来亚新艺术”的宗旨。

另外，1929年16岁的李曼峰完成他第一幅油画《双林禅寺》。这位少年早年在新加坡受教育，后来移居印尼椰加达，在那里成为著名画家，并于苏卡诺时代担任总统府画家。李曼峰于1938年来新加坡结婚度蜜月期间，与张汝器、庄士钊、司徒乔等30多人去巴丝班让写生，也加入华人美术研究会成为海外会员。1940年他特地从印尼来新，专为请徐悲鸿指教。徐悲鸿看过他作品的照片后极赞赏，鼓励他出版画册，并立刻为他作一篇序文 。但这篇序文直到1984年李曼峰在新加坡出版画册时才派上用场[45]。原来属印尼国籍的李曼峰1967年回新加坡定居，1988年逝世后身份曾引起争议。但他自己曾说过：“中国是我的出生地；新加坡是我的第一故乡，我的童年和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印尼是我的第二故乡，在那里我获得一生最大的荣誉与成就”[46]。根据他这句话以及他许多南洋风格浓郁的作品，我们亦可以把他当做新加坡美术家看待[47]。

战争结束，林学大于1946年复办南洋美专之后，校址迁至圣托马斯路（St. Thomas Road），逐渐吸收到不同国籍如英、美、澳、捷克、印度、印尼的学生来加入研究班[48]。这发展正切合擅长中西绘画艺术的林学大，以南洋多元种族、文化的特殊条件贯通东西与创造新美术的夙愿。

南洋美专在林学大所坚持的办学方针继续发展，尤其师资阵容逐渐强大，有施香沱（1906—1990）、陈宗瑞（1910—1986）、钟泗滨（1917—1983）、陈文希（1902—1992）与张荔英（1906—1993）等杰出的画家，加上与刘抗主持的华人美术研究会携手合

[43] *Malayan Saturday Post*, 12 July 1924.

[44] 姚梦桐在《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有一章专论张汝器，称他为“很早且有意识地以‘南洋景物’入画的画家”，页189；刘抗形容他为“全马画家中写实技巧最圆浑纯熟的一员，可与悲鸿、把苏基（印尼画家Basuki Abdullah）并肩齐步，而神韵风采则过之无不及，所作之人物栩栩如生，已达到勾魂吸魄之境界”，见《刘抗文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私营有限公司，1981年），页237；1986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出版年刊《学大》介绍张汝器的作品，其中有这两幅油画，但没作品说明，也没注明有关收藏信息；陈宗瑞于1966年为林学大、张汝器、杨曼生三人遗作展特刊写〈怀张汝器先生〉，对其作品给予极高评价，并肯定其通过中华美术研究会对新加坡美术所做的重大贡献；陈其新，《陈宗瑞文集》（2010年），页23—24。

[45] 李曼峰，《李曼峰画集》（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84年），页6—7。

[46] 欧阳兴义，《南洋画伯李曼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页60。

[47] 《南洋画伯李曼峰》；又《李曼峰画集》，（中英文双语版本）*The Oil Paintings of Lee Man Fong : The Pioneer Artist of Indonesia and Singapore* (Taipei: Art Book Company, 1984)，这本画册绝版多年后于2014年再版。

[48] 林学大，〈卷首语〉，载《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画刊》第一集（1951年）。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南侨总会分九批把3000余名南侨机工送到昆明，负起滇缅公路运输战略物资任务

1月

中正中学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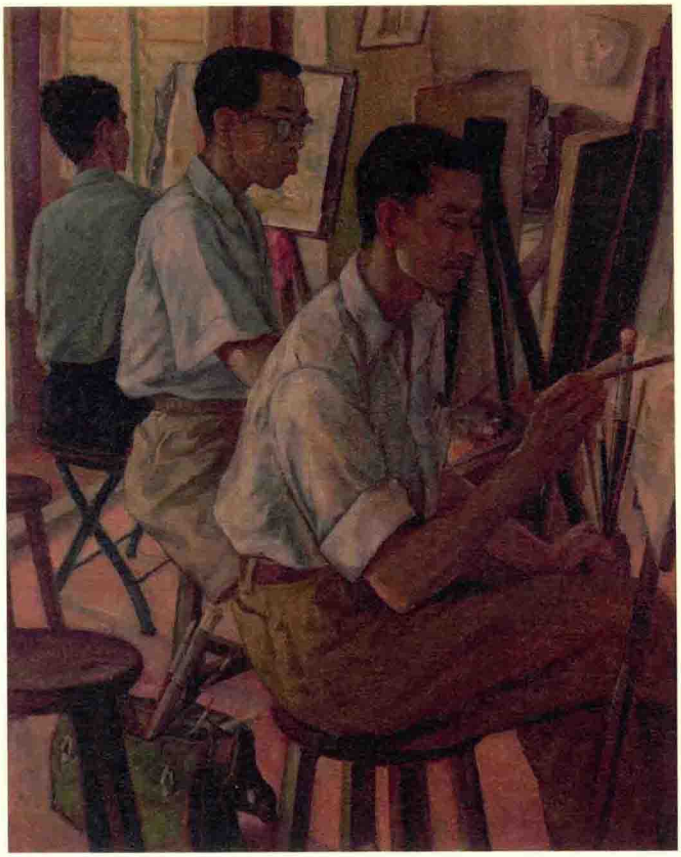
9月3日

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作，成为美术界强大的中坚力量。

1952年陈文希、刘抗、陈宗瑞、钟泗滨四人为进一步探索南洋意识、发掘更原始、朴实的本土绘画素材，结伴到印尼峇厘岛去写生，归来后华人美术研究会举办了四人的《峇厘旅行画展》。展览很成功，启发了新马画家，往富有浓郁热带景观和生活气息的东南亚各地去采风的创作方式。

南洋风与本土意识自1920年代末萌芽至此热烈地全面展开，为新加坡美术开拓了格外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华人画家，尤其那些在南洋美专授课者，几乎全是中国艺专毕业或曾留学法国，直接或间接吸收法国各画派如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然后将之带入新马，影响学生至深。南洋风格也通过不同画种如油画与水墨画来表现本土题材，融合中国传统水墨的意境、欧洲现代的写实技巧，以及热带风物的浓烈色彩，创造出独特的“南洋风美术”。



林友权的《绘画课》（油彩布本，83cmX65cm, 1956年），描绘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绘画课上课的情况（由新加坡美术馆提供）

战后新加坡美术发展

战后的20年期间，在欧美掀起的新思潮与新兴起的美术流派，也逐渐吹向新马艺坛，加上新马社会经历过战乱后本土意识复苏而加速，南洋风美术就在如此多元激荡的状态中形成更鲜明的特色。

林学大将南洋美术的宗旨扩大成为“六大纲领”，即“融汇各民族文化风尚、沟通东西艺术、发挥20世纪科学精神与社会思潮、反映本邦人民大众需求，表现当地热带情调及配合教育意义、社会功能”。

这期间展览的次数大增，一些画家的作品也开始有市场，不过大部分美术家群体如南洋美专、华人美术研究会、以及华侨中学、中正中学里的美术研究会，基本上还仍然偏重教育，因为画家绝大多数为教师[49]。战前解散的美术团体少数如华人美术研究会重整复办，改称“中华美术研究会”，许多新团体也纷纷成立。这些团体也个别举办重要展览如“徐悲鸿遗作展”、“张大千、黄宾虹、齐白石联展”、“赵少昂作品展”，产生相当的影响。

从战后成立的美术团体组织看来，新加坡以及马来亚的美术发展开始比较倾向多元化，并超越族别界限。例如，1949年成立的新加坡艺术协会，发起人包括中华美术研究会主席刘抗，还有英殖民地政府官员和马来族人士。其理事会有各文化团体代表：英国文化协会、中华美术研究会、马来美术协会、印度美术协会、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教育学院、南洋美专等。协会会员不分种族、国籍，专注举办展览与设立夜间绘画研究班。当年协会会长何国豪非常积极推动新加坡本土艺术家作品。由于他个人的努力，1955年他促成新加坡美术展览第一次踏出国门，在英国伦敦展出陈文希、钟泗滨、陈宗瑞、林学大、郑伟高、素里莫耶尼（Suri bin Mohyani）以及他自己的作品。何国豪曾于新加坡艺术协会担任会长多年，任内对本土美术发展贡献良多。

1940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许铁生，同年

[49] Kwok Kian Chow, *op.cit.*, pp. 69–70.

移居新加坡。1948年至1977年，他任新加坡公教中学的美术及华文老师，擅长西洋画及中国水墨画。许铁生活跃于中华美术研究会，1968年专攻木雕艺术，成为新加坡少数雕塑家之一。作品富于本土色彩，表现当地人民的勤劳生活。

1956年，正当本地艺坛传入西方现代艺术新时尚，李文苑领导了一群年轻同道林友权、赖桂芳、郑文斌、李直、蔡名智、陈成兴、许锡勇等，成立了赤道艺术研究会，主张以现实手法来创作，具体而生动地描绘现实生活，通过形象以表露崇高的思想感情。这画会人数众多，打着鲜明的写实主义旗帜，坚决反对现代主义的“怪画”，重视人物外在形象的准确性和其内心世界真实的刻画。

在思想意识上，赤道艺术研究会接近较早成立的新加坡华中学生毕业班同学的艺术研究会，其会员的作品大多含有强烈反殖民的国族意识，例如蔡名智的《国语课》（1959年）、《马来亚史诗》（1955年）。赤道艺术研究会会员众多，虽于1970年代就结束了，但其影响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马来亚抗日时期兴盛过一阵的木刻，经过一段好长时间的沉寂，1966年又恢复了！六位画家朱庆光、陈世集、符致珊、林友权、林木化、许振第联合举办新加坡第一个木刻展，作品的内容与风格近似赤道艺术研究会所作。

1963年，受现代艺术思潮影响的青年画家黄明宗、何和应、吴仲达、陈贻僮、郑志道、董长英等发起成立了新加坡现代画会，主张画不在真或像而在它有性灵，认为生命的线条、气息的笔触、独特的结构、活动之色调，即艺术创作。现代画会虽会员人数不多，它强调现实主义的美术已过时，艺术需要与时并进。画会1980至1990年代由抽象主义画派的唐近豪出任会长。刘抗非常肯定新加坡现代画会的贡献，认为虽然新加坡本来就有人创作现代绘画，如钟泗滨、姚照宏、叶之威、方谨顺、郑志道等，但都各自为政，所以散漫而影响不大，直到现代画会成立才形成一股力量[50]。

从1961年至1970年之间，叶之威召集了一群绘画的朋友，结队到区域各地去写生画画，然后将作品集合起来举行联展。这个非正式的组合称为“十人画会”。十人画会的基本成员有李锡君、佘金裕、杨中华、陈城梅、谢丕才、陈妙卿、朱庆光、林子平、赖凤美。他们游历的地区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峇厘、泰国、柬埔寨、砂劳越、沙巴、文莱与苏门答腊等，似乎切实贯彻当时对南洋美术的更进一步的探索。南洋区域的风景与生活通过他们各自的才情展现出绚丽多姿的风采。

第二代美术家当中有几位如张永生、姚照宏、黄荣庭、吴民权、陈潮光、杨可均、蔡荣恩、方谨顺、郭维洲等在新加坡完成了基本美术教育后，赴欧洲与北美深造，回国以后带来新思潮，美学观点与本地现代画会所追求的刚好不谋而合。他们当中有几位，还曾在南洋美专或跟随美专老师习艺。

当这群爱好现代美术的艺术家正苦于没有足够展示作品的机会时，来自槟城的建筑设计家林苍吉于1971年，在亚历山大路创立了亚化画廊（Alpha Gallery），刚好为他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展出空间。这群画家跟亚化画廊的阶段也因此成为新加坡美术史重要的章节。

留英的蒋才雄1973年对现代画会所提出的

[50] 刘抗，《刘抗文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1年），页305；另见刘抗，《文集新编》（新加坡：新加坡美术馆，2011年），页233。

抽象与南洋画派的表达方式，视为肤浅、僵化，主张开放眼界，多做崭新的试验，寻求突破[51]。

1955年新加坡李氏基金与中国学会联合创立了新加坡艺术学院，由留学日本的沈雁出任院长。学院的目的为陶冶身心、发扬文化、沟通中西艺术、务使新马成为文化的桥梁、造成欧亚间文化艺术共通的鼻祖。学院于1970年代末停办。

由陈宗瑞、林清河、吴承惠、沈观德、黎才专、许延义等十多人，于1969年发起成立新加坡水彩画会。画会会员经常结队在国内或区域各地写生，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活跃美术团体。新加坡有一只相当强大的水彩画队伍，其中佼佼者如王金成、刘培和、陈长豪、李运启、周碧珊、王春鑫、董振狮等，多年来还孜孜不倦地坚持创作，成绩斐然。

萧学民早年在南洋美专学画，耕耘多年后至2004年才举办首次个展，一鸣惊人，作品以东南亚与亚洲区域的山川人文题材为主，是南洋风再现的突出例子。

新加坡水墨画的历程

新加坡正式的水墨画教育最早见于1922年华侨美术学院的正科课程，但一开始报读学生都选择念西洋画，中国画竟无人选修。创办人之一的孙裴谷因此感叹说："岂我们中国画是不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么？"

华人美术研究会（后改称为中华美术研究会）自1936年成立后，战前五次常年展都以西洋画为主，而所举办南来访问画家展览却以水墨画居多。1938年创立的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课程也以西洋画为主，水墨画起初由李魁士一人去负责，接着增加了吴再炎与施香沱，林学大校长本身兼能作西洋画与中国画。

南洋美专战后正式开设中国画系，原有的师资阵容多了黄葆芳、卢衡。新加坡的水墨队伍到陈文希与钟泗滨加入南洋美专就更加壮大。南洋美专教授水墨画的师长都曾于上海的美专学习，继承了海派写意的传统，并且也历经过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他们各有所长，培育了一批年轻水墨画人才，自己也通过水墨的创作来表现南洋的题材。陈宗瑞早在1940年代有意识地用传统水墨画表现本地题材，新加坡最早南洋风的水墨画作品多出于他手[52]。1960年他做的一幅《河边洗衣》反映出如何融合形式、题材与技巧的探索[53]。钟泗滨的"南洋水墨"也起步得早，尤其是1950年代的《奎笼》深得美术界推崇，肯定他成功地结合中西美术之精髓[54]。南洋美专训练出来的水墨画家有符致珊、陈世集、陈建坡、曾纪策、黄明宗等。

范昌乾1956年来到新加坡，先后任教于中正中学、黄埔中学。自己也开课授徒，1960至1970年代教过的学生有林子影、赖瑞龙、陈有炳、郑剑峰、林家雄、刘挥、李淑芝、蔡逸溪、陈克湛、庄耿文等。范昌乾可算是在南洋美专以外影响最深的水墨画家。

进入1960年代，新加坡水墨绘画的发展跟先后成立的美术团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1967年成立的墨澜社，创会成员是施香沱门下的庄声涛、曾广纬、王思宗、胡康乐、赖瑞龙、郑剑峰、陈建坡、曾纪策、林万菁、张有铄、潘永强、吴心晖、廖伟业、郑子硕等。还有另一主要以施香沱之学生于1971年组成的啸涛篆刻书画会，该会活跃于新加坡书坛的名家有吴俊刚、陈建坡、曾纪策、许梦丰、赖瑞龙、纪民贞等。

新加坡华翰研究会是由一群中华书画爱好者如赖瑞龙、陈有炳、陈绍易、林子影、廖宝强、黄寿松、蔡逸溪、李淑芝、林家雄、黄永春等，于1972年在范昌乾鼎力支持下所创立的。近年来多位同仁都在新加坡画坛崭露头角。

年龄介于第一代先驱画家与第二代画家之间的林子平，土生土长，毕业于中正中学，全靠自学而达至油画、水墨兼精。早期多作油画，直至1970年代中才以扎实的书法功底开始作水墨，虽起步略晚，但以书画交融的水墨风格独

[51] 蒋才雄，〈为第八届现代画展而写〉，载《星洲日报》，1973年1月3日。

[52]《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1900—1965》，页102。

[53] Kwok Kian Chow, opcit, pp.82–84.

[54]《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1900—1965》，页103。

树一帜，题材也以本地和区域自然与人文为主。2009年，林子平成为第一位受北京中国美术馆与上海刘海粟美术馆邀请举行个展的新加坡画家。

另一自学成功的第二代艺术家是油画、水墨、书法、篆刻皆精的多面手陈瑞献。他的水墨创作亦有突出的表现，可算是新加坡新水墨代表人物之一。

唐大雾留学英国，虽然喜欢实验多种形式如雕塑、装置与行为，但坚持不断地用水墨、书法来尝试突破其形式与题材上根深蒂固的局限。

曾与陈文希习艺的第二代画家何和应、陈潮光、与王瑾，除油画以外，在当代水墨方面，也有大胆的实验和探讨，各有所成。

新加坡书法艺术的发展

书法为华族独特的艺术形式，早期的启蒙馆、义塾及学堂所传习的书法，虽不属于美术教育范畴，但每日的习字锻炼却为学生在书法艺术方面打下一定的基础。其实，新加坡的书法发展，是与华文教育历程息息相关。

对新加坡书法教育贡献最大的首推先驱书法家施香沱与陈景昭。此外，黄载灵、俞龙孙、蔡梦香、黄勖吾、张瘦石、陈人浩、崔大地、颜绿、陈之初、潘受、黄火若、王瑞璧、黄国良、林子平等都各有杰出的成就，也曾带来一定的影响。

施香沱曾任教于南洋美专，得意门生有黄明宗、陈建坡、曾纪策、胡康乐、庄声涛、林万菁、张有铄等。学生们也各自组织书画团体如“新加坡墨澜社”、“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兰亭画会”推广水墨以及书法艺术。陈景昭曾任端蒙中学校长与中正中学总校教师。在任期间校内、校外都大力提倡书法活动，培养了一批热爱书法的学生如陈声桂、朱碧妹、杨应然、杨应春、杨庆盛、邱程光等。其中陈声桂历任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利用坐落于小坡四马路的新加坡书法中心，推出许多普及与发扬书法艺术的活动及课程，作出重大贡献。邱程光则于1991年离开新加坡书法协会，与曾广纬另组狮城书法篆刻会。此外还有曾守荫、廖宝强、杨昌泰、邱少华、朱添寿等都是目前新加坡书法界知名人物。

新加坡由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书法课原先受重视的地位逐渐消减，在华校当中端蒙中学与中正中学由于有热爱书法的老师任教，还继续坚持学书法的风气。端蒙有祝业殷、陈景昭、杨伟群；中正中学有张瘦石、陈景昭；另外，德明中学有陈人浩担任校长，热衷于推广书法艺术，杰出学生有许梦丰。

历经新加坡教育的变迁与改革，书法艺术的传授、推广与普及几乎完全从学校转向书法团体以及个别书法家在社区联络所进行。

南洋画风已成艺术史名词

南洋美术的发展历程是在特殊社会、时代背景和条件下产生的。新加坡华族从初期侨民意识逐渐转向本土意识，思想上从落叶归根朝向落地生根。早期的美术学院课程内容沿袭中国当时的模式，到了南洋美术专科学校虽然课程内容依照当时厦门美术学院与中国其他美术学院而制定，但办学的方向很明确的是要创立富有本土特色的美术，并以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位置沟通东西文化，体现多元、兼收并蓄的精神。

先驱如张汝器、刘抗、陈文希、陈宗瑞、钟泗滨、施香沱、张荔英都来自中国，以他们本身的文化和教育背景，在新的土地上很快的就投入并吸收区域浓郁的热带气息与色

相关人物

姚楠　张礼千　许云樵

历史事件

南洋学会成立，以研究南洋文化为宗旨，并出版《南洋学报》。创立人为姚楠、张礼千、许云樵等

彩，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南洋风格。他们特有的时代背景不可能重复，南洋风格可说已成为艺术史上的名词，尤其1965年独立之后，国族意识与身份认同成为许多新加坡人迫切思索的问题。新一代的艺术家大都土生土长，他们当中有的在延续先辈风格的基础上创作，有的跨越本地与区域的界限，吸取各种新观念，进入比较实验性的表现形式与更广泛的题材。

先驱的拓荒、进取精神，与他们文化与思想上多元、开放、兼容的创作态度为新加坡美术奠下巩固、扎实的基础，也为后进艺术家开发、创造了丰富的资源，给予他们持续不断的启发与鼓舞。

第二节　唱尽人间喜与忧
——新加坡的表演艺术

摘要

华族戏曲与舞蹈和话剧工作者在克服了前个时期的式微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田野调查显示华族表演艺术家们的文化使命感与追求卓越艺术的精神，是他们抗拒全球化与现代化压力的坚实基础。在“环球艺术大都会”语境下，艺术家们借助全球化与资讯科学的力量，为多元文化社会里的华族表演艺术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

Abstract

Xiqu, the various genr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eatre as well as Chinese dance and drama in Singapore, overcame their decline in the previous period and managed to enter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in the recent years. An ethnographic study shows that Chinese arts practitioners' strong sense of cultural mission and desire to achieve artistic excellence provide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overcoming the pressures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artistes are finding their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king of the "Global City for the Arts".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in fact offered new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蔡曙鹏（**Chua Soo P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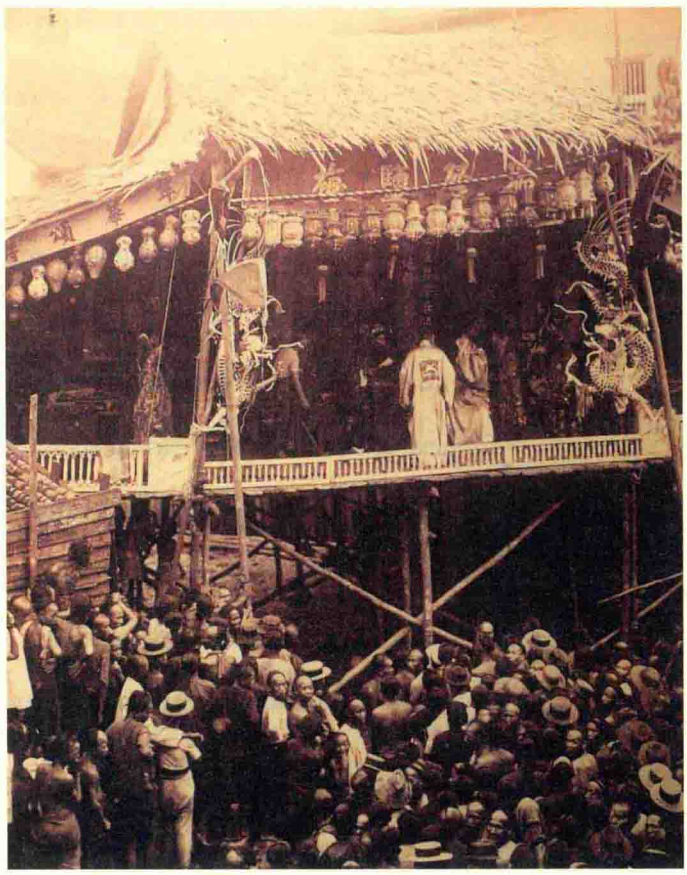
表演艺术是表达情感的行为，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其形式多样化，各有其社会教化、文化传承与娱乐功能。新加坡华人社会表演艺术种类由少而多。早期的舞蹈、戏剧、音乐、偶戏，从内容到形式，源自自己的故乡（homeland）。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社群对国家认同转向，开始意识到需要更关注自己居住地的事物的情感表达。新加坡建国以后，面对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挑战，艺术家们在各自领域中，于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自己的戏剧、音乐、舞蹈的创作，逐渐形成地域特色。建国50年来，新加坡舞台上各种门类的作品，鲜明地展现一个多元文化的大都会呈现的特殊风采。

早期的剧团与演出

表演艺术需要三个基本条件。表演创作群、场地与观众群。正因为其性质，表演艺术的兴旺或萧条，与所处社会环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华族戏曲是最早从中国传播到新加坡的华族表演艺术。中国剧团到新加坡最早的文献是1842年美国远征探险队司令官威尔基斯（Charles Wilkes）写的《航海日志》。根据英国学者柯恒（Matthew Cohen）的研究，17世纪时已经有中国剧团在印尼首都巴达维亚（Batavia）演出。泰国关于潮剧演出的最早文献出现于1685年法国教父梭亚只（Choisy）的《1685至1686的游暹日记》。由此推断，威尔基斯看到的可能是来自暹罗的潮剧团。

中国戏曲自明朝便有堂会、酒楼、会馆、船艇、庙会不同类型场所的演出。这些形式大多也流传到海外。19世纪末新加坡的戏曲，已在两种不同的场所演出。一是流动性的演出场所，一是固定的演出场所。前者包括沿街拉场的小戏班的流动性演出、在不同地点举行的节庆与宗教活动而搭建的临时性舞台。后者包括了先后在牛车水建立起来的专门供地方戏曲演出的戏园。这包括梨春园、普长春戏园（后改名为庆维新）、庆升平、景春园、阳春园、丹桂园、升春园、哲园和怡园。这些场所的演出与庙会演出，分别吸引大量的观众群。演出剧目是粤剧、潮剧和闽剧[1]。此外，也有潮剧团受邀在市中心的草地搭篷帐开演[2]。1881年出现第一家华文报章《叻报》，当时各籍贯的宗乡组织也相继成立。文化环境的改进，对戏曲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清朝末年是京剧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集中在京城的名家，博采众长，吸取了其他地方戏的各种优点，发展了整套严谨的表演程式，艺术纯熟。当时的皇室权贵、文人书生乃至贩夫走卒，都追捧京剧。上海和北京随着士绅商人对京剧热情的高涨，戏班与戏园发展了新关系，豪门富商与伶人来往频繁，伶人社会地位提升，京剧伶人跨地域流动也更为活跃。而此时新加坡戏园内外观众的增加，引起戏园邀请正在中国兴旺起来的京剧戏班南来商演的动机，这与京剧戏班寻求域外表演的愿望契合。庆升平戏园一马当先，于1893年请来了福祥升京班。90余人浩浩荡荡



早年的临时性戏台

[1] 李钟钰，《新加坡风土记》（1887年），页13：“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唯彼乡人往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三四占合银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

[2]《新加坡风土记》，页11。

地在12月27日登场，至翌年1月8日，连演13天。《叻报》报导了当时的观众对京剧这一陌生剧种的热烈反应。“所演之戏甚佳……园中几无坐处概其表演之剧情景，较为真肖，而且甲仗鲜明、器具精美、而戏场之上复经藻饰一新，颇觉美观，故能令观者乐而忘倦也”。京剧演员的高亢唱腔、精致服饰、紧凑武打，令人大为赞叹，观众热烈争看。这个成功的经验，促使庆升平戏园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邀请更多京剧戏班与伶人南来，甚至在1900年以后，还出现了本地人当班主的京剧戏班[3]。

新加坡在1903年晋升为世界第七大海港。到了1911年，已经约有18万5000华人，占总人口的75%。商业经济发展促进了观戏的文化消费，无形中也培育了在闲暇时刻弹乐唱戏的雅士，结社唱戏。最早成立的是由潮商陈子栗担任首任社长的余娱儒乐社。1912年，陈子栗以他的谦裕号为社址，聚集了许多喜爱汉乐的商人，清唱汉剧曲目，演奏汉剧音乐。余娱儒乐社的成员大都经济条件好，有文化修养，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宗旨是“提倡汉剧、研究音乐、发展文娱、联络感情、协助公益、服务社会”[4]。最初的活动，仅限于做唱与奏乐。后来扩大至社员粉墨登场，正式演出完整剧目。儒乐社对开展的活动有清晰的目的，认为演出“可宣扬教化、伸张正义、褒善贬恶、移风易俗”[5]。为了提高技艺，成立不久后，便邀请名家陈夔石、魏松庵为导师，教导唱曲与表演。演奏员与演员达到了一定水平后，在1926年8月一连三晚共演出《白虎堂》等剧目，反应热烈。余娱儒乐社定期为了社庆联欢、庆祝孔诞、或为救济灾黎而演出。接下去的一、二十年，不同方言的业余剧社越来越多。无不开放门户，广纳各阶层戏曲爱好者，为救灾或建校或其他慈善事业筹款。这些戏曲团体、民间团体有强韧的生命力，是此后传承与推广华族戏曲活动的重要基地。戏剧与音乐团体为公益事业筹款的义演，是当时最常见的增强族群凝聚力的社会活动。

话剧诞生在一个中国国势日微的时代。从一开始，文化人便看中这门外来的艺术形式的社会与政治功能。他们把观众引进剧场，当成是一种救国的群众运动。天缪生在1908年在《月月小说》第二卷第2期发表的〈剧场之教育〉说：“吾以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欲输入国家思想，舍戏剧未由”。到了1930与1940年代，先后出现了“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戏剧、左翼戏剧、国防戏剧以致抗战戏剧，都被赋予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色彩。其功利性与“文以载道”的思想，与戏曲的教化功能一脉相承。中国第一个新剧的职业剧团进化团，从一开始便以《血蓑衣》、《东亚风云》（又名《安重根刺伊藤》）、《新茶花》三出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戏面世。演出的戏“几乎没有一出不是骂贪官污吏的”[6]。因此，华语话剧传入新加坡，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也在这实用功能的轨迹上前进。例如1913年由邱雁宾会长领导的耆英善社，邀请了香港振天声改良白话班在升平园演出，目的是为中国广东省水灾募捐筹款。翌年由几间书报社共同发起的国风幻境慈善班，更是为了筹款救灾而成立。国风幻镜慈善班在1905年演出的《黑海慈航》、《害人终害己》、《国怀兴学》、《巾帼英雄》等，都显现出其借戏剧宣扬社会道德与新进思想的意向。接下来几年成立的剧社如临时白话剧社、仁声白话剧社、通俗白话剧团等剧团所组织的演出，大多是为了救灾或建校。新加坡戏剧、戏曲、舞蹈、音乐会为了一个共同目的开展的传统，由此建立起来。为善

[3] 王芳，《京剧在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戏曲学院，2004年），页35。

[4]《余娱儒乐社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余娱儒乐社，1972年），页158。

[5]《余娱儒乐社六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57。

[6] 陈大悲，〈十年来中国新剧之经过〉，载《晨报》，1919年11月15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2 月 8 日

日军空袭新加坡

12 月 28 日

星华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

举而演出的捐款活动，延续至今，仍旧时有所见。

20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不同方言族群的学校，也成为演剧活动的生力军。养正学校带头于1915年演出《毒妇现形》、《好男儿》、《假狗案》等之后，许多中小学也展开了校园戏剧活动。虽然这些由师生编剧的话剧鲜有文本流传下来，但从剧目名字如《家国新声》、《金钱孽》[7]，可以推测学生戏剧的创作倾向与演出宗旨。以从这时期开始到1960年代初，学生戏剧一直是新加坡华语话剧活动的主力军。这个时期的学校演出以综合性晚会为主，节目包括短剧、舞蹈与歌唱，甚至魔术、武术等。这种筹集资金的模式，也成为加强族群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

随着人口的增长，新加坡复制了上海建于1917年的大世界游乐中心类似的游乐园。除了欢乐园（建于1921年）在开张后不到十年便结束营业外，新世界（建于1923年）、大世界（建于1930年）和快乐世界（建于1935年），为演艺圈提供了牛车水以外的新的演出场所。当时的游艺场除了有歌舞、杂耍魔术表演外，还有电影院、商场、餐馆、小吃摊位与商店等。加上锣鼓响亮的戏曲舞台，成为人们消闲活动的好去处。

1920至1930年代，中国剧团接踵而来，构建了一个戏曲演出的黄金时代。福建莆仙戏紫星楼班的《伐子都》、《薛仁贵征东》、《封神榜》；闽西汉剧新舞台班的《九炎山》、《薛蛟吞珠》；广东汉剧新天彩戏班的《三气周瑜》、《辕门射戟》、《桂枝写状》；高甲戏班的福荣兴班的《献苦肉》、《过五关》、《斩蔡阳》；福和兴《斩郑恩》、《失高宠》、《小商河》等等都是深受欢迎剧目。

当时在广州的名角也在这个时期蜂拥而至。领导永寿年班的靓元亨，被普长春班重金聘请来的名伶白驹荣、在梨园春粉墨登场的章丽章、觉先声剧团的薛觉先、非侬剧团的当家花旦陈非侬、胜寿年的当家男花旦李翠芳、振环球剧团的梁醒波，无不是当年粤剧界响当当的红星。除了一次南来总会盛演两、三个月的大戏班外，也有单独来搭班的粤剧名演员如汤伯明等。京剧演出也热闹非凡。从厦门、上海、北京请来的戏班，让观众目不暇接。这些京剧团除了演出传统戏《铁公鸡》、《斩黄袍》、《辕门斩子》、《目连救母》、《狄青取珍珠旗》外，还演过《枪毙阎瑞生》等时装戏。京剧与粤剧的兴旺，还可以从伶人的演出场所延伸到南天茶楼、天一景酒楼、大东等清唱看出端倪。潮剧老赛桃源、老赛永丰、老三正顺、新荣和兴等剧团也在戏园里热演。

那么多不同剧种的戏班同时在新加坡上演，给民众带来同时选择观赏不同方言戏曲的机会。虽然不同剧种演出语言有别，其戏曲表演的综合形态（唱、做、念、打），表演样式（写意性、虚拟性和程式性）和剧目内容（取材自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文学作品、神话故事）类似，不同方言族群的观众欣赏起来，不会有太大的障碍。因此，技艺各自精彩的各种来访的剧团很快在这个正在迅速增长的港市拥有了观赏多种方言戏曲的观众。当时那些来自中国不同省份与地区的剧团，也在这个多语言环境里，相互学习与观摩。例如粤剧演员陈非侬，便曾向京剧演员学习把子功与化妆，高甲戏演员郑文语学习京剧锣鼓。这种不同剧种的演员相互学习与支援的风气，经岁月累积，成为新加坡不同剧种演员相互观摩的活传统。每逢戏曲演出，台前不同方言群的人看自己能说或不能说的方言的地方戏曲。幕后不同剧种的从业者相互帮忙。梨园戏演员为潮剧演出化妆，琼剧演员协助粤剧演出。观众也一样，养成了欣赏不同剧种的观戏习惯。各种庙会与节庆活动，以戏曲演出继承族群传统的风俗，更为市民村民增添了生活趣味，促进社会和谐。

1930年代的新加坡，多元民族和华族各方言群的文化活动，随着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而更丰富了。土生华人的俱乐部，像华族文化团体一样，为慈善筹款而演出了话剧如《贪婪》、《悔悟》和《时髦的戴斯玛》等。英国人社群也常呈献话剧与组织音乐会。此外，开始风行的马来歌舞剧邦沙旺（Bangsawan）[8]，也吸引了多元民族的观众。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黎锦晖于1928年带领的明月歌

[7]《山岗的脚印—华中人的表演艺术实践1922—2014》（新加坡：新加坡华中校友会，2014年），页39。

[8] 邦沙旺（Bangsawan）源自从印度来访的歌舞剧。1880年代来访的由帕西人组成的剧团以兴都斯坦语到槟城演出，其载歌载舞的活泼形式，受到各种民众的喜爱。1885年有一定居槟城的帕西人富商自己组团，演出这种形式的歌舞剧，首次采纳了邦沙旺的名称，于是这种艺术形式的命名约定俗成。此后，还有华人如陈文德、Yap Chow Thong等组织邦沙旺剧团商业。邦沙旺剧团在1930年代在新加坡演出，成为娱乐圈的一道新风景。演出内容取材自马来民间故事、阿拉伯传说、莎士比亚戏剧与中国神话故事如宝莲灯等。演员与观众也是多元化，巫、印、华兼有。

舞团在上海成功开创了歌舞团商业演出市场后，老上海的歌舞团也纷纷南来。例如魏萦波领导的梅花歌舞团就曾两次南来。这个歌舞团拥有号称“梅花五虎将”的龚秋霞、钱钟秀、张仙琳、蔡一鸣、徐灿莺，除歌舞剧《小小画家》、《情伴》双人舞外，还演出了海报上宣称的“抗敌战争爱国大猛剧”《到前线去》、日本剧作家菊宽池（田汉翻译）的《父归》等等，节目每两晚一换，票房极佳。之后来的还有银月歌舞团、万花歌舞剧团、蔷薇歌舞剧团、冷燕歌舞社等。演出节目有时代曲、滑稽话剧、滑稽歌舞剧。

观赏无声电影和听唱片，也是当时的新鲜娱乐消闲形式。1913年开始面世的唱片业，无线电台广播与录制唱片等现代技术逐渐成熟。最初几乎是戏曲的天下。到了1930年代，上海流行华语时代曲风行一时。聪明的唱片商家看到商机，开始罗致著名艺人，灌录各种剧种的唱片。上海东方百代（EMI）唱片公司、美国无线电胜利唱机联合公司、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香港艺声唱片公司、香港春秋唱片公司、德国兴登堡（Hindenburg）、高亭（Odeon）、丽声、茂发等唱片公司等先后出品了多种戏曲唱片。兴登堡唱片公司录制了由潮音老中正顺香班的花旦胶走、小生丽泉、乌衫清正合唱《梅花落叹五更》、潮音老中正顺香班的老丑如松、老生桂义、老丑乾泉合唱《青年宝鉴之弔祭》、粤剧名伶瑶仙、耀卿的《盲公问米》等。东方百代公司也为谭鑫培、汪笑侬、刘鸿声等京剧名角录制过唱片。

这些唱片在新加坡广泛传播，也是促成二战前新加坡戏曲黄金时期的因素之一。余娱儒乐社也由宝塔唱片公司录制了《牧虎关》、《芦花荡》、《三家店》、《杀四门》、《五台山》、《南关门》、《百寿图》、《青竹寺》、《五丈原》、《骂曹操》、《和北番》等剧目多达50个剧目。民众对新的娱乐形式的接受，也表现在对来自台湾的歌仔戏的热烈追捧。1932年来访的歌仔戏剧团凤凰班，以亮丽的服饰、新奇的机关布景、浅白通俗的曲词、通俗的闽南话，造成了一股歌仔戏热。之后甚至出现有些高甲戏剧团为了适应潮流而改演歌仔戏的奇迹。这和1960年代演出汉剧数十年的儒乐社因为抵挡不住中国潮剧电影的热潮而改演潮剧的情况，可说是先后呼应。

抗日救亡运动与剧运高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爆发了中国全面对日抗战。新加坡华人社会迅速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戏剧”。在舆论的声援下，各种剧团都投入了各种筹赈演出活动的洪流中。同德书报社率先联合了数十个团体，在大世界广场和七个舞台，演出京剧、粤剧、话剧、歌舞、音乐、武术节目。主办方在不同地点安排接送观众的巴士车，让2万名观众观赏这套由上千名演员义演的节目。戏曲团体如余娱儒乐社、陶融儒乐社、八和会馆、昙花镜影剧社；话剧团体如业余话剧社；有演剧经验的学校与校友会如星洲学校、崇福女校、养正校友会、工商校友会、爱同校友会、端蒙校友会、中华女校校友会，都加入了这激情高涨的筹款抗战队伍。戏剧演出是能组织大量群众的社会活动，很自然成为抗战救亡的运动的主流。最难得的是许多原本没有演剧经验的爱国份子，都义愤填膺地加入了演剧的队伍。例如建筑工人互助会、华侨书记公会、中医药联合会等等都不落人后，登上抗战剧的舞台。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更来自四面八方。除了茶叶女职工、女子理发同业、新世界粤籍舞女、星华舞女协会外，华校女教师、华文报女记者、女佣人、女店员、家庭主妇还组成了新华闺秀团。惹兰勿刹区的妇女组也组织了慈善白话歌剧团，为抗战出一份力。在话剧得到快速普及的此刻，也出现了一些即写即演的抗战剧。例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2 月 15 日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接收华英文报馆，出版华文《昭南日报》和英文《昭南新闻》（Syonan Shimbun）

如主张以用提高艺术去展开马华救亡戏剧运动的叶尼，就写过《活该》、《伤兵医院》、《串好的把戏》、《同心协力》；担任华侨筹赈会宣传组戏剧股主任王秋田，也写了《逃难到星洲》、《汪精卫叛国记》等剧。在新、马积极推动救亡戏剧的流冰也写了《开不成的欢送会》、《金门岛之夜》、《十字街头》等剧。

1937年底，杜边、赖丹、林钺夫等创立了南岛剧团。这个最早的全职话剧团职员满腔热情的去学校、社团卖花筹款，到乡下、渔村做演出宣传。除了演出《爱国心》、《他的末日》、《放下你的鞭子》、《战地泪花》、《巨魔》外，该团还根据报章新闻编演了许多活报剧。南岛剧团的另一贡献是演出载歌载舞的表演唱节目如《锄头歌》、《铁蹄下的歌女》、《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剧团广邀学生团体与青年团体加入他们呈献的晚会，演出歌咏或短剧。表演唱和活报剧这些新颖形式，显现了这批爱国青年的活跃的创作能力。这个时期，杜边的《她疯了》、《反迫害》、《二年》；铁抗的《父》；璀璨的《空袭之夜》；啸声的《救国》；莹姿的《虎口中的孩子们》，都是抗战期间常演的名剧。新加坡戏剧人在这时期表现了强烈的抗战救亡意识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1930年代末，两个从中国来访的艺术团体带来的抗战演剧活动，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1938年底武汉合唱团抵达新加坡，开始了一年四个月的新马巡演，演出《逃难到星洲》、《九一八以来》、《一二八》、《毒药》等剧。其中名曲《中国不会亡》最有鼓动士气的力量，每逢演唱，群情高涨，动人心魄。武汉合唱团1940年结束巡回之旅回中国时，其中一位优秀女团员李豪（1915-2009）选择留了下来。之后，她在新加坡组织了李豪合唱团，在许多学校教授音乐课。战后李豪留学意大利，成为出色的指挥家。在接下去50几年的教学与推广音乐活动中，为新加坡声乐界培养了许多的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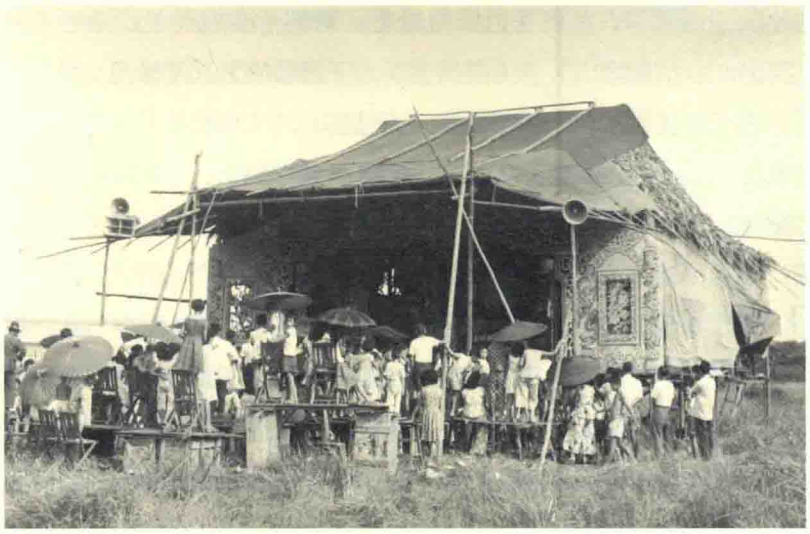
武汉合唱团之后，华侨筹赈会又主办了由著名电影与话剧演员金山、王莹和蓝马领衔的新中国剧团南来的演出活动。英国政府不准金山等十几位男演员入境，他们只好先折返越南。该团王莹等获准登陆，为募捐演出活动进行准备[9]。第二年金山等化名为赵洵得以进入新加坡，并正式成立新中国剧团。首场演出的是欧阳予倩的《塞上风云》（演出时改名为《塞上风光》）。新中国剧团演出了《反纳粹》、《八百壮士》、《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大义灭亲》、《永定河畔》、《贼》等等，两个月内以丰富的剧目与精湛的演技感动了观众。新中国剧团的演出，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演出前先由金山或王莹宣扬中国抗战英勇事迹，声情并茂的演说后，观众即席捐款；二是创作剧目《为自由和平而战》以多种方言演出，引起观众强烈共鸣；三是创新意识活跃，根据剧目内容与场地条件进行舞台与灯光设计，例如《永定河畔》演出，搭建庞大桥头形成凸字形舞台，扩大表演区，拉近与观众距离。

这个戏剧繁荣的历史时期，深化了现实主义的戏剧，凸显了戏剧的社会功能，锻炼了本地戏剧从业者编、写、演的创作力，开创了讨论严肃戏剧的风气，提升了戏剧理论水平，催生了许多戏剧团体的成立。剧人在报章发表了讨论马华戏剧运动方向的文章，戏剧团体深入民间在各式各样场地演出，把戏剧运动推上一个高潮。

一批热爱京剧的社会贤达在日军向南洋挺进的1941年6月，在发起人林庆年号召下成立了平社。成立时发出的“敌国兴戈，千古著盖世拔山之勇。同人等集成平社，原为陶情；戏衍渔龙，无非言志。盖亦欢娱不忘救国，博弈犹胜无为意也……天下兴亡，既尽匹夫之天责……”的号召。成立不久后，平社也投入戏曲团体义演筹赈抗战的队伍。

这个时期戏曲界的大事是抗日题材现代戏的迅速登场。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思想迅速传到海南岛。当地的革命先驱徐成章带头鼓吹改革内容陈旧的土戏，在1926年海口成立了琼崖土剧改良社和琼崖伶人界公会，提倡“改良旧戏文，编写新剧目”。于是，极力编写和演出宣扬新思想的时装戏。其中大力推动穿时装的文明戏的是由年轻人为骨干的琼南和华南剧团，之后合并为二南剧团，南来演出。承载着传达传统价值观的故事，以熟悉的乡音演出的琼剧，牵动了海南籍华人的乡情，除了传统剧目如《张文秀》、《林攀桂》、《卖胭脂》外，更重要的是演出了宣传新思想的现代戏。例如由热血青年翁丁君、王光洲、

[9] 王莹到访不久后，与已经在新加坡一段时间的郁达夫和王映霞密切来往。参阅王映霞1939年10月2日在《星洲日报》发表的〈再见王莹〉，页9。



街戏

莫筱琴、符美双、陈玉花等组成的南星剧团便演出过《还我河山》、《鸭绿江上》、《打卢沟桥》等宣传抗战的现代戏。华南剧团南来期间，也演出了《社会第一钟声》、《爱国运动》、《秋瑾殉国》、《鸭绿江上》、《还我河山》等充满爱国热情的戏。其中为育英中学和抗日筹款的《大义灭亲》，观众敌忾同仇，情绪高昂，无不慷慨解囊。

日军1942年2月之后占领新加坡三年半，百姓在占领者的淫威下，过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悲惨生活。但电影院被令继续放电影，京剧戏班演出如常。慑于日军淫威，有些未及逃亡的伶人与乐师，只好到大世界敷衍演出[10]。当时在新世界和大世界，也有老赛桃源、老三正顺、老玉楼春、新荣和兴等潮剧班的演出。在游艺场演出的还有粤剧班新华年班和万年青剧团，琼剧班如新琼州剧团等。其他歌舞类团体如银月歌舞团等在任何场所公开演出的娱乐节目，也需事先领到日本军政处检阅官的批准。不过，绝大多数剧团则进入冬眠时期。因为日军雷厉风行追捕抗日份子，文艺工作者大多被迫逃亡。但仍旧有抗日份子杜边等在偏远的柔南山芭开展抗日宣传戏剧演出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后，新加坡百业萧条，贫困如洗。光复不久，大量逃亡避难的人回来，人口突然增加至90万。潜入地下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在物质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逐步恢复活动。1945年9月白玉艳、筱茹珍、白叔安以大东方京班为名，在大世界重庆戏园率先登台演出京剧。之后不久这个戏班由于白玉艳等人回国而结束营业。其他琼剧艺人与汉剧导师也纷纷回中国。各种剧种的消长盛衰，与剧团的经营方式和演出阵容强弱有密切关系。

1950年代庙会活动非常热闹，商家与商会合资请戏班酬谢神明渐多，给戏班带来大量的演出机会。加上1956年以后中国戏曲电影陆续在电影院放映，促成了新加坡戏曲一个新的黄金时期[11]。当时许多受到热烈欢迎的潮剧戏班如老赛宝丰、老赛荣丰、老怡梨春、老三正顺、老玉楼春、老玉春香、老赛桃源、中赛桃源、老一枝香、中一枝香、新荣和兴等天天都演出[12]。这些在寺庙或城乡街头巷尾的空地上搭台演出的“街戏”，直至1960年代末，是

[10] 2002年10月6日潘月红在新加坡戏曲学院接受采访时称道，当时没有办法，只好敷衍演出，以免惹来杀生之祸。

[11] 蔡曙鹏，《新加坡华族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挑战与契机》，载《戏曲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年），页89–104。

[12] 新荣和兴五十年代当家花旦庄玉花口述历史记录：Chng Gek Huay, Oral History Cent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Recording date, Accession No.860, Transcription。

那个年代最受新加坡人喜爱的娱乐活动。1950年代中叶以后，新赛凤闽剧团[13]成功抢滩，也进入庙会节庆活动，演出福建戏。此后，许多闽剧团也应运而生[14]。南艺闽剧班、艺声剧团、筱凤闽剧班、梅兰闽剧班、宝凤闽剧班、快乐闽剧班、美美闽剧班、新锦凤闽剧班和原本在游艺场定期演出、拥有固定观众的群岛新麒麟闽剧团和莺燕闽剧班，构成庞大的街戏演出团队。

战后廿余年间的蓬勃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对戏曲艺术实行“改戏、改人、改制”的政策。三年后的秋季，中国文化部举办了首次全国首届戏曲观摩大会，展演了数十个剧种的百个剧目。精选了一批剧目于1954年拍成电影后在海内外发行。1956年第一部戏曲电影越剧舞台纪录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新加坡首映，取得连满三个月的记录。接下来几年陆续放映的的戏曲电影包括越剧《追鱼》、《情探》、《红楼梦》、《云中落绣鞋》、《柳毅传书》、《毛子佩闯宫》；评剧《秦香莲》、《丝线姻缘》；曲剧《陈三两》；吕剧《姐妹易嫁》；黔剧《秦娘美》；京剧《大战雁荡山》、《群英会》、《借东风》、《杨门女将》、《野猪林》；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淮剧《女审》；粤剧《搜书院》、《关汉卿》、潮剧《火烧临江楼》、《苏六娘》、《告亲夫》、《乳燕迎春》（包括《卢林会》与《刺梁骥》）、《陈三五娘》、《韩江花似锦》（包括《王茂生》和《闹开封》），和《刘明珠》等等。这些戏曲电影集中了当时中国各个剧种的顶尖人才。从剧本、作曲、导演到演员，都达到极高质量。曲词优美、唱腔动人、做工细致、节奏紧凑、剧情曲折、服装贴切。

新麒麟闽剧团前往菲律宾演出海报

此外，从这个时期至1970年代中叶，香港拍摄的潮语、粤语、厦语电影，也起了推动戏曲文化的积极作用。戏曲电影除了提供审美的愉悦外，更有文化知识传递的功能，展现历史人物的崇高品德，宣扬爱国主义、歌颂坚贞爱情，或批判权贵恶劣行径。以生旦净丑的精彩表演，讲仁爱、重情义、守诚信、崇孝道。其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作用非常深远。

对新加坡戏曲发展来说，这些电影有三方面影响。一是培养了大量不同籍贯的忠实戏曲观众；二是培养了一整代的戏曲工作者，鼓舞他们为戏曲事业而终身奋斗；三是许多业余团体和职业戏班竞相模仿戏曲电影[15]，从而提高了整个新加坡的戏曲演出水平，甚至激发了不同方言群的艺术爱好者组织社团剧团。例如从事琼剧的琼联声剧社（1957年）、新兴港琼南剧社（1957年）和推广潮剧的南华儒剧社（1964年）等剧社相继成立。

战后东南亚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十几个话剧团体在十几家华文报章的支持下，组织了许多吸引大量人潮的演出，聚集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力量。这一社会动向，引起了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关注与警觉。中国歌舞剧艺社抵达新加坡时，40几个社团与文艺团体联合举办的联欢会的场面，让当局觉得此团非比寻常。中艺从1947年4

[13] 早年的新加坡，来自中国福建省的移民闽南人的人数大大超过闽北人。因此他们把源自闽南、形成于台湾的地方戏称为福建戏。以一个省的名称冠于这一流行于厦门、漳州一带的地域性地方戏剧种。1983年，中国漳州芗剧团来新加坡演出后，也有本地剧团以仿效中国称法，称为芗剧。近年有不少剧团以歌仔戏相称。

[14] 新赛凤班主魏木发在2008年4月28日接受采访时指出，原本新赛凤闽剧团与莺燕闽剧班、新麒麟闽剧团都在游艺场售票演出。但鉴于街戏演出需求增加，福建戏班于是有了加入街戏演出的机会。

[15] 苏章凯，《“六娘热潮”：潮语片〈苏六娘〉在新加坡的跨建制互动》，载吴君玉编，《香港潮语电影寻迹》（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页86。

月开始的长达一年四个月在新马演出造成的重大影响，更令英国政府感到不安，终于在1948年12月底被下令离境。中艺累积了在泰国巡演与培育艺术人才的经验之后南下，演出歌剧、舞剧、歌舞剧、舞蹈、话剧。这个团队人才济济，创造力强，能在不同场地根据演出环境的条件做出迅速调整。例如在快乐世界体育馆演出时，把表演区放在中央，观众围绕舞台而坐。又如演出《夜之歌》时，让小丑扮演者串场，与观众互动。中艺首五场演出的是李伯钊编剧、向隅作曲的《儿女英雄》（原名《农村曲》）。接着演出《马车夫之恋》，在维多利亚纪念堂10场约满后，移师到快乐世界体育馆演出两套歌舞节目《中国人民悲欢曲》和《艺海风波》。中国文艺工作者在抗战岁月中发展起来的歌舞艺术形式新颖、群众性强、音乐通俗、节奏欢快。如河南的《王大娘补缸》、云南的《阿细跳月》、新疆的《青春舞曲》、广东的《春牛》、四川的《端公赶鬼》和秧歌剧《兄妹开荒》、由川剧改编的小舞剧《驼子回门》和歌舞剧《花轿临门》、舞剧《天快亮了》、《胜利之歌》、《祖国梦幻曲》等等，都叫观众耳目一新。

此外中艺的舞蹈编导梁伦、陈蕴仪等还创作了《印尼儿女》、《缅甸情歌》等新编节目，这些歌舞节目的精彩上演，给在新加坡刚刚起步的舞蹈艺术带来急需的养料与动力，为1950年代的新加坡舞蹈园地播下了种子。中艺团员也根据他们在南洋的生活体会，编写和演出了创作话剧与小品，包括《风雨三条石》、《风雨牛车水》、《流浪到南洋》、《海外寻夫》、《Office内外》等等，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形象鲜活。有些戏与抗战时期的活报剧一样，用华语、闽南语、潮语、粤语、客家话、马来语演出，启发后来的剧团制作演出多语言戏剧，也由此可见当时观众的多元化。

亚洲反殖民运动在1948年发生了重大变化。马来亚共产党在6月6日向殖民地政府发动武装攻击，英国政府立刻颁发紧急法令，宣布马共、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等为非法组织。社团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被疑为马共分子的剧人如海鸥剧团的杜边等被捕，并于不久后被遣送回中国、政府禁止五人以上的集会、演出需要申请准证等等新措施，大大影响了表演艺术活动。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英国政府于翌年的9月制定了阻隔新马华人与中国大陆的往来的法令[16]。1950年5月31日，警方包围华侨中学与南洋女中，逮捕了两校许多师生。詹道玉把1950年至1951年称为蛰伏潜藏的冬眠时期[17]。1951年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了《人力动员条例》后，大批华族青年奔赴中国，华校学生人心惶惶[18]。1952年9月，进一步规定新加坡居民不得前往中国大陆，否则回新加坡时会遭到扣押。1954年，中国宣布取消双重国籍政策。1956年2月8日，马来亚代表团在伦敦与英国政府达至协议，将于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新加坡于1959年大选后获得自治。这些政治形势的发展，加速了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在申请公民权运动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华人决意抛弃中国国籍而成为本地的公民。

1950年代的演艺活动有两个中心事件。一是华社为建立南洋大学掀起的筹款运动，一是反黄运动。前几年学生剧团与戏曲团体接替了在1940年代末被英殖民地政府查封的剧团的戏剧薪火。在为南大义演过程中，培养与汇聚了许多演艺人才。后来先后成立的艺术团体如中教剧团（1953年）、康乐音乐研究会（1954年）、丽的呼声华语话剧研究组（1954年）、

[16] 1950年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发回境新条例，凡是持有居留证的外侨，离境后想回新加坡，重新领取签证有效期只有三个月。

[17] 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1年），页43。

[18]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页263。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日本当局准华侨汇款回国，但指定由香港、汕头、厦门、上海四地转送

华人铜乐互助会游艺大会（1955年7月27日）

艺术剧场（1955年）、艺联剧团（1956年）和南洋大学戏剧研究会[19]（1957年）也加入这个波澜壮阔的文化建设运动。

1953年企业家陈六使提出建立华文大学的建议，立刻得到新马乃至东南亚华社的热烈支持。当时的两百多个话剧、戏曲团体几乎都投入了为南大义演的大潮流。其中以1953年全星中学筹组“一九五三年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为南大筹款演出声势最为浩大。这些热血青年在隔年5月13日强烈抗议殖民地政府征兵，发生了与警察的流血冲突。支持学生的抗争活动的工友与民众都汇成一股社会力量。在“五一三事件”后成立的“全星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一年后被指为马来亚共产党外围组织而被令解散。对学生的恐吓与压制，严重打击了学生的戏剧与舞蹈活动。

1953年圣安东尼女校一个16岁学生被奸杀十天后，从中正分校中二学生自发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声讨黄色文化，蔓延成一个轰轰烈烈的反黄运动[20]。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歌舞节目有华中戏剧会学生创作的《打黄狼》，以黄狼比喻黄色文化。演出时观众与台上演员齐呼打黄狼，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表达了对怂恿黄色文化滋长的殖民地政府的不满。《打黄狼》和不久后华中学生创作的舞剧《甘榜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剧中有金发魔鬼侵袭一个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谐相处的乡村，意喻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新马。

新加坡华族舞蹈发展在1950、1960年代的突飞猛进得力于四个有利因素。一是中国歌舞剧艺社在新加坡期间的精彩演出给舞者的启发及其开办的舞蹈课程培训了日后的编导人才；二是1950年代中国出版的许多包括了舞谱、乐谱、舞台队形记录的舞蹈教材传入新加坡。这些舞蹈除了红绸舞、荷花舞、安徽花鼓灯等汉族舞蹈外，还有中国少数民族的舞蹈如新疆舞、瑶族舞蹈、黎族舞蹈、傣族孔雀舞、朝鲜族扇舞等等。此外，还有东欧国家的民间舞蹈如乌克兰士风舞、立陶宛回旋舞、哈萨克舞蹈、匈牙利舞等等，训练了中学生组织叙别会时负责同学读谱排舞的能力。《舞蹈基本训练》和《古典舞》则为舞蹈爱好者提供了完整的基本训练的教材，为日后新加坡编导创作提供了重要学习资料[21]；三是来自中国的舞蹈电影《宝莲灯》、《蔓萝花》、《鱼美人》、《中国民间艺术》（红绸舞、采茶扑蝶、飞天）、《南方之舞》、《百凤朝阳》

[19] 南洋大学戏剧研究会成立不久后，演出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剧本，展现其国际视野，并积极鼓励本地创作。其最重要贡献是出版了理论性刊物《戏剧研究》，提升剧团学习理论的意识，树立了戏剧舞蹈评论风气，鼓励艺术创作者对自己作品，与观众关系等课题的反思与讨论。1963年该会在政府“冷藏行动”后被查封。

[20] 周维介，《中学生点燃的一把火——反黄运动一甲子》，载《怡和世纪》期23（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2014年），页42-49。

[21] 1969年4月5日采访艺术剧场《天女散花》编导黄天能与2014年11月3日采访崇福校友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编导邱崇德时，两位舞蹈家都提到这两部书与1950年代出版的舞蹈丛书，对新加坡华族舞蹈发展的重要作用。

等的启示。当时中国舞蹈老师无法南来教学，中学生团体、工会和校友会要演出这些节目，就通过反复观赏舞剧、舞蹈电影，记下所有队形与动作后，模仿电影中演员的动作与队形变化来排练。于是走雨、草笠舞、快乐的啰嗦和孔雀舞等，几乎成为舞蹈晚会必演的节目。从模仿演出中提升了表演能力；四是在反殖民主义与反黄运动的感召之下，华族舞蹈爱好者积极与马来族与印族舞蹈工作者交流。特别是印度舞蹈家巴斯卡（K. P. Bhaskar）于1958年以印度古典舞的形式，将中国广受欢迎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了舞台之后，许多华族学生都到巴斯卡舞蹈学院学习印度舞[22]。巴斯卡为华校团体排演的《撒红节舞》和《印度猎人舞》等节目也从此广为流传。1957年马来文化团体希里瓦纳（Sriwana）邀请了印尼的华族舞蹈家廖春远女士（Madam Liauw Tjien Yan）和印尼舞蹈家雅哈妮（Yohanit）前来开课，引起一阵华人学习马来舞蹈的热潮。此后，不同民族舞蹈员之间相互学习，加强了不同民族舞蹈工作者的交流与沟通，鼓舞了来自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的舞蹈家，在进行文化展演时同台献艺，并构建成一种新加坡特色的多元文化主义舞台艺术。

自治独立后的走向

1959年自治后，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执行了多元语文的政策。四大官方语文为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马来语为国语。政府发行了一套四支不同肤色的手臂相互紧握的邮票，具有象征意义。此后，还多次发行过各族舞蹈、各族乐器的邮票，对不同民族的表演艺术一视同仁。首任文化部长拉惹勒南在1960年6月24日在维多利亚剧院为英语古装戏《桂英公主》致开幕词时表示，这种以英语融合华族表演艺术的尝试应予鼓励。新加坡应该是一个世界上伟大文明汇合的地方[23]，应该打破现有的语言屏障，从而产生一种本土文化。自治不及半年，文化部长倡议筹建国家剧场。这个有浓烈国家意识象征的工程，牵动了百万百姓的爱国心。文化部发起的“一元一砖”筹款活动，获得民间的热烈支持。许多戏曲团体、话剧团体为筹建国家剧场义演，得到民众的高度支持，与之前的为南大义演和之后的为筹集国防基金义演类似。选择建在市中心福康宁山的国家剧场，给予都市空间一个新的政治想象。

1963年8月8日开幕的国家剧场，于1986年6月8日因为发现剧场的150吨无支撑钢铁盖篷结构不安全，而决定拆除。国家剧场的3420个座位，曾经拥有观赏许多海内外戏曲、音乐、舞蹈团的精彩演出的观众，从此消失。国家剧场开幕时举办了东南亚艺术节，是新加坡最早的文化外交创举。管理国家剧场的法定机构国家剧场信托局，搬迁至嘉龙剧院，继续其文化艺术推展活动，直至1991年解散为止。

人民行动党政府上台后，积极推广多元文化活动与促进文化建设，得到各族文艺团体的热烈支持。文化部主办了四种语文的剧本比赛和举办文化节，鼓励剧作家写自己的故事。华文文艺工作者十分积极提倡文艺的社会功用，自觉地发动把本地故事搬上舞台，一时出现了一个创作本地剧、上演本地剧的热潮。如《怒火在苦难中燃烧》、《潮来的时候》、《开斋节前夕》、《大选前夕》、《第二街》、《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浮沉之间》、《椰林

[22] 蔡曙鹏，《舞蹈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新加坡的经验》，载《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期04（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1年），页5。

[23]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27 June 1960.

夜歌》等等，都是这个时期涌现的作品。文化部也组织了一系列“人民联欢之夜”（Aneka Ragam Ra'ayat），在全岛巡回演出。节目包括华族、马来族、印度族舞蹈和芭蕾舞节目的“人民联欢之夜”，环岛巡回演出，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这些以卡车后厢为舞台，使用简单的声光设备走遍村镇的文娱演出，让人们强烈感受到了多民族社群和睦共处的自豪感。政府与文艺团体紧密合作，为建立多元文化社会而奋发图强。自此以往，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新加坡舞蹈共同体中最鲜明的主题之一。数十年来，不论是任何民族的民间舞蹈团体，都经常能看到不同民族同台演出的舞蹈节目。官方的国家舞蹈团、人民协会文工团、民间舞蹈团如凤凰舞蹈团、聚舞坊、豁然生舞蹈团、舞跃舞乡、新舞风舞蹈团、麟记舞蹈团等华族舞蹈团；马来舞蹈团希里瓦纳（Siriwana）、希里娃丽珊（Sri Warisan）；或印度舞蹈团阿莎拉斯艺术团（Apsaras Arts）都创作与演出过这类多民族舞蹈合演的节目。多元民族舞蹈也是教育部自1967年开始为全新中小学生举办的青年节中不可少的作品。1969年新加坡开埠1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以及1973年以来人民协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牧艺大游行，都在其大型演出的节目里强调多元民族共舞的特色。

自治初期，33间华校校友会也推动华族舞蹈活动，其中崇正校友会的《胶林风云》和《两个邻居》；星幼、晋江校友会的《胶林里的故事》；艺术剧场的《阿里和法蒂玛》都是脍炙人口、富有本地色彩的创作节目。不过，政府于1963年2月2日发动了“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扫荡左翼运动，扣留133位在野党社阵、工会、学运、社运与一些文艺团体骨干分子。这些人被捕之后，许多文艺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接下来几年，许多中学戏剧会、校友会和工会，都相继被解散。文艺演出在接下来几年很自然地急速锐减。直到1965年新加坡宣告独立之前，只剩下少数没有政治色彩的校友会、戏曲、话剧和舞蹈团体继续活跃在舞台上。这时，人民行动党中央文化局成立的戏剧股，在不同支部演出如王里等人编写的本地创作。在这个话剧与舞蹈短暂低潮时期，戏曲界却有了新的转机。电视台积极邀戏班和业余戏曲剧团拍摄戏曲片，给戏曲团体带来了新动力，扩大观众接受群体[24]。

独立后，政府意识到加强国家意识是首要任务，社会要稳定，需要人民有高度纪律。表演艺术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媒介，能有效地增强国家意识与塑造文化认同。1965年成立的人民行动党中央文化局下的戏剧股，建国初期在社区积极开展戏剧活动。国家剧场信托局也很快地承担了统筹文化活动的任务，主办各种大型演出。1966年中组织了国家剧场艺术合唱团、华乐团、舞蹈团，成立了俱乐部（设有华族、马来族、印度族舞蹈组与铜乐队及华乐团）。人民协会于1968年成立文工团（属下有华乐团、华族舞蹈团、马来舞蹈团、印度舞蹈团）。1969年，在时任副总理吴庆瑞的倡导下，一个为推广地方戏曲的露天舞台也在牛车水开幕了。这个命名为人民剧场日后成为本地粤剧演出的重镇，也是许许多多来访的粤剧、歌仔戏、潮剧、河北梆子、琼剧、高甲戏、婺剧、京剧、锡剧、梨园戏、湖南花鼓戏等剧团演出的场所。人民剧场地点适中，草根性强，接地气。经过多次改建后，成为本地各种方言剧种最受欢迎的剧场。负责管理的人民剧场基金会，历年来担任主席职务的有吴庆瑞副总理、胡赐道财政部长、李文献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部长等等。中国名伶红线女、裴艳玲、香港潮剧小生王陈楚蕙、台湾歌仔戏巨星杨丽花，都曾经以精湛演技征服了一连数周追看好戏的观众。1972年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新加坡，也到过人民剧场观赏粤剧。这个由人民协助筹集资金的公共文化设施，经过几次翻新，至今仍旧锣鼓声声，戏曲节目轮番上演。

建国后的首十几年，不同门类华族表演艺术受到了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出现了很不相同的状况。城市规划迅速压缩了戏曲演出空间，旧有的乡村发展成为新的卫星镇，庙宇搬迁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电视电影与其他娱乐形式如歌台的出现，都使演出街戏的戏班感到压力。此外，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取缔非法小贩，禁止售卖各类生活物品和美食的流动摊子小贩在戏台附近做生意，大大减低了观众看戏时顺便吃喝购物的乐趣。新出炉的噪音

[24] 以潮剧为例，从1964年至1972年，新加坡电视台拍摄了近五十部由戏班和业余潮剧团演出的潮剧。剧目包括传统戏如《三哭殿》、《四告状》、《秦香莲》、《八仙闹东海》等；移植自中国与香港戏曲电影的有《三看御妹刘金定》、《云中落绣鞋》、《王老虎抢亲》等；改编自中国潮剧电影的有《刺梁骥》、《王茂生进酒》、《辞郎洲》、《闹开封》等。

南华儒剧社于1970年10月30、31及11月1日一连三晚演出潮剧《一门三进士》，台上演员是黄月娇、陈月春、郑秋茂

管制条例，也缩短了演出时间。过去的乡村往往集中了不同籍贯的居民，如海南村、潮州村、广东村等，但在政府的种族和谐居住政策下，每个组屋区华、巫、印各种族户口需按比例分配。同一籍贯的居民集中同住一区的“方言族群村”消失后，地方戏曲演出也失去从前的地缘情谊。往日的以观戏聚乡情的社会活动也相对减弱。加上新马分家后，戏班不能自由出入联邦演戏，严重影响戏班的收入。1970年代以后在本地演出机会也少了。因为许多寺庙搬迁后成为合并在同一屋檐下的“联合宫”。在联合宫内的寺庙不再个别办庙会活动而是联合办庙会，庙会节庆活动总量自然减少了。加上城市发展规划的种种条例限制下，在空地上演出街戏的范围也缩小了。虽然这个时期新加坡电视台拍摄了一系列的本地戏班与业余剧团的舞台纪录片，方便民众在家里欣赏戏曲表演，但此时戏班式微的症状已经浮现。

新加坡教育部为鼓励中小学生参加音乐舞蹈活动，于1967年开始主办青年节。以评选方式鼓励学生学习各民族舞蹈，呈献高水平节目。当时电视台把青年节舞蹈在电视台播放出来，对舞蹈艺术的普及起了积极作用。音乐、舞蹈与戏剧作为课外活动很快得到学生喜爱，也给从事舞蹈的教师提供较稳定的收入。人民协会的文工团在各地区的民众联络所免费演出，延续了自治初期人民联欢之夜的传统，把多元民族音乐舞蹈送到千家万户门口。1970年文化部成立国家舞蹈团，由来自台湾的编舞家李淑芬担任首席编导[25]。在日本接受舞蹈教育的她，也热情投入多民族舞蹈的创作。在主题和风格上具有鲜明地方色彩。例如1969年新加坡开埠150周年纪念活动中，她为人民协会编排的《祖国颂歌》，描写新加坡从一个渔村发展成现代化海港的历史进程。在1978年和1981年，再度为凤凰舞蹈团创作类似题材的舞剧。在国家舞蹈团期间，李淑芬和同事们创作了几个同类风格的作品。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团结的节奏》、《胡姬花》、《渔民舞曲》。此外也有宗乡会馆如晋江会馆、福州会馆为了推广华族文化，组织了华族舞蹈组。联络所也开始邀请兼职教师，教导华族舞蹈。

在话剧界，建国前十年，却是大起大落的十年。最先登场的是由程茂德于1965年创立的附属于新加坡电台的儿童剧社。当时的程茂德只有29岁。这个于1962年在艺术剧场主演《梁上君子》的文艺青年，热心学习语言与戏剧，知识面非常广。设立儿童剧社的目的是为戏剧界培养一批生力军。那个年代，广播听众无数，极有影响力。首两届在报考的2000

[25] 1964年，李淑芬受琼州会馆邀请从台湾南来教导民族舞蹈，从此在新加坡定居。

人当中选出品学兼优的60名中小学生。经过严格语音训练后，程茂德开始为学员排舞台剧。1966年第一个演出《儿童话剧之夜》包括了《借雨伞》、《宿舍风波》和《儿童节前后》，日场演出戏票在演出前两个月便被抢购一空。两年后演出了由董林肯根据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著、鲁迅翻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五幕剧《表》。艺术剧场前辈林晨、白淑銮、吴敬钿、陈春裕等每晚为小演员们化妆，对这个刚成立的剧团十分关爱。1968年初程茂德成立了童声小组，由陈彩鸾、郑文光、周炯训担任钢琴伴奏，委任蔡曙鹏、华丽、郭淑女负责舞蹈组。1969年推出的《儿童文艺之夜》，六场演出的戏票，也一样在演出前就全卖光。儿童歌舞剧《兔妈妈种萝卜》和《森林里的宴会》、诗歌朗诵《公鸡和太阳》、童声小组表演唱等节目受到热烈欢迎。不久后成立男声小组、女声小组、口琴队、铜乐队、美术组、文艺组。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创意编排节目、选取曲目、训练同龄社员。这些在学校曾经不同程度参加过演艺活动的青少年如鱼得水，在极大的发挥空间里磨练技艺。

1970年，在《民报》的支持下，程茂德开辟了每周一期的《骆驼》副刊，发表社员的诗歌、散文、剧评、舞评和剧本。所有经发表的剧本都由儿童剧社录制成广播剧，给小小编剧者极大的鼓励。播出剧目如《狗王狗后狗公主》（吴雪妮）、《足球三杰》（曾足）、《到生活中去》（黄瑞福）、《最甜的东西》（蔡曙鹏）、《赌徒的结局》（蔡碧珠）、《最忠实的朋友》（傅志宽）等等。此外，程茂德也在《少年报》开办了《戏剧天地》副刊，除了发布儿童剧社社员的访问稿、社员自编剧本的介绍和报导活动消息外，也有社员观赏戏剧或舞蹈演出后的集体讨论的记录稿。1970年儿童剧社脱离电台成为注册专业团体。隔年有些成员已经成年，程茂德又注册了青年剧社。两社一体，1971年联合演出了《让青春更加美丽》、《儿童话剧大会演》（包括：《雨季来了》、《大灰狼》、《装死的这回真的死了》）。1972年推出了《春到人间》文艺晚会、《儿童话剧晚会》（《自动小火车》、《进攻弱点》、《一件有益的事》、《要为大家想得多》）。1973年推出《百燕迎春》文艺晚会、六月话剧欣赏晚会（包括：《东郭先生和狼》、《他有资格当演员了》、《婴儿杀戮》）。1974年推出《春雷》文艺晚会。1975年推出《春常在》文艺晚会。1976年推出《春耕》文艺晚会。虽然演出节目中有不少中国歌曲如《川江号子》、《姑娘生来爱唱歌》与舞蹈如藏族舞蹈《丰收舞》、彝族舞蹈《阿细跳月》，但也演出了创作剧目如舞剧《黄鹤的故事》、《巴督山的传说》、《王二小放牛郎》；舞蹈《拔草舞》、儿童歌舞剧《集体生活好》、讽刺喜剧《青年画家》等等。程茂德主张“艺术应该尽量避免同政治直接挂钩，不管是亲政府的‘主题艺术’或者有着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类型”[26]。演出剧目以儿童剧为主。这批青少年也意识到扩大观众网的迫切需求，发动了“到生活中去”，把戏票和书报拿到组屋、学校去促销。每次演出，都达到销售3万张左右的戏票。为当时所有华语剧团演出之冠军。儿童剧社和青年剧社密集的演出，为艺术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对日后的文艺界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受到儿童剧社第一个演出《儿童话剧之夜》获得大成功的鼓舞，丽的呼声的张昭英和曾鹏翔也设立了儿童话剧组。后来改名少年儿童话剧组，制作广播剧与组织舞台演出。

与儿童剧社同一年成立的，还有由澳洲归来的郭宝崑和吴丽娟夫妇合办的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1966年学院的第一个戏《考验》由艺术剧场林晨和郭宝崑联合导演。第二部戏是陈伯汉的《生命的决堤》在同一年演出。同一时期演出的多幕剧还有刘仁心写的《百年树人》和林明洲编剧的《生活的旋律》，加上王里的四幕剧《悬崖》和《巷口》等等。与1960年代本地创作的独幕剧比较，编剧技法进步了。表演艺术学院开办的戏剧班和芭蕾舞班，吸引了不少青年前往学习。在演出翻译自布莱希特名著《高加索的母亲》之后，学院艺术创作倾向有了明显的转换。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慢慢蔓延到了新加坡表演艺术圈。政府对显现出强烈左派意识形态的舞台制作，都拒绝给予演出准证。康乐音乐研究会是首个遇上问题的文艺团体。1964年该会的文艺晚会中，史可扬的《未完成的作品》和诗歌朗诵节目《黑人的枷锁》都无法通过。但康乐音乐研究会在1968年以后改而以内部演出的形式，演出更多政治色彩鲜明的节目，如描写1950年代反抗英国殖民地统治武装斗争的《送军粮》等。左翼团体次年举行的联合演出，还有歌

[26] 鹿回头，〈儿童剧社从广播走上舞台〉，载《赤道风》（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5年4月4日）。

曲《毛主席万岁》、语录剧《毛泽东文艺思想放光芒》等。1970年初，政府逮捕了“在文化活动的掩护下，号召展开武装革命运动”的10位文艺团体的负责人。

康乐音乐研究会与演出移植自京剧的话剧《红灯记》的醒华校友会被查封。表演艺术学院这时期也有两个集体创作《挣扎》和《青春的火花》在1969年和1970年遭禁演。吴丽娟编导的1969年编的《万年青》和1971年编的《老石匠的故事》也拿不到演出准证。

1972年，毕业于表演艺术学院的学生组织了南方艺术团（1976年改名为南方艺术研究会）。之后一连三年演出“生活文艺晚会”。这几台综合性晚会除短剧、诗歌朗诵外，还有舞蹈节目。其中《黄梨园丰收时》与芭蕾舞《渔歌》都是编导到生活中体验后创作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而受好评。1975年，南方艺术团根据被禁演的《青春的火花》修改的多幕剧《成长》获得上演的准证。其表演风格与主题阐述与同时期艺术剧场演出的几个集体创作剧本《第二次奔》、《蛆虫》、《阿添叔》类似，从其编导手法与表演风格可以看出文革期间风行的样板戏的蛛丝马迹。政府不能容忍这些被认为是马共地下组织成员的活动，终于在1976年5月，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了吴丽娟、郭宝崑等50名被指控者。吴丽娟不久后在电视上讲述她与马共接触的经过[27]。不少政治色彩浓烈的剧团与剧人，在这事件之后退出舞台。几个月后，传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受文革风影响的激进剧人也开始了在沉寂中反思戏剧的路向。在1976年至1978年那些业余团体比较少演出的年头，学校里的中学生戏剧活动却逐渐苏醒。许多初级学院都先后在校内举办戏剧观摩会、戏剧比赛或戏剧节。其中不少还直接得到文化部戏剧促进计划的协助。

王鼎昌出任代文化部长之后，文化部设立了文化事务组，制定了影响深远的文化政策；设立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与摄影六个咨询委员会，提出艺术发展建议；设立文化基金资助艺术活动；设立文化奖表扬优秀艺术家；出版艺术资讯快报宣传各种门类的艺术活动；举办包括四大语文源流戏剧团体的戏剧节；委托国家剧场举办多元民族的舞蹈节等等。当文化部长王鼎昌宣布文化部将在芳林公园定期举办戏曲演出消息时，戏曲界对政府在强调华语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的同时，仍旧扶持以方言演出的地方戏曲的决定，感到十分鼓舞。此后几年，文化部与旅游局合作，定期定点演出，给正在为观众减少而焦虑的戏班和业余剧社带来新的生机。华文报章也为芳林公园的演出擂鼓助阵，热闹一时。此外，文化部于1981年主办首届华乐节，大大提升了华乐的社会影响力。

新的起点

1978年是新加坡戏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新起点。文化部在商家财力的支持下，开始主办戏剧节，广邀在剧坛有所建树的四大文化源流剧团参加演出，创造了马来语、英语、淡米尔语和华语话剧戏曲剧团之间交流的平台。这个破天荒而又准备长期持续的创举，比文化部1960年代举办的几次剧本创作比赛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戏剧节在内容上的扩充和大众传播给予的支持，使它成为1980年代我国戏剧活动最重要的盛典，不同民族的剧人有了相互观摩的机会，为日后的合作铺路。戏剧节后来还扩展到户外，例如双语剧团演艺坊就曾经在植物园演出《糊涂的小花猫》和《普罗米修斯》，以及刚成立的三人剧团在国泰戏院前的大草地演出了《迷你西游记》。

[27] *Far East Economic Reviw*, 12.6.1976, pp.14–16.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8 月 15 日

日本投降，新加坡光复

9 月 12 日

日军投降仪式在市政厅举行

毫无疑问，文化部主办的戏剧节直接地催促了戏剧戏曲的新生。一些向剧坛告假的老、中、青年剧人又重现舞台，或参加别的剧团，或组织新剧团。一批对戏剧有兴趣的新人，或是因电视剧引起的兴趣，或者是从学校戏剧的经验触动爱意，或在观看舞台剧后燃起的莫名冲动，纷纷加入不同艺术风格的团体，成为一股新的动力。文化部戏剧节促成整个1980年代的戏剧繁荣有以下因素：

第一，大众传播媒介的鼎力支持。1970年代初期的戏剧演出活动非常蓬勃。不少演出都吸引了以千以万计的观众。但是那个年代，不论是事前的报导或过后的评论，都是寥若晨星。相对来说，这个时期的《南洋商报》有《音乐》、《舞蹈》的副刊；《星洲日报》有《艺术》和《新明日报》有每周一期的《台前幕后》。《海峡时报》的《双语》版，也大量报导华族表演艺术活动。各门类的表演艺术活动的宣传工作都得到报章、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热心支持。有些不但刊登了大量文字，而且还发表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剧照。

第二，剧人与观众视野开阔。文革色彩的阶级斗争的戏剧销声匿迹了。戏剧节剧目多姿多彩，有现实主义戏剧如艺术剧场的《来自凤凰镇的人》、传统粤剧如敦煌剧坊的《蝶影红梨记》、艺联剧团印尼古典戏剧风格的话剧《茉莉公主》等等。李廉凤的1979年文化部主办的剧本创作比赛得奖作品《晚来风急》，也由创艺剧团搬上戏剧节舞台。观众接触了比以往更多不同类型的剧目，能接受更多实验性的尝试，风格上歧异已经不是一种障碍。

第三，编导演员的自由流动。业余剧团锻炼出来的许多优越戏剧工作者，不像专业编导和演员那样，有合同的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播音室里、电视摄影棚里和舞台上表演。这样的跨界合作，有利于提升舞台剧水平，也给广播电视界带来一定冲击。

第四，剧团成员结构的多样化。不同社会阶层的戏剧爱好者加入了业余剧团。他们多样化的背景与经历丰富了剧团的知识库。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越来越多能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文的新加坡人，欣赏其他源流的话剧演出。他们不但能评估、了解英巫印源流的艺术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们能直接翻译与演出外族优秀作品，直接借鉴他族的新成就。开始重视戏剧书刊的公共图书馆也为表演艺术从业者提供了更多的资源。

第五，戏剧节鼓励了剧团开拓视角，关注世界当代剧坛上的发展，介绍或改编新作，扩大题材范围，丰富表现手法。

1982年，在文化部主办的艺术节倡议下，14个华语剧团（艺术剧场、艺联剧团、丽的呼声华语话剧研究组、新加坡广播局戏剧组、人民协会戏剧组、南方艺术研究会、实践艺术学院、青年剧团、生活剧社、晋江会馆戏剧团、创艺戏剧团、春雷文艺研究会、大路剧社、向阳剧社）联合演出了集体创作《小白船》。接下来还在1984年、1986年和1988年，有三次不同组合的联合演出，演出了《乌拉世界》、《羔呸店》和印尼剧作家诺尔阿里芬（Arifin Noer）的《喀拜喀拜》。这几次合作的剧团于1989年成立了新加坡华语戏剧团联合会，但运作并非顺利，1996年正式解散。

随着中国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新加坡政府也调整了对华的文化政策。自1979年开始，由国家剧场信托局与牛车水人民剧场基金会主导、主办中国艺术院团南来。最先在国家剧场亮相的是中国周恩来总理倡导建立的东方歌舞团。在国家剧场演出近20场，观众5万多。王昆带领的团队包括了中国资深民族舞蹈家崔美善、阿依吐拉、莫德格马等等。演出节目包括观众非常熟悉、在新加坡舞台上看过无数次的《孔雀舞》和《红绸舞》等节目，激起舞蹈爱好者组织一个高水平的舞蹈团的渴望。国家剧场信托局不负众望，不久后邀请香港舞蹈家郑书正南来开班。1980年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正式成立。自此，该团的《东方舞集》历经20几年，曾经拥有全国最优秀的华族舞蹈演员。1981年成立的国家剧场舞蹈学会，积极推动跨文化舞蹈活动、提升理论研究、组织学生舞蹈营、出版舞蹈文集与表演艺术杂志，并协助国家剧场主办了新加坡舞蹈节。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像戏剧节一样，有力地促进了各族舞蹈团的交流，鼓励了许多各族年轻编导呈献新作，扩大了社会对舞蹈艺术的关注。1980年代几个非常活跃的华族舞蹈团如凤凰舞蹈团、民族舞蹈团、甘榜格南联络所舞蹈团、阿裕尼舞蹈团、马林百列舞蹈团，晋江舞蹈团等共同创造了华族舞蹈的黄金时期。1984年，新加坡华族舞蹈艺术协会成立后，也多次推出“鹤舞共鸣”舞蹈晚会。在副总理王鼎昌的支持下，1988年由吴素琴与邓添福担任创团艺术总监的新加坡舞蹈剧场成立了。由吴素琴的姐姐吴素妮等

南洋女中演出富有东南亚色彩的双语诗剧《茉莉公主》（1988年）

于1958年建立的新加坡芭蕾舞学院撒下的种子，在3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新加坡舞蹈的成功起步，鼓舞了其他舞者大胆创团。六年后现代舞编导梁佩贤和视觉艺术家詹德拉斯加兰（Chandrasekaran）创立了化生艺术团，尝试开拓一条多元艺术的新道路。

1979年底，国家剧场信托局邀请以姚璇秋为首的广东潮剧院带领潮剧精英南来，在未宣布剧目的情况下，3万张戏票也被抢购一空。观众层面广而热烈，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看过了姚璇秋、张长城、林舜卿、黄瑞英、萧南英等主演的多部潮剧电影，另一方面观众也渴望了解经历过文革浩劫后的潮剧的恢复情况与发展现状。此后国家剧场和人民剧场，以及少数允许主办中国戏曲、音乐或舞蹈院团演出的机构如中侨百货有限公司，主办了广东省、福建省，以及京剧名团南来演出。中国戏曲界的领军人物如红线女、裴艳玲、王文娟、方荣翔、郑兰香、胡奇明和中青年演员如李静文、丁凡、陈学希、郑秀琴、茅威涛、吴多冬等都先后带来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彩剧目，把1980年代的新加坡戏曲从低谷带上了另一个高峰。

最难能可贵的是主办当局安排来演出的院团举办交流会，让主创人员与主要演员与限量的本地剧团团员见面，谈艺术创作与做唱念示范。交流会时间虽短却让本地的戏曲爱好者有了极为强烈的提升自身水平的渴望。当时中国与新加坡没有外交关系，戏曲爱好者无法前往中国的艺术院校进修。直到1989年政府放宽条例，业余剧团才能邀请中国戏曲教授南来教课。在余娱儒乐社教导潮剧基本功的汕头戏曲学校资深教师林蕴育，通过三个月的密集高质量培训，让演员演技有了飞跃性的提升。1992年余娱儒乐社参加社会发展部举办的传统戏曲节，呈献了《蝴蝶梦》，演员规范的关目以及投入的表演，让观众赞赏不绝。其他潮汕名导演和演员如林鸿飞、吴殿祥、黄瑞英、方展荣等，也曾到陶融儒乐社、南华儒剧社、潮剧联谊社排戏。此后，不同剧种的业余剧团也纷纷向政府申请准证，聘请教师、导演、音乐员到社团培训、排戏或为演出伴奏。近年则有不少京剧、粤剧、琼剧、越剧团体与个人，邀请名伶同台演戏。这些活动，对本地艺术的提升，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贡献。

在吴作栋1990年任总理后，国家文化政策有所调整。主管文化事务的社会发展部把棒子交给新成立的新闻与艺术部。政府在1991年成立国家艺术理事会，解散国家剧场信托局，外交家许通美出任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一职。赋予国家艺术理事会的任务包括：推动艺术创作的内容创新及传播；促进新加坡艺术的国际化及提高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培养艺术人才与开发艺术潜能；开发艺术及信息产业的资源；促进艺术深入民间，鼓动社区参与；推动儿童和

相关人物

林谋盛

历史事件

新加坡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林谋盛烈士葬于麦里芝蓄水池公园内，并立纪念塔于康乐通道

青少年的积极性；促使新加坡各界意识到艺术的重要性。

成立于1955年的艺术剧场，自1986年由许崇正接任后，在继承剧场演出现实主义话剧的基础上，开发儿童剧创作与演出。1990年代初，邀请多位中国中央戏剧学院、贵州话剧院资深教授开课。1995年，在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下，积极推广校园戏剧，在初级学院、中学和小学开设戏剧课。每年举办全国的戏剧营和文化营，并从中国、台湾、香港请来了专家学者授课与交流，为普及推广戏剧艺术，培养戏剧人才，以及普及戏剧做出积极贡献。1998年起，艺术剧场与《联合早报》联办每年一届的“全国院校戏剧小品”比赛，得到学校师生的热烈响应，佳作涌现。2007年第10届“全国院校戏剧小品”比赛被列入教育部的青年节活动项目之一，成为一个中学生期盼的戏剧活动。此外，艺术剧场也曾连续几年，举办“亚洲中学戏剧小品观摩会”，邀请了来自香港、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的学府参加，得到多间中学的支持。

在国家艺术理事会鼓励艺术进校园的政策下，一些戏曲团体如湘灵音乐社、敦煌剧坊、平社等旋即聘请中国专业戏曲教师培训演员，并开始到中、小学给学生做示范演出。潮剧联谊社、南华儒剧社、陶融儒乐社、东安会馆、冈州会馆、海南协会、新兴港琼南剧社等邀请教师前来排戏或短期教学。这些专业人才的到来，有效地提高了戏曲团体的技术水平。此外，戏曲团体在国家艺术理事会与同年成立的国际基金会的大力协助下，新加坡戏曲多次在国际舞台上呈献[28]。

为了进一步推动戏曲的发展，国家艺术理事会倡议建立专门机构，推广戏曲活动与提升戏曲水平。1995年6月，新加坡戏曲学院正式成立。成立以后，戏曲学院积极推展校园戏曲活动，通过特别制作的短小精悍的教育节目，努力引导青少年欣赏与认识地方戏曲外，还培训中小学生表演戏曲的技能，以剧目带动他们，并在剧院呈献“童话故事晚会”与“青年剧展”。这也是发展有新加坡特色的创作剧目的一部分工作。戏曲学院定期主办戏曲专题讲座、先后主办了“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创新”（1997年）、“传统戏剧教育”（1998年）、“台湾与新加坡歌仔戏”（1998年）、“戏曲导演艺术”（1999年）、“歌仔戏的现代风采”（2000年）、“亚洲传统戏剧”（2007年）、“戏曲的变革与创新”（2008年）、“潮剧的传承与发展”（2009年）、“粤剧：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亚洲豫剧的当代风采”（2000年）学术研讨会。戏曲学院出版的丛书包括：蔡曙鹏的《华族戏曲的变革与创新》、蔡碧霞的《狮城潮剧情》、王芳的《京剧在新加坡》、黄秀琴的《新加坡南音初探》、《中华戏曲》、《潮剧保护、发展与传播》和《新加坡粤剧的发展》。

新加坡戏曲学院成立以来，也创作了许多富有创意的剧目，作为戏曲教育剧目在高等学府、数百所中小学演出。这些剧目包括《林谋盛》、《红山的故事》、《夜莺》、《老鼠嫁女》，及跨文化实验演出如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搬上戏曲舞台。此外还改编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莫里哀的《屈打成医》、布莱希特的《灰阑记》。戏曲学院也为戏曲团体搭桥，参加国际艺术交流活动。学院师生多次受邀参加在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孟加拉、伊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台湾、土耳其、德国、比利时、英国、丹麦、挪威、拉脱维亚、奥地利、斯洛伐克、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摩纳哥、芬兰、美国、加拿大等28国与地区演出，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在本地戏曲学院也得到国家艺术理事会及民间基金会如李氏基金、丰隆基金及艺术基金的支持，组织许多剧团在芳林公园演出了《薪传戏曲汇演》系列。

另一个积极促进国际交流的是在1981年成立的敦煌剧坊，由1970年代活跃于冈州会馆的胡桂馨、黄仕英等人发起创办，成为当时粤剧活动的最重要推手。在促进中新戏曲交流、推广粤剧、提高演出质量、吸引人才与观众等多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84年，敦煌剧坊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社会发展部的“把艺术带给民众”的计划。把配有中英文字幕的粤剧带到新加坡许多民众联络所去。除推广粤剧外，敦煌剧坊也主办中国优秀剧目展演。许多名家如涂玲慧等，都曾经受邀来参加戏曲汇演。新加坡观众未曾观赏过的戆剧、婺剧的优秀剧目，也都先后受敦煌剧坊的邀请南来，提升了观众的欣赏水平。敦煌剧坊把黄仕英改编的经典剧目或新编的戏，介绍给外国观众，促进文化交流。除在中国演出外，敦煌剧坊在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资助下，到过23个国家与地区演

[28] 朱恒夫，〈论新加坡传承、发展戏曲的经验〉，载《文化遗产》期2（广州：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14年）。

出，为传播新加坡戏曲做出贡献。2000年还将《白蛇传》的片段，编写为英语折子戏粤剧。两年后，黄仕英再接再厉，编写了长篇英语粤剧《清宫遗恨》。值得一提的是《白蛇传》还有马来语版。在多元民族的新加坡社会，粤剧团体能尝试以他族语言演出传统戏，也为促进民族和谐作出了贡献。

进入21世纪

新加坡戏曲在21世纪能维持相当数量的观众，与有近百年历史的韭菜芭城隍庙有密切的关系。自1990年起，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清溪显佑伯主诞辰时，韭菜芭城隍庙都会广邀福建戏班与潮剧班演出。戏金由谢神的信众报效，入场免费。这个庙会活动继社会发展部主办了几年便偃旗息鼓的“传统戏剧节”后，为地方戏曲燃起了新的生命火花。演出周期从初期的几十天发展成韭菜芭城隍庙百日大戏汇演，成为振兴新加坡戏班的重要演出场地。韭菜芭城隍庙每年也邀请来自海峡两岸的剧团参加庙会。票价大众化，往往能吸引大量观众。另一间百年老庙凤山宫，自2010年起，也邀请中国潮剧团在九皇爷诞辰期间连演数周，对推广潮剧起了作用。2015年起，包公庙也办了为期两周的庙会，观众反应同样热烈。

进入21世纪以后的第一年，政府发表了《文艺复兴城市报告书》，提出把新加坡打造成环球艺术大都会。城市的发展水平、发展质量、综合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与城市的文化艺术发展密切相关。报告书清楚表明政府发展一个充满活力和能持续发展的创意群体，以推动新加坡的创意经济的决心。第一步就是需要提升团队的艺术质量，协助艺术团体走向专业化道路。因此，政府加强了对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艺术学院的管理与辅助，并颁发奖学金给青年人到世界各地著名艺术院校进修。2005年与2008年，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报告书陆续发表，重点在于发展创意产业。毕竟竞争环球大都会的地位取决于创意产业的建立与文化消费的上升。在文化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环境下，华族艺术团队需要迅速启动新的运作方式。2008年政府建立了新加坡艺术学校，是新加坡第一所培训13至16岁青少年的专业艺术学校。

新加坡华乐团是最先取得改造传统文化产业、活跃文化业态的成功例子。湘灵音乐社在挖掘文化资源、包装艺术产品、开展文化宣传教育活动方面，也取得亮丽成绩。实践剧场在资源相对充足的条件下，开展多种形式活动，推展话剧与音乐剧，培养了数量不少的支持者。此外其“华文小剧场节”，也开拓了戏剧新天地。敦煌剧坊与中国粤剧团稳健合作，制作英文字幕演出、举办粤剧节，不断吸引新的观众群。南华儒剧社整合资源，转型为有限公司，开展密集训练课程，安排频密演出机会，提高团队整体素质。新生代话剧团如吴文德创立的Toy Factory，创作理念新颖，作品有前瞻意识，多次在国际舞台亮相都载誉而归。郭庆亮的戏剧盒积极透过论坛剧场与观众进行对话，讨论种族互信、家庭暴力和华语教育等本地议题。有近60年历史的艺联剧团、坚持演出创作剧目的海燕等人、以翻译与改编世界名著的九年剧场、和双语剧团十指帮，各有艺术追求，为华语剧坛增添不同景色。

戏剧、戏曲、音乐或舞蹈的演出动机与运作模式，与殖民地时期或建国初期，有极大的不同。演出活动不再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人们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热情参与，根据自己的审美选择买票。另一方面，随着文化产品生产成本的大幅度提高，专业团体要开展大型演出活动或制作剧目，需要严格评估演出成本与风险。演出者商业运作的考量影响艺术决定的可能性极大。其是否会逐渐娱乐化与时尚化有待观察。各剧团自己的风格定位逐渐明朗，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通过《新加坡立法议院选举法令》

教育咨询会议通过《十年教育计划》

以建立自己特色来维持稳定拥有的观众群，风格的多元化使艺坛更为绚丽多彩。例如1990年代成立的几个舞团，如梁笑英创立的麟记舞蹈团（1992年），严众莲领导的聚舞坊（1993年）和陈君明创办的O'剧场当代舞蹈团（1999年），都根据自己的特长开班授课、开展艺术教育活动或通过作品赢得观众。近年出现的舞蹈团则有几个由师生组成的团队如黄捷宽、苏建龙带领的豁然生舞蹈团（2001年）、由前晋江会馆舞蹈团指导颜明理和她的学生陈德惠等组成的舞跃舞乡（2008年）。福建会馆舞蹈团的林美琴和梁杰妮将舞团专业化后改名的福建会馆舞蹈剧场（2014年），也以鲜明的艺术特色立足于舞坛。可以说每个阶段都有新舞者组团。2008年，来自马来西亚的郭瑞文，建立了舞人舞团，希望能创作出“反映当代人的精神和生活面貌”的作品。2015年由陈国汇创立的段艺术空间，以来自新、马、中三国的青年演员为班底，尝试“结合多元艺术，向世界推广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

新加坡人口统计局2015发表的数字显示，新加坡总人口547万中，新加坡公民为334万，永久居民为53万有，华人则占新加坡人口74.2%。其中非常住人口高达百万左右。在一个多元文化族群人口密集的空间，华族的传统与现代表演艺术如何在其表述中表达对国家与社会的情感，发挥其反思功能、娱乐功能、文化传承功能和社会教育功能，将深受考验。音乐舞蹈或戏剧戏曲在商业化现实下，表演创作群与观众关系，深受审美品位个性化、娱乐个人化趋向的影响。因而从事非商业性演出活动的会馆社团、业余剧团、社区舞

新加坡戏曲学院创作现代黄梅戏《林谋盛》（1998年首演）

团剧团，在传承华族艺术与促进族群文化认同两方面，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以来，为数不少的受过专业训练的新移民艺术人才，在不同领域积极参与新加坡的表演艺术事业建设，例如戏曲界的新明星粤剧中心（1990年）的凌东明、现任湘灵音乐社艺术指导的林少凌（1995年）、南洋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俞维洁（2000年）、新加坡华乐团指挥叶聪（2002年）、新舞风（2006年）创办人于树淮等等。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与艺术背景的艺术家，与本地土生土长的、深具文化使命感的艺术团队，在全球一体化的今日，如何避免族群文化断层、艺术传统被边缘化，将是巨大的挑战。表演艺术工作者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族群艺术的传播，和多元文化身份认同的传承，以及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等方面，任重而道远。

第三节 影视百年
——华语电影与电视剧的发展

摘要

新加坡电影的滥觞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马来影片。二战反殖运动及新加坡独立建国推动了本地制作的华语影视业的发展。本节除了介绍新加坡影视业，包括华语的电影与电视剧超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外，也介绍当时放映电影的院线及参与影视制作的主要人物。

Abstract

Singapore's movie indust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alay film production in the 1930s.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and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led to the growth of the local Chinese-language film and TV serial industry. This section explores its over half a century's history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Chinese-language film and TV serial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cinema operators.

叶舒瑜 (Yap Soo Ei)

电影与电视是新加坡华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新加坡电影诞生于1965年抑或更早，却是个值得商榷的议题。本节除了介绍新加坡超过半世纪的电影与电视剧的发展外，也介绍投身电影与电视剧制作的主要人物，并附上本地电影院线的分布与统计资料。

一般人不免会以1965年新加坡独立的那一年开始追溯“新加坡电影”的诞生，而新加坡电影的定义，普遍上可以简单地将“本地制作，由本地人员参与”的影片，归类为新加坡电影。

然而许多学者的研究著作中皆认为，新加坡电影的起源早于1965年。当时二战结束后的新加坡通过争取自治以及成为马来亚的一份子，欲脱离英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故而催生了“马来亚化华语电影”（简称“马化电影”）运动，是为新加坡电影历史上的重要转捩点。而新加坡电影的滥觞其实也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马来影片，其衰弱则与本地电视的崛起息息相关[1]。

本节将首先梳理新加坡电影发展的历史，再从国民电影——国族电影——国家电影的身份转型，以及2003年前后，新加坡电影如何因为“媒体21发展蓝图”（Media 21 Blueprint）的出现而“回归”国民电影的类型，阐述超过半个世纪的新加坡电影的特点，然后介绍新加坡华语电视剧的发展、普及与重要里程碑。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华语电影的本质非常多元，在电影素材、风格、技术等方面亦继承了多元的影响。本节如果一开始就只单一讨论本地的华语电影而省略本地马来电影的历史发展是有欠全面的。另外，因为电影制作之工业相当复杂，往往也需要巨额的资金投注方可生产。在二战后及建国初期尚缺乏健全国营体制的支持下，我们不应将新加坡华语电影的定义局限为必须由新加坡人所投资拍摄的电影。本节也包含所谓“另类新加坡电影”的讨论，这一批为数不少的“另类”电影因刻意追求或收录本地特有的风景、人物或事件等，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反思何谓“严格意义”上的新加坡华语电影。

最后，本节采用“国民电影”、“国族电影”和“国家电影”这三组概念，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经济/市场与官方/政治力量之间的拉锯。例如“国民电影”的特色是由民间或私人出资拍摄的影片，其目的首先是为了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与电影票房，因此往往着眼于商业考量，而不愿意直接服务于当地执政者的政治诉求。反之，“国族电影”则将最大经济效益排除在外，不仅主动呼应官方论调，力求服务于相对狭隘的本地市场，亦反映出凝聚当地民众的企图心。“国家电影”则介于二者之间，既在取材方面以通俗性为主要考量，也在很大程度上积极引导本地观众、回应执政者所关注的国家、文化与身份认同等课题。

早期新加坡电影的发展

新加坡电影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02年第一场露天电影的放映，后来在1904年，巴黎戏院（Paris Cinema）也开始放映电影，经营者为保罗·皮卡（Paul Picard）[2]。早期旅居新加坡的日本人也从事电影放映的行业，例如孙中山最得力的日本支持者之一梅屋庄吉（Umeya Shokichi），便曾于1904年至1905年来到新加坡，在美芝路（Beach Road）开设放映室（戏院），放映日俄战争纪录片。梅屋庄吉的友人播磨胜太郎（Harima Katsutaro），除了经营旅馆，也在位于桥北路（North Bridge Road）所开设的夏里吗戏院（Harima Cinema）里，放映梅屋庄吉的制片公司所拍摄的纪录片《伟大的中国革命》[3]。电影放映的年份应该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这一时期出现的电影院可谓屈指可数，有些仅维持两年，例如1906年的法国戏院（French Cinema）。而1907年设立的娱乐戏院（Alhambra Theatre）和1910年代设立的曼舞罗

[1] "A bleak future for cinemas when TV comes – producer"，参阅网上资料http://newspapers.nl.sg/Digitised/Article.aspx?articleid=freepress19610811-1.2.55（原文载《新加坡自由西报》（1961年8月11日），页4）。

[2] 根据电影学者拉菲·米勒（Raphael Millet）的研究，保罗·皮卡放映的影片乃由立威赫曼诺（Levy Hermanos）兄弟所引进。参阅Raphael Millet, *Singapore Cinema*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6), pp.16–17。

[3] 1912年1月22日，《海峡时报》上曾刊登《伟大的中国革命》纪录片在夏里吗戏院上映的广告。

邵氏机构的电影广告车

戏院（Malborough Theatre）则一直维持到二战之后[4]。

1920年代的新加坡才逐渐出现更多戏院，但它们所播映的绝大多数都是由美国进口的影片。1925年，邵仁枚从上海来新加坡，并携带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摄制的三部影片[5]，希望能在本地的戏院播映，却多方受阻。后来邵仁枚终于成功向一位宁波籍的孔姓商人租了位于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的华英戏院放映电影[6]，而这些影片也深受本地华侨的欢迎。后来，邵逸夫也来到新加坡，兄弟两人在当地设立了新的影片公司，名为”海星影片公司”[7]。考虑到当时东南亚一带的海外华侨因久离祖国而思念家乡，对国产影片的需求意味着本地将会是个庞大的市场。邵仁枚遂陆续收购新加坡、马来亚、印尼、泰国、安南等上百家电影院，专门放映影片[8]。余慕云在《香港电影史话·第二卷：三十年代（1930年-1939年）》中也记载，邵氏的天一影片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1933年他们投资摄制的《白金龙》为公司赚了大钱，也证明了在南洋一带最受欢迎的电影不是国语片而是粤语片，所以，邵仁枚亲自到香港开办“天一港厂”（1936年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9]），专门拍摄粤语片，以供应南洋市场的需求。邵氏也在1937年在惹兰安拔士（Jalan Ampas）设立马来制片厂，拍摄马来电影，以积极争取非华族观众的电影市场。邵氏也在旗下的院线放

[4] 娱乐戏院和曼舞罗皆于1969年8月25日停业，参阅王振春，《石叻战前老戏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11年），页123。

[5] 郑燿霆指出，邵仁枚设立的海星影片公司所出版的宣传刊物《海星》，所刊登的电影广告注明是“天一青年影片公司”，而不是“天一影片公司”。但笔者依然采用目前学界普遍使用的“天一影片公司”。参阅郑燿霆，〈从新加坡电影的发展谈当地电影的困境〉，取自新加坡文献馆网站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03；以及廖金凤等编著，《邵氏影视帝国：文化中国的想像》（台北：麦田，2003年），页11。

[6] 邵氏兄弟后来得到槟城富商王竟成的协助，不仅成功租下新加坡的“华英戏院”，也租下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和马六甲的“一景团影戏院”，作为邵氏最早的院线和发行网络。参阅《邵氏影视帝国：文化中国的想像》，页47-53。亦可参考伍宏，《影视大亨邵逸夫》（中国：团结出版社，2008年）和戴光中，《浙江籍港台巨商》（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7] 邵氏兄弟来新加坡设立院线播映影片之前，本地也有两大影片公司，即王宣化设立的南洋影片公司和黄敬一的南海影片公司。参阅《邵氏影视帝国：文化中国的想像》，页48-49。

[8] 1941年元旦的《星洲日报》广告显示，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当时“已经拥有139间戏院”。

[9] 《影视大亨邵逸夫》，页33。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6月20日

马来亚联合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几天后，新加坡也实施紧急法令

映印尼影片以及好莱坞的西片。二战前邵氏兄弟的经营模式可谓采取了“全方位的攻略”[10]。

有趣的是，二战前在本地上映的电影大部分都是从外国进口的，而不少学者往往会将第一部“新加坡电影”定义为1933年印度导演拉詹斯（B. S. Rajhans）所执导的《莱拉和马吉努》（Leila Majnun）。笔者认为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一）《疯狂的莱拉》由外地摄制人员执导，在本地取景，并邀请本地知名的马来“邦沙旺”（Bangsawan）传统戏剧演员参与演出；（二）采纳与《疯狂的莱拉》类似的故事桥段，以及邀请本地马来传统戏剧演员演出的拍片模式，渐渐成为二战后（也是二战前）的常态，由此可见此片对新加坡电影风格与制作的深刻影响。

然而，1926年刘贝锦监制、郭超文指导的《新客》在取材和吸纳“本地（南洋）人才”等方面所投入的力度，也应该被考虑在“新加坡电影”的范畴内。不同于印度导演拉詹斯，刘贝锦1902年于柔佛麻坡出生，可谓本地首位电影制作人。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投身南侨机工的队伍，还被委任为南侨先锋大队的队长。在《新国民日报》上，刘贝锦的自述中也提到“影片是开通民智的利器，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因为在中国的时候，晓得祖国的同胞，不明白这里的情形，所以想稍微尽一些义务”[11]。刘贝锦的这段话点出了他希望通过电影展示南洋（新加坡）的意图。另外，《新客》亦积极招募并培训本地演员，还在加东开设电影学校[12]。影片的编剧之一陈学溥曾撰文讨论此片，除了支持制作“纯粹南洋化影片”的主张，也突出电影里的南洋本土性。显然地，《新客》是新加坡电影的“先锋创作”。

吊诡的是，电影导演郭超文最后还是将《新客》剧本里面有关南洋风俗的部分删除，其采取的姿态与视角也接近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文艺价值标准，批评“（南洋此地有着）不良的风俗和社会的黑暗”[13]，否定了南洋本位的意义。此片上映时受到英殖民地政府的审查压力，上映后票房欠佳，甚至没有上映完整的影片。后来刘贝锦也因为缺乏资金而不再开拍其他的影片，《新客》无疑成了沧海遗珠。这或许也是为何电影学者Jan Uhde和Yvonne Ng Uhde会对《新客》提出“没有留下任何永久的电影制作遗产给新加坡”的评价[14]。

反之，《疯狂的莱拉》在票房上取得不俗的成绩，亦让邵氏兄弟看到马来影片市场里的商机，并于1937年投入资金拍摄马来影片。邵氏兄弟也在新加坡与马来亚一带建起多家电影院，并同时买下了新世界游艺场、大世界游艺场、快乐世界游艺场等，大力开发其娱乐事业版图[15]。马来亚富商陆佑的妻子林淑佳（陆运涛的母亲），则在1936年创办了吉隆坡首家联线戏院——光艺戏院，1939年在新加坡正式开幕第一间冷气戏院——国泰戏院，大有与邵氏分庭抗礼的野心。1940年，陆运涛学成归国，准备接管家族

首都戏院是当年新加坡著名的大戏院

[10] 傅无闷等编辑，《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1939年-），第一编，章16。

[11]《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6年11月26日。

[12] 1926年9月22日《曼舞罗》（第2版），作者“荷兰水瓶”的投稿。可参阅许维贤，《〈新客〉：从“华语语系”论新马生产的首部电影》，页10-11，收入在2013年《清华中文学报》期9。

[13]《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6年11月26日。

[14] Jan Uhde and Yvonne Ng Uhde, *Latent Images : Film in Singapore* (Singapore: Ridge Books, 2010), p.19. 亦可参考许维贤，《〈新客〉：从“华语语系”论新马生产的首部电影》，页22。

[15]《影视大亨邵逸夫》，页22。

邵氏制作的本地电影《新加坡之歌》

生意，但是，随着二战日军的炮火逐渐逼近新马，陆运涛的电影事业还得在1945年之后，才真正崭露头角[16]。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刚上轨道的本地电影业受到严重的打击。当时新加坡和马来亚只允许播映日本制作的影片，其目的主要是为日本官方进行政治宣传。日军也要求华人捐赠五千万奉纳金，交奉纳金的地点便是在大华戏院（日治时期改名大和剧场）[17]。当时，邵氏所有的戏院皆被充公，国泰戏院则被改名大东亚剧场，是日军设立广播电台的地方[18]。1920年代建成的东方戏院、光华戏院、首都戏院等也纷纷被改名，早期的曼舞罗戏院和娱乐戏院也被改名为“潮剧场”和“昭和剧场”[19]。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英国联军统帅蒙巴登在国泰大厦设立联军总部，一年后，才将国泰大厦归还陆运涛，并重新放映电影。

二战期间，也有一些独立制片人计划在本地拍摄影片，所拍摄影片包括由新加坡富商黄奕欢出资拍摄的《马来亚之光》。此片聘请徐焦明[20]和刘曼为担任摄影师和编导，并从马六甲开始，逐一记录抗日军队在新马各地的生活状况、与日军对抗的细节以及胜利游行的盛况等。新加坡剧坛先驱者之一，也是著名的新马剧作家的朱绪曾参与此片的制作。日军投降后，新加坡的电影工业开始复苏，由当地富商集资成立的中华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本地战后第一部华语电影《华侨血泪》[21]，以及后来的《海外征魂》。

二战结束后的新加坡电影

二战结束后，邵氏重整旗鼓，聘请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导演吴村，负责拍摄国语电影《新加坡之歌》。影片描述了抗日军队在

[16] 黄爱玲编辑，《国泰故事》（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9年），页34。

[17]《石叻战前老戏院》，页83。

[18] 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源库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532_2004-12-17.html。

[19]《石叻战前老戏院》，页123。

[20] 徐焦明曾经创组“群岛影业公司”，该公司为本地电影业界培养了不少的马来导演。参阅《南洋文摘》卷10期12，页840。

[21] 这是一部黑白片，内容主要描述日治期间，本地华人所遭受的磨难。影片中所有角色都由本地职业艺人扮演。参阅郑耀霆，〈从新加坡电影的发展谈当地电影的困境〉，参阅新加坡文献馆网站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03。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0 月 8 日

马来亚大学成立，由莱佛士学院和爱德华七世医科学校合并而成

二战期间与日军作战的情形，其中也穿插了三位女性在战前、沦陷和战后生活的转变，该电影里的角色主要由本地演员担任[22]。邵氏在《新加坡之歌》之后，也开拍另外两部影片——《第二故乡》和《度日如年》，但这几部电影的票房只属一般。

1947年，邵氏重新启动位于惹兰安拔士的马来制片厂，并成立新公司——马来电影制片厂（Malay Films Productions），全面投入马来片的拍摄。制片厂在1947年至1952年之间，迅速制作了37部马来故事片。另一方面，陆运涛在1953年与本地富商何亚禄成立国泰克里斯制片厂（Cathay-Keris），加入拍摄马来影片的行列，以供应国泰旗下的院线。其实在这一年及前年间，何亚禄也率先完成了两部本地彩色马来片《太平洋战士》（Perwira Lautan Teduh）和《真假王子》（Buloh Perindu）。1958年，何亚禄为国泰克里斯制片厂完成的影片《婆罗洲处女》（Chinta Gadis Rimba），采用彩色电影技术，在当时可谓开创了先河。何亚禄为国泰成功打造马来女鬼（Pontianak）恐怖影片系列，在他与国泰另一位印度导演劳尔（B. N. Rao）的积极推动下，这批马来女鬼题材的国泰影片皆赢得观众的喜爱。

当然，邵氏也不落人后，他们旗下的菲律宾导演孟艾斯特拉（Ramon Estella），亦为公司推出类似影片。南利（P. Ramlee）也自导自演，为邵氏拍摄多部经典喜剧影片。不巧的是，原本是邵氏旗下的导演克利斯南（L. Krishnan），在1952年从邵氏跳槽国泰制片厂之后，再次成功为国泰塑造经典的油鬼仔（Orang Minyak）恐怖片系列。至此，邵氏的马来电影制片厂与陆运涛的国泰克里斯制片厂可谓棋逢对手，旗鼓相当。

1951年，陆运涛也没有忽略国语片市场，除了国泰克里斯制片厂，亦在本地成立国际电影发行公司。他聘请欧德尔（Albert Odell）执掌在香港的子公司国际影片发行公司，并由朱旭华协助打理，负责在香港购买影片以便在新马放映。1956年，陆运涛接手上海商人李祖永在香港成立的永华公司，将之与其子公司（即国际影

电影宣传单

片发行公司）合并，改组为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电懋的总经理由钟启文担任，并效仿美国荷里活片场制，投入拍摄电影的工作，以应付各地院线的固定需求。电懋设立宣传、发行、制片、演员培训班等，其机制趋向企业化、专业化的经营模式而稳健成长，逐渐对邵氏构成一定的威胁。

眼看电懋涉足香港，邵氏也迅速仿效荷里活，并在香港沿用大片场制，积极开拍大量华语片以满足市场需求，力求与电懋一较高下。邵氏影城在其高峰期时甚至有15座片场之多，设立南国训练班，同时包办宣传、发行、制作等环节。邵氏和电懋之间的激烈竞争可以从两家公司抢拍《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武则天》、《杨贵妃》、《七仙女》、《啼笑姻缘》等“双胞电影”看出端倪，结果据欧德尔的回忆，电懋只管制作好影片，但陆运涛当时的亏损就高达2500万坡币[23]。

1950-1960年代，在邵逸夫和陆运涛双方激烈竞争的情况下，直接推动了香港电影工业的发展与成熟；新加坡电影工业亦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造就了许多学者所提出的新加坡（马来）电影的黄金时期。值得注意的是，1959年之前，在本地的马来电影大多由印度导演执导，诸如拉詹斯、拉曼纳丹（S. Ramanathan）、巴斯克（K. M. Basker），马纯岱（Phani Majumdar）等邵氏旗下的导演，就为本地传

[22]《娱乐》期60，1946年7月13日。

[23]《国泰故事》，页37。

统的马来影片注入不少新的元素。邵氏曾聘请华人导演侯曜和尹海灵拍摄马来影片[24]，其中包括《渔人得利》（Mutiara）（1940年）、《多妻恨史》（Bermadu）（1940年）、《蒙面壮士》（Toping Saitan）（1941年）等。拉詹斯为邵氏完成的几部电影则捧出多位著名的马来明星如南利、鲁迈诺亚（S. Roomai Noor）、山姆苏丁（S. Shamuddin）等。其中，南利除了对邵氏忠心耿耿，也在1955年执导第一部电影《三轮车夫之恋》（Penarek Becha），为邵氏取得不俗的票房。后来，南利自导自演许多影片，为邵氏开创了“王老五形象”（Bujang Lapok）的马来喜剧系列。其精湛的演技也为他于1963年赢得亚洲最杰出演员的头衔，而马来西亚更在1986年设立纪念馆，表扬南利对当地电影娱乐事业所做出的贡献[25]。

1955年，南利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三轮车夫之恋》（Penarek Becha），为邵氏取得不俗的票房。这是该电影海报（国家博物馆提供，邵氏特许复制）

来自印尼的女演员玛丽亚蒙娜多（Maria Menado），则是在这一时期，少数能够出产自己的电影的女明星[26]。相较同一时期的国语（华语）电影皆为女性明星的世界，凭演出马来女鬼而一炮而红的玛丽亚蒙娜多，在明星魅力及受欢迎的程度上，丝毫不逊于林黛、乐蒂、葛兰、夏梦、李丽华等华语明星。南利的太太莎乐美（Saloma）也是同一时期家喻户晓的女明星，她和南利一样是唱做俱佳的演员兼歌手[27]，夫妇二人亦曾在陶秦指导的电影《花团锦簇》（1963）中客串演出[28]。

另外，在这一时期（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并继续积极争取与马来亚合并，希望能摆脱英殖民地政府的统治。配合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国泰克里斯影片公司于1960年遂耗资10万元完成华语电影《狮子城》的拍摄。这是一部典型的爱情故事片，由本地电影工作者易水负责执导。为了能更好地摄制这部影片，国泰克里斯影片公司还特地为了挑选剧本而组织了剧本编导委员会，甚至组织队伍到马来半岛去遴选演员。当时影片的临员就多达200多人[29]。

在这部电影里，胶厂女工凤玲和富家少爷（也是胶厂少爷）的爱情故事是电影的主线，

[24] Raphael Millet, *op.cit.*, p.24. 关于导演侯曜和尹海灵的介绍，参阅法兰宾（Frank Bren）的文章，收录在香港电影资料馆第65期通讯中。法兰宾在文章里也提到共有七部马来电影是由侯曜和尹海灵联合编导的。

[25] 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料库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490_2009-03-23.html 。

[26] Raphael Millet, *op.cit.*, pp.52-53.

[27] 有关莎罗玛的唱片及音乐成就，参阅Joseph C. Pereira, *Beyond the Tea Dance:The Story of Singapore Sixties Music*, Vol.2 (Singapore: Select Publishing, 2014)。

[28] 网上资料http://www.movingimagesource.us/articles/p-ramlee-superstar-20110318 。

[29] 易水，〈大胆的尝试—为狮子城开拍典礼而作〉，载《南洋文摘》卷1期6（1961年），页68。

其中的支线则包括凤玲的兄长卷入香烟走私风波、邻居的女儿被花花公子抛弃后难产而死等情节，以及1959年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获胜的现实情况，与独立桥到旧机场一带的组屋区、新加坡河、花柏山等真实风景。在这里，电影主要通过部分对白、音乐和风景展示了新加坡“多元种族，和睦共处”的社会特质，将这一社会特质用以服务当时执政者所提倡的“马来亚文化”[30]的理念。奇怪的是，“马来亚化华语电影”运动只生产了两部电影，即《狮子城》和《黑金》（1962年）[31]，而1965年独立后的新加坡以经济建设为主要目标，根本无暇顾及电影等文化生产。因此，二战后“新加坡（华语）电影”的发展似乎戛然停止，比马来电影的寿终正寝还早了整整10年[32]。

1964年，陆运涛与夫人一同出席台湾举行的第11届亚洲电影展，却因飞机失事罹难。空难后，陆运涛的妹夫朱国良接掌生意，香港的电懋则改由新加坡的国泰机构直接管理。然而，此时的国泰已大不如前，1971年结束其制片的部门，只专注于发行与戏院业务[33]。另一方面，由于马来影片的票房日益走下坡，邵氏在1967年关闭了旗下的马来片场，而国泰克里斯则继续供应马来影片，直到1972年歇业关闭片厂为止[34]。

“另类”新加坡电影

1955年，原本在战前新马经营电影发行与放映事业的光艺有限公司，转而发展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光艺有限公司”由何启荣在1937年创立，而何氏兄弟选择在战后的香港投入拍摄粤语电影，其合伙人便是导演秦剑[35]。光艺在

1957年，光艺为了迎合新马市场的需求，由导演秦剑率领大队，来到本地拍摄“南洋三部曲”，并将新加坡与马来亚各地的风景植入电影场景内。上图为“南洋三部曲”之一《血染相思谷》的电影宣传单

1955年至1969年之间，一共制作了近120部影片，其中又以文艺片、喜剧片、惊悚片为主[36]。1957年，为了迎合新马市场的需求，秦剑率领大队，来本地拍摄“南洋三部曲”，即《血染相思谷》、《唐山阿嫂》和《椰林月》，取得不错的回响。值得注意的是，“南洋三部曲”刻意将新加坡与马来亚各地的风景植入电影场景内的做法，也运用在1969年红宝影业公司所拍摄的《娘惹之恋》。在光艺的“南洋三部曲”之前，1956年由国泰电影制片公司摄制的《风雨牛车水》，便曾邀请严俊、李丽华担任主角，并来到牛车水进行实地拍摄，引起本地观众的热烈追捧。邵氏也在1958—1959年拍摄并完成类似的“三部曲”粤语片，即《独立桥之恋》、《过埠新娘》和《榴莲飘香》[37]，并将新马一带的风景收录于片中。

自1945年开始就在本地从事电影发行与放映事业的荣

[30] 魏艳，〈从《狮子城》看六十年代新加坡国家电影的出现〉，载《电影欣赏学刊》8（2）（2011年），页74—75。

[31] 易水，《马来亚化华语电影问题》（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59年）。关于参与《狮子城》和《黑金》的演员，参阅管雪梅，《回忆廊》（新加坡：连星娱乐制作有限公司，2009年），页150—151。

[32] 〈从新加坡电影的发展谈当地电影的困境〉。

[33] 《国泰故事》，页39。

[34] Raphael Millet, *op.cit.*, p.67.

[35] 黄爱玲编辑，《现代万岁：光艺的都市风华》（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6年），页114、118—119。

[36] 2013年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光艺故事”（The Story of Kong Ngee）电影系列特刊；《现代万岁：光艺的都市风华》，页233—249。

[37] 韩燕丽于2011年8月28日在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夏期合宿会上的报告《论新马两国建国期间的华语电影的结构分析》，参阅网上资料http://www.dylw.net/dianshidianying/121104.html及邵氏电影年表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529/20/1630322_120339565.shtml。

华影业公司（创办人吴荣华），也曾拍摄多部厦语电影，如《马来娘惹》、《马来亚之恋》、《新加坡小姐》、《泪洒树梶山》、《马六甲姑娘》等，同样突出新马的地理面貌与“马来风格”[38]。厦语电影的流行也吸纳了不少本地的演员，如厦语片皇后庄雪芳、本地谐星野峰、杨佩云、徐莱、关新艺、上官流云等[39]。

1960年，印度导演沙迪·萨曼塔（Shakti Samanta）在本地取景，完成了影片《新加坡》。1966年，意大利导演费迪纳多·巴蒂（Ferdinando Baldi）亦在新加坡拍摄《特务任务》（Goldsnake Anonima Killers），电影里便邀请了本地演员沙拉·蒙拉（Salleh Melan）参与演出。1967年，法国电影《新加坡五人行》（Cinq gars pour Singapour）同样在本地取景，并大量吸纳本地的演员。导演当时不但采用彩色技术拍摄电影，也将岛国庆祝国庆时的景观拍摄进电影里[40]。

在严格意义上，这些电影并不能够被归类到新加坡电影里。大部分影片如《娘惹之恋》，我们可以在其电影画册上看到诸如“新加坡实地拍摄蕉风椰雨美丽风景”的口号；又或是如《特务任务》中，美国特务来到新加坡解救人质的情节安排，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电影对于本地场景的筛选及新马社会面貌的刻画，往往流于肤浅甚至“公式化”（stereotypical）。但是，如果我们不介意将1926年的《新客》考虑为新加坡电影的话，这些电影未尝不可以被列为“另类”的新加坡产品。

1965年独立后的新加坡电影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已不能像先前那样在新马两国之间自由地活动。此外，独立后的新加坡倾向推动经济（而非文化）建设，这些亦给本地电影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阻力。尽管如此，1966年，新加坡国文影业公司还是开拍了华语片《前程似锦》；1967年，狮城影片公司则拍摄独立影片《兄与妹》和《幻影》[41]。然而这些电影的票房并不理想，而这两家电影公司也没有继续摄制其它的影片。

1974年，中心33电影公司完成华语片《血指环》（导演：邱百岁和James Sebastian），但却无法通过审查而遭禁映。参与该片的演

《桥的两岸》（1976年）电影海报（国家博物馆提供）

[38] 吴君玉编，《香港厦语电影访踪》（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12年），页129。

[39] 《香港厦语电影访踪》，页130–132。

[40] Raphael Millet, *op.cit.*, pp.63–64.

[41] 许永顺，《新加坡电影界纪要1965–1983年》（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厅，2013年），页23。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1月5日

华校联合会一致反对代理华文副提学司主张华校依从英校制一年改为三学期

员主要是电视台演员如何丽娟、饶开柚、林斯雄、陈荣远等；影片的男主角庄志炎则是本地知名空手道教练[42]。这部电影一直到2005年才有机会在本地电影节上正式放映。

1975年，原本在本地以发行香港长城、凤凰和新联影片为主的综艺机构成立制片部，宣布在一年内希望能制作三部华语电影，以供应本地市场。综艺也招聘本地男女演员，及聘用来自香港的导演，分别拍摄了《一家之主》和《荒唐世家》。1976年12月，综艺完成《桥的两岸》，并在黄金戏院放映优先场。此片的导演林岸与丁戈皆为本地人才。《桥的两岸》也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亚细安电影节[43]。

1978年，本地独立电影制作公司B. A. S国际电影（B. A. S Films International）也拍摄了几部英语电影——《他们叫她埃及妖后》（They Called Her Cleopatra）和武打片《无敌小金》（Dynamite Johnson）及同名电影续集。有趣的是，《他们叫她埃及妖后》在菲律宾的口碑不俗，也成功打造了本地第一位女性动作明星Doris Young[44]。电影也通过镜头捕抓70年代的新加坡风景、人们的穿着打扮、流行音乐等，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很珍贵的一种影视纪录（visual-documentary）。而《无敌小金》展现的人物风格显然受到李小龙及香港武打片的影响，但始终无法真正引起本地观众的共鸣。

在经济稳健增长并步入1980年代的新加坡，本地观众对于新加坡制作的电影需求却相对低迷。统计显示，单在1971年到戏院去观赏电影的本地人高达2800万人次[45]，而1979年售出的电影戏票也有4600万张[46]，明显地国人还是非常热衷于看电影这一消遣活动。可惜，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本地便不再生产新加坡电影，本地观众所观赏的电影全都是海外制作的影片[47]。

1987年，经济发展局成立了一个“推动电影事业委员会”，着手探讨本地电影事业的困境；同一年设立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提供一个让亚洲电影工作者进行交流与分享的平台。1990年，经济发展局也宣布将拨款100万元推动本地电影工业，并承诺在五年内会颁发奖学金给有志于电影事业的新加坡人[48]。1998年，在艺术理事会属下的新加坡电影委员会（Singapore Film Commission）成立，继续支持本地电影的发展。这一年，本地唯一的电视台新传媒机构属下的星霖电影公司也正式诞生，并制作第一部华语电影《梁婆婆重出江湖》[49]。电影的票房成绩不俗，亦奠定了本地演员兼导演梁志强的电影事业。在这期间，许多香港导演及电影制作人也纷纷在1997回归前后涌进新加坡，并为本地电影的风格与题材取向带来一定的影响。

基本上，1990年代新加坡电影事业的重新整顿，主要交由经济发展局、资讯与媒体发展管理局及一些外资电影公司去进行，因此其商业的考量也极其明显[50]。然而最初经济发展局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例如1991年，由经济发展局全力资助，并以本地轰动一时的杀人案为故事主线的英语电影《乱童》（Medium Rare），便出现票房欠佳的情况[51]，各界对其制作水平也多持批评意见。反而是新生代导演如邱金海、王景生、魏铭耀、唐永健、陈子谦等人，相继在本地与国际平台上交出漂亮的成绩。他们其中如王景生的《新兵小传》（1995年）和魏铭耀（Glen Goei）的《狂热迪斯科》（1998年）皆没有申请官方资助。前者是与国泰机构的合作，描写本地新兵入伍时的生活及彼此

[42]《新加坡电影界纪要1965-1983年》，页65。

[43]《新加坡电影界纪要1965-1983年》，页79-82。

[44] Raphael Millet, *op.cit.*, p.76.

[45] 金华，〈新加坡电影业的回顾〉，载《新加坡月刊》期64（1972年4月15日），页49。

[46] Raphael Millet, *op.cit.*, p.77.

[47] *Ibid.*

[48]《商业时报》1990年4月9日，页2。

[49] Raphael Millet, *op.cit.*, p.88.

[50] 经济发展局网页http://www.edb.gov.sg/content/edb/en/about-edb/company-information/our-history.html 。

[51] 该片制作费为200万元，但票房仅得13万元。参考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料库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476_2005-01-07.html 。

适应的过程；后者则是独立出资，并试图“重演”1977年由约翰·巴德姆（John Badham）执导的《周末夜狂热》。其他新生代导演如邱金海、唐永健、陈子谦等，则展示了他们既能驾驭独立影片，也能满足追求商业电影的大众心理需求。其中邱金海监制的《梁婆婆重出江湖》和《一脚踢》便是一个例子。另外，唐永健1999年执导的《吃风》虽然没有赢得票房，却为他赢得国际影评的赞赏[52]。唐永健后来执导的《女佣》（2005年）和《大世界》（2011年）终于交出可观的票房，而陈子谦的电影《881》（2007年）及《十二莲花》（2008年）也备受本地观众的追捧。在本地还有一批年轻的导演，如何子彦、巫俊峰、陈彬彬、施忠明、Sandi Tan等，他们虽然只专注于独立短片的摄制，却有一部分成功申请到官方经费（如巫俊峰和Sandi Tan），继续开拍更多元的本地影片[53]。当中，2009年获得“新加坡艺术文化优秀青年奖”的何子彦，大胆地将电影与当代艺术相结合，无疑是将新加坡电影带到另一种层次。总的而言，跨过千禧年的新加坡电影界（直至2013年），可谓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了。

1990年代及之后的新加坡电影

1990年代新加坡电影界最重要的导演莫过于邱金海、梁智强与陈子谦。由邱金海指导的《面薄仔》于1995年完成后，不仅受邀在大大小小30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进行放映，更为新加坡电影的发展开拓了全新的局面（如电影风格与题材方面），并发掘了其它本地电影的人才如梁志强。邱金海作品中偏向于探讨都市的冷漠与黑暗，并聚焦于人性沉重内敛的一面，从而深刻地反思社会迅速发展下的扭曲心理，无疑是加强了新加坡电影的严肃内涵。

1997年，邱金海完成的第二部影片《十二楼》，是康城国际电影节（又称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第一部被选上放映的新加坡电影，也赢得国际影评人协会（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Film Critics）大奖[54]。邱金海也参与星霖电影公司的制作，负责监制商业电影，为星霖电影公司赚取了不错的票房，证明了他驾驭商业影片的能力。2005年，邱金海完成电影《伴我心》（Be With Me），再次获选进入康城国际电影节，以及第1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之风”特别提名的殊荣[55]。2008年，他执导的《我的魔法》（My Magic），获得第61届康城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棕榈奖提名[56]。《亚洲周刊》将邱金海列为亚洲电影界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人之一。然而，邱金海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他在新加坡电影的“复苏时期”拔高了本地电影的整体素质，并正面影响了其他同时期的年轻导演。

电影学者拉菲·米勒（Raphael Millet）认为，1990年代新加坡电影事业开始恢复，但主要以商业娱乐片为主流影片[57]，其中梁智强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原本是演员兼谐星主持人的梁智强，以电视节目《搞笑行动》和《欢

[52] 网上资料http://kelvintong.wordpress.com/2008/04/02/kelvin-tong-writerdirector/。

[53] Raphael Millet, *op.cit.*, p.105. 亦可参阅Lee Wei Ying, *Singaporean Cinema in the 21st century: Screening Nostalgia* (Singapore: NU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2013), p.85。

[54] 网上资料http://www.erickhoo.com/。

[55] 网上资料http://www.erickhoo.com/ 及http://award.mtime.com/14/2005/。

[56] 网上资料http://www.erickhoo.com/ 及http://blog.chinatimes.com/jostar2/archive/2008/05/13/278053.html。

[57] Raphael Millet , *op.cit.*, p.88.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9 月 22 日

新加坡升格为市，市政局改称市议会

笑巅峰》建立口碑，而他的首部电影《钱不够用》在1998年上映时也创下当年最佳票房的成绩。此后，梁智强陆续摄制了《那个不够》、《梁婆婆重出江湖》、《小孩不笨》、《跑吧！孩子》、《爱都爱都》、《小孩不笨2》、《钱不够用2》、《笑着回家》、《孩子不坏》、《新兵正传》及《新兵正传2》等。其中，《小孩不笨》（2002年）在新马、台湾、香港等地上映时票房报捷，也因为关注本地教育课题而成功引起人们的共鸣。《跑吧！孩子》（2003年）则在台湾第40届金马奖上获得两项提名，而电影的演员郑智允也荣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新演员[58]。此片不仅取得超过200万的票房，也在多个国际电影奖项中（如伊朗国际儿童电影节、莫斯科电影节等）脱颖而出[59]。

梁智强也和星霖电影公司积极制作新年贺岁片，如《爱都爱都》（2004年）、《小孩不笨2》（2006年）、《笑着回家》（2010年）、《孩子不坏》（2011年）、《新兵正传2》（2013年）等，除了看准本地市场缺乏能够配合农历新年时期上档的华语影片，也因为可以借助新传媒属下的电视与电台频道，为这几部电影打响知名度。2012年，梁智强执导的《新兵正传》也在短短六周荣登本地最卖座的华语影片，相隔一年即推出电影的续集（原本安排为上下集），2014年更是衍生出《新兵正传》的音乐剧[60]。显然地，梁智强与其他导演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追求通俗而富娱乐性的电影题材时，也懂得善加利用在本地渗透力强大的电视与电台网络。在新加坡电影的“复苏时期”，梁智强的贡献是制作能够引起本地共鸣的影片，并积极以回归“本土性”为目标。

介于邱金海和梁智强电影风格之间的便是陈子谦了。陈子谦以短片起步，他早期的作品如《子》（2000年）和《福协隆》（2001年）皆赢得国际电影评委的青睐。然而，《15》（2002年）却是陈子谦真正的成名之作，并在2003年由邱金海的昭玮电影公司制作成同名故事片。2006年，陈子谦继续制作短片《4:30》；2007年和2008年则相继推出电影《881》和《十二莲花》，都取得不俗的票房。电影《十二莲花》也为他赢得第22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头衔[61]，证明了陈子谦除了独立短片，也能够掌握商业影片与大众趣味。

此外，还有两位年轻导演值得注意，他们分别是巫俊峰与陈哲艺。前者的影片《沙城》（2010年）由新加坡电影委员会出资完成，并受邀在康城电影节上进行分享。2013年，陈哲艺执导的《爸妈不在家》[62]则是本地第一部在康城国际电影节中获得金摄影机奖（Camera d'Or Prize）的影片，也入围了第57届伦敦影展、第56届亚太影展、第50届金马奖等。此片后来也代表新加坡参加了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竞逐但最终落选。

从“国民电影”到“国族电影”到“国家电影”

本节以2013年作为新加坡电影发展史的下限，并不意味着2013年之后本地再无电影制作，而是希望借助学术的标签，即国民电影——国族电影——国家电影[63]，厘清超过半个世纪的新加坡电影的特点，并反思新加坡电影的功能转型、电影里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当我们提出当代新加坡电影“回归”到国民电影类型的意义。2013年也是本地电视发展的50周年庆，因此以这一年做为下限，也可以做一种参照，总结本地电影与电视的历史脉络与发展。

---

[58] 网上资料http://www.people.com.cn/GB/yule/1080/2244361.html。

[59] 网上资料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622_2009-12-31.html 及http://www1.mediacorp.sg/raintree/instoo/filmText.swf。

[60] 2014年1月17日《我报》的报道〈“新兵正传”音乐剧制作费料超过150万〉，参阅网上资料http://mypaper.sg/entertainment/xin-bing-zheng-chuan-yin-le-ju-zhi-zuo-fei-liao-chao-guo-150mo-20140117。

[61] 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料库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3-06-19_102953.html。

[62] 网上资料http://www.todayonline.com/blogs/ratedg/singapore-film-ilo-ilo-wins-historic-cannes-prize；http://news.sina.com.cn/m/2013-11-25/102328803379.shtml；http://wanbao.omy.sg/hot-story/%E7%88%B8%E5%A6%88%E4%B8%8D%E5%9C%A8%E5%AE%B6 及http://www.iloilomovie.com/press/。

[63] 〈从《狮子城》看六十年代新加坡国家电影的出现〉，页71-72。

电影学者米勒曾表示“在新加坡，电影制作受到其独特的地理因素，以及这里的历史、文化场域的多重影响。它既是一种商品，也是反映一个多元民族、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从初创时期，新加坡电影制作已经可以看到马来人、印度人、中国人、英国人，以及中东和日本等地的影响”[64]。放眼整个东南亚，新加坡虽然只是马来半岛最南端的一个岛屿，却一直努力跳脱新加坡市场。随着1819年新加坡开埠变成自由港并吸引大量移民及劳动队伍后，使得这里的华人人口迅速激增。根据1860年的统计数字，新加坡当时的华人人口超过5万，而其他民族如马来族约1万、印族则约1万2000[65]。可是，围绕新加坡周遭的皆是以马来族群占大部分人口的地域及国家，这使得早期新加坡电影的生产与生存，不得不以吸引马来人的市场为优先考虑的因素。

二战结束后，零星的国语片相继出现，其中1946年中华电影公司完成的《华侨血泪》，以及邵氏的《新加坡之歌》、《第二故乡》和《度日如年》等，并没有交出亮眼的成绩。即便是1960年配合“马化电影”运动而倍显瞩目的《狮子城》，其票房亦属一般[66]。因此邵氏和国泰皆专注于马来电影的生产，对新加坡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国家而言，我们可以断言此时新加坡电影的发展模式，发挥的正是“国民电影”而非“国族电影”的特质。在这里，笔者将“国民电影”的特色定义为由民间或私人出资拍摄的影片，其目的是为了迎合大众，争取票房，却没有照顾到新加坡当地的华人主流市场。“国民电影”也不需要服务于当时执政者的诉求，但同时亦不愿意回应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政策，甚至是身份建构（identity-making）等。

反之，“国族电影”有着明确的本位意识，强调新加坡市场与（华人）观众，例如《狮子城》的导演易水便曾说过“目前港制以马来亚为背景而号召的国语、粤语、厦语片仅仅在马来亚一地的市场已经大赚洋钱，我以为本地华语片初期根本不用顾虑到海外市场，应该先以本地市场为对象”[67]。同时，这部电影的教化意识浓厚，对当时的执政者主张“马来亚化”并宣传与马来西亚合并以达到独立的理想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狮子城》和后来的《黑金》都可以被视为带出“国族电影”的特质，也有积极参与建构一种模糊的身份认同的企图心。值得注意的是，1967年1月在本地出版的《电视与广播》周刊上，还可以看到一则有关狮城影片公司宣布拍片的报导：“（本公司）是由新加坡一群热爱电影艺术的青年所组成，目的在于推动本国的电影艺术活动，及培养训练电影艺术工作者”。报导中也提到，公司成立的时间虽短，“但在大家积极地努力合作之下已经摄制完成了两部黑白与彩色实验电影《兄与妹》和《幻影》，接着他们（也）将继续摄制五部实验电影”[68]。1976年底上映的《桥的两岸》[69]，同样突出本土意识，该片在黄金戏院放映优先场时，也将收入捐给新加坡协助协会。此片也积极吸纳本地人才担任导演、演员。

---

[64] Raphael Millet, *op.cit.*, p.10.

[65]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2), pp.7-13.

[66]《国泰故事》，页97。

[67]〈从《狮子城》看六十年代新加坡国家电影的出现〉，页80。

[68]《新加坡电影界纪要1965-1983年》，页23。

[69] 关于《桥的两岸》影评，参阅《星洲日报》之“读者之声”，1976年12月16日；也收录在作者钟晓的博客上 http://zhongxiao33.wordpress.com/%E7%AC%AC%E8%BE%91%E4%B8%83/%E7%94%B1%E3%80%8A%E6%A1%A5%E7%9A%84%E4%B8%A4%E5%B2%B8%E3%80%8B%E8%B0%88%E5%8F%91%E5%B1%95%E6%9C%AC%E5%9C%B0%E7%94%B5%E5%BD%B1/。

显然地，1965年前后短暂出现的这几部华语电影都具备“国族电影”的特质，而专注新加坡本土（华人）电影市场是“国族电影”的最终目标，可惜皆无法交出漂亮的成绩。笔者认为这背后的原因，除了技术及其他外在因素如成本等，主要也是因为走向合并以及1965年被迫独立后的新加坡在短时间内，尚未很好地形塑一个真正明确的国家与身份认同。正因如此，本地制作的电影无法很好地与海外电影区分，并塑造自己的特色。

新加坡电影必须到1990年代过后方成功转型成“国家电影”，并以再次聚焦于本地社会面貌如都市发展、教育问题、市井人民的生活等，引起人们对于新加坡电影的关注。在这时期所生产的电影，既不呼应官方的主旋基调，也出现语言“混杂”的现象，即电影里大量使用新加坡式的语言（Singlish），有英文、中文、马来文、淡米尔文兼容的对白，而电影里人物的遭遇，基本上也脱离了只关心属于个别种族与文化所相联系的问题，转而关心更为贴近本土民生的普世议题。笔者认为，在独立后新加坡执政者推行的种族和谐的政策，以及实行免费教育、规范双语政策等已逐渐奏效，也有助于凝聚并打造更为清晰的国家与身份认同。梁智强的《钱不够用》、《小孩不笨》以及《跑吧！孩子》成功吸引非华族同胞的关注，并采用非华族演员如葛米星[70]，也是这一时期“国家电影”的特点。

在官方的“媒体21发展蓝图”（Media 21 Blueprint）发布会上，由星霖电影公司参与制作的华语片如《真心话》（1999年）、《公元2000》（2000年）、《无间道2》（2003年）以及《向左走·向右走》（2003年）皆被列入新加坡电影的名单中[71]。然而，这几部电影所涉及的题材或是创作元素都和新加坡毫无直接关系，亦缺乏明显的本土色彩。即使《真心话》的女主角是本地演员范文芳，而其他本地演员如郑斌辉和叶世品也有份客串演出《无间道2》，甚至是担任电影的第一男配角（例如陈之财在《向左走·向右走》里），然而是否可以因为这样的标准而将这些电影列为“新加坡电影”？另外，星霖电影公司也是这几部电影的主要投资机构，而星霖电影公司是由媒体发展管理局所赞助成立的本地电影公司，这是否就意味着从官方的角度出发，只要是由本地公司注资的影片都可以归纳到“新加坡电影”的名单？

笔者认为由此衍生的特殊现象，恰恰有助于我们反思：当我们以为新加坡电影已在1990年代之后明确地发展出自我的本土意识与身份认同时，为何在相差不到10年后的千禧年所推出的部分“新加坡电影”，却回到最初的“国民电影”的类型，并似乎有意回避了国族意识、身份认同等议题？抑或者这样的抉择，恰恰符合日渐国际化的新加坡社会面貌，及本地近年来所鼓吹的一种“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意识[72]？若是如此，当我们提出“新加坡电影”的类型指涉的是一个清楚的国家民族时，那么国域/边疆（geographical boundary）的概念，对于我们研究“国家电影”的意义究竟有多重要呢？

华语电视剧的制作与崛起

1963年2月15日，新加坡电视台（Television Singapura）于维多利亚纪念堂正式推介，文化部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成为第一位上电视的政治人物。当时电视节目的播映时间仅100分钟，包括15分钟的纪录片“从电视看新加坡”（TV Looks at Singapore）、卡通片及新闻短片。同年的11月则推出第8波道，并制作华语和淡米尔语节目，而当时第5波道已率先制作英语和马来语节目了[73]。

1965年8月9日，李光耀总理在电视上宣布新马分家的消息，这一年新加坡正式独立。两年后，新加坡广播电视台（Radio and Television Singapura）归属文化部，并开始以

[70] 网上资料http://blog.omy.sg/jackneo/archives/date/2007/10 及http://movies.insing.com/feature/a-look-back-at-jack-neo-movies/id-cd453101/。

[71] Media 21: Transforming Singapore into a Global Media City Creative，下载自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mn.gov/mnddc/asd-employment/pdf/03-M21-MDA.pdf。

[72] S. Gopinathan, "Are We All Global Citizens Now? Reflections on Citizenship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ising Worl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12/001, February 2012).

[73] 2004年，第8波道和第5波道改名8频道和5频道，参阅《电视50周年》特展。

四种语言（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制作广播节目，其中关注于数学、地理、科学等具教育意义的广播节目也曾经走进本地学府。1969年，本地电视台首次推出“全国歌唱比赛”[74]，迅速成为深受本地观众喜爱的节目之一。这股歌唱热潮也一直蔓延至1980年代，而新加坡独立后的许多本地华语流行乐坛歌星，如黄清元、张小英、凌霄、林竹君等，皆是1965至1969年间的歌唱比赛冠军[75]。一般上，这些歌唱比赛多以四种语言进行，而胜出的歌手也陆续录制唱片，并以上电视和电台表演的方式打响名堂。

独立后的新加坡电视节目也包括短剧和综艺节目，其中又以王沙、野峰二人组的短剧和由张炜主持的《声宝之夜》令人印象深刻[76]。然而，初期电视台的节目，尤其是华语电视剧的来源主要还是中国、香港、台湾三地，而海外制作也掺杂了方言。1968年，电视台宣布招募演员并成立电视台编剧团，1970年代遂出现《家在大巴窑》和《小小心灵》等以组屋生活与故事的电视剧，以及许多口碑不俗儿童电视剧如《小DD》[77]。1974年，电视进入彩色时代，这一年的国庆庆典便是采用彩色转播。1978年，电视台禁止方言节目的播映，而所有外购的电视剧集也必须进行华语配音[78]。

1980年，新加坡广播电视台融入新加坡广播局（Singapore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1982年推出本地首部华语单元剧《实里达大劫案》，以本地真实罪案为故事蓝本[79]。1983年3月，广播局制作本地六集连续剧《新兵小传》[80]，并以国民服役军人生活为题材。此外，同年8月，本地演员王玉清与当红本地歌手邓妙华主演的《小飞鱼》开播，该连续剧的主题曲和插曲皆由邓妙华包办，对当时仍处于萌芽阶段的本地音乐界有重大影响。

1984年，配合新加坡建国25周年，新加坡广播局制作《雾锁南洋》[81]，共计吸引了82万2000名观众[82]。这一年，新加坡广播局也推出另一新频道：第12波道，主要播映文化与教育节目。1985年，广播局推出的另一部电视剧《大侠吴三奇》，是第一部拉队到国外取景的电视剧，对当时参与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验[83]。

1988年，广播局推出《才华横溢出新秀》，目的是为寻找有潜力成为下一代明星的

---

[74] 在1969年之前，本地电视节目也曾出现不少类似的歌唱比赛，如1963年的Dendang Ria 和1961年的Pop Inn，反映了本地蓬勃的音乐与乐团发展。参阅Joseph C. Pereira, *Apache Over Singapore: the Story of Singapore Sixties Music*, Vol.1(Singapore: Select Publishing, 2011)和*Beyond the Tea Dance: the Story of Singapore Sixties Music*, Vol.2 (Singapore: Select Publishing, 2014)。

[75] “文史达人”博客http://blog.omy.sg/sgstory/archives/776。

[76] 有关本地早期电视节目的介绍，参阅“人生舞台”博客之《戏剧情牵二十五》特别企划http://wsyf.blogspot.sg/2007/11/1976-1976-2002-1969.html；又：关于《声宝之夜》介绍，参阅《星洲日报》1981年4月12日，页28的报道及《回忆廊》，页5。

[77] 《回忆廊》，页3、页17。

[78] 关于“讲华语运动”与禁止方言运动，参阅本书第九章第二节，亦可参阅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料库（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3-07-04_122007.html?s=speak mandarin campaign）；或《星洲日报》，1980年10月4日，页29。关于本地观众对于电视剧配音的反应，参阅《南洋商报》，1979年10月31日，页25；据统计，电视台在将粤语的《倚天屠龙记》配上中文播映后，曾收到多达100封投诉来函，参考《电视50周年》特展。

[79] 关于《实里达大劫案》，参阅《南洋商报》，1982年7月12日，页29。

[80] 参与《新兵小传》的演员，参阅《回忆廊》，页25。

[81] 关于《雾锁南洋》，参考《联合早报》，1983年4月10日，页29。

[82] 《电视50周年》特展。

[83] 《联合早报》，1984年12月28日，页6。

本地人才，当时第一届的《才华横溢出新秀》的前三名分别为郑惠玉、陈丽贞和刘琦，而第二届的前三名分别为周初明、李美玲和陈泰铭。1994年，广播局成为“新加坡国际传媒机构”（简称“新传媒”），而子公司“新加坡电视机构”也随之诞生。这一年，电视台举办第一届《红星大奖》，借以肯定本地演员的努力，隔年也增设了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男女配角奖。

2001年，新加坡报业控股获得本地第二个电视广播执照，打破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一台独大”的局面[84]。随着“报业传讯”的诞生，许多当时在新传媒颇有名气的综艺主持人、新闻播报员以及电视演员如王禄江、钟琴、郭亮、王嫣青、张海洁、谢韵仪、宋怡霏、陈毓芸、李之晴等亦纷纷跳槽。可惜的是，就如时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所观察的“新加坡地方太小，不宜拥有多于一家电视台”[85]。2004年年底，相对处于弱势的报业控股最终选择合并，而优频道也被转让给新传媒，改名为U频道，同样由报业传讯经营的英语频道I频道则停播。至此，报业传讯最初为催生本地传媒市场竞争的使命也结束了。

根据1963年的统计显示，仅1.5%的本地家庭拥有电视机，但1973年已有改善，每10人之中便有一人拥有电视，而40年后（即2013年）的电视渗透率更高达98.5%[86]。电视对刚取得独立的新加坡人而言，虽然是一种奢侈品，但也为本地家庭提供了新的娱乐选项，甚至也包括一定的教育功能。1970年至1980年代的电视台亦大力制作不同种类的电视节目，1985年更耗资760万元开设东南亚最大的摄影厂[87]。随着电视节目日渐受到本地观众的欢迎，以及电视成为推动本地文化的官方机制[88]，电视台自然地将得到更多的资源。故此，电视的崛起与同时期的新加坡电影构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现象。

电视剧国际化

1990年代的本地电视节目除了积极走向国际（例如新传媒曾在中国和台湾市场推销一些本地电视剧），也试图扩大国际版图，并在印尼、澳洲和美国进行落地式电视广播[89]。本地的电视剧也不时邀请海外艺人参与演出，并获得不错的回响；连续剧在海外上映后，也为本地演员打响国际知名度。1998年，新传媒机构属下的星霖电影公司正式诞生，制作第一部华语电影《梁婆婆重出江湖》，成为当年最卖座的本地电影[90]。此部电影脱胎自梁智强深受欢迎的电视综艺节目，也暗示了开启本地电影业复苏的影片与本地电视节目息息相关。

另外，无论是本地电影或是电视的发展皆可以看到香港的影子，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生产的影片如《血指环》、《一家之主》、《荒唐世家》等，除了电影题材的选择受到香港影响，参与电影制作的技术人员也大多来自香港。随着1978年佳艺电视的倒闭，以及1981年和1982年丽的电视二度股权转让，本地电视台大量吸纳许多来自香港的电视节目制作人才，其中以梁立人、江龙、文树森与区玉盛四位对新加坡电视界的贡献最为显著[91]。显然地，新加坡与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除了彼此共同的殖民地历史记忆，也体现在本地电影与电视的发展脉络与两地的相互影响。

---

[84]《联合早报》，2001年5月13日，页37。

[85] 2003年11月12日的《今日报》报道，载http://www.singapore-window.org/sw03/031112to.htm。

[86]《电视50周年》特展。

[87] 同上注。

[88]《人民行动党 1954-1979：行动报二十五周年纪念特辑》（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79年），页142-153。

[89] 2010年，新传媒与微软共合作，推出双语资讯娱乐网站xinmsn，将电视与网络联线，为本地电视业打开新局面。参阅网上资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3c9370101oj18.html。

[90] 网上资料http://legacy.zhaowei.com/liangpopo.htm。

[91] 网上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3c9370101oj1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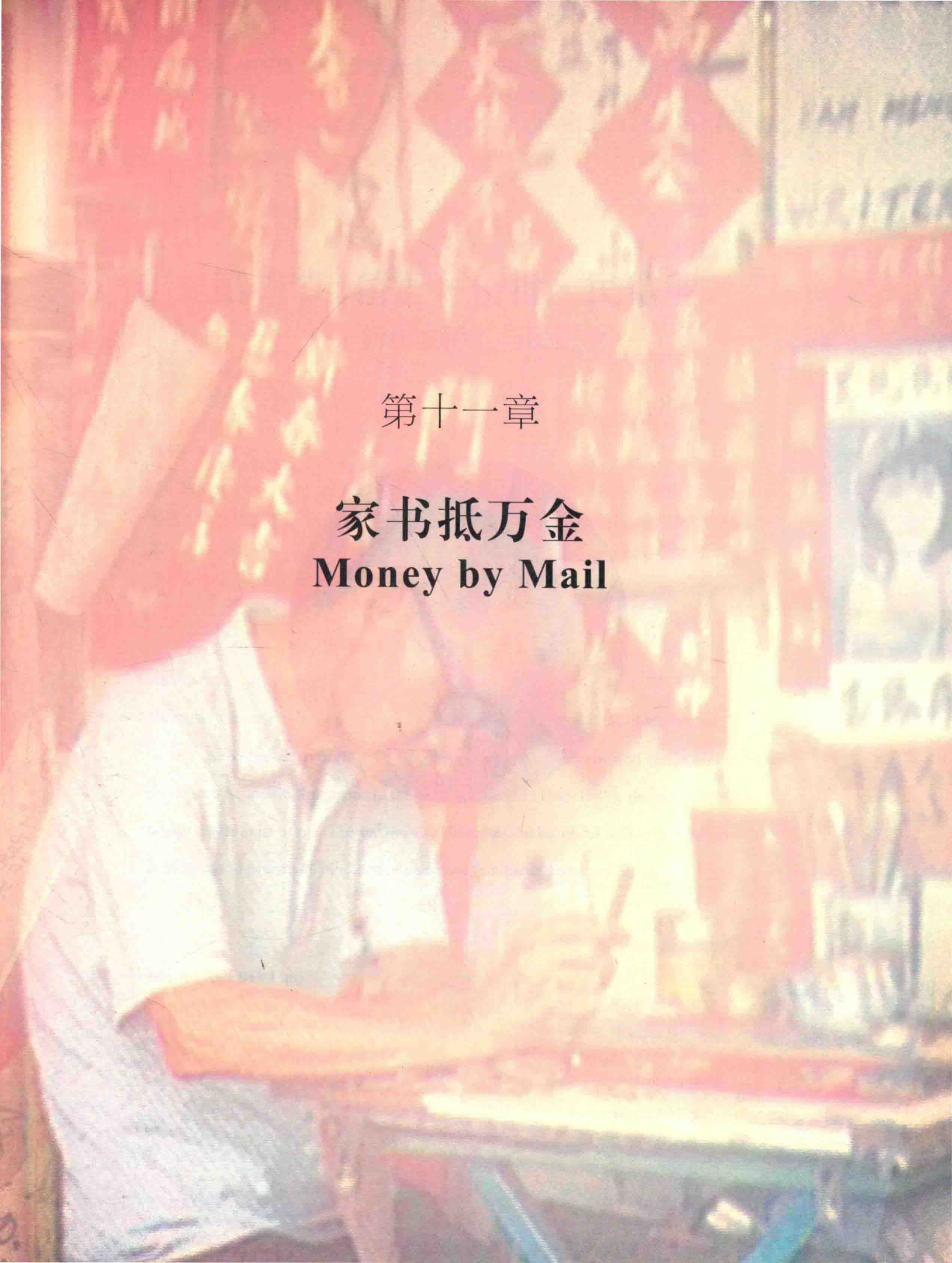
附表
本地戏院沿革（1965–1983）

区域	分布戏院
南部	国宾戏院（今国泰乌节电影娱乐城）、辉煌戏院、嘉宾戏院、娱乐戏院、太子及翡翠戏院、黄金戏院、光辉戏院（布业中心内）、金皇戏院、牛车水人民剧场和长江戏院
西部	金城戏院、皇宫戏院、裕廊大影场（后来才出现裕廊戏院）、四海戏院、皇都戏院、达利戏院、艺龙戏院、华声戏院、金文泰戏院、联邦戏院与嘉宾戏院
中部	京城戏院、大巴窑戏院、光前戏院和总统戏院
北部	百乐汇戏院、宏茂桥戏院、光华戏院、皇冠戏院、皇城戏院、兀兰戏院（原名华莲戏院）与海峡戏院
东部	牙力丝戏院、狮城戏院、文华戏院、新城戏院、嘉龙戏院及隔邻的乐心宫、东滨戏院、加东奥迪安、金国戏院、银都戏院、北斗戏院、樟宜戏院、丽华宫、王子戏院和公主戏院

备注：在1965年至1983年间，本地共有46间戏院；而根据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本地五大主要电影放映机构（即邵氏、荣华、嘉华、Filmgarde和国泰）属下的戏院总数虽然减少，但放映厅总数却多达218间。

资料来源：http://www.mda.gov.sg/IndustryDevelopment/IndustrySectors/Film/Documents/5%20-%202013%20No.%20of%20Cinema%20Screens%20and%20Capacity.pdf。也感谢黄汉民先生提供以上资料

再和成偉記
存根
滙票
CHYE HUA SENG WEE KEE
民國 年 月
福建永春太平水磨鄉交
黃國治先生
潮安江東都村頭鄉送交



第十一章

家书抵万金
Money by Mail

第一节 侨汇·侨批·民信业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

摘要

侨汇与民信业关系密切。民信业是新加坡社会的特殊行业，尤其是在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只有民信业一枝独秀。本节旨在探讨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由盛而衰的因素，并以1945年至1949年为断限。通过这一特殊的时代来探讨新加坡民信业的情况，是因为这段时期是民信业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它由盛而衰的时期。

Abstract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and remittance houses were closely inter-related. This section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and the business of remittance houses in Singapore in the post-war period (1945-1949), the era where such business was at its prime. The section also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reasons for the growth and demise of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and remittance houses in Singapore.

柯木林 (Kua Bak Lim)

侨汇与民信业关系密切。侨汇的产生应该很早，自从华人到海外谋生时便开始了。不过，早期侨汇是由归侨或水客办理，到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民信局。民信业是新加坡社会中的特殊行业，尤其是在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只有民信业一枝独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本节旨在探讨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由盛而衰的因素，并以1945年至1949年为断限。通过这一特殊的时代来探讨新加坡民信业的情况，是因为这段时期是民信业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它由盛而衰的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侨批这种风格独特的“银信”方式，填补了官方档案中对基层史料记录的某些空白片段。伴随侨批研究而衍生出来的诸多课题，如其运作方式、传递线路、汇兑民信等，足以窥视近代中国社会动荡的历史图景，及基层人民的生活样相，是研究近百年中国社会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把侨批誉为“侨史敦煌”，足见其份量。2010年3月，“侨批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5月又被选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13年6月再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侨批研究越来越受史学界的重视[3]。

几个概念：侨汇、侨批、民信局、民信业

侨汇是海外华侨汇款回国的简称。广义的侨汇包括一切华侨汇捐回国的义款、赈款以及接济侨眷的家用汇款[1]。甚至华侨回国投资，如：交通、农业、地产、建筑等的资金也包括在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中国国内局势扰攘，不能吸引华侨或外国资本家的投资，于是自1945年开始，华侨的汇款仅限于接济家用的性质[2]。

侨汇是伴随着侨批而来的，说明白一点，侨批是侨汇的载体。当然，不是所有的侨汇都通过侨批。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及家书，是一种信、银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经营侨批的业务称民信业，负责汇寄侨批的机构称侨批馆。侨批馆有不同名称，如：批信局、银信局、侨信局、汇兑局、民信局等，指的都是同样的汇款机构。我们可以用简单公式显示三者间的关系：

侨批（载体）= 信（侨信）+ 银（侨汇）

与官方的邮差相对，民信局的任务除了负责邮递的全责外，其最大特点，就是带银：一方面将华侨的银信送到国内的侨眷手中，一方面从侨眷那里携带音讯。所以这个特殊的商业机构，可说是华侨特有的专递服务。

侨汇与民信业诞生的社会根源

侨汇与民信业的诞生，是与华族移民历史分不开的。华族的大量移民，开始于19世纪。当时正值英人大事开发马来亚，因感劳工缺乏，而华工工资低廉，刻苦耐劳，最适宜开发工作，于是大事鼓励华工移殖。华人也因国内生活困难，为了生计或其他动机[4]，纷纷出国南来[5]。

南来的华人，以福建、广东两省人民最多[6]。这些移民，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多数从事劳苦工作，如开掘锡矿、建筑马路、割胶、垦荒、造房屋等[7]。他们克勤克俭，节衣缩食，日子久了，自然有了积蓄。然而，这些积蓄要怎样寄回国内接济家眷呢？那时候既没有邮汇，又没有银行，就是有邮政和外国银行，也不知如何办理。结果只好委托邻近的乡亲带回国去。但这种方法一来不安全，二来又稽延时日，毕竟是不完善的。到了后来，年月久了，华人渐渐增多，寄款回国的人自然也增加了。就在这时，新的办法产生了。那些曾帮华侨带过银信的人，因为次数多了，就有专为人们带款回家的“水客”（有时或称“南洋客”）。水客南返时，又带领华人新客南来，所以他们又被呼做“客头”。

---

[1] 陈滴，〈论侨汇问题〉，载《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7年），页8。

[2]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载《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8年），页9-17。

[3] 柯木林，〈百年跨国两地书〉，载《联合早报》，2013年1月26日。

[4]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页48。

[5]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页10。

[6] 巴素原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1940年），页5。

[7] 华侨村史调查小组，《星马的开发与华族移民》（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学系，1970年4月），页26、50-54。

起初，水客利用小店铺做根据地，凡是要汇款回国的，或要水客代理从中国带来的消息，都要到店铺询问，店铺于是成了华籍劳工汇款及询问讯息的所在地。有些店铺牌子老，信用好的，人们便信赖它。平时劳工略有积蓄时，因为恐怕滥用或遗失，每将要寄的款项预先寄存在店铺里。店铺一俟汇集相当数量时，即派人将款项带回家乡。这在店铺方面，除向寄款人取得往回费用及若干报酬外，而有些还可以周转这笔款项，做小量的土产生意；而在劳工方面也感到极大的方便。同时，为了招揽生意，店铺也可代顾客先行垫汇，虽然有时要付利息，但在劳动者看来，是再乐意不过的事。店铺这种传递款项的营业，后来便演变成为民信业；而店铺也成了“民信局”的前身，专为汇款的华侨服务[8]。

新加坡是华侨集中之地，所以民信局的设立实属必要。新加坡最早的一间民信局是在源顺街（即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一带，但因人事变迁，世代久远，确实的地址已不可考。1845年，新港之间已有定期的邮船，每月来往一次，定期邮轮的川行，有助于民信局的经营[9]。到1873年时，侨汇侨批的传递，已为少数华商所垄断。殖民地政府为方便劳动阶级，乃决定开办华人邮政分局于中街（Market Street）81号，并规定凡欲寄返银信必须经过此邮政局，办法及程序公布于邮政总监的通告第二号中[10]。1876年12月15日，当华人邮政分局开业之日，曾发生严重的暴动及罢市，新邮政分局被捣毁，警察被殴打，有数人死于暴动。嗣后，据华民护卫司及警察总长的报告，这次事件的煽动人是本坡经营侨汇的华商。他们散布谣言，谓华侨今后不能再有邮费寄家书的机会，英人统办邮政，不过是增加剥削华侨的新途径，要侨民群起反对，所以才酿成暴动事件[11]。

1887年，新加坡已有49家民信局，其中潮帮开设的占34家，闽帮占12家，客帮2家及广帮1家。侨批寄邮的统计，1886年是18万封，1889年是28万封，汇款数额，每年约达100万元，到1891年，除原有正式开铺的49家民信局外，还有无固定地址的水客16人往返各地，作流动式的收取侨汇银信[12]。由此可见，远在100多年前，先侨经过一番的努力，才有日后民信局的存在。

民信局的组织及汇款方法

民信局诞生以后，立即成为华侨汇款回国最重要的机关。虽然当地政府所开办的华人小邮局收汇的成绩不错，然而，它在国内派送的范围毕竟有限。要知道，国内侨眷是分布在穷乡僻壤、山陬海隅，无处不有的。有时要派

[8] 林树彦，〈银信局与侨汇之由来〉，载《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1947年），页2。

[9] 高维廉，《马来亚侨汇及中马贸易之展望》（新加坡：中南联合出版社，1950年），页2。

[10] 寒潭，〈华侨民信局小史〉，载《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1947年），页60。

[11]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184–186 &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27th December 1876, 对此事件有详细记载，综合描述如下：“1876年12月15日上午，当华人邮政分局开业不久，暴动就发生了。暴民集中在中街，以木棍及玻璃瓶攻击邮局（华人商铺），店内家具全毁，挂在门楣上的盾形徽章（The Coat of Arms）被折下；甚至连在场指挥警察的Mr. Maxwell都被击伤。部分暴民也攻击直落亚逸警署（Telok Ayer Police Station）和新巴刹警署（Ellenborough Market Police Station）。警方开枪击毙三名暴徒，数人受伤，还有不少暴徒被捕。事后法庭严惩肇事者：25名被控，其中17名被严判，除坐牢三个月外，还要鞭刑30下（六人因有情况不便鞭刑）。五名被判三个月严厉监禁；三名暴徒因高喊‘Pah Lah! Pah Lah!’（闽南语‘打呀！打呀！’的意思）被控煽动罪（Section 153 of the Penal Code），坐牢六个月（包括一星期的单独囚禁），且须保证今后不可再滋事”。

[12] 〈华侨民信局小史〉。

相关人物

伊丽莎白

历史事件

5 月 30 日

这一天起庆祝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为期一周。10月总督成立一委员会，重新检讨新加坡宪法

送一封信，还要跑上几十里路程才可以到达目的地。至于民信局则不同，各信局都普遍深入民间，对地方情形十分熟悉，能代为派送银信到任何穷乡僻壤的侨眷家里；而且民信局在接收侨汇的手续上，十分便利，实在和水客差不多一样的简单。所以，这里的华侨心理和习惯，都喜欢把银信托民信局“寄”回国才算安心。民信局因得侨民的信赖，因此，营业蒸蒸日上，虽有政府的华人小邮局与之分庭抗争，但对其并无多大影响[13]。

然而，民信局在收汇后，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些汇款寄回国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开几个不同阶段来谈。因为在不同阶段的历史时期中，民信局的汇款方法也随之而异。

先从民信局历史发展的第一时期说起。在还没有民信局的组织以前（中国当时也未设邮政机构），所有华侨的银信全赖水客转送。水客办理侨汇的方式，分为两种：（一）原信原银，带回中国交付收款人；（二）订明原银，任水客购货运往中国，以经营生意。但生意的盈亏，与寄款人无关。水客必须将原额银信交给收款人，换回证据，才算完成任务。水客除带银信外，还可以替华侨带些南洋土产。水客南来时，也同样可以替国内侨眷带来故乡风味的食物和音讯。由于那时交通不便，同侨寂寥得很，华侨远适异国，客旅邸中，偶而听到“乡音”，便雀跃三丈。所以，水客十分受华侨的欢迎。这种水客当时据说有几千人，是跟海舶而往来，每年阳历12月到新加坡，次年6月回国[14]。百多年前新加坡的商业市街上，常有许多人拥挤在一起，便是为了办理这种由海舶汇款回乡的手续。这是早期侨汇的传递方式[15]。

当殖民地逐渐开发以后，各地都市依次建立起来，各港海舶往来也渐频繁，各种部门商业机构也随之发展。于是民信局遂独立成为华侨特殊商业之一。在这时期中，民信局是怎样被委托寄款回乡呢？方法仍是和第一期差不多。仍然是各属的劳动者，依托其同乡信局之信用卓著者，由该被委托信局，选派得力人士回乡，一面交清寄款，一面传递消息，并为取得回文，另外还带来家乡的消息。由于民信局在金融的周转及信用方面都胜于水客（水客良莠不齐，每有逃没信款情事）；而且有时经营民信局的人，还会本其优异的知识与经验，和汇款人接谈及帮助汇款人解决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问题，非公式化或官僚式的营业所能望其项背；所以，这些寄款人通常与民信局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是民信上的往来而已。这是民信局构成独立部门后的第二时期历史[16]。

第三时期是邮电银行事业发达以后。在这时期中，民信局需要海外与国内双方配合才能搞起分送银信业务。从表面上看，民信局的组织规模有大有小，规模小的民信局只有职员数人，而规模大的也不过数十人，但一般上民信局都有总行及分行。总行设在南洋，分行设在汕头、厦门或闽粤两省各市镇，大抵是接近侨乡的地方。这里的华侨要汇款可先到信局缴款。该信局将款项折成国币后，付给汇款者收据一纸（见图（一）），并登记此人姓名、地址、职业及故乡的通讯处，然后将此编号入簿。华侨汇款时，会留下家信一封（如不识字，可请民信局代笔），封面上注明汇款数额（俗称“批款”，见图（二））。此信背面贴有长2寸、宽1寸的薄白纸信封，外印有该信局图章及批信号码（见图（三））。小信封内备有3寸宽、5寸长的白纸一张，预备收款人写回信之用。民信局一俟汇集信款后，一面由银行汇去汇票（本坡信局多数向汇丰、渣打、中国、华侨等银行购汇国币），一面由邮政局寄出侨信[17]。信款到了国内入该信局分行，由分行着人派送（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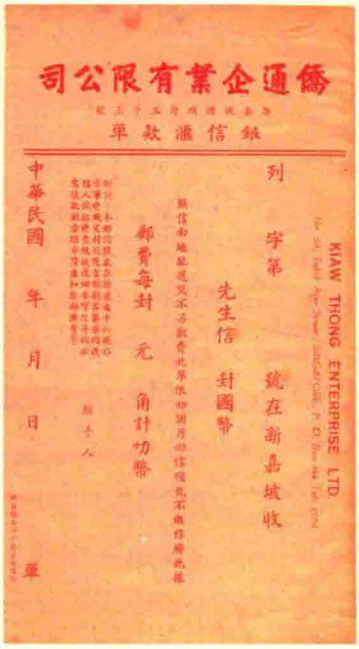
[13] 世界书局编，《星马通鉴》（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1959年），页626。

[14]《马来亚侨汇及中马贸易之展望》，页1。

[15]〈华侨民信局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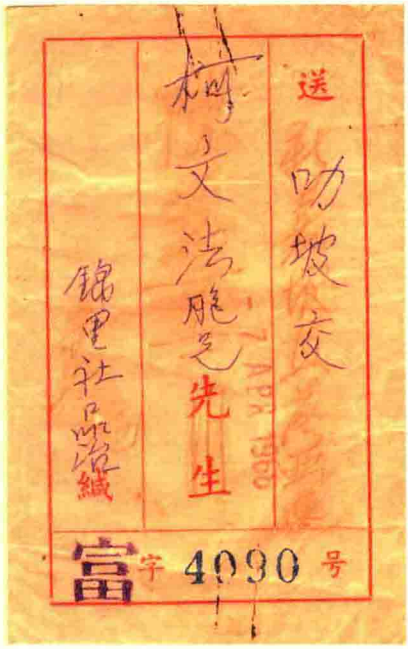
[16]〈银信局与侨汇之由来〉。

[17] 林树彦曾告诉笔者，按照民信局的习惯，是将此间所收侨信若干封，装成一包，然后总包封寄去中国。此项总包邮费较之每封零寄，要节省得多（按1888年间，每封仅缴邮费三占）。可是民国成立后不久，中国政府忽然下令禁止“民信总包”制度。事为全侨民信同业所反对，组织委员会，办理交涉。其后，虽收回成命，得以维持总包制度，但必须论封计邮，然后再汇集成包寄出（包外须注明包内共有信件若干，如有虚报者，邮局当予以处罚）。在外汇统制期间，所有寄出的民信汇款，都要得到外汇统制官的批准才可。民信局收取侨信邮资大约是普通信收叻币0.40元，航空信收0.60-0.70元。后来又改为空邮单程收费1.00元，双程1.50元，平邮双程0.50元正。有关林树彦事迹，参阅柯木林，〈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载柯木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8月第一版），页142-148；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年11月），页185-187。



图(一) 民信局付给汇款者的收据样本

图（二）由本坡寄往中国的“批款”



图（三）国内的“回批”

俗称“派批”）。收款人接收后，即将小信封写回信答复（如不识字，由派批代笔）。此信在民信局视为收据，在汇款人视为回信，俗称“回批”。回批是由新加坡信局对号送给汇款人，同时取回汇款时所付的收据。

所以，在这时期中，民信局的汇款是方便与安全了许多。从前要专人携信带款，人事上安全上恐有不周。现在各民信局在国内各地都设有分行或代理处，这里由银行及邮局寄出信款。国内信局接收后，立即派人分发，既快速便捷，又有条不紊。有时国内分行虽未接到南洋总行的现款，也按照“批信”中所述的数目，由派批分送到各汇款的家里。因为总行与分行同属一机构，彼此可以划账，所以也不必等银行款到，便可先行分发。

侨民在汇款时需付手续费，但其数甚微，往昔且有不取汇费者。民信局不重视汇费而重视汇率，汇率往往有利于民信局而不利于汇款人，这是民信局的主要收入。不仅如此，民信局将零星批款陆续收入，等到积有大宗款项然后才汇往中国，其中经过的时间所生的利息也归民信局。此外，民信局所收的汇款，可资周转，以充实其本业资金，实一举数利[18]。

最初民信局所收的汇款向银行购汇国币汇出，获利不高。其后因抗日战争，中国金融动摇，国币汇率日跌，如再向银行购汇国币，殊属失算。为避免损失，于是转变汇款方法，改为购汇港币，托港方分局或联号向银行转汇国币，然后驳汇到国内派送[19]。利用港币站稳、国币日跌的套汇方法，获利更为可观。这就是为什么战后民信业之所以特别繁荣的原因。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根据各种不同的套汇方式，将新马的民信局分为三等：

第一等信局与银行同等地位，能自设通汇，自由买卖英镑或国币，收价较平宜于二三等信局；

第二等信局系向银行及第一等汇兑店接洽购买港币，然后在上海及中国内地交换国币；

第三等信局系将所收侨汇转交银行或第一

[18]《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页88–89。

[19] 林树彦，〈银信局与统制外汇〉，载《汇业特刊》第三集（1958年），页45。

相关人物

李光耀

历史事件

5 月至 6 月

华校中学生拒绝服兵役以免在紧急时期当砲灰，引发“五一三学潮”

11 月 22 日

人民行动党宣布成立，由李光耀担任党秘书长

等汇兑店转寄中国，或作上列的代理店，收价稍高。

上述三等信局的收价虽然高低不同，但大多是根据香港及上海分店或代理人每天用电报拍来的行情为标准，并加算约10%，作为中国方面的分信工及当地的印件电报等费。

侨汇的发达时期（1937–1941）

一百年来，侨汇在中国的经济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过去中国的入超（贸易逆差），就是藉着侨汇弥补。而在世界各地的侨汇中，新马侨汇是最重要的一环。据估计，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1年止，总计四年半侨汇数额为国币53亿元（折合叻币11亿元），每年平均数为国币11.7亿元（约为叻币2.45亿元）。在这里，新马所占的数额，大约是七分之一，即是每年国币1.67亿元（约为叻币3500万元）。若以中国对外贸易入超数目而论，1938年的入超总数是国币1.23亿元，则移新马华侨的汇款挹注，尚有余裕[20]。

由此可见新马侨汇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实在不小。这时期的侨汇之所以有辉煌的成绩，除了华侨热心捐款支持抗战外，其中最重要因素便是当时新马经济繁荣，华侨对国内巨大投资（包括矿农、畜牧、贸易以及资助华南各种事业的建设）所致[21]。

必须说明的是：抗战时期新马侨汇虽然发达，但还不致造成民信业的繁盛。这是因为此时筹赈中国的汇款，多数由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通过中国银行转寄国内；部分的家用汇款虽也经过民信局，但此时国币币值稳定，信局盈利不高，所以民信业务还是正常发展。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战火迫近新马时，一部分华侨纷纷将其储蓄购汇国币，寄返国内眷属；但有一部分汇款因新马沦陷在即，寄发不及，以致积压下来。这些汇款人都希望等待战事结束后，再来计算支领[22]。到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后，民信业便完全停顿。

虽然在日治期间，“昭南当局”曾准许华侨汇款归国，并指命闽、潮、琼三帮汇业人士及台湾银行（即今小公银行）和正金银行（即今汇丰银行）接收侨汇，每人每次限汇100元（斯时汇率是叻币或日军票一元值国内沦陷区储备券18元）。但华侨财产既经日军搜括一空，复以申请手续麻烦，汇款乏人，该令不久即被取消[23]。而一些寄汇者到战后接到国内家书，才知道该项汇款全无收到，均已落空了。

战后民信业的复兴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经过将近四年的悠长岁月，寄汇无门，对于国内侨眷的缅怀，更是无法形容。1945年9月12日，日本投降以后，侨民都急于汇款回国救济家眷。可是，在当时联军登陆后的两个月内，马来亚与中国之间，只有重庆、上海、香港、南京、汉口、北平、天津等埠，有电报可以沟通；至于邮政则全未恢复，侨汇也尚未得伦敦当局的批准[24]。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侨众于渴望之余，纷纷恳请政府速通侨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华侨

---

[20] 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170。

[21] 傅子樵，〈马来亚侨汇情况〉，载《南洋商报》，1949年1月1日。

[22] 这些战前积压的侨汇，到和平后作清理工作，对当时汇业界来说是件极繁重的事。因为战前国币汇率每万元约值叻币1200元左右，可是到战后却降至13元（《南洋商报》，1946年6月11日），而且还在继续下跌中。这种金融上的意外变动，造成极大纠纷。本坡中华汇业总会为此曾召开多次会议，并请示各有关当局商讨对策（《南洋商报》，1946年6月4日；《星洲日报》，1946年6月7日），花了整四个月的时间，到1946年8月23日才通过解决战前侨汇办法三条，兹录于下：

“（一）汇款在1941年12月6日以前收汇者，经已遵守当时当地统制条例汇出，一律应当作汇出结算，12月6日以后收汇者，其经汇出之款，须有汇出证件或邮局盖戳为凭，否则当作未汇出论，应将原汇如数退还汇款人，倘经汇出而在国内尚未交款者，应由汇款人补贴国币24倍，仍由汇款人重汇国内照交，如汇款人欲领回，亦得由经汇人按照汇款数目补贴国币24倍，以现时市价折算领出马来亚币。

（二）1941年12月6日以后，当地未被占领前收汇，而在光复后汇出之款，应照汇出时之汇率伸算国币交付国内收款人。

（三）当地未被占领前收汇，仍存在国内之款，应请我国（中国）政府增加津贴24倍交付收款人，存在国内银行之家用汇款，无论存在政府银行，或商营银行，或民信代理局之家用汇款（如经在战争期中交妥者则作罢论）；若未交妥者，应列报本会，以便汇集讨论，呈请总领事馆转请中央政府补贴24倍，此项补贴之汇款，在政府未核准以前，先由经汇人垫付”（《南洋商报》，1946年8月24日）。

[23] 许云樵、许直合著，《新加坡工商业全貌》（新加坡：华侨出版社，1948年），页49。

[24] 心远，〈沟通邮电与侨汇〉，载《华侨经济》卷1期1（1945年11月23日），页2–3。

各行商务的最高机构，由于民信局及侨民的请求，总商会乃向当局陈情，要求准许华侨汇款救济家属，并要求政府特辟空邮载平安信件返国[25]。

同时，新加坡数十家战前经营民信业者，经过三四年的冬眠状态，今观时机已至，乃大作复兴准备。但是当时各民信局在战前所领取的营业执照，都已过期失效了。按理，要恢复营业必先领取执照。于是闽帮侨通行负责人林树彦首先挺身而出，向政府商洽请求发给新执照，以便继续营业[26]；接着，闽侨汇兑公会、潮侨汇兑公会及琼侨汇兑公会也分别登记各该帮民信局，计有：闽帮32家、琼帮24家、潮帮21家，合共77家，造表联合呈送当局报告该业情形，并听候发给执照[27]。不久即获当局答复称："原则上可以接纳，但因新马对外汇率，尤其是中国，尚未订定，当侯汇率宣布后，才能实行发给"[28]。

民信局同业在接到政府覆函后，知道此事"欲速则不达"，乃召集同业联席会议，共同磋商通汇及复业的进行办法。于是，林树彦再度出面，邀请闽、潮、琼三帮汇兑公会各派代表三名，在1945年10月31日下午一时假侨通行会谈。席间决定："如欲从速复业，应更进一步地向当地政府与中国政府商洽，迅将汇率订定"。各代表于是号召各帮侨众，依照战前"新加坡各帮汇兑公会联席会议"的名称进行工作（临时办事处即设在侨通行），并公推闽帮的林树彦，潮帮的余功良与琼帮的韩鸿丰为代表，负责向有关方面接洽[29]。结果，本地军政长官答允尽力设法，唯须待伦敦政府的训示才可恢复[30]。

经过各方的努力，1946年3月18日（星期一），中南侨汇正式开通[31]。但所有的侨汇必须依照下列条件进行：

（一）所有汇款须由银行或指定信局汇寄

（二）对于任何一家庭，每月最高汇款为马来亚币45元

（三）对于一家庭，仅能容一人汇款

（四）此项汇款必须系用以维持家庭而非作别用

汇款人之所有汇款须由同一银行或信局汇寄，所有汇款的报告，均须交予外汇统制官（Controller of Foreign Exchange），任何人在金融条例下触犯上列条件，将处以三年徒刑及罚款一万元[32]。

这些条令宣布以后，各银行及民信局乃于1946年3月18日起收汇，民信界一时呈现百花齐放现象。但由于所有汇业均以中央银行所公布的美金汇率为标准，当地政府并无规定国币汇率[33]，仅由此间各银行自定，因此开盘后，各行汇价不一。如中国银行所订的汇率为每万

[25]《星洲日报·总汇报》，1945年9月22日。

[26]《星洲日报·总汇报》，1945年10月3日。

[27]《星洲日报·总汇报》，1945年10月23日。

[28]《星洲日报·总汇报》，1945年11月1日。

[29]同上注。

[30]《星洲日报·总汇报》，1945年11月2日。

[31]《南洋商报》，1946年3月7日。又：本地民信业人士在争取中南通汇时，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以"新加坡各帮汇兑公会联席会议"为代表，在中华总商会协力下，致电重庆侨务委员会，恳请中国外交部向英国交涉，并另呈马来亚军政长官，请速开放侨汇。直到1946年3月5日，上海中央银行才宣布中国对外汇率是以美金为标准，规定美金一元兑法币（国币）2040元，而黑市美金一元约值叻币三元余。因此新汇率公布后，汇率乃无一定标准。详细过程见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载《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173-175。

[32]《南洋商报》，1946年3月15日：通告中所称之"家"，甚有疑义。嗣后根据中国银行负责人与外汇统制官商谈结果，决定："此项'家'之单位，系以家长本人及其妻子为限，凡亲友戚族及工役之聚居一室者，仍可按上述单位之标准分别汇款"。

[33]《南洋商报》，1946年3月16日。

元国币值叻币15.625元；汇丰银行直汇上海及重庆的汇率为每万元国币值叻币15.50元；华侨银行规定汇率每万元国币收叻币15.80元，另收每封邮资叻币0.40元；广东省银行的汇率是每千元国币收叻币1.5625元，民信每封加收0.40元[34]。

至于民信局方面，因港沪汇率核算，汇价也是参差不齐的。但一般上均比银行规定的价格低，保持在14余元之间，很少高至15元者[35]。因为民信局同业们认为："以中美汇率申算，国币每万元只需叻币10.50元之谱，黑市计算也不过12元强，银行界收15元以外，未免过于厚利。民信营业的目的，第一固然是为了赚钱，第二便是为侨众服务。尤其是在这困苦时刻，更不应取过高的汇率"。基于这个原则，他们乃一律减收汇价，以利侨众[36]；并实行划一各民信局汇率的计划[37]。

本来，当政府还未发给民信局执照时，深恐他们垄断汇价，乃订"汇兑民信四项法令"，规定信局收价不能高于银行。但却适得其反，民信局的汇价反比银行低廉。

中南侨汇现在是已完全开放了。从此，华侨汇款回国，除每人所汇不得超过45元外，其他所有汇款（如加多汇额等），均须经外汇统制官的批准，才可寄出[38]。民信局在领取执照后[39]，营业步入正轨，发展到最高峰，便是它的黄金时代。

民信业的黄金时代（1945–1948）

1945年9月12日新马光复以后，断绝了将近四年的中南音讯得以恢复。侨民纷纷投书向国内亲属报告此间情形，而侨乡亲属也来函叙述国内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的窘境[40]，希望此间华侨尽速汇款回国接济。一般投机商人，就是利用华侨急于汇款的心理，私定汇率，每100元国币竟收至叻币5元，乘机牟利。但因未获信赖，所以寄汇者甚少[41]。到1945年11月间，各银行及民信局规定以叻币5.38元兑国币1000元的汇价复业以后，侨民乃争先恐后前往投寄。不及一周，汇款数额竟超过1.5亿元，其间获利约每汇1000元国币可赚叻币1.09元。一周之间，赢利最少15万元，数目之巨，利益之厚，诚足惊人[42]，民信业于是成了新加坡光复后最热门的生意。加以民信局的谋利方法，是以香港为汇运中心，以叻币购汇港币，然后再以港币从黑市里兑换国币，利用国币日跌、港币不变的套汇之术，大赚其钱[43]；有些信局甚至故意扣留侨汇，等到国币黑市价低降后才付款，藉以猎取汇率低跌的巨利[44]。就是因为国币日跌[45]，所以造成民信业利润日升。那时纵使没有计然之术的，经营起民信业来也会钞票滚滚而来，成为小暴发户。有些商号甚至如眼镜公司[46]、药行[47]等也经营起民信业，民信局成了

---

[34]《南洋商报》，1946年3月18日。

[35]《南洋商报》，1946年3月20日。

[36]《民报》，1946年3月18日。

[37] 本坡闽侨汇兑公会曾一度规定以国币10万元为单位，执行划一收汇价格（《南洋商报》，1947年12月9日），但各信局为广招徕，各自为政，这样措施遂告失败（《中兴日报》，1948年1月8日）。以后这种参差不齐的汇价，就一直没有统一过，直至1949年9月中国解放后为止。

[38]《公报》，1946年6月17日。

[39]《南洋商报》，1946年3月20日："（当局）于18日发给汇兑执照，领得者有华侨银行三纸，广东省银行二纸，中国银行二纸，闽粤琼潮各籍民信局，计129纸，总达136纸"。

[40]《华侨日报》，1946年1月11日："（国内物价高涨的情形，以闽西、广东、浙江一带尤盛）闽西上杭、武平、岩前等地，米价每石2400元左右，猪肉每斤150元，国产自由布每尺290元，赤金每两6万5000元，金价在日本未投降前每两达13万元，日本投降后，突落至二万元，嗣涨回6万5000元，闽西一带无论在日本投降前后一切物价均较闽省各地为廉。广东大埔方面：米每石6500元，猪肉每斤220元，自由布每尺500元。浙江：该地一件较好之旗袍，价达100万元以上，经济学一书，价值25万元一本，其他各物亦极高价，人民生活极感困难"。

[41] 文泽，〈为汇款侨胞呼吁〉，载《星洲日报·总汇报》，1945年12月7日。

[42]《星洲日报·总汇报》，1945年11月29日。

[43]《南洋商报》，1946年7月26日。

[44]〈马来亚侨汇情况〉。

[45]《星马通鉴》，页631–632："关于国币惨跌的情形，现举一个具体例子。比如华侨于民国26年汇出国币一万元，存入国内或国外中国银行，按照当时国币的价值，本来可在国内购置一座洋楼，但至民国27年，就只够买一架汽车，民国34年只可买一包白米，民国35年只可买一只鸡，民国36年6月只可买一条鱼，12月只可买两盒火柴。到民国38年，一万元才值叻币二占，最后国币终至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46] 如平平眼镜公司（《星洲日报·总汇报》，1945年11月10日，广告）；亚东眼镜公司（《星洲日报·总汇报》，1945年11月12日，广告）等是。

[47] 如联邦大药行（星洲分行）等是，《星洲日报·总汇报》（广告），1945年11月16日。

战后初期新加坡社会的畸型产物。

从1945年11月至1948年这段期间，可说是民信业的黄金时代（其中以1946年及1947年上半年最佳，1948年则较逊色）[48]。这一方面是由于战后初期华侨都急于汇款回家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币价值日降，而银行却格于遵守国币官定汇率，所收汇价较之民信局国币自由汇价（黑市）高昂。最初银行的国币汇价较自由市价高10%至20%，继后则相差愈来愈大[49]。

在这种情况下，致使银行侨汇业务难以与民信局竞争，再加上银行寄汇往来的时间，一般上都比民信局延缓，因此汇款者均舍银行而选民信局，造成民信业日趋巅峰；而银行侨汇业务日走下坡，民信局几乎囊括全部侨汇。

战后新马侨汇的大量逃避，成为香港金融投机一主要部分，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造成侨汇的逃避，除了上述中国国内经济根本问题未解决、币值未稳定等因素外，本地民信局的林立，也是一个导因。因为侨汇黑市途径，均为民信局经营。

民信局套取国币的方法有三：（一）在本坡买货出口，在香港将货变款，而复买入国币；（二）由本坡银行汇取港币，在港代理人即将此项港币视国币变动时机，买入国币；（三）由本坡将收受侨汇的商号打单，持单向港汕联号或办庄，随时兑取国币[50]，所以逃避侨汇十分便捷。此外，本地侨汇逃避香港也不困难。因为新马与香港同属英镑集团，是以新马超出当地限制的侨汇额以及其他商业汇款，均可大量汇转香港[51]。再者，香港的金融在法律上虽有统制，但对侨汇之转汇及国币交易，实际上没有受牵制，因而形成侨汇逃避的大本营[52]。新马侨汇逃港数额，虽难获得精确数字，但根据香港有关方面的估计，世界侨汇经香港逃入国内者占侨汇总额80%，每月至少有美金2000万元。由此可见新马侨汇逃避额于该项数目中，殊非微小[53]。

盛极必衰

新加坡民信局分福建帮、潮州帮、琼州帮、广东帮及客帮等五帮，其中以前三帮信局较为重要。根据1938年“星华筹赈会”调查所得，约有65家[54]，但在黄金时代中，全新信局共计约200余家[55]。同业组织，除闽、潮、琼三帮汇兑工会外，尚有1946年3月成立的“南洋中华汇业总会”[56]及1948年10月成立的“中华汇业股份有限公司”，藉团结精神，共谋业务发展。总会办事处设于大坡客纳街（俗称大门楼）49号B[57]。第一届正会长是林树彦，副会长是韩鸿丰及周镇豪。属下会员除本坡民信局外，马来亚各地同业参加者也很多。

华侨汇款回国数额的增减，由好几个因素决定，如海外华侨人数、海外华人的经济状

[48] 王文灿，〈新加坡的侨汇〉，载《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1948年），页9。

[49] 战后国币官定汇率（银行挂牌价）与自由市价汇率（民信局收汇价）对照表（1945–1948），参阅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载《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179：单位为每万元国币对叻币一元的比值。

[50] 《总汇报》，1946年10月21日。

[51] 〈马来亚侨汇情况〉。

[52] 《华侨日报》，1947年5月10日。

[53] 同注51。

[54] 佚名，《南洋与华侨》（南洋大学图书馆影印本），页15。

[55] 《南洋商报》，1953年1月29日。

[56] 《南洋商报》，1946年3月16日；汇业总会共有三本特刊，分别出版于1947，1948及1958年。1958年时，该刊物由原名《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改名为《汇业特刊》。

[57] 〈南洋中华汇业总会章程〉，载《华侨日报》，1946年1月17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4月至5月

爆发福利巴士工潮，为反殖情绪高涨的一大事件

6月6日

全新加坡500多个社团在中华总商会开会，讨论教育问题，主张保持华校优良传统

况和国内的治安与投资机会等[58]，此外，汇率的高低也很重要。汇率有利时可以多汇，否则少汇。战后国币汇率低、跌幅极大，使得华侨对国币失去信心[59]；再加上上述的因素不利于侨汇，因而导致侨汇的衰退。虽然汇率的低降，民信局利用套汇方法，营业蒸蒸日上，形成汇业的黄金时代，然而，“盛极而衰”，中国通货膨胀短暂地使民信业走入红运，但跟着而来的便是它的衰微。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以后，民信业从此一蹶不振。

根据笔者于1970年10月调查所得，新加坡当时尚存的民信局约有55家，即闽帮22家，潮帮12家及琼帮21家，如果再加上广客两帮的信局，也不过60家。60家的信局与黄金时代的200余家数目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60]。民信局是建立在一个移民社会的基础上，当时旅居新加坡的华侨，他们的眷属多在国内，很少在这里建立家室的。由于他们与中国尚有眷属亲戚等关系，故有逐月汇款回乡接济家用之需。加以其时银行制度未盛，侨民既感银行汇款手续繁苛，语言尤多隔膜，因此，汇款者多舍银行而趋信局，才造成民信局的滋生。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一切情况都改变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境的华侨几乎绝迹，而新马两地也相继独立。大多数的侨民都安定下来，成家立室，致力于当地的建国大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逐渐地疏远了。而侨生人数的增加，更减少了汇款的可能；银行业务的高度发展，过去中国通货膨胀情形不复存在，也使一些汇款者改由银行寄汇。根据新加坡大学经济学系李绳毅讲师研究所得，从1958年至1964年，新马两地华侨汇款平均每年数额是1400万元（其中以1961年及1962年最少），多数经由银行寄汇，尤以中国银行收汇最多[61]。职是之故，民信局业务更受打击。民信局既是建立在一个移民社会的基础上，现在这社会基础动摇了，它也就自然跟着消失了。

[58] 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载《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188–199。

[59] 参见注45。

[60] 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载《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200。

[61] 同上注。

第二节　华侨特有的专递服务
——各帮信局及其行业组织

摘要

“侨批”是海外华人寄给国内家眷的家书与汇款。本节旨在探讨新加坡早期的侨汇与各帮民信局的盛衰，并着重分析其业务性质、组织结构、营运方式、经营网络等特色，以及由它们所组成的同业公会，为了解新加坡早期的华人社会提供另一个切入点。

Abstract

“Qiaopi” refers to the letters and remittances sent by overseas Chinese to their families back home in China. This section discusses the nature of the business structure of the remittance houses under various “bangs”, its operational methods, business networks, trade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is provides another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Singapore.

李志贤 (Lee Chee Hiang)

19世纪以后，由于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中国华南各地人民大量移居东南亚[1]。华侨的递增带动了汇送侨批的需求，过去那种回乡时亲自携带或委托返乡亲友代为转送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大量通信和汇款之需。当时中国还未在全国各乡县镇内地设立邮政设施，于是专门为华侨递送侨批的“水客”应运而生。关楚璞在《星洲十年》叙述了南洋尚未有汇兑信局之前：

侨胞欲寄款回乡，多委托以来往南洋汕头间代客运送银信物件或引导新客南来为专业之水客，此等水客往返，每年计分六期，正月、五月、九月三期为大帮，二月、七月、十月三期为小帮；每期返乡，行前均至同乡常有往还之商店收取银信，收齐后即趁轮回汕转乡，按址分派，及取回收据或回信，继即在汕购办各种同侨应用货物，南来推销。同乡中有新客南来者，以程途不熟，又多托其沿途照料……[2]。

“水客”既是最早为华侨递带侨批和物件回乡的专业，也是指从事此专业者，又因为他们也引导新客南来，故又称“客头”。他们大多依靠一些小杂货店为乡亲收取侨批，也有些深入矿山、园区和农场等去招揽生意。有些水客还在回程之前刊登广告，以作宣传，招徕生意（表一）[3]。他们所收到的批款皆是当地货币，在国际汇兑业还未发展之前，水客须将收到的批款购买商品，到家乡后将货物变卖换为现款送达受批人。我们从以上关楚璞的叙述中，也可知“水客”的运作和业务，已经不止于通过递送侨批和引带新客过番来赚取佣金。由于他们谙熟“番畔”和家乡两地情况，对沿途中各地的水陆托运也有丰富的经验，遂逐渐兼营各种土产买卖，以赚取更高的利润。这不只是汇兑条件的客观因素所使然，也是可供赚取更高利润的主观诱因所驱动。因此，这种早期由侨批所衍生的递带行业本身已包含有跨域贸易的商业性质。

表（一）：水客刊载于新加坡某报之返国广告

水客吴寿如回国启示

启者鄙人昨日由山顶各埠区返抵本坡，决定本期芝字船返港回国，各亲友仍有信款事宜委托者，请早日（九号以前）寄到或驾临面商幸勿延误为祷。

水客吴寿如寓：巴黎旅社

九月五日

资料来源：杨建成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页97-98

除了专业水客外，还出现一些临时水客。他们多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到新加坡从事短暂性的农业或耕植的劳务，回国时顺便代为转送侨批，赚取另一笔外快[4]。专业水客络绎不绝地往来于新、中两地之间，在逢年过节收到较多的侨批而须“走大帮”时，也会在国内搭班或雇请伙伴（即批脚）帮忙解送侨批。但他们毕竟属于小个体户，在移民人数迅速增长，侨批与日俱增的客观形势下，其承接递送侨批的传统运作方式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另一方面，“因水客良莠不齐，每有逃没信款情事”[5]，或因办货亏损，无法发批，那些较有信誉的客头就“利用小杂货店做根据地，凡是要汇款回去的华人，或者要得到客头代他们从中国带来的消息，都要到杂货店来询问，此后，再演进一步，小杂货店便成了‘民信局’的前身”[6]。

这些小杂货店为了招揽生意，也代顾客先行垫汇，虽然收取小数额的利息，却也渐渐获得乡亲的信任，收到的批银也越来越多，有些汇款人还将要汇回家的款项预先存放在这些店铺。店铺东主除了向汇款人和水客抽取若干费用外，还可以用这笔批银来周转，扩充业务，可谓一举两得。就这样，小杂货店成了民信局的前身，它们有不少因此而获得可观的收益。

[1]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出版馆，1938年），页48。

[2] 关楚璞，《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年），页585。

[3] 杨建成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页97-98。

[4] 滨下武志，〈传统社会与庶民金融——新马华人社会的合会与银信汇兑〉，载《1985年华侨华人历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64-73。

[5] 同注2。

[6] 许云樵，《星马通鉴》（新加坡：星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9年），页624。

民信局的发展与现代邮政和银行的推动

因为有利可图，到了19世纪30年代以后，新加坡一些有信誉有资金的商人开始创办民信局，代收本帮乡亲的批款。新加坡的民信业自此兴起，民信局发展步入另一阶段。这时期的民信局虽然已是当地社会一门独立的新行业，但其营运方法仍然保守。芮诒埙在〈有信银庄琐忆〉一文中对新加坡早期民信局的运作情况有生动的描述：

新加坡各个较大批局，职司招揽寄批员工，例皆自备一本小册子，详细记录其所经手大户，每年分寄家乡亲友批款的人名、地址、金额、甚或有详细记录其姻亲、朋友关系称呼者，每届年梢，便登门招揽；寄户或有遗漏，则当面补上，或在征得寄批人同意时，代为开列名单，一般豪商巨贾，事冗心繁，大都莞尔一笑，交易立成，旬日之后，回批送还，才向收账，咸称妥便。……星马批业例须备足三副本钱，盖一副应付门市，一副汇汕在途，一副应付各地州府代理周转。……

新加坡批局收汇侨批，除店前外，还须简派专人，深入各个胶园区、锡场、工厂揽收，按期送回唐山亲人回批。不少送批员还代寄批人写批和宣读回批仔，务使寄批人心满意惬[7]。

《星洲十年》也有如是的记载：

营业范围较广之商号，内地口岸，每有分店或联号，而各口岸之联号，又多与内地市镇商号有交易往还，此等内地市镇商号，多为当地人士所经营，对于附近居民，非亲则故，藉其办理交收，方易收稳妥迅速之效。[8]

从上文的描述中可知新加坡早期民信局的营运方式，仍需要聘用许多水客，上门招揽生意、递送批款、代写家书、传达乡讯，甚至代为寻找失散亲人，提供一系列高效率、人性化和个人化的服务；而且，其资金周转和信用更胜于个体户的水客。在客户一时无法凑足汇款时，民信局代为垫付，待收到回批再予结账，故深受欢迎与信赖而得以迅速发展，而寄款人与民信局也由此建立起密切关系，不只是民信上的往来而已[9]。

现代邮政和银行出现后，为方兴未艾的民信业提供了一个加速发展的契机，对它后来的跨域业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民信局也由此步入与现代邮政和金融体系接轨的发展阶段。自1845年，新加坡和香港每月定期一次邮轮往来[10]，民信业者很快地掌握这个契机，他们意识到国家邮政在邮运上的安全快捷，可以提高投递批信的效率，故而通过邮局中转，或直接与邮轮挂钩，充分利用这个互补的功能。例如一些潮帮民信局便积极地在汕头和马来亚各城镇设立分局和联号，将各地收到的批信邮寄至新加坡总局集中起来，装入邮包经由邮局运往汕头的分号或联号，通常在一周至10日后即可

批信回乡

[7] 芮诒埙，〈有信银庄琐忆〉，载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汕头文史》（第4辑），1987年，页96。

[8]《星洲十年》，页578-579。

[9] 林树彦，〈银信局与侨汇之由来〉，载《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7年），页2。

[10] 高维廉，《马来亚侨汇及中马贸易之展望》（新加坡：中南联合出版社，1950年），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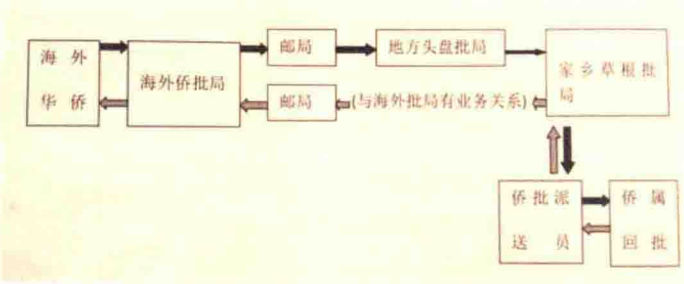
相关人物

马绍尔　林有福

历史事件

首席部长马绍尔率领的各党派代表团在伦敦因独立谈判破裂，愤而辞职，由林有福继任

图（一）邮局与民信局营运的互补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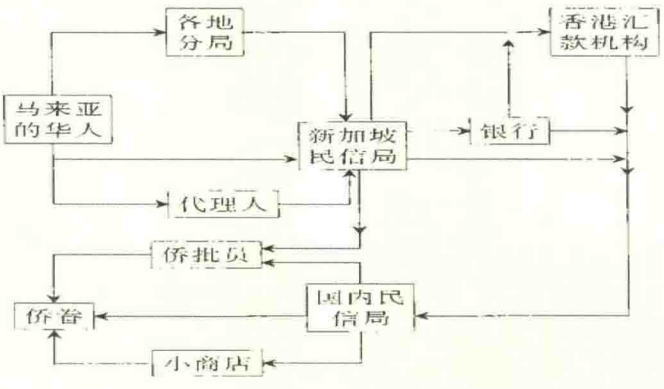


送达，汕头批局收到后立即派人分发，既快速便捷，又有条不紊，大大缩短了递送批信的时间和增加了往来递送的次数。这样便形成了批局—邮局—批局的合作关系和营运网络（图（一））。从这个角度来看，邮局无疑成为民信局营运网络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代银行业务也为民信业的汇款网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20世纪，民信业发展到一个阶段后，倍增的大量批款已经不是传统运作方式所能有效处理的。无论民信局还是邮局，它们的汇款和货币兑换的流程都有赖于银行才能完成。但中国的银行设立较晚，经营范围有限，且在南洋尚未设立分行，因而新加坡民信局的汇兑业务多由在地的银行经办。它们所收取的叻币、英镑等批款大多在新加坡的银行兑换，或汇至香港的银行兑换，只有少数被带回中国境内的钱庄换成银元发给受批的侨眷（图（二））。

民信局也通过银行汇款牟取更大的利润。批局之得以向客户收取低廉的费用，有时甚至不收费，正是因为汇率

图（二）侨批局的汇款网络



资料来源：焦建华，〈试析侨汇网络之构建与运作〉，载《侨批文化》（第6期），2006年6月，页47

浮动的差价带来的可观的利润才是它们盈利的来源。以潮帮民信局为例，它们从新加坡和周边区域陆续收到零星的批款后，并不随即汇至汕头，而是先存入银行户头，让汕头的分号或联号周转发出批款，等到积累了大笔款项后，或是在汇率升至更有利的时候才汇到中国或香港的分号或联号，这段期间所赚取的银行利息和汇率的差价所带来的盈利成为一笔重要的收入。此外，就如最初水客或收批的小杂货店的运作模式一样，所收到的批款，可资周转，或充实资本，或扩展其他业务，赚取更大的收益。所以，银行对侨批业而言，实质上存着一种互惠互利的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对手。

新加坡各帮民信局（19至20世纪）

1870年前后，中国华南各都市开始办理华侨汇款业务，而最先与南洋当地同乡侨商合作经营民信业务的是厦门的民信局。此后，潮州帮、广东帮、琼帮、客家帮的民信局，从1887年起在南洋各大城市先后创立[11]。民信局又俗称信局、批局、汇兑信局、汇兑庄。新加坡的民信局基本上以服务对象的原籍地自成体系，各帮民信局皆以所属籍贯的客户为主，批信的发送地也当然多是原籍各乡镇，这是民信业的原始性质。民信局分帮而立的特色反映了当地华人社会，尤其是新马华人社会的帮权结构现象。

据傅祖顺在其〈泉州侨批局初探〉一文中，谓新加坡最早开设的“天一批局”创办于光绪六年（1880年）[12]，但文中没有说明所根据的资料；柯木林也曾指出新加坡最早创立的批信局据说是在今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俗称源顺街）一带[13]，但创立的具体年份、确实地址和创立者的籍贯身份，因世代久远，已不可考。在不同时期经营的各帮民信局究竟有多少，现存文献所见的统计不一，各有所据，准确与否，已经无法考核。据1887年的统计，除了一些无固定地址的水客往返各地，作流动式地收取批信，新加坡各帮民信局有49家，其中潮帮占34家、闽帮12家、广东人开设的仅1家、客籍2家，直至1891年仍保

[11]《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页99。

[12] 傅祖顺，〈泉州侨批局初探〉，载《新加坡菜市集邮会会刊》（出版年代不详），第4期。

[13] 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1949）〉，载柯木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页152。

持49家[14]。根据“星华筹赈会”在1938年所作的调查，当时有65家民信局[15]，二战后民信业进入黄金时代时，数量竟增至200余家，可是到了1953年，汇兑业已日渐衰微，各帮民信局只剩70余家[16]。

闽帮民信局

闽帮民信局又以方言之别分为四系：厦门、金门、同安、南安、安溪、永春、德化、海澄、龙溪、漳浦、华安、长泰、南靖、云霄、诏安、东山、适中、漳平等县族人所经营的民信局自成一系；福州、长乐、福清、永泰、闽清、福安、三都澳、福鼎等县人士所开设的又为一系；兴化、莆田等县华侨经营的民信局另为一系；龙岩、永定、上杭、长汀等也自成一系[17]。厦门等县族人因占本地闽人总人口的多数，故此系民信局也相应最多。据统计，至1937年，闽帮各系大小民信局已有42家[18]。

1938年，原籍福建安溪，从印尼占卑到新加坡发展的林树彦创设侨通行于直落亚逸街，商号取“沟通侨汇”之意。由于业务发展迅速，信誉日隆，遂于美芝路（Beach Road）开设分行，并在泉州和香港等地设置分号。虽在二战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业务完全停顿，但侨通行在战后恢复业务不久就崛起为民信业的翘楚之一，除新加坡的分行外，经营网络逐步扩大至全中国、马来亚和印尼各地，约有25家分号。收汇数额从战前的每星期十几二十万元增至四五十万元。一直到1950年代初，可说是侨通行的全盛时代，其规模已超越战前民信业的第一把交椅和丰、信通、正大等几家驰名的民信局[19]。

由中国寄至新加坡的回批（正面、背面）

潮帮批局

在新加坡，潮帮是排在闽帮之后的第二大方言群，但其民信局的数量与规模却不比闽帮逊色。潮帮最早设立的批局是原籍澄海的黄继英在1835年创立的致成信局。致成信局是黄氏在1829年创办致成染坊（其后改称致成栈）后有鉴于侨批市场的高度需求所开拓的另一事业。此后，曾润元栈、森峰栈、陈瑞泰、谢来福等34家批局先后成立[20]。1900年至1919年近20年间，潮人新创办的批局如雨后春笋般兴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是潮帮民信业的兴盛期，新创办的民信局多达50余家[21]。至于汇款额，在二战前则已达到“每年约千余万

[14] 许云樵，《星马通鉴》，页626。

[15] 佚名，〈南洋与华侨〉，载《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1939年）。

[16] 〈汇兑业已日见衰微，由二百余家减至七十余家〉，载《南洋商报》，1953年1月29日。

[17] 《星洲十年》，页579–580。

[18] 《星洲十年》，页580–582。

[19] 柯木林，〈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载《石叻史记》，页142–144。

[20] 王炜中、杨群熙、陈骅编著，《潮汕侨批简史》（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页120–121。

[21] 据邹金盛《潮帮批信局》（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年），页316–385和《潮帮批信局续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页218–227。二书收录之新加坡潮帮批局所作的不完全统计。

元，每月平均在一百三十余万之谱，若在旧历年终，则恒达二百余万”[22]。二战刚结束时因受外汇统制的影响，汇款数额相对锐减，许多民信局因无利可图而纷纷结业。据统计，于1945年通过“新加坡各帮汇兑公会联合办事处”登记向政府申请恢复营业执照的潮帮民信局只有21家[23]。但战后不久，潮帮批信业呈现繁荣的局面，据1947年出版的《新加坡工商业全貌》记载，当时领到执照经营的潮帮批信局已增至45家[24]。

李伟南家族所经营的民信局在潮帮同行中最具声望，独领风骚。这和李伟南本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以及其独特的组织形态和经营网络不无关系。李伟南原籍潮州澄海，16岁随父南来新加坡后在历史悠久的侨批局“孔明斋”任职四年有余。在这期间所学习的知识与经验，为日后创业打下良好的基础。1900年李伟南和兄长与好友李应筹合资在新桥路（New Bridge Road，俗称大坡二马路）33号创立再和成伟记汇兑信局（以下简称再和成），业务范围以潮汕各地的批信为主，兼收其他地区的汇款。由于李伟南长期管理新加坡潮人创办的四海通银行，拥有广泛的人脉与社会资源，他凭着独到的投资眼光和经营策略，以新加坡为基地，在南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成为新马的金融巨擘。二战后李伟南将再和成交给女婿周镇豪管理，这时的再和成业务发展堪称一日千里，旗下的侨批局分布在东南亚许多地区、香港、汕头，以至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俨然形成一个广大的跨域经营网络。

琼帮民信局

琼帮的汇兑信局集中在小坡海南人聚居的密驼路（Middle Road，俗称海南一街）和巴米士街（Purvis Street，俗称海南二街）。俗有“兑汇街”之称的海南二街曾有四宝文、南方、南同利、三盛、锦泰隆、和记等十余家民信局在此营业。海南一街的民信局相对较少，有顺成隆、会源丰、人信庄、泰南隆、琼盛、阜安等商号[25]。琼帮民信局究竟肇始于何时，无可稽考。据关楚璞《星洲十年》所载，“琼侨营民信业者，以恒裕成号与曹琪记号为嚆矢，入民国后，营斯业者渐增”[26]。《星洲日报》曾刊文谓“据该业之老前辈称，最先设立者为琪记等号，时约在光绪年间”[27]，此文所指之“琪记”是否就是上文所指的“曹琪记号”，不能确定。该文也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琼侨民信局多达40余家，是该业全盛时期。大战结束后，市民生活困难，汇兑生意无人问津，民信局门可罗雀，是最黯淡时期。虽然后来因南洋土产价格逐渐上升，汇兑业又重见活跃，但日本侵华战事爆发后，闽粤沿海地区被日军封锁，侨汇因而不通，在新加坡的琼帮民信局有三分之二停业。日军占领东南亚各地后，仅存的30余家琼帮民信局亦被迫停业。二战结束后，各民信局才先后复业，当时加入琼侨汇兑公会的就33家[28]。

除了上述恒裕成号与曹琪记号外，由黄义华及其多位朋友合创立于1910年的永吉昌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琼帮民信局。虽然初创时设于桥北路（North Bridge Road，俗称小坡大马路）的店户是经营洋货布匹生意的，但在1920年开始兼营民信业务后，生意兴隆。日据时期，永吉昌业务停顿，战后重新开业。因为是兼营性质，永吉昌的收汇对象仅限于琼州人，所收到的汇款通过向中国银行购汇寄往海口分店，通汇范围覆盖琼州各地。如收到非琼籍的汇款，则委托他帮民信局处理。所以，永吉昌经营民信业的历史虽然悠久，但所收汇额却相对不多，“即使在战后民信业黄金时代，其所收汇款每周也不过一二千元而已”[29]。

---

[22]《星洲十年》，页584。笔者按：此数额有可能比所收到的批款少，因为当时不少侨批局为了减少纳税而隐瞒实际的营业额。

[23]《星马通鉴》，页629–630。

[24] 许直、许钰，《新加坡工商业全貌》（新加坡：华侨出版社，1948年），页51–52。

[25] 王振春，〈汇庄往事〉，载《源》第1期（2013年），页32。

[26]《星洲十年》，页586。

[27]〈琼侨汇业话兴衰〉，载沈时霖主编，《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新加坡汇业联谊社，1947年），页119。

[28] 同上注。

[29]〈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1949）〉，页199–200。

客帮与广帮民信局

客帮民信局不多，至今可考的只有数家，大体上可分为梅县与大埔两系，由于所服务之顾客与业务的覆盖区域有别，两系的商号向来较少联系。客帮民信局的营业模式可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民信局在收取汇款后发出汇票给汇款人，由汇款人自行将汇票寄与收款人，收款人持汇票至该局在中国的分号或联号取款。采用这种模式的客帮民信局有万裕祥、广顺昌等；第二种是寄款人将信及款项交给民信局，由该局雇批脚按址送交收款人，如葆和堂、仁爱堂等商号皆采取此方式；第三种是以水客而兼民信局者，除代寄银信外，尚可代为带人和物。客帮民信局的规模较小，营运模式也趋于原始，而中国银行在嘉州四属县城设立分行或代理处经营汇款业务后，梅县系的民信局相继停业，大埔系的民信局也苟延残喘，日益艰辛[30]。

至今可考的广帮民信局也是寥寥十余家，且多为兼营性质，如中药行余仁生、春泰茶庄、永昌金铺等都兼营民信汇兑。其中多数规模较小，在中国无联号，因此收到汇款后，通常以再托方式由规模较大的民信局处理。和琼帮民信局的命运相似，“因广东省银行的分行和办事处遍设广东各县市，华侨汇款传递迅速，官价与黑市汇率相当时，华侨都往银行汇寄，致使两帮信局不易发展。所以在本地民信界也不占重要地位”[31]。

各帮民信局同业公会的建立

比起客广二帮，闽帮、潮帮、琼帮的民信局数量较多，规模较大，经营网络较广，也

海南二街是海南人的汇兑街

都有汇兑同业公会的组织。新加坡潮侨汇兑公会是新加坡汇业最早创立的同业公会。关于其成立的情况，文献尚存一些资料。据载，1925年该公会由成发号绸庄总经理陈子由太平局绅、万益成号司理杨杞岩发起创立，1929年4月始获社团注册局正式批准成立。公会成立的宗旨在于“联络同业感情，促进汇业机能”。当时加入为会员的商号有再和成、万益成等10余家，初创时以成发号绸庄为临时办事处，四年后才租下里峇峇利路（River Valley Road）19号二楼为会所。到了1940年，会员有18家商号。二战结束后，增至50余家[32]。有关闽粤二帮汇兑业公会的资料所存无几，只知新加坡闽侨汇兑公会在1937年成立，原名“闽南汇兑公会”，成立后数年便有30余商号会员[33]；而新加坡琼侨汇兑公会则成立于1939年3月，数年间会员商号数目只有40家[34]，二战后，商号会员还有33家，接近全盛期的数目[35]。

除了这三所公会外，民信业者还在二战后相继联合成立了数个组织：1946年3月成立的“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7年3月成立的“新加坡汇业联谊社”和1948年10月成立的“中华汇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三个组织的成

[30]《星洲十年》，页585-586。

[31]〈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1949）〉，页195。

[32] 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年），页320；《星洲十年》，页584-585。

[33]《星洲十年》，页580-581。

[34]《星洲十年》，页588-590。

[35] 同注27。

立，除了藉以团结同业，共谋业务发展的一般宗旨外，还有其独特的背景。

二战结束后，各帮民信局纷纷复业，但它们在战前所领取的营业执照都已失效。闽帮侨通行的创始人林树彦遂邀请闽、潮、琼三帮汇兑公会组成一个“新加坡各帮汇兑公会联合办事处”的临时性质机构，开始登记战前汇兑同业商号，代表它们向当局申请新营业执照。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原则上答应发给执照，但要等待对外汇率订定后方能营业。“新加坡各帮汇兑公会联合办事处”过后通过中华总商会代为恳请英国殖民地和中国两地政府从速订定汇率，新加坡民信局终于获准于1945年11月22日起开始收汇。翌年3月，“新加坡各帮汇兑公会联合办事处”改组，成立“南洋中华汇业总会”，推选林树彦为第一届会长[36]。该会的宗旨有三：联络同业感情，巩固各帮汇业机能；促进汇业进展活泼金融运用；建设及履行汇业应兴应革事宜，必要时可集结同业力量创造其他经济结构[37]。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也接受马来亚各地同业商号参加为会员，该会在1947年和1948年出版《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各一期，1958年改名《汇业特刊》，也只出版一期。

为了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民信业加强管理，英国殖民地政府于1948年颁布新法令，规定民信局申请执照须缴交保证金。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会长林树彦又发起组织“中华汇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该公司向政府担保同业会的保证金，同业们只须交一半的现金，另一半由其信用担保，由此为同业商号节省了保证金额[38]。

“新加坡汇业联谊社”则是一所以从事汇兑业工作的个别人士为会员，以团结互助为宗旨，不代表任何帮群民信局或本地民信业的联谊组织。当时发起筹组联谊社的曾昭明等人认为“民信局之以商号组织团体者，则不上40年，至于藉汇兑为职业之以个人组织团体者，虽有经纪公会之设，但规模不大，今日情势迥异，潮流所趋”，故“抱联络同业情谊，加强互助精神，沟通声气，团结一致为宗旨，纠结同业之同志者入会”。联谊社标榜“无帮派畛域之分，无劳资阶级之别”，会员间没有东主雇员之分，不具帮派乡族之别和商号的限制，每一社员都享有同等的权利。联谊社成立后很快便吸引了百余人加入，名誉社员也有30余人，并邀请各帮民信业翘楚和社会贤达如林树彦、郑则光、杨人月、李振殿等十余人为名誉社长，积极响应侨汇公会和南洋中华汇业总会的各种议案，组织各种康乐活动，社里也提供书报让会员阅览，并出版《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39]。

民信业同业公会成立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代表属下民信局商号会员的制度化机构。潮、闽、琼三帮的汇兑业公会创立后就加入中华总商会为团体会员，中华总商会仍然是其代表机构[40]。它在维护民信业的利益上曾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民国政府成立后不久，新加坡民信业者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发生“民信总包事件”的纠纷，在汇兑公会和中华总商会的一再抗议下，双方最后达致协议[41]。

南洋中华汇业总会成立后，成为新加坡各帮民信局的最高代表机构，遵行“巩固各帮汇业机能”的宗旨，统一和协调各民信局的业务规范，并为同业向殖民地和中国政府争取各种利益。1946年10月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向银行发布新的汇款条规，在新条规生效后，民信局即不能像以往一样直接汇款到香港或中国分行或联号，而须先将汇款交给香港及中国的四家银行，再由它们转寄予民信局所指定的内地批局分发给侨眷。

针对这项不利于民信业营运的条规，中华汇业总会向中国和殖民地政府有关当局据理力争，终于说服外汇统制部门取消该项条规[42]。有关当局又于1948年宣布先前从邮政局申请执照的民信局必须向外汇统制官申请执照，此后所有领到执照的民信局不得委托未有执照的商号代理银信收汇，且必须在执照上写明接受批信的地点，并由邮政局直接寄往中国，不得间接

[36]《星马通鉴》，页629-631。

[37]《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7年），页107。

[38]〈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1949）〉，页179。

[39]沈时霖主编，《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页7、67-68、80-81、156-158。

[40]陈丽园，〈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期2，2012年6月，页36-43。

[41]《星马通鉴》，页626-628。

[42]〈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页175-176。

新加坡汇业联谊社发起人合影（1947年3月30日）

邮寄或交给马来亚的信局或联号寄往[43]。这一法令也在南洋中华汇业总会的极力交涉之下作了合理的修改。从以上两个事例，足见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作为本地民信业的最高代表机构，在协调同业内部的稳定和有效运作以及对外的交涉中，已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有效机制。

民信局的营运特点与跨国经营网络

观察各帮民信局的营运模式，可以归纳出几个共同的特有现象：

以兼营方式经营

民信局兼营其它业务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从各帮批局的商业广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特点。以在1947年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出版的年刊里刊登广告的52家潮人批局为例，兼营的就有31家，占了59.6%；而没有兼营其他业务的批局，有多家是属规模较大且兼营其他业务的批局的分号，例如“有信庄汇兑信局”就是“有信庄”的分号[44]。其他帮群的民信局的广告中也可看出这个显著的特点。从广告中可见民信局兼营的业务广泛多元，从矿业到橡胶业和药材，从船运业到汽车和脚车行，从广告业到文具和印刷业，从茶叶到酒和蔬果，从土产到化妆品，从中西布匹到中外杂货，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民信局之所以采用兼营方式首先是因为同行间竞争激烈，利润微薄，通过兼营其他业务，可以获得其他的收入，提高竞争能力。这也是它和政府邮局相比之下一个重要的优势。除了这营业上的策略性因素外，民信局采取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式还有传承性因素和其它现实的需要。早期水客递送批信，便是以兼营的方法赚取更多的利润，并为汇批款的客户提供其他采购服务。作为民信局前身的小杂货店，一开始更是以售卖杂货和其他商品为主业，收取侨批只是增加收入和充实资金的副业。后来发展起来的民信继续采用这种有利可图的兼营形式是顺理成章的。用收到的汇款灵活周转，正是他们兼营和投资其他业务的主要资金来源。

陈春声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正是因为

[43]〈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页177-178。

[44] 曾旭波，〈东南亚侨批信局经营方式初探——以潮帮批信局为例〉，载赖宏主编，《第六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潮州同乡会，2005年），页552-553。

相关人物

顾德

历史事件

3月30日

总督顾德为南洋大学主持落成典礼，参加者3万余人，车辆阻塞于途凡十余英里

侨批业者这样的‘多种经营’的方式，提高了其在海外华侨中的商业信誉，减少了经营成本[45]”。我们可以引申其言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新加坡，民信业兴起初期原可自由营业，后来业者日益增加，英国殖民地政府遂规定业者须领有执照。由于曾发生民信局倒闭及卷逃汇款等事件，政府对于新申请的业者都严格审核，并要求其须有产业作为担保[46]。兼营性质的民信局，可以“寓属”于经营其他业务的商号，这个商号正可以为该民信局提供所须的担保，并加强其在市场上的实力与信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郑绵发信局就附属于经营酒业的郑绵发酒厂有限公司；光德栈成记信局是专营布匹的光德栈成记绸庄的子公司。从这个角度来看，多种经营的方式对无本经营的民信业的发展，无疑起着重要的护持作用。

显著的家族与乡族性

华人家族企业成功的重要关键之一是它们建基于强大的关系网络，民信业也体现了这特点。民信局相对邮局和银行的竞争优势在于它能提供上门收批、代为写信和垫批款的个人化服务。批信送达潮汕后，其分号或联号又能一一登门送批。民信局之所以能如此运作，原因就在于其内部组织成员以及众多客户都具有同乡同族的特点，民信局借助于家族式和乡族式的经营组织，取得递送批信快速、安全、准确和温馨的高效率。

以潮帮的再和成和其分号联号为例，这家民信局最初是李伟南兄弟二人与好友合创的，数年后，李氏即买下其全部产权，再和成遂成为李氏的家族产业。尔后再开设的万益成保家银信局，也是和友人陈渠、许惟德合创。但最迟到了二战后，李伟卿即出任司理，这家批信局的管理权已经完全掌控在最大股东李氏家族的手中。再和成的另外两家分号三发号和四合兴，当然也是李氏家族的资产。至于分布于东南亚各埠和汕头的分号与联号的司理，其中籍贯可考的就有三分之二与东家李伟南是澄海同乡[47]。二战后。再和成的司理一职，先后由李伟南的儿子李毓宽和女婿周镇豪担任，整家民信局的营运网络一直都掌控在李氏家族和乡族手中，局里所雇用的批脚基本上都是同宗和同乡的族人，其服务范围遍及澄海各地及附近其他乡镇，客户的乡族性非常明显。

民信业突出的家族和乡族性，不仅加强了民信局内部的管理效率和保持高水平的服务，而由此衍生而来的归属、认同和信任也使民信局内部雇主、员工和客户之间形成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有利于促进和拓展业务。

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第三届职员就职典礼（1948年3月17日），中立者为侨通行创办人林树彦。

[45] 陈春声，〈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以潮汕地区的研究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期4（2000年），页60。

[46] 《星洲十年》，页587。

[47] 根据邹金盛，《潮帮批信局》（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年），页312-537所作之不完全统计。

广泛的跨国经营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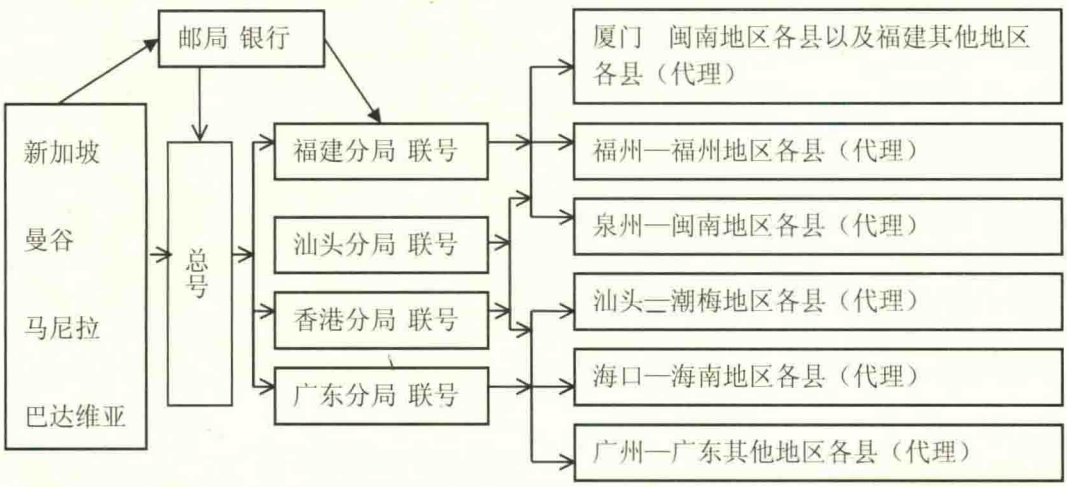
民信业的经营网络中，地方性的草根民信局[48]与跨国性的民信局的关系呈现着垂直性和平行性两种不同形态。垂直性是指总号与分号间的直属关系，而平行性是指民信局与联号之间平等合作的代理关系。有些规模较大的民信局独家经营，它们在本地和境外都设有独立的分号，组成有系统的收、转、投的完整营运网络，但大部分的民信局都倾向于委托代理商号或联号，组成跨国的经营网络。

在境外设立分号的好处是能自由控制资金的流动，又可赚取两方的盈利。但为何大部分民信局却选择和其他批局合作，建立联号或代理关系呢？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设立分号的开销成本较大，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并非首选；其次是对当地社会环境不熟悉，人脉不足，尤其是与当地官员的关系往往不如当地批局那么密切，难以竞争；再次是当地治安不良或是政治局势不稳定与社会动荡不安，投资风险相对较大。考虑到这些因素，委托当地批局为代理或建立联号关系自然成为大多数民信局所采用的经营策略了。

同样以再和成为例，设在新加坡的再和成除了在地的分号万益成、三发号和四合兴，以及一些依托它汇寄信款的草根批局，如广成批局、天安信局等，也在东南亚其他地区与某些民信局建立联号或代理的关系，通过它们接收当地华侨的批信，再以新加坡总号为枢纽，汇寄至香港的德兴行或汕头的光益、捷成等联号或代理，委托他们递送批款。这些联号和代理雇用“批脚”或通过潮汕各县和乡镇的草根批局完成递送的流程。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广泛的跨国经营网络，以东南亚各地为腹地，以新加坡为中枢，以香港为中转站，向中国潮汕地区辐射，覆盖大小城乡。当然，这只是规模较大的民信局才有能力做到的，规模较小的草根批局的业务范围就只限于较狭隘的所在地。

二战期间，新加坡民信业大受打击，一蹶不振。战后一度恢复生气，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趋势，各帮民信同业公会也恢复活动，还组织了代表本地各帮民信局的南洋中华汇兑

图（三）：新加坡民信局的跨国经营网络



资料来源：夏诚华，《近代广东省侨汇研究（1862–1949）——以广、潮、梅、琼地区为例》（新加坡：南洋学会，1992年），页17，本图略作增补

[48] “草根批局”指那些只拥有地方性的收发网络的批局，它们多是规模较大的“一盘”、“二盘”批局的分号或代理商。

相关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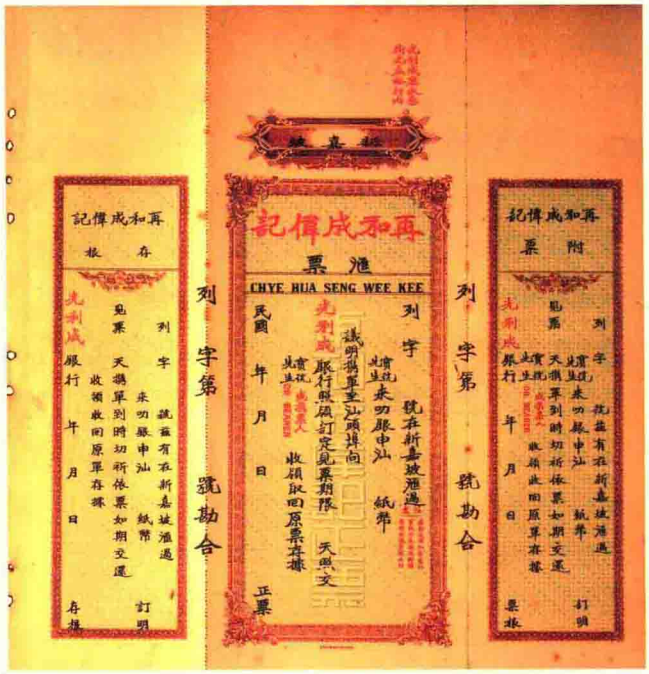
李光耀

历史事件

5 月 30 日

举行新加坡自治邦选举，人民行动党在 51 个议席中，夺得 43 席，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出任总理

闽帮和丰信局汇票



再和成汇票

业会、中华汇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新加坡汇业联谊社三个组织。可惜这种繁荣的局势却如昙花一现，1948年以后，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货币急速贬值，民信局生意大受影响，也有许多民信局因投机失利而关闭，自此新加坡民信业开始萎缩。到了1953年，再度受本地实行新执照条例和外汇统制的冲击，批款额再一次大幅度锐减，雪上加霜，许多民信局结束营业。19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政府宣布侨批业务归由银行管理，新加坡各帮民信局自此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民信业同业组织也名存实亡。

构成新加坡民信业的各帮民信局和其同业组织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它们曾在本地金融业发展历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曾是本地、中国的闽、粤、琼、香港和东南亚一些地区之间跨域商业网络的主要元素之一，更是本地各方言移民社群与中国祖籍家乡保持联系互动的重要桥梁，其功能与影响是多层面、广泛和深远的。因此，我们对各帮民信局的研究，需置于一个跨国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情景下来考察。此外，各帮民信局的主事者与同业公会的领导人如林树彦、李伟南等皆是对华社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侨领，所以，若要透彻了解本地各帮的民信业，我们也须研究这些早期的侨领。这些或是未来研究本地民信业的新视角。

附表（一）新加坡各帮信局（1940年之不完全统计）

闽侨信局汇兑公会会员

商号	地址	东主/司理
协隆源	小坡加郎律	黄奕根
和丰	大坡源顺街	林秉祥 林秉懋
许联成	大坡源顺街	许厚坤
立诚	大坡吉宁街	陈长水
信通	大坡源顺街	张元遠
荣美	大坡吉宁街	白锡隆
南中	大坡丹戎巴葛路	周宗启
林和泰	大坡福建马车街	林本龙
成源	大坡源顺街	陈景兰
绍昌	大坡源顺街	洪绍世
新胜发	大坡五代天宫	李成厚
建源兴	大坡中兴	吴水龙
振南	大坡吉宁街	黄武科
庆丰	大坡当店巷	庄文庆
瑞芳	大坡福建街	陈日定
四美	小坡来踏礼士	黄桂岩
新泉和	大坡监光仔内	何水全
泉发兴	大坡呢律	李国坑
荣源	大坡合洛律	黄则福
华南	大坡怒干那律	周建生
建源	大马路怒美芝律	孙贞祥
美兴	小坡二马路络君实得力	吴鸿渚
福泰和	大坡广合源街	周学振
林建德	小坡怒美芝律	陈科斗
郭福成	小坡二马路密多利亚	郭可济
郭丰成	小坡二马路密多利亚	郑国栋
胡瑞隆	小坡鲁班让	胡瑞隆
南昌	大坡丝丝街	洪锡信
侨通	大坡北京街	林树彦
万福兴	大坡丝丝街	陈辉相
源通	大坡源顺街	许马赞
和丰分局	小坡美芝律	林秉祥、林秉懋
许联成分局	小坡美芝律	许厚坤
信通分局	小坡美芝律	张之达
荣美分局	小坡梧槽律	白锡隆
侨通分局	小坡	林树彦
协茂	大坡源顺街	
顺茂	大坡源顺街	
黄瑞隆	大坡赌间口	
建发兴	小坡葱兰勿杀	
协茂分局	小坡	
聚华	小坡	

潮帮汇兑信局

商号	地址	东主/司理
再和成	大坡二马路	李伟南
万益成	潮州马车街	陈大源
孔明斋	新吧虱脚	吴励堂
有信	大坡二马路	余功良
洪万成	大坡奉教街	洪贤炎
永吉祥	大坡奉教街	陈铭松
汇通	大坡十八间后	曾子闻
华益	大坡十八间后	刘炳岳

潮帮汇兑信局					
商号	地址	东主/司理	商号	地址	东主/司理
公发祥	大坡二马路	曾广琦	大信	大坡怡园脚	陆壁臣
永德盛	潮州街新吧虱脚	许顺洁	万丰隆	大坡戏馆街	林秋月
祥泰隆	大坡二马路	张祯美	李福利	大坡敬昭街	李明初
万顺成	大坡二马路	郑炳宋	普通庄	小坡梧槽路	陈谦鸣
永安祥	大坡二马路	周寿昌	荣盛	大坡渥街	陈清溪

琼帮民信局					
商号	地址	东主/经理人	商号	地址	东主/经理人
恒裕兴	密驼街40号	王先树	富兴隆	巴米士街9号	何明轩
阜安号	密驼街49号	黄实甫	琼和安	巴米士街3号	（缺）
人信庄合记	密驼街31号	王保民	四宝文公司	巴米士街14号	翁若侯
锦和号	密驼街53号	（缺）	光亚号	佘街18号	陈明任
锦泰隆	密驼街45号	周荫庭	贝源公司	佘街5号	周怀史
德和昌合记	密驼街35号	（缺）	恒成号	佘街10号	许万松
琼宝通	密驼街39号	郑尧卿	益泰轩记公司	佘街9号	郭登五
联合公司	密驼街37号	范基让	益华合记	佘街16号	（缺）
会源丰公司	密驼街25号	（缺）	琼盛公司	米芝律25号	高定薄
普天公司	巴米士街31号	林少章	纶昌号	米芝律51号	陈际云
宝通号	巴米士街11号	周克翰	和记号	米芝律53号	林衍桥
三盛号	巴米士街6号	陈习甫	万安堂	小坡大马路420号	林会瀛
泰南隆	巴米士街27号	冯所欲	瑛记	（缺）	（缺）
顺成隆	巴米士街40号	王永振	南安公司	小坡大马路425号	杨祚五
丰盛合记	巴米士街4号	陈锦亭	天成美	小坡大马路424号	杨甘清
南同利	巴米士街13号	王兆鳌	益和堂	小坡大马路436号	陈镜雅
南兴昌	巴米士街37号	吴人杰	正利华	小坡大马路440-1号	陈伯鳌
吉昌号	巴米士街34号	陈昭球	美兴旅店	小坡大马路516号	钟圣田
协和合记	巴米士街26号	钟运拔	万合丰	小坡三马路187号	韩钊锟
汇安公司	巴米士街10号	曾庆和	锦纶号	连城街6号	李加汉

资料来源：关楚璞，《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年），页580-590

广帮民信局					
商号	地址	东主/司理	商号	地址	东主/司理
广利银行	漆木街	林紫昭	永昌金铺	牛车水大马路	彭伯伟
余仁生	牛车水大马路	余东璇	福安号	漆木街	周成
春泰茶庄	漆木街	陆梓昌			

客帮汇业信局					
商号	地址	股东/司理	商号	地址	股东/司理
万裕祥	松柏街11号	周兰记	葆和堂	钮吻里芝律129号	蓝迺章
仁爱堂	怒美芝律669号	周敬椒	广顺昌	福建街31号	徐添

附表（二）新加坡各帮民信局（1959年之不完全统计）

商号	地址	商号	地址
有信庄	纽美芝律38号	立诚公司	吉宁街109号
有信庄分局	梧槽律215号	全亨裕	吉宁街88号
人信庄汇局	密驼律31号	荣美信局	吉宁街131号
大川公司	何罗卫巷28号	金龙泰信局	吉宁街158号
大信号	吗真律27号	再和成伟记	纽美芝律33号
上海同利公司	域多利亚街512号	森源庄	纽美芝律34号
三盛号	巴米士街6号	再和成分局	吗真律5-7号
中南汇兑信局	芽龙律982号	万和成	吗真律9号
天安民记	加冷律36号	鼎盛汇兑信局	吗真律14号
永安公司	哨吻里芝律73号	金安信局	丹戎巴葛律131号
永利华有限公司	怒美芝律440-1号	和源信局	丹戎巴葛律171号
永吉昌	怒美芝律438号	南中汇兑	丹戎巴葛律93号
永昌金庄有限公司	哨吻里芝律202号	成源号	直落亚逸40号
信通信局	哨吻里芝律251号	同发信局	直落亚逸19号
春泰号	哨吻里芝律60号	崇成行	直落亚逸71号
振华汇兑庄	哨吻里芝律227号	源通汇兑	直落亚逸88号
侨益行	哨吻里芝律157号	侨通行	直落亚逸53号

商号	地址
永德盛	潮州街13号
祥泰隆	潮州街8号
民安行	巴米士街10号
四宝文	巴米士街14号
南方信局	巴米士街3号
南同利	巴米士街13号
孚天行	巴米士街29号
和记信局	巴米士街39号
鸿安	巴米士街28号
丰盛合记	巴米士街4号
民兴行	密驼律56号
恒裕兴	密驼律40号
林茂兴	源顺街71号
怡盛有限公司	哨干那律20号
南安公司	怒美芝律422号
南昌汇兑信局	丝丝街87号
信通信局	哨美芝律251号
信义行	域多利亚街285号
郭丰成	域多利亚街309号
郭福成有限公司	域多利亚街311-313号
恒成信局	余街10号
泰盛信局	余街26号
建芳公司	北京街50号
泉发兴	尼律25号

商号	地址
均源汇庄	怒干那律34号
协茂	源顺街62号
林金泰	源顺街36号
协茂分行	美芝律203号
富兴隆	美芝律29-A号
汇元丰信局	美芝律21号
侨通分行	美芝律157号
琼盛公司	美芝律53号
协隆源	加冷律143号
长安号	布连拾街156号
林和太	福建街20号
瑞芳信局	福建街6号
洪万成	纽吗吉律85-89号
厦门公司信局	北京街8号
万和成	吗真律9号
万益成	潮州马车街1号
万益成分局	梧槽律17号
汇通信局	纽吗吉律83号
瑞隆信局	中国街26号
瑞春信局	亚峇街138号
福泰和信局	广生源街69号
福泰兴	哇里街85号
荣美信局	吉宁街131号
郑绵发有限公司	盒巴沙球勝律16号

资料来源：许云樵，《星马通鉴》（新加坡：星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9年），页632-633

附表（三）新加坡各帮汇兑公会团体会员名录（1947年）

闽侨汇兑公会团体					
商号	负责人	地址	商号	负责人	地址
侨通行	林树彦	直落亚逸街53号	来安	杨成金	丹戎巴葛律172号
成源	陈国铭	直落亚逸街40号	吴成兴	吴水玉	丹戎巴葛律129号
顺茂合记	何清万	直落亚逸街58号	公和发瑞记	唐祖基	亚峇街117号
绍昌	洪绍世	直落亚逸街11号	福春	林水西 林丰来	亚峇街138号
许联成	许厚坤	直落亚逸街43号	怡泰公司	沈会之 林先桐	丹戎巴葛街49号
源通	许妈赞	直落亚逸街88号	林进成	林添发	亚峇街178号
协茂	黄玉带	直落亚逸街62号	林贵顺	陈君美	亚峇街86号
信通汇兑庄	张庆圻	源顺街23号	长安	林福和	亚峇街129号
和丰	林秉懋	直落亚逸街47号	四美	黄永祺	乞来打礼士路71号
德原	黄家乾	直落亚逸街60号	协隆源	黄弈根	加冷律143号
林金泰	林兆年	直落亚逸街36号	荣源	黄则福	合洛律51号
荣美	白锡澄	吉宁街131号	福泰和	周开南	巴鹅拉街（广合源街）69号
立诚	陈长水	吉宁街109号	泉发兴	李叻成	尼律25号
源崇美	颜惠芸	吉宁街142号	新泉和	吴英娘	纳逊律80号
金龙泰	曾智生	吉宁街158号	郭丰成	郑桂栋	域多利亚街309号
正泰美	杜士吾	直落亚逸街25号	郭福成	郭成源	域多利亚街311-313号
林和泰	林本道	福建街20号	瑞隆	黄添福	中国街26号
瑞芳	陈日定	福建街6号	兴隆	蔡明泉	中国街24号
建芳公司	林大年	北京街50号	庆丰	庄文坎	乞力街70号
南昌	洪天生	丝丝街87号	建源	黄雅山	怒米芝律561号
成丰栈	吴必昌	中街77号	天安	江子民 陈百礎	加笼律126号
开平公司	李铁民	中街80-82号	和成	孙亚达	南鹿街115号
胡瑞隆	胡瑞隆	梧槽律225号	新顺昌	蔡清溪	俭马巷38号
福安信局	沈士民	梧槽律147号	添盛	沈荣甫	明古连街229号
福和隆	黄锦发	梧槽律121号	杨人月	杨人月	大马路273号
大陆公司	黄铭扬	梧槽干那律14号	义和栈	黄亚根	域多利亚街285号
聚华公司	陈耀如	奎因街129号	厦门公司	陈义总 陈庆信	北京街8号
美兴公司	吴鸿渚	奎因街125号	中和商行	苏玉灿	葱兰勿杀64号
南中	周宗启	丹戎巴葛律93号	四海公司	白济川	怒干那律9号
和源	陈建和	丹戎巴葛律171号	杨协成	杨天球	欧南律5号
合安	陈晋昌	丹戎巴葛律131号			

潮侨汇兑公会

商号	负责人	地址
万益成	李伟卿	盒巴沙球拉律1号
郑锦发	郑则光	盒巴沙球拉律16号
律	陈铭松	同上35号
公发祥	曾广沂	钮米芝律18号
万顺成	郑炳宋	钮米芝律32号
再和成伟记	李毓宽	钮米芝律33号
永安祥	周寿昌	钮米芝律39号
有信庄	李秉衡	钮米芝律38号
联和公司	王雨田	钮米芝律63号
鼎盛	蔡炳顺	同上65号
利华兴	林裕江	同上77号
祥利	张寿仁	同上79号
鸿生	房永钦	同上81号
裕生	卢卓生	吗真律6号
裕泰	李春培	振兴街20号
万丰隆公司	陈潮勤	振兴街16号
大信	陆国瑞	吗真律27号
洪万成	洪贤炎	钮吗吉律85号
李福利	李明初	敬昭街27号
裕丰利	潘梓彬	吗真街56号
永德盛	沈观光	潮州街13号
祥泰隆	张祯美	潮州街8号
元发利	曾一鸣	吻基125号

商号	负责人	地址
许顺记	许崇铭	奉教街11号
孔明斋	吴骊堂	新吧杀街脚4-5号
同记	吴桂荣	漆木街47号
光德栈	杨如山	沙球拉律7号
复源	曾昭明	沙球拉律8号
茂兴利	陈子吉	沙球拉律88-89号
华益礼记	辜崇礼	沙球拉律35号
汇通	曾子闻	沙球拉律38号
新发	许义邻	哨嘉拿律6号
普通庄	陈谦鸣	梧槽律217号
再成	李寿年	怒米芝律604号
达华	蔡建侯	二马路
中南	陈一中	漳宜律吧剎内
荣盛	陈业基	渥律3号
永万源	黄赛芝 房汝英	吻基116号
万德祥	郑觉生	大马路新街口597号
耀华成	黄耀初	大坡二马律14号
新兴	蔡培枝	淡宾尼士律208-3
成兴	蔡树声	大马律32号
光和成	王远泉 陈韵琴	加宾打律6号
万和成	邹锐钊	马真律9号
信通	林仰韩	戏馆街39号

琼侨汇兑公会

商号	负责人	地址
琼盛	高定簿	米芝律53号
人信庄	王保民	密驼律31号
益和堂	陈镜清	怒米芝律436号
南安公司	杨祚鳌	怒米芝律422号
三盛	陈习甫	巴米士街6号
南兴昌	吴南山	巴米士街37号

商号	负责人	地址
永利华	陈伯雅	小坡大马路440-1号
鸿安	何智纯	巴米士街28号
普天	林鸿养	巴米士街32号
万合丰	韩钊准	奎因街187号
万安堂瑛记	林明瑛	怒米芝律420号
富裕	李修禄	巴米士街5号

琼侨汇兑公会					
商号	负责人	地址	商号	负责人	地址
福兴公司	何家福	巴米士街9号	永吉昌	黄正本	小坡大马路438号
南同利	王国材	巴米士街13号	顺成隆	王永振	巴米士街40号
四宝文	卢甯	巴米士街14号	长安	陈行琼	美芝律37号
泰南隆	潘冀洲 冯所欲	巴米士街27号	丰盛合记	陈元光	巴米士街4号
协和合记	钟运拔	巴米士街26号	新琼盛	郑尧卿	密陀律39号
锦和	陈成第	密驼律53号	郭新父子公司	郭新	怒米芝律20号
恒成	许世深	佘街10号	林和记	林华廷	密陀律23号
光亚	陈明任	佘街17号	民安	吴书亭	连城街13号
美兴	钟光樑	怒米芝律516号	海洲	谭文票	美芝律35号
恒裕兴	王桂苑	冥里律40号	会源丰	吴开文	密陀律25号
阜安	黄文汤	冥里律49号			

商号会员名录		
商号	负责人	地址
利安有限公司	黄瑞初 陆锡昌	大马路206号
永昌有限公司	彭慰农 彭百唯	大坡大马路202-4号
春泰茶庄	谢铭联 陆子光	漆木街60号
福安号	周成 梁秋田	漆木街83-85号
光华栈	林国仁	玻璃后2号
怡盛有限公司	简永年	哨干拿律20号
均源	谢荣禧	玻璃后5号

资料来源：《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7年），页95-104

附表（四）新加坡汇业联谊社会员通讯录（1947年）

商号	名誉社长	地址	电话
万德祥	郑觉生	小坡大马路597号	82122
恒裕兴	王裕兰	蜜驼律40号	80308
正　大	蔡明泉	吉宁街106号	
侨通行	林树彦	直落亚逸街53号	2588
郑绵发	郑则光	盒巴沙球拉律16号	2286
杨人月	杨人月	大马路273号	2603
信泰庄	黄孝坤	砂球拉律28号	7763
荣　盛	陈深溪	渥律3号	4859
永吉昌	黄正本	小坡大马路438号	2542
茂　兴	李振殿	源顺街77号	4993
茂　兴	郭珊瑚	源顺街77号	4993
茂　兴	苏孝先	源顺街77号	4993
商号	名誉社员	地址	电话
永吉祥	陈铭松	盒巴沙球拉律35号	2998
万益成	许惟德	盒巴沙球拉律1号	3207
万德祥	洪胜臣	小坡大马路597号	82122
鼎　盛	蔡炳顺	钮米芝律65号	
裕丰利	黄雪山	吗真街56号	4274
黄瑞隆	黄奕发	中国街26号	2453
洪万成	陈永山	钮吗吉律85号	7818
鸿　生	房永钦	钮米芝律81号	83112
有信庄	陈应昌	钮米芝律38号	6029
信　通	张庆祈	源顺街23号	6318
裕丰利	潘梓彬	吗真街56号	4274
汇　通	曾子闻	沙球拉律38号	80418
汇丰银行	沈名坚	哥烈溪墘	7035
茂　兴	许铭霖	源顺街77号	4993
裕　生	林安民	马真律6号	82815
中　南	陈一中	漳宜律吧虱内16号	84602

商号	社员	地址	电话
复　源	曾昭明	沙球拉律8号	6413
万顺成	曾一鸣	钮米芝律32号	4895
达　华	莫再深	奎因街61号	2569
万和成	邹正英	吗真街9号	
裕　泰	李春培	振兴街20号	
万丰隆	尤愚石	振兴街16号	6975
许顺记	许统领	奉教街11号	7118
裕　生	卢卓生	吗真街6号	82815
大　信	陆兆初	吗真街27号	80617
万益成	林汉炎	盒巴沙球拉律1号	3207
洪万成	郭文雄	钮吗吉律85号	7818
元发利	陈大波	吻基125号	
孔明斋	廖森坤	披士街4号	7239
鼎　盛	陈　庸	钮米芝律65号	
万丰隆	郭秋河	振兴街16号	6975
永德盛	黄克伟	潮州街13号	6972
许广利	陈复华	利咨咨里律117号	82448
万顺成	郑春草	钮米芝律32号	4895
裕　泰	许日丰	振兴街20号	
鸿　生	黄菊秋	钮米芝律81号	83112
耀华成	林吉枝	钮米芝律14号	4849
汇　通	曾伟然	沙球拉律38号	80418
再　成	李寿年	怒美芝律604号	3461
祥　利	曾剑侯	钮米芝律79号	4163
郑绵发	陈英豪	盒巴沙球拉律16号	2286
祥泰隆	陈　群	潮州街8号	2797
新　发	许义邻	哨嘉拿律6号	7434
万益成	林钦昌	盒巴沙球拉律1号	3207
祥泰隆	郑俊贤	潮州街8号	2797
成　兴	许敬木	哨美芝律32号	80858
光德栈	许勇强	沙球拉律7号	82306
公发祥	曾俊奎	钮米芝律18号	7121
有信庄	洪德文	钮米芝律38号	6029
再和成	潘绍浩	钮米芝律33号	7572

商号	社员	地址	电话
再和成	王细咨	钮米芝律33号	7572
元发利	邱元钦	吻基125号	
裕　生	蚁亚咨	吗真街6号	82815
洪万成	郑　声	钮吗吉律85号	7818
裕成利	杨炎辉	吗真律56号	4274
许顺记	李海洲	钮吗吉律11号	7118
华益礼记	辜美财	沙球拉律25号	2347
万顺成	许玉林	钮米芝律32号	4895
永安祥	吴汉山	钮米芝律39号	4248
公发祥	杨四美	钮米芝律18号	7121
许顺记	庄昇腾	钮吗吉律11号	7118
茂兴利	李锐书	沙球拉律88号	7744
复　源	黄子山	沙球拉律8号	6413
复　源	黄振泰	沙球拉律8号	6413
汇丰银行	陈炳强	哥烈溪埠	7035
复　源	吴伉雪	沙球拉律8号	6413
复　源	陈子芳	沙球拉律8号	6413
复　源	陈爵居	沙球拉律8号	6413
永安祥	陈锡熙	钮米芝律39号	4248
裕成利	沈周坤	吗真街56号	4274
裕成利	潘良泽	吗真街56号	4274
万丰隆	姚良胜	振兴街16号	6975
万丰隆	谢岳惠	振兴街16号	6975
万丰隆	许继生	振兴街16号	6975
元发利	林建鸿	吻基125号	
公发祥	蔡清林	钮米芝律18号	7121
裕　生	林立炎	吗真律6号	82815
万顺成	黄剑秋	钮米芝律32号	4895
汇　通	周炳宏	沙球拉律38号	80418
黄瑞隆	阮赞生	中国街26号	2453
万顺成	陈旭良	钮米芝律32号	4895
新　发	杨子润	哨嘉拿律6号	7434
永合发	章文林	杨厝港律451号	
光德栈	郭子述	沙球拉律7号	82306

商号	社员	地址	电话
普通庄	吴云彬	梧槽律217号	4079
联　和	陈濬泉	钮米芝律63号	3396
森　源	吴翼庭	钮米芝律34号	
公发祥	傅钦亮	钮米芝律18号	7121
裕　生	郑康德	吗真街6号	82815
万德祥	郑振鹏	怒美芝律597号	82122
再和成	吴节菴	钮米芝律33号	7572
万丰隆	尤孙傅	振兴街26号	6975
裕　泰	陈绍平	振兴街20号	
元发利	黄　冠	吻基125号	
洪万成	吴桂仁	钮吗吉律85号	7818
孔明斋	钟稚鹤	披士街4号	7239
万益成	许空吾	盒巴沙球拉律1号	3207
万顺成	黄家琨	钮米芝律32号	4895
成　兴	蔡树声	哨美芝律32号	80858
万合丰	韩卓章	奎因街187号	
荣　盛	翁兴志	渥律3号	4859
黄瑞隆	黄自生	中国街26号	2453
利华兴	姚树祯	钮米芝律77号	6945
汇丰银行	温肇棠	哥烈溪墟	2070
有信庄	吴其璠	钮米芝律38号	6029
汇丰银行	黄振源	哥烈溪墟	2070
万顺成	陈卓求	钮米芝律32号	4895
荣　盛	蔡友成	渥律3号	4859
荣　盛	李钦海	渥律3号	4859
信　通	吴膺赞	加宾打街39号	6435
再和成	陈振豪	钮米芝律33号	7572
永安祥	杨青圃	钮米芝律39号	4248
永安祥	卢仰琴	钮米芝律39号	4248
永德盛	陈再丰	潮州街13号	6972
华益礼记	杨树川	沙球拉律35号	2347
华益礼记	辜美谷	沙球拉律35号	2347
元发利	陈道明	吻基125号	
荣　盛	陈业基	渥律3号	4895

商号	社员	地址	电话
立　诚	陈生地	吉宁街109号	4514
荣　美	白圻成	吉宁街131号	4404
汇　通	陈振元	沙球拉律38号	80418
中　南	陈烈和	漳宜吧虱内16号	84602
源利隆	赵耀宣	加宾打街17号	2971
黄瑞隆	黄益珍	中国街26号	2453
许联成	李辉贞	源顺街43号	7975
合　安	陈晋昌	丹戎百葛131号	
天　安	陈百礎	加冷律126号	
福　春	林芳来	亚峇街138号	4974
李福利	季喜来	敬昭街27号	7889
庆　丰	钟振海	乞力街70号	
汇丰银行	關志尧	哥烈溪墘	2070
源利隆	赵永全	加宾打街17号	2517
裕　生	许兆楠	马真律6号	82815
裕　生	许友惠	马真律6号	82815
裕成利	蔡懋荣	马真律56号	4274
同　记	陈养之	漆木街47号	2048
利华兴	姚连泉	钮米芝律77号	6945
利华兴	郑少云	钮米芝律77号	6945
陈连发	陈连掌	六条石杨厝港律1058D	
万丰隆	翁绍辉	振兴街16号	6975
信　通	张植三	源顺街23号	6318
万丰隆	罗永祥	振兴街16号	6975
郑绵发	陈茂泉	马车街16号	2286

资料来源：新加坡汇业联谊社会员通讯录（1947年），页156-158

附表（五）新加坡路名新旧对照

英文街名	华文译名	华文俗名
Beach Road	美芝路	米芝路
Boat Quay	驳船码头	吻基
Carpenter Street	嘉宾达街	大坡戏馆街/加宾打路
China Street	中国街	大坡赌间口
China Town	宝塔街	巴鹅拉街
Circular Road	沙球勝路	大坡十八间后/沙球拉路
Craig Road	克力路	当店巷/乞力街
Cross Street	克罗士街	吉宁街
Dunlop Street	南洛街	南鹿街
Duxton Road	达士敦路	监光仔内（甘榜仔内）
Fish Street	菲士街	新吧虱脚（新巴剎脚）
George Street	乔治街	玻璃后
Hokien Street	福建街	福建马车街
Kallang Road	加冷路	加郎路/加笼路
Market Street	马吉街	中街
Merchant Road	马真路	大坡怡园脚/吗真路
Middle Road	密驼路	密陀路
Neil Road	尼路	呢路
New Bridge Road	新桥路	钮吻里芝街/纽米芝路/大坡二马路
New Market Road	纽马吉路	大坡奉教街/纽吗吉路/奉教街
North Bridge Road	桥北路	怒米芝路/小坡大马路
North Canal Road	北干拿路	怒干那路
Pagoda Street	宝塔街	广合源街
Queen Street	奎因街	小坡三马路
South Bridge Road	桥南路北段	漆木街/牛车水大马路
South Bridge Road	桥南路	哨勿里芝路/大坡大马路
South Canal Road	南干拿路	哨干那路/哨嘉拿路
Tampines Road	淡滨尼路	淡宾尼士路
Telok Ayer Street	直落亚逸街	源顺街
Upper Circular Road	沙球勝路上段	潮州马车街/盒巴沙球拉路
Upper Nankin Street	南京街上段	松柏街
Victoria Street	维多利亚街	域多利亚街/密多利亚街
Wallich Street	华利街	哇里街

资料来源：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5年），页269-276

大世界
CHINESE TRADE FAIR

第十二章

经济活动
Economic Activities

UTHERN HOTEL

经济活动
——华商与华资银行

摘要

华商在殖民地经济体系内是扮演转口贸易中介商的角色。随着资本的累积、扩张及企业谋略与商业网络的建立和发展，华商在20世纪初开始试图突破殖民地政府和洋行所设定的转口贸易框架，直接将产品销到英美消费国。他们开办华资银行、航运、工厂，进行跨国营销。保守的行业和帮权挂钩及家族企业框架，都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Abstract

Under the colonial economic system, Chinese merchants were middlemen in the entrepot trade. Following the growth of Chines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xpansion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business strategy and networks,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ought to cross the economic markers set by the colonial master. They ventured into banking, shipping and manufacturing and shipped their goods to reach the consumers in Europe. Bang specialization in trade and family busines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preventing Chinese entrepreneurs from expanding their businesses.

林孝胜（**Lim How Seng**）

二战前华商的特征是中介商、家族企业、帮权和行业挂钩[1]，简言之，华商头上罩着三顶帽子：殖民地经济体系结构、帮权结构及家族企业结构。华商就在这三顶帽子所界定的空间求生存、求变、求突破及求发展。

1900年世纪之交为新加坡二战前华商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水岭。1900年之前是呷华商或海峡侨生华商领军的时代，之后是侨民华商挂帅的时代。

第一代华商：投资取向与网络机制（1819－1899）

殖民地经济体系下的华商

莱佛士身负英国东印度公司使命，在马六甲海峡南端物色优良地点设置商栈作为中国贸易的中途站。他看好位于印度和中国航线上的新加坡有利于发展转口贸易，遂决定于1819年在新加坡设置贸易基地。黄麟根指出，新加坡在开埠后短短的五年内就迅速发展为东南亚的区域贸易商港，1822年和1824年之间新加坡的贸易值是1866万1139元，208艘欧船入港[2]。新加坡成为船只取得供应品补给和维修服务的首选停泊站。帆船及轮船也将新加坡和区域海港接轨。新加坡于是成为区域土产及欧洲与中国工业制成品及华工的集散中心和国际大都会。莱佛士的自由港和商人至上政策不但决定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的经济体系，也决定了新加坡商业社会的本质。在莱佛士的新加坡发展大计里，商人阶级是新加坡社会的中坚分子。他处处保护商人的利益及给予特殊待遇。因此，来自马六甲和中国的华商也随着欧洲、印度、阿拉伯和马来群岛的商人，于开埠不久纷纷到来充满商机的新加坡经商。

新加坡河是早年的新加坡经济命脉

19世纪欧洲刚走出政府控制市场的重商主义经济，步入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欧洲工业革命正隆，急需大量原料。因此，英荷殖民地政府在英属马来亚及荷印（今印尼）大事掠夺殖民地资源发展英荷工业。华商及华工在这特定的历史时刻被引进协助开发英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促使大量华工有计划地被引入英属马来亚与荷印的种植园和锡矿场工作。在殖民地政府的经济体系里，洋行代表母国工业家的利益。由于数量少、族群不同和语言不通的关系，他们必须仰赖华商来完成原料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活动。因此，华商在洋行和劳工市场间扮演中介商的角色：（一）华商被鼓励投资设立种植园和矿场，生产原料转卖给在地的欧美洋行，再由洋行输出到英荷的消费市场工厂；（二）殖民地政府和洋行也鼓励华商在岛屿贸易和中国贸易中收集区域土产转卖给洋行；（三）华商协助洋行销售欧美工业制成品给消费者；（四）协助招募及管理华工（包括在种植园和矿场）。这也就划定华商经商的空间或地盘，即为殖民地政府和洋行提供服务的行业如土产的生产、收集、运输、转售与贸易；销售欧美产品；提供及管理劳力市场以及在矿场和种植园内的经济活动（包括承包各种税收）；在城乡华人聚落经商包括地产投资。

黄枝连指出，华商从事致富的行业主要是转口贸易、航运、包办烟酒、种植、采矿、房地产等。“所有这些行业，都是在得到英国商人、殖民地政府及马来土酋的容忍与合作之下才得以开展的”。换句话说：在生产过程和交换活动之中，主动权不掌握在他们手上，因而反映出他们的活动，其性质为买办性的、中介性的[3]。颜清湟也指出由

[1] 颜清湟，〈东南亚华人资本主义初探（1842－1941）〉，载颜清煌，《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页445－478；黄枝连，《马华社会史导论》（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1年）。

[2]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KL: MBRAS, 2003 (reprint)), p.33.

[3] 《马华社会史导论》，页84。

于华人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根本抵不过西方商人的势力，华人的商业资本就是在殖民地经济制度底下发展起来的[4]。

三组华商先驱

新加坡开埠初期的第一代华商主要分三组。最重要及最早移入的华商是来自马六甲的漳泉华商。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粤商是第二组，第三组是来自闽粤地区由华工出身的华商。

• 来自马六甲的漳泉富商

新加坡第一代华商的主流是来自邻近的马六甲漳泉富商。这批来自马六甲的富商世代移居马六甲，例如蔡沧浪、薛佛记、陈笃生及陈金声的先祖都在乾隆年间（18世纪）移居到马六甲。

马六甲是历史古港，历经满剌加王朝（1400－1511）、葡萄牙（1511－1641）和荷兰（1641-1825）殖民统治，是东南亚主要商港。自17世纪就有定居的华人人口，且于1673年建立新马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庙宇青云亭[5]，奉主神观音大士。葡萄牙与荷兰殖民地政府从17世纪开始委任的侨长甲必丹皆为漳泉富商[6]，甲必丹的治所就设在青云亭。1825年至1915年，英国接管马六甲后废除甲必丹制度，华社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侨长地位。

由于统治马六甲的荷兰殖民地政府敌视新加坡的开埠，千方百计阻挠马六甲商民到新加坡发展，马六甲华商起初持观望态度。直到英荷签订1824年条约，荷兰正式于1825年将马六甲统治权移交给英方后才纷纷到新发展。他们都出自富裕的家庭，如蔡沧浪出身豪门甲必丹蔡士章后裔，薛佛记在马六甲经营锡矿生意，锡矿场在宁宜河（Lingi River）领域一带。

他们是有备而来，携带巨资来新加坡抢商机投资地产。1826年4月20日政府发出首批51份商业区地契中，呷漳泉华商占22份。其中陈送占5份、薛佛记（后当青云亭亭主）、蔡沧浪（甲必丹蔡士章后裔）、杨金水（庆德会成员）及龚光传（来自槟城）各一地段。1827年再发出199份地契给更多华商，包括陈笃生及陈有郎（庆德会成员）兄弟、杨佛应、杨清海等。这些地段都是宝地，如商业区（今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马六甲街（Malacca Street）、吻基（Boat Quay，俗称驳船码头）、桥北路（North Bridge Road）、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北京街（Pekin Street）、厦门街（Amoy Street）、马交街（Macao Street）、沙球劳路（Circular Road）、美芝路（Beach Road）、南京街（Nankin Street）、福建街（Hokien Road）等。他们成为地主和屋主，在直落亚逸街和新加坡河南岸勿基建店屋与货仓。来自马六甲的第一代漳泉华商还有陈金声（后为青云亭亭主）及庆德会的其他家族[7]。

1829年4月23日《新加坡纪事报》

[4]《东南亚华人资本主义初探（1842—1941）》，页447。

[5] 林孝胜，〈青云亭与19世纪马六甲华社〉，〈创建初期的青云亭〉，载林孝胜，《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新加坡：青年书局，2010年），页148—166。

[6] Yeh Hua Fen, *The Chinese of Malacca* (Malacca: Malacca Historical Society, 1936)；日比野丈夫，〈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载《东南亚研究》卷6期4（1969年3月），页88—10；〈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补遗二则〉，《东南亚研究》卷9期1（1971年6月），页58—60；庄钦永，《新呷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新加坡：国家语文局，1965年）；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邦权政治〉，《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页28—62。

[7] 庆德会其他创始成员为：徐钦元、蔡延龄、谢宝容、薛文仲、陈国朝、李珍元、梁瓒元、翁如水、郑荣华、邱青山、何栋梁、王彩凤、陈如意、杨青山、陈天全、陈明宗、薛荣山、颜元珍、钟贤源、陈武略、曾梅生、洪俊成、陈明赞、叶永和、曾明珍、徐长怀、许贵节、苏源泉、许广生、李建安、梁添益、徐钦三、陈应策以及陈坤水。有关庆德会创始人的简单生平，见庄钦永、林孝胜，〈新加坡庆德会研究〉，载《亚洲文化》期5（1984年4月），页58—65。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国家图书馆大厦落成

4月2日

南洋大学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

庆德会是来自马六甲的漳州、泉州中介商的互助性质组织，总部设在新加坡

（*Singapore Chronicle*）的一则报导突显了第一代华商在贸易过程中的中介商的角色。该报报导1829年4月有三艘厦门帆船及五艘广州帆船刚抵达新加坡。两地商船运来的货物大同小异。厦门船带来的商品主要是陶器、建筑材料如磁砖与花岗石板、纸伞、面条、干果、香烛、冥纸、烟叶、棉布、生丝等，货值约五、六万西班牙元。广州船的货包括上述各商品外还带来绸缎、樟脑、糖果、茶叶、大量蓝、绿及黄色棉布以及生丝，货值和厦船相同。货都属于人在国内的船东，船长及大副（本身也带200至100担不等的商品来卖）负责售卖船东的货和购买回航的货物。船抵达新加坡当天，各路华商即刻登船检验各种货物的数量。下来几天，船长上岸了解当地市场及和商家进行贸易。通常在一两周内将货物售罄。这些货品主要供应给华人市场。新加坡华商成为这些货物的出入口商，输出到马来半岛及荷印的头盘商。在地的头盘商再转销给二盘商、三盘商等。另一部分商品如丝绸、生丝及茶叶则是供应给欧洲市场，也通过华商之手才转销给欧洲洋行，由洋行转运到欧洲市场。至于各色棉布也通过华商之手转售给婆罗洲（Borneo）和武吉士（Bugis）土著[8]。

这则报导明确地标示呷华商是提供华人生活用品给本地和区域华人市场、提供中国高值的丝绸、生丝及茶叶给欧洲市场，以及提供中国棉布给马来群岛土著市场的中介商。他们控制了这批货物的供应线和转销线，商机无限。

这篇新闻报导也清楚描绘出华商在殖民地经济体系下扮演的中介商角色。在整个殖民地经济体制内，华商、洋行（欧商）、中国商贸的三角关系有实质的唇齿经济利害及互补的关系。在19世纪中叶前或中国五口通商前，他们组成一个牢固的东西方之间的转口贸易链，华商扮演关键性的中介商角色，促成中国产品、欧洲工业制成品及东南亚土产的交换和流通。

陈笃生（1798-1850）和陈金声（1805-1864）是海峡殖民地政府承认的首任和第二任华社侨长。他们成功的历程具有代表性。1840年代，从事土产生意的陈笃生和陈金声分别将商行设在新加坡河畔的驳船码头，方便货物起落及囤货。陈笃生也投资地产，其商号为独资经营。陈金声的丰兴号在马六甲和上海有分行，经营土产出入口、种植及采矿业务。丰兴号创立初期是合伙生意，合伙人为薛佛记女婿陈双林，而陈金声又和薛佛记是姻亲。他们和欧商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及英商怀德黑德（J. H. Whitehead）合作经营甘蜜出口生意，同时输入建筑材料[9]。陈金声则和著名欧洲洋行汉密顿．格礼公司（Hamilton, Gray & Co.）及莫实德洋行（Boustead & Co.）维持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10]。两人都积极为帮群谋福利，成立闽帮庙宇天福宫，并作帮群总机构。陈笃生还成为天福宫大董事及闽帮领袖，几乎所有来自马六甲的华商及厦门商船都大力捐款建立和维持天福宫。两人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陈笃生出资创立陈笃生医院，陈金声除热心兴学办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外，捐资改善新加坡自来水设备，两项工程都惠及新加坡各族人民，因而深得殖民地政府的赏识，1846年封陈笃生为太平局绅，使他成为首位华人侨领受封者，并承认他为华社领袖。陈金声继陈笃生于1850年去世后为殖民地政府承认为华社领袖，并获封太平局绅衔及被委为陪审员。

[8] *Singapore Chronicle*, 23.04.1829, 25.03.1830.

[9]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Malaya Press, 1967), p.66.

[10] Song Ong Siang, *op.cit.*, pp.46-47, 91-92.

1827年华商已是一股仅次于欧商的商团。当时一名英籍通讯员观察到华人的移入及其可观的财富和与日俱增的商业影响力带来地方繁荣[11]。

1828年和1830年新加坡分别发生两宗轰动的洋行和华商间的商业纠纷，对华商经营方法产生一定的影响。

1828年5月法庭审一起财务纠纷。原告是著名英商阿姆斯特朗公司（G. Armstrong & Co），被告是黄埔商号，东主为胡亚基的父亲（胡亚基当时还在广东家乡，1830年来新）。两者有商业来往，胡氏以赊帐方式向英商取货，赊帐到1826年3月6日满期，累积欠款2218.1元。胡氏曾立借据，期到还债，可是借据没注明利息。期间，被告曾数度以小额款项和货物抵债后仍欠142.99元。双方对此欠款余额都无异议。但是原告除余额欠款外要求另加利息，被告拒绝还利息，因而告上法庭。当时商场普遍对华商借据不索取利息（因借据里未提利息）。原告请了一位资深熟悉商业交易的专家证人乔治（Mr. George）作证。他说按照惯例，新加坡商人之间索取12%的利息，他觉得原告的要求合理。原告即索取利息306.70元，连同本金，合共449.69元。法官判原告胜诉[12]。此判例使华人借据不再存在利息问题。

另一起商业纠纷发生在1830年。闽商王端（音译Ong Tuan）因该年2月一场火灾，损失惨重而破产。洋行西密公司（Syme & Co.）股东蒂克儿（Digglers）于是向王端合伙人龚光传和其弟西理（音译Si Lee）追讨货物欠款1万4635西班牙元。龚光传辩称他在1829年底已拆伙，但原告洋行说公司是因为龚光传为王端生意合伙人及龚氏良好的商誉才同意赊帐给王端。结果法官判洋行胜诉[13]。由于华商合伙与拆伙都私下解决，外人无从知悉，因此导致龚光传败诉。此案改变了华商生意秘密合伙拆伙的习惯，结案后华商即刻纷纷在《新加坡纪事报》登载生意合伙或拆伙广告。

两起案件围绕着洋行和华商关系一个极重要的融资及资本信用问题。华商资金有限，往往先向洋行赊帐领货，帐期通常是六个月，洋行给予无抵押信贷，洋行凭观察贷方华商的人品、信用、商誉、合伙人、资金、社会地位等条件来决定放贷，双方签借贷合约。华商通常以土产物物交换或现款方式分期还清债务。欧商的新加坡商会于1835年至1958年之间曾数度议决将债期简缩到三个月，但都因洋行之间的剧烈竞争而无实效。1864年，有两家洋行就因此在经济危机中倒闭[14]。

广帮领袖胡亚基（人称黄埔先生）

• 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粤商

另一组（数量相对较少）第一代华商是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最具代表的是新会人当中的朱氏家族与罗氏家族。他们很早就在江门

[11] *Singapore Chronicle*, 12.04.1827.

[12] *Singapore Chronicle*, 22.05.1828.

[13] *Singapore Chronicle*, 12.08.1830, 26.08.1830详细记载该案经过。亦见庄钦永〈龚光传·吴新科〉，载《联合早报》，1983年7月4日。

[14] Chiang Hai Ding, *A Study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eign Trade, 1870–1915*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78), p.51.

和广州建立事业，听说新加坡开埠，可以发展业务，于是朱氏和罗氏兄弟分别于1830年和1841年将业务发展到新加坡来，扎根于马六甲街（Malacca Street）。于是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朱广兰、广恒、朱有兰、朱富兰、同德、罗奇生、罗致生组成了赫赫有名的中街七家头，经营红烟、杂货、酱园，垄断南洋各地的粮油杂货行业。南洋各地的红烟、土产、粮油杂货的行情都以七家头所订的行情为标准。他们的行号分布广州、香港、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及印尼。由于中街七家头业务的扩张及影响，粮油杂货和酱园成了新会人的传统行业。七家头大力捐助冈州会馆、同济医院及广惠肇碧山亭公冢的建立[15]。

来自广州市郊黄埔的胡亚基（1816-1880），也于1830年南来新加坡受教育并协助父亲经营面包店。父亲过世后，他将业务重心改为专门提供食品给英国海军。英国人称他为黄埔（Whampoa）先生。致富后，斥资开辟南生花园，为19世纪广客两帮的领袖。1869年，成为第一位受委行政议员的华人。1871年受封为太平局绅。1870年代同时任中国、俄国与日本驻新领事。

◆ 来自闽粤白手起家的华商：胡椒甘蜜种植与烟酒包税

19世纪中叶，中英鸦片战争使得沿海各省农民流离失所，生活艰苦。这个时候，英国及荷兰正通过洋行在厦门、广州等港口大规模招募劳工去开发“遍地黄金”的殖民地：新加坡、马来亚及荷印（今印尼）。过番成了华工的活路。我们的先辈就在利诱威逼的情形下离乡背井远下南洋当华工，去圆其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番客梦。

同时适逢英国和荷兰为了发展工业而在马来半岛和印尼大力开发锡矿与种植业，掠取自然资源，因此为一些勤俭的华工提供致富翻身的商机。虽然他们教育低（大部分是文盲和小学程度）但是情商和智商高，在逆境的矿场、种植园工作或从商，能吃苦耐劳，能逆来顺受，不少赤手打拼的华工，经过数年卧薪尝胆，有朝一日，摇身一变成为商贾，成为新加坡第一代华商的一员。

19世纪中一位海峡殖民地官员，柯尔（A. J. Kerr）如此描述从华工到华商的过程：“新客（新到的契约华工）第一年的劳力主要是用来偿还从中国来的盘川，生活清苦，月底只拿到三元生活费。每个华工都附属帮会，不久，新客也成为帮会的一员。帮会既要求他绝对忠诚和服从，同时给于他人身、工作及生活保护。当契约完后，新客可以续约，或成为自由工，或借钱，甚至偷钱筹集资本开始作小买卖。如果顺利，不久他一跃成为店主、种植者或技工”[16]。

佘有进与陈旭年白手起家的历程是这批草根型华商的最佳实例，两人都享有甘蜜大王的美誉。两人来新后都从事卑微的工作，后经贵人提拔而致富，成为19世纪新马甘蜜大王[17]。

这批早期白手起家的华商主要投资在新柔的胡椒甘蜜园及烟酒包税。

当英国人于1819年来到新加坡时，岛上早有20处华人与马来人开垦的甘蜜园丘。甘蜜园一般兼种胡椒，这两种经济作物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提炼甘蜜之后留下的甘蜜渣是胡椒藤的好肥料，也可以用来保护胡椒藤的根。甘蜜可以用在鞣皮和染色。欧洲工业革命后，皮革和纺织业高度发展，对甘蜜需求殷切。新加坡很快就取代廖内成为本区域甘蜜胡椒的贸易中心。19世纪30年代，甘蜜成为早期新加坡出口到英国的主要经济作物。廖内群岛的民丹（Bintang）岛的种植人也将大部分所生产的胡椒和甘蜜运来新加坡销售。

甘蜜市价暴涨的结果促进了甘蜜胡椒种植的扩展，甘蜜园地延伸到内地如实里达河地区。19世纪中叶，柔佛天猛公实行港主制度吸引新加坡华商（如陈旭年）到柔佛开垦甘蜜园。但新加坡作为本区域甘蜜胡椒贸易中心的地位还是保持不变，柔佛和廖内各港出产的甘蜜胡椒继续运到新加坡，转运到其他国家。以佘有进为首的潮州商人垄断了这行业，他们的店铺多集中在新加坡河两岸。他们是甘蜜胡椒投资家（称为头家）提供资金给在地的种植人。种植人签下贷款合约，保证以低于市价的甘蜜胡椒卖给他们，再由他们转卖给洋行出口到欧洲市场。投资家成立椒

[15] 区如柏，〈百年前称霸中街的七家头—红烟、杂货、酱园大王〉，载区如柏，《寸寸乡土情》（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年），页167—177。

[16]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857*, p.23.

[17] 佘有进与陈旭年白手起家的历程，见本书附录（一）〈新华先贤50名〉。

蜜公局作为行业公会[18]。

这批投资家也是新加坡和柔佛的烟酒大饷码承包商。包税是一种间接税，包税人以较低的数额承包一至三年不等的税款，再以较高的数额向纳税人征税，盈利很可观。政府将税捐的权利拍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19世纪，鸦片和酒的饷码承包成为自由港的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和柔佛王室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新柔饷码大承包商主要由闽潮两帮商人垄断。漳泉籍戴汉良（戴河水父亲）、龚光传及章三潮[19]（章芳琳之父）为新加坡饷码承包先驱[20]，1843年至1860年新柔烟酒饷码多由他们承包[21]。1860年代，佘有进退出第一线，由妻舅陈成宝主管其业务，章芳琳则继承其父章三潮的包税业务。1863年至1865年，陈成宝、章芳琳和陈旭年形成包税铁三角，分别掌控新加坡和柔佛的烟酒包税。为了化解无谓的竞争，1870年至1879年，章芳琳、陈成宝及陈旭年组成闽潮大联盟承包新加坡、柔佛、马六甲及廖内的鸦片和酒饷码[22]。饷码承包商和椒蜜公局控制了马来群岛的甘蜜胡椒的产销。甘蜜胡椒以及饷码承包几乎被侨民华商所垄断。

帮权结构与华商的网络机制

从呷华商、七家头及白手起家的华商的身上，我们看到一批智商和情商兼优的移民商人。他们都是新加坡的先驱移民，具有企业家对政治、经济大环境敏锐的洞察力，也熟知本身的实力和短处。他们的投资策略是发挥长处，避开阻力，建立各自的商业网络。

呷华商是城市商人，数世纪历经葡萄牙、荷兰及英国殖民地统治，非常了解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思维和政经政策，是以殖民地的一切资源供养宗祖国经济为目的。在这种殖民地经济架构下，洋行挂帅，华商是中介商。数世纪以来，他们都在马六甲扮演这个中介商角色，为殖民地政府和洋行服务。因此他们在新加坡毫无困难地融入莱佛士的经济和市区规划蓝图里，继续扮演这个中介商角色。他们扎根于马六甲，建立了成熟的华社结构，有庙宇（青云亭）作为华社的总机构，有殖民地委任的侨长制度（甲必丹及自主时期的亭主）。他们也依样将这个华社结构移植到新加坡来，以恒山亭及后的天福宫大董事为侨长。

他们的商业网络和企业谋略颇符合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于1986年所提出的“文化资本论”架构。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的架构，资本可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三种形式。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立即直接转换成金钱，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为符号，以某种高贵头衔被制度化；而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也能转换成经济资本，以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和再生产，以及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型态[23]。

其实，就华商而言，布迪厄的三项资本形式之外，还得加上一项“政治资本”，以官商关系、官衔为符号，以官职及受官方咨询为制度化形态。从19世纪到现代，政治资本有如润滑剂可迅速转换成经济资本，对华商的成功起

[18] *The Straits Times*, 03.03.1877.

[19] 章三潮，漳州长泰人，新加坡开埠不久南来谋生，稍有积蓄创长越号，经营烟酒及土产，1849年创长泰会馆。

[20] Carl A. Trocki,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191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97, p.99.

[21] Carl A. Trocki, *op.cit.*, p.99.

[22] Carl A. Trocki, *op.cit.*, p.119.

[23] 译文引自龙坚，〈新加坡独立前崛起的华商文化资本积累〉《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卷5期1（2013年6月），页30。

着事半功倍的效益。简言之，呷华商凭四种优势建立了他们成为举足轻重的中介商。这四种优势为雄厚资本（经济资本），亲情、帮群、族群及外商关系（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崇奉中华传统文化与通晓闽粤方言、马来语、荷语与英语（文化资本）以及良好的官商关系（政治资本），使他们在新加坡开埠初期，抢先机和中国商队与欧商建立了良好的商业关系，扮演销售欧洲工业制成品及收集东南亚土产及中国货物的中介商角色[24]。

19世纪初，七家头在广东三角洲，尤其在广州，已是大商号。五口通商前广州是欧美十三洋行驻扎地的大商港。与呷华商一样，七家头对华洋杂处的国际贸易的环境并不陌生。他们凭借这种国际贸易的经验和知识，并夹着雄厚的资本登陆华工总汇的新加坡，以华工市场为主力销售华人日用品，然后扩展到马来半岛及印尼。他们在新加坡华社最初是以粤人会馆及慈善机构为基地，发展其社会网络，进而积极支持同济医院的成立，和其他各帮华商接轨，扩张其社会与商业网络。

白手起家的侨民华商来自民间，华社基层社会是他们的基地。他们有呷华商及七家头没有的草根人脉，尤其是控制华工移民及劳工市场的会党势力如义安公司、港主与种植人、工头等。资金和草根人脉让他们掌获甘蜜与胡椒的供应，销售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油盐米糖、酱油、香烛、鸦片、酒等到甘蜜胡椒园。换言之，他们以新加坡为基地，靠资金和草根人脉遥控新加坡郊区和柔佛胡椒甘蜜园的劳工和经济市场。鸦片和酒是他们的经济命脉。他们和入口烟酒的洋行建立商业关系，确保鸦片烟土和酒的供应。他们设立鸦片加工厂把烟土制成烟膏，分销到新加坡、柔佛和廖内群岛的鸦片烟馆。烟民主要是在生活线上挣扎的劳工，如人力车夫、码头工人、胡椒甘蜜园的华工。1887年到访新加坡的李钟珏目睹新加坡的鸦片烟贵于中国数倍，但是吸烟者并不见少，且穷人居多。人力车夫“日夜可得洋一元，缴租四角，可余六角，苟无烟癖，度日有余。乃十人中无烟瘾者不得一二。炎蒸汗血博得之蝇头，尽入烟斗，殊可怜已”[25]。为了烟酒包税，潮籍甘蜜胡椒商和闽籍烟酒商联手合作结成商业联盟垄断新加坡、马六甲、柔佛及廖内的烟酒饷码承包。为了确保烟酒包税的投标成功，他们必须维持良好声誉，以及跟新柔官府建立良好关系。

三组华商都有各自的商业领域及网络，他们在华社事务活动方面合作无间（如积极参与会馆、宗亲会及行会的活动、设立和管理陈笃生医院及同济医院），跟官方的往来，立场也一致（如打击海盗、集体代表华社欢送离去的总督）。殖民地政府也在社会动乱时请各帮侨领（皆为华商）协助平乱，维持社会治安。简言之，他们都在特定的商业版图，通过各自的渠道，经营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资本，建立其网络机制。

移民时代华商世界的帮权特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帮权和行业的关系。移民由于生活在陌生的多元种族环境，往往靠语言相同的同乡引介进入同乡从事的职业，造成某帮群多数从事某种行业的现象，如来自马六甲的华商控制转口贸易，潮商独霸胡椒甘蜜种植业，广客商分别垄断酱油与当铺业等。另一层面是各帮分享同个行业但根据帮权结构占据各自地盘。例如汇兑或民信业就有闽、潮、广、客及海南帮群的汇庄[26]。华资银行起初也是有鲜明的帮权色彩。行业的帮权结构是一双面刃。初期有助于企业建立商业网络，但当企业发展到成熟阶段就必须跨越帮界，甚至华社和国界，走向区域。否则，帮权结构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除了经济大势外，建基于帮权结构的民信业的没落为一佳例。

华商的思想内涵

传统中华文化是19世纪新加坡华社的主流文化，其思想内涵包括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如孝道、尊贤敬老、长幼有序、以和为贵的和谐社会与人际关系、忠义诚信的道德准则，以及泛神的民间宗教信仰等。36个来自马六甲的华商于1831年成立的庆德会的组织纲领，最具代表第一代呷

[24] 有关主要第一代华商的商业活动，见黄枝连，《马华社会史导论》，页85—86；杨进发，〈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载杨进发，《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页6—7。

[25]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年），页13。

[26] 见本书第十一章《家书抵万金》。

华商的思想内涵。庆德会的组织纲领完全建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与文化价值观，强调血缘关系的亲情，圣人的教诲则是他们的思想指导。世居马六甲的36家族创始人和中国与中华文化的纽带延续不断，他们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创始人仍具有心向中原的忠君思想。他们仿效刘关张桃园结义，照顾遗孤，重视仁义道德，创始人的理想人格模式是一个正直、诚毅和忠实的人。“正直是我们的盾，诚毅和忠实是我们的武器和引导”[27]。他们以祭祀仪式来加强会员间虚拟的血缘关系。会所内供奉道教的神明三官大帝，俗称（上元、中元、下元）三界公[28]。

实际上，侨民华商包括七家头、胡椒甘蜜种植人、头家、烟酒饷码承包商也一样深受传统中华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身体力行，倡建庙和坟山，崇奉佛祖、菩萨、观音、妈祖、关帝等神祇，会馆都有神座安置会员的祖先牌位。中华文化价值观无形中成为一种社会压力，左右了华商的社会行为。义安公司更在章程里注明奉教者不得担任名誉顾问，这种无形的社会压力无所不在。

1839年至1843年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新加坡华社传教，尤其积极向来自马六甲的富商如陈笃生等布道，可是都毫无进展，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帮权首领担心一旦信奉耶稣基督，将被同胞及同胞排斥，影响到业务和社会地位[29]。另一原因是华社领袖无法接受一旦信奉基督教，就得放弃祖先崇拜及民间信仰[30]。陈笃生及其他华商也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以鸦片戕害华人苦力而大发不义之财的怒气的账算到传教士和基督教的头上[31]。在上述龚光传的诉讼中，陈送等华商在供证前皆斩公鸡头宣誓。

陈金声更在遗嘱中清楚注明如果任何儿子或其男性后裔一旦放弃华族宗教和礼俗及崇奉其他宗教，则他或他们以及其父系的男性后裔即失去对其遗产的任何权利[32]。这是19世纪华商崇奉华人传统宗教和文化最指标性的表白。

华商版图重组（1900 – 1942）

家族企业面临挑战

迈入20世纪，华商，尤其是老字号的大家族企业，处于十字路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形势的改变，另一方面是家族企业的后遗症的出现。19世纪末，胡椒甘蜜种植已没落，兴起的新兴行业是锡矿开采和黄梨种植及黄梨加工业。随着禁烟运动的展开，1909年，政府设立鸦片专卖局取代包税制度。此经济局势的巨大变化对华商影响很大，尤其对靠种植胡椒与甘蜜及烟酒包税致富的华商，更是雪上加霜。华商如何应变？为了比较研究经济变化对经营出入口生意的贸易商及胡椒甘蜜商与包税商有何不同影响，以及两者如何应变，笔者选了最大贸易商陈笃生和陈金声及最大胡椒甘蜜商与烟酒包税商章三潮和佘有进四大家族企业。他们是19世纪华商的领军企业，因此具有代表性。下表显示四大家族企业调整其投资形态的情况。

[27]《庆德会创会章程》，1831年。

[28] 林孝胜，〈庆德会：华商互助会的组织与运作〉，载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100—128。

[29] 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出版部，2010年），页232。

[30]《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页225。

[31]《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页235。

[32] *Codicil to the Will and Testament of Tan Kim Seng*, 17.12.1863.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9月1日

新加坡举行强制公民投票，通过保留教育与劳工事务而与马来西亚合并

表（一）四大家族投资形态变迁

家族/世代	业务	家族/世代	业务	家族/世代	业务	家族/世代	业务
1. 陈笃生（1807－1850）	地产、贸易	1. 陈金声（1805－1864）	设丰兴公司经营出入口生意，设分行于马六甲及上海，并投资地产	1. 章三潮（？－1860）	苦力出身，开设长越号经营烟酒土产，烟酒包税	1. 佘有进（1805－1883）	南来初在商店理账，发迹后经营土产经纪行，大量投资地产和胡椒甘蜜种植，号称甘蜜大王。通过妻舅陈成宝承包烟酒饷码
2. 陈金钟（1829－1892）	陈笃生长子，扩展父业到暹罗等地，设立碾米厂。振成公司为新最大米商。航运业丹绒巴葛船坞公司创始人之一	2. 陈明水（1828－1884）	金声子，继承父业	2. 章芳琳（1841－1893）	章三潮长子，继承父业，烟酒包税、航运、大地产商	2. 佘连城（1850－1925）	佘有进次子，协助父业。守住庞大地产。后投资黄梨种植及设厂出产黄梨罐头
3. 陈纯道（1854－1891）	陈金钟子，协助父业，比父亲早逝。家业由其孙子陈武烈继承。1913年，金钟遗产陆续拍卖	3. 陈若锦（1859－1917）	陈明水子，继承父业	3. 章壬全（1878－1940）	章芳琳三男，继承遗产，成为最大地产主	3. 佘应恭（1873－？）	佘连城次子，继承经营黄梨加工，后改种树胶

资料来源：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Malaya Press, 1967)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黄枝连，《马华社会史导论》（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1年）

上表显示：（一）第三代才开始感受到经济变化的压力；（二）贸易商受影响不大，在第二代的掌权下迅速扩展家族企业。陈金钟将父业扩张到暹罗（今泰国），成为新加坡和暹罗最大米商，他也投资在航运业。陈金声的第二、三代（明水与若锦）则主要守业，继续发展新、呷、上海的区域贸易，并投资地产；（三）相较之下，胡椒甘蜜及包税商受影响较大，主要守住地产以缓冲失去盈利最高的业务。章芳琳继承父业外，积极扩展航运和地产业务。佘连城开始调整投资形态，投资在新兴的黄梨种植和黄梨加工业。

归根结底，老字号家族企业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在变迁的新世纪创新企业计划从新出发。商场竞争是无情的，不进则退。根据现代企业思想之父约瑟·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观察，成功的企业的通病是往往由子嗣继承，并因袭旧业和满足于守业，直到为新的企业家取而代之为止[33]。

上述四大家族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不幸而言中。陈金钟于1892年去世，其辉煌的米业王国因儿子纯道先他早一年去世，而孙子武烈当时只有18岁，后继无人，家业就此走下坡。七家头也难逃此厄运。七家头以红烟起家，垄断了

[33] 熊彼得著，文何畏、易家详译，《经济发展理论》（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9年），页195。

东南亚的红烟市场，代代相传旧业，当市场转向洋烟，七家头也就没落了。因此，老字号和市场脱节是企业未能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企业自我创新的问题，家族企业更大的致命伤是因后人为遗产问题而导致家族企业的没落。遗产官司多起源于华社一夫多妻制度，华商往往在妻之外还有一或多名妾，妾生的孩子属于私生子。遗产官司往往牵涉到妾与私生子在奉行一夫一妻制度的英国法律是否具有分享或继承遗产的权利问题。上述四大家族，除了陈笃生家族外，其余都发生子孙为遗产打官司的事。1872年4月15日，章芳琳被弟芳源在高等法院控告在其父章三潮的遗嘱上的签名作手脚[34]。陈金声的遗产官司于1895开始，时为第三代陈若锦当陈金声遗嘱信托兼执行人[35]。几乎在同个时候，佘有进遗产官司也在高等法院开审[36]。遗产分家也是阻碍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华商新贵建立企业王国

当19世纪各豪门忙着处理祖业纠纷时，一批新企业家蜂拥而入，以创新的企业计划，迎合时代的经济趋势，开辟新天地。这批华商新贵大部分来自中国闽粤地区。

19世纪末，新马胡椒与甘蜜种植业已衰退，取而代之的是黄梨种植业及远在中马与北马的锡矿业。1897年殖民地政府在义顺港脚拨地三百多亩发展种植业，陈泰和陈杞柏（陈嘉庚父亲）最先响应，引进农户种植黄梨并设黄梨加工厂制作黄梨罐头出口。1904年陈嘉庚也投入此新兴行业，在义顺区创设新梨川黄梨厂，并在附近买下福山园，广种黄梨。

同时，随着欧美汽车业兴盛起来，需大量树胶以制造轮胎，刺激新马树胶业的发展。英人纷纷于1904及1905年组织股份公司来新马开发胶园。新马华商也抢着跟进，促使胶价大涨，使得新马经济大好，百业欣欣向荣。树胶和锡矿业成为20世纪新马的经济命脉。树胶商成为华商的领军人物，华社活动都以胶商为马首是瞻。

19世纪四大企业家族也有创新企业的后裔如陈齐贤（陈笃生孙，其三男德源之子）及陈若锦（陈金声孙），他们拜跟洋行的密切关系，抢先机投资种植树胶。可惜由于遗嘱问题导致家族成员不和，使得两人只在树胶种植赚了钱，止步于成为树胶种植拓荒者，为华商新贵如陈嘉庚铺路成为树胶大王。

当陈嘉庚于1906年听闻陈齐贤等种植树胶获利甚丰的消息，即刻向陈齐贤购买18万粒树胶种子，在福山园的黄梨园播种树胶[37]，一举成为树胶大王，成为二战前家喻户晓的企业王国开创者之一。另外两个是林秉祥与胡文虎。

陈嘉庚的企业王国的建立可分三个阶段：（一）1904年至1916年，投资重心是米与黄梨业；（二）1915年至1918年，投资航运业，以及（三）1907年至1934年，全力投资在树胶业及

华商所用的树胶出口凭单

[34] Song Ong Siang, *op.cit.*, pp.167–168.

[35] "Summons in Chambers", Supreme Cour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2.05.1895.

[36] *Singapore Free Press*, 23.09.1895.

[37] 林源福，〈义顺社区发展概述〉，载《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基层组织等，1987年），页37。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2月2日

政府采取“冷藏行动”，百余左翼分子被捕

9月16日

新加坡因合并而成为大马的一州

陈嘉庚橡胶公司总部（陈仲熙提供）

工业。1916年聘李光前为经理，负责扩大树胶市场，直接输出到英美消费国。这是华商划时代的创举，打破洋行及英美胶商在新马的代理的垄断，其谦益树胶公司在新马及印尼设立12间胶厂与16间分栈。1920年，设立树胶工业品制造厂，雇佣6千名工人大事生产汽车内外胎、各种日用品和胶鞋、雨衣、医生用具等。他在新马、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香港、澳门及中国各大城市设立76间分行[38]。

林秉祥于1904年和胞弟秉懋创立和丰油米厂，1920年，另注册成立和丰油较有限公司，1922年投资锯木业。和丰集团最大投资是航运业。1911年以油米较的盈利累积资金收购黄敏公司三艘轮船，1918年增加到11艘。第一次大战期间，和丰轮船公司在槟城、仰光、香港、厦门及汕头设立航运代理处，每周定期有轮船穿梭于新加坡与香港、汕头及厦门之间。和丰公司也有航线由新加坡至槟城、仰光、麻坡、马六甲等城市。林秉祥从航运业、油米业、直接贸易与代理商业赚取巨利后，分别于1917年和1919年建和丰银行及和丰洋灰厂。和丰集团俨然成为一个多元化的企业王国[39]。

胡文虎、文豹昆仲于1908年在出生地缅甸仰光继承父业，永安堂制药厂，研制举世闻名的虎标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及头痛纷四种成药。1926年将企业总部由仰光迁至新加坡。二战前先后在上海、香港、巴城（今耶加达）、槟城、汉口、汕头、福州、棉兰、重庆、昆明、贵阳及泗水设立永安堂分行，形成一个庞大的虎标成药销售网络。为了免费登广告推销其产品，虎豹兄弟又创设星系报业集团，从1921年起至1942年先后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大城市办报，都以星字命名，计有《仰光日报》（仰光，1921年）、《星洲日报》（新加坡，1929年）、《星华日报》（汕头，1931年）、《星光日报》（厦门，1935年）、《星渝日报》（重庆，1937年）、《星槟日报》（槟城，1939年）、《星岛日报》（香港，1940年），完成一个虎标药业王国及星系报业王国[40]。

表（二）列出1900年至1942年间主要华商新贵，这些华商大部分是侨民华商。呷或海峡侨生华商的后裔自1900年逐渐转向专业发展，许多成为著名医生（如林文庆）、律师（如宋旺相）等专业人士。虽然林文庆也投资商业，但不是第一线华商。因此，1900年世纪之交时，新加坡华商版图重组，由19世纪侨生华商时代过渡到侨民华商时代。

[38] 有关陈嘉庚的企业王国，见林孝胜，〈陈嘉庚的经营理念与企业管理〉，载《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148—182。

[39] 杨进发，〈林秉祥与新加坡和丰帝国的缔造〉，载杨进发，《新华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页69—100。杨进发，〈民族资本家林秉祥与和丰公司〉，载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页103—116。

[40] 沈仪婷，《谱写虎标传奇—胡文虎及其创业文化史》（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等，2013年），页79—285。

表（二）主要华商新贵（1900－1942）

名	帮属	业务
陈嘉庚	闽	米、种植黄梨、黄梨加工、树胶、树胶产品、航运、银行、饼干厂等。创立一庞大的多元化企业王国，被誉为树胶大王，其分号遍布东南亚及中国
林秉祥	闽	与胞弟秉懋创设和丰企业王国，业务包括航运、油厂、银行、保险、等。和丰轮船是二战前东南亚家户喻晓的品牌
李清渊	闽，呷侨生	出入口贸易、航运
吴寿珍	闽	锯木、锡
黄仙精	潮	绸缎、布匹、汇兑
李光前	闽	树胶、黄梨厂、饼干厂、地产。二战后继陈嘉庚之后成为世界级的树胶大王
陈六使	闽	树胶、保险。二战后在世界树胶界和李光前齐名，被称为两大树胶大王
林义顺	潮，本地出生	种植黄梨、树胶
杨缵文	潮	土产、黄金首饰
李伟南	潮	汇兑
廖正兴	潮	树胶园
黄亚福	粤	建筑、银行、胡椒甘蜜、树胶
余东璇	粤，槟城出生	锡矿、树胶、中药、汇兑
吴胜鹏	粤	火锯厂、木材
胡文虎	客	创设永安堂制药厂及星系报业集团，风行中国和东南亚，也投资银行业
林师万	客	当店业、金庄
张梦生	客	当店业
王绍经	琼	树胶园、房屋、银行
郭新	琼	木薯种植、木薯粉厂、树胶
邵仁枚	宁波	电影、影院。1926年与胞弟邵逸夫由上海南来新加坡开拓东南亚电影王国

资料来源：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

华资银行的兴起

新加坡虽然于1819年开埠，但第一间银行，加尔各达联合分行（The Union Bank of Calcutta），却迟至21年后的1840年才设立。63年后（1903年）第一间华资银行，广益银行，才出现。那时离开新加坡开埠已经过了84年。19世纪新加坡的欧洲银行还有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渣打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and China）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这些都是英资银行的分行，其总部都设在伦敦。在华资银行设立之前，华商的存款、贷款或外汇都由外商银行经手。由于语言隔膜和缺乏华商的资料，这些外商银行都雇佣华族买办。例如薛中华曾在1900年代当汇丰银行买办。他们在华社交游广、熟悉华商的背景。因此，外商银行依赖买办对华商的推荐，甚至担保，放款给华商。可是华商既不谙英文，需通过买办的传话，中文签名也不受承认，诸多不便，于是非常期待有间华资银行的出现。20世纪初，新马华商在锡矿和树胶业赚大钱，游资充足，开办银行正好成为最好的投资。这是新马华资银行兴起的历史背景。

1900年代的华社帮权兴盛，因此，早期的华资银行在组织上也呈现帮权特征，但是银行服务对象则是全华社民众。

广益银行

广帮华商于1903年12月创办华社首间华资银行——广益银行，取其“广府人受益银行”的含义[41]。缴足资本85万元。主要创办人为广东省台山县人黄亚福，他是新马著名建筑商。黄亚福担任主席兼总理，后改任董事，由林维芳接任总理[42]。创办人皆为当时广帮著名华商，如表（三）所示。

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存款、贷款、交易票据等。不幸的是，该行于1913年11月发生银行管理不当而停业，数名董事还因侵用行款被判入狱。后来公司条例的银行部分因此案修订，“凡银行董事或雇员，除有法定抵押品外，不得向本行借款，并须于每年结账时，声明各人借款数字，及其抵押品的性质和估值”[43]。

四海通银行

1906年11月21日，著名潮商黄松亭、陈德润、廖正兴、杨缵文等发起创办四海通银行。创办时由黄松亭担任主席，陈德润为总理，陈瑞麒为司理（经理）。董事有廖正兴、杨缵文、沈克俊、陈瑞标等。廖正兴在黄松亭之后任主席，李伟南当时任副经理。1907年1月4日开业。

1907年10月19日，四海通银行发布开业半年来的业绩报告，资讯丰富，为我们提供不少华资银行在草创时期的营运资料。该业务报告以四海通银行保险有限公司（创办时名）之名发布，自1907年1月4日开业至1907年8月8日，该行2万份每股百元的股份全部被认购，注册资本200万元，缴足资本100万元。开业半年得利8万2428元，扣除本息与奖赏后实际盈利为1万7054元。利息计算法如下：

- 5元－99元，未满月取回无息。1月后每百元利息3角
- 100元－999元，三天内取回无息。3天外照存款日

表（三）广益银行创办人

名	银行职称	业务	社会活动
林维芳	正总理（董事经理）	当铺业主	中华商务总会总理
黄继祥	副总理（副董事经理）	洋行买办	
梅连振	副总理（副董事经理）	当铺业主	
黄文圃	司理人（经理）	当铺业主	
黄名	司理人（经理）	商人	
黄亚福	协理人（董事）	地产、建筑商、胡椒甘蜜及树胶种植	广惠肇留医院创办人，养正学校创办人
朱树铭	协理人（董事）	商人	广惠肇留医院创办人
许裕顺	协理人（董事）	商人	
邱雁宾	协理人（董事）	商人	广惠肇留医院创办人、华人参事局委员、保良局委员、养正学校创办人
黄光炎	协理人（董事）	当铺业主	
梅百福	协理人（董事）	当铺业主	

资料来源：黄佩萱著，张清江译，《移民、建筑商、企业家：黄亚福传》（新山：广肇会馆，2010年），页172—174

[41] 黄佩萱著，张清江译，《移民、建筑商、企业家：黄亚福传》（新山：广肇会馆，2010年），页172。

[42] 陈维龙编著，《新马注册商业银行》（新加坡：世界书局，1975年），页15。

[43] 同上注。

永安堂广告

起，每千元每月利息3元6角

- 1000元起即日取回无息。过一天外则照存款日起每千元每月利息3元6角
- 定期存款，3个月期利息4厘；6个月期利息4厘半；一年期利息5厘[44]

该行采取保守稳健的营业策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引发新马金融危机，该行之能安然渡过全靠潮帮商人团结一致的支持，尤其是股东刘炳炎存入50万元巨款，取得安定银行客户的心的作用。二战前华资银行都备有中英文两本帐簿。中文本供不谙英文的董事及高级职员查阅，英文本为公司条例所需，供公共查账员及政府人员的稽查。华资银行多在二战前停用中文帐簿，唯独四海通银行迟至1960年才废止。1972年12月15日，该行与华侨银行合并[45]。

二战前夕，缴足资本增至两百万元。李伟南为董事主席兼任总理。在香港与曼谷设分行，上海、汕头、伦敦及马来亚各埠设立代理。业务范围包括来往存款、定期存款以及汇兑。

华商银行

华商银行于1912年9月注册，1913年开业，缴足资本200万元。创办人阵容强大，除了廖正兴为潮籍外，其余都是闽帮富商及名人，包括总理林秉祥（和丰集团董事主席）、主席李浚源、副主席林文庆。陈齐贤、陈若锦、殷雪村、陈仙精、陈延谦、陈侦祥等名列董事，可视为一闽帮银行。开业不久就遭遇1914年的金融危机，一时资金周转不灵，发生挤提事件，银行暂时停业，幸得殖民地政府的出面支持才渡过难关。1914年10月1日复业。危机过后，林秉祥辞职，由吴克俭继任[46]。

和丰银行

林秉祥离开华商银行不久，和胞弟林秉懋于1917年创立和丰银行。7月1日，新加坡总行开幕。同年，又在马六甲、麻坡及峇都巴辖开设三间分行，次年设立槟城分行。香港、上海、巨港、雅加达分行也陆续成立。1920年缴足资本已增至400万元。该行网罗许多优秀银行业专才如萧保龄、马奇经、林戊己等。银行业务进展神速，成为后起之秀。它除了储蓄和借贷，还率先发展外汇业务。成立不久，其分行已分布新马、印尼、香港、厦门及上海。在1920年代，和丰银行开风气之先进入国际与区域金融业的领域，它也是当时新马最大的华资银行[47]。

[44]《叻报》，1907年10月19日。
[45]《新马注册商业银行》，页16—22；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年），页508。
[46]《新马注册商业银行》，页23—26。
[47]《新马注册商业银行》，页27—29。

华侨银行旧址

华侨银行

华侨银行创立于1919年9月，缴足资本525万元，其中100万属于爪哇糖王黄仲涵和黄弈注的。创办人包括林文庆、林义顺、陈延谦、邱国瓦、陈侦祥、蔡嘉种、殷雪村等。林文庆任主席，1921年辞职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由林义顺接任王丙丁任总经理。1920年代，先后设立槟城、仰光、吉隆坡、马六甲、吉兰丹、厦门、占碑等分行。业务蒸蒸日上。

利华银行

1927年，以余东璇为首的一批广帮富商创立利华银行，注册资本1000万元。董事包括余东璇（董事主席）、李声余（总理）、吴胜鹏、邱雁宾、何乐如、李亮琪、张郁才、陆寅杰、陈文敏等。二战前夕，余东璇在香港去世，由陈文敏继任董事主席。1943年，余东璇长子余经铸接任董事主席职务[48]。

大华银行

大华银行创办时人才济济。主要创办人有黄庆昌（黄祖耀父亲，被喻为砂劳越商界的“无冕国王”）、邱明昶（槟城殷商）、王丙丁（华侨银行总经理，合并后华侨银行四位经理之一）、郭新（海南籍富商）、陈文确等。1935年10月1日开始营业。黄庆昌担任董事主席，邱明昶副董事主席。该行吸收一批华侨银行优秀职员，如历任总理的王丙丁、首任经理兼秘书蔡克谐、会计主任吴静山、副会计主任柯子平等。二战后在董事主席黄祖耀的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新加坡主要民办银行之一[49]。

经济大萧条与战争阴影下的华商

1929年开始，美国华尔街股市全面崩溃，导致全球经济大萧条，胶市大跌，一度跌至每磅六分。新马胶园停割，工人失业，百业萧条，工厂产品堆积如山。几乎在同时，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及日本企业南进东南亚，更使新加坡华人企业和华资银行雪上加霜，面临空前的经济危机。日本对新加坡华商的对抗并不是纯粹是商业竞争，而是政治对抗。由于新加坡华商是援华筹赈会的骨干，击垮华商是日本侵略中国大计的一部分[50]。

不少华商在业务连年亏损下遭外资银行追还债款。1931年8月，陈嘉庚公司因拖欠各银行一百多万元，而在汇

[48]《新马注册商业银行》，页45。

[49]《新马注册商业银行》，页51。

[50] 见本书第十三章〈四海同心 义薄云天：抗日救亡运动〉。

丰银行为首的八间债权银行的压力下，改组成为有限公司，引入侯西反加强业务管理、协调产品生产及推销。但是，恶劣的经济大势并没有好转，世界经济继续恶化，加上日本货品排山倒海般的贱价倾销的攻势越来越猛，市面上全是日本货。中国市场也同样遭遇日货倾销，以致中国20多个分行严重亏损。各国都实行保护主义，施行关税壁垒政策，促使陈嘉庚公司的树胶和树胶品出口大受打击。1933年，陈嘉庚公司宣布自动收盘结束营业。

林秉祥的和丰企业王国也难逃瓦解的厄运。和丰集团的银行与航运业首当其冲遭到最大打击。1931年受英镑贬值的影响，导致和丰公司无法还清银行债务，抵押给银行的产业都最终被没收，损失惨重，动摇和丰企业王国的基础。经济风暴的骨牌效应之下，造成其工厂和轮船公司连年巨额亏损。1932年遂决定出售和丰集团的旗舰，和丰轮船有限公司的轮船给欧商海峡船务公司，结束和丰辉煌的企业历史。

这场经济大风暴对大企业家和大园主打击最大，如陈嘉庚、林秉祥及林义顺都垮了，一时华商领导层出现真空状态，正好给一些创业不久的华商提供发展良机。李光前的南益和陈六使的益和的兴起是最贴切的例子。两人的树胶公司于经济大萧条前夕的1920年代中创立。由于规模小，投资不大，故损失也相对的小。另外一个有利因素是大胶商及大园主倒闭后，树胶业竞争者也减少了，因此，在他们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方法下，逐渐在新马印尼建立其树胶收集网及销售网，他们的树胶业务反而稳健发展起来。新马树胶业的领导权的棒子在1934年陈嘉庚将公司收盘后，已移交给两位旧部属李光前和陈六使了。两人在韩战后跃升成为世界树胶大王。

另一方面，经济风暴和日本侵略中国对华资银行也产生深远的影响，波及三家闽帮银行，华商、和丰及华侨银行，最终导致三家银行于1932年12月合并。经济学家李绳毅指出，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给华商、和丰及华侨三家银行一大压力。1931年英国脱离金本位制度，英镑因而大贬值。由于三家银行多接受香港银元存款，银元不追随英镑贬值，导致它们蒙受损失。再加上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它们在中国的资产也大受损害。这种种不利因素，使得三家银行只好合并[51]。1932年改组成为现今的华侨银行。当1933年1月2日正式开业时，它成为新马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本地银行[52]。合并后的新华侨银行，由李光前及李俊承分任正副主席，陈延谦为总理[53]。

华商的组织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1915年改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创立于1906年，是华商的最高组织，同时它也是华社的最高组织。它是由清廷发起并在其支持下成立的。自从清廷于1870年代在海外设领，便深感华侨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一股振兴晚清经济重要的潜在力量。因此，驻外使领馆的职务中，护商与招商为核心职务。

[51] 李绳毅，〈新马华人银行发展过程及未来趋势〉，载吴伦霓霞，郑赤琰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页160。

[52] 吴祖文等著，陈照明译，《华侨基石－银行家陈振传先生之业绩与商道》（新加坡：名创学术出版社，2004年），页17；杨妍，〈1933年之变革：论新加坡早期华人银行发展－以华侨银行为例〉，载《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卷4期2（2012年12月），页60－82。

[53]《华侨基石－银行家陈振传先生之业绩与商道》，页31－37。杨进发，〈林秉祥与新加坡和丰帝国的缔造〉，载《新华华族领导层的探索》，页98。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6月5日

南洋大学开始由政府补助及管制

7月21日

马来回教徒举行先知诞辰大游行，与华人冲突酿成大暴动

20世纪初，中国各工商口岸纷纷成立新式商会。清廷商部开始策划在海外鼓励华商设立商会，引导华资回国投资，振兴疲弱的晚清经济。1905年底，首任南洋事务大臣张弼士到东南亚视察华侨商务。他在同济医院和华商会商倡议成立中华商务总会。翌年丙午年二月廿二日（阳历3月16日）华商开大会，议决创立中华商务总会[54]。商会宗旨包括团结新加坡华商，会员间分享商业资讯，对政府政策向有关当局陈请等。新加坡著名华商都入会，它成为华社实际上的领导组织，也是华商与华社的发言人，政府与华社华商对口的组织。

华商自清廷于1877年在新加坡设置领事馆以来就和清政府及驻新诸领事及总领事维持密切关系，商会成为新加坡华社支持清廷的基地。他们积极捐输救济中国水灾和旱灾，热烈接待访新的清廷高官、视察侨情的代表团和招商团；不少著名华商向清廷买官鬻爵。捐购官衔的新加坡华商包括陈金钟、章芳琳、陈泰（陈清泰）、吴寿珍、吴新科、邱忠波、邱菽园、黄亚福、李清渊、颜永成、林秉祥、刘金榜、余东璇等[55]。这些官衔如道台、道员、同知、中宪大夫、花翎二品顶戴、荣禄大夫等成为他们的政治资本的一部分。

行会

为了团结同行及保障同行的利益，华商在1860年代就有行会的组织。1867年，从事甘蜜与胡椒种植及贸易的华商创立椒蜜公局，以保护在新加坡与柔佛的胡椒甘蜜投资家和种植人的利益，创会主席是陈成宝，从事建筑及木工的华商分别成立北城行（1868年）和鲁北行（1890年）。19世纪成立的其他行会还有酒楼劳资双方组织的姑苏慎敬堂、轩辕洋服商会、八和会馆（粤剧同人的行会）。进入20世纪，业缘团体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行各业几乎都组织团体团结同行与保护同业利益。重要的包括树胶公会、安南郊商务局、布行商务局星洲杂货行、广帮猪肉行、当商公会等，不胜枚举。

俱乐部

俱乐部原是华商在商余时间，聚在一起联络感情，消闲聚会，但也具有华商互通商业情资，扩展人脉，建立商业网络的功能。

潮商于1845年创立的醉花林俱乐部，历史最悠久。创办人，兼首任总理为陈成宝。创会会员都是社会贤达、商界名人包括佘有进、黄金炎、陈有锡等潮帮侨领，俨然是一所高层潮商俱乐部。二战前担任总理者有廖正兴、林义顺、杨缵文、陈振贤、李伟南等人，他们也都担任过中华总商会的会长。醉花林的正宗潮州菜肴闻名新马，会员经常在这里款待好友及宾客[56]。

怡和轩俱乐部约成立于1895年，起初为闽商的俱乐部。早期总理是林推迁，1923年林推迁去世后由陈嘉庚接任总理职务。陈嘉庚大事发展怡和轩会务，广招各帮侨领富商入会。著名的华商几乎都是怡和轩的会员，如陈嘉庚、林义顺、叶玉堆、陈楚楠、张永福、薛中华、林师万、陈延谦、胡文虎等。在陈嘉庚领导下，怡和轩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运动。由怡和轩发起、组织或推动的政治运动包括新加坡华侨救国援蒋大会委员会（1936年）、星华筹赈会（1937–1941）、南侨筹赈会（1938–1941）等[57]。

威基利俱乐部成立于1896年，发起人为李俊源、陈秋金等，是新加坡唯一由侨生华商所组织的俱乐部。创办时每周必聚会一次。自胡文虎、文豹加入后，会务更形发展。二战前夕，胡文虎担任主席，佘应忠为副主席[58]。

吾庐俱乐部，原名“古寄乐”，是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等人所创立，1907年改名吾庐俱乐部。会员多是闽商，不少来自受华文教育的银行界人士。二战前邱国瓦与陈延谦先后担任总理。会员积极参与陈嘉庚领导的山东筹赈会及抗日救亡运动[59]。

---

[54] 颜清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清政府的关系，1906—1911〉，载颜清湟，《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页71。

[55] 颜清湟，〈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载颜清湟，《海外华人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页3—43。

[56]《醉华林俱乐部：流金岁月》（2011年）。

[57] 杨进发，〈怡和轩俱乐部与战前星华社会〉，载《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页30—37。

[58]《星洲十年》，页962。

[59]《星洲十年》，页963；杨进发，〈战前新加坡的吾庐俱乐部〉，载《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页38—43。

海天俱乐部为粤商所创办的俱乐部。起源于1918年广东水灾，粤商筹款万余元赈灾，后扩大组织，改名海天俱乐部，又附设话剧团，曾为国内外医院学校演剧筹款多次。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广帮筹赈会即假该会为办事处。总理为伍燊才，林文田为副总理，正司理曾纪辰，皆为粤帮侨领[60]。

二战前华商发展的局限性

随着华商资本的累积与扩张及企业谋略与商业网络的建立和发展，华商在第二期开始试图突破殖民地政府所设定的经济领域，出现华资银行、远航航运、工厂等的跨国营销，因而和殖民地政府、洋行及南进的日本企业产生利益冲突和矛盾。

树胶商尤其身受其害，陈嘉庚开始突破洋行所设定的转口贸易框架，试图直接将产品销到英美消费国，可是由于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风暴，加上日货贱价倾销，结果失败。但继承其胶业界领袖地位的两位接班人陈六使与李光前，继续努力为新马胶业前途长期奋斗。从1930年代起至1950年代，两人更进一步力争将世界树胶交易中心从消费国的伦敦和纽约转移到产胶国的新马来。在殖民地时代，英国洋行垄断了新马树胶业，树胶品质鉴定及交易条件全由英美树胶公会及新加坡西人树胶商会决定，产胶国胶商任由宰割。由于西商有强大的殖民地政府做后盾，华商无法突破大英帝国的经济体系框框。再者，华社保守的行业和帮权之间挂钩及其家族企业框架都成为二战前华商企业发展的绊脚石。华商发展的局限性要到二战后新马独立建国之后才有所突破。

[60]《星洲十年》，页963。

第十三章

四海同心 义薄云天
Anti-Japanese Campaign

四海同心　义薄云天
——抗日救亡运动

摘要

济南惨案与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华社的反日情绪与救亡意识。终于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催化了一个以新加坡为基地，由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侨民除积极筹赈外，南侨机工还到前线抢运战略物资。新加坡沦陷前夕，新华社会还协助殖民地政府维持地方治安及民防的工作。

Abstract

The Jinan Massacre and the Mukden Incident sparked an anti-Japanese campaign among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This developed, after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nto a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based in Singapore 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an Kah Kee.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not only raised funds for China but also helped as volunteers, transporting strategic materials into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fall of Singapore, the Chinese also assiste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maintaining Singapore's law and order.

林孝胜（Lim How Seng）

1937年，当新马华人开始从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阴影走出来时，又被卷入中日战争的旋涡。祖国与家乡危在旦夕，海外华侨义无反顾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是海外华人历史，也是华侨时代最悲壮和激情的篇章。虽然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是点燃中日全面战争的火花，但日本入侵中国的根源却是1870年代明治维新运动的大国梦。

从明治维新到田中奏折

日本的崛起始自1870年代的明治维新运动。它推翻德川幕府，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首个走向现代化、西方化、工业化及富国强兵道路的国家。18、19世纪，由于工业革命，西方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及美国）武力瓜分亚洲与非洲，广设殖民地，掠取殖民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以供养国内新兴工业。这种强权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常态。因此，明治维新大国梦的愿景是借鉴西方势力通过扩张领土的手段，以振兴国内经济的模式，“脱（离）亚（洲）入欧（洲）”成为一个能同西方强国平起平坐的亚洲大国。

柯木林认为自明治维新就研究征讨中国战略的日本参谋本部第一局长小川又次（Ogawa Mataji），早在1887年已提出“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的战略方案。因此，柯木林指出自明治维新以来作为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即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1]。1894年及1904年，日本分别击败中国与俄国，占领辽东半岛与台湾，继承沙俄在中国的旅顺、大连租用权，从此走上黩武军国主义的不归路。1900年，日本随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天津。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至此，日本已崛起，逐步实现其大国梦，也是唯一加入瓜分中国的西方利益集团的亚洲国家。

进入1920年代，一个征服亚洲的行动计划在总理田中义一（Giichi Tanaka）任内完成。田中义一为一军人，曾参与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1927年4月出任日本首相，6月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会议由田中义一亲自主持，出席者包括外务次官，日本驻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使领馆要员与驻蒙特务机关首领，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长官、南满铁路总裁等。会议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和日本侵占中国的步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会后发布了《对华政策纲领》，这是田中奏折的雏形。7月25日，田中向天皇密奏《日本侵略满蒙积极政策》，即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不但提出入侵满蒙，还提出征服全中国及亚洲的计划和时间表。田中奏折开宗明义指出：“侵略满蒙，实行明治大帝第三期亡满蒙之计划矣！亦即大和民族征服世界之时矣！按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皆实现，唯第三期之灭亡满蒙以作征服支那全土，则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洲全带，无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之大业，尚未能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2]！可见田中的行动计划和前面提到的小川又次之征讨清国方案是一脉相承的。田中又指出：“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3]。

长期为张学良提供日本侵华情报的蔡智堪，于1928年7月密传田中奏折之手抄本给张学良的秘书王家桢[4]。1931年蔡智堪还不断提供日本的满蒙政情报给张学良[5]。中国与苏联官方认为确有田中奏折，而日本则坚决否认其存在。日本一直否认有田中奏折，因为其日文真本至今尚未找到，可见战败国在

[1] 柯木林，〈中日关键历史人物的视野〉，载《怡和世纪》期25（2015年2、3月），页82。

[2] 《田中密摺》（南京：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1931年10月1日），页40—41。

[3] 《田中密摺》，页7—8。

[4] 沈予，〈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载《历史研究》期2（北京，1995年），页90—91。

[5] 《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19。

投降前毁灭证据也已成为常态。

虽然田中奏折真伪争议不断[6]，但是，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行动，几乎完全按照田中奏折的侵略大计进行却是铁一般的事实，难道这是历史巧合？田中义一在1927年就能未卜先知1930年代发生的战事？

反日浪潮掀开序幕：济南惨案

日本的侵略政策分北进中国与苏俄的大陆政策，以及南进入侵南洋群岛的计划。由于南洋群岛大部分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南进的阻力预料会相当大。因此，日本乘中国内乱，先启动北进行动计划，于是1928年就发生了济南惨案。1928年5月3日，日本关东军在山东济南和国民党北伐军发生武装冲突，杀害中国特使蔡公时。消息传到新加坡，引起侨民反日爱国浪潮，掀开筹赈活动序幕。怡和轩俱乐部在陈嘉庚领导下，发起成立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简称山东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分帮选出32名董事。总部设在怡和轩俱乐部的山东筹赈会组织各帮、区、行会、社团、妇女及学校募捐团，在短短的九个月就筹得百多万元[7]。陈嘉庚成功领导山东筹赈会使他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灵魂人物。

市面上还有抵制日货运动，一些售卖台湾茶叶的商号也遭殃，因为当时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历史悠久的白三春茶庄就于翌年4月15日收到下列恐吓信[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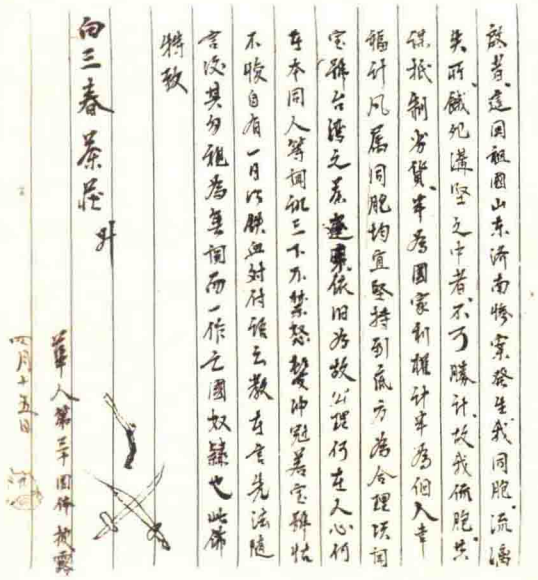
启者：这回祖国山东济南惨案发生，我同胞流离失所，饿死沟渠之中者，不可胜计。故我侨胞共谋抵制劣货，半为国家利权计，半为个人幸福计。凡属同胞均宜坚持到底，方为合理，顷闻宝号台湾之茶运来依旧，为故公理何在？人心何在？本同人等闻讯之下，不禁怒发冲冠。若宝号怙（恶）不悛，自有一日以铁血对付。语云教在言先，法随言后。其勿视为无关而一作亡国奴隶也。此布特致

白三春茶庄升

华人第三十团体披露

四月十五日

抵制日货对当时集中在桥北路（North Bridge Road）、密驼路（Middle Road）、海南街（Hylam Street）一带的小日本商业区，约20余间日本商行受打击很大。日本为促进对东南亚的贸易，在各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南洋



白三春收到的抵制日货恐吓信

[6] 服部龙二，〈围绕《田中奏折》的论争－实际存在说与伪造说之间〉，载刘杰等，《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页83－110。〈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的再探讨〉，页82－94。Leon Trotsky, "The Tanaka Memorial", *Fourth International*, Vol.2, No.5(June, 1941), pp.131－135. John J. Stephan, "Tanaka Memorial (1927): Authentic or Spuriou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7, No. 4 (1973), pp.733－745.

[7] 杨进发，〈山东筹赈会与陈嘉庚〉，载崔贵强、古鸿廷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年），页141－147。

[8] 作者从本地邮商购得原件，现藏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感谢该中心提供图片。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6月1日

马来西亚与印尼签订协定中止对抗，同时印尼承认新加坡

协会负责推销日货及调查在地的经济情资。南洋协会也在当地设立日本商品陈列馆。新加坡日本商品陈列馆设在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1929年初，新加坡的日本南洋协会属下的日本商品陈列馆的新年报告指出“南洋排日之热烈比国内为甚，新加坡尤为南洋排日中之最彻底兼持久者”[9]。报告继续指出以华侨为推销对象的货物如棉布、卫生衣、洋灰、火柴、铁器、玻璃、法郎、面粉、药品、漆料等，受打击最大。华侨也杯葛日本医生、牙医、照相馆。该报告指控排斥日货的纠察团的手段是对初犯商号先发忠告信（如以上白三春茶庄者）或罚款，再犯则店铺涂鸦，甚至割耳及暗杀。结果，华商取消定货。又因日货滞销而拖延还债，造成恶性循环，不少日商出现资金周转不灵，亏损惨重，甚至倒闭。该报告指明推销国货的华商和中国制造商为抵制日货的推手，恶意指控他们利用排日恶感，借名爱国发财[10]。

由于华商是筹赈会的主干，提供财政援助给国军，加上日本官商主观上以为华商是排斥日货的推手，促使其视华商为眼中钉。在侵略战略上切断华商对国军的支援有利于征服中国，同时可协助日商清除在东南亚扩张的障碍。所以，华商和日商的矛盾不纯粹是商业竞争[11]。

于是，1930年代出现一连串对南洋华商的调查和剖析[12]。早期的调查报告着重于分析南洋华商如蜘蛛网似的商业网络。从大盘批发商、中盘商店至大小零售店等，除输出贸易外，所有物品都经华侨之手买进卖出[13]。日商是后来者，人数也少，因此只好依赖华商营销日货。“海峡殖民地的华侨不但是日本商品的输入商，也是批发商，同时也是商品的消费者”[14]。因此，吸取抵制日货的教训，调查报告作者之一的竹井十郎（Takei Juro）呼吁日商“必须去除以前迎合他们（华侨）及依赖他们的态度，独立自主地往南洋发展，开拓自己的机运，让他们依赖我们，而决不去依赖他们。我们亲善的主要目标是土著，也要加强与法人、泰人、英人及荷人的合作”[15]。他极力主张商业移民，“尤其商业移民的施行，是急务中的急务，能在制度上改善及成立新设机关的话，就能实行商业移民。因此透过多数有为的青年，使他们活跃于商场上，将我国的贸易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地盘上，由根而干，由干而枝，由枝而叶，遂至茂密繁盛”[16]。1939年4月日海军国策研究会的“南方对策要项”更直接建议日本加强在菲律宾、泰国、法属越南、英属马来亚（不包括新加坡）、荷印等地区的经济力量，或努力获取区域商贸权，以取代华侨的经济势力[17]。

救亡意识的萌芽：九一八事变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这首抗战时期很流行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歌曲描绘了1931年9月18日东北沦陷后难民痛失家园亲人的悲恸呐喊。九一八事变惊动了神州大地和海外侨社，他们意识到日本开始启动田中奏折入侵中国的计划，亡国危机开始浮现，救亡意识油然而生。新加坡华社，在发动山东筹赈会时的焦点是抗议日本杀害中国特使蔡公时，这点可

[9]《叻报》，1929年1月15日。
[10]《叻报》，1929年1月16日。
[11] 蔡史君，〈战前日本“华侨政策”的背景与特征〉，载庄国土编，《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上册）》（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31。
[12] 竹井十郎，《南洋华侨阻害日本对南洋贸易之真象》（东京：东亚经济调查局，1930年），1984年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重印并改书名为《三十年代南洋华商经营策略之剖析》；小林新作，《华侨之研究－中国民族的海外发展》（东京：海外社，1931年）。
[13]《三十年代南洋华商经营策略之剖析》，页17。
[14]《三十年代南洋华商经营策略之剖析》，页40。
[15]《三十年代南洋华商经营策略之剖析》，页48。
[16]《三十年代南洋华商经营策略之剖析》，页59。
[17]〈战前日本“华侨政策”的背景与特征〉，页141；Joyce C. Lebra edit., *Japan's East Asia Co-prosperity 18 Sphere in World War II -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65。

以从筹款铸造铜像以纪念蔡公时明显看出[18]。九一八事变则激起了华社强烈的救亡意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谋发动“九一八事变”，出动大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启动田中奏折第三阶段入侵满蒙战略计划。其实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可是未受到舆论界和国人广泛注意。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整个舆论界才如梦初醒般动起来，开始铺天盖地传播田中奏折。1931年10月及11月，南京、上海与广州的社团都争先恐后出版书刊，宣传日本入侵东北的田中奏折。例如《田中密摺》、《日本侵吞满蒙毒计之大披露》、《日本田中侵略满蒙积极政策奏稿与注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19]。尤其是上海日本研究社出版的《日本田中侵略满蒙积极政策奏稿与注释》，出版不到一个月竟印了24版。各书封面或封底都印上救国标语如“中国存亡之重要关头”，“利刃当头，群起拯救”，更预测田中奏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火线[20]。

新加坡三大华文报，《叻报》、《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也分别于1931年10月9日、10月13日及10月22日以大篇幅连载《田中奏折》，唤醒侨胞的抗日救亡意识。皆谓田中虽死（1929年9月24日去世），而国策变本加厉，关系国家前途重大，应广为传播，揭发其阴谋，使我侨胞，研究应付。怡和轩俱乐部与新加坡福建会馆还各向南洋商报社订印一万份《田中奏折》，计划作大规模反日宣传。新到任的总督金文泰知悉后大怒，他嘱英国驻日大使向日外交部求证《田中奏折》的事，日方加以否认。于是金文泰随即对身为福建会馆与怡和轩主席的陈嘉庚施压，两团体只得取消印刷[21]。但是，奏折早已见报，因此，金文泰此举，其实也无实质效应。实际上，日本否认有《田中奏折》是预料中的事。试想，有哪一个侵略国会事先对外承认已有侵略计划？

上海出版的中国著名英文周刊《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也于1931年10月8日出版“暴日入寇专号”，刊载田中奏折的英文译文，惊动了欧美报章，使其纷纷报导田中奏折。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随着跟进，于1931年11月7日转载伦敦《晨报》（*Morning Post*）有关田中奏折的新闻，11月23日也报导日本外交部否认有田中奏折的新闻。

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新加坡的华文报每天都大篇幅报导东北战事的新闻，还出号外，1931年9月23日更一致停刊一天以示致哀。中华总商会分别致电给南京的国民政府及广州汪精卫政府，呼吁国难当前，团结御敌[22]。陈嘉庚因翻印田中奏折事遭政府严重警告[23]，因此不敢造次，退居第二线，他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促中华总商会召开侨民大

[18] 蔡公时铜像于1930年制成时，中国局势动荡，未克送去济南，暂收藏陈嘉庚树胶厂。战后，又因大陆政权变动，铜像陈列在晚晴园（今南洋孙中山纪念馆）内，2006年4月送回济南，安放在济南惨案纪念馆。

[19]《田中密摺》、《日本侵吞满蒙毒计之大披露》（上海与广州：爱国社，1931年）、《日本田中侵略满蒙积极政策奏稿与注释》（上海：日本研究社，1931年11月15日初版，12月5日24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

[20]《日本侵吞满蒙毒计之大披露》封面。

[21] 林孝胜，〈怡和轩俱乐部研究〉，载林孝胜，《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新加坡：青年书局，2010年），页140；杨进发，《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年），页217。

[22]《叻报》，1931年9月22日。

[23]《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页218。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2 月 15 日

日军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揭幕

2 月 25 日

政府宣布从本年起，国民须服兵役两年

会[24]。总商会于1932年2月4日召开侨团大会，两百多个社团派代表出席，即席选出以商会董事为主干的75名委员，成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筹赈中国难民委员会，展开募款和推广国货的活动。

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总商会发起组织上海筹赈会以赈济上海灾民。

抗日救亡运动的形成和扩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爆发。7月7日晚，日军向宛平城射击并炮轰卢沟桥，全面侵华战争从此开始。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所引发的反日浪潮及救亡意识迅速提升，把新马华人的筹赈活动推向高潮。一个有严密组织和明确方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逐渐形成和扩大。七七事变后各地的筹赈会扩大组织，加强联系和协调，一个以新加坡为基地，由陈嘉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形成中。在这个空前绝后的爱国爱乡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旗帜下，新马华人，不分男女老幼、政治意识、籍贯、富商、劳工、知识分子及学生，大家团结一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私忘我地到处奔波筹赈救国。

陈嘉庚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灵魂人物。曾对陈嘉庚施压的金文泰总督于1934年卸任后，陈嘉庚再度积极参与筹赈活动。英殖民地政府对日渐高涨的反日浪潮有所顾虑，一方面警告中国和日本侨民不得有破坏殖民地和平的举动，一方面着手物色可信任的华社领袖来领导形成中的抗日救亡运动。新任总督汤姆斯（Shenton Thomas）在华民政务司佐顿（Arthur Benjamin Jordon）的推荐下，同意无党无派的陈嘉庚是适当人选。因此，在1937年8月15日中华总商会召开侨团大会前夕，佐顿连同其得力助手孙崇瑜和陈嘉庚面谈，告知总督的决定，但也给陈嘉庚提了四个条件：不得筹款助买军火；大会不得提议抵制日货；统筹汇款以及款汇至总督指定的机关[25]。有118个侨团派出700余名代表参加的大会如期在商会举行，议决组织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华筹赈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陈嘉庚开宗明义道出侨民大会的宗旨首在救济难民及前线死亡者的家属，而非募军费[26]。会址设在他任主席的怡和轩俱乐部。筹赈会委员31人：福建帮14人、潮州帮9人、广府帮4人、琼（海南）帮1人、客家帮2人、三江帮1人。他们分别被分配到下列五科工作：财政、总务、查账、交际及筹款。在新华筹赈会的领导下，峇峇和妇女也分别组织了新加坡海峡华人筹赈会，与新华妇女筹赈会。

马来亚各地也纷纷组织州及地方筹赈会。1937年10月10日，为统一新马筹赈活动，陈嘉庚在吉隆坡召集各区代表大会，到会百余人，决议组织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联合通讯处于新加坡。陈嘉庚为通讯处主任，统辖和联系全马12区的筹赈工作：包括新加坡、雪兰莪、彭亨、吉打、吡叻、槟城、柔佛、马六甲、森美兰、玻璃市、丁加奴、吉兰丹[27]。

抗日救亡运动的策略与工作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共开始合作。南京国民政府和广东派系停止内斗，团结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下，一致抗敌。新马国民党和马共党员也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总路线下，全力支持无党无派的陈嘉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陈嘉庚于七七周年纪念的新华侨民大会上透露其抗日救亡运动的策略与工作。他指出：“对于祖国抗战应负任务有明暗两种工作。明之一面，即组织筹赈会，公开劝募分会，推举若干委员，负责筹赈及劝募公债。暗之一面，即组织爱国团，惩戒汉奸，抵制仇货。然明暗两种工作，必须分开办理，各守责职，若不明此义，相杂相

[24]《叻报》，1931年9月22日。

[25]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页42—43。

[26]《南洋商报》，1937年8月16日。

[27]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Lawrence: Centr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 Yen Ching-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 Vol. 52 (Aug, 1998), pp.150–159.

混，小则阻碍筹款，减弱抵制仇货力量，大则干犯居留政府法律，致筹款工作被禁止，爱国分子被驱逐……故凡真诚爱国者，必临事审慎，不轻举妄动，浮噪叫嚣，而贻误大局也”[28]。筹赈会就按这个策略和工作方针展开宣传、筹赈及经济制裁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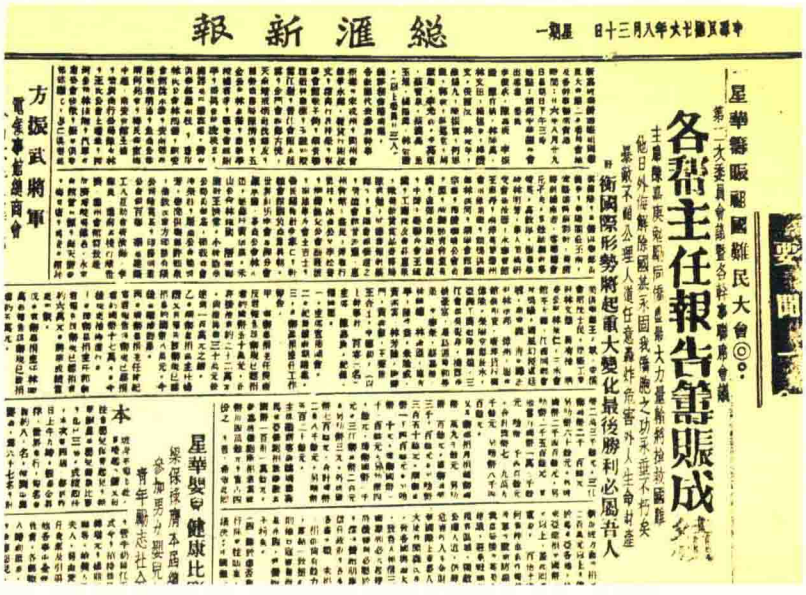
宣传

新加坡各华文报章如《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总汇报》、《中兴日报》一致全力支持新华筹赈会的抗日救亡运动，每天大篇幅报导有关抗日战争，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的暴行、筹赈会活动及捐款人名录、抵制日货的新闻，向同胞灌输爱国抗日救亡思想，热烈捐输，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为了向不识字或受教育不高的劳工如人力车夫、码头苦力、建筑工人、店员、农夫、妈姐、红头巾女工等开展宣传，筹赈会在市区和乡村举办通俗演讲，以最直接启迪有效的方法，向他们宣传和灌输救国救乡及抗日意识。1938年9月6日，筹赈会在天福宫戏台举办首次通俗演讲[29]。9月25日则在乡村区的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民正学校举行第二次[30]。筹赈会要员包括陈嘉庚、林文庆、周瑞献、侯西反、黄奕欢及各帮代表都以方言讲述抗日救亡的意义。

黄昏后在牛车水及新加坡河畔摆摊的讲古佬不再讲《七侠无义》、《三国演义》的故事，而改念报章上刊登的抗日战争，和筹赈会活动的新闻，给目不识丁的听众听。讲古佬有时还加插个人的评论，向苦力传播抗日救亡消息。

新马戏剧工作者在宣传抗日救亡与筹赈活动也有突出的表现。他们不但紧扣抗日救亡的主题创作剧本，而且还成立众多剧团如业余话剧社、爱同校友会话剧组等，更有大批业余团体的戏剧活动。他们不但在游艺场（快乐世界、新世界和大世界）义演为筹赈会筹款，也参加筹赈会主办的游艺晚会演出，更随时随地演出街头剧。常演出的剧本有《雷雨》、《日出》、《金门岛


總滙新報

各帮主任報告籌賑成績

《总汇新报》有关星华筹振会的新闻报道（1937年8月30日）

[28]《南洋商报》，1938年7月8日。

[29]《南洋商报》，1938年9月5日。

[30]《南洋商报》，1938年9月23日。

之一夜》、《伤兵医院》、《保卫卢沟桥》及《放下你的鞭子》等[31]。《放下你的鞭子》[32]更是街头剧的招牌剧目。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中国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以卖唱为生的故事。一日，女儿唱歌时，因饥饿难熬而晕倒，老父即举起鞭子打她，观众中一人因愤怒而高呼“放下你的鞭子”，夺下了皮鞭并询问原因。父女二人诉说了在东北遭受的苦难，引起众人愤慨。1939年，著名画家徐悲鸿来新马举办筹赈画展，在新加坡根据此剧绘了一帧家户喻晓取名为“放下你的鞭子”的油画[33]。业余话剧社于1938年3月至8月组织马华巡回歌剧团到马来亚巡回演出，这批20余业余团员由胡守愚率领，从新加坡到槟城踏遍近50个城、镇及乡村，到处受到热烈欢迎，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功不可没[34]。

1940年6、7月，著名影星赵洵（即金山）、王莹率领新中国剧团在新演出救亡戏剧。王莹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很多侨胞看得落下泪来。剧团一面演抗战剧，向广大侨胞宣传全面抗战，一面为支援抗战募捐。该剧团于7月7日七七三周年纪念日，一连三天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为新华筹赈会义演筹款，剧目为《永定河畔》[35]。

1938年底至1940年3月，夏之秋率领有30余团员的武汉合唱团到新马巡回演唱抗战歌曲，为各地筹赈会筹款。它像一阵旋风把抗战歌曲传播到新马各角落。1939年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演唱，带领观众齐唱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时，全场“就热血沸腾起来”[36]。麦留芳指出贯穿这些抗战歌曲的意涵，“便是日本侵略期间，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丧失国土的悲惨局面。同时也在激发人民抗日的士气，并呼吁华侨慷慨解囊，共赴国难”[37]。编辑《30–40年代经典歌曲》歌集的孟欣也说：“（爱国歌曲是）歌声中有仇恨、有痛苦、有激动、也有自豪、有思索、更有希望……”[38]。例如团长夏之秋作的抗战歌曲“八百壮士”就是一首典型的抗战歌曲，它歌颂“一·二八事变”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事迹：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斗守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
八百壮士一条心，四方强敌不敢当
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豪壮
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
快快上战场，把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

其他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还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等[39]。

武汉合唱团于1938年12月抵达新加坡，先后在首都戏院、快乐世界、新世界及大世界演唱，历三个多月为筹赈会筹款三万余元[40]。

---

[31] 方修，〈救亡剧运的全面开展〉，载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页113—118；杨松年，〈新马戏剧界对七七卢沟桥事件的直接回应：1937年下半年的新马戏剧活动分析〉，载《亚洲文化》期20（1996年6月），页67—85；黄嘉丽，〈中国抗战文学与马华抗战文学的兴起、繁荣〉，载《南洋学报》期53（1998年12月），页128—157。

[32] 《放下你的鞭子》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部爱国主义街头剧，最初是田汉根据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改编的独幕剧，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被改编为街头剧。

[33] 有关徐悲鸿在新的活动，见本书第十章第一节。

[34] 杨松年，〈战前新马剧团研究之一——马华巡回歌剧团〉，载《亚洲文化》期13（1989年8月），页12—25。

[35] 《南洋商报》，1940年7月5日。

[36] 麦留芳，《虚拟认同：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新加坡：华裔馆，2012年），页5。

[37] 《虚拟认同：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页18—19。

[38] 《虚拟认同：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页5。

[39] 贺丁，《抗战歌集》（新加坡：C. F. Liam，2010年）；《中国抗战歌曲选（一）、（二）》（唱片）（香港：百利唱片公司，1993年、1995年）。

[40] 〈武汉合唱团南来筹赈〉，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112—113；《南侨回忆录》，页80。

筹赈

筹赈会的募捐活动由筹款科负责。筹款科按帮群分设六个帮委员会，由下列帮领导担任主任：侯西反（闽）、李伟南（潮）、曾纪宸（广）、林师万（客）、郭新（琼）以及杨惺华（三江）。各主任可委任其他同乡及帮侨领为委员，以增强筹款力量。各帮筹款委员会利用帮网络策划筹款机制展开筹款活动。

募捐名目繁多，大致分定期捐款与临时筹募两类。属于定期捐款者如募捐、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如树胶土产附捐）等。临时筹募者如卖物捐、卖花捐、售旗、义卖、演剧游艺会筹款、义演、义赛、酬神（如中元节普渡）及宴会节约等。

闽帮的筹款活动由福建会馆统筹。闽帮富商、胶业巨子、银行家热烈响应陈嘉庚的号召，踊跃捐款：陈嘉庚捐2000元（国币，下同），陈六使5000元，李光前10000元，叶玉堆10000元[41]。李光前和陈六使领导的树胶公会1937年至1941年捐了国币1百29万元[42]。受薪人士和劳工也每月捐出部分工资。

潮州八邑会馆统筹潮帮的筹款活动。潮帮领导陈振贤（时任中华总商会会长）与李伟南亦捐巨款。潮帮将新加坡分成八区，区内各潮帮地缘、血缘及业缘组织，以及商家的捐款皆入帐到潮州八邑会馆的统一帐号，再转汇到新华筹赈会作为潮帮的捐款。

广帮因无总机构，由海天俱乐部主导广帮筹款活动。其筹款方式包括以募款箱向小贩、商家募款，在市区交通要道设日用品零售店，举办粤剧义演等。

客帮、琼帮与三江帮同乡也在各帮领导带动下热烈捐款赈灾。

从1937年8月至10月，新华筹赈会已筹得国币228万元，超越陈嘉庚预期的200万元。各帮捐款如下：

闽帮	1280500元（国币）
潮帮	350000元
广帮	426000元
客帮	73000元
琼帮	72000元
三江帮	78000元[43]

自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新华筹赈会筹款达国币5700万元（月捐270万元，特别捐300万元）[44]。

无数爱国情绪高昂的男女青年及学生自动参加卖花队，沿街挨户卖花，为赈灾募款。卖花日期多在纪念日（如国庆日、九一八纪念日、七七纪念日），或义演、义赛的场合。卖花队由各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各社团会员自愿参加。花朵由学校师生（如南洋、南华、育英、崇福、养正等学校）或社团会员制作，报效给筹赈会。花分五等：名誉（无固定价码，多多益善，有每朵售百元或千元者）、一等（每朵15元）、二等（10元）、三等（5元）及普通花（5分）。参加各帮卖花队的社团和学校，数以百计。卖花队约有五百多队：广帮150队，闽帮100队，潮帮50队，客帮40队，琼帮40队，新华筹赈会120队。每逢纪念日，全新加坡布满卖花队，盛况空前[45]。

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各界热烈认购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各种公债包括自由公债、爱国

[41]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页485。

[42]《东南亚华人史》。

[43]《东南亚华人史》，页6。

[44] 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5》（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页115、149。

[45]〈筹赈运动中的卖花队〉，《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108—111；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年），页989。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9月1日

建屋发展局宣布新条例，国人可利用公积金购屋

公债、救国公债、国防公债。胡文虎认购公债50万居榜首，陈嘉庚、林文田、李光前、叶玉堆、李俊承、陈延谦等也认购10万。福建会馆、应和会馆、南安会馆与冈州会馆以及各帮商店的店员也踊跃认购[46]。1938年初，琼帮购销公债国币37万元[47]。华侨银行由于购买20万元公债而被委为公债的东南亚代理汇兑银行。自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新加坡各界购销公债共计国币455万元[48]。

经济制裁

新马华人以抵制日货和罢工活动作为经济制裁手段以削弱日本的经济力量，进而削弱其军事力量。1938年9月25日，陈嘉庚在武吉班让的通俗演讲会上对五千多村民强调抵制日货的重要性，他说："老辈旧客应教导少年辈誓勿购买仇货，因购买仇货无异资助敌人购买军火，杀害同胞。凡稍有良心的同胞当不因价贱而购买仇货"[49]。抵制日货的方式分公开和秘密（即陈嘉庚说的暗的一面）活动两项。

抵制日货获得各途华商（如布商、瓷器商、自由车商及茶商等）合作，热烈响应号召，签公约信条，表态不再进日货，如有存货则售完不再卖或予以查存。各途行商还成立监督机制，务使属下商号遵守拒买拒卖日货的规约[50]。

抵制日货的秘密活动是用来对付少部分贪图小利的奸商。惩罚奸商的方法包括发警告信、割耳朵、商号招牌涂乌油、涂粪、割破运日货罗厘的轮胎、在闹市张贴大字报公开奸商名字等等。执行这些激烈的惩罚行动主要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国民党外围组织，由侯西反、刘牡丹与黄奕欢于1937年9月成立）、华侨抗敌后援会（马来亚共产党外围组织，1937年8月创立）及建筑工友所组成的劳工锄奸团负责[51]。除奸活动导致筹赈会闽帮要员和陈嘉庚的得力助手侯西反于1939年底被驱逐出境。

经过明与暗的抵制日货行动，日货在市场上逐渐绝迹，却又造成市面上物品供不应求和物价上扬，中华总商会于是展开推销国货及奖励采购欧美货物的活动。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委员会颁发给捐款者的奖状

罢工是另一个有效制裁日本经济的手段。华工罢工由新马筹赈会暗中策划，事件多发生在日本在马来亚吉兰丹、丁加奴和柔佛经营的铁矿场。1937年11月8日，林谋盛与庄惠泉领导柔佛峇株巴辖日本月原株式会社铁矿场两千多名华工罢工。12月8日同一公司在峇株巴辖附近的另一铁矿场800名华工也响应罢工。1938年2月庄惠泉组织丁加奴龙运日资铁矿场（马来亚最大规模的矿场）的两千余华工罢工。罢工行动很快就蔓延至全马其他地方，如居銮、永平等地。罢工行动使日资公司的铁矿生产陷于瘫痪，影响日本的军事工业。

南侨总会与东南亚华侨全民抗日

七七事变之后，东南亚各地侨胞也纷纷成立筹赈会。为了更好地展开东南亚各地区的筹赈活动，以及策划推动救亡工作，各地侨领遂有筹组全南洋筹赈总会的建议。尤其是厦门于1938年5月11日沦陷后，切断了各地众多闽侨汇寄家用给家乡眷属的通道，起着催化的作用。菲律宾侨领李清泉首倡在香港开闽侨代表大会，共商对策，后因地点遍远不便及只限闽侨，反应不佳。后经李清泉和荷属东印

[46]《东南亚华人史》，页491。

[47]《南洋商报》，1938年3月2日。

[48]《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5》，页115。

[49]《南洋商报》，1938年9月26日。

[50]许世聪，〈星马华族对日本的经济制裁1937—1942〉，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144。

[51]《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页234—235；庄惠泉，〈我与林谋盛共同献身于作战〉，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20—21。

度（即今印度尼西亚）侨领庄西言商议，改在新加坡举行华侨代表大会。庄西言上书重庆蒋委员长，遂有行政院长孔祥熙致电陈嘉庚，敦促他领导南洋华侨筹赈。

1938年双十节国庆日，180多名来自新加坡、马来亚、荷印、泰国、菲律宾、香港、北婆、砂劳越、缅甸及越南的华侨代表，齐集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侨民大会，商讨组织全南洋筹赈总会。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也出席了此会。10月15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遂告成立。第一届职员如下：

主席：陈嘉庚（新）

副主席：庄西言（荷印）、李清泉（菲）

财政：林文田（新）

查账：曾纪宸（新）

常务委员：何葆仁（马六甲）、陈振贤（新）、王泉笙（菲）、

李光前（新）、陈肇基（又名陈国础，越）、陈三多（菲）、

李振殿（新）、侯西反（新）、陈延谦（新）、陈占梅（雪兰莪）、梁桑南（吡叻）、黄重吉（雪兰莪）、周瑞献（新）、

刘玉水（槟城）、李孝式（雪兰莪）、黄益堂（森美兰）

南侨总会成立时属下的筹赈组织只有68个，到了1940年增至200多个，陈嘉庚遂成为东南亚近八百万华侨的代言人和领导[52]。南侨总会强化了南洋各地区华侨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经济支援，并激励军民的抗日士气。南侨总会还议决呼吁各地区华侨增加义捐、多购公债、多购国货[53]。各附属筹赈会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每年为中国集送寒衣、棉被、药品、汽车、卡车等。

华侨机工回国服务[54]

1938年10月，广州失守，中国沿海一带交通为日本切断，国民政府赶建滇缅公路，并于1939年1月10日正式全面通车，成为对外交通唯一通道。国外支援中国抗战的战略物资全靠滇缅公路运输进入中国。1939年初，重庆国民政府通过西南运输公司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招募熟练的南洋华侨汽车司机和修车技工在滇缅公路负责抢运战略物资的任务。陈嘉庚回忆说："（1939年2月7日）南侨总会乃出通告，并致函马来亚各属会鼓励，数月之间，热诚回国者3200余人，经安南往昆明者居多，经仰光者300余人。有一修机工人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55]。

出发前南侨总会举行欢送会，陈嘉庚于1939年3月11日在欢送第二批机工的送别会上致词说："抗战救国，出钱出力，为国民天职，

南侨总会纪念章

[52]《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页241。

[53]《东南亚华人史》，页501—502。

[54] 本节是作者一篇题为〈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纪实〉的微缩版，该文原载《南洋学报》，卷44（1989年），页21—50。后收录于林孝胜，《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新加坡：青年书局，2010年），页54—107。

[55]《南侨回忆录》，页85；机工招募经过见叶钟铃，〈南洋华侨筹赈会招募机工支援抗日史实〉，《南洋学报》卷44（1989年），页1—20。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新加坡为纪念开埠150周年，举行盛大展览会和检阅仪式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复原同志留念（白毅柏提供）

海外华侨对于出钱虽未达到最高标准，亦已略尽天职。若对于回国出力，则当以此次机工为正式开始之表现……足以代表八百万华侨出力之任务，不特尽其个人之天职也”[56]。机工都从红灯码头登轮，千余送别人群欢呼声响彻云霄，朋友临别壮语相勉，妻子珍重道别，父母叮咛为国杀敌，场面悲壮[57]。船终于开了，机工们就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壮志，踏上征途，为争取世界和平而献出生命和青春。

南侨总会在机工出发前订立以下10条“回国机工公约”[58]：

为争取民族自由而牺牲个人自由

加强抗战建国的信念，并努力为国家民族服务

为表现尽忠报国的精神，须将过去一切恶习勇敢革除

遵守团体纪律，即遵守国家的纪律

服从上峰的命令及诚恳接受领导的指挥与劝戒

有意见须向负责人报告，不得随便乱发嘈苏

上峰所委派之责任，应忠实担负

生活集体化、做事系统化、值勤纪律化

对同志亲爱、和平、互助、对公众尊重公意、严守秩序、注意卫生

按期寄家信，并经常安慰家属之怀念

南侨机工分九批由1939年3月至8月中陆续抵达云南首府昆明。这批热血青年，沿途受到热烈欢迎。到处可以看到如“欢迎爱国侨胞回国参加抗战”的布条。抵达昆明后即刻被送到潘家湾的西南运输公司的训练所受军事训练，为期数日至三个月不等。军训包括军事常识、政治常识、驾驶与修车技术及步兵操练。短期军训完毕后，机工被分发到广东、广西、四川及云南各省的公路服务，但大部分在滇缅公路当驾驶兵和修车技工。

第一批机工受训一个月后被编成华侨义勇大队，奉派到越南海防去接新车。长官、西南联大代表们来送行。他们就在鼓励、祝福及赞颂声中，坐着10辆卡车，高喊口号，浩浩荡荡地出发，开始他们以路为乡，以车为家的运输生活。他们就以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日以继夜地在各战线，尤其在曲折崎岖的滇缅公路上，翻山越岭，赶运军火。机工们还唱自编的“运输救国歌”：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运输能救国，安全第一条
车辆的性命，同样的重要
好好的保养，好好驾
快把运输任务达到
再把新的中国来建造，来建造！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生活要简朴，人格要高超
不许赌钱，不许嫖
快把烟酒齐戒掉
听啊！
哪怕到处敌机火炮
宁愿死，不屈挠
努力保家，忍苦要耐劳，要耐劳！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唤醒着同胞，团结着华侨
不怕山高，不怕路遥
收复失地，赶走强盗
把民族敌人快打倒，快打倒！

[56]《南洋华侨筹赈会招募机工支援抗日史实》，页7。
[57] 同上注。
[58]《南洋华侨筹赈会招募机工支援抗日史实》，页9。

滇缅公路从昆明到缅甸腊戍，全程1200公里，途经10多个城镇，途中高山峻岭，迂回重叠。路经点苍山一带尤为惊险，最高峰海拔9000公尺，车达山颠，云雾迷蒙，右边是悬崖峭壁，左边是深谷大川。如果稍微不留神，机工随时便有滚落山下与水中，套句机工的话，那就“初一跌下去，十五未到底”[59]，可以想象机工工作环境之惊险。他们日以继夜赶运军火（炸药、子弹、枪炮、配件）、汽油及医药从缅甸边界到中国西南大后方，往返需时两星期。虽然沿途城镇有宿舍，但大部分机工们选择睡在车厢里，只为了照顾车上的军火及防范零件被偷。

老机工白清泉（战后退役回新从商，创著名的大华食品公司）回忆道：“有时在高山抛锚，吃干粮，在山边找木材，拨点汽油，烧水解渴。有时过三，五天都不一定……有时日机突袭，机工马上把车停下来，人靠山边躲起来，用泥土把反射的车灯和玻璃加以涂擦，再用树叶掩盖车身”[60]。云南雨季常造成山崩，车坏桥断，交通中断，机工只得露宿荒野，机工戏称为做“山大王”。

每个南侨机工背后都有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但是最轰动的是来自槟城的李月美的传奇故事。李月美又名李月眉，祖籍广东台山，1918年出生在槟城一个富裕家庭。1939年，响应南侨总会号召，背着父母，舍弃舒适生活，女扮男装参加南侨机工队伍回国服务，被分配到贵州红十字会当司机。1940年，她不幸在滇缅公路执行任务时翻车受伤，为缅甸海南籍机工杨维铨奋勇相救，送往医院急救，并细心照料，这时才发现“他”原来是“她”。消息传出后轰动全中国和新马，李月美被誉为“当代花木兰”。何香凝为表彰她的爱国精神，送她一面“巾帼英雄”的红稠锦旗。不久李月美和杨维铨坠入爱河，缔结连理，成为滇缅公路奇缘。自后，李月美脱去军服成为白衣天使，照顾南侨机工[61]。

自1939年至1942年缅甸失守的四年间，机工可以说是生活在枪林弹雨中，每当前线吃紧，抢运任务，全由机工包办。1940年6月中，日本入侵越南，英国在日本的淫威下下令于7月18日关闭滇缅公路，为期三个月。留在缅甸边境的机工紧急撤离。机工张智源回忆当时的紧张状态：“（1940年）7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通知：7月18日下午六时封闭滇缅

南侨机工复员留影（白毅柏提供）

[59] 楚琨、戈丁，《华侨机工在滇缅路》，载《南洋商报晚版》，1939年9月28日。

[60] 作者与白清泉口述历史访谈（新加坡口述历史馆，1980年）。

[61] 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页111—124。

线，华侨运输先锋队留腊戍人员车辆必须在封闭前全部离境。从接到通知时起，我们留腊戍全体机工，废寝忘食，争分夺秒，抢运车辆，到18日下午力时前全部车辆离开腊戍”[62]。10月18日滇缅公路重开后，日机时常来轰炸滇缅公路最重要的两道桥，即介于芒市与保山之间的惠通桥及介于保山和永平之间的功果桥，企图切断昆明至腊戍的唯一通道。云南领空防卫薄弱，日机如入无人之境，机工抢运途中常要逃避日机的袭击，非常危险。1941年7月日军从越南进攻广西，机工奉命连夜抢运镇南关的物资军火，抢运途中，遇日机低飞扫射，机工伤亡惨重[63]。不少机工不幸在运输工作中发生意外身亡，或在枪林弹雨中执行抢运任务壮烈牺牲。此外，也有一些机工和当地傣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姑娘结婚。

机工分秒必争地为中国抢运了不知多少宝贵的战略物资，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贡献大，也作了重大的牺牲。二战结束后，约有一千多名机工复员返回东南亚[64]。中国侨务委员会颁发奖状给每个机工，赞扬他们“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短短28个字，交融着几许机工的血和泪！

抗日救亡决心坚持到最后

1940年3月，陈嘉庚觉得抗战已逾两年，南侨总会逐月汇捐款救济中国难民，也派遣机工回国服务，但“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海外华侨于义实有未尽，故发起组织回国慰劳视察团”[65]。陈嘉庚和慰劳团员到滇缅公路慰问机工，目睹路政管理不佳，机工工作与生活条件也不理想，乃促有关当局加以改善。慰劳团也到重庆和延安，会见了蒋委员长和毛泽东。在陪都重庆他看到灯红酒绿的战时生活和国府的官僚作风，而在延安他对中共领导层的朴实和社会平等印象深刻，认为中共是中国明日之救星。陈嘉庚的观感和言论导致他和国府及海外国民党人战后分道扬镳。眼前为了抗日，国府还需要陈嘉庚领导海外抗日救亡运动，因此暂时压下党人和在地外交人员对他的不满。

1940年3月29日，南侨总会在大世界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陈嘉庚预感部分国民党人及驻新领事馆人员反对他连任，故在会前先表态无意连任。国民党中委会组织部长朱家骅随即来电慰勉。但是开会期间还是发生陈嘉庚和国府驻新总领事高凌百，在大会上针锋相对，甚至互相作人身攻击的不愉快事件。后经庄西言发言慰留，并获得其他代表赞同，大会顺利选陈嘉庚续任主席[66]，继续领导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几乎同个时候（新加坡时间是8日凌晨）日本空袭新加坡，投弹市区，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进入战争状态，10日，日军在马来亚东岸吉兰丹首府哥打峇汝登陆。中英美于是结盟，对抗日本。国府通知英国愿协助动员新侨民与英军协力抗日，遂有12月28日总督汤姆斯（Shenton Thomas）在总督府召集华社各界领袖包括陈嘉庚的会议。陈嘉庚临危授命受总督邀请组织星洲华侨抗敌后援会（亦称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该会于12月30日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怡和轩俱乐部隔邻的晋江会馆，以便坐镇在怡和轩的陈嘉庚协调南侨总会、新华筹赈会及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该会总务为叶玉堆；负责替政府招募工人的劳工服务部主任由林谋盛担任；保卫部主任是郑古悦，招募人员负责各街道的巡逻治安工作；宣传部由胡愈之负责；民众武装部是马共党员林江石，负责组织华侨义勇军。设立民众武装部由在场刚出狱的马共党员耶鲁[67]临时提议，陈嘉庚极力反对，认为民众军训不足，无法胜任，军事防卫应由英军负责，但在众多的马共党员及热血青年的坚持下，陈嘉庚

[62] 张智源，〈滇缅公路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纪实〉，载《华侨历史学会通讯》（北京），1985年3月，页21。

[63] 刘牡丹，〈沉痛的回忆〉，载《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第12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1959年），页11。

[64]《陈嘉庚与南侨机工》，页299；邱新民，《艰难的行程》（新加坡：文学书屋，1985年）。

[65]《南侨回忆录》，页94。

[66]《南侨回忆录》页309—321；邱新民，《昭南时代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90年），页7—10；子冈，〈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纪略〉，载《大战与南侨》（吉隆坡：隆雪中华大会堂，2007年）（翻印），页53—54。

[67] 耶鲁二战后改名黄望青，从商致富，历任中华总商会董事，1973年6月至1980年8月担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勉强同意[68]。至此新加坡华人在新加坡失守前的最后一个半月，不但身负中国抗日救亡重任，还得协助殖民地政府维持地方治安、清洁及民防的工作[69]。

1942年1月，三千余名华侨义勇军编成七连，还没来得及完成基本军训，日军已兵临城下，匆匆领了英军发下来的土枪，上前线迎战由空军掩护从柔佛海峡偷渡过来的日军。义勇军也在岛的西部如裕廊（Jurong）及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和入侵的日军交战。华侨义勇军死伤惨重，纷纷退至设在南侨师范学校的总部，英军随即下令加以解散[70]。

由于战争已蔓延到新马，英军在马来亚节节败退，日军于1942年1月30日开始进攻孤岛新加坡。南侨总会在同年1月起完全停止筹款，并赶紧在失守前由中国银行将最后一笔新币160万元（国币1300余元）的款额汇交国府行政院[71]。

1942年2月14日，新加坡失守前夕，新加坡华人在极度恐慌中度过史上最煎熬及最长的除夕夜。翌日（15日），大年初一，原该是欢天喜地迎新年的日子，人们却显得忐忑不安、惊惶失措地迎来朝夕对抗的敌人进城，新加坡华人就这样进入新加坡史上的昭南岛黑暗时代。

[68]《南侨回忆录》，页337—338。

[69] 同上注。

[70]〈星华义勇军总部报告抗敌经过〉，载《大战与南侨》，页60。

[71]《南侨回忆录》，页338。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月5日

《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开始采用简体字

第十四章

昭南岛的沧桑

Japanese Occupation

昭南岛的沧桑

——华侨“排斥论”与“利用论”交织下的军政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占据与统治马来亚（包括新加坡）长达三年八个月，并留下难以磨灭的苦涩回忆。本章着重于分析日本占领军在新加坡（当时被更名为“昭南岛”）所推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政策，并进而探讨其冲击与影响。

Abstrac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including Singapor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s a tragic interlude in Malayan history. This chapter analyses the impac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policie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Government on occupied Singapore.

蔡史君 (Chua Ser Koon)

英军向日本投降，结束了英国在新加坡长达123年的殖民地统治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马来亚的哥打峇鲁（Kota Bahru）登陆，打响了日本发动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枪（比日军偷袭美国夏威夷提早70分钟）。

攻打东南亚是日本对中国侵略战线的延长。在发动侵略中国战争时，日本曾宣称只需费时三个月就能征服中国，但事与愿违。由于在中国遭到顽强抵抗，战局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沼，日本转而将战线推向东南亚，希望在打开僵局的同时，使东南亚成为供应战略资源的大后方，以此实现其全面占领中国，并称霸亚洲的野心。

登陆哥打峇鲁后，日军长驱南下占领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1942年2月15日，英军司令白思华中将（Arthur Ernest Percival）向日军投降，英国在新加坡长达123年的殖民地统治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三年八个月”的军政统治[1]。

日本占领东南亚的三大军政方针

占领马来亚后，日军即以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Yamashita Tomoyuki）的名义推行其马来亚军政。首先，将马来亚改称“马来”，将马来亚分为10州，废除了英殖民地时代的马来亚行政划分。1942年2月22日，日军开始委任军政要员。3月4日，日本在马来亚设立军政最高指挥机关——马来军政部（同年8月1日改称“军政监部”，简称军政当局），总部迁至新加坡前海峡殖民地政府大厦，正式开始实施军政。与此同时，将前海峡殖民地之一的新加坡改称为“昭南岛”。并基于其在政治、经济，以及作为军事要塞的重要性而立之为“特别市”，作为日本军政南方占领地的中枢。3月7日（于3月12日宣布）委任各州知事，另一海峡殖民地槟榔屿则改称“彼南岛”，也委任知事管理。“昭南特别市”则委任市长统治，首任市长为大达茂雄（Otate Shigeo）。

军政实施原则方面，则根据东南亚作为兵站基地的定位而制定了三大方针，即（一）恢复治安；（二）迅速获取重要国防资源；（三）占领军的“现地自活”[2]。其中的“急速取得重要国防资源”是占领东南亚的主要目标，其他方针则旨在确保该目标的顺利推行。不仅如此，上述方针中还明确指示：“在战争进行期间，为了取得国防资源和实现军队当地自活，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容忍其对民生所造成的沉重压力，宣抚工作亦不得违反上述目的”[3]。这就明确规定了日本对东南亚统治政策的本质，即日本以战养战的总体战略必须高于东南亚民众的经济与民生需求，对施加于民生上的“沉重压力”所将招致的任何不满或反抗，都将不惜采取镇压手段。换言之，占领军的任务旨在维持一个确保战略物资供应的、高压型的统治机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将华侨政策视为其占领政策中的首要重点。换言之，在占领马来亚期间，如何有效控制与利用华侨始终是日本军政的重点之所在。

日本制定华侨政策的背景与过程

日本之视华侨政策为其占领政策重点，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简言之，其远因在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商人在东南亚进行贸易、经商过程中与华侨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与摩擦。近因则在于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东南亚华侨对中国的精神与物资上的支援。基于此，日本官民都认为有必要对华侨社会进行周密的调查与研究，从而探讨对策，并围绕着是对华侨经济实力和贩卖网善加利用，还是采取强硬排

[1] 若以阴历计算，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期间共为三年八个月零七天。在华人社会中，“三年八个月”一词已经成为新加坡沦陷期苦难岁月的代名词与符号。

[2] 联络会议拟定，〈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昭和16年11月25日。

[3]〈南方作戦ニ伴フ占領地統治要綱〉，大本営陸軍部，昭和16年11月25日。

相关人物

胡清才

历史事件

8 月 23 日

星系报社董事主席胡清才在南美洲旅途中病逝

斥政策，亦即针对“利用论”与“排斥论”进行争论[4]。此外，还研究以华制华的手法，即利用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教育中所培养的、绝对忠诚于日本的台湾人充当对付华侨的利器。主要利用台湾人与东南亚华侨语言相通的优势，渗透到华侨社会进行严密监视，乃至潜移默化地改变华侨的抗日思想[5]，甚至在日本占领时期充当日军奸细，监视与密告华侨的“不稳”言行。

在战前、战时的华侨政策中，“利用论”与“排斥论”虽然相互抗拮、论争不断，但却殊途同归，亦即以日本“国益”为其前提。

随着南侵步伐的加速，此前对华侨社会的研究成果就从书面转化为实践。日本清楚认识到，在东南亚，尤其是马来亚，只有充分利用华侨才能顺利推行其军政三大方针。对于此，日本决策文件中即提出：必须在占领地各军政领域全面利用华侨。在经济方面即：

- 利用华侨的经济实力和经验，协助供应军用物资与确保物资的流通，尤其是占领初期的粮食措施方面，以此减轻日本的压力；
- 利用华侨在资力上的全面优势，协助日军维持治安与商店的秩序；
- 长远目标是利用华侨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

在具体措施上则指示：占领后对华侨所采取的不再是“诱引”政策，而是强硬的措施，即：

- 令华侨“自行”决定其对日本态度。真心宣誓合作者之生计可不被剥夺，反之则不得生存。
- 在“一次性”命令华侨筹措巨款前绝不劝说其作捐献，以免“严重妨碍”未来的“华侨政策”。但对于自愿性的献金则不加拒绝；
- 经济活动方面，在当前仍须依靠华侨协助日军征购军需物资，以及推动日用品流通之际，可在日军统一命令下暂时给予其活动空间，并视其所得利润为将来之有利财源，对之保留课税的权力。

至于作战结束后的第二期军政措施，文件则指示须具体执行筹措军费与统治资金，即召集新加坡、槟城与吉隆坡等主要城市有影响力的华侨代表，命令全体华侨筹措最低五千万元的资金；责令华侨宣誓全面“协力”，减轻日本在经营南方上的负担，以实现日本贯彻南方政策。召集各商会与其他有影响力的团体代表与具影响力的华侨，令其誓约全面协助日军经营南方所需的有关产业、贸易、经济、财政、文化等工作。责令全体华侨必须自行决定动向。不参与者将受到最严厉的处分，亦即没收财产、驱逐全家并禁止其再入境；反抗者则被处以极刑。至于誓约全面协助日本者，不但其原有的生业权益不受剥夺，还将完全保障彼等之繁荣。并公开告示，以期贯彻[6]。

上述各文件显示了日军于占领前夕即已策划了华侨政策的具体措施。首先，自哥打峇鲁长驱南下过程中，日军就已对华人华侨采取了强硬的镇压行动，并在占领全马来亚后达到顶峰。这就是令华人华侨社会不寒而栗的“华侨检证大屠杀”（亦称“华侨大检证”，简称“大检证”），以及强制华侨“俯首赎罪”的“五千万元奉纳金”。

---

[4] 关于战前日本对东南亚华侨社会与对策研究，见蔡史君，〈战前日本“华侨研究”的背景与特征〉；庄国土等编《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详细内容参见蔡史君，〈日本南侵与‘台湾本岛人利用论’—台湾总督府华侨政策“具体方案”的史料发掘〉，载《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期1（总第105期）（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2001年3月）。

[6] 第25军军政部，〈华侨工作实施要领〉（军政资料19），载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著，《資料集　南方の軍政》（朝雲新聞社），1990年、页287-289。文件未具日期。据篠崎护战后所述，该文件是以第25军军政部长渡边渡大佐名义，于1942年4月19日发予马来亚及苏门答腊各州长官（见篠崎护《シンガポール占领秘录》（日本：原書房，1976年），页68。但从其中指示令华侨筹措“奉纳金”一项，可推知草拟时间应在占领新加坡前后。

军政初期“恢复治安”的重点

“华侨检证大屠杀”与“奉纳金”

“大检证”是日军接管全马来亚后针对华人华侨的“下马威”。1942年2月21日到23日，日军命令18岁至50岁的华人华侨集中于七个地点。在进行简单盘问后将被拘留者运至海边，或偏僻的郊区加以杀害。战后战犯调查队称有17、18处地点被用作屠场，多在东南地区。

“大检证”是一项未加审讯、漫无目标的杀戮新加坡平民的行为。根据战后审判庭上以及经历者各方的证言可知，日军在各集中地点是单凭三言两语的盘问，或以目视来判断对方生死去留。例如在不同地区分别拘留的包括海港工人、身体强壮者或纹身者、知识分子、有钱人、公务员、银行职员，乃至医生或受英文教育者；而分辨方法是令各人按顺序走过检查站，由日军通过翻译员提问一两个问题，例如职业、姓名等，同时也观察被问者的神情与装束，以决定拘留或释放。尤有甚者，有些地区仅命令众人排成两行后，由日军决定释放哪一行的人；或者在最后一天感到疲劳时，某地区释放了最后一批人，另一地区则全体拘留。总而言之，是仅凭个人好恶，滥杀无辜，草菅人命[7]。

当时日军最高负责人，如军参谋辻政信（Masanobu Tsuji）和朝枝繁春（Shigeharu Asaeda）都亲自到各地区巡视与督促，责令执行的日军不得磨蹭松懈，辻政信甚至扬言其目标是“新加坡人口的一半”[8]。由此可见日军强硬态度的一斑。

“大检证”的屠杀人数迄今仍受到争议。日方的供证及回忆录都声称只杀了5000人左右或以下。但当时《朝日新闻》的通讯稿报道共“检举了7万零699人”，战后新加坡华侨社会估计约为5万人。根据战后裁判法庭上的证言，可知“大检证”中能够侥幸逃命的人并不多。因此死难者应在5万人以上[9]。

“华侨大检证”与“南京大屠杀”、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并列，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军政的三大污点。

此屠杀行动之被称为“检证”，是源于日军对被放行者发予印上“检”字的小方纸，纸张用罄后则将“检”字肆意盖在被放行者的衣物上，或身体的任何部位而得名。但是，在日文著作中，此屠杀行为被称作“肃清”，英文著作中则用中文读音称之为“Sook Ching”。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肃清”，是指“严厉取缔不良分子和反对者，以整顿社会和政党”（日文辞典《广辞苑》）；或“削平寇乱”（《辞源》、《辞海》）。用之以称谓侵略日军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的行径，实在是谬以千里，截然迥异。由此观之，站在受害者立场，“肃清”和“Sook Ching”都不宜采用，而应坚持使用“华侨大检证”或“华侨检证大屠杀”（简称“大检证”）。

“大检证”结束后，日军又根据前述预设方案，强迫马来亚华侨“亲口”提出“自愿捐出”财产，呈献5000万元“奉纳金”。在军政当局步步威逼下，不少人为了缴纳被摊派的金额而贱卖货物、不动产和贵重物品。经过多方筹措，“马来亚华侨总协会”仍仅筹得2800万元，不足款项须向横滨正金银行借贷，条件是附加年利并于一年内还清。

更值得关注的是呈献“奉纳金”时的“献词”。各州代表所起草的献词屡遭日军当局驳回，往返修改八次后才获得批准。献词内容包括：对抗日行为表示“忏悔”，感谢日军“不杀之恩”；并表明呈献“奉纳金”是为了报答日军“特赦”与不没收华侨全部财产的“浩恩”；又自责华人社会充当“恶虐无道”英美的“傀儡”，做出“妨害大日本帝国之举动”；并誓言“对大日本尽忠之道无他，当用一良民之心情，对大日本帝国协力”。也就是说“马来亚华侨总协会”愿意领导华侨社会，誓约赤诚效忠于“大日本帝国”，以报答日本的“宏大无量怜情”与“抚民之真情”[10]。

---

[7] 有关“大检证”的详细内容，见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收录的下列文章：洪锦棠，〈敌寇入境后之新加坡〉，页430–432；吴璜，〈星洲各区受检经过〉，页433–434；郭正修，〈日寇入境检证之记录〉，页434–435；葛馥生，〈检证之回忆〉，页435；郑光宇，〈虎口余生谈〉，页436–438。记述大检证过后日军在郊外各区检证的文章有：〈武吉知马大屠杀〉，页432–433；谢长潮，〈后港六条石之检证〉，页463；郭祖实，〈新加坡沦陷时受检记〉，页438–439；黄二甲，〈裕廊路沦陷时期〉，页439。

[8] 大西觉，《秘录昭南岛华侨肃清事件》（金刚出版，1977年），页75。

[9] 有关检证人数的争论，见蔡史君，〈日军检证大屠杀人数之商榷〉，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868–871；蔡史君，〈日本軍政のインパックと教訓シンガポールからの視点〉，载倉沢愛子編，《東南アジア史の中の日本占領》（日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1年），页485–486。

[10]〈日本南进之军政组织与统治对策〉，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289–290。

相对于上述“忠诚誓约”，日军当局的华侨政策却未有所改变。1942年4月晋升为军政部长的渡边渡（Wataru Watanabe）就曾对视察新加坡的日本新闻界人士表明：对华侨仍将不会采取“缓靖政策”，在当前无法忽视华侨经济力量之际，所采取的是抑制兼利用的“乳牛”政策[11]。

该政策充分体现于“三年八个月”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施策上。在具体施策中可归纳为三点，即：（一）排斥；（二）利用兼排斥；（三）最终取代，即在利用华侨的同时致力控制华侨经济实力，以期最终取而代之。

在此施策方针下，严密监视并竭泽而渔地利用华侨的手法，就是命令华侨成立一个为日本效劳的傀儡团体——华侨协会。

“华侨协会”的创立及其本质

占领马来亚后，日军强迫华侨组织成立“马来亚华侨总协会”，新加坡分会则命名“昭南岛华侨协会”（以下简称“华侨协会”）。“华侨协会”主要仿效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为“大日本帝国”效劳的傀儡组织——“治安维持会”，但以其臭名昭著故弃而炮制新名称。

“华侨协会”由日本宣抚官篠崎护（Mamoru Shinozaki）劝诱林文庆出面牵头创会，并担任首任会长[12]。至于“华侨协会”的会员，则除了部分甘心俯首作日军的马前走卒者，也有被迫加入的侨领。其中包括原已逃避印尼，但在“华侨协会”之“邀请”下，被连哄带骗送回新加坡束手就擒，最后在囹圄中被迫以出任“华侨协会”理事为条件，以换取生命、自由的部分华侨领袖。此外，也有部分将“华侨协会”当成避难所的人士。

“华侨协会”的性质可见于其章程中。“昭南岛华侨协会”章程第二条写道：“本会以秉承大日本帝国政府领导全体华侨服从一切施政为宗旨”。也就是说，“华侨协会”的政治任务在于领导华侨、华人向日本宣誓全面效忠，对日军的占领政策绝对服从与“效力”。在下列军政措施中都可见到“华侨协会”协助推行军政的身影。

“华侨协会”所执行的工作包罗万象。

首先在社会与经济方面，主要协助日军顺利推行其统治政策。例如占领初期协助日军恢复社会秩序工作，包括协助募集劳工、登记失业者、设立难民所等；占领期间则协助召募勤劳奉仕队与警察等。在日用品缺乏时协助生产替代品、响应贮金运动、协助推动粮食增产运动、响应开垦荒地、种植杂粮；并协助大规模农村移植工作，赴兴楼建立所谓“新昭南模范村”等等。当然，“华侨协会”所受命执行的各项政策，其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协助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迫使民众接受日本国益优先政策所强加的压力与牺牲。

政治方面，则充当日本的宣扬工具，扮演支持汪伪“南京政府”，反对抗日战争、在东南亚起“表率作用”的角色。例如：1942年2月22日“华侨协会”甫告成立，即由会长林文庆与汪精卫互通款曲，表示愿献身与日军合作，并恳请汪政权指点对日本占领者效劳的“心得”，以及“华侨协会”在“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呼吁中国放弃抗日等，都为日本瓦解中国和东南亚抗日力量的政策效其犬马之劳。

第二，协助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在许多特定的纪念日，如庆祝日本天皇生日的

[11] 黑田秀俊，《军政》（日本：学風書院，昭和27年），页185。

[12] 篠崎护是战前在新加坡的日本情报员，并与新加坡侨生社会有着密切联系。日军侵略马来亚前夕被英殖民地政府以间谍罪判刑收监。日军占领后被释放出狱，劝说林文庆成立“华侨协会”。之后在出任厚生科长期间，篠崎护在引导“华侨协会协助与执行日本军政方面更扮演着重要角色。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1 月 22 日

罗敏申百货公司发生大火，九人受困在电梯内焗死

11 月 26 日

双枪大盗林万霖伏诛

“天长节”（4月29日）、“大东亚圣战周年纪念日”（12月8日—庆祝日本偷袭珍珠港）、“新生马来周年纪念日”（2月15日—庆祝日本占领马来亚）等，“华侨协会”都积极协助筹备和参与盛典，并在报章上刊登献词，号召民众牢记日本和天皇的仁政、恩德，呼吁华侨忠诚效劳，辅助日本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

日方对“华侨协会”上述种种贡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1944年3月，日本同盟社在表扬“华侨协会”众多贡献的撰稿中即称：“今日之昭南岛华侨协会，在与马来各地协会之联络下，一致忠诚与当局协力，以求完遂战事，此则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也”[13]。军政当局也通过用协会理事的名字命名新街道、颁发奖章、勋章等形式，对“华侨协会”在“模范农村”建设中的“诚恳工作”予以嘉奖和鼓励[14]。篠崎护则多方激励“华侨协会”诸理事，必须在建设“兴楼模范农村”中发挥其积极性；还曾建议“为鼓励起见，应将以经济扶助新昭南发展之华侨人士列成一表，上呈东条首相等议”[15]；并对华侨的“亲善合作”寄予高度期待，认为其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不独为全马来华人之率先垂范，抑亦为全世界华人之楷模”[16]。换句话说，是期望新加坡华侨成为对抗中国抗日战争的旗手。

由此可见，“华侨协会”的性质与“贡献”并非如一手策划和推行马来亚版“维持会”的篠崎护所标榜的一般，是出于保护华侨，或为华侨社会谋福利而创立。相反的，“华侨协会”是始终在为日本军政当局效犬马之劳，并出色地履行了“大日本帝国”所赋予的傀儡团体的职责。

军政三大方针的具体施策

维持治安的施策

对民众的严密监视是日军维持治安的重点。军政当局设立警察部，开办军政部警察训练所，对新旧警察施以日本式教育与训练，培养效忠于日本帝国的中坚干部[17]。又开办兴亚训练所，挑选各族青年进行严格的日语及军事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并设立各级法院，如审讯一般民事与刑事案件的“昭南地方法院”与“昭南检察局”，以及“昭南高等法院”与“昭南民事地方法院”。在严密监视与告密无所不在的白色恐怖笼罩下，冤假错案也为数不少。

监视制度方面，首先是颁发“安居证”以掌握民众的详细情报，藉以加强监视与控制；并建立“自卫团”或“协警”（保甲制度）协助监视居民，协助宪兵队侦察与追缉一切涉嫌反日的活动与人员；此外又成立特别警察队，专门收集情报以及进行防谍、侦察与扑灭抗日军活动。

但军政当局也认识到，严密监视无法收一劳永逸之效。唯有彻底改造民众的思想，才能根除“反日情绪”，确保各民族的“真心合作”，日本的占领也才能长治久安。因此，占领后军政当局立即着手推行其文化宣传政策。

日本侵略时期的宣传海报

[13]《昭南日报》，昭和19年3月28日。
[14]《昭南日报》，昭和19年5月25日。
[15]《昭南日报》，昭和19年4月19日。
[16]《昭南日报》，昭和19年1月8日。

文化与宣传政策

为了及时并准确地传达军政当局政令，并有效推动宣传与指导舆论，日军于占领后立即动用战前原有设备，启动宣传工作。其中尤以报纸的出版为其重点。在“一个民族一份报纸”的政策下，在新加坡出版的有中文报《昭南日报》，英文报*The Syonan Times*（后改称*Shonan Simbun*），还有马来文报*Utusan Malai*，以及以印度人为对象的、分别以淡米尔文、马拉亚南文以及兴都斯坦文出版的*Azad Hindustan*等。

昭南日報

昭南日报

陸鷲新春初出擊

曉雲未明

聖扶西南北機場爆碎！

科學之神風

十機屠敵十艦船

必勝決意一新

我機襲炸爾皇

終局之勝利確信

美軍反攻潰擊碎

《昭南日报》（1945年1月4日）

各语文报纸在宣扬“大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包括诱导居民“正确”认识日本“大东亚战争”与“建设新马来”的意义，以及对“亚洲盟主”日本所应持有的从属关系。尤其着重于强制市民放弃其原有的文化、习惯与思维，转而“积极理解”，并模仿日本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其中被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鼓励”市民学习日语，接受日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例如*The Syonan Times*于创刊次日（1942年2月22日，亦即日军占领全马来亚六天后），即开始连载“日语入门”，并于25日开始，在日语单词中注上闽粤方言以助记忆。创刊一周后（2月28日），*The Syonan Times*提出“Lingua Franca of Malaya”（马来亚的公用语）必须是日语”的论调[18]；继之以文章、漫画、照片等形式扩大宣传效果[19]，并撰文阐述日语学习之重要性等，都是军政当局积极普及日语工作的措施。

开办各语言媒介的小学是对儿童灌输思想教育的重要一环。在课程中逐步增加日语的比重，并通过举行各种日常和特殊节庆日的纪念仪式，以及发动学生参加节庆日活动等，其终极目的都在于加强灌输日本文化与思想。其他普及日语的措施还包括开办日语学校和日语补习班；以半强迫半鼓励的方式促使市民，尤其是日本机构的本地职员学习日语；并适时举办“日语普及周”，广泛宣传学习日语的重要性等。

此外，还大量传播歌颂日本侵略的歌曲，例如〈跃进亚细亚〉、〈爱国行进曲〉（战争期间，该歌曲在日本国内被广泛奏唱，并被视为日本之准国歌）；宣传日军赫赫战功的影片，诸如〈马来战记〉、〈夏威夷马来大海战〉；以及宣扬“中日亲善”的〈支那之夜〉（李香兰主演）等，企图通过潜移默化作用将日本的侵略合理化，使民众接受日本式的意识形态与统治。

改弦易帜也是重要法门。比如更改时间，把时钟拨快以与东京时间一致；禁止使用公元和民国历法，改用日本天皇“昭和”年号及

[17]《战时月报》、昭和17年5月号。

[18] *The Syonan Times*, 28.2.Showa 17。

[19] *Ibid.*, 14.4, 2.5, 15.5, 16.5, 22.5, 25.5.Showa 17。

“皇纪”（将日本立国时期上溯至神话时代，以1940年为皇纪2600年）；再如更改地名，新加坡改称“昭南岛”、马来亚改称“马来”。又强制民众尊重日本国旗和国歌，即必须尊奉“日之丸”为神圣的象征，每逢节日必须张挂；集会时则须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并向日本皇宫方向致最敬礼。另外，必须向哨兵敬礼，理由是他们代表日本天皇执行任务；在日本机构工作的本地人必须对日本职员行礼等。上述强制民众接受“尊（日本）卑（被占领者）关系”的措施，都由军政部警务局监督及强制执行，对违反者轻则殴打、重则投狱。

在软硬兼施政策下，文化政策的作用在于令民众感怀日本“解放恩情”，而其终极目标则在于“唤起”民众自觉自愿为日本效劳的“意志”。具体而言，就是歌颂为日本“牺牲”与“效劳”的“坚韧耐劳”的精神，而体现于“三年八个月”期间的，就是驱使民众充当日本掠夺资源政策下的劳工、勤劳奉仕队等低廉劳役、乃至臭名昭著的“死亡铁路”劳工等等。

由此可见，文化宣传政策是军政的润滑剂与推手。之所以用怀柔外衣加以包装，只因其更具欺骗性，并能更有效践行日本国益的目的而已。

“以战养战”政策下的经济措施

在三大军政目标指导下，日军在马来半岛加速恢复资源的开发。包括没收英国殖民地政府与英籍商人的土地与园丘、低价收购华侨工厂，或接收华侨经营的园丘与矿山，并由军政当局委任日资公司担任收买与开采事宜。

为确保资源的顺利开采，军政当局强制登记劳工与“苦力头”。截至1942年5月上旬为止所登记的技工为7000余人，劳工则达到14万余人。登记后的劳工立即被分配到马来半岛各州工作[20]。

日资商社的任务还包括控制林产、海运、交通与银行，以及控制主要粮食的进口。为确保占领军的粮食与日常用品的供给，军政部设立了统筹机关——“会社”与“组合”以控制粮食与日用品（包括盐、糖、柴、炭、纺织品等）的流通。

• “会社”、“组合”与黑市的横行

组织“会社”与“组合”所宣称的目的是平衡物资需求、压制恶性竞争并控制物价。在形式上，“会社”与“组合”是根据军政当局所规定的价格，将物资配给中介商，并随时向军政部报告消费量。但实际任务却是将低价收购的物资优先供应军政当局，有剩余才配给于市民。

这种配给方式极不利于市民经济。因为（一）物资优先供应日军造成了民众配给量的不足，尤其是日本制海权日益丧失的1943年中期以后，入口物资的逐日减少造成新加坡粮食与日常用品严重匮乏；（二）由于根据公定价格供应军政当局物资的无利可图，“组合”用提高市场物品价格的手法弥补损失。这些高价物品大多在黑市交易，造成了某种行业的“组合”一朝成立，该有关物品就在市场上消失的结果。军政当局也将之视为对“组合”的补偿而不多加干涉。另一方面，入口物资都只交由“组合”处理的结果是，有部分商人因贩卖价格受压制无利可图，而转向参与黑市活动。这些商人主要通过贿赂“组合”负责人以获得物资，并将之流入黑市。至于生产者也因收购价格过低而冒险留下部分产品卖到黑市。

在战局日趋不利，日本丧失制海权后，粮食与日用品欠缺的情况日趋严重。物资的供不应求也激活了黑市交易，同时加速推动了通货膨胀率。例如：与日本占领前的1941年11月的物价相比，1943年2月的物价指数即涨了200至1000倍不等。其结果是：日军与其行政机关确保了粮食与物质供应无忧，而一般市民却陷入物质匮乏的困境。

另一方面，在占领马来亚期间，日军通过大量印发军票以搜刮战略及民间物资。其准确数目虽无法得知，但估计在70亿到80亿之间。最初发行的军票还印有号码，1942年中开始就只印上罗马字母，1943年以后，部分军票已不见字母。1944年12月开始流通百元面值的军票，日军投降前甚至已印了千元面值军票。据说当时各军队也自设流动印刷部，并只报告所用纸张的重量，足见军票滥发的一斑[21]。

• 粮食增产政策与“白米有害论”

粮食政策方面，鉴于马来亚粮食向来无法自足的现状，军政当局于占领后就通过对粮食的输入、统制与增产

[20]《昭南日报》，昭和17年5月7日。

[21] 有关日本滥发军票之情况，见《新马华人抗日史料》中的下列文章：吴体仁，〈日本压迫下的马华经济〉，页310—311；彭友贞，〈马来亚沦陷期间的经济〉，页311—313；〈日本滥发军票与搜刮物资一斑〉，页313—315；狂生，〈马来亚日币没落记〉，页315—316。

措施，以保障驻扎日军的粮食供应；另一方面则推动民众增产粮食以自给。

随着日本于1943年中制海权的日益丧失，以及运输船舶多被征用，粮食不足再加上物价高涨，粮食增产措施也进入强制阶段。军政当局通过傀儡团体推动居民垦荒种植，包括指令军政机关雇员在工余种植，教师与小学生在校园空地垦殖，以及教师到郊外荒地种植等。由于白米种植周期长，无法满足民众所需，军政当局所强制增产的粮食多为杂粮。与此双管齐下的措施，就是强制居民改变吃白米的习惯。

军政部长渡边渡就曾放言，在粮食配给上必须采取“强硬手段”，不可陷入“姑息之同情”，须坚持“对于不食米而不能生活者，即使其饿死亦无不可”的态度[22]。军政监部部员也教训居民，白米是造成南方民族缺乏精力的、低营养并有害健康的粮食。不改变食白米的“错误”习惯，则无论从经济、营养、精神角度而言，都是“愚不可及”的“自杀”行为[23]。

伴随上述“白米有害论”的，是逐步削减米粮配给量的措施。1942年初每人每月配给白米20斤，11月中旬减为17斤。1943年2月减至米14斤，外加3斤硕莪粉及薯粉，亦即用杂粮逐渐取代米粮。至1943年9月，男子每人配给米谷14斤、杂粮8斤，女子则各为9斤与6斤；1945年初又锐减至7斤以下。由于白米配给量屡次削减，民众只得用木薯等杂粮弥补不足，脚气病患者因此日增。但军政当局仍坚持是市民食米太多，导致维他命B缺乏所致[24]。自1944年初开始，军政当局还积极推动栽培收成期短的木薯。并令日本人督促其大小佣仆各种植木薯20株，以解决佣人的粮食，并号召民众以木薯为主食。

战争中及后期，军政当局更采取了“重点配给”方式。由于战局吃紧，需要更多生产军事战略性作业的劳工，军政当局即推出了强制转业政策。亦即强制大量从事商业与服务业等、所谓“不急不要”行业的市民转业成为“军需劳工、国防资源劳工，以及其他紧急情况的劳工”的政策。并在重点配给白米予从事“战略性生产线”劳工的同时，对不愿转业者采取了削减粮食配给量、禁止营业以及政治干涉等手段。

与此同时，军政当局积极策划并推行大规模移植计划。其中以华侨移植者为主的“新昭南模范农村”（亦称“兴楼模范农村”），和以天主教徒为主的马口模范农村（后称为“不二乡”）的规模最大。其他则为以马来人及印度人为主的小规模移植区——民冬岛。

上述种种容忍军政压迫民生的措施，也迫使民众为了生存而为日本制造军需物资，间接地支撑了日本的侵略战争和军事统治。在“以战养战”的境况下，大东亚“共荣圈”事实上变成了“共贫圈”。而在上述各项军政措施中，都可见到“华侨协会”的踪影。

日据期间的敌后反抗

在占领地军政中，日本将马来亚视为仅次于菲律宾的“治安不良”地区。一名日本军政人员将之归咎于“华侨检证大屠杀”的失策。他总结道：“这个使日本以残暴闻名于世的新加坡华侨大屠杀，究竟是否给作战地区带来了（日）军所预期的安宁呢？不、不然。当我到此地上任时，人人都称赞马来的治安良好。夸称它的平静是（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所无法

[22]《昭南日报》，昭和17年6月20日。

[23] 军政部部员安田庄司谈话，载《昭南日报》，昭和17年8月5日。

[24]《昭南日报》，昭和18年1月1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6 月 15 日

新加坡华文报的报业假期从每年 13 天减为五天

比拟的。可是，这个镇压华侨的行动却提供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反日与抗日的借口……我在初就任时所听到的有关马来治安良好的现象，也就只出现在战斗后的二、三个月之间而已”[25]。

换言之，“大检证”式的高压政策是反侵略抗日斗争的催化剂。

马来半岛的敌后反抗

敌后抗日武装活动主要分布于马来半岛。在日军登陆哥打峇鲁，英军节节败退时，马来半岛各地已开始出现抵抗组织和武装。而集聚于新加坡参加“华侨抗敌后援总会”，并接受英国短期军训的“星华义勇军”，则于参加新加坡保卫战后不久奉命解散。其中部分成员潜伏于新加坡，另一部分则分散到马来半岛各地，成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中四个独立队的骨干。

抗日军在装备落后、军事训练不充分，以及物资短缺、疫病丛生的艰苦条件下，对拥有现代化精锐装备的日军展开了游击战争。由于遭到秘密叛变的马共总书记莱特（Lai Teck）与日军共谋的无数破坏计划，抗日军组织与中高级干部蒙受了严重损失[26]。但抗日军仍开展了伏击日军、袭击警署、破坏铁路与通讯网，以及锄奸等武装斗争；并通过出版地下刊物、抗日歌集、在抗战纪念日张贴与秘密分发传单等，积极教育民众、团结其他民族、扩大民众同情与支持范围。与此同时，抗日军也努力争取部分“华侨协会”州分会会长、部分警察（包括马来警察）、探员、自警团成员等的合作，以期达到加强抗日力度，扩大抗日活动的影响力。

1943年中，联军与抗日军合作，由抗日军负责保护联军潜入情报部队（136部队）、提供情报与配合联军反攻；联军则提供武器弹药、军事训练与药品等。

新加坡的敌后反抗

在新加坡的敌后反抗主要是地下活动的展开。马来亚陷落后不久，抗日军即开展了宣传与秘密募捐等活动[27]。但地下组织也同样因莱特的秘密叛变，以及伙同日军共谋无数破坏计划而遭到致命性的打击，马来亚共产党中高级干部牺牲不少[28]。但秘密活动与地下刊物印刷处仍此伏彼起，被视为无法掉以轻心的“不死鸟”[29]。其他还有部分潜伏当地的中国国民党与星华义勇军人员，也在不同条件下进行活动。

军政当局从未停止它对华侨社会的监视，并大量利用台湾人为线人，混入华侨社会中探取情报与进行思想调查工作。特别秘密警察则专门对不合作或“有嫌疑”者进行恐吓、逮捕与处刑，致力于削弱抗日力量。但仍然无法阻止有正义感民众的秘密捐助、支持与掩护抗日军，或救济与协助英军俘虏逃狱，乃至暗中协助英军突击行动等活动[30]。

总而言之，军政当局对新马两地抗日活动的镇压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其中包括利用内奸等进行袭击、逮捕的残酷镇压行动；截断粮食供应、设置“净化地区”以阻断民众的支援等政策，但却无法彻底扑灭抗日军。其原因可归纳为几点。首先是长期以来反侵略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其次是对日本军政下民不聊生与残暴镇压的不满与反抗。此外，显示日本必将失败的战争局势等，都是民众参加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抗日活动的推动力。

“三年八个月”的影响：“反面教材”与“当家做主”

在“三年八个月”期间，新加坡华侨遭到空前的浩劫。除了“大检证”与“奉纳金”的大规模镇压与勒索，日常的严密监视、暴力、逮捕、冤狱、严刑拷打，乃至残

---

[25] 大谷敬二郎，《宪兵——自传的回想》（新人物往来社，1973年），页189。大谷于3月6日，即“大检证”结束后不久任马来军政部警务部长。

[26] 例如1944年9月莱特所参与策划的，在雪兰莪黑风洞召开的会议，提供了日军大规模袭击机会，导致马共与游击队干部的惨重损失。

[27] 陈育民，〈入狱前后〉，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468。

[28] 例如至4月为止，日军根据莱特的情报，袭击和杀害在新加坡的马共市委与中委；8月由莱特建议召开新加坡马共地下组织会议，使日军特警队得以一举逮捕马共中、高级干部。莱特还多次提供情报，协助日军捣毁在新加坡的地下印刷所，并逮捕众多负责人员等，阻碍了马共地下组织的重组，使新加坡的抗日活动严重受挫。详见大西觉，《秘录昭南岛华侨肃清事件》（日本：金刚出版，1977年），页152–163。大西觉时任特别警察队长，负责扑灭新马各地抗日活动，并充分利用莱特等叛变者提供情报，乃至协助策划打击抗日活动。

[29] 大西觉，《秘录昭南岛华侨肃清事件》，页163。

[30] 刘戈青致庄惠泉函，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910。

酷杀戮等，都使民众惶惶不可终日。强制劳役（勤劳奉仕队、修筑死亡铁路）等破坏了民众生活与社会秩序；而军政当局之物资掠夺政策，也严重破坏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商业活动因物资缺乏而日趋停滞，许多民众卷入黑市和投机活动也扰乱了市场，并加速了经济的崩溃。至于一般民众的饥饿与营养失调等生活窘境则更不在话下。据统计，该期间人口中有三年出现了死超，其中1944年与1945年的死超都在1万人以上[31]。

“三年八个月”是新加坡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它给予新加坡人的惨重经验教训是：在日军侵占新马时未负起坚决迎战、保护民众的责任，而是弃甲后退、肩扛白旗投降的外来统治者——英国是无法信任的。至于标榜“驱逐白人、解放东亚”的日本，其奴役与剥削亚洲人的残酷程度则比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新加坡人认识到，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是摆脱外来势力控制的唯一道路。对于占新加坡人口绝大比率的华侨而言，日本军政所给予的另一个启示是：华侨必须改变并放弃战前不参与当地政治的移民思想，而应该落地生根，与其他民族并肩奋斗，自己当家做主，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才不会重蹈那黑暗的“三年八个月”的覆辙。

战后新加坡华侨之积极争取公民权，尤其是年轻一代积极参与独立运动，并在新加坡建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都不能不说是受到日本侵略惨痛经验教训的刺激。从这角度看来，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并非如战后某些政治家和学者所说的，是其“驱逐白人、解放亚洲民族”的口号与标榜唤醒了东南亚民众的民族主义。相反的，“三年八个月”是警示东南亚民众必须反抗一切外来侵略者，并立志当家做主的“反面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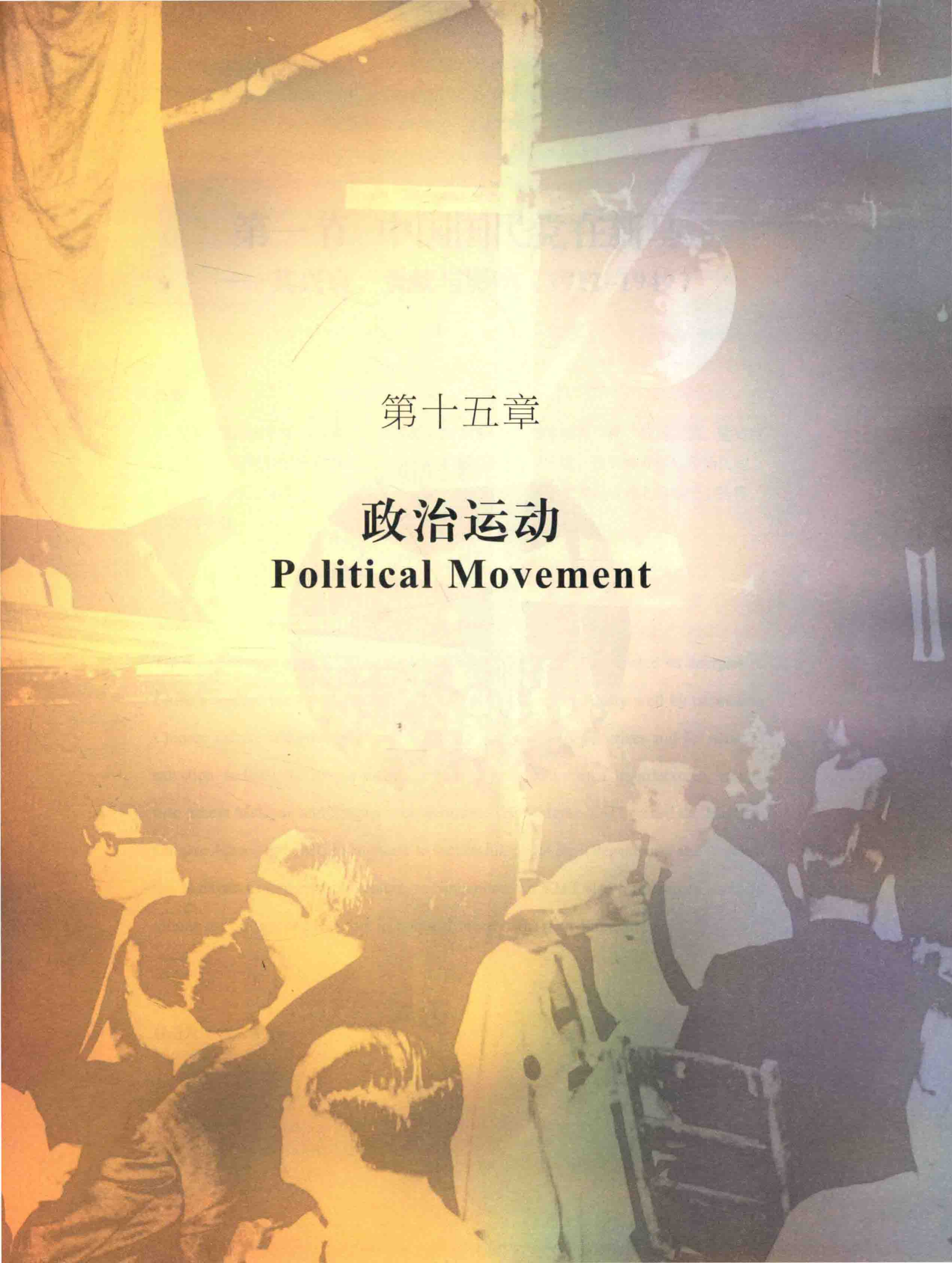
[31] 战前的每年人口自然增加率为2.2%。1944年死亡人数超过1万1029人，1945年为1万889人。见许云樵，〈昭南时代的人口〉，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488-489。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8 月 29 日

《报章与印刷馆法案》在国会通过，成为政府管制报章的主要手段



第十五章

政治运动
Political Movement

HUI KUAN
LUB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在新马
——其兴衰、贡献与影响（1912–1949）

摘要

新马国民党运动（1912-1949），为国事尽忠凡四十年。该党服务华社、推动文教，建树良多，然其政治思想却分裂华社。1949年，英官方再度严禁斯党，促其接受新马政治认同。该党遂群起投入马华公会，争取独立，阻止马共得逞。新加坡国民党亦向马华公会转移，但政绩平庸。

Abstract

The Pan-Malayan Kuomintang (KMT) movement (1912-1949) devoted its energies to China's welfare for 40 years. The Party served the Chinese society well by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by raising funds for societal crises and for national salvation. In 1949,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banned it for a third time, in order to encourage, it to accept Malayan and Singaporean identities. The Malayan KMT joined the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en masse to successfully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nd to defeat the Malayan Communist movement. In Singapore, the KMT also transformed itself by joining the Singapore MCA, but its political success was more limited.

杨进发（C. F. Yong）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新马华族政治史上的里程碑。它催生了两地的国民党运动，塑造了陈嘉庚无党无派领导层的模式与延续了两代华侨中国认同、忠诚内向的传统。

辛亥革命是该运动的外来影响，其内在的历史因素是来自新马华族民族主义的萌芽、演变与冲击的结果。从1877年晚清在新加坡设领事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先由文化运动开始，而后伸展到经济与政治的领域。新马华族民族主义的内涵，包括文化认同、经济挂钩与政治和政治思想的建立和冲突。

新马华族文化民族主义的创始人非晚清驻新首任专业外交官左秉隆莫属。左秉隆在任期间（1881-1890），倡义塾、设辩论会与建会贤社以奖励华侨子弟创作文艺。此外，他还鼓励华社上层推动乐善社讲演运动（The Lo Shun She Lecture Movement）。此运动主要是宣传康熙皇帝的16条圣谕，诸如儒家思想中的孝顺、礼仪、守法与和睦等等[1]。1889年，新华社上层展开孔教复兴运动（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创建现代学校、庆贺孔子诞辰、捐资设立孔庙以为祭拜之用，再度加强了儒家文化的价值[2]。以上种种，复加上晚清鬻官卖爵的政策，进一步巩固了华社上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为清朝培养了一批文化与政治的支持者。

晚清政府鼓励华侨回国投资企业，诸如铁路、矿产与银行等，加速了新马华族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清廷屡派外交官或使节团出国吸收华资，其最得力者为张弼士。他曾是南洋大资本家与驻星总领事（1895-1900），1898年以粤汉铁路总裁身份，出国推销建铁路之股票。1905年，复以南洋商务大臣官位，号召华侨投资中国企业。晚清官方的努力，鼓励了华社上层与中国经济挂钩，争取了他们对清廷的拥护。这股拥清力量，其大本营为1906年在新建立的中华商务总会。

1890年代，晚清内忧外患，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神州陆沉。新马华族有识之士，人心思变，因而政治民族主义油然而生。康有为君主立宪的维新思想与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张，开始角逐于华社政坛以争取华社的同情。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维新派领袖，光绪皇帝宠臣，名气很大。他的维新思想，有不少是进步的，诸如废除八股取士与建新式学堂等等，很受华社欢迎，尤其是华社上层。1900年，康有为抵达新加坡，其支持者已展开维新运动。他们拥有华字报为宣传喉舌，且成立保皇会（Emperor Protection Association）新加坡分会，其领导人物为富商邱菽园、林文庆医生与叶季允等。他们还利用其外围组织好学会以传播百日维新与儒家思想。由于保皇会是秘密结社，不能公开活动，故其支持者转移阵地，利用1906年成立的中华商务总会来对抗同盟会（Tung Meng Hui）的革命势力。

同德书报社是中国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同时也举办跟华人社会有关的活动

[1] 颜清湟，《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页101-102。

[2] 《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页105-106。

1906年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成立，推动其倒清的革命主张。同盟会成立时，只有12位创始人，选出了三位土生华商张永福、陈楚楠与林义顺为领袖。为实现革命事业，他们首先广召会员。在辛亥革命前夕，会员已增加到400余名[3]。其成员中，不少是华社精英、侨领或帮领，诸如陈武烈、林文庆与陈嘉庚等等。其次，他们扩大书报社外围组织。从1903年成立的星洲书报社（Sin Chew Reading Club）增加到六间书报社（中华、公益、开明、大同与同德）。第三，他们策划与筹款帮助孙中山举行两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如广东的黄花岗（1907年5月）与广西镇南关（1907年12月）的起义[4]。新加坡同盟会还安置此两次起义失败的逃难者，人数达500余人。此外，新加坡同盟会领导人与孙中山曾到吉隆坡与槟城成立分会，也鼓励了不少华社领袖加盟。迨1907年，同盟会已成为泛马运动，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11年辛亥革命消息传来，新加坡同盟会分子倾巢而出，奔走相告，挥手相庆。他们以无比的豪情与信心，欢迎新共和国的诞生；在爆竹声里，剪辫队前、焚旗（龙旗）焰中，泪雨纵横地葬送了大清皇朝。据《海峡时报》记者采访土生华社领袖宋旺相的报导，宋旺相估计约有1万华人在新加坡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这个数目字约代表新华人口的5%，马来亚华人庆祝人数不详[5]。

辛亥革命与新马国民党运动（1912–1925）

辛亥年武昌起义后，福建与广东两省宣布独立，需款正殷以维持两省治安，闽粤两帮的同盟会领导人反应迅速。闽人于该年11月13日组织福建保安捐（Hokkien Protection Fund），为时九个月，募得义款凡12万9000元，其主席为陈嘉庚，粤帮的同盟会领袖，诸如张永福与林义顺出面领导广东保安捐（Kwangtung Protection Fund），筹得义捐约20万3000元，成绩更佳。陈嘉庚当选为福建保安捐主席，一说是同盟会副会长陈楚楠让贤[6]。陈楚楠的雅量与胸襟，使陈嘉庚能够发挥其领导才华，更奠下了陈嘉庚于1920与1930年代领导新马华社的救亡运动的基础。

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洪流中，新加坡同盟会雄心勃勃，深谋远虑，对外支援孙中山未竟之建国大计，对内企图夺取华社的政治与社会的领导权。为此，新华国民党与中华商务总会势力发生严重的冲突与争执，促成了新华第一次政治与社会的大分裂。

这次大分裂始于1907年-1910年期间保皇会人的《南洋总汇新报》（1908-1914）与同盟会的《中兴日报》（1907-1910）的笔战，关系到国体、政治目标与手段问题。保皇会人主张君主立宪，改革维新与反对暴力推翻大清朝。同盟会人却宣传民主共和的利益，并强调革命的重要性与彻底性。连年的思想斗争加深了两阵营的成见与仇恨。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双晏驾，总商会令华侨商店与学校停市与停课一日以表哀忱。同盟会人的商店有多间照常营业，引起保皇会人破坏其业务。这个近乎武斗的例子，种下了同盟会人日后另创新商会的历史因素之一。1912年1月1日，同盟会部长张永福，以总商会会员名义召集会员大会，讨论华校庆祝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事。总商会人不赞同张永福妄派传单召集此会，认为此举为非法行事。总商会座办林竹斋讽刺张永福，谓

[3]《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革命源流与革命运动第十一册》（台北，1963年），页520。

[4] 陈楚楠，〈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东南亚研究学报》卷1期1（1966年），页53。

[5] *The Straits Times*, 23.10.1911;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Malaya Press, 1967), p.471.

[6] 不息庐主，《陈楚楠先生传略》，载《星洲日报》，1971年10月1日。

相关人物

黄循文

历史事件

2月6日

实施限制区执照计划，以解决繁忙时间市区交通过于拥挤问题

4月

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被控贪污80多万元，被判坐监四年半，后经上诉减刑至18个月

总商会不能随时升旗以庆祝共和成立，盖满清政府尚未倒台[7]。此次会议未能得到总商会会员的同情而解散。同盟会人证实商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政治与经济需求，遂有另起炉灶之大计。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设想在短期间实现。1912年2月，同盟会人起草章程，命名为南洋华侨总商会（Chinese Merchants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3月22日英官方准其注册，4月初北京政府承认其商会地位。此组织较中华商务总会迟六年出现，时人称为新商会，而后者为旧商会。

1913年5月，新商会500名会员，选出第一届60名理事。正总理沈子琴（Sim Chee Kim）为潮人土产商，副主席留鸿石（Lew Hong Sek）为闽侨银行界人物，财政邱国瓦（Khoo Kuo Wah）乃潮人米商。其他50余位委员来自各帮中下层商界人士，不如旧商会会员之富裕。如1912年6月两商为北京政府经济危机而筹款，新商会只募得5万2000元，旧商会筹获29万元，证明旧商会在财富上占尽优势。

从新商会成立至1913年2月，两商会基本上和平共处。在此期间，北京与国民党要曾多次鼓励两商会谈判合并。旧商会会员多（2000名）、经济强、有英官方支持，故毫不让步，不允许新商会夺取其社会领导权[8]。

1913年3月以后，新商会参与反袁运动，故为北京政府于该年10月撤销其立案。此外，英官方亦增加压力，新商会终于于1914年8月自动解散。新商会两年余之沧桑史，留下了鲜少历史遗产，令国民党人有“出师未捷”的遗憾。

新加坡国民党北京交通部（Singapore Communication Lodge of the Kuomintang of Peking）于1912年12月出现，以取代新加坡同盟会支部。该年12月23日，叻英官方也准其注册为一合法之政党。此国民党，乃新马政治史上第一个公开组织的政治团体。其支分部相继在新马两地成立，故国民党是一个泛马性的组织。

新加坡国民党成立后，第一项工作为招收会员。入盟者须缴交入会费3元，年捐2元。1913年7月会员人数增至2000余人，选出第一届理事123名。此庞大的党组织包括名誉会长（3人）、正副部长（3人）、评议员（47人）、基金部（4人）、总务部（12人）、外务部（12人）、政务部（12人）与会计部（12人）等等。党领导人众多，领导结构的繁杂是其第一个特征；其二，其最高领导层，泰半为土生海峡华人所把持。部长林文庆，才华横溢、胆识过人，曾经是复孔运动的推动者、保皇会领导人、孙中山挚友、英官方信任的立法议会成员、众望所归的理想领导人物。副部长陈武烈，为陈金钟孙儿、叻埠米商、天福宫领袖、闽帮风云人物。另一副部长林义顺，经营树胶黄梨业，华社名人。名誉部长陈齐贤与张永福，都是树胶种植界成功人物，张永福为叻同盟会会长多年。两位评议长陈楚楠与殷雪村（西医）也都是华社红人；第三个特征是叻国民党领导人以商界最多，文教界亦有代表；第四，国民党人虽来自各帮，但闽籍人最多；第五，此123人中，有五位为女性，标志早年华社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1913年的国民党选举，是新华政治史上一大盛事。

1913年与1914年，新加坡国民党主要是反袁世凯政权，因而与旧商会的外围组织共和党的亲袁政策往往针锋相对。1913年7月，部长林文庆抵柔佛麻坡（Muar）宣传三民主义，并助该地华人组织国民党分部。此外，党人亦于该年创建英华女校（Anglo-Chinese Girls' School），推动女子教育。1913年11月，袁世凯解散北京国民党总部，1914年7月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以取代国民党。英政权也多施压力，最终迫使新加坡国民党组织自动解散。1914年新加坡国民党的解散，显然是一大挫折。然而，其短暂的存在，也唤醒了一代华侨关心中国政治命运，从而创下了忠诚内向的政治传统。

早年新华国民党运动，有两个重要的外围组织应该受到分析：南洋学务总会（Nanyang Chinese Education Association）与书报社。前者成立于1912年8月，其领导层来自文教界与商界。其目标是发动小学师资训练、建立华文中学、普及国语的应用与编辑适合南洋华文小学教科书等。此组织支援新加坡第一间华文中学——华侨中学（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的创办。此总会对新马华文教育的发展，也有不容忽视的贡献。1925年当英官方严禁国民党组织时，此组织被迫解散。

新华国民党运动，特别注重书报社的发展。辛亥革命以后，新加坡华社各帮都有新的或改组的书报社出现。1912

[7] 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页88。

[8] 杨进发，《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页30-32。

年，客籍人创建志同书报社，团结梅州与大埔等地的客家移民。可惜此书报社不久为英官方取缔而停办。1912年6月，琼籍人建立同文书报社，社员竟达到500人。1912年，此书报社曾派数十名同志返琼，进攻海上省城，不幸失败，殉难者十余人[9]。1913年，粤籍人士复开办平民阅书报社，会员泰半来自理发行与打金业。同年，福州人也设立爱群书报社，关心党事与国事[10]。其他辛亥革命前的星洲书报社与同德书报社，继续发展，而同德书报社是国民党运动的重要遗产，今日还存在于新加坡。

1914年至1919年的中华革命党时期，新马国民党运动走向低潮，其原因主要有四点：首先中华革命党秘密结社，为一非法团体。这种新困境，不利土生华人参与领导层行列；其次，中华革命党指定入盟者须重新注册，且须缴交10元的入会费。不少党员只能望门兴叹；第三，马来亚党运动闹分裂。有些党员加入新党，也有不少国民党支分部继续活动，两党的同时存在，犹如劲敌；此外，尚有一批1913年反袁失败来马的政治难民在搞派系活动。他们攻击孙中山解散国民党的失策，也反对孙中山只偏重反袁而忽略斥责日本侵华的野心。这时期的新马党员，士气消沉，无建树可言。

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国内的政治意识与民族士气大大地提高，除反对日本侵占青岛，也向军阀专制挑战。同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基地，一方面重组国民党以取代中华革命党，另一方面办黄埔军校，预备北伐，统一中国，新马党人为国内政治发展而振奋。1923年7月，广州国民党总部制定条规，整理海外党组织，并建立南洋总支部（Nanyang General Branch of the KMT of China）于新加坡，由党员选举九人委员会以执行党务[11]。此南洋总支部向广州海外总支部负责，管辖海外各地各分部。据广州国民党总部资料，南洋总支部管辖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等地，于1925年属下有14支部、71分部与80区分部，共有党员4367人[12]。这仅有的4000余人，在政治挣扎中保存了一些元气。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政治革命性的演变，震撼了英殖民地官员，是加速他们政治控制的主要原因。英官方恼怒华社文教界的政治化，诸如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华社为抗议日本占领青岛而排日货，与华校杯葛1919年欧洲休战的庆祝典礼等等。英官方的反应迅速，在新马两地通过1920年的学校注册法令（Registration of Schools Ordinance），以注册的方式来控制教师与董事的政治活动。英政府或未意料到，此注册法令却引起了华社更激烈与持久的抗议行动。1922年，英殖民地政府认识到事态的严重而作出了两项重要的决策。其一是在新加坡设立情报局（Political Intelligence Bureau），多方搜集有关华社的政治情报，然后发表在《马来亚政治情报月刊》（Malayan Bulletin of Political Intelligence）上。新加坡的军事总部（Military Headquarter）也组织其情报机关，并编辑《马来亚军事部情报录》（Malayan Command Intelligence Notes）。此两个情报局，主要搜集左翼运动的资料。新马两地的华民政务司署（Department of Chinese Affairs），则专门搜集、整理与编辑国民党的情报。华民政务司每三个月向上司与英殖民部（Colonial Office）作一次长篇的汇报，让官方对国民党运动有延续性的了解。

英官方的第二个反应，是主张严禁国民党运动。1922年10月，海峡殖民地总督基理玛（L.

[9]《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革命源流与革命运动第十一册》。

[10]《陈嘉庚研究文集》，页71。

[11]《中国国民党在海外》（台北，1961年），第一册，页159。

[12]《中国国民党在海外》，页161。

相关人物

李光耀　毛泽东　华国锋

历史事件

5 月 10 日

总理李光耀应邀访问中国两周，并会见毛泽东主席和华国锋

N. Guillemard）向殖民部陈述严禁国民党的理由。首先，总督形容孙中山左倾，与国际共产党有挂钩，这威胁英国远东的经济利益。其次，孙中山支持国共合作，控制中国劳工，也企图控制20万新马的华工。左倾与反英的孙中山会影响新马国民党支分部干预殖民地的教育、经济与政治。再者，如不取缔国民党，其支分部将控制新马华社。英殖民地政府决不容忍国民党建立所谓“主权内的主权”（imperium in imperio）[13]。英殖民部从容不迫，等待时机以决策。1925年，上海工人在英租界游行为警察射杀多人，闹成“五卅惨案”。随后，国共合作推动长达16个月的港省大罢工，损害英国远东经济利益。英国殖民部与外交部以此运动为把柄，遂决议主张严禁新马国民党。该年7月1日，英内阁批准此严禁决策。10月，海峡殖民地行政长官向英伦殖民部证实，新马两地的国民党支分部已全盘解散。实际上，两地的国民党组织只是暂时停止活动，也等待良机卷土重来。

命途多舛的国民党运动（1926–1941）

1925年8月英官方的禁令虽获得了短期的效果，但它并不影响国民党的外围组织，诸如书报社、夜学、俱乐部与党报等的活动。

1926年，外来的因素给国民党运动带来一线生机。首先，该年6月，中国国民党开始北伐，新加坡国民党人筹得3600元。1927年6月，新加坡国民党汇回7000元给北伐军。其次，从中国来的国民党左翼在新马非常活跃，英当局称这批左翼分子为“主流派”（The Main School）。此“主流派”人物在新加坡利用国民党名义创办夜学作为党分部。据英官方情报，“主流派”在1927年的新加坡，已占据了21个国民党分部的16个[14]，其他五个分部由“温和派”商人与社团领袖所控制。再者，1926与1927两年间，广东共产主义青年团（Kwangtung Communist Youth League）与中共广东区委（Reg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曾五次派遣党员如黄昌炜（Huang Chang Wei）、潘先甲（Phua Ting Kiap）等人到新马组织南洋共青团支分部（Nanyang Communist Youth League）、南洋各业总工会（Nanyang General Labour Union）、南洋共产党区委（上司为广东共产党区委）、南洋共产党部委（上司为中国共产党）与南洋共产党临委（Provisional Committee of the Nanyang Communist Party）等[15]。以上左翼势力的扩张、挑战与威胁刺激了国民党组织的死灰复燃，拉开了两派政治思想、组织与权力斗争的序幕。新马两地的华民政务司，于1927年初的联合报告中，证实国民党“支分部不仅在大城镇纷纷地涌现，甚至连小村镇也建立了支分部”[16]。

在英政府箝制与左翼力量的挑战中，新加坡国民党人在快乐谷（Happy Valley）举行孙中山逝世第二周年的追悼大会。国民党人曾经非常成功地主持1925年与1926年的追悼会，无限兴奋地获得华民政务司有条件地批准，其条件主要包括（一）不能到城市游行示威；（二）不准挂国旗与；（三）不准演讲。1927年追悼会的领导人包括萧志来（Siaw Chee Lye，闽商，南安会馆主席）、侯西反（Hau Say Huan，南安人，树胶商）、李亮琪（Li Leung Kie，粤人，亚洲保险经理）与李凌溪（Li Lien Chi，粤帮商人）等。

与1926年一样，这一年的追悼会照样未邀请左翼人士参加，这给左翼人士领导的共青团、总工会与夜学运动的主脑人物有机可乘。他们率领其支持者与学生，提早在该日到会场，喧宾夺主地纠缠会议主持人与扰乱大会秩序。事后左翼人士散发反殖与反帝标语，在摇旗呐喊与混杂的鼓声中，向城市进发。当游行者抵达牛车水警局时，警察开枪射杀六人，14人受伤。这便是新加坡政治史上的“牛车水事件”（Kreta Ayer Incident）。英官方对此流血事件采取高压政策，对左翼力量的控制更紧——关闭其夜学，解散其组织与驱逐其领导人。“牛车水事件”也有其历史意义，它是新马华社左右之争公开化的开始。英官方认为

[13] 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12–1925,"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arch, 1981), pp.127–131.

[14] 《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页176–177。

[15] 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pp.67–72.

[16] CO273/537, File 28053, Enclosure to Straits Despatch of 16.02.1927, p.4.

僑民出國登記證
泉僑字第2070號
一 姓名 何榆治 別號
二 性別 女
三 年齡 十九歲 年 月 日 時生
四 籍貫 福建省南安縣 市 來壹區榕橋鄉 村人
出生地 仝上
五 職業技能 商
六 前往何地作何種事業 英屬新加坡地
七 前往地通信住址 英屬新加坡地 街 號
八 國內通信住址 南安榕橋鄉
九 現領出國護照號數 字第 號
十 同行親屬 妻 子 女
十一 乘坐何船出國 金易
十二 輪船開行日期 三月廿七日
十三 其他
免費登記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廿四日 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廈門僑務局給

中国国民政府侨务局颁发的侨民出国登记证（1929年）

左翼力量是殖民地政府的劲敌，但也不信任国民党领导华社的好处。

1927年的国共分裂与新马左右之争，导致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海外部于该年8月在广州召开南洋总支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新马国民党派遣49人代表团出席，讨论改组南洋总支部以及肃清新马共产党的势力。1928年4月，中央以马来亚总支部（British Malaya Head Branch）取代南洋总支部，还设立一个九人委员会以改组党务等问题。此九人委员会包括张永福、郑螺生（Tay Lay Seng，吡叻闽商）、李振殿（Lee Chin Tian，叻闽商）、郑少炳（Tay Sau Peng，巴生琼籍商人）、邓子实（Tang Tsz Sat，怡保客商）、萧振堂（Siu Chan Tong，芙蓉潮商）、沈鸿柏（Sim Hung Peck，马六甲闽商）、何如群（Ho Ju Khoon，槟城客商）与姚定尘（Lu Teng Chan）。姚定尘出生于怡保的一位客家人的家庭，年纪仅26岁，南京政治大学毕业，是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属下组织部的一名成员，可说是党组织能手。他于1928年6月抵新加坡，着手成立马来亚总支部、新马各分支部，重新注册党员与负责召开1929年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全马代表大会。在该会上，姚定尘报告新马已成立11个新支部与20个分部。此外，南京政府已批准约8000份党员证书。在全马代表大会功成之后，姚氏重返南京，其后半生历史不详。

1929年1月的全马代表大会，出席者有70余名党员，选出了马来亚总支部的第一届理事，八名执行委员，诸如张永福、郑少炳、姚定尘、崔广秀（Tshui Kwong Siu，槟城粤商）、邓子实、萧振堂与罗美东（Lo Mei Tung，麻坡商人）与五名监察委员，包括黄吉宸（Huang Chi Chen，柔佛新山粤商）、陈占梅（Chan Chan Mooi，吉隆坡粤商）、朱慈祥（Chu Chee Chiong，叻潮人，知识分子）、沈鸿柏与符和谦（Foo Ho Chien，叻琼人）。以上13位领导人物，泰半为商界精英，仅姚定尘与朱慈祥为知识分子，他们之中大都是忠贞之士，还有多位是德高望重的同盟会元老（张永福、陈占梅、沈鸿柏等）。

1929年马来亚总支部的成立有其历史意义。其一，此总会与新马各地支分部是清党以后才出现的，新马国民党除了宣传三民主义的思想，还以反共思想作为其行动指标；其二，清党后的领导层较有凝聚力与团结性，其编制亦较前为严密。第三，马来亚的国民党运动，其控制权也由南京中央转移到新加坡。

1929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其党员并不算多，但其反共的政治思想比较一致。据英官方的情报，1929年9月国民党党员共有1万290名，其中新加坡只有1270人[17]。

英官方采取骚扰的政策来对付新马改组后的国民党。1929年，新加坡警方与华民政务司署曾多次突击并搜查马来亚总支部与新加坡支分部的活动。他们对付国民党要比南洋临时委

[17] NL 5937, 6. D. 40, No 212/1929, Enclosure No 1 to Straits Despatch, 04.09.1929 on "The Malayan General Branch of the Kuo Min Tang in China," pp.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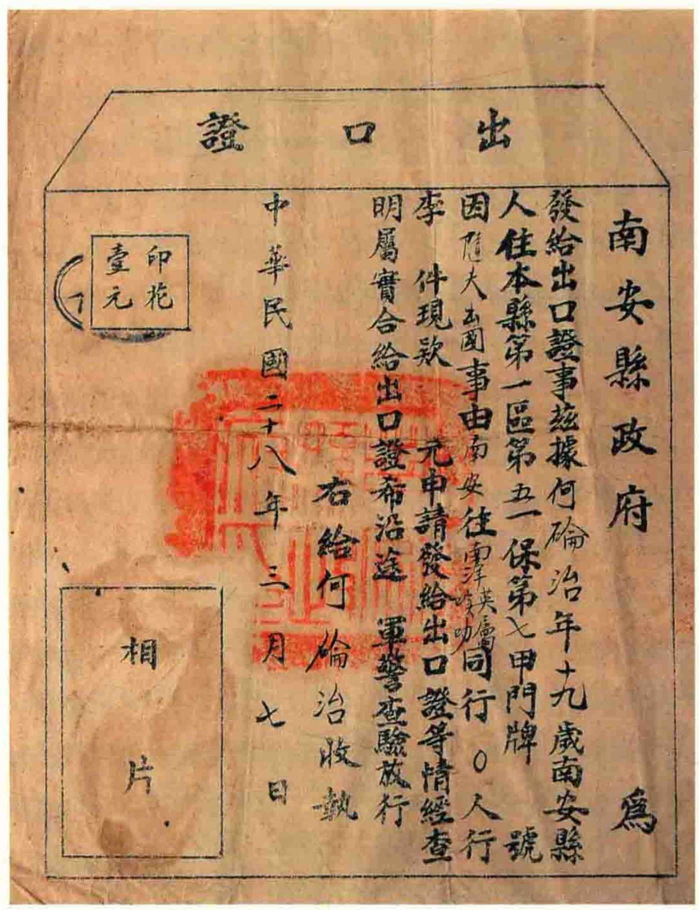
员会的领导层来得温和与礼让，每次的纠缠并未演成大逮捕的灾祸，故马来亚总支部竟胆敢在1930年2月5日召开第二届泛马国民党会员大会。这大会在新加坡举行，选出了1930年度的执监委员会。此委员会共有21名领导人，其中包括9名执行委员与五位后补以及5名监察委员与两名后补。除了大多数是同盟会元老之外，后起之秀也占了7名。换言之，在这21位理事中，三分之一是新血。这7人包括张开川（麻坡代表、企业家，中英语文俱佳，Teo Khai Chuan）、胡少炎（Oh Siow Yam，马六甲代表，五金店主）、方之祯（Png Chi Cheng，叻代表，潮籍报人）、王吉士（叻出生闽人，华校出身，社会活动家，Ong Kiat Soo）、朱慈祥（Chu Chee Cheong，叻粤人，知识分子）、李怡星（Lei Yi Sin，芙蓉代表，年纪仅28岁，精通中英语文与各种方言，华校教师）与谢文进（Chia Boon Chin，槟城代表，著名报人，闽籍）。这批较年青的后起之秀，是新马1930与1940年代国民党运动的接班人。

当马来亚总支部召开会员大会的第一日，新总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走马上任。他不相信他的眼睛，竟看到《民国日报》（*Min Kuo Jit Poh*）对大会议程的记载。他不满国民党不顾禁令，一意孤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对中国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痛恨已非始于该日，盖在他当香港总督期间，就备受国共两党的侮辱。国共两党为“五卅惨案”（1925年）而发动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严重地打击了英国在华南的经济利益。金文泰为对付国民党的违法，遂火速地召集17位马来亚总支部执监委员，于1930年2月20日到总督府进行一次历史性的对话。

2月20日的会议，金督首先发言，指责国民党人破坏地方法律，强调英政府不允许国民党举行会议、从事宣传、募捐与招收会员。他训令国民党支分部全部解散。待解散后，政府乃允许国民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为党员。随后，张永福、郑螺生与方之祯三人发言。张永福认为国民党的组织是要对付马共的，郑螺生指责共党分子煽动工人阶级是极危险的。金督非难郑氏为英籍民，却效忠中国。他更讥讽张永福土生英籍民，对中英两国的双重效忠，简直是“两头蛇”（Leung t'au sha，Double-headed snakes）[18]。

这一次严肃而紧张的会议，反映了英官方严禁国民党的新的原因——新马华人唯一的效忠对象应是大英帝国。

金文泰于1930年2月严禁国民党组织并，未引起中国政府或国民党的强烈反应。该年7月，金文泰以宣传反英的罪名放逐郑螺生与方之祯，这下逐客令激起了南京政府的抗议。不久，马来亚国民党便成为中英两国外交部所要解决的国际问题。英驻华大使蓝逊（Sir Miles Lampson）代表英国外交部与中国外长王正廷谈判多月，遂于1931年4月成功达成协议。这个“王蓝协约”（Wang-Lampson Agreement）不许国民党在新马组织、宣传与募捐，但不反对党员个别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从协约字面上看，这是英国外交的胜利，但英国却没想到中国国民党有权力组织海外党员，在中国国民党的鼓励下，马来亚各州成立党组织。1932年1月金文泰证实吉隆坡的崇文俱乐部（Sung Man Club）是雪兰莪的直属支部（Direct Branch），2月逮捕其领导人，3月放逐郑少炳、林友桐与潘子修（Phoon


出口證

南安縣政府　爲
發給出口證事茲據何碖治年十九歲南安縣人住本縣第一區第五一保第七甲門牌　號
因隨夫出國事由南安往南洋英屬吻叻同行 0 人行李　件現款　元申請發給出口證等情經查明屬實合給出口證希沿途軍警查驗放行
右給何碖治收執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七日

印花壹元

相片

华侨出口证（1939年）

[18] 总督府会议记录，见 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47–52.

Tsz Sau）等六人返国。金文泰的铁腕手段压制了国民党运动正常与公开的发展。国民党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陈嘉庚领导的星华筹赈会（Singapore China Relief Fund，1937-1941）、南侨筹赈总会（South Seas China Relief-Fund Union，1938-1949）与新加坡华侨动员总会（Singapore Chinese Mobilisation Council，1941-1942），作出人力、物力与财力等贡献。

日本统治马来亚期间（1942-1945），华社备受摧残，新加坡国民党元老李振殿与周献瑞等受辱。马六甲国民党领袖林大典（Lim Ta Tian）与麻坡国民党闻人张开川被杀。有一部分国民党人参加英国的一三六部队（136 Force），党员被派往印度受训，受训完毕后再潜入马来亚搜集情报，并与马共游击队联系，林谋盛是国民党人的殉难者之一。国民党人也组织华侨抗日军（Chinese Resistance Army），其总部在吉兰丹，却活跃在吡叻、雪兰莪与彭亨等州，和平后，不少抗日军回中国，解甲归田。

战后国民党运动的发展与认同的转移（1946–1949）

战后国民党运动的迅速发展，从1946年的复兴到1948年的顶峰，有其政治与历史因素。首先，日治期间，新马国共两党为英国抗日盟友，故战后英官方采取较开明的政策，允许两党合法与公开的活动。不过，如果两党有威胁地方治安，英总督与马最高专员还是拥有严禁之权。一个有官方承认的政党，比较容易招收会员。其次，1930年代的国民党是一股政治势力，其外围组织，诸如书报社、俱乐部与三民主义青年团还存在，国民党领导人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也能独当一面作出贡献。过去的组织经验、领导人的组织才华与胆识，在战后政治化的华社，都有用武之地。1946年秋，国共内战爆发，吸引反共人士加入国民党。第三，南京中央海外部，于1946年3月决定在新加坡设立南洋办事处（Overseas Department Office），12月此办事处正式成立。1946年，南京中央曾派三个党务视导团到新马视察党务并慰问党人。1946年1月，陈振亚（Tan Chin Yah）领导一视导团，鼓励党人重组支分部，其本人留在新马，为党务发展而努力。第二个视导团由叶人（Yeh Jen）与余超英（Yee Chao Ying）等领导，于该年5月抵达新马，协助建党工作。该年10月，戴愧生（Type Kwai Sheng）领导慰劳团，指导新马各地党支分部的重组。戴愧生为新加坡南洋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在新加坡晚晴园内。除戴愧生外，尚有七名对党务有专长的职员助其推动党务。此七人有李思辕（Lee Sze Yuen）与陈国礎（Tan Kok Chor）等等。此办事处的全部经费，由南京中央海外部负责。在他们的领导下，新马党务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务蒸蒸日上。1948年3月，当党、团两组织合并时，新马两地国民党党员只有4万5000人，占华族人口的1.75%[19]，其中党员最多者为新加坡（约8000人）、槟城（约4000人）与吡叻（约1万5000人）。

1948年，新加坡国民党支部的领导层共22人，包括15名执行委员与7名监察委员。其成员来自华社各帮，其中约三分之二是商人，三分之一为教员与报人。在商人中，有多位是成功的侨领、饱经风雨而致富的名人。

其中如郑古悦（Tay Koh Yat，福州人），是战后新加坡交通业巨子。林师万（Lim Soo Bah，大埔人），是金银业与当业领袖，商会董事、南洋客属总会副会长等，

[19] 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op.cit.*, p.209.

相关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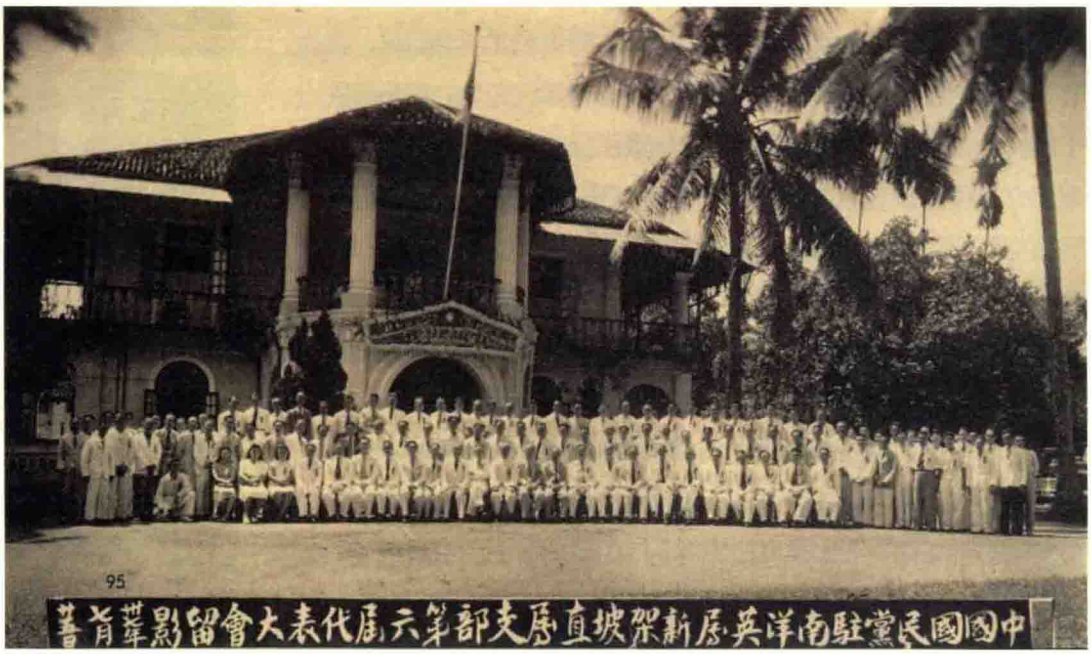
历史事件

9 月

《南洋商报》挂牌交易

10 月

《星洲日报》也挂牌交易，从此两大报由家族企业，变为公共公司



中国国民党驻南洋英属新加坡直属支部第六届代表大会留影（1948年7月25日）

梁后宙（Neo Tiew，闽人），战前是发展林厝港的大功臣，1941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主任，战后为英皇乔治六世颁赐荣誉奖状。报人中如王仲广（Wang Chung Kwang，江苏人），是《南洋商报》主编之一。陈振亚（Tan Ching Yah）是《中兴日报》编辑与陈国礎，是《中兴日报》社长。在七位监察委员中，李振殿与陈楚楠为党务鞠躬尽瘁凡40余年，是同盟会元老、战前国民党领袖。

新马的国民党，是一个有政治与社会影响力的团体。它有组织、有经济基础、反共政治思想与党国的支持。1946年与1948年新加坡商会选举，国民党员中选者有10位，亲国民党的商董也约有10位，其他12名是反国民党的董事。国民党人可说是控制新华商会组织，是华社的领导人物。1948年，新加坡英政府调查国民党的影响力，认为国民党成功地渗透华社的俱乐部与社团组织，约有60%的地缘与血缘组织是受他们的影响或控制[20]。此外，英官方也证实全星159个注册工会，有22个是国民党所组织或控制者，其会员人数总共约1万4000人。不过，马共的左翼工会势力远较前者为强[21]。

战后的国民党人，继续赞助华文教育的发展。他们以董事身份出钱出力，以教师身份影响校内或校外的国民党运动。1940年代吉隆坡尊孔中学（Confucian Middle School）校长郑心融（Teh Sin Yoong）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长。新加坡的教师陈诗豪（Tan Shi Ho）与李义侠（Lee Yee Hsieh）是1948年新加坡国民党支部执行委员；槟城钟灵中学（Chung Ling High School）校长陈充恩是槟城国民党支部执行委员。根据陈氏学生陈青山（Chen Ching Shan）1991年在广州提供的口述历史资料，陈充恩在1930年代便已是一位活跃的校长。1936年，他曾多次劝17岁的陈青山加入国民党，但陈青山却选择马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天地[22]。战后的华校趋向政治化，但国民党人的影响须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确定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根据英官方1948年的调查，新加坡华校有一半是受国民党控制的。它还指出，吉打、吡叻、槟城与柔佛的华校，国民党的影响也很广泛[23]。

新马的国民党，注重党报的政治宣传与舆论制造的功能。为了支持蒋介石政权与反共抗争，他们开办了三份党报，即新加坡之《中兴日报》（Chung Shing Jit Pau）、吉隆坡的《中国报》（The Chinese Press）与槟城的《光华日报》（Kwong Wah Yit Poh）。1948年，《中兴日报》董事

[20] 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op.cit.*, pp.212–213.

[21] *Ibid.*, p.213.

[22] C. F. Yong, *op.cit.*, p.257.

[23] 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op.cit.*, p.212.

为林师万等，社长陈国礎，主笔有林启森（Lin Chi Sen）与陈振亚，每日销售约4500份。《中国报》社长为李孝式（Lee Hau Shik），主笔为宋韵铮（Sung Yuen Chin），每日销售数约5500份。《光华日报》1946年复刊后成为党报，社长为槟城国民党要人许生理（Khoy Seng Li）与王景成（Ong Keng Seng），主笔为庄心在（Chuang Hsin Tsai），日销约6500份。此外，新加坡的《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与《星洲日报》（*Sin Chew Jit Poh*）以及槟城的《星槟日报》（*Sin Pin Jit Pao*），是亲国民党的报章。他们的助阵，增强了反共的政治宣传与力量。反观左翼华报，寥如晨星，唯一可以与国民党报抗衡者只有新加坡之《南侨日报》（*Nan Chiau Jit Pao*）。此报为新加坡中国民主同盟（Chinese Democratic League）与陈嘉庚反蒋的政治力量合作的报章。陈嘉庚为该报董事长，胡愈之（Hu Yu Chih）为社长，编辑有夏衍（Hsia Yen）与洪丝丝等。陈胡两人合作无间，共同推动反蒋拥毛的政治立场。《南侨日报》为左翼读者的精神粮食，每日销售约1万2000份到2万份。以华报的多寡与其读者的数量来说，国民党人的报章占尽优势。

为拥戴蒋政权，新马国民党攻击四股左翼力量，即中共、马共、中国民主同盟新马支分部与陈嘉庚势力。对反中共的宣传，主张剿"匪"，支持镇压暴乱，诋毁其领导层与讽刺其阶级斗争的谬论。

新马国民党与马共起冲突，是在1948年6月"紧急状态"（Malayan Emergency）宣布以后。该年7月，新加坡国民党办事处副主任李思辕公开鼓励国民党员支持政府剿共与参加其警卫队，新加坡的国民党员也应参加政府组织的地方情报部（Civil District Watch Corps）以助政府剿共。同年10月，中国国民党政府赞同李氏的建议，鼓动党领导支援政府剿共行动。马共反应强烈，1948年7月，27名国民党员被谋杀。8月，40名党员为反共而牺牲性命。1951年，马共射杀槟城国民党要人陈充恩，轰动新马的华社。战后的国民党运动有使用暴力的例子、流血的悲剧。

新马中国民主同盟是国民党的劲敌。于1946年成立于新加坡，次年伸展到马来半岛，成为泛马运动，与国民党争天下。新加坡民主同盟之会长为胡愈之，1933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此为中共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新马民盟以华侨上层知识界为主，成员包括中共与马共党员、无党无派民主人士与国民党左派。胡愈之认为民盟"实际上是党（中共）领导下的反美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24]。1946年，民盟基本上支持陈嘉庚的呼吁反对美国援蒋打内战[25]，为国民党与其报章反击。1947年，民盟成立泛马支部，对国民党政权的评击非常激烈。民盟主张武装人民反对国民党，并号召海外华侨参与战斗。他们还建议与中共合作，联手推翻国民党政权[26]。国民党报反击民盟煽动华侨参加革命的罪过。民盟喉舌《南侨日报》与国民党报为国事的唇枪舌战，分裂了新马华社，也延缓了新马民族主义建立的进程。

中国国民党与陈嘉庚的交恶始于1940年南侨筹赈总会组织的慰劳团回国慰劳与考察中国情况。陈嘉庚在中国九个月，发现了中华民族的救星——毛泽东，开始了亲毛反蒋的政治大转移。

战后陈嘉庚的反蒋言论泰半局限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1946年9月7日，陈嘉庚成为国际性的政治人物，以南侨筹赈会名义，代表

[24] 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江苏省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71。

[25] 《我的回忆》，页71-72。

[26]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89。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0 月 11 日

维修中的油槽船"史拜鲁斯号"（Spyros）发生大爆炸，造成至少 60 人丧生，超过 100 人受伤

一千万华侨，通电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与参众两议长，呼吁美国撤退驻华军队，停止支援国民党政府，以解除内战根源。此外，陈氏再劝告美国勿误信武力可以灭公理。这个富有历史性的所谓“电报风波”（Cable Crisis）不但惊骇了国民党政权，而且也震动了冷战中的世界，新马国民党报群起围攻陈嘉庚，吉隆坡的《中国报》称他为“叛国老人”，“强奸侨意”[27]。此外，他们也照样通电美国总统与蒋介石政权，一方面抨击陈嘉庚谬论，另一方面欢迎美国与“反陈”政治分裂的序幕。新马拥陈派大多来自闽帮社团、左翼工会、新马民盟各分部、新民主青年团（New Democratic Youth League）与其他左派团体。反陈派主要来自粤、潮、琼、客等帮与帮组织、各地商会、非闽帮的业缘与血缘组织以及俱乐部等等，这场“拥陈”与“反陈”的斗争，是东南亚华社，尤其是新马华社的一场大搏斗，“拥陈”派虽然胜利，却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尽管中国政府和新马国民党领导层鼓励党员参加政府的剿共行动，他们也未能挽救于1949年5月第3次被解散的命运。战后的英国，计划退出殖民地统治，故有1948年马来联邦宪法的出现。此新宪法肯定巫族的政治特权，土生华人拥有公民权与移民华人须在马居留15年始有投票权。新加坡的宪制进展较缓，但也在1948年开始立法议会的选举。为建立一个独立自治的马来亚，英官方须要培养华人的马来亚观念与意识。为了建立马来亚意识，只有严禁中国政党或政治的存在与发展。

1949年2月，新加坡总督金森（Sir Franklin Gimson）上书殖民部建议禁止国民党活动。他指出国民党为一外来组织，妨碍马来亚意识的成长，而国民党的中国认同是培养华人效忠马来亚的绊脚石。该年5月，殖民部赞同其主张，总督遂在官方的宪报（Gazette）上取消国民党支分部的组织[28]。

中国的国民党决胜败于战场上，新马的同路人定得失于指掌间（总督）。在改朝换代的风浪中，约5万名党员，投入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的怀抱，继续贯彻其反共与建国的大计。在危机四伏的1940与1950年代，英国的政策，顺利地带动了他们从中国认同到新马归宿的大转移。

国民党运动对华社的贡献与影响

新马国民党运动，其领导层推动华校的努力与其创立的许多党报，为华社作出贡献。但在国民党失去合法地位后，它却继续影响华社的政治前途与命运。

辛亥革命以前，华社中上层不是拥康，便是拥清政权。辛亥革命以后，华社的中上层，逐渐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新兴的国民党势力，并未团结华社，但却分裂华社。如1910年代与商会的角逐，1920年代与左翼力量的明争暗斗，1940年代与左翼（陈嘉庚势力、中国民主同盟、马共）的纠纷等等。华社多年来的党争，在1950年代开始消失。

国民党领导层来自华社中上层，包括商界与文教界，但专业人士并不多，这个领导层不需要国家的经济支助，它本身有殷实的财富、诸多的企业。他们原来就是华社精英，故能领导华社的许多重要的团体，如商会、宗乡会馆、职业团体、学校或文化组织等等。试举一例，新加坡战后的国民党红人林师万，是叻金银业公会会长、中正与华侨两中学董事、客属总会副会长、广东会馆副会长、商会董事、崇侨银行副董事主席、《中兴日报》董事、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局员等等。他可说以国民党人和华社领导人的双重身份，出钱出力，为社会服务并作出贡献。

新马国民党领袖，大都如林师万，热心公益、慈善为怀。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爱国思想强。他们有组织能力与领导魄力，更有儒家的事业心。他们为国事，曾经参与反康、反清、反袁、反军阀与反共（中共、马共）的政治斗争，为华社创造了一个国民党领导层的形象与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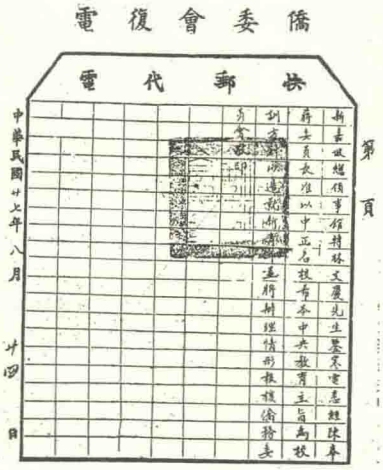
新马国民党与党人，推动华文教育，贡献良多。1913年，陈楚楠与张永福等在新加坡倡办英华女校，陈楚楠为该校第一届总理。1918年，新加坡国民党外围组织的同德书报社，开办夜校，广推通俗教育。1932年，复办英文夜课。此外，同德书报社亦创办南洋女子学校与南华女子学校，它们在1920年代都发展成为新加坡有名的中学[29]。

新加坡另外两间有名中学——中正与华中的创办，都

[27]《南洋商报》，1946年9月19日与1946年9月24日。

[28] 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op.cit.*, pp.219–220.

[29]《星洲日报》，1979年5月7日。



新加坡中正中学原本是用以纪念蒋介石的

得到国民党人的大力资助。华中虽为陈嘉庚领导创办，但它得到国民党人的助力不小。如第一届华中校董55名（1919年）中，最少有13位是同盟会或国民党人，包括陈嘉庚（同盟会）、吴晋陞、陈武烈、陈开国、林义顺、吴胜鹏、王金练、黄肖严、陈延谦、何仲英、陈楚楠、陈梦桃、陈翼扶等。1938年中正中学的成立，主要推动人来自国民党，诸如林文庆、李振殿、林中杏、林金殿、王景成等。用蒋介石的名字为校名，其创办人非国民党人莫属。马来亚的华文教育亦然，如果没有国民党人的推动与支援，便会是华社一大损失。他们对华文教育的贡献不止在财政上，也在师资上，诸如陈充恩主持槟城钟灵中学校政多年，郑心融任吉隆坡尊孔中学校长有功。

为政治宣传，新马国民党创办报章以争取舆论。从1903年《图南日报》的问世到战后新加坡《中兴日报》、吉隆坡《中国报》与槟城《光华日报》的复办，国民党在传播政治文化、思想与情报上作出贡献。它把华社政治化，丰富了国民党人的政治生活。国民党报的政治言论、笔战的记录与政治活动的报导，除了反映华社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外，其主要贡献在为历史工作者保存了原始资料。例如吉隆坡1919年国民党创办的《益群日报》（*Yik Khuan Poh*），为新马政治史留下了无政府主义（Anarcho-communism）与其领导人吴钝民的史料[30]。它也记录了早年中共领导人，如董方城与鲍惠生在中马的政治活动，为新马历史肯定了中共最早来马工作的党领袖与其宣传左翼思想的情况。

新马国民党运动有两面性。它加速了华社政治化，接受中国认同，另一方面却分裂了华社，制造政治纠纷与混乱的局面。1949年新马国民党被严禁，党员转投马华公会，增强马华公会反共的决心与明确了争取新马独立自治的路线，为新党提供了有斗争经验与胆识的领导层。虽然，马华公会的中央委员几乎全部操纵在受英文教育的华裔与企业家之手，但国民党人却能掌握各州的领导层，诸如黄树芳与林国华（柔佛）、李孝式、曹尧辉与洪户读（雪兰莪）、王景成（槟城）、刘伯群、王振相（吡叻）、林庆年与庄惠泉（新加坡）领导各州的例子[31]。如此，各州的领导层能够督导中央实现反共与争取独立、自治的谋略。最后，国民党人原是华文教育的精英，他们为马华公会指教新党员并鼓励移民登记为新选民，使巫印华联盟在1955年大选中大获全胜。联盟政府1955年的胜利，使英国决定于1957年让马来亚独立。1960年，马共武装起义终告失败。这些政治成就，也有国民党人的贡献与影响。

辛亥革命掀开了一场亲中国与爱中国的国民党运动，为时40年。这运动有改朝换代的狂欢、有组织与动员的高潮、有北阀成功的庆典、有赈灾纾难的热火朝天、有流血与死亡的无情悲剧、有三次严禁的耻辱，也有对新马政府认同所带来的成果与归宿。

这运动把新马国民党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而不能自拔。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斗争

[30] 杨进发编著，《吴钝民政论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页1–14。

[31]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49》，页232。

相关人物

彭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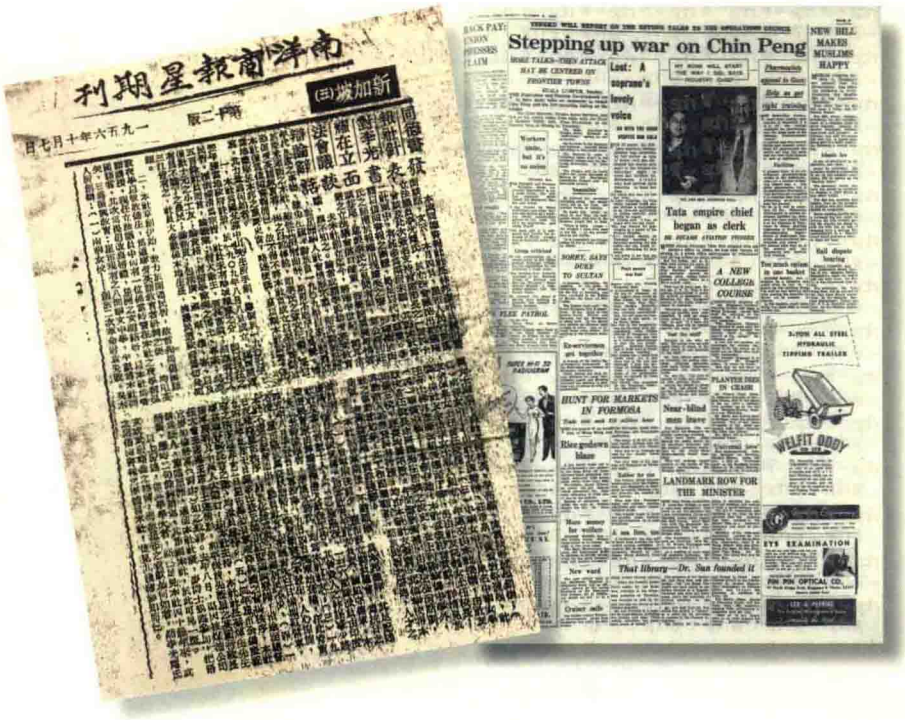
历史事件

8 月 25 日

樟宜机场搭客大厦举行奠基礼

12 月 10 日

职总主席彭由国涉失信及滥用公会基金等六项罪状被控，之后弃保潜逃。2015 年 6 月 22 日向新加坡驻泰国大使馆自首


南洋商報星期刊
新加坡(三)
Stepping up war on Chin Peng
Tata empire chief began as clerk
A NEW COLLEGE COURSE
LANDMARK ROW FOR THE MINISTER
HUNT FOR MARKETS IN FORMOSA
NEW BILL MAKES MUSLIMS HAPPY
WELFIT BODY

战后《南洋商报星期刊》与《海峡时报》有关同德书报社的报道（同德书报社提供）

中，分裂了新马华社，为华社带来了政治纠纷与苦恼。不过，新马的国民党也曾为华社作出贡献，诸如推动文教事业，提高华侨子弟的教育水平；创建报业，增进读者的政治知识等等。国民党人往往是华社领袖，他们慈善为怀、任劳任怨、为华社服务，出钱出力，赈灾纾难，为华社所欢迎的领袖形象与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马来亚的国民党终于接受马来亚的政治认同，加入马华公会，为建立一个非共、多元民族的国家而奋斗。新加坡的国民党人，虽也组织并控制新加坡的马华公会，但其成就欠显著与突出。他们虽然找到了归宿，但难能与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对敌。盖一个超种族而清廉的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未失人民信任，故能继续当家作主至今朝。

新加坡的国民党，除了加强马华公会的领导阵容之外，其所留下的历史遗产并不多。硕果仅存的同德书报社，于2000年庆祝90周年大典，出版《同德书报社九十周年纪念特刊》，记录先贤启蒙民智、推动文教与振兴中华的大业。武吉巴梳（Bukit Pasor）的怡和轩俱乐部，曾是1920与19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大本营。此地也曾是西安事变后陈嘉庚为蒋介石洒下英雄泪的地方。该俱乐部也曾吸收了不少同盟会或国民党精英，如林义顺、林文庆、陈武烈、陈嘉庚、李振殿与周献瑞等等，卧虎藏龙。1903年，张永福为其母安度晚年而购得晚晴园，随后为同盟会总部，国父孙中山运筹帷幄之重地。其园之前主人，曾用为金屋藏娇之所，充满罗曼蒂克的情调。

第二节 默迪卡
——独立斗争二十年

摘要

本节旨在论述新加坡几经抗争与谈判，自1945年8月始至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正式独立，前后20年迂回曲折争取独立的艰辛过程。

Abstract

This section elaborates on the winding road of the 20 years of struggle and negotiations for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from British colonial rule. It began after the Japanese surrender in August 1945 and ended with full independence, after withdrawal from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on 9th August 1965.

陈剑（C. C. Chin）

庆祝人民政府诞生大游行（1959年）

二战后，世界各殖民地人民纷纷发动民族民主独立运动，意图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独立民族民主国家。大英帝国也鉴于国际的压力与殖民地人民的意愿，开始所谓去殖民化政策，设立立法议会，逐步放权给当地人民，让殖民地逐步通过自治走向独立。事实上，却是以此收编、培植政权代理人、淡化和稀释民族民主运动、延长殖民统治、继续掠夺殖民地资源。

新加坡在战后，大部分人民首先面对的是生活问题。具有政治意识的主要有两部分人：即在马来亚共产党（马共）领导下的左翼人士与受英文教育各族小资产阶级。马来亚共产党在二战时曾是英联军的同盟军，战后获得相对自由，可以公开活动，并建立起工运、农运、学运、妇运、文运等各条战线，开展反帝反殖运动，并支持反殖的左倾知识分子组织政党，开展合法的宪制斗争。

新加坡争取独立的斗争可以从战后的1945年8月15日计起，一直到1965年8月9日，历经20年始真正建国，其过程曲折多变，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 1945年8月－1948年6月马共主导民族自决抗争时期
- 1948年6月－1954年10月资产阶级开明派宪制斗争时期
- 1954年11月－1959年6月左翼与人民行动党主导宪制斗争时期
- 1959年6月－1962年9月自治及大马合并与反合并斗争时期
- 1962年9月－1965年8月并入大马至脱离大马独立时期

马共主导民族自决抗争时期（1945年8月－1948年6月）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二战甫结束，遭遇重创的新加坡，物质匮乏、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民不聊生、百废待兴。9月2日英军重临马来亚，9月4日登陆新加坡，再度掌控政权，施行英军政（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简称BMA），新加坡成为马来亚英军政的指挥总部，由英联军最高统帅蒙巴登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主阵，委派拉尔夫·霍恩（Ralph Hone）为马来亚民事总行政官，并组建新加坡咨询理事会行使临时政府职能。咨询会委任七名华社成员，包括李光前、陈振传、马共新加坡公开党代表伍天旺、马共妇女会代表李球等人。

英军政刚成立，就不顾民生疾苦，即刻宣布日币作废，殖民地人民仅有的一点积蓄，瞬间变成废纸，英军政此举类同公然打抢殖民地人民，形同强盗，民愤极大。其时黑市猖獗，人民讽刺英军政为黑市政（Black Market Administration）。英军政维持了8个月的军事统治，于1946年4月结束。

二战时英国去殖民化政策

英国在战时的丘吉尔内阁曾作出解散殖民地的决

定[1]，主要是为平息美国的批评。由于战争的关系，这去殖民化的建议无从实施。二战甫结束，新上任的工党政府历来把东南亚殖民地统治看成某种负累，认为去殖民化这个决定有助于确保英国的行政效率和国家安全，因而对鼓励殖民地自治的政策倍加赞同，但这并意味着工党政府有意放弃其殖民地丰富的资源和各项利益。1942年，时任殖民部主任官员爱德华·肯特（Sir Edward Gent）便已对东南亚战后殖民地统治企划方案。1943年7月，战时内阁组建了一个六人成员的马来亚策划小组，其中包含了前马来亚殖民机构的高级公务人员，为马来亚的宪政改革作谋划[2]。这个小组也向外进行咨询，如英国著名大律师暨战前新加坡市政理事约翰·雷科克（John Laycock）、马来亚政务高级官员博特里克·墨克柯伦（Patrick MacKerron）以及在印度避难的马来亚权贵如陈祯禄及其子陈修信、华侨银行董事经理陈振传等人。对爱德华·肯特提出把新加坡隔离开来的建议，大多持反对意见。

1942年12月，避难的马来亚侨民在印度成立了“印度马来亚人协会”（Malayan Association of India），但亚籍侨民与欧籍侨民矛盾重重、争吵不休，终于在1942年9月，陈祯禄等另起炉灶，组建华侨协会（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同时向英殖民地署提呈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建议马来亚各州与三个海峡殖民地共同组建成一个联邦，并让所有愿意与马来亚土地认同的人赋予公民权和参政权[3]。

随后，在印度的约翰·雷科克、陈振传、柔佛王子东姑阿布·巴卡（Tunku Abu Bakar）、英裔商人奥列弗·霍尔茨（Oliver Holt）等人再向殖民署呈递另一份备忘录，反对把政治行政中心从新加坡迁往吉隆坡。其时，在伦敦的英属马来亚人协会也呼应印度马来亚人协会的建议，把所有九州马来土邦连同三个海峡殖民地建立为一个联邦。但所有这些备忘录和建议并没有受到英殖民部的重视，他们进行暗箱作业，私底下炮制其“马来亚邦联计划”（Malayan Union Proposal）。

当时英国的所谓去殖民化的“伟大设计”（Grand Design），其实是想把分散的东南亚各英殖民地通过并合的方式，形成一体化的管制，可称为“马来西亚殖民地计划”（Colonial Malaysia Scheme）。首先是将当时已经成为马来联邦的吡叻州、彭亨州、雪兰莪州和森美兰州与非联邦的柔佛州、丁加奴州、吉兰丹州、玻璃市州和吉打州，加上槟榔屿和马六甲这两个海峡殖民地，并合为一；而砂拉越、汶莱与北婆罗洲（后改名为沙巴）则在稍后连成一片；最后，再将马来亚及北婆罗洲（含砂拉越及汶莱）合并，新加坡则单独保留为大英帝国的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成为这联合体的中心。1944年5月，爱德华·肯特便正式提出以白皮书形式颁布的马来亚邦联计划（Malayan Union Proposal），作为去殖民化计划的第一阶段。

二战后马共主导的民族自决运动（1945—1948）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二战结束，9月2日英军于槟城登陆。10月，英殖民部便派出刚卸任的巴勒斯坦公使哈雷·墨克迈可（Sir Harold MacMichael）前来马来亚，对各州苏丹进行游说。他利用日占时期各州苏丹曾与日军政合作的事实，威胁他们接受并签署“马来

[1] Arthur Creech-Jones Papers, Rhode House, MSS Brit. EMP. S332, Box 26, File 11.

[2] A. J. Stockwell, "Colonial Planning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Case of Malaya,"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2 no, 3 (May, 1975); C. M. Turnbull, "British Planning for Postwar Malaya," *Journal of S. E. Asia Studies*, Vol.2 (1974).

[3] Tan Cheng Lock, "Memorandum on the Future of British Malaya" (Bombay, 1943), and C.O. Minute 11 July 1945, CO/825/42A.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2 月 24 日

新加坡第五届国会选举，人民行动党囊括全部75个席位，得票率 75.5%

亚邦联白皮书”协议。爱德华·肯特也于1946年4月1日，正式走马上任为马来亚邦联首任总督，驻扎吉隆坡。

英殖民地政府原以为这去殖民化计划将是战后赐给马来亚人民的一份礼物，却不料马共于1945年放弃成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提出“八大主张”，鲜明表态不搞独立，这使英国人大为放心。但“八大主张”中，莱特必须对马来亚的政治前途作出表态，因此有“实现马来亚民主政治，建立全马和各州由各民族各抗日团体普选的民意机构”的纲领[4]。马共这一政治诉求，致使英殖民政府的“恩赐”，在人民面前，倒反变成受到马共的逼迫而不得不作出的政治让步。讽刺的是，这马共的诉求却是由其潜伏在马共党内的间谍莱特所发出，出乎意料的棋局，使接收大员盟军总司令蒙巴登很不高兴，认为马共“偷走了我们的惊雷”[5]。

尽管马来亚邦联计划在公民权问题上十分宽松，让所有当时在马的各族人民都自动成为公民，但由于割裂土地分而治之的英国惯用统治手段，此举引发全马人民无论左右都强烈反对。马来人则因英殖民专使以威摄手段取得马来封建苏丹同意，又未曾与马来权贵磋商而大为愤怒，对于公民权问题则更为惶恐；面对人口众多的华族，加上印度族，马来人担心失去政治优势，反对尤烈。马来亚邦联的推出，直接催生了于1946年3月成立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巫统UMNO）。马来民族主义的伸张促使政治形势逆转，在巫统的压力下，英国撇开所有其他种族的代表和广大的民意，单独与马来人协商。这其实也十分符合英殖民地政府分而治之的策略。在长达半年（1946年6至12月）的英殖民地政府与苏丹及马来权贵全权代表会议上达致协议，这就是厚达100页的“马来亚联合邦蓝皮书”，建立了赋予马来人特权的马来亚联合邦宪法。1946年1月21日，全权代表英国的爱德华·肯特扬弃了由他一手策划的马来亚邦联计划，签署了此协议，马来亚联合邦在1948年2月1日正式成立。

大英帝国这个老牌殖民主义者以惯用的分而治之手法，以不平等的马来亚联合邦宪法造就了马来亚及后来马来西亚以及延绵至今的种族政治恶果。

战前，除政治觉醒度高的知识分子，一般民众政治意识薄弱，国家与身份认同与土地归属感意识相对模糊。华族大半仍自认为“中国人”，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有亲中共、亲国民党之分[6]。印度人则大都认同甫独立的印度。马来人则封建意识浓厚，心中只有马来领主苏丹，认同马来亚土地[7]。二战后，由于居留权身份，而有公民权之设，必须认真考虑国家认同与土地归属问题；加以战后世界各殖民地人民纷纷掀起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争取民族自决、独立建国的斗争，新马人民政治觉醒度也有了提高，整体形势产生重大改变。基于切身利益，人民开始关注政治，并逐渐投入到民族自决运动中来。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是战前、战时及战后马来亚唯一秘密成立的政党。马共土地归属意识鲜明，是第一个具有马来亚国家认同政治意识的本土政党。1933年的政治斗争纲领，第四条便提出：“争取马来亚民族和社会解放，建立马来亚工农苏维埃共和国”[8]。日降后，马共是东南亚唯一拥有军队、具备精良武器、兵员达1万5000余人，并拥有整10万外围组织力量（主要为抗日同盟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政党。但鉴于该党已遭英国奸细莱特所渗透，位居要津为党秘书长[9]，听命于英军政，放弃了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并接受英军政训令，解散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这武装力量，而不是效法越盟和印尼，立即宣布独立，并对殖民政权展开民族解放战争，建

[4] “马来亚共产党当前八大主张”第二条，马共中央1945年8月25日颁布。

[5] Supreme Allied Command Southeast Asia to FO, 3 September, 1945, CO273/675

[6]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修订卷）》（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Ching Fatt Yong,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部分马来人认同印尼，并认同苏卡诺提出的大印尼版图计划。

[8] “马来亚共产党现阶段十二条革命纲领”，1933年马来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原载马共言论集之一：《南岛之春》（新加坡：马来亚出版社，1946年）。

[9] 莱特，越南籍，原属越盟金瓯半岛地区区委。被捕后，投靠法国殖民当局，后转送英国于香港培训后，送到新加坡，以码头工人身份混入战前马共地下组织，并谎称为第三国际代表，获选入马共中央委员会，1927年正式升任为秘书长（战前不叫总书记）。

立民族国家[10]。

作为二战盟友，马共在战后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1946年1月21日，马共召开第八次扩大中央全会，收回于1945年8月25日颁布的“马共当前八大主张”，提出“马共当前民主纲领”，并以此作为宪制斗争的依据，出版《马共当前民主纲领浅释》[11]向全马五百万（当时人口）各族人民解释纲领的意义和斗争目标。

纲领第一条：“根据民主自决原则建立马来亚自治政府，有权决定马来亚行政、司法与立法，并有权解决政治、经济、财政、国防、外交等问题”。这是战后马共第一份向英殖民地政府提出要求自治的民族自决。第二条则是：“建立全马国会，并制定民主宪法，建立各州人民议会，由18岁以上各民族人民，不分阶级、党派、性别和信仰普选成立”。包括其他五条纲领，其实完全符合公开合法的宪制要求。但时值国际冷战方兴未艾，基于意识形态斗争，英殖民地政府对马共的合理政治诉求完全置之不理，充耳不闻。实则上，英殖民地政府忌讳马共与其众多而活跃的公开外围组织的存在和急速发展，诸如全马各业总工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马妇女委员会等开展的组织活动，尤其担忧其在政治上的主导作用。因此，对马共采取诸多限制、干预，并动辄采取法律行动，将马共人员绳之以法，控诸法庭，加以逮捕、监禁或驱逐出境。

新加坡第一个民主政党：马来亚民主同盟

马共一面依纲领行事，一面扶持当时受英文教育的反殖左翼人士组建的民主政党。马共新加坡公开党代表伍天旺、马共原第四独立队党代表郭鹤龄（炳清）等协助林丰美、著名律师如约翰·伊伯（John Eber）、菲立·何亚廉（Philip Hoalim）等人组建马来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简称MDU马盟），并协助党务事宜。后为避免马盟亲共色彩过于浓厚，伍天旺及郭鹤龄等均先后退出马盟事务。

马盟事实上也是马来亚邦联计划催生的政党，但它却是一个毫无种族色彩的跨族群政党，党的核心分子都是大学毕业、文化水平较高、受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并都是在职的专业人士。刚成立，便开宗明义反对马来亚邦联计划，反对把新加坡从马来亚版图中被单独划出来成为大英帝国皇家殖民地。马盟于1945年12月颁布其政纲，主张扩大立法议会的代表权，要求改革与放宽公民权限制；保留新加坡为马来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实现马来亚自治。此外，呼吁进行社会改革，解决屋荒问题，要求住房信托局加速建房实施；支持英总督建议，实行所得税计划，以用于社会和民生建设；建议组建民主工会，改善工人待遇；建议教育改革，建设多元化教育体制，并建立本地大学等[12]。作为民主政党，它有别于马共的激进思想，其政纲所显现的立场和政治观点都比较温和。

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马盟的领导层有多次变动，甫成立不久，组建得力人物林丰美任秘书长、约翰·伊伯任副主席，何亚廉任主席。林丰美于1947年4月前往英国深造时，由余柱业任秘书长。余柱业是任期最长的一位，直到1948年6月初马盟解散为止。

1946年，英殖民当局提出的马来亚邦联计

[10] 二战期间，代表马共与英联军订立“美罗协定”，并接受英军提出的具投降性质的协定条文。日本投降前夕，莱特即抛出“马共当前八大主张”代替“抗日九大纲领”，“抗日九大纲领”第一条就是：“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八大主张”第三条：“实现马来亚民主政治，建立全马和各州由各民族各抗日团体普选的民意机构”。

[11]《马共当前民主纲领浅释》（新加坡：马来亚出版社，1946年）。

[12] Cheah Boon Kheng, "The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Dissertation presen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University of Malaya, July, 1974.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2 月 29 日

樟宜机场正式开幕，掀开我国民航发展史的新页

划方案遭到各界的反对有多重原因。巫统除对英国撇开马来封建集团、一意孤行和担心开放的公民权政策将损害马来人的利益外，也担心它割裂马来半岛与新加坡岛两地的马来人。马共与马盟则基于马来亚整体的地域概念，认为其有损建立马来亚共和国的理念。而华族商会则认为把新加坡作为马来亚经济政治与文化中心隔离开来，将有损马来亚经政与文化整体的利益和发展[13]。后来英殖民当局单独与巫统及马来苏丹达至协议的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则造成全民的反弹。这个宪法赋予马来人特权、保障马来人与苏丹领主的利益、严格限制其他种族成为公民、选举代表制的实行也无限期延长，马来人在这回坚持把新加坡隔离在外，原因是考虑到新加坡华人人口的数量在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后将超越马来人口。

一石激起千层浪，特别在新加坡，马来亚宪政修改方案反而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马共率先强烈谴责英殖民当局，并于1946年9月在新加坡花拉公园（Farrer Park）举行3万人的群众大会，提出马来亚自治的诉求和要求平等对待所有在马以及愿意留马的各族人民，赋予他们公民权。10月，马盟创议成立社会各种族、各社群、各阶层、各界的委员会，以共同讨论新的宪政方案。

PUTERA-PMCJA 与马来亚人民宪章

1946年11月19日，由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简称PKMM）、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民主同盟以及个别开明人士如律师塔剌尔拉（H. B. Talalla）、邱德义等人开会讨论成立一个针对宪政改革的统一战线。

1946年12月14日，由马盟主催，马来国民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全马各业总工会、新加坡书记与行政人员联盟（Singapore Clerical and Administrative Workers Union）、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新加坡泰米尔人协会（Singapore Tamil Association）、新加坡印度商会（Singapore 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新加坡妇女联合会（Singapore Women Federation）等会参与，根据11月19日会议列出的宪政改革三大原则，共同组建“联合行动理事会”（Council for Joint Action，简称CJA）。陈祯禄被选为主席、约翰·伊伯为秘书长。

1946年12月22日，泛马工联（Pan Malay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槟城、雪兰莪、马六甲与吡叻的书记工联（Clerical Union）、雪兰莪印度商会、雪兰莪妇女联合会、马来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马来亚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等组织加入，CJA 扩大为“泛马来亚共同行动理事会”（Pan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简称PMCJA）。陈祯禄仍为主席，秘书长则改由杰拉尔德·迪·克鲁兹（Gerald De Cruz）担任。

12月24日，马来亚邦联总督爱德华·肯特颁布了长达半年单独与马来权贵谈判的结果，即马来亚联合邦蓝皮书，新马人民对此的抗争更形炽热。1947年2月22日，由马来国民党主催，团结了上百个马来组织的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简称PUTERA）正式成立，展现马来左翼强大的反对力量。

1947年3月，PUTERA与PMCJA 正式结盟，组成全马共同行动理事会（PUTERA-PMCJA），由约翰·伊伯担任秘书长，并起草《马来亚人民宪章》（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1947年8月，泛马共同行动理事会（Pan Malayan Council for Joint Action）改称为全马共同行动理事会（All Malayan Council for Joint Action，简称AMCJA）。

PUTERA-AMCJA是华、马、印三大民族众多团体组成，具有全民代表性，并向英殖民地政府提呈《马来亚人民宪章》[14]，提出宪政改革十大原则，主张马来亚实行邦联制度，新加坡自动成为邦联的成员，成立邦联行政会议，负责邦联事务，由邦联立法议会管辖。议会经由选举产生。

面对三大民族强烈的反对，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略作修改，并在7月间公布，但其不平等条文维持不变。李光前领导的中华商会一直是英殖民地政府咨询委员

[13] 1946年1月24日《新民主报》、《中华日报》、《星洲日报》等当日报导以及马来亚报（The Malayan Press）对马来亚邦联白皮书的评论，载马来亚报文摘的副刊。

[14] PUTERA-AMCJA,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 1947," published by Ban Ah Kam, *Pusat Kajian Bahan Serjarah Kontemporari Tempatan* (Kuala Lumpur, May 2005).

会成员，于1947年8月间，正式要求英国国会成立皇家委员会以修改马来亚的修订宪章，并在9月间先在怡保与马六甲分别举行罢市并取得成功，此举在于向英国展示马来亚人民，特别是华、印两族的意愿。

9月21日，PUTERA-AMJCA向全马人民颁布了《马来亚人民宪章》，并在10月20日英国国会开会辩论马来亚宪章修订议案当天，由中华商会连同PUTERA-AMCJA发动全马大罢市（Hartal）。大罢市取得百分之百成功，但英殖民地政府无动于衷，一意孤行，拒绝承认PUTERA-AMCJA的代表性，并宣布将在1948年2月1日正式施行马来亚联合邦宪法。PUTERA-AMJCA原想在当天举行第二次大罢市，但由于中华商会临阵退缩而告失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于1948年2月1日成立。接着，PUTERA-AMJCA也完成它的任务而自动解散。

PUTERA-AMJCA争取自治、民族自决的抗争行动，外在主导力量来自马盟与马来国民党，而其背后的推动力则是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联合邦宪法公布实施后，英殖民地政府已经全面提升对马来亚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和统一战线组织如马盟与马来国民党的镇压。在马共反殖公开斗争方面，工人组织所采取的罢工行动最为有效。为扼制泛马工联在全马所开展的斗争，英殖民地政府终于1948年5月推出"职工会修订法令"以遏制反殖组织的发展，扼制它们的活动，镇压升级，开始任意展开逮捕、监禁、驱逐左翼人士的镇压行动。开明资产阶级如中华商会诸公以及民主人士有鉴于英殖民地政府的威胁，担心与激进左翼的结盟将带来经政利益的损失而开始退缩与PUTERA及马盟等的合作。华社内部也因中国局势、国共两党内战的影响而分裂。

马共此时已经意识到，二战时期的盟友关系已走到了终点，将遭遇封禁的厄运而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道路。马共于1948年3月所颁布的纲领及其后一系列声明都清楚地宣称"人民战争"无可避免[15]，各地区民运组织挖取二战时期遗留并收藏起来的武器，开始组建武装游击队。1948年6月17日，英殖民地政府对柔佛州及吡叻州颁布紧急法令，接着于20日，宣布全马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在全马实行大逮捕行动，总共超过3000名各政党、工会、农会、妇女、文化团体等组织左翼人士遭逮捕，另有超过千名马来左翼人士亦未能幸免于难。紧急法令堵死了限制斗争的途径，扼杀了当时马来亚人民和平抗争、争取合理宪政的生机。

资产阶级开明派宪制斗争时期（1948年6月—1954年10月）

马盟于紧急状态颁布前夕，于1948年6月23日正式解散，紧急法令于次日在新加坡生效。于是，由马共支持、马盟领导的激进宪制斗争都归于沉寂。代之而起的则是英殖民地政府认同的资产阶级开展的宪制斗争。

1947年8月25日，毕业于伦敦大学法律系的亲英律师陈才清、约翰·赖柯克（John Laycock）与纳西尔·阿默·马拉尔（Nazir Ahmad Mallal）共同发起组织了新加坡第一个按英国法律正式注册的政党，名为新加坡进步党（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他们属于受英文教育的社会上层专业人士，都是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和新加坡协会的领导人，主张遵循英殖民地政府政策，循规蹈矩、循次渐进的政治改革方案，逐步走向自治的目标。

英殖民政府按照马来亚邦联计划，依据1946年海峡殖民地（撤销）法令（Straits Set-

[15] 陈剑，〈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回顾:马来亚共产党是否有起义的计划〉，载《冷战国际史研究》期8，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页349-379。

tlements （Repeal）Act 1946） 正式解除海峡三州府，把槟城与马六甲并入马来亚邦联，把新加坡割离开来，成为皇家殖民地，因而新加坡必须有本身的宪法。按1946年新加坡殖民地枢密令（Singapore Colony Order-in-Council 1946），新加坡总督拥有否决权与立法权，并成立一个行政咨询理事会（Advisory Executive Council），有六名现任官员与四名受委非官方人员（即经提名而受委任的民间人士）。立法理事会则有四名前任官员、七名现任官员、二至四名受委非官方人员以及九名获选委员。虽然看似增加了多名民间人士，但经修订后的宪法事实上仍然操纵在英殖民地政府手中[16]。新任总督弗兰克林·金逊（Franklin Gimson）上任后，对有关批评做出反应，特设宪法修订委员会修改有关规定，受委非官方委员增至四名，并将九个选举席位中的三个席位分别保留给新加坡商会、中华商会及印度商会，另六个席位则由民主选举获选者就任。这样，非官员便增多了四名，达十三名，更具意义的是，也首创立法理事经由民主选举产生。

新宪法于1948年3月1日正式生效，而第一次立法议员选举也于1948年3月20日举行。鉴于马盟不满修订的宪制，认为当地人无从获得更多的决策权，大权仍然牢牢控制在总督手中而不受制约，故而决定抵制选举，并于花拉公园举行抗议群众大会[17]。进步党于是成为唯一参与竞选的政党，但也仅得三席，而另三席位则为独立的参选律师所得。六名获选者中，仅有一名是华人，一名马来人、一名欧洲人、三名印度人[18]。

事实上，进步党人大多是资产阶级出身，与英殖民地政府上层过从甚密，高高在上而远离群众，被目为英国人的走狗。当时潜在的选民估计在20万人以上，但注册的选民却只有二、三万人，而其中一万人以上是印度人，参选者中，十五人中，八名是印度人[19]。

1951年英殖民地政府让立法议会的民选议席从六席增加到九席，并允许受委非官方立法议员中的两位参加行政理事会（Executive Council），使行政理事会的官、民议员人数相等，此举表面上在于提升当地人的立法与行政参与权，事实上，立法与行政主导权仍然在总督手中。1951年的选举中，进步党获得九席中的六席。

紧急状态实施后，新加坡的政治环境极其窒息，就是上层社会，除了进步党的亲英举措外，没有什么其他作为。但广大的群众在紧张而严峻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仍然寻求突破僵局的行动。马来亚共产党于1948年9月成立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简称抗盟），开展各条战线的地下斗争。抗盟成立的头两、三年，以地下工作严密细则的方式，主要谨慎从事但全面发展盟员，修复与组建学运、工运、农运、妇运、文运等各条战线的工作，包括建立起抗盟的英语支部，团结了马来亚大学中的受高等教育的老师和学生，以及校外一大批受英文教育的左翼学生、教师和律师等。原来具有部分武装的工保队（工人保护队），也在秘密扩大建设中。其中一部分如黄福光等人，事实上已经转为城市武工队。马共公开宪制斗争之途被封闭后，只能采取隐蔽战线的形式继续开展反殖与争取独立的斗争。抗盟在1953年的高峰期，盟员数目高达3000人。从1948年杪到1953年3月，在报章上比较常见的反殖活动的报导，都是殖民地政府对抗英同盟活动的镇压消息和逮捕行动。在这段时间，英殖民地政府总共逮捕了1209人，其中286人自愿离境，而另254人被强制驱逐出境[20]。

其实，除进步党外，1948年3月28日，另一个仿效英国工党的政党应运而生，那便是由一批受英文教育的非共工运人士所组建的新加坡工党（Singapore Labour Party）。创党人为当时海员工会主席马吉德（M. A. Majid）、陆军公务员联合会（Army Civil Services Union）的执委彼得·威廉斯（Peter Williams）与蒂凡那（C. V. Devan Nair）和法兰西斯·托马斯（Francis Thomas）。1949年，蒂凡那劝服当时已是“新加坡书记与行政人员工联”（Singapore Clerical and Administrative Workers' Union）的林有福退出进步党

[16] Kevin Tan, "The Evolution of Singapore's Modern Constitution: Developments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Day," in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 (1989);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195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55.

[17] 马盟至此已经感受到白色恐怖的压力，正式于6月24日自动解散，参阅Yeo Kim Wah, *op.cit.*, p.98.

[18] 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p.239.

[19] *Ibid.*

[20] Yeo Kim Wah, *op.cit.*, 1973, p.225.

加入工党，并获选为主席。林有福曾于1948年因其代表劳工利益，受委进入立法议会。工党的领导层及其党员，原本几乎清一色为印度移民，林有福加入后，才逐渐增加了华裔和马来成员。但不幸的是，自1951年因市议会参选人遴选问题产生矛盾，林有福与托马斯这些温和派与较激进的彼得·威廉斯形成党内派系斗争而分裂。这次选举工党因内斗导致竞选失利，仅得三席。1952年，激进派终于将林有福驱赶出党。当时英国工党国际秘书长恰巧来马访问，主动邀请对垒双方和谈但功败而返。1953年，林有福等另组民主工党（Democratic Labour Party）。蒂凡那与杰拉尔德·迪·克鲁兹（Gerald De Cruz）则逐渐退离而参与更激进的抗英同盟的活动。工党最终于1955年完全淡出新加坡政坛[21]。

无论进步党还是工党，他们当时都提出并不清晰的政纲，进步党于1953年曾颁布一个“十年目标”，计划在10年后，让新加坡取得自治，并通过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而独立。工党的目标则更为激进，计划在1954年便实现自治，之后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并建立马来亚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两党基本上都与广大华社甚少联系，而华社则视这两党为殖民地当局的傀儡或走狗，因而缺乏强大的群众基础，实力不足，难有作为。至于受委任的三位商会代表则被看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英殖民政地府原本希望通过当地成熟而可靠的政党来完成其去殖民化计划（Decolonization Plan），进步党的表现颇得当时的总督约翰·尼克尔爵士（Sir John Nicoll）的赏识，认为进步党是一个可信赖的政党，能够依照英殖民地政府的议程办事，逐步实现新加坡和平有序地过渡到自治，而不至于影响英帝国的利益和当地经济。办法是让立法议会与市政委员会通过增多民选议员，逐步由当地人主政与管理新加坡事务，以达到政权平稳转移的目的。但这些民选议员都是受英文教育、跻身上流社会的海峡华人，与传统华人十分疏离，事实上不能代表广大的华人群众。他们也认识到当时的宪政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华社，因而华社对所谓宪政改革显现极大的政治冷漠。以华人占人口75%的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认识到华社参政的热情低落将是建立民主政府的极大障碍，从1951年选举时仅有25% 的公民登记为选民便可见一斑。

左翼与人民行动党主导宪制斗争时期（1954年11月 – 1959年 6月）

林德宪法与1955年首届立法议会选举

1953年11月，英殖民部终于委任乔治·林德爵士（Sir George Rendel）主持新加坡宪制委员会（Rendel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全面检讨新加坡宪政，而后成就了林德宪法（Rendel Constitution）。这个宪法赋予新加坡一个“受限的”自治政府，英殖民地政府将法律、财务、内政、外交与国防等主权以外的一切政府权力转移到新立法议会。这议会将拥有25位民选议员、由总督委任三位殖民地政府官员及四位非官员。这宪法也硬性规定，议长需由总督任命议会外人士担任。一个由总督主理、由25名民选议员中选出的六名部长及总督委任的三名政府官员为部长组成的内阁，作为决策总机构以替代原有的行政咨询委员会，这便是新加坡林德宪制下新加坡自治政府。

林德宪制规定1955年举行第一次立法议会大选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当时在李光前的领导下，事实上还是比较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与不断

[21] *Ibid.*, pp.105–113.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5 月 30 日

政府宣布建造地铁系统，首段线路由大巴窑站至杨厝港站于隔年 10 月 23 日通车

为华社争取各项应得的利益的。对于马来亚邦联计划，商会不仅参与反对行列，作为AMCJA的主要力量和活动经费支柱，也是大罢市（Hartal）的主要推动力。之后，在为华族争取公民权和维护华文教育的问题上更是不遗余力，也是李光前的高瞻远瞩，在商会议会上通过华侨称为华人的议案，直接具体落实华人的国家认同。商会代表也是行政理事会的当然咨询委员。但紧急法令颁布后，英殖民地政府便逐渐疏离商会，而商会则更专注于建立华校系统。1953年，陈六使登高一呼，建议筹建南洋大学，得到东南亚华社各界的积极反应和大力支持。华社大量捐助，众志成城，终于在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英美视举办南洋大学为政治事件，诸多干扰与干预，在不得逞的情况下，便力图想通过林语堂校长使之成为反共文化堡垒。在宪政改革上，英殖民地政府对李光前等的建议充耳不闻，拒华社于宪政大门之外。英殖民地政府一方面不信任华社，一方面却又担心缺少华人参政将不利于其所属意的自治政府的民主运作，其矛盾与犹豫心态十分显著。

1953年是新加坡政界比较活跃的年份。林有福与法兰西斯·托马斯退出新加坡工党后，于1953年10月，另组新加坡民主工党（Singapore Democratic Labour Party）。在草拟章程的过程中，他们与辞去进步党的律师大卫·马绍尔（David S. Marshall）及留英回来的李光耀讨论共同组织一个左翼联合政党来与进步党抗衡，但李光耀没有接受。他们便于1954年4月另行建立新加坡社会主义党（Singapore Socialist Party）。但这新党发展迟缓，三个月后都还没有建立任何支部，党员人数也还不到300名[22]。面对1955年林德宪制的立法议会选举，他们最终还是与工党联合成立了一个竞选联盟，称为人民统一阵线（People's United Front），并由双方领导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全权处理竞选人选问题以及研究两党合并的可能性事宜。1954年10月，执委会决定将名称改为新加坡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颁布了1955年竞选名单，并进行政党注册。除领导小组外，大部分工党领导人发现自己不在候选人名单内，愤而脱离劳工阵线。大卫·马绍尔以强势作风成为劳工阵线的核心人物。1955年大选颇为热闹，总共有79个候选人角逐25个席位。劳工阵线获得10席、进步党4席、人民行动党3席、民主党2席。劳工阵线成为执政党，大卫·马绍尔成为首任首席部长。

伦敦宪制及自治谈判与新加坡宪法

显然的，作为“有限”政府，总督代表大英宗主国，掌握住财政、内政、外交等重要权力，首席部长受到总督的监督和严重制约。马绍尔于1955年7月，要求委任四名助理部长遭到总督拒绝，愤而威胁辞职。殖民部妥协同意马绍尔的建议，答应在立法议会期满一年后，启动宪制谈判。1956年4月23日至5月15日，由13名立法议员组成的独立谈判代表团（包括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与林清祥）在伦敦与殖民部周旋。马绍尔要求新加坡于1957年4月1日独立，英国可保有国防与外交权，但新加坡享有对国防政策的否决权与外交政策的咨询权。英殖民部拒绝了马绍尔所有放权的要求，新加坡的“默迪卡”谈判（Merdeka Talk）终于失败，马绍尔于1956年6月依诺辞去首席部长职，由林有福取代。

马绍尔掌政时期，发生了多起严重的工潮，如福利工潮、海港局工潮、市政会工潮、电车工潮等一系列罢工事件，尤其是福利巴士工潮引发暴动，造成多人死伤。此外，全星华校学生在1953年5月13日反服役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申请成立全星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并获准注册。在英殖民地政府眼中，马绍尔向马共及左翼的压力妥协，不敢全面动用国家镇压机器对付反殖运动，执政表现显得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因而对把政权交付到他手中有信心和信任的疑虑，对他提出的放权要求则认为是他的个人作风和权力欲的表现。

1957年3月，林有福再组各党代表宪制代表团前往伦敦延续成立自治政府的谈判。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仍然是代表团成员。由于林有福执政期间，采取了雷厉暴政，全面镇压马共与左翼发动的工运、学运组织和行动，封禁了全星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新加坡各业工厂及商店职工联合会等左翼工团、农民协会和众多左翼文化团体，荷枪实弹强力对付各业罢工行动和学生示威以及因之引发的暴动，英殖民地政府对林有福这些维护英殖民政权的举措大加赞许，也认定林有福为适当的接班人。

这次会谈获得成功，并同时撰写了新加坡宪法。李光

[22] Yeo Kim Wah, *op.cit.*, p.114.

耀作为代表团的最重要成员，也是新加坡宪法的主要起草人。除了国防与外交，英殖民部同意了上一回谈判马绍尔提出的所有条件，在内政的权限上，英殖民部作了修改，建议成立一个七人内政安全理事会（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由英国及新加坡各派出三名代表，马来亚联合邦派出一名代表组成。这部分满足了新加坡的要求并为将来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铺路，而马来联合邦的投票权则是对英殖民政权遏制马共威胁的保证[23]。

代表团回来后发生了一个颇有意义的插曲。在随后举行的立法会议中，马绍尔严厉批判代表团，特别是李光耀接受他认为的“欺骗性的宪法”（Fraud Constitution）。这导致他们双双辞去立法议员，接受补选的挑战，结果，李光耀胜出[24]。立法议会接受了谈判代表团的报告与相关宪法草案。

1958年4月，林有福率领第三次宪政谈判代表团为完善新加坡宪法的细节前往伦敦。同年8月1日，英国国会正式通过新加坡法案（State of Singapore Act），使新加坡从皇家殖民地转变为自治国度。英国保有国防、外交的权力，而内政则交到内政安全理事会手中。根据新加坡（宪法）枢密令（Singapore（Constitution）Order-in-Council），取消总督的位置而以国家最高元首（Yang di-Pertuan Negara）代之，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则改为总理（Prime Minister）。新宪法规定设立英国最高专员（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及其公署以代表英国在新加坡的权益，作为内安理事会的主席掌持新加坡安全事务，并获特权审阅所有内阁议程及所有内阁文件，拥有在极端紧急状态下撤销宪法行使政府全权的权力[25]。

1959年大选与新加坡自治

依据1958年宪法，于1959年举行第一次全国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51席中的43席，正式执政。过渡总督威廉·顾德（William Goode）宣誓成为新加坡首任元首，李光耀成为首任内阁总理，九人受委为内阁部长。

这次参选的政党一共有六个，人民行动党参加所有选区，共51个候选人；其次是林有福领导的人民联盟，参选39席；然后是自由社会主义党，参选38席；巫统参选八席；马绍尔另组的工人党参选三席；劳工阵线参选三席；独立人士参选共34席。从参选阵容看，颇为热闹。选举结果却十分清晰，人民行动党大获全胜，独得43席，成为执政党。人民联盟仅得四席；巫统获得三席；独立人士仅有一人中选，其余政党均全盘皆墨。

人民行动党：费边社会主义者与马共及左翼的统一战线

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其实是一个左翼与费边社会主义者的统战组织。费边社会主义者指的就是留英归来的李光耀、吴庆瑞、阿都拉萨（Abdul Razak Hussein）、莫里斯·贝克（Maurice Baker）等人。他们在英伦留学时，对马来亚的政治十分感兴趣，开始萌生反殖民主义思想。经常聚集一处，并设立一个马来亚论坛，讨论马来亚的局势。1951年1月，马来亚民主同盟领导人约翰·伊伯、沙尔玛（P. V. Sarma）、沙末·伊斯迈（A. Samad Ismail）以及蒂凡那等人被殖民政府逮捕，吴庆瑞等还到殖民部去抗议[26]。

这些人于1952-1953年回到新马后，积极

[23]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 held in London in March and April 1957," Sessional Paper no. Misc 2 of 1957, paragraph 27; C. M. Turnbull, *op.cit.*, p.266.

[24] C. M. Turnbull, *op.cit.*, p.266.

[25] C. M. Turnbull, *op.cit.*, p.269.

[26] Sonny Yap, Richard Lim and Leong Weng Kam, *Men in White* (Singapor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2009), p.10.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 月 30 日

缆车惨祸造成七死一伤。5 月 20 日，新加坡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

投身各自的事业，但极度关心新马政治的发展。特别是李光耀，开始以收费极低的方式从事律师业。由于先后挺身为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学生成员因社刊《华惹》（*Fajar*）登载反殖民主义言论被捕，以及为1953年5·13反服役斗争被捕的华校中学生进行辩护并且胜诉而名声大噪。这时，李光耀也为在监禁中的马共机关报《民声报》社长刘一帆当辩护律师。这些，都奠定了他的反殖左翼形象。接着，李光耀接二连三受邀担任许多工会、农会、学生、妇女等组织以及宗亲会馆的法律顾问，俨然成为左翼的法律代言人，因而取得了广大左翼人士的支持和拥护，获取了晋身政治的资本。1954年始，李光耀便酝酿组织政党，经常在其住家地下室聚众商讨[27]。他深切认识到他们这些受英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赢得受英文教育者的支持。但他们清楚认识到他们与只讲华语和方言的广大的华人社会十分隔阂，而有组织的群众都掌握在左翼的手中，特别是林清祥等影响巨大的工运领导人手中，必须与他们联合才有可能赢得政权。而左翼也发现必须与这些受英文教育的反殖人士进行统战，在战略上更能取得优势。而马共地下党也作出指示，采取统战策略才能更好完成反殖事业。当时，马共的外围组织，星洲人民抗英同盟发展得非常蓬勃，盟员人数高达3000人之众。在地下人员的安排下，李光耀与林清祥终于会面并一拍即合[28]，成立人民行动党，作为在宪制斗争条件下政治合作的统战组织。

在马共地下党与左翼组织的支持和协助下，人民行动党迅速发展成为新加坡最大政党，支部遍布全岛各处（从第一年建立5个支部到1961年共51个支部）。其时，全新左翼组织众多，声势浩大。所有左翼工会、农会、学生、妇女、文化团体以及在这些组织下团结起来的群众，全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坚强后盾。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马共特别重视工人组织的建立和发展。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马共迅速组织起泛马总工会，会员人数达到45万人。单在新加坡，便有63间不同行业的工会加入总工会，人数达20多万人。然后工会数目逐年增加，在1957年的高峰期，泛马总工会旗下工会达到270间，单在新加坡工会数目便高达117间。英殖民地政府十分担心这庞大的有组织的工人力量，采取了一系列律法和实质性镇压手段，遏制它的发展。1948年6月以紧急法令封禁了泛马总工会以及其他众多左翼团体，全马工会数目锐减至156间，新加坡则锐减至93间。英殖民地政府在战后也培植其所操控的工会。紧急状态颁布后，则一面建立更多左翼称为“黄色工会”的工会，一面收编中间偏左的工会在羽翼之下。1953年末，左翼工会开始复苏。1954年8月12日林清祥领导的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正式获得注册。会员人数从初创时的375人飙升至1955年的3万多人，属下工会多达30间。当时，这些左翼组织都是由抗英同盟负起组织和宣教的任务，主要负责人也大多是抗英同盟的积极分子。1957年9月抗英同盟正式解散，大部分盟员便分散进入到政党、工会、农会、学生、妇女与文化团体等左翼组织中去，直接担任组织的各项任务。当时人民行动党各支部几乎全掌握在抗英同盟的手中。马共地下统战的工作做得很完善，其他政党如工人党、人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特别是组织秘书、宣教等重要职务，也都掌握在抗英同盟或马共成员手中。

统一战线裂解的导火线

1957年人民行动党即将举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马共地下一些极左成员认为李光耀等费边社会主义者始终是资产阶级分子，只是暂时团结的反殖对象，不是永远的盟友。他们自觉左翼实力已经足于掌控全局，应该是时候把人民行动党牢牢掌握住。于是，他们召集了所有支部组织秘书等重要领导人，组织了杜亚士渔村岸外奎笼（渔栅）秘密会议，商讨是否通过8月份的中执委选举时，一举把李光耀集团选出去。与会者并不完全认同激进分子的分析和主张，他们认为当时还不是适当的时刻与李光耀集团分道扬镳，况且李光耀在当时并还没有展现出十分反动的举措，应该还是求同存异、团结一致共同反殖。1957年8月4日中执委选举的结果因而出现了六对六（六位左翼代表、六位李光耀集团分子）的局面。李光耀将之定性为马共与左翼意在夺权，非常光火，不予合作，致使中委会无法成立。左翼斡旋不果，李光耀拒不接受左翼的善意，当选的

[27]《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1998年），页188。

[28] 蔡石君，〈带林清祥与李光耀认识的经过〉，载《深埋心中的秘密》（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08年），页3–11；《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208。

左翼只得自行组织中委会[29]。

接着，1957年8月22日，林有福进行大扫荡，把六位中选的左翼中五位（主席陈从今、副主席陈贡元、副秘书陈世鉴、财政王才安、副财政吴文斗）连同泛星工联会的执委梁再明、林石塔、蔡作成（蔡德怀）、蔡维杰、林戴伟（即林友曲，又名林有固）、郑激发、林沙烈（林清如）等38人逮捕拘禁，独留秘书知知拉惹律师[30]，他在9月3日辞去中委会秘书一职。

当中委会主要成员被捕后，剩下的中委李光耀、杜进才等人立即重组中委会，接着，修改党章，并清除各支部涉嫌的左翼分子[31]。自此，李光耀牢牢掌握住了人民行动党。

马共地下激进派党人这个举动，显然构成费边主义分子的极大恐慌和不满，成为统一战线分裂的导火线。马共驻北京的国外政治局书记章凌云（阿苏）裁定这个夺权行动，纯属冒险机会主义行动，严重损害以李光耀为代表的非共反殖人士的统战关系，责令流亡印尼的马共新加坡旅印尼工作委员会立即采取行动修补这个关系。方壮璧受命负起这个重任[32]。

自1958年4月起，方壮璧前后共五次与李光耀秘密会面，一方面传达和重申马共的善意，重新建立真诚的统一战线、支持人民行动党的宪制斗争策略，共同反殖、争取自治与独立；一方面提出马共的一些政治要求，而李光耀却并未给予承诺[33]。马共国外政治局仍然认定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唯一可以支持的政党，责成马共地下发动左翼在即将到来的竞选中，撤离对工人党以及人民党的支持，全面支持人民行动党[34]。费边社会主义者缺乏群众基础，尽管李光耀在短短两三年内努力通过担任工团、农会、学生团体等机构的法律顾问赢取一些群

星洲日報星期刊

本埠新聞

立院大選揭曉 人民行動黨獲壓倒勝利

各區如風捲殘葉 囊括四十三席位

各區候選人得票紀錄

1959年5月31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报道当年的大选结果

众的赞赏与支持，以及建立起人民行动党在民众当中的信誉，但面对左翼的强大动员力量，没有左翼群众的全力支持，要赢得大选并非易事。何况，所有人民行动党的支部其实都掌握在抗英同盟的手中。李光耀深知其利害关系，必须屈服于政治现实，利用左翼争取群众以胜选。1959年的选举结果，清楚说明事实，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在51席中获得43席，胜利执政。

自治及大马合并与反合并斗争时期（1959年6月 — 1962年9月）

政治现实一再告诫人们，盟友毕竟不是同路人，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

[29]《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313。

[30] 郭大英，〈情系狮城〉，载《从战场到茶场》（香港：见证出版社，2006年），页120-142。

[31]《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315。

[32] 陈剑主编，《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年），页36-37；《方壮璧回忆录》（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7年），页147-155；《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321-332。

[33] 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新加坡：文化部出版，1961年），页30-32。

[34] 方壮璧，〈天若有情谈笑间〉，载《方壮璧回忆录》，页183-196。

人。在大选胜利的狂欢过后，隐藏的分裂危机逐渐显露。一旦撕破脸，便不再有什么道义考量，而是必须动用一切可能把对方打倒。

王永元挟着市议会的政绩，开始问鼎党权与政权，挑战李光耀的权威，马共与左翼虽一时有取舍的难处，但始终对机会主义者没有好感。在1960年4月29日芳林区补选中，左翼被指暗地里支持王永元，造成人民行动党败北。此时，虽然不曾完全表面化，分裂却已成定局。

统一战线的最终瓦解

这背后的原因是早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后，杜进才、吴庆瑞等便已经萌生与左翼决裂的意图。李光耀则在1957年3月与英国和马来亚联合邦达成默契，建立了另一条反共的统一战线。马共与左翼懵然不知人民行动党人已经放弃原定的统战安排。方壮璧与李光耀在1958年4月秘密会面时，仍然一厢情愿地要求行动党设法废除内安委员会及预防性拘留法令，殊不知这个委员会与相关法令就是用来对付马共与左翼。在安顺补选前，左翼更提出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团结工运、放宽公民权标准，给予新闻、言论、出版、结社与集会的自由。

也就在安顺补选前的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突然提议建立马来西亚的构想，这类属偶然的建议，其实是英国创议，后获得东约两大支柱美国及澳洲首肯的计划，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与延蔓、防止新加坡左翼执政的可能性。显然的，马来西亚计划是个冷战产物，而李光耀等极力支持马来西亚计划。马共与左翼这时才意识到与人民行动党的统战已经到了尽头。不仅政治诉求无望实现，还必须立即作出分道扬镳的抉择。

安顺补选，左翼毅然展开对人民行动党的反击，而人民行动党不仅面对显赫的对手马绍尔，尚发现以林清祥为首的工运六巨头强力支持马绍尔，另42个工会联合发表声明支持左翼的诉求，而人民行动党八名议员公开支持六巨头[35]。左翼的诉求不得要领，1961年7月15日的安顺补选揭晓，马绍尔明显地获得左翼支持，胜利获选，左翼与人民行动党正式决裂。

两次补选失利，李光耀于7月17日呈请辞去总理一职，但以杜进才为主席的党中央不曾接受。7月19日，安顺区落选的职工会（Trade Union Congress）主席马末·阿旺（Mahmud Awang），连同蒂凡纳等亲行动党的工运人士发表声明，指责林清祥、方水双等六位支持马绍尔的职工总会执委背叛他们的主席，用以驳斥前一日林清祥指斥李光耀造成职工总会的分裂。职工总会于8月3日解散，马末·阿旺与蒂凡纳等随即另组全国职工中心（Trade Union Centre），后改称为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简称NTUC）。林清祥等则另组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s，简称SATU）[36]，决裂行动从工运方面全面展开。

1961年7月18日，英国最高专员薛尔克勋爵（Lord Selkirk）与副理菲立·穆尔（Philip Moore）在林清祥的要求下，于最高专员官邸以茶会形式会见了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S. Woodhull）和詹姆斯·扑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目的是要了解假如左翼获得政权，英国将持何种立场和态度。薛尔克表示其职责在于确保新加坡迈向民主[37]。李光耀通过政治部获知这个茶会，非常震怒。

7月20日，李光耀召开立法议会特别会议，提出信任动议，以图逼使所有议员表态。信任动议由两个方面，通过签署一份表格进行：一是对于马来西亚合并表支持，一是对他表信任。在这过程中，双方展开拉票行动。7月22日，在长达超过13小时的马拉松辩论后，于凌晨3点20分，李光耀依靠病重的女议员莎荷拉的一票，以26对25票险胜[38]。事态一目了然，13名异议者退出行动党，而李光耀则声明行动党开除这13名行动党议员，其中有五位政务次长。当时任职的三位政治秘书林清祥、方水双及兀哈尔也脱离了行动党而李光耀则称他们被逐出行动党。

1961年8月13日，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成立，并

[35] 叶添博、林耀辉、梁荣锦，《白衣人》（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2013年），页190。

[36] 《白衣人》，页204；Fong Sip Chee, *The PAP Story*, PAP Chai Chee Branch (Singapore: Time Periodicals Pte. Ltd), pp.97–98.

[37] 薛尔克在一封外交信函中表明："我很肯定，即使下一届政府更加左倾，甚至受共产党操纵，只要内部安全没有受到威胁而无需我们出手干预，我们就必须允许民主程序按宪法运作"，参阅《白衣人》，页193。

[38] 由亲李光耀的议员陈志成安排医院的救护车送莎荷拉到立法议会，抬进议事厅去投票。投票结果，27票赞成（其中一票属独立人士许春风）、8张反对票（包括马绍尔在内的人民联盟议员）及16张弃权票（13位行动党异议者及包括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议员）。

于9月17日获准注册。李绍祖获选为党主席，兀哈尔为副主席，林清祥为秘书长，傅树楷（又称傅树介）为副秘书长。骤然，新加坡议会有了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接着，戏剧性地，行动党的51个支部，有35个投向社阵，23位支部秘书，19位倒戈。“大分裂”的上层序幕刚结束，接着便是基层组织的大裂变。1960年成立的人民协会，时由陈新嵘负责管理及招聘员工，于1961年9月起，亲社阵的人员展开长达10个月的大罢工。数千名的建国队，则由黄信芳负责，约2000名建国队员也开始罢工行动。农运、妇女、学生、青年组织、文化组织等各条战线纷纷泾渭分明地进行割裂[39]。陈新嵘与黄信芳皆为马共地下人员，于1963年2·2大逮捕之后，逃亡印尼，后辗转到泰南打游击。

并入大马至脱离大马独立时期（1962年9月－1965年8月）

新加坡于1959年6月正式自治，便逐步开始与马来亚联合邦进行商讨合并事宜，但此时东南亚局势越来越紧张。中印半岛，越盟发动的共产主义解放运动在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泰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1959年，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越南，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武装颠覆。1960年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并成立一支人民的军队，旨在推翻美国扶持的南越吴廷琰政权，统一越南。自1955年起，美国逐步提升对吴廷琰的军事援助，从派遣顾问到部队支援，全面介入越南战事。1961年2月15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把越南共和国境内各地的人民武装统一组成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从事游击战。老挝建立了巴特寮人民武装。起自1959年，为打击“胡志明小道”（北越支援越南南方的运输通道），美国在老挝石缸平原由中情局开展秘密战争[40]，并屡次干预老挝民主政权。而印尼方面，苏卡诺自1955年倡导不结盟运动，在万隆举行会议以来，越来越左倾，并实行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宗教三结合的左倾指导民主政治体制，简称“纳沙贡”（NASAKOM）政体，印尼共产党公然入阁[41]。

1960年代初，肯尼迪曾扬言印支半岛的局势一旦失控，将造成整个东南亚全面赤化，有所谓骨牌论的政治忧虑[42]。英国作为原马来半岛、新加坡、砂拉越、汶莱与北婆罗洲（后改称沙巴）的殖民地宗主国，整个地区变色，则其殖民地利益便全盘皆墨；而新加坡则因左翼运动蓬勃，他们担心马共将可能通过左翼在新加坡执政而使新加坡变成东方的古巴。对此，英殖民主义者早有预谋，早在1951年初，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就曾提出“马来西亚”的概念[43]，主要为了殖

[39]《白衣人》，页197-198。

[40] 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nvert Oper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Morrow, 1987); Roger Warner, *Shooting the Moon: The Story of America's Clandestine War in Laos* (South Royalton, Vermont: Streerforth Press, 1996), pp.3-6.

[41] 印尼苏卡诺实行左倾民族主义政策，印尼共产党获得空前的机遇，不仅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也成为苏卡诺创导的指导民主政体及其“纳沙贡”体制（NASAKOM -- NASionalisme (nationalism), Agama (religion), and KOMunisme (communism) - 即联合民族主义、宗教信仰以及共产主义大团结执政理念）的一员。印尼共产党受容纳进入人民协商会，成为印尼政治的三大支柱之一；陈剑，〈1950及1960年代美国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博弈与其战略与策略的探讨〉，载《柔佛州人民之友》网页。

[42] 骨牌论始于195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提出以隐喻东南亚局势在中苏主导的共产国际运动掀起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将使整个东南亚地区从越南开始一个个全面赤化。1960年代，肯尼迪再次重申骨牌论造成的威胁。

[43] 陈剑，〈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简述〉，载《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2年，页15-16; Tan Tai Yong," Creating' Great Malaysia'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erg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p.13-20。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7月11日

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海峡时报有限公司、时报出版有限公司合并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各报维持现状

民统治的方便。1961年5月27日，马来西亚这个冷战措施的提出，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1961年是新加坡争取合并与独立斗争的重大转捩点，对于行动党来说，就经济角度而言，马来西亚显然提供新加坡更大的经济腹地，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政治上，则提供行动党更大政治发展空间，拓展行动党人的宏图伟略，有望通过宪制道路在马来西亚执政。对于马共与左翼来说，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马来西亚事实上就是扼杀左翼合法宪制斗争的途径，是新殖民主义措施，摧毁建立马来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

因而，行动党誓必坚持并入马来西亚的行动，而左翼则誓必反对到底。马来西亚计划提出后，立即引发五邦在野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的强烈反弹，他们组织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同仇敌忾反对大马计划[44]。

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对新加坡华人人口的数目颇有顾忌，对行动党的多元种族政治纲领尤为忌讳。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因而设置诸多障碍与苛刻条件，不同意新加坡以平等的姿态加入马来西亚。在公民权问题上、在税收的分配上、新加坡政党在马来西亚参政权上、在国会议席位上等方面诸多限制。而行动党则相应妥协，唯在教育与劳工政策上要求自主。当时，行动党认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是唯一的出路。

左翼认为马来西亚是冷战产物，政治目的就是摧毁左翼的有生力量，对马来亚联合邦提出的不合理合并条件甚为反感，提出新加坡必须以完全平等的条件加入大马，完全像槟城与马六甲一样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一州并享有同等的经政和社会待遇。

争取合并的斗争炽热化。在新加坡，社阵引领群众展开如火如荼的反大马斗争。李光耀则利用电台作12次广播演讲，一面阐释行动党的大马合并计划、一面对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阵营进行攻击，一再指斥左翼是马共的代理人，特别通过政治部收集到的材料意图暴露林清祥的马共身份[45]。

马来西亚计划成了国际问题，引发中国与苏联的谴责与东南亚周边国家强烈反对。菲律宾与印尼发起政治、外交攻势，苏卡诺更进一步发动军事对抗。

1962年12月8日，汶莱人民党在竞选大获全胜后，在组织政府时遭遇英国与汶莱苏丹的刁难愤而起义。起义军在三天内即遭枚平，但逃亡在外的党魁却在印尼与菲律宾支持下，组织起北加里曼丹合众国流亡政府[46]。这事导致的连锁反应是：五邦左翼政党的道义声援、砂拉越地下组织砂盟发动武装斗争，并获得印尼的军事支援。英国与新

---

[44] 陈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反殖左翼运动与马来亚、印尼及北婆三邦的关系与互动〉，载《柔佛州人民之友》网页；〈社会主义政党会议特辑〉，载《阵线报》期12（第一版），社会主义阵线编辑部，1962年1月31日；“大会十七项议决案”，载《阵线报》期12（第四版），社会主义阵线编辑部，1962年1月31日。

[45]《争取合并的斗争》。

[46] 1962年8月30至31日，汶莱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四个县共55个席位，汶莱人民党参加所有议席竞选。参与竞选的还有汶莱国民机构（六个议席）、汶莱联合党（一个议席）以及18位独立人士。汶莱人民党赢得54席（32个议席无对手），唯一获选的独立人士，最后也加入了汶莱人民党。根据1959年宪法，立法议会设33个议席，16个议席由议会选举任命，9位由汶莱苏丹委任，剩下8个议席，由当然委员充任。按大选结果，汶莱人民党获得全胜，理应占有立法议会16个议席。原定立法议会在12月5日召开，并准备授意阿查哈里组织第一届自治政府。汶莱人民党拟在议会通过要求英殖民政府归还砂拉越、英属北婆罗洲（沙巴）领土主权并成立称为婆罗洲联邦独立政府，不参与马来西亚计划而在1963年宣布独立。此议案遭到苏丹奥马·阿里·萨夫丁三世（Sultan Omar Ali Saifuddin III）反对，而延长开会日期至12月19日，汶莱人民党事前早已作武装起义的准备，并在印尼军部的协助下，组织了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entera Nasional Kalimantan Utara,简称TNKU）。汶莱人民党原定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时采取行动，面对英殖民政权与汶莱苏丹迟迟不召开立法议会，于是突然提前发动武装起义，攻打苏丹皇宫、总理住宅、发电厂、蚬标素里亚（SERIA）油田、全境各警署等处，砂拉越第五省林梦（Limbang）等地区卡达央族亦配合行动。英军远东军区司令部早有警戒，事前已经通令两个辜加步兵团48小时待命。此时立即派往前线应战。此外，再派遣第一营的两个连队，以及第99步兵旅的第二辜加来福兵团，由新加坡樟宜英空军基地运往汶莱。当天，辜加兵团救出苏丹。9日，英军发动巴拉姆河（Baram River）区数百名达雅族红羽毛战士、第五省巴里欧（Bario）高原地区的格拉比斯（Kelabit）族另数百名战士，加上当地英籍公职人员、油田技工等构成超过2000名非正规军参与战斗，达雅族及格拉比斯族熟悉山林，精于搜寻踪迹。10日，英精锐部队远东茅尖步兵营以及第99辜加步兵营均陆续到达，起义武装迅速被镇压下来，素里亚油田及砂拉越林梦地区虽为起义军占领，最终在三天内也被英军夺回。到12月17日，起义军基本上已全被瓦解。40名起义军战死，3400名被俘捕，少数逃往印尼西加里曼丹，起义军领袖雅辛·阿凡迪（Yassin Affandi）受伤被捕，起义以失败告终。汶莱人民党主席阿查哈里因身在国外，得以幸免被捕，后逃往椰加达受苏卡诺政权政治庇护，成立北加里曼丹合众国。接着，汶莱苏丹立即宣布关闭立法议会并提出退出大马计划。参阅Vernon L. Porritt,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Sarawak 1940–1990* (Melbourne: Monash Asia Institue, 2004), pp.84–85；陈剑，〈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简述〉，载《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2年），页18–24；陈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反殖左翼运动与马来亚、印尼及北婆三邦的关系与互动〉。

马政权借机发动全面镇压行动，在新、马、砂拉越展开大逮捕与封禁左翼组织的行动[47]。在新加坡，由内安委员会主导的“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先后逮捕了106名社阵、工团、农会、学生、文化团体的中坚分子，一举严重摧毁了左翼的有生力量[48]，为马来西亚合并铺平了道路。新加坡于是顺利地在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为马来西亚的一员。

在法理上，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加入马来西亚，必须最终由英国殖民部批准。1961年7月，英联邦国家国会联盟（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49]在新加坡举行会议，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砂拉越、北婆罗洲（即沙巴）与汶莱的代表参与，同意并批准了所提呈的马来西亚合并的各项原则[50]。英国同意了这个合并计划，但保留其对新加坡基地的控制权，条件则是它必须获得这些地区人民的认同，合并公投（Referendum of Merger）作为竞选课题并赢得71%的票选。

然而事与愿违，加入马来西亚后的新加坡面对中央政府的诸多刁难，纷争不休。巫统通过其新加坡代理人先后借机发动两次种族暴乱，一次发生在1964年7月21日，另一次在1964年9月2日，意图制造新加坡地方政府无能管理而采取中央派兵干预的行动。但在短短的数天内，种族暴乱便受到控制而使中央失算[51]。

行动党也在马来半岛组织起民主行动党（简称民行党）与巫统抗衡。其实，行动党的打算是希望以民行党代替马华成为联盟的一分子，但巫统并不信任李光耀。事实上，联盟各

相关人物

吴作栋　王鼎昌

历史事件

1月1日

新一代领袖接班，吴作栋、王鼎昌分别出任第一、第二副总理

[47] 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于1958年8月宣布紧急状态结束，却于1960年6月7日颁布“内安法令”及“1960年紧急状态条例”取代“紧急法令”，并继续拘留在紧急法令下被逮捕的67人，其中包括反对党成员与左翼人士，如：劳工党中委及吉打州分部主席钟奕文、人民党中委兼怡保支部主席汤毅、吡叻州分部副秘书袁富棠、马来亚普通工联四君子黄乐群、黄芝春、陈行水、黄振泉等。8月1日，“内安法令”正式生效，当天就逮捕了劳工党柔佛州东甲支部秘书吴恩。同年11月5日，以内安法令再行逮捕包括社阵副总秘书兼人民党中委许傅义、马来亚黄梨工联总秘书苏炳春等20多人。1961年1月14日，又再逮捕雪兰莪州士毛月新村8名青年；四天后，又逮捕槟城人民党党员郑春云；2月6日，再逮捕人、劳两党槟城分支部要员林有进等5人；两天后，再逮捕崔方平等5名社阵要员。1962年3月4日、8月2日、8月12日、11月19日、11月21日、11月30日，隔三差五连串逮捕了包括文德甲市议员林作栋在内的人、劳两党彭亨、雪兰莪、威省等地方支部及工运要员9人。1962年12月16日的逮捕行动规模最大，全国共扣留超过50人。参阅朱齐英编著，《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1972）》（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出版，2001年），页222-227。

[48] 面对新马强大的反马来西亚左翼势力，由英殖民政权操控的“内部安全理事会”，以英、新、马三方拟定的逮捕名单，于1963年2月2日以代号“冷藏行动”的镇压行动，实行对新加坡政党、工会、农会、学生、文化团体及个别左翼人士进行全面大逮捕。新加坡拟就的名单人数多达250人，而马来亚所提呈的名单只有25人。英驻新总督认为新马两地政府所提呈名单人数过多，旨在打击反对党，并认为其中许多人其实进行的是合法的宪制斗争的左翼人士而非共产党人。讨价还价的结果，各方同意的名单减至110人，最终逮捕106人。参阅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FED 115/416/01 "Internal Security – Singapore" 1963-65; CO 1030/1573 Documents 31 and 32; CO 1030/1576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 Singapore (1963-65)", pp.142-230; "U.K. Lord Selkirk Secret Letter to Duncan Sandy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ated 27 July 1962," CO 1030/1158 "Singapor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 1962," pp.161-62; 以及Geoff Wade, "Operation Cold Store: A Key Event in the Creation of Malaysia and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ingapore," Presented at the 21st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21-25 June 2010, Singapore; Poh Soo Kai, Tan Kok Fang and Hong Lysa, *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 (Kuala Lumpur: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Pusat Sejarah Rakyat Malaysia, 2013).

[49] 英联邦国家国会联盟原称帝国国会联盟，产生于英国，成立于1911年。后澳洲、纽西兰、加拿大、格陵兰、南非等加入。1948年改为现名，并扩大以包含英联邦九个区域：非洲、亚洲、澳洲、英伦各岛及地中海、加拿大、加勒比海、美洲与大西洋、印度、太平洋与东南亚。

[50] 同意新加坡与其他区域，因其人口组成与英帝国的远东军事利益而具有其特殊性，新加坡保有金融、教育与劳工的自主权。条件是新加坡公民并不能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以及仅获得15席联邦国会的议席和代表权，还须缴纳其总收入的40% 给中央政府，而新加坡保有自己的政府与行政权力。参阅 "Memorandum Setting Out Head of Agreement for a Merger betwee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Parliament, Cmd. 33 of 1961, paragraph 1, 5, 14&15以及Federation of Malaysia: Joint Statement by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U. K. Cmd. 1963.

[51]《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610-623；《白衣人》，页257-265。

政党在骨子里都是贪污腐败的政党，在利益上分赃取赂、实行朋党主义，与行动党的反贪政策格格不入，自然难与合作。在1964年即将来临的大马普选时，李光耀提出了一个震撼巫统的政治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口号旨在于针对不合理的马来西亚宪法，特别针对马来人特权而发。

1965年5月9日，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召开"马来西亚团结大会"，在会上成立了"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机构"（Malaysia Solidarity Council，简称 MSC）。其成员包括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马来半岛及各地的联合民主党、人民进步党、砂拉越统一进步党及马真达党等非马来人政党和组织。MSC以"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非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为口号，号召马来西亚联邦内的各界人士广泛参与[52]。

当时马来西亚各族人口的比例来看，华人人口的总数与马来人的人口总数几乎相等，是42%比42%，如加上18%的其他种族的人口，则马来人在人口总数上的劣势分明。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机构对马来人组成的中央政府构成极大的威胁。宪法或将修改，马来人的特权或将取消。巫统感觉到它的权威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警告新加坡政府不得干预中央政府事务，更不能试图篡夺马来人对马来西亚的领导权。

为应对这严峻的局面，巫统领导人认为只有让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经过数次紧急协商，终于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政府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被逐出马来西亚。在英美等国际的支持下，新加坡无奈宣布独立。

从新加坡加入直到被逐出马来西亚，虽然历经镇压和逮捕而元气大伤，新加坡马共地下党与左翼仍然没有停止为争取独立而奋斗。他们依从马共纲领，坚持为实现马来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目标继续展开斗争。但2·2大逮捕过后，左翼基本上处于半地下的活动状态，也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再因执行过左政策，内部呈现分裂状态以致协调欠佳而对政治形势变迁的反应产生矛盾[53]。典型的事例如三个口号的论争[54]。后来更逐渐受激进思维影响，采取冒险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宪制斗争路线，退出国会，大搞议会外群众斗争[55]，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推动斗批改运动自我消解并削弱左翼的力量，以致左翼运动逐渐式微。

1959年6月的全民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成为执政党

[52]《白衣人》，页268–272。

[53] 厂商工联总务于其1965年的会务报告中总结："……我会步入第11年代的开始，也是整个左翼运动面对最严重考验的时刻。左翼运动现阶段所面对的考验不仅来自反动派，更严重的是来自左翼阵营内部因意见分歧而发展至不可调和的局面"。

[54] 三个口号的论争：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后，随即展开国民服役登记。马共地下鉴于1954年5·13的经验教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新加坡前线的曾福华发出原则性登记的号召，但社阵主席李绍祖却发出杯葛的号召引发争论。后来，在印尼的马共地下第一把手方壮璧支持李绍祖而作罢。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双方纷争不断，代替泛星工联的厂商工联的负责人陈辛撰文呼吁新加坡退出大马，李绍祖立即以粉粹大马批驳，引发第二轮论争。1965年3月15日，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成立并发出宣言，其副题便是"为粉粹马来西亚，实现马来亚真正独立而斗争"。当新加坡被逐出大马时，陈辛撰文欢迎新加坡独立，立即遭遇李绍祖的批判，认为新加坡的独立为假独立。方壮璧再次背书了李绍祖的批判。

[55] 1965年8月10日李绍祖率领9名社阵国会议员集体退出国会，正式启动议会外群众斗争路线。

另一方面，新加坡人民在独立后，立即要面对的是生存与发展的严峻考验，当政者必须摈除一切不利因素，以生存危机取代政治意识形态，以务实政策治理国家，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工业，解决民生问题，积极建国。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在宪法上仍然必须妥善处理。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制定了马来西亚宪法新加坡修订法案（Constitution of Malaysia（Singapore Amendment）），以转移所有立法与行政权力给新加坡。但其中仍然保留马来西亚联邦法院的最高权力，经交涉再第二度修改后，新加坡国会在1965年12月22日通过了这个修订法案。接着，新加坡提呈并通过了新加坡独立法案（Singapore Independence Act（R.S.I.A）1965）在法理上，新加坡才真正具有独立的意义。

星加坡脫離大馬 宣佈獨立爲國家

星加坡政府宣言

星加坡脫離大馬兩政府協議全文

政府發表宣言昭告全民
强調新立國原則
將遵循正義自由

星加坡永爲自主獨立民主國家
華必爲人民大衆追求福利快樂

政府內閣改組

李總理 [illegible] 接見本外國記者
披露星加坡獨立
將與所有國家留
包括中國蘇聯印尼及東
與馬來西亞依舊保持

張許星脫
新修正法

1965年8月10日（星期二）《星洲日报》报道新马分家的新闻

作为小岛城市国家，类似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生存是新加坡第一要务。在激荡的东南亚马来海洋、以及国际地缘政治与军事汹涌浪涛中，对于一个华族为主的弹丸孤岛，国际纵横与睦邻和谐共存是首要策略。严重缺乏资源、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努力争取国际投资、走高新科技工业道路以解决人民温饱和经济繁荣，绝对是任何时期的当急之务。新加坡从1945年至1965年这20年中便获得独立建国，也是历史的异数。

相关人物

郑章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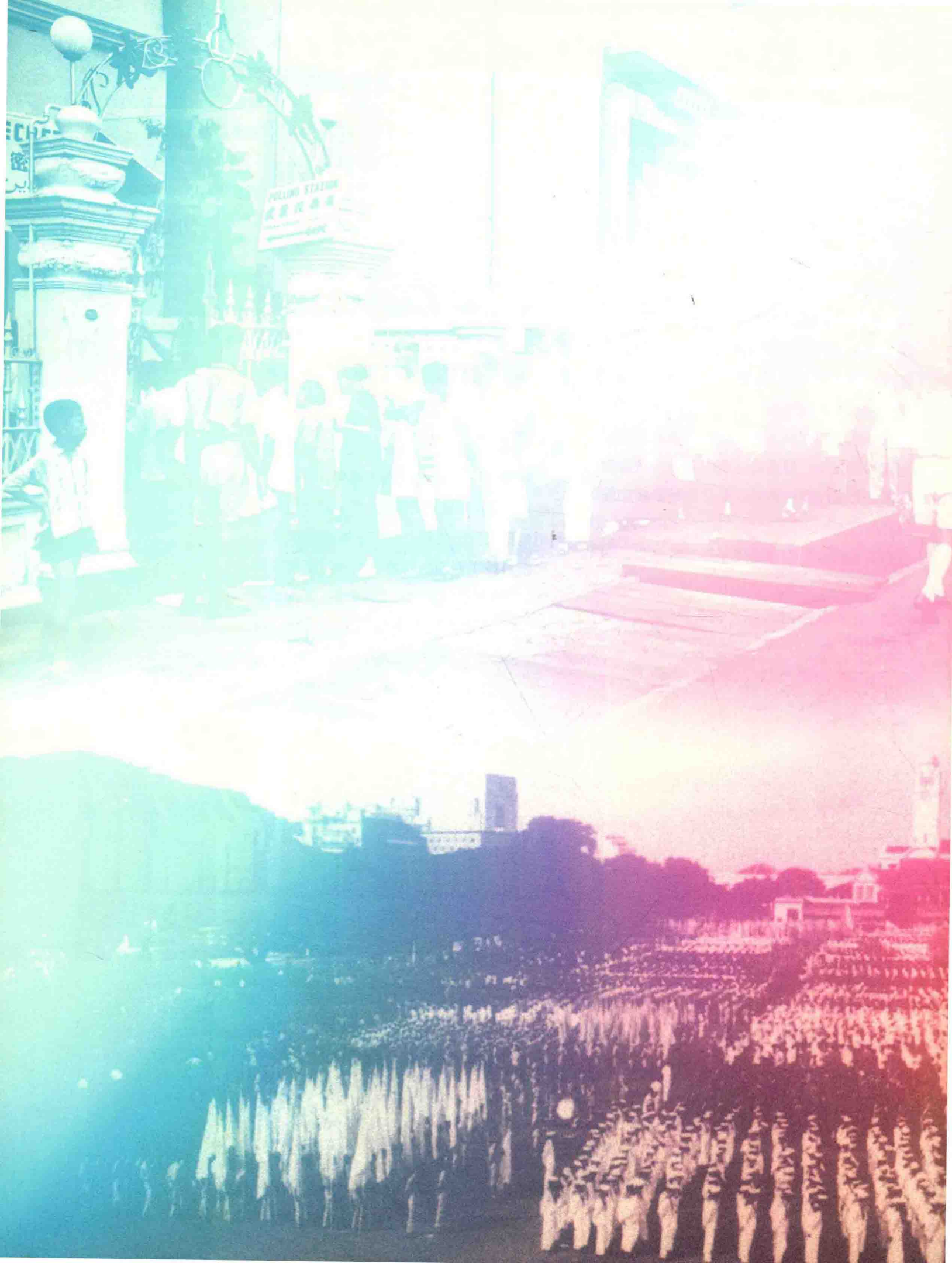
历史事件

3 月 15 日

发生新世界酒店塌楼惨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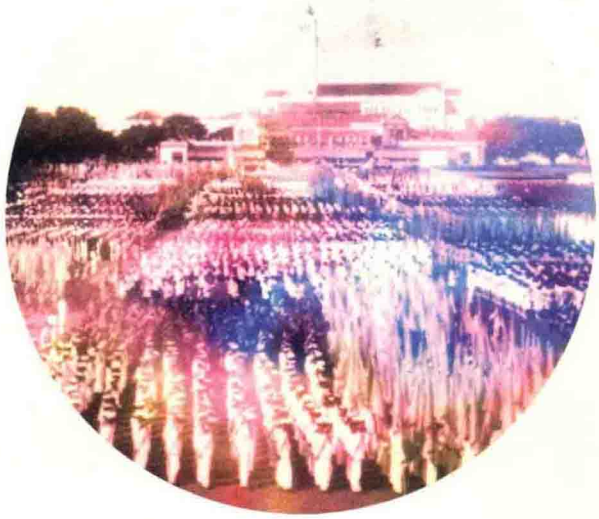
12 月 14 日

原任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因涉及百万元贪污案受调查后，留下一封遗书自杀


POLLING STATION

第十六章

建国之路
Road to Nationhood



第一节 选贤任能
——历届大选与政治演进

摘要

在1955年实施的林德宪制，外来华族移民能登记成为选民，改变了1948年新加坡被称为“印度人的选举”的第一次选举形象。1959年自治邦的选举，华族选民，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促成了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1963年的选举，巩固了行动党独大的统治地位至今。

Abstract

The Rendel Constitution in 1955 paved the way for Chinese immigrants to become voters. This has transformed the profile of voters substantially. As a result,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in 1959 was elected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t has become a dominating party in the Parliament since 1963.

林金圣（**Lim Chin Seng**）

新加坡政府大厦旧影

1945年，英国人从战败的日本占领军手中接收了新加坡，继续它的殖民统治。在经过两年后，英国殖民统治者在面对二战后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殖运动，因此想通过部分民选立法议会选举的方式，来缓和人民反殖民统治的浪潮。

虽然新加坡建国只有50年，但选举却有67年的历史。从1948年的第一次选举到2011年，共举行了16次选举，其中5次是在独立之前举行的。本节通过探讨历届选举的历史，分析华族在新加坡政治演进中扮演的关键性作用。

独立之前的五次选举

第一次选举是一个以印度人为主的选举

1948年新加坡举行历史上第一次选举，目的是要在一个22人立法议会席位中选出六名民选代表。这次的选举有投票权的选民，只局限于占人口10%的英籍民。而大部分的华人移民与土生马来人都没有投票权。因此，这次的选举遭到马来亚民主联盟（新加坡的第一个政党，成立于1945年）的抵制，原因是在1947年所进行的选民登记，许多马来人及来自中国的移民，都不能参加登记。这个抵制使这次选举的代表性与意义大大地降低。

参加这次选举的只有一个成立才七个月的新加坡进步党，派出5名候选人与10位无党派的独立人士竞选。当时登记的合格选民有2万2239人，除了英国侨民，占人口仅7%的印籍选民却占了全部选民的45.3%；而占人口超过一半的华人却只有25.1%。在候选人中有超过一半为印度人，只有四人为华籍；当选者也超过一半为印度人，因此历史学者形容这次的选举是“一个以印度人为主的选举，竞选活动枯燥无味”[1]。选举结果进步党获得3席，另3席归独立人士。

这次选举的民选议员只占议会人数的25%，使这次选举的点缀意义多于实质的意义。

第二次的选举是在1951年4月10日举行，距离上一次选举只有三年，目的是要增加民选议员至9位，使议员总数增加至25名，有资格的选民在扩大投票权后虽然比上次多了一倍半，但登记投票的选民反而少了3.1%。

参加这次选举的政党除了原有的进步党外，就是成立于1948年的劳工党，参选的候选人共有22人，印度人却占了15人或68%。大选的结果，印度人也在9席中赢得了4席。同样的这还是一个以印度人占优势的选举。这次大选的唯一意义是将民选的议员人数增加到9位，但民选议员人数还是只占议席的1/3。

这两次的选举绝大多数的本地人都没有投票权，因此只能说是让本地人了解选举的意义与操作，谈不上什么代表性，尤其是让一个少数族群占优势的选举。但在另一方面，随着选举的举行，更多政党开始成立，开启了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序幕。

英国殖民统治者举行这两次的选举，目的当然不是要结束它的殖民统治，相反的是希望延长它的统治。政治学者认为“英国殖民统治者在面对风起云涌的世界性民族主义的反殖民统治运动，要求独立自主浪潮的冲击下，了解到殖民主义的末日屈指可数。为了缓和逐渐高涨的反殖民地运动，同意在新加坡实行一个有限度的地方政府并成立立法议会”[2]。这个做法有效地延缓了反殖运动的浪潮，及延长了其殖民统治。因为人们转移了目标去争取几个非常有限的立法议会议席。“这种做法促成了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到过外国的留学生，成立政党以参加立法议会的选举”[3]。

---

[1]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Singapore, 1945–1955*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261–266.

[2] Hussin Mutalib, *Parties and Politics–A Study of Opposition Parties and the PAP in Singapor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2.

[3] Yeo Kim Wah, *op.cit.*, p.87.

1955年林德宪制的选举：华族选票增加，扭转政治变数

第三次的选举是在1955年举行，也就是所谓的林德宪制选举（Rendel Constitution）。殖民地政府在1953年时，委任一个以退休法官林德爵士（Sir George Rendel）为首的委员会来拟定宪制报告书，目的是要为新加坡的自治作好准备，及订立一部自治邦宪法。报告书建议将目前的行政议员改为九个部长，负责各有关部门的事务。部长会议的主席由总督担任，首席部长则由民选的议员出任，负责除了外交、国防与内部安全外所有的政务。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有限度的方案，英国人只让民选的政府负责一般的民政事务。

林德宪制进一步扩大了选举投票权，大批的新加坡华人移民因此都获得投票权。许多在过去被列为没有资格登记的外来华族移民，及许多不懂英语的受华文教育者，都在选民登记制度下成为合格选民。这些来自不同背景选民人数的增加，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加上不同背景与种族政党数目的增加，改变了过去以印度人为主的政治生态。使这次的选举有一个新的政治变数，那就是华人选票崛起为单一最重要的票源。

这个改变使选民人数更能反映当时人口的结构。选民人数的构成为华族选民占55.5%，印度族选民占18.4%。华人虽然在人数上崛起成为一股新政治力量，但因动员机制尚未全面建立与民智未开，在这次的选举还未能充分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但选举结果预示了讲华语的工人与学生运动，已经逐渐崭露出两股壮实的政治势力。

参选政党共六个，除了原有的进步党与劳工党外，还有新成立的劳工阵线、人民行动党、联盟党与民主党，其中进步党派出22位候选人，民主党也派出20位候选人，使全部的候选人达到79位。“从参选的人数来看，很明显的进步党与民主党有意夺取政府的执政权”[4]。

选举的结果是获得印族工人阶级与初级公务员工会的支持的劳工阵线赢得10席，占全部席数的40%，是获得最大胜利的政党，但得票率只有27%。这证实了讲英语印族工会的真实政治势力，与当时以族群聚居选区划分的弊端。而参加过二次大选及派出最大阵容的进步党只赢得4席，原因是低估了林德宪制对政治环境改变，缺少华文教育者支持的政治后果。相反的第一次参选的人民行动党，虽然只派出4位候选人就获得3席。除了得到拥有强大基层的左翼团体支持外，也得到许多受华文教育者的拥护。因此，人民行动党可以说是华人选票增加后的最大受益者。

1955年立法会议选举的结果，预示了华族工人运动与华校学生运动，已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可以抗衡讲英语社会在新加坡政治上的传统优越地位。进步党与民主党的失败，说明了华社选票的作用。

由于没有政党在大选中取得多数，劳工阵线与联盟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并由劳工阵线领袖马绍尔（David Marshall）出任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位首席部长。

这次大选与前二次大选有很大的不同，候选人的背景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过去以印族为主导转为以华族为主，出生地也由海外转为以本土出生者为多。在语言方面，从单语占绝大多数到懂双语人数的增加，在职业方面则从专业人士转为以商人占多数[5]。这些变化对后来新加坡政治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次的选举也掀开了一个多元政党政治竞争的开始，为后来的大选奠定了基础。

[4] Yeo Kim Wah, *op.cit.*, pp.261–262.

[5] Yeo Kim Wah, *op.cit.*, p.269.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3月

政府宣布新人口政策，每家至少有三子女，以扭转人口老化趋势

总结新加坡在1945年至1955年的政治发展史，许多政党相继成立，促成在这时政党的成立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是日本在二次大战时侵略东南亚国家，打破了英国殖民统治者在新加坡人眼中的优越地位，加强了人们的政治意识；另一个因素是英国人希望通过民主的方式将政权和平地转移，因此鼓励人们组织政党参加大选。实际上英国人的做法，是希望通过选举的方式，让本地人参与政治，从而消除当时马来亚共产党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对当地人民所产生的影响。

1959年自治政府选举：人民行动党取得压倒性胜利

1959年的大选是为成立新加坡自治邦的选举，以选出51位全部民选的立法议院。参加这次大选的政党多达10个，人民行动党是唯一参加所有选区竞选的政党，其次是新加坡人民联盟（由劳工党与部分自由社会党的党员组成），共派出39名候选人；自由社会党也派出了32名候选人；新加坡联盟则有39人参选，包括其他只派少数几个候选人的政党及独立人士，使参选的候选人数达到194名。

由于这次大选是为新加坡成立自治邦的一次大选，各政党都为了争取这个统治国家的机会，因此竞选课题主要集中在如何治理国家。人民行动党雄心勃勃，除了参加全部议席的竞选，也提出它详细的治国理念与纲领《当前的任务》，同时提出清廉政治概念来打击执政的劳工阵线政府的贪污与无能，使人民相信它可取代劳工阵线政府。由于当时的劳工政府被指腐败与无能，这个清廉政治的主张受到大众的欢迎。加上这时人民行动党在市议会的工作表现杰出，赢得人民的赞赏。

人民行动党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取得51席中的43席，“是人民对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信心，有效的竞选策略，及能提出一个实际与令人信服的政策与方针”[6]。人们对人民行动党的信心，主要来自它在1957年管理市议会时所采取的大刀阔斧手段，改进工作效率，铲除贪污及为人民办实事的作风，赢得人民的信任。当时的市议员史立华说：“人民开始相信，虽然市议会的权力非常有限，但人民行动党却为人民做了许多的事，因此如果让人民行动党组织政府，将可能为人民做更多的事”[7]。因此，一个完全没有执政经验的人民行动党，凭着市议会的政绩与政策便赢得了1959年的大选。

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在1957年，殖民地政府对公民权法令作出的重大修改，让许多不在新加坡出生的华人获得公民权，成为合格选民。“这些华人大多是来自中国受华文教育的移民，他们及他们的家庭都是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支持者。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压倒其他十个政党，主要的支持力量来自这些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8]。此外，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左翼团体的支持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其他参选的政党曾在政坛上显赫一时，并在过去的二次大选中赢得席位，但选民结构的改变，分散了他们的支持力量，使人民行动党能够突围而出，在自治政府的选举中第一次赢得执政权。

其他参选政党虽然也企图通过合并或改组的方法来增强力量，如进步党与民主党合并成为自由社会党，新加坡人民联盟由劳工阵线与部分自由社会党员组成，以应对与对抗来势汹汹的人民行动党。“这些做法并不能达到效果，因为这些政党主要由一批受英文教育者所组成，他们在反殖民地的目标上并不一致，有人希望成为接棒的一代，另一些人则要争取建立一个社会平等与种族平等的社会”[9]。但他们都忽略了选民结构的改变，受华文教育的选民人数已大量增加，足以形成一个大的政治变数。这个政治变数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下，让人民行动党能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虽然只有53.4%，但却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相对多数决的计票方法是造成这种席票失衡的主要原因。这种的计票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这次大选的重要意义在于表现了新加坡人民对谁应在

---

[6] Bilveer Singh,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Singapore* (McGraw Hill Education (Asia), 2007), p.8.

[7] Yap Sonny, Richard Lim & Leong Weng Kam, *Man In White–The Untold Story of Singapore Ruling Political Party*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2009), pp.141–142.

[8] 黄庭康，《比较霸权 – 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台北：群学出版社，2008年），页63 – 66。

[9] Seah Chee Meow, Para Political Institution. Cited in John ST Quah, Chan Heng Chee & Seah Chee Meow (Edit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of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立法议会内代表他们的立场上，给殖民地政府发出了明确的讯号。大选的另一个意义是它所采取的二项措施：一是所有新加坡人所使用的主要语言，包括华文、英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在立法议会中都享有平等的地位；其次是实行强制投票，对新加坡政治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各种语文的平等使用，为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国家的建设，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强制投票使新加坡历届大选的平均投票率达到93.4%左右，这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作用很大。

第五次选举："冷藏行动"与"鹬蚌困局"决定新加坡未来

新加坡第五次大选，是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的一次大选，在1963年9月21日举行，这时新加坡已是马来西亚的一州，也是人民行动党在1961年7月与左翼势力分道扬镳后所面对最大一次的挑战。"这次大选也是人民行动党争取生存斗争的开始，因此，动用了所有政府的资源，来与社会主义阵线决斗"[10]。

大选是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合并的第五天之后举行，参加的政党共有8个，人民行动党还是参与所有选区的唯一政党，参加的候选人多达210人。这是历来最多人数的一次。从参加的政党看，表面上是四大政党之争，但实际上是人民行动党与社会主义阵线之争。

大选的结果：人民行动党赢得51席中的37席，但得票率47%比上一次少了7.1%。社会主义阵线尽管面对"冷藏行动"，在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遭逮捕的情况下，仍赢得13个议席及33%的得票率。地于社会主义阵线的败选，学者将它归咎于"冷藏行动"的大逮捕。英国学者Bellows Thomas认为"1963年2月的'冷藏行动'大逮捕，是社会主义阵线败选的主因，这次的大逮捕包括它的执行委员会人数的一半，主要是负责组织、出版及宣传委员会的成员，使政党的运作近乎瘫痪"[11]。此外，"根据当时的报章评论员都同意，人民行动党的胜利，不是因为它的实力而是选票被分散了，人民行动党其实只在20个选区赢得多数，另外17席的选票被人民统一党分散了。因此将这二党（社阵与统一党）的票数加起来，有另外21个区的票数是超过人民行动党"[12]。从大选的结果看，也是从行动党分裂出来的人民统一党，的确分散了不少反对票，使社会主义阵线的票被分散了。这是多数决选举制的另一个主要缺点的鹬蚌困局。

社会主义阵线虽然是刚从行动党分裂出来的政党，它在1961年的大罢工事件中，展示了它动员群众支持的实力。如果不是因为"冷藏行动"的大逮捕及选票被分散等因素，社会主义阵线或能取得更多席位。

1963年大选的激烈情况，是到目前为止已成为绝响的大选，是选举史上反对党挑战人民行动党最激烈的一次。自此以后，再也看不到这种激烈的场面。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在分裂时，失去了大部分的党支部与基层党员，整个党部近乎瘫痪。因此，利用新组成的基层组织，如公民咨询委员会、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的力量来助选，这些基层的领导人主要来自华社。

1963年的大选的另一重要意义是，两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政党，一个是由社会主义阵线所代表的亲左翼势力，另一个是由人民行动党代表的中间偏左力量的斗争，在接下来的大选中已不能再看到。意识形态不再是新加坡未来竞选的课题。

[10] Bilveer Singh, *op.cit.*, p.9.

[11] Bellows Thomas,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 Emergence of Dominant Party System*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Monograph Serious, 1973), p.92.

[12] Yap Sonny, *op.cit.*, p.225.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5 月 18 日

国会通过集选制提案，来届大选开始实施

早年国会开会的场景

独立后的十一次选举

1968年、1972年、1976年与1980年：一连四届一党独大

1968年的大选是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举行的第一次大选，社会主义阵线在势力瘫痪的情况下，选择以抵制大选作为抗议。因此只有工人党与独立人士共7名候选人参选。这是历届选举中参选政党、候选人数与竞争选区最少的一次。人民行动党除了在提名日就蝉联执政外，在大选时也赢得了其他7个席位与历来最高的得票率84.43%。这次的大选掀开了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及国会中没有反对党的序幕，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并将它归咎于社阵抵制的结果。但抵制大选固然缺少了竞争，对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有影响，但却不会影响它的结果。这次大选之所以会形成一面倒，除了竞选对手太弱太少外，英国人在1968年1月16日发表《防务白皮书》，宣布英军将从新加坡撤退，并在1971年底之前完成撤出，新加坡人民在撤军的危机阴影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处理。人民行动党以这个“生存危机”及过去九年的政绩，作为竞选课题要求人民的委托，才是人民行动党赢得全部议席的原因。在这次的选举中，虽然只有7位反对党候选人参选，却有3位失去按金。这个结果证明了“在生存危机的阴影下，新加坡人民给人民行动党的支持是非常明确与坚定的”[13]。人民行动党的领导领悟到人民害怕生存危机的威胁，就经常在后来的大选中，以国家的“生存危机”作为竞选策略，并以生存危机来说服人民接受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

1972年的大选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阵线的复出，社会主义阵线主席李绍祖医生解释：“过去的抵制行动已暴露了人民行动党的法西斯性质及假独立的事实，为了争取正义，民主与自由，必须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14]。我们无法从这个口号式的解释来理解它从抵制到复出的理由。

选举的结果是人民行动党再度获得全胜，但得票率比上一届下降了16%，回到正常的70.43%。这次选举获得最高得票率的反对党，却是代表马来民族利益的政党——马来民族机构，因为它只参加2个马来民族较集居的选区，这使政府对民族集居产生了顾虑，而实施了组屋区内分散种族集居的政策。

人民行动党得票率的降低，除了有更多的政党与侯选人参加，分散了中间选民的票数外，另一个原因英军撤出所带来的影响，并没有政府原先所说的那么严重，“生存危机”的影响作用已逐渐减退。

社会主义阵线重新复出，但却只取得24.1%的得票率，从社会主义阵线所获得的得票率来看，社会主义阵线显然已没有大的作为。它错误地估计了主客观力量的对比，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贸然走上进行议会外斗争的革命化道路，结果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而从此一蹶不振。1988年大

[13] Stephan Ortmann, *Managed Crisis: Legitimacy and the National Threat in Singapore* (Deutschland: VDM Verlag Dr Muller, 2009), p.36.

[14] *The Straits Times*, 17 April 1968.

选前主席李绍祖医生宣布全体党员加入工人党，社阵从此在新加坡政坛上消失。

这次大选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社会主义阵线重新复出，只取得24.1%的得票率，说明它为先前所做的抵制大选行动付出了代价，失去人民的信任；其次是81名反对党候选人中有20位失去了按金，其中联合国民阵线就占了17位，说明了候选人素质差与没有明确目标政党的候选人，无法获得人民的支持。

尽管经过两次的全军覆没，仍有7个反对党参加1976年的大选，其中有3个是新政党。这3个新政党虽然都是第一次参加大选，但它的候选人很多是一些政坛老将，曾经参加过不同政党。

大选的主要课题是民生问题，如医药费、水电费及教育政策等。由于没有重大的国家课题，人民行动党将宣传重点放在政府的效率，及为人民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选举结果是人民行动党再次囊括所有的议席，并在得票率方面增加了2%至72.4%。

人民行动党第三次一党独大，取得国会中所有国会议席。主要原因是反对党太弱，没有一个有能力与人民行动党较劲，虽然他们组成了新的政党，但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做法，已在上次的大选中为人民所唾弃。重施故技照旧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成为反对党领导人的詹时中，在这次大选中以独立候选人孤军作战，挑战人民行动党的资深部长。由于他是一名年青律师故成为这次大选的新闻焦点之一。说明了人民盼望有素质反对党的出现。

1980年大选参加的政党共有8个。人民行动党在提名日就不劳而获37个议席，只差一席就能执政。这次参选政党虽多，但候选人却不多。人民行动党在这次大选派出15位新人参选，进行较大规模的人才更新计划，在连续执政21年后，人民行动党已为长期执政作准备。

反对党的主题又回复到最基本的课题上，那就是国会中应有反对党来制衡政府的功能。刚成立民主党的詹时中，以一党独大的危险与弊端，呼吁国人支持国会中应有反对党，显然未获人民的支持。人民行动党则以人才更新为主轴，第四次获得全胜的纪录。

人民行动党第四次在国会中一党独大，得票率也比上一次大选增加了3.2%，这主要是人民行动党在这次大选中以接班人为主题，推出了许多有实力的新人，显然获得人民的认同。

这四次的大选，人民行动党都取得全胜，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它连续四届一党独大？笔者认为人民之所以一而再选择人民行动党，除了反对党太弱别无选择的原因外，也因为它的政绩取得了人民的认同及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

1984年大选：反对党第一次打破一党独大

1981年的安顺区补选，工人党的惹耶勒南（J. B. Jeyaretnam）中选，打破了连续四届国会中没有反对党的局面。“1981年的补选，让反对党进了国会，虽然对人民行动党在国会中的地位，影响微不足道，但却鼓舞了反对党的士气。那就是他们可以在选举中打败人民行动党，惹耶勒南的效应却是一个简单的讯号，人民行动党不是所向无敌的”[15]。反对党呼吁国会中应有反对党，开始有了反应。为此，执政党在这次大选中推出非选区议员制，以回应人民希望国会中有反对党的愿望。

1984年的大选是在12月22日举行，这是安顺补选后国会里有了反对党的第一次大选，让反对党充满了希望。但对人民行动党而言，经过了安顺补选的震荡后，小心翼翼地策划这次大选，虽然它在提名日已不劳而获30个席位。

[15] Bilveer Singh, *op.cit.*, p.170.

这次参选的政党共有八个，派出最多候选人的是工人党（15人），其次是统一阵线（13人），人民行动党再次派出26名新血参加竞选。

这次大选的主要课题有二，一是提取公积金的年龄提高到60岁。这是一个以候永昌部长担任主席，为解决人口老化的报告书的许多建议之一，在这次大选中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另一个是精英主义与人才的问题，因为在大选之前政府实施了两个颇受争议的政策，一个是由李光耀所提议的大学毕业母亲的孩子，可以在小学入学时享有优先权。一个是给低收入与受教育较低的母亲，在生育第二胎后实行节育手术，可获得1万元购置政府组屋的辅助金。许多人认为这是歧视社会中弱势群体与违反公平的原则。

由于有了这些具争议性的课题，使得反对党在安顺区与波东巴西区取得胜利，这是自新加坡独立后，连续四届大选反对党在大选中赢得席位的第一次。更令人民行动党感到意外的是，它的得票率一举下降了13%，而工人党与民主党都取得高得票率，并在6个选区中以高票落选。因此人民行动党意识到，必须在选举制度上作出改革。李光耀在选举结果公布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要认真考虑改变一人一票的制度。

政治学者认为这次大选“是人民行动党与人民之间的分歧，人民行动党按照他们统治新加坡的长期计划，实施了一些大胆的政策，他们要使新加坡成为一个达到瑞士水平的发达国家。因此，他们要求新加坡人民一同朝向这个愿景，而不是以眼前的利益来投票。另一方面，选民则要解决眼前的问题，由反对党所提出的两大竞选课题，大学毕业母亲的优先政策及延后提取公积金的问题。还有组屋价格的高涨达38%，及人民行动党家长式的统治作风等问题”[16]。这次大选反对党在竞选区的得票率大幅度提高，其中民主党与工人党的升幅最大达到45%及41%，马来民族机构35%。但学者认为，“反对党得票的增加并不是由于人们要选择反对党的替代政策，反对党并没有这个能力，而是要针对政府的统治作风及一些颇具争议性的政策”[17]。

针对马来民族机构的高得票率，李光耀在大选后的记者会上说：“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马来民族机构，（如果）非马来人不投它一票，这个种族政党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票数。换句话说，华人已改变对这个政党的看法”[18]。但在下一次大选时，他却以相反的理由推出了集选区制。

这次的大选第一次实行非选区议员制，两位高票落选的反对党候选人都反对这个制度而放弃，使非选区议员制因此受挫。《海峡时报》对反对党的做法表示赞同，它说：“从短期来看，工人党可以在国会中得到一个席位。但从长期看则是没有实质效果的，如果去接受一个不是赢得的席位，反对党的信用会受到质疑，同时人们也将他当作是一个次级的反对党议员”[19]。

1988年大选：第一次实行集选区制度

1988年的大选在9月3日举行。经过了上次大选的低得票率及国会中有两名反对党议员后，政府第一次实行选举制度的重大改革——集选区制度，将81个选区划分为13个3人一组的集选区，及42个单选区。

在反对党方面，由于受到1984年选举结果的鼓舞，派出了自1963年大选以来最多人数参选，由于新设立的集选区对反对党不利，因此把主要目标集中在单选区上。参选的政党有7个，候选人数达到71名，人民行动党不劳而获的席位只有11个。

这次大选反对党主要是针对拟议中的市镇理事会、民选总统的选举，与集选区制度等有关的课题。而人民行动党在这次大选中再次推出17名新血，作为该党人才更新计划的一部分。

由于集选区制度的设计有利于大党，使人民行动党在这次大选中，在得票率下降1.66%的情况下，还能赢得81席中的80席。民主党的詹时中在波东巴西区保住他的议席，而工人党的惹耶勒南因失去竞选资格没能参选。

《联合早报》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选举，是新加坡选举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行动党大部分元老已经退出政

[16] Lee Boon Hiok, "Singapore in 1984", *Southeast Asian Affai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5), p.300.

[17] *The Straits Times*, 30 December 1984.

[18] *The Straits Times*, 5 January 1985.

[19] *The Straits Times*, 14 September 1984.

坛的第一线，选举后将由新一代领袖负起领导任务，带领新加坡人民走向未来的开始”[20]。

非选区议员制度，在这次大选后第一次为反对党接受。前社会主义阵线主席李绍祖医生，这次代表工人党在友诺士集选区以49.11%的高票落选，是最高得票率落选人，成了新加坡国会史上第一位非选区议员。

在上届大选中，反对党以高票微差落选的选区，绝大多数都在选区划分下被划入了集选区，学者因此认为，“集选区制度可以说成功地阻止了反对党取得更多席位”[21]。

1991年大选：反对党取得重大突破

1991年8月31日举行的大选，距离上次大选还不到三年，是历来选举间隔最短的一次。“大选提早举行，不仅让反对党措手不及，甚至连人民行动党本身的议员也感到有点错愕”[22]。这次闪电式的大选是吴作栋出任总理后的大选。由于他中途接任总理，希望通过大选获得人民的重新委托。

参加这次大选的反对党只有5个，并派出较少候选人，因为反对党之间在这次大选之前达成了竞选策略协议，只竞选少过一半的议席，让人民行动党在提名日就获得政权，这就是所谓的“补选策略”。反对党认为，既然人民愿意选择人民行动党执政，让人民行动党先取得执政权，然后在选举时就可以放心把票投给反对党。因此只竞选81席中少过一半的40个议席，让人民行动党在提名日时就不劳而获41个议席，获得继续执政。

这次选举的主要课题是市镇理事会的管理。人民行动党一再提醒组屋的居民，他们不仅仅是选出议会的代表，当选国会议员作为市镇理事会主席，也将负责维修与改进他们所居住的邻里。

在上次大选被剥夺选举资格的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指责政府提早选举是不要让他有机会参选”[23]。为此，总理提出补选献议，以反驳惹耶勒南不要让他参选的指责。

大选的结果令许多人意外，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60.97%创了一个新低，是独立以来最低的一次。反对党在四个单选区中胜出，其中民主党是最大赢家共获得三席。工人党获得一席，这是新加坡独立以来反对党所获得最好的成绩，也是行动党失去最多议席的一次。此外，反对党除了获得39%的得票率，中选的反对党议员有三位是华校背景。

大选的结果令人民行动党感到十分震惊。时任党主席王鼎昌认为，应认真看待华社的不满情绪，他说：“受华文教育者对政府忽略他们，及对受英文教育者的强烈要求所作的让步感到不满”[24]。华社与选举的关系再度浮现，并引起执政党的关注。

政府非常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及采取了补救办法。在大选后对华社进行了种种安抚工作，包括委派受华文教育的部长与议员组成小组，与华社团体进行联系与访问，这是华社在大选时再一次受到重视。

这次大选最大的赢家是民主党，除了获得三个议席，得票率也增加到48.6%，成绩令人刮目相看。但民主党后来出现党争，造成民主党的分裂，尤其是许多华校生党员相继离开，使这次的成绩成为昙花一现，并使民主党在接下来的大选的得票率每况愈下。

---

[20]《联合早报》，1988年8月23日。

[21] Tremewan Christoph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 (London Macmillan Press,1984), p.167.

[22] Hussin Mutalib, *op.cit.*, p.148.

[23] George Cherian, *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 (Singapore: Landmarks Book, 2000), p.87.

[24] *The Straits Times*, 27 November 2010.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0 月 27 日

马来西亚财政部长单方面宣布新马股市分家，影响许多股民

1997年大选：地方选举对抗补选策略

1997年大选的举行，距离上一次大选在时间上是最长的一次。政府用尽了五年的执政期，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在过去选举之间的间隔一般在四年左右。说明了1991年选举的结果对人民行动党产生冲击，使它对下一次大选的日期犹豫不决。

人民行动党在大选提名日即不劳而获47个议席，并以过半议席获得了执政权，很显然的反对党仍旧是应用旧的补选策略。人民行动党在经历了上届大选的补选策略的冲击，决定采用地方选举策略来应对。在选举之前各选区的议员纷纷公布各自选区未来的发展计划蓝图，让人民知道如果把票投给反对党，他们的选区将不能实行这些计划及从这个计划中得到好处。根据李光耀说，这个策略对选民来说具有更加深切的意义，因“赌注”增大了[25]。

大选之前政府再次修改了国会选举法令，将集选区的规模再次扩大与减少单选区，理由是配合社区发展理事会的需要。国会议员人数也增加到83人。修改后的集选区构成是6人组4个、5人组6个、4人组5个。单选区则从21个减少到只有9个。集选区的扩大，根据政治评论者的看法：“人民行动党为了确保统治权，使反对党变成‘跛脚鸭’的一种手段”[26]。

人民行动党共派出历来最多的24位新候选人，反对党方面也不落人后，国民团结党推出二位执业医生，工人党推出一位活跃于华社的执业律师。

大选的课题主要是组屋翻新的问题。人民行动党以大选与组屋翻新挂勾，凡是在大选中强烈支持人民行动党的选区，将能在组屋翻新的计划中获得优先进行。“显然的，为翻新而投票已淹没了其他选举的课题，并且有效的抑制了反对党的补选策略”[27]。人民行动党把组屋翻新与选举挂勾的做法引来美国政府的批评说：“任何地区的人民在行使公民权利时，不应对政府的反应感到畏惧”[28]。

为了进一步贯彻选举与组屋翻新的政策，政府实行分散选票计算的计划。每个选区分成几个分区，每个分区大约有5000个选民，约等于居民委员会的一个分区。因此各个选区的候选人在计票进行时，可以清楚地知道每个分区的投票情况。政府将根据这个分区的投票结果决定组屋翻新的优先秩序。

这次的选举人民行动党采取了针对个别的、具有威胁性的反对党候选人，进行激烈的攻击，如民主党的徐顺全与工人党候选人的邓亮洪。政治学者将这种做法称为另一种形式的选举暴力，“选举政治是一件残酷的事，在新加坡也不能例外。虽然在新加坡的竞选活动，没有像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有暴力与伤亡事件发生，但这不意味着新加坡没有其他形式的暴力”[29]。

大选的结果对民主党来说是暗淡的，在上届大选所得到的三席全部失去。相反的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在连续三届大选下降后，第一次回升了4%，并赢回失去的2个议席。

对于大选结果并没有一致的定论，有人认为是人民行动党将大选与组屋翻新挂勾的结果。其他人则认为是分区计票的影响。笔者认为除了这二个因素外，扩大集选区的规模及减少单选区的数目，对反对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此外，民主党与工人党在这次大选前分别发生了党争与内部纠纷，大大地影响了人民对反对党的信心与支持。

2001年大选：经济衰退，选民以不变应万变

2001年的大选是在世界性经济衰退，失业率增高的情况下闪电宣布举行，虽然距离任期还有一年。人民行动党在提名日即不劳而获55个议席，赢得了执政权。剩下的29个席位由5个政党角逐，其中以新成立的民主联盟派出最多，共派出13位，民主党次之派出11位，工人党与民主进步党各派出2位，及2位独立人士。工人党因为在提名表格上犯了错误被取消阿裕尼集选区的参选资格，工人党因此成为最少候选人的主要政党。

民主联盟是由詹时中所领导的一个松弛的反对党联盟，成员包括人民党、国民团结党、正义党与马来民族机构，是反对党第一次以联盟的形式参选。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让反对党在竞争上，能够消耗较少的资源。

---

[25] *The Straits Times,* 24 December 1996.

[26] Da Cunha, *The Prize of Victory: The 1997 Singapore General Election and Beyond* (Singapore: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9.

[27] Da Cunha, *op.cit.*, p.2

[28] *The Straits Times,* 27 December 1996.

[29] Hussin Mutalib, *op.cit.*, p.41.

反对党对这次仓促的选举颇有微辞，人民行动党认为在一个快速变化与不确定的时代里，他们需要一个迅速与决定性的委托，以采取坚决的措施来拯救经济及处理内部安全有关的问题。因为这时正是新加坡面临经济衰退，失业率增加的时侯。美国又在9月11日发生了所谓“911恐怖攻击事件”，使经济衰退问题雪上加霜，并且在政府任期届满前不可能改变。因此，人民行动党政府决定选择在选个时候举行大选来争取选民的委托，这是人民行动党又一次实行“危机政治”。

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举行大选，是否能增加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取得更大的胜算呢？一般人相信在经济发生衰退时，人们不愿冒更大风险而会偏向于考虑与选择他们已相信了多年的领袖。

选举的课题主要是围绕着经济的问题，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了实际有效与长期的策略与措施来解决问题，不但要将经济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同时还要考虑将来的增长。因此采取了一连串预算以外的措施，如分发新新加坡股票及颁发经济救济金，并通过社区发展理事会进行工作配对与技能培训，帮助失业人士寻找工作以减少失业人数，这些措施都让人民对政府充满了信心与感激，并将手中的选票投给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

除了在正面上采取措施来拯救经济，为了防止反对党利用经济衰退的课题，政府在选前即已处心积虑的作了一些法规改变。2001年4月，政府就通过新加坡广播局修正法案，限制外国人干预大选的机会。虽然政府早已对平面媒体做了类似的限制，但对广播媒体的限制是从2001年时才开始。在同年8月，又再修改国会选举法令，明确规定新加坡广播局有权决定网上的内容是否含有政治性，政党本身的网络只能宣传本党的政纲；非政党的网站，包括个人电邮与电话短讯，不能宣传与转发任何政党的讯息。此外，政府也通过政治捐款法案，规定政党与政治团体不能接受超过5千元来自外国的捐款。为了防止政党以其他团体形式接受外国的捐款，法案也授权内政部长决定那些团体应被列为政治团体。这些规定大大地影响了反对党的竞选能力与散布讯息的机会。

为了进一步防止大选受到外力的影响，政府基于安全的考量，也拖延了原定在2001年大选让旅居在海外国人在海外投票的决定。

大选的结果是人民行动党以75.3%的高得票率当选，这与1997年相比增加了10%有余。政治学者认为这是对吴作栋总理表示支持，因为这是他任总理的最后一次大选[30]。反对党再次以补选策略出击，但无法扭转劣势，民主党得票率一举下降了13%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徐顺全在竞选活动时巧遇吴作栋，公开对他喊叫贷款给印尼一事。这种对国家首长不敬与不成熟的政治风度，令许多人对他感到失望与不满，给民主党一个很大的负面效应。有人甚至将这种情况认为这是反对党的末日。

工人党认为选举的成绩并不足以断定，新加坡人民不要反对党，“目前的经济衰退，使到选民不敢投票给反对党。”[31]

2006年大选：高效政府挑战民生问题

新加坡独立后的第10次大选是在2006年4月27日提名，只有短短9天的竞选活动期。与上次三届大选不同的是，人民行动党在提名日不战而胜的席位只有37席，无法在提名日就获得执政权，这是因为反对党阵营显然已放弃了补选策略。这次大选是第三任总理李显龙当权后的第一次大选，人民行动党也一如既往派出24名新人上阵，他们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精英代表。

[30] Bilveer Singh, *op.cit.*, p.171.

[31]《联合早报》，2001年11月15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4月3日

政府宣布实行拥车证制和公路收费制，以缓和公路拥挤

10月3日

新中建交

反对党方面在这次的大选中所派出的候选人，除了有更多年青的候选人外，候选人的素质也普遍提高。

这次大选的选区划分，一改过去只在选举前几天才公布的做法，在修改幅度也很小，让许多的人感到意外。

政府采取了2001年大选的策略，在财政预算中拨出总值2亿600万的“发展配套”，作为填补公积金户头、工作花红及国民服役人员的花红。

大选的课题主要有外来人才与外劳对新加坡的经济与社会的影响；贫富差距的扩大；医药费的高涨与全国肾脏基金会的丑闻等。不过在竞选活动初期，却被所谓的“戈麦斯事件”成为大选的热门话题。因为代表工人党的戈麦斯（Gomez James）自己忘了提交少数民族证明书申请表，却诬赖选举局官员失误，政府后来公开了电话录音与录像资料证明他并没有提交。一时间总理、资政与各部长纷纷指责戈麦斯玩弄政治，企图抹墨选举局和政府，指责他是一个骗子，并要工人党负责任。这些宣传长达7天之久。人民行动党对戈麦斯及工人党进行的猛烈攻击，却玩过了火而造成反效果，让工人党得到不少同情票。学者认为“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候选人品格的缺陷与个人污点的攻击，将会在将来继续进行，因为这对他们有利”[32]。

这次大选人民行动党宣布要夺回两个反对党的选区（波东巴西与后港），委派吴作栋资政进行这个特别任务。吴作栋抛出18亿元的组屋翻新计划，要这区的人民作出选择，投票给人民行动党以换取组屋的翻新。大选的结果是人民行动党不但无法夺回这两个选区，原任议员不但再度中选，得票率更比上届分别增加3.4%及7.8%。选举的结果很明显的是这两个反对党选区的人民，向人民行动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号，那就是国会中应有反对党来制衡政府。人民行动党再一次获胜，反对党却保留了2个人民行动党要夺回的议席。

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66.6%，与上一届比较，减少8.7%。分析家认为，“应与1997年的结果相提并论，较能反映真正的选情。这是因为2001年的大选是在911事件后举行，人民在强烈的国家危机感下，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执政党。而这次选举的认知又回到1997年大选时的常态，重新回到关心生活层面的基本问题上。”[33]

反对党虽然无法在大选中取得突破，仍旧保留在两个议席的层面上，但反对党在这次大选中派出更多年纪轻、学历高的新人参选，让反对党候选人整体的素质提高了，得票率也相应提高了。

大选之后政府的智囊机构——新加坡政策研究院，对人民在大选中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生活费、寻找工作或组屋翻新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效能的政府、政府政策的公平性、在国会中有制衡的力量与不同的意见及候选人的形象等[34]。

2011年大选：反对党取得突破，集选区第一次失陷

许多政治评论家都用惊叹、转型、奇迹、大转变、分水岭等来形容新加坡2011年大选的结果，将这次的大选说成是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原因是在这一次的大选中，反对党第一次在一个集选区，打败了人民行动党的团队；这个团队拥有两名资深部长及一位政务部长，及一位在中选后有潜质担任部长的新候选人，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创了历届大选的新低。另一方面，反对党第一次赢得一个实行了20年的集选区，这个制度是执政党为了遏阻反对党进入国会的竞选机制，一向被反对党认为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使到反对党更自1991年后，在国会中第一次拥有9位国会议员（包括3名非选区议员）。

2011年5月的大选与过去几次大选比较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反对党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选区的竞选，只有一个丹戎巴葛集选区，因有意参选者迟到不获得参选，使人民行动党一直以来未选先执政的情况不再。其次是反对党的候选人的资历与阵容比过去大大地增加与提高了。有前超级与高级公务员、政府奖学金得主、专业人士、公民团体领导人等，如果单单从学历来看与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不相伯仲[35]。这与过去的反对党候选人被人认为都是一些失败的小人物来说，真不可同日而语。

这次大选的课题主要有五大项，都是全国性的课题；

[32] Hussin Mutalib, *op.cit.*, p.384

[33]《星洲日报》，2006年6月1日。

[34] *The Straits Times*, 3 June 2006.

[35] 严崇涛，〈2011新加坡大选对政府的启示〉，载《联合早报》，2011年6月24日。

在执政党方面主要有二个，一是为领导层更新的准备推出第四代领袖参选；二是政治制度的选择，要人民沿袭一党独大的体制， 两党制并不适合新加坡。反对党则集中在民生问题上来攻击执政党的缺失，如组屋价格失控、居民已负担不起越来越贵的组屋，供应量不足及需长时间等待；移民政策的偏差造成外来移民大量的增加，与本地公民抢工作，并造成公共交通拥挤与屋价高涨、生活费用高涨；贫富差距增大，贫穷居民生活困难及部长薪金过高等。

大选的结果，人民行动党虽然凭着选举制度的优势，赢得87席中的81席，但得票率只有60.14%，是历届大选新低。尽管李显龙总理5月3日在驳船码头的一个群众大会上，为政府过去五年的施政偏差向新加坡人民作了史无前例的公开道歉[36]。反对党的总得票率约40%，是历届大选中最好的一次。

反对党中最大赢家是工人党，总得票率高达47.45%，并赢得6个议席及2个非选区议席，这是工人党在历届大选中获得的最好成绩。因为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决定跳出后港单选区， 率领一个以党主席林瑞莲与国际知名律师陈硕茂的强大团队来角逐的结果。李光耀说》：“2011年大选对人民行动党不利，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决定从后港单选区走出，到阿裕尼集选区参选及有些人对现行的政策不满，我们最终失去一个集选区给反对党，但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持续”[37]。这次大选，反对党所获的议席虽然相对的还是很少，但这个成绩在投票日前二周，还是一个令人不敢想像的政治改变。这个改变将会对未来的大选起一个催化作用。

这次大选的结果对人民行动党来说是一个警号。在大选结果宣布的一周后，曾带领新加坡从贫穷走向繁荣的建国总理的内阁资政李光耀，及第二任总理的国务资政吴作栋，在执政党公布新内阁阵容之前，联合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内阁不再担任资政，让年轻一代领袖在更加困难与复杂的局面下，带领新加坡继续前进。这是李光耀自1959年组阁以来首次不入阁并不再担任资政，这个宣布令人震憾。政治分析家感叹道，没有人会预料到有这么戏剧性的发展。这也意味着新加坡已进入了后李光耀时代。

李显龙在大选的10日之后宣布新内阁阵容，再次令人意外。除了宣布不再入阁的二位资政李光耀与吴作栋外，原资深部长包括副总理黄根成、马宝山与林双吉都纷纷落马，加上二位在大选前就宣布退位让贤的贾古玛与林文兴，及二位在大选中落败的杨荣文和陈惠华，共有九位非常资深的部长离开内阁，占了原内阁部长人数的约一半。另一方面只有三位被称为第四代领袖的新人入阁。使内阁人数从原来的21位减少到只有15位，这是历届大选后在组阁时所做的最大变动，这个变动不仅失去许多资深部长，也大大削弱了新内阁的实力。

在落马的三位原部长中，都是担任在竞选时成为主要竞选课题的掌管部门的部长，某中黄根成负责人口政策，马宝山则是负责组屋建造的国家发展部长，而林双吉是负责公共交通的交通部长，这样的安排应该不能说是一种巧合。

此外，总理李显龙在新一届内阁宣誓就职礼上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检讨内阁部长的薪金。委员会在次年1月公布了检讨委员会的报告，建议总理减薪36%、总统减薪51%、而新部长的年薪减了30%，从原来的158万元减至110万元。单单从减少的幅度来看，可以说相当的严厉。尽管如此，新加坡内阁部长仍旧是世界上最高薪金的总理与部长。

在大选之后，除了检讨部长薪金外，政府

[36] Raja Gopalakrishnam & Kevin Lim, "Singapore PM Make Rare Apology as Election Campaign Heats Up," Reuters, 4 May 2011.

[37] Lee Kuan Yew,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traits Times Press, 2013), p.205.

也进行了检讨大选课题的民生问题，如国家发展部宣布建造更多组屋与屋价降温的政策；交通部宣布改善交通服务的各种措施，包括由政府出资购买更多巴士，政府也宣布种种限制外劳与外来移民的政策。这些种种改善的措施与政策都是针对大选时提出的课题所做出的回应，可见政府对这些课题所引起的民愤，造成得票率减少的原因非常的重视。这也是人民行动党在大选后所做出最积极的反应。

国会大厦

华人与新加坡大选的关系

新加坡最早的二次大选（1948年与1951年）被认为是印度人的大选。但1955年的林德宪制大选，随着华族选票的增加，扭转了这个不合理的政治变数，使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中以压倒性的胜利执政至今，这次的大选人民行动党得到华校生的支持。1963年的大选是人民行动党与社会主义阵线两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政党的斗争，华族选票分裂，行动党仍旧取得胜利，但得票率只有47%，是所有选举中最低的一次。

华社在过去有所谓华校生与英校生的分别，随着教育的改革与时间的推演，硕果仅存的华校生多已逐渐减少并淡出。从1968年至1980年，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一直到1984年与1988年有反对党进入国会，没有迹象显示这两位反对党议员的中选与华族问题有关连。但到1991年大选时，人民行动党一举连失四席，时任主席王鼎昌认为受华文教育者，对政府忽略他们感到不满。华族的政治分化再次浮出水面。政府过后实施各种措施来安抚华社。在接下来四次选举中，华校生的问题不再浮现成为选举课题。

自独立之后，新加坡政府就非常重视与经营种族和谐的问题，并在选举制度中实施了集选区制，来确保少数民族在议会中有足够的代表。因此，新加坡没有发生种族政治的问题。但许多人认为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华族是种族政治的根源。但根据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调查，有94%与91%的华人，愿意接受印族与马来族人出任总理；而接受印族与马来族出任国会议员的人数则高达97%与96%[38]。因此新加坡的种族问题，并没有在选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虽然政府在1988年设立集选区制，以确保少数民族在国会中的代表。国会中国会议员的种族结构与实际人口的比例也近乎相同。因此，过分强调种族政治问题并不完全符合新加坡的政治情况，但也不能不防止种族政治的滋生与成长。

[38] Yolanda Chin and Norman Vasu, "Multiculturalism in Singapore: The Ties that Bind and Blind," dr.ntu.edu.sg/bitstream /handle/10220/4290/ rsis 116-07.pdf? Squence=2, Accessed on 31st August 2007.

第二节　因时制宜
——独立后的国策与社会变迁

摘要

本节旨在论述新加坡历经五十载国家与社会建设的过程。辨析务实主义主导的国家政经、社会发展与文化政策如何形塑国家体制、社会形态、城市特质、人文生态与人民精神面貌。

Abstract

This section traces the gradual process of Singapore 50 years nation build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alytically describes how the nation'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shaped the natio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systems and brought about the drastic changes of the city-state into a globalised metropolitan, and thus re-shaped the social-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ppearances of the nation.

陈剑（C. C. Chin）

新加坡土地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是个弹丸小岛，飞机在15秒钟便超越国界。但在半个世纪中，便从一个转口贸易港转化为迈向知识经济的后工业社会，人均收入从1959年的600多元提升到2014年的6万多元，国势从第三世界跃升为第一世界。许多大国，都要花上一个世纪都还达不到的预期目标，新加坡却在短短的50年间便达到，确实令世界刮目相看。

多亏这半个世纪，新加坡没有涉入周边的战争或动乱之中，反而在某个程度上受益于周边政局的动荡。建国之前，有朝鲜战争，建国之后，则有越战以及中印半岛的南越、柬埔寨、老挝等解放战争，缅甸与泰国的政变及内部抗争，还有印尼的政治不靖与1965年的10·1政变和1969年马来西亚的5·13种族大屠杀及二次紧急状态。还有较远的中东的两伊战争、沙漠风暴、伊拉克之战等的影响。在这些动乱期间，新加坡一直是一些战乱国家或者参战国的后勤基地，也是这些战争的物资供应地，特别是战争时期，橡胶、汽油和食品等战备物资的就近供应。

周边国家的动乱以及新加坡本身的华丽转身都深刻地影响着新加坡的社会转型。危机、危机，危险与机会是共生的。有危机便有机会，问题在于如何在危机中抓紧时机，逮住一瞬即逝的机会。更关键的则是在能力上，是否有抓紧机会的胆识、能力和准备？在视野上，是否有对事态发展和这些机会将带来何等结果的远见？在行动上，是否有果断的决策及迅速和有效率的行动？对一个国家来说，那就是执政党的执政纲领是否符合国内外情势的变化与发展，其领袖是否高瞻远瞩，有辽阔的视野，洞悉事态的发展方向并预知其结果；执政党及其团队是否具有前瞻视野的国策规划，是否有具体的发展策略和政策与执行的效率？

建国以来，为了国家长期与短期目标，有关当局制订了相关策略与政策，有为短期生存而设，也有为长期发展做规划而制定。这些策略与政策在在影响新加坡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变着新加坡的社会面貌。本节着重讨论影响及奠定立国根基及与发展相关的课题，重点放在社会治理体制、经济、民生与社会建设方面的讨论。

新加坡建国伊始，人民行动党面对三大挑战：

- 时值国际冷战炽热时期，国际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斗争激烈。依靠左翼起家的人民行动党，面对强大的左翼政党和蓬勃的左翼运动的挑战
- 社会治安不靖，官僚贪污、私会党横行，鱼肉人民
- 失业率高达14%，人民生活困苦

在李光耀主导下，执政党唯有诉诸强权政治，实行威权管治。

然而，在一个议会选举的民主制度，任何政党单纯依靠威权管治并不能保住政权，它必然会在全民普选中遭到选民唾弃。人民行动党执政56年而不衰，虽然选票下降，为何民众依然支持人民行动党？秘诀何在？根源在于新加坡选民与政府一样务实。反顾历史，可以简要列举人民行动党的主要凑效政策：

- 廉政政策：领导洁身自爱、严刑峻法、杜绝贪污
- 法治政策：谨慎立法、严谨司法、严厉执法
- 经济政策：审时度势、掌握时机、十年一变，有效转型
- 劳工政策：掌握工运、劳资政三结合、保障工人利益、劳资双赢
- 民生政策：发展经济解决民困、公共住房政策解决屋荒，居者有其屋计划致富普罗大众
- 社会保障制度：强迫储蓄、未雨绸缪、公积金养老制度，照顾弱势群体
- 民防国防政策：全民民防、全民国防，积极建军、精兵策略、强化社会凝聚力与国家认同

廉政改革

执政党洞悉国家兴亡在于领导人的廉洁奉公、励精图治。首任总理李光耀甫上任，首要决心整治的便是泛滥成灾的官民普遍贪污枉法乱象。他首先把英殖民地政府原先设立的反贪小组，通过立法正式建立为独立于警、法部门的机构，并赋予执法的绝对权力，以利根治贪污腐败社会顽疾[1]。

[1]《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页183-197。

国际透明度机构[2]断言，世界“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行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勋爵（Lord John Acton，1834—1902）[3]有句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说明贪污是人性的最大弱点之一，而它与权势密切关联。当代社会最典型的贪污形式便是官商勾结，或者动用权势讹诈、要挟以获取财物或其他好处。权、钱、色、裙带风、朋党勾结都是贪污的目的和结果。新加坡早年贪污横行，官僚上自高官、下至普通警员，或掌握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权力的低级执行员都涉及，在商界则几乎是不能明言的贸易法则。这样的殖民地社会，民众投告无门，被逼而效尤，苦不堪言。它也使行政权力成为大小官僚鱼肉人民和生财的利器，使相关部门失去效率，成为无能的机构。

反贪污、反无能便是行动党第一个也很有效的竞选口号。反贪局的成立不仅仅为显示实现竞选诺言而设，在往后的执政时段里，雷厉风行展现了一系列的治理贪污的案件。上自部长、下至普通警员及商人，不一而足。无论贪污形式多样、贪污款项巨细，反贪利刃无情砍伐、深入肌理，一时间贪污枉法现象顿然消失，达到反贪效果，相当程度整治和杜绝了普遍存在的贪污现象。

自治与独立之前，刑不上大夫，行动党上台后，拉下马遭判罪者便有1966年8月前国家发展部长陈家彦、1975年4月前环境政务次长黄循文、1986年前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1990年前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等部委高官。此后，尚有前公用事业局前副总裁崔汉添、前贸易发展局局长杨胜德、前亚太酿酒私人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谢德龙、前亿兆国际创办人翁亚平等；近期的有前陆军中校王明亮、前土地局技术官僚辜声伟、林嘉明，前国家肾脏基金会（NKF）执行理事长杜莱及其下属若干人、仁慈医院前院监明义法师、前海星中学校长陈金福及各界上百人触犯贪污条例被刑法处治。有者遭受重罚，没收贪污赃款、罚款坐牢；有者更畏罪自杀（如郑章远部长）；有者潜逃国外，流亡终生（如前职总主席及国会议员彭由国等）。

尽管严刑峻法，仍有人甘冒身败名裂、屡屡以身试法，不得善终。足证欲壑难填、贪念难改。执政党领导人对贪污枉法零容忍度及坚韧的决心绝非口头誓言，而是立国之本。它使新加坡获得世界最廉洁国度的信誉，国际透明度、清廉指数、国际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世界经济论坛、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等国际机构在逐年的调查与评比中，新加坡的清廉度都名列前茅，介于第一至第五名之列。除了新加坡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之外，反贪力度与清廉度也为新加坡赢来国际投资的信心，为新加坡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法治政策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华人移民来自中国南方数省，由几个方言群和帮派组成。由于帮派族群的相互关照与保护主义，原有的帮派结社也就顺水而来，在新加坡渊生成长。其他马来与印度族群，也不遑多让，各有自己的帮派结社。这众多帮派秘密会社，形成为新加

[2] 国际透明度机构（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具有监察贪污腐败的作用，由世界银行前区域总监彼得艾钦（Peter Eigen）倡议，成立于1993年5月。自1995年起，制定并每年公布清廉指数，提供一个国际贪污状况比较列表。它由约100个国家分会共同组成，总部设于德国柏林。清廉指数以对象为商人的问卷调查为基础，按世界各国本土贪污情况的普遍性进行排名。

[3] 约翰·爱默里慈·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1834-1902），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月3日

《民选总统法案》在国会通过

8月31日

在大选中，行动党获77席，反对党得4席

坡颇为严重的私会党猖獗乱象。在中国的会党如洪门、天地会等秘密会社，原本具有反清复明革命性质的民间反政府势力，但到了新加坡，社会性质改变，会党的性质也相应变化为利益集团的恶势力，成为社会治安的头痛问题。殖民地时代，它与官方既矛盾冲突也狼狈为奸。一般民众成了鱼肉的对象。由于贪污状况严重，私会党获得发展空间，社会治安因之恶劣，民众深受其害。其时，偷窃、打抢、勒索、绑架、强奸、殴斗、私会党开片、谋杀等刑事案件层出不穷。许多案件破案无期，束之高阁。自治和独立前的新加坡，社会一片乱象。执政党上台，社会治安变成治理的重点之一。

国家领导人是法律出身，却不一定能保证法治的存在与成功。关键在于领导人有否法治观念并是否期望通过法治建设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定的国度。新加坡的法治获得成功，主要在于领导人的法制智慧和建树。作为法律出身的首任总理，李光耀有非常严谨的法制观念。他的威权政治也正是建立在严谨的立法、司法和严厉执法上。从英国继承的基本法律与律法条规是新加坡律法的基本框架。李光耀的法治观是构成新加坡律法的精神实质。李光耀的基本律法观念是："人性本恶，以法施教"；"严刑峻法，以刑去刑"；"不分贵贱，严厉执法"；"杜绝贪污，以法治权"[4]。他的法治观与中国商鞅、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不谋而合。法家视"法"为治国良方，李光耀视"法"为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利器。新加坡从国家治理到民间任何纠葛都以法处治，决不姑息。

当然，一个国家光有法也不行，许多事还得依据社会道德规范从事，而不是事事都诉诸法律诉讼。因而，国家与社会必然有其国民的道德规范。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民族文化，有些民族还涉及宗教道德规范。新加坡是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与多元宗教的国度，在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全民的道德规范，自然须具有高度的包容性。

人的道德素质、美德是国家建设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文化是信心的源泉，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根基。新加坡在道德建设上，其特色是把道德建设置于国家战略目标的高度。道德建设活动由政府主导，采用多种途径、措施进行道德教育和提倡举办多元道德实践活动，诸如礼貌运动等。

道德建设取开放型思维，融合东西方文化价值观体系。强化法制在道德建设中的保障作用。人们的举止言谈、行为规范、社会伦理皆依道德规范，依法监督执行。政府成立专门道德教育机构，进行规划、确立目标与实施方案，贯彻始终。

新加坡维护社会秩序的律法主要有《公共秩序维护综合法》、《破坏公物法》（《涂鸦法》）、《司法委员会法案》等律法。新加坡保持鞭刑制度与延续死刑制度。

为保证民族与宗教的和谐，新加坡刻意维持多元民族平等政策与宗教宽容政策，多元宗教平等并存、相互尊重，并立法确保宗教与政治分离。以国家德育政策为指导原则，以立法维持宗教民族和谐。

在家庭层面，主张并实践家庭美德教育。家庭凝聚是社会基石，强化父母教育子女的爱心与责任，强化子女孝顺奉养父母的责任与义务。维系家庭和谐有礼，恪守五伦关系、强化维护三代同堂家庭结构与家庭美德。

国家德育总体目标为忠于祖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5]。个人要具备良好行为，才能肩负起社会责任，并效忠国家。

新加坡在某个程度上，是个相当西化的社会。为防止新加坡沦为"伪西方社会"，必须在西化的环境中培育东方价值观，需培育国民具有国家、社会意识，树立亚洲人观念，培育亚洲人道德观和责任感。

为达致这个目标，1970、1980年代，政府致力于弘扬以儒家为主的东方价值观。政府成立专门道德教育机构，进行规划、确立目标与实施方案，贯彻始终。1978年，成立道德教育委员会，由时任文化部长王鼎昌为主席，成员包括各部部长。1988年，成立国家意识委员会，由时任副总理李显龙为主席。2001年，成立改造新加坡委员会，由时任总理吴作栋主持，并分五个小组：激励创业小组、爱国意识小组、族群融洽小组、精神建设小组、发展协调小

[4] 中国学者陈新民对新加坡的法治观有极精简的总结，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页17-43。

[5] 有鉴于新加坡的种族多元敏感性，李光耀于1981年就提出："新加坡不是一个马来人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更不是一个印度人的国家，而是一个综合民族的国家"。新加坡曾先后于1982年及1988年，举行建立国家意识的德育活动，从1988年开始，每年都开展"国家意识周"活动。

组主理其事。将儒家“八德”（忠孝仁爱礼仪廉耻）改造为：尊敬老人、富有爱心、官为民系、为人堂正等现代道德观。

1991年，政府颁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五大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6]。

落实与信守国家德育目标、确立亚洲价值观、人本主义德育理念、国家主义原则、民族利益至上，五大共同价值观，实施德育途径一体化：学校、家庭、社会有机结合以达致社会道德与规范得以建立和贯彻。新加坡的道德建设辅以严谨法治，造就新加坡社会秩序，治安良好，为东南亚各国之冠。

经济政策

建国之初，新加坡赖以为生的便是依靠优越地理位置的转口贸易。英国人看中新加坡的就是它的作为东南亚海陆交汇的地理位置，和断层海岸形成的天然深水港湾。它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南端，扼制着东西贸易的通道，成为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航运枢纽。此处既无台风，又无地震，即使偶尔来自苏门答腊的热带气旋，也只有四到五级，不足为害；再加水深60呎（360英尺）岸沿笔直的自然港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刻意发展下，新加坡成为英帝国远东地区的重要商港和军事政治桥头堡，便于英帝国掠夺东南亚天然资源和扩张其在远东的势力和影响。

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虽然贸易发达，但也就仅仅停留在作为英帝国远东的贸易站和军事要塞以及东南亚天然物资的转口贸易港。除了必要的炼油业之外，从来不考虑其他轻重工业的发展。作为东南亚或亚洲及后来的世界第一大港，停留与过往的船只众多，再加上顺理成章形成的东南亚第一空港，柴油、汽油不可或缺，必须就近供应，于是新加坡成为远东第一炼油中心，后来成为世界第三大石化中心，仅次于荷兰的鹿特丹（Rotterdam）和美国的休士顿（Houston）。在1960年代，位于毛广岛（Pulau Bukom）的英荷合资的蚬标炼油厂便已是日产一百万桶汽油的炼油中心。新加坡不产石油，但每天停留与过境的各国，特别是英、荷两国的油槽船多如过江之鲫。其时，英、荷在中东、东南亚各地区拥有大片油田，除运送回国的原油之外，保留一部分在新加坡提炼以就近供应过往船只和军事用途的需要。这是英帝国在新加坡发展的唯一的重工业，也只为英帝国利益服务而设。

人民行动党执政后，首要考虑作为缺乏资源的弹丸岛国如何生存？一面通过威权政治严厉管治，稳定社会局面，一面立即设立经济发展局等经济发展立法机构，积极开始向外招商引资。在短短的50年里，新加坡经济华丽转身，平均约每10年一个转型，保持住新加坡在亚细安的引领地位，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分述如下：

劳工密集：从转口贸易到基本加工工业（1955–1965）

自1959年自治以来，有鉴于转口贸易单一经济所可能带来的经济灾难，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以改变新加坡对港口的依赖性。唯一的途径便是走工业化的道路。但新加坡毫无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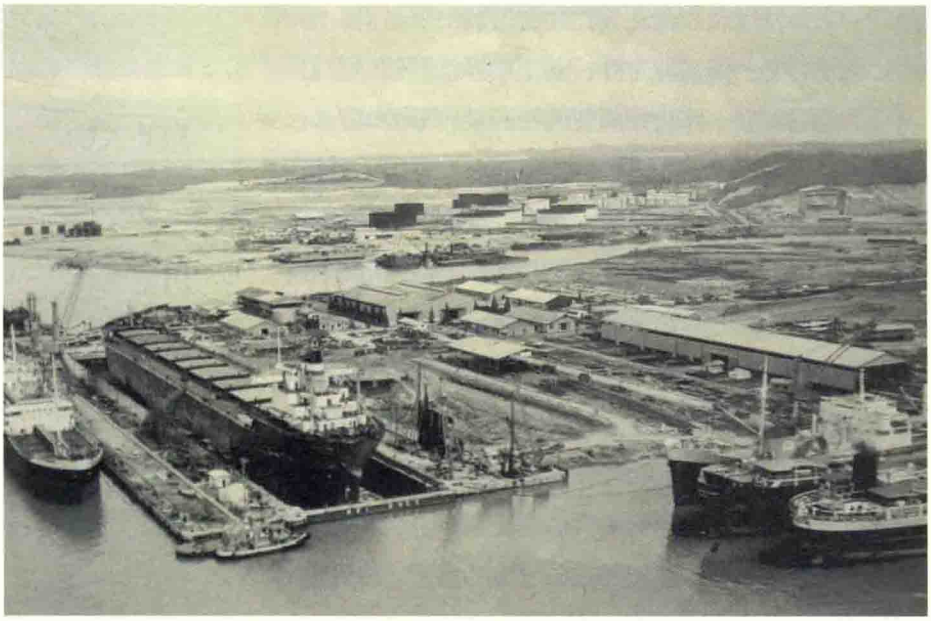
[6] 1991年国会通过《共同价值白皮书》，确立五大共同价值观念。中国学者吕元礼在讨论新加坡建立和谐社会的章节中，对五大共同价值观有精辟的论述，见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下卷）：和谐社会是怎样建立的》（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88–98。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9月21日

华社自助理事会成立，总理部长为自助会高歌，筹得367万余元



裕廊工业区及造船厂（1970年代初）

基础，民族资本家也仅仅从事商贸，资本也十分有限。其时，整个东南亚地区，工业基本付之阙如，大量天然资源都是出口商品，鲜有加工成半成品或成品出售。当时新加坡面对高达14%严重的失业率，唯一的选择便是依靠进口的天然资源进行加工。

自1955年以来，便有民族资本建立的极小规模的基本加工工业存在，如椰子油榨油厂、简易食品加工厂等。于是，在政府的策动和鼓励下，基本加工工业如纺织业、机械加工业便成为新加坡的工业支柱。加工工业需要大量劳工，解决了失业问题，创造了工业基础。裕廊镇工业区应运而生，成为新加坡的工业基地。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已经达到全民就业的境界。

技术密集：制造业蓬勃崛起（1965–1985）

10年下来，周边国家的加工工业也渐次形成，而它们拥有自己的天然资源和更为廉宜的劳工，新加坡即刻就会失去竞争力。进入1970年代，为经济发展而专门成立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与专门提供工业设施和厂房的裕廊镇工业局[7]，与国家领导研究的结果，立即进行经济转型，走提升生产制造技术的路线，不再进行对原材料的原始加工，而是以技术提高生产力，生产与制造成品，并提高产品质量，工业发展已经走在亚细安各国前面。

1970-1980年代，英美等国投资建设多间新炼油厂或扩建老厂，并逐渐转型成为石化工厂，开始逐步从原油提炼进入石油下游石化工业生产[8]，制造业也开创多元局面。由于印尼、马来西亚、汶莱、中国全面拓展石油勘探、开采，新加坡成为探油台、油田生产设备的基地。造船业也兴旺起来，投资商包括国家本身附设的政联公司兴建多家造船厂，制造各类大小船只。由于英军撤退，舍弃的军港经改造而成为三巴旺造船厂，而位于海港近旁的岌巴修船厂也扩建而成标准的造船厂。此时，新加坡也正式有了自己的炼钢厂[9]。重工业的发展带动了许多下游支持工业如机械等行业的生产与制造。

进入1980年代，政府也开始关注电子工业的全面开拓，从事电子业研发、工业设计与电脑软件开发并建立起相应的制造生产能力，逐步建设半导体工厂。这是工业发

[7] 为发展工业，新加坡政府选择了新加坡主岛西南部地区的大片胶林、椰园与沼泽地，开拓成为工业基地。1968年6月1日正式成立裕廊镇工业发展机构（Jurong Town Corporation，简称JTC）专司全岛发展工业区、提供工业设施、厂房等一应基础建设等职责。三年内，JTC便打造完成裕廊工业镇。

[8] 在新加坡投资石油提炼与石化工业除英荷合资的蚬标石油（一译壳牌，Shell Oil）之外，有美国的埃索（Esso）、无比油（另译美孚，Mobil Oil），后Esso改名为埃克森Exxon，并与无比油合并为ExxonMobil，其在新加坡炼油厂每日产量59万2千桶汽油，为世界第七大炼油厂；英国的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以及美（Summit Oil）、英（BP）及新加坡合资的新加坡炼油厂（原名Singapore Petroleum Corp，后改名为Singapore Refining Company，简称SRC）。

[9] 电弧炉炼钢是一项顶尖级的技术。经济发展局购买了大量的旧船，并在巴西班让的海滩上将其拆卸，作为钢铁工业的原材料。这就是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众钢铁厂。

展的里程碑，是新加坡工业技术密集发展时期，也是新加坡工业起飞的年代。

资本密集：向外拓展年代（1985–1995）

1980年代开始，政府就重视生物药剂的研发。化学与石化工业也全面发展下游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南北高科技带基本成型[10]。1990年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已经成为新加坡两大工业支柱，本土企业受鼓励进行多元化发展、提高它们的技术与生产能力并发展为出口为主的企业。

为发展及支持高新科技工业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科技研发基地并从事新型科技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建立外向型经济并在全球市场开拓与进取。新加坡与外国合作，成功建设科学园区，并以之向海外拓展，在亚洲各国，合作建设科学园区，先后在印度、中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建设科学园区，也以国家投资公司向外做多元化投资[11]。这期间，新加坡在国外投资由于民情、国家体制的差异，面对重大挑战，在某些国家也缴了学费[12]。在吸收了经验教训之后，投资政策有了调整，不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深具外交智慧和灵活机动的决策形式迅速使败局扭转成双赢局面，不仅保住了投资，还进一步拓展了业务根基，打开新的局面。

知识密集：高新科技发展的年代（1995–2015）

考虑到新加坡的地理局限和地缘经政关联，新加坡在新一轮经济发展方面须作出重大决策。国际科技发展迅猛，高新科技层出不穷，在资讯通讯十分发达的年代，新加坡必须掌握先机，才能保持住在亚细安的领先地位。在环球化的国际环境中，新加坡也必须赶上这快速的列车，并与先进国家建立起强劲的经济联系和互动。缺乏天然资源，新加坡只能采取精兵战略，在方寸的土地上设法去赚取上亿的收益。新加坡因此只能向高新科技领域做适当的选择和发展，更需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就是把发展的契机放在人才的聚集上。

新加坡选择了生命科学和生物药剂的研发和生产、深化在资讯通讯领域，包括媒体科技的投资和开发。因此，新加坡科技局成立后，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所，向国际延揽了大批科技人才与聘请了大批专家，在南高科技带建设了纬一科技园，拼全力打造知识经济。

进入21世纪，并加入新生水与洁净能源的科研和开发，以及航空工程与机械研发和生产，原实里达小型机场（Seletar Airport）改建为航空工业园区，引进如英国罗斯莱斯等著名厂家在此进行飞机引擎研发与制造。高新科技研发与生产也带动新的支持工业的开拓和发展，精密工程与精密机械业应运而生。此外，正在建设中的还有位于南洋理工大学旁边的洁净科技园，作为洁净能源科技开发的基地。新加坡政府对知识经济所能带来的机遇和收益期望很高，单就生物科技与药剂生产一项，新加坡希望它在未来能带来25%GDP的增长。

总在危机中脱颖而出

新加坡经济建设过程似乎一帆风顺，进入1970年代中期，新加坡已经是亚洲四小龙[13]之首。

---

[10] 北科技带西起自克兰芝东至淡宾尼，主要为电子工业带，是新加坡晶片的生产基地；南科技带东起自阿历山大区西至杜亚士，主要为生命科学、生物药剂、资讯通讯、微电子、洁净能源、环境与水等科技研发与生产，它还包含三个科学园区、纬一科技园区等高新科技研发园区。

[11] 这些政联公司包括由经济发展局组建、与各国科技园发展公司合作的腾飞公司、纬一科技园公司等。

[12] 新加坡在中国苏州工业园区与在印度邦加楼的合作投资都曾先后遭遇困难，后经协商达致妥协而延续发展。

[13] 自1970年代起经济迅速发展的四个亚洲经济体：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位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或地区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经济发展高速成长。

事实上，新加坡也遭遇数次严重的挫折和衰退。首先是1970年代初英军撤退造成依靠英国军事设施维生的工人失业、商业受损、业务萧条，使尚在襁褓中的新加坡，立即遭受沉重打击。新加坡独立后，英国为削减远东驻军开支，原定于1970年代中期正式从新加坡撤军，并已通知新加坡政府有关撤军事宜，但英国在1960年代末却遭遇英镑贬值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决定提早并最迟在1971年12月完全撤离。这仓促撤离立即造成新加坡两重困难[14]。一是新加坡军队尚未成型，面对近邻的军事威胁，国防安全堪忧；二是英军基地提供2万5000人的工作，即每10人中，一人在基地服务，并带给新加坡每年20%的国民总产值（GNP）。新加坡不仅经济受损，还将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

新加坡政府应对之法是加速工业发展进程，并与英国成功谈判获得5000万镑的优惠贷款，以及免费转让所有主要资产。军事上，协助新加坡培训军事人员并协助建立新加坡的空防系统。新成立的基地经济改造部接手，将机场与军港的宝贵土地与设施进行商业化运作，使之转变为新加坡造船与航空工业的基地。

面对刚建国的经济、国防等局面的挑战，人民行动党于1968年4月提前大选以取得人民的委托。结果获得84%选民的重托，立即通过新劳工法令以扼制工业纠纷来吸引外资。政策奏效而外资大量涌入，美国取代英国逐渐成为新加坡主要投资者和贸易伙伴。新加坡以9亿元投入新加坡的工业化项目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虽然也影响新加坡经济，但却仍然保持强劲的势头。1973年至1979年间，始终取得8.7%的成长。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造成经济长期萎靡不振、重创发达国家，新加坡却似乎不受波及。1979年至1981年间，仍然保持8.5%的成长。这是因为新加坡本身对其他国度提供石油服务，如原油提炼和石油产品供销，使新加坡更像是个产油国所致。

1985年经济衰退却使新加坡受到重创。1986年新加坡首次遭遇1.5%的负增长。到1986年才有了1.9%的转机。这是因为石油及相关业务以及电子业全面衰退，导致新加坡有关产品滞销所致。政府立即于1986与1987年采取冻结工资、降低资方公积金缴交率，以及减低所得税率，并提高厂商在机械与设备的投资津贴到30%等措施。这些措施的迅速奏效，使生产成本下降达30%，而生产力上升，1988年新加坡经济显著回弹。

2001年新加坡再度陷入经济不景。这是因为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持续效应，以及美国世贸大厦遭遇袭击的911事件引发的一连串效应所致。经济学家还预测这衰退会延续至2002年。联合国国际贸易署估计是年直接投资将全面大幅下降超过25%。还好新加坡电子业于2002年强力回弹，解除了经济不振的压力。

始于2007年末的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为国际经济恶性循环。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 Inc.）破产，导致世界经济危机，造成新加坡经济遭受历来最严重的衰退。它所造成的冲击和经济萎缩被认为是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到了2009年，效应明显呈现，是年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0%，这是新加坡40年来最差劲的年头。政府也需调低6%至9%的经济成长预测，此情况远超东南亚其他国家，新加坡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

新加坡相当程度依赖对欧美及日本的出口，这些国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幅降低进口。新加坡制造业、石油产品、电子成品全额下跌达到13%，对马来西亚的出口竟下跌了40%。这还包括新兴产业生物药剂的生产遭遇严重挫折。尽管在2009年下半年经济略有起色，但还是要到2010年才出现显著的复苏。这一次的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萎缩致使超过1万5000新加坡工人被裁退，电子业方面的情况最为严重。

除了工业生产与服务业遭遇重挫，作为世界10大金融中心之一的新加坡，在这一年面对严重萎缩。新加坡两大金融支柱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与政府投资公司（GIC）也遭遇重创。淡马锡在2007及2008年买进美林（Merrill Lynch）约50亿美元的股份。当美林于2009年初因债务危机倒闭而遭美国银行并吞，淡马锡在美林的股值萎缩至27亿，损失达45%。当淡马锡把股份卖给美国中央银行时，再度损失13亿。政府投资公司也面对惨重损失，但具体数字缺如。新加坡金融局作为新加坡央行，资产损失达92亿，占其平均资产的3.2%[15]。

---

[14]《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页43-56

[15] Jordan, Rolf, "Singapore in Its Worst Recession for Years. The Effects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on the City-State's Economy,"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and Hamburg University Press. 2009), Vol. 28(4), pp.101-103.

政府在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萎缩，为稳定民心与市场，乃于2009年10月16日起至2010年底，金融局拨出庞大资金以保证所有新加坡银行的储备维持稳定。同年12月，新加坡工资理事会建议减低资方的公积金缴交率。这是自沙斯（Sars）危机以来，第二次大幅降低公积金缴交率。政府一连串的经济振兴配套达205亿新元，是新加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也是远超亚太地区所有的国家。另外，还拨款26亿作为商业资金流动周转之用，再拨58亿新元用以松动紧缩的借贷情势。此外，投入44亿作为基础设施、教育、医药保健卫生的开支[16]。还给企业提供20%所得税的仅此一年的回扣。自然，这些钱的一部分只能从国家储备里想办法，是故49亿新元从储备金拨出。这也是新加坡至今唯一一次借助储备金以解救经济危机。尽管这些措施有效振兴经济，却一时帮助不了工人失去工作，被解雇的还包括大量的外来劳工。

虽然是一些人认为新加坡是亚洲自由市场经济的明灯，实质上却是政府主导的严谨的计划经济体。新加坡国土面积极小、经济实力却还很可观，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极大，在某种程度受制于先进国家的经济波动。也因为国小人少，比诸许多国家，容易转身。首先国家领导必须洞悉先机，未雨绸缪；面临危机，果断决策应对；掌握时机，转危机为机遇。在历经接二连三的经济危难，新加坡能脱颖而出，化危为安，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执政党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决策果断，高效运作至为关键。

劳工政策

在建国之初，人民行动党内部左右两翼由于政见相左而产生严重分裂，左翼与费边主义者之间这原本脆弱的统一反殖战线终于走到了尽头。李光耀为首的执政集团，主动积极与左翼切割。左翼以林清祥为首与脱离行动党的13位议员，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作为反殖先锋队的工人运动立即出现分裂。执政党乃组织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与左翼的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s Unions，简称SATU）抗衡。把新加坡经济投注在依靠外资的工业发展需要一个政治稳定和工业和谐的环境。而左翼的主要政治力量表现在工人运动上。工人运动最具体和有效的武器则是具有政治目的的罢工行动。这是分裂形成的政治现实，无可避免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

作为执政党，对于任何阻碍政治社会稳定的因素，必然需要采取严酷的行动，以解除来自反对一方造成的障碍和困境。工人所面对的生活困境是存在的现实，工会的目的在于保障工人的切身利益。这是工人运动取得进展和蓬勃的主要原因。建国之初，工人运动的主动权几乎掌握在左翼手中。当时存在的30几个工团中，29个为左翼所掌控。

当工运主动权在左翼手中，执政党处于被动局面，如果工人运动每次行动都能确实保障工人的经济利益，则它所带来的政治效应获得无限放大；反之如工人利益受损，则造成其政治挫败。执政党在掌握了工人运动的本质后，以其职工总会争取工人加入，试图建立起一如左翼的强大工人运动的势力。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职工总会一时间还很难说服大部分工人转向。于是，执政党一面采取严酷的镇压手段和遏制左翼工会的措施，并逮捕利用工会进行政治斗争的工运分子；一面则以实效收编转向的工会和吸纳工人加入全国职总。在极短的时间内，执政党把工运的主导权转移到全国职总的手中。红色的左翼工会一方面遭遇封禁和吊

[16] *Ibid.*, pp.104–105.

相关人物

王鼎昌

历史事件

4 月 27 日

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海皇大厦举行。这是中国大陆与台湾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中断了 44 年联系后正式接触商谈

8 月 1 日

今后 10 到 15 年，新航将名列全球十大

8 月 28 日

王鼎昌当选民选总统

销注册而终结了其政治作用，一方面也因工人失去斗争信心而渐次失去工人群众的支持。工人是现实的，当工运不仅未能保障其工作及相关利益而只能带来挫折和失业，工人的转向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仅仅把工人转移到职总组织之下，既不能兑现工人的实际利益如工时与工资和福利的保障，也不能长期使工人臣服于职总之下。工人与资方是矛盾的双方，在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前提下，似乎难有妥协的余地。全国职总是执政党设立的工人运动国家机器，目的在于通过有效控制工运而达致政治稳定的工业环境、有利投资，特别是外资带动的工业发展[17]。职总一方面必须体现作为工人组织作出保障工人利益的行动，一方面则作为稳定工业环境协助工业发展的国家机器，在两者之间作出平衡。因而，一方面说服工人要为国家发展作出必要的牺牲和作出贡献，一方面也积极向资方争取起码的工人利益如合理的工资、工时以及其他工作条件和相关福利。

从其性质来说，新加坡全国职总具有社会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特别是中国在解放后全国总工会所扮演的角色，既把工人运动牢牢掌控在国家利益的手中，也把工人运动的政治作用和色彩清理的荡然无存，达到掌控政治局面的效益，为外资入场、工业发展铺路。

从一开始，政府介入全国职总掌控工人运动的色彩极其浓厚。其与资方的互动也极频繁。主要必须争取资方，特别是外资方面的合作，对国家劳工政策的认同，同意全国职总的工资等有利工人利益的建议和措施，从而共同缔造良好的工业环境，有利生产。这样的政策方向和措施取得成效，奠定了后来正式建立的劳、资、政三方合作的三方代表制[18]。在新加坡工运的演化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在面对左翼工运挑战下逐步建立起“民主工运”与“工运现代化”的统合主义工运和劳工政策模式，成为许多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乐于仿效的工运掌控的样板。

民生政策

新加坡政府最成功并受世界推崇的政策便是“居者有其屋”计划（Home Ownership Scheme）。这是人民行动党在“统一战线”时期就形成的最具民主社会主义特色的民生政策。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把一个除了市中心与海港之外，基本是个大乡村的新加坡，改造成为全面城镇化、现代化的大都会，并解决了全民的住房问题。

至今为止，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其政府有效地为全民提供廉价住房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人民拥房率最高的国家。在最高峰的1990年代初期，新加坡87%以上人口居住在建屋发展局兴建的组屋内，而其中82%的住民拥有其组屋。这是执政党引以为傲的执政业绩，也是位居东南亚之首的雄辩的执政效率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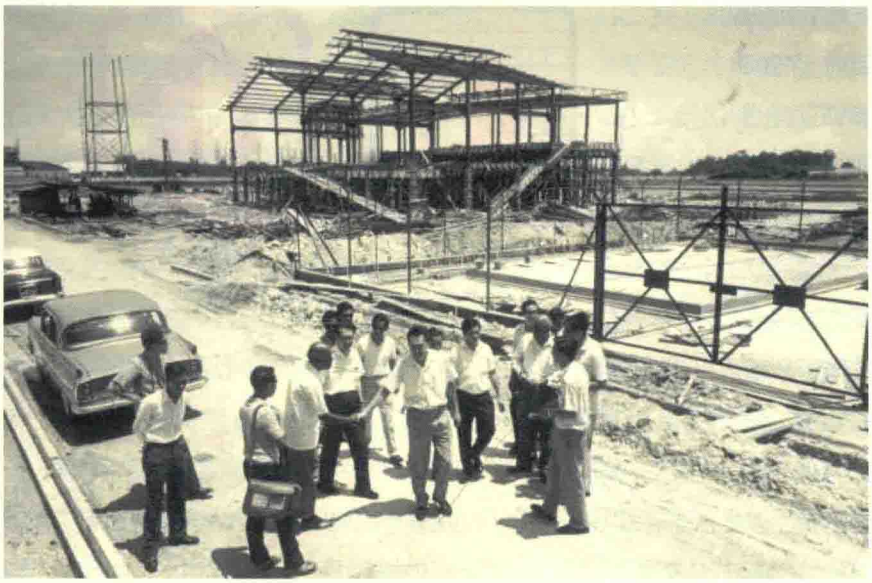
房地产是世界各国增长率最高的产业，也是致富的不二旁门。原为解决屋荒的新加坡的组屋建设转变为新加坡人民的资产积累致富的根本。执政党的民生宏愿在谨慎策划下逐步实现，首先协助人民解决住房基本需求，然后逐步提升组屋规格。50年来，新加坡今天的国民住房已经达到媲美私人公寓的标准，可是作为首次购房的年轻家庭，他们承担的价格却只是类比私人公寓的1/3或更低，还可以获得公积金购房补贴与建屋局优惠的长期房贷，而房贷可由公积金偿还。作为新加坡公民，既住得起房子，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下，还买得起房子。

新加坡对建筑物的保存维护有一定的规章制度。组屋的保养原先由建屋局承担，后来转移到市镇理事会负责。从组屋的外观、公共设施部分、组屋内部都得按时维护整修。外来客人惊讶新加坡看不到年久失修的建筑物，特别是组屋，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焕然一新。这种制度性的保存维护管理是一种负责任的政策使然。

民生政策对低收入阶层与年老一族在住房方面也给予

[17] 郑振清，《工会体系与国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页73-80；参阅网上资料http://en.wikipedia.org/wiki/Labour_movement_of_Singapore。

[18] 新加坡全国工资委员会（National Wage Council, 简称 NWC）成立于1972年。NWC由30位委员组成，其中政府、资方及劳工各有10名代表，任期2年。资方代表由新加坡雇主联合会及美国、日本等跨国企业推派；劳工代表由全国职总 NTUC推派。NWC为处理劳资关系相关议题所设的次级委员会或临时委员会，也依三方同等数额推派代表参与对话。亦参阅网上资料http://www.mom.gov.sg/employment-practices/tripartism-in-singapore/Pages/default.aspx。



1965年李光耀视察裕廊工业区的建筑工地

特别的关怀和协助。通过购房补贴，给予低收入阶层更多的关照。对年老一族，还特别为他们所拥有的组屋安排“组屋租期租契回购计划”（Lease Buy-Back Scheme）的处理[19]。他们可以将组屋卖回给建屋发展局，将现金松动出来作为养老用途，而继续居住在该组屋内直到老死。此外，为照顾老人的安全，也在其组屋内特别设计安装专为老人起居安全的设施和设备，老人也可以转换组屋为老人小型公寓。

人性化的处理还在于照顾年轻新婚夫妇，协助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当他们结婚后，由于所购买组屋有待完成，他们可以申请临时住房计划下的组屋居住，一直到所购组屋完成。新婚夫妇，妻子有孕，更可获得优先照顾，住进临时住房计划的组屋。这恐怕也只有新加坡才有此政策上的特殊安排。当然，这种安排有其人口政策的背景。新加坡政府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忧虑越来越多单身男女，成为社会问题，因而特别鼓励青年男女谈婚论嫁、鼓励他们组织家庭，鼓励受教育的夫妇多生养。新加坡的生养率已经低于替代水平，而老龄化的速度却在加快。因而在组屋政策上，特别关照青年夫妇。

在长达150年的殖民地统治下，殖民地政府只在1927年时成立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简称SIT），主管城市发展事宜。到了1932年才赋予SIT关注低收入者住房的责任。事实上，一直到1941年二战前，SIT才完成了2000个住房单位。二战后，住房问题更趋严重。从1947年至1959年新加坡自治前，SIT总共才建成2万1000个住房单位，只解决约8.8%人口（截至1959年）的住房需要。当时，新加坡人口接近100万，其中70万人集中在市区8000公顷的土地上，居住在3万8400座建筑物里。其中30万人挤在400公顷的闹市，而在牛车水区的2万个家庭，居住情况更是恶劣。

建屋发展局成立于1960年2月1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必先解决闹市中心如牛车水区的拥挤情况，重新安顿市区中心25万居民的住所；另外需立即安顿市区边缘的25万居民，并且还需照顾市区东部及西部郊区的25万乡村人民。换句话说，在短短五年内，必须为3/4的人口，即约75万居民完成和提供住所，对一个刚上任的新政府来说，这计划是宏伟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19] 网上资料http://en.wikipedia.org/wiki/Lease_Buyback_Scheme；http://www.hdb.gov.sg/Fi10/fi10296p.nsf/PressReleases/8891D802BA22AA6E48257D4800212EEA?OpenDocument。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4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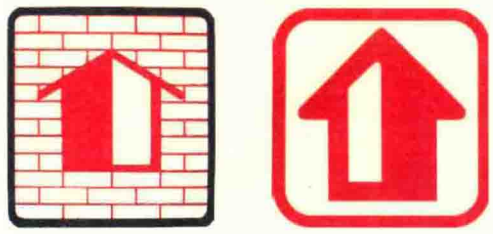
开始实施消费税，税率3%

新镇的建设过程其实就是新加坡乡村城镇化的建设过程。新加坡乡村面积原占岛屿面积的85%。政府于1960年代开展建屋以及工业发展计划后，于1966年修订了《土地征用法令》，开始逐步征用大片农地改作工业、交通、住房建设之用。1920年英殖民地政府已经制定了《土地征用法令》（Land Acquisition Act），1946年及1955年两次修订，授权政府为城市发展征用私有土地。举凡为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如公路、捷运系统、机场、海港、发电厂、垃圾焚化炉等，或为建设公共住房（组屋）、工业发展、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都可征用私人土地为公家之用。为防止滥用《土地征用法令》所赋予的权力，政府设有土地征用程序、操作流程与土地赔偿条款和标准。任何部门用土地，首先得提呈律政部长审批，确保土地征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再由内阁会议批准。

1966年新加坡在殖民地政府《土地征用法令》的基础上，制定《土地征用法令》并正式征用民间土地供政府发展使用[20]。1970年代征用土地赔偿价低于市场价，极大地便利工业化与大量建屋发展。1973年土地赔偿获得修订，改以市场情况决定购价或按地主原购地价折算。因此，1973至1987年，土地征用赔偿按1973年11月30日市场价值或土地征收宪报公布日期价格，视何者为低计算。2007年5月《土地征用法令》再次修订。

国有土地面积因之逐渐扩大，从1960年44%激增到1985年的76%，至2000年，国有土地已经是土地总面积的90%。新加坡土地稀缺，人口增长与经济需要都争地发展。除通过《土地征用法令》获得土地外，新加坡政府也通过转换原英军军用地以及填海方式获取土地，供发展之用。1966年开始填海时，新加坡土地总面积只有582平方公里，到了2002年，填海使土地总面积增加了100平方公里，2012年达到710平方公里，预计到2030年填海极限将最终使新加坡土地总面积提高到760平方公里[21]。

《土地征用法令》赋予政府强制征用土地的权力，也确立了政府对征用土地按开发前的价值进行补偿的规定。通过法令，政府控制了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并享有开发土地所带来的增值收益。1968年颁布的《国有土地条例》规定所有国有土地地契期不超过99年。政府将低密度住宅区、贫民窟、散居户地段和乡村，收拢起来成大片地块，然后以99年地契的租赁方式转给法定机构如建屋发展局、裕廊镇工业发展局等供建屋及工业发展用。土地使用均交由城市重建局负责规划、管理与销售，包括公众土地租赁。发展商须经由公开投标方式获取土地，并依总体规划蓝图土地使用规范、城市导向等准则建设。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标志（旧新）

征用乡村地段也并非一帆风顺。对依赖土地为生的菜农、养畜业者等来说，那就是打破生计，也就是失却生产依据，生活堪虞。故而，在征用土地过程中，发生许多乡民与政府的争执。加上左翼农会，如新加坡乡村住民联合会、新加坡乡村人民联合会等主导的抗争行动，征地进程受到相当大的阻扰，也激发民众的愤怒[22]。大多数的菜农和耕作者、养畜业者并不是土地的拥有者，他们获得的赔偿极其有限，如果没有生计的安排，他们将面对严峻的生活问题。在身份转化的过程中，工业发展提供了身份转换的便利。全国职总扮演着招收工人、转换农民为工人的角色，使经济生活的转变成为可能，减轻了改变的阵痛。

新加坡以《土地征用法令》作为政策依据，开展按部就班的土地整合运动，为新加坡经济发展、工业化与住房建设等基础设施提供适当价格的土地保障。新加坡的土地"改革"方式是以经济重组为动力，以《土地征用法令》将小块土地集中而有规划、有计划把土地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产生经济效应，一切都建立在照顾民生，以国家与人民生计为目标有效利用土地。土地征用主要作为一种措施，以解决屋荒与大量建造组屋，为人民提供优质住房；

[20] 网上资料http://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1f669eff-bc82-49d1-a27c-2624e4cab8c6。

[21] 网上资料 http://www.ura.gov.sg/skyline/skyline12/skyline12-03/special/URA_DesigningourCitySupplement_July12.pdf; http://population.sg/whitepaper/resource-files/population-white-paper.pdf.

[22]《阵线报》期27（第二版），1962年5月23日。

为国家经济重组，打造工业园区、商业园区。

赔偿与优先购买组屋、提供就业机会等措施大大疏解征地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也为原为小农的住民转业与转换身份提供了条件。当23个新镇建设完成，新加坡也就完成了全岛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消除了城乡差距。这同时也成就了新加坡城乡经济一体化、乡村人口职业与身份转化和产业转化。

建国之初，国家经济薄弱，人均收入低下。但人口密度与城市发展却快速增长，远超欧美先进国家。1960年政府组屋人口大约9%，到了1990年则达到87%，到2006年则下降至82%。

新加坡建国过程中，建屋发展局也历经四大发展阶段：

1960-1970：解决屋荒

1971-1977：大量增加住房供应数量，改善建筑形式

1978-1988：全面提升居住环境，增设组屋实施

1989年至今：改革组屋的素质与服务，全面实施组屋增值计划

自1960年起，大量建造组屋，解决屋荒。到1990年代，基本上解决了国民住房短缺问题，也实现了城市规划的目标，完成了新镇的建设。1980年代以来，全岛组屋区开始逐步进行增值改造，新镇建设则注重提升组屋环境规格与品质，突出地方特色，体现培育各城区文化与风格特质的城市规划目标，进一步改善国民的生活素质与居住质量。1990年代，则全面落实组屋增值计划，进一步完善城区特质培育规划与建设。各新镇以突出“新镇个性”为目标，建筑形式多样化，全面落实环保概念，推广社区伙伴理念与实践。

新加坡独特的新镇模式，体现了新加坡创新而又务实的规划思想。一系列新镇的建设，使新加坡妥善地以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乡村现代化、城市化的目标，使新加坡城（市中心）乡（实质上的农村）差距消于无形，有机地把城区与次城区、乡区建设成为一体化的大城市。新加坡新镇在城市布局、人口分布、国民住宅规划与市镇经济发展上自成体系。新镇规划与建设的成功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的典范。其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新镇规划与建设是为着体现国策、完成既定宏伟政治目标及民生政策——“居者有其屋”计划而为。

新加坡新镇规划体系，主要参照欧美国家居住区理论，但结合国情需要而创造性地发展起来。新镇规划是借鉴西方“田园城市”（Garden City）以及明日城市（City of Tomorrow）等的城市结构模式。

新镇土地利用具有相对独立的功能规划，但总体用地规划则需按照总规划蓝图的基本原则。4至6万住户或14至21万人的新镇，面积约10公顷左右。新加坡新镇基本上是一个三级结构模式：

- 小区（Precinct）：是新镇最小住房团组，约400至800户住户，或1500至3500人。设有小区中心、小区公园等公共设施与公共或社区开放空间
- 邻里（Neighborhood）：是新镇中型住房团组，约4000至6000户，或1.5万至2万人，由8至12个小区组成。设有邻里商业中心、邻里公园、公共设施服务半径400米
- 新镇（New Town）：是由8至12个邻里结合而成，占地约5至10平方公里，全镇4至8万户或15至30万人。设有服务全镇的商业中心、公共交通转换站、初级学院等教育机构、新镇图书馆、新镇体育设施、新镇公园等大型公共设施。这些公共设施的服务半径1至1.5公里

在新镇三级结构中最重要的是各级中心。对其区位、交通、规模、等级要求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6万户新镇中心的商业中心占地面积为28公顷，建筑面积规定10万平方米，包括办公楼、商场、超市、邮政局、银行、商业

街区、图书馆、社区医院、餐饮、娱乐、电影院、宗教场所即庙堂、教堂、回教清真寺等配套设施。一个5000户的邻里中心商业建筑面积需1万平方米，占地面积为4公顷，需包括日用品店铺、文具店、电器店、咖啡店、小贩中心、菜市场，以及公共与私人诊所等。

上述新镇中心、小区中心都尽可能与公共交通的中转站相结合。基础设施与其他建设用地基本上以人口比例、住宅密度、市场需求、公共设施服务半径以及环境品质、公共利益等需求作为计算、调整，并融合其地理与人文各因素为依据。

自1990年代以来，新加坡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特别注重生态环境的营造，建设与提升新加坡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新镇的建设必须依照绿色建筑的规范设计与建设。

当前，新加坡共有120万间住房单位，其中98万间是建屋发展局所提供的组屋单位。2030年人口预计增长至690万，新加坡必须有足够的土地供建房以容纳激增的人口。即从现在开始至2030年，应再提供70万间住房，到时全岛将有190万间住房。截至2016年，总共须完成建设9万间私人房产（包括行政公寓）与11万间组屋。

目前，建屋占地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占土地规划总面积的14%。到2030年，则将提高到17%。以高楼密集居住方式，解决了土地稀缺的局限。组屋的高度也从1960年代的10层楼，发展到今天的50层楼；从一座组屋仅拥有100多户人家发展到一座组屋可以容纳1250户人家或更大的规模。

鉴于人口不断增长，建屋发展局将立即再兴建三个新镇，提供8万7000间住房单位，它们是：

- 比达达利（Bidadari）1万1000单位
- 登加（Tengah）5万5000单位
- 淡滨尼北（Tampines North）2万1000单位

城市的历史底蕴与生态环境是城市文化的有生机制，是其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根基。城市规划必须重视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保持生态平衡。注重生态城市设计新理念以构筑新型城市生态文化。

新加坡注重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1年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过程中提出的“生态城市”理念，倡导与自然生态融合的人类聚居形式，在城市规划与设计方面，尊重自然的城市设计理念，具体落实建设生态城市的方案，建设城市花园或花园中的城市。

当代建筑有基本环保（智能化）要求：节能 、生态、可持续发展，新加坡在建筑文化方面积极落实建筑智能化，如节能化：利用太阳能、光伏玻璃等；生态化：平面与垂直绿化、屋顶覆土种植（空中花园）、地下净化池就地处理污水与排泄物，实现节土、节水、节能；即统一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三方面的效益。进入2000年，开始绿色住房建设。一度遭遇金融风暴而搁浅的榜鹅21（Punggol 21）濒水生态新镇计划重新启动，落实绿色生态宜居城市规划与建设宏图[23]。

榜鹅21计划于1996年正式宣布，但于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而放缓建设，于1998年正式启动，但在2003年再度遭遇金融危机影响而近于停顿。原计划建设8万个单位，至2007年止，只完成1万6000个单位。进入21世纪后，于2007年提升规划，以榜鹅21+（Punggol 21 Plus）再度启动[24]。新镇规划与建设已成为新加坡城乡建设、乡区城市化、现代化的典范案例。依据国策改变新加坡的经济结构，逐步完成乡村城市化的建设过程，城乡一体化成就新加坡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都会，避免了地区不平衡发展可能形成的矛盾以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冲突。

新镇的设置和建设也加速了新加坡经济发展，形成内需经济模式。新镇的发展离不开新加坡政府卓越的民生政策与高效的城市规划系统。新镇的规划是新加坡城市整体规划的有机部分，为总体规划所规范并刻意保留和培育地方特质的良好实例。参考世界各国的城镇住房规划建设模式，成功规划与建设了23个新镇、以高密度高楼住房结构解决土地制约问题，成就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新加坡高密度、高楼层、低楼价的惠民住房模式。

新加坡在国民住房的建设上，采取“居者有其屋”的利民政策，并具体落实有关计划，赢得国民的积极支持。住房建设政策采取的依国家经济水平、提升人民生活素质要求、现代化生活需求等因素循次渐进，逐步升级，提升组屋的建设水平、优化结构、优化各项设施，优化住房面

[23] HDB "Green Living by the Waters," *HDB Annul Report* (2011), pp.8–30.

[24] *Ibid.*

积以满足人民不断提升的要求，从而使新加坡组屋建设达到现代化公寓水平。在建设新组屋的同时，实施旧组屋的翻新、提升计划，使组屋居民受惠，并使旧组屋区整体形象得到提升，改变刻板的新镇面貌和市容。从仅仅满足住房需要逐步提升到绿化生活、持续性发展和宜居生态建设，新加坡新镇与住房建设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模式。

社会保障制度

有别于欧洲福利国家的制度，新加坡的社会保障政策更注重国家、社会与个人三方面的责任结合。深感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制造懒人、造成国家在这方面的沉重负担的弊端，新加坡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符合国情的改革，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订。特别突出之处，在于重视个人方面的责任以及社会的支持。

中央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简称CPF）制度是新加坡社会保障的主体，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养老保障制度。新加坡把建国前英国人建立的公积金制度完善化，使之成为新加坡独一无二的社会保障体制。公积金最大的特点是人民负有相当的社会责任。

二战结束，英军政设立公共援助计划，援助二战受害者。1946年，成立社会福利部，将援助计划扩大至病患者与入狱者及其家属。1951年，殖民地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调研有关新加坡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可能性。委员会提呈了养老金（或称退休金）计划与公积金计划两种方案。殖民地政府最终采纳了公积金计划，原因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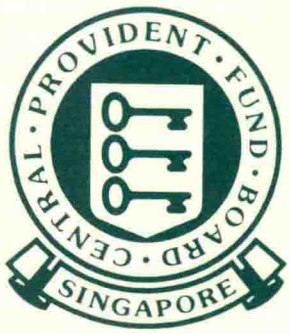
- 当时劳工薪金很低，约90%的人收入不足200元，其中有些不足100元
- 在这低工资的基础上建立的养老金不足以应付基本生活保障

1953年，英殖民地政府制定了《中央公积金法》（Central Provident Fund Act）。1955年正式施行中央公积金制度，专司公积金制度的实施与管理。中央公积金局于1955年7月1日正式成立，是劳工部属下的法定机构。它按公司管理结构营运，由董事会领导。董事会由政府代表、雇主代表、职工代表及专家学者组成[25]。

中央公积金局依据《中央公积金法》对公积金进行收缴、储存、结算、使用，并实行规范化、企业化、制度化管理。公积金的管理独立于新加坡政府财政之外，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公积金是一种制度化的强迫储蓄计划，这种储蓄积累到退休时，数量可观而足于养老。

无论任何人，只要有工作，都必须遵从公积金的规定，将收入的一部分扣除出来，存入公积金其个人账户，而资方也必须依政府规定按其员工薪金的百分比计算的金额，一并存入该员工的公积金账户。这是依法律照办、律法保障员工利益的措施。公积金由公积金局统筹管理并作为国家资产，依法进行低风险投资增益。

公积金分成数个账户，分别为普通账户、特别账户、保健储蓄账户及退休账户。各个账户按数额给予利息。公积金利率每年检讨一次。普通账户年利2.5%；特别与保健储蓄账户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标志

[25] 网上资料http://mycpf.cpf.gov.sg/CPF/About-Us/HistoryofCPF.htm。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8 月 15 日

《联合早报》上网，深受读者欢迎

年利4%，退休账户年利4%[26]。

公积金缴交率历年来多有变化。最高达个人及雇主分别需缴交薪金总额各25%。金融风暴或经济不景气时期，为减轻雇主的负担，雇主缴交率一度调低至10%。

公积金的设立最初只是作为一项退休金的储蓄制度存在。今天，公积金制度已经完善为融合养老、医疗、住房等保障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27]。

新加坡建国后，为满足人民在家庭保障、住房、医疗、教育与投资的需要，不断引进创新计划，扩展公积金所能照顾的面并逐渐完善其相应的管理条规，但始终恪守其基本原则，确保公积金持有人在退休后能保持经济独立，维持基本生活和医疗保健的开支。因此，从创始至今，公积金制度在不同时期提出相应的措施，满足国人的愿望。

1968年，公积金制度容纳了公共住房计划。允许国民以公积金存款购买政府组屋，即从公积金中扣除组屋的每月分期付款。1984年，公积金设立医疗储蓄账户，允许国民以公积金医疗账户中的存款支付个人或直系家属成员的医疗费用。1990年，设立一项重病医疗保险计划，称为“医疗保险计划”或称“健保双全计划”，允许国民以医疗储蓄账户存款购买保险，以应付重病与长期住院的医疗费用。1992年，原本只照顾雇员的医疗储蓄计划扩展到自雇人士。1997年，公积金局为使公积金储蓄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帮助会员的储蓄的累积增值，推出公积金投资计划。这计划逐步完善化，前后共推出五项投资计划：

- 新加坡巴士有限公司股票计划（1978年）
- 公积金基本投资计划（1986年）
- 非住宅房地产计划（1986年）
- 教育计划（1989年）
- 公积金投资增进计划（1993年）

1997年，公积金基本投资计划与公积金投资增进计划合并为中央公积金投资计划。建国以后，新加坡政府有鉴于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增强公积金的保障功能，对公积金缴交率也因之一再调整。

殖民地时代，1955年伊始，人们工资收入较低，缴交率为工资的5%，并以50元为缴交顶限。建国后，自1968年起，缴交率为略微提高至6.5%。1970年起，缴交率为8%。1971年起，缴交率为10%。此后逐步增加到1982年的22%到1984年的25%。维持四年后，开始逐步下降至1994年的20%。1986年起，总缴交率为35%。1995年起，开始差别化的缴交率。为减轻雇主的负担，降低雇主的缴交率，55岁以上员工，公积金缴交率递减[28]。

2007年，65岁以上老人人口达30.6万人。至2030年，将达79.6万，届时，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1/4强。早年退休年龄为55岁，并可全数领取公积金。1987年起，中央公积金局推出新措施，规定国民必须在领取公积金时，必须留下一笔“最低存款”，成为“最低存款计划”。

- 退休成员公积金户口仍需保留最低存款：$94,600
- 2007年7月1日最低存款：$99,600
- 2008年7月1日最低存款：$100,600
- 2013年起最低存款目标：$120,000

医疗储蓄户口也必须维持最低存款额：

- 最低存款：$28,000
- 2007年7月1日最低存款：$28,500
- 2008年7月1日最低存款：$29,500
- 2013年起最低存款目标：$33,500

随着老人预期寿命以及生活成本的增高，最低存款是养老的第二重保障，是为预防老人陷入贫困时仍能有所照顾而设。公积金局为预防通货膨胀等因素，对最低存款额也逐年进行调整。2003年的规定是8万元，2009年则提升到11.7万元，2013年则提升到12万元。如果最低存款不足，可自行以现金填补，或以公积金购置的资产作为抵押，但其数额不能超过最低存款的50%。1987年起，会员最低存款可由子女自愿代为填补，1995年起，会员可为配偶填补其最低存款。领取最低存款年龄与退休年龄的提升挂钩。1999年之前为60岁，1999年起，退休年龄提升至62岁，提取最低存款年龄亦提高到62岁，至今未变。会员可按月提取数百元以应生活补贴之需。

2007年达到62岁的会员可每月从最低存款中提取790元，为期20年或数额耗尽为止。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对最

[26] 网上资料http://www.mom.gov.sg/employment-practices/employment-rights conditions/cpf/Pages/default.aspx。

[27] 网上资料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Provident_Fund。

[28] 网上资料http://www.singaporebudget.gov.sg/data/budget_2014/download/annexb2.pdf。

低存款提取的时限与数额将在近期重新加以考虑。政府考虑将提取最低存款年龄从62岁提升到65岁。从2012年开始，每两年上调一岁，至2018年时为65岁。也在2012年，政府鼓励雇主在员工62岁退休时重新雇用他们至65岁。“延后提取花红”是一项新措施，由于53至58岁的会员将受此政策的影响而于65岁后才能领取最低存款，政府特别给予一次性的“奖励”花红。如58岁至62岁的会员愿意延后领取最低存款，也能获得一笔“自愿延后红利”。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则是另一项措施，2009年9月正式实施。可以最低存款向指定保险公司购买终身年金。目前会员可自行选择，而非强制性措施。政府考虑在将来强制会员购买终身年金。

这项计划目的在于确保国民在最低存款提取完毕后，不至于陷入生活困境。最低存款无法保证长寿老人的生活保障。此项计划让会员可以在最低存款提取年龄时起，获得计划所提供的每月入息直到终老。这是对仅有20年时限的最低存款的进一步的改进保障。在2009年年满55岁或以上年龄的会员，退休账户中有存款，可立即加入此计划。2013年起，凡满55岁会员，账户中拥有4万元以上数额，则自动纳入此计划。加入此计划的最大年龄为80岁。

1984年公积金局推出医疗储蓄计划（Medisave Scheme）。1992年，自雇人士亦纳入此计划中。医疗储蓄计划旨在为会员做未雨绸缪以应付日益高涨的医疗费用。为使老年会员有足够的储蓄以支付医疗开支，中央公积金局规定医疗公积金账户中必须有一笔“最低医疗存款”。2009年起，这最低医疗存款从2万9500元提高到3万2000元。相应的，医疗最高存款额限定也从3万4500元提高到3万7000元。

医疗保险计划（Medishield Scheme）是一项非强制性的重病医疗保险计划。公积金局允许会员以医疗储蓄账户款额，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或参加医疗保险计划；于1990年7月正式推出。由于医疗储蓄计划只能应付一般基本医疗费用，无法支付重病开支和手术费用，购买医疗保险实属必要。此计划可帮助会员支付每天高达150元的医疗费用，足以支付B2及C级病房的费用。1994年，中央公积金局再推出医疗增值计划（Medishield Plus Scheme），亦由会员自行确定参加与否。其保费额较高，分A及B两类。A类支付每日医疗费上限为625元。B类则为375元，足以支付A级和B1级病房费用。年龄不超过80岁的会员均可加入，保险费可从医疗储蓄账户中扣除，惟其保费数额不得超过660元，余数须由会员以现金填补。自2005年起，医疗增值保险计划转由新加坡职总英康保险合作社作为一项私营业务。

老人保障计划（ElderShield）是由新加坡卫生部于2002年推出，专为严重残疾老人而设的保险计划。此计划为残障老人提供基本资金保障，为他们支付因严重伤残导致劳动力丧失而造成的费用与开支，是一项长期护理保险。参加此计划的老人每月可获一笔现金资助，惟资助期有限。如属公积金会员，则在40岁时，将被自动纳入老人保障计划。参加老人保障计划的保费可从医疗储蓄账户中扣除，或由家属垫付。2007年卫生部对老人保障计划进行了两次改革：

- 增加支付额，从300元增加到400元。延长支付时限，从60个月延长至72个月
- 提高更高补助额，推出老人保障辅助计划（ElderShield Supplement），其保费可从医疗储蓄账户中扣除，但总额不得超过600元

为确立老龄住房的保障，公积金也为会员提供两项住房保障，即公共住房计划与住宅房地产计划。这两项计划都为老人在晚年保有住房提供了保障。1968年，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公积金局允许会员以其公积金20%普通账户存款支付购买组屋的首期付款及其分期付款。条例后来逐渐放宽，如存款不足时，会员可向建屋发展局申请贷款，并以后缴的公积金

相关人物

林清祥

历史事件

2月5日

新加坡左翼政治和工运领袖林清祥因心脏病逝世，终年62岁

分期偿还。贷款额可高达房屋估价的80%。

1981年，公积金局设立了住房保护计划，以保护会员或其家人不因意外或失去工作能力时，无法付清房贷而失去住房。会员可从普通户口中一次性扣除保费，保费依据房贷额数、偿还时限、屋主年龄及性别等情况计算。如会员是唯一屋主，则需以贷款总额投保。同年，中央公积金也设立了住宅房地产计划，允许会员以公积金购买具有60年以上地契的私人房产，限定会员仅能以普通户口支付房产的首期付款的10%。公积金住房保障功能让老人“以房养老”。新加坡仿效西方模式“以房养老”的实施取得成功。具体方面有以下几种：

- 可以全部或部分出租组屋以换取养老开支
- 置换现有较大组屋为较小组屋，所得作为养老开支
- 将房屋依政策抵押给金融机构，换取现金以支付开支
- 将组屋部分分层地契卖回给建屋发展局，屋主仍居住于屋中，这就是“屋契回购计划”，以换取现金用以养老

在住房方面，政府还特别关照老人的心理、生理的各种需求，因而在住房及其环境设计上多加考虑，提供以下各色住房：

- 老年宜居住房
- 多代同堂住房
- 老年友善型居住环境
- 乐龄公寓

除上述公积金计划所提供的老年医疗与住房保障之外，新加坡在养老方面尚有三种模式的制度性养老措施：即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

新加坡政府特别重视家庭观念的稳定与延续。建国总理李光耀一再强调家庭是“巩固国家、民族永存不败的基础”，并极力主张儒家三代同堂的家庭传统，因而家庭养老一直以来便是新加坡最主要的养老模式。

然而，当前重功利现实社会，传统孝道价值观念已经渐次失却其对青年人的约束力，必须诉诸法律手段以维护老人。新加坡国会于1995年通过《赡养父母法令》（Maintenance of Parents Act），规定子女必须照顾与赡养年迈的父母，不履行者将遭惩罚或判刑。政府并专设赡养父母仲裁庭，专门处理此类案件。对歧视、虐待、遗弃老人者予以法律制裁，罪名一旦成立，轻则罚款，重则判刑。

此外，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福利政策对家庭养老给以积极支持，诸如：鼓励子女与父母同住，在住房政策上给予三代同堂家庭价格优先安排；单身子女不得租赁或购买组屋，但如与父母同住，则可优先照顾；如父母有一人去世，该房屋可获减免遗产税，但子女必须要一人与丧偶的父或母同住；如果纳税人与父母或残疾兄弟或姐妹同住，则纳税人可获税务扣除。1993年公积金局推出12项“公积金填补计划”（CPF Minimum Sum（MS）Topping-Up Scheme），以津贴方式协助赡养老人家庭减轻负担。这包括住房补贴与停车补贴，以便子女能靠近父母居住与探望父母。公积金填补计划中有四个为“敬老保健金计划”（Dependants' Protection Scheme（DPS）），鼓励子女为父母甚至祖父母填补公积金，并可将填补数额扣除税务。此外，为低收入家庭的老人，政府尚提供医疗津贴。

社区养老事实上是家庭养老的延伸，依仗社区的资源和扶持，其覆盖的范围较广。社区养老可以辅助家庭养老的不足，并可满足老人晚年生活的社交要求，纾解他们可能产生的心理压力。社区养老是一种“就地养老”或“原地养老”的养老理念。这是让老人在他熟悉且喜爱的社区、社会与人文环境度过乐龄时光。

社区养老有助于减轻相关机构的压力、减少政府在养老机构建设的财政支出。更重要的，它有助于建立一个新加坡政府极力提倡的3P（政府、私人机构、社区与个人）的互助与共同承担的机制。

在社区内实行照顾的方式是利用社区正式照顾资源，使服务对象在社区的中心或在家庭（上门）获得照顾。其资源或为政府所设，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或社区本身所建立或设置小型、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

由社区负责照顾则是利用非正式照顾资源，使服务对象在家庭接受照顾和服务，正式照顾资源只发挥辅助作用。

为社区进行照顾，则是在社区内任何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成为照顾对象，包括弱势群体。以服务对象为本的理念使“由社区负责照顾”提升到“为社区进行照顾”，扩大了照顾面并使正式照顾资源与非正式照顾资源相结合，成为社区丰富而相对完整的照顾资源体系，增进了社区养老的包容性。

社区养老提供持续性的照顾与服务，对社区老人的服务大多由志愿团体的福利组织和私人机构提供，服务类别有照顾者（Caregiver）支持服务[29]、社区个案管理服务[30]、咨询辅导服务、家务助理服务、交友服务、邻里联系与乐龄活动中心与乐龄日间护理中心等。

2008年，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与体育部连同卫生部共同推出一项“康乐计划”（Senior Citizen Recreation Program），在全国六个地区设立“康乐中心”（Senior Citizen Recreation Centre）。中心作为一站式服务设置，主要提供为老人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医药等信息咨询、日常护理、举办社区老人（乐龄）活动等一站式服务。每个中心配置有两名训练有素的老龄指导员专为社区老人提供上述服务。

到2009年，新加坡共设有22间乐龄日间护理中心与19间乐龄活动中心。此外，政府拨款1800百万元，从2009年起，在五年内，以其中500万元增建六间乐龄日间护理中心，1300万元增建22间乐龄活动中心。

机构养老指一般所谓养老院、安老院等形式的院舍养老照顾的一种。除提供生活照料之外，尚提供医疗、护理等服务。

新加坡政府对养老机构的发展提供大力度支持。政府提供养老设施90%的建设资金，为养老机构服务的运作成本提供津贴，实行“双倍扣税”鼓励政策，并允许获得认证与批准的养老机构向社会募捐。

新加坡的养老机构有几个类别。第一类为社区医院，它是介乎正规医院与社区之间的过渡性医疗建设，是一种康复中心的设置。新加坡目前有七家社区医院。

第二类为养老院（Nursing Home，安老院）。新加坡养老院有几种类型，即政府资助福利机构养老院、非资助志愿福利机构养老院、商业性私营养老院、疗养院（严重疾病高级护理特殊老人院）。新加坡政府于1999年2月通过《老人院法令》（Homes For The Aged Act），对养老院的设立、标准、审核、管理等方面，作明确规定，以立法的方式对养老院进行规范并对相关规定严格强制执行。

第三类为临终关怀机构（Hospice），专为在结束医疗后的绝症老人及其家人提供临终服务的机构。按其所提供服务的性质分别又分为三种，即第一种是日间临终关怀服务，通过康复训练与社交活动改善绝症老人的身心机能而设；第二种为家庭临终关怀服务，即照顾人员上门进行对绝症老人的护理以减轻其症状与痛苦的服务；第三种为临终关怀机构服务，即对无法在家中护理而生命期少于三个月的绝症老人在机构中提供护理和各种旨在减轻病人痛苦的服务。

此外，尚设老年庇护所。这是专为无依无靠孤独老人，或无法与家人共住的老人而设的居所安排。一般建在社区中，使老人能在社区中独立生活，并参与社交、娱乐活动，保持身心健康及与社区融合。

至1996年末，新加坡由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养老院共收容4213名老人，占养老院收容87.9%。1998年，新加坡共有超过40间由社会慈善团体建立的养老院、30多家私营养老院。由社会团体组织的乐龄俱乐部超过300间。

---

[29] 新加坡超过85%的老人与家人共住，其中29%老人需要至少一名家庭成员提供个人生活日常照顾。这造成这名家庭成员的重大压力，社区所提供的“照顾者支持服务”在这方面起着关键辅助的作用。服务项目包括：热线求助、转诊、协调、提供建议、信息发布、培训、外展服务、公共教育、支持小组等。

[30] 社区个案管理服务由社会工作者及护士提供的专业个案管理服务。个案管理的目的在于对老人的需要作出评估，并一同评估提供相应的支持服务；协助老人积极参与社区社交活动，保持他们的活力，延缓他进入养老机构；为照顾者提供协助、减缓他们的压力。老人可通过个案管理服务申请各类医疗、社交等社区服务。

民防国防政策

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只有两个步兵营、两艘军舰，兵员不足1000人。新加坡实行国民服役制度，男性公民或永久居民年届18岁必须服兵役两年至两年半。然后成为后备军人，到40岁才能退役。新加坡现有正规军约14万人、后备军人25万人。正规军人则要到50岁才能退役。

新加坡发展高科技水平军事装备、军队具现代化作战能力。新加坡领导人认为确保新加坡安全，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国防力量才足于应对外来的威胁。新加坡故而也积极从事军事科研、发展国防工业。新加坡加入五国联防，与英、澳、纽及马来西亚签署军事安全条约。新加坡也履行国际义务，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护和平运动。

新加坡推行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积极发展与推动东盟事务，以共同维护区域和平、安全与繁荣。

新加坡采取淡化意识形态差异和务实主义作为国际外交策略，实行大国平衡政策。为保持区域稳定，新加坡支持美国维持其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以保持区域军事态势均衡。新加坡抵御西方极端民主、自由与人权政策，但积极发展与各国密切的经济外交。

由于地小人稠，高楼居住环境，一旦面对战争威胁，缺乏广大的幅员以作为保安的后方。新加坡人民必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居民必须具有保护社区安全的责职。政府向人民灌输全民国防、全民民防、维护国家安全、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危机意识和保安训练。全民国防与全民民防是新加坡总体防卫的策略和措施，分成军事防卫、民事防卫、经济防卫、社会防卫与心理防卫五大方面[31]，有助强化社会凝聚力、国家认同与人民集体防卫的建设和实施。

因时制宜

顺应时局的变迁，新加坡不断改变国家应对局面和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策略，在不同时期采取适当的国家政策解决国际外交与地缘政治问题、严峻的经济发展问题、民生问题、社会问题，取得卓著的成效。

建国伊始，一面以威权治理手段，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左翼政治，掌控政治主动权，稳定政治局面；一面采取和实行有效的民生政策和措施，稳定社会治安。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急速开展工业化进程，制造与提供就业机会、建设经济基础与实力；建立全国职总，掌握工运主动权、遏制工潮、建立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面对住房的严峻挑战，设立建屋发展局，大量建造组屋，解决屋荒状态及全民住房问题；以新镇规划与建设完成组屋区建设的目标，逐步完成新加坡城乡一体化，建设为现代化的都会。积极建军，精兵强武，全民国防、全民民防，打造坚实的军事保卫力量，保家卫国。

一个政党是否具有为国为民的真实意愿，不在于其政治纲领的堂皇与否，而是其具体设施的实效性，其是否有落实政治纲领的策划与规定，其政策是否真实惠民。检验和衡量一个政府的好坏，在于其长期执政过程中，是否实现其对人民所作的承诺，以及在国家发展和民生政策上是否具有实质性的成效，使国家不断向上向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是否不断获得改善和提升。

国际与国内形势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将可能不断出现各种预计不到的变数，任何一项规划也因此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或天衣无缝，在50多年的发展中，新加坡也多次交了不菲的学费，有血的教训和严重的经济损失以及其他的经验教训，重要的是能从中获得教益，调整步伐和发展计划，改变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局面。

国家的策略与政策深重影响和改变国家的外在实体形象与其国民的精神面貌。新加坡人从手到口、赤足的乡村居民到今天的丰衣足食、四处旅游，人均收益从建国初的600元到今天的6万多元，全岛城市化，现代化，高楼林立，公路四通八达，公共交通堪称世界第一，全赖一个廉洁的政府及其效率特高的行政机构，及其具有实效性的政策贯彻始终所致。

新加坡从转口贸易打造的市区中心加上大片落后的乡村，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便整体逐渐改造为现代化都会，并因注重环境绿化建设，使新加坡成为花园城市。现正从花园城市逐步建设成花园中的城市，发展和使用洁净能源、

[31] 网上资料http://www.scdf.gov.sg/content/scdf_internet/en/cor。

建屋发展局组屋抽签仪式（1960年代）

绿色建筑，以达致持续性发展规划基本要求，把新加坡提升为生态宜居的智慧城市。这些目标的实现有赖国家策略与政策的长远规划与切实履行，并以法治确保其贯彻始终。世界上许多城市国家大都难以生存，新加坡作为亚洲唯一城市大都会的生存条件，依赖的除了人民的团结一致，国家策略与政策的正确把握和持续依法有效执行至为关键。

新加坡的发展经验足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借鉴，印证其国策、政策获得实质发展成效。新加坡是一个最具规划意识的国度，凡事都先行策略、战略的研究与规划，才形成政策加以实施，并在实践中不断检讨和改进，以达最佳成效为目的。成功的策划必须具备宽阔和长远的视野，新加坡的任何规划都尽可能以50或60年或更长的远景作为考量的基础，并在每十年及每五年作检测和调整，以完善规划并使之不仅具有前瞻性，还具时效性、实质性和务实性。政府效率的表现体现在对时势变化的迅速应对。新加坡的应变能力、速度、效率来自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精简性、高效性与机动性。没有叠床架屋的臃肿结构、没有各层官僚的扯皮、由上而下一步到位的执行和管理机制、雷厉风行严厉管制与惩罚分明的问责制、讲求实效与业绩的成果衡量等机制都在在保证了领导层闻风而动、急速应变的体制支持。

新加坡以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外资创建的经济奇迹，从不断的积累中再以国家资本进行高科技的投资与发展，从所得利益中进行再分配，用在国家建设与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李光耀及其团队以独到的视野和廉洁与高效率的行政组织，使新加坡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便从第三世界跃升到第一世界，这是新加坡发展的建树奇迹。具有实效的国家政策实施的结果成就了新加坡国家形体、国际形象、都市面貌、人民生活素质、精神面貌的重大变化，显现向上向善的发展而跻身世界先进国家之林，这其实是在一党独大的体制下完成的。新加坡政治体制的民主进程也从威权统治，到威权管治，到威权治理，循次渐进，逐步实现民主开放。一党独大并没有封杀民主机制的实现，新加坡不得不庆幸有这样一个具有政治智慧、使命感与自律性强的领导人物组成的政党及其所组成的政府，引领国家与人民在汹涌的波涛中稳健向前。

国际形势变幻多端，社会急速发展，弱势团体和个人在这样激烈的社会转型中自然面对极大的挑战，赶不上生活水平的提升，而逐渐被边缘化，从而收入赶不上开支以致趋于贫穷。他们是需要国家和社会照顾和协助的一群。政府也已经注意到这方面政策的欠缺，也开始有了大幅度政策的改变。许多在经济和社会前进的步伐中由于各种因由而致落后于形势，或遭到淘汰命运，或被边缘化的中产和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2 月 19 日

胜安客机从雅加达飞返新加坡途中在巨港坠毁，机上 104 人全部罹难

小资产阶级，因而产生各种抱怨甚至愤怒，则在所难免。近年来，各种反对势力的崛起，反对党人数的大量增加以及支持执政党的选票的大量滑落，都在在证明社会不满情绪递增。政府必须严正对待精英主义以及官僚主义所造成的偏差，近期在人口问题上，对外劳与引进人才；在公积金问题上，对如何管理、提取存款等一系列措施方面都引发诸多论争，政府在政策上需要做全面的调整与改革确实在所难免。国家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性在面对挑战之余，政治智慧与实实在在照顾民生的政策至为关键。起自2014年末，政府颁布一系列为低收入弱势群体特设的辅助、补贴措施；建国一代医疗照顾配套；以及2015年初派出的新春红包“乐龄补贴计划”，构成现行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此外，还提供一系列在职技能培训；中专、大专教育体系的中高技术及未来技能培训补贴、津贴以及各项针对性强的扶贫经济援助配套。这些都显然昭示政府听取民意、体恤民情的举措，确实落实务实关怀民生的国策。虽然面对国际经济持续不稳的可能性，2015年的财政预算却还提供诸项惠民举措，并略带“劫富济贫”色彩，展示政府对国家发展仍然胸有成竹、信心十足。

第三节　经济转型的新加坡
——回顾、反思与展望（1965–2020）

摘要

新加坡在独立前面对内忧外患，在不具备建国的条件下退出马来西亚，通过强势的领导和执行力，在没有天然资源的困境中茁壮成长，由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落后和贫穷的国度，转变成为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度。凭着坚定的意志和建国的情操，开启迈向求生求变求差异的昌盛之道。本节详述有关新加坡从单元经济转型到高科技的过程。

Abstract

In the pre-independent days, Singapore was confronted with domestic concerns and external threats, it also had to leave left Malaysia and build a nation under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and conditions. Through robust leadership and executive power, and inspite of its lack of natural resources, Singapore rose from backwardness and poverty to steadily transform into a homeland that enjoys economic vibrancy, social security and racial harmony. With strong determination and passion for nation building, Singapore marches firmly towards the path of prosperity fighting for survival, seeking change and making a difference. This section provides an account of the transition of Singapore from a rudimentary third world economy to a multi-dimensional high-tech world class cosmopolitan city.

陈企业　郭明忠　刘丹彤（Tan Khee Giap　George Quek Meng Tong　Liu Dantong）

建国前的新加坡海岸线

回顾过去不仅在于铭记那段艰苦的岁月，更重要的是要更好地理解新加坡在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是如何克服恐惧与焦虑，在这条漫长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转型，从而蜕变成为如今的国际化大都会。只有通过更好地了解新加坡开国领袖和建国一代新加坡人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才能从容乐观地继续向前迈进。

新加坡、马来西亚与香港五十年经济表现

相对而言，横向比较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的经济规模或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比较能简要突出相对的经济表现。因为50年前，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道扬镳，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因此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同时，新加坡也把香港作为参照，因为二者都是城邦经济体，人口规模接近，尽管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如图表（一）所示，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领先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经济规模在1980年代和2000年后急速扩张。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特别是在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2008年，香港的经济规模增长放缓。自2009年起，香港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强势赶超，乃归因于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没有受到全球金融海啸太大的影响。

马来西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包括种植物、出口货品、天然气和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脱离时，马来西亚有着更大的人口基数。尽管如此，新加坡在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稀少、国内市场规模有限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在过去的50年间，在经济规模上紧追马来西亚。然而，自2011年起，两个经济体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差距开始小幅扩大。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建设瓶颈、人力资源的限制以及国内要求放缓经济增长的政治压力，有可能会进一步限制新加坡未来的商业和经济活动。

如图表（二）所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新加坡与香港基本持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略落后于香港。但自2004年起，新加坡大幅超越香港。一方面是因为新币走强升值，另一方面则因港币自1984年以来一直采取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

到2013年，有着560万人口的新加坡，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是5万5182美元，而有着780万人口的香港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3万8123美元，比新加坡低30%。马来西亚的人口为2800万，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7年略有下降，自2010年起始终徘徊在1万美元左右的水平。如此令人担忧的表现值得进一步研究。

接下来的部分，笔者会对比马来西亚和香港，具体阐述新加坡经济增长的精髓，特别是新加坡政府发挥的作用以及相对他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笔者会分析一些新加坡遇到的问题，找出因极具挑战性的经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课题以及其对未来潜在国内生产总值走向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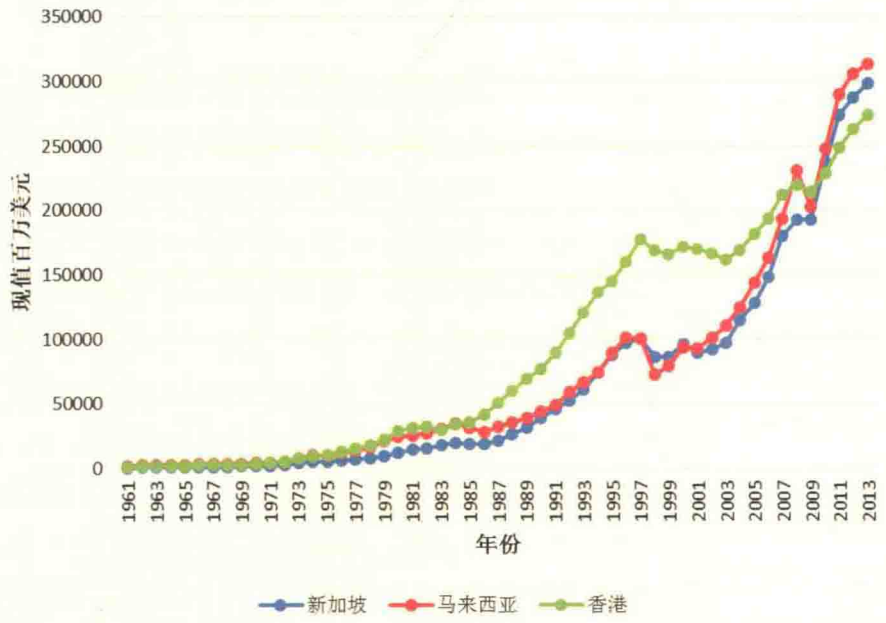
在第二部分，笔者会研究新加坡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以来的主要经济指标，看看新加坡向前迅速推进了多少。笔

者进一步分析了两国不同的政策措施是如何从根本上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成果。这的确是一个宝贵的“对照经济实验”。以此来对比两个自独立以来就一直长期执政的政府基于发展愿景、承诺和战略顺序上的不同。

在第三部分中，笔者将探讨过去50年中，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周期和趋势，及其相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增长模式的过程。公共政策必须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改变，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国际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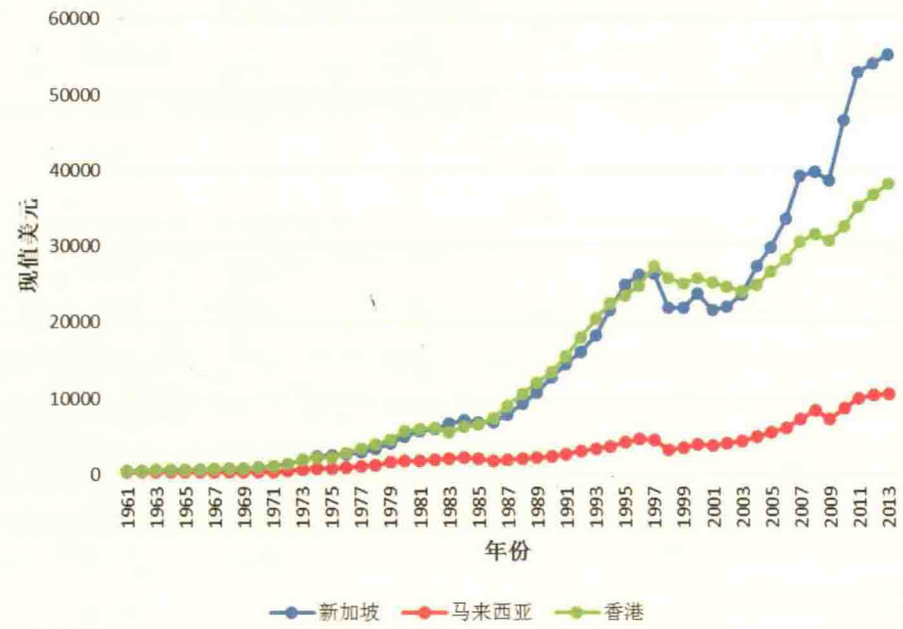
随着新加坡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在第四部分中，笔者以香港为参照，观察这两个高度全球化城邦经济体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不同表现以及两者所遇到的民怨和不满。这些问题

图表（一）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1961–201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15），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

图表（二）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的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1961–201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15），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

相关人物

李光耀

历史事件

9 月 16 日

由《联合早报》负责翻译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举行首发仪式

可以通过两个政府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来解释。

第五部分讨论如何满足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期望，以及应对多变的外部冲击所面临的困难。作为一个开放的小型经济体，新加坡几乎无法掌控这种外部冲击。

在第六部分，笔者不做“水晶预言”，而是通过总结来反思未来新加坡人和香港人所需要的，且做了决定就必须接受的社会类型和战略顺序。

新加坡经济增长的精髓

50年以前，新加坡出人意料地在1965年8月9日一夜之间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像其他新成立的国家那样，新加坡并没有大肆庆祝或宣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新加坡没有经济腹地，面对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存在的敌意，加上国内政治社会动荡，新加坡在震惊与无奈中，开始了建设国家的艰难历程。

爆发于1964年7月的一场严重的种族暴动，促使政府宣布实施戒严。1965年7月又发生了一次更严重的种族暴动。这个岛国的社会结构特点是多元种族，不同族群的宗教和语言都是不同的。与邻国印度尼西亚之间爆发的对峙在1960年代一直持续，直到1966年8月一项和平协议的签署才结束。而另一场由左翼分子领导的街头暴乱则贯穿整个1960年代，它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了经济发展，使得多元种族社会间的紧张关系一触即发。新加坡的长期稳定受到了严重威胁。经济状况持续低迷，失业率高达5.6%，实际经济增长率在1964年下跌了3.7%。

对于许多民众和海峡两岸的政治领袖来说，当时的新加坡既没有先天的优势，也没有足够的条件成为一个可以继续发展的国家。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人曾经质疑新加坡是否能顺利成功地发展，但是新加坡做到了，余下的都已成为历史。今天的新加坡共和国是一个非常宜居、有着高经济效益的国际大都会。在任何国际尺度的衡量下，新加坡都具有着最和谐的种族融合、理想的劳资关系和高度稳定的社会，所有这些都不是与生俱来理所当然的。

新加坡开创性成功的奠基石在于政府的辅助性作用，其体现于通过积极精简、腐败零容忍的公共服务系统来制定务实的公共政策。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新加坡通过首创性地推行共同支付的中央公积金（CPF）制度，实现了85%的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中央公积金是一个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交存入的制度，由此减轻了国家福利系统对于政府的沉重负担。

由于缺乏自然资源禀赋，新加坡别无选择，只有通过建立高质量的学校、理工学院和大学来对新加坡人的教育进行长期投资。尽管这样的人力资源投资可以更早更大规模的实施，但这样的计划却因为财政资源需要投入到其他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受到限制，从而导致建国一代的本地员工在工作技能上的劣势。由于新加坡通过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简称EDB）积极吸引并设法留住跨国企业的投资，且制造了无数的就业机会，本地员工的工作技能很快就过时了，不能适应新就业岗位的需要。

经过几十年，新加坡共和国已经持续不断地建成了一个综合的全岛范围内的基础设施系统，包括道路、快速公路、大众捷运系统以及可持续的环保绿色生态系统。回顾过去，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本可以再提升几个等级以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为求谨慎，必须平衡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一是不确定的潜在经济表现；二是日益加重的政府支出。只有平衡了二者的关系，政府才能在开支上有充裕的资源，应对快速人口老龄化和多年良好的医疗服务带来的人均寿命延长问题。

新加坡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不断增加的人口在2013年达到了560万。为了发展并实现临界质量效应，新加坡在1990年代初就通过新组建的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International Enterprise，简称IE）着手推行外翼政策，帮助新加坡公司拓展海外市场，以克服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新加坡因此成功地通过国际贸易与服务进入了全球贸易网络。目前，通过运营高效的金融、航空、海运、物流和电信中心，新加坡的国际贸易与服务总量达到了其自身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几十年来的经济扩张非常成功，新加坡创造了大量的白领和蓝领工作岗位，以至于本地劳动力已经不足以填补这些空缺。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决定“进口”外籍员工，包括专业人士和体力劳动者，但这也给新加坡的成功之路带来了一些问题。

经过几十年稳健的政府预算，和建立诸如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简称GIC）和淡马锡控股公司等专业投资工具，新加坡已积累充裕的财政资源。只要能作为一个群体理性地思考，并能够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保持团结并对行为负责任，新加坡拥有的资源就可以被用于应对和解决未来的挑战，和潜在且持久性的外部冲击。

1965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为9亿7000万美元，相较于拥有32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马来西亚，不足三分之一。此后，新加坡的经济迅速发展。1977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已有马来西亚的一半，1987年几乎达到69%。以后新加坡继续发展，并且在1997年达到与马来西亚齐平，两国在1987年和1997年之间均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推进。新加坡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在2007年和2013年间，其经济规模徘徊于马来西亚的95%左右，如图表（三）所示。

图表（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主要经济指标（1998–2013）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与基尼系数

财政年度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 基尼系数		失业率		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新加坡
1998	-7.4 %	-2.2 %	3.2 %	2.5 %	5.3 %	-0.3 %
1999	6.1 %	6.1 %	3.4 %	2.8 %	2.7 %	0 %
2000	8.9 %	8.9 %	3.0 %	2.7 %	1.5 %	1.4 %
2001	0.5 % (0.46)	-0.9 % (0.45)	3.5 %	2.7 %	1.4 %	1.0 %
2002	5.4 %	4.2 %	3.5 %	3.6 %	1.8 %	-0.4 %
2003	5.8 %	4.4 %	3.6 %	4.0 %	1.0 %	0.5 %
2004	6.8 %	9.5 %	3.5 %	3.4 %	1.5 %	1.7 %
2005	5.3 %	7.5 %	3.5 %	3.1 %	3.0 %	0.4 %
2006	5.6 % (0.46)	8.7 % (0.47)	3.3 %	2.7 %	3.6 %	1.0 %
2007	6.3 %	9.1 %	3.2 %	2.1 %	2.0 %	2.1 %
2008	4.8 %	1.8 %	3.3 %	2.2 %	5.4 %	6.5 %
2009	-1.5 %	-0.6 %	3.7 %	3.0 %	0.6 %	0.6 %
2010	7.4 % (0.44)	15.2 % (0.47)	3.4 %	2.2 %	1.7 %	2.8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987–1997	1998–2008
马来西亚	8.9 % p.a.	4.4 % p.a.
新加坡	9.2 % p.a.	5.2 % p.a.

国内生产总值规模	1977 / 1987	1997	2007	2013
马来西亚	140/320亿美元	1000亿美元	1940亿美元	3130亿美元
新加坡	70/220亿美元	1000亿美元	1800亿美元	2980亿美元
新加坡/马来西亚	50%/69%	100%	93%	95%

2000–2020年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马来西亚为5.5%；新加坡为4.5%（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推计）

20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新加坡为5万5182美元；马来西亚为1万零538美元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2015年），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新加坡统计局，“表14：有就业家庭基尼系数2000–2013”（2014年）

马来西亚统计局，〈家庭收入与基本设施调查报告（2009）〉（2012年）

马来西亚统计局，〈家庭收入与基本设施调查报告（2012）〉（2013年）

新加坡源自于一个多元种族、宗教和语言的移民社会。作为一个新成立且又贫穷的国家，新加坡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创造就业来提高生活水平，与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下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占主体，华商通力合作支持政府的发展战略，他们在业界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为新加坡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并且保障了新加坡的社会环境。这对新加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腾飞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新加坡发展初期，建国一代华商在面临诸多困难时，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独立之初，新加坡不仅国家规模小，自然资源匮乏，而且缺少资金、良好的基础设施、熟练工人和技术支持。许多人认为新加坡不会成功……随着新加坡经济的演变和发展，这些企业先驱抓住了机遇并顺应环境。我国的企业先驱深信新加坡的未来，并一直植根于此。除了在各自的领域取得成就，许多企业先驱还坚持回馈于社会[1]。

事实上，我们也应该向更广泛的工商业界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致敬。这些企业在就业、模范的职业道德和企业家精神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性。在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政府积极努力吸引跨国公司以创造就业并让新加坡人学习到了国际公司治理的经验。新加坡商界，包括大小型企业，都为新加坡国防计划和发展教育做出了捐款和奉献。这些积极参与确保新加坡经济更有竞争力，国防安全稳固，传统文化价值得以留存且促进了种族关系和谐。

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KYSPP）亚洲竞争力研究所（ACI）的推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的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4.5%和5.5%。在1998年到2008年期间，前者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基本在其潜在水平之上，而对于后者，其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却远低于其潜在水平。稳定物价在新加坡是成功的，其通货膨胀率为1.3%，而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的这一数据较高，为2.6%。这段时期，相较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成功地保持了相当低的失业率，其失业率为2.9%，而马来西亚该数据为3.4%。参照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在0.46左右。两国在这一方面，本都应该有更好的表现。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亦对亚细安（东盟）10国自2000年起开展了年度经济竞争力排名。根据此排名，新加坡始终名列榜首，马来西亚位居第二。而他们的标准化得分显示，新加坡为2.0507，竞争力至少是马来西亚的两倍，通过计算，马来西亚的得分仅为1.0601[2]。

因此，相较于马来西亚，新加坡享有如此大的相对经济竞争力优势可以归因于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有效的推行。相比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政府的效率低下，治理欠缺完善，倾向于善待“土地之子”且歧视非马来西亚土著的政策，也就是马来语中所谓的原住民政策。而此类政策普遍贯彻于包括商业、教育、住房和土地政策等许多领域。并且，由于马来西亚于十几年前转入了两党制体系，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投入到持久且无结论的公共政策辩论、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当中，而这些行为是以牺牲制定长期经济增长战略和实现政策目标为代价。

独立以来的主要经济指标

要充分领略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大致上理解新加坡在过去50年中各个不同转型阶段的经济增长战略。在1965至1986年间，新加坡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8.6%。这一时期，新加坡处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驱动阶段，其首要目标就是创造就业。1987年至1997年，新加坡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9.3%。这一时期，新加坡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及投资驱动阶段，其目标是通过劳动节约战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1998年至2008年，新加坡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放缓至年均5.2%。这一时期，新加坡处于创新科技产业驱动阶段，旨在提升科技水平。2009年以后，随着区域竞争加剧和经营成本的提高，新加坡进入了生产力提升、高附加值产业

[1] 2015年2月6日，陈庆炎总统在中华总商会于新加坡丽思卡尔顿酒店（The Ritz-Carlton, Millenia Singapore）举办的“新加坡建国50周年杰出华商奖”颁奖仪式的演讲。

[2]《东盟10国年度竞争力分析，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2000-2010》（新加坡：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南亚有限公司，2013年）；〈东盟10国竞争力评估〉，载《经济和商业研究国际期刊》（2014年），页377-398。

驱动阶段。目前，新加坡的经济调整正面临着一些难题，尤其是对于服务业和建筑业，因为这两个行业早已习惯了大量的外国廉价劳动力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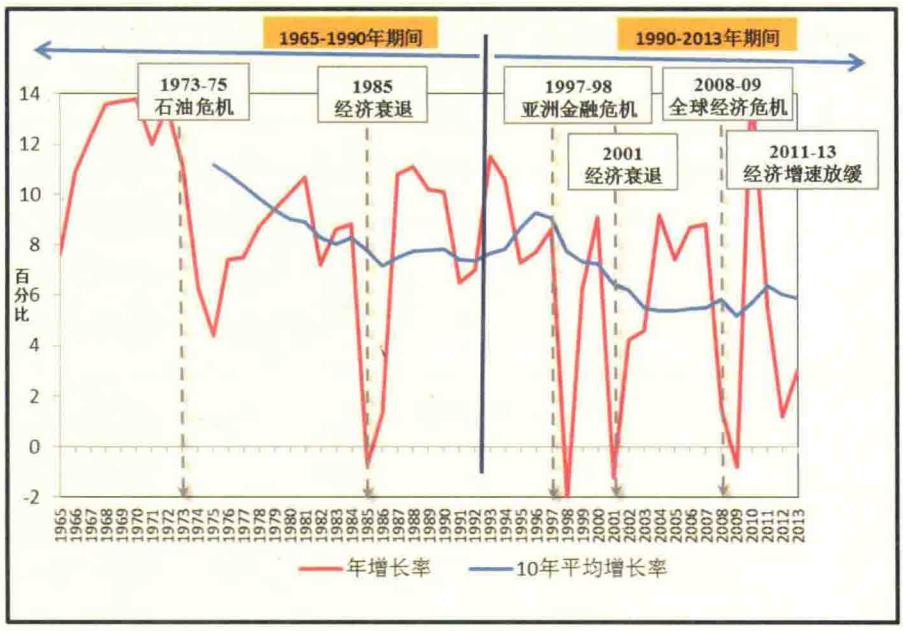
如今，小岛国已变身为人口稠密的国际大都会，它正处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经济增长要达到理想的水平，这直接影响到薪资和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公众必须决定一个社会可以容忍、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外劳团队，因为这会影响到经营成本和经济活动。因此，这一部分旨在锐化和聚焦与新加坡发展策略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方面的论述，基于经济增长的决策必然涉及到政策的权衡。

首先，新加坡的经济扩张是否过快，增长是否过高？增长放缓是否能够避免诸如收入差距大、房价上涨、公共交通和交通拥堵等问题？其次，政府致力于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它该如何通过在公共政策方面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显著地缓解这些问题？第三，由于公众不满的广泛升级，收入差距问题能否在不诉诸于全面社会福利制度作为解决方案的前提下，被显著缓解，以防止经济底层阶级出现？全面社会福利制度不仅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负担，同时对于纳税人也将产生消极作用。这一问题对于新加坡来说更是如此，这是因为新加坡人口平均年龄迅速趋向老化，并且人均寿命也变得更长。

如图表（四）所示，在1998年和2008年之间，新加坡进入了一个穿插着复苏与衰退的、不连续的经济增长阶段。即便如此，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达到了每年5.2%。而其所遭遇的三次危机均为外部驱动的，它们是1998年由亚洲金融危机所引起的经济衰退、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和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的爆发。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海啸，新加坡的经济于2009年再度陷入衰退。

在1987年至1997年间，由于外部环境比较有利，新加坡的年均国内产总值增长率高达9.2%。与所有成熟的经济体一样，这令人羡慕的增长速度是不太可能重现的。有意思的是，在那些年，新加坡并没有许多人抱怨增长过高

图表（四）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周期与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5年），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相关人物

李显龙

历史事件

1 月 20 日

副总理李显龙在国会宣布“华文教学新政策”，让更多学生修读高级华文，另为华文较弱者设华文 B 课程

或过快，这是因为收益的分配更为平均，并且广泛的大众也不像如今这么直言不讳。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周期与趋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在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排名第三，是仅次于卡塔尔（Qatar）和卢森堡（Luxembourg）的第三富裕的国家。但是，如果考虑到新加坡是世界上最为脆弱的开放经济体，新加坡的贸易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之大，那么，这样的排名是没有意义的。当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新加坡是最先进入衰退的。迫使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库资源以帮助减缓经济衰退对企业的伤害，以及实行全面性的雇用补贴（Jobs Credit）计划来减轻失业的痛苦。

目前，美国经济的复苏比较慢，加上外债导致的财政困境会在欧盟内持续发酵，欧盟经济危机不大可能会快速得到解决。尽管欧洲央行宣布从2015年3月启动全面量化宽松政策。因为欧债危机反映的是竞争力削弱和沉重的福利负担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美国和欧盟是新加坡的两大出口市场，新加坡的开放型经济面临着独特的双重挑战。

在最近有关“亚洲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研究中[3]，笔者认为，有鉴于现有的贸易联系，美国和欧盟仍然是除了台湾和香港之外的所有亚洲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西方国家的经济受冷，亚洲经济体特别是新加坡将第一个患感冒，新加坡不能从这些地区的麻烦中脱身。

由于痛苦的紧缩措施仍然受到欧洲公众的很大抵制，国际信心恶化导致主权债务融资的成本更高。面对这样的不利因素，即使加重先前采用过的雇用补贴计划也不能避免新加坡经济在2012年增速放缓，因为作为一个小型而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只能更好地准备并且有效地处理新加坡不能控制的外来冲击。

事实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类似于新加坡利率的决定，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在最被人误解的公共政策当中，经常被提到的是新加坡过快的经济增长是不惜一切代价换来的。这个论点不恰当地假设政府可以很容易地控制并决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数量，好比能随心所欲地加速或减速一辆行驶中的轿车。

即使这些论点是正确的，当外部环境对新加坡有利时，政府也不应该收紧劳务市场，增加商业成本来放慢经济增长。这种直接干预的做法会引起商业和潜在投资者严重的反响，如果跨国公司认为这些做法是官方的经济管理模式，一旦决定将其投资转到其它地方，趋势将会不可逆转。

若公众对大量的外国劳动力的流入存在抵触情绪或者基于其他社会政治因素的考虑，从而促使政府在外部条件好的时候通过削减就业来减低经济增长，这是不明智的。这种讨好主义的方法会给当前谨慎行事的政府带来麻烦。如果未来有更频繁的由外部引起的经济衰退，期望民选政府动用国库来支持特殊转移支付或者维持长期预算平衡，那也是不切实际的。

1998年至2008年期间，新加坡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2%，并取得了2.9%的实际年就业增长和2.5%的年均生产率增长。这一增长率掩饰了这段时期的经济衰退，和接踵而来的近两位数的增长所表现出的大起大落。这段期间的表现几乎是1987年至1997年均增长率9.3%的一半。

因此，目前的问题不是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否已经增长过快，或者当局是否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重点不在于增长的数据，而在于政府如何拿出更好的规划，和如何加强政府机构间的协调，以便更好地管理预期的基础设施需求，确定和了解所提供的工作类别以及本地劳动力是否能满足技能的需要，也要能把握公众对住房的需要，提供可以获取并且负担得起的医疗，并保持一个适合更多人口居住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事实上，即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慢到1998-2008年期间的一半水平，上述这些提到的许多问题将仍然存在，其严重程度也不会必然减轻，而且财政预算的压力将更加严峻。

如果我们非理性地指责政府在外部环境允许下促进经济强劲增长，以确保在经济周期里能够奉行谨慎和可持续的财政预算，那将是个误导的评判。因此，当前是一个有利的时机来重新考虑政府在发展为一个更加包容性社会的过程中扮演更好的角色，重新审视公共政策的

[3]〈转变的增长驱动因素：对东盟五国的政策影响〉，载《亚洲经济文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3年）。

新加坡吉宝海港

基本理念，以便新加坡能在外部环境变好时充分抓住所出现的机遇。

总之，笔者应该严肃、理性地停下来思考下面的疑问或问题：政府是否应该屈从于民粹主义的政治需求，人为地、突然性地抑制对于业务扩展至关重要的外劳供应，从而减缓经济和工资增长？抑或是我国是否应该通过政府盈余的累积，更好地协调公共政策，通过生产力的转型和为那些落后的个体提供技能提高项目，从而增强竞争实力？

通过率先推动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交易网络中，新加坡已经充分地利用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带来的优势。同时，新加坡作为一个拥有高效的国际机场、海港以及最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断提升， 也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增进了其扩大外部经济的驱动力。尽管新加坡不断地通过贸易和金融获益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见证了这一进程所带来的，诸如贫富差距拉大，房地产价格飙升和基础设施过度拥挤等不受欢迎的弊病。

然而，随着新加坡在技术阶梯上不断上升，也面对来自东盟邻国、中国和印度的越来越激烈的区域竞争。在1950和1960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所拥有的技能，很快便不能胜任更高增值的新工作了。尝试提高生产力的努力不能带来赶上快速经济重组需求的成果。来自低收入家庭、只有中学或更低学历的新加坡人，逐步地陷入了难以翻身的经济底层阶级。并且这一问题也被诸如较大的家庭规模、社会资源和信讯网络劣势等因素所加剧。

自1990年代末以来，新加坡的基尼系数情况迅速恶化，并在2012年达到0.48的最严重水平。相比之下，香港的基尼系数早已在1997年达到0.48，这是从1970年代0.43，1980年代的0.45起逐步恶化的。至2013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54前所未有的水平。当基尼系数超过0.5后，社会紧张局势将从不同领域表现出来并加剧。因此，2014年大规模的由学生主导的社会动荡以“占领中环”的方式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每年的财政预算中通过特殊转账的方式对于教育、医疗、公共事业及中央公积金（CPF）不断大量地进行补贴。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已经高达年均26亿新币。根据2013年统计局的计算，此类特殊转账能够将基尼系数控制在0.44之下，也就大概是2000年的基尼系数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注意到最富有的20%的家庭与最贫穷的20%的家庭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增长差距。经济学家对于研究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责无旁贷的。全球化技术导向的技能落伍理论，也许不能对于如此大的差距提供完整的解释。

两个城市的经济表现

新加坡不像香港那样幸运。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香港能够获利于“内地和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和“优于世界贸易组织”（WTO Plus）的贸易条件。另外，香港的防务完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承担，新加坡却需要动用很大一部分的年度预算来保持防御能力，与邻国不时的摩擦扰乱了原本在亚细安内可以更紧密进行的经济合作。

相比之下，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87-1997年期间的年增长率是6%，在1998-2008年期间是3.8%，比同一时期的新加坡低30%左右。另外，对比这两个城市经济体，每当出现衰退，香港下沉更深；每当经济复苏，新加坡反弹更高。比较而言，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77年和1987年间只有香港的43%，在1997年和2007年，它迅速提高到56%和85%，此后于2013年则超越了香港至少9%。

图表（五）新加坡和香港的主要经济指标（1998–2013）
新加坡与香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与基尼系数

财政年度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 基尼系数		失业率		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	
	香港	新加坡	香港	新加坡	香港	新加坡
1998	-5.9 %	-2.2 %	2.2 %	2.5 %	2.9 %	-0.3 %
1999	2.5 %	6.1 %	4.6 %	2.8 %	-4.0 %	0 %
2000	7.7 %	8.9 %	6.2 %	2.7 %	-3.7 %	1.4 %
2001	0.5 % (0.53)	-0.9 % (0.45)	4.9 %	2.7 %	-1.7 %	1.0 %
2002	1.7 %	4.2 %	5.1 %	3.6 %	-3.1 %	-0.4 %
2003	3.1 %	4.4 %	7.3 %	4.0 %	-2.5 %	0.5 %
2004	8.7 %	9.5 %	7.9 %	3.4 %	-0.4 %	1.7 %
2005	7.4 %	7.5 %	6.7 %	3.1 %	0.9 %	0.4 %
2006	7.0 % (0.53)	8.7 % (0.47)	5.6 %	2.7 %	2.1 %	1.0 %
2007	6.5 %	9.1 %	4.8 %	2.1 %	2.0 %	2.1 %
2008	2.1 %	1.8 %	4.0 %	2.2 %	4.3 %	6.5 %
2009	-2.5 %	-0.6 %	3.6 %	3.0 %	0.6 %	0.6 %
2010	6.8 % (0.53)	15.2 %(0.47)	5.2 %	2.2 %	2.3 %	2.8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987–1997	1998–2008
香港	6.0 % p.a.	3.8 % p.a.
新加坡	9.2 % p.a.	5.2 % p.a.

国内生产总值规模	1977 / 1987	1997	2007	2013
香港	160/510 亿美元	1770亿美元	2120亿美元	2740亿美元
新加坡	70/220亿美元	1000亿美元	1800亿美元	2980亿美元
新加坡/香港	43 % / 43%	56%	85%	109%

2000–2020年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香港为3.5%；新加坡为4.5%（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推计）
20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新加坡为5万5182美元；香港为3万8123美元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2015年），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新加坡统计局，“表14：有就业家庭基尼系数2000–2013”（2014年）
香港政府统计处，〈2006人口普查–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2007年）
香港政府统计处，〈2011人口普查–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2012年）

人们可以得出结论，新加坡政府通过积极干预比实行不干预政策的香港当局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长。后者的经济受制于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不能通过汇率调整成本。这就导致在不景气时期更严峻的股市调整和房地产行业衰退。

因此，由香港政府委任的公共财政检讨专责小组在2003年得出结论："如果继续执行当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政府将面临不断扩大和持久的财政赤字。据估计，财政储备（2002年达到3700亿港元）将会在2008-2009年财政年耗尽"。这就是香港财政状况的脆弱性所在。如果不是十几年前中国大陆游客自由行政策的放开，香港的财政可持续性将很有可能被质疑！

香港政府的长期财政计划工作组在2014年再次指出，"如果香港政府仍然坚持各项公共服务支出，那么根据目前的趋势，结构性政府预算赤字将在七年内出现（2021年），所有的政府盈余会在2028年被用光，此后香港将不得不举债"。这就是香港在建立了一个全面且昂贵的福利制度以后所陷入的财政困境。新加坡一定不会步入这种境地。

相比之下，新加坡政府已经面临经济增长带来的管理压力。为缓解收入差距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每个年度的政府预算都安排了特殊转移支付作为补贴。事实上，年度预算的特殊转移支付自2009年以来翻了一番。在未来，这种转移支付如果不上升的话，至少也会保持在目前较高的水平上。

反思与展望

在经历了2009年1%的经济萎缩后，2010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强劲回弹15%。在2011年至2014年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平均为3.3%，低于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测算的4.5%潜在增长率。这一偏低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由于政府调整劳动力供应所造成的，而政府实施这一举措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同时也是响应民众要求降低外籍劳工数量的广泛呼声。而当企业面对有订单却不能扩大其经营活动的情况，有些公司将因为担心新加坡可能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风险而考虑搬迁。一旦跨国公司的总部做出最终搬迁的决定——尤其是在他们认为目前劳动供应的限制将会加剧，并成为新加坡对外籍人力政策的新常态时，他们多数不会重返新加坡。新加坡必须进行精确测量并谨慎对待这一政策。

新加坡在2013年国际机构的排名中，在最自由经济体、投资风险最低、廉洁程度和整体竞争力方面被评为环球前五位，尽管缺乏自然资源、人口基数小、国土面积有限，而且是一个高度开放、总贸易量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的经济体，也可说是一个非常依赖于外部需求的经济体。

积极主动且长期连任的政府，在过去近50年的经济周期中，使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始终高于潜在水平。在政治稳定、种族和谐、经济多元化、控制成本、保持竞争力、创新求变、维护和谐劳资关系方面的不懈努力，使其在动荡的外部市场环境中保持了健康的财政预算状况。然而出于种种缘由和因素，这一发展策略却逐渐开始受到部分选民的质疑，这些不满在2011年的大选中显露出来。

改善收入差距，建设一个包容型的社会，是国家的承诺，但对于如何去实现需要达成共识，新加坡是否应当通过投资于务实的教育课程与为那些有需要的人，通过由市场驱动的生产力激励措施来锐化他们的竞争优势？或者应当形成一个"迷你福利国家"，就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以确保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增强包容性所包括的基本原则和相关问题是什么？这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并且这是可持续的办法吗？这样的包容性社会将如何被资助，而谁将会为此买单？

公共住房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均衡器，这是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报业控股进军电视广播业，华语"优频道"5月7日启播，但因市场太小蒙受亏损而于2004年结束营业

新加坡的一个独特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土地稀缺并且增长迅速的城邦国家资产增值计划的组成部分。如果房屋的价值不提升，甚至更糟，也就是说停滞或逐渐贬值，那么居者有其屋将毫无意义。因此对于首次购房者来说，优惠价格和激励机制是有必要的。对于政府如何确保土地和物业资产升值的果实可以被合理地分配给那些渴望、并为了得到住房而工作的公民手中，是值得讨论的。

包括工人、雇主和政府有效的三方关系将继续做为新加坡和谐的劳资关系，和生产力驱动的基石，以换取平稳的就业和生产效率。这种三方关系的安排不容被轻视或滥用。事实上，它是新加坡的经济命脉。没有了它，将产生严重后果并导致了努力提升几十年的竞争力遭到侵蚀。

包括教育、医疗保健、公共组屋和公共交通的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是普通民众生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至关重要的服务应当私有化还是国有化？在2011年大选后，政府放弃了对于公共服务的盈亏平衡、成本回收式的市场定价策略，走出了曾经过于谨慎的财政预算原则。

如此的政策急转弯必然不会是免费的，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政府支出，而这一支出必定从某些地方获得由某些人支付。可能由纳税人来直接或间接地承担。国民是否准备好了承担这一费用？并且，这一负担将随着我国社会迅速的老龄化而逐渐变得越发沉重，除非能够通过引入生产力高且年轻的新移民来分担。

透明地追踪支付能力指标将保障有效降低公众疑虑。可以通过和政府的合作，尝试定期地公开针对普通新加坡居民的重要公共服务计算出来的透明支付能力指数（Transparent Affordability Indices，简称TAI）。如果它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公众审查的，那么它将有助于增强公众的信心和对于政府的信任。

构建年度国际基准指数以计算世界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购买力和工资，就像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刚刚完成的研究[4]，将对于透明支付能力指数（TAI）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

对于城邦国家来说，为了不断发展增长，依靠外国劳动力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权衡其中利弊是必要的。新加坡准备包容外劳团队到什么程度？政府为了把他们留在新加坡该如何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条件？

政府承诺要以一个稳定状态为目标，确保外劳人数不能超过总劳动队伍的三分之一。这样才能更好地管理和满足他们在住房、交通、社会空间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更多需求。

政府承诺致力于确保所有想要工作的新加坡人都可以通过实践培训课程、行业实习、有补贴的生产力培训或入息补助计划，找到一份薪水合理的工作。新加坡人应该有信心在职场竞争中赢过外国员工。

因此，公众的理解和接受是十分重要的，只要大趋势是将外劳人数控制在三分之一，期间外籍员工的人数有所起落是可以接受的。在外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新加坡要抓住外部需求强劲的机会。这将有助于平衡在全球经济衰退时，可能产生赤字的政府预算。

另外需要公众理解和接受的重要一点是，只要所创造的工作机会总数大于新加坡人所能胜任的空缺，那么吸纳高技能的外籍白领专业人员就不是问题，同时我国也需要较廉价的外籍蓝领工人来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作为一项政策目标，政府预测至2030年，本地的专业人员、经理、管理人员和技师（PMETS）数量将会从目前的二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二。因此届时新加坡将需要较少的工作准证和S准证持有者。

在经济长期低增长率的情况下，无论是因为公司迁址或是外部需求下降，新加坡能够继续为专业人员、经理、管理人员和技师创造高质量的工作吗？当外部经济环境有利时，政府却通过缩紧就业市场来降低就业增长率，从而提高企业成本，削减“不必要的额外业务增长”，从而使经济放缓，这样说得通吗？

到2030年，稳态预测人口数目将达到690万，这是确保新加坡经济反弹和持续增长的关键。因此正确的方法是鉴别能为税收做贡献、能融入当地的高素质移民，能否融入取决于他们来自哪里。同时移民潮不该破坏种族比例现状或社会和谐。

随着日益高涨的公众期望，新加坡人可以尝试思考以下几个相关问题。

- 是否愿意看到随着跨国公司的搬迁，导致新加坡就业机会减少，商业活力降低？
- 能否接受由于没有雇佣足够的外籍劳动力，而导致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瓶颈和交通拥堵？
- 能否接受20万套公共住房建设被推迟？

[4]《全球103个主要城市外派人员与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工资与购买力年度指数（2005–2013）》（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集团，2015年）。

- 是否准备好要以提高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或公司利润税的形式支付更高的社会支出?
- 是否能假定淡马锡控股和政府投资公司能一直提供一笔固定的利润来补贴我国未来的政府预算?
- 是否准备利用新加坡往年累积的财政储备来支付未来的发展支出?而此支付能力又可以持续多久?
- 政府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一些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如今已经进入了“自动驾驶”阶段，也许需要重新校准、微调，甚至可能需要调头。在有些情况，此类的改革努力或许已经开始了
- 建屋发展局可能需要考虑修改或重组公共住房价格和租金的可负担能力指数，以恰当地反映房型和收入水平的比重
- 国家环境局可能要根据政府确定的每月生活工资相关的生活成本指数来设置小贩摊档的租金和竞标基础价
- 公共交通委员会可能要重新设置公共交通票价的定价公式，以便考虑人均家庭收入，年龄组合和通货膨胀的因素
- 裕廊镇管理局也许要以一个独立由私人企业界主导的委员会来判断中小型企业的业务可行性，以此为标准来评估中小型企业的土地成本、厂房租金和售价
- 在批准外国人的就业准证、S准证和工作准证之前，人力部可能必须要求人力资源经理们在申请表格中法定确认已经尽力在本地人中招揽过员工

上述建议的种种更具包容性的举措，必然导致法定机构、政府部门和政联公司收入减少或必须付出更大的补贴，但好处是这些建议将能提高新加坡人的收入和就业量。这些措施显然是优于一些人所提出之需要更多财政负担，且会导致财政枯竭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

这些包容性的方法也比当前的就业入息补助计划更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就业入息补助计划不仅不能显著缓解收入差距，而且会是一个无止境的资金负担，除非我国将提高入息补助水平跟技能提高计划联系起来，并且设置退场机制和时间表。

以过去10年为基准，基于特定的就业水平、劳力与资本质量前提，李光耀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模拟了三种情况来预测未来十年不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水平下所需的生产力预计平均水平。在不同的生产力增长目标的前提下，假设就业水平、劳动力比重、全要素生产力、劳力与资本质量的增长实现不同的水平，对新加坡中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模式进行了三种情景的预测。

以1998年至2008年的实际经济表现为基础，笔者对2009年至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区间和生产率增长作了乐观、悲观与基线情况三种模拟，笔者认为基线情况的情景最有可能发生。其结果显示在图表（六）。

笔者的基线情况情景模拟结果显示：在一个1.5%的年度就业增长率的政策假设与一些其它关于资本与劳动力假设之下，新加坡在2009年至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2%，相应所需的生产力年均增长率为2.7%。这种预测结果意味着新加坡的劳动团队需要达到2009年经济战略委员会确立的全国生产力指标（National Productivity Target，简称NPT）2%到3%范围的上限目标。

图表（六）国内生产总值和平均劳动生产力增长的政策模拟，2009 – 2020：假设和预测

	实际 1998-2008	悲观情景	基线情景	乐观情景	备注
劳动力比重	0.532	0.532^	0.532^	0.532^	^假设值
劳动质量增长(%)	1.24	1.00^	1.24^	1.50^	^假设值
资本积累提升	0.08	0.08^	0.25^	0.50^	^假设值
资本质量增长(%)	0.29	0.18^	0.29^	0.40^	^假设值
全要素生产力增长(%)	0.51	0.30^	0.51^	0.70^	^假设值
就业增长(%)	2.92	1.00	1.50	2.00	^假设值
、生产率增长(%)	2.52	1.79@	2.67@	3.61@	@预测值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24	2.79@	4.17@	5.61@	@预测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5年），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但是，不管是基于什么缘由，如果政府把年均就业增长率减少到1%的水平，我国将仅取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2.8%的增长率，相应所需的生产力年均增长率为1.8%，比全国生产力指标确立的低端值略低。这个悲观情景的预测结果意味着与过去的10年相比，在所述时期可以动用的特别财政转移资金会比较少，除非执政政府准备动用额外的净投资收入（Net Investment Income，简称NII）。

让我们再来看看乐观情景下的增长模式。如果政府努力达到2%的年度就业率增长，新加坡将取得年均5.6%的增长率，相应所需的生产力年均增长率为3.6%。这种情景下要求新加坡达到的生产率水平会远远超过全国生产力指标。这个水平有点高不可攀。如果要实现这过高的增长，新加坡政府必须在经济景气时大量雇用外国劳力来弥补在经济不景气时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而这又意味着新加坡人会对政府大量引进外国劳力感到不满。

就算追求基线情景下的增长，其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依然是政府究竟该怎样最公平、最有效益地使用预算盈余来缩小收入差距？如何通过合理的计划和资源分配以避免出现经济底层阶级？全球化与包容性增长并非一定是互相排斥的，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政府干预性政策仍然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政府的挑战就是要能证明新加坡可以在加强包容性的同时又不会在贸易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倒退。新加坡是一个没有直接经济腹地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也许没有太多的选择。

随着国人教育水平的提升，新加坡人越来越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这是应该被肯定的。所以有效的公共政策陈述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然而就如发生在台湾、香港、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情况，新加坡面临公民过于内视的潜在风险。全面专注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讨论，将会使得整个政府和行政体系被卷入了矛盾和僵局，以至于消耗宝贵的资源、时间和努力！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和高度开放的经济体，新加坡是否有本钱踏上类似的道路？这将是最令人担忧的风险，这可能导致新加坡脱离几十年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轨道。尽管所有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争论最终还是回归到本土问题，但是关于新加坡经济方面的讨论却应该采取全球视野。理性的公共政策必须要超越不理性的公众压力。

最关键的是，公众对于公共机构和公务员的信任不能受到进一步地腐蚀。除了传统的传播媒介，政府必须在组屋区推行引导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宣导活动，特别是以社区为基地来推动民间基层的双向政策交流。

公众对公共政策制定商讨的热烈参与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是，公众积极参加商讨的模式须要仔细的思考：是否愿意接受两党制下必然的政治对抗？还是需要一个反对党对拥有良好记录的执政政府给予强有力的制约与平衡？但是，对于第二种方式的选择也很可能会以第一种方式告终。

第四节　现代新加坡之父
——耀眼的华人政治家李光耀

摘要

李光耀的前半生适逢反殖运动高涨，他在反殖的洪流中崛起，组织人民行动党，领导新加坡历经自治、新马合并及1965年分家独立建国。新加坡在他的掌舵下通过精益求精的治国理念（法治、清廉反腐、唯才任贤、种族和谐），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提升到第一世界但其威权作风引起的争议也将在后李光耀时代会继续存在。

Abstract

The rise of Lee Kuan Yew coincided with the upsurge of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He formed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and led Singapore through autonomy, merger and eventual separation with Malaysia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nation in 1965. Guided by his state governing idea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uprightness and anti-corruption, meritocracy and racial harmony, he transformed Singapore from a third world to a first world state. His legacy and the controversy over his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style will linger on into the post-Lee Kuan Yew era.

严孟达　林孝胜（**Giam Meng Tuck　Lim How Seng**）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2015年3月23日因肺炎在中央医院逝世，享龄91岁，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李光耀走入历史了吗？从他留给新加坡各方面的遗产来看，这就未必。我们在谈李光耀这个历史人物的时候，也是在谈新加坡今天的成就。

在不到30年时间里，李光耀（1923－2015）带领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这是他一本书的书名）的提升。从1965年人均收入与加纳（Ghana）相当的水平起步，新加坡如今（2015年）已经转变为人均收入超过前殖民地宗主国英国的富裕经济体。

新加坡各方面的成就，从组屋政策、绿化政策到新生水的研发等等，无一不是李光耀思维的具体落实。

他认为，新加坡人在这个小岛国上拥有自己的屋子，才会把这里当作家。新加坡虽小，但他坚持新加坡必须保持大面积的绿地，并在各个角落广植树木。为了摆脱在食水供应上过度依赖柔佛，免受马来西亚的牵制，他很早便提出研发淡化海水，导致后来新生水的开发，让新加坡加强了生存的条件。

新加坡独立50年的时间便已蜕变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有繁忙的国际机场和海港。新加坡也从早期的吸引外资提升到鼓励新加坡企业家“走出去”。2014年，新加坡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要谈论李光耀，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事。先从李光耀的崛起说起。

中流砥柱

1959年5月底，人民行动党在国会大选中获胜执政，组织自治政府，李光耀出任总理。1963年，在他带领下，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合邦而摆脱了140年英国殖民地统治。两年后，新马分家，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直至1990年，李光耀才退居内阁资政，由吴作栋继任总理。2011年5月大选，人民行动党首次失去一个集选区，总得票率也下降，李光耀和时任国务资政的吴作栋一起退出内阁。

1923年李光耀出生在新加坡，父母皆为道地侨生。他受高深英文教育，学业好。按照父母及其个人原来的人生规划，是想成为一名律师。二战后，律师从政好像是理所当然似的，许多华籍、印籍及欧籍律师都从政。这也可能是李光耀从政的一个诱因。

1946年至1950年，李光耀留学英国顶尖的剑桥大学，攻读法律。经过二战的洗礼，世界进入冷战的国际格局，美国和苏联二霸把世界分割成民主与共产集权两大阵营。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席卷亚洲各国，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及印尼人民如火如荼地展开结束欧美殖民地统治的独立斗争。英国在这大势下也被迫开始部署在新马逐步转移政权给当地人民的计划，并积极在新马留英知识分子间物色和培养可靠及可驾驭的首批政治接班人。

二战初新马留英知识分子不免也感受到这种时代气氛，有识之士如彭亨马来贵族拉萨、莫哈末·索比（Mohamed Sopiee）、吴庆瑞、贝克（Maurice Baker）等于1949年在伦敦成立一个政治论坛，称为马来亚论坛（Malayan Forum），开始热心探讨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如何协助建设国家，新马独立后的发展方向如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李光耀是其会员，但由于身在剑桥，无法扮演更积极的角色[1]。马来亚论坛的讨论、活动以及与志同道合的新马留学生之间的互动激起李光耀对新马前途问题的思考。

1950年1月28日，李光耀应邀在马来亚论坛作专题演讲，讲题为“海归学生”（The Returned Student）。他强调海归学生在争取国家独立和建设中扮演领袖角色。他指出印度、巴基斯坦、缅甸、菲律宾及锡兰的独立运动都由海归学生领导。马来亚（1965年新马分家前，“马来亚”一词包含新加坡在内）及越南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最后的堡垒。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马来亚面对两大难题。首先是如何促进华巫种族和谐，以及如何组织一个强大的政治统一阵线，而不必通过暴力导致权力转移。在这两方面，李光耀觉得海归学生可以作出重大贡献。他认为马来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建立一个包容各种族的全民马来亚社会，培育马来亚民族主义，而非各族群的民族主义。他呼吁海归学生组织起来，让英国政治领袖意识到独立必定会降临马来亚，殖民统治结束只是时间问题。因此英国把政权移交给一批在英国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而又熟悉

[1] 陈淑珊，《吴庆瑞传略》（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0年），页49—51。

国人自发排队向建国总理致敬告别（2015年3月）

英国的生活方式，及愿意独立后留在英联邦大家庭和留在英镑区的海归学生，将是一个较明智的选择。他最后对马来亚论坛的成员指出如果海归学生不负起这重任，当英国离开时，马来亚即将发生马共暴力起义[2]。

李光耀这篇演讲预示他已决心从政。演讲里也包含了其一生坚信的核心政治理念如种族和谐、平等及统战的战略等。他在英国曾参与英国的竞选活动，在工党的竞选大会上演讲。他也被费边主义的理论吸引了。费边主义主张利用向富人征收高税收，“劫富济贫”缩减贫富不均的差距，逐步实现理想社会（后来他觉得这费边的福利主义不实际）。他在马来亚论坛的反殖演讲和参与工党的竞选活动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而且把他列在监视名单中。政治部高层还张冠李戴误以为他于1949年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共产组织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催的活动（其实是他弟弟李金耀参加）[3]。

1950年8月当李光耀和柯玉芝毕业乘船回新时，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是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4]。回忆录还透露了1981年看到1950年6月28日总督府的一份会议记录，他才知道当时政治部主任还建议当他和柯玉芝返新时加以扣留。但受到当时的警察总监伏尔杰、英军总司令及辅政司的反对[5]。“他们认为我们两人都出身名门，如果逮捕我们，公众的反应一定很坏”[6]。实际上，警察总监认识李光耀父母，在李光耀回国前数月刚好在英国，邀他和柯玉芝到其老家做客，近距离观察他的言行。那次见面可能让他觉得李光耀不是激烈的反殖斗士。因此，那次“做客”化解了李光耀回国被扣留的厄运。“相反地，他们表示如果善待我们，并把我们争取过去，那就有利无弊……我们返回家门几个月后，（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便邀请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7]。虽然麦唐纳经常邀请学生共进晚餐，可是，这餐聚对不久前还被列名在监视和扣留名单内的李光耀可能有不同的意义，似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释放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息：“我们不再怀疑你！”。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也透露，1950年代新加坡反殖运动正方兴未艾，如以广义的教

[2] "The Returned Student", Talk given by Lee Kuan Yew to the Malayan Forum at Malayan Hall, London, 28 January 1950,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3]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年），页155。

[4] 同上注。

[5] 同上注。

[6] 同上注。

[7]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10。

育源流和政治意识加以分类，各路反殖派系约可分为左、右翼及中间偏左阵营。左翼阵营表现得最积极。新加坡的反殖运动由马共及其操控的新加坡首个政党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打先锋，其他还有马共属下的反英同盟。随着1948年英殖民政府在新马颁布紧急法令，马共与反英同盟走入地下，民盟解散。1953年2月一批激进派的英文源流的大学生在马来亚大学（当时校园设在新加坡）成立社会主义俱乐部，骨干成员包括傅树楷、林福寿、詹姆士和多米尼·普都遮里兄弟（James and Dominic Puthucheary）、锡尼·兀哈尔（Sydney Woodhull）等，推动反殖学运，在大学里宣扬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促进马来亚团结的方法等[8]。他们毕业后参加林清祥和方水双领导的左翼工运。

华文源流的反殖运动以林清祥、方水双领导的左翼工运为中心[9]，而辅以孙罗文领导的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的学生运动[10]。这两股中英文源流的工运和学运分子在反殖运动的大旗下合作无间。

右异势力方面是亲殖民地政府的进步党，由名律师组成，包括黎觉（John Laycock）、陈才清等。一批效忠英国的英籍民及海峡华人（峇峇）为进步党的忠贞党员。殖民地政府原本最放心将政权交给该党，可惜该党有将无兵，没有基层力量支持，不成器。另一右翼势力是由中华总商会支持的民主党，陈永裕（陈六使侄儿）担任党主席。中华总商会原为华人移民（华民）的总机构和亲中（亲清廷及辛亥革命后的国民政府）势力的大本营。华商在清廷、国民政府及殖民地政府扶助下成为华社侨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殖民地政府严禁回国，以及压制国民党的活动。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商会唯有转型致力于为华人移民争取参政权。民主党被戏称为资本家或头家党，既无基层支持，组织松散。两党在1955年大选中溃不成军后合并为自由社会党。

还有一个右翼政党是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领导的劳工阵线，乘人民行动党羽毛未丰，异军突起，赢得1955年立法议会大选执政，马绍尔及林有福先后担任首席部长。此党人事复杂，派系多，组织松散，也缺乏一个威权党领袖。

李光耀回新不久就成为合格律师，在分析当前政局后决定采取统战策略，走群众路线，建立热心为工友及学生争取权益的形象。李光耀在一连串的工潮及学潮中，以法律顾问或辩护律师身份协助有关工会和资方谈判，例如1952年的邮电工潮，1954年华校中学生反对国民服役的五一三学潮、以及同年社会主义俱乐部刊物《华惹》（*Fajar*）被控发表煽动性言论的案件等[11]，李光耀才华毕露，各工会如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等纷纷请他担任法律顾问。他也担任中学联的法律顾问，俨然成为反殖运动的领袖。

1954年11月李光耀召集马来亚论坛的旧班底如吴庆瑞、杜进才组织一个中间偏左的人民行动党时，也延揽工运及学运领袖包括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傅树楷、林福寿、詹姆士·普都遮里及兀哈尔成为发起人或创党党员，确保行动党有雄厚的基层力量支持。李光耀为秘书长，杜进才为主席[12]。1955年行动党初试啼声，派出四人（李光耀、林清祥、蒂凡那及吴秋泉）参加立法议会大选，结果只有蒂凡那一人落选。李光耀成为立法议会的反对党领袖。

这一历史时期，唯有走入地下的马共和人民行动党才是正规专业的政党，组织架构完善、明确政治理念和党纲以及政治目标。

但李光耀也知道和激烈左翼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只是权宜之计，虽然摆脱殖民地统治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一旦目标

---

[8] 有关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起源，参阅Poh Soo Kai, "Genesis of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Poh Soo Kai & others edits., *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0), pp.11–20.

[9] 有关林清祥与方水双的工运及政治之路，参阅《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上、下册（吉隆坡：社会分析学会及朝花企业，2002年）；方水双，《方水双回忆录》（新山：陶德书香楼，2007年）。

[10] 有关1950年代新加坡学运及中学联，参阅Tan Jing Quee & others edits., *The May 13 Generation: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 1950s*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1).

[11] 《华惹》编委于1954年5月10日因发表反殖社论〈在亚洲的侵略〉("Aggression in Asia")被控煽动罪，见Tan Jing Quee, "Background and Impact of the Fajar Sedition Trial," *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 pp.119–147。李光耀因协助为学生辩护的女皇律师布理特（D.N. Pritt）打赢此官司而名声大噪。

[12]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过程和发展，见李光耀，〈温故知新〉，载《行动党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行动党1954—1979》（新加坡：行动党中央执委会，1979年），页32—40。

实现就是分道扬镳之时。由于殖民地政府绝不允许激烈的左翼势力掌权，因此，他们需要躲在李光耀背后。而李光耀领导的温和派则需要左翼势力掌控的基层群众的支持。两个阵营各取所需，互相利用，互相依赖。在目标实现之前，双方合作无间。

即使1956年10月底，新加坡发生大暴动，林有福政府逮捕和行动党有密切关系的重量级左翼工运领袖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普都遮里及兀哈尔等，这种统战关系也没有中断。李光耀在即将来临的1959年大选宣称假如行动党获胜，将以释放他们为执政条件，以换取他们控制的基层群众继续在1959年大选中支持行动党。为了平衡左翼的激烈立场，行动党温和派以李光耀为首的领导班子，在党纲中宣布党的建国道路是要建立一个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13]。凭着这种优势，1959年5月立法议院大选结果，行动党大胜组织自治政府。6月4日，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普都遮里及兀哈尔等人获释放，翌日，李光耀内阁宣誓就职，坐上总理大位，从此开创一个长达31年的李光耀时代。

1959年6月，李光耀在自治选举中大获全胜

身份认同

2015年4月初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2014-2015年度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14]，特别向与世长辞的李光耀致敬，赞扬他是一位“深远影响了世界的华人”。的确，作为一位世界华人杰出政治家，说李光耀是一个“深远影响世界的华人”恰如其分。

李光耀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领袖与他的交情延续了几代领导人。“新加坡模式”在中国人眼中具有特别意义，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是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另一方面则是李光耀对“亚洲价值观”的推崇，使得新加坡既能取得繁荣进步，又能长期保持政权的稳定。在西方人眼中李光耀的“威权统治”能够不走向腐化，对中国是很有参考的价值。中国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掀起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以来，不断派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和官员来新学习，对新加坡和对李光耀个人都是高度的敬意。

尽管这些年来，新中关系密切，李光耀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作为一个地处东南亚的弹丸小国的领袖，李光耀一生中都在避免被描绘成一个“华人领袖”，也因此，李光耀对中国的观察和意见才会被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领袖所重视，而成为他们咨询的对象。

对其华人身份，李光耀打从年轻时候起便是“敏感”的。

二战后，1946年10月李光耀到英国伦敦

[13] 人民行动党编，《大选的局势、建国道路、五年计划》（新加坡：行动报，1959年）。

[14] 2015年迈入第九届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凤凰卫视发起，由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南方报业集团、香港《亚洲周刊》、《明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等十余家华文媒体和机构协办。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0 月 12 日

滨海艺术中心开幕，为新加坡的世界级表演殿堂

念法律，他先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后来转去剑桥。他说："在剑桥和伦敦的学习生涯，我只说英语，我的英语变得很英国化，带有英国式的标准节奏与口音。1950年8月回返新加坡，发现自己居然忘了怎么说马来语……我在伦敦的时间不长，可是经常出入伦敦戈顿广场一个叫中国学会（China Institute）的体验，却让我终身难忘，并成为我后来努力不懈学习华语，以及为新加坡人积极推动双语教育的动力"[15]。

有趣的是，在伦敦的生活，让他"重新找回华人的身份"（born-again Chinese），因为他了解到在西方人眼中他始终是个"中国人"，他也因此开始有了"我是华人"的意识。

在20世纪50年代后，他投入政治的风口浪尖，发现到如要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华人群众沟通，就必须学习方言（主要是福建话）和华语，学习华文也成为他终身的努力，即使在晚年健康欠佳时，他也没有把华文放下。

然而，自始至终，他避免被套上"华人领袖"的立场是坚定和一致的。他的祖先在中国广东大埔的祖居在10多年前被当作文物重点修复，但即使在吴作栋（当时是国务资政）于2009年10月到福建永春"谒祖"之后，李光耀也一直拒绝去广东大埔。

治国理念

谈到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一般上都以"务实"两个字来形容。"精益求精"，鞭策国人，不怕竞争，主动发挥竞争精神使新加坡不断进步。在他的带领下，新加坡政府从不间断地强调国家的脆弱性。"务实"、"精益求精"和"强调脆弱性"可以说是李光耀治国理念的要素。

1996年，李光耀在新加坡记者俱乐部和外国通讯员俱乐部联办的演讲中说："人们不明白新加坡的脆弱性，他们读到和看到的是新加坡这样第一，那样第一，海港第一、机场第一、航空公司第一等等。有时他们埋怨我们鞭策得太紧，让他们生活得很有压力，他们说为何不能就求第二、第三或第四就好。但这是不同的，如果不在竞争中处于顶尖位置，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海港、一个机场或是一家航空公司，或甚至说，根本就不需要有一个个别的、独立的新加坡。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这就是新加坡多年来赖以生存的"硬道理"。

非凡的李光耀造就了非凡的新加坡，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多次在非常时刻做出非常的决定。在新加坡被逼独立的一刻，他哽咽着宣布这个困难时刻，但不久就向当时200万同胞承诺要把这个新兴小岛国发展成东南亚的大都会。二战后，1960和1970年代，世界上不少国家纷纷脱离西方的殖民地统治，经济发展都走民族主义路线，以"入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为导向，以发展本身的工业。新加坡却不跟着当时的世界潮流走，而是大力吸引外资，借助来自欧美和日本的跨国企业力量解决失业问题，并打下工业基础。

20世纪70年代，尽管外国专家建议扩充原来的机场，而且政府当时也为巴耶利峇机场投资了8亿元，李光耀仍果断地决定把国际航空机场由巴耶利峇迁移到樟宜。李光耀在当时的非常时刻的非常决定，意味着政府须另外投资15亿元建设樟宜机场。多年后，李光耀说这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好决定之一，那15亿元是最物有所值的投资。

不随波逐流、果敢、拼搏这三大精神要素可以概括李光耀治国理念的精髓，具体呈现的是李光耀的强人政治家作风。李光耀因此被西方普遍看成"专制"，甚至"独裁"。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下的确难以产生李光耀型的政治家。

李光耀与邓小平在国宴中举杯互贺(1978年)

[15]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11年），页24。

1968年8月9日的国庆游行队伍

对法治的贡献

李光耀毕业自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考获双重第一荣誉学位后回到新加坡加入黎觉与王律师馆（Laycock & Ong）。1951年他取得律师执业资格，1955年和弟弟李金耀及妻子柯玉芝创办李及李律师事务所。他执业约10年直到1959年成为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总理。

大法官梅达顺在李光耀逝世后代表本地司法界发出文告说，在李光耀为新加坡设下的愿景中，一个由独立和清廉司法部门领导的司法体系，包括一流的法律学院、强而有力的专业和优秀的司法服务等，是最为重要的。“李光耀先生一生都是法治的提倡者，自他担任总理以来便致力于根除公共机构的贪腐行为”。

李光耀也极为重视本地法律专业与国际接轨，大法官引述李光耀1990年为新加坡法律学会（Singapore Academy of Law）开幕时的致辞说：“新加坡做的是国际生意，因此律师必须有国际观”。

他说，新加坡法律学会的成立，便是因为李光耀认定若要成功面对国际化的挑战，就必须推动业界不断学习和发展。

大法官说，他确保司法公正和人民都能获得法律资源的主张，时至今日仍适用于本地司法和社会。

总检察长维克拉惹（V. K. Rajah）在其悼文中指出，李光耀致力于倡导法治，这是独立初期和让司法制度跨步向前的支柱之一。他为新加坡的司法奠下基石，造就人民和国家今日的成就。

李光耀也是律师公会首位荣誉会员，公会会长张正义高级律师在文告中说，李光耀为新加坡做出了巨大贡献，律师界尤其感激他所做的一切。司法界享有的效率、明确和可执行的法律，以及可靠和廉洁的司法制度，这些都归功于李光耀的远见。

在德尊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文达星（Davinder Singh）眼中，李光耀是一名比任何人都了解人性和社会的“天才”。他能洞悉前方的趋势和挑战，知道什么对人民及对新加坡是最好的。

在1988年至2006年间担任过国会议员的文达星曾在几起诽谤诉讼中代表李光耀。文达星对《联合早报》说，每次和李光耀开会时总会对他感到佩服，虽然他过去数十年已不再执业当律师，不过却清楚记得大学时学过的法律细节。他们常因李光耀需要咨询法律事项而进行讨论，而他都会利用机会分享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对教育的贡献

教育部长王瑞杰在赞扬李光耀对教育事业所作贡献的公开信中着墨较多的是双语教育。他说，“李先生所做的最关键决定之一，就是

将双语政策确立为我国教育制度的基石”，母语维系国人与母族文化的纽带，同时李光耀又将英语定为工作语言，让国人能与彼此及全世界沟通。

一生致力于推动双语政策的李光耀在1973年设立“总理书籍奖”，每年颁发给双语能力最杰出的中小学学生，又于2011年推出“李光耀双语基金”推动双语教学，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培养孩童热爱双语。

李光耀说，尽管各方认为，在双语教育下，国人两种语文都掌握不好，但这还是我们最好选择；英语作为共同语言，消除了各族之间的冲突，英语是国际商业、外交、科学与技术的语言，缺乏英语的优势，新加坡也就无法吸引到来自各地的跨国公司以及超过200家银行到新加坡来[16]。

除了双语政策，李光耀在30年前的一次讲话中便已强调“未来技能”（SkillsFuture）精神的重要性。在1987年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为国人勾勒出卓越表现的定义时说：“尽你所能在工作中达到你的顶峰。不管你是一名工匠还是从事任何行业，都要竭尽所能，争取最佳表现”。

李光耀当时已经在提倡对各行各业的尊重，以及终身学习、精益求精的精神，王瑞杰表示，最近重读这篇讲稿，让他感受到“这也是我们通过未来技能所希望提倡的思维转变”。

李光耀于1940年获得奖学金在莱佛士学院攻读经济、英国文学和数学。1942年2月日据时期，18岁的李光耀停止学业，数年后负笈英国。莱佛士学院如今是国大武吉知马校区，李光耀正是在这里与日后成为他终生伴侣的柯玉芝相知相爱。

国大自1991年起以李光耀命名多项奖学金、奖项，以及2004年设立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也是本地首个以李光耀命名的学府。

唯才是用与培养接班人

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的遗产之一是，为公共服务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并塑造了公共服务的精神特质，包括灌输卓越服务、廉洁反腐，以及唯才是用的价值观。

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兼主管公共服务的张志贤于2015年4月1日的常年行政晚宴及擢升仪式上，列举了李光耀为公共服务所定下的高标准：李光耀坚信卓越服务的重要性，知道治国并不只是靠修辞，而是必须说到做到。

张志贤说：“他以身作则，定下了高标准，努力为新加坡人做事。他注重细节，力求把大小事务都办妥”。

廉洁反腐方面，张志贤把李光耀对清廉政府的坚持形容为“传奇性”。他说，新加坡建国初期贪污猖獗，李光耀强化了反贪法令，并赋予贪污调查局更大的权力去调查并肃清贪污，造就了今天公共服务，乃至全体新加坡人，对维持廉洁社会的支持。

此外，李光耀也致力于灌输唯才是用的价值观。张志贤说，李光耀坚决认为公务员必须按自身能力、贡献和成就获任用和擢升，也坚信要给予公务员具市场竞争力的薪酬。

张志贤也指出，李光耀一直都认为公务员必须了解民情，并与政治领导层合作，向部长提出坦诚中肯的意见。一旦部长作出了决定，公务员就必须好好执行，包括用简单的文字交代复杂的计划。

李光耀对民事服务的贡献可以追溯到独立之初，便对“唯才是用”（meritocracy）确立了明确的定义。

新加坡独立后的两个月，李光耀在维多利亚剧院向高级公务员发表了对公务员制度具标志意义的演讲。他强调，只有工作表现优异的人才会获擢升。这种唯才是用的理念，决定了招聘公务员和给予相应合理报酬的原则。

为了跟私人企业界竞争人才，李光耀逐步调整公务员薪金和加速擢升人才。1984年，李光耀作了一个重要决定，以私人领域顶尖领导者薪金的80%作为部长薪酬的指标。

1994年1月，时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进一步倡议，把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金同市场薪金挂钩，继续吸引一流人才担任内阁和公共服务要职，确保政府领导班底永远维持最高质素。同年11月，李光耀在国会辩论《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白皮书时说，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开，外加三方相互制衡，像美国国会和白宫定期抗衡、众议院和参议院定期抗衡，就会有好政府。然而，亚洲的经验使他有不同结论。

他说：“英国和法国为不同的殖民地制定了大概80个

[16] Lee Kuan Yew,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0), p.181.

宪法，这些宪法、体制和制衡的方式都没有问题。但由于领导人不称职，这些国家在暴动、政变和革命中倒了，制度垮了。……要是新加坡过去不是由一些每年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掌管政府，不计他们的政治思想、信条或哲学，都是品德好、头脑好和有强烈信仰的人才，我们就不会成功”。

当年国会经过三天激烈辩论后通过白皮书，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自此同企业界最高薪者挂钩，计算的方程式虽先后有所调整，但基本原则保持不变。

2011年的大选，政治领导人的高薪酬成为执政党选票下降的因素之一，李显龙总理迅速成立政治职位薪金检讨委员会，导致担任政治职务者的薪酬显著下调，以更直接反映他们应有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系统化地培养政治接班人是李光耀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唯才是用”的原则贯彻各个政府部门和武装部队，并以此确保社会的流动性。一个人不论出身，只要肯努力，就能凭自己的才干往上提升，甚至进入政治领导层。

对政治接班人，他定下了很高的品德标准，执政党物色候选人也有一套严格的过程。

国际透明组织自1995年推出贪污印象指数后，新加坡一直保持亚洲最廉洁经济体的位置，在全球的排名也一直在10佳之内。2015年，新加坡的排名为全球第七。

行动党政府在1960年修改殖民地时期通过的防止贪污法令，加重刑罚，扩大“赏钱”的定义，并授予调查人员更大的权力。

新加坡能够长期保持政治清廉，是李光耀严厉对付贪腐的结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前全国职工总会主席兼行动党议员彭由国，以及前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先后因涉及贪污或失信被调查。黄循文之后被判坐牢、彭由国弃保潜逃，而郑章远留下遗书后服药自杀。

他说：“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17]。

对外交与国防的贡献

俗语说：“小国无外交”，但李光耀却有一套小国必须靠外交生存发展的理念。他在2009年的一篇演讲中，清晰地总结了自己的外交理念：首先，小国无法改变国际游戏规则，所以必须广结善缘，结交众多友邦，从中保持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自由；其次，小国无法改变所处的地理，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东南亚独善其身，将是新加坡的宿命和挑战。他说：“在国际关系里，友谊并非是因为善意或个人感情的作用。我们必须让自己变得有用，那样我们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继续存在和繁荣，才会让其他国家觉得利益相关”[18]。

在国际外交上，他纵横捭阖，对世界局势的观察、分析能力和远见，在国际上广受重视。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抗议中共当局杀害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之际，李光耀不畏西方舆论的批评，公开为北京辩护。他说流血收场是个悲剧，但是事件并非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么黑白分明。在他看来，一个因无法尽快解决天安门占领状态，最终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中国，恐怕会是个更悲惨的后果。

在中国受到国际孤立的时候仗义执言，使他获得了中国领导人的信任，因此得以在1993年促成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汪辜会谈。

[17] 第12章〈铁腕护廉洁〉，《李光耀回忆录》下册。

[18]〈务实精算洞悉时局〉，载《联合早报》，2015年3月23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2月21日

新生水正式成为水供来源

2月

“沙斯”来袭，历时三个月，人人自危

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但讲话不哗众取宠，对其他国家的忠告诚恳坦率，不讲客套话，如1980年访问澳大利亚时，老实不客气地提醒澳洲人再不努力工作，只求安逸，最终要变成亚洲的“白人垃圾”。虽然他当时遭到澳洲政界和媒体的反击，但后来他们都把他的忠告当作激励的话。李光耀逝世后，澳洲国会还动议向他致敬，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和几位部长发言，赞扬李光耀。新西兰国会也动议，向李光耀致敬。

李光耀的另一外交成就是，在大国之间从事平衡外交，时刻为新加坡争取利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新加坡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其一方面与美国有着紧密防务联系，一方面与中国有着种族亲缘关系”[19]。

新加坡在外交上的建树大大加强了小国的生存能力，终于赢得了“小国大外交”的称号。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许通美说：“从1965年到1990年担任总理的长时间里，他（李光耀）是新加坡外交的总建筑师。之后，在担任内阁资政期间，他继续为继承者在外交上提供宝贵的意见。说他是我们对外的首席外交官，是完全正确的”[20]。

许通美把新加坡外交成就归功于“李光耀因素”。“李光耀为什么那么受到外国领导人的敬重？这是因为他的超群智慧、分析能力和判断力、滔滔雄辩和领袖魅力，及他愿意分享他坦率和无私的看法。他的长寿也让他能够从新加坡的杰出总理，变成年长、睿智的政治家。知名美国学者阿里森（Graham Allison）及布莱克韦尔（Robert Blackwill）最近更称他为‘大师’（The Grand Master）”。

为了新加坡，李光耀不时出国访问，一直到晚年，仍然风尘仆仆。他同许多外国政界、商界与学术界领导人建立了友谊，并得到他们的尊重。他的全球联络网让人印象深刻。比如，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法国前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及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Kiichi Miyazawa）都非常尊敬他。以美国来说，他认识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至奥巴马（Obama）的历届美国总统，也得到他们的尊敬。在众多钦佩他的人当中，还包括美国思想领袖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与舒尔茨（Schulz）。

受邀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是美国赋予外国领导人的最大荣耀之一。许通美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85年秋季10月9日那美丽的一天。李光耀在座无虚席的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当时，美国政界有强烈的保护主义情绪，李光耀深具说服力的演讲，多次

1976年5月12日，李光耀与毛泽东在中南海

[19]〈新加坡的“李光耀遗产”〉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转引自《联合早报》，2015年3月26日。

[20]〈李光耀的外交功绩〉，载《联合早报》，2015年3月25日。

获得全场起立鼓掌。李光耀向出席者解释，美国继续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为什么是符合其战略利益的。坐在我旁边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后来对我说，他之前并不知道自由贸易和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有密切关系。李光耀的演讲，对帮助抑制美国国会里的保护主义浪潮，的确发挥了作用”。

许通美把李光耀对外交贡献总结出七大原则：

（一）实事求是：新加坡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实事求是，而不是任何主义或意识形态。

（二）自力更生：新加坡相信世界不欠我们什么，并没有向发达国家寻求援助。新加坡不希望养成依赖的心理。相反的，把精力放在吸引外来投资，和为新加坡人制造工作。新加坡开始组织自己的武装部队，并实行国民服役制度，来建立防止侵略的力量。

（三）接受现实：对世界不存幻想，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事实和现实。这不意味着是被动和相信宿命论的。相反的，新加坡非常主动地带头成立小国论坛（Forum of Small States）和环球治理组织（Global Governance Group）等。新加坡知道自己生存在一个不公平和危险的世界，也知道小国往往面对来自大国的压力。

（四）亚细安的核心地位：新加坡全力支持亚细安，及让东南亚成为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区域。大力促进亚细安的整合，并同新加坡的伙伴紧密合作，确保亚细安到2015年，成功从一个联盟建成一个共同体。

（五）亚太共同体：新加坡支持建立亚太共同体的愿景。新加坡希望区域维持势力均衡，也欢迎美国、中国、日本、印度、欧盟及俄罗斯在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扮演正面的角色。新加坡支持通过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发起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贸易，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自由化，来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整合。新加坡也支持通过亚细安区域论坛和东亚峰会等平台，来进行对话、建立互信及合作。

（六）不害怕持不同观点：新加坡不应该害怕采取和传统观念不同的看法。1960年代，当第三世界其他国家都认为跨国公司是邪恶的，新加坡却欢迎这些外来投资。新加坡在决定同美国商讨自由贸易协定时，也不害怕被其他亚细安伙伴批评。当美军被迫离开菲律宾时，新加坡却欢迎他们在区域的存在。

（七）成为良好的全球公民：新加坡应该努力成为良好的全球公民。在亚细安内，新加坡带头拉近旧和新成员的距离。新加坡在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都有培训中心，帮助培训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由外交部负责的新加坡合作计划（Singapore Cooperation Programme），每年为其他国家培训7000名官员。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已经为170个国家的8万名官员提供培训。

许通美提到新加坡的武装力量，是一个对新加坡生存非常关键的因素。新加坡一独立便感到建立国防的迫切性，这项重任落到了吴庆瑞身上，他成为了新加坡的第一任国防部长，着手建立国防之初获得以色列的协助。1975年，李光耀凭着他与台湾总统蒋经国的密切关系，新加坡陆军和装甲部队获准在台湾受训。1970年代末期，菲律宾总统马可斯（Ferdinand Marcos）和美国同意让新加坡空军利用克拉克空军基地进行训练。在1990年代，当美国撤出克拉克基地，新加坡空军便把空军训练转移到美国的亚利桑那（Arizona）和澳大利亚。

受限于空间的缺乏，李光耀以非传统的思维和行动，不断在友好国家寻找训练空间，逐步把新加坡武装部队建立成一支受人尊敬的力量，如今新加坡已经拥有超过400架战斗机来保护仅710平方公里的土地。

相关人物

李显龙

历史事件

5 月 31 日

行动党议员和部长，一致推举李显龙任总理

褒贬自有春秋

马凯硕院长说："了解内情的人都不会小看新加坡的国防能力。其军队能调动25万名军人。公务员体系也很强大。"英国政府及教育专家巴伯爵士（Sir Michael Barber）称："以我的经验看来，新加坡公务员体系的素质标准，几乎是无可匹敌的"。

李光耀通过推动一项富有争议的计划做到了这一点，该计划以可与私营部门相比的高薪，把一流人才留在公务员体系中。新加坡在教育、医疗和公共住房方面所取得的出色成就，正被竞相效仿。

这个顽强的岛国今后机遇众多。就像伦敦和纽约分别充当欧洲世纪和美洲世纪的中心一样，新加坡也可以成为亚洲世纪的中心。新加坡拥有或许是世界上最好的机场和港口。

新加坡金融中心做好了为亚洲中产阶层服务的准备。新加坡是亚洲第一大财富管理中心，拥有亚洲地区排名最高学府之一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当然，新加坡也存在挑战。由于大量外来人口流入新加坡，公共交通和住房建设都已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这引发了反移民情绪，不平等程度提高。因此，最新预算案引入了一些新的社会转移支付措施，比如，提出了让中低收入家庭，更多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计划[21]。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说："李资政带给新加坡的正直与高效，很可能会跟着他进入坟墓"。多年来他这句话常被提起和引用，这句话就像1980年李光耀警惕澳洲人不要变成"白人垃圾"一样，虽然听来有点刺激，但也正因为这样，时刻提醒新加坡必须把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体制化，不要因为李光耀不在而"人亡政息"。

马凯硕院长说，"新加坡领导人明白一个重要历史教训：小型城市国家很少能生存一个世纪以上。这些领导人没有想当然地认为，新加坡已经取得了成功，因而可以轻松地采用'自动驾驶'模式了，他们预料到、也准备着迎接新挑战。时刻保持警觉是李光耀的一个性格特征，他也已经把这一特性深植于新加坡社会中"[22]。

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于2015年1月26日举办的"新加坡透视论坛"上的演讲中指出："但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物流枢纽、海港和机场及金融中心，我们却一点也不'小'。在贸易、互通互联和金融等领域，我们是有国际规模的，远比我们的面积大"[23]。

基于李光耀治国理念的体制化以及新加坡本身的经济规模对本区域的重要性，新加坡在某种意义上已不是一个小国。国际上在乎新加坡的生存，新加坡继续发挥它在地缘政治上的作用，后李光耀的新加坡的"李光耀之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

从古至今，世上的伟人身上都难免存在争议性，李光耀也不例外。他性格强悍，从一开始掌权便展露强人领袖的风格。对媒体的管制从不放松，使新加坡在国际上被视为缺乏自由的民主国家。受到国际媒体的攻击时，多次毫不犹豫地通过法律对付。

面对政治敌人的挑战，他的手段被视为残酷无情。他跟马共与左派人士的斗争是新加坡一页不可磨灭的历史。

到了晚年，以前被他长期拘留过的政治犯开始反扑，企图以自己的说法修改新加坡一段政治斗争史。后李光耀时代，诠释历史引起的争论将会持续下去。

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由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陈六使创议成立，曾在新加坡和马来半岛上的华人社会引起轰轰烈烈筹建热潮的东南亚唯一华文大学，1956年开课的南洋大学，1980年关闭，成为李光耀一生最受争议的政策之一。

[21]《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

[22]《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

[23] 演讲全文载《联合早报》，2015年2月2日。

附表
李光耀年谱（1923–2015）

年份	月份	大事记
1923年	9月16日	在新加坡甘榜爪哇路（Kampong Java）92号家中诞生
1936－1939		在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求学
1946－1950		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
1950－1959		执业当律师，出任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
1950年	8月	从英国返回新加坡
	9月	与柯玉芝结婚
1952年		长子李显龙出世
1954年	11月	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当选秘书长
		女儿李玮玲出世
	4月	在根据林德宪制举行的大选中，当选进入新加坡立法议会，成为反对党领袖（人民行动党赢得三个议席）
1956年	5月	参加由首席部长马绍尔率领的首个各政党宪制代表团到伦敦进行争取自治的谈判。谈判失败，马绍尔辞职，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
1957年		次子李显扬出世
	3月	参加由林有福率领的第二个各政党宪制代表团到伦敦谈判，达成自治协议
	12月	人民行动党参加市议会选举，赢得13个议席
1958年	3月	同共产党地下组织领袖方壮璧（马共全权代表）进行第一次秘密会谈
	5月	参加各政党宪制代表团第三次到伦敦谈判，双方对成立新加坡自治邦的宪法达成协议
1959年	5月	人民行动党参加在新宪制下举行的第一次自治邦议会大选，在51个议席中赢得43席
	6月5日	人民行动党执政。宣誓就任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总理，时年35岁
1961年	8月	人民行动党分裂，党内的亲共分子在李绍祖医生领导下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1962年	11月	开始下乡访问全国51个选区
1963年	2月	一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在“冷藏行动”中被拘捕
	9月16日	马来西亚成立，成员包括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印度尼西亚对马来西亚展开“对抗”行动
	9月21日	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获胜，并在全部三个以马来人为主的选区里击败新加坡巫统
1964年	3月	人民行动党派出九名候选人参加马来西亚大选，只赢得一个议席。它同联邦政府的关系恶化
	7月21日	新加坡于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发生种族暴乱
	9月	新加坡发生更多种族暴乱
1965年	5月	人民行动党召开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大会，宣扬“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
	1月－7月	修订马来西亚宪法的尝试失败
	7月	东姑阿都拉曼在伦敦决定新加坡必须退出马来西亚
	8月9日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

年份	月份	大事记
1968年		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独立后第一次大选，夺得国会全部58个议席，总得票率84.43%。本身以94.3%的得票率，第五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继续担任总理。到温哥华和哈佛大学进修三个月，并考察美国的总统选举，同时研究美国的社会与政治制度
1972年		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夺得全部65个议席，总得票率是69.2%。本身以82.5%的得票率，第六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继续担任总理
1973年		把在国外演讲所得的演讲费悉数捐给教育部，以所得利息设立“总理书籍奖”，每年颁发给双语学习表现特出的学生。50岁生日，全国职工总会出版论文集《朝向明天》作为献礼
1976年		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夺得国会全部议席，总得票率72.4%。本身以86.9%的得票率，第七度成为丹戎巴葛区议员，并连任总理
1980年	8月	母亲蔡认娘去世
	12月	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赢得国会全部75个议席，总得票率75.55%。本身以76.6%的得票率，第八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继续担任总理
1983年		60岁生日，全国多个公私部门和民间团体举行宴会祝寿
1984年		第一次在大选中无对手当选，第九度担任丹戎巴葛区议员，继续担任总理。同年10月19日，提出实行民选总统制以保护国家储备金的建议
1988年		在大选中以79.4%的得票率，第十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第八度出任总理
1990年	11月28日	吴作栋接任总理。继续留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自1959年6月起，担任总理长达31年又5个月
1991年		参加大选，在无对手的情况下连任丹戎巴葛区议员。民间举行“全国人民向李光耀先生致敬”的盛大晚宴，有4000人出席
1992年	11月	辞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职位。除了1957年一小段时间，先后担任这个职位长达38年
1997年		连任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续任内阁资政
	10月	父亲李进坤去世，享年94岁
1998年	9月16日	配合75岁生日举行《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首发仪式。这本书是他个人亲自执笔，历时三年完成的著作
2000年	9月16日	举行《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首发仪式。同一天，也获吉隆坡透明与廉洁学会颁发首个“环球廉洁奖”（Global Integrity Medal），以表扬他在担任新加坡总理期间杜绝贪污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2001年	11月	大选，在无对手的情况下连任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继续留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
2003年	9月16日	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千人盛宴庆祝80岁生日。会上，时任总理吴作栋宣布设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11月14日	弟弟李金耀因患癌去世，享年77岁
2004年	8月12日	长子李显龙担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理
	8月16日	以他名义设立的学府“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正式成立，该学院研究重点是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与社会政策时所面对的挑战
2006年	5月	大选，在无对手的情况下连任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继续留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
2007年	11月19日	与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一起为“通商中国”主持启动仪式，推动新中两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双向交流
2008年	6月25日	公用事业局以他名字设立“李光耀水源奖”，以肯定他在本地水供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2009年	6月22日	政府设立“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旨在奖励以远见和创新思维进行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或解决许多城市面临的环境挑战的杰出人士或组织
2010年	10月2日	妻子柯玉芝在家中安详逝世，享年89岁

年份	月份	大事记
2011年		大选，在无对手的情况下连任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继续留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
	5月14日	与国务资政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从内阁退休，不会在新一届内阁中担任职位
	5月18日	受委任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高级顾问
	1月21日 9月16日	分别出版《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英文和中文版本。该书主要收集《海峡时报》新闻工作者与李光耀所做的一系列访问，谈到新加坡政治制度未来的发展、新加坡与邻国的关系、移民问题、中国与印度的崛起、气候变化等一系列课题
	10月18日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福特剧院获颁林肯勋章（Lincoln Medal），成为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亚洲人
	11月28日	推出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同时也成立李光耀双语基金，用来设计适合学前教育孩童使用的英语和母语教材，以及提升师资，为学前教育机构提供更有利教导双语的环境
2012年	2月15日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出现类似中风症状，首次无法出席选区的新春团拜宴会
	3月27日	收录了他从1990年至2011年言论的第二套言论集《李光耀言论集：演讲、访谈与对话》面市
	6月4日	获颁国大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肯定他带领新加坡晋升第一世界国家级别的卓越贡献
	6月29日	三弟李天耀逝世，享年85岁
	8月6日	新著*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李光耀观天下》）在总统府推介
2013年	8月6日	本地第一座李光耀塑像在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落成。这座半身铜像是里昂—新加坡协会请法国知名雕塑家凯奴制作的
	9月5日	获三华社组织颁发“通商中国丰功伟业奖”，次子李显扬代他出席晚宴并领奖。三个组织是通商中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9月6日	新加坡报业控股推出以中英文撰写的图片集《李光耀图片人生》（*Lee Kuan Yew: A Life in Pictures*）
	9月16日	90岁大寿这天，他出席国会，国会领袖黄永宏以四分钟的赞词向他致敬。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同日主办了“李光耀的宏大治国理念”研讨会
	9月18日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以及宜居城市研发中心，举办“李光耀与新加坡城市建设研讨会”
	9月	由前华文新闻工作者编写的《新加坡选择了李光耀》九册丛书面市
2014年	11月2日	出席丹戎巴葛集选区与拉丁马士区的植树节活动
	11月7日	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出席人民行动党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的建党60周年纪念仪式
2015年	3月23日	凌晨3时18分在中央医院逝世，享年91岁。陈庆炎总统在发给李显龙总理的唁电中说，李光耀为打造一个唯才是用和多元文化的新加坡做出了深远的贡献，他是“现代新加坡的建筑师”

资料来源：《联合早报》，《光耀百年》特辑，2015年3月23日

第十七章

缘聚岛国
Inclusive Nation

缘聚岛国
——当代新移民

摘要

由于新加坡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替代水平，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自199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不断积极引进外来移民，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占多数。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大量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涌入新加坡，他们努力适应和融入新加坡社会，与此同时，他们也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Abstract

Due to the recent birth rate of Singapore's population dropping below the replacement rate necessary for sustai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gapore had, since the 1990s, been actively bringing in foreign immigrants to supplement its labour force, the majority of whom are from Mainland China. In the past 20 years, large numbers of new immigrants from China have flocked to Singapore and have strived to adapt and integrate into Singapore society. However, they also have some impact on Singapore society.

欧雅丽（Ou Yali）

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至1941年前，一直吸引着大量中国南方移民的到来。关于早期华人移民新加坡的情况，本书的其他章节已经详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限制人员出国，再加上英殖民地政府限制从中国来的移民，导致1945年至1980年代中国移民至新加坡的人数锐减。1990年新中建交后，新中两国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内外两股力量的作用下，大批中国移民涌入新加坡。这股移民浪潮迄今已持续了20多年，为新加坡带来了数十万中国新移民，对当今的新加坡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节将重点论述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如何影响新加坡社会。

在开始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厘清本节所要讨论的“新移民”的范畴。李显龙总理在2010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明确提到，“移民有别于外劳；移民是指永久居民或新公民”[1]。本节谈到的新移民沿用这一说法，只包括新入籍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在地域上，因为港澳台地区的移民与中国内地的移民虽同属中国移民的范畴，具有文化和种族上的共性，但前者移民的背景、动机和类型不同于后者，所以在此仅讨论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在时间上，1990年新中建交后，才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移民来到新加坡，因此本文也将时间限定在1990年后。总的来说，本节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1990年新中建交后移民至新加坡的中国内地新移民，包括已入籍的新公民和永久居民。

移入岛国

新一波移民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立后，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向海外移民基本处于中断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原本严格控管的出境条例。1985年，中国政府通过立法允许国民在一定限制下出国。到了2002年初，出境审查进一步放松，出国申请不再需要提供海外邀请函以及事先向公安局申请出境卡。除了政策的宽松外，中国人在经历了长期闭塞后对外国充满了向往，这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两次移民潮的兴起[2]。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对中国改革开放意义重大的南巡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3]。在邓小平这次讲话的号召下，中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数以百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中国代表团到新加坡考察。他们回国后，或著书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畅谈“新加坡经验”。中国人因此加深了对新加坡的认识，并对这个花园城市产生了好感，这也促使了一些想移民的中国人把新加坡当作理想的移居地之一。

此外，1980年代至1990年代，新加坡的电视剧在中国开创了收视热潮，如《雾锁南洋》、《人在旅途》、《调色板》、《出人头地》、《法网情天》等。据资料统计，1984年至1999年，中国引进的新加坡电视剧共有48部[4]。这些新加坡电视剧的热播，让中国人通过荧幕感受新加坡，也使得很多中国人对新加坡产生向往。

新加坡的人才政策

与此同时，新加坡国内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开始推出政策，积极吸引人才。

新加坡建国初期实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政策，再加之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职场，导致新加坡本土华人出

[1] 李显龙总理国庆群众大会华语演讲（2010年8月29日），参阅总理公署网站http://www.pmo.gov.sg/。

[2]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次移民高潮。第一次移民潮是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很多有海外关系的人纷纷出国团聚或移民，很多去了港澳台和东南亚及欧美等国，还有大量的留学生；第二次移民潮是1980年代末到20世纪末，许多发达国家在这个时期开始向中国吸收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特别是大量吸收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第三次移民潮就是21世纪以来到目前正在发生的第三次移民浪潮，其特点为精英移民，包括大量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也包括大量的留学生出国学成后被发达国家吸引转化为移民。参阅王辉耀，《中国正经历第三次移民潮》，载FT中文网，2013年1月9日。

[3]《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参阅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1231/5390024.shtml。

[4] 潘娜，《中国引进的海外电视剧（美日韩除外）回顾》，载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网站http://rirt.cuc.edu.cn/html/meijieyanjiu/2007/1101/402.html。

现代新加坡的地标——滨海酒店金沙

生率在1980年代后大幅下降。根据新加坡政府的统计，在1970年，新加坡华人人口出生率是3.03%，到1975年下降为2.07%，到了1985年，华人出生率为1.5%[5]，不足以维持人口更替水平[6]。为了解决低生育率、人口老化的问题，政府自1980年代开始积极吸收外国移民。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经济结构在1980年代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成为继续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政府开始引导经济逐步转型为依靠高增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新经济（关于经济转型的详细内容，参阅第十六章第三节）。而这种经济转型也增加了对人才的需求。

新加坡政府主要从两个方面吸纳人才，一方面是吸引本国人才，另一方面是吸引外来人才。1977年，新加坡推出国外人才居住计划（Scheme for Housing Foreign Talent），向有住房需求的国外人才提供援助，由专门负责工业开发区工作的半官方组织裕廊集团（Jurong Town）和新加坡住房署共同管理，并帮助外国人通过与当地人为邻，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生活。1978年11月13日《新国家午报》（*The New Nation*）报道："长期以来致力于促进跨国公司和其他大企业在新加坡投资的经济发展局，最近开始努力吸引在西方居住的亚洲人，包括在英国、西德、瑞士和美国的中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斯里兰卡人，有独自设计和革新才能的人才，同时也吸引已经移民到国外的有高科学水平的新加坡人，以及留在国外如在澳洲的前新加坡学生回国"[7]。这是新加坡尝试吸引外国人才最早的报道之一。

1980年至1982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简称EDB）的官员去香港和台湾寻找愿意到新加坡工作的新加坡人和其他人才（主要是华人）。1980年代，政府积极在欧美招募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台湾人、出生在美国的华人等。1991年，政府设立新加坡国际基金会（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加强与在国外的新加坡人的联系，同时也鼓励世界各地的人才到新加坡学习和工作。1997年，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指出，新加坡之所以繁荣，正是因为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5] 苏瑞福著，薛学了、王艳等译，《新加坡人口研究》（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77。

[6] 一对夫妇通常需要生育2.1个小孩，才能维持人口更替水平。

[7] 叶傅么，〈新加坡是英殖民地、第三个中国或全球化城市〉，载《联合早报》，2001年2月11日。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月1日

"优频道"改组成为新传媒旗下频道正式启播

新加坡要继续成为新加坡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必须吸纳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要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一个成功的知识经济体，就需要人才资源。故此，本国必须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城市及开放的社会，以留住世界各地的人才[8]。

1998年，政府将原来的劳工部改组为职能范围更广的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以制定和协调全国性的人才发展策略。人力部新设两个部门，一个是人力发展处，另一个就是国际人才处，专门负责外国人才的相关事宜[9]。1999年，人力部推出了“联系新加坡”的国际人才宣传计划，旨在与海外新加坡人和国际人才建立联系，并协助他们到新加坡工作、投资和生活[10]。2006年，政府成立了“国家人口秘书处”（National Population Secretariat，简称NPS），其主要任务就是为了鼓励合适的外国人移民新加坡，以及引导海外新加坡人回国。2010年，政府在总理公署设立人口及人才署（Population and Talent Division），制定整体政府部门的方式来吸引、培养和留住人才，也监管生育率、移民融入以及同海外新加坡人保持联系[11]。

新加坡政府自1990年代起便针对中国内地策略性地引进人才。从1992年开始，政府就颁发奖学金给中国学生，让其在本地大学就读，附加条件是毕业后须在本地工作六年。2002年，李光耀在国大“资政论坛”上说，“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我决定吸收聪明的中国人才来新加坡工作和学习，以便他们了解新加坡，并成为新加坡的一分子”[12]。2005年，政府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内地第一个“联系新加坡”中心，加强在中国的新加坡人与新加坡的联系，为其提供有关新加坡的信息；同时，也帮助中国人寻找在新加坡就业、学习和生活的机会。

移民之路

中国新移民的数量

中国大环境改变的推力，加上新加坡本国吸纳移民的拉力，在这两股力量合力作用下，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新移民纷纷来到新加坡，尤其是2000年之后，每年均有数万中国人通过各种移民途径进入新加坡。目前，关于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的数量众说不一，官方也没有公开具体的数据。厦门大学专门从事华人研究的庄国土教授2009年在吴德耀文化讲座演讲时，估计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可能有30万左右[13]；有一项2010年的研究估计在新加坡可能有50-60万来自中国的新移民[14]。南洋理工大学刘宏教授在2012年撰文时指出，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数量约40-50万[15]。但是，这些学者讨论的中国新移民的范畴包括已入籍的新公民、永久居民和非常住居民（含留学生、劳工、陪读妈妈等），这和本节所要讨论的中国新移民范畴（只包括新入籍的公民和永久居民）稍有不同。

根据新加坡国家人口与人才署（National Population and Talent Division）发布的《2014年人口简报》的统计，截至2014年6月底，新加坡的人口数量为547万人，其中有387万新加坡常住居民（包括334万新加坡公民和53万永久居民），非常住居民160万[16]。表（一）是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公布的根据族群和人口出生地划分的新加坡居民人数：2010年新加坡常住居民总数为377万1721人，华人数量为279万3980人。其中，有17万4355名华人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这17万4355名华人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与2010年相比，2014年新加坡常住居民的人数增加了约10万人，相信在2011年至2014年，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人数也有一定的增加。目前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新公民和永久居民）数量估计在20万人左右。

---

[8] Goh Chok Tong, Prime Minister's National Day Rally Speech 1997(Singapor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9]〈发展一支世界级劳工队伍 劳工部4月起改为人力部〉，载《联合早报》，1998年2月25日。

[10] “联系新加坡”网站https://www.contactsingapore.sg/cn/。

[11]〈黄根成：以可持续方式引进移民确保社会本质不被破坏〉，载《联合早报》，2010年8月31日。

[12] 杨建伟，〈新移民的作用与价值——读李资政国大“资政论坛”讲演有感〉，载《联合早报》2001年10月24日。

[13]〈庄国土教授谈中国新移民在东南亚〉，载《联合早报》，2009年12月7日。

[14] 谢美华，〈近20年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及其数量估算〉，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期3，2010年9月，页58。

[15] 刘宏，〈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形象：当地的视野与政策的考量〉，载《南洋问题研究》，期150，2012年第2期，页69。

[16] "Diagram 1: Total population, as of June 2014", *2014 POPULATION IN BRIEF*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Talent Division), http://population.sg, p.5.

表（一）2010年按出生地和族群划分的新加坡居民

出生地		人口总数	华人人口
	总数	3, 771, 721	2, 793, 980
新加坡		2, 911, 934	2, 206, 695
新加坡以外		859, 787	587, 285
马来西亚		385, 979	338, 501
中国大陆 / 香港 / 澳门		175, 155	174, 355
印度 / 巴基斯坦 / 孟加拉 / 斯里兰卡		123, 478	140
印度尼西亚		54, 404	42, 571
其他亚洲国家		90, 143	20, 764
欧洲国家		13, 351	2, 278
美国 / 加拿大		7, 212	3, 605
澳洲 / 新西兰		4, 803	2, 017
其他		5, 262	3, 054

资料来源： "Table A6: Resident Population by Place of Birth, Ethnic Group and Sex", *Census of Population 2010: Advance Census Releas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0), p.31

移民的类型

中国新移民的移民途径主要为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留学移民、其他移民四大类型。

投资移民： 2004年，新加坡政府推出“金融投资者计划”，个人资产不低于2000万新元的人士，将不低于1000万新元的资产保留在新加坡5年，就可以申请新加坡永久居留权。2005年又实施“全球投资者计划（GIP）”，要求投资者至少投资100万新币到新加坡政府批准的基金，无居住要求。至2012年4月之前，投资者可以选择这两种方式移民新加坡。2012年4月之后，政府取消了“金融投资者计划”，“全球投资者计划”成了唯一的投资移民方式，并且随着新加坡移民数量的快速增加，这项计划不断提高申请者的要求[17]。近十几年来，有不少中国的富裕阶层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移民新加坡。

技术移民： 1997年，吴作栋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表示，外来人才可以在三个不同层面为新加坡的经济做贡献，包括（一）顶尖人才，如公司总裁、科学家、学者、艺术家；（二）专业人士，如工程师、会计、资讯人员 、教师、行政人员；（三）技术工人，如巴士司机、技工等等[18]。吴作栋的讲话明确指出了新加坡引进的外来人才既包括了尖端人才，也包括普通的技术人才。

自1990年代起，有很多原本在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或发展的中国大陆尖端人才受聘于新加坡，他们广泛分布在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领域。1996年，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推出“彩虹计划”，目的是让外籍体育专才在更短时间内成为新加坡公民，为新加坡在体育赛事中争取荣耀[19]。在这项计划下，新加坡吸纳了很多来自中国的运动员，如李佳薇、

[17] 参阅联系新加坡网站https://www.contactsingapore.sg/cn/。

[18] 同注8。

[19]〈国家女乒副教练井浚泓：外来人才催生体育新气象〉，载《联合早报》，2010年10月3日。

相关人物

杜莱

历史事件

4 月 17 日

全国肾脏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杜莱（T. T. Dulai）被控贪污罪，于 2008 年 6 月被判坐监 3 个月

5 月 6 日

举行第 10 届大选，人民行动党在国会 84 席中赢得 82 席。得票率为 66.6%

王越古、冯天薇等。此外，国家艺术理事会（National Arts Council，简称NAC）也和新加坡移民局（Immigration & Checkpoints Authority，简称ICA）共同管理一个针对艺术人才的“外来人才计划”，帮助在艺术、舞蹈、音乐、戏剧、文学、电影等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外国艺术人才申请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

由于新加坡对新移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具有可携带技能的专业、技术移民和劳工（后者通常无法以合约工人的方式获得永久居民权）[20]，因此，除了尖端人才外，专业人士和技术工人占了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的大部分。与欧美国家相比，新加坡对技术移民的条件要求相对宽松，其要求也较适合中国的相关群体。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新加坡的各行各业几乎都能看到中国新移民的身影。

留学移民：新加坡教育部在19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推出“SM奖学金计划”，该计划分别针对初三毕业生（SM1）、高二在读生（SM2）、大学一年级在读生（SM3）。这项计划旨在促进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吸引外来人才，以便将来让他们留在新加坡服务，更好地把握发展中国市场的商机。通过这项计划来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需要在大学毕业后，留在新加坡工作六年[21]。除了新加坡政府直接从中国吸收留学生，还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自主来到新加坡就读从大专到博士的各级课程。新加坡有数以百计的中小学对外国留学生开放，这些学校也吸引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

其他类型移民：主要包括婚姻移民和自雇移民等。根据新加坡移民局的相关规定，与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结婚的外国人，均有资格申请成为永久居民，但移民局会视具体个案审批。不过，新加坡政府为防止利用假结婚骗取移民身份，对婚姻移民造假的判罚很重 。

另外，为鼓励创业，新加坡政府还给外国人签发创业准证和自雇就业准证，这两个准证都是在新加坡注册公司，然后在新加坡人力资源部门申请准证，最后通过持有准证申请新加坡永久居民。

新移民新特点

与早期下南洋的老一辈华人移民相比，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新移民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首先，老一辈移民多来自东南沿海省份，如福建、广东、海南等，而中国新移民来自于中国的大江南北，沿海内陆皆有。并且，早期的华人移民南来多是同乡互相介绍，因此他们的来源地比较集中，来自同村、同乡、同县的较多，中国新移民的来源地却更为分散，同乡网络不再是来新加坡的主要关系网络。

其次，两者的生活习惯和地域文化也不同，老一辈移民的饮食、生活习惯是中国南方的习惯和文化，因此新加坡的华人文化也主要体现了中国南方沿海的文化，包括饮食、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中国新移民来源地广泛，因此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地域文化更加多元，包括了中国各个省份的生活习惯和文化。

其三，从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早期的移民多是华商和华工，而中国新移民的职业更加多元，根据中山大学范若兰教授等人的调查显示，在新加坡的中国人的共同特征是“高学历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22]。与老一代华人移民相比，最明显的差别是新移民教育程度普遍很高，具有较强的谋生能力，比较容易成为中产阶级。

移民生活

艰辛适应之路

中国新移民把新加坡作为移居地的原因不一，但总的来说，可归结为几点：（一）因为新加坡良好的社会环境。这里环境优美，政府廉洁，任人唯才，社会安定，治安良好，重视法治，人民素质高，生活水平高，资讯自由，华人占大多数，以及融汇东西方的双语社会；（二）希望在新加坡谋求更好的个人发展；（三）为了下一代的教育，给孩子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和一个更好的未来。

中国新移民初来新加坡时，大都会经历一段“蜜月期”。根据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斯蒂芬 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的“文化冲击四阶段”周期理论，

[20]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229。

[21] 何子煌，〈SM1奖学金初探〉，载《华汇》期9（2014年9月），页30-33。

[22] 范若兰、孟庆顺、湛焕义，〈大陆中国人在新加坡：一个实地调查〉，载《东南亚研究》期1（2001年），页80。

这个“蜜月期”阶段属于第一阶段——新鲜期（大约在第一个月）。初来者刚到一个崭新的环境，新鲜感成了最主要的感觉。每天如游客似的看风景、购物。即使与中国有很大差异的事物，看着也觉得有趣，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在这个阶段新移民的心态非常好[23]。

第二、三个月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失落期，做了一个月的游客，新加坡的景点大都已经去过，食物也品尝过了，新鲜感过去，失落感随之而来，心境也开始低落；到了第三阶段（大约在第四至第六个月），正式进入低潮期。在这一阶段，新环境与原来环境的所有文化差异都表现了出来，加剧了新移民不习惯、不顺眼、不适应的感觉。此时，新移民从游客的虚幻中回到了现实生活，开始面临找工作、找房子、为孩子找学校等问题。面对困难和挫折，此时的新移民开始怀念在中国的生活，不少人甚至萌生打道回府的想法。这一阶段也是新移民心境最低潮、情绪最差的时候。大约在半年之后，开始进入第四阶段——恢复期，之前的情绪波动渐趋平缓，新移民开始慢慢适应这些文化差异，许多消极的心态逐渐淡化。多数新移民都能够面对现实，说服自己既来之，则安之，心境逐渐恢复正常。

与其他国家的移民相比，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在面临异国的文化冲击时也多一个困惑：明明是华人为主的社会，但是在融入时却并不那么容易。这个困惑也是源于许多中国人对新加坡的一个误解，以为这个华人为主的社会和中国社会一样，以华人文化为主流。而实际上，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至1959年自治，一直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社会基本按照英国的制度运作。建国后，新加坡也是沿袭英国的体制，可以说“新加坡人更倾向于英国文化而不是华文文化”[24]。而且，在新加坡政府的努力下，国民逐渐建构了一个统一的身份认同，即“新加坡人”。因此，新移民在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下，会以为新加坡华人是和自己同文同种的中国人，这也会在双方的交往中造成一些问题。

正如马来西亚小说家欧大旭所言，“表面上看，中国新移民要在文化上融入新加坡无比轻松。在新加坡的多语种教育系统中，华语实际上是仅次于英语的第二语言。近半个世纪前，新加坡采用了中国大陆的简体字，而非香港和台湾的繁体中文。在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发起了‘讲华语运动’，以限制各种中国方言的使用。由于新加坡与中国有相似的华族美食和根植于儒释道传统的华族习俗，新加坡人熟悉中国文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然而，新加坡的华人和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之间，仍然横亘着一道鸿沟。造成这种割裂的，是当代社会价值和价值背后的语言”[25]。

除了文化上受到的冲击外，一些新移民还要应对职业上的落差。由于新加坡将英语作为工作用语，因此必须掌握英语才可能在职业上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一些中国新移民因为英语能力有限，来到新加坡后，无法从事自己最在行的工作。另外，新加坡引进的外来人才主要是“具有可携带技能的专业、技术移民”[26]，对于一些学习偏文科专业的中国新移民而言，在这里比较不容易找到发展的空间，因此谋生能力也相应削弱。调查显示，一部分中国新移民到新加坡后，所从事的职业就声望和水平来说，要低于在中国所从事的职业。

最近20多年，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与新加坡的差距逐渐缩小。中国新移民背井离乡，在新加坡经历了文

[23] 杨建伟、杨萌，〈新移民与文化冲击〉，载《联合早报》，2004年8月6日。

[24] 同上注。

[25] 欧大旭，〈新加坡华裔，你是中国人还是华人？〉，载《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213/c13aw/zh-hant/。

[26] 同注18。

化冲击和职业上的落差之后，一部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内，但是他们也发现自己已经回不去了。中国国内人才济济，回去也不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再加上多年在新加坡生活，与中国社会脱离太久，即使回去能找到适合的位置，也不一定能适应那里的职场氛围和规则。在新加坡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回国又很难找到发展空间，移民不易，故土难归，很多新移民难免有无根之感。这种无根的失落感也是中国新移民在情感上面临的困境之一。

《华汇》[27]第七期将新移民适应新环境需攀越的障碍总结为七条：（一）由于社会背景不同，思维模式与待人接物也不同，造成想与本地人深入沟通不易；（二）在新加坡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背景下，了解其他种族的文化并保持敏感性，尊重其他种族的文化；（三）在本地很难找到适合的人生伴侣；（四）本地高昂的生活成本；（五）留新加坡不易，回中国更难；（六）新移民下一代的身份认同问题——究竟哪里是故乡，中国还是新加坡？（七）抱着美好期望来到异国他乡，但现实和理想有巨大差距，又加之近年来一些本地人对新移民的排斥态度，对新移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28]。这七条基本可以概括中国新移民在融入本地生活时所面临的问题。

新移民的社交网络

前面已经讲过，与早期的华人移民相比，1990年代的中国新移民依靠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再主要是同乡网络。由于他们主要是专业人士或技术人才，更有可能通过同学（专业相同）介绍而获得工作信息，因此同学间的联系会更加常见。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生庄致彤2005年的硕士学位论文通过对30位新移民的访谈得出结论：新移民建立社会交往主要是通过原来建立的社会纽带，与在本地的亲朋好友取得联系。或者通过父母或朋友预先告知已来本地的朋友的子女或友人的讯息，而建立关系。到新加坡后，也积极地建立与其他新移民的联系。通过职场上的工作关系，或经由朋友介绍，或者参与一些集体活动，而建立起联系[29]。

笔者作为新移民的一员，根据自身经历与多年的观察，认为庄致彤的结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由于新加坡房屋租金高昂，新移民刚到新加坡时一般都会选择与其他新移民一起合租房子，这也会成为新移民建构本地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方式。在逐渐安定下来之后，新移民会通过朋友或同学介绍新的朋友，或加入本地新移民组建的一些团体，参与新移民组织的一些活动、聚会等，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关系网络。

但总的来说，中国新移民交往的人群还是以其他中国新移民为主。中国新移民社群的活动方式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比如华人新年聚在一起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到本地的中国餐厅聚餐等。实际上，中国新移民在本地的生活方式跟在中国的情形很相似，在由本地中国新移民构建的社群圈子中，中国的生活方式被移植过来，在本地营造出一种熟悉的生活形态，从而慰藉乡愁，获得认同感和安全感。

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新移民

进入21世纪后，新媒体迅速发展，以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的传播方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媒体为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提供了新的公共生活平台，改变了他们获取信息、传播信息、与人交往的方式。他们通过设立新移民网站、撰写博客、开通微博、微信等方式，分享移民生活经验、本地资讯、表达看法、结交朋友。目前，新加坡有很多中国新移民设立的网站，其中“狮城华人网”（http://www.sgcn.com/）、“随笔南洋网”（http://www.sgwritings.com/）和“华新网”（http://www.huasing.org/）是较为活跃的三个网站。

“狮城华人网”创办于2001年，其创办人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李志辉。狮城华人网的内容丰富，设有新闻、留学、生活、文学、旅游、美食、租房、物品、交友、博客、论坛等栏目[30]，基本涵盖了新移民在新加坡生活所需的各方面资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狮城华人网已拥有注册会员十多万人，每天有逾十万计的访问量和上千人同时在线，已成为东南亚和新加

[27]《华汇》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的，专门面向新加坡新移民社群的华文季刊。

[28]〈攀越移民生活的7大障碍〉，载《华汇》期10，2014年12月。

[29]庄致彤，《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及其跨国移民经验之研究（1990–2004）》（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30]参阅狮城华人网http://bbs.sgcn.com/。

“随笔南洋网”网站

坡访问量最大的华文交流平台之一[31]。

“随笔南洋网”是由四位新移民于2006年创办的中文原创文学网站，四个创办人李叶明、罗斌、陈燕红和邹璐因为共同热爱文学创作而创办了该网站，旨在推动本地的移民文学。“随笔南洋网”是新加坡第一家中文原创文学网，文学爱好者可以在网站上自由发表作品，交流读书心得，网站也提供各类新书出版及文化的资讯，以及提供博客、论坛等服务，还会不时组织线下文化活动[32]。李显龙总理在2010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时还特别提到了“随笔南洋网”[33]。2013年9月“随笔南洋网”的版主及热心网友成立了随笔南洋文化协会，会员包括新移民和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鼓励文学创作、推动文化活动及各类交流。

与其他两个网站不同，“华新网”是由一群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网站。该网站创立于2000年，开始时锁定的用户为来新留学的中国大学生，后来将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校园，而是包括到新加坡的留学生、工作人士及华人同胞，活动内容也扩展到如何融入社会、拓展事业、结婚成家等方面。在2000年网站创设后即注册华新社团，除了运营网站，还举办讲座、社交活动等让会员联系感情，社团团员还为其他会员给予生活上的指点和帮助。目前，“华新网”每月拥有上百万的点击量[34]。

除了这些新移民网站外，中国新移民还非常善于利用社交软件，比如微博在中国流行时，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也通过微博建立联系，发布各类信息，为新移民群体提供资讯，还通过举办线下活动结交朋友[35]。一些知名的微博用户，如“新加坡眼”、“新加坡省钱皇后”等，通过人气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2012年，中国的社交软件微信开始红火，很多新移民又迅速通过微信分享资讯。

此外，中国新移民不仅通过本地的网站和社交软件与外界建立联系，沟通交流，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新移民通过互联网突破地域上的疆界，在全球的网络世界（特别是中文网络世界）获取资讯，分享信息。庞大的中国网民及社交网络用户群，不断地为中文互联网世界提供各种各样的资讯，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可以从中获得更为丰富多元的资讯。有学者总结这些来自中国的知识阶层新移民具有现代都市知识精英阶层的普世特征：他们满足于身边关系亲密的校友同学圈子；对本地社会和中国官方交往都缺乏兴趣，甚少依靠“关系”拓展事业，仅保持与中国家乡亲友的私人联系；但却对互联网上的中文世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感情依赖；同时，跨国求职就业常规化，又使得他们的朋友网络遍及全球[36]。

[31]《访新加坡狮城华人网创办人李志辉（新加坡访问记之九）》，参阅网上资料http://www.21cte.com/104126.html。

[32]〈中国移民办文学网 共同推动本地华文文学〉，载《联合早报》，2007年7月9日。

[33] 同注1。

[34]〈与华新社团一起成长 谢春艳愿当种树人〉，载《华汇》期2（2012年12月），页12-13。又参阅〈从设网站到组社团—新加坡中国留学生扩大交流圈〉，载《联合早报》，2005年12月14日。

[35]〈新移民与本地人共享 微博小江湖牵系大世界〉，载《联合早报》，2012年4月10日。

[36] 阎靖靖，〈新加坡的中国知识精英新移民〉，载《纵横》期4（2010年7月），页29。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9 月 25 日

本地第一个中英资讯娱乐网

omy 启用

中国新移民团体

随着新加坡中国新移民人数的增加，一些新移民开始成立社团，新加坡天府会是最早成立的新移民社团。该社团初创于1996年，2000年正式注册，目前约有2300多位理事和会员。天府会的会员除了中国四川籍的新移民外，也包括新加坡、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新老移民，大多数会员是技术移民，专业人士、高学历人士。成立15年来，该会每年都举办15至20次内部交流与活动，如中秋联欢、新春团拜等，为会员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还设立奖学金，帮助会员子女。此外，该会还积极参与本地事务，多位理事受邀加入新加坡的社区组织、政府专门委员会等机构，如市镇理事会、国民融合理事会、国内税务局民意委员会等，为新加坡的社会发展献计献策[37]。

本地最大的新移民团体是华源会。该会成立于2001年，是由来自中国各个省份的新移民组成的团体，旨在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促进会员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促进会员与其他社团的友谊及交流；通过各类活动丰富会员及家人的业余生活；促进中新两国的文化和商贸往来。据该会网站的资料显示，目前华源会的会员有6000多名，遍布各个行业与领域。2010年恰逢华源会成立10周年，该会设立了“中国新移民杰出贡献奖”，用以表彰对新加坡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新移民，提升新移民的整体形象，并增进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的融合与理解。该奖项迄今已颁发两届，共有九位新移民获得了该奖项，另外有六位新加坡人获得该会为鼓励积极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而设立的“新移民之友奖”[38]。

近年来，新加坡又出现多个以地缘建立的新移民团体，如天津会、山西会馆、齐鲁会、陕西会馆等。除了这些地域性团体外，在新加坡还有众多中国高校的校友会，如北京大学校友会、清华大学校友会、南京大学校友会、浙江大学校友会等，在随笔南洋网“校友会专栏”列出的校友会（包括三个本地大学校友会）就达27个[39]，这些校友会也吸纳了相当数量的中国新移民。

此外，一批热心公益的中国新移民和新加坡本地人还于2010年7月共同创立了新加坡关爱会（Caring and Compassion Singapore），以资助中国贫困学生，培养学生健康心理，帮助新加坡困难群体为主要任务。该会的宗旨是通过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创造一个新移民和本地居民互相交流、互相帮助的平台，帮助新移民适应新加坡生活、融入新加坡社会，同时在公益活动中体现新移民价值、回馈新加坡社会，促进新移民和本地居民的文化交流和理解互信。关爱会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各种公益慈善活动；二是组织各种讲座、研讨会、对话会等项目活动，帮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40]。

中国新移民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

1990年代之后中国新移民的到来，对新加坡社会最主要的贡献，也是政府引进新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增加了新加坡的人口，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中国新移民在科技、教育、商业、金融、媒体、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突出人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各有建树。一些尖端人才已成为本地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重要业务骨干，有的取得了重大的科技成果，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来自中国各地的新移民为新加坡带来了更为丰富的中华文化，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以前新加坡的华人饮食主要是福建菜、广东菜、潮州菜等南方菜系，近几年本地出现了很多其他中国省份的地方菜，如山东菜、东北菜、四川菜等，丰富了新加坡的餐饮文化。

另外，具有较高华文华语水平的中国新移民的到来，使得华语、华文的运用范围在新加坡逐渐扩大。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荣誉教授郭振羽认为，大量华族新移民来自于大中华文化圈，有助于提升华族文化发展。从华族文化的角度看，新移民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就是新加坡当下的华文文学创作和华族文化推广的生力军。他们的加入，让本土的华文景观变得更有活力，也更加斑斓多彩[41]。新移民作者为新华文学注入了新的元素，新加坡本地的多个文学团体积极吸收

[37] 参阅《新加坡天府会15周年（2000–2015）纪念特刊》（新加坡天府会，2015年），页1。

[38] 参阅《新加坡华源会（2001–2010）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华源会，2010年），又参阅华源会网站http://huayuanhui.org/。

[39] 参阅网上资料http://www.sgwritings.com/bbs/forumdisplay.php?fid=130。

[40] 〈新移民组关爱会 善用新加坡体制〉，载《联合早报》，2011年7月25日。又参阅新加坡关爱会网站http://lng.org.sg/。

[41] 〈谈新加坡华族文化、新移民、华语电影——郭振羽教授〉，载《怡和世纪》期25（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2015年），页4–15。

2015年6月新加坡天府会组织的健走活动（天府会提供）

新移民作家入会，如新加坡文艺协会，新加坡作家协会等就有许多中国新移民活跃其中。

在文化领域，新加坡的很多艺术团体、学校的很多艺术家和老师都是中国新移民，他们为新加坡文化艺术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曾于1996年至2003年担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理事长的朱添寿就表示，新加坡文艺发展能有今天，除了本土艺术家永不言倦的努力，来自中国的艺术家默默耕耘，也功不可没。他说："就拿目前华乐团来说，来自中国的39位音乐家，22位是永久居民，12位入籍我国。华乐团之外，这十多年来在我国落地生根，置家立业，从事教学、指挥、作曲的外来人才，就我认识的，有顾立民、张念冰、丁晓燕、张玉明、詹永明、魏燕铭、刘雁、刘斌、陈慧兰、王桂英、丁怀成、罗伟伦、徐宜平、刘紫薇。他们的贡献，华乐界自有公论"[42]。2002年来新的中国新移民叶聪，担任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十多年，将华乐团水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2013年叶聪获颁新加坡文化人的最高荣誉——"新加坡文化奖"[43]。又例如新加坡本地历史悠久的业余京剧社——平社，其新移民会员已占了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为这个老剧社增添了新生机[44]。

在体育方面，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运动员也为新加坡夺取了很多国际体育赛事的奖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来自中国的游泳小将陶李成功地游进了奥运会蝶泳决赛，引进多位中国运动员的新加坡女子乒乓球队在决赛中获得亚军，为新加坡赢得了阔别48年的奥运会银牌；2010年5月，在世界乒乓球团体赛中，新加坡女队力挫中国女队，有史以来首次登上世界冠军宝座；2012年伦敦奥运会，乒乓球女将冯天薇获得女单铜牌，迎来了新加坡52年来的首枚奥运个人奖牌。此外，中国新移民运动员还带动和栽培了新一代的新加坡球员，例如现任新加坡国家女子乒乓球队主教练的井浚泓，1992年与新加坡国手黎仕汉结婚，曾代表新加坡参与多场大赛，并协助带动本地运动员训练，提升水平[45]。

另一方面，中国新移民与中国内地的联系密切，关系网络广泛，他们在促进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搭建了新加坡与中国交流的桥梁，使新中两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促进了新中两国在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42]〈朱添寿：本地文艺发展 中国艺术家功不可没〉，载《联合早报》，2010年10月1日。
[43]〈文化奖三剑客：得奖是故事的开始〉，载《联合早报》"2013年新加坡文化奖和青年艺术奖专辑"，2013年10月23日。
[44]〈新加坡京剧社与新移民〉，载《联合早报》"新汇点"，2010年12月20日。
[45] 同注19。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8月8日

政府采取新措施，鼓励国人结婚生育

新加坡人眼中的中国新移民

尽管中国新移民的到来，为新加坡社会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近20多年来，外来人口的迅速增加，也给新加坡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民间对于新移民或外国人的排斥情绪增加了。2003年《联合早报》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人民认为中国新移民是1993年后10年以来对新加坡产生最深刻影响的十大事情之一[46]。2010年《海峡时报》在圣诞节的“INSIGHT”专刊中，也把“新移民”课题列为12大争议课题之首。

本土新加坡人对中国新移民的焦虑和不满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本土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新移民负面的刻板印象。1949年至1990年近50年的时间里，新加坡和中国关系疏远，社会隔绝，再加上这期间中国还未发展起来，生活水平与新加坡相差较大，这也使得新加坡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来自不同社会体制的一群人”，生活水平不如新加坡，不谙英语等。“主流社会以新加坡人民自身注重法治、秩序、业绩等特色为参照值，衡量新移民的行为习惯是否符合在地的情况和条件”[47]。由于新移民和本土新加坡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成长，接受不同的教育，因此双方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和生活习惯不同[48]，这种差异性可能成为本土新加坡人不满的源头。

（二）新移民与本地人竞争工作职位、教育机会、住房资源、公共设施资源（特别是交通）等[49]。很多本土新加坡人认为新移民抢了自己的饭碗，在下一代的教育上新移民与本地人竞争有限的学额，另外中国新移民子女在学业上的优良表现也可能使自己的子女丧失较好的教育机会。此外，中国新移民还推高了本地的房屋价格，使交通变得拥挤。

（三）新移民缺乏对新加坡的归属感，对国家缺乏政治忠诚。新加坡一旦有危机，这些新移民会随时离开新加坡。一些新移民抱着匆匆过客的心态，把新加坡当跳板，一有机会就移民到其他西方国家。

（四）一些本土新加坡人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女性新移民，加之在一段时期里大众传媒对在新加坡的中国女性的负面报道较多，使得本地人给中国女性新移民贴上一些标签，如“抢新加坡人老公”、“破坏别人家庭”、“小龙女”等[50]。不过，近年来，随着媒体环境的改变，以及新移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对中国女性新移民的偏见已逐渐减少。

新加坡人对中国新移民的排斥态度，导致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2013年9月，由种族和谐资源中心（OnePeople.sg）与新加坡政策研究院联手展开的调查显示，96%的受访者能接受本地华人为同事，而能接受本地马来人、印度人或欧亚裔为同事者也高达93%，但对于中国、印度或周边地区新移民的接受程度，却分别为84.9%、85.5%和87.6%[51]。调查显示，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交圈，有60%非华族能接受跟本地华族通婚，但不到一半（47.6%）受访者能接受跟中国新移民通婚。在选择亲密好友方面，受访者对土生异族和外来新移民之间明显亲疏有别，新加坡人跟本地生长的异族成为好友，比跟来自中国、印度或周边地区新移民成为好友来得更加自在。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第一个关于种族和谐的调查，受访者包括4000多名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52]。

融入主流社会

政府融合计划

2011年全国大选，新移民课题成为朝野政党角力的主要课题之一。2013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了《人口白皮书》，表示为应对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挑战以及保持经济竞争力，将继续引进外来人口，预计到了2030年新加坡人口规模将增至690万[53]。白皮书的公布随即引发了新加坡自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集会，抗议政府的移民政策。

新移民问题引起了新加坡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方面，

[46]〈1993年—2003年改变新加坡人的十件事〉，载《联合早报》，2003年8月11日。

[47]游俊豪，〈与公民互动 中国新移民在新加坡〉，载《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卷5期1，2013年6月，页13–16。

[48]〈融入与接纳间的对视〉，载《联合早报》“新汇点”，2012年9月10日。

[49]刘宏，〈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形象：当地的视野与政策的考量〉，载《南洋问题研究》，期150（2012年第2期），页69–77。

[50]刘丽辉，《性别与移民：新加坡中国新移民之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51]谢燕燕，〈首个宗族和谐调查显示：国人跟土生异族相处比跟新移民自在〉，载《联合早报》（2013年9月12日）。

[52]同上注。

[53]参阅《可持续的人口，朝气蓬勃的新加坡 白皮书》，2013年1月。

政府通过规划相关措施，减少引进外国人的人数和设定给予永久居民的更高标准来控制移民的涌入，并且通过减少永久居民的福利和津贴，鼓励更多永久居民成为新公民。仅在2013年，新加坡政府平均每两个月就出台或宣布一个新政策，从购屋、租房、就业等方面区分公民与永久居民的权益[54]。

另一方面，政府努力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现任总理李显龙及其他政要曾在多个场合发表公开演讲时，呼吁新移民应积极融入本地社会，本地人也应协助其早日融入。例如李显龙总理曾在2012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时说："新加坡人很本能的知道什么行为举止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会引起不良的反应，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已经不知不觉地吸收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社会的作风。新移民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潜移默化，才能了解新加坡人的思维和想法。这是一段过程，需要一番功夫，并且需要走一段路，可能还要犯一些错误，从中吸取教训，这是势所难免的。我吁请新移民在这方面多下工夫，而且学一点简单的英语，方便沟通。我也希望新加坡人主动帮助新移民，对新移民采取包容的态度"[55]。

2007年，人民协会推出国民融合主导员（Integration Naturalisation Champions）计划，由基层领袖联系社区里的新移民。2009年9月，由政府、私人企业及民间组织等20名代表组成了国民融合理事会（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提出"开放门户、敞开胸怀、开阔思想"的口号，从不同方面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促进各社群间的相互信任。政府还宣布拨款1000万元，成立"社区融合基金"（Community Integration Fund），提供高达80%的津贴给予举办活动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的本地非营利组织与社团等。

同年，《联合早报》推出了新移民专刊——《新汇点》。该刊每逢周一出版，主要报道新移民社群的故事、热点话题，并针对投资、理财、创业、求学、法规、美食、休闲、文化等多个与新移民息息相关的课题，提供实用信息，旨在促进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的双向融合。时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以特别嘉宾的身份出席了《新汇点》的推介仪式，他致词时说，不论是土生土长的公民，或是刚加入的公民，新加坡奉行的是"任人唯贤"的政策，不管是工作分配、升迁机会，或是商业合同的签订，政府都一视同仁，重用最优秀的人选[56]。迄今《新汇点》已经报道了数千个新移民故事，除了用文字介绍新移民的故事，也以讲座和活动的方式向新移民介绍本地。

会馆及宗乡总会的角色

在历史上，新加坡的宗乡会馆曾在华人社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帮助南来的"新客"在本地落脚曾是宗乡会馆的一项重要职责。1980年代，由于新加坡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一代对会馆毫无兴趣，本地的宗乡会馆面临着日益边缘化、后继无人的困境。随着中国新移民的到来，宗乡会馆开始开放门户，引进新移民。李显龙总理就在2010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时指出，新加坡人应该帮助新移民融入社会。宗乡会馆在这方面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在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会馆的主要使命是援助和安顿新来的移民，那时叫作"新客"。现在，在经过大约一个世纪后，宗乡会

[54]《2013新加坡移民政策"紧"字当头 新移民多感痛苦》，载《联合早报》"新汇点"，2012年12月30日。

[55]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s National* Day Rally 2012(Speech in Mandarin),http://www.pmo.gov.sg/mediacentre/prime-minister-lee-hsien-loongs-national-day-rally-2012-speech-mandarin

[56] Speech by Mr Lee Kuan Yew, Minister Mentor, at SPH Integration Seminar, 12 April 2009, 3:00 pm at SPH Auditorium in Toa Payoh, http://www.pmo.gov.sg/mediacentre/speech-mr-lee-kuan-yew-minister-mentor-sph-integration-seminar-12-april-2009-300-pm-sph.

建国总理李光耀与宗乡总会第13届理事会理事合影（2011年1月18日）

馆又再负起这个任务了。当然，新移民也为宗乡会馆注入一股新的活力，许多新移民成了一些会馆的生力军，使会馆的青年团壮大起来[57]。

实际上，新加坡的宗乡会馆很早就担负起了帮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工作。早在1990年代初，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新加坡三江会馆就开始欢迎并吸收中国新移民会员入会，是最早欢迎新移民的本地会馆之一[58]。近年来，三江会馆更加有意识地发展新移民入会，开展相关活动，为新移民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新加坡另一间较早开始吸纳新移民的会馆是李氏总会，同样也是从1990年初便开始招收新移民会员，一些新移民还担任会馆理事，积极推动会务工作[59]。除了三江会馆和李氏总会外，很多老会馆都开放门户，吸引新移民入会，如潮州八邑会馆、厦门公会、晋江会馆、惠安公会等。新移民加入老会馆，一方面可以通过会馆这个平台与新加坡本地人建立联系，沟通交流，另一方面也为古老的会馆注入新的活力。已经有多位中国新移民曾担任或担任多家会馆的会长，比如新加坡海陆丰会馆会长钟声坚（现任荣誉会长）、惠安公会会长孙礼锋、福清东张同乡会会长王宏仁等。

作为本地宗乡团体的领导机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宗乡总会）很早就关注新移民问题。宗乡总会出版的杂志《源》（双月刊）曾刊登多篇有关新移民的文章，如《谁怕新移民，新移民怕谁？》（2006年8月）、《新移民给狮城“移”来了什么》（2007年11月）、《新客到狮城 岛国环球风》（2008年11月）、《新老移民一家亲——老会馆里的新移民》（2009年11月）、《新移民、新会馆、新气象》（2010年5月）、《新移民第二代扎根狮城》（2010年11月）等。

2010年7月，蔡天宝接任宗乡总会会长。同年10月，宗乡总会第13届理事暨执委会就职，蔡天宝在就职典礼上致词说，宗乡总会起着凝聚各会馆的作用，领导本地会馆与时俱进，协助会员适应社会的变化，把推广“华文华语，弘扬华族文化与传统”作为历史使命，把“促进社会和谐与凝聚国家族群”作为前进的动力。他也指出，随着新移民的增加，总会将展开一系列活动，以便吸引新移民走进本地会馆，融入本地生活圈[60]。

新一届宗乡总会理事会的第一个突破，便是引进了一位新移民理事，并委任了三位新移民担任执委会正副主任的职务。蔡天宝表示，宗乡总会要借助新移民的联络网，进一步增进新移民与各个会馆的关系，为彼此搭建友谊的桥梁[61]。2012年，宗乡总会第14届理事会引进了三位新移民理事[62]。

随着宗乡总会修改章程，进一步开放门户，新移民成立的团体，如天府会、天津会、山西会、齐鲁会、陕西会馆等已先后加入宗乡总会。一些以中国新移民为主的中国各高校的校友会，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的留学生团体，也陆续以各种形式加入宗乡总会，并参加总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宗乡总会

[57] 同注1。

[58]〈新老移民一家亲——老会馆里的新移民〉，载《源》期86（2009年11月），页4-17。

[59] 同上注。

[60]〈宗乡总会第13届理事暨执委会宣誓就职〉，载《宗乡简讯》期63（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0年10月），页1。

[61] 同上注。

[62]〈宗乡总会引进17新理事 新移民代表增至三人〉，载《联合早报》，2012年9月30日。

也举办了一系列以新移民为对象的活动，如“会馆走透透”、“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等。另外，宗乡总会也举办了“新移民对本土文化的贡献与冲击”讲座，“外来移民与国民融合”研讨会等。

宗乡总会在促进社会和谐，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方面所做的努力，得到政府的肯定。国民融合理事会及国民融合基金开始常年赞助宗乡总会的相关活动。2012年9月，在国民融合基金的资助下，酝酿多时的华文季刊《华汇》面世了。

《华汇》由宗乡总会负责出版，定位是针对新移民社群，展现新移民文化，同时也融合多姿多彩的本土特色，致力于协助新移民更有效地融入新加坡，进而产生归属感。宗乡总会希望以《华汇》建立一个双向沟通平台，增进新移民与本地社群间的互动和交流，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加强国民凝聚力。迄今为止，《华汇》已出版了12期。

宗乡总会出版的，主要针对新移民社群的季刊《华汇》（2012年9月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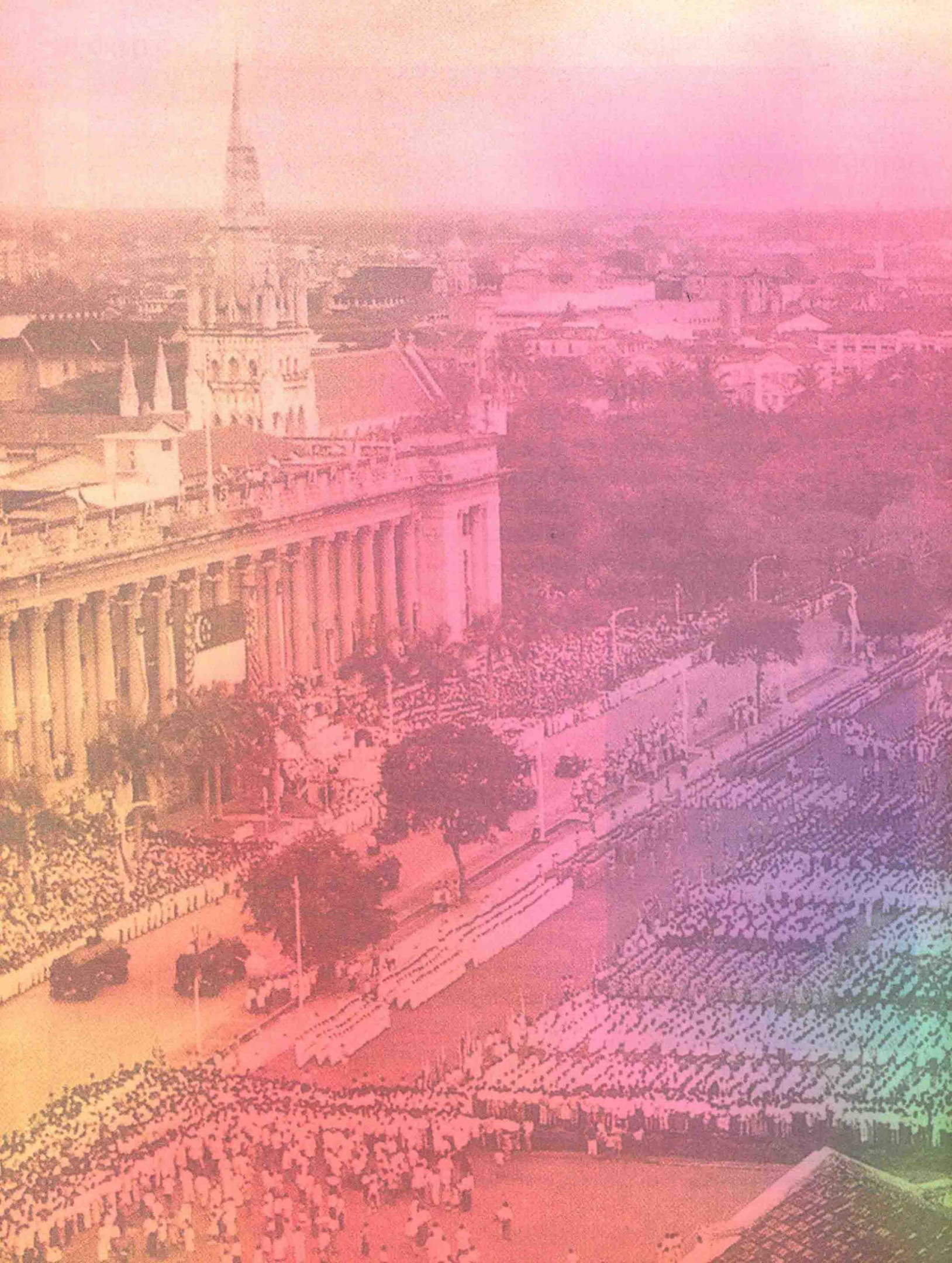
2015年6月30日晚李显龙总理在“何日华亚洲领袖公开讲座”上，以“新加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题，阐述了新加坡未来10年、25年和50年里所面对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挑战。他说，身份认同的稀释，将是未来50年里新加坡所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新加坡越来越开放化和国际化，国人充分掌握在国外生活的能力后，可处处为家，但他们也同时失去对国家的认同，使得我们的社会核心在全球化浪潮冲刷中瓦解。另一方面，社会也可能因内部日益增加的断层线而逐渐分化[63]。

新加坡从一开埠就是一个移民社会，纵观整个新加坡华人历史，第一代移民的融入与被接纳都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早期南来的华人从衣锦还乡回唐山落叶归根，到努力创业扎根南洋落地生根，也同样经历过身份认同的问题。郭振羽教授在2012年的一场题为《人口、移民与身份认同——新加坡的挑战》的讲座上说，新加坡从来都是移民社会，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移民社会是新加坡的宿命，因此，新加坡必须接纳移民，这是别无选择的。新加坡必须建立起具持续性的移民政策，成为一个“永续性”的移民社会，忘记移民历史将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族群的“集体失忆”。新加坡多年来已经在国际社会建立起欢迎外来人才和移民的名声，具有吸引优秀移民的条件和优势，是珍贵的资产，不可以轻易放弃。一旦放弃，日后要重启移民之门，需要花大气力[64]。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员的跨国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和频繁，新移民选择来新加坡，正是因为新加坡有着和谐、稳定、美好的生活环境。新移民应努力融入本地社会，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也应敞开胸怀，接纳新移民，协助他们融入，让新加坡——这个共同的家园更加美好，因为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下一代而言，新加坡是他们唯一的故乡。

[63]〈总理阐述我国短中长期大挑战〉，载《联合早报》，2015年7月1日。

[64]〈郭振羽教授：新加坡须以持续性政策建“永续性”移民社会〉，载《联合早报》，2012年4月23日。



第十八章

两百年来谁著史
The Study of Singapore Chinese

两百年来谁著史
——回望新加坡华人研究

摘要

战前英殖民地官员、西方报人及律师在《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及《海峡华人杂志》撰述华人研究的鸿文。南渡的中国文人如邱菽园及叶季允的诗文，也为华人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战后杰出的西方与华人历史学者则有巴素（Victor Purcel）、托洛基（Carl A. Trocki）及华伦（James Warren），许云樵、陈育崧、邱新民、王赓武、颜清湟及杨进发等人，利用跨科际研究方法，撰述了辉煌的创作。

Abstract

Pre-war British colonial officers, western journalists and lawyers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Singapore Chinese in th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nd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Chinese writers from China such as Khoo Seok Wan and Yeh Chi Yan whose articles and poetries, too, provide rich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fter the war, there were outstanding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as Victor Purcel, Carl A. Trocki and James Warren, Hsu Yun-tsiao, Tan Yeok Siong, Chiu Shin Ming, Wan Gungwu, Yen Ching Hwang and Yong Chin Fatt, who have produced excellent works on Singapore Chinese us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pproach.

崔贵强（**Choi Kwai Keong**）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关新加坡华人的著述，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西方人士的著作。在作者群中，有些是殖民地官员，鉴于职责所在，他们须研究了解华社的情况作为施政方针，其作品有：毕麒麟（W. Pickering）的〈海峡殖民地华人〉（"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1]、沃恩（J. D. Vaughan）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的礼仪与习俗〉（"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2]及巴素（V. Purcell）的〈华文教育的难题〉（"Problems of Chinese Education"）[3]等等。其他西方人士的作者，基于对华人的好奇与兴趣，仔细观察与潜心研究，蔚为巨佚。以下是两部英文巨著，其一是巴克利（C. B. Buckley 1844-1911）的《新加坡旧时轶史》（*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其二是布莱德（R. ST. J. Braddell）等人的《新加坡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西方人士的著作

先说第一部。作者巴克利出身书香世家，1864年来新加坡，先在律师馆工作。1884年，与他人合资购买了《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并转为日报。巴克利对写作充满热情，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成了《新加坡旧时轶史》的一部分。该书厚达790页，是名符其实的巨著。既称轶史，故其内容既有严肃的一面，也有轻松有趣的一面。始于1819年新加坡开埠，终于1867年。1867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从该年起，海峡殖民地脱离了印度总督的管辖，管辖权转移到伦敦殖民部，此后新加坡的商业日趋发达，经济日趋繁荣。该书于1902年首先出版，198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重印。

《新加坡旧时轶史》以编年体创作，共分57章，每一篇章以一年为主，论述该年的主要事迹与人物；有些事迹与人物较为繁复，便分为两、三章来描述。严肃的课题如1819年莱佛士与管治新加坡的天猛公缔约；1824年东印度公司与柔佛苏丹的进一步订约，割让新加坡及附近岛屿；以及1867年新加坡管辖权的转手，都分若干篇章论述。

作者也描绘了早期新加坡的虎患。1831年，除了南部发展的市镇，新加坡其他地区还是丛林密布，经常有猛虎出没伤人。9月8日就有一名华人被咬死；不久又有一名土著遭虎吃。据说这些猛虎都是从柔佛彼岸，泅水过来找人畜觅食。

1854年5月，新加坡爆发了有史以来的大暴动，敌对两派是福建人与潮州人，私会党也卷入了斗争的旋涡。杀人纵火，抢劫货物，暴动蔓延到全岛各地，前后延续了十一、二天，400余人遭杀害，受伤者无数，约300间店屋被焚毁。关于这次暴动，该书用了近10页，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

总之，该书给我们提供了新加坡开埠后5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与华人领袖有趣的故事，是一部重要的史书。

《新加坡百年史》的编者有三人，他们是麦比士（W. Makepeace）、布鲁克（G. E. Brooke）与布莱德（R. St. J. Braddell）。麦比士曾任《新加坡自由西报》高级编辑多年，写作经验丰富。布鲁克在剑桥受教育，历任海峡殖民地主要卫生官员。布莱德是最年轻而有干劲的编撰者，出身法律世家，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法律，继后回新加坡律师馆处理法律事务，他对文学与历史也有浓厚兴趣，出版了许多论文与专著。

《新加坡百年史》分两大卷，卷一厚达580余页；卷二厚达610余页，两卷合共1200页，堪称巨著。卷一分为11篇章，卷二共12篇章，书后附有"新加坡大事记"与"索引"。

该书内容丰硕，包括的课题有：历史、政治、法律、人口、军事、国防、教育、科学、经济、种植业、宗教、邮政与文化等。涉及华人的章节有："新加坡华人"、

---

[1] 1877年，英殖民地政府设置了华民护卫署（Protectorate of the Chinese），毕麒麟被委任为第一位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专事处理华人事务，尤其是华人私会党及新客移民受拐骗的问题。文中列举的文章，刊于*Journal of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Aug 1867。

[2] Vaughan曾任海峡殖民地的警察总监等职，后成为合格律师，其著作描绘了19世纪海峡殖民地华人的生活习俗、婚姻、节日喜庆、庙宇、教育及私会党等，从历史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很有参考价值。

[3] 巴素博士曾出任华民护卫司、教育助理主任及情报主任等职，战后任教牛津大学，另有著作*The Chinese in Malay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等。

"鸦片、烟酒的承包权与垄断"、"橡胶与橡胶种植"与"新加坡的商业"等篇。但有学者认为该书立论偏颇，如名史学家C. M. Turnbull就批评它充分表现了白人的优越感，偏重描绘统治者上层的社会生活，而对华人与其他种族持有偏见；殖民地政府只用家长式的严酷的手段来统治，对多元民族的社会和谐视若无睹，诚为不当。

战前的《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是一套历史悠久而甚有份量的学术期刊。1878年创刊，为半年刊。除了日治时期停刊外，战后继续出版，以迄于今，已有130余年历史。其研究区域与内容，以新马两地为主要取向。涉及范围甚广，包括历史、地理、考古、人种、农业、生物、地质、气象、历史人物、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等。

旗下的名作者如云，如温士德（R. O. Winstedt），一个殖民地的高官，他在学报发表的著述，不下140篇，有几部还是专著，如《马来亚史》以及好几部分州的历史。他还对马来古典文学有精深的研究。又如布莱德（R. St. J. Braddell）与吉逊禧（C. A. Gibson-Hill），擅长马来亚古代史的考据与探究；还有如专事研究莱佛士的吴滋堡（C. E. Wurtzburg），撰写吉隆坡与双溪芙蓉历史的古力克（J. M. Gullick）等等，不胜枚举。

至于有关新马华人研究的专书与篇章，也是汗牛充栋，如研究华人历史的，有巴素的《马来亚华人史》；米德布洛克（S.M. Middlebrook）的《叶亚来》与《早期华人移殖吉兰丹布赖史》（*Pulai: An Early Chinese Settlement In Kelantan*）；研究华人私会党的有梁康伯（Leon Comber）的《马来亚华人私会党》（*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研究华人宗教信仰的，有史特灵（W.C. Stirling）的〈华人驱魔〉（"Chinese Exorcists"），及托利（M. Topley）的〈新加坡华人的宗教与宗教团体〉（"Chinese Religion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n Singapore"）以及研究华人的婚姻、丧葬、方言、陶瓷、路名及报纸等等，著作丰富，不一而足。

海峡华人的论著

第二部分是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的论著。林文庆与宋旺相于1897年4月创办了《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到1907年12月停刊，长达11年之久。杂志每年一卷四期，宗旨是推动海峡华人的文化活动，提供大众一个园地，探讨各族的风俗、社会生活、历史及宗教等课题。积年累月，杂志刊登了许多作者的不同议论。林文庆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他是社会改良主义者，也是个推崇儒术的学者。他的作品多是环绕着改革社会陋习、颂扬儒术思想、推广教育、倡导孝悌及效忠祖国。1923年，宋旺相更出版了一部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是一部编年体的史著，虽然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被认为过于偏狭性[4]，但作者却以其生花妙笔，为我们描绘百年来新华许多生动有趣的人物与事迹，保留了许多珍贵史料。

[4] 《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被批评为具有偏狭性，大部分写海峡华人，描述移民华人的部分太少；侧重写社会中上层，少写劳动群众，见李元瑾，〈从认同角度评析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偏狭性〉，载《亚洲文化》期22（1998年6月），页96–113。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3月6日

政府修订条例，减少投机，非津贴组屋住满三年才能卖

南来文人雅士

第三部分涵盖了来自中国文人墨客的诗文。19世纪末与20世纪前期，由于种种因素，推动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衣冠南渡，新加坡涌现了大批文人。他们大都学富五车，品格高尚，且具浓烈的热爱中国意识。他们以其丰沛的感情，诉诸笔端，写下大量的诗文，对中国与当地华社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与教育等领域，提出种种议论，期盼中国转弱为强，中华传统文化能在海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南来著名的文人雅士主要有邱菽园（1874-1941）、左秉隆（1850-1924）、李钟珏（1853-1927）、黄遵宪（1848-1905）与叶季允（1859-1921）等。有关他们诗作可参阅本书第八章第二节。

南来的文人阵容强大，他们多数插足教育界与报界。其中杰出者有傅无闷[5]、胡愈之、郁达夫与许云樵[6]等人。本书第六章第一节对此有详细论述。

战前的三部华文巨著值得一书。其一是《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册》，该书的编辑是傅无闷，1930年3月20日出版，全书共600余页，60万字，内容丰富，概括了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华侨面面观。如傅无闷的〈英属马来亚志略〉，就触及马来亚的地理、史略、人口、政治组织、交通、财政金融、实业及英国殖民地政策等问题。胡浪漫的〈一九二九年〉，除纵论当年国际间的错综关系与国内的风云激荡外，还旁及当年当地华侨的经济、教育、文化、风尚以及华侨的热心、总商会的波澜、小贩的取缔与娼妓的废除等课题。谈及华侨的问题，还有赖竹君的〈马来亚华侨之片面观〉。华侨教育是个热门的话题，有〈整顿华侨教育之我见〉（曼如）、〈华侨女子教育不发达之原因〉（刘韵仙）及〈一年来华侨教育之新趋势〉（周延珍）等篇。此外还有译作文学、小说及戏剧等创作，可谓琳琅满目，极为可观。更有价值的，是两个附录的调查表，一个是“南洋各埠华字日报调查表”（1929年），另一个是“新加坡华侨学校调查表”，都是研究这方面课题的珍贵资料。

许云樵学术名著《南洋史》（左图）
《马来亚丛谈》是许云樵所著的一本通俗历史读物（右图）

其二是《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傅无闷不愧为编撰高手，1930年3月20日，又出版了这部巨著。它比前一部更为浩大，厚达900余页，100万字。文章的篇目更多，内容更为丰富，概括史地、民族、文化、教育、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及华侨等课题。如傅无闷的长篇巨作〈英属马来亚地理〉、叶华芬的〈马来民族的历史及文化〉、温雄飞的〈南洋民族考〉。华侨教育的文章有〈华侨教育之改进计划〉（罗良）、〈改进南洋华侨教育的先决条件〉（朱袁兴）及〈南洋华侨教育概况〉（梅梅）等篇。政治军事有〈两年来之国际政治述评〉（郑绍崖）与〈两年来福建军事政治述评〉（柔仲），后者惹起了一场轩然巨波。经济方面有〈世界经济恐慌总论〉（若思）、〈中国经济概况〉（林汤）、〈南洋经济社会的分析〉（熊理）及〈土产低落后的华侨出路〉（陈破浪）。

其三是《星洲十年》，由姚楠、许云樵及张礼千编辑，1940年1月初出版。该书工程更为浩大，厚达近1300页，内容更是多姿多彩。全书共分为五大篇，第一篇“政

[5] 傅无闷（1892–1965），原籍福建省南安县，1929年来新，先后在《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任编辑主任。他在《星洲日报》任职八年期间，做出一连串的革新工作，更增辟了几个包括《南洋研究》的专刊。他在《南洋研究》、《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刊》及《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发表许多有关华人经济、社会与教育的长文，也经常在《星洲日报》刊登涉及华人社会各方面的议论。

[6] 许云樵（1905–1981），原籍江苏省吴县。1931年南来，先在教育界服务。1932年《星洲日报》设立《南洋研究》专刊后，许氏常在专刊发表有关南洋历史及华侨的专文。许氏著述等身，是著名的史学家。

治”分七章，论述英属马来亚及海峡殖民地的地志、政治、军备、交通、财政及中国驻马来半岛的行政组织。第二篇“市政”分十三章，论述公共工程、公用事业、交通事业、卫生行政及文化事业等。第三篇 “经济”分八章，分述矿业、农林、畜牧、渔业、工业、贸易、金融及华侨商业。第四篇“文化”分五章，概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新闻事业、体育与宗教。第五篇“社会”分六章，述及社会组织、华侨社会活动、先贤传略、慈善事业、华侨社会风俗及名胜。

战后的史著

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蜕变，东南亚区域成了东西两大集团冷战博弈的舞台，这就掀起了东南亚研究的风气。对新加坡华人作系统研究，也正式掀起序幕。与战前一样，西方学者率先投入这个区域作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耕耘，成果累累，产品源源不绝。作者的阵容越来越壮大，研究的问题包括新加坡华人的各个层面，有历史、社会、文化、教育、政治、家庭、婚姻、宗教与习俗，不一而足。

有三部重要的英文著作，这里一一介绍：最早出现的是巴素博士的《马来亚华人》（*The Chinese in Malaya*）。这是第一部马来亚华人系统化的研究著作，几乎涵盖了华人的全面，是一部开山鼻祖之作。该书的所谓“马来亚”，包括了新加坡及马来半岛。本书分为三部，第一部分共五章，论述华人移民的中国背景，及华人在马六甲、槟城、新加坡与马来半岛土邦的早期历史，从最早移民到19世纪中叶的社会发展。

第二部分共八章，论述马来西亚华人的特殊课题，分别就宗教、英政府与华人关系、华人私会党、社会难题、劳工与移民、华人政党、华文教育及华人工业等课题进行讨论。

第三部分是“近年的发展（1939-1946）”共四章，即1939-1945战争期间的华人，马来亚光复后的华人，马来亚新宪制下的华人及回顾与前瞻。

巴素的这部著作深获另一名史学家Blythe的赞许。陈志明也认为：巴素的书虽然有一些缺陷，尤其是论述华人宗教及忽视英殖民地主义负面的影响，但它始终不失为经典之作，现今研究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的学者，还未能写出一部更全面与赶上时代的著述[7]。

第二部是梁康伯的《马来亚华人私会党》（*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作者长居马来亚，并在警察部服务达九年，学会了广府语、华语与马来话，认识中国字，有机会接触私会党徒，这有助于这部书的撰写。全书共有18章，首两章概述中国传统的历史与礼仪，与中国的三合会。这两章目的是让读者认识当地与中国私会党渊源的背景。其余篇章论述马来亚私会党的起源、流派、活动与影响，它们的敌对导致新加坡（1851年、1854年、1876年）与槟城（1867年）发生暴动，私会党参与拿律（Larut）战争，并成为《邦咯条约》（Treaty of Pangkor）幕后的黑手，华民护卫司毕麒麟对私会党的态度，导致并制订了最后的镇压政策。

作者利用了多种政府档案，中英期刊与报纸，论文与书籍，加上访谈资料，蔚为一部洋洋大观的专书，为其他学者广泛利用。

另一部也是以研究华人私会党为主题的著作，它是Blythe. W.的《马来亚华人私会党的影响》（*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作者曾在马来亚联合邦华民政

[7] Tan Chee Be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in Leo Suryadinata,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ASEAN States: Bibliographical Essays*, p.122.

相关人物

陈庆炎

历史事件

5月7日

工人党在大选中，攻下阿裕尼集选区

8月27日

陈庆炎当选民选总统

务司署任秘书，所有警方卤获私会党的道具与文件，都由他经手处置。他也亲自审讯私会党徒，获取珍贵资料，配合了披阅政府档案及第二手资料，终完成这部巨著。跟梁康伯的《马来亚华人私会党》不同，Blythe描述的华人私会党故事，一直延续到1965年（梁康伯的只写到1900年），Blythe著述卷帙更浩繁（500余页），内容更丰富，描绘更细腻，远胜过梁康伯的著作。

在1940、1950年代，西方学者除了在华人历史研究有突出的成果外，在人类学的领域里，也有良好的建树，如傅利曼（Freedman M.）的《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有郭振羽的中译本）与伊利奥特（Elliott A. J. A）的《新加坡华人乩童的祭礼》（*Chinese Spirit - Medium Cults in Singapore*），也都是重要的著述。

从1950年代开始，欧美著名学府培训了一批名学者，尤其是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更是声名远播，人才辈出。这些学者综合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及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到华人研究，建立了科学的理论架构，配合了田野调查，学者撰述了若干名著，如美国学者施坚雅（Skinner G. W.，康奈尔大学博士）的《泰国华人社会：分析的历史》（*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1957年，有457页）及《泰国华人社区的领导层及权力》（*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1958年，363页）就是经典之作。施坚雅较后又写了《印尼的华人少数民族》（*The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及《海外华人文化的变化与固守：泰国与爪哇的对比》（*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两篇著名的论文。

利用科学方法与田野调查作为研究新华历史的主轴，也产生了若干名著，如托洛基（Trocki, Carl A.）的《鸦片与帝国：英殖民地政府统治下新加坡华人社会（1880-1910）》（*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1910*）；华伦（Warren, J. F.）的《人力车苦力：新加坡人民历史（1880-1940）》（*Rickshaw Coolie, A People's History of Singapore, 1800-1940*）与Warren, J. F.《阿姑与南洋姐，新加坡的娼妓业，1870-1940》（*Ah Ku and Karayuki-san, 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

托洛基为康奈尔博士，他的著作主要是探讨19世纪新加坡华族鸦片承包商的起落。承包商向政府购得售卖鸦片的垄断权，转卖给广大的农民与劳工。承包商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给政府带来极大岁入，却也摧残了消费者的身心。本书的中心课题，就是阐释了华族承包商如何利用私会党营运鸦片的销售，如何与政府、新加坡经济及华社的发展，产生了连续性的联系。作者在书中提出若干新论点，认为鸦片承包税占了政府岁入的50%，承包商集团利用私会党争取承包权及推广鸦片消费市场。鸦片承包权每隔1至3年就须重新投标，而承包集团一向由福建帮与潮州帮首领争夺垄断。作者认为19世纪新加坡发生的几次大暴动（1846年、1851年、1854年），其主因是经济的冲突，福建帮与潮州帮资本家与劳工，不同派系的私会党及不同的鸦片承包集团卷进了暴动的漩涡。鸦片承包集团的活动与争夺，在1860年代益趋激烈，但在19世纪90年代，由于新加坡经济的转型，以及民间兴起反鸦片运动，政府不得不取消了鸦片承包制，盛极一时的鸦片承包制从此烟消云散。

长期以来，历史学者研究新华历史，都把焦点积聚在资产阶级分子身上，而忽略了广大劳工、农民及苦力的研究。实际上，这些低层阶级分子的贡献，对新加坡的现代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华伦（Warren, J. F.）的研究华人人力车苦力，撰写了这部《人力车苦力：新加坡人民历史（1880-1940）》（Rickshaw Coolie: A People's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弥补了部分历史研究的缺陷。其书名标出“新加坡人民的历史”，正标志了这是一部描绘人力车夫劳动人民的辛酸史。

该书深入探讨了新加坡华族人力车夫的各个层面：人力车夫行业的起源与发展，车夫与业主的劳资关系，政府的管制，工作环境的恶劣，长时间的劳作，风吹日晒雨打，摧残身心，容易染病，缺乏休闲娱乐，作者形容这是一门“谋杀”的行业。

人力车夫行业的兴起，与新加坡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密切关系。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新加坡经济繁荣，中国移民蜂拥而来，其中包括福州府县市的移民，由于他们缺乏谋生的技能，便选择了人力车夫的行业，过着困苦的生活。

作者是结合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他利用大量验尸官报告（Coroner's Record），这些报告记录了人力车夫及其亲属的丰富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

态、出生地、职业、居留期、饮食、衣着、疾病与死亡。作者也与多名车夫作访谈，获取口述历史资料。前后花了八年的时间才完成。

华伦另一部《阿姑与南洋姐，新加坡的娼妓业（1870-1940）》（Ah Ku and Karayuki-san, 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也是一部描绘底层社会成员的力作。

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大学

战后数十年间，新华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两支生力军，他们是两间大学培训出来的优秀毕业生，这两间大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大学。

国立大学的前身，是马来亚大学与新加坡大学。马来亚大学早在1950年代初即已创设，早期的历史系由英澳历史学者主持系务，教学人员亦多来自欧美。到了1970年代，本地学者羽翼已丰，足担重任，成为教学人员的主干。现任的教学人员则本地与外地人参半，在他们教导下，培训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其中最为佼佼者，要算是史学界泰斗王赓武教授。王赓武是1950年代的毕业生，学生时代即崭露头角，其荣誉学士论文〈孙逸仙与新加坡〉（"Sun Yat Sen and Singapore"），为研究南洋辛亥革命的佳作；硕士论文〈南海贸易〉（"The Nanhai Trade"）于1958年在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发表。王赓武博览群书，记忆力与分析力强，出版了多部东南亚华人的专书著作，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成为蜚声国际的学者，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历史系荣誉学士、硕士与博士论文，积年累月数量颇丰，有些论文学术水平颇高，如温仲佶（Wen Chung Chi）的〈十九世纪中国派驻海峡殖民地领事馆：起源与发展〉（"The Nineteenth-Century Imperial Chinese Consulat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1964年硕士论文））即为一例。还有通晓双语的李廷辉，其硕士论文《英属马来亚的华校：其政策及政治》（*Chinese Schools in British Malaya: Policies & Politics*），资料丰富，内容扎实，2006年由南洋学会印行出版。另外多篇优秀论文多在学术期刊发表，如Ee Joyce的〈华人移民新加坡〉（"Chinese Migration to Singapore 1896-1941"），Ng Siew-Yoong的〈新加坡华民护卫司署〉（"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Singapore"），Pang Wing-Seng的〈七七事变：新华对中日战争爆发的反响〉（"The Double-Seventh' Incident, 1937: Singapor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860-1901）），及Lim Joo Hock的〈华族女性移民海峡殖民地〉（"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in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60-1901"），都先后在*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与《南洋学报》发表。

1960年，历史系出版了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学刊，主要刊登有关东南亚历史的文章。1970年，该学刊改名为*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以迄于今。有一两期还出版华人研究专号。该期刊发表了多篇有关新马华人历史的文章，如Leong, S., "The Malayan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1"、Yen Ching-Hwang（颜清湟）"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77-1912"，及Yong, C. F.（杨进发）"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during the 1930s"等篇。

除历史系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在新马华人研究里也作出重要的贡献。过去20余年来，先后有十余位教学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研究华人历史的李恩涵、梁元生、庄迪扬、李志贤和刘宏；研究民间信仰的李焯然，研究大众文化和地方戏剧的容世诚，研究华文报刊的王慷鼎及研究宗教和儒学的苏新鋈和劳悦强。

沉醉在历史的海洋中

柯木林希望续写新华历史

社团 人物

柯木林：我的最大愿望是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撰写一部从1819年到今天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通史》。

区如柏

在推广华族文化的大前提之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罗致了各方人才，搞历史研究的几位朋友也不能“置身事外”，把他们的学术研究心得服务华社，学术组主任柯木林就是其中之一。

柯木林于1970年毕业自南洋大学历史系荣誉班，他目前从事产业管理的工作，却又“执迷不悟”地沉醉在历史的海洋中而不能“自拔”。历史的学术背景对宗乡总会有什么帮助？这几年来，宗乡总会主办的传统节日展览、出版有关新华社会历史的出版物，拍摄让人们了解过去的录像带等都需要延揽对历史熟悉的人才。

柯木林是在1985年第一批加入宗乡总会工委会的成员之一，当时宗乡总会还未正式成立，工委会就先成立了行政组、文化组、学术组和出版组，筹备宗乡总会成立后的工作。柯木林被推举为学术组主任，他着手拍摄一部反映百余年来宗乡会馆的成立与发展的《抚今追昔》录像带。

收集整理华社历史

这几年来，柯木林领导的学术组孜孜不倦地从事华社历史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他们举办历史图片比赛和展览，出版《新加坡宗乡会馆沿革史》，主办《中华文化十讲》，进行《石叻夜话》播音等。目前，他们正在着手出版《新华历史人物辞典》以及《新加坡会馆录》。《会馆录》由该组秘书陈万发主编。

柯木林说，学术组已经邀请研究历史的朋友帮忙撰写了1200个各个领域的新华历史人物，目前他正在进行统一文字的工作。这部《辞典》将在1994年出版。

总结了七年的工作经验之后，柯木林认为，虽然学术组的工作方针依然是负起推广华族文化，收集、整理、保存以及出版有关新华历史的资料。不过，过去所做的都是点点滴滴的工作，今后，应该做些整体的工作，所做的工作应该是“藏诸名山，传之后世”。

柯木林现年44岁，离校以后仍然与历史为伍。他说，这是他的“最爱”。他说：“沐浴在历史的海洋中，怡然自得，内心世界的满足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乐趣。历史悠久的国家比较重视人文科学，新兴国家比较注重新科技，新科技很快就能看出它的效果。但是，人文科学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它的成绩。”

人力资源不足

柯木林说，学术组是集合了九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块儿做事，可是，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不容易集中精力做义务工作。目前，宗乡总会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人力资源不足，必须多发掘一些人参与工作，否则不容易做出更大的成绩。

柯木林说，自从宋旺相撰写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819—1919）出版之后，直到今天，还没有一部延续《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著作。他的最大愿望是能够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撰写一部从1819年到今天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通史》。

《联合早报》，1992年11月23日（星期一）

中文系历年来的博士、硕士和荣誉学士论文合计109篇，其中约76篇（70%）内容涉及新马华人的研究，因此华人研究可说是论文的主流。

2001年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东南亚华人丛书”，迄今已出版了12本，包括李元瑾的《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2001年）、梁元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2005年）、蔡佩蓉的《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2002年）及许泰源的《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传播研究》（2013年）等。

南洋大学诞生于1956年，经过了20余年的风风雨雨，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大学前后只延续了约25年，令人徒呼奈何。

南大生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有趣的，除了追求纸上的知识外，还配合了户外的调查实习。在黄枝连的指导下，历史系学生曾进行了两次田野调查。1969年第一次展开村史调查，受调查的乡村包括：葱茅园、榜鹅万国村、义顺兴利芭村、绝后岛杨家村、蔡厝港东成村及波东巴西村，就各村的移民历史、乡村发展与村民的职业生活等方面进行采访，事后总结成报告。

自治独立后的50余年间，新加坡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昔日的乡村已被现代化的组屋与工厂所取代，消失无踪，因此这些调查报告，更显得弥足珍贵，让我们抚今追昔，追忆过往乡村（甘榜）的身影。

另一次是1970年9月进行的华族行业调查，受调查的有：客家人与典当业、温州人与木器业与福州人与理发业，事后也都写成报告。在三个调查的行业中，后两者已成了消失的行业，但这些调查报告都是今日珍贵的资料。今年已由八方企业有限公司出版。

事后，黄枝连出版了一本《马华历史调查研究绪论》，将这次调查村史与行业史的缘起、组织、调查方法、经过与成果，作了一个综合性的总结。

自1969年起，南大创设荣誉学士与高级学位，撰写论文是学生必备的条件，直至1980年南大与新大合并，短暂的10年，论文的数量不算多，但沙中拣金，历史系荣誉学士生也有几篇上水准的论文。它们是：许秀聪〈新马华族对日本的经济制裁，1937-1942〉（1969/70年度）、欧阳昌大〈新加坡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1969/70年度）、李元瑾〈林文庆与邱菽园—马来亚华族社会的两

个改良主义者》（1970/71年度）与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1945-1949）》（1970/71年度）。

自1959年第一批南大毕业生出炉后，每年都造就一批又一批毕业生。20余年间，南大毕业生估计有一万多人，在芸芸众生中，不乏优秀人才。他们有一部分嗣后到外国考取高级学位，或长居海外，或成为海归派回国服务。另一部分在毕业后继续深造。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他们学有所成，努力不懈，向学术疆场进军，作出了辉煌的贡献。

南大的学者（学人）阵容强大，不胜枚举。他们在各个学术领域中都表现不凡。在此列举一些在新华历史研究有杰出成就的历史学者。前期有颜清湟、杨进发、陈达生、廖建裕、崔贵强、张清江、戴渊、钟临杰、饶尚东、叶钟铃、吴振强、王大鹏、李业霖与王慷鼎等，后期有林孝胜、庄迪扬、庄钦永、陈剑、柯木林、李元瑾及蔡史君等。其中以颜清湟、杨进发与廖建裕三人的作品最多，成果最辉煌，学术地位最高，他们都是蜚声国际的历史学者。

南大学者从事华人研究，具有一个优越的语文条件。南大生一般都通晓中英双语，有些甚至能用英文创作，如颜清湟、杨进发、廖建裕、王大鹏、钟临杰及戴渊等人，都以英文写作，以争取更多读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为能掌握双语，所以在搜集资料、分析及论述方面就无往不利，扩大视野，有更多的研究题材。因此一旦掌握了基本的研究与田野调查方法，就有更大的分析及论述空间。

这里要特别介绍的两位出类拔萃的南大校友，他们能掌握两三种语文，勤于笔耕，毕生献身研究工作。研究领域聚焦于新马两地华人，取得学术界的认可，跻身于国际学者之林，他们是颜清湟与杨进发。

颜清湟原籍福建省永春县。吉隆坡尊孔中学毕业后，负笈南大，选读历史系。在南大就读四年期间，他苦修英文，兼学巫文，最终能掌握两种外语。在学生时代，颜清湟就表现优越，出类拔萃，名列前茅。

嗣后荣获奖学金赴澳洲坎贝拉国立大学深造，1969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论述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由于资料丰富，立论精辟，于197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付梓问世（有李恩涵的中译本）。该书是一部经典之作，为其他学者广泛引用。而国内外举办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研讨会，都要邀约颜清湟或作主题演讲，或提呈有关论文，颜清湟无疑是这方面的权威。

颜清湟创作欲旺盛，笔耕不辍，其中英文著作专书多达近10部，学术论文近50篇[8]。其研究领域聚焦于新马两地华人，涉及多方面的题材，包括政治[9]、社会[10]、经济[11]、文化[12]、民族

[8] 颜清湟著作目录，详见《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页499—504。

[9] 政治方面，有“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殖民地时期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人社区与政治》）及“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海外华人与中日战争》）等。

[10] 社会方面，有“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新马华人社会史》）、“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新马华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地位流动》）及“Early Chinese Clan Organis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新马早期华人的血缘组织》）等。

[11] 经济方面，有“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Late Ching Economic Modernisation”，（《海外华人与晚清经济现代化》）、“The Rise of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东亚与东南亚华人商业的崛起》）及“Historical Backgrou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before World War II”，（《战前新马华人社会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等。

[12] 文化方面，有“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99-1911”，（《新马的儒学复兴运动》）、“Ethnic Chinese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东南亚华人文化持续与变迁》）及“Hokkien Immigrant Society and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in British Malaya”，（《英属马来亚福建移民社会与近代华文教育》）等。

相关人物

陈六使

历史事件

10 月 28 日

在报业中心礼堂举行“传承文化、作育英才：纪念陈六使逝世 40 周年”并发布五本与陈六使及南洋大学有关的新书。

国际知名东南亚华人史学者陈育崧（椰荫馆馆主）

主义[13]、清廷与海外侨民[14]与历史人物等等[15]，洋洋大观，美不胜收。

杨进发，原籍广东省大埔县，毕业于吉隆坡尊孔中学，1958年报读南洋大学历史系，1961年荣获学士学位，成绩优越，表现特出。1962年获英联邦奖学金，赴澳洲坎贝拉国立大学深造，1966年完成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新加坡大学历史系及澳洲佛林德斯大学（University of Flinders）任教。在澳洲多年，浸淫于西方社会，英文水平大大提高。而他作诗填词的造诣，也更上一层楼。长期以来，杨进发勤于笔耕，中英文创作丰富，获士林好评，为国际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也是聚焦于新马华人历史。在学术研究贡献上，有以下四方面：即（一）华族领导层研究；（二）新马国民党兴衰的研究；（三）战前马来亚共产党史的研究；与（四）陈嘉庚研究。

1994年，崔贵强出版了一部《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的历史书籍，这是一部以华文撰述的新加坡华人通史，上限始于13世纪，下限终于1965年新加坡的独立建国。全书共分15章，内容涉及新华人口的增长，社会的变异，经济的发展，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与华文教育的兴衰等等。该书荣获新加坡艺术理事会颁发1996年度最佳非小说（non-fiction）书籍奖。崔贵强曾将华裔馆的英文版《海外华人百科全书》译为中文，中英文版于1998年同时出版。

此外，南大校友的杰出著述有：

- 戴渊，《战前英属马来亚的华人资本主义》（*Chinese Capitalism in Colonial Malaya, 1900-1941*），马来西亚国民大学（UKM）出版社，2013年
-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 张清江，《新马华人史译丛》，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
- 吴振强，《厦门的兴起》（*Trade and Society: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3
-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95年
- 钟临杰，《新加坡的社会变迁与华人，特别论述帮群结构的社会经济地理》（*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ocial-Economic Geograph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ang Structu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5
- 陈达生，《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
- 廖建裕，《印尼原住民、华人与中国》，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
- 叶钟铃，《黄乃裳与南洋华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
- 王大鹏，《华人“公司”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Kongsi*），Petaling Jaya，Pelanduk Publication，1994

[13] 民族主义方面，有“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77–1912”（〈新马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及“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A History Study”（〈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历史研究〉）等。

[14] 清廷与海外侨民方面，有“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ese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1851–1911”（〈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及“Ching Sale of Honours an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and Malaya”（〈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等。

[15] 历史人物方面，有“Tan Kah Kee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陈嘉庚与海外华人企业〉）。

- 饶尚东，《汶莱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新加坡青年书局，2010年
- 李业霖，《读史与学文》，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
- 柯木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
- 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南洋学会，1986年
- 庄迪扬，《印尼华人商业精英，1940-1950》（*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s in Indonesia 1940-19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加坡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国立大学中文系，2001年
- 蔡史君，《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编著），文史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
- 陈剑，《浪尖逐梦》，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年
- 区如柏，《弦歌不绝》，青年书局，2006年

接下来要谈谈两个民间研究团体，它们充实了华人研究的内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它们是《南洋学会》与《亚洲研究学会》。

南洋学会（The South Seas Society）

南洋学会创立于1940年，至今已70余年。学会的主要活动与贡献，是出版《南洋学报》与丛书。南洋学会也主办过几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

南洋学报从1940年创刊，之后在日治时期中断，战后初期复刊，迄今已出版了67卷81期。主编数度易人，以许云樵任期最长，其他主编有王赓武、魏维贤、崔贵强、李励图、陈松沾（陈剑）、李志贤等。学报早期的文章，多涉及东南亚古国古地名的考证，中西交通贸易、东南亚土产的考订、东南亚考古的发现及华族民间信仰的神祇等等。主要作者有许云樵、韩槐准及陈育崧等。尤其是许云樵，每期都有作品发表，有时多达两三篇。

许云樵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出版专书多达36册，论文至少有近150篇。他古文根基扎实，白话文流畅，既写艰涩的文章，也写通俗浅白的读物。创作内容包括东南亚史、华侨史、中南交通贸易史、语文、掌故、历史人物及邮票史等，许云樵最得意的是考证《太平御览》中载述的“蒲罗中”，是1700年前新加坡的古名，其论证为政府的出版物多次引用，但未获学者的共鸣。

韩槐准是自学成功的学者，是考订鉴别古代陶瓷器专家。他到过旧柔佛与婆罗洲进行古陶瓷器的挖掘工作，写了〈琉璃珠与瓷珠之研究〉、〈中国古陶瓷在婆罗洲〉及〈旧柔佛之研究〉等论文，后来更出版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韩槐准也发表了南洋土产水果如红毛丹、榴莲（流连）、椰子等研究的论文。他在汤申路（Thomson Road）的愚趣园，培植了特大甜美多汁的红毛丹，每当红毛丹成熟时，便邀约名人学者前往品尝。嘉宾中包括郁达夫与徐悲鸿等人，主宾们一面大啖新鲜的果实，一面鉴赏主人搜集的陶瓷器碎片，其乐无穷。

陈育崧是个治学严谨的史学家，他重视信史的确立，强调“国于天地，必有以立，立国之道，在乎信史”。他绝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对前人或时人的言论，先是怀疑，进而搜集文献资料，从事分析、辨伪与批判，从而得出新的结论。陈育崧治史，认为金石遗物的碑刻十分重要，因此认为田野考古，发掘史料，充实历史研究的内容，才是正确的途径。

陈育崧的长期写作生涯，为新马华人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他对清廷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事迹与《叻报》主笔叶季允的研究，是开风气之先，发人深省。他对华文教育的发轫史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1月30日

人口白皮书预测新加坡到2030年人口将达到690万，引起国人强烈反弹

陈育崧手稿《椰影潮声》诗集（柯木林藏）

的研究也是一大贡献。陈育崧把研究的成果，以丰富的感情与美妙的笔触，写成优美的散文，令人读起来兴味盎然。

陈育崧的全部著述，辑录成册，书名为《椰阴馆文存》，共三卷，都数10万言，洋洋巨著，蔚为大观，后来又出版了第四卷补编，是研究新加坡华人必具的参考著作。

《南洋学报》自1958年王赓武接任主编后，学报的形式为之一变，出现了中英两种稿件参半的现象。以王赓武的崇高学术地位与广结人缘，吸纳了国际知名学者如A. Lamb、D. K. Bassett及G. W. Skinner等人的来稿，Skinner的著名文章“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就在这期刊登在学报上（16卷，1.2辑，1960年）；王赓武的“Sun Yat-sen and Singapore”也出现同一期的《南洋学报》上。这种中英稿件参半的形式，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魏维贤卸下主编职责为止。常出现在学报上的稿件，包括崔贵强、杨进发、颜清湟及庄钦永等人的作品。从1990年代迄今，主编一职多由年轻学者担任，稿件以中文作品为主，英文作品为副，外稿的份量也逐渐增加，内容也越来越多面化。

除了学报以外，南洋学会也出版丛书达40余册，这包括《伍连德自传》（徐民谋译，1960年）、《严几道先生遗著》（1959年）、《中国传统文化》（郑德坤，1963年）、《东南亚古代史地论丛》（邱新民，1969年）、《石叻古迹》（林孝胜等，1975年）、《新加坡华族会馆志》（吴华，1975-1977）、《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杨进发，1977年）、《新加坡华人史论丛》（庄钦永，1986年）、《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柯木林、林孝胜，1986年）、《椰阴馆文存》（陈育崧，1984年）、《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崔贵强，1990年）等。其中《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一书曾获新加坡政府社会发展部1988年度学术著作奖。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创立于1982年，迄今已有32年历史。主要活动是出版学报《亚洲文化》与丛书，并举办了好几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亚洲文化》于1983年2月创刊，至2013年已出版了37期。原为半年刊，1990年改为年刊。除了特殊的情况，很少误期出版。《亚洲文化》具有以下几项特色：

- 为中英双语学报，不过在数量上以中文作品居多
- 以东南亚华人研究作为主要的取向。据林孝胜编的《亚洲研究学会学报索引1983-2002》，其内容可归纳为数大类，即：

总类（31篇）

哲学、宗教、民俗（64篇）

社会学（74篇）

政治、国际关系、法律（8篇）

教育（13篇）

经济（31篇）

语言、文学、艺术（123篇）

历史、地理、传记（60篇）

大众传播（14篇）

书评（21篇）

各分类所包括的论文，大多以东南亚区域为核心。各期都刊登了东南亚华人研究的论文，而且占的篇幅也较大。此外还有几期华人研究的专号，如第14期的“海外华人专号”、第15期的“东南亚华人与当地社会专号”、第16期的“东南亚华人与中国文化专号”及第17期的“东南亚华人文学与社会组织专号”。

作者包括本地学者与外地国际著名学者。本地学者几乎倾巢而出，予以学报极力的支持，使学报稿源不断，充实了学报的内容。也是据《索引》所示，加上笔者的查核，截止2011年（第35期为止），本地学者的作品有：叶钟铃35篇、廖建裕26篇、庄钦永14篇、王赓武13篇、林孝胜11篇、颜清湟8篇、王慷鼎7篇、杨进发5篇、李元瑾5篇、饶尚东4篇、卢耀华3篇、柯木林2篇、钟临杰2篇、李志贤2篇、林源福2篇，蔡史君、李金生、符懋濂各3篇，朱炎辉、陈鸣鸾及李业霖各1篇。

以上所列举的诸多历史学者，除王赓武外，都是南大生。为《亚洲文化》撰稿的南大生，尚有：吕振端、林万菁、林顺福、王永炳、彭志凤、杨贵谊、陈达生、姚梦桐及杨松年，他们也都是南大造就出来的精英。从他们身上，散发着“力争上游、自强不息”的南大精神。

《亚洲文化》因办得出色，获得一些外国学者的青睐，他们包括：傅吾康（Frank Wolfgang）、Clammer, J. C. A.、Heidhues、Mary Somers、Mackie J. A. C.、苏尔梦（Salmon Claudive）、Walker, A. R.、魏安国（Wickberg, E.）、Willmott, W. E.、日比野丈夫、田仲一成、梁元生、陈志明、叶曼瑛、朱杰勤、李明欢、曾玲等。

碑铭的史料价值

过去从事新华研究的学者，往往感到文献之不足，即使是现有的文献资料，其可靠性也不足征信，产生辨伪与解读的困难。直至1960年代末，金石碑刻的发掘与史料价值，才引起学者的注意。碑文史料价值，为学者另辟蹊径，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首名拓荒的是为著名学者饶宗颐。饶宗颐长居香港，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其研究领域横跨甲骨学、敦煌学、地方志、文史及书画艺术创作，著述辑录于《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论文集》，共20大卷。1968年，饶宗颐受聘为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据他说，南来一载，走遍新马两地的古刹荒丘，由于马来亚地广，只能聚集在几个焦点。他将考察所得，撰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长文，刊载于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学报第10期（1968-69）。

饶宗颐搜罗的碑刻数量颇多，范围亦广。上限始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下限止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碑碣刻文的区域，以马六甲、新加坡及槟榔屿为主。只有区区数块碑碣，采自吉打广东列位义冢总坟墓碑、芙蓉惠州府甲必丹盛明利碑、太平甲必丹陈亚炎墓碑及雪兰莪琼州会馆碑。

碑碣刻文包括私人的孤坟，墓碑刻上墓主人考妣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墓碑多由其后代子孙所立。如马六甲三宝山发现的黄维弘墓碑及槟城辜礼欢墓碑。至于地位显赫的家族，如马六甲历任甲必丹郑芳扬、李为经及曾其禄的墓碑，除了墓地广阔，墓碑美轮美奂外，更树立了颂德碑，以歌颂墓主人的仁风义举，以垂永久。

新马方言群的社团，多拥有公冢（义山）的资产，以处理客死异域的同乡故里，入土为安。新加坡的公冢墓地，承袭了马六甲青云亭之制，概以亭为名。如闽人的恒山亭、广惠肇人的绿野亭与碧山亭、丰永大的毓山亭、潮人的泰山亭等。饶宗颐所采撷的有道光十年（1830年）薛文舟（即薛佛记）立〈恒山亭碑〉，碑文曰：“……托足异国，昔人所悲。犹未旋返，莫可以期；存则荣归，没则旅瘗。

眼见恒山之左，叠叠佳城，壘壘坵墟。或家乡远阻，吊祭不至；或单形只影，精魂何依，饮露飧风，诚无已时。每值禁烟令节，一滴之到，夫谁与主，令人不胜感慨系之矣。是以会诸同人，劾文正公之妙举，建亭于恒山之麓，以备逐年祭祀，少表寸诚”。言词悲怆，读之令人垂泪。碑文也刻上了捐金者芳名约百人，以薛佛记与陈送为首次，捐金从764元2角5分至12元不等。

此外还有嘉庆六年（1801年）槟屿（广东）暨汀州义冢墓道志、马六甲潮州义冢公司墓碑及槟城福建义冢碑记等。

华南移民移居海外，历尽波涛的惊险，最后航抵目的地。为了报答天后圣母（妈祖）的保佑平安，便在各地兴建简陋的庙宇，祭拜这位航海女神。随着时日的推移，华人移民激增，因此斥资兴建庙宇，蔚为风气。流风所及，新马各地市区与乡镇、庙宇，触目皆是。与此同时，移民也把家乡祭祀的神灵带到海外，立庙设坛祭拜。如新加坡潮人的粤海清庙，供奉玄天上帝、闽人天福宫祭拜的天后圣母、福建南安人凤山寺崇奉的广泽尊王、客家人海唇福德祠祭祀的福德正神（或称土地神或大伯公）以及海南人天后宫膜拜的妈祖。

规模较大庙宇的兴建，往往都立碑以记其盛，碑文一般缕述建庙的缘起、地点、建筑形式、尊崇的神祇、神灵的庇佑以及捐金者的芳名。庙宇内各类文物杂陈，计有匾额、楹联、钟铭、石刻香炉等。以天福宫而论，木刻匾额有45件、木刻对联有12对、石刻对联5对、铜钟铭文一口。其中最珍贵的，要算是刻上“波靖南溟”的匾额。这是光绪帝于1907年御赠的，高悬在正殿上头。1999年，于匾额后面的隐蔽处的圆筒中，发现了真迹，现存于新加坡国家历史博物馆。

饶宗颐辑录的庙宇碑文与文物，计有：〈槟城创建广福宫碑记〉（1800年）、〈槟城重建广福宫碑记〉（1824年）、〈新加坡天福宫碑记〉（1850年）、〈新加坡重修凤山寺碑记〉（1868年）、〈海唇福德祠碑〉（1869年）及〈新加坡双林禅寺缘起碑」（1902年）等。文物则有〈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前石刻香炉〉（1792年）、〈粤海清庙铜钟，钟款文为“风调雨顺”〉（1837年）、〈福德祠铜钟一口〉（1856年）、〈琼州会馆铜钟一口〉（1876年）以及〈槟城青云岩门前香炉一个〉（1887年）。至于匾额绝大多数属马六甲青云亭及宝山亭，槟城广福宫则有一个。

至于会馆的碑文，则有〈重建应和会馆碑〉（1844年）、〈重建应和会馆碑〉（1875年）、〈琼州会馆序〉（1880年）、〈宁阳会馆重建碑记〉（1894年）及〈雪兰莪琼州会馆碑〉（1908年）。书院则有〈萃英书院捐题名碑〉（1861年）及〈萃英书院碑〉（1896年）。

饶宗颐对该文的发表，颇引以自豪，他沾沾自喜地说：“他日有撰‘星马金石志’者，吾文敢谓为其嚆矢”。

此后，对华文碑铭的搜集与研究，并卓有成就的学者颇多，由陈育崧、陈荆和编著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此后简称《集录》）一书，1973年由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集录》收录了新加坡地区碑铭共119件，较上述饶宗颐收集者多得多，碑铭之年代，最古的为道光十年（1830年）之〈恒山亭碑〉，下限为1945年，即二次大战结束之年。

碑铭共分九类，计有：庙宇、会馆、公冢、宗祠、书院、医院、墓志铭（附题赞）、教会及纪念碑（杂）。书前有一篇陈育崧撰写的〈绪言〉，分以下几方面来阐述，即：

（一）本计划发展经过（略）；

（二）碑铭与华人历史关系：从恒山亭与天福宫碑文来考察，可见19世纪的新加坡，有一个财雄势大的闽南人集团崛起。他们以漳泉人士、来自马六甲移民为领导层，以恒山亭与天福宫为核心，凝聚成为一个强大的方言帮群。这个帮群以薛佛记为首，他原籍福建漳州东山人。新加坡开埠不久，便从马六甲移民来新加坡，经商致富，拥有大片土地。薛佛记大约在1843年返回马六甲，接任青云亭主。此后福建帮的领导权便转移至陈笃生。陈笃生原籍福建漳州海澄县人，生于马六甲，早年移民新加坡，以勤俭致富。他独资捐建陈笃生贫民医院。陈笃生之后，另一位福建帮领袖随之出现，他是陈金声，原籍福建省永春县。陈金声乐善好施，热心教育，创建萃英书院，又捐巨资建造自来水库，俨然足继陈笃生之后，成为福建帮的领导人。

从宁阳会馆及梧槽（Rochor）社公庙的碑文中，可见几乎与恒山亭同时，崛起了一个广东人社群，其成员多半属工人阶级，多从事木匠与泥水匠的职业。他们以宁阳会馆与曹家馆为核心，领导人物是曹亚志（珠），他也是私会党广东义兴的首领。

又从梅州应和会馆等碑文，另一个说客家方言的帮群逐渐形成客帮的集团，他们以种植园艺为行业，属于农民阶级。

（三）华人社会的结构与形态：华人社会的结构，以帮群为基础。福建帮财雄势大，其组织只能代表漳泉人的利益，为占有利益而加紧结合，因而产生了排外的小群意识。而其他许多较小的不同地缘的方言群，为了适应生存，不得不互相结合，形成一股力量，与福建帮抗衡，因而产生了广（府）惠（州）肇（庆）集团、丰（顺）永（定）大（埔）集团与嘉应州五属集团的结合，凝聚力量，力求图存。

（四）碑铭的史料价值：碑文的资料提供了许多有趣的课题，如从庙宇散布情况来看移民社群播迁的状况；从奉祀的主神来看移民的籍贯，和作为不同地缘的社群结合的桥梁；从异文怪字来研究闽粤方言和殊俗等。碑文中船户和船名往往占显著地位，结合其他资料作一综合研究，对于当时华人航业的营运，必多阐明。尤其各帮行业类型的发展经过，如福建帮所掌握的航运事业和出入口的贸易事业，都有坚强的历史根基，对华侨经济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陈育崧的〈绪言〉，对华人的帮权与社会结构多有阐析，予读者诸多启发。正如日本学者今堀诚二的评述，这是一篇优秀的论文。

两年后，1975年4月，《石叻古跡》一书出版了，这是个莫大的喜讯。《石叻古跡》一书中多数的篇章就是利用碑铭的资料撰写的。

《石叻古跡》书前扉页有林孝胜撰写的导言，论析〈十九世纪星华社会的帮权政治〉，该文篇幅颇长，对早期新华社会的结构与形态，分析入微，议论纵横，引人入胜，较之上述陈育崧的〈绪言〉尤为精彩。

林孝胜认为新华社会基本上是由五大帮群构成，所谓“帮”是个方言群体，五大帮指的是福建帮、潮州帮、广府帮、客家帮与琼州帮。以人数与财富地位而论，福建帮最强大，依序为潮州帮、广府帮、琼州帮和客家帮。各帮内部的结构与活动，帮际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但林孝胜却能利用碑铭等文物及其他相关资料，条分缕析，给读者留下清晰的印象。

《石叻古跡》是一部集体创作。除了林孝胜外，还有柯木林、张夏帏、吴华、张清江、李奕志。他们亲身到各古迹考察，利用各庙宇内的神坛、碑文、匾额、木刻楹联及古钟钦文，写成了25篇专文，文图并茂，功德无量。

另一位对碑刻文物的搜集与研究而卓有成就的学者是庄钦永。从1984年起，他即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30多年来，凭着一股傻劲，奔走于马六甲与新加坡的坟山，孜孜不倦地拓印与抄录碑文。庄钦永也到庙宇、会馆及学校去搜集碑铭、匾额、楹联、古钟、香炉与神主牌等文物，配合了文献的资料，研究成果累累，著作计有《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甲华人史新考》及《实叻峨嘈五虎祠义士新义》等书，以及多篇学术论文。对问题提出新的解释与观点，纠正了他人著述的错误，还原历史事件与人物原貌，赢得士林的赞赏。

华人研究机构还有“东南亚研究院”（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院”（Asia Research Institution）与“华裔馆”（Chinese Heritage Centre），网罗了许多资深研究员，出版书刊丰富，多姿多彩。

中国的海外华人研究

马来西亚、中港台近年来也涌现了不少老中青学者，产品源源推出，成就辉煌，令人欣喜，其中要以中国学者的表现最为突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与民间秉承了过去关注与研究华侨（海外华人）的精神，相继成立了研究机构。1956年，福建厦门大学率先成立了南洋研究所。从1956-1963年间，展开研究华侨史和华侨问题，出版了《华

侨问题专号》。1950年代，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成立东南亚史研究室（今东南亚研究所前身），出版《东南亚华侨问题专号》。1960年，暨南大学也设立东南亚研究所，致力于研究这方面的工作。

岂料1965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华侨问题竟成了最敏感的问题之一。10年浩劫，学者人人自危，封笔归隐，以致使研究华侨的园地一片荒芜。直至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邓小平复出，才恢复了生机，一些科研机构与民间学术研究团体才复甦或成立。如1981年7月，暨南大学成立了华侨研究所，续后又成立了东南亚研究所。接着厦大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华侨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华侨史研究室、泉州华侨大学华侨史研究室、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侨史研究室、北大亚非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都相继成立。1981年12月全国华侨史学会（后改名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此外，地方侨史学会也相继成立，如广东侨史学会、上海市侨史学会、福建侨史学会、云南侨史学会、广西侨史学会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从事华侨史研究的专职、兼职科研人员多达300人。

各侨史学会基本上都出版会刊，如中国侨史学会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每年出版四期，自1988年开始，迄今仍继续出版。又如广西侨史学会出版的《八桂侨史》，自1987年问世，30余年继续不断出版。

各科研机构也出版丛书，如暨大华人研究所的《华侨研究》、《华侨史论文集》；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的《华侨华人历史论丛》；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的《华侨史》；厦大南洋研究所的《南洋问题》、《南洋资料译丛》等书。

几十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阵容强大的科研人才，他们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一批资深学者，古文根基扎实，学识渊博；另一批归侨学者，尤其是印尼归侨，通晓双语甚至是三种语文；还有一批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挟带着科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且兼具田野调查的训练，发挥了极大的研究成果。再有一批本国培训出来的博士、硕士本科生，他们各自发挥所长，努力创作，成就可观。

有几部史料汇编，必须提出。一部是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10辑，呈现了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初华南契约劳工的悲惨命运。另一部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目前已出了两册，第一册新加坡卷，第二册菲律宾卷，其他国家的卷册，相信会陆续编印出来。

还有一部是由林金枝主编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约100多万字，分福建、广东卷。这是作者与庄为玑带领一批学生到福建广东两省50个县市作实地调查，整理出来的珍贵资料。林金枝把研究成果写成《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一书出版。

由周南京主编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与《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是两部集体创作的巨著，前者全书200余万字，后者共11卷，是治史者必须参考的书籍。

学者初期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华侨史”。继后把研究的领域扩大，涵盖华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艺术、教育、报业、种族关系等层面，均取得不俗的成绩。

侨乡与移民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如李明欢等的《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新侨乡调研报告》，黄静的《潮汕与中国传统侨乡》，张国雄的《粤闽侨乡考察二战前海外华侨华人的群体特征—以五邑侨乡为主》及庄国土等的《中国侨乡研究》，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移民史方面的研究，学者利用族谱与地方志的材料，追溯海外移民的轨迹，有不少新发现，如李天赐《泉州华侨华人研究》、陈支平等的《闽南海外移民与华侨华人》等专著，都是精心的杰作。

张应龙写过一篇〈新时期新马华人研究述评（1978-2000）〉，对新加坡华人研究，作了如下的分类论述：

（一）移民与社会

（二）新加坡华人与抗日救亡运动

（三）华人经济问题，分两方面论述，一是战后几十年来华人的经济发展；另一是华人企业集团之崛起与茁壮

（四）福建籍华人研究

（五）华人政策，在政府推行多元民族和谐的政策下，华人社团与教育受限制

（六）华人教育问题，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推行双语政策，英文至上，华文教育日趋衰落

对于以上诸问题的论述，都有专著问世。至于研究的论文，介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不同的类别篇数如下：历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1995年11月出版）

史（16篇）、社会（11篇）、社团（15篇）、经济（21篇）、教育（18篇）、文化（11篇）、文学（24篇）与报刊（5篇），共120篇。

（本文之作，蒙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前主任李金生诸多协助，谨申谢忱。）

以下辑录有关东南亚（包括新加坡）研究中英文专著与论文索引，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书。

- 张长虹等编，《东南亚研究中文书目》，厦门大学，2010年
- 徐斌等编，《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论文索引（1996-2000）》，厦门大学，2002年
- 徐斌编，《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论文索引（2001-2005）》，厦门大学，2006年
- 徐斌编，《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论文索引（2006-2010）》，厦门大学，2011年
- 徐斌编，《华侨华人研究中文书目》，厦门大学，2003年
- 福崎久一编，《华人・华侨关系文献目录》，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1996
-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
-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2012年
- Leo Suryadinata ed.,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ASEAN States, Bibliographical Essay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相关人物

历史事件

6 月 26 日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的“禧街 47 号”建国五十周年特展开幕。此特展讲述中华总商会一百多年来在教育、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和贡献

7 月 4 日

新加坡植物园申遗成功，为新加坡首个被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中的世界文化遗产

8 月 9 日

庆祝新加坡共和国建国 50 周年

9 月 11 日

投票选举，选出未来五年治理新加坡的政府。这是自独立以来，首次把大选投票日定在星期五，当天为公定假日。这也是自 1988 年推行集选区制度以来，首次没有一个选区出现执政党不战而胜的情况

9 月 12 日

大选成绩揭晓，人民行动党以 69.9% 高得票率获胜，在国会 89 席位中赢得 83 席，继续执政。反对党只有工人党获得一个集选区及一单选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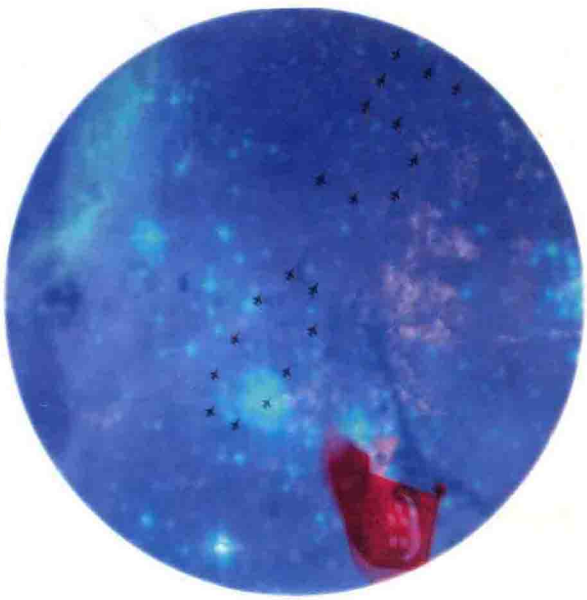
SingTel

附录一

新加坡历史大事记

遴选准则

- 对华人史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 对华社有重大影响的政府政策
- 源自华社内部的自发性运动



列号	日期	事件
1	1819年2月6日	莱佛士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与柔佛天猛公（Temenggong）签约，以年俸西班牙币5000元，租借新加坡岛，辟为自由商港。莱佛士利用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和中国及东南亚土邦的贸易，使新加坡成为中国及东南亚货物的集散中心，和一个繁盛的转口贸易商港。
2	1822年10月17日	莱佛士实行重商政策及重组市区计划，设立新加坡市区规划委员会，委员会划定华人区在新加坡河南岸，河以南沿海地带为商业区。
3	1822年12月4日	住在吻基（Boat Quay，今作驳船码头）和甘榜格南（Kampong Glam）的华人居民，受莱佛士市区发展计划的影响被逼迁。111名吻基华人住户（多为广客劳工和技工）联名向驻扎官法夸尔（W.Farquhar）陈情，要求给予公平赔偿。为了更好保护帮群利益，广客帮最先分别于1822年和1823年成立宁阳会馆及应和会馆。
4	1824年	广惠肇邑人建立海唇福德祠，作为联合阵线的总部。
5	1840年4月20日	刚落成的天福宫主神妈祖金身由中国湄洲岛运到，特别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迎接天妃娘娘入庙。福建漳州、泉州和永春邑人，在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俗称源顺街）创建天福宫，早年福建会馆即设在庙内。
6	1844年5月25日	陈笃生医院奠基。陈笃生鉴于许多贫穷华工求医无门，乃创建陈笃生贫民医院。英殖民地政府非常器重他的仁风善举，奉他为华社首领，并封太平局绅，为华社受封此衔之第一人。陈笃生医院（Tan Tock Seng Hospital）初期建于珍珠山，1860年迁至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1909年迁到摩绵路（Moulmein Road）现址。
7	1845年	潮州邑人在佘有进领导下，成立义安公司，团结潮州邑人，管理潮人庙宇、坟山、办潮人公益及慈善教育事业。
8	1849年	陈金声建立崇文阁于天福宫左殿，为新加坡有籍可查的第一所华校私塾。1854年，续建萃英书院。
9	1854年5月5日	华社两极化的帮权政治，终于酿成巨大悲剧，爆发了新加坡开埠以来最严重暴动，对华社来说更是一场浩劫。福建帮和潮帮发生正面冲突，跨帮组合的广客帮也加入战围和潮帮同一战线。一连12天，从市区到乡村的胡椒甘蜜园丘，双方互斗、抢掠、杀劫、烧毁房屋。
10	1857年11月18日	陈金声慨捐1万3000元予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建筑自来水工程，以改善市区供水。1882年，市政局建立喷水池以纪念其贡献。
11	1876年12月15日	华人邮政分局在中街（马吉街Market Street的俗称）开业，引发严重的暴动及罢市，新邮政分局被捣毁，警察被殴打，有数人死于暴动。嗣后，据华民护卫司及警察总长的报告，这次事件的煽动人是本坡经营侨汇的华商。他们散布谣言，谓华侨今后不能再有邮政寄家书的机会，英人统办邮政，不过是增加剥削华侨的新途径，要侨民群起反对，所以才酿成暴动事件。
12	1877年6月1日	英人创立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专门处理中国移民、劳工、会党及妇孺等事务。1934年易名为华民政务司署（Chinese Affairs Office）。
13	1877年10月	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开馆，广帮富商胡璇泽（又名胡亚基），受委为首任领事，兼俄国与日本驻新领事。
14	1880年2月16日	人力车从上海运到新加坡，开始作为本地重要交通工具。
15	1881年12月10日	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华文日报《叻报》出版。叻报也是战前新加坡出版和行销最久的中文日报，由薛有礼创办。从创刊日起至1932年3月31日停刊，共维持了51年。
16	1885年9月	各帮富商联合倡办同济医院，为华社帮权政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列号	日期	事件
17	1889年12月	英政府成立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作为与各帮华民上情下达及下情上达的沟通机构，委员多为商界与各帮领袖。
18	1900年8月17日	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俗称侨生公会成立。
19	1905年5月5日	应新学校（应和会馆）创立。这是为响应光绪所颁行的“广设新式学堂”的上谕而开办的首间新式学校。翌年养正学校（广帮先贤何乐如等创办），道南学校（福建会馆）及启发学校（茶阳会馆）相继开办。
20	1905年4月6日	孙中山在晚晴园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作为东南亚反清的革命基地。
21	1906年5月22日	孙士鼎总领事就侨民在棋樟山岛（St John's Island）检疫，被令脱衣裤事件照会新加坡总督，请改善侨民受检待遇。经交涉后，总督下令，凡由有疫之埠来船，大舱搭客均不用赤身验体。
22	1906年3月15日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成立，1917年改名中华总商会，为新加坡华社最高领导机构。
23	1910年	广客帮创立慈善医院——广惠肇方便留医院。最初只收容广惠肇邑人，其后开放给各籍贯华人及各族人士。院址在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与实龙岗路交界处。
24	1919年2月6日	新加坡举行开埠百年庆典，莱佛士铜像移置维多利亚纪念堂前揭幕；同年3月21日南洋华侨中学创立，为东南亚最早成立的华文中学。
25	1923年6月	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出版，为研究新加坡华人史的重要资料。
26	1929年1月26日	潮侨大会召开，议决成立潮州八邑会馆，与义安公司同为潮人的最高领导机构。
27	1932年10月31日	受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华侨银行与和丰银行、华商银行合并为华侨银行有限公司，总资本4000万元。
28	1933年4月1日	新加坡限制成年男性华工入境，妇女不受限制，华人人口的男女比例开始改善。
29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新加坡华人组织星华筹赈会，支持中国抗日。第二年，更联合南洋各地华侨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1939年南侨总会分九批把3000余名南侨机工送到昆明，负起滇缅公路运输战略物资任务。
30	1942年2月15日	日军攻陷新加坡，英军投降，新加坡易名昭南岛（Syonan-to）。日军对华人展开检证大屠杀，同时组织华侨协会，勒索奉纳金5000万元。
31	1950年10月	殖民地政府实行回马签证新条例，规定华侨回中国省亲三个月（旧例两年）内必须回新。中华总商会召开侨团大会，联合向政府抗议。由于对回马签证新条例的强烈反应，引发华社思考华侨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嗣后总商会展开争取华人公民权及选民登记运动。
32	1953年1月16日	陈六使在福建会馆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倡议华社创办华文大学。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后，使得新马华文学校的师资来源，以及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渠道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陈六使倡议创办一所华文大学，即刻获得新马及东南亚各地华人热烈响应，掀起筹款热潮。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
33	1956年2月8日	政府公布《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肯定了母语教育的地位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平等对待各源流的学校。建议被政府所采纳，使华教成为国家教育之一环。
34	1956年9月24日	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被解散引致学生占据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校园，举行会议和示威。为避免学生失学，10月，政府创办四所政府华文中学：立化、德明、德新、华义，让受学潮影响的学生入学。
35	1958年10月22日	政府援引不良刊物法令，禁止中国和香港53家出版社的出版物之入口和售卖。
36	1960年2月1日	政府设立建屋发展局，加速建造政府组屋以解决屋荒问题，拆除贫民窟，将密集的市区人口迁到郊区的新镇，造成一次人口大迁徙。

列号	日期	事件
37	1960年8月20日	人民协会成立，在各组屋社区设立联络所，促进和组织社区内的社会、文化、教育、职业、娱乐与体育等方面的活动。其基层组织，公民咨询委员会及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成为基层社区领袖，削弱了宗乡会馆传统社会领袖的影响力。
38	1961年1月1日	华校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改为四二制（初中四年，高中两年）。许多华校生和华教人士，担心华校改制对华教不利，因此反对改制，遂发生从11月18日至12月5日的中四会考罢考事件。
39	1962年2月23日	随着多个地点发现日治时期被屠杀者的遗骸，中华总商会成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1967年2月15日，位于美芝路（Beach Road）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落成，每年举行公祭。
40	1971年5月2日	政府逮捕《南洋商报》的李茂成（总经理）、仝道章（总编辑）、李星可（主笔）及郭隆生（公关经理）。政府发表文告指出《南洋商报》自1970年炫耀共产主义，同时又借着语文和文化问题，煽动种族和沙文主义情绪。15日，政府又揭发《星洲日报》社长胡蛟创办的英文报《东方日报》接受香港的中共情报机关720万港元资助。政府取缔报界的一连串行动（史称“五月风暴”）导致华文报业大改组，嗣后通过立法，打破家族控制华文报业的局面。
41	1979年3月13日	《吴庆瑞教育报告书》建议，为避免太高的学生损耗率，应按照学生吸收教导进度进行调整，中学分为三个支流，即特选课程、快捷课程与普通课程。1980年，九所华文中学成为特选中学，肩负着为新加坡培养双语人才以及传承华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这九校是圣公会、公教、圣尼各拉女校、中正（总校）、德明、海星、南洋女中、立化和华中。1990年，特选课程也扩展到道南、爱同、南华、圣尼各拉、菩提、培群、南洋、公教、海星及万慈10所小学。
42	1979年9月7日	总理李光耀主持讲华语运动开幕礼，呼吁大家“多讲华语不讲方言”。
43	1980年4月6日	南洋大学理事会接受总理建议，南大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44	1983年3月16日	《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
45	1986年1月27日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举行成立典礼。此前（ 1985年12月9日），由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南洋客属总会、广东会馆、海南会馆、三江会馆及福州会馆七大会馆共同成立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注册获准。宗乡总会取代了中华总商会在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的地位。宗乡总会的成立也结束了华社帮群意识主导的帮权政治，取而代之的是在国家意识主导下，肩负起传承文化和传统的使命。积极协调宗乡会馆的关系，通过春到河畔、文娱活动、展览及出版推广与发扬华族传统文化；成立文史资料中心，收集华社与宗乡会馆资料，以及开办幼儿园，教导学前儿童学习母语和认识华族传统价值观。
46	1987年1月24日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及直落亚逸区公民咨询委员会联办“春到河畔迎新年”。从1987年迄今，“春到河畔”已成为了农历新年期间不可或缺的欢庆活动。“春到河畔”旨在发扬华人传统节日，促进社会和谐与国家凝聚力，并成为国人及旅客在农历新年期间的必游之处。
47	2010年10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开放让新移民社团加入，扩大会馆的队伍，并且配合政府的政策，积极协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新移民团体如山西会馆，天府会和天津会也加入宗乡总会。
48	2014年9月29日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筹建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由李显龙总理主持动土仪式。该中心是一个能启动各种文化活动的空间，其终极目标是促进族群融合，建立和谐社会。预期2016年落成。
49	2015年3月23日	建国总理李光耀于凌晨3时18分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50	2015年11月9日	首部《新加坡华人通史》出版，作为庆祝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年，及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30年的纪念贺礼，由李显龙总理主持发布仪式。

（资料整理：林孝胜）

附录三

新华先贤五十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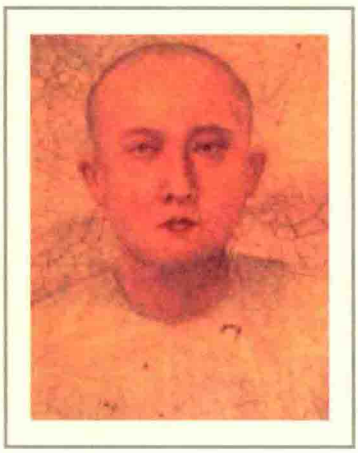
遴选准则

◆对整体新华社会有重大贡献者

◆各领域中之领袖人物

◆各方言群之领导人物

歷史人物



薛佛记

Si Hoo Keh (1793-1847)

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字文舟，谥维邦，祖籍福建省漳浦县（今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上营社）。生于马六甲，其父薛中衍育有三子五女，薛佛记居长，在马六甲经营锡矿业，其矿区在宁宜河流域一带。1820年代南来新加坡，经商致富。1826年为新加坡最大土地拥有者。1828年创建福建公塚恒山亭，任大董事，捐金764.2元。天福宫兴建时，亦是大董事之一，捐金多达2400元，数额仅次于陈笃生。46岁时退居马六甲，任青云亭亭主共八年至1847年逝世。

陈笃生

Tan Tock Seng (1807-1850)

新加坡首位华人太平局绅。根据《海澄峨山陈氏族谱》所载，陈笃生原名陈卓生，“生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三月十二日戌时，娶李贵郎官之女名淑娘”。一般史书都记载他生于1798年，实误。陈笃生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仓头村后许社），是继薛佛记之后的闽帮领袖人物。父亲陈月中约在18世纪移居马六甲，以种植为生。陈笃生在马六甲出生。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便从马六甲南来，以零售商起家，嗣后在驳船码头（Boat Quay）开设陈笃生商行，经营土产生意，同时结识了英籍商人怀特黑德（J.H.Whitehead of Shaw, Whitehead & C.），两人合作经营甘蜜、胡椒出口生意，同时输入建筑材料，获利甚丰，逐渐成为新加坡富商和商界领袖。1840年创设天福宫。1844年创建陈笃生平民医院，被誉为大慈善家。其子陈金钟、曾孙陈武烈均为闽帮杰出领袖，祖孙三代领导闽帮，传为佳话。1846年，被殖民地政府封为太平局绅（Justice of Peace）。

陈金声

Tan Kim Seng (1806-1864)

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字巨川，祖籍福建省永春县。其父在马六甲出生，陈金声也在马六甲诞生。幼年就读私塾学堂，同时进教会学校学习英文和荷文。新加坡开埠后不久，与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南来，创办金声公司经营小本生意，后逐渐扩充，在马六甲和上海开设分行，从事出入口生意。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独资兴建金声桥，横跨新加坡河，使平民百姓无需乘渡船过河。又铺设金声路，方便百姓来往。尤其致力于教育事业，出资创办天福宫偏殿的崇文阁（1849年）和厦门街的萃英书院（1854年）。又与陈笃生共同筹划创办陈笃生平民医院。陈金声的哲嗣陈明水和孙子陈若锦，更秉承先志，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代不衰。陈金声对新加坡社会最大的贡献，是改善居民的水供问题。1857年11月18日捐献1万3000元给英国殖民地政府兴建自来水库。1882年当局建造一座喷水池纪念他。

陈泰

Tan Tye (1839-1898)

福建帮领袖，又名陈清泰，祖籍福建省金门县。少年时在家乡耕读，1860年南来新加坡。累积钱财后便创立合春号，经营杂货、木材出入口生意。其木材生意，远达上海、福州和香港，成为当时巨富。陈泰也是义顺区主要黄梨园主之一，素有“黄梨大王”之称誉。1870年联合同乡在史密斯街（Smith Street）创设浯江孚济庙（即今金门会馆），也捐资支持崇文阁和萃英书院。他将新加坡河附近房地产捐赠给英国殖民地政府建设码头、蓄水池和仓库。英国殖民地政府乃将该地命名为陈泰坊（Tan Tye Place）和陈泰巷（Tan Tye Alley）纪念他。19世纪末，他响应满清政府的捐款救国号召，向清政府捐献巨款，获得清政府赐封“中宪大夫”和“通封大夫”官衔。陈泰担心富不过二代，于1876年立下遗嘱，规定他逝世当天所有在世后人全部逝世后21年，才能把遗产平均分给在世嫡系男性后裔。陈泰育有四男三女，幼子陈楚楠支持孙中山革命，曾任新加坡同盟会首任会长。

章芳琳

Cheang Hong Lim (1841-1893)

慈善家，亦作章芳林，又名桂苑，祖籍福建省长泰县（今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金里村溪尾），新加坡出生。其父章三潮育有四子，章芳琳居长。章三潮在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俗称源顺街）开设长越号，经营槟叶烟酒等土产。章三潮逝世后，长越号易名为章芳琳公司，后改称苑生号。章芳琳曾与潮帮富商陈成宝和陈旭年合股经营鸦片和烟酒生意，同时又兼营航运业和地产业，在振瑞路（Chin Swee Road）和合乐路（Havelock Road）一带兴建不少店屋。1860年代后期，他已成为新加坡一等大富翁。章芳琳乐善好施，独捐3000元开辟芳林公园。又修建巴西班让福德祠、重修海唇福德祠和金兰庙，捐建玉皇殿、清元真君庙，为19世纪各帮领袖中最热心修建庙宇者。此外，又创办章苑生英文义学、章壬宪义学，并慷慨捐献孤儿院建筑费。章芳琳抛弃狭隘的帮派思想，不积极参与帮权活动，把全副精神集中在公共事业上。1873年被封为太平局绅，并被委任为保良局委员。1891年殖民地政府正式承认他为福建帮首领。

邱菽园

Khoo Seok Wan (1874-1941)

星洲名士、诗人、报人。原名邱炜菱、字萱娱、号菽园，又号啸虹生、星洲寓公，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今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垵乡惠佐村）。其父邱正忠是新加坡著名米商兼华社领袖。1888年随父母回乡，先考中秀才，后又考中举人。1895年北上赴会试落第，从此绝意仕途。1896年回返新加坡，不久父亲逝世，邱菽园护送父亲灵柩回中国安葬。1897年返新，与林文庆等创办《天南新报》，鼓吹变法维新。邱菽园在继承了父亲约70万元巨额遗产后，投资土产及产业，但因经营不善，不几年便告破产。1899年邱菽园与林文庆合创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独捐半数基金3000元。1913年承办《振南日报》，1920年任双林寺董事。1926年任中华总商会秘书。1929年出任《星洲日报》编辑，主编“繁星”副刊。1930年因病辞职。主要著作有诗集《菽园诗集》、《啸虹生诗钞》以及《菽园赘谈》和《五百石洞天挥麈》两部杂文笔记等。

刘金榜

Low Kim Pong (1837-1909)

双林寺创建人，原名刘诚正，号文超，金榜为其乳名。祖籍福建省南靖县（今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船场镇仔角村），父辈务农。1858年南来新加坡，创立万山号经营中药。后集资开设福南银号，跻身金融界。致富后，献出金吉路（Kim Keat Road）地段兴建双林寺，并花巨资聘请中国名师巧匠南来，仿闽南古刹，使双林寺成为马来半岛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中国式建筑。双林寺于1898年开工，至1907年花了九年的时间和近50万元的巨资，尚未完全竣工。1909年刘金榜逝世时，该寺尚未举行落成典礼。后由其第五子刘启祥主其事，并在寺内立碑志盛。刘金榜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中华总商会前身）发起人之一，历任该会董事、福建会馆董事、华人参事局委员、保良局委员等。

吴寿珍

Goh Siew Tin (1854-1909)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首任总理，祖籍福建省诏安县。父亲吴秀水早年在直落亚逸街开设万安号，经营锯木业和锡业，并在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印尼）和马来半岛之间经营土产出口生意。父亲去世后，继承父业，改万安号为安和号。1906年领导成立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并担任该会第一届和第三届总理以及第二届副总理。1905年与陈楚楠创办崇正学校；1906年又与李清渊、张善庆等创办道南学校，并出任总理。他委派校长马征祥率领数十名学生回国求学，当中包括李光前、陈维龙与其第四子吴应隆，就读于南京暨南学堂。1916年天福宫重修时，他是三大董事之一。吴寿珍也是柔佛峇株巴辖（Batu Pahat）的开埠功臣，当地人尊称他为“港主”。

陈嘉庚

Tan Kah Kee (1874-1961)

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祖籍福建省同安县（今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在集美出生。父亲陈杞柏为当时新加坡殷商。1890年奉父命南来，在新加坡顺安米店习商。1903年父亲破产。隔年开始独资创办新利川黄梨罐头厂，并发展黄梨园。1916年起全面转向树胶业，创设胶厂。1925年时资本已达叻币1200万元，有“东南亚树胶大王”之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树胶业损失惨重，1934年2月宣布收盘。毕生倾家兴学，先后创建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崇福女校、华侨中学。1919年创办厦门大学，聘请林文庆为校长。后因经济困难，乃将厦大交给政府，改为国立大学。陈嘉庚也积极参与本地社会活动。1910年以后两度出任中华总商会协理；1923年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同时创办《南洋商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还组织3200多名机工回国参加抗战。日治时期避居印尼东爪哇，撰写《南侨回忆录》。1949年6月回中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并参加开国大典。1961年8月12日零时15分在北京病故，葬集美鳌园。

林秉祥

Lim Peng Siang (1872-1944)

企业家，祖籍福建省龙溪县二十八都浒茂保溪州社（今龙海市紫泥镇溪州村凤林社），出生于中国。其父林和坂为新加坡著名船商之一。林秉祥幼年时在家乡受传统教育。南来后进入圣约瑟学校攻读英文。毕业后受聘于丰源船务局，逐渐积累了航运业管理经验。1904年与胞弟林秉懋创设和丰公司，业务范围涉入航运业、银行业和工业。1911年公司资产多达1000万元，轮船数十艘，航行于印尼和马来半岛一带。1912年与林文庆、李浚源等创办华商银行。林秉祥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早在1904年便捐资6万元，协助莱佛士学校扩建。同年天福宫重修时为协理之一。1920年更捐资3万5000元倡设华侨中学。1915年与李浚源合购一架飞机赠予英国政府，获英国殖民地政府赐封太平局绅。

- 《文物》
- 《文艺生活》
- 《香港电影资料馆通讯》
- 《香港信报》
- 《新报》
- 《新国民日报》
- 《新加坡菜市集邮会会刊》
- 《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学刊》
- 《新加坡月刊》
- 《新青年》
- 《新世纪学刊》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新学》
- 《星报》
- 《星洲日报》
- 《亚洲经济文献》
- 《亚洲文化》
- 《怡和世纪》
- 《艺术天地》
- 《源》
- 《娱乐》
- 《战时月报》
- 《昭南日报》
- 《振南报》
- 《阵线报》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中教学报》
- 《中文系学刊》
- 《中文学会学报》
- 《中兴日报》
- 《总汇新报》
- 《宗教学研究》
- Asian Culture
- Bintang Timor
- Calcutta Englishman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Fourth International
-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 Journal of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 Journal of the Island Society
-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Journal of S.E.Asia Studies
-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catcc Society

郑古悦

Tay Koh Yat (1880-1957)

郑古悦巴士车有限公司创办人。祖籍福建省金门县，家乡出生，22岁时南来新加坡投身商界。32岁时自创顺源公司，并在印尼槟港设有分栈。1921年成立益成兴公司，设分公司于印尼巴达维亚（今椰加达）和泗水。翌年又在新加坡创设振裕成公司，专营印尼各港土产杂货的进出口贸易。1938年成立郑古悦巴士有限公司，至1949年拥有大型巴士车60余辆，是当时华人巴士车公司规模最大者。抗战时，参加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持有关募捐与筹款事宜。日军南侵期间，陈嘉庚应英国殖民地政府之邀，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郑古悦任义务警察股（亦称保卫团）正主任，负责市区各街道治安。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组织新加坡华侨被日寇检证及杀害鸣冤委员会，出任委员会主席，调查日本侵占新马时期华侨所受的财产损失。1948年出任《中兴日报》董事长，并任新加坡福建会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金门会馆要职多年。1949年出任同济医院正总理，特呈请殖民地总督批准为正式慈善机构，凡医院受捐的款项，均豁免缴纳所得税。

庄竹林

Chuang Chu Lin (1900-1973)

教育家。祖籍福建省惠安县山腰乡菜堂村，出生于故乡。幼年时在家乡受教育。后进入福州协和大学深造，获得社会科学学士学位。1929年前往美国深造。1933年获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旋受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政治学教授。1939年南来新加坡，出任中正中学首任校长，此后连续担任20载，使中正成为当时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华文中学。1957年10月庄竹林因学潮被林有福政府拘禁10个月至1958年8月获释。1959年庄竹林接受陈六使的聘请，出任南洋大学副校长五年。

林树彦

Lim Soo Gan (1912-1993)

新加坡民信业领袖，字成木，祖籍福建省安溪县官桥镇赤岭村。1928年，在家乡中学毕业后，即南来荷属印尼占卑，任当时中华总商会秘书及中华会馆座办。1937年转往新加坡，翌年在新加坡创立侨通行于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俗称源顺街），业务突飞猛进，乃设分行于小坡美芝路（Beach Road）。除经营侨汇民信外，兼营土产杂货。二战结束后至1950年代初年，是侨通行的全盛时期，其分行遍设各地，举凡香港、上海、福州、厦门、吧城（今椰加达）、泗水、砂劳越、怡保、吉隆坡都有分行。1946年林树彦成立侨通企业有限公司；1947年组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8年创立中华汇业股份有限公司。侨通行的式微，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嗣后由于政治环境改变，减少汇款的需要，侨汇从此萎缩。

陈育崧

Tan Yeok Seong (1903-1984)

历史学者，原名陈慎，号椰阴馆主。祖籍福建省海澄县，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曾在槟城中华学校与英华学校就读。1921年回福建进入集美中学，后考入厦门大学商科。1926年毕业后南下新加坡，在陈嘉庚属下公司任职。后任新加坡华校督学。1935年创立南洋书局，编印华文学校教材。1936年设立编译所，先后在槟榔屿、吉隆坡、马六甲、仰光、巴达维亚（今椰加达）设分局。战后恢复营业，继续编印华文教科书。1947年出版《南洋儿童文库》、《马来亚少年报》和《南洋杂志》等。业余从事东南亚史地和华人史研究，曾任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理事和南洋学会会长。编著有《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与陈荊和合编）和《椰阴馆文存》三卷及补编，内容包括华文和英文论著及诗词等。

吴庆瑞

Goh Keng Swee (1918-2010)

新加坡开国元勋之一，祖籍福建省漳州，生于马六甲。两岁时随父母迁居新加坡。曾在英华学校就读，后入莱佛士学院读经济学，其经济科成绩全班第一。毕业后在新加坡所得税局任职。1948年获奖学金前往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深造，与李光耀等来自新马的留学生成立马来亚论坛，并出任首任主席。1956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返回新加坡仍在福利部任职。1958年8月，41岁的吴庆瑞辞职从政，协助行动党策划1959年大选的工作。1959年5月代表行动党当选牛车水区议员，其后五次大选中成功连任。历任新加坡财政部长、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副总理。他是新加坡经济发展总工程师，以及裕廊工业区创建人。1984年底退休后，接受中国的邀请，义务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顾问。1990年以后，72岁的吴庆瑞完全退休，2010年5月14日逝世。

林文庆

Lim Boon Keng (1869-1957)

医生，社会活动家，字梦琴，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今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鳌冠村），新加坡出生。童年在新加坡福建会馆附设的书院读四书五经，后转入莱佛士书院就读。1887年因成绩优异，获英女皇奖学金前往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1892年获一等荣誉学位和外科硕士学位。1893年返回新加坡挂牌行医。一度担任爱德华七世医学院讲师，1897年与宋旺相创办《海峡华人杂志》，与邱菽园等创办新加坡中华女子学校。此外还参与创办华商银行和保险公司，发展马来亚的树胶园。历任新加坡立法议会华人议员及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等。1921年至1936年应陈嘉庚邀请，出任厦门大学首任校长。日治时期，被迫出任华侨协会会长，并在日本军方强制下，向新马华人筹集5000万元奉纳金。汉文著作有《孔子学说原理》、《卫生原理讲话》；英文著作有《中国内部的危机》、《新中国》以及英译屈原《离骚》等。

宋旺相

Song Ong Siang (1871-1941)

律师，新华历史学者。一名宋鸿祥，新加坡出生，祖籍福建省南靖县。其父宋佛俭出生于马六甲，为基督教徒，能操流利英语和马来语。母亲冯芳莲，亦通马来语。1878年，宋旺相就读于莱佛士书院，1886年申请英女皇奖学金获选，但由于年龄不够规定的16岁，只好让给同班的林文庆。1888年再获英女皇奖学金，乃于1888年前往英国攻读法律，1889年进入中宇法学院就读。同时，于1890年进入剑桥大学攻读文学。1893年6月前后，考获法学士和文学士学位。同年10月返回新加坡执业律师。1894年创办新加坡第一份罗马化马来文报纸《东方之星》（*Bintang Timor*）。1897年与林文庆合办英文刊物《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倡导华人剪辫子和戒除鸦片等。1900年与陈若锦、林文庆等共同创立海峡英籍华人公会（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俗称侨生公会）。著有《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1923年出版），且因此书获英皇颁赐英帝国二等勋章（K.B.E.）拥有爵士衔。

颜永成

Gan Eng Seng (1844-1899)

英华义学创办人，祖籍福建省漳州海澄县青礁，为土生华人，生于马六甲，家境贫苦。在马六甲受正规教育，懂得说和书写英语。1861年移居新加坡，起初在英商牙直利公司（Guthrie & Co.）当簿记员，后任仓库管理员，再升任买办主任。离开牙直利后，颜永成经营土产生意和船务，旗下有15家公司。1864年，丹戎巴葛船务公司成立，使他有机会承包码头和仓库的劳工生意。颜永成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1885年创办英华义学（为颜永成中学前身），捐出直落亚逸街数座店屋作为校舍。1892年捐出梧槽区一大片土地给陈笃生医院，又在哇央街（Wayang Street）创设和资助同济医院。1892年和1899年担任同济医院主席和产业信托人。他也受委为华人参事局委员，代表华人向政府申诉和陈情。

李清渊

Lee Cheng Yan (1841-1911)

实得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 Ltd.）创办人之一，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桃城，出生于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家庭。1858年南来新加坡，在直落亚逸街经营小生意。后创立清渊公司和振裕号，从事进出口贸易。1890年1月20日与陈若锦和陈恭锡等创立实得力轮船公司。清渊公司业务蒸蒸日上，10年后成为大贸易公司，为欧商的主要贸易伙伴。历任华人参事局委员、保良局委员、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1904年七州府医学堂倡建时捐金1000元。1906年天福宫重建时，为三大董事之一。他也是永春会馆和陇西李氏公所的创办人，曾获殖民地政府封为太平局绅。李清渊家业丰富，一共建了四座度假别墅。长子李浚源为其得力助手。

林谋盛

Lim Bo Seng (1909-1944)

抗日英雄。父亲林露为新加坡著名建筑商，祖籍福建省南安县（今福建省南安市美林镇满山红村）。幼年就读于鼓浪屿英华书院，16岁南来新加坡，进入莱佛士书院就读。毕业后负笈香港大学，攻读商科。后因父亲逝世，返回新加坡继承父业。拥有地产、福安有限公司等。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新加坡建筑公会会长。1937年，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与庄惠泉等发动马来亚丁加奴州日本人经营的龙运铁矿华工四千余人罢工。1942年2月日本占领新加坡前夕，逃离新加坡，辗转前往重庆。1942年与庄惠泉出任留印度华人海外战时工作训练班正副组长。后参加“马来亚136部队”，担任马来亚华人区正副区长。1943年乘潜艇在吡叻州安顺峇眼那督港登陆，并化名为陈春林。1944年5月被日军逮捕，6月遭杀害，年仅36岁，葬汤申路（Thomson Road）麦里芝蓄水池旁。1954年当局在政府大厦前的海滨公园，建“林谋盛烈士纪念塔”，作为永恒的纪念。

佘有进

Seah Eu Chin (1805-1883)

潮州帮领袖，祖籍广东省澄海县岐山月浦乡（今属汕头市区），幼年在家乡受私塾教育，1823年南来新加坡。初任华人商店书记，25岁时在南干拿路（South Canal Road）创业，经营土产经纪行。不久成为大地主，率先在新加坡大规模种植胡椒、甘蜜。其甘蜜园遍布里峇峇利路（River Valley Road）至武吉知马路和汤申路一带，有“甘蜜王”之称。1845年领导潮帮人士设立义安公司，并担任总理多年。1851年受委为特别陪审员。1854年闽粤两帮私会党发生械斗，与陈金声出面调停。1872年受封为太平局绅。1883年逝世，遗下四子三女。长子佘石城、次子佘连城、三子佘松城、四子佘柏城。佘松城在中国早逝。其他三子均受封为太平局绅。

陈成宝

Tan Seng Poh (1830-1879)

华社领袖，祖籍广东省潮安县庵埠镇亭厦村，1832年在马来亚吡叻州出生，是甲必丹陈亚汉的儿子。其姐嫁给新加坡富商佘有进后，随姐前来新加坡。他与柔佛苏丹阿武峇卡（Sultan Abu Bakar）关系密切，曾取得柔佛政府售卖鸦片的专利权。后与陈旭年、章芳琳垄断了柔佛与新加坡的主要鸦片烟酒生意。1871年受委为新加坡市政委员会主席，连任数年。1872年受封太平局绅和名誉推事。

陈旭年

Tan Hiok Nee (1827-1902)

港主，新马富商，又名陈毓宜，祖籍广东省海阳县上莆都金砂乡（今广东省潮安区彩塘镇）。幼年生活困苦，曾在家乡当油贩。后南来新加坡当码头工人，继为经营布匹生意，川走于直落布兰雅（Telok Blangah）马来甘榜。他与柔佛天猛公阿武峇卡交往甚笃，两人结拜为兄弟。天猛公依布拉欣统治柔佛期间，广招华人垦荒种植甘蜜和胡椒，并实行港主制，陈旭年大力配合。1866年，在柔佛拥有第一至第七条港的经营权，成为柔佛最大港主。同时在新加坡开设四间店铺，从事甘蜜胡椒买卖。1870年，阿武峇卡升任柔佛大君（Maharaja）后，封他为柔佛华侨侨长（Major China），并获宰相衔。晚年定居新加坡，1885年在登路（Tank Road，也就是今克里门梭道（Clemenceau Avenue）和槟榔路（Penang Road）的交叉口）建造一座中国式大宅，称为“资政第”。1900年退休回国，1902年终于故里。柔佛新山有陈旭年街（Jalan Tan Hiok Nee）以纪念他发展柔佛的功绩。

林义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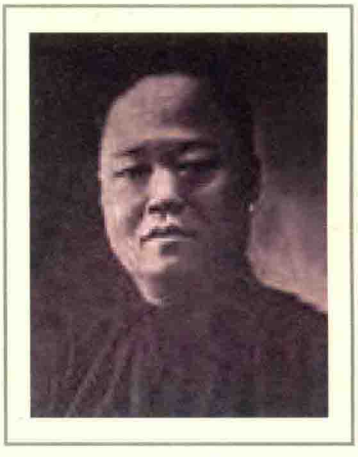
Lim Nee Soon (1879-1936)

社会活动家，字蔚和，号发初，祖籍广东省澄海县岐山镇马西村（今汕头市郊区），生于新加坡。年幼丧父母，由外祖父张礼抚养成人。自幼受华、英文教育。17岁毕业后在舅父张永福的长美布庄工作。20岁继承外祖父遗产，从事垦植、种植树胶与黄梨二万多英亩，获利甚巨，有黄梨大王和树胶大王之称。又在美芝路（Beach Road）创办通美号、通益号，经营树胶制造厂。历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潮州八邑会馆主席、政府米粮统制局委员等职。孙中山在新加坡期间，随侍左右。先后斥资数十万元支持革命。1924年前往上海，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36年3月19日病逝上海。育有四男六女。新加坡多条路径以他为名，纪念他对地方的贡献。

张永福

Teo Eng Hock (1871-1957)

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领导人，祖籍广东省饶平县樟溪镇青岗村杨梅坑，生于新加坡。曾创办华资第一家树胶制品厂，为其从事革命事业奠定经济基础。张永福追随孙中山鼓吹辛亥革命，与陈楚楠先后合办《图南日报》（1904年）、《南洋总汇新报》（1906年）和《中兴日报》（1907年）；并以其别墅晚晴园作为革命组织的基地。1906年2月，孙中山在新加坡创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时，出任正会长。1932年回国，先后出任汕头市长、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行长。1933年著《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1940年3月被汪精卫任命为驻越南通商代表。战后以汉奸治罪入狱。解放后回新，过隐居生活。1957年逝世于香港。根据晚晴园提供的张永福女儿张健华的口述资料（2010年12月29日），汕头公园前门的福平路就是张永福做汕头市长时开的。



廖正兴

Liau Chia Heng (1874-1931)

四海通银行创办人之一，号杰夫，祖籍广东省潮安县金石廖厝村。年少时南来新加坡，在亲戚店铺当学徒。稍有积蓄，自营粿条业，后开设万茂兴号与永茂昌号，经营胡椒、甘蜜、树胶等土产。又在沙球勝路（Circular Road）创立万德兴布店。因各店获利甚钜，乃厂置树胶园。1905年发起组织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即中华总商会前身）。1906年与黄松亭等发起创办四海通银行。1906年又与蔡子庸等倡办端蒙学堂。1920年起连任该校名誉总理12次。历任保良局、华人参事局委员及陈笃生医院理事，并受封为太平局绅。英国殖民地政府为表扬他对社会的贡献，乃将汤申路和纽顿路（Newton Road）交界处附近一村庄命名为甘榜正兴（正兴村）。

杨缵文

Yeo Chan Boon (1881-1967)

潮州帮领袖，原名杨诗籍，祖籍广东省潮安县文里村。自幼好学，17岁南来新加坡从商，创设永元成号，经营土产生意。后设成美庄，经营黄金首饰。1905年与同乡廖正兴、陈秋云等发起创办端蒙学堂。1919年又与陈嘉庚等人创办南洋华侨中学，连任该校董事长。1955年南洋大学创办时，任大学理事。曾任义安女校董事长和新加坡华校董教联合会主席，他也是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1917年改称中华总商会）发起人之一。1929年至1930年间，与林义顺和李伟南等人创办潮州八邑会馆及义安公司，还协助成立马来亚潮州公会联合会及广东会馆。1938年英国殖民地政府委任他为华人参事局委员，并两度获政府颁赐荣誉奖章。

李伟南

Lee Wee Nam (1880-1964)

再和成伟记创办人，字英豪，祖籍广东省澄海县秀水社外埔。家贫，16岁随父南来。1909年在新加坡四海通银行任职。1911年升任总行副司理，1932年任总经理兼董事长，创办再和成伟记和万益成汇兑信局。1927年至1930年先后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正副会长。1930年至1947年，任潮州八邑会馆正副总理、义安公司正副总理。1938年，参与创设广东会馆，任首届会长。1940年出任端蒙学校总理，同时创办义安女校。曾受政府委任为保良局、华人参事局委员、棋樟山检疫所巡视员。战后重振旧业，声望更著。

张汉三

Teo Han San (1897-1965)

企业家，祖籍广东省潮阳县。从故乡南来，初抵吉隆坡经商。后到新加坡发展业务，并扩展至马、港、泰、缅等地。前后设立张汉三实业有限公司，并与儿子张泗川设立四海栈有限公司、四海栈种植有限公司、捷源栈有限公司、新加坡南洋保险有限公司、赛克玲（马来亚）有限公司等，并自任董事长。历任新加坡米入口商总会主席、糖商公会会长、广东会馆会长、潮阳会馆名誉会长、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潮州八邑会馆及义安公司总理、醉花林俱乐部总理、南洋德教总会名誉会长等。1963年获雪兰莪州苏丹赐封拿督勋衔，后又获新加坡公共服务星章（BBM）。

连瀛洲

Lien Ying Chow (1906-2004)

银行家，祖籍广东省潮阳县潮南区司马浦镇大布乡。生于故乡，1920年南来新加坡。1928年与友人合资创办华兴有限公司，任总经理，1941年当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日本占领新加坡前夕，经澳洲、印度到中国陪都重庆，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在重庆期间，成立华侨联合银行（华联银行前身）。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10月返回新加坡。1947年在新加坡创立华联银行，先后担任总经理和董事长。曾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1965年获泰王颁赐高级皇冠勋章。1981年6月27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Dallas, Texas）获美国成就学院第20届金盘奖，为获此奖之第一位非美国人。1980年后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理事会主席，并成立连氏基金会。1988年获新加坡最佳商人奖。

胡亚基

Hoo Ah Kay (1816-1880)

清朝驻新加坡首任临时领事，原名玉玑，又名南生，字璇泽、号琼轩，祖籍广东省广州市琶洲塔黄埔村。1830年南来新加坡，为黄埔公司东主，专门提供食品给英国海军。英国人称他为黄埔先生（Mr. Whampoa）。致富后，开辟南生花园。1842年任陈笃生医院义务财政。1864年被政府委为陪审员，1869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推举他为立法议会议员。数年后被委任为行政议会议员，为第一位受委该职的华人。1871年受封太平局绅。1874年担任莱佛士图书馆及博物院委员，又获英女皇维多利亚颁赐圣迈克与圣乔治三等勋章（C.M.G.）。1877年出任中国驻新加坡第一任领事，旋俄国与日本亦委任他为领事。1880年3月27日于南生花园私邸逝世。胡亚基逝世15年后，南生花园变卖，新主人为潮帮领袖佘连城。

黄亚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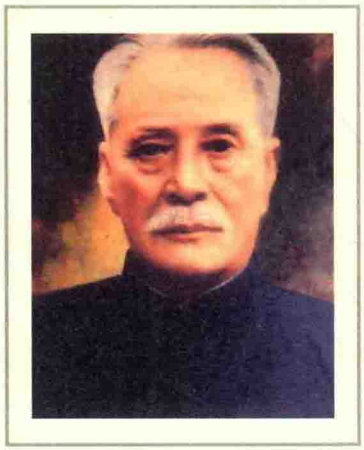
Wong Ah Fook (1837-1918)

建筑商，又名黄福、黄福基，字彦廷，号莆田，祖籍广东省台山县，家乡出生。1853年南来，先在新加坡当学徒，后赴柔佛新山随同乡当木匠，旋由木匠成为建筑工人、承包商，协助开辟柔佛，成为著名港主。曾承包兴建柔佛新山的苏丹大皇宫及其他皇宫多座，包括新山监狱。其后业务发展到新加坡，在新柔两地拥有许多房屋、甘蜜、胡椒园和树胶园等。1903年与其他华商在新加坡创设广益银行，并拥有广东潮汕铁路和华商银行的大量股份。1910年在新加坡创办广惠肇留医院，并任该院总理多年。亦为新加坡台山黄家馆及养正学校的赞助人，曾出资购置大片土地作为碧山亭冢地，称“黄福山”。黄亚福亦为新山广肇会馆创办人、新山宽柔学校的热心赞助者。1904年柔佛苏丹封赐予准拿督（SMJ）勋衔，新加坡政府也封他为太平局绅。1918年逝世，遗下五男四女。新山的惹兰黄亚福（Jalan Wong Ah Fook，即黄亚福街），就是纪念他的。

余东璇

Eu Tong Sen (1877-1941)

企业家，祖籍广东省佛山。生于槟榔屿，幼年回中国受教育。1892年返回槟榔屿。1898年父亡后，继承其父在吡叻州的锡矿及雪兰莪州的树胶园，业务扩展到新加坡、香港、广州等地。曾在新加坡苏菲雅山上建余氏别墅。1911年至1920年任马来亚联邦议会华人代表，并受英王赐封英帝国四等勋章（O.B.E.）。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捐赠飞机及坦克予英国政府。1918年捐献5万6000英镑给香港大学，1929年捐10万元予莱佛士学院。1923年碧山亭举行第一届万缘胜会时，任名誉总理。



陆佑

Loke Yew (1846-1917)

企业家，字碉，号衍良，祖籍广东省鹤山县雅瑶镇黄洞村。幼年南来，在新加坡受雇于罗奇生烟庄。17岁创设东兴隆杂货店。26岁时受雇到吡叻拉律（Larut）经营锡矿，负责运货。在太平住了15年，初任职于矿场，后从事供应军队粮食的生意。37岁时，转到吉隆坡发展。10年之间建立了庞大的企业，举凡锡矿、胶园、工业、商业，无不参与。1913年创办吉隆坡广益银行，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其财产已达叻币七、八千万。曾捐5万元予陈笃生医院，并结识孙中山，多次捐献革命经费，亦资助创办《星洲晨报》宣传革命。1917年，香港大学颁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同年2月24日病逝。遗下四子四女。幼子陆运涛，掌管父亲的庞大遗产，在香港设立电懋影业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国泰机构。陆运涛于1964年6月赴台北参加第11届亚洲电影展，因飞机失事身亡。

陆寅杰

Look Yan Kit (1849-1931)

牙医，祖籍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出生，在香港念牙科。1877年南来新加坡，在桥南路开设牙科诊疗所。1884年赴印尼泗水一带行医，受诊者包括梭罗副王。数月后返回新加坡，所获诊费不下1万元。亦为柔佛苏丹阿武咨卡的挚友，每两个半月赴柔佛为王室诊牙。将积蓄投资于房产，在新加坡拥有大约70间房屋和两座树胶园。1910年资助广惠肇留医院的创立，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广帮代表。1911年南顺会馆重建时为总理之一，他亦为利华银行的创办人之一。新加坡的寅杰路、寅杰游泳池和寅杰村都是纪念他的。

邱雁宾

Yow Ngan Pan (1863-1923)

广帮领袖，祖籍广东省南顺县，新加坡出生。其父邱立南于1841年自广州南来，在马吉街（Market Street）开设香港罗奇生分店，经营中国杂货。邱雁宾肄业于教会学校，17岁时往香港罗奇生总行受训一年。返新后，任新加坡分店经理至1906年。自1902年1月起即担任实得力轮船有限公司董事。从1909年至1917年，他是陆佑的新加坡代理人。后来又成为其遗产信托人的代理人。历任联东保险有限公司董事、利华银行董事。又创办养正学校、广惠肇留医院，任该医院董事及主席等。此外亦任英王爱德华七世医学院董事、陈笃生医院董事、保良局及华人参事局委员。1912年受封太平局绅。1923年碧山亭举行第一届万缘胜会时担任正总理。

伍连德

Wu Lien Teh (1879-1960)

医生，鼠疫斗士，祖籍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市），生于槟榔屿。1896年获得英女皇奖学金，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医科，以有关破伤风论文考获医学博士学位。1903年返回新马，一度在槟榔屿行医。1907年应清廷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聘，担任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监督（副校长）。1910年奉命赴中国东北扑灭鼠疫。由于执法认真，按科学精神办事，不到四个月，即将鼠疫扑灭，声名大噪，有“鼠疫斗士”之称。曾获香港、上海、美国、日本、苏联授予名誉医学博士或荣誉院士。1911年在哈尔滨设立第一间鼠疫研究所。1913年在北京组织中国第一个医学会，为中国近代西医的奠基人之一。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伍连德返回马来亚，在怡保设立诊所。最后20年在怡保和槟榔屿度过。著有《中国医学史》和《鼠疫斗士》等书。1995年6月，上海举行中华医学会成立80周年暨纪念伍连德博士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伍连德铜像揭幕礼。

吴胜鹏

Ng Sing Phang (1873-1951)

利华银行创办人之一，别号经常，祖籍广东省恩平县，幼年在家乡受私塾教育。1894年移居新加坡，在锯木厂工作，后升任经理。不久创立成源号杉木火锯厂，经营木材生意致富。1923年亚洲保险公司成立时，当选副主席。曾任新加坡华人参事局委员、保良局委员。1918年受封为太平局绅。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粤帮董事凡八届，亦为南洋华侨中学创办人之一。历任新加坡肇庆会馆总理、广惠肇留医院主席。1922年至1948年任同济医院五届董事，四届副主席，八届正主席。

胡文虎

Aw Boon Haw (1882-1954)

企业家、慈善家，祖籍福建省永定县金丰里（今下洋镇）中川村，生于缅甸仰光。10岁返家乡念书。1896年回仰光，后继承父业永安堂制药厂，与其弟胡文豹合作经营。研制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头痛粉四种成药，畅销东南亚各地。1926年将永安堂总行迁至新加坡，1932年在香港成立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并在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各地设立分行。此外胡文虎又进军报业。从1921 年至1952年共创办10多家报纸，包括《仰光日报》、《星洲日报》、《星岛日报》、《星槟日报》、《星暹日报》、《星闽日报》及《虎报》（英文）等，形成星系报业集团。此外又创设崇侨银行与大众保险公司，并在中国云南开采矿产。平生热心公益。1954年赴美求医期间，病逝檀香山。

林师万

Lim Shih Ban (1886-1953)

企业家，祖籍广东省大埔县。幼年入私塾，13岁随父南来，初至砂劳越古晋，习金匠业。15岁到新加坡，在爪哇路（Java Road）与叔父合资创办成丰银店。1904年因生意欠佳收盘。旋就业于南京街（Nankin Street）刘和兴号，积蓄多年后再与叔父合作，于南京街创设林盛丰万记银铺。1914年改营金饰，生意日渐兴隆。1934年在禧街（Hill Street）独资创办林盛丰万记金庄。又创林盛丰分行，扩展营业，设万福当、万禄当、万寿当，成为新加坡金银行巨子。抗战时期，任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客帮分会主任，曾遭日军监禁年余，先后创办启发学校、中正中学。历任启发学校、中正中学、南洋华侨中学董事长，以及新加坡华人参事局、保良局委员。新加坡华人金银业公会会长、南洋客属总会副会长、崇侨银行副董事主席，《中兴日报》董事长。

李珠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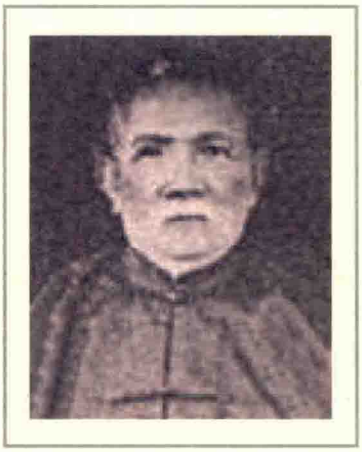
Lee Choo Neo (1895-1947)

新加坡首位华族女医生，为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姑母。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介于今广东省梅州市与福建省永定县之间山区）。年幼时进入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就读。后转入莱佛士女校。1911年考获英国剑桥九号文凭，为第一位取得此文凭的海峡侨生女性。1912年进入爱德华七世医科学校，1919年考获医科文凭，为爱德华七世医科学校出身的第一位女医生。曾受委为新加坡中央医院女助理外科医生，负责照顾二等与三等本地人女病房的病人。1916年与其他40多位华族闻人妻女，为筹款购买“马来亚妇女号”战斗机，献给英国而出钱出力。

李光耀

Lee Kuan Yew (1923-2015)

新加坡建国总理，现代新加坡之父，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自曾祖父李沐文起，世代定居新加坡，李光耀幼年曾就读直落古楼学校（Telok Kurau Primary School）、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及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194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读法律。留英期间，参与争取新马独立活动。1950年8月毕业后返新执业律师，任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同年9月与柯玉芝结婚。1954年10月与杜进才等创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任秘书长。1955年，当选丹戎巴葛区立法议员。1956年和1958年，赴伦敦参与新英宪制谈判。1959年5月，人民行动党在第一次自治邦议院选举中获胜执政，出任总理，时年36岁。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合邦。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建立新加坡共和国，续任总理直至1990年11月。吴作栋继任总理后，改任内阁资政。2011年5月辞去资政职务。2015年2月5日，李光耀患肺炎入中央医院治疗。3月23日凌晨3时18分逝世，享年91岁。李光耀从1959年6月以来，10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连任总理七届，长达31年又5个月。



王绍经

Wee Cheow Keng (1860-1939)

琼帮领袖，祖籍海南省琼海县。1884年南来新加坡，初靠劳力为生。后以200元为资本，与友人合股做布伞生意。继而到柔佛州和印尼山区开设杂货店，并收购各种山货及皮货，运往新加坡及海南岛做制鞋原料，又兼任煤油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实地办产业，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一带购置树胶园和房屋。王绍经在新加坡拥有20多间店屋，为新加坡琼籍百万富翁，也是当年新加坡12位名商之一。曾受清朝政府封为“资政大夫”。历任华人参事局委员、四海通银行董事。1926年创设琼崖王氏祠，任新加坡琼州会馆（今海南会馆）主席、中华总商会及华侨中学董事。育英中学创办时，捐资在校内建立绍经礼堂。其幼子王先德，执业律师，曾任琼州会馆主席。

郭新

Quek Shin (1886-1955)

琼帮领袖，字镜川，祖籍海南省文昌县美丹村，在中国出生。少年时就读乡校，后转赴广州升学。南来后，初在马六甲辅佐其兄经营木薯种植业，并开设木薯粉厂。其后大事垦植胶树，旋在新加坡创设郭新父子有限公司。年轻时参加同盟会，鼓吹革命。1918年被选为马来亚华侨代表出席国民代表大会，并被委为国民政府总统参事。抗日期间，曾为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委员，兼琼侨筹赈主任。历任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主席、世界红卍字会星洲分会会长、新加坡琼州会馆主席、马六甲琼州会馆主席、新加坡育英中学总理、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培群学校董事。柔佛州苏丹赐封他为太平局绅和准拿督（SMJ）。

符致逢

Foo Chee Fong （1898-1975）

琼帮领袖，祖籍海南省文昌县。幼年来新加坡，就读英校。后协助叔父管理神农大药房和树胶园。抗日时期，曾与殖民地政府交涉，使得逃难来新的同乡获准居留。战后又与英国政府交涉，使得战时服务于盟军而牺牲的同乡海员的亲属，获得抚恤。曾耗费十年心血，使得新加坡琼州会馆新大厦终告落成。他担任马来亚琼州会馆联合会（简称琼联会）主席期间，创设琼联会大学奖学金。又广阅史料，纠正巴素博士（Victor Purcell）所著《东南亚华人》一书中有关海南民族的诸多错误。1963年被推举为琼联会有史以来第一位名誉会长。历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华侨中学副董事长、育英中学董事长、马来亚琼州会馆联合会主席、新加坡琼州会馆主席等职。1947年被政府委为华人参事局委员，1962年获颁公共服务星章（BBM）。

叶季允

Yeh Chih Yun (1859-1921)

报人、诗人，原名叶季隐，又名叶懋斌，字季允，号水翁，原籍安徽省歙县。年少时随父母流寓广东番禺，受私塾教育。曾任香港《中外新报》编辑。1881年，《叻报》在新加坡创刊时，应薛有礼之聘，任该报主笔，一干40年，所写社论署名惺垒生。叶季允擅长篆刻，能弹琵琶，又工诗文，精医术，曾出版《医学报》。1906年辞去《叻报》职务，改行医。叶氏也是养正学堂发起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创始人之一。著有《永翁诗存》，被誉为“南洋第一报人”和“南洋一代诗人”。

邵仁枚

Runme Shaw (1901-1985)

电影企业家，原名初章，字仁枚，号山客，祖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1926年与弟邵逸夫前往南洋开拓电影事业，起先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乡村放映露天电影。1928年创立邵氏机构。1930年兄弟俩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经营多间戏院及电影发行。1937年抗战前夕，邵氏在新、马、爪哇、越南等地拥有110多家电影院和九家游乐场。邵逸夫60岁以后犹日理万机，邵仁枚则乐意放权给兄弟子侄，享受个人生活。但富贵不忘善举，邵仁枚于1957年成立邵氏慈善基金会，常年捐钱赈灾敬老恤贫，大部分则用于教育与医疗事业。因此获得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赐颁拿督勋衔。邵仁枚的善举对邵逸夫影响颇大。1980年代后，邵逸夫将善举由新马港台扩大到中国内地，慈善捐款达数十亿元。邵仁枚则捐最大一笔慈善基金300万元给新加坡国立大学，设立丹斯里邵仁枚电脑科学高级教授讲座。

周星衢

Chou Sing Chu (1905-1986)

东南亚华文出版业的推手，大众集团的创办人，祖籍浙江省平湖县，上海出生。因家境贫寒，受过三年的正规教育，便到书店当学徒，但却从此与书籍结下不解之缘。1924年，19岁的周星衢南来新加坡，开设上海正兴公司。最初售卖从上海带来的年画和洋画，生意勉强维持。1934年创办世界书局，从事图书创办和分销。1936年又创设大众书局，专营图书零售。1949年周星衢将业务扩展到香港，先后成立世界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出版不少青少年出版物，推广及弘扬中华文化。1997年大众控股在新加坡上市。2014年，大众书局已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双语连锁书店和教育集团。周星衢的幼子周曾锷为传承父亲推广华族文化语言教育的精神，于2004年成立周星衢基金，以实际行动支持华族文化。

（资料整理：张清江　柯木林）

附录三

重要古迹与文物

遴选准则

- 现存或已消失的古迹
- 国家保护古迹
- 标志性建筑物/文物/遗址

南生花园遗址

Historical Site of "Nam-sang-fa-un" or Whampoa's Garden

南生花园是令人追怀的历史遗迹，位于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花园占地70英亩，内有一座别墅，园中有多种热带的花卉，也有不少热带植物。除了名花奇卉，还有假山、池塘，又开辟兽苑及鸟槛。南生花园乃中国驻新加坡临时领事胡亚基创立，欧人称之为黄埔花园，约建于1840年代，1867年进行扩建。南生花园的全盛时期达30多年之久。胡亚基逝世后16年（1895年），南生花园易主，由佘连城购得，易名“明丽园”。南生花园正门的具体地点于今天的黄埔西路（Whampoa West）大牌29号这位置上。

晚晴园

Sun Yat Sen Villa

位于大人路（Tai Gin Road）12号，1880年代落成，原称“明珍庐”，业主为梅泉宝（Boey Chuan Boh）。1905年潮籍富商张永福购下，供母亲陈宝娘颐养天年，故名“晚晴园”。当年孙中山来新加坡宣扬革命，张永福将晚晴园作为孙中山住所及从事革命的基地。1906年，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也在晚晴园成立。孙中山曾到新加坡九次，其中三次住在晚晴园。如今晚晴园已被列为国家古迹。2011年，政府耗资560万新元修缮后重新开放，并正名为“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东陵振裕园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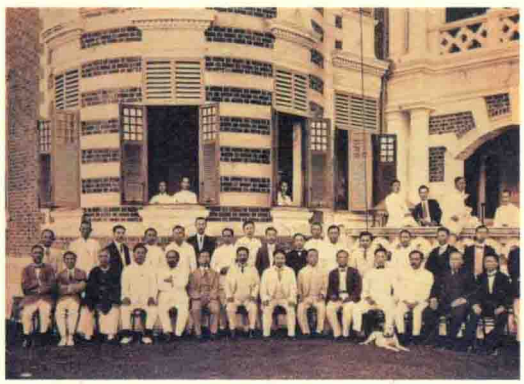
Historical Site of Magenta Cottage

为19世纪中叶闽籍富商李清渊所建立。振裕园共有二处，一在东陵，一在加东。东陵振裕园（Magenta Cottage）购于1882年，地点在现今的基里尼路（Killiney Road）。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来访新加坡曾下榻东陵振裕园（1890年4月及1894年3月）。1896年，华商公所在此商议创办。1901年至1906年招待清朝的贝勒、清廷大臣。1911年李清渊病逝于东陵振裕园。1980年代，盛名一时的振裕园逐渐被淡忘。加东振裕园坐落在安珀路（Amber Road）29号，即今海景华庭公寓（The Sea view）所在地，1902年落成，是李清渊儿子李浚源夫妇的寓所。当年是本地有名的社交平台，不少活动都在此举行。1913年曾于此设宴招待中国驻法国和西班牙的大使。李浚源于1924年病逝，1983年此豪宅被拆除。

梨春园

Lai Chun Yuen Theatre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地方戏剧开始在新加坡兴盛，粤剧班、潮剧班、闽剧班、琼剧班相继南来演出。梨春园为粤剧班演出的场所。粤剧南来以“永寿年班”开始。该班在梨春园开锣。梨春园设在牛车水的史密斯街（Smith Street），俗称戏院街36号，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物，为早期牛车水娱乐中心。1887年便存在，场内的布置模仿中国形式，观众一边品茶，一边观赏表演。20世纪30年代初期，著名粤剧团在此演出，生意兴旺。1941年，邵氏兄弟租下梨春园并改为电影院，取名“新声戏院”。1942年被日军炸毁，战后重建。牛车水区有一条街称为珍珠街上段（Upper Chin Chew Street），俗称豆腐街，此街道横贯于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及新桥路（New Bridge Road）之间，在早期是一条繁华的街道。当年，著名的酒楼、餐馆、戏园、妓院等都集中于此。1912年，新加坡的双林寺、金兰庙、都城隍庙、天福宫联合槟城的极乐寺、马六甲的青云亭以及廖内的妈祖宫等响应中华商务总会所发起的筹募“国民捐”，由僧人表演杂技，在豆腐街口的“新舞台戏园”公开演出，为新加坡的华族历史留下光辉的一页。



金钟大厦

Golden Bell Mansion

坐落于花柏山麓（Mount Faber）秉德路（Pender Road）10号，现为丹麦海员教会（Danish Seamen's Mission）会址。该大厦为陈金钟的孙子陈武烈为纪念其祖父而兴建，于1909年至1910年落成。1911年12月15日（星期五），孙中山回中国就任临时大总统，途经新加坡，就在金钟大厦住了一晚。

资政第

House of Tan Yeok Nee

19世纪下半叶，新加坡四位潮籍富商各拥有“大住宅”，俗称“四大厝”。第一座是陈成宝的故居，在振南街（Chin Nam Street，俗称水仙门）；第二座为佘有进旧宅，位于驳船码头（Boat Quay）；第三座是位于禧街（Hill Street）的黄亚佛“大夫第”；第四座是建于1882年陈旭年的“资政第”。上述四大厝，三座已被拆除，唯一现存的是资政第。资政第坐落在今克里门梭道（Clemenceau Avenue）和槟榔路（Penang Road）交界处，距今约130年的历史。资政第是座潮州式建筑物，历尽沧桑，几度易主。原业主为陈旭年，1902年陈旭年返回中国前易手给铁道局。1903年至1912年，它是火车站长的住宅，而后它成为英国圣公会属下的圣玛丽救济所（St. Mary's Home），1938年，成为救世军总部。1999年起作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Asia Campus）的校址。

虎豹别墅

Haw Par Villa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曾经修建三座私人别墅，都称为“虎豹别墅”或“万金油花园”，分别建在新加坡、香港和中国福建省永定县。新加坡“虎豹别墅”于1937年建立，耗资超过100万元，占地面积8英亩，坐落在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靠山面海，拱形大门。别墅内造假山，建榭亭，塑人物，取材自中国历史人物，神话故事，寓意忠孝仁义，弘扬儒家思想。日治期间，虎豹别墅遭受破坏，光复后重修。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甚为兴盛，游人众多；1988年为新加坡旅游局接管。

广合源猪仔馆遗址

Historical Site of Coolie House at Pagoda Street

广合源街即宝塔街（Pagoda Street），位于牛车水区。广合源街因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一间著名“猪仔馆”广合源号而得名。猪仔馆的旧址，确实位置有不同的说法。一些学者认为是在宝塔街38号和39号（即现在的61号和63号）；第二种说法是在今天宝塔街37号；另一种说法是今宝塔街54号至62号之间。当年，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劳工被贩卖做“契约劳工”，俗称猪仔。他们抵达新加坡后，必须替雇主无薪工作一年，以偿还船费及其他费用，雇主只供给他们住宿在猪仔馆及三餐的饭食，生活悽惨。

维多利亚女皇雕像

Statue of Queen Victoria

在总统府内（即前总督府），于1889年2月26日由时任总督史密斯（Sir Cecil Smith）主持揭幕礼。此雕像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为纪念英国维多利亚女皇1887年登基金禧而捐赠。出席揭幕礼的华社代表有35名。雕像的基座上刻着："此维多利亚女皇的雕像为新加坡华人社会所奉献；作为女皇陛下登基金禧之献礼。侨生社会受惠于女皇陛下之统治，乃献此雕像于总督府内，以志不忘，并表忠心。"这项立像计划的发起人是佘连城。

华人半身铜像

Bronze Bust of a Chinese Pioneer

原竖立在国家博物院门前的华人半身铜像，是纪念早期开拓海峡殖民地有重大贡献的华人。此铜像是一名英国艺术家史德龄（W. G. Stirling）于1939年赠给莱佛士图书博物馆。在铜像石碑上刻着："此华人半身铜像，为艺术家史德龄于1939年寄赠新加坡者，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称。叻屿甲三州暨马来各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者良非鲜浅，史君敬仰此优异之点，乃以此像相赠云"。新加坡开埠的成功华人的贡献不少，这座半身无名华人铜像，正是表扬华族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陈金声纪念喷泉

Tan Kim Seng Memorial Fountain

原本建于浮尔顿广场（在邮政总局与汇丰银行之间），其后始迁到现址海滨公园（Esplanade Park）。这座喷水池是纪念陈金声于1857年1月18日捐助1万3000元，以协助殖民地政府设置自来水。1882年5月19日，由市政局局长史谷特（Thomas Scott）主持揭幕礼。史谷特在揭幕礼上致词说："如果没有陈金声先生慷慨的赠予，我们的自来水供应可能没有这么快实现。新加坡自来水的供应可能要延后才能实现"。陈金声纪念喷泉是一座三层的铁质喷水池，水池的圆形低垣外面以英文刻着："此喷水池为市政局所建，以纪念陈金声先生献款予新加坡兴建自来水工程。"1925年，这座喷水池被移至现址。

林谋盛烈士纪念塔

Lim Bo Seng Memorial

矗立于康乐通道（Connaught Drive）。塔成八角形，连三层，高19英尺6英寸，每层有古铜色瓦面，塔顶刻有"智仁勇"三字。塔台为一八角形石亭，高有4英尺半，塔台四角伴以古铜狮。奠基仪式于1953年11月3日由时任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Malcolm MacDonald）主持。1954年6月29日由英国远东地面部队总司令卢文将军（General Sir Charles Loewen）主持开幕典礼。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1942-1945），驻印度的英军总部组织"136部队"作为反攻的生力军，林谋盛是该部队中的一位华人勇士。1943年11月2日，他乘潜水艇在吡叻安顺登陆从事抗日工作时被捕，1944年6月29日壮烈牺牲。

和平纪念碑

Cenotaph

矗立在海滨公园（Esplanade Park）中央的和平纪念碑，碑基为长方形，正面五级，象征着1914年7月29日至1918年11月11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背面五级则象征自1939年9月3日至1945年9月2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该纪念碑原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124名新加坡烈士（“Our Glorious Dead”），故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在纪念碑的背面加添二战的纪念文字“They died that we might live 1939-1945”，因此又称“二次大战和平纪念碑”。该碑于1920年11月15日由海峡殖民地总督兼英军总司令基里玛爵士（Sir Laurence Guillemard）主持奠基仪式。揭幕礼则于1922年3月31日由英国威尔斯太子（Prince of Wales）主持。

《恒山亭重议规约》

Rules of the Heng Shan Teng Temple

在甘榜峇鲁区（Kampong Bahru）的石叻路（Silat Road）旁的小山丘，早期称为恒山。山坡的一座古庙，建于1828年，这就是管理闽籍漳泉邑人最早的公冢，称为恒山亭。1836年，恒山亭立有“规约五条”，条文用的是当年非常通俗的福建口语，是为该规约的一大特色。例如规约第四条：“凡清明节、七月普渡、中秋佳节，一概不许闲人在亭内及亭外左右，私设宝场，以乱规模。倘有不遵者，请褒黎大狗吗礁来，挪交褒黎主责罪。”这显然是福建话夹杂巫语、英语的句子。“褒黎”即警察（police）；“大狗”为福建话警长的意思。“吗礁”即巫语（mata-mata）意思是警察。这种文句是当年一般侨生所惯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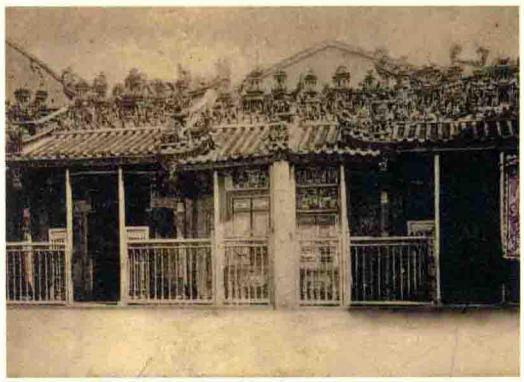
天福宫

Thian Hock Keng Temple（一作 Thean Hock Ke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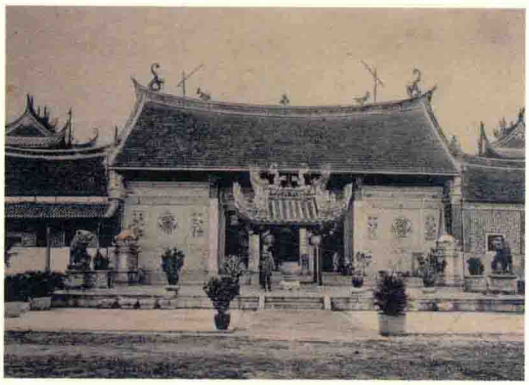
矗立在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俗称源顺街）的天福宫为福建省漳州人、泉州人和永春人所建。1839年开始动工，至1850年落成。这座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其部分建材由中国海运来。天福宫是新加坡闽籍人士历史最悠久的庙宇之一。这是继恒山亭之后福建帮的总机构，也是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前身。天福宫正殿崇祀天后，殿之东堂供奉关圣帝君，殿西堂祀拜保生大帝，殿后寝堂崇奉观音大士。天福宫落成后，南来或北归的航海者，都会把船舶停在宫前，然后到宫内祭拜航海守护神天妃。如今天福宫已成为游客必到的胜地。

粤海清庙

Wak Hai Cheng Bio Temple



位于菲立街（Philip Street，俗称老爷宫口），是最古老的潮州人庙宇。该庙建于1826年之前，比天福宫（1840年）还要早。据潘醒农所述，该庙初时只是一所亚答屋，1820年代在现址有一个神堂，1852年至1855年间扩建，由林泮等筹建。庙宇为潮州式建筑，古色古香，建材部分由中国运来，主要技工也聘自中国。粤海清庙分为左右两祠，左祠曰“天后宫”，供奉天后圣母，右祠曰“上帝宫”，供奉玄天上帝。该庙俗称“老爷宫”，粤籍人士称它为“孖庙”。粤海清庙为义安公司的产业。现存“曙海祥云”一匾，系清朝光绪帝的“御笔之宝”。2014年重修，并于该年3月31日举行竣工仪式。



双林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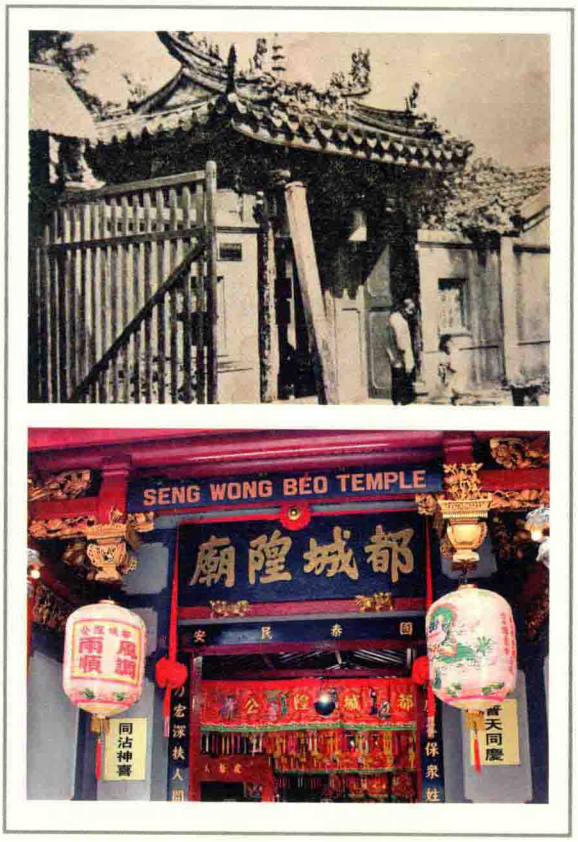
Shuang Lin Monastery

位于金吉路（Kim Keat Road），由福建省南靖县人慈善家刘金榜捐建。自光绪廿四年（1898年）动工，到光绪卅三年（1907年）前后九年，耗资近50万元，工程尚未完成。至1909年始完工，为新加坡著名的佛寺，仅次于槟城的极乐寺。1918年至1920年，刘金榜五子刘启祥重修。此后，又分别在1935年，1950年及1974年多次重修与扩建。双林寺早期乃由中国名师巧匠，仿闽东古刹兴建，建材部分由中国运来，它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中国式建筑物。双林寺的开山祖师为贤慧禅师。

都城隍庙

Temple of City God

坐落在柏城街（Peck Seah Street）。该庙乃由瑞于上人（俗姓黄，原籍泉州，前清贡生）及“星洲寓公”邱菽园等于1905年建立。庙正殿奉祀城隍神，左边供奉白虎大将，右边有两个神坛分别供奉注生娘娘和文判官等神祇。庙中现存匾额多幅，其中一幅为清朝派驻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手书赠匾“聪明正直”，立匾时间为1907年。



凤山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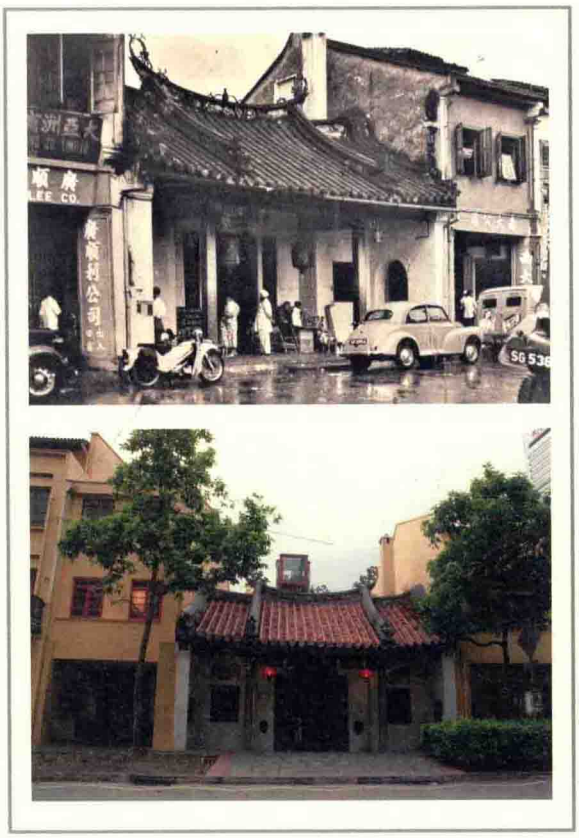
Hong San See Temple

建于1836年，寺址在丹戎巴葛路（Tanjong Pagar Road）青山亭，由南安人领袖梁壬癸创立。原本是一座小寺庙。1868年，由大董事蔡鹏南等发起重修。1907年殖民地政府为了改建市区，乃令该寺迁移，获赔偿5万元，由林露（林谋盛烈士之父）等负责建新庙。1908年新庙宇在摩哈末苏丹路（Mohamed Sultan Road，俗称水廊头）的因士迪丢申山（Institution Hill）兴建，1913年竣工。该寺为闽南泉州式建筑，庄严华丽。供奉的主神为广泽尊王。1926年南安会馆成立前，凤山寺是新加坡南安人的唯一组织。

海唇福德祠

Fuk Tak Chi Temple

早年直落亚逸街是大海堤岸。约在1820年，一位姓陈长者的尸体在堤岸被发现，居民捞起葬于岸边。因前来拜祀者众，广客七属人便集资于1824年建祠，名曰“福德祠”，作为七属人士共同的组织。由于该祠建于“海唇”地带，所以称为“海唇福德祠”。初建时庙宇规模很小，到1869年闽帮领袖章芳琳昆仲捐出边海一地段，经过扩建后才有今日的规模。该祠是广、客、潮三帮共同奉祀的庙宇，但闽籍人士也颇为敬仰。这是新加坡最古老的福德祠（俗称大伯公神庙）。庙内道光甲申年（1824年）的“赖及遐陬”匾额，更是新华史上最早的文物之一。



崇文阁

Chong Wen Pavilion

在直落亚逸街天福宫的左殿，1849年由闽帮领袖陈金声创办，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私塾，比萃英书院（1854年）还早五年。1880年，陈金声的哲嗣陈宪章捐巨金重修。崇文阁后为崇福女校的校址。

萃英书院

Chui Eng Si E Public School

故址在厦门街（Amoy Street）131号。1854年，由闽帮领袖陈金声创立，是当年华人社会的启蒙教育所在，历时100年，1954年停办。萃英书院崇祀“文昌帝君”与“紫阳夫子”，都是中国旧社会的文化神。萃英书院所教授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之类的课文。

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

Memorial of Nanyang University

1953年1月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提议倡办南洋大学。陈六使率先认捐500万元，福建会馆则捐献裕廊云南园500余英亩地作为校址。1953年5月，南洋大学在公司法令下注册，即成立南洋大学委员会，由陈六使担任主席。马来亚各地亦成立分会，展开筹款事宜。1953年7月兴建校舍，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学，1958年3月30日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举行揭幕礼，由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与南大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共同主持。此纪念碑已被列为受国家保护古迹。

南洋华侨中学

The 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

创立于1919年，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中学。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即今华侨中学）乃由陈嘉庚联同养正学堂等16间学校总理发起创立。陈嘉庚首捐3万元作为倡导，在各帮侨领的捐献下，总共筹募得49万4000多元。陈嘉庚被选为首任总理，副总理吴胜鹏，财政林义顺。初期校舍设在小坡尼文路（Niven Road）陆寅杰洋楼，1919年3月21日正式开学。1923年进行筹建武吉知马路新校舍。

庆德会

Keng Teck Whay

位于直落亚逸街150号，1831年创建。该会正厅中供奉长生禄位。长生禄位中的石碑刻着35位创会先贤的名字（另一位创会人陈坤水的名字未刻在石碑上）。该会为来自马六甲的漳州、泉州中介商的互助性质的组织。创会时每位会员缴交入会基金100洋元。如果会员不幸离世或生意失败，该会将在经济上支援其家属。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原名“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由中国南洋商务大臣张弼士倡议，经吴寿珍、林秩荣、王会仪、曾兆南等推动于1906年3月15日正式成立，1915年改名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初期租赁禧街“大夫第”为会所，1911年向原屋主黄亚佛购下作为永久会所。1961年1月，旧会所拆除，1962年9月15日，举行奠基礼。新会所大厦于1964年9月20日由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主持开幕典礼。

应和会馆

Ying Fo Fui Kun

创立于1822年5月5日，创办人刘润德，为嘉应五属（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平远）同乡的地缘性组织。应和会馆坐落在直落亚逸街，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物。190多年来，曾经多次修复。客籍先贤创会系秉持“恪守温恭和衷共济，毋得各存私见”，故称“应和馆”。1905年应新学校于馆舍内创建。

宁阳会馆遗址

Historical Site of Ning Yeung Wui Kuan

1819年曹亚志创立曹家馆，故址在劳明达街（Lavender Street）1号，为最早的血缘性组织。最早的地缘性组织为宁阳会馆，成立于1822年。初称“宁阳公司”，1848年重修后改为“宁阳馆”，1894年重修，更名“宁阳会馆”。该馆也是由曹亚志所创立。初创时会所为亚答屋，重建后成为古色古香的馆宇，但在1962年拆除，1966年在原址重建一座巍峨壮观的五层楼大厦（今135, South Bridge Road）。1970年9月27日新厦举行落成典礼。1981年会馆接获市区重建局的征用通令，大厦被拆除，于1984年获赔偿106万元。1993年会馆迁至安祥路所属楼宇为会所，并于1994年举行新会所开幕暨成立172周年会庆。2005年始购下芽笼（Geylang）8巷72号的现有会所。

醉花林俱乐部

Chui Huay Lim Club

这是新加坡的俱乐部中历史最悠久者。创立年份无可查考，但相传系成立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并于1890年5月2日向社团注册局注册。该俱乐部由潮籍商人陈成宝创立，并以庆利路190号（亚答屋）为所址。陈成宝逝世后，由陈永锡、王石榴、吴合弟、陈亚雨等及刘荣丰号10人，捐资向陈成宝家属购买该地进行重建。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俱乐部损坏不堪，1945年由李合平等捐资修复，2007年11月再度重建，始有今日之规模。

威基利俱乐部

Singapore Chinese 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

社址在客纳街（Club Street，俗称大门楼）76号，由林文庆于1891年创立。该俱乐部拥有一座华丽宽敞的会所，是当年海峡华人唯一有资产的俱乐部。会员是海峡华人社会中的精英分子。李浚源曾长期担任会长，胡文虎于1895年也担任过会长。

吾庐俱乐部

Goh Loo Club

初名“古寄乐”，1905年前后成立。初址在克罗士街（Cross Street，俗称吉宁街）124-A号，后迁至客纳街今址。1907年始改为今名。由前清驻新加坡领事孙士鼎及陈卓然等创立。会员多数为闽帮富商，领导人亦为闽籍著名领袖，如薛中华、陈祯祥、黄奕住、邱国瓦、胡先愿、陈延谦、陈六使、高德根、黄桂楠、陈笃山、唐裕等。

怡和轩俱乐部

Ee Hoe Hean Club

战前怡和轩已是一间著名的华商俱乐部。1895年10月18日海峡殖民地政府宣布怡和轩为豁免注册社团，因此成立年代当于1895年之前。担任怡和轩秘书多年的林云认为，怡和轩是林和坂（林秉祥之父）、陈祯祥（陈振传之父）、李清渊（李浚源之父）、林推迁、陈若锦、陈明源、颜永成、林文庆等创立。该俱乐部原址在达士敦山（Duxton Hill）28号，而后迁至客纳街38号，1925年才迁至现址武吉巴梳路（Bukit Pasoh Road）门牌43号。在1968年、1975年、2006至2008年，怡和轩曾数度重修。抗日期间，该俱乐部主席陈嘉庚于1928年倡组“山东筹赈会”，1937年成立的星华筹赈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办事处都设在怡和轩。它虽非政治团体，但其成员都是爱国爱民的精英分子。

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

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于1936年正式创设。1963年当新加坡合并于马来西亚时，新加坡的中国银行面临关闭厄运。1965年新加坡独立，始得继续营业。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设在百得利路（Battery Road），另有五间支行分别设在余东璇街（60, Eu Tong Sen St）、麦士威路（20 Maxwell Road，2014年5月关闭）、密驼路（133, Middle Road）、东海岸路（188-192, East Coast Road）及淡滨尼（10, Tampines Central）。

华侨银行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1919年6月28日创立，董事长为林文庆。1929年至1932年期间，世界经济不景气，无数历史悠久的银行关闭。当时新马两地的银行亦受波及。华侨银行、华商银行及和丰银行为了共同利益乃于1932年10月31日合并为华侨银行有限公司，首任董事主席为徐垂青。该银行于1933年1月2日正式启业。华厦大楼于1932年落成，原本为华商银行与华侨银行所共有，后来，华侨银行有限公司继承了三家银行，它即成为华侨银行有限公司的总办事处。

侨通行遗址

Historical Site of Kiaw Thong Enterprise Limited

1938年4月由闽籍林树彦创立，行址设在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53号，经营汇兑业。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该行停业。战后复业，分行分布中国各地，香港、马来亚、印尼、砂劳越、印尼等地约有25间。1948年成立“侨通企业有限公司”。1953年起，民信业处于麻痺状态。其后，该行转营中国土产货物出入口及本地与邻国的转口贸易。

再和成（伟记）汇兑信局

Chye Hua Seng (Wee Kee)

创立于1910年代，创立人李伟南，总行在新桥路（New Bridge Road，俗称大坡二马路）33号，有分行多家，中国汕头和香港亦有分行或代理处。它是潮帮著名的汇兑信局，历史悠久。

人力车总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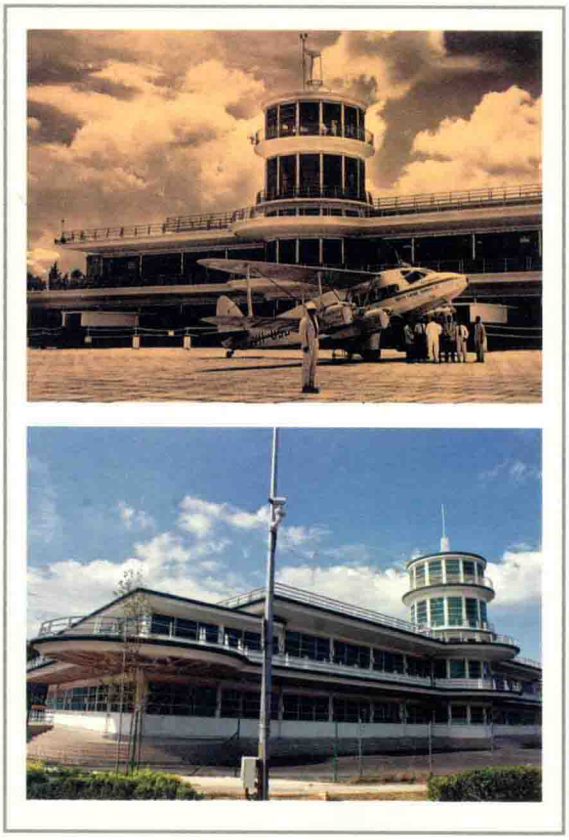
Jinrikisha Station

故址在尼路（Neil Road）与丹戎巴葛路（Tanjong Pagar Road）交界处，1904年竣工。人力车于1880年代由上海传入新加坡。1888年政府设立人力车总局，用以登记注册人力车及其业者。人力车是早期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但1925年无轨电车（Trolley Bus）在新加坡启用后，人力车便逐渐减少。二战结束后，三轮车成为普遍交通工具，人力车走进了历史。

旧加冷机场

Old Kallang Airport

故址在加冷河（Kallang River）河口，是早期主要民用航空机场。填土工程于1931年开始，1937年6月12日机场落成，由汤姆斯总督（Sir Shenton Thomas）主持开幕典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冷机场成为东南亚航空中心。后因加冷机场跑道不够新型飞机使用，政府便计划开辟巴耶利峇机场，加冷机场于1955年关闭。1960年加冷机场大厦曾一度改为人民协会总部。



丹戎巴葛火车站

Tanjong Pagar Railway Station

1903年创立，初期火车站设在登路（Tank Road）。丹戎巴葛火车站于1929年兴建，1931年底落成，1932年5月2日由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文泰主持开幕仪式。1932年1月2日至10日，火车站大厦曾举办“实业展览会”。新加坡的火车服务于1903年1月1日开始。自从2011年7月1日起，由马来半岛南下的火车终点改在兀兰火车站，丹戎巴葛火车站便完成了历史使命。

福特汽车厂

Ford Factory

故址坐落在武吉知马路（Bukit Timah Road）。1942年2月15日，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Lt General Arthur Ernest Percival）与属下军官持英国国旗和白旗到福特汽车厂内的日军总司令部，向日军第25军总司令山下奉文中将（Lt. General Tomoyuki Yamashita）投降。投降书于当晚7时半签署。从此，新加坡被日本统治了三年八个月，并改名昭南岛。1945年9月15日新加坡光复。2006年2月16日国家档案馆在厂内设立的“昭南福特车厂纪念馆”宣告开幕。

《叻报》馆遗址

Historical Site of Lat Pau

《叻报》创刊于1881年12月10日，创办人为受英文教育的侨生薛有礼。《叻报》是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以报纸形式出版的华文日报，1932年3月31日停刊，前后出版了51年，为早期新马华文报中历史最悠久者。《叻报》的立场属于保守派，支持满清政府。该报首位总编辑叶季允前后主持笔政40年，被誉为“南洋第一报人”。初期社址设在罗弄直落（Lorong Telok），后迁至马六甲街（Malacca Street）及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

同德书报社

Unite Chinese Library

1910年成立，1911年8月8日正式注册，孙中山亲自取名为“同德”，即一心一意，共同提供书报，启迪民智。该社乃同盟会党员奉孙中山之命所组织，创立人为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旨在启发民智、宣扬革命、推翻满清，是早期新加坡国民党人的活动中心。该社创立初期社址在里峇峇利路（River Valley Road，俗称水廊路）。民国元年，始租亚米尼亚街（Armenian Street）51号为社址，现址在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

同济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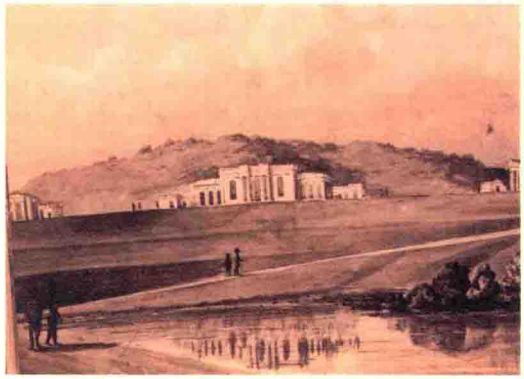
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

前身为同济医社，创立于1867年（本地历史学家陈育崧考证为1885年），发起人为何道生、梁炯堂等。医社以中医中药，为“贫病无力延医者”诊病，不收医资，故名“同济医社”。原址在毕麒麟街上段（Upper Pickering Street，俗称单边街）。金文泰总督（Sir Cecil Clementi Smith）于1892年11月14日正式颁布赠地令，将哇央街（Wayang Street，俗称同济医院前）至纽马吉路（New Market Road，俗称奉教街）一块面积8380方英尺的地段赠予该医社，作为建立新社之用。1892年，新医社大厦落成后，改称“同济医院”，该院故址已被国家古迹保存局列为受保护的建筑物之一。1976年该院迁至振瑞路（Chin Swee Road）新建的同济大厦。

陈笃生医院

Tan Tock Seng Hospital

1844年7月25日在珍珠山（Pearl's Hill）奠基，由陈笃生独捐工程建筑费5000元，J. T.汤申（John Turnbull Thomson）设计及督建。1852年，陈笃生哲嗣陈金钟又捐献3000元予该院作为增添设备之用。1856年，殖民地政府征用该院原址兴建军营，该院乃迁至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与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交界处附近，即今广惠肇留医院所在地。1909年，陈笃生医院再迁到摩绵路（Moulmein Road）现址。



广惠肇留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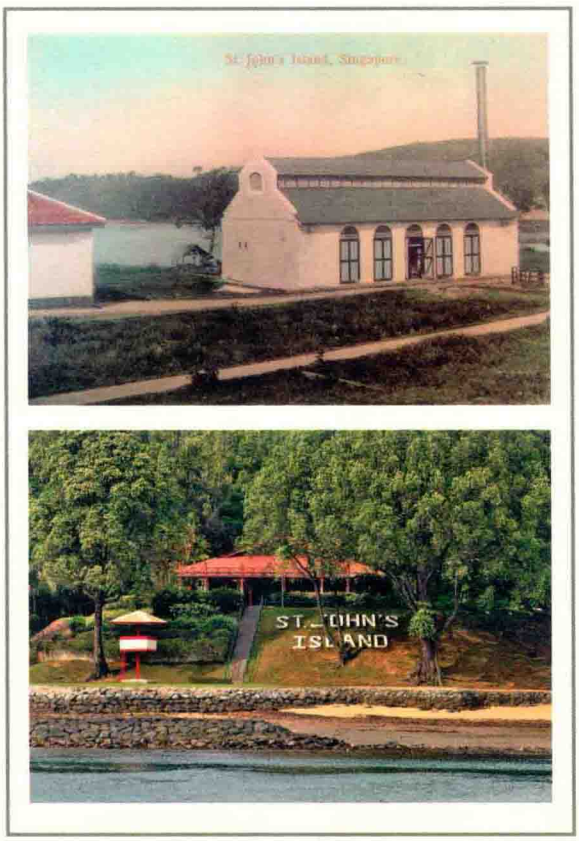
Kwong Wai Shiu Free Hospital

位于实龙岗路与马里士他路交界处。1910年前，新加坡没有一家私人医院（同济医院创立于1867年，但它是施医赠药的医院，并没有病人留院医治；陈笃生医院于1844年创立，但已成为政府医院）。华民护卫司仍向华署总翻译兼帮办何乐如探询设立一家私人医院的可行性。何君献议邀广肇两帮领袖商议。华民护卫司即请黄亚福与梁敏修磋商。黄梁两位接受建议，并进行筹办，先筹得1万元，嗣后又得邱雁宾、吴胜鹏、陆寅杰协助推动，在短期间内筹得5万元。但落实创立医院计划，实非三几人之力量，遂扩大组织，广邀广惠肇人士共创，并得三帮同人热烈支持，筹足10万元，遂向政府租下现有院址，以99年为期，每年租金1元。广惠肇留医院于1910年正式成立，聘用中医师，应用中药为病黎服务。该留医院已逾百年历史，其间多次重修与扩建，始有今日之规模。

棋樟山检疫站

Quarantine Station in St. John's Island

华人俗称棋樟山的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位于新加坡本岛南部。1819年1月19日莱佛士的船队为寻找商站，自槟榔屿开向马六甲海峡，同年1月28日抵达新加坡岛外，停泊在棋樟山附近，1月29日始登陆新加坡岛。开埠后，凡是入口的船舶都得先在该岛停泊。1873年发生霍乱，政府在在棋樟山设立检疫站，所有抵境人士移民必须在检疫站接受检疫方可准许登陆新加坡本岛。



约翰斯顿码头（然申码头）

Johnston Pier

约翰斯顿码头，或称然申码头，故址在前邮政总局（即浮尔顿大厦，Fullerton Building）前面海岸，建于1854年初，1856年3月13日完工。它是莱佛士的挚友亚历山大·罗里·约翰斯顿（Alexander Laurie Johnston）出资所建，是早期主要的登陆处。1933年6月3日，克利福码头（Clifford Pier，俗称红灯码头）建成始被拆除。

驳船码头

Boat Quay

19世纪20，30年代称为“Public Quay”，1846年才改称“Boat Quay”（吻基）。“Boat Quay”在华人有不同的称谓：十八溪墘、柴船头、十三行等。驳船码头为现今的正式称谓。自从新加坡成为自由贸易港后，新加坡河岸的驳船码头是货物起卸站。驳船业者自停泊在海港内的船只把货物起卸在舢舨上，沿新加坡河运入，在驳船码头起货而存放在沿岸的货仓内。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加坡河岸的驳船业逐渐没落。1977年，新加坡政府制定“十年清河计划”，改变了新加坡河的命运。自从驳船被令搬到巴西班让新驳船码头后，再看不到驳船在新加坡河川行，而沿岸的货仓也改为餐室和酒吧。

莱佛士登陆地点

Landing Site of Raffles

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于1971年研究，1971年11月3日正式宣布：1819年1月28日下午4时，新加坡开埠人莱佛士爵士首次上岸的地点，是靠近新加坡河口，介于国会大厦后面与皇后坊民事地方法庭后面之间的沿岸地方。又有一说：莱佛士当年登陆是在梧槽河口，那是因为当年随莱佛士南下的曹亚志在梧槽河口上岸，首先竖立英国国旗的位置是曹家馆故址的所在。

安祥山古井

Old Well at Ann Siang Hill

安祥山在客纳街（Club Street，俗称大门楼，闽人称为翠兰亭），系纪念闽籍企业家谢安祥。谢安祥的产业不少，安祥山为其中之一。安祥山公园内有一口古井，为早期有自来水供应之前，大门楼一带居民汲取食用水的水井。此古井和“牛车水”地名有密切关系。当年，人们利用牛车把井里的水装在水桶运到街上贩卖；“牛车水”因此得名。新加坡于1878年开始供应自来水后，这口古井便成了废井。

（资料整理：吴华　杨茳善）

附录四　参与撰写本书作者

章	节	题目	作者	学术简历
第一章		**海疆殊域** —古代新加坡	吴庆辉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研究员
第二章 移民与早期贸易	第一节	**乘风破浪下南洋** —早期华族移民浪潮	崔贵强	曾任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
	第二节	**风帆时代的新加坡** —开埠初期的中国帆船贸易	吕世聪	石叻学会会长
			李业霖	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
第三章 新华社会	第一节	**神权·绅权·帮权** —帮权结构与帮权政治	林孝胜	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长
	第二节	**闽帮精神** —从恒山亭到福建会馆	林孝胜	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长
	第三节	**广客帮总机构** —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公所	曾玲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四章 清廷与华社	第一节	**八方风雨会星洲** —晚清官员访问新加坡	崔贵强	曾任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
	第二节	**我视新州成旧州** —中国驻新加坡领事	林孝胜	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长
	第三节	**顶戴花翎** —晚清“售卖官衔制度”与新加坡华人	颜清湟	澳洲阿德莱德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四节	**晚晴园内外** —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华社会	陈丁辉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
第五章 迁民社会与峇峇社会	第一节	**泽被功敷** —华族领导层与其政治变革	杨进发	曾任澳洲阿德莱德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二节	**义结金兰** —华人秘密结社的演变	麦留芳	社会学教授（香港）
	第三节	**一櫂冲开瘴海烟** —新华“士”阶层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
	第四节	**海门奇葩** —峇峇文化	黄慧敏	曾任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研究员
	第五节	**峇峇双杰** —林文庆与宋旺相	李元瑾	曾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

章	节	题目	作者	学术简历
第六章 报业文化	第一节	**南渡衣冠　各领风骚** —战前新加坡华文日报	崔贵强	曾任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
	第二节	**从百花齐放到一枝独秀** —战后新加坡华文日报	崔贵强	曾任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
			张　静	中国国立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第七章 儒学与宗教	第一节	**浮海居然道可行** —新加坡的儒学运动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
	第二节	**三教合一** —儒释道在新加坡的发展	徐李颖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第八章 出版物与文学	第一节	**华风远被** —开埠以来的华文出版业	李金生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
	第二节	**与君话冷炎州月** —新华古典文坛	柯木林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第三节	**蕉风椰雨文学** —新加坡华文文学	杨松年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第四节	**东方红** —左翼文学的文革潮	朱成发	《联合早报》审版主任
第九章 风雨华教	第一节	**开智启蒙　薪尽火传** —从华文教育到华文教学	梁秉赋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第二节	**华语还是方言** —讲华语运动	郭振羽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创院院长
第十章 文化与艺术	第一节	**南洋画风** —早期新华社会与南洋美术的形成	张夏帎	曾任吴冠中美术馆馆长
	第二节	**唱尽人间喜与忧** —新加坡的表演艺术	蔡曙鹏	新加坡新跃大学高级研究员
	第三节	**影视百年** —华语电影与电视剧的发展	叶舒瑜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员
第十一章 家书抵万金	第一节	**侨汇·侨批·民信业**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	柯木林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第二节	**华侨特有的专递服务** —各帮信局及其行业组织	李志贤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副教授
第十二章 经济活动		**经济活动** —华商与华资银行	林孝胜	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长
第十三章 四海同心 义薄云天		**四海同心 义薄云天** —抗日救亡运动	林孝胜	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长
第十四章 昭南岛的沧桑		**昭南岛的沧桑** —华侨“排斥论”与“利用论”交织下的军政	蔡史君	曾任日本津田塾大学教授

章	节	题目	作者	学术简历
第十五章 政治运动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在新马** —其兴衰、贡献与影响（1912-1949）	杨进发	曾任澳洲阿德莱德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二节	**默迪卡** —独立斗争二十年	陈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第十六章 建国之路	第一节	**选贤任能** —历届大选与政治演进	林金圣	新加坡政治研究学者
	第二节	**因时制宜** —独立后的国策与社会变迁	陈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第三节	**经济转型的新加坡** —回顾、反思与展望（1965-2020）	陈企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
			郭明忠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刘丹彤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
	第四节	**现代新加坡之父** —耀眼的华人政治家李光耀	严孟达	曾任《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林孝胜	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长
第十七章 缘聚岛国		**缘聚岛国** —当代新移民	欧雅丽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杂志《源》（双月刊）编辑
第十八章 两百年来谁著史		**两百年来谁著史** —回望新加坡华人研究	崔贵强	曾任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
附录一		**新加坡历史大事记**	林孝胜	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长
附录二		**新华先贤五十名**	张清江	资深翻译工作者
			柯木林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附录三		**重要古迹与文物**	吴华	新马会馆史料学者
			杨茳善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建筑与可持续设计系助理教授

附录五　主要参考资料

A 中文著述

- 巴素著、郭湘章译，《东南亚之华侨》，台北：国立编译馆，1966年
- 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1940年
- 彼岸，《响雷》，新加坡：高峰出版社，1970年
- 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2年
- 蔡新，《缉斋文集》（卷4），乾隆刻本
- 曹蓉主编，《开卷有益、润物无声：东南亚早期华文课本图示目录》，新加坡：周星衢基金会、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大众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出版，2014年
- 仓沢愛子编，《東南アジア史の中の日本占领》，日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1年
-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
- 陈国贲、张齐娥著、王业龙译，《出路—新加坡华裔企业家的成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
- 陈楚楠，《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40年
-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编撰，《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陈剑，《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2年
- 陈剑主编，《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年
- 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
- 陈伦新，《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人民生活出版社，1976年
- 陈蒙鹤著、胡兴荣译，《早期新加坡华人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年
- 陈鸣鸾，《丹戎巴葛华族社会结构初探》（*Tanjong Pagar: Singapore's Cradle of Development*）Singapore: Tanjong Pagar 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1986
- 陈企业、陈光炎、刘琳达，《全球103个主要城市外派人员与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工资与购买力年度指数，2005-2013》，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集团出版发行，2015年
- 陈企业、刘琳达、陈光炎、林莉娟，《东盟10国年度竞争力分析，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2000-2010》，伦敦：培生教育出版集团，2013年。
- 陈荣照主编，《南洋学会出版书刊总目（1940-2010）》，新加坡：南洋学会，2010年
- 陈淑珊，《吴庆瑞传略》，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0年
- 陈维龙编著，《新马注册商业银行》，新加坡：世界书局，1975年
- 陈其新，《陈宗瑞文集》，新加坡：陈其新，2010年
-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 陈映真等著，《新马文学史丛谈》，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1999年
- 陈育崧，《南洋第一报人》，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1958年
-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
- 陈育崧、陈荆和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0年
- 陈育崧、魏维贤、许苏我编，《椰阴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年
- 陈植，《海南岛新志》，中国：海南出版社，2004年
- 陈支平主编，《福建宗教史》，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 陈支平主编，《闽南海外移民与华侨华人》，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
- 陈宗瑞，〈四十年来新加坡艺坛回顾〉，《艺术协会双庆画刊》新加坡：新加坡艺术协会1969年
- 传发，《新加坡佛教发展史》，新加坡：佛教居士林，1997年
- 崇汉，《金光道上》，北京：人民文艺出版社，1974年
- 崇汉，《在风雨中》，北京：人民文艺出版社，1975年
- 崇汉，《走在闪耀的路上》，新加坡：热带出版社，1999年
-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纂委员会编，《大战与南侨》，吉隆坡：隆雪中华大会堂，2007年（翻印）
- 崔贵强，《新马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
- 崔贵强，《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新加坡：华裔馆、南洋学会，2002年
-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年
- 崔贵强，《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新加坡：海天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
-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变（1945－1959）》，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
-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 崔贵强主编，《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新加坡：美都出版社，2010年
- 崔贵强、古鸿廷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年
- 大谷敬二郎，《宪兵—自传的回想》，日本：新人物往来社，1973年
-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 大西觉，《秘录昭南岛华侨萧清事件》，日本：金刚出版社，1977年
- 戴光中，《浙江籍港台巨商》，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蒂凡那编，《社会主义的实现——新加坡之路》，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76年
- 《东南亚六百名人传》
- 冬琴，《在宿舍里》，新加坡：而今出版社，1974年
- 杜南发主编，《南海明珠天福宫》，新加坡：福建会馆，2010年
- 吴岸，《盾上的诗篇》，新加坡：新月出版社，1962年
- 方水双，《方水双回忆录》，新山：陶德书香楼，2007年
- 方修，《胡愈之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年
- 方修，《马华文坛往事》，新加坡：星云出版社，1958

年

- 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吉隆坡：董总出版，1987年
- 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年
- 方壮璧，《方壮璧回忆录》，雪兰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年，2007年（再版）
- 费信，《星槎胜览》，上海：中华书局，1954年
-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3年
- 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
-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中国：海洋出版社，1987年
- 傅吾康、陈铁凡，《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
- 傅无闷等编辑，《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1939年
- 福崎久一编，《华人·华侨关系文献目录》，东京：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1996年
- 郁树琨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1951年
- 高刻等，《下乡》，中国：风雷出版社，1971年
- 高维廉，《马来亚侨汇及中马贸易之展望》，新加坡：中南联合出版社，1950年
- 龚鹏程、杨松年等编，《21世纪台湾、东南亚的文化与文学》，台北：南洋学社，2002年
- 龚缨宴，《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中国：东方出版社，1999年
-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年
- 管雪梅，《回忆廊》，新加坡：连星娱乐制作有限公司，2009年
- 广东省地名委员会，《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中国：广东地图出版社，1987年
- 国际出报社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新加坡：《国际时报》，1969年
- 国难资料编辑社编，《日本大陆政策的真面目》，上海：生活出版社，1937年
-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二），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
-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 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1971年
- 郭伟川，《岭南文库：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 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之五），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
- 《海南移民论文集》，新加坡：海南文化研究中心，2013年
- 潘翎主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8年10月
-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
- 贺尔（G. T. Hare）主编，《三州府文件修集》，新加坡：政府印务局，1894年
- 贺丁，《抗战歌集》，新加坡：C. F. Liam，2010年

- 黑田秀俊，《军政》，日本：学风书院，1952年
-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
- 胡愈之，《我的回忆》，中国：江苏省人民出版社，1990年
- 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台北：华侨协会总会，1999年
- 华侨村史调查小组，《星马的开发与华族移民》，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学系，1970年
- 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检讨与建议》，新加坡：新加坡教育部，1992年
- 黄爱玲编辑，《国泰故事》，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9年
- 黄爱玲编辑，《邵氏电影初探》，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3年
- 黄爱玲编辑，《现代万岁：光艺的都市风华》，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6年
-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新加坡：新加坡国家语文局，1965年
- 黄竞初，《南洋华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 黄美萍，钟伟耀，林永美编，《新加坡宗乡会馆出版书刊目录》，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07年
- 黄佩萱著、张清江译，《移民、建筑商、企业家：黄亚福传》，新山：广肇会馆，2010年
- 黄庭康，《比较霸權：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台北：群学出版，2008年
-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
- 《黄奕欢对南洋大学的贡献》，新加坡：新加坡文献馆，2009年
- 黄枝连，《马华社会史导论》，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1年
- 纪宝坤、崔贵强编，《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新加坡：华裔馆，2000年
- 新加坡艺术剧场会员集体创作，《第二次奔》，新加坡：英雄出版社，1973年
- 今富正巳，《马来亚华文文学的高潮和低潮》，东京：三冬社出版，1992年
- 今富正巳，《马华文学在抗战初期的一些问题》，东京：三冬社出版，1992年
- 今堀诚二（Seiji Imahori）著、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人社会》，槟城：嘉应会馆，1972年
- 蒋祖缘，《简明广东史》，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1993年
- 蒋祖缘，《广东航运史》，中国：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 可儿弘明，《猪花—被贩卖海外妇女》，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 柯木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
-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年
-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
- 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
- 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

- 槐华，《半世纪的回眸》，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 槐华，《缪斯喜悦的回音》，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
- 槐华，《文艺卫兵歌》，新加坡：赤道诗刊社，1971年
- 赖宏主编，《第六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潮州同乡会，2005年
- 冷东，《东南亚海外潮人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
-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
-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
- 李恩涵，《曾纪泽外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
- 李复雪，《泉州湾宋代海船上贝类的研究》，中国：海洋出版社，1987年
- 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现代出版社，1994年
-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年
-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11年
- 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新加坡：文化部出版，1961年
- 李曼峰，《李曼峰画集》，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84年
-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李拾荒编，《近代马华诗歌选集》，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76年
- 李雪涛主编，《出使四国日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 李业霖主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7年
- 李亦园、郭振羽主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
- 李盈慧编，《官方公报的华侨史料1911年－1916年》，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2012年
- 李玉梅著、李发沈译，《昭南：新加坡在日本统治下，1942-1945》，新加坡：传统协会出版，1992年
-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响应》，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1年
- 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0年
- 李元瑾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等，2002年
- 李钟钰，《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年
- 李焯然等编，《道教简述》，新加坡：道教总会，1994年
- 《莲山双林寺》，新加坡：莲山双林寺，2001年
- 梁廷枏、袁钟仁点校，《粤海关志》，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 梁元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5年
- 廖金凤等编著，《邵氏影视帝国：文化中国的想像》，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
- 林枫，《闽南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林任君编，《我们的七十年》，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1993年
- 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
- 林水檬、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
- 林纬毅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年
- 林我铃，《龙牙门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9年
- 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
- 林孝胜，《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新加坡：福建会馆，2005年
- 林孝胜，《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新加坡：青年书局，2010年
-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
- 林孝胜、柯木林等合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
- 林孝胜、林源福编，《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联合出版，1987年
- 林孝胜、林源福、柯木林编撰，《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新加坡：新加坡新闻与出版公司，1986年
- 林一叶，《从战场到茶场》，香港：见证出版社，2006年
- 《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 刘泽彭主编，张应龙、徐云副编，《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刘杰等，《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 刘抗，《刘抗文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私营有限公司，1981年
- 刘抗，《文集新编》，新加坡：新加坡美术馆，2011年
- 刘彦，《中国外交史》，台北：三民书局，1962年
-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 罗香林，《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
- 吕思勉，《中国通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
- 吕世聪、洪毅翰，《投桃之报—万山港福德祠历史溯源》，新加坡：石叻学会，2008年
- 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下卷）：和谐社会是怎样建立的》，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 玛戈（许钟祜），《马来亚艺术简史》，新加坡：南洋出版社，1963年
- 马来亚共产党，《马共当前民主纲领浅释》，新加坡：马来亚出版社，1946年
- 马来亚共产党，《南岛之春－马共言论集之一》，新加坡：马来亚出版社，1946年
- 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年
- 马来亚文艺历史经验评论小组，《高举党的战斗旗帜，为发展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文艺奋勇前进》，油印本刊物，年份不详。
- 《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编委会，《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上下册），吉隆坡：社会分析学会及朝花企业，2002年

- 马仑，《新马文坛人物扫瞄（1825-1990）》，马来西亚：书辉出版社，1991年
- 马仑，《新马华文作者风采（1875-2000）》，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 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 马士林著、区中华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香港：三联书店，1957年
- 毛起雄、林晓东编著，《中国侨务政策概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
-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
- 麦留芳，《虚拟认同：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新加坡：华裔馆，2012年
- 麦留芳编，《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2002年
- 梅伟强，《五邑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 孟继群编，《毛泽东领导思想论纲》，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 南洋美专出版委员会，《学大》，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1986年
- 南洋小学生（孙中山），〈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也〉，《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五册），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
- 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I）》，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聂德宁，《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
- 区如柏，《寸寸乡土情》，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年
- 欧阳兴义，《悲鸿在星洲》，新加坡：艺术工作室，1999年
- 欧阳兴义，《南洋画伯李曼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 潘醒农编，《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年
- 潘星华主编，《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新加坡：新加坡华校校友联合会，2014年
- 彭伟步，《海外华文传媒概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
- 彭伟步，《新马华文报：文化、族群和国家认同比较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 邱逢甲，《嶺云海日樓詩鈔》，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
- 邱格屏，《世外无桃园：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北京：三联书局，2003年
- 丘克难，《这一条幽静的路》，踏实文化公司，1976年
- 邱克威、徐威雄、庄华兴主编，《学文2：上海书局历史中的时代印记》，吉隆坡：庄华兴，2012年
- 邱新民，《东南亚古代史地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69年
- 邱新民，《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84年
- 邱新民，《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加坡》，新加坡：胜友书局，1991年
- 邱新民，《艰难的行程》，新加坡：文学书屋，1985年
- 邱新民，《昭南时代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90年
- 饶宗颐编，《新加坡古事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1994年

- 人民行动党编，《大选的局势、建国道路、五年计划》，新加坡：《行动报》，1959年
-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
- 《日本侵吞满蒙毒计之大披露》，上海与广州：爱国社，1931年
- 《日本田中侵略满蒙积极政策奏稿与注释》，上海：日本研究社，1931年
- 日本企画院编，赵顺文主译，《华侨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
- 《山岗的脚印-华中人的表演艺术实践1922-2014》，新加坡：新加坡华中校友会，2014年
- 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 世界书局编，《星马通鉴》，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9年
- 少锋，〈谈谈当前马华文艺的几个问题〉，《星洲木器工友联合会文娱晚会特辑》，新加坡：星洲木器工友联合会，1966年
- 史英，《新华诗歌简史》，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
- 斯科特著、王晓毅译，《国家的视角》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
- 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台湾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 苏瑞福著，薛学了、王艳等译，《新加坡人口研究》，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
- 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汕头文史》（第4辑），汕头：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
- 沈仪婷，《谱写虎标传奇－胡文虎及其创业文化史》，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13年
-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
- 释能度主编，《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新加坡：药师行愿会，2010年
- 释证亮、梵辉，《西禅小记》，中国：福州怡山西禅寺刊本，1942年
- 松台、岳典合著，《俯拾篇》，长路出版社，1973年
- 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
- 帅民风，《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 太虚大师，《太虚自传》，新加坡：南洋佛学书局，1972年
- 唐菁编，《新加坡华文教育》，台北：华侨出版社，1964年
- 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 《田中密摺》，南京：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1931年
- 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 王芳，《京剧在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戏曲学院，2004年
- 王赓武著，张奕善译，《南洋华人简史》，台北：水牛出版社，1969年（2002年再版）
- 王赓武著，《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

-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新加坡：新社，1987年
- 王慷鼎，《王慷鼎论文集》，新加坡：南洋学会，2014年
-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95年
- 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
- 王敏，《苏报案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 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
- 王炜中、杨群熙、陈骅编著，《潮汕侨批简史》，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
- 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国：上海著易堂印行，1897年
- 王韬夫编，《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
- 王士谷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
- 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中国：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
- 王振春，《石叻战前老戏院》，新加坡：青年书局，2011年
- 王振科，《同根的文学》，海口：南海传播公司，1996年
- 王植原，《叶德来传》，吉隆坡：艺华出版印刷有限公司，1958年
-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
- 魏维贤编，《新加坡华文书刊，1965-1990》，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1990年
- 吴岸，《盾上的诗篇》，新加坡：新月出版社，1962年
- 吴凤斌，《契约华工史》，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 伍宏，《影视大亨邵逸夫》，中国：团结出版社，2008年
-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
- 吴华等编，《柔佛义兴史料集（1844-1916）》，马来西亚：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2013年
- 吴君玉编，《香港厦语电影访踪》，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12年
- 吴君玉编，《香港潮语电影寻迹》，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
- 吴伦霓霞，郑赤琰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
- 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 吴元华，《华语在新加坡的现状和前景》，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04年
- 吴祖文等著、陈照明译，《华侨基石－银行家陈振传先生之业绩与商道》，新加坡：名创学术出版社，2004年
-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
- 厦门华侨博物馆编，《厦门华侨博物馆藏品精华》，中国：文物出版社，2009年
- 萧村，《国术师》，香港：学问疏导，1951年
- 萧汀，《海上风波》，新加坡：人民文艺出版社，1975

年

- 貂问湄，《小鬼春秋》，新加坡：文汇出版社，1957年
- 小林新作，《华侨之研究 - 中国民族的海外发展》，东京：海外社，1931年
- 篠崎護，《シンガポール占领秘录》，日本：原书房，1976年
- 萧一山编著，《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北平：北平研究所史学研究会，1935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 谢燕燕，《庙宇文化》，新加坡：焦点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辛广伟，《世界华文出版业》，台北：远流，2010年
- 传发法师编，《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简介》，新加坡：佛教居士林，1995年
- 《新加坡庙宇概览》，新加坡：南风商业出版社，1951年
- 唐志尧编撰，《新加坡华侨志》，台湾：华侨文化出版社，1960年
- 《新加坡国家出版总书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1965-2011
- 《新加坡宗乡会馆史略》（上下册），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05年
- 邱炜菱，《星洲上书记》，上海，1900年
- 新加坡佛教总会，《新加坡佛教总会会务报告-196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新加坡：新加坡佛教总会，1966年
- 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夏诚华，《近代广东省侨汇研究（1862-1949）——以广、潮、梅、琼地区为例》，新加坡：南洋学会，1992年
- 新加坡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新加坡：政府出版局，1956年
- 新加坡美术馆，《徐悲鸿在南洋》展览图录，新加坡：新加坡美术馆出版，2008年
- 《星洲日报》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1949年
- 熊彼得著、文何畏、易家详译，《经济发展理论》，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9年
- 徐斌等编，《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论文索引（1996-2000）》，厦门大学，2002年
- 徐斌编，《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论文索引（2001-2005）》，厦门大学，2006年
- 徐斌编，《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论文索引（2006-2010）》，厦门大学，2011年
- 徐斌编，《华侨华人研究中文书目》，厦门大学，2003年
- 徐博东、王志萍，《邱逢甲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年
- 许甦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1950年
- 徐晓望，《福建通史》（明清，卷四），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 许永顺，《新加坡电影界纪要1965-1983年》，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厅，2013年
- 许云樵，《星马通鉴》，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9年
- 许云樵译注，《马来纪年》，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年
- 许云樵主编、蔡史君编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

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1年

- 许直、许钰，《新加坡工商业全貌》，新加坡：华侨出版社，1948年
-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书麓书社，1985年
- 颜清湟，《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
- 颜清湟，《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颜清煌，《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
- 颜清煌，《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 颜清湟著，《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0年
- 颜清湟著、粟明鲜、贺跃夫译，姚楠校订，《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0年
- 杨贵谊译，《阿都拉传》，新加坡：热带出版社，1998年
- 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5）》，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
- 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
- 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商经营策略之剖析》，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
- 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
- 杨进发，《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新加坡：南洋学会，1980年
- 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
- 杨进发编著，《吴钝民政论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
- 杨进发，《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
- 杨进发著、李发沉译，《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年
- 杨松年，《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新加坡：同安会馆，1988年
- 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1年
- 姚梦桐，《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
- 姚楠，《星云椰雨集》，新加坡：新闻与出版公司，1984年
- 叶添博、林耀辉、梁荣锦，《白衣人》，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2013年
- 叶钟铃，《陈省堂文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4年
- 叶钟铃，《黄乃裳与南洋华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
- 叶钟铃、黄佟保合编，《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
- 冈察洛夫著、叶予译，《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 井出季和太，《南洋与华侨》，东京：三省堂，1942年
- 《1985年华侨华人历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

- 易水，《马来亚化华语电影问题》，新加坡：《南洋商报社》，1959年
- 印顺，《妙云集13太虚大师年谱》，台湾：正闻出版社，1990年
- 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 杏影，《愚人的世纪》，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
- 原甸，《马华新诗史初稿》，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
- 原甸，《原甸三十年集》，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1990年
- 袁丁，《晚清侨务与中外交涉》，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 云惟利，《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996年
- 载振，《英韶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
-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 曾纪泽，《曾惠敏公日记》，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
- 曾玲，《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
- 曾玲编著，《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一：1920-1927年会议记录》，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
- 曾玲编著，《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二：1953年-1959年会议记录、1957年-1959年绿野亭坟山迁葬委员会会议记录》，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
- 曾玲编著，《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三（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
- 曾玲、庄英章，《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年
- 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
- 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1年
- 张长虹等编，《东南亚研究中文书目》，中国：厦门大学，2010年
- 章翰，《文艺学习与文艺评论》，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1973年
- 张君房，《云笈七签》（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张克宏，《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6年
- 张礼千，《马六甲史》，新加坡：郑成快先生纪念委员会，1941年
- 张青，《出使新加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 张燮，《东西洋考》，香港：商务印书馆，1937年
-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版，1963年
- 郑海麟著，《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 郑海麟、張伟雄编校，《黄遵宪文集》，京都： 中文出版社，1991年
- 郑良树，《华人文化史论丛》（卷一），新加坡：南洋

学会，1982年

- 郑振清，《工会体系与国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革命源流与革命运动第十一册》，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编，《中国国民党在海外》（第一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61年
-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国同盟会革命史料（一）》（革命文献第六十五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4年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编，《馆藏南洋研究中文资料目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1990年
- 《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6年
- 周南京主编，《华人华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 钟瑜，《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 1900-1965》，马来西亚：艺术学院东方艺术研究中心，1999年
- 钟瑜编，《南洋美术之父林学大》，马来西亚：艺术学院东方艺术研究中心，1991年
- 邹金盛，《潮帮批信局》，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年
- 邹金盛，《潮帮批信局续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 周凯，《厦门志》，福建：鹭江出版社，1996年
-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 周南京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周伟民，《海南移民论文集》，新加坡：海南文化研究中心，2013年
-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周兆呈主编，《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新加坡：八方出版，2011年
- 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 朱齐英编著，《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 1972）》（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出版，2001年
-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 竹井十郎，《南洋华侨阻害日本对南洋贸易之真象》，东京：东亚经济调查局，1930年
- 朱齐英编著，《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 1972）》，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出版，2001年
- 朱维幹，《福建史稿》（下册），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 庄国土编，《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 庄钦永著，《神州域外西潮暗流：十九世纪上半叶马六甲、新加坡中班文出版初探》，新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6年
- 庄钦永，《“石叻梧槽”五虎祠义士新义》，新加坡：南洋学会，1996年
- 庄钦永，《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
- 庄钦永，《新呷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

1990年

- 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
- 庄致颖、黄惠龄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编年书目（1965-2009）》，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1年
-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
- 左秉隆，《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
- 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深埋心中的秘密》，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08年
- Perter Elphick著，陈新才、张清江译，《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新加坡：亚太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

B 英文著述

- Akashi, Yoji（明石阳至）,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Lawrenc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
- Ban Ah Kam, *PUTERA-AMCJA,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 1947*. Kuala Lumpur: Pusat Kajian Bahan Serjarah Kontemporari Tempatan, 2005
- Bellows Thomas,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 Emergence of Dominant Party Syst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Monograph Serious, 1970
- Bilveer Singh,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Singapore*. Singapore : McGraw-Hill, 2007
- Blackbum, Kevin, "Reminiscence and War Trauma: Recalling the Japanese Occputation of Singapore, 1942-1945", Oral History 33(2)
- Blythe, Wilfred, *The Impact of Chinese Societies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Braddell, R., *The Lights of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Buckley, C. B,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
- 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 C. F. Yong,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 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nd edition)
- C. 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1963
- Cameron, John, *Our Tropical Possessions in Malayan India*.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65
- Campbell, Persia Crawford, *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 to Countrie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Reeves. Bibliolife, 1923
- Carl A. Trocki,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191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 Chan Sue Meng, *Road to Revolution*. Singapore: Sun Yat-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2013
-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 Chen Ta,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AMS Press, 1939
- Cheng, Lim-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Chiang Hai Ding, *A Study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eign Trade, 1870-1915*.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78
- Choo, Alexandra Avieropoulou,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at Fort Canning Hill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86
- Chua, Beng Huat, *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1995
- Chung Chee Kit, *Longyamem is Singapore the Final Proof?* Singapore: Friends of Admiral Zheng He, 2003
- Crawfurd, John,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Edinburgh: Archibald Constable and Co., 1820
- Crawfurd, John,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Exhibiting a View of the Actual State of Those Kingdom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828)
- D. Ownby and M. Heidhues, eds, *Secret Societies Reconsidere*.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 *Da Cunha, The Prize of Victory: The 1997 Singapore General Election and Beyo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olony of Singapore,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Ten Years' Programme*.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47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olony of Singapore, *Ten-Year Programme: Data and Interim Proposal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49
- Chng, David K. Y. *Heroic Images of Ming Loyalists, A Study of the Spirit Tablets of the Ghee Hin Kongsi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9
- Dickinson, Frederick R., *World War I and Triumph of a New Japan, 1919-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Donnelly, Ivon A, *Chinese Junks*. Singapore: Graham Brush, 1924
-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Duty to the British Empire. Being an Elementary Guide for Straits Chinese during Great War*. Singapor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1915
- Earl, George W, *The Eastern Seas, or voyages and adventures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 London: W. H. Allen & Co, 1837
- Eddie C. Y. Kuo, Jon S. T. Quah, *Religion in Singapore: Report of a National Survey*. Singapore: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1988
- Edwin Lee, *The British as Rulers governing multi- racial Singapore 1867-1914*.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anoel Godinho de Eredia, *Eredia's Description of Malacca, Meridional India, and Cathay*.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with notes by J.V. Mills. Singapor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0
- Federation of Malaysia, "Joint Statement by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U.K. Cmd., 1963
- Felix Chia, *Ala Saya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 Felix Chia, *The Babas*. Singapore: Times Book

International, 1980

- Fong Sip Chee, *The PAP Story*. Singapore: PAP Chai Chee Branch, Time Periodicals Pte. Ltd, 1979.
- Frank A. Swettenham,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and Malay Languages with Notes*. London: W. B. Wittingham & Co., 1881, rev. edn, 1896
- Francis HK Wong and Gwee Yee Hean, *Official Reports on Education: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870-1939*. Singapore: Pan Pacific Books, 1980
- G. T. Hare (ed.), *A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Sele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Special Use of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rotected Native State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4, 3 Volumes
- George Cherian, *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2000
- Gibson-Hill C. A, *Singapore Old Strait and New Harbour 1200-1870*. Singapore: Raffles Museum, 1956. Memoirs of the Raffles Museum 3
- Gretchen Liu, Angeline Philips, "Wayang: A History of Chinese Opera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88
- Henry Charles Sirr, *China and the Chinese*, Vol. 2. London: W. S. Orr & Co., 1849
- Hanneman, Mary L., *Japan Faces the World 1925-1952*.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2001
- H. C. Whalley Tooker Esq., M.A., LLM. *The King's Chinese — Their Cultural Evolution from Immigrants to Citizens of a Crown Colony*, The Straits Times Annual, 1936
- Heng, T. S. Derek, "Economic networks between the Malay region and the hinterlands of Quanzhou and Guangzhou: Temasek and the Chinese ceramics and foodstuffs trade" in *Early Singapore 1300s-1819: Evidence in Maps, Text and Artefacts*, ed. J. N. Miksic and C. A. Low M. G.,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2004
- Heng, T. S. Derek, *Sino-Malay Trade and Diplomacy From the Tenth Through the Forteenth Century*. Ohi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Ohio University, 2009
- Hiroshi, Shimizu and Hitoshi, Hirakawa, *Japan and Singapore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9
-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Hugh Clifford, *A Dictionary of the Malay Language: Malay-English*. Taiping: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4-1902, 5 v.
- Hussin Mutalib, *Parties and Politics - A Study of Opposition Parties and the PAP in Singapor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
- Irene Lim,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Featuring the William Stirling Collection*.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1999
- Jan Uhde and Yvonne Ng Uhde, *Latent Images : Film in Singapore*. Singapore: Ridge Books, 2010
- John N. Miksic,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Forbidden Hill" of Singapore: Excavations at Fort Canning, 1984*.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Singapore, 1985
- John N. Miksic, "Singapore &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1300-1800)," NUS Press and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Singapore, 2013
- John N. Miksic and Cheryl-Ann Low Mei Gek ed. *Early Singapore 1300s-1819: Evidence in Maps, Test and*

Artefacts.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2004

- John N. Miksic and Lim Chen Shie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Padang and in the St. Andrew's Cathedral Churchyard: St Andrew's Cathedr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 Progress Report Summary September 2003-June 2004". ARI Working Paper, 2004
- John R.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nvert Oper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Morrow, 1987
- John S. T. Quah, Chan Heng Chee & Seah Chee Meow,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Joseph C. Pereira, *Apache Over Singapore: the Story of Singapore Sixties Music Volume One*. Singapore: Select Publishing, 2011.
- Joseph C. Pereira, *Beyond the Tea Dance: the Story of Singapore Sixties Music Volume Two*. Singapore: Select Publishing, 2014
- Joyce C. Lebra ed., *Japan's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 Karl Hack and Jean-Louis Margolin, with Karine Delaye, *Singapore from Temasek to the 21st Century: Reinventing the Global C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0
- Kevin Tan, "The Evolution of Singapore's Modern Constitution: Developments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Day,"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 Singapore, 1989
- Khoo Kay Kim, *The Western Malay States, 1850-1873, The Effects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n Malay Politic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Koh Lian What, "Artefacts from Pulau Saigon," *Heritage 10*.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89
- Kuo Chenyu & Peter S. J. Chen, *Communication Policy and Planning in Singapore*.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3
- Kwa Chong Guan "Records and Notices of Early Singapore" in John N. Miksic,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Forbidden Hill" of Singapore: Excavations at Fort Canning, 1984*.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Singapore, 1986
- Kwa Chong Guan, Derek Heng, Tan Tai Yong, *Singapore a 700-year History from Early Emporium to World City*.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09
- Kwok Kian Chow, *Channels and Confluences: A History of Singapore Art*. Singapore: Singapore Art Museum,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1996
- Lai Ah Eng, *Religious Diversit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 Lee Boon Hiok, "Singapore in 1984"' 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5
- Lee Kuan Yew,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2013
- Lee Kuan Yew, *The Battle For Merger*.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Series, 1961
-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Pte Ltd, 1998

-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Lee Ting Hui, *The Open United Front,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Singapore, 1954-1966*.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6
- Lee Wei Ying, *Singaporean Cinema in the 21st Century: Screening Nostalgia*.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US, 2013
- Leo Suryadinata ed.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ASEAN States, Bibliographical Essay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 Lim, Boon Keng, "The Chinese in Malaya Present Days" in *Impressions of the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China, Hong Kong, Indo-China, Malaya and Netherlands India*. London: Globe Encyclopedia Co, 1917
- Lim Boon Keng, *On Simplicity of Language*, S.C.M., vol. 4, No. 16, Dec, 1900
- Liu Hong, "Internal Structure of 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in *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 NY: Peterlang, 2004
- "Lung-ya-men and Tan-ma-his," *JMBRAS* 42, 1:10-24, 1982
- Lynn Pan (General editor),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1998
- Mak Lau Fong, *Rigidity of System Boundary among major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the 19th Century Singapore*. Singapore: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Nanyang University, 1978
- Mak Lau Fong, *The Sociology of Secret Societie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Maurice Freedman,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on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 No.1, October 1960
- Maurice Freedma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 Longer View*. 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1965
- Munshi Abdullah Bin Sheikh Abdul Kadir, *Hikayat Abdullah (Jilid Dua)*.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Pustaka Antara, 1966
- Mutalib, Hussin, *Parties and politics: A Study of Opposition Parties and PAP Singapor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
- N. B. Dennys,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British Malaya*. London: London & China Telegraph Office, 1894
- National Museum Singapore,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at the Parliament House and the Recovered Artifacts," Unpublished report, NHB, 1990
- Osborn, Sherard, *The Blockade of Kedah in 1838: A Midshipman's Exploits in Malayan Water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ang Cheng Lian, *Singapore's People's Action Party: Its History,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Paul Wheatley, *The Golden Khersonese*.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1
- Peter Borschberg, "A Portuguese-Dutch naval battle in the Johor River Estuary and the liberation of Johor Lama in 1603," in *Early Singapore 1300s-1819: Evidence in Maps, Text and Artefacts*, ed. J. N. Miksic and C. A. Low M. G.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2004
- Peter Borschberg, *Singapura in Early Modern Cartography: A Sea of Challenges, Visualising Space*

Maps of Singapore and the Region.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2015

- Peter Borschberg, *The Singapore and Melaka Straits Violence, Security and Diplomacy in the 17th Centur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0
- Peter Wee, *A Peranakan Legacy: The Heritage of the Straits Chinese*. Singapo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0
- Poh Soo Kai, Tan Kok Fang and Hong Lysa, *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Pusat Sejarah Rakyat Malaysia, 2013.
- Poh Soo Kai & others ed., *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0
- Walter Feldwick, *Present Day Impressions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London: Globe Encyclopedia, 1917
-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PUTERA-AMCJA,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 1947," published by Ban Ah Kam. Kuala Lumpur: Pusat Kajian Bahan Serjarah Kontemporari Tempatan, 2005
- Raja Gopalakrishnam & Kevin Lim, "Singapore PM Make Rare Apology as Election Campaign Heats Up," Reuters, 4 May 2011
- Raphae l Millet, *Singapore Cinema*.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6
- Richard Clutterbuck,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945-1983*. Singapore: Graham Brash (Pte) Ltd, 1985
- Roger Warner, *Shooting the Moon: The Story of America's Clandestine War in Laos, South Royalton*. Vermont: Streerforth Press, 1996
- Rosie Tan Kim Neo,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tudy of the Straits Chinese Way of Life," Un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University of Malaya, Singapore, 1958
- S. Gopinathan "Are We All Global Citizens Now? Reflections on Citizenship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ising Worl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12/001, February 2012
- Saw Swee 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2
-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Singapore: Mission Press, 1880
- *Singapore Lifeline The River and its People*. Singapore: Oral History Dept &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6
- Singh, Bilveer,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in Singapore: An Introduction*. Singapore: McGraw-Hill, 2007
- Song Ong Siang, *"Are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Subjects?"*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3, No. 10, Jun., 1899
- Song Ong Siang, *"Prince Chun and the Kowtow Ceremony," S. C. M.*, Vol. 5, No. 19, Sept., 1901
-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1923
-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 Sonny Yap, Richard Lim and Leong Weng Kam, *Men in White: The Untold Story of Singapore's Ruling Political Party*. Singapor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2010
- Sophen, D, E, *The Sea Nomads*.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77
- Stephan Ortmann, *Managed Crisis: Legitimacy and the National Threat in Singapore*. Saarbr ü cken: VDM Verlag Dr. M ü ller, 2009
- T. R. Doraisamy, *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TC Publication Board,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1969
-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Penerbit Fajar Bakti, 1993
- 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sher, 1988
- Tan Cheng Lock, *Memorandum on the Future of British Malaya*. Bombay, 1943
- Tan Jing Quee & others ed., "The May13 Generation: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 1950s,"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Petaling Jaya, 2011
- Tan Tai Yong, *Creating 'Great Malaysia'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erg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 *The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Proceeding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Feb. 10, 1910
-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Malaya*, Proceeding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Jul,12,1913
- Thio, Eunice, "The Singapore Chinese Protectorate: Events and Conditions to its Establishment, 1823-1877,"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6(1/2), 1960
- Tremewan, Christoph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 London: Macmillan, 1994
- Trocki, Carl A.,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191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ung-tsu Ch'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Vaughan, J. 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79 (Reprint 1971)
- Vasil, Raj., *Asianising Singapore: The PAP's Management of Ethnicity*.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95
- Vernon L. Porritt,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Sarawak 1940-1990*. Melbourne: Monash Asia Institute, 2004
- Wen Ching (Lim Boon Keng), *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 London: Grant Richards, 1901
-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oh: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 William R Roff., *Bibliography of Malay and Arabic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Peninsula Malay States 1876-194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Kuala Lumpur: MBRAS, 2003 (reprint)

- Wurtzburg, Charles Edward, *Raffles of the Eastern Isles*. London: Hodderland Stoughton, 1954
- Yeh Hua Fen, *The Chinese of Malacca*. Malacca: Malacca Historical Society, 1936
- Yen Ching-hwa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Yen Ching-hwang,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1851-191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195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Yong, Ching-Fatt, *Tan Kah-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3

C 纪念特刊

- 《百年基千秋业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一百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07年
- 《新大中文学会1973年文艺创作比赛特辑》，新加坡：新大中文学会，1973年12月
- 《不屈的人们》（1977年文艺创作比赛特辑），新加坡：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1978年
- 《南洋大学师生著作、出版刊物目录》（新加坡：第十一届南大学生会出版委员会，1975年）
- 《成长》（1973年文艺创作比赛特辑），新加坡：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1974年
- 《放眼四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9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6年
- 《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纪念特刊》，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1960年
- 《冈州会馆成立15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冈州会馆，1990年
- 《广惠肇碧山亭118周年纪念特刊：三水会馆发展史略》，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1988年
- 《护国祈安大清醮暨超度法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道教总会，1993年
- 《华人·华语·华文》（推广华语运动2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出版，2000年
- 《华语十年》（推广华语运动1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交通及新闻部推广华语秘书处出版，1989年
- 《华语·新时代》（推广华语运动35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出版，2014年
- 《汇业特刊》（第三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58年
- 《建党十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编辑委员会，1964年
- 《金银业职工联合会庆祝1968年国际劳动节特刊》，新加坡：金银业职工联合会，1968年
- 《孔圣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纪念南洋孔教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双庆特刊》，新加坡：南洋孔教会，1995年
- 《立德传心堂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立德传心堂，1982年
- 《路班让顺天宫福德正神——新加坡路班让顺天宫二百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顺天宫（大公司）有限公司，2012年
-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书刊总汇》，新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4年
- 《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复办纪念刊》，新加坡：南洋美术

专科学校，1946年

- 《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7年
- 《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8年
- 《暖流》（1975年文艺创作比赛特辑），新加坡：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1976年
- 《人民行动党 1954-1979：行动报二十五周年纪念特辑》，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79年
- 《三江会馆百年史纪念特刊》，新加坡：三江会馆，2001年
- 《淡滨尼联合公晋宫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淡滨尼联合宫，2003年
- 《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175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1999年
- 《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成立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2005年
- 《新加坡华校联合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华校联合会，1967年
- 《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新加坡汇业联谊社，1947年
- 《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1918年-1978年》，新加坡：晋江会馆，1978年
-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2年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厦落成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64年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庆祝钻禧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商友出版公司，1966年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81年
- 《行动党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行动党1954 - 1979》，新加坡：行动党中央执委会，1979年
- 《星洲惠安公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923年-1974年》，新加坡：惠安公会，1979年
- 《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刊》，新加坡：星洲日报，1930年
- 《怡和轩90周年纪念特刊（1895-1985）》，新加坡：大水牛出版社，1985年
- 《音乐晚会特辑》，新加坡：康乐音乐研究会，1966年
- 《余娱儒乐社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余娱儒乐社，1972年
- 《源远流长：上海书局65周年纪念刊》，新加坡：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1991年
- 《源远流长：上海书局70周年纪念刊》，新加坡：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1995年
- 《这半个世纪1910-1960，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年
- 《走过狮城七十年1934-2004——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七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2004年
- 《总会三年》，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89年
- 《总会十年》，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5年
- 《总会二十年》，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05年
- 《总会二十五年》，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0年
- 《醉花林俱乐部：流金岁月》，新加坡：醉花林俱乐

部，2011年

- 《新加坡天府会15周年（2000-2015）纪念特刊》，新加坡天府会，2015年
- 《新加坡华源会（2001-2010）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华源会，2010年

D 报刊杂志

- 《晨报》
- 《船史研究》
- 《道讯》
- 《电影欣赏学刊》
- 《东南亚研究》
- 《东南亚研究学报》
- 《凤下周刊》
- 《公报》
-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 《华侨经济》
- 《华侨日报》
-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 《暨南学报》
- 《经济和商业研究国际期刊》
- 《冷战国际史研究》
- 《历史研究》
- 《联合早报》
- 《联合早报星期刊》
- 《联合晚报》
- 《叻报》
- 《马来亚报文摘》
- 《民报》
- 《民声日报》
- 《名人传记》
- 《南侨日报》
- 《南洋佛教》
- 《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画刊》
- 《南洋商报》
- 《南洋问题研究》
- 《南洋文摘》
- 《南洋学报》
- 《南洋杂志》
- 《南洋资料译丛》
-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
- 《清华中文学报》
- 《人类学研究丛刊》
- 《热带学报》
- 《日新报》
- 《狮城道教》
- 《商业时报》
- 《天南新报》
- 《文化遗产》

- 《文物》
- 《文艺生活》
- 《香港电影资料馆通讯》
- 《香港信报》
- 《新报》
- 《新国民日报》
- 《新加坡菜市集邮会会刊》
- 《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学刊》
- 《新加坡月刊》
- 《新青年》
- 《新世纪学刊》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新学》
- 《星报》
- 《星洲日报》
- 《亚洲经济文献》
- 《亚洲文化》
- 《怡和世纪》
- 《艺术天地》
- 《源》
- 《娱乐》
- 《战时月报》
- 《昭南日报》
- 《振南报》
- 《阵线报》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中教学报》
- 《中文系学刊》
- 《中文学会学报》
- 《中兴日报》
- 《总汇新报》
- 《宗教学研究》
- Asian Culture
- Bintang Timor
- Calcutta Englishman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Fourth International
-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 Journal of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 Journal of the Island Society
-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Journal of S.E.Asia Studies
-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catcc Society

- Malayan Saturday Post
- Modern Asian Studies
- Monthly Review of China Affairs
- MyPaper
- Nanyang Quarterly
- Proceeding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
- Singapore Chronicle
- Singapore Chronicle and Commercial Register
- Singapore Free Press
-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 Straits Times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merce
-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 Syonan Times
- The Business Times
- The Straits Budget
- The Straits Times
- The Straits Times Annual
-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835-1869), 15-1-1846.
- Today
-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E 学位论文

- 曹世明，《“多元文化，一种声音”：新加坡电视广播社会史(1965-1974)》，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11年
- 李元瑾，〈邱菽园与辛亥革命〉，广州：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
- 林任君，〈新加坡对西方媒体的反击与新加坡的媒体模式〉，95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1995年
- 麦欣恩，《再现 / 见南洋：香港电影与新加坡(1950-1965)》，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9年
- 叶树景，《黄遵宪与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班论文，1988年
- 许原泰，《中华传统宗教信仰在东南亚的蜕变：新加坡的道教和佛教研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 柯木林，《华人会馆的现代化问题》，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89年
- Cheah Boon Kheng, "The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Dissertation presen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1974
- Chen Omar (2001)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ccurrence of Earthenware Artefacts at the Parliament House Complex Site," MA Thesi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m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Geoff Wade, "Operation Cold Store: A Key Event in the Creation of Malaysia and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ingapore," Presented at the 21st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21-25 June 2010, Singapore
- Lee Wei Ying, "Singaporean Cinema in the 21st Century:

Screening Nostalgia," NU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2013

- Low Mei Gek, Cheryl-Ann, "Discovering Pulau Saig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onours Thesis, Singapore, 1996
- Shah Alam bin Mohd. Zaini, "Metal Finds and Metal-Working at the Parliament House Complex,"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Singapore, 1997
- Wen Chung-chi, "The Nineteenth-Century Imperial Chinese Consulat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64. (Unpublished)

F 官方资料

-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71
- "Annu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Singapore, 1887," in SSGG, April 27, 1888
-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9-1860
-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857
- Arthur Creech-Jones Papers, Rhode House, MSS Brit. EMP. S332, Box 26, File 11
- C.O.106/F.O., 13.12.1880
- C.O.273/213, 05 & 06.05.1896
- C.O.273/537, File 28053, Enclosure to Straits Despatch of 16-02-1927
- C.O.1030/361, Arrests under sedition legislation in Singapore, 1954. See *Fajar*, No.7, 1954-05-10.
- C.O.1030/403, Briefs for Secretary of State's visit to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55.
- C.O. 1030/1158 "Singapor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 1962," pp.161-62
- C.O. 1030/1573 Documents 31 and 32;
- C.O. 1030/1576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 Singapore (1963-65)"
- C.O. Minute, CO/825/42A, 11 July 1945
- Colony of Singapore Annual Report 1954,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 "Letter of Marquis Tseng to Earl Granville, 31.05.1882," C.O.118/F.O., 14.16.1882
- "Letter from Weld to C.O. 21.06.1880," C.O. 103/66
- "Letter of Weld to C.O. 14.03.1882" C.O. 113/106
- "Letter of W. Farquhar to Major De Havilland, 25 July 1819," Christie's Aution Catalogue on Fine Stamps and Coin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26 March 1994
- "Marquis Tseng's Letter," C.O. 118/F.O., 14.06.1882
- "Memorandum Setting Out Head of Agreement for a Merger betwee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Parliament, Cmd. 33, 1961
- "Minutes of the Colonial Office," C.O. 91/142, 27.04.1877
- NL 5937, 6. D. 40, No212/1929, Enclosure No 1 to Straits Despatch,"The Malayan General Branch of the Kuo Min Tang in China," 04-09-1929
- Proceeding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Straits Settlements,, 1 November 1926, p.B161
- "Report by Mr. G.T. Hare, 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 Singapore dated 30th September 1896," in Colonial Office Records (C.O.), 273/218, pp.56-58

- "Report of Committee upon the Condition of Chinese Labourers in the Colony" in Straits Settlements Legislative Council Proceedings (SSLCP), 1876
- "Report of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Singapore, 1880," in SSLCP, 1881
- "Report of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Singapore, 1884," in SSLCP, 1885
-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 held in London in March and April 1957," Sessional Paper No. Misc 2, 1957
-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
- Summons in Chambers, Supreme Cour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2.05.1895
- Supreme Allied Command Southeast Asia to FO, C.O.273/675, 3 September 1945
- "Translation of Proclamation, 16.03.1882," C.O. 118/F.O., 14.06.1882.
- U.K. Lord Selkirk Secret Letter to Duncan Sandy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ated 27 July 1962
- 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FED 115/416/01 "Internal Security Singapore" 1963-65

G 口述历史、讲话

- 白清泉，新加坡口述历史馆，1980年
- 《邓小平副总理在新加坡机场的书面讲话》，1978年11月12日
- 李光耀，《国会演讲记录》，1977年2月23日
- 庄玉花 (Chng Gek Huay, Oral History Cent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Recording date, Accession No.860, Transcription)

H 网络资料

- 〈斌椿：“中土西来第一人”〉，http://www.picturechina.com.cn/bbs/thread-13412-1-1.html
- 〈斌椿：走出去才能看到“西洋景”〉，《凤凰资讯》，2008年7月31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bupingdengtiaoyue/news/200807/0731_4259_686409.shtml
- 瓜田，〈标点符号是怎样诞生的〉，《求是理论网》，2010年05月13日，http://www.qstheory.cn/ts/zxyd/xszlhj/201005/t20100513_29593.htm
- 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料库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
- 《黄遵宪 ——〈赠梁任公同年〉》，http://tieba.baidu.com/f?kz=100387319
- 经济发展局网页http://www.edb.gov.sg/content/edb/en/about-edb/company-information/our-history.html
- 莲山双林寺网站http://www.shuanglin.org/
- 梁永佳、 阿嘎佐诗，〈在种族与国族之间：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731437.html
- 《柔佛州人民之友》网页
- 邵氏电影年表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529/20/1630322_120339565.shtml
- 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2015
- “文史达人”博客http://blog.omy.sg/sgstory/archives/776
- 吴春燕，陈亮谦，〈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感动今人〉，《光明日报》，2005年3月30日http://www.gmw.

cn/01gmrb/2005-03/30/content_206047.htm

- http://www1.mediacorp.sg/raintree/instoo/filmText.swf
- 新加坡道教协会网站 http://www.taoism.org.sg
- “新加坡灯谜协会”博客——《新加坡华文电视剧专题猜谜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3c9370101oj18.html
- 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网站http://www.mda.gov.sg/IndustryDevelopment/IndustrySectors/Film/Pages/Film.aspx
- 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网页http://www.mda.gov.sg/IndustryDevelopment/IndustrySectors/Film/Documents/5%20-%202013%20No.%20of%20Cinema%20Screens%20and%20Capacity.pdf
- 新加坡文献馆网站——《从新加坡电影的发展谈当地电影的困境》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03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线上目录（2008-2014）统计
-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线上目录，1988-2014
- 早报网2004年9月11日到24日的读者调查数据
- “钟晓”博客——《由〈桥的两岸〉谈发展本地电影》http://zhongxiao33.wordpress.com
- 郑燿霆的《从新加坡电影的发展谈当地电影的困境》，取自新加坡文献馆网站，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03
- “周星星”博客http://blog.chinatimes.com/jostar2/archive/2008/05/13/278053.htm
- “A bleak future for cinemas when TV comes- producer”，取自http://newspapers.nl.sg/Digitised/Article.aspx?articleid=freepress19610811-1.2.55
- Amir Muhammad 博客http://www.movingimagesource.us/articles/p-ramlee-superstar-20110318
- InSing.com Movies http://movies.insing.com/feature/a-look-back-at-jack-neo-movies/id-cd453101/
- http://award.mtime.com/14/2005/
- http://blog.chinatimes.com/jostar2/archive/2008/05/13/278053.html
- http://www.erickhoo.com/
- http://kelvintong.wordpress.com/2008/04/02/kelvin-tong-writerdirector/
- Ilo Ilo 《爸妈不在家》网站http://www.iloilomovie.com/press/
- http://mypaper.sg/entertainment/xin-bing-zheng-chuan-yin-le-ju-zhi-zuo-fei-liao-chao-guo-150mo-20140117
- Media 21: Transforming Singapore into a Global Media City Creative（下载自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mn.gov/mnddc/asd-employment/pdf/03-M21-MDA.pdf）
- “Our Lives in Motion Encapsulated”博客
- “Sam's Alfresco Coffee Shop”博客
- Sina 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m/2013-11-25/102328803379.shtml
-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
- "Singapore Window" http://www.singapore-window.org/
- http://ourlime.wordpress.com/2011/11/22/mat-yoyo-returns-in-2012-in-4-singapore-languages/
- 网上资料http://www.movingimagesource.us/articles/p-ramlee-superstar-20110318
- http://www.sammyboy.com/showthread.php?106726-

Hello-again-quot-Mat-Yoyo-quot&s=765635le6a4eb7f0d b3aa2de6dc9c66d

- Zhao Wei Films （昭玮电影公司网站）http://legacy.zhaowei.com/liangpopo.htm
- 62http://www.todayonline.com/blogs/ratedg/singapore-film-ilo-ilo-wins-historic-cannes-prize
- http://news.sina.com.cn/m/2013-11-25/102328803379.shtml
- http://wanbao.omy.sg/hot-story/%E7%88%B8%E5%A6%88%E4%B8%8D%E5%9C%A8%E5%AE%B6
- 2003年11月12日的《今日报》报道，刊登http://www.singapore-window.org/sw03/031112to.htm
- Yolada Chin and Norman Vasu, "Multiculturalism in Singapore: The Ties that Bind and Blind," dr.ntu.edu.sg/bitstream /handle/10220/4290/ rsisc 116-07.pdf?Squence=2, Accessed on 31st August 2007
- http://en.wikipedia.org/wiki/Labour_movement_of_Singapore
- http://www.mom.gov.sg/employment-practices/tripartism-in-singapore/Pages/default.aspx
-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ase_Buyback_Scheme
- http://www.hdb.gov.sg/Fil0/fil0296p.nsf/PressReleases/889ID802BA22AA6E48257D4800212EEA?OpenDocument
- http://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1f669eff-bc82-49d1-a27c-2624e4cab8c6
- http://www.ura.gov.sg/skyline/skyline12/skyline12-03/special/URA_DesigningourCitySupplement July12.pdf
- http://population.sg/whitepaper/resource-files/population-white-paper.pdf
- http://mycpf.cpf.gov.sg/CPF/About-Us/HistoryofCPF.htm
- http://www.mom.gov.sg/employment-practices/employment-rights conditions/ cpf/ Pages/ default. aspx
-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Provident_Fund
- http://www.singaporebudget.gov.sg/data/budget_2014/download/annexb2.pdf ANNEX B-2: CPF
- CONTRIBUTION RATE CHANGES AND RELATED
- http://www.scdf.gov.sg/content/scdf_internet/en/cor

I 其他资料

- 《道教总会会议记录》，2002年—2013年
- 《福建会馆改组后第一届议案及帐目报告》，1931年
- 《庆德会创会章程》，1831年
- 《新加坡道教总会章程》
- 《新加坡人口普查报告》，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
-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试办章程》，1906年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50年11月、1951年5月
-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丙午丁未（1906/1907）两年征信录》
- 国家博物馆《电视50周年》特展（2013年）
- 国家博物馆“光艺故事”电影系列（2013年）
- 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FED 115/416/01 “Internal Security Singapore” 1963-65
- 新加坡全国总书目（Singapore National Bibliography），2011年序言

- 马来西亚统计局，〈家庭收入与基本设施调查报告2009〉，2012
- 马来西亚统计局，〈家庭收入与基本设施调查报告2012〉，2013
- 香港政府统计处，〈2006人口普查-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2007
- 香港政府统计处，〈2011人口普查-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2012
- 《中国抗战歌曲选（一）、（二）》（唱片），香港：百利唱片公司，1993年、1995年
- Codicil to the Will and Testament of Tan Kim Seng, 17.12.1863

编后语

2014年6月，当我们第一次对外发布消息，谓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将于2015年11月出版《新加坡华人通史》一书后，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可能吗"？"有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就写好一部华人通史吗"？

这些疑问也不无道理！新加坡虽然历史浅短，但要有系统地梳理亦非易事。

其实，早在对外发布消息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拟定全书大纲，选择专题，还有寻找适当的撰稿人等。换言之，当第一次对外宣布出版消息时，我们的工作已经做了一大半。2015年7月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联合早报》以大版篇幅报导，用了"宗乡总会庆SG50耗时三年多完成"的标题，完全正确。

经过了三年多的不懈努力，这部80多万字，厚826页，有300多幅插图的巨著，基本上已经编辑完成。按照惯例，应该说几句编后感言。

曹雪芹在其名著《红楼梦》的第一回题诗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用于形容其著述之艰辛。这本《新加坡华人通史》虽然没有用上十年的时间，也不是字字皆血，但三年半的审稿、批阅、校对、编辑的工作，的确也是付出了不少心血。然而，考虑到这是一部记录先贤事迹，可以传世之典籍时，所有的辛劳还是值得的！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首部以华文撰写的华人通史，我们一开始便将此书定位于"学术与通俗"之间。这也是一部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完成的巨著。我们做了大量的考证、研究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谬误，目的是要为后人保存一份真实准确的历史档案，还原历史面貌。我们更希望这部通史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协助各地华人了解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使"新加坡华人史"成为一个专门的史学研究领域。

在此，我们要向所有协助完成这部《新加坡华人通史》编辑工作的同仁们，包括几位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的同学，表示谢意。宗乡总会秘书处的职员卓敏、卢碧霖，虽然她们已经离职，但她们早期的贡献不可抹杀；特别要感谢现任秘书处职员欧雅丽，在出版任务最为繁重的时刻，她承担了很多编辑工作。这部史著的完成，算是我们做了这一代人的工作，接下来一百年或更长远的历史，留待后人继续谱写！

新加坡華人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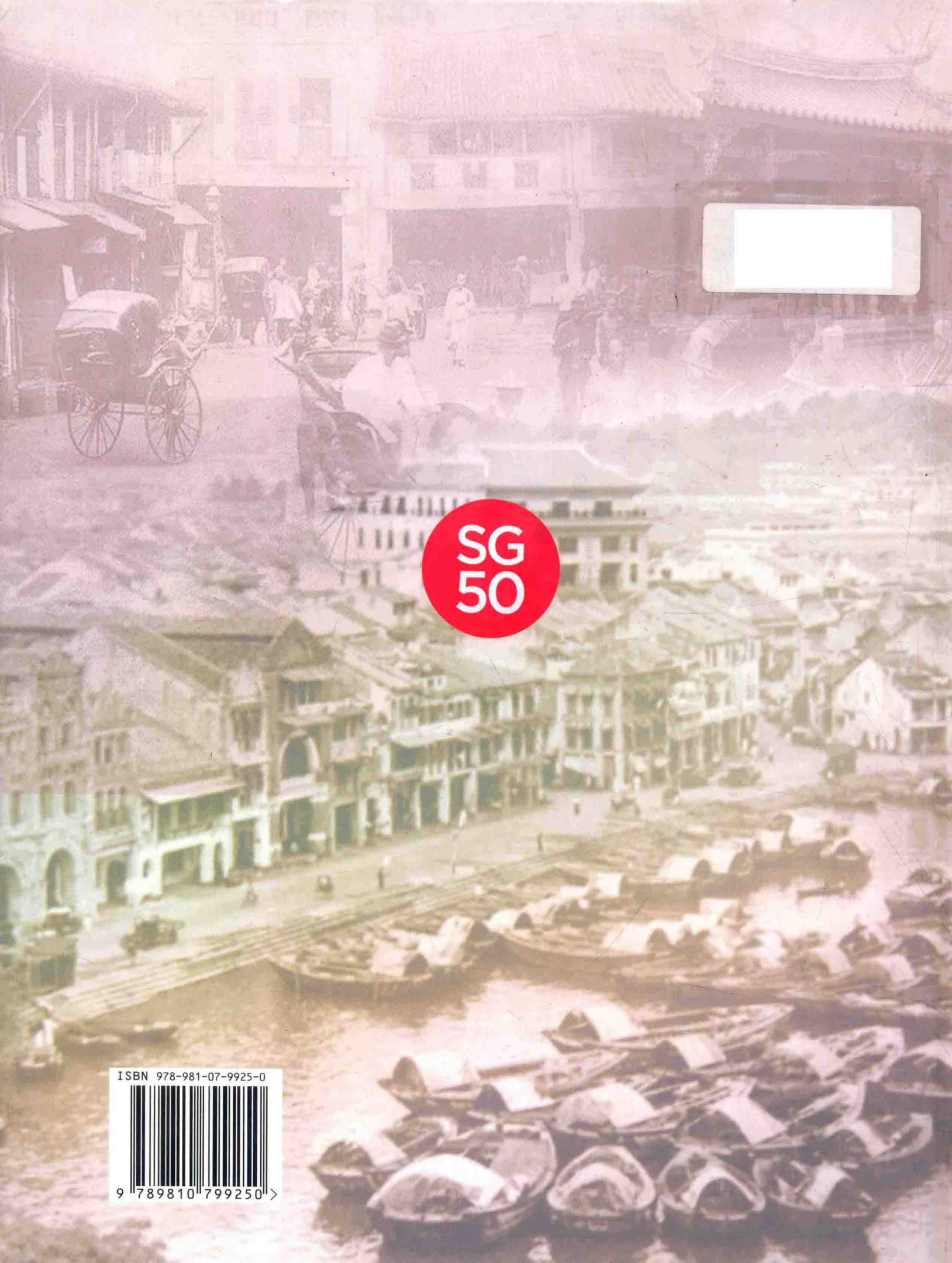
编辑委员会

2015年7月21日

鸣谢

这部《新加坡华人通史》能够成功出版，背赖各界人士鼎力相助，尤其是下列机构和个人的慷慨赞助，谨此致谢。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
福建基金
李氏基金
养正基金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新加坡三江会馆
新加坡海南会馆
陈延谦基金
新加坡永春会馆
新加坡永定会馆
南洋客属总会
新加坡福州会馆
曾宪民
高允裕
陈文平
杜志强



ISBN 978-981-07-9925-0